



良

知的拷问

孙忠涛

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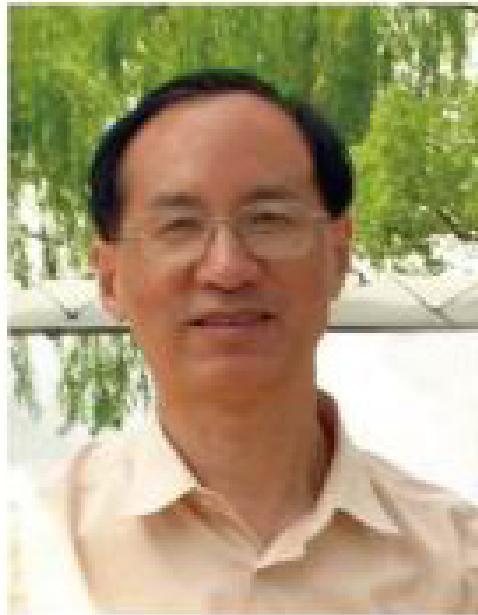
在清华文革初期的政治光谱中，蒯大富在我的左边，沈如槐在我的右边，我居二者间。在蒯大富的左边是刘才堂，在沈如槐的右边是周泉缨。与我站在同一点的是汲鹏，以及我们背后的「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

很遗憾，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它们离正确都相距甚远。

ISBN 978-988-18318-3-5

9 789881 831835

H.K.\$ 168.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作者简介：

孙怒涛，1960年至1980年在清华大学
自动控制系（现计算机系）上学、任教。

在清华文革初期担任过：

- 「怒涛」战斗组组长
- 「第一湘江」战斗组组长
- 「天安门纵队」主要负责人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委员
- 「414串联会」勤务组主要成员
- 「三七战团」主要负责人
- 「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第二把手

文革是一个大劫难，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革是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国本也震醒了中国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显一党极权体制严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炼狱，拷问着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

—— 献给
或近在咫尺
或远在天涯
甚或阴阳两隔的朋友们！

文革回忆录丛书

良知的拷问

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孙怒涛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丛书名 文革回忆录丛书

书 名 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著者 孙怒涛

责任编辑 多 喜

封面设计 严 雨

出 版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香港新界粉岭安全街 33 号丰盈工贸中心 5 字楼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00852-3921-6033

Fax: 00852-2528-5333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规 格 开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84.2

字 数 931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988-18318-3-5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定价: HK\$ 168 元

总
目
录

【序】

- 杨继绳：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 ······ 1

【文革·反思】

- 王允方： 磊落的一生 ······ 25
王允方： 求索与启蒙 ······ 32
孙耘： 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 119
李仕林等： 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 163
沈昆： 否定文革面面观 ······ 185
陆小宝： 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 211
周家琮： 文革春秋 ······ 232
郑易生： 反思极端思维方式 ······ 256
胡鹏池： 清华园的一只蝴蝶 ······ 268
唐伟：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 ······ 293

【文革回忆录】

- 孙怒涛： 良知的拷问 ······ 340

【实时·连载】

- 孙怒涛： 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 ······ 707

【后记】

762



序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

——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杨继绳

孙怒涛是我在清华的同学，我们都是1966届的，都因文革延迟分配，因而共同经历了清华文革的全过程。如今，我和老孙都退休了，在百年校庆上相会。不久，他就发来了《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写的他在文革中的经历，让我读后写点东西。读了这本著作的初稿，产生一些想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最后毛泽东还是采取刘少奇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

毛没有直接管清华的文革，是通过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来贯彻他的意图。中央机关一些人，也根据自己探测的毛泽东的意图，把清华学生当枪手。阮铭就是一例。

8月19日，唐伟、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当时有同学对我说：“快去看唐伟他们的大字报！你曾贴过王光美的大字报，要不要再写一张帮唐伟添把劲？”

我看了唐伟他们的大字报，感到很震惊：我的大字报说王光美“定调子”，是我亲耳听到的，她当政治“大扒手”我怎么能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唐伟哪里来的这股勇气。2009年我向唐伟提出了这个问题。唐伟回答说：是阮铭让我们写的。写完后我们还不敢贴，放了几天，还是阮铭鼓励我们贴出去的。当时阮铭是中宣部的一名干部，可能他得知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就让学生们冲在前面。文革后，

阮铭发表了很多文字，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刘少奇与清华文革

刘少奇最先插手清华文革。他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最早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如果不是从自己家里摸了底，我想他们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陈继芳描述了她亲历的过程：

有一天，刘涛、贺鹏飞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一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那是一次神秘的会议，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一样的通知形式，一样的召开方法，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一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你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你们！”刘涛说：“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她的话使我们万分激动，由于是秘密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低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子弟。¹

当时的中央已经是“两头蛇”²，一个头是毛泽东，一个头是刘少奇。刘涛说的“党中央”显然是刘少奇主持工作的“党中央”。

根据刘少奇的指导思想，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一进校就罢免了学校的全部官员，完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刘少奇直接过问清华的文革，派他夫人王光美当工作组的顾问。正像中央文革小组对江青唯命是从一样，清华工作组在王光美面前当然也是唯命是从的。王光美来清华时，一位目击者有一段描述：

6月的一天，自控系63级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³

¹ 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2011年自印本，第22页

² 中央是“两头蛇”是毛泽东说的。陶铸、叶剑英在不同场合都向邱会作谈到这个说法。见《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34页

³ 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记忆》第86期

孙怒涛注：樊程看到这一段话以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他在信中说：“当时我担任班级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兼负安排系内各班派人到校门值班（戏称九门提督）。那天我正在东校门与值班人员聊天，无意之中见到了王光美骑自行车来到校门口，在做了登记后，又骑上自行车向校内驶去。开始没认出来，待守门师傅把登记簿拿给我看时，才知道来者是何人，急转头望过去，她已骑车奔向主楼方向而去，只能注视个背影。我没见到王光美乘小车到校门前，更没见到她从小车后部搬出自行车，只是后来看到有大字报披露：王光美乘贺龙办公室派出的中吉普到林学院附近下车，改骑自行车。”

王光美一脚踏进清华，就惹下了决定她和刘少奇命运的大麻烦。

我一直无缘见到王光美。孙怒涛描述了他亲眼看到王光美的情景：

7月30日，中饭时间，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饭来了！

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想一睹她的风采。其他几个售饭点上卖饭打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可怜。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筐箩的馒头、窝头再放一大搪瓷盆菜。

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那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录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4-P23]这是记录在清华文革大事记上的话。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可能是我走了以后有人这样呼过，也可能是她在别的食堂卖饭的时候有人呼过。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大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把清华大学当作“桃园”，把她的“桃园经验”用到清华来了。她左手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分子”，右手把700多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她6月来清华，一直深藏不露。连已经承诺和工化系学生见面，还是找了替身，造成了把蒯大富推上政治舞台的一场误会¹。然而，毛泽东批评工作组以后，她频频现

¹ 6月21日，王光美原来约定和工化系的学生开座谈会，开会时来了一位女士，蒯大富等以为是王光美，后来才知道不是，蒯大富等写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进一步加深了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怀疑。

身，又是讲话，又是卖饭。她是想“挽狂澜于既倒”，还是想作一个精彩的告别？我想，这应当是毛刘角逐溅出的一朵小浪花。

薄一波和刘少奇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刘少奇派到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薄一波在国家经委的副手。薄一波当然十分关心清华文革。他至少两次到清华，他到清华如何指导工作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同蒯大富那场精彩而有趣的对话已广为传播。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看《清华蒯大富》这本书。这场对话发生在科学馆和大草坪间的那条路上，当时我在那里看大字报，可惜只赶上了一个尾巴，看到了一位头发稀疏的“胖老头儿”在人群众中指指点点地说什么。

我从延庆四清工作队回来以后，工作组指定我为“汽六一”班的文革组长、团支部书记。负责我班的工作队员是一位来自林业部的赵女士，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凡事请示她的上级、“汽六”年级工作组负责人是王茂林。王茂林也是林业部来的。刚开始我是听工作组的。“汽六五”的李文藏、电机系的甘小杰和“汽六一”的吴文忠从林学院抄了《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署名“李小忠”在清华张贴。由于这个谈话和工作组的精神不一致，他们被工作组打成“小三家村”，在大礼堂开批斗会。作为班上的文革组长，我也参加了批斗会的组织工作。吴文忠是调干生，是我班的大哥，对他的批判我一直心怀愧疚。后来工作组还要批判我班另一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我不同意，和王茂林吵了一架。

王光美整蒯大富我开始不在意。她组织了万人针对蒯大富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蒯大富”的口号。我在游行队伍中想：这么大的政治压力，蒯大富会怎么样呢？后来看到蒯大富那么坚硬，我心中暗暗佩服和同情。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天晚上，在同学们激烈批评工作组的发言以后，王光美竟然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拐弯抹角地为工作组辩护。她说：“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还公开讲她和刘少奇的“生活关系”。当时刘少奇还很有威望，她搬出刘少奇，使我们感到她有以势压人的味道。她还没有讲完，我就贴出了上述大字报，说王光美的讲话为辩论工作组问题“变相地定了调子”。当时《人民日报》批评走资派在群众运动中“划框框，定调子”。我这里用“变相地定了调子”，为王光美留了一点余地。王光美在她的10月10日的检查中采纳了“变相地定了调子”这句话。这天晚上，叶志江也贴了批评王光美的大字报。

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期间，每天回家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对清华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有直接责任。刘少奇还深夜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当时有人把“梁思成日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了，其中有两句自责的话：“我有两个缺点，一是好逸恶劳，二是爱玩女人。”刘少奇看了说：“梁思成跟他父亲一样的坏！”刘少奇这样贬损梁启超我很吃惊。

周恩来与清华文革

毛泽东7月18日回北京不久，就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周恩来在清华的几次活动中说：“党中央、毛主席叫我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找了两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开座谈会，听取学生们对清华文革的意见，每个座谈会三个小时。一个座谈会是“临筹”的头头，即刘涛、贺鹏飞等人；一个座谈会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即雷蓉、王小平等。当时蒯大富还没有平反，31日，周恩来又两次共用6个小时听取了蒯大富的汇报。这三次活动大概是调查研究，可能是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准备。几天以后，8月4日，他就到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话。8月22日，再一次在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话。

周恩来同临筹的头头谈什么不得而知。找批评工作组的那一批人座谈，当中有我。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王光美同志在定调子》那张大字报的原因。那是星期六下午，我们从甲所乘一辆旧吉普车到人民大会堂（雷蓉、王小平以外的8人）。参加座谈会的共10人，有雷蓉（外贸部长雷任民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张征尔（自0的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学），还有工化系6年级一位姓鲁的男同学，其他几位记不得了。雷蓉、王小平、张征尔等高干子女称周恩来“周伯伯”，我们称“总理”。座谈会开了3个小时。我回来后作了追记，现在还留着。

周恩来叫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时我们像课堂上老师点名一样站了起来。周说：何必这么客气？不要站起来，我们随便些。他问每一个人的年龄、几年级、家庭出身，父亲干什么，祖父干什么。我们中间有几位不知道祖父是干什么的。周笑着说：“这可不行，要了解家史，过五关嘛，家庭是一关。要了解祖宗三代。社会调查必须揭三代，挖思想影响必须追究三代。当然最后还得看本人表现。”

“揭三代”？在以后血统论横行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三个字。

周问到一位同学的母亲干什么，这位同学说：“她走了！”周问：“怎么走了？”这位同学说：“她和我父亲离婚了，和别人结婚了！”周问：“你去看她没有？”这同学说没有看她。周说：“看来你还有点封建，她离婚是按婚姻法办事嘛，你为什么不去看她呢？有人说我们老年人有旧框框，看来你们年轻人也有旧框框，”说到这里，周笑了：“嘿嘿，我抓你的小辫子了，你回去给我贴大字报吧！”

周问我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周说：“大学还有六年级？太长了，陆定一就是喜欢长！”

雷蓉说：“过去被当做‘蒯派’整过的人现在矛头指向了文革干部，这些文革干部原来都是反蒋的左派，我觉得这样不对。过去整‘蒯派’只能怪工作组，

不能怪这些学生干部。”几位同学同意雷蓉的意见，周总理也同意。

一同学问：“为什么叶林不承认错误？”周说：“总得有一个认识过程嘛，别看他岁数很大，他没有想通的时候和你们年轻人一样。”

一位同学说：“周伯伯，你昨天在人大会堂讲话时说错了一个字，把自上而下说成了自下而上。”周说：“昨天我没有讲稿，只有一个提纲。少奇同志的讲话也没有稿子。只有小平的讲话有稿子，我们都看了。我是 68 岁的人了，心里想的和嘴里讲出来的有时不一样。你们对我的讲话可要一分为二呀！”

我接着问：“对毛主席的讲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为二！他的讲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多年以后我想到，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是同一个意思。

周还和大家讨论了下一阶段如何“斗批改”的问题。

在座谈中我们虽然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问题，他总是滴水不漏。周恩来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孙怒涛在他这本书中记录了他亲历的周恩来的一个细节：

记得有一次接见过程中，周总理起身向边上走去，可能是想到卫生间去。走到半途，忽然听到接见的人群中不知那个造反派唱起了国歌。我远远望去，听到国歌声的周恩来马上停住脚步，端着右臂，一动不动地凝立在那里，直到这边唱完以后才再起步。那份不留下一丝把柄的小心谨慎，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的事情很多。我只写我亲身经历的事。他在清华参加的两次万人大会已被记入史册，清华校友们已经对两次大会补充了不少细节。8月22日那次我再补充一点细节。为了和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唱对台戏，8月22日，我们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系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我和任彦申组织起来的。当时我们争取到了“保卫总理”的任务（其实中央警卫局已有保卫，我们只是象征性地在外围站岗），十分高兴，十分光荣。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是红绸子袖章，我班把王敬同学的红床单撕了做袖章。那天下大雨。周恩来站在雨中讲话，有同学给他打伞，他推开了，执意要在雨中讲话。全场万人齐声高喊：“打伞！”“打伞！”“为总理打伞！”场景是很感人的。

毛最后还是采用刘少奇治理清华的办法

毛从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入手介入清华文革，最后还是采取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不过，他派出的不是 500 多人的工作组，而是 3 万多人

的“工作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还得从清华的文革过程说起。孙怒涛的书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我再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概述一下。

工作组主政期间扶持成立了以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等高干子弟组成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临筹”），我们称之为“伪临筹”。“临筹”成立时，我在大礼堂草坪南头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很简单：“毛主席说‘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高干子弟没有吃过苦，他们不可能是左派，不是左派怎能当‘临筹’的领导？”“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是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的一句话，这个谈话在文革前就传达了。“不是左派不能当领导”是当时通行的政治标准。这张小字报贴出后，周围写满了批评和支持的批语。

工作组撤出清华以后，“临筹”在清华主政。但他们控制不了局面。

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反工作组的学生，成立了一些“战斗小组”。工作组撤了以后，就清算工作组“余毒”、批判“伪临筹”。在我们系有两个比较活跃的战斗组，一个是我组织的“云水怒”，成员有钱寿民、周泉缨等人；另一个是任彦申组织的“刺刀见红”，成员有尹尊声、孙述璞等人。我们两个战斗组观点一样，经常写大字报互相呼应。钱寿民和周泉缨口才好，让他们当了“云水怒发言人”，他们俩经常在大礼堂的辩论会上发言。全校这样的战斗组很多。大礼堂的辩论会也很多。唐伟、陈育延、孙怒涛等都是活跃分子，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千钧棒”的头头沈如槐经常到我班来找钱寿民搞“革命串联”。这些战斗组都是清算工作组、批判“伪临筹”的。没有参加“破四旧”，没有搞武斗，更没有搞“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不过，学校行政中心工字厅门前的两尊大石狮子被拖到百米开外，是我们这批人干的事。

“临筹”领导成员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蒯的主导力量。8月7日，“临筹”提出结束对工作组的批判，把斗争方向转到批“黑帮”上，即“八七建议”。显然“八七建议”是保工作组的，背后是保王光美、保刘少奇。8月8日，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学生组织“八八串联会”，否定了“临筹”的“八七建议”。8月9日，支持“临筹”的刘菊芬（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刘宁一之女）等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坚持“八七建议”。成立“八九串联会”是王光美支持的。清华大学就这样分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组，一派要立即批蒋南翔。当然，“八八”派并不保蒋南翔，只是说肃清工作组的影响以后再批蒋南翔。“八九”是多数派，是和“临筹”一体的掌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八九串联会”就翻牌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派，在强大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面前，我们感到势单力孤。自控系的孙银基（即孙怒涛）写了一篇《少数赞》，对我们

鼓舞很大，孙银基也在造反派中一举成名。

8月24日，贺鹏飞等组织十二校的中学生红卫兵撕掉了全部大字报，用皮带殴打不同意见的人，强迫“黑帮分子”拆二校门，孙怒涛在书中记录了他的见闻。那一天我也在现场。事后我们一批人到府右街中央接待站去告状，身穿灰色毛料中山装的周荣鑫接待了我们。他没有表示支持我们，使我们失望。

我们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本来是继蒯大富之后起来的，但蒯大富已经被工作组搞得很臭。给他平反以后，他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接纳他。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建议我成立一个组织。”¹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9月24日，蒯大富等组织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正式成立，他们想在校广播台上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不同意。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三司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才发展起来。

这样，清华大学就出现了三个学生组织：以刘涛、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八八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以后，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渐式微，到年底基本解体。剩下的两个主要的学生组织都是造反派，一个温和一些，一个激烈一些。清华大学红卫兵解体以后，其中很多人归附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旗下。

在江青的说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此时保守派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华一统天下。井冈山兵团总部就成了管理清华的权力机构。曾经总管全校行政事务的是张学琛。蒯大富倒霉后，张学琛也跟着倒霉。他当不了官，出不了国。在百年校庆的一次聚会上张学琛满怀委曲地对我们说：“我管事的时候你们的助学金少了一分钱吗？教职员的工资少了一分钱吗？我贪污了一分钱吗？食堂照常开饭，医院照常门诊，那时我才20出头啊！”张学琛是一位管理人才，文革耽误了多少这样的人才啊！

虽然联合了，井冈山兵团内部在一些问题上常有争论。例如，1967年“捉鬼队”通过欺骗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华，在西大操场批斗，号称“智擒王光美”。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持批评态度。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和“清华井冈山兵团”有对立之势。5月29日正式成立“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这样，清华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老团儿”，是掌权的多数派）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38页

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在野的少数派）。我也成了“老四”。蒯大富不承认“四一四”是造反派，说我们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¹，代表人物就是唐伟。“团派”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是一个很光荣的称呼。谁会想到，文革被全面否定以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了。

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持续了一年半的斗争。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两派头头们采用了种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对付对方。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清华有很多重要的机密专业，向学生传授很多重要的机密技术。现在，最重要、最机密的技术——权术，已经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头头们，都产生在极权制度下，都尊崇阶级斗争理论，难道还期待他们有什么政治文明吗？看到两派头头们不停地要权术，多数群众是厌恶的，外出串联的，逍遥派的越来越多了。权术表演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然而，已经登上舞台的演员们还得继续表演。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团派”想凭借他们的优势地位，实现两派联合、尽快建立以他们为主导的革委会（革筹小组共22人，其中学生代表13人，团派9人，四派4人）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两派还签订了促进联合的协议。后来“四一四”不同意签订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一直无法联合，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

看到很多省市建立了革委会，蒯大富也急于建立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几次明确地表了态，要求老四支持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以团派为主体的革委会筹备小组提出：“拿出12分干劲，下定24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招贴画到处张贴，宣传车四处广播，还向全国各地发电报、挂长途，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全国皆知。兵团总部上上下下，齐心合力，忙忙碌碌，高音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来贺喜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到校。

蒯大富不仅限制四派进入革委会的名额，还在舆论上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一四。对于四一四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采取“先搞臭，再进来”的办法。这是学习毛泽东中共七大时对王明的办法。老四不希望成立这样的革委会，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建立红色政权”。老四决定来一个釜底抽薪：5月29日，四一四串联会正式从井冈山兵团里分裂，成为独立的“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在毛主席号召“大联合”的政治气候中搞大分裂，这是一个政治风险很大的事。谁也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候，周恩来帮了老四的忙。孙怒涛在书中记录了这一关键时刻：

¹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一些小地主也挂上红布条参加革命

5月30日凌晨4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这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414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革委会成了泡影，两派更加尖锐对立。蒯大富看到聂元梓用武力解决了她的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发起武斗。四一四也不是等闲之辈，在4月23日之前就到处占楼，武斗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7日，号称“百日大武斗”，11位大学生在武斗中失掉了年轻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武斗，老团和老四同归于尽。

毛泽东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刘少奇的工作队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外力介入，都是全面接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权力。都不是采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毛泽东采用刘少奇的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原来设想文革搞半年，后来不行，延长一年，现在“天下大乱”两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还没有影子。他派出的支左部队很多支持了保守派或造反派中的一派，各地的造反派都分裂为不同的派别。造反派不同组织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出现了混战，很多地方发展为真枪实炮的武斗。1968年夏天以后，“大联合”、“三结合”成了主调。已经复职的官僚们和支保部队一起挤压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愿地被边缘化？各地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对抗行动。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为了迎战用支左部队的枪支武装起来的“广西联指”，竟然拦截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为此发了严厉的“七·三布告”。造反派，当初作为毛为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不仅没有作用，反而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江青说：“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8年7月17日，由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八·三一”头头武传斌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个会议，准备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北京造反派头头也出席了会议。虽然这些造反派是在受压的情况下采取的反抗行动，但违反了“大联合”“三结合”的战略部署，特别是想建立中央早就明确不准建立的全国性组织（1967年初就已经明令取缔了几个全国性组织），犯了大忌。这个会被定为“黑会”。

1968年7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接见广西来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军队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当时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口径一致地严厉斥责了造反派，审判式地追问这个“黑会”的详细情况。陈伯达在会上点名批评蒯大富：“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警告不听话的造反派：“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事后，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真的当土匪被围剿了，广西“四·二二”十万人被屠杀。其实，搞极端行为的不单是“四·二二”，他们的对立面“广西联指”也是搞了的。军队和一些老干部支持“广西联指”，“四·二二”没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对造反派已经没有耐心了，对广西的“七·三布告”，7月25日“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们对广西来京人员的严厉批评，就说明毛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群众组织问题。而军管、派庞大的工作队是最有效的办法。

7月27日派工宣队之前，蒯大富等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他完全不知道进驻清华的大批工人、解放军是毛泽东派来的，还以为是“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红卫兵小将”！他跑到电报大楼向中央发电报求救。就工宣队进清华一事，毛泽东对蒯大富说：我这是来为你解困，“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团派会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

如果在派出工宣队之前向蒯大富打好招呼，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个招呼是必须打的。7月28日，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周恩来虽然对清华两派没有表示

明确的态度，但倾向是很明显的。如果通知了蒯大富，可能是另一种结果：蒯大富不会犯武装反抗的错误。两派在工宣队的帮助下联合。在联合中蒯大富还是占主导地位。多年来，周恩来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疑，一直不谈战略，只管操作。但他心中不是没有战略，而是通过操作上的细节来实现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造反派 保守派

为什么群众在文革中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孙怒涛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的回答：

大学六年中，各种政治运动和繁多的活动从没间断过。

逐渐地，班上同学分成了两个界线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点轮廓的群体：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优质、差质的差别主要在政治表现方面的不同。

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阶级感情深等等，都是政治表现好的重要标志。出身于双革（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质群体的主体，政治辅导员、党员、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等学生干部则是其中优秀优质生，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优质群体的核心和骨干。

而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右派学生是最差质的差质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认识模糊、立场动摇的学生肯定也属于差质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家庭的学生，有个性、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不大爱听组织话的学生，都有成为差质生的可能。在政治上表现不上进、不紧跟，以致给组织上留下政治落后印象的，个人品行（譬如有点小偷小摸）、思想意识（譬如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点问题的学生，还有极端散漫、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学生，也可能属于差质群体，虽然这些与政治思想上犯错误有问题是有程度上差别的。

孙怒涛认为，优质生倾向保守的比较多，劣质的倾向造反的比较多。对他的看法我要作一点修正和发挥：

我同意孙怒涛说的：多年的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限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从党的角度看，前者是优质群体，后者是劣质群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质和劣质是随着政治运动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采取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质分子。政治运动是变幻无穷的，如果哪一次

站错了队，优质（优势）分子很快点成劣质（劣势）分子。在文革中不是所有的劣势分子都造反的。右派分子就不敢造反，也不让他们造反。优势分子中也有造反的。

文革开始时，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五六年了，应当属于孙怒涛说的优质（优势）分子，为什么也贴校党委的大字报？主要原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往深处想也有个人原因。在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给我留下了一个政治“疙瘩”。在那场运动中，要求每一位同学都“向党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忏悔一样，说出自己心中的与党不一致的“一闪念”。党委承诺不打击，不记档案，不影响毕业分配。作为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上清理思想运动的负责人。为了落实系里的要求，我动员大家讲出了各人的“一闪念”。青年学生有什么可讲？逼得没办法，有的女同学连对某男同学的“一闪念”也讲出来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自己讲什么呢？在上下的压力下，我搜索枯肠，想起了这年暑假回家经历的一件事。回到村里几天后，一位我称她为细婶（没有亲戚关系，这是对年长者的尊称）的农妇，请我帮她写一封信，信是写给她在新疆的一位朋友的，说是在家里日子不好过，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帮她写了，但事后心里嘀咕：她是地主的女儿，为什么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苏联挨着的！我是新党员，这事不能不告诉党组织。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党小组长。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心里还是嘀咕：如果村里为这事整她，整死了怎么办？我心里有一股同情和恐惧（后来得知，她既没有去新疆的行为，生产队也没有整她）。清理思想时，我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和心理活动讲了出来。我讲完后，政治辅导员帮我分析，说：你能向当地党组织汇报是正确的，但你对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压力，说明你有人道主义思想。当时报纸上正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政治辅导员把我的“一闪念”和人道主义挂上了钩。

过了不久。校党委组织部长在阶梯教室为我们系讲党课。他讲到“什么是党性”时举了一个反面例子：有一个预备党员，暑假回家帮地主婶婶写信，帮婶婶逃到新疆。事后，还怕当地把他婶婶整死，怀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党性是不相容的！我开始不知道讲谁，正琢磨时，又听他说：这位预备党员就是你们系里的！我想，这不是说我吗？我立即写了一个纸条，说你讲的事实不对，我想找你谈谈。我一边喊着一边挤到前面想给条子时，同年级的孙同学（1990年代他成为副部级干部）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喊：“杨继绳，你想干什么？！”条子没有递上去。结果我被延长预备期一年。

正是这个“疙瘩”，使我对清华大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见。我写的大字报就是批评清华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果某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个“疙瘩”就可能成为这个人行

为的动因。当然不全是如此。

以我在清华的文革经历和 1966 年 10 月以后到 20 多个城市“串联”所看到的情况，我认为参加保守派的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吸取了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站在反对党委和工作组一边；

二、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老实听话”、不敢独立思考的人；

三、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党的代表”、“党的化身”的人；

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大学生中，党、团员和学生干部、研究生倾向保守的比较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多持保守态度。

保守派中虽然很多人是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但他们对秩序的维护和权威的尊重，对维系一个社会有着重要价值。虽然毛泽东在制造“天下大乱”时不需要他们；但是，一旦实现“天下大治”时，他们就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

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平时“不太听话”、“思想活跃”、“调皮”的人；

受到党团干部压制的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通常站在造反派一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处于边缘状态的干部，一般是支持造反派的，有的成为支持造反派的幕后“黑手”。

大体说来，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持保守态度的较多；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造反的比较多。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对社会现状不满意，但一般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当时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对当权派的一些个体不满。毛泽东一号召，一给他们自由结社的权利，他们渴望社会平等、渴望个体受到尊重的潜意识，就像是一堆干柴被点燃。他们看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从心底里有一种自发的痛快。

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条件下，能够站出来造反并且成为造反派头头的，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行的，没有敢作敢为的气概也是不行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个过程中，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成为牺牲品的残酷逻辑。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摘“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冒死写出了

支持造反派的动人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要认真观察形势，对大局作出认真的判断，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对党委的态度将人们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出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毛的指示、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那些指示、文件和讲话本身就会自相矛盾、朝令夕改，这也必然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对立。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中的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愿意参加这一派，等等。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是否定 17 年的。但是，否定 17 年，并不是说 17 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 17 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权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个恶，反对官僚制度的恶。

孙怒涛在书中写到群众组织头头们的行径时说：“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是的。造反派一旦成了头头，阶级斗争的思想、权力斗争的手腕、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都会充分表现出来。没有新的思想，没有制度创新的要求，造反派一旦掌权，就会像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都会成为新的专制者。

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一些个人和组织。这一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刘邓的 50 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清华是高干子弟从家里得到内部消息反党委，不属此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10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第 13 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 月 6 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从此以后，造反派

群众组织才真正发展起来。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只有20个月。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第四条规定：“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毛泽东恩准的“结社自由”到此结束。群众组织退出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

总的来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由此可见，造反派不是造成“十年动乱”的主角，相反，在文革中造反派受到打压更多。“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是打压极端分子的过程，而造反派这边极端分子要多一些。当然，他们的极端态度也与复职的官僚们对他们的排挤、打压有关，是互动的结果。军政官僚们利用“一打三反”、“一批三查”、“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造反派，文革后“清查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理‘三种人’”等政治运动，完全是针对造反派的。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可见，强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是不能轻易触动的，触动这部机器的人们大多要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护了官员，患难识知己，官员们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加上保守派有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的基本素质，适合于文革后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进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头头多数受到重用，有的成了显赫的高官。与他们相对的是，造反派的头头们像过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成了政治贱民。文革以后，保守派头头和造反派头头的处境是有天壤之别的。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辩护中间公诉人：“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19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公诉人无言以对。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

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文革以后，随着特权的扩张，官僚们离群众更远了。文革中批他们的人被他们整得不能翻身。文革中保他们的人也另有想法。文革中的保守派是除极少数的头头成了高官显贵以外，大多数是良民。这些良民文革后是怎样想的呢？戴厚英女士在她的《人啊，人》这部著作中描述了一位在文革中死保党委书记奚流的女教师心态：“她把奚流当做党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她相信她付出去的是心，换回来的也是心。她用整个心灵捧托着一具雕像，神圣的雕像啊，像艳阳当空照着她、温暖着她。突然一阵狂风暴雨，把一切都吹散了，颠倒了，混淆了。她眼里看的，心里捧的，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文革后，这位奚流恢复了原职，但在这位文革中保卫他的人的眼里：“奚流的职务恢复了，可奚流这个人却只恢复了一半，低级的、令人讨厌的一半。”¹明眼人一看便知，戴厚英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奚流，而是整个官僚群体。

毛泽东的两难处境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造反红卫兵的“五大领袖”结束时，韩爱晶记下了这么一个动人的细节：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又回过头来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泽东这次召见，是造反派的历史终结。人们已经受够了无政府状态的折磨，是该恢复秩序的时候了。怎样恢复秩序呢？一是要告别破坏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复被造反派冲垮的官僚体制。在没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以后还得依靠这些官员，官员们还是要用原来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响应毛的号召起来冲击官僚

¹ 戴厚英：《人啊，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年，第109、17页

体制的造反派，一定成为牺牲品。

毛泽东7·28召见时，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领袖”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多次批评温和的造反派“四·一四”，最使他不满的是《四·一四思潮必胜》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毛所指的不是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产党已经牢牢地坐稳了天下（他一再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应当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原来的官僚体系来恢复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经使造反派和官僚们结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复秩序，只能让官僚们坐天下。官僚们坐了天下，造反派势必成为官僚们砧板上的鱼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泪了。造反派是因为被边缘化而流泪，毛泽东是因为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泪。毛泽东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来源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又来自文革前17年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尽管当时已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尽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用“极权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来描述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来控制全国。官僚体系就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每一级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上级的任命。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所有的官员都对他的权力来源——任命他的官僚负责。官僚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势必尖锐。

王亚南¹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²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¹ 王亚南，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译者

²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官僚体制内部有三对矛盾：最高领导人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官僚集团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官僚集团内部不同派系（山头）之间的矛盾。官僚制度总是力图使这三对矛盾处于均衡状态。然而，这种均衡不是使社会和谐，而是使社会保持着一种张力。毛泽东不喜欢这种均衡。他要打破均衡，利用这些矛盾来制约官僚，防止政权变质。结果造成官民之间，官官之间的大混战。毛泽东虽然处在官僚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却以民意代表自居。在官民这一对矛盾中，毛口头上是站在民这一边的，他鼓励老百姓造官僚的反，但对多数官僚是只能“烧一烧，但不能烧焦”¹，因为政权还得靠官僚维持。深谙帝王之道的毛泽东，他对官僚们时而紧，时而松，时而进攻，时而让步。时而让群众打倒官僚，时而对官僚们报复造反派听之任之。结果，官员们在造反派的冲击中受到迫害，“官不聊生”；造反派在官员的报复中受到迫害，“民不聊生”。如果说，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冲击官僚体系有一定的正义性的话，那么，让那么多官员受到人身摧残和人格侮辱，就不能令人容忍了。被摧残的官员中虽然有人曾经骑在老百姓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其中多数是无辜的。反过来，重新上台的官员对造反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报复，也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他们毕竟是响应你们所尊崇的伟大领袖的号召才这样做的呀！

这两方面不能容忍的行为源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报复性和残忍性。中国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凌迟处死，剥皮充草，砍头，腰斩……一旦某人被妖魔化，他就成为砧板上的肉了。怎么处置都不过分。报复性、残忍性，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造反者对官员，还是上台后的官员对造反派，都是如此。

本来，制衡官僚体系最有效的办法是民主。毛不愿意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也借助民意。所以，他总是以底层社会的代表自居。他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众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他经常批评官僚，赞美群众；批评高贵者，歌颂卑贱者。毛既是官僚体系中最大的官僚，最高统治者，同时又为被官僚体系压在底层的人发出呼声。显然，这与他的民粹主义思想有关。他站在权力金字塔的制高点上，又企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这个矛盾角色与他的另一对矛盾角色是相对应的：他自己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和掌门人，又要发动群众砸碎这个制度。

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² (Milovan Djilas) 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

¹ 毛泽东对陈丕显就采取这个方针，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45页。毛对邱会作也是采取这个方针，见《邱会作回忆录》

² 密洛凡·吉拉斯是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阶级。”¹ “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² “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³。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⁴ 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吉拉斯有着相同的看法。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⁵ 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⁶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这里说的“特权阶层”，和他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个意思，他明指苏联，也是指中国。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看出了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

1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页

2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78页

3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93页

4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90页

5 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要维护斯大林主义，建立一个比斯大林更为专制的极权制度。吉拉斯是斯大林制度的掘墓人，而毛泽东却要强化斯大林制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洞察到了苏联制度的弊端（虽然是浅层次的），但却没有找到走出苏联制度之路。他的认识局限挡住了他通向现代民主之路的视线，从而走上了比苏联更加荒谬的道路。

和官僚特权阶级相对立是被官僚制度打击、盘剥和钳制的人群。这些人和享受特权的官僚们有着尖锐的矛盾。在政治高压下，矛盾潜伏着。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就会对官僚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1956年毛泽东号召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出现的冲击力威胁到共产党的地位，被打了下去。文化大革命又创造了这个机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使毛难以驾驭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深怀不满和忧虑。他从国家机器的本质层面探索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列宁说：“‘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成了废物’，——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¹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公共职能。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²。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统治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国家机器有弊端；国家机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畏惧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机器的矛盾中挣扎的过程。

¹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6页

²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最高统治者必须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没有官僚体系，政权就要瘫痪。但是，官僚们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早有古语：“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忠于信仰和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但是，毛认为官僚对百姓的压榨、官僚蜕化不是极权制度造成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是阶级斗争。面对官僚们的特权和腐败（当然毛自己也搞特权和腐败，我在《墓碑》中已经有所揭露，但对最高政治领导人主要是看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当然，他个人操守与他执政的理念和行为不是没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用发动群众打击官僚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从制度创新来解决。他着眼于官僚这个人群，而不是着眼于创建新制度。他没有想到蜕变和腐败是极权制度造成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锐的社会条件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官僚这个人群，势必要打倒所有的官员，大批好的官员也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腐败官僚像韭菜，割了一茬，还要长出一茬。一次政治运动只能解决一茬的问题。

在近现代，人类已经创造了限制官僚的权力、监督官僚们的行为的制度，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由于现代民主制度和毛泽东的极权制度相冲突，毛泽东当然要排斥它。毛泽东也有一个制度设想，那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和“五七道路”，这个设想在 1958 年试验过，失败了。这种乌托邦的设想肯定是要失败的。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只有称号创新，没有制度创新。过去的部、委、局都改成“组”，结果“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不仅官场运行机制、运行规则没有变化，还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官僚机构大量扩张办公用房就可看到官僚利益的扩张：1972 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 82500 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 26000 平方米。至于支左军队干部成为革委会的官员以后，肆无忌惮地占用民房、走后门送子女上学参军更是不在话下。¹

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媾合，是造成 1958 年社会混乱、进而造成 3600 万人饥饿死亡的制度根源。文革，又是一次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媾合，当然会再一次带来社会混乱，再一次带来灾难，先是官员受害，后是造反派受害，全国上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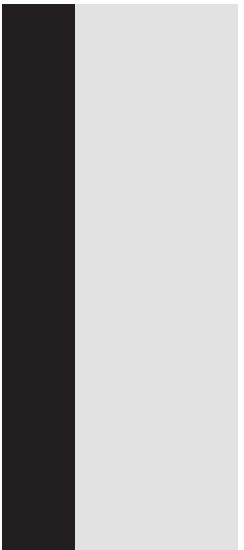
¹ 杨继绳：《1972 年：全国军队大搬家》，载《炎黄春秋》2011 年第 5 期

受害。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洁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秩序，就得要官僚。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仇恨的情况下，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取得文革最后胜利的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开放的主导权。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文革，但对毛的政治遗产却全部继承。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权力至上；还是那个官僚队伍，任命制，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官僚们成为新的权贵。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和文革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大富翁，金钱可以收买权力、权力和金钱可以互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已经离开人世，造反派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年改革的结果呢？建立的是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说是官僚资本主义体制、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文革 · 反思

磊落的一生

——怀念我的朋友李磊落

王允方

李磊落是我年轻时的朋友。我们同在清华大学学习，他比我高两届，是电机系企9的学生。当年我们都是学校乒乓球队的队员，平时接触较多。他待人真诚热情，乐于相助；对于身边的事物，善于思考，有独立见地。这些性格特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四十多年前，整个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之中；面对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他所表现出的坚强与淡定，沉着与冷静；对于真理之追求，对于信念之捍卫；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他表现出了超乎一般年轻人的成熟，显示了热血青年的勇气与决心。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的时候，都不由得思念李磊落，回想他短暂而富有激情的一生。

1965年夏天我从上海考入了清华大学工化系。我自小喜爱打乒乓，无师自通，小学时曾获得新成区少年比赛第一名。后在育才中学，曾多次代表校队出战；进入清华大学，被选入校队，作为三线队员参加球队训练。按照学校运动队的规定，大学一年级的三线队员暂在原系原班住宿，只能在运动员食堂就餐。因此，除了每天下午的训练之外，我与其他老队员见面的机会不多。记得65年秋天某日中午，我和几位同学一边吃饭，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刘守昭同学侃大山。刘是动农系6字班的学生，是我们的队长。他在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队练过，球艺高超，曾获得北京市高校单打冠军，我们都很佩服他。这时不远处有一位同学捧着饭盒走来。他瘦高个子，圆脸短发，穿着一件宽松的红色运动服。刘守昭站起，对我们说：“互相介绍一下吧。”那位同学伸出右手：“李磊落，电机系企9的”。我也当即站起握手“王允方，化001班。”我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友善、明亮，一点没有老队员的傲气或者那种漫不经心的表情。他静静地在桌旁坐下，慢慢地吃饭，听我们继续聊天。

我与李磊落就此相识，初次的印象很好。他沉稳，平和，说话不紧不慢，不像有的学生那样张扬。你与他对话时，他总是看着你的眼睛，先静静地听着，然后慢慢地述说自己的观点，似乎同时在思索着你内心的感觉。所以，不论在饭桌旁，还是在训练时，对于时事新闻、球艺球路，我都喜欢与他探讨，向他请教。他也时常向我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学习方法，讲述对蒋南翔校长教育思想的理解；这些鲜活的经验和感受，对于我这个进校不久的新生来说是十分有用的。

乒乓球队是个团结友爱、富有朝气的集体。整个队有男女队员二十余位，高低年级都有。当时一些7、8字班高年级的学生下乡参加四清，所以在平时训练与比赛中，担当主力的主要是9字班以下的学生。当然，在举行一些正规比赛，如北京市高校比赛时，我们的队长刘守昭是必定会参加的。

乒乓队指导姓杨，为人随和，不多言语。他根据各人的特点，安排队员上场参赛。记得年底在与清华附中的一场比赛中，我被排在第四场，这是相当关键的一场。我因压力太大，输了。结果，由我们这些三线队员与二队队员组成的清华大学队输给了附中队。听着附中拉拉队的欢叫声，我觉得没面子极了，只想快点溜走。晚饭时李磊落挨着我坐，帮我分析输球的原因。他说：“你一开始过于放松，有些轻敌；胶着时又比较急躁，技术走型；最后阶段想赢反输，那几个球处理得过于简单。今天你的左手攻击性特长没有发挥出来，下次比赛要冷静一些，以我为主，才能掌握主动。”他耐心地一步一步帮我分析，丝毫没有获胜队员的得意，以及对失败者的责备，我心里清爽了许多。在我迈进大学门槛的第一个阶段，李磊落就像一个可敬的兄长，一个亲密的同伴，在学习、训练等许多方面给我指点与帮助。我也将他视为自己的榜样，视为一个可信赖的好朋友。

1966年春天，一年一度的北京市高校乒乓球比赛开始，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赛事。在京几十家大学都派优秀选手参加。按照杨指导的布局意图，我们清华的五位上场队员是刘守昭、曹小平、李磊落、刘景文和我。五人中除了刘守昭是高校单打冠军外，曹小平曾获得北京市西城区单打冠军，他两面起拍的打法在高校中无人抵挡。其他三位实力稍逊，但亦各有特点：李磊落右手横拍，防守型，一正一反海绵胶，球路变化，常使对手捉摸不定；刘景文右手横拍，防守型，两面胶皮，打出去的球似转非转，对手很难回击；我是左手直拍，搓攻型，擅长打回头，对付右手选手比较有利。我们一路征战，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与钢铁学院队争夺冠军。决赛那天早上，我们早早来到赛场。我初次参加这样的比赛，即激动又紧张。李磊落穿着红球衣，慢慢地在场边练身，显得很沉稳。他把我拉到一旁，递给我一块巧克力，说：“快开赛了，吃一块提提神”。我们五人顺次登场，每场都打得很努力、很精彩。结果清华大学赢了，我们兴奋地登上了1966年度北京市高校乒乓球比赛的领奖台。正当我们还沉浸在获胜的喜悦中时，谁也没有想到，不远之处一片黑沉沉的乌云正在慢慢飘来；两三个月后，乌云笼罩了全国大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开始时，我是化 001 班的学生，担任班长。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党中央革命路线的无比信赖，我与许许多多的同学一样，真诚地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影响，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参加运动的基本原则：除了毛主席之外，对于各级领导，都应当“怀疑一切，造反有理”。六月初，由于对学校党委定调子、划框框等做法不满，我参加了反对派的行列。几天后工作组进校，我被指定为班级文革组长。不久，我们系 902 班蒯大富等几位同学因不满工作组，贴出大字报。工作组领导在全系文革组长内部会议上布置各班积极分子与蒯大富们辩论，并要对他们跟踪盯梢，收集证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工作组采用的小动作甚感不满。会后我联络了班上六七位同学，6月 24 日晚上分布在大礼堂的台前台后，观察收集工作组的台下活动情况。事发之后，我被定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反对工作组的小组头头，隔离审查，并在 0 字班、00 班两个年级大会上批斗。一时间新斋楼前大字报栏贴满了批判我的文章。我失去了自由，不能与外界联系，连去食堂、上厕所都有同学跟随。

在这样被监管的环境下度过了一个月，我每天写交代材料，自我反省批判，心中充满了困惑、委屈与恐惧的感觉。我不认为自己主观上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工作组的神秘做法不满意；后来在听说清华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之后，是我自己主动向工作组承认错误，坦白所做的事情。但是，在当时那种急风暴雨的气氛下，容不得你稍做辩解，所以我只得俯首认错，接受一切可能的后果。我一边写检查，一边等着第二次大会批斗；但是吊诡的是一直到七月下旬也没有开会，相反的，周边同学对我的看管似乎渐渐松懈，我可以自由走动，独自去食堂吃饭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切巨大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毛主席批评了主张派工作组的刘少奇。我与其他一批所谓的“蒯派”人物就此重新获得了自由。

那时候学校党委与工作组先后崩塌撤离，狂热的群众运动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一批干部、学术权威被批斗游街，有的甚至遭受人格侮辱。对于这样的行动我颇为反感。不久社会上翻起了一股“血统论”的恶潮，作为其代表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迅猛异常地蔓延开来，引发了不同出身群体的对立。我出身于一般职员家庭，虽然父亲历史清白，还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翻译团的工作，但因为不是红五类，又加上之前的挨整阴影尚未消散，所以在班里和系里一直感到孤独、孤立，忧心忡忡，压力很大。我决定去运动员食堂，希望能见到李磊落，向他倾吐心中的苦闷。

一个多月没见面了，见了他我真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我把六月份以来的境遇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一再述说着自己的困惑与委屈。我们谈了很久——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与亲切了。李磊落诚恳地对我说：我相信你是热

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运动，每个人都要在运动中斗私批修，接受考验。因此你一定要放下包袱，抛弃私字，不要计较别人的议论和看法，要克服患得患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坚定不移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看着他真诚的眼睛，我感到了信任和力量。

八月一日，传来谭力夫关于对联的讲话。在一些中学红卫兵的鼓噪下，对待对联的态度被上升为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与“试金石”。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也不敢直率地表达反对意见。中午见到了李磊落，他已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平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反对这个对联的提法，它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一个人的出身不能由自己决定，但革命不革命完全可由自己选择。许多领袖人物的出身并不好，但他们不都背叛了家庭，成为革命的一员？革命需要有更多的拥护者、参加者，“唯出身论”的政策只会将许许多多愿意革命的群众排斥在外，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个正确的政策。他又接着说：我的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位少校军医，解放后一直在为人民工作。我不能因为父亲的出身而消极悲观，我要更加努力学习，自觉革命，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磊落坦率地向我讲述家庭情况，他不但没有因此而背上包袱，反而告诫我，鼓励我，使我增强了积极参加运动的信念。

二日下午，一群中学红卫兵开进清华，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对联口号，寻衅辩论。晚上，老红卫兵头头在大礼堂主持对联辩论会。台上挥拳擦掌、摇旗呐喊，台下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横扫一切坏蛋！”“对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气氛恐怖，令人窒息。说是辩论会，实为一言堂。这时，只听见台下有一人喊道：“我反对”。他边说边跳上了讲台。主持人说：“先报出身？”“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医”。台上几个人迅速跑过去，一边挥拳一边大叫“把这坏蛋赶下去！”。他摔倒在讲台底下，四周一片嘘声及歇斯底里叫骂声。这位勇者正是李磊落！他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弱小的身躯去挑战庞然大物，与那些头脑发昏的狂热之徒论战。他为真理而挺身，他是真正的英雄。那天我不在现场，但是从大礼堂喇叭传出的叫喊声可知如此。几天后我见到了他，问他当时害怕吗？他平静地说：没什麼，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对联是错的！

清华的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八月八日，以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宗旨的一些学生组织了八八串联会，第二天，以老红卫兵为主体的学生相应地成立了八九串联会。串联会按系为单位建立分支机构，并选出了勤务员。学生们依照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串联会活动，一时间战斗组林立，大字报遍地。我很希望能投身运动，参加战斗组的活动，但是八八派的一些领导对于我们这些“蒯派”人物总心怀戒意，虽然口头说可以，实际上避之不及——即使在周总理两次亲临

清华，呼吁为“蒯派”学生平反之后。工化系是“蒯派”的大本营，学生中反蒯、恐蒯心态更为严重。我向李磊落述说自己的困境，他建议我不如离开学校出去串联，看一看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八月下旬我回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仅逗留了半个来月，就被班上一些老红卫兵通缉勒令回校。通缉布告张贴在上海的街头。九月中旬回到学校，几天后被班里的老红卫兵遣送到延庆县参加劳动，同行的还有本班及系里其他年级的学生，据说都是像我一样的不安定份子。大约一周后这些同学中传说临时筹委会已经解散，我们纷纷要求解除劳改，回校参加运动。

回校后我马上去找李磊落，他兴奋地告诉我：“前两天老蒯与鲍长康、彭伟民一起发起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现正在吸收报名者。我准备参加，你呢？”这真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对我犹如久旱逢甘露。我赶紧去找我班同学彭伟民，经他介绍，我成为了井冈山的一员。

我参加井冈山的时间很早，当时才五十多人。蒯大富点名将我安排在井冈山直属第三战斗组，即“湘江”战斗组，组长孙怒涛。在困难的时候我曾拜读过他写的“革命少数赞”，对他早已慕名。“湘江”最初由十个学生组成，其中几位也曾有过“蒯派”的经历，所以感受相同，彼此容易理解。我们朝气蓬勃地投入运动，很快“湘江”就以其大字报观点鲜明、及时、多产，而成为清华政坛的一支新锐。十一月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老孙提议是否再吸收几位能独立思考、思想性强的学生，来充实战斗组的力量？我第一个就向他推荐了李磊落。李磊落上山后被安排在宣传部门工作。我与老孙在井冈山总部见到他时，他正在忙着。他抱歉地让我们等一会儿，歇手后才与我们聊天。他很关心我的近况，知道我到“湘江”后感觉良好，能够发挥才干，为我感到高兴；但是对于老孙的邀请，他面有难色地表示可能不行。他说现在外面的形势那麽复杂，宣传口的事情很多，本来就人手不够，我这时候岂能离开？我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合适。

十二月上旬，井冈山红卫兵等四总部开始整风。为了促进学校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由“湘江”、“轮机兵”、“不怕鬼”等十几个分属各派的战斗组联合发起，于十五日成立了“天安门纵队”。1967年元月，一月风暴自上海掀起，并迅速扩展至全国各地。“天安门纵队”赴山西、四川串联，支持当地的造反派。我随大部队活动，春节前回校。三月开始，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对清华大学干部队伍的调查文章。围绕着如何评价解放后培养出来的这支干部队伍，井冈山内部分歧很大，矛盾对立，争论意见纷纷见诸于大字报间。“天安门纵队”以及我所在的“第一湘江”（后改名）也分成了两派。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面对如此纷乱而复杂的观点争执，我一定会去找李磊落请教，听取他的意见。但是，没有想到，三月底我突然被抽调去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来不及与他打招呼，一直到七月底才回学校；其间发生的各项重大事件，包括四一四从井冈山里分裂出来，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活动，

我只间有耳闻，都未得参加。所以，对于四一四成立的看法、对于团派与四派的主要分歧、对于解放后十七年以及清华大学干部队伍的评价等等，这些重要而关键的问题，我一直没有机会与李磊落讨论，也未能了解他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件莫大的憾事！回校后我随同老孙参加了四一四的活动，而他则仍然留在了团派。

七月底，以720“武汉事件”为导火线，全国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八月上旬开始，北京许多高校的学生喊着“文攻武卫”的口号，奔赴全国各地，支持造反派，反对“带枪的刘邓路线”。我因刚从记者站回来，对全国的形势有些了解；而且感觉上也认为军队不能乱，这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一条红线，所以我不同意，也不打算外出串联。八月初的一个下午，大约两点来钟，我与老孙由东往西路过二校门，突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三四个人正挎着背包，沿土路往南校门急走。“李磊落！”我喊了一声。真是他！李磊落快快地跑了过来。我问他要去哪儿？他说去湖南，那里的造反派“湘江风雷”正在受压制。我和老孙一再叮嘱他要当心，他边说边退，挥着手说：“我知道，回来见。”我们站在原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愿他一路平安”——我内心默默地为他祷告。

几天后，团派广播台播放了一则消息：李磊落在湖南常德被枪弹击中，不幸去世，据说当时他正在一辆卡车上。想想几天前我们还挥手告别，几天后却人各一方，心中不禁唏嘘万分。一年多来我与他相知相处，那一幕幕的场景油然而生。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赶写了一篇哀思悼文，送四一四广播台播出。这可能是四一四派对一位团派战士逝世所发表的唯一一篇悼念文章——这是我当年所能做到的全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很想知道他去世时的具体场景。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尚不清楚。但是，我也经常自问，即使现在知道了又有什麼意义？！

是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要弄清李磊落当年去世时的具体场景确实已不重要；但是，作为他曾经的朋友，作为一个同时代的青年，我不能不经常想起当年的一切。

我对李磊落的怀念，从朴实的层面来讲，首先是基于感恩的情感。我时常在想，当年在我最苦恼、最孤单、最消沉、最无助的时刻，假如没有他的理解，没有他的帮助，没有他给予的温暖，我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是否会完全沉沦，甚至丧失生活的勇气？人的一生有时就会失于一念之间。所以，对于他的这种患难中的友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对李磊落的怀念，从根本来讲，还是基于对他整个人品的肯定与赞佩。李磊落自小就是个优秀学生，在师大一附中就学时他当过中队长，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时他是当年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后曾担任足兵支部的支委。我在与他的交往中，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热情、真诚、谦虚、平和、乐于助人等美好品德。真诚是

他待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及行为准则。文革开始后，他像全国千千万万的学生一样，真诚地投身于运动之中。他真诚地对待自己，对待朋友，也真诚地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学。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能冷静淡定、独立思考；面对错误的政治观点，他能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为了捍卫真理，他能挺身而出，表现出勇者的气质。最后，甚至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所追求的事业。在他的身上，没有机会主义的色彩，也没有市侩功利主义的气味。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时代青年。

我对李磊落的怀念，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对我们曾经共同生活、成长的那一个时代的追忆。文革之前，我们都是在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下生活，年轻人的思想被禁锢在设定的框架之中，自由思考被视为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异端追求。文化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扼杀人性，毁灭文明的历史惨剧，全国人民为之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摧毁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打碎了大一统的精神桎梏，给了善于思考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有了一个探索真理的绝好机会——虽然这一定不是始作俑者的本意。我们一边在风暴中经受政治运动的洗礼，一边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对人文哲理的感受。我们如饥似渴地从那些从未读过的世界名著中吮吸着思想养分，并在同道好友间畅所欲言地激烈讨论。中外革命志士们所展现出来的崇高气质和坚强意志，他们不畏牺牲，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决心，使我们热血沸腾，心仪不已。他们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弦，使我们开始思考起人性与良知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许许多多的学生，不论是团派还是四派，不论是造反派还是老兵，在清华园里充分享受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自由；思想得以开启，意志得以磨练，认知得以深化，境界得以提升。这是我们自我启蒙的开端，是人生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各人的发展路程。

今天我在这里怀念我的朋友李磊落，追思四十四年前与他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心中充满了真挚而丰富的感情。我默默地对他说：我的朋友，你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你既不是碌碌无为，也没有虚度年华；你在激情中告别了世界，留给我们——正如你父母所期盼的——是磊落的一生。

王允方 完成于 2011 年底

求索与启蒙

王允方

(一)

年初，接孙怒涛邮件，得知他耗时四年，完成了回忆清华生活二十载的力作，拟起名为“良知的拷问”。作为第一个读者，当时我心情之兴奋可以说一点也不亚于作者本人。回想四年前，2007年春天，一百多位校友在东校门外阳光大厅聚会，重温四十年前的友情。席间，一些同学热情地向老孙提议，何不在退休之后集中精力，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几天后好友小聚，我和蔼玲、易生、洁平，还有威威，都一再劝他：时不我待，应当马上开始思考写书的事了。岁月流淌，四年一剑——老孙不负众望，终于完成了这本倾心之作——他为自己、为朋友、更为清华的文革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珍贵的文字资料。

老孙在清华大学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1960年入校，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1980年调回家乡，之前在校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但是，在我们那一代清华的师生中，绝大多数都知道孙怒涛的名字，都记得他那瘦高身材，胡子巴茬，戴副眼镜的模样，以及那一口实在让人难懂的绍兴普通话。这就是老孙，一个堂·吉可德似的人物，被当年清华文革的潮流推上了舞台，从而成为一位特殊年代的知名人物。

据我所知，老孙在清华大多数师生员工中的印象是比较好的，评价正面。即便有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甚至有些迂腐，但是他更多的给人以真诚、善良、热情、率真、朴实的感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人正派、正直，既不贪恋权力，也不畏惧权势，更不搞阴谋诡计——在当年有权就有一切的年代里，具有这等风

骨和做派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与老孙是知心的朋友。自 1966 年 10 月成立湘江战斗组起，我就跟随着他，一起参加运动。1970 年我离开学校，相互间书信频仍，依然保持着联系。但是，即使我们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我对他文革中的许多事情并不了解，对于他在清华二十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心路历程更是知之甚浅。因此，我一直急切地期盼着能早日看到他的作品，希望能够由此探知我所熟悉的那个老孙心底里那些更多、更新、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

与先前几位清华文革名人的作品不同，老孙的新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全书描述了他在清华二十载的生活经历，其中不仅包括了跌宕起伏的文革十年，而且也包括了此前的六年学生生活以及此后留校当教师的岁月；其二，作者将书名定为“良知的拷问”——这是一个相当沉重、深刻而有分量的题目——试图通过对人生经历与感受的回忆和铺陈，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彷徨、妥协与争斗披露于众，以人性良知的神圣标准，进行自我检视与剖析——这实在需要非同一般的胆量与勇气！读者在阅读此书后尽可以对老孙的思绪文笔做出褒贬不一的评议，但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拷问良知的真诚用心。

正如老孙在前言中所说，这本书既是写给他自己的，也是写给我们这些与他一起参加了清华文革运动的同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远在四海天涯朋友们的。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文革经历，既属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共同的资源。他在给我的邮件与电话中多次提议，期盼有多位同学能提笔思考，在回忆—反思的大题目下，参与到他所搭建的平台中去。给历史留下一些史料，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种需要，更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责任。

我之所以同意老孙的提议，参与到他的平台中来，除了他的邀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接到他的书稿后不久，即春节刚过，我国政坛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那就是众所周知的重庆薄王事件。

薄王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不敢想象文革梦魇在消逝了四十多年之后，居然还会在我国某一个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3月14日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严肃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总理的警告绝非耸人听闻，他深刻指明了：在我国，文革的土壤尚未得到彻底清理，文革的幽灵还在伺机游荡，文革的元素还有可能复活。如何防止文革重演，这是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中国人都需要正视和深思的问题。

坦率而言，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新发生，主要的责任在于执政党，

在于国家最高领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所谓的顶层设计方案，显然是避免文革重演的根本保证。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主要的方面。而作为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你我他，如果再次面对文革时期那种法治不存、人性撕裂、良知泯灭、理性践踏的疯狂场景，又该如何自处呢？是自我控制，保持沉默，还是不予迎合，坚决反对？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三年来重庆发生的境况不正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考验吗？索尔仁尼琴有一句话非常直白：“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今天，结合重庆发生的事件，老孙“拷问良知”一说的提出，显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不仅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在检视当年心路历程时能有所参鉴，而且我们，以及我们的后辈，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也能从中不断地得到警醒与反思。

(二)

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这段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运动，覆盖了中国每一个角落，遍及社会每一个领域，对于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前途，无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的一生。文革时期，我在清华大学求学；通过真诚积极的参与，亲身体验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人情世态的冷暖。可以说，文化革命给与我的最大收获，是开启了我自我启蒙的阶段。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段重要的启蒙阶段——不是少儿时代读书识字的启蒙，而是进入青年之后，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一种顿悟与开解。康德在其名著《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他进一步指出：启蒙的对象是开启与打破“蒙蔽状态”，而这种“蒙蔽状态”的基本特征就是依赖于别人的引导，习惯于让别人替自己思想，安排自己的生活。康德基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朴素信念，以及对人性之善和理性认识能力的确认，坚信尽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步入成熟状态是非常艰辛而且危险的……，因此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但是，“公众要启蒙自己确实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这一段话寓意深刻，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教益。近代中国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哲学家，所以由哲学家发起的启蒙运动显然不可能。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启蒙的阶段，这要看个人的特殊经历，以及是否付诸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年轻时在清华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得到启蒙的开端。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开始感受启蒙的真谛，尝试摆脱过去

那种“不成熟的状态”，并进而改变思想方式，逐步形成独立的人格与新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自我求索、自我启蒙的过程，是那个年代一批年轻学子追求真理、探求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

在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由环境与教育的因素所造成。自反右斗争开始，几乎年年搞运动：三面红旗、党内反右倾、中苏论战、九评学习、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使得神州大地充满了硝烟和火药味。在大环境的熏陶下，不论是出于求安自保的动机，还是功利主义的考虑，人们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受到了明显的扭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真实性。从中学开始，配合社会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学校普遍开展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要求学生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面对强大无比的政治灌输，我们幼嫩的心灵开始发生畸变，变成了一种与自然年龄不相称的“非我”状态。这种状态的主要特征是：思想僵化，片面极端，缺乏创造，观点雷同，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罔论理性批判的精神。“非我”状态的特征与康德所描述的“依赖于别人的引导，习惯于别人的意见，听从于别人的安排”的状况如出一辙。这里的“别人”不是任何他者，而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无所不管的组织。这正是形成自己（非我）加之于自己（本我）“不成熟的状态”的根本原因。启蒙的目的就是要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回复到一个自由的本我。这是一个非常艰辛而有风险的过程，但是，对于人生的成长影响重大。

(三)

1965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大学，被分配在化001班。与其他班相比，我们班个性强的同学较多；某些人思想偏激，观点偏颇，因而注定日后相处会不太平。我就此开始了一段陌生而又分生的大学生活。

我之所以感到陌生，主要是因为大学同学的状况，以及周边的氛围，与我中小学时的经历太不一样。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三十年代末，父亲考入了上海市邮政局，当时这是个不错的职业；母亲是位中学教师。因此，在填写出身时，我填的是“职员”。父母亲早年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这是上海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年轻时他们目睹旧政权的贪腐与无能，对新社会抱有热诚的爱国情感。1953年，由于抗美援朝战局需要，父亲主动报名，被政府抽调去朝鲜参加翻译团工作，当时我刚六岁，妹妹也才三岁。父母亲虽然进步爱国，但从未主动过问政治，

奉行君子无党，洁身自好的原则。究其原因，一是害怕开会，二是与心灵深处的基督教信仰有关。

我的外公外婆都曾是基督教长老，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周末假日妈妈常带我和妹妹去外公家玩。我很喜欢听外公讲故事。他讲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过红海的故事，以及李提摩太来中国传教的经历。午饭前家人都要先做祷告，感谢主的赐福。外公曾带我去教堂；看到那么多大人一起礼拜，一起祷告，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神奇、肃穆的感觉。一天外公带我上街，见到路旁一位乞讨者；外公取出一元钱给他。我问：“外公，你认识他吗？”外公说：“不认识，但是他现在有困难。”还有一次，一位路人对我说，他要去杨树浦，没有钱坐车。我给了他两毛钱，回家后忐忑不安，担心受骗。父亲知道后对我讲：“只要人家提出了要求，就要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多少年来，“相信别人、助人解困”，这些教义精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自小在一个温馨和美的家庭成长。家中除了父母妹妹，还有我的奶妈，她在我家一直工作了十五年。奶妈是浙江南浔人，忠厚朴实，善良好干，对我影响很大；她教给了我许多为人做事的好品行，以及操持家务的实际本领。

由于家境艰困，父母亲早年都曾做过家教，勤工俭学，完成学业。他们不仅了解西方的教育，更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记得幼童时，母亲常给我讲希腊神话、格林童话，让我的心灵充满了好奇心。父亲爱好广泛，常与我们一起下棋、打球、做功课。父亲的英语水平在邮政局屈指可数，他不仅负责国际邮政业务，处理对外邮政函件，而且还常被派去参加一些涉外活动，例如去捷克工业展览会当翻译。捷克、罗马尼亚使馆定期寄来一些中文版公报，介绍本国经济文化状况。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些外国刊物，翻看外国消息，听大人谈论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所以较早就对国际时政有了兴趣。1953年夏我进了新成区长乐路小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级任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毕业于教会师范学校，她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以爱的理念，倾心施教，循循善诱；不仅教给了我们文化知识，而且教给了我们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精神，以及相互友爱、为同学服务的观念。我性格开朗，热情主动、兴趣广泛、做事认真，所以从四年级起被老师安排当了大队委员，五、六年级时，辅导员让我当大队长。课余时间，我们组织活动，编写板报，宣传卫生，清除四害，办夏令营，炼钢献礼，一直到成立红色少年工厂，由我担任厂长。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我社会服务的意识，也锻炼了社会交往的能力。在辅导员的推荐下，我报名加入上海市少年宫朗诵小组，参加声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诗歌创作比赛。此外，我还曾获得了新城区少年乒乓球比赛中第一名。1959年6月1日，团市委在上海市体育馆召开大会，欢迎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一行凯旋归来。我被指定为大会小主席，代表全市少年儿童致欢迎词，并与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合影，这是我最

得意的回忆。六年的生活精彩难忘。我庆幸自己在少年时期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经历，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健康的发展。客观地说，当年的小学教育侧重于启发式，比较顺应孩子的个性发展，注意在性格培养、知识授教、能力锻炼以及责任训导几方面进行平衡和协调。当时社会上政治风潮还没有波及学校，因而我们能很幸运地获得了一种比较全面的底色教育，思想方式也相对自由。这些中西文化交汇，授教、育人结合的底色教育为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几十年日月风雨，常有其他颜色浸染，但是，这种本底的色彩却难以改变。

小学时我少不更事，不明世态，以为诸事顺遂，生活中只有阳光。其实，当年我们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已经掺入了政治的色彩。尤其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影响了学校的生活。我发现班上一位要好的女生，原先活泼可爱、聪慧开朗，衣着鲜亮；突然有一天穿上了旧衣裳，愁容不语，老师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后来得知她的父亲在运动中出了问题。我还听说一位图画课老师因历史事情被捕，一位管行政的老师成了右派不再上班。政治运动的阴影，正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的身边移近，并很快蔓延开来。

1959年夏我进入育才中学，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六年生活。1958年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要求全国“超英赶美”，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毛主席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于是，各行各业闻风而动，头脑膨胀，盲目冒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经济，大搞教育。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开始进入校园。有几件事我有印象：一是为了支援大炼钢铁，老师要求我们放学之后去铁道路旁或乱坟墓地拣废铜烂铁；二是为了响应大跃进，教育也要放卫星：一般的做法是压缩课时，加快进度，增加新内容。记得上俄语课时，老师每次都会印发补充教材，包括一篇新课文和二三十个新单词，要求我们当堂背熟，第二天默写。几周下来后记前忘，疲惫不堪，效果甚差。这种违背学习规律的填充式方法显然不可持久。三是工人阶级走进教育领域。从初二上学期起，学校来了两位工人师傅，其中一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班主任没有教学经验，管理方式简单，在同学中威信不高；讲课时方言很重，往往不知所云，听讲效果不好，课堂纪律涣散。这种乱哄哄的状况与我小学时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真不知道如何适应这样的环境，曾一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对班上的工作缺乏兴趣，自我要求也松懈了下来。这时正好校学生会需要干部，于是我加入了“红育才”黑板报编委的工作。

“红育才”黑板报是我们学校的“机关报”，每半月出一期，主要报道领导讲话、重要活动、班级动态以及同学来信等等，此外还有一片知识园地。隔周日的上午，责任编辑与各年级担任通讯、誊写、美工的同学一起来校出版报；我们分工配合，相互商量，气氛融洽，效率很高。“红育才”的工作，不仅培养了我版面设计、

综合协调的能力，而且使我学会了采访不同对象的技巧，掌握了应对紧急状态的办法。这是很有意义的锻炼。但是，两年的经历也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班级的活动，疏离了班上的同学。不久，我发现在周围的同学中，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六零年中苏交恶，中央电台开始广播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章。可能出于对国际时政的兴趣，我对这样的论战有一种莫名的激情，但是对文章的观点和内容，心里并不清楚，更不觉得与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久，困难时期开始。市场上商品匮乏，物价飚升，钱币贬值。父母亲节衣缩食，应付度日。我家亲友大多住在城里，对当时农村的状况并不了解；也可能大人知道一些但不便向孩子们讲述。因此，我完全相信政府的说法，认为这种困难是暂时的，是由于自然灾害以及苏修单方面撕毁协议，欺压我们造成的。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情况逐渐改观，市场上的商品重新丰富了起来。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辅导员常常找班上几位同学出去开会，神神秘秘的，据说是去听团课。我不知道什么是团课，也不晓得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听团课。据说听团课的人都需要先写个报告，叫入团申请书。我父母不是组织的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参加过共青团，亲戚中也没有党团员，所以，对我来说，入团完全是件新鲜事。初二下学期，有两个同学入团了；初三时候，又有四、五位同学入团。据说他们都是在反修防修教育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意志坚决，态度明确，与政府保持一致。而我这位原先一直比较活跃的学生干部，此时却尚未想到入团——因为我还不懂得申请入团到底意味着什么。

1962年夏天升入高中。也就是在该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并根据苏联共产党和平演变的历史教训，告诫全党必须反对修正主义，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此后四年，全党工作都围绕着这个政治任务，我们学校自然概莫能外。

育才中学位于市中心静安区，建于1901年，民国时期由英租界工部局管理。学校周边多是一些中产阶级的住所，所以生源主要来自职员、教师、医生以及一些小房屋出租者的家庭。班上同学中占多数比例的正是这些家庭的子女，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观点，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有不多几位工人家庭出身的，但不属于产业工人，所以彼此间差别并不明显。我们这样的学生，以及同样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老师，在育才传统的环境里你教我学，相互依存，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这样平和的氛围没能维持多久，阶级斗争的风浪同样吹进了校园。

1963年3月，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在雷锋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公而忘私、助人为乐，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高尚品德，这是我以

往很少想过的。我为之感动，并开始思考入团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我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上进，不甘落后的人，对时事政治素来敏感。社会大形势的变化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父亲也认真问起我入团的事情。我想需要先找团员同学谈一谈。高一时我班的团支书姓杨。可能由于年龄稍长，或者家境艰困，他比一般的同学要显得成熟与老练。我藉着回家同路的机会，常向他谈论自己的想法，提出一些疑惑的问题。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听到了一个新的名词：“组织”，而且懂得了一个原先不明白的基本道理：年轻人寻求进步，必须要参加“组织”。他告诉我：“组织”与一般的群众团体不一样，有明确的宗旨、系统的纲领和严明的纪律；参加“组织”的人必须要遵守组织纪律，服从组织领导，听从组织决定，这是对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基本要求，现在我们在学校学习，身边的“组织”就是共青团；你要求上进，参加革命，以后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首先应当考虑成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明确、清晰的指点，心中感到一片豁亮。他还告诉我：希望参加组织，首先要向组织靠拢，经常向组织交心，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为此，要有勇气进行自我批判，洗心革面，弃旧图新，与家庭的影响和自己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要暴露思想，写思想认识，这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挑战。我家庭出身简单，至亲长辈中虽然没有在组织的，但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都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怎样理解家庭影响？怎样才能划清界线？我从未批判过别人，更谈不到批判自己。该怎么写呢？！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进行阶级教育，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影响。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但在那个年代屡试不爽，十分通行。我的祖父是前清举人，是福建大儒林纾的托孤养子，早在父亲上中学时就已去世，因此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影响总是有的。依照阶级立场分析，这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我的外公外婆更不待说，基督教长老，肯定是帝国主义的影响，精神鸦片。父母亲都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世界观显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在困难时期常有牢骚，说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除了分析家庭影响，我还暴露了自己学习目的不够端正，有严重的名利思想；以及对于苏共提出的“三和主义”立场不够坚定，态度不够坚决等等问题。我把自己有过的，或者头脑中闪过的想法都写了出来，进行批判，最后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加入共青团的申请。就是这样，我在组织面前真诚地剖析自己，希望通过批判旧我，展现新我，来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对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认识。此后我认真努力，处处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半年之后，也就是在1963年年底纪念一二九的大会上，我被宣布批准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我成了革命组织新的一员。但是有一件与入团有关的事情却一直让我窘迫难忘。该年秋天，我班同学去松江县参加三秋劳动。一天早上，我内急如厕。看到蹲厕的大桶里尿屎已满，虫蛆蠕动，十分恶心。但是生理有需，顾不了许多，我即招呼同学，一起帮忙，抬桶清倒。

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想到第二天有同学找我采访，她是团支部负责宣传的干部。她问我当时的想法，我说只是生理之需，没别的想法。她就启发我往深处想。如此这般，简单的事情被染上了颜色。听着那篇用词夸张的宣传稿，心里的感觉不是很好。但是，我只能听从组织的意见。想必此事成了我入团的临门一脚。

阶级斗争渐渐扩及各个领域。1964年春节，毛泽东在与侄子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教育领域要进行革命。这是文化革命开始前的一首前奏曲。不久，许多高官先后飞抵育才视察，其中包括中宣部副部长童大林以及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我们一点没有想到，中央决定选择上海市育才中学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我们更没有想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决定派一个联络员到育才中学某班蹲点：这个联络员是史慧莉老师，这个班级就是我所在的高二（3）班。

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是位三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长年从事教育工作，是个老教育家。段校长潜心研究教育思想，他以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以调动学生为主体的教与学两个积极性为基础，认真探索新的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一套“紧扣教材、新旧联系、边讲边练、因材施教”十六字教学原则，以及“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教学方法。有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学校代表蜂拥而至，观摩学习；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介绍评论。根据段校长的教学理念，师生之间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沟通交流，教学互长。我们相互讨论习题，相互批改作业，甚至评论教材与教案，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前所未有地发挥出来，展现出生动活泼的良好风气。现在看来，当年中央肯定的这种勇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探讨明显有悖于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本意，实际上是在打擦边球，开顶风船，就像当时社会上进行的文艺改革一样。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段校长对于党内最高层的路线斗争毫不知情；但即便如此，文革期间他亦不可避免地被作为黑线人物惨遭迫害。

史老师是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专门在我班蹲点。她原先是个纺织女工，在党的培养下，进入机关工作。平时她不多过问教学事宜，更多地注重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记得她在班上组织了三项活动：

一、依照阶级分析的思路，将班上同学按照出身进行分类。这项工作的具体内情我不清楚，只知道她选择了三位同学作为典型。其中一位家庭出身工人，是继承革命传统的典型；另一位同学的父亲好像是开工厂的，任区政协委员，他是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再一位就是本人，作为能够正确处理好红专关系的典型。史老师要求三个同学依照各自的典型特点写报告，并在班会上谈体会。我对史老师布置的工作很重视，认为这是上级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与培养，所以抓紧时间积极准备。关于红专问题的认识，我在写入团报告时已有考虑，准备起来并不困难。我在讲稿中强调了红对于专的统领关系：红代表了政治方向，专反映了

工作能力。会后不久，我被指定为班级的班长。

二、要求每个同学写“自传”。1964年下半年，企事业单位开始搞社教，农村开始搞四清。史老师要求同学们写“自传”，显然有点仿照社会上对待工作人员的做法。当时我们才十七、八岁，不懂得“自传”是什么意思。史老师就指导我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写，“自传”内容包括写家庭出身、家庭成员中有问题且对自己有影响的人，以及自己一些错误思想。很幸运，我的至亲长辈中没有涉及政治问题的，于是我就将入团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加上一些闻或听闻的长辈情况，以及父母亲在困难时期的牢骚，都写在了“自传”中。扪心自问，当年我的这种做法很不负责，很不地道：既不尊重长辈，也不尊重事实。我所知道的所谓长辈情况，多是闲谈耳闻，有的更是臆断联想。为了得到组织的青睐，我居然把这些不实的内容都像真的似地写了下来。至今回想，心有愧疚，深感不安。几年后父亲看到了我写的草稿，对我说：“写得瞎七搭八”。我不清楚这份“自传”后来的去处，是不是进了档案。说不定当年这些学生的所谓“自传”会变成家长手中的一颗炮弹。它对各位同学的家庭、个人前途和人生遭遇是否会有影响？想想真有点后怕。

三、组织同学下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与每年春夏两次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支援农忙不同，市委专门批准我们班暑假期间去松江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增强学生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意识。在高二升高三的那个暑假里，二十多位同学参加了这次调查。我们自己制定计划、安排活动、管理生活，没有一个老师参与。在二十多天里，大家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去农舍家访，参加村里召开的大会。回来后整理了一份本村社会调查报告，包括农户人口、阶级成分、村庄发展、生产情况等等。当年这样的活动完全是先入为主，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进行调查；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些贫下中农在忆苦思甜中，谈到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说吃不饱饭时，都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是少数落后分子的消极态度。有件事情我有印象：开始几天傍晚收工回来，总有两个男孩来我们住处附近玩，这是哥儿俩，五六岁，眉清目秀；不远之处有一位少妇看着，估计是他们的母亲。我们与孩子们逗乐，很开心。后来村里有人告诉，说这家是个富农。于是我们开始警觉，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此后再没见到小哥俩。这件事很小，很简单，但我记得很牢，这多少反映了当年农村的政治气氛。

除了下乡接触社会，学校还特意安排我们班去部队体验生活。我们与低班同学一起到一个高炮部队，参加为期两周的军事训练。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学习解放军，“欧阳海之歌”之类的书籍在青年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我很喜爱阅读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一方面是当时大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确实给了自己许多启发和帮助；我在班上的工作方法，很多都是参照着做的。

育才教改的一大特点是减少课外负担，让学生可以活泼主动地学习。我们在

课堂上认真听讲，完成作业，放学后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语文老师桂涛声，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期间，写下了《我们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壮士》等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记得他在讲授《岳阳楼记》时，来回踱步，高声吟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他那真切的情感，使我体悟到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在桂老师的鼓励下，我勤习书法，多有长进，曾荣获全校书法比赛高中组第一名。我常参加乒乓球比赛，获得了国家三级运动员证章。此外，我还热情参与班上许多兴趣活动：办壁报，搞竞赛，结合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及抗美援越教育，自编自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椰林怒火”等诗歌话剧节目……。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培育了自己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活动，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责任感。那一时期，报上经常刊登一些英模人物的优秀事迹；他们高尚的思想境界，过硬的技术才能，使我激动不已。在我的心目中，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天坛医院脑外科医生王忠诚、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电焊工唐应斌、以及南京军区练兵教员郭兴福都是最受敬佩的英雄。我决心以他们为榜样，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栋梁。

育才六年，尤其是在经历了高中阶段的教学改革与社会实践之后，我和许多同学一样，眼界为之开放，思想为之更新。我热衷于阅读课外书籍，养成了课后向老师提问的习惯；自己的工作能力、交往能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在一个相对自由活泼的学习氛围中，我发觉自己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某些显著的变化：虽然我还不敢质疑老师讲解的对错，但是，对于一道题目，或者一个问题，我不再被动地接受老师给予的一种答案，或一种思路，而会自己思考，进行比较，判断哪种更有道理。班主任在品德评语中表扬我“责任性强，开动脑筋”，说明我在对问题的认识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这些进步主要还是体现在学习方法和工作能力上。至于思想认识方面，我还是循规蹈矩的。从高中起，我们纯洁的心田开始被灌输了阶级出身、阶级差别、阶级斗争的观念；尤其在加入团组织之后，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被紧紧地禁锢在组织纪律的框架中间，不敢逾雷池一步。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听从组织意见，服从组织决定，这些观念演化成生活中不可违背的原则。只要上面下达文件，总是依循一套习惯的程序：努力学习、深刻领会、认真消化、贯彻执行；很少敢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独特的见解，最多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可以说，在政治观点上，当时的我已经缺乏自主的理智，开始进入了一种“被蒙蔽的状态”，只是时间还比较短，程度还比较轻而已。

我很幸运，以全优的成绩告别育才，与班上五位同学一起，考取了清华大学。

但是，有些同样成绩优秀的同学却因种种原因与大学无缘。我在多年之后才得知这些情况。我的一位好友，外号“外文”，其外语水平在班上出类拔萃，非常出众；但因兄长问题的牵累，文革结束后方进得大学。还有一位女同学，聪慧漂亮，成绩很好；父母早先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因五七年遭罪，累及于她——很显然，这些同学正是受到了当时已经开始风行，此后越来越烈的家庭出身与阶级斗争观念的伤害。他们是非常可惜的。

(四)

我进了清华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五百多名新生一样，心中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当时，我对自己也有所期许，这是循着中小学生活轨迹自我规划的一个目标：即政治上加入共产党；学习上成绩优秀；体育上取得一级运动员证章，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同时，我心里也非常希望能当上班干部。但是，入校后的感觉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的简单，我觉察到清华的环境与育才不太一样。当然，不是指自然环境，而是政治环境。清华的政治气氛严肃、浓郁，无形中给人一种压力——我想这可能与当时全国的大形势有关，也可能与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有关。开学之后，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

一、我班有 27 个同学，其中，来自北京上海、一般城市以及农村的各占三分之一。农村同学中有好几位出身于贫下中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具体接触到贫下中农的概念；还有几位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甚至父亲是高级干部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听闻，感到十分好奇。班主任陈智老师在指定团支部干部时，好像也有按照出身成分的考虑：譬如团支部正副书记选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组织委员选贫下中农家庭的同学，宣传委员选革命干部家庭的同学。我呢，出身职员家庭，被指定为班长。班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家境状况差别很大，我在协助他们办理助学金申请时，了解到了这一点。

二、进校不久，参加了新生入校大会。大会由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主持，蒋南翔校长做报告，还有一位数力系三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后来知道他就是红专典型的代表叶志江。

蒋校长的报告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但是他关于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的三阶段、两点论的阐述，我至今记忆犹存。蒋校长说，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你们要适应大学的生活，坚持政治挂帅，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蒋校长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使我们倍感兴奋与激动。但是会后的一些活动又使我们回到了冷静与思考之中。这就是关于反右运动的教育。

据高年级同学介绍，新生入校之后，一项必要的活动就是参观清华大学反右

展览。我记不得我们是否参观过展览，但是很清楚地记得班主任与一些老师在介绍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一再强调：反右运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教育阵地领导权的生死斗争；每个革命师生都应当立场坚定，坚决捍卫党的领导。虽已年过八载，但老师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的凝重神态和谨慎语调，使我不由得心弦紧绷、倒吸凉气，似乎阶级斗争近在身边。

过了国庆，学校团委组织 00 级学生参加京密运河劳动。团委副书记贺美英带着各班班长视察现场，按系按班，分片包干。工地上抡镐铲土，装车推拉，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休息时你呼我应，拉歌接唱，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气氛。这样的场面我原先没有见过。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同学，干起活来显然比不上农村的同学，但是大家认真主动，尽力投入，表现了旺盛的自我锻炼热情。

入校两个月，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开局顺利。由于中学时期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所以学习上得心应手，感觉良好。同时我被学校乒乓球队招收为三线队员。一切似乎都还如愿。但好景不长，我与个别同学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些矛盾。

一件是学习方面的。一般来说，考入清华的学生都是各地的尖子，学习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不尽然。十月之后，课程展开。有位女同学感到有点吃力，高数、英语跟不上。任课老师负责任地向我提出，能否另拨时间，给她补课。作为班长，自然不希望有同学拉课，我在向班主任汇报之后，同意老师的建议。这件事情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好事。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后，这件事情竟然成了我迫害贫下中农子弟的罪状。

还有一件涉及工作方面的。我班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各人的经历不同，养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也各不相同，这是十分自然的。譬如我，从高中开始，在担任班干部期间，就比较注意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改进工作方法。我很喜欢毛主席“关于党委工作方法”一文的内容，其中，“要当好班长”“学会弹钢琴”“改变一般化领导”的教导，更是常记在心。进了清华，在学习贯彻校系领导布置的工作时，我总是先思考，重领会，想主意，再发言，避免轻率表态，热闹过场。这种思维方式未必能获得其他人的赞同——我发现班上某些团干部正像大多数人一样，反应热烈，表态简单，提不出有特点的意见。这就是毛主席批评的“一般化领导”。其实，采取何种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商洽，不是个原则问题，但是，在当年大讲阶级斗争的氛围下，这个问题也被提到了是对待贫下中农子女的态度问题。

我班团支部组委来自河北农村，据说是个孤儿。他从小由政府抚养，对党感情深厚。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同，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比较消极和片面，对城市学生，尤其是大城市来的同学，一直抱有某种偏见，觉得这些人虚头滑脑，不够实在。对于我，以及我所提出的工作意见，他也因此心有成见，屡屡向班主任反映，并提升到阶级立场的高度。团班两方不和，相互制肘，耽误了工作，在同学中造

成不好的影响。班主任十分为难，虽然他明白就里，但因为自己也背着一个出身的包袱，所以不便表态。这件事在文革当中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八零年左右，我回 200 号看望这个同学，当时我们已冰释前嫌。在谈到那段往事的时候，他直白地说：“当初我就觉得陈老师喜欢你，不喜欢我。”原来，他的心里一直有这样的小疙瘩——自卑与嫉妒，本质上就如此的简单。

这两件事对我心理震动很大，这些学习、工作中的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一旦被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就会变得十分复杂。这是我在中学时从未感受过的。以往我一直认为：由于成绩、能力、性格的不同，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差异，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同学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完全没有高低之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的状况却非如此。由于家庭出身不同，同学之间的政治地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下之分。我成长在上海这样的环境里，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知之甚少。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些年的阶级教育，譬如四清运动，在农村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农村中传统的观念、思想方法，加上新近灌输的阶级斗争意识，使得在一些人身上仿佛有了护身符和神主牌。他们动辄以贫下中农自傲，使得别人在与其交往时好像站在了低一等的位置。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不是红五类出身。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于这种难以理解的阶级斗争观念，我心中充满了困惑与不解，甚至还有一丝隐隐的恐惧。文革时期，阶级出身的概念被进一步提升、放大，一度成为衡量革命与否的基本标准，成为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给善良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966 年元旦来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寒假未完，我被电报催回，参加培训。新的活动开始了。

这是我们 00 班学生进清华后参加的第一个政治活动，主题是谈论战争以及与之关联的生死问题。大背景是这样的：1965 年国庆节前，陈毅外长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政府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了态度强烈的观点。他在会上言辞铮铮地表示，现在美帝在越南，苏修在北方，印度反动派在西南，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你们要想打仗，就开战吧——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了准备，决心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陈毅的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校团委组织这个活动，就是要结合形势教育，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关于战争的看法；第二阶段对于生与死的认识。我们班以三个团小组为单位，进行分组准备。

我所在的团小组组长是杨东胜，毕业于北京四中。他是将门之后，其父杨成武是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长征时红一方面军独立团团长，我从小就很敬仰。东胜豪爽开朗，与我相处甚好。支部宣委彭伟民也在这个小组。他来自长春，大度爽直，善于思考。我们首先学习形势，领会活动的目的；然后收集资料，整理讨

论心得；第三步就是由小组长代表发言。我们的观点比较平和，没有纠缠在比较早打晚打、大打小打哪个更好，而是提出要立足于准备大打早打，但同时也做好晚打小打的准备；关键在于要争取时间，努力学习，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由于有东胜的便利条件，所以小组发言中罗列了不少数字与资料，大家听后认为观点清晰，厚实有据。后来我们小组作为 001 班的代表在年级大会上发言，受到了老师和他班同学的好评。

为了配合政治教育，学校安排 00 级学生观看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介绍当时亚非拉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惨况。在资讯屏蔽的年代，这部影片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至今难忘：一个非洲幼童，赤身裸体，将一只肥硕的软体虫送入嘴里咀嚼，一缕绿液从嘴角淌下；一个干瘦的妇女怀抱着饥饿的幼儿，孩儿无力地叼着妈妈干瘪的乳头。这些特写镜头令人震撼不已。影片成功地告诉了我们，当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心绪激荡，热血沸腾，心头涌起了类似宗教拯救的神圣使命感，深感责任之重大；我下定决心，长大之后，一定要响应党的召唤，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担。

第二个阶段进入真刀真枪、思想交锋阶段。老师在动员会上要求团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揭批，敢于刺刀见红；而且还口吻严肃地指出，这是对党、对革命是否忠诚的一次严峻考验。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思想学习活动，既感到严肃庄重，又感到有些紧张。但是我的基本态度是：必须对党忠诚老实。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坦率地说，我那时想得很少。从小我生长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家景和美，生活与战争相距甚远。中学时听中苏两党辩论，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主义，即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这样的提法，内心还是有些赞同的。因为从人性常理来说，和平总比战争好，竞赛要比死人强。当时一些苏联电影和小说在国内流行，其中描述二次大战的战争作品让我感到恐惧、紧张，而一些反映人性和人情的作品则温柔细致，时有共鸣。这是我的真实思想。要不要把这样的想法和盘托出，如实写来？为此，芒刺在背，纠结了好几天。最后，我还是在“忠诚”的感召下，亮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与批判，从而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高度。当时的感觉，如同在鞭挞自己的心灵。几天之后，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我被通知参加由系党总支副书记黄志冲主讲的党课学习。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详尽、全面地向组织敞开自己的心扉，暴露内心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在组织面前不应该隐瞒任何东西，尤其是错误的、卑劣的东西。组织就像母亲，允许孩子犯错误，会对犯错误的孩子进行批评和教育，但是她是深爱自己孩子的。如果我对组织都不信任，那麽为什麽还要申请成为组织的一员呢？当年我真是有点像幼时在教堂里看到的大人们祷告的样子，他们的心里满怀着虔诚、谦卑的情感。

但是，以后发生的事情，让我完全意想不到。1968年夏天，在文革开始两年之后，清华两派因观点分歧，升级为武斗。414派一百多人被封堵在科学馆里，727后才脱险，其中有我班的一位同学。他事后告诉我，在科学馆里，看到了一些由团委保管的分类档案，其中包括我的那份思想报告。这份报告与其他一些持异议思想学生的材料放在了一起。初闻此讯，一阵恶心，就像童贞被侵的感受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当年我以自己的真诚与虔诚——当然根本上是单纯与幼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而结果居然会是这样的遭遇！我简直气晕了。虽然历史未能显现原先可能的结果，但是，从文革中被揭露的高班异议思想学生的境遇，我就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以后的景况将会怎样！此事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一直未能释怀。我也不由得由此联想，当年那些向组织汇报了所谓异议思想的学生中，是否也有人像我一样，完全是出自于真诚和虔诚，或者是单纯与幼稚的呢？！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两者的结果其实都是相同的！

五一过后，形势骤紧。5月7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明确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各报炮火齐发，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全国把斗争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布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从五月中旬开始，校党委动员学生批判“三家村”。

对于此时社会上翻滚的政治风浪，我既不明白缘由，也不知道深浅，总以为虽然来势汹汹，但与自己距离尚远，注意观察就是了。班上同学自愿组成了一些大批判小组，我与两位同学一起，利用下午课余时间，写些批判文章。谁也没有想到，十天之后，形势骤变，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就此进入了一个命途多舛的时期

(五)

文化大革命，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梦魇，也是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的一场梦魇。

对于亲历者来说，文革生活是难忘的。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文革故事，不论其真实的感受如何。文革磨练了人格——捶打了每个人的筋骨，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每一个经历文革的人，在其有生之年，都难以逃避良知的拷问和神灵的垂听。“亲历者的体验与感受是一种可贵的资源，当事者的醒悟与反思对历史研究有新的提升。”

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我也有自己的文革故事。我的故事虽不如风云人物一般跌宕惊险，但也并非平淡无趣。当年，我曾真诚、全力而又无私地投身于红色的运动之中，在激荡的革命风浪中练习游泳，在有限的自由氛围中求索真理，尝试“开启并打破自我蒙蔽的状态”。文革中的挫折和磨练给我造成了伤害和苦恼，但也增添了勇气与智慧；我内心深处开始滋生出一种理性担当的精神：一方面学会理性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学会为自己负责。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感受，一种自我启蒙的过程——正如康德所说的是启蒙精神萌生的过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工作组先头部队进驻北大。2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同时，全文转载了聂的大字报。清华为之震动。

清晨，各系传达校党委三点指示，即：一、听从党中央指挥；二、主攻方向为“三家村”，对党委有意见也可以提；三、注意“内外有别”，大字报要贴到楼道和饭厅里。中午，大字报大量出现，除声援北大之外，有的矛头直指校党委。清华园炸锅了！

听着中央电台语调严厉的广播，看着《人民日报》用词犀利的社论，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清楚局势将往哪里发展？学校已经停课，班上有的同学去看大字报，有的依然夹着书本去自习——我没有心思再去看书，对于时政的直觉告诉我，眼前发生的一切太重要了，一定要想个明白！我决定去阶梯教室，独自一个人，冷静梳理一下思路，然后再做判断。我一遍一遍反复阅读两篇社论，对于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细细品味，来回思考；整整一个下午，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我觉得这次运动非同寻常，是由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斗争的对象是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重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说明从组织关系上看，最高领导对基层组织的状况不满意，认为混进了走资派。这场运动势必将涉及到全国各地的所有领域，斗争一定会非常的激烈，这可从两篇社论所用的语句看出。因此，在这次运动中，除了毛主席，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轻信，都可以怀疑；任何领导都需要在群众运动中经受考验，包括学校党委；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千万不能态度暧昧、感情用事；在这场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我要立场坚定，态度坚决，积极参与，接受考验，勇敢地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回到新斋，楼门口遇见了班主任。陈老师问我学习社论的体会，并肯定地说：“我想你是一定拥护校党委的。”我没有直接应答，只是含糊地表示：“我还没有想好，看看再说。”

大字报越来越多。一些高干子女也开始在大字报上署名，责问蒋校长，吸引

了大家的关注。我与几位同学在大字报区穿梭而行，好奇而激动地浏览着各式各样的大字报。我们入校不久，对校党委的事情知之甚少，所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他们对待运动的态度上面：是公开透明，还是遮掩推诿；是实事求是，还是文过饰非？当时，校系领导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不明背景，不知底细，仍旧按照原先的组织程序，下随上意，分级布置；但是，由于形势发展得太快，一下子乱了阵脚，所以只能朝令夕改，疲于解释，左支右绌，困不可忍。我与班上几个同学对校方的表现很不满意，站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

从 1 日停课开始，东胜就没来学校。他托付我每晚八点给他电话，介绍当天学校的动态。当时只觉得这是同学之托，是他对我的信任，后来才有所醒悟：原来那些天，中央高层各派政治力量都在关注着清华的一举一动，我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个“线人”。

4 日下午，化 004 班张丽云约请几位同学去旧水教室碰头，交换对学校运动的看法。张丽云和唐伟是文革之前我们年级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其父是二机部的干部。这次召集会议，是她本人的意思，还是另有原因，我不得其详。除了彭伟民和我，到会的人不多，一共六七位。大家交换了学习社论的体会，以及对运动的看法，一致认为要紧跟形势，加强学习，注意观察，慎重表态。

大字报越来越多，批判的观点也更加尖锐。有的文章直接质问“清华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与此同时，歌颂校党委、肯定校党委的声音也在有组织地发出。两种意见激烈对峙。少数中层干部开始反戈一击。

10 日下午，工作组开进清华。我和几位同学到二校门迎接工作组员，一边引路，一边帮他们扛被褥，拿行李。在我的心中，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是党中央派来领导清华运动的新的党组织。当晚，工作组领导叶林、周赤萍会见全校干部与学生代表。许多干部纷纷起义，表示与校党委划清界线。

11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论述了这场运动的性质、目的、任务，指明了运动发展的方向。

13 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接着，各系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杨东胜担任我系文革组长，张丽云、彭伟民任年级文革正副组长，我被指定为 001 班的文革组长。

清华的运动被纳入了工作组的轨道。但是，就像六月上旬我们学生对运动的感觉糊里糊涂一样，这些匆匆组建、仓促上阵、来自部委机关的工作组员，对于文化革命如何搞法，心里也不清楚。所以几天之后，新的矛盾开始出现，问题接踵而来。

中央在《五一六通知》中宣布，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以及结社集会的四大自由。类似的四大自由，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毛主席曾提出过，之后全部收回。这次重提四大自由，显然

也是一种利用人民群众，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那时，学生们不明白这一点。四大自由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宽松、活跃的氛围，也同时给一些非理性的过激行为提供了充分表现的空间。

当时，工作组面对着几个棘手的难题：

第一个难题：如何看待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六月中旬，文革刚开始几天，从上到下乱乱哄哄，不可能对此有一致的意见。新市委领导表态，认为蒋有严重错误，决定予以停职处分；而另一些中央领导则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两种不同的说法在清华师生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也使工作组感到为难。为了显示领导运动的决心，工作组在 12-16 日的四五天中，匆匆忙忙地将全校 112 人定为走资派，16 人为反动学术权威，50 多人为牛鬼蛇神，而且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召开批斗会。这种“不斗大黑帮，只斗小干部”的做法自然受到许多学生的批评和不满；

第二个难题：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工作组把许许多多的干部、教授定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或者牛鬼蛇神，一时间，校园里出现了随意抓斗黑帮、保皇派的情形，四天之内 103 名干部被戴高帽游街。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成段摘录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内容，鼓吹群众运动好得很，矫枉必须过正，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我从小受到尊师敬老的教育，对于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非常反感，很看不惯，但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有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有几次新斋楼下喧闹声响，游街人群路过，同学们急着去看热闹；我赶紧把窗户关上，免得噪音干扰，刺激神经。起先，对于揪斗游街的行为工作组还出面制止，但过了几天，尤其在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明确指出：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之后，工作组就不再出面劝阻了；

第三个难题：如何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工作组进校后，针对他们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态度与做法，一些持批评意见的大字报陆续贴出。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化 901 刘才堂与化 902 蒲大富的文章。他们鼓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求矫枉必须过正，反对工作组阻拦开斗争会，制止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他们的观点我并不赞同；但他们是学生，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都持这样的看法。一直到 6 月 23 日晚上，在参加了那个会议之后，我才开始对蒲大富产生了同情，并进而对工作组投射出怀疑的目光。

会议由系工作组杨组长主持，参加者包括了各班的文革组长。主要发言的是副组长张蔷薇。她向大家介绍了系里的形势，重点讲了化 902 班蒲大富等人的情况。据张介绍，蒲在大跃进时对三面红旗有看法，文革开始后保蒋，现在又反工作组，说明他一贯反对共产党；蒲前日在刘才堂大字报上的批语，充分暴露了他向无产

阶级夺权的狼子野心。根据这样的分析，她要求各班立即行动起来，可以通过写大字报，盯梢，或者引出来辩论的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张的语调完全是一种战前动员令。会场气氛很紧张，底下不时发出窃窃私语；有的高班同学直接发问，对工作组的意见似乎并不认同。我没有发言，但心里却有看法。

为什麼工化系工作组要在 23 日晚上火急火燎地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布置任务呢？当时我只知道第二天晚上，学校工作组将在大礼堂与蒯大富等人进行辩论，但是我不知道系工作组的这些意见，实际上代表了校工作组的态度，而且已经得到了一个在工化系蹲点的“普通工作组员”的首肯。这个神秘的幕后操纵者，就是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事后来看，工化系文革中的许多做法，很像是 64 年桃园四清的一个翻版。

回到班上，几位同学急不可耐地向我打听情况，我简单说了一下张的要求，并情不自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天上午，我向全班同学照章传达。午饭后，那些同学到我宿舍，商量晚上“观察”的安排。当时我们不满二十岁，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富有理想，逆反心理强；对于任何事物，要求公开公平；一旦发现有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或者以势压人、以强凌弱的现象，内心深处的抗争意识就会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来。我们与蒯虽然同系，但素不相识，也从无交往。六月上旬，从他们写的大字报上得知 902 班反蒋力量较强，蒯是支部组委，是反对者中的核心分子。为什麼工作组把他的这段经历也给否定了？许多同学想不通。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工作组要求我们采取的那些手段，什麼盯梢呀，激化情绪呀，引出来辩论呀——全是一些不上台面的小动作。为什麼要采用此等做法，不能堂堂正正地公开辩论？此时，逆反心态完全占据了主导，取代了以往的理性思维，也取代了我一直非常重视的组织观念。我与同学们商量：兵分几拨，傍晚时候早早去大礼堂占好位置，尤其要占据前排那些可以窥看后台动静的座位。

大礼堂座无虚席。大部分学生是抱着澄清事实的态度参加大会的。工作组领导与蒯大富舌枪口剑，激烈交锋。叶林表示：蒯是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周赤萍说：我们代表毛泽东思想，不许怀疑反对工作组。许多同学对工作组以势压人的口气很反感、想不通；他们认为工作组错判了形势，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大方向有问题。一些同学提早退场，进城向国务院汇报。

当晚我没去大礼堂。会毕，几位同学兴匆匆回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谈论现场看到的情景。大家一致认为疑窦重重，其中有鬼。于是，我们挑灯夜战，将疑点归纳整理成二十来个问题，以当时多见的提问形式贴出了大字报。我对清华工作组是否是毛主席派来的产生了重大的疑问。

第二天，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围绕 624 辩论会，拥护与反对的意见针锋相对，营垒分明。下午，叶林传达新市委领导讲话，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作组一边。晚上，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走访了国务院接待站，国务院副

秘书长许明表示，清华、北大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完全可以信赖。我是次日中午从学校广播台的广播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顿时觉得受到重重一击。

午饭后，那些同学到我宿舍，问我怎麽办？我斜躺在下铺的床边，两腿翘在扶栏上，平静地说：“看来清华工作组真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错了。事情主要由我发起，我一人承担，你们都没关系。下午我就去找工作组谈”。个别同学劝我别主动去找工作组，说过几天就会没事了。当时我想：接下来工作组一定会通过大会小会，要求人人表态；与其让别人检举，不如自己去说来得坦荡。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算盘：工作组吴同志平时对我不错，说不定会放我一马，要我吸取教训，以后当心。我放下双腿，准备站立起来，但感到两脚麻木，一个趔趄。其实这是由于姿势不当，压迫了神经。后来有人在批判会上说我害怕得站不起来，简直是无稽之谈！

下午，我找吴同志谈话。开始他很客气，笑嘻嘻的。但越听面容越发阴沉，没说一句话。第二天没事。第三天，全年级召开大会。工作组宣布：在化 00 级，有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反工作组小集团，为首的是 001 班的王允方。挖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无疑是件大事情，尤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全年级震动了！我不知道工作组是如何发动群众，搞背靠背揭发的，我只知道一下子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新斋门前的大字报栏；其他系原先的育才同学也奔走相告，参与揭发。据说杨东胜因不同意把矛头对着学生而被冷遇；彭伟民因态度不够坚决而不再担任职务。这就是组织的力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工作组宣布 001 班的文革组长由那位团支部组委同学担任，另一位湖南来的 Z 同学似乎也有一个位置，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我被软禁看管，行动限制，吃饭如厕都有人跟随。外边发生的事情，包括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都无法知晓——这样也好，少了平添烦恼。七一过后，工作组在化学馆大教室召开化 0、化 00 联合批判大会。一个因病住院半年的同学从医院回来，高喊着“我揭发、我控诉”上台；说我去医院探望时带了水果，是在腐蚀拉拢他。那位成绩差的同学控诉我的逻辑更奇怪，她说：我与高数老师（摘帽右派）和英语老师（支部书记——走资派）相互勾结，给她补课是在歧视、迫害贫下中农子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件简单的事情竟然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对于这种不可理喻的说法，我只得保持沉默，无言以对。

听着这些气势汹汹又不入情理的言论，我还有什麼可说呢？我站在台前，沉默以对，态度平静，与大家一样举手呼喊口号，似乎没有太多的恐惧。因为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工作组责令我认真检查，并暗示下次批斗会将定在 7 月 18 日。二十年后我与东胜谈起文革往事。他说七月份工作组曾派人去他家调查。杨成武的秘书问道：“王允方是清华的干部还是学生？”答曰：“学生”。“你们怎麽把矛头对准了学生？”很简单，政策的差别就在这里。

写检查我不陌生。中学时写过“自传”，大学时写过“思想汇报”，其中的格式套路我心中有数。这次写检查，除了过去的内容，还要将反对工作组的错误联系起来。怎么写？这可是政治性的错误！我的内心充满了紧张和恐惧，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转彻难眠。但是，我更多的是感到委屈和困惑。这次我犯了错误，但事后态度诚恳，对组织主动坦白，为什么组织上还要对我如此的严厉，将本来简单的事情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等着检查。几天过去了，一切照旧。十天过去了，没有动静。到了7月18日，依然没有消息——倒是我有些着急了。我哪里知道，短短二十多天，北京城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7月30日，我被通知参加班会，听文革组长介绍前一天去人大会堂参加文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情况，并传达刘少奇的讲话。刘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工作组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要保护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大转折、大变化——我听了欣喜若狂，如同劫后重生的感觉。其实细想一下，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中，已能窥出端倪：先是新市委宣布从各学校撤出工作组，后是班文革组长专门找我谈话，把查抄的笔记、资料以及我写的检查材料如数退还，还问我检查材料是否需要烧毁？我得到了解放，获得了自由。一场噩梦总算过去——我想。但是，后续的经历却远非我想的那麽简单。

我开始思考这两个月背后的故事。我想：这样看来，清华工作组显然不是毛主席派的，那又是谁派的呢？看来我原先的想法不对了，党组织也不是事事正确，也会犯错误。清华工作组不是毛主席认可的，所以它是错误的。《五一六通知》中不是清楚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工作组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呢？有何背景？用意何在？我一边想着问题，一边庆幸自己没有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摔跤，没有错跟这个组织。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后续故事，要比我，以及一切善良的人们想的要复杂、曲折、残酷、血腥得多——早在1965年，在韶山滴水洞，老人家用了38天的时间，已经构想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余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具体实施了。

我被解除了看管，虽然身体获得了自由，但精神禁锢依旧——主要的感觉是孤单与孤独。一个多月的检查批斗，把一个真实的人完全毁了。毁了人的尊严，毁了人的精神，毁了人的个性，也毁了人的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所谓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至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断章取义、小事扩大、无限上纲等等，均被视为小节，不会追究。我与其他蒯派同学都经历过这样不堪回首的场景。工作组匆匆地走了，但是两个月的后果和影响却不可能就此带走——它是造成清华后续运动内斗不止的主要祸根。

短短两个多月，学校形势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校党委与工作组相继崩塌、撤离，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权力空窗期。党组织不再了，团组织也不见了；没有了组织的领导，没有了组织的安排，我该怎麽办？！在这种混乱无序的情势下，我想，只有通过学习领会《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然后依靠自己对形势的感悟，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及，最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理智与良知，来明辨方向，分辨是非，分析对错，规范行为；我不能因为这次挫折而灰心丧气，要振作起来，投入运动，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文化大革命是人生一次难得的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机会，我必须积极对待。我对自己如是说。

基于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学生开始分成两派，观点针锋对立。八月初，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对联风暴，鼓吹红色血统论。一批外校学生藉着宣传对联寻衅闹事，在大礼堂挑起了一场辩论。有些系加紧成立“贫协会”。一时间，红五类、出身论的声浪席卷了全校，空气躁热而又压抑。如果说，最初是工作组在学生中砍下了第一刀，那麽接着是出身论鼓吹者又砍下了第二刀。学生群体被活生生地撕裂成对立的两派，清华的运动走入了令人迷茫的歧途。

我不赞同血统论观点，那是非常唯心的，违反辩证法。由于无法与班上同学交流，我只好去乒乓球队向我的朋友李磊落倾吐心思。他同意我的看法，理解我的处境，一再现身说法地开导我、鼓励我。李磊落的出身并不好，但是他没有背上包袱，而是坦荡面对，积极上进。我从他的身上得到了力量，但依然没有胆量像他那样，在公开场合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还有顾虑，害怕会再次陷入蒯派身份的囹圄。

工化系素来能人集聚、能量充沛，不论是文革前参加校运会还是现在参加文革运动。作为工作组重点关注、王光美专门蹲点的单位，工化系似乎注定了将在清华文革历史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时蒯大富尚在蛰伏，而其他的能量人物已在窥测时局，跃跃欲试。

工作组撤离之前，提议由原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临时筹委会”，代行学校领导职权。这个脱胎于工作组的钦定机构，缺乏群众基础，从成立之日起，就决定了其无所作为的命运。当时学生中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二是接受工作组的检查，把运动方向转向揭批学校党委。临筹委支持第二种意见，并在8月7日中午广播了“八七建议”。这无疑像是一把火，点燃了学校炙热躁动的空气。

我有一点记忆，尚待佐证核实：8月7日下午，在新斋化001班宿舍里，杨东胜、彭伟民、施云浦等人针对中午广播的建议，情绪激动地争论着。他们主张必须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弄清是非，消除影响，然后才能开始批判蒋南翔。高分贝的声响吸引了旁边003班的同学，以及过道那边002班的同学，有人

过来参与讨论，其中就有唐伟。他们决定通告全校，第二天上午在化学馆开会，具体商量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议题。我在邻近的房间里，听着他们热烈的讨论；虽然我与他们观点相同，但是当时在他们的眼中，我还不具备平等参与的地位。

“八八串联会”由此成立，这是清华第一个由群众自发产生的组织，唐伟就此成为学校文革期间的一位风云人物。我一直不明白：8日上午，杨东胜、彭伟民为何没有到会？其中有无变故？如果他们到场，清华的文革历史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版本。第二天，对立的“八九串联会”相应成立。清华文革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八八串联会”连续数天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涉列的事实触目惊心。但是，那段时间，我与大多数蒯派学生一样，只是个半自由人：虽然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但依然无法参与具体的活动；别人见了回避，似乎我们是不可接触者。八月中旬，我找到乒乓球队一位姓沈的同学，他是数力系八八派的头头。他对我说：“你是一般职员家庭出身，参加八八没问题。但你是工化系的，需要回系里报名。”系门紧闭，叩门无声，期望如泡影破灭。我好像荒野游荡的弃儿，四处徘徊，天地不应，内心的苦楚与无助只有自己知晓。

自八月开始，社会上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各校。北京二中红卫兵散发传单，提出“破四旧”口号。各校红卫兵走上街头，打砸抢恶行蔓延京城。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一时间，北京好像疯了似的，变成了红色的海洋，红色恐怖笼罩全城。据文革后披露的资料介绍，仅八、九两月，北京市内被红卫兵抄家的有11.4万户，没收私人外币黄金价值4480万元，被赶回老家的黑五类及其子女7700人（占当时北京人口的1.7%），被打死的有1772人。我的姨妈住在西单附近。一天，一批人大附中红卫兵闯进她家小院，将邻居一位黑五类老者拉到院中，当着子女的面，用开水浇淋，皮鞭抽打，反复多次，活活致死。红卫兵还要站在一旁的子女表态，承认这是革命行动。清华园里，伴随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叫喊声，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宣告成立。几天之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相应成立。校园里开始形成了一个串联会对阵串联会，红卫兵对阵红卫兵，势不两立的对抗架式。

大字报越来越多，矛头指向从工作组，上升到王光美，再延伸到新市委，甚至直指刘少奇。社会上开始转抄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大批外地学生来校观看大字报。8月24日下午，应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的请求，包括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内的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杀气腾腾开进了清华园。他们一遍一遍播放安民告示，播放最后通牒，打人骂人，撕毁了全部大字报。晚上，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将清华大学的代表性建筑二校门推倒砸烂；中层以上干部被勒令到场搬运清理，惨遭毒打。历史将永远牢记这罪恶的一天！

清华的运动走入了暴力的泥沼，前景迷茫不明。我与许多同学一样，带着恐惧与无奈的心情，离开了学校。李磊落劝我去外地看看文革的情况，于是我回到了老家上海。

我在上海逗留了半个月。父母亲单位文革运动一样红火。他们身为一般干部与教师，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还分别担任了造反派的队委，平时很忙。妹妹在市二女中念书，学校活动很多。我空闲无事，就去离家不远的上海市委门口看大字报。我对上海市委一直心有好感，这可能与前几年在育才时，常听史老师介绍有关。这显然是感情的缘故。至于大字报中揭发的事情，我知晓甚少，无从表态。我想比较实际的做法还是去我熟悉的母校看看。

离校一年，犹隔半世。我所见到的育才，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大字报、大喇叭，绿军服、红袖章——到处充斥着令人头晕心颤的气氛。那些风风火火进出校门的学生，没了稚嫩的面容，只有亢奋的表情。一位老师悄悄告诉我：不得了了！你不知道：上个月，来了一批北京育才学校的红卫兵，在二楼教室用皮鞭抽打林老师，说她是修正主义教改的黑干将，还给剃了阴阳头。林老师不堪受辱，自缢而死。另外一位小王老师，因看不惯某些学生的暴力行径，口出怨言，被迫绕校爬行，并逼喝尿，当晚跳井自尽。这两位老师都是我所熟悉的，他们年轻开朗、意气风发，对教育事业倾注了一片热忱。现在，她们匆匆离去，带着满腔的悲愤与冤屈，死在了理性失没、人格变态的学生手里。我真不能理解，人性怎麽会变成这样？！我的这些育才弟妹，这些原本知书达理、尊师守纪的学生，怎麽会变得如此张狂、如此暴戾？！可能这就是他们心中理解的革命的含义？我沉重地叹息摇头，心中一阵阵地抽泣。校园里贴满了批判段校长的大字报，所写的事情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有记忆。我边看边想：假如现在我没毕业，还是育才的学生，我会选择怎样的立场？我会站在哪一边？是反对还是保护段校长？我想自己肯定是个保守派。为什麼？很简单，因为我了解育才，信任段校长。相比之下，我对清华党委的态度却不一样；因为我刚入校一年，对他并不了解。

我在家里住了半月。一天中午，妹妹突然回家，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是不是从学校逃回来的？”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她出了什麼事情？她严肃地告诉我，在他们学校附近看到了一张由清华大学红卫兵张贴的“通缉令”，并附有相片。被通缉的对象正是王允方。我本以为周总理来校多次，向全体师生公开表示工作组批斗学生是错误的，这就意味着向我们这些蒯派人物作了道歉，以前的事情就此过去；但没想到直到现在，居然还有一些人纠缠老帐，将我们看作是反动分子。我没法对妹妹解释，也来不及向父母道别，匆匆赶回了学校。走进宿舍，见到了班文革小组的那位Z同学——我的直觉告知他与那份通缉令有关。他冷冷地冲着我说：“你回来了！你是什麼人？还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这句侮辱人的话我一直记着，这哪是清华学生的语言，完全像市井肖徒的口气。两年之后，即1968年

7月27日那一天，正是这位Z同学，向一教门前的工宣队人群投掷了两枚手榴弹。我真想当面责问他：“你该想想，你是什麼人！”

国庆节将到。出于安全考虑，“临筹委”要求各系将内控学生安排下乡，参加劳动。我与施云浦以及高年级的十几个同学一起，去延庆山区劳动，带队的就是这位Z同学。我们在延庆住了近十天，音讯全无。突然有一天，听高班同学说，“临筹委”解散了。我们强烈要求立刻返回学校。次日一早，翻山择道，攀上火车，演出了一场胜利大逃亡。

我首先想到去见李磊落。他神色兴奋地告诉我：清华形势大变了！前几天，“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蒯大富、鲍长康与彭伟民是召集人。井冈山红卫兵的三大口号是：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他已经报名上山。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回想几个月的孤独与孤单，回想因为没有组织、没有同伴的苦恼与受气，我急切地希望加入井冈山。9月28日见到彭伟民，我希望他能介绍我上山，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在荒野踯躅、游荡了两个月，终于找到了归宿。有家的感觉真好！

(六)

我上了井冈山，有了自己的家，心境愉悦，舒畅无比。10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帜一起飘扬。我和五十多位井冈山战士在战旗下精神抖擞，高喊口号，列队游行。这是我文革以来第一次参加游行，一路唱歌、高呼口号，激奋之情难以言表。

10月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我们清华井冈山战士去首都工人体育场参加“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共有十万之众。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参加。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蒯大富代表首都红卫兵向毛主席宣誓。面对着庄严的场面，我热泪盈眶，激动异常，不住地鼓掌、欢呼。我庆幸自己站队正确，预感今后的斗争会更加艰难复杂。我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无所畏惧地参加文化大革命，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次大会是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分水岭，也是蒯大富人生经历的重要里程碑。

几天后，一位瘦高个儿、戴眼睛的学生找我，通知晚上在西区二宿舍开会，并自我介绍是自控系6字班的孙怒涛。是孙怒涛啊——我好惊讶。我想起了，“革命少数派”不正是他写的吗？回想八月份，在我受压难熬的时候，正是这篇文章鼓舞了我，激励了我，给了我充实的力量和信心——当时从这篇文章获取力量的

又何止我一人！

“湘江”战斗组成立了，当时一共有十个成员，组长就是孙怒涛。据他介绍，老蒯对“湘江”抱有很大的期望，将其定为井冈山红卫兵直属第三战斗组，并委派老孙领导。我之所以能够加入这个小组，也是老蒯与彭伟民商量的意见。我很感谢他们的安排，使我能有机会认识老孙，以及其他几位同学。我们并肩战斗，相互帮助，友情与日俱深，并一直维持至今。我对这个曾经属于过自己的“家”感情深厚，经年不忘。

“湘江”的成员分布多系，年龄不等。其中有自控系6字班的孙怒涛、刘惠明和常峰，自控系7字班的刘国光、水利系7字班的万陵馨、8字班的戎兵（显然是改用的名字，真名姓陈），数力系9字班的沈文龙、自控系0字班的殷江昊（长实）以及工化系00班的我。还有一位化901班的宋同学，没来几天就离开了。这些人中，有的原先也是班团干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整过。大家都有一段翻身解放的感受，期盼今后能在一个比较宽松、融洽的环境里，全身心地参与文革运动中去。

我有一个积年养成的习惯，比较在乎听取学长的意见，这可能与我比较早熟有关。在“湘江”里，我班次年龄最小，因此，很自然地格外关注高班同学的观点，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觉与老孙、刘惠明、殷江昊的思想方法比较相同，看问题的观点比较接近，因此配合默契，交谈也多。我尤其愿意与老孙讨论问题——他谦和诚恳，热情民主，没有丝毫的架子；他思路敏捷，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也善于了解对方的意图。所以，我很自然地时常主动向他反映一些看法，提出某些建议；对此他也从不敷衍搪塞，而是认真考虑，合理采纳。“湘江”在老孙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分工合作，全组一盘棋：大家先集体商量各篇文章的主题，确定论述的观点，研究表述的思路，然后分头撰写，很快就写出了一批立意明确、观点鲜明、论述清晰的大字报，在校园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湘江”也由此成为清华战斗组中的一支新锐。

那时学校战斗组很多，分属于各派红卫兵组织，各自占据了某个教室作为活动场地。“湘江”组人数较多，需要一个较为宽大的场所。一天，我与老孙、刘惠明无意中找到新水403，这是一个上制图课的大教室，宽敞而又明亮。领主是“轮机兵”，一个由冶金系压00班同学组成的战斗组，主要成员有陆小宝、周家宗、雷翎、卢清萍等人。老孙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分享共用，合室活动。我对此不抱希望，心想哪有人会同意与别组分享房间，一家独用不是很惬意的吗，况且又不用自己支付房费。没想到“轮机兵”的代表竟然爽快而简单地回答：“可以！”我不禁肃然起敬，定睛细看：此君中等身材，青工模样，浓眉大眼，两目炯炯。我们一一握手，自我介绍。他自称叫“汲鹏”；我没听清，又追问了一句，他答曰“姓汲名鹏”。我这才知道这是个不多见的姓氏。事后想起，《新清华》上曾有介绍，压00班是当年我们这届年级中几个优秀团支部之一，我曾有心造访取经；汲鹏是

该班的团支书，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66年10月我俩邂逅相识，一起战斗；毕业后同样被分到了邯郸；八十年代中期又曾同在康华公司工作；彼此友情深厚，历久弥坚。“湘江”搬进了“轮机兵”的领地，两组同室活动，并由此开始了孙汲合作的新篇章。

十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学生串联，分赴各地，煽风点火，发动群众。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坚决照办。于是“湘江”组全体南下广州、南宁。在广州，我们住在华南师范学院，参加两派举行的大会。当时，该校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应当先批判工作组，还是先批判校党委？这与清华以前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明确表态应当首先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了南宁，入住西南民族学院。老孙因在衡阳候车时受寒发烧，加上路途耽搁，酿成了胸膜炎，需要留医治疗。我和其他组员无心久留，决定直接返京。

这是我第一次随团串联，亲身体验到旅途的辛劳。当时，各地的大学生，包括一些中学生，响应号召，结伴串联，给正常的铁路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从广州启程，在衡阳转车，足足候了两天两夜。车站里人山人海，东躺西歪。一些初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串联。他们被困在途中，去哪里不清楚，干什麼不知道。时已入秋，风起寒意。有的学生饥困交集，生病发烧。老孙也因路途劳累，受寒患疾。好不容易等到了一辆开往南宁的国际列车，大家蜂拥而上。我与几个同学打开空无一人的软席卧铺，让那些患病的孩子休息，引起了乘警的干预。说实在话，我们的行为的确不妥。但是在那个目无法纪的年代，只要政治正确，其他都是次要的。我亲眼看到了大串联的混乱，感受到大串联对企业日常运行的干扰，对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心有疑虑。果然，不多时间，中央就改而提倡步行长征了。

离校半月，运动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全校形势趋于明朗，一些原先持中立态度的红卫兵开始集体转向；二是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等组织内部，一股与井冈山红卫兵合并的呼声渐渐兴起，而且愈来愈烈；三是由基层干部与教师组成的战斗组陆续成立，开始提出解放干部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争论；四是井冈山红卫兵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发展迅猛，急速膨胀。我听说由于总部把关不严，一些投机分子、保守派、营利之徒趁机混了进来，给外界造成不好的印象；有些头头身上开始出现官僚主义的苗头，贪图舒适，拉帮结伙，相互吹捧等等。我听了非常气愤，也十分担忧。十一月底，老孙从南宁回来，我们向他汇报了各方面的情况，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向老蒯进言，从井冈山总部内部开始自我整风。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大联合已成为造反派能否继续前进的头等大事，造反派内部的自我建设问题已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一个由战斗组长联席会议议决产生的三总部整风领导小组成立。老孙作为改名为“第一湘江”的组长与“轮机兵”的组长汲鹏一起，参与了整风小组的工作。

我们两组同室活动，经常交流对运动的看法。一天，“轮机兵”新来了两位女同学。雷翎介绍说：一位是焊 8 的冯韵芬，一位是金 7 的张蔼玲；她还同时补充了一句：张蔼玲是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我与高班同学已有接触，但从未见过学生辅导员，感到十分好奇。后来听说，她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因此，从认识那天起，我就比较注意她的言谈想法，以及对问题的分析。不久，新水教室出现空余，“湘江”搬到了 311 室，“轮机兵”则搬到了邻近的 308 室。

出于对“家”的情感，我十分看重三总部的大联合，以及井冈山内部的整风，认为这是造反派队伍壮大自身力量，保持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的灵丹良方。其实我很天真，哪里知道在位者的感觉与在台下时已截然不同。老孙像我一样，也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每次见他回来，一脸的愁容，就知道他未能说服老蒯。我很焦急，就向老孙提议，何不把三个总部的主要战斗组一起拉出去，实行“兵谏”，这样或许能有助于推动大联合。我拿着老孙提供的战斗组名单，去十号楼找“轮机兵”陆小宝、周家宗商量，决定立即行动，分头联络。当晚，我按图索骥找到了十几个战斗组；除一个婉拒外，其余的都很热情、诚恳，答应赴孙-汲之约。12月 15 日晚上，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会聚在新水 311，在促进大联合的理念下，决定成立“天安门战斗兵团”。据我记忆，这些战斗组包括：“不怕鬼”（化研）、“人民万岁”（制 7）、“第一红五星”（汽 7）、“第一燎原”（无 06）、“红色风暴”（化 02）、“第一送瘟神”（自 05）、“锷未残”（水 9）、“巴黎公社”（化 6 等）、“第一红鹰”（企 6），“轮机兵”以及“第一湘江”。之所以起名为“天安门”，一则当然是由于天安门在国民中的崇高形象，二则照老孙的说法，“天安门”不是东单，不是西单，不偏不倚，比较公允。第二天，“天安门战斗兵团”发表成立宣言，并同时贴出了一批大字报。大字报上统一盖上由“不怕鬼”才子们刻制的天安门红色印戳，颇为显眼。“天安门战斗兵团”的成立震动了井冈山的头头，老蒯赶紧派总部委员崔兆喜前来探问。老孙不在，由我接待。崔很激动，眼中泛着泪光，一再表示有意见好好谈嘛。我向他说明：“天安门”的成立，完全没有拉山头、闹分裂的意思；我们是为了促团结、促联合才这样做的；只要三总部联合了，“天安门”会立马从“兵团”降为“纵队”；这些战斗组的人没有权力的欲望，只希望用大字报说话。过了三天，也就是 12 月 19 日上午，三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其他一些红卫兵组织宣布解散。分久必合，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二月注定是惊心动魄的月份。文革过了半年，中央两种力量、两条路线的斗争，营垒分明，异常激烈。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各地造反派组织要在年底之前完成大联合，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夺取决定性的胜利。那段时间，矛头指向刘少奇的大字报已公开上街，与此同时，社会上流言

四起，观点对立，针对其他政治人物的大字报也有出现，其中包括关于周总理，中央文革某某人，甚至有关于林彪的。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反击！井冈山兵团决定组织一次声讨刘邓反动路线的大游行。老孙指派我与“红色风暴”的几位同学为先头部队，去城里骑河楼清华办事处做准备。

12月25日一早，井冈山兵团和全校革命师生六千余人冒着凛冽的冷风，徒步游行，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公开喊出了声讨刘邓反动路线的口号。十点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兵分五路游行宣传。1225游行震动了北京，也震动了全国。

那天我在骑河楼与天安门纵队的队伍会合，一路唱歌喊口号，走回了学校。这是我文革之中最狂热、最亢奋的一个时期，也是自己的理性思维被感性情绪严重压抑的一个时期。我不仅参加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将以“第一湘江”的名义写了许多观点偏颇、用词过激的大字报，藉以表达保卫中央文革，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坚定立场与鲜明态度。老蒯在二教前我写的一份大字报上曾有批注，赞扬文章嗅觉敏锐、观点犀利，写得好。当时觉得很得意，回想起来，这正是我当年头脑膨胀、思想极端、理智失却的具体表现。我为什么在这段时期会有这样狂热的表现呢？客观分析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像绝大多数年轻学生一样，当时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维系着强烈的革命崇拜、英雄崇拜和领袖崇拜的情结。记得那时候传抄的大字报中有一篇马克思认同的格言，其中他最欣赏的一句是“怀疑一切”，我对此很有共鸣。此外，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毛主席有句精辟的论述，那就是：“归根到底一句话，造反有理。”“怀疑一切”“造反有理”这八个大字，犹如一道圣喻，成了我那段时期思想行为的罩门。我与千百万在天安门广场朝圣的年轻人一样，如同一个个浑然不知的小和尚，张狂不羁，无法无天。第二个原因，我们这代年轻人的身上都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时代责任感。毛主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的教导极大地激励着我们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7月下旬，老人家畅游长江；8月10日，提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广大同学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运动之中，希望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第三个原因，这种狂热、亢奋的表现，可能多少与我几个月来承受的心态压抑有关。这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一种压抑的反弹。作为心理状态的调适过程，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慢慢地趋于平静，归于理性。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不久之后中央高层爆发的一场新的斗争，犹如一记猛掌，给了我当头棒喝，使我原先狂热的头脑开始苏醒，亢奋的情绪开始降温——我对那八字圣谕开始投注检视的目光，理性思维逐渐从感性情绪的压迫中摆脱出来，逐渐回归自我。这场斗争的主角，一个新的牺牲者，是我心目中的崇拜偶像——陶铸。

1967年元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揭开了打倒陶铸的序幕。中央文革首长纷纷讲话，学校里很快出现了一个批判陶

铸的高潮。

为何要打倒陶铸，我感到莫名其妙。即使后来陈伯达言之凿凿地批判他用促生产来对抗抓革命，我也认为这只是由于分管工作的不同，思考角度有差别，不至于要被上纲到反革命两面派的罪行。

我对陶铸素怀敬仰之心。早在中学年代，读了他写的散文《松树的风格》，被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吸引。那些闪烁着哲理之光的文句，自小一直陪伴我成长，成为激励自己进步向上的动力。在我年少的心目中，陶铸的形象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正直朴实、刚正不阿、克己奉公、任劳任怨；他的人品、风骨、操守，以及文采都令我敬佩不已。文革开始，他从广州升到中央，成为总理之后的第四把手；但是短短半年，就被稀里糊涂地打成了反革命。对于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政坛骤变，我怎麽也想不明白。我想毛主席想必是知道这件事的，那他为什麼会同意打倒陶铸呢？！这个问题太复杂，我不敢深想下去。几天后，我与“天安门纵队”几位高班同学聊天。在谈到十二月黑风以及陶铸倒台的事情时，有人说：

“现在全国都举着红宝书，山呼万岁，真有点像历史上皇帝的样子。”不知谁接着补充了一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如果以后中央文革自己犯错误了，该怎麽办？！”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尖锐的言论，不禁为之一怔。其实，那个时候一些思想敏锐的同学已经开始思考和议论这类尖端的问题，只是我比较木纳，还没想到而已。中央文革犯错误——这可能吗？我怎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呀，如果中央文革真的犯了错误，那该怎麽办？这句话如醍醐灌顶，令我豁然开窍。我一边呐呐地说：“不会吧”，一边暗自思索：政治斗争太复杂了，谁知道政局会如何变化；今后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理性分析，千万不能再盲从跟风、轻易表态了。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67年元月开始，文革运动进入自下而上全面夺权的阶段。元月初，上海“工总司”首先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权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随即致电祝贺。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青岛等省市仿而效之，相继完成了夺权。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由于夺权斗争，矛盾进一步激化，逐渐由辩论争执，演化为武力抗争。为了支持地方革命造反派，推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全面展开，各校学生纷纷离京，去外地串联宣传。“天安门纵队”战斗组长紧急开会，商议行动去向。“湘江”组几位同学主张去上海，因为上海是一月夺权的发源地，是文革运动最为红火的地区，去上海可以感受新的革命激情。但是老孙与我比较倾向于纵队其他战斗组的意见，主张去山西 - 四川一线。当时山西刚刚完成夺权，新生的政权需要北京学生支持；而四川形势正在吃紧，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难分难解，更需要我们前去声援。讨论多次无法统一，老孙只好决定全组人马兵分两路。这次分离预示了小组内部开始出现了裂痕。果然，回校几个月后，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看法不同，彼此

互不妥协，无奈之下，“第一湘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老孙布置我与周家宗，还有两位“第一燎原”的女生，先去太原踩点，安排众人住宿。1月18日纵队人马抵达。我们把队伍分成两拨，一拨去太原纺织厂，支持由女工解悦当头头的造反派；一拨去太原重型机械厂，一些高班同学以前曾在该厂实习。我们在厂广播台宣读“抓革命，促生产”的稿件，写大字报反击经济主义黑风。每篇稿件和大字报都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天安门纵队”的名称统一标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生活十分清苦。我们住在河西区政府招待所，每天伙食费三毛一分。菜量不够，只能以醋拌粥，好在饭桌上陈醋是敞开供应的。2月初，老孙得知老蒯身边有人试图反对唐伟，否定八八串联会，他心感焦虑，赶紧返回了学校。我们余下的人马则转赴成都，参与当地的文革运动。

四川的情况比较复杂：保守派产业军主要由老工人、老模范组成，受到原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的支持。造反派中有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以及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三股力量。按照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我们先入为主，下车伊始就明确表态支持川大826和造反兵团。我们住在原西南局机关大楼，每天分散活动：有的写大字报，有的去川大参加会议。我曾两次去军区文艺团体，向他们介绍北京政坛的情况，就是当年学生“煽风点火”的那套做法。所传的消息，有些是大字报上登载的，并不靠谱；有的观点比较偏激，带有主观臆断的成分。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给听者带来了很坏的影响；由于他们的军人身份，有的人可能还因此遭受了整肃与处罚。回想此事，我深感内疚和自责。

10日左右，从川大826和造反兵团听到消息，说一些造反派人士被军方抓捕，关在军区大院。我们十几个清华同学，以及一些四川本地的学生进到大院，在二道门前静坐，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军区没有反应。两天后，我们开始绝食抗议。二三十个人在二道门前不停地喊口号，要求军区派人会谈。后来，军区汝副参谋长出来与我们谈话，他要求北京学生马上离开，只字不提放人的事情。大家非常气愤，继续坚持绝食。第三天，一位化8女生晕倒，被赶紧送医。我忍无可忍，写文痛斥韦杰、甘渭汉等军区领导。可能是事情闹大了，引起了更上层的注意；2月15日，汝某通知我们，同意放人。我们高高兴兴走出了军区大院，俨然一付得胜归来的样子。“不怕鬼”的同学犒劳诸位，我一气吃了九个馒头。17日晚天安门纵队最后几位同学回京，其中有杨承勋和张蔼玲。这次静坐绝食，张蔼玲一直在现场，我对她十分佩服。顺便说件趣事：四川虱子很多，接待站发给每人一根“水银腰带”，说是可以驱避虱子。“水银腰带”中并无水银，只是一些乳白色的黏液，常常会因破漏而沾污衣裳。我们天天系着这根宝贝腰带，昼夜不离身。但是这玩意儿一点不管用，我还是觉得身上痒痒难受。有时一边写大字报，一边挠肩揉腰，坐立不安，样子非常难看。无06班杨秋生与我们一起回京。他拎着一个小包裹上火车，把包裹放在座凳上，说“里面是虱子”，谁也不敢靠近。回到北京，

我去姨妈家里，用一大盆开水将衣物浸泡，脱下的毛衣都挠出了一个个窟窿。成都之行让我有机会了解地方两派群众组织严酷斗争的真实状况，从而开始对文革有了一种冷静的思考。我完全没有想到，正是这次串联，引发了许多后续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这辈子的生活。

离开校园一个月，形势有了大变化。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干部问题开始成为辩论的焦点。其实，从1966年11月中旬起，学校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干部问题的大字报。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揪要害”战斗组的“你知道我校有多少‘黑帮’吗？”、“再谈是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的”，以及“万山红”战斗组“对待解放基层干部问题不必怕字当头”等等，公开提出了解放基层干部的问题。与之相对立，以土建系教师陶德坚为首的“红教工”战斗组则予以反驳，提出要与“揪要害”讨论，认为这股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面对双方观点交锋，“横眉俯首”战斗组也参与了争论。这个战斗组由原数力系总支六位委员组成，他们平时在原副校长张维家里活动。我记得十二月初，曾随组里高班同学一起拜访过张维老师，他们知道我们是“第一湘江”的，显得特别热情。我们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表示今后相互走动，小将要积极支持干部站出来革命。这是我第一次与清华干部接触，也由此认识了该组的老师王学芳。

与两个月前相比，1967年春节之后的形势已大不一样。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和青岛五个省市的夺权运动，标志了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建立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即要有革命造反派、革命军人以及革命干部这三部分人组成。因此，解放干部的问题成为了新政权成立的关键。2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文章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传统政策；“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决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篇社论如同吹响了集结号，许多中层干部，甚至包括原党委副书记刘冰纷纷表态，决心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在这些干部中，原团委副书记谭浩强比较引人注目。1月13日，他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1月23日和2月15日，又先后编印了“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100例”、“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行100例”。这次学习红旗社论之后，他贴出了“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的大字报。对于谭浩强的革命行动，井冈山总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月1日，《人民日报》介绍贵阳棉纺厂按车间联合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希望由乱到治的一个战略部署。井冈山总部立即发出通知，决定解散全校各个纵队，学生回班闹革命。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想做到按系按班复课闹革命是很难的。第一，那时候全校行政领导系统尚未建立，总部正忙于进行整风，头头们灰头土脸，观点对立，顾不上部署系班联合的具体事宜；第二，各系各教研组两派不和，行

政学术系统打乱，没有人来考虑课程安排；第三，一些教授挨批判、靠边站，戴帽子，不敢上台讲课。所以复课没几天，就有人提出了质疑，上纲上线，抨击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重新吃香了”。另一方面，虽然纵队一级被解散了，但战斗组犹在，仍在参与运动。因此，不到半月，回班闹革命的情势名存实亡，而运动依然在按照其原有的轨道继续前行。

根据总部的通知，天安门纵队解散了。三个多月的共同战斗，尤其是一、二月份的晋川之行，更加深了各战斗组间的战斗友情。三月中旬，冒着初春的寒风，全纵队近百人同游香山，在鬼见愁高峰合影留念。之后，各战斗组以独自活动的方式，取代原先联合行动的方式。随着学校运动不断深入，许多小组成员之间意见分歧明显，分裂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

“第一湘江”是个典型的跨系跨年级战斗组，最初的成员革命精神旺盛，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与战斗力。老孙身为组长，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虽然他在组里作风民主，不重权势。十二月份进了几位新人：有的特立独行，不好合作；有的擅长美工，思维平淡。一月夺权后的晋沪之争，显出组内已有不同的意见。有些组员向老孙发牢骚，说他经常偏向我。其实在小组讨论时，我说的一些意见，往往有许多与老孙思路相通，不谋而合，于是他就此做了决定，完全没有所谓偏向的问题。晋沪串联回校后，老孙忙于总部的活动，组里的日常工作托付刘惠明来负责。一次全组开讨论发展新人，我说：看来下一阶段学校的争论重点将是干部问题，我们何不在现在就吸收几位干部进来？老孙表示赞同，但也有一些人竭力反对，认为干部右倾，思想保守，来了不好相处。经由老孙拍板，原团委副书记谭浩强与贺美英成了湘江组的新成员。有的组员也顺便把自己的同学或个别新闻人物推荐进来。因此，三月份之后的湘江，状况大不如前：虽然人员多了，但真正有思想、有观点、出主意、能动笔的人并不增加；反倒是一些空议论、常溜达、说闲话、吃零食的人多了。组内矛盾日益显露。三月下旬，井冈山总部二办通令解散“二万五千里”，这是一个主要由动农系教师组成的战斗组，由此引发了部分总部委员和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谭浩强写文批评二办，招致了各种意见。月底前某天早上，我照常去新水311参加活动。门虚掩着，响声传来。我从门缝往里看，屋里坐着许多人——老孙不在，刘惠明是否在记不得了；只见谭浩强耷拉着头坐在墙边，常峰站在一旁，慷慨激昂地指着他说话，一副大批判的样子。我没进去搅局，赶紧报告了老孙。后来得知有些组员背着老孙和我们几个，提早开会，想内部帮助谭浩强。这种面和心不和，背后闹事的做法，注定在两个月后，当学校运动进入辩论干部问题时，“第一湘江”终于走上了分裂的不归路。

关于清华大学干部队伍的分析，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真正走资本主义的是极少数。这种观点与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以及此后发表的红旗杂志调查员和评论员文章的基调相同。文章明确指出：1966

年 6-7 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看法在学校广大中下层干部，以及相当多的师生中受到拥护。另一种认为，干部队伍基本上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执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 727 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之后宣称的所谓两个基本估计，反映了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这种看法在以“红教工”为代表的教师干部中获得了支持，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表示赞同。

平心而论，我对清华的具体情况了解甚少。如果说当初反对校党委，主要考虑的是他们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那么这次我对干部队伍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对整体概念的思考，内心积淀的感受，以及相关逻辑的推理。

我们这代学生与共和国一起生长，从懂事开始，就受到了全面、系统的红色教育。这些红色因子耳濡目染地浸润了每个人的心扉，成为我们——至少是我个人的一块思想基石。同时，我们又从小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尊敬师长是个必须谨守不渝的天条。我对各个时段的老师都心怀敬重，非礼不敬的行为有悖于自己受过的底色教育。更何况清华大学，国之骄子，那里的干部、教师出类拔萃，又红又专，怎麽能不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呢？如果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麽能担负得起培养、教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责任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是我内心积淀的一种自我感受。另一种逻辑推理是从当时我所理解的宏观政治想起。建国十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各种运动，取得的各项成果不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吗？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不都有教育科研战线广大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一份功劳吗？如果说这些干部与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麽如何解释十七年来国家取得的丰功伟绩呢？又如何理解党的伟大领导呢？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因果推理。由于长年的思想灌输，我一直认为解放后毛主席领导的各项运动，包括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苏反修、四清运动，一直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作为贯彻执行这条正确路线的各级干部，自然也应当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以上两点是我对清华干部队伍的基本认识。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没来得及跟随老孙参加全校四、五月份的那场大辩论，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我不得不暂离清华——三月底，杨承勋、张蔼玲和我被抽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材料组工作，一走就是四个月。

七月底，我们三人回到学校。几个月不在，清华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围绕干部问题的大辩论，致使井冈山内分为了对立的两大派。一些大事相继发生：先是 414 串联会成立，之后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推迟成立；召开第一次干部问题辩论会；举行声援武汉革命派大游行等等……。很遗憾，这些重要的活动我都没有参与，对于这段历史缺乏具体的感受。原天安门纵队的同学在三号楼顶层平台欢迎我们——当时他们已经分属两派，分别热情

地介绍团派和四派的观点，希望我们表态。面对这些曾经风雨同舟的朋友，选择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最后，我们还是尊重老组长的意见，决定成为 414 的一员。

加入 414 后干些什麼？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原先的天安门纵队已不复存在，“第一湘江”也已名存实亡。与我关系较好的刘惠明是六字班学生，正面临着分配；殷江昊虽然观点上倾向于 414，但对班上几位四派同学不感冒，对学校两派的争论越来越没兴趣，准备退隐山林、告别江湖。两位老朋友离开了，我只得与老孙一起，继续扛起“第一湘江”的大旗。七月底，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度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我刚从记者站回来，对局势自有看法，不同意外出串联，冲击军区。汲鹏见我空闲无事，说我跟总部说一下，你挑头设立一个军口吧。

群众组织的活动很有意思，什麼事说干就能干起来。我在新水 311 “第一湘江”的“府第”挂牌办公，不几天就有一些同学自荐参加。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同学都是“三七”战团的，这是 414 中观点比较温和的一些战斗组的联合体。我从设立军口开始，又结识了一批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还有几位年轻教师。朋友之间的这段友情历年弥坚，有的一直维持到今天。

我们这个军口完全是“民办”的，没有正式的资讯渠道，纯粹是通过亲属关系，或去军事单位看大字报，回来后交流沟通，归纳分析。720 事件之后，一些省市造反派与军区矛盾激烈，武斗频发，有关军队调动的说法满天飞。有的大字报甚至公开宣称“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鼓吹“打倒带枪的刘邓”，搅得人心惶惶、思想混乱。为此，八月中旬 414 总部在主楼后厅举办报告会，张轴材代表军口向大家系统地介绍了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他口才好、条理清晰、内容精彩、拿捏精准，赢得了阵阵掌声。我们呼吁总部要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积极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军口的工作得到了老孙和总部的支持，会后改名为“拥军爱民办公室”。

八月份因“揪军内一小撮”而引发的全国第三次大串联完全违背了中央部署，干扰了运动大方向，激化了各地群众组织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为此，毛主席公开表态“还我长城”。中央首长纷纷出面讲话，批判“战争解决”、“内战外打”的口号，并指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军中真正的左派力量。8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于是，围绕着邀请“三军”组织来校参加联欢，团四两派进行了明争暗斗的较量。

起先，414 总部希望清华两派一起举行拥军活动，但是团派总部不搭理。可能在某些人的眼中，能否邀请“三军”来校，是分辨“三军”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团派自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请来“三军”不成问题，而 414 则不好说了。的确，我们没有官方的渠道，势单力薄；“三军”能否被请动，不只是一场联欢的问题，更关系到背后的政治表态。9月 9 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清华，

与团派举行了盛大的拥军爱民大会，海直、空直等二十九个单位的解放军参加。下午解放军与各系师生座谈，晚上在主楼前联欢。会上，双方高呼相互支持的口号，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马国光还特意吼了一曲“井冈山战歌”，极大地激发了团派群众的情绪。团派活动在先，对 414 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不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自尊心上讲，我们都不能输掉这一局。在总部的统一运筹下，“拥军爱民办公室”全力投入，通过亲属关系、高干子女关系与军队积极联系；老孙以 414 总部的名义，亲自给三军送去了请柬。9月 15 日被确定为 414 拥军日。那天全校张灯结彩，一片欢乐气氛。下午五时，“三军”各部陆续到校，学生夹道欢迎。晚上在西大饭厅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参会者达四、五千人之众。414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军队代表演出了精彩的节目。群众情绪高涨，充分表达了军民鱼水情。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新水 311 呆着，坐立不安。我不敢去现场，提心吊胆地害怕出现变故。幸好一切顺利，我终于松了口气。对于这次活动成功举办的原因，我一直不明就里。我认为，单靠 414 的力量未必能请动“三军”，显然这是高层政治力量平衡考虑的结果。就在 414 拥军日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文章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一段话就像是说给清华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听的。中央在满足了团四两派拥军爱民的活动要求之后，明确指出，下一个阶段的运动方向就是大联合。

我三月底离开学校，一走四个月，缺席了 414 成立之初的那段经历，因此对于其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战团形成都不清楚。我只知道老孙、汲鹏是“三七”战团的头头，所以回来后就跟着他们一同参加了“三七”的活动，而对“东方红”战团则一无所知，人员之间亦无交往。八、九两月，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筹备军口以及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社会上火爆一时的“揪刘火线”、“火烧英国代办处”都没参加。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大规模情绪宣泄式的武化活动原本就很反感。这段时间，我和几位同学还利用空闲之时大量阅读书籍，有时也会被唤去参加“三七”内部的一些讨论。其中包括对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批判。

“四一四思潮必胜”之所以发生争论，而且首先在 414 内部发起，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本文的题目有问题。作者杜撰了一个概念，并把它硬加于 414 整体之中，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四一四思潮”。414 内部对许多问题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各方求同存异，不能强加于人。其中哪些观点是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形成了共识的呢？好像没有。即使是对十七年、干部队伍评价之类的问题，也只是原则上的一致，并没有进行过充分、深入的探讨。因此，应该说，414 内部确实存在着一些相似

的思想，但尚不存在一种已经形成为共识，并能够上升为一个特定的专门概念的“四一四思潮”。这种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不科学，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好比近些年有的人提出了“某某共识”，或者“某某模式”，概念本身就模糊不清。这是其一。其二，虽然我对于文章中的有些观点表示赞同，但认为作为 414 的一种政治表态，是无益而有害的。譬如对于造反派队伍的分析。作者基于对河南情况的了解，比较青睐当地的群众组织“河造总”。这种看法我能理解。四月份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材料组工作时，曾参与四川问题的解决。一天接总理办公室电话，要求编写一份如何正确看待“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文章。此文由我执笔，张蔼玲修改。后接总理办公室回复，表扬此稿“分寸掌握得好”。这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我感觉到总理身边的人对于“红成”这样的群众组织比较关注。在此后几个月的工作中，我先后接触了重大“815”、广西“联指”、浙江“红暴”、湖南“工联”等群众组织的材料，都与“红成”的情况相似。具体而言，这些都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比较理性，成员中基层干部较多，党团员较多，与 414 的情况比较相似。这是文革中的一支健康力量。因此我一直隐约觉得，作为这支力量的一个代表，414 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并多次化解风险，与高层某种政治力量的关照与平衡不无关系。但这只能是隐匿在心的事情，既不便于求索证据，更不能公开渲染。但是，周泉纓的文章恰恰将代表中央两种政治力量的两类造反派的矛盾公诸于世，引起了极端造反派（如团派）背后政治力量的恐慌（后来传出张春桥指这篇文章的要害是造反派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进而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这对于 414 派别以及一直在后面隐隐支持的政治力量来说，不是件好事。第三个原因，文章中所表达的权力观只能代表“东方红”中的部分人群，不能代表广大 414 群众，至少不能反映“三七”的立场。这一点很容易激起反对者的情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必胜”问世之后，立即遭到了外界的质疑，批判之声不断。后来事情闹大，周泉纓被抓，成为钦点的“414 的理论家”。我对他不畏强势、敢于表达意见的勇气表示钦佩，但对他天马行空、张扬不羁的个性没有好感。尤其是后来他又写了几篇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大字报，将 414 群体活生生地绑架在个人的战车上。这样的行径凸显了他做人的品德，难怪后来真朋友不多。前段时间，网上有同学披露：周对“必胜”没有文字贡献，只是署名而已。对此说法，我倒不大采信。

在中央首长的强力推动下，自九月下旬起，团四两派开始大联合，成立了联合总部。但是，由于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分歧，这种联合注定是表面的、脆弱的、暂时的。大联合的关键是三结合，而三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干部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清华大学的干部问题是当初团四分裂的焦点，现在，时钟拨延了半年之后，重又成为当前争执的重点——只不过由过去一般性的政策辩论，发展到现在对于某

些具体人物的评价上来。

9月15日拥军日之后，“拥军爱民办公室”的阶段性使命宣告完成，我与组里同学赋闲无事。一天偶见王学芳，她在414总部任职。在她的推荐下，我有机会参与干部办公室的工作。

414干办已成立多时，之前开展过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我加入时阵容已相当整齐：负责人段文新，数力系6字班学生；主要成员有黄美来、徐锡安、李振民和李永发。其中二李是原校人事处的干部，黄美来是政治课教研室教师，徐锡安是土建系房8的学生。冶金系黄智老师似乎也曾一同共事。大家都十分热情，向我介绍干办的情况，并让我参与一些讨论干部问题的座谈会。

参与干办的工作很有意思。原先在战斗组时，我只是纸上谈兵地阐述解放干部的重要性，现在却要实实在在地针对一些具体干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放方案。这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很有挑战性，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派性的干扰。

当时414方面举荐的干部主要有谭浩强、罗征启和吕应中。其中谭、罗两位是中层干部，而吕原是校党委常委，属于校级领导干部。我对三位干部都了解不多。记得工作组进校后，曾安排一些中层干部揭批蒋南翔。其中一次由罗征启主讲。他思路清晰，表述流畅，给我印象深刻。哦，这就是清华干部的水平！我非常感慨。谭浩强与我曾同为“湘江”组员，但时间很短，了解有限。从所写的文章来看，他思绪缜密，文笔不错。414之所以主要推荐吕应中显然有诸多方面的考虑：吕应中是一位技术型干部，政治色彩较浅，容易为两派群众接受；他是当年清华又红又专的典型，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了众所周知的贡献，在学校师生中容易获得好感；他是原党委常委，有担任学校领导工作的经验，可以在三结合的班子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原先团派也有意推举吕应中，条件是必须先亮相到团派一边。但吕应中选择了老四，团派恼羞成怒，反目为仇，从反对、批判、动手，直至将其绑架关押。

我进干办不久，即被安排承办解放吕应中的工作。我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除了明面上责任重大之外，还有一个隐匿的个人原因，那就是我对吕老师素怀一种敬重之情。说来也巧，大一时我的英语老师陈槐庆正是吕应中的夫人，我却一直不知道。她是常州人，从原来的俄语专业改行为英语，教授我们这些丙班学生。陈老师工作非常负责，经常课后与我一起分析班上同学的学习情况，也正是她提出了要为那位同学补习英语。陈老师在与我交谈中，曾经谈起吕应中的情况。记得那时我刚听了他的一次报告，谈及在科研中学用哲学的体会。那段关于尖端与一般、先进与普通关系的精彩论述使我开始领悟到哲学的深意。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令人敬慕的又红又专的典型，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陈老师告诉我，吕应中带领一批平均年龄23岁半的年轻人在几年之中建造了200#这座反应堆；在接待外宾时，他能用不带s的英语一连讲上两个多小时。这些锦团花絮在我的记

忆中印象深刻。一直到文革开始，在大字报中我才得知她和他的关系。

对于吕应中本人，414 总部的立场是通过批评，帮助他亮相。我们的工作既要帮助他看到自己的错误，又要帮助他认识这些错误。为此，我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我找了 200#414 分部的成员，尤其是一些原先与吕相熟的总支干部开会，分析吕应中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系处，200# 的情况比较简单：它是个科研生产单位，干部、教师中分歧不大，主要是有些工人师傅对知识分子有意见，有矛盾，这些矛盾自然都集中到吕应中的身上。另一方面，我直接去吕应中家，将大家讨论的意见转述给他，供他写检查时参考。我曾看过他的文稿，从家庭出身写起，字很小，密密麻麻。我将他写的要点，尤其是对错误的认识态度告诉他的同事，再返回来，如此多次，同时我将情况向干办汇报。但是，在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势下，思想认识能被群众通过是相当困难的。可谓是：干部亮相，中枪倒下；团四两造，概莫能外！

414 加紧步骤，帮助吕应中公开亮相。而团派则针锋相对，提高了批判的调门。11月 16 日晚上，团派抢先一步，在 200# 开会批斗吕应中。414 总部获悉，由老孙、汲鹏、刘万章率一百多人赶到现场。我和组里的同学一同前往，要求与团派辩论。200# 的团派工人大打出手，其中包括一些女工，一边抓打一边叫喊。我被围在当中，脸上肩头受到拳击。面对混战的场面，我理性地将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并不还手，听任一些女工辱骂。缠斗越来越凶，只听见一下撕裂的声响——我的大衣左袖整个儿被扯了下来。事后听说有 414 成员被关在厕所里遭到毒打。事情闹腾到半夜方告了结。

围绕吕应中的争执日益白热化。414 认为“解放吕应中是解决清华干部问题的关键”，团派则认为“批判吕应中红色工程师的道路，是抓住了教育革命的战略方向”，哪派都不让步。22 日下午，414 召开“彻底批判蒋南翔在 200# 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帮助吕应中同志大会”，吕应中诚恳检查错误，揭发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200# 工人代表以及学生代表对吕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判。孙怒涛在会上讲话，表示对吕的政策是一批、二帮、三保，欢迎革命干部杀向教育革命第一线。晚上，团派召开“彻底砸烂 200#，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大会”，蒯大富在会上说：“吕应中的道路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对吕应中应批斗了再说”。台下多次响起“打倒吕应中”的口号。

按照原有的计划，我们对吕应中采取既批判又帮助的做法，积极鼓励并创造机会让他在揭批蒋南翔的斗争中亮相，立新功。25 日下午，414 干办召开了一个“批判帮助吕应中同志”小型座谈会。27 日晚上，414 “干部问题串联会”在主楼后厅举行“批判蒋南翔帮助吕应中同志大会”。次日晚上，在“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彻底埋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会”上，吕应中第一个发言，揭发控诉蒋南翔反对毛泽东思想，利用 200# 科研成果反党的罪行。

面对 414 的阵阵攻势，团派在宣传上大造舆论。他们采用打击威胁，挑拨引诱的方法，试图迫使吕应中改变立场。几位总部委员在对形势分析的文章中认为：“目前清华两派的矛盾，是彻底砸烂和什麼彻底砸烂的矛盾”“吕应中道路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如果说这个时候，对于吕应中的定调，团派还将其本人与所谓的吕应中道路分开来的话，那麼几天之后，调门就完全不一样了。

12月2日下午，蒯大富亲自去吕应中家登门拜访，软硬兼施、威胁引诱。老蒯说：“你如果亮相 414 一边，我用两千个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资派，你也没法工作。”吕应中的回答我不知道，显然不为所动。两天之后，在吕应中去北医三院看病的时候，团派“保卫组”将他强行绑架，秘密关押，从此下落不明。正是从吕应中事件发端，团派开始对 414 派的干部、学生，以及一些无辜群众，随意绑架、殴打关押，完全施行黑社会组织的手段。414 总部和几百名干部严正声明，要求市政府惩治凶手，立即放人。但是当年的市革委会，与团派沆瀣一气，对于这样的非法行径听之任之，无意干预。清华两派的斗争，就此升级，最终酿成为百日武斗。

获悉吕应中被突然绑架，我很焦急，赶紧去找陈老师。她告诉我，团派有人通知，要她准备一些吕的衣物。我问她是否知道关在哪里，情况如何？她说都不清楚。后来听说团派对他施行体罚，经受长时间举凳子之类的折磨，要他揭发与 414 的关系。一直到第二年 7 月 27 日，在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他才获得了自由。据沈如槐书中写道，见面时吕应中心有愧意地对老沈说，在关押期间，他受不住折磨，编造了一个与 414 密谋炸毁反应堆的计划，说想藉此造成重大国际影响，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我不明白，以清华学生的智商，团派的头头居然会相信这等离奇的故事！

吕应中被绑架之后，我一直没能见到他。但是对他的情况却常在念中。听说他八十年代去了美国。2000 年前后，清华大学专利事务所罗文群老师找我，说有一件涉外案件想委托我公司代理。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专利申请，关于煤能源转化方面的技术，发明人是吕应中。我很激动，赶紧去信问候。但是，没见回音。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匆匆一面，早已淡逝。我遥祝吕老师伉俪身体健康。

我在干办工作，也有内心纠结的时候。大约 11 月下旬，414 干办举行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会。这个大会与当时的解放干部工作是一套组合拳：我们担心如果只重视解放干部，不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会被团派抓辫子，骂右倾，所以必须双管齐下。显然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那天被拉来批判的学术权威有好几位，都是年逾花甲的老教授，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思成。看着这些老人蹒跚地走到台上，衣发不整，情绪紧张，我心里一阵抽动，不敢直面这样的场景。开会前，一位老师告诉我，梁思成的腰有毛病，脊柱中加了一根不锈钢，不能久立。我不懂医学，但我明白长久站立会出问题。所以赶紧让人从后台拿来一把椅子，

让他坐着听批判。会毕，又派同学护送回家，担忧他路上支撑不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阶级立场高于一切，人的情感和良知是相当微弱的。这件小事，是我本底的良心反应。

1968年开始，团派加紧了对414干部的迫害。1月25日，蒯大富在与“12.25”战团座谈时说：“414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策划班子，他们控制着414每一个人的行动”又说：“不要把清华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清华是有地位的，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物，有权威的，是没法控制清华的。”老蒯的这席谈话，表明了团派总部的一种看法，或者说是一种臆断：即414的领导层，实际上是被一个严密的班子控制着；414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权威的大人物，他是414的后台。正是基于这样的猜测与妄断，团派保卫组，以及一些极端战斗组，肆无忌惮地开始对亮相414，且比较活跃的干部施行绑架与关押。1月30日，团派保卫组和“捉鬼队”在城里绑架了罗征启；3月27日，又抓走工物系教师贾某某等十余人；4月14日，团派保卫组突然抓走文学宓、李康、饶慰慈与刘承娴，并声称摧毁了所谓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和刘承娴原先都是工字厅的中层干部，我与他们相识。在414召开的干部座谈会上，我们一起努力领会中央精神，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认真的态度以及对错误的批判精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中，交往较多的是文学宓、李康两位老师。

可以说，我对清华党委之所以能有比较具体的了解，主要源自于与文、李二位的交谈。文学宓长年参与党务工作，对学校各次运动的情况比较清楚；李康一直负责教务工作，对执行教育路线方面的问题比较明白。我曾不止一次听他们介绍学校党委的情况，介绍一些主要干部的问题，这对我观点的形成很有帮助。如果说，原先我对清华的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的认识主要还是出于理论上的分析，那么通过这几个月的交谈与了解，我的认识有了较为丰富的事实依据，不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在我印象中，文学宓的讲述比较细致、具体，而李康的介绍则严谨、系统，表述到位。我很赞赏李康的思维和口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几位普通的干部，真诚热心地参加运动，居然会遭到绑架、关押和毒打，长时间失去了自由。727之后，我见到了文学宓。他的脸上还有伤痕，牙齿缺了几块，都是被殴所致。刘承娴关押期间去世，至今死因不明。文学宓、李康都较早往生，关押期间的那段经历，给他们身心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合的。我想那些手持棍棒、虎钳的施刑者应当扪心自问，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良知？！

清华园内形势紧绷，中央高层斗争诡谲。3月24日，中央突然公布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文件，传达毛主席关于撤销三人职务的决定。27日下午，陈伯达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指出：文化革命快两年了，结束了几个大回合。第一个回合，打

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击退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击退刘邓陶的小爪牙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揭露杨余傅的阴谋。回想自己两年来的思想变化：如果说运动初期，与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一样，我是满怀着一腔热忱，积极参与文化革命的话，那么两年后的今天，激情已经消退，代之以重重的困惑与不安。67年元月陶铸倒台，令我惊愕不已；夏天之后王关戚下台，让人莫名其妙；现在又出现了杨余傅事件，更是难以理解。昨日还高居庙堂，指点江山，今天却身陷囹圄，沦为囚犯。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中央的这些决定充满了疑惑。这究竟是路线斗争，还是权力之争？两年来运动越搞越乱，没有个头，文化革命难道是这样的搞法？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我心中疑团重重，焦虑苦闷，一年前“中央文革犯错误怎么办？”的问号在头脑中越长越大。我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也为自己的下一步感到迷茫。二十年后见到东胜，他告诉我，当年父亲被点名打倒后，奶奶与家人迁往河南。三年里，包括奶奶、姑姑和姐姐在内多人去世；一直到913事件之后，父亲才重新复出。

团派罗织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罪名，清华园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4月20日，四派抄了团派干部陶森的家，把她抓到科学馆，准备23日开会批斗。蒯大富根据形势做出决断：认为现在是到了需要挑起武斗，扩大事态，逼中央表态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会获得主动。4月23日，旧电机馆冲突爆发，一场酝酿已久的武斗开始了。

百日武斗开始，清华文革运动走进了一条死亡的不归路。如果说在这之前，两派群众组织中还残存着某些理性的话，在这之后则失去了理智，完全被派性所绑架，为感情所驱使。面对团派的强权淫威，为了图存生活，为了捍卫权利，我和许多四派同学不得不铤而走险，自卫反抗。

两派进入武斗状态。414属下的各个机构全部解散，按系成立武斗建制。4月29日，团派出动车辆去9饭厅抢粮，414自控系团队拦阻。自9学生谢晋澄被汽车撞倒，脑浆迸流。汲鹏眉额击伤。我在5号楼三层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怒火填膺，气不可遏，决心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回到系里，我拿起长矛，成为414工化系团队的队员。

工化系队伍先被安排在主楼东配楼值岗，后被调防到汽车楼。5月21日凌晨，我下岗后带着盔甲睡觉。6时许，听见外面有喊杀声，赶紧出去，看见院子对面汽车实验室顶上站着好多武装人员。“老团来偷袭了！”我一边叫喊，一边提着长矛向院内跑去。只见我方两位队员倒在地上，呻吟着，他们显然被刺伤后从屋顶摔了下来。一位化7同学奔来，把近处的伤者背走，鲜血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流。我去拉远处的伤者，他腰部摔伤，手臂脱臼，哇哇直叫。我抬不动他，拉着他慢慢移动，自己却成了偷袭者的目光。他们站在屋顶，向我投掷铁块砖石。先是柳

条帽被击落，然后眼镜被打碎，接着头顶被砸中，鲜血沿着脸面流淌。我感到头昏眼花，双腿发软。这时救援者赶来，架着我们回到楼里。上午 9 时，在焊接馆施行手术，我的头顶、鼻梁一共缝了 12 针。这次偷袭成功，激发了团派的士气。5 月 30 日，他们偷袭东区浴室，企图故伎重演，再下一城。但是万万没有想到，530 一仗成了团派的滑铁卢。

我在焊接馆休养半月，头昏依旧，决定转到城里休息。那时汲鹏在校外，主要负责对市革委会的文宣工作。一天他来看我，说现在校内给养紧张，虽然不少老师背粮送油接济，但入不敷出，需要社会帮助。他让我赶紧回上海去募集经费。我回到上海，经 414 上海联络站倪振伟老师安排，在上方花园向校友们介绍情况，布置募捐事宜。从六月下旬起，团派加紧了文武两线攻势：一方面大力宣传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另一方面邀请新疆、广西、重庆等地造反派头头来校介绍武斗经验，准备武斗升级。此后，绑架、投毒、射杀事件相继发生，四派多人牺牲。7 月 7 日，悲愤的 414 群众进城游行，抬尸抗议。同日，卫戍区送来了中央发布的“七三布告”，要求各派组织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停止武斗。四派欢欣鼓舞，团派置若罔闻。四派人员给养困难，几近断粮。七月中旬，倪振伟告诉我，在无锡印制的一批“414 战歌集”将运至上海，希望我尽快押送回京。24 日我启程回京，行李架上堆满了一捆捆歌集。一些同学为我送行，当时的气氛确实有点悲壮。

次日抵达北京，汲鹏派人接站。我们拉着歌集在王府井南口叫卖；购者踊跃，生意出奇得好。我问汲鹏学校情况，他说现在清华附近很不安全，前几天一位自 8 女生从东校门进校被团派射杀。他让我先参加一段在市革委会门前静坐的“汇报团”工作，看看情况再说。27 日——就在我回京后的第三天，大事情发生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大军开进清华园。当天晚上，一夜未眠。我们从王府井到前门，到珠市口，到虎坊桥，一直到天桥，在靡靡的细雨中，一路狂走，一路高喊，尽情地刷写大标语，并不停地向路人介绍当晚发生的情况。百日武斗结束了！清华的文革运动就此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新阶段。

四十多年来，关于 727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说法，但时至今日，仍内情不明。4 月 23 日，蒯大富在决定挑起武斗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中央并未如其所愿，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清华问题表态；更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告终。从 1966 年 10 月 6 日在首都大会上代表红卫兵宣誓，到 19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校，老蒯的政治生命只有短短的二十一个月，可谓是昙花一现。我时常在想：为什麼中央文革没有在 423 武斗之后很快表态，支持老蒯？为什麼清华两派能在毛的眼皮底下，使刀动枪，武斗升级，而各级领导却推诿不管，任其发展？为什么在百日之后，毛会突如其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武斗，而事先没给老蒯任何的暗示与信息？为什麼中央文

革在 727 之前也没有对老蒯有任何的提示和关照？还有，为什么毛泽东在 728 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会表现出如此这般的情感投射、惺惺相惜？原先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分析，即毛听任清华武斗发展，有两层打算：其一，如果团派打赢了，造成了既成事实，就可以以团派为核心，成立革委会。这是最好不过的结局；其二，通过武斗暴露坏人。据韩爱晶的书中介绍，毛说过，武斗可以锻炼好人，暴露坏人。在毛看来，414 内部有坏人；只有这些坏人在武斗中显露了原形，才能教育群众，分化队伍；毕竟 414 是数千人的组织，影响不小，不做实不能够服众。但是武斗百日，并未发现四派中有坏人跳出，倒是在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出现了四派欢迎，团派反抗的尴尬局面，这是老人家没有想到的。因此在接见老蒯的时候，他表现出明显的恨铁不成钢的情感。但覆水难收，事已至此，老蒯只得掉进了自己挖的大坑。但是近来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认为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是毛的剧本中早有的剧情，只是将清华武斗作为具体的场景，有其偶然的因素。文革两年过去，应当开始斗批改的步骤。但是大学内斗不止，无法纳入正轨，尤以清华为甚。因此，毛开始思考举刀的时机。百日期间，两派动枪动炮，大声呼求，高层全然不理；一直到兵疲马困、民怨积聚的时候，老人家认为瓜熟蒂落，才顺势下刀。作为政治领袖，毛在下刀的当口从不犹豫。但蒯大富毕竟还很年轻，二十多岁，跟着他拼死拼活地干了两年；现在弃如敝屣，内心总不免有些伤感。这是老人对孙辈的一种不舍，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政治！造反派的戏码，两年前在北大登台，两年后在清华谢幕——北大清华，老蒯小蒯；卸妆退场，令人玩味。毛深知蒯的前途到此结束，因此，接见时才一再叮嘱手下，要好生对待蒯大富。两种解读，哪种合理，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造反派的历史就此被完全翻了过去。

派驻工化系的工宣队来自化工三厂，当年化三是毛泽东钦定的六厂之一，由 8341 部队参与领导。我走进新斋，四月份武斗之后，再没回过宿舍。室友还没回校，屋里干净整齐，显然已多日无人居住。我的衣箱放在橱室里，与原先一样。打开抽屉，书本文具尚在，只是少了一件重要的东西。我把抽屉清空，又将褥子翻开，依然没有找到。我想必定有人翻动了我的物品，窃走了这件东西。这是一份两页纸的抄件，是我在记者站时起草的有关四川问题的材料，后来成为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决定的文本。当时我只感到吃惊，没有想到偷者的险恶用心。一直到几年之后，这份抄件重浮水面，我才明白其人的政治意图——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清楚这个魔鬼是谁！

我回班参加学习班。同学之间两年没有交往，一切都很陌生，都很疏远。杨东胜参军去了，彭伟民还在班里。我班四派观点的人很少，大部分属于团派，或是逍遥派，彭伟民在他们中威信很高。这些年我主要参与学校的活动，与班上同学没有过节；我一再提醒自己，要控制情绪不争论，猫冬平安过日子。文革初期

的那些隔阂虽未清除，但毕竟时过境迁，不再有人提及，除了那位补课同学不时还会嘟囔几句。

坦率而言，对于 727 那天发生的事情，414 派师生是非常拥护，非常感激的。如果没有工宣队的强力干预，我们的境况不堪设想。所以最初一段时间，学校里兴奋与沮丧的情绪营垒分明。但是，过不多久，大家都恢复了理性，开始同样的思考。回顾两年走过的路程，清华的运动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这样的方式告一段落，是绝大多数师生未曾想到的，不论团派、四派还是逍遥派。两年前我们是红卫兵小将，文革的生力军；两年后我们是受教育的对象，文革的被改造者。河东河西，天上地下，历史与我们开了个大玩笑！727 之后，工人阶级登上学校讲台，成为教育革命的领导力量。在为时一年的空窗期后，清华大学重新有了党团组织。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组织我该抱怎样的态度呢？我还会像过去对校党委和工作组那样积极靠拢，坦诚交心吗？显然不会了，我想。首先我对它没有亲近感。它是文革期间的一个产物，从天而降，突兀生疏，虽然目前似乎得到了最高领袖的支持；但政治斗争深不可测，谁知道是否会像工作组一样，过不多久又被翻了烧饼？其次，自从得知在科学馆里发现了那份思想报告之后，我对组织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轻易相信。这种被伤害的感受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康复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两年来我已经长大，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的单纯、幼稚和鲁莽。两年里丰富的阅历，包括学校的活动，记者站的工作，以及我阅读了那么多好书，使自己比较地成熟起来。我开始有自己的人格要求，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外界事物的独立看法。两年多的自由生活，强烈淡化了我的组织意识，解除了纪律对自己的约束；原先充斥于脑中的革命理想和主义追求，也变得虚幻与空洞。我对周边的一切都不信任，觉得自己不再需要依赖外部的力量，来引导我的思维，安排我的生活。这种外部的力量，同样也包括了组织。我记取当年工作组进校时的教训，与许多同学一样，对工宣队顺势接受，审慎听从，保持一种不热不冷、不拒不予以的关系。

学习班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工人阶级全面领导教育领域的权威。我们班团派力量强大，自然引起工宣队的重视。在最初揭批 727 对抗工宣队的罪行时，那位在一教楼前投掷两枚手榴弹的 Z 同学成为重点对象，并受到了团内记过处分。

彭伟民是我们班的领袖。他讲义气、有气度，爽直开朗，很有想法。许多同学，主要是团派观点的同学经常围聚在他的身旁，成为一个小圈子，工宣队对此十分恼火。当时，树立工宣队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班太平，唯独我们班出现了一种“适中有立”的观点，提出对工宣队，表面服从，内心独立，在同学中颇有市场。第二年 3 月，中苏边界发生珍宝岛战斗。在讨论形势时，几位同学冒出了制空权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掌握制空权，因此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适中有立”和“制

“空权”的提出者中都有彭伟民的身影。

在工宣队看来，这些观点搅乱了同学的思想，干扰了工宣队的领导，所以接连开会批判。我虽然也在会上不痛不痒、不深不浅地发表意见，但内心赞同他的说法。我赞赏他独立思考的见解，更佩服他挺直不阿的骨气。毕业时工宣队对他惩罚式分配；他虽一度艰难，却最终创造了成功的人生。

我对文革早已失去了激情，没有了兴趣。开会学习，天天如此，我心神疲惫地敷衍应对。按照老人家编写的剧情，1969年4月，在党中央第九届代表大会上，林彪被正式提名为接班人，许多军人进入了领导核心。而半年多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如果说1966年下半年，在看到毛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时，我还能非常真诚地表达出批判刘少奇的激情，那么两年之后，早已不像当年那样的单纯。看到报上说大会代表群情激愤，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时，心里的感觉真不知说什麼好。简直在演戏！堂堂国家主席，居然是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内奸”；中央委员中居然有超过半数的“阶级敌人”——真是匪夷所思！这是我党的光荣，还是我党的耻辱？！工宣队连夜召集游行，宣传九大胜利。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我非常反感，但身不由己，只能消极应付，尽量偷懒。我在班上混天，低调而不多言。这种单调沉闷的学习，言不由衷的讨论，简直是在折损生命。我只想早日离开学校，飞向新的生活。

工化系是团派的大本营，一些中层干部为了自保，纷纷亮相团派，有的涉足较深。工宣队进行调查，某些干部因包袱太重，自缢身亡，其中包括两位原总支副书记。作为样板单位，化三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为此，工宣队决定调整政策，加快对系级干部的解放进程。在系主任汪家鼎被推出亮相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解放总支书记滕藤了。滕藤是原清华党委的一员大将，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他对文革有一句经典评论，那就是“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他之所以投靠团派，我想主要不是基于观点相同，而是有投机的成分。从派别立场来看，我对他不大感冒。半年以来，我猫冬度日，无声无息。不知何故，四月下旬，突然接工宣队的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关于滕藤问题的学习班。从主持学习班的李师傅口中听出，系里开始考虑解放滕藤了。我们首先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教导，然后听有关滕藤情况的介绍，以及对他所犯错误的分析。我很注意李师傅对于犯错误干部政策的掌控，尤其是对那些不同状况的区别性说法。同学们放开思想，提出了多项意见。李师傅对讨论结果表示满意，他说：作为学习班的一项功课，需要整理出一篇解放滕藤的报告，由谁来执笔呢？我没想到他会提出由我来写。事后猜测：我在414干办的那段经历工宣队显然知晓，所以，这次有意指定我参加学习班，并让我来写报告，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很认真地接受了任务，整理讨论记录，思考报告脉络，一连数天深夜才睡。我很得意自己在报告中列出了区分六种情况

的政策界线，这是有一定创见的。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感染诱因，完稿前两天，感到疲惫不堪，胃纳不佳，见油呕吐。陈老师提醒我去校医院验血：肝功指标超过 700——急性肝炎，隔离住院。5月9日，我给李师傅送交了报告，随即住进荷二病房，一直到六月下旬方才出院。

感谢上帝的安排，我可以理由充足地避开学校烦人的环境。此后半年，因肝功能指标波动，我一直在城里蔼玲家休养，同时陪伴她孤单的妈妈。蔼玲 1968 年底毕业，被分配去包钢。离京前我俩确定了关系，她成为我人生的女孩。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也是最满意的选择。那段时间，全国备战备荒，各地挖洞藏粮，拉练集训，气氛紧张。系里的同学去工厂劳动实习，进行所谓的“开门办学”。我远离革命化的氛围，在北京、上海两地猫冬，年底被召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学习班。

1965 年夏天我进入清华，八个月后赶上了疯狂的岁月，一直到 1970 年春离校远走，前后正好四年半。坦率而言，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名不副实；在校期间没有学到多少知识，我只是一位比较优秀的高中生。自幼受到的家庭熏陶，以及少年时期的教育，给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底色基础。此后日月风雨，多色浸染，但消退之后留下的主要还是原有的底色。这是令我欣慰的。当然，清华的生活，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经历，使我在另一方面得到了其他年代、其他学校不可能受到的教育。在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中，我通过真诚参与，积极历练，理性思考，独立判断，试图从以往的非我中摆脱出来，回复到本我的状态。这是一个难得的自我求索、自我启蒙的开端。上述完整而全面的文革经历，无疑是我得到成长的基本条件；除此而外，在记者站的那段阅历，文革期间的大量阅读，以及挫折带给自己的种种思考，也是我感悟丰沛的重要源泉。四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促成了我自身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

(七)

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对我来说显然是重要的。这纯属是个偶然，是一段插曲；虽然时间不长，却给我此后乃至一生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即使现在回想，也很难简单地用好坏两字论断。

1967 年元月起，文革运动开始进入全国性自下而上全面夺权的阶段。围绕着权力之争，各派群众组织在其背后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零星武力，其中以四川省最为典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

已治蜀后治”。中央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从四川着手，开始解决各省问题，并逐个建立新的政权。

3月30日夜里，我刚睡下，听到新斋楼下有人叫喊：“王允方，快下来，去人大会堂参加接见。”我与张蔼玲赶到人大会堂，杨承勋已在门口等候。这是中央文革首长第一次接见四川省两派代表。我听到周总理在会上宣布：中央将从四川省开始，陆续解决全国各省的问题。现在，由一些红卫兵小将来协助我们工作，他们将把大家反映的材料整理后上报给我们。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被抽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整整工作了四个月。

我们所在的部门是记者站材料组，由八名学生和两位记者组成，组长丁固是位资深军事记者。学生中除了清华三位，还有北航两位，以及地质学院三位。我们三人之所以会被提名，很可能是因为两个月前天安门纵队在成都串联时有些影响，而且此后杨承勋还一直与当地群众组织保持着联系。因此，这次接见时有的代表就向总理提议想请清华大学天安门纵队的学生参加。

材料组的工作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负责接待安置上访群众，收集上访材料；二是与四川参会代表联系，了解反映动向；三是整理编写材料。起初参与编写的人员较多，后来接访任务加重，人员有所调整，只有张蔼玲与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动。

我俩负责编写简报。具体的做法是：将每天通过机要送来的几麻袋各式各样、杂乱无章的材料进行整理，浏览，筛选，将其中有价值准备编写的部分分类放置，然后按照事件大小、时间紧缓，依次阅读，删改，编写成稿，签名后送组长审阅；获批后由机要取走，交到记者站总部，再经审定，直接送红旗杂志社印刷厂付印。据说每份简报只印35份，仅限于呈送周总理与中央文革领导。为了保证简报质量，记者站专门派人对我们进行业务培训，讲授编写知识，规定编写要求。要点包括：第一、必须客观真实，忠实于原始资料；第二、不能加入个人情感与派别观点，行文用词少加修饰语；第三、可以将内容分成写人、写事，相关的内容可以并成一篇来写，重大事件可以单独写；第四、必须抓住主次，重要的内容立即写，马上反映，其他的内容可以放后写。业务培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毕竟以往我们从未接触过这样具体而重要的文字工作。

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前后耗时一个来月。我们白天编写简报，夜里有时参加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两派大会。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坐在主席台，不时翻阅着我们编写的一份份简报。我们坐在前排，现场速记，将各位领导，尤其是周总理的讲话，作为编写简报的指导思想。总理联络员多次来材料组指导工作，康生、江青、王力偶尔写便条指示我们编写某篇材料。

有一天丁固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来电话，指示编写一份关于如何正确看待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的文章。此文由我执笔，张蔼玲修改，经老丁审定后交给了记者站。几天后接总理办公室回复，表扬说“文章分寸掌握

得好”。通过此事，我心里有种感觉，即中央领导对具有某些特质的造反派组织比较关注。这种类型的造反派在我以后接触的其他省份都有；这是一种不同于当时分贝声最响的极端造反派的政治力量，是比较理性的造反派组织。在清华两派群众组织中，我认为 414 就属于这样的群体。

四月底，中央召开总结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最早由我起草，经张蔼玲修改，交丁固阅审后上报。出于好奇心和虚荣心，当时我誊抄了一份，结尾处写上三人的名字。没有想到，正是这份稿件，后来被团派窃走，此后二十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烦恼。

五月以后，我们开始编写其他省市的材料，先是重庆，然后依次为山西、广西、浙江、河南、湖南、江西和云南。具体的做法如前相同：根据中央的部署，各省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总理与中央文革领导接见群众代表，针对各地情况，发表指示，解决问题，促成革委会成立。我们如前一样，听会记录，编写材料，一直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720 事件。据后来资料介绍，毛泽东对周总理原先这样一省一省处理问题，成立革委会的做法不大满意，认为时间太长，决定亲临武汉，就地解决，没有想到发生了大事情。我们材料组的工作也因此出现了大变化。七月底，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准备编写新疆材料，记者站领导突然召集开会。他肯定了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后，宣布材料组的工作到此结束。就这样，从三月底到七月底，整整四个月——我们糊里糊涂地进来，又莫名其妙地离去，经历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的确，对于一个二十来岁，从未出过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段经历确实难忘。我不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重要的工作，学到了编写简报的专门知识，而且有机会参加接见，多次聆听中央首长的讲话。他们对复杂问题的解析思路、表达方式，以及驾驭全局的能力，都给我深刻的印象——自然，其中也包括了对某些领导人讲话风格的看法。但是，四个月的生活中，真正使我感受到冲击和震动，引发我深层次思考，并从本质上影响了我此后对许多问题看法的，是我能够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许许多多原汁原味、丰厚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到的。虽然时光流淌，具体内容早已忘却，但是沁入心扉的感悟却不会淡去。

上面讲过，材料组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除了编写简报之外，还有一部分人负责与两派会议代表联系，了解动向，反映意见；另外一部分人则驻在西苑旅社，参与由国务院接待站干部、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组成的班子，负责接待、安置各地上访群众。这两个摊子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书面材料，包括传单、小字报、群众来信、情况介绍等等，这些材料全被装入麻袋，由机要骑摩托送到材料组。材料内容大致分为几个方面：其一、两派组织的基本情况，包括成立经过，人员组成以及对主要头头的介绍；其二、两派组织之间的主要矛盾，演化过程，对一些冲突事端，尤其是武斗事件的介绍。这部分材料数量较多，而且言辞激烈，各说各

道；其三、关于省地市委主要干部的材料，包括出身、经历，在各次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其四、十七年间，当地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与其有关的主要人物。实际上这涉及到党内路线斗争在地方的具体表现；其五、群众来信，包括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或者申诉自己的冤情。还有相当数量其他方面的材料。毫无疑问，当年上报的各种材料，观点上无一例外都是站在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以及许多历史事件，恪守了当时整齐划一的政治口径；但是，由于资讯渠道的多元化，而且主要来自于民间草根群体，所以披露的许多事实，与通常官方的说法并不相同，我认为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这些来源广泛而又相对真实的信息，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知田禾苦，只读圣贤书的城市学生来说，无疑像窗外射入的一缕亮光，照亮了我的好奇心，并引发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

当时有三个问题给我印象深刻。

第一个问题：关于三面红旗。1958年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我才是个小学生，在上海城里读书，对于社会上的情况，尤其是广大农村的情况全然不知。长期以来，我对三面红旗的了解，都是基于政府宣传管道的正面报道，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察与亲身的体验。高中下乡劳动，曾经听到农民对困难时期的抱怨，认为这是小部分群众思想落后的表现。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在我的案头，堆放着许多省份大批群众提供的资料，他们反映了195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经遭受的贫饿交加的惨痛苦难。看着这些鲜活滴血的描述，看着这些毛骨悚然的数据，我感到心里像揣着一块冰似地寒颤不已。为了高举三面红旗，1958年党中央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全国上下头脑发热，各行各业竞放卫星；高指标，浮夸风盛行，完全违背了生产建设的客观规律。在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各地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虚报粮食产量。尤其像湖北、河南等一些省份，浮夸风尘嚣甚上，是亩产卫星的专业大户。从我接触的河南省材料来看，当年党内工作经历了“高指标 - 瞒产 - 反瞒产”三个阶段。一开始，为了实现农业大跃进，省地县领导你追我赶，竞相制定脱离实际的亩产指标。但是，到了收获季节，实际产量没那么多。下级干部为了取悦上级领导，认定收粮不足是由于农民瞒报产量，故而发动了反瞒产运动。基层干部带着警察，持枪进村，去农民家翻箱倒柜，强行搜查，甚至把藏在坛坛罐罐里的第二年口粮和种子粮也搜刮一空。许多农户家破人亡。对于这种反瞒产的做法，有些干部态度消极，不予赞同，受到党内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撤职罢官，开除党籍。有份材料令我难忘，写的是一个王姓官员，原先是一个地委书记；由于不同意反瞒产做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一天，他蓬头垢面，端着破碗，由孙女搀扶着去施舍站讨粥。旁人认出了他，他却认不出别人，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当年，河南省是个重灾区。由于天灾人祸，处置失当，中原大

地饿殍遍野，仅信阳地区就有材料说饿死了 10 万人，甚至发生夜间挖吃死尸，换食婴孩的悲惨景况。据广西资料披露，全区饿死了 30 万人。我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无法判断，但是在我的心里，几十万人是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数字，何况只是一个地区的数目。近些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村实际死亡人数的报告陆续披露，其中，我的学长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一书最为翔实。可怕呀！三千六百万人——相当于当时全国六亿五千万人口中的 5.5%！难怪刘少奇要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这是要上史书的呀！

看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资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显然不会是编造的材料，我应当相信它。第二个感觉是：为什麼在过去八年中，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一直不知道这些情况，相反的只是听到粉饰太平的宣传？想不到在这些宣传的背后，竟然隐藏着天大的秘密——那就是事实。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问题：这是谁的责任？为什麼要对人民隐瞒这些事实？震撼性的冲击无疑给我打开了思维桎梏，使我开始明白了一个浅近的道理：凡事不能只看报上的宣传，要仔细思考，寻求背后的事实在真相，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事物的本质。

第二个问题，关于干群矛盾。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干群矛盾这个概念离我很远。长久以来，我们被灌输的印象是，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达不到全心全意、任劳任怨，至少也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焦裕禄就是基层干部的好榜样。我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但是，从文革期间许多单位大字报所揭露的情况来看，基层干群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某些地区干群矛盾还相当突出，相当尖锐。这是我们这些身居象牙塔的学生所不了解的。建国以后，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变为了执政党，党的路线政策，以及党与人民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基层干部来执行和体现的。十七年间，干群关系经过了数次严酷的考验，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一次是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这次运动从广义上讲，是一部分群众对于党的领导，尤其是对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有意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次民主意识的试练，主要发生在城市，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但是最终被毛泽东全盘否定，三百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反右斗争的严重后果，是群众恐慌地意识到对抗基层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从此以后，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各级干部则有恃无恐，官气十足，更加脱离群众。第二次干群矛盾发生在农村，与广大的农民之间。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更由于人祸——包括中央领导不切实际、好大喜功的决策性错误，以及各级干部投上所好、浮夸冒进的错误，致使神州大地哀鸿遍野，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更让人震惊的是基层干部为了取悦上级，邀功领赏，竟然出动军警，带着手枪，进村搜粮。这种以前只能从电影里看到的镜头，现在的主角居然是我们的基层干部，这不能不让人深思。第三次干群矛盾发生于 1964 年，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农村的四清运动。自困难时期积累起来的严重干群矛盾，以及积聚在城乡民间的巨大怨气，使得中央认为有必要清理一下那些高高在上、

作威作福、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中国党政体制下愈演愈烈的干群矛盾，并认为只有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客观事实证明，不论是社教运动、四清运动，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没能解决好干群矛盾。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属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还在以其他的形式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从而引发了越来越大的民愤积怨。这种干群矛盾的成因是什麼？为什麼长期以来屡改不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想人们对此都有自己的分析。

我在材料组看到的资料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干群矛盾，每个省市都有；时间跨度包括反右斗争、困难时期以及四清运动。具体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干部特殊化的问题。这部分内容最多，群众意见也最大。六十年代物资匮乏，供应紧缺，大家都很困难。一些干部，尤其是省地主要干部的特殊化待遇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感。我记得有份材料揭露河南省一位吴姓领导，在大旱高温的夏天，一家人由轿夫抬着上山避暑，同时还抬着许多水和食物。当时我想，这样的干部与封建社会的县太爷有什麼区别？至于其他关于食品特供、公馆行宫、子女安排、生活作风等问题也多有反映。

二是关于困难时期干部欺上瞒下、滥用职权、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成因我在上面已有介绍，关键是基层干部对于几近绝粮的百姓，任意扣押、私用刑具，简直无法无天。许多农民挖草吃土，离家逃难，饿毙路途。读着一份份泪血写成的材料，我仿佛看到了一群群灾民拖儿带女，离乡背井的惨状，心里实在痛苦。

三是关于四清问题。当然，那时候对于四清运动还是从正面完全肯定的。其实，四清运动相当复杂。它是在 1962 年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开展的，成因之中蕴藏了极左的因子。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炮制了桃园经验之后，四清运动更是披上了某种神秘的面纱。一些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一些群众的多年积怨，加上部分勇敢分子的带头造反，使得多种矛盾交叉浮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从上访材料看，不少案件因果相缠，扑朔迷离，真不容易搞清。

四是关于蒙冤受屈的申诉。这类材料数量不少，时间跨度很长，从建国初期开始，主要集中在五七年之后。提出申诉的有普通百姓，也有党员干部，甚至省地一级的干部。他们自述遭受迫害，罢官撤职，家破人亡。从材料中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一些地方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罔顾法律的做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同时，我也深切地体会到党内斗争的严酷与激烈。从湖南、广西、河南、江西等多个省的材料看出，当地干部与南下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历次运动中经常有新的牺牲品。这些被整的干部中不少人很优秀，早年参加革命，当年没有战死在敌人的枪口下，现在却倒在了同志的手掌中。读着沉痛的申诉材料，心中唏嘘不已。

很显然，在我国，干群矛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城市、农村都有，只是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有所差异，程度有所不同。建国以来实行的政治体制，使得干群关系长期隔阂、相互对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鼓吹“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致使社会主流意识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进一步扭曲、对立，各种矛盾交织加剧；而这正是文革初期群众情绪井喷发泄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联想，我对于一批工人、实验员，包括红教工成员，揭发学校党委错误，表达自己愤懑情绪的做法，就比较可以理解了。其实，红教工中不同人群的观点是混杂不清的：一部分人表面上把矛头指向了学校干部，实际内心反对的是干部所执行的十七年，尤其是五七年之后的路线，他们希望回到五十年代初期的状态；另一部分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希望由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就像727之后的状况。工宣队进了清华，宣布两个基本估计，老人家的底牌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军队介入运动。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当时的形势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经过运动初期的折腾之后，许多省市的群众组织由分趋合，形成观点对立、相对稳定的三足鼎立局面。一般来说，其中声势最大、人数较多、造反精神最强的是一些观点比较偏激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学生与青年工人组成，如四川省的川大826和工人造反兵团；与其相对立的是一些观点偏向保守，拥趸众多，主要由老工人、复转军人以及机关干部组成的群众组织，如四川省的产业军；另外一支力量是在运动过程中，由从上述两派中分离出来的人员组成，力量相对较弱，成员多为学生和基层干部，他们自称是温和的造反派。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浙江“红暴”、河南“河造总”、重大815以及广西“联指”等可归于这一类型。第二，文革一开始，省委领导均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被打倒；各级干部纷纷亮相，各自站队，原先整齐划一的干部队伍，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一月上海风暴掀开了全国自下而上夺权的序幕。地方各派政治力量相互角力，争取获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码，其中最大的份额，就是想方设法将支持本派的领导干部推荐到三结合的班子中去。权力之争，引发了相互攻讦；抹黑之战，加剧了两派冲突。

夺权斗争加剧了两派组织的矛盾，一些地区逐渐由开会辩论，激化为武力抗争。一月下旬，毛泽东指示解放军介入地方运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全国280万官兵进入地方单位，开展“三支两军”工作。

我党历史上，党指挥枪是一条铁律。建国后的政权建设中，军队也一直隐身在后，忠实地担当着政权捍卫者的使命。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军队不仅走上了台前，直接介入地方运动，而且成为政权建设的首要力量，这样势必产生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军队介入，标志着强制力的干预。这一决策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平衡地方两派势力，促进大联合；但实际的效果，却使原本已经尖锐的两派矛盾，变得更加

表面化、公开化，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最终酿成了枪击血案，代价非常昂贵。

军队介入地方运动，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政治表态，支持哪派组织。文革期间，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概念相当混杂，任何群众组织都打着热爱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军队一旦介入，只能以其既有的对待当地群众组织的认识与判断，来界定支持的对象——显然，这种认识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当地组织、人事关系以及历次运动的影响。从多个省份来看，具有规律性的状况是：地方军区和武装部主要支持观点偏向保守的组织，这类组织早先曾经得到过省委的支持；而派驻该地的野战军则态度鲜明地支持观点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二月之后，许多地方呈现出两派群众组织，在各自军事后盾的支撑下，推举本派干部参加三结合的局面。在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双方公开出招，亮出人选，亮出方案，最后亮出了拳头。对于对立派的不同意见，军队以职业性的强力思维，开始动用专政工具，逮捕他派头头，由此引发了激烈的抗争。群众组织与军队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白热化。二月中旬，四川等省出现了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情况，强烈抗议成都军区随意抓扣关押群众。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亲自下令向抗议群众开枪，死伤三百，震惊上廷。这是文革期间第一例由军队造成的流血事件。造反派惨遭当地军队镇压，纷纷上京控告。驻地野战军施以援手，运送武器，提供自卫。一时间，烽火延烧，四处告急，许多省份面临形势失控的局面。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中央决定从四川省入手，开始解决各省的问题。

以上两个月来一些省份的形势演化情况，我是在材料组浏览了大量资料之后知晓的。应当说，由于军队的介入，当时全国的状况相当严峻，相当糟糕。军队强力介入，无章无法，少有顾忌，即使在中央开始干预的情势下。四月中旬，我看到一份紧急报告，说桑吉悦西（天宝）被康定军分区抓走，正关在监狱。我知道天宝是个藏族干部，中央候补委员，参加过长征，文革前任甘孜自治州第一书记。他因支持造反派，被军分区关押。我立即编写简报，报丁固阅后，急送记者站。后来听说总理看到简报，马上安排飞机将天宝接来北京。天宝衣衫不整，戴着手铐，由士兵持枪押送上机。总理秘书周家鼎去机场迎接，对士兵说：他是总理请来的客人，立刻打开手铐。随即天宝被送往人大会堂，作为干部代表参加了四川省的会议。此事给我印象深刻，表明当年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中央从四川省着手，开始解决各地的问题，为此耗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我明显地感到，我所知道的九个省市中，两派组织间的对立程度，都是自1967年起显著加剧，冲突方式不断升级。很显然，这是由于各派都得到了军队支持的缘故。每次接见，面对双方代表派性激愤、相互指责的场面，总理总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呼吁顾全大局，实现大联合。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觉得他实在太难为了。在中央的干预和协调下，虽然九省市先后达成协议，同意停止抗争，

进行联合，但基础十分脆弱。720事件之后，在“文攻武卫”的口号声中，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又在全国掀起，迅速蔓延。各地发生群众组织攻击军队的事件，严重搅乱了刚趋平稳的局势。为此，毛泽东发出了警告：“还我长城！”自1967年3月开始，中央解决地方问题，此后进进退退，谈谈停停；一直到次年9月5日，也就是十八个月之后，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才都成立革命委员会，完成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此期间，各地事端不断，冲突迭起；中央按照自己的需要，或通过军队调防，削弱某派组织背后的力量；或抓捕某派头头，造成两派力量的失衡，从而促成了当地新政权的建立。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得势的一派疯狂镇压落势一派的群众，留下了众多的冤情血案。执政党的背上，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包袱。第二年春九大召开，军人正式走上了政坛。中国的政权结构，开始亮出危险的信号——这是军队介入文革运动的必然后果。

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都是以革命军人为核心，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为陪衬。当年全国法律不存，组织瘫痪；军人参政的后果，形成了一股难以制约的强势力量。许多兴起于文革时期的不正之风，如走后门、拉关系、搞帮派等等，都是与当年不受法律与组织监督的权力体制有关。可叹的是，四十多年过去，这些不正之风在新的环境下越演越烈，严重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健康机体。

我在记者站时间不长，却感悟匪浅。丰富的信息，使我知道了一些历史的真实，明白了一些基本的道理；最重要的，我开始懂得了寻求真相、独立思考的深刻意义。在自我启蒙的过程中，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影响，如何评断都不为过。

(八)

我在回忆好友李磊落的文章中写了那麽一段话：“我对李磊落的怀念，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对我们曾经共同生活、成长的那一个时代的追忆。文革之前，我们都是在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下生活，年轻人的思想被禁锢在设定的框架中，自由思考被视为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异端追求。文化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扼杀人性、毁灭文明的历史惨剧，全国人民为之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摧毁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打碎了大一统的精神桎梏，给了渴望思考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有了一个探索真理的绝好机会——虽然这不一定是始作俑者的本意。我们一边在风暴中经受政治运动的洗礼，一边在生活中逐渐积累对人文哲理的感受。我们如饥似渴地从那些从未读过的世界名著中吮吸着思想养分，并在同道好友间畅所欲言地激烈讨论。中外革命志士展现出来的崇高气质和坚强意志，他们不畏牺牲，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决心，使我们热血沸腾，心仪不已。他们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弦，使我们开始思考人性与良

知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许许多多的学生，不论是团派还是四派，不论是造反派还是老兵，在清华园里充分享受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自由；思想得以开启，意志得以磨练，认知得以深化，境界得以提升。这是我们自我启蒙的开端，是人生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各人的发展路程。”

我在本节文中沿用这一段话，是为了再次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文革初期，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于群众自由思考、自由表达的控制，这在客观上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读书讨论的机会。这一时期的大量阅读，拓展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境界，使我开始明白一些道理，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一阶段的学习，无疑是我自我启蒙的重要环节。

我自小喜爱看书。幼童时起，父母亲常给我讲西方文学故事。父亲钟爱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曾给我讲述《块肉余生》（《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情节。受基督教文化熏陶，以及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安分守己，尊师重礼，对贫寒羸弱者怀有同情。这是我所受的底色教育的一部分。

小学时期，我开始接触一些中国长篇小说，古典的、现代的都看。进入中学之后，阅读兴趣进一步拓展。我在上海市少年图书馆办了书证，经常借阅；初二时还主动去学校图书馆帮忙，协助老师整理书目、填登卡片，当然借机阅读是自然不过的事。初中时期，中苏关系尚未交恶；我很喜欢苏联小说，包括俄国作家的作品。应当说，耳熟能详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我涉猎不少。俄罗斯悲怆、强悍的民族性格，深深地印在了记忆中。当年，我还看了一些描写苏联青年奔赴远东，建设西伯利亚的小说。他们富有理想，充满朝气，勇于献身，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我曾为之激动，心热不已。我阅读兴趣广泛，没有特殊爱好，也没有刻意回避，但很少光顾政治领域——其实，在当时的中学藏书中，政治类书籍本来不多。高中阶段，阅读明显减少，内容有所转变——这可能是由于课程紧张，空闲不多，也可能由于我需要将精力更多地关注于班级事务。

作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自高二起学校推行教育改革，我也自然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政治方面，开始阅读毛泽东选集。其中，一些对于事物矛盾的分析，以及领导班子工作方法的文章给我教益良多；我经常对照理解，奉为圣明。此外，阅读较多的有关于解放军思想工作的书籍，譬如“源泉”、“欧阳海之歌”等；至于那些宣传红色经典的主流作品，我都基本读过。那段时期，关于阶级、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教，通过电影、歌舞、书籍等各种形式，大量灌入我们的脑海，植入我们的心田。歌颂党和领袖的红色教育，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势浸入，涂抹在人们内心的底色上。坦白地说，对于这些红色因子的灌输，我是欢迎的、期盼的。我真诚地认为：我们这些城市学生，自小脱离工农、脱离社会，有先天的不足；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与身上

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彻底决裂；接受党的红色教育，正是意味着要在心灵深处开展革命。我的这种简单化思维，在文化革命中遭到了完全的颠覆。

我的文革经历坎坷、曲折。文革初期的自我表现，可以用“动机单纯、思想简单、感情真诚、情绪冲动”来概括。文革是文化的浩劫，理性的坟墓。文革期间没有书籍，没有阅读，没有理性交流，没有独立思考。平时的读物，除了两报一刊，就是人手一本的红宝书。我与许多人一样，不再将阅读作为一种享受与启迪，而是带着政治放大镜，希望从社论的字里行间，揣摩上意，领会圣心，进行政治投注与押宝。那时的思维方式，很难有客观、理性、辩证、独立的考虑，只有对当下利害的权衡与判断。人们在恐怖的氛围中站队、表态、检举、批判，不少人蝇营狗苟，落石下井，充当打手，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1967年元月，陶铸突然被打倒，这是我开始警醒的转折。回想中学时代，“松树的风格”对我心灵成长的影响，不禁涌现出强烈的困惑与不解。尤其在听到“中央文革犯错误怎麽办？”的提问后，更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参加记者站的工作，使我离开了喧嚣躁动的学校环境，有了四个月的内心平静。通过浏览资料，编写简报，我开始沉思静想，并重新寻回了久违多时的阅读欲望。

良机始于八月，延续到次年的春天，前后大约半年。我回校不久，在“文攻武卫”的口号声中，第三次大串联开始。大批同学出走，校园显得冷清。我受命筹组军口，结识了一批新的伙伴，鼎盛时近二十余人。我们一起组织拥军爱民活动，一起参与解放干部的工作，感情融洽，关系很好。工作之余，大量阅读，思想互动。此时张蔼玲已回“轮机兵”，她与冯韵芬、顾家琳一起，也是与我经常交流沟通的书友。

学校图书馆关门谢客，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借书。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较多的机会：一是有些老师、教授和干部热情地将家里的藏书借给我们；二是几位新认识的工字厅干部将校部馆藏书籍介绍给我们，有些以往是不可能看到的；三是我的伙伴中有亲属在军队机关、军事院校工作，他们能借到一些标有“内部读物”字样的书籍；四是周末进城，在西单、隆福寺旧书店淘到了一些好书；有些书相当宝贵，估计是从学者家中流落于市的。大家为获得这些好书而兴奋不已，相互传阅，如饮甘露。我贪婪地翻阅着每本书，细细品尝其中神奇的滋味，饥渴地吮吸丰足的养分——每见精彩段落或妙语佳句，就会全数抄录，反复咀嚼，合卷静思，领悟深意。我与书友们畅所欲言地交换心得，坦诚无虑地发表看法，理性平静地进行讨论——那种舒畅惬意、乐在其中的感觉真是久违多时的享受！如此集中、大量、专注而又自由的阅读，以及伴随其中的脑力激荡，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过去没有，后来也很少有过。这是一个心灵洗练、精神醒悟的过程，对我思想启蒙的影响，深刻而又久远。

记忆中，有几方面的书使我心动难忘：

一是有关革命领袖的传记。在那个沸腾的年代，年轻人心中激荡着强烈的革命情怀。对于领袖人物的景仰，对于英雄人物的追崇，无疑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我对领袖人物的成长历程，包括青年生活、求学经历、思想发展，以及他们世界观和人格魅力的形成过程尤感兴趣。马克思无疑是我心目中最受尊敬的革命导师，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至尊至圣。我读了梅林写的《马克思传》。弗兰茨·梅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受马克思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委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并进而撰写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过，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作为马克思最博学、最贤明的学生，作者对马克思的为人非常了解，因而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作者笔下的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具有彻底崇拜真理的正直人品，而且首先是一位勇于参与社会实践的革命战士——斗争就是他的本分——能像他那样热情顽强而卓有成效地斗争的人是不多的。作者写到：

“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结合着的，而且相辅相成。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像一条关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马克思的风格就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什么别的。他可以毫不犹疑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

对于恩格斯的性格，作者有这样两段介绍：

“恩格斯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决不逃避，要跳过去，或者爬过去。”

“唯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就是伪善。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不忠于党的人，恩格斯决不留情。在他看来这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

上述箴言警句给了我深刻的教诲，使我懂得了要成为一个革命者，首先需要正直、忠诚，不能伪善、堕落；为了追求真理，必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勇于克服困难险阻，而不能像奶酪里的蛆虫一般，逃避现实的斗争。这是革命者应尽的责任。面对当年的文革形势，这些观点激励着我不能逃避现实，像逍遥派一样置身于运动之外。

我还读了克鲁普斯卡娅著的《列宁回忆录》。这本书主要介绍了十月革命前列宁两次侨居国外的情况。作为列宁的夫人，作者通过许多细小的事情，讲述了

列宁如何在国外关注国内的革命事业，组织反对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斗争。列宁善于正视真理，不论真理是何等的严峻。他注重革命原则，一旦发现有人在拉革命后退，即使对最亲密的战友，也会忍痛绝交；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会质朴、诚恳地对待昨天的敌人，冰释前嫌地坦诚交谈。正是在斗争的环境里，列宁汲取了力量，成为俄国十月革命领袖，并在与第二国际领导的斗争中，逐渐奠定了第三国际的基础。其实，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歧，以及列宁与第二国际领袖们之间争论的观点，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对仅有的一些知识，也是先入为主地为我所用，这是十分可悲的。他的一些经典语录往往成为我们打派战时的投枪与匕首。其中有名的一句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语言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价值。”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共产国际的这段历史有了深入的研究，公布了许多以往尘封的资料以及客观理性的评述；再结合北欧一些国家后来发生的变化，让人不得不开始有新的思考。

在我的笔记中，还有一段是关于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摘自于斯诺所著《漫长的革命》。斯诺的这本作品，是他1970年最后一次访问北京回去后写的，尚未写完，溘然辞逝。这本书可以被认为是《西行漫记》的续篇，中间相隔了三十多年。除了斯诺的作品，文革时期关于毛周的书籍不可能出版。因此，我读到这本书的时间，显然是在毕业之后。作者对两人的个性如此介绍：

“毛是一位活动家，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交替使用奇袭、紧张和松弛取得成就的战略大师。他不相信能有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步伐、速度从不满足。但是，他是实际的，对分阶段达到目标能够有极大的耐心。”

“总理小心地避免去强求个人的权力，但在贯彻执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向来是一个热心的工作者。他的和蔼的态度掩盖了坚强而又灵活的内心；他是一位执行政策的能手，而且工作极其细致周密。他的个人接触多得不可胜数，行政效果和他的无处不在，使本来难以调和的，却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缺少的，完全信赖的战友。”

“周喜欢具体细致地执行一项计划——毛则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很快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必要时假装不知；并且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绝对把握的话。当革命的钟摆摆动平稳的时刻，周工作得最好。他是一个建设者，不是一个诗人。”

“在我同中国的这两位伟大人物谈话时，小心翼翼回答主要问题的通常是周，而毛则听人家讲，插几句告诫或说明的话，打开宽广而辩证的思路。”

通过几段传神而又细腻的描述，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伟人跃然于读者的面前。短短几行，神来之笔，入木三分，令人感叹。此时文革进行了六七个年头，我们对发生过的事件已有看法，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国人关注着这两位衰弱的老人，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前途。斯诺看到了毛周的性格差异，但没有透析俩人

的微妙关系，更没有想到本书出版时会出现“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局面。看来，他最终还是没有了解毛。

如果说当年我们醉心于领袖的传记，主要是基于敬仰，那么，对于英雄人物的了解，则更多的可能是基于追崇、好奇与模仿。崇拜英雄是年轻人的共性，尤其在那样一个时代。英雄们艰困环境的成长、坚定意志的锤炼、非凡人格的培育，都是我孜孜以求的榜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类书籍，对于心中的英雄深表敬意。有三本书我作了笔记，其中包括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尼契的《牛虻》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中学时曾读过《绞刑架下的报告》，那时年龄尚小，不可能对作者面对死亡的心情有深切的理解。经历文革初期的隔离审查之后，我才体会到自由的价值——当然，这与伏契克的境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伏契克是一个捷克记者，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在德国秘密警察的监牢里，面对死亡，他袒露了心底的隐秘：“我要再说一遍：我们曾经为欢乐而生，为欢乐战斗，我们将要为欢乐而死。因此，悲哀永远不要和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

“死的威胁能赤裸裸地暴露每一个人……，在这里，人家不来衡量你所说的话，而是看进你的内心。在你的内心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而那些为了冲淡或者粉饰你本质的，一切次要的和表面的东西，都被临死的旋风一扫而光，只剩下最本质、最简单的东西：忠实者坚持，叛徒出卖，庸俗者绝望，英雄斗争。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力量和软弱，勇敢和恐惧，坚定和动摇，纯洁和卑污。但是在这里，能够存在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非此即彼。”

“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英雄主义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的。但是，斗争比我们所意想的还残酷的多。要坚持斗争并取得胜利，这就需要有无比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每天都看见，却不是常常能意识到。”

“死总归只有对于活着的人、对于被留在世上的人，才是残酷的。因此，我要你们变得坚强和勇敢。”

“假如生命要用别的同志的生命去换，那还算一个生命吗？”

“看到一个亏了良心的人，比看到一个身体被打坏的人更可怕。懦夫丧失掉比生命更多的东西。”

是呀！英雄主义没有灿烂的圣光。在生与死的考验中，一切都会变得透明而简单。伏契克珍惜无瑕的良心，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与人性中固有的软弱、恐惧、动摇、卑污的搏斗中，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是另一类英雄。与伏契克身处的年代不同，“牛虻”这个形象是十九世纪中叶青年意大利党的一个成员。该党的目标是驱逐奥地利占领者，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共和国。“牛虻”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志士，在长期苦难的斗争中，他的人格和心灵遭受到残酷的凌辱与践踏，全身无一处不

是伤痕。他反抗教会，蔑视虚伪，渴望冒险，视死如归；他的强毅与无畏，钢铁般的坚忍力量，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以及近乎病态的拼命主义精神，紧紧攫住了读者的心扉，这也是“牛虻”留给后人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牛虻”中有几段话富有深意：

“有害的原则在于：任何一个人握有操纵别人的权力。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错误的关系。”

“凭无知的民众习惯于流血的景象，并不是提高他们赋予人类生命价值的办法。”

“要记得你们自己的雪莱说过：‘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趁未来还属于你自己的时候抓住它吧；不要专心懊悔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来糟糕自己，而要在目前所能做的事情上全力帮助别人。”

“牛虻”无疑是一位勇于牺牲的革命者的典范。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写道：“但就牛虻的本质，就他的强毅，他那种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以及那种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赞成的。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在我阅读的书籍中，《怎麽办》显然属于上佳之作。和其他书友们竞相争阅，先睹为快。这本书后来被传出了圈外，几个月后，等到我费力索回的时候，已破残不堪，面目全非——可见大家对此书是多麼的钟爱。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早年接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积极参与领导反对沙皇农奴制度的斗争，被沙皇政府囚禁流放二十年。《怎麽办》是他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完成的。《怎麽办》有一个副标题：《新人的故事》。“新人”主要指平民知识分子。列宁把十九世纪俄国人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贵族时期（十二月党人革命）、平民知识分子时期以及无产阶级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到1895年列宁为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基础为止。本书描述的正是这些“新人”如何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过程。作者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书中几位主人公，使他们在构建社会合作组织，进行生产、管理、消费、分配等等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原则。这种民主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时许多俄国进步人士的理想，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达到社会主义。为了与这些民主主义的“新人”相区别，作者还特意勾画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他就是书中的传奇人物拉赫美托夫。

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心目中革命者的最高典型，是那个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这些英雄多数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就在劳动、漫游、严格的斯巴达式生活和地下活动中磨砺自己。他们背叛了出身的阶级，完全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他们相信人民，自觉地接近人民，同时提升人民的自发力量。他们不是

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实践家，而是具有高度理论修养，能够指导人民开展运动的革命家。拉赫美托夫代表了俄国的未来，代表了俄国的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敏锐感觉使普列汉诺夫大为惊叹，也获得了列宁的高度赞赏。

《怎么办》不仅在思想上充满了丰富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探索，而且在故事构思与情节安排上也有独到的设计，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关于四个梦境的解析，以及对在郊游中出现的那个“穿丧衣的太太”的解读，都能引起我们对作者本意的猜测。我与书友们往往为了对书中某个人物、某个观点或者某种行为的理解而争论不休：譬如对由革命者创建的缝纫工场，这个具有公社性质的组织，在当时沙皇统治环境下的社会作用；对拉赫美托夫近于自虐性的苦行僧式锻炼，他在钉满了几百个钉子的床上睡觉；以及对革命者在感情与性爱关系上特殊态度的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平日的话题，都围绕着这本奇书，围绕着对当年俄国社会中这些平民知识分子，也就是作者称之为“新人”的评价；当然，也有将时代变换，环境变换，角色变换的联想。年轻人的性格就是喜欢浮想联翩。

二是关于苏联，重点来说是关于斯大林的书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苏联的养分最为浓郁，影响也最为强烈。少年时期初涉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不受到苏联的书刊和教育。这是我们最早接触的红色因子。五十年代中苏友好，中国一边倒。我从初一起学习俄语，在老师的安排下，与图拉一位女生通信数次。六十年代中苏交恶，隔空论战，中央发表了洋洋九评。我们少不更事，对于苏联的情况、两党的矛盾，浑然不知；所有信息全听官方介绍，能供借阅的读物，除了斯大林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外，实在很少。多年以来，我一直怀有一种俄国 - 苏联情节，热切希望了解苏联，尤其是十月革命后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真实情况。我很幸运，先后看到三本这方面的书籍。有意思的是，这三本书的作者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居然大相径庭。

第一本书《斯大林传略》，由亚历山大罗夫·加拉等四人编写，作为纪念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礼物，于1949年12月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发行。因此本书的观点不言而喻。作者依据苏共传统的基调，介绍了斯大林自少年时代起，所经历的伟大而光辉的历程。书中全面肯定并高度赞扬了斯大林跟从列宁参与国内战争、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创造性具体化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重视发展工业生产，大力推进集体农庄，反对季-托反党联盟，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取得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作者对于伟大领袖不吝褒奖，其中有一句如此评价：“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或如我党常说的那样，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第二本书《斯大林时代》，由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写。这是美国人写的第一部全面介绍斯大林的书籍。作者以其在苏联长期居留和旅行中收集

到的第一手资料，详细描写了斯大林时代的发展过程，记录了苏联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奋斗的历史。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克服困难艰险，取得的伟大成就，作者给予充分的肯定。应该说，与《斯大林传略》的作者相比，安娜有其真诚、理性和客观的立场；当然，本质上她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理想主义者。作为局外之人，她对亲身经历过的生活，自有一些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对此我多有摘录。

譬如，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是赞赏的。她在书中写道：

“是约·斯大林在1924年8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仅仅在几个月前，他还说过恰恰相反的话。他曾说：‘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势力，特别像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的势力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前后一致对他来说并不需要，因为那时他并不被看成是一个首要的理论家，他的才能是在组织方面。”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斯大林表达了这个目的，毫不含糊地推翻了自己过去的理论。他不是从理论中，而是从人民的意志中挖掘出这个目的。”

“斯大林是善于运用手腕的，他的上升是由于……他对于那种我只能称之为‘人民意志’的东西有深刻的感觉。他有把这种意志转化为行动的技巧。最后，他坚决相信他的行动能把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未来，并且善于使旁人感染上这样的信心。”

“斯大林自己是这样来谈他的领导方法的：‘不能落在运动的后面，因为那样就会陷于孤立……可是也不能跑在前面太远，因为这样会失去与群众的联系。’”

对于建立集体农庄的政策，作者也基本表示理解。她写道：“1929-1930年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党内围绕着农村政策分歧巨大，斗争激烈。党内右翼主张让富农发财致富，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工业国有化取得胜利。左翼则主张强迫农民迅速加入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理论上加入集体农庄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有时候使用了压力，甚至发展成为过火的行为。”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说：‘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时候已经到了。’大批富农被流放。一些组织者为了急于创造纪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否则就将把它们当作富农而放逐。”

对于秘密警察的活动，以及1936-1938年大清洗时期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作者只是做了心平气和的评论，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见，这是令人诧异的。她为政府解脱说，一个极少具有民主意识的农民国家，工业化非常落后，又面对着险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需要人民的百倍努力、铁的纪律以及采用无情的手段。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极端行为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多次提到了第五纵队

的渗透和破坏，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清洗运动，苏联就不能抵挡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这种看法显然与苏共的正统观点相吻合。她如此写道：

“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富有动力的伟大时代，也许是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它使一切参加创造这个时代的人发生了改变。它产生了千百万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出他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代价的一部分。”

“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

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这些理想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多年所受的教育。这种崇尚革命，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无视法律，漠视人权，招致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伤害，而得不到保障。我从记者站的资料中看到，在建国以后的各次运动中，包括文革期间，我们不正是承袭了苏联的做法，假革命的名义，做出了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决策，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这种血腥的代价是不是值得？是不是有必要？历史对此会有怎样的评断？我深感困惑。

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作者几乎避而不谈，或者简单地认为这只是领袖人物的个人弱点，完全没有正当的愤慨，也没有公正地对其严重后果进行论断。这样的态度，是出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还是何种目的，我不得而知。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认为：如果不记得斯大林在国家建设中的伟大功绩，以及他在共产国际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就不能理解正是这些决定性的因素造成了个人崇拜的如此发展。“个人崇拜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无论在苏联和世界上都是如此。这不仅在苏联产生了最无意义和残忍的镇压与横蛮行为，而且还使全世界各国同情社会主义的千百万工人严重地怀疑社会主义。”当时我还看到了一本由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编印的《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内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全文，以及许多国家共产党对此所做的决议和声明。基本的观点认为：这是各国共产党之间开始建立正常关系的历史转折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认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具有正面积极意义的观点，还是占据了多数。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历史是如此的相似！面对当时全国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崇拜狂热，读了这些文章无疑可以使头脑变得冷静一些，理智一点。

第三本书《斯大林评传》，这是一本奇书。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一本奇书，第一，因为作者托洛茨基本身就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列夫·托洛茨基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他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第四共产国际

的领袖，以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独创性发展而闻名于世。1927年因对世界革命运动的严重分歧，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后流亡海外，于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暗杀身亡。第二，他是与列宁齐名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亲身参与并领导了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苏联早期的建设。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不同，他是革命的局内人，是曾经与斯大林近距离接触的同事。因此托洛茨基笔下的斯大林，自然会更加真实、更加细腻，也更加深刻。况且，他也正是因写此书而惨遭暗杀，这或许更能证明所述内容的分量。不管怎麽说，当年我阅读此书的感觉，如果用手脚冰冷、毛骨悚然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不敢想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内，居然会有如此激烈、如此残酷而又龌龊的内斗。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一个性格诡谲、多疑、暴戾、冷酷的人，为了拥有最高权力，不惜制造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捏造许许多多冤假错案。作者对斯大林的性格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斯大林获得成功的原因，其个性的主要动力是权力欲、野心和嫉妒。斯大林一向认为，权力与它所服务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要像运动员为了胜过别人而运用筋骨那样来行使他的意志。这就是他个性的主要动力。”

“他越是认识到自己缺少许多为了攫取权力而必备的特性，就越发强烈地要弥补性格上的每一个缺陷，就越要巧妙地在一定情况下把短处变成为长处。”

作者认为，斯大林的性格特点来源于出生的环境。他出生于一个鞋匠的家庭，极端贫困。一种仇恨的意识从小就深埋在性格之中。面对复杂的环境，他精于揣摩和分析，善于伪装与试探；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实力，相信权力，相信恐惧与威吓能使人屈服。许多同僚为了不被他怨恨，不得不主动地和他往来。大家本来认为他缺少政治资本，威信不高，性格简单，易被操纵，但结果是：斯大林没成为任何人的棋子，而别人则成了他的棋子。

作者进一步阐述了苏联体制的弊端，以及体制与领袖性格的关系。他认为：在创业阶段，制度往往因人而设。当时因为有列宁这样的天才，所以制度多围绕他而设计、运转。但是，制度确定之后，如果后继者不是一个伟人，那么制度就有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制度为人服务，转而成为人为制度服务。斯大林不是一个天才，但他最适合这个制度。受伤的人格最适合有缺陷的制度，因为规则出现了漏洞，给竞争双方留下了太多可能使用不正当手段的空间。这时的竞争就成了个人之间的品质较量。品质高者自我约束，有所顾忌，品质低者肆无忌惮、不择手段。而后者往往能够获胜。

斯大林不是一个书虫，不是一个学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满不在乎。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理论修养极高，和者甚寡；他性格孤傲狷介、自我欣赏；他不谙人情世故，不善社交，不拉山头，不结帮派；因此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失势，遭到失败。失败使他发现了制度存在的问题，他预言苏联将因此走向悲剧。面对

正在不自知地走向悲剧的祖国，托洛茨基的清醒呐喊无助于事，最终自己也未能摆脱惨烈的命运。

这本书不仅使我知道了斯大林攫取权力、成为领袖的过程，而且对他在许多关键时刻的表现，以及他在列宁眼中的印象都有所了解。作者对于苏维埃国家制度的论述与评断，尤其发人深省。显然，领袖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问题不只是苏联一国才有，不少集权国家都曾遇到，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只是很难为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所认识。本书虽然译文有些生涩，但仍不失为是一本使人一生难忘的奇书。

三是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其中有两本非常有趣，影响深远：一本是《巴黎公社史》，另一本是《第三帝国的兴亡》。

文革期间有一种说法，即把中国当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与九十六年前法国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以及四十九年前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认为这三次革命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虽然这样的评断并不恰当，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后继者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三者之间承继着某些遗传基因。我们这代人在受教过程中，对十月革命了解较多，而对于一百年前曾经存在过的巴黎公社却只有模糊、朦胧的概念。1967年元月，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夺权后的新政权起先仿照“巴黎公社”的称谓，定名为“上海公社”，后因毛主席不赞同，而改名为“革命委员会”。这段小小的插曲更使我对巴黎公社的那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巴黎公社史》由苏联学者凯尔任策夫撰写，完成于1940年。这是一本研究巴黎公社历史事件的经典巨著。作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述巴黎公社的重要著作为依据，参考了该时代所有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各个主要阶段和基本方面的问题做了总括性论述。作者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力图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继往开来，实现这一理想的成功典范。这本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恢弘、壮烈的历史画卷，展现出公社从成立到失败过程中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伟大场面，而且热情、理性地试图对这一尝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这些深刻隽永的内容广受后人的关注。

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挑起了普法战争。9月2日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当了俘虏。本书叙述的历史时期起自1870年9月4日，巴黎的工人、学生、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小资产阶级者包围政府大厦，推翻第二帝国，建立了共和国，止于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英勇斗争的最后一天，总共267天；其中前195天是组织、动员工人群众的时期，后72天是巴黎公社执掌政权的时期。

巴黎公社掌权的72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6天是公社内部组织

工作的“和平”时期。这一阶段的重要成就是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国家的框架，实行了第一批政治措施及社会经济措施，同时，巴黎以外省份的革命斗争也开展起来了；第二个阶段从4月初到5月份，与凡尔赛当局发生军事冲突，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这一阶段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措施，并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第三阶段5月之后，公社继续实行社会经济措施，军事局势进一步恶化，两个炮台失守，公社内部“多数派”“少数派”分裂。5月10日凡尔赛当局与普鲁士签订和约，从而形成了普鲁士出兵干涉的条件。最后一周，凡尔赛军队攻入首都，巴黎公社悲壮结束。

本书引用资料丰富，作者对公社之前以及期间各种群众组织的活动、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同时还介绍了第一国际的态度，介绍了当时各社会主义派别的观点。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武器之后提出的社会经济要求，并在掌权之后很大程度上实行了这些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措施，譬如规定新的工资制度。作者特别强调巴黎公社摧毁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的框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等问题，其中有的正是后来苏维埃政权大规模采用的。当然，对于公社期间的军事斗争，包括武器装备，作者更是不惜笔墨地着力介绍。这是一个非常悲壮、感人的场面。

在阅读本书时，我很注意事件变化的过程，但是我更为关注的是作者对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分析。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列宁有一个精辟的解释。他说：“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国的资产阶级发展还很不够，法国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还没有工人政党，工人阶级还缺乏准备和长期的训练，大多数工人甚至还很不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既没有无产阶级严格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广泛的职工会和合作社……。”在法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工人阶级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策略；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一种无定型的目标，而广大群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也是不自觉的。还有一点，无产阶级也没有意识到团结后备力量的重要性。他们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未研究过，这样的后果，就使农民站到了资产阶级的那一边，成为反对革命的力量。

列宁指出巴黎公社的另一个错误，是为了保卫民族，企图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别的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具体表现在对待敌人过于宽大，希望从精神上进行感化。公社宽容敌人，关于人质的法令几乎没有实施；对于阶级敌人需要采取广泛的恐怖手段和特别措施，但具体内容连谈也没有谈到。

再有一点，公社防御性的军事政策，从一开始就铸成了错误。消极性的防御，对于任何起义来说都意味着失败。开始几天，国民自卫军本能轻易地占领凡尔赛，但因一再迟延，不采取运动性出击，故而错失了向凡尔赛进攻的大好时机。

当然，组织性薄弱对巴黎公社来说也是致命的。由于没有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坚强的权力中心，没有真正的专政，一些公社领袖只沉醉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从而毁坏了他们肩负的伟大事业。

巴黎公社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它坚持了七十二天，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探索了新的路径，新的模式。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作者介绍了英国实证论者协会主席弗·哈里逊的一篇文章。文章精辟地将巴黎公社原则表述为五项：第一项：共和国；第二项：否定普选原则；第三项：没有议会常规的直接管理；第四项：废除常备军；第五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人掌握了政府的职能。他指出：巴黎公社的基本实质在于“大陆上这个主要首都的工人们第一次在现代欧洲为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了真正的政府。”

在我的笔记中，还有摘自“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的一些片段，其中有关于泰奥菲尔·沙尔·费烈、路易·丝米歇尔、路易·欧仁·瓦尔兰等人的介绍，以及多首由公社成员书写的激情满怀的诗歌。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公社的精神永存不朽。1871年，原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创作了著名的“国际歌”，十七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盖特为其谱曲：“从来就没有什麼救世主，也不管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从此，这首反映无产阶级寻求自由和解放的歌曲传遍了全世界，成为鼓舞人民反抗暴虐专制的时代最强音。

巴黎公社是一部伟大史诗，读来使人激动不已。我不由得浮想联翩，将九十六年前法国经历的那一幕与中国政治舞台上正在演出的场景进行比较，似乎从中能够体悟到毛泽东或许正是从巴黎公社的历史中找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灵感，他的许多做法不正是与当年哈里逊五项原则中的内容十分相似吗？其中第二、三项，否定普选原则和没有议会常规的直接管理，当时的实际情况即是如此；而第五项由工人掌握政府职能，更是为毛泽东赞赏不绝的创举。我明白了为什麼上海工总司一月夺权后张春桥要将新政权起名为“上海公社”！但是，这两个历史事件能相互类比吗？难道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正是要把中国带回到一百年前巴黎公社那样的政权结构去吗？我对此感到茫然不解。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我读过的另一本历史巨著。这本上下两册的恢弘力作，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纳粹德国的历史，描述了第三帝国的崛起与灭亡过程。由于篇幅厚重，传阅时间受限，我只能重点浏览，择要阅读，来不及摘录笔记。但即便如此，作者提供的翔实资料，独特观点，还是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尤其书中展现的某些历史现象，几十年后居然还会在其他地方类似重现，这是非常值得世人警醒的。

作为一本历史研究的著作，本书在写作上有两点明显区别于其他历史书籍。第一、本书作者是历史的同代人，亲历了这段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与传统的后人写史完全不同。作者威廉·夏伊勒，美国人，二次大战之前和初期，曾以美国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系统驻德记者的身份，在德国工作多年。因此，

对于当年纳粹的兴起，以及通过议会斗争上台的整个过程和政治氛围，有直接的了解和真切的感受。第二、作者著书引用的资料，是盟军在战争中缴获的德国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机密档案，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秘密警察的原始档案，此外还有后来纽伦堡审讯出版的十五卷材料。回顾世界历史，这样的情况绝无先例。一个大国即使战败，其国家档案还是由自己保管，秘而不宣；几十年后公开的，也多半是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像《巴黎公社史》的作者，只能参考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资料，而收藏在法国政府内部关于巴黎公社的档案，却无法涉猎。本书作者正是依据了这些绝无仅有、数量惊人的历史资料，才能为世人提供这部具有强烈可信性的历史鸿片。

作者以记者的敏锐眼光，以及作家的细腻笔触，为我们描述了第三帝国内部发生的一桩桩怵目惊心的重要事件：希特勒上台、国会纵火案、德奥合并、占领捷克、攻占波兰、进攻苏联、设立集中营、残害犹太人等等。所有这些表面堂皇的事件，一旦与秘密档案所披露的阴谋诡计、背信弃义、不择手段联系起来，就能看出纳粹当局的卑鄙嘴脸和险恶用心。本书涉猎广泛，涵盖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需要读者对欧洲国家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对此我勉为其难。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只能把阅读的重点放在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上，其中之一就是纳粹为何能够兴起？造成纳粹上台的群众基础是什麼？

夏伊勒是一个美国记者，多年周旋于德国社会上层，与政坛、企业、商人、新闻界有密切的联系。在他的潜意识中，政治是贵族、社会精英施展的舞台，草根百姓无缘参与。但是，一次大战后的情势打破了这个规律，纷乱无序的德国需要强人出现。这就为纳粹崛起以至于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相宜的条件。

1918年11月，持续四年的一次大战接近尾声，德国将不得不接受战败的命运。11月9日柏林发生了十一月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至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临时政府，成立共和国。11日德国宣告投降。多派政治势力开始博弈，国内政局陷入混乱。1921年5月，在未与德国协商的情况下，协约国发表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相当于330亿美元）；向法国归还在普法战争中攫取的土地（德国因此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此外，最伤自尊心的一点是要求德国实际上解除武装。

德国经济发生崩溃，马克大幅贬值，民众生活无着，国家面临破产。在这样的生死抉择面前，人们开始提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的呼求。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中写道：“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人民群众中扎根越深，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当如何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显然，在德国当年的时空环境下，民众认为：只要能够重拾国家的荣誉，重温神圣罗马帝

国以及俾斯麦第二帝国时的威严，即使选择了一个独裁者也不是不可接受的。

为了得到民众的拥戴，德国工人党在成立之初，以及后来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时，对社会宣布了“不能改动的”党的纲领，共有二十五点。其中包括了第一点：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第二点：废除凡尔赛和约；第二十五点：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内容：譬如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以外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回国有；国家分享大企业的利润；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保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对卖国贼、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等等。这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纲宣示迎合了普罗大众的需求，反映了他们的心声。这是纳粹能够获得支持，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枭雄，希特勒深谙群众运动之道。早在维也纳落魄的时候，他在分析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归纳为三点：一是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将一无是处；二是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他们知道“精神上与肉体上恐怖”的价值。在后来纳粹的发端中，希特勒正是利用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巧妙地依靠了这三招手段。他领导了一个以工人群众为基础，加上一批退伍军人、失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工人党；他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清楚地知道，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政治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与象征，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这样才能唤起他们的热情，得到他们的信任；群众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运动，这样就能够吸引追随者，使他们感到有一股压倒弱者的气势和力量。希特勒正是依靠其突出的组织才能和煽动人心的演讲天才，渲染个人崇拜，确立领袖原则，加上其天性狡诈，敢于赌博，所以很快崛起为纳粹党的元首，进而执掌政权。理性的民族一旦失去了理智，狂热的后果不堪设想！德国给整个人类，世界各国，当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

戈培尔在回忆纳粹历史的时候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了。通观第三帝国的兴亡过程，不能说这句话没有一定的道理。希特勒的上台不可能全是凭着无耻的谎言和恐怖的手段；作为德国的一个政党，当初他也是凭借群众拥戴，通过议会斗争攫取了最高的权力。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再品味一下作者在扉页记录的歌德的一段话，自有复杂的感悟。歌德写道：“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其实，不论在哪个国家，人民都是短视的、轻信的、冲动的、迷茫的，都是容易被利用的，而且最后都是受苦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人民都是可怜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希望告诫人们的，可能也包含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四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书籍。这方面的书我看了不少，其中印象最深的两本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和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这是两部传世之作、经典之作。狄更斯和雨果以其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这两部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都以1793年发生的法国革命作为时代背景，在小说中勾画了以贵族、革命者、平民为人物代表的故事情节；二是对于法国革命，作者都持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对革命的同情与对暴力的憎恶相互纠结在一起；三是在故事情节的铺陈中，作者一直拿捏分寸，驰张有度地藉书中人物之口，表述了自己对于贵族阶级、革命以及人道三者关系的见地。书中不时跃出一段段生动而富有人情的描述，一句句精彩而富有哲理的对白，发聋振聩，令人深省。

狄更斯身在英国，那时的英国早已完成了“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是国王与议会之间妥协的产物，是贵族阶级之间的妥协结果，是没有民众参与的“革命”。狄更斯像同时代许多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症结；他同情劳苦大众，主张采用社会改良的方式，而不是如法国那样，用革命的方式，靠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对于贵族压迫人民的残暴行径，以及革命者非理性的过度复仇，他都持否定的态度。狄更斯认为，革命是一种压迫取代另一种压迫，是一场血腥替代另一场血腥，因此，对于“革命”而言，绝无肯定之辞。在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人性罪恶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崇尚人道主义，宣扬仁爱与宽容，希望以此消弭社会各种矛盾。

狄更斯以“爱”作为化解社会问题的良药，并将其渗入到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异己的阶级关系中去。他在书中构设了多个以爱化恨的情节，十分细腻感人，其中以卡登的出现为故事的高潮。这个富有才华，情感高尚的年轻人，由于没有施展的机会，一生碌碌无为。他对于日渐堕落的社会痛感失望，最后，为了使心爱女子的丈夫能免于一死，他毅然决然地成为替身，走上断头台，献出了自己可爱的生命。卡登的形象是仁爱的化身，展现了狄更斯崇高的心灵寄望。每当读到这段情节，我总会激动不已。卡登在离开人世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现在做的一桩大好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所作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大好归宿，远远胜过我一向所知所解。”这正体现了基督教的高尚境界：“为自己赎了罪而消亡。”

与狄更斯相同，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也宣扬了这样一个观念：“慈悲之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的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法国人，雨果对于巴黎的这场革命是肯定的。他满怀义愤地谴责外国势力的干涉，以及贵族的罪恶行径，热情赞扬共和国士兵的政治觉悟和对民众的感情。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暴力与恐怖，他明确予以反对。书中塑造了两个正面人物：革命军的

司令郭文和政治委员西穆尔登；他们情同父子和师生，但是他们的思想深处却代表了真理的两极。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体现了革命原则与人性良知的冲突。

郭文说：“我们现在过着的九三年，将来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血的年头。”

西穆尔登说：“当心点！不要谴责不应该谴责的。这个伟大年头的特征就是不能仁慈。我们现在过着的年头是革命的化身。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革命要肢解身体，可是挽救了生命。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了一道很深的伤口，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个伤口里生长出来。你痛苦吗？毫无疑问！革命在为世界开刀，因此才有这次流血的九三年。”

西穆尔登又说：“革命需要一些凶猛的人做帮手。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革命只信任铁石心肠的人。请注意，（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这几个名字是必需的。他们和军队一样重要。他们能够使欧洲陷于恐怖。终有一天，革命会证明这种恐怖政治是正确的。”

郭文说：“只怕这种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是安宁与和谐的信条，为什麼要使它们显得恐怖可怕呢？我们的目的是什麼？是建立一个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共和国。那好，我们就不要吓倒人民。恐吓有什麼用呢？我们不应该为了行善而作恶。我们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但要让人民活着；打翻王冠，但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而不是恐怖。仁慈观念被残暴的人们使用错了。对我来说，宽恕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如果一个人不能宽恕，那麼胜利就不值得争取。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

西穆尔登说：“当心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仁慈可能成为一种叛逆。”

两个革命战友的对白，犹如剑与斧在碰撞。

故事的情节考验着人性和良知：

朗德纳克侯爵，保皇党人，在逃生的关键时刻，放弃生存，选择死亡。他折回火场，救出了三个孩子，自己则落入了敌手。在他身上，人道战胜了残暴；

郭文，革命军将领，崇尚自由正义，他为侯爵的救人行为所感动，决定以身受罚，甘愿牺牲。在他身上，充满了公正、宽恕的光芒；

西穆尔登，政治委员，为了原则和理想，不顾私情友谊，做出了执行死刑的判决。在他身上，体现了坚定的原则和炽热的亲情。

郭文上了断头台。就在指令下达，铡刀下去的一刹那间，枪声响了。西穆尔登用子弹射透了心脏，倒在了血泊之中。

三个不同的人物，面对生与死的选择，表现了惊天动地的良知情感；他们的生命绽发出人性中最光亮的本底色彩。

读着这些剑斧相撞，火花四溅的对白，我心感震撼，惊叹不已。坦白而言，当年我内心的天平是倾向于西穆尔登的。革命的概念，我们太熟悉不过，尤其在

那个文革的年代，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西穆尔登阐述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意志，精辟而又深刻，正是我们心中追求的崇高境界。在我看来，法国革命 - 巴黎公社 - 1917 年俄国苏维埃建立 - 1949 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当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同一基因的延续，同一血脉的流淌：那就是崇尚暴力，藐视人性，武装夺取政权，不惜伤害无辜。在我们受教的记忆中，革命从来就不像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那样的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一个自然不过的基本原则，而其他任何一切，包括情感、人性、人道主义，在革命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在狄更斯和雨果的笔下看到了不同的思考，看到了他们对于革命与人性关系的另类解读。通过卡登、郭文、西穆尔登，还有朗德纳克的个性表现，作者告诉了人们：“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性”，爱与仁慈是人类共同生活残留的底色。我和同伴们不止一次地对作者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关于公正与宽恕的理念进行争论，各抒己见，各自保留，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是，我记住了郭文的对白，记住了他临刑前在土牢中回答西穆尔登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将来。”是的，将来！将来会是怎样？将来的人们对于这段历史，以及对于革命、暴力、理想、原则、人性、人道、宽容会做怎样的评述？这正是两位巨匠留给后人的不尽思考。

阅读是一种学习，阅读是一种享受，阅读更是一种自我启蒙的过程。半年多的时间，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我有幸阅读了大量厚重的书籍，并与书友同伴热烈讨论，相互启发，这样惬意的感觉从未有过。通过阅读，我不仅与许多历史事件邂逅相遇，窥视其中的细节奥秘；而且与书中的众多伟人结伴同行，理解他们言谈行止的真实含义；同时我还不断地与作者心神交互，体会他们潜于内心的丰沛感情。阅读中我做了一些摘录笔记，这些精彩的片段是自己有感而发的写照，即使过后读来，也常回味无穷。阅读的厚度将实实在在地影响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宽度和深度。大量的阅读使我看到了世界，了解了历史，接触到智者伟人的深邃思想；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笔受享不尽的精神财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受到心灵深处的纠结与冲撞：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妥协、革命与改良、暴力与人道、法律与宽容……，这是两种理念的博弈，两种价值观的角力。我想：历史上过去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显出其本来的面孔；让将来去做公正的评断吧！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感觉：既可能有因成功而产生的激情，也可能有因失败而产生的消沉，或者因受害而产生的颓丧与放弃。这些大起大落、突兀变化的感受，在文革时期尤为明显。我在文革中曾两度受害，一次时间较短，一次延续许久，并影响了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挫折与打击的思考，也是自我启蒙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文革开始不久，我因对工作组的神秘做法不满，被打成“蒯派”。最近听孙怒涛说，当年工作组将“蒯派”人物分为四类，一类最轻，四类最重。工作组说我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反对工作组的头头，估计不是四类，也至少是三类。从6月27日开始，我被限制行动，专人看管，物品抄没。七一活动不准参加，在两个年级大会点名批判。一周前我还是班级文革组长，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一周后却沦为革命对象，成为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异类，这种像坐过山车似的感觉，一下子真难以适应。其实文革期间，像我这样起起落落的情况屡见不鲜。我被调了宿舍，住在楼道尽头的一间屋里。起先我感到非常委屈，非常困惑：我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文革开始，我参与反蒋；工作组来了，我热情欢迎，积极配合；我只是对系工作组对于持不同意见同学的态度和做法不满，才产生了“这个工作组是毛主席派来的吗？”的疑问。在我看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是不可能采取这种不相信群众的做法的。但是，我错了。当得知清华大学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之后，我主动坦白，向工作组承认错误，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我百思不得其解。当初有同学劝我，不要主动向工作组说明，我还以为然。是不是我过于天真？如果瞒过去不就没有今天的麻烦了吗？我左思右想，就是想不通。负责我班的吴同志原先对我印象不错，我曾几次提出与他谈谈，但是，没有答复。眼见批判的调门越来越响，批判的层级越来越高，大字报贴满了新斋前的专栏，我只得放弃幻想，面对现状，实实在在认识错误，认认真真书写检查。

写检查并不困难，以前我写过思想汇报，入党申请，心底有一种模式，一本记录。但是，这次怎么写呢？我想，这次的情况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以往反映的思想属于认识问题，而这次写的属于立场问题，因此一定要当心，上纲上线的基调要拿捏准确——我一再提醒自己。我白天写检查，晚上想问题，一个多月的生活如同在锅里煎熬。

白天的日子比较好过，难过的是晚上，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室友的酣睡声，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了很多，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更想到了自己的将来。我思念温馨的家庭，我亲爱的父亲、母亲，还有可爱的妹妹。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险恶处境。还有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年逾花甲，最疼爱我了，在得知我的境况后一定会心如刀绞，难以承受。自然，我不能不想到我的老师，小学、中学时的老师，毕业之后我还常去看望他们。在他们眼里，我从小就是个好学生，

历年的大队长、班长。现在这个好学生变成了反革命，他们知道了会有怎样的想法？我实在对不起这些爱我的亲人！十几年的为人品行居然在一周之内全然颠覆，简直不可思议！成绩、奖状、职位，过去的一切如过眼烟云，都已远去，留下的是对将来最实际的思考，最沉重的预想。

将来无疑是我想得最多的内容，虽然一切都在臆想之中。恐惧攫住了我的情绪，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我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右派，一个丧魂落魄的右派分子。我的至亲长辈中没有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所以我对右派的具体遭遇缺乏真切的了解。我只记得小学时有一位姓高的老师，很斯文，是工会主席；反右开始时，作为表率，带头提了意见，结果被戴上帽子，发配到西北工作。还有一位一年级时教课的史老师，先生是国民党军官，去了台湾；反右后期她被补戴帽子，免去教职，改当勤杂人员。我妈妈学校的一位校长，戴上右派帽子后被遣送到宁夏劳动。清华大学以前对于右派学生的处理，我知之甚少，我想大概其中许多人也是被送去劳动改造的吧。

是呀，劳动改造——这是基本确定的前途，我是逃脱不了了。显然会去一个劳改农场，每天开荒、种地，与土壤打交道。北方的，还是南方的？我的身体行吗？没有办法！说不定这样反而能得到锻炼，强壮起来。哦，我还有文化，至少可以写写弄弄，做些实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劳改农场的情况，更不知道在中国有像东北兴凯湖、西北夹边沟这样主要关押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那里的生活惨绝人寰，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最担忧的是去东北或者西北，一个人迹罕至、寒冷之极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和劳动，就像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一般。我在小说中读到过这样的故事。孤独，非常的孤独；寒冷，非常的寒冷。我显然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支撑下去，不论是体力，还是精神。生命很可能在那里消失了。我在梦中不住地臆想，有时候很虚幻，有时候很具体；我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只能心里默默地祈祷。幼时，外公曾带我去过教堂，看到教徒祷告的样子。我默默地与主沟通，希望能得到主的看顾、帮助和拯救。慢慢的，焦虑的心情平静下来，渐渐入睡。其实，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想绝了，看透了，也就不过如此。这样的景况持续了近半个月，一直到七月中旬。本来工作组计划 18 日前后召开第二次联合批判会，责令我大会检查。但是日子一天天临近，又过去，却一直没有动静；过了一周，还是不见声响。我想一定是发生了情况。几天之后人大会堂举行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公开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我和许多蒙冤受害的同学一样，被平反昭雪，重获自由。就这样，一个多月的精神枷锁被卸下了，一个多月劳改农场的噩梦被解除了；我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劫后余生。这段遭遇虽然痛苦，毕竟短暂，对于后来的生活亦无影响；但是我看清了现实生活中周围某些人的人品，他们在践踏他人尊严的同时，也践踏了自己的良知。

相对于上述劫难，我在文革中的第二次受害更是冤枉和无辜。一个莫须有的

问题缠绕了我二十个年头，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事情起因自那份抄件，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材料组工作时留下的一份抄件。1967年春夏时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到记者站工作了四个月，主要从事材料编写工作。中央处理四川问题决定的稿件，由我起草，张蔼玲修改，丁固审核。出于好奇心和虚荣心，我将文稿抄了一份，五月初回校取衣物时带回了宿舍。有同学问我：“你是去林彪办公室了？”我说：“没有”；又问：“是去江青办公室了？”我答：“没有！”；“那是去王力办公室了？”我急着说：“你有完没完？”就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谣言在校内传开：“王允方去王力办公室工作了。”八月份王力倒台，这个谣言就此成为团派攻击414的一个把柄，也成了构陷我的依据。清华百日武斗，我被迫离开宿舍。八月初回到新斋，才发觉这份原先放在褥子底下的抄件不翼而飞，显然被团派偷走了。当时我想只是丢了件东西，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东西居然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影响我，前后持续了二十年。

1970年3月我离开了清华。在基本没有学到什麼的情况下，折腾四年，大学毕业，內中的滋味，心知肚明。当然，我是非常期盼离开的，对于百无聊赖的文革生活，早已厌烦，巴不得走向社会，寻求新的感觉。我和汲鹏等五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邯郸工作；我的单位是正在新建的邯郸市化工厂。当年我二十四岁，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工作积极，群众关系良好；我既会写文章，又会打乒乓，字也写得好，加上清华大学的牌子，在厂里三十多个大学生中属于比较活跃的一位。第二年秋领导调我到厂办当秘书，准备发展入党。显然党组织将我作为年轻干部进行栽培。但是，不久听到一些风传，说厂里收到了一份关于王允方的材料。此后，入党的事没了下文，我又被调回车间，而且不再是原先那个“密级”较高的车间。我敏感地觉得出了问题。一天政工组干事无意中告诉我，说：“你的事情真不好办，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调查。”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份材料被转来了。这是谁干的呢？怎麽在我分配两年之后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估计不会是随档案来的，如果档案里有问题，领导不会把我调到办公室，一定是心怀叵测的人存心干的。会不会就是当年偷材料的那个人？他是谁？我苦思不解。厂里要我写份说明，我照实写了，没有下文。的确，对于一个地方小厂，记者站的门往哪里开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外调？就这样，我在厂里呆着，天天上班，不好也不坏。领导与同事们对我都很好，但是有一条，入党莫谈，提升也没门，彼此心照不宣。我的问题就这样静静地放着，没人提起，一年又一年，直到我离开邯郸。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新的春天。当时人才匮乏，百废待兴。1978年底，我考入交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两年后被安排在交通部情报所水运室工作。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交通行业，但是我热情主动，虚心好学，对新知识有兴趣，加上悟性较好，具备原先在工厂中养成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很快适应了

新的环境，能够开始参与并独立担当一些课题的研究。八十年代初，根据中央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掌门人袁庚先生提出在深圳蛇口湾试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1982-1983年间，在室主任的举荐下，我参加了情报所为蛇口工业区第二期干部培训班招聘、培训干部的工作，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气息。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所里的活动，获得了所长的肯定。1983年，全国各地、各单位选拔年轻干部，组建领导班子。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提任为情报所一正两副中副所长的人选名单，上报交通部政治部，当时我三十七岁，不是党员。这样的安排实在出乎意外。我进所不到三年，才疏资浅；对于部属机构的生态，以及交通专业知识知之甚少，怎么可能担负起如此的重任呢？我想可能由于自己年龄较轻，作为班子成员可以降低年龄的平均值。最终这个名单没被批准，我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所里尴尬的人事纠纷。不久传出情报所收到了一份关于我的材料。又是那个幽灵再现，但我无可奈何。所里没要我写材料，也没有对我作新的安排。次年春天，专利法颁布。夏天，中国专利局在香山举办专利代理培训班，政治处指派我参加。学毕归来，我被安排负责筹建专利室，后改名为交通部专利服务中心。我没想到，香山班获得的专利代理人证书，居然成为我日后执业发展的金钥匙。

我在情报所工作五年，亦如在邯郸一样，不好也不坏。领导与同事们对我都很好。新所长欣赏我的能力，想调我去所办工作。但还是那句话，入党莫谈，提升没门——那个幽灵一直在头上盘旋。既然组织上没有动作，我自然无能为力。耳闻清华同学提职称晋升的消息，内心充满了羡慕与无奈。我自视能力不差，工作积极，也有悟性，但就是这件不明不白的事情，使得仕途受困，难以解脱。我问自己：怎麽办？！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不管哪个单位，对这样的事情只会拖着不办：他们不敢负责，也不想作为；即使再过五年，也未必能够解决。既然前景已非常清楚，我对此有何眷恋？还不如及早走出体制，去寻找外界新的天地。

改革开放的大潮激动人心，也撞击着我的心弦。我与一批富有理想、具有改革思想的朋友热烈讨论，憧憬未来，充满了闯荡市场、下海试练的冲动。我的动因很简单：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市场经济的前景深深吸引了我：虽然前途未卜，荆棘丛生，那毕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我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对自己的能力也满有自信。另一方面，我在国家单位工作了十五年，对这里的生态了然于胸：这里论资排辈，埋没人才，适合年长者修身养性，不适合年轻人拼搏创业。我年近四十，还在茫然度日，何不出去折腾，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摆脱体制桎梏，寻求自由之身，这是我当时的 basic 想法。于是，我开始寻找机会。

按照中央的部署，自 1984 年底开始，以中信、光大、中农信、中工商、康华为代表的几家大公司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康华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属下的一个公司，其宗旨是为全国残疾人事业

积累资金，第一任董事长是邓朴方。我在理念上对残疾人群体心怀同情，如果能参与他们的事业自然非常高兴。当然，我的心里还有一层细腻的想法：投靠朴方创设的公司，风险不会太大。1985年春，在易生、敏声的介绍下，经朴方亲自过问，我加入了康华的队伍，与在这之前已经加盟的清华同学沈如槐、汲鹏一起工作，这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在康华工作了两年。第一年沈如槐任公司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我担任信息联络部经理。一年不到沈如槐辞离，先有黄大树代理，后有殷自烈接任。那时的康华已不同以往，初具规模，业务兴旺。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康华不再谨守在商言商的原则，而是开始染指政治。1986年夏，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浪，公司内部亦有反应。不久，我听说从基金会转来一份材料，上面有朴方的批语：“康华不是清华……云云”。那份材料是关于我的，显然那个幽灵再度出现！文革结束将近十年，67年时的文革语言那时看来很不入眼。我想朴方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下，突然看到了这份材料，自然非常光火。我发现某些同事投来了神秘的眼光。是的，康华不是清华。但是，这件事情原本与清华也无关系，那是谁的错呢？我想解释无用，只能听之任之。几个月后，突然人事处王晓光经理找我谈话。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非常熟悉的一张纸，正反面全是我的字迹。幽灵再现！正是我抄录的那份材料！王晓光笑眯眯地告诉我：“你有问题弄清楚了。没事了。”短短一句话，我等了二十年，等了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今天终于听到了，当场的感受简直难以言表。据他告知，问题的解决多亏了机械工业部情报所的不懈努力。后来才知道，机械工业部情报所对张蔼玲的学历、党龄、能力很器重，准备提拔她任室主任，但是遇到了与我同样的问题。政治处处长刘玉梅（曾在中组部工作）出于惜爱人才、对人负责的态度，下定决心搞清这件事情。她去中央有关部门查阅中央文革的材料，没有发现任何与我们相关的线索，又专程去福州找时任新华社福州军区分社社长丁固调查。老丁说：“我都没有问题，他们几个学生有什么问题？”他还就对我俩的印象，尤其是张蔼玲的工作能力、政策水平赞赏了一番。情报所将调查结果转送康华，我就此得以清白。第二年，公安部情报所找我调查杨承勋在材料组的情况，我出具证明，他也获得了信任。文革中的这段经历，一个莫须有的问题，竟然在二十年后才告白结清。想想我在这段时间，背负的压力有多重，遭受的折磨有多大！我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背后还要遭受非议与怀疑。过去的一切让我无法忘记。但是，我对邯郸市化工厂以及交通部情报所的领导还是心存感激：虽然他们没有负责任地进行调查，把事情弄清，但至少没有将我打入另册，随意惩罚。试想一下，如果在文革初期，我肯定会挨打批斗、饱受折磨；对于这种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罪名，我真是跳进黄河也讲不清。感到自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无论周边的压力有多大，多艰难，我都没有消沉，没有颓丧，没有失去对自己，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一切源自于文革期间的性

格捶打与意志磨练。2007年冬天，丁固从福州来电话，说当年记者站的一些老战友在国防大学开会，商议写书事宜，邀请我和蔼玲参加。我们见到三十多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年长的已逾八旬，年轻的也七十好几。四十年前他们都是军队的翘楚才俊，有的是军事记者，有的是政治教员，或者文化干事，被推荐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在那个政治混乱、信息闭塞、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年代，他们临阵受命，不惧危险，亲临现场报道事件真相，为中央了解情况、进行决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谨守职责的表现理应得到尊重和肯定，但是，事后却身陷旋涡，遭受整肃，处境艰困，令人痛心。67年秋，我们离开记者站后不久，随着王力、关锋以及此后戚本禹倒台，江青、陈伯达开始对记者站人员进行审查；次年，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一些记者被打成516分子，一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八十年代开始整党，中央要求清查一些历史问题，包括清查中央特派记者，特别指明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于是，这些记者又被审查了一遍。各单位组织力量，内查外调，走访知情人员，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记者当年写的文稿，甚至去监狱审问被押的造反派头头，综合情况，做出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最后还听取了本人的意见。也就是说，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许多记者的冤情才被复查平反——差不多也拖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的人蒙冤身亡、连累家人；有的人解甲归田、生活无着；有的人甚至差点被枪毙；一些境况稍好的也都受到了降级使用的处分。听着老人们血泪倾述，我感到无比的悲伤和心痛。啊！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伤害了多少无辜与忠良！同时我也领悟到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深深的黑洞：知道得太多本身就是一种“罪行”。我暗自思量：与这些记者相比，我们还算幸运，至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冤屈昭雪的一天。联想自己的遭遇，我不禁想起了在材料组时看到的那些申诉信，那是一封封由血和泪写成的伸冤书。当时我是局外人，不懂，现在，懂了。许多文革期间，以及以前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们，在上访申述了几十年之后，听到的往往只是一句简单不过的结论：“查无实证，事出有因。给予平反。”既没有真诚的歉意，更没有实际的赔偿——人的权利竟是如此的低贱！当事人和家属伤痛欲绝的心情怎能得到平复？我在文革中的两次经历：一个月的限制行动，批斗检查；延续二十年的限制使用，不做任何调查——究竟是谁的错？谁的责任？！在一个缺乏自由、没有法制的体制下，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包括生活、工作、思想和行为的权利都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我的事情弄清楚了，但是心情却越加苦闷。夏天刮起的那场风浪，引发了中央上层的政治危机。改革与保守的争斗表面化、公开化。次年春节之前，胡耀邦总书记被迫下台。康华内部批判声起，总经理要求每位中层干部明确表态。我对胡耀邦素怀敬重，对于他的人品，也对他的改革思想和执政理念。我不能违心表态，更不能合拍起舞。于是我做了一个含混的表态，总经理侧目怒视；之后两人相见无语。我决定离开康华——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对得起良心和人格的决定。两个月后，

1987年4月，我离开了康华，完全告别了旧的体制。我希望寻求自由，一个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远离政治的地方。康华的历练使我受益匪浅，我不仅初涉商海，知道了营商投资的ABC，而且了解了中国残疾人群体的基本状况，这对我日后的人生规划影响深远。

我重新操起专利代理的旧业，参与创建香港永新专利代理公司。商途艰辛，一路走来，又是二十多年。我有幸进入法律领域，涉猎国际知识产权业务。在与国内外发明人、企业家、律师、学者的交往中，我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我很喜欢与外国朋友谈论对于时政、历史、文化的看法，他们表述的那些深邃、理性、包容的观点和理念，往往是我所匮乏的。在与台湾同道的多年合作中，我愉悦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柔与敦厚。二十多年来，我摆脱了体制的羁绊，无党无派，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一以贯之地关心时政，关注时弊，忧国忧民；我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思想，自由创业，自由发展，从事心仪的事业；同时真诚、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人文情怀，增添底色厚度。一生劳顿，交友行事，没有涉足官场的污泥浊水，没有沾染商场的金粉铜臭，没有偏离做一个正直人的人生目标，我为此感到宽慰。自由的经历铸就了独立的人格，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式与价值观念，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人生追求。一切起始于四十多年前的那场运动，那场令人无法忘却的文化大革命！

(十)

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运动，不论始作俑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效果确是如此。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愚弄和伤害，大家都是受害者；但是，作为每一个个体，如果放在理性的天平上，自我拷问良知，我们中哪个人又不同时是个加害者呢？在那疯狂的年代，有的人为虎作伥，充当打手；有的人告密举报，落井下石；大多数人明哲保身，摇旗呐喊——为了权、利，人性泯灭；为了自保，良知蒙尘。面对权势的淫威，人性的懦弱主宰了自我。这是我们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凡是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灵魂上都受到过严酷而真实的考验。但是，即使在当年瞒天罩地、压抑窒息的环境下，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努力尝试摆脱那种受蒙蔽的“不成熟的状态”，期盼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启蒙道路。我当时的心境就是如此。

文革中求索真道的经历，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回顾四十年前的心路历程，我常常问自己：

如果不是当年如此真诚、积极地参与运动，我有可能真切地体会到那段历史的时代脉搏，感受到运动中无比丰富的人情世态吗？显然不可能！

如果不是文革中亲身遭受到冲击与折磨，甚至在延续二十年的日子里身心伤害，我有可能对历次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们抱有如此的理解与同情吗？显然不可能！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特殊机会，在记者站里看到了如此翔实、可信的上访材料，我有可能对各地曾经发生而从未披露过的事实有这样具体的了解，并进而有所思考吗？显然不可能！

如果不是有机会阅读到那么多从未知晓的经典巨著，并与同伴们激荡脑力、畅谈心得，我有可能对许多政治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涉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刻问题产生这样新的理解与思索吗？显然不可能！

正是在清华大学那样相对自由而宽松的环境条件下，我通过参与和求索，才感悟到自我启蒙的愉悦。其实，文革之中，各人的经历不同，比我体悟深刻的大有人在。这样的求索与感悟，是每个人自我发展的宝贵财富。

诚如康德指出，实现启蒙并不容易。他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艰辛而外，并且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但是他坚信：“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写本文之前，我有机会拜读了陈乐民先生的《启蒙札记》。陈乐民先生是著名学者资中筠的丈夫，一位博学多识、治学严谨、富有良知的老知识分子。他将自己阅读启蒙大家经典著作后迸发的思想火花，写成了这本深入浅出的笔记，可以说这是一本“对启蒙之说进行启蒙”的文集。阅读此书，我有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点，康德说：“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唤作启蒙。”启蒙是一个光亮醒目的名词。启蒙是相对黑暗而言，在政治上则是针对愚昧、专制而言。然而，实现启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启蒙是要从迷信中摆脱出来。迷信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长时期地传承接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不论是宗教迷信还是政治迷信，往往都是与权力、利害、前程、甚至生死连在一起，具有极大的利益相关性。因此，被迷信束缚的人，都是不自主的，不自由的，处于一种被蒙蔽的“不成熟状态”。这种状态的特征，就是对他人的依赖，和对自己的不信任；似乎不经过他人的引导，运用自己的理智，将无能为力。这是迷信状态的两个侧面。所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勇气。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大的迷信，最大的造神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从本质上讲，文化革命是十七年的必然发展，两者之间密切相连，一脉相承，只是前者在形式上更加登峰造极，无法无天，造成的冤假错案罄竹难书。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们都有深切的感受。建国以来，运动持

续不断，迷信逐步升级，文革到达了顶点。人们对文革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狂热拥护，渐渐变得不大理解，进而变得茫然怀疑，再而觉得出了问题；文革后期，大多数人已非常反感，希望梦魇尽快结束。毛泽东的威望也就这样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从神坛回到了人间。这是一个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漫长过程，是中国人民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从历史教训中获得的一次重要启蒙。从此之后，领袖的光环退色了，党的英明打折了，革命的神圣不再了。人民开始懂得，一切都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文革结束不久，党中央拨乱反正，胡耀邦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我们国家试图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有益尝试，是全民参与的一次思想启蒙活动。

这次启蒙活动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关键在于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文革十年的经历，人民看破了迷信的障眼，看清了体制的本质，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开启蒙蔽，摆脱“不成熟状态”的诉求。同时，对于自己长期以来受到的革命教育、传统观念、思想方式以及行为规则，进行了理性、深刻的思考和反省。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启蒙教育。八十年代初期，由此讨论而引发的改革开放思潮，本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良好开端，但遗憾的是，进程刚兴，风波突起，一切戛然而止；从此万马齐喑，人心凉默，延续了二十多年。文化革命推翻了一个个人迷信，但又被一个新的金钱迷信所驾驭，所束缚。正如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预见的那样：“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事实深刻地告诫人们，如果缺乏思想，很容易被新的偏见所套住，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点，启蒙的前提是存在着“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是康德论启蒙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反复强调：“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给人类的启蒙。”这里所提的“自由”，我的理解首先是指外部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能够使人们充分运用理性的条件。文革之前，国人都在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下生活，人们的思想被各级组织禁锢在规定的框架中，自由思考被视为是一种不被允许的异端追求。文革摧毁了传统的组织体系，打碎了大一统的精神桎梏，给了善于思考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有了一个求索真理的绝好机会。文革期间的清华园，整体氛围相对自由；虽然运动初期有过一段关于阶级出身的喧哗，但是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基本的信条。不论是老兵还是造反派，不论是团派还是414，都能在清华的论坛上激扬文字、阐述己见；这样的氛围给了大家思考问题、辩论是非的条件。我们的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得以开启与提升的。此外，依我的理解，康德所说的“自由”还有另外一层意涵。康德认为，自由是人的意志的一种属性：自由既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每个人的自由需要与他人的自由相一致。在这里，“自由”的意涵可能更多地表

现为对人们主观意识的一种规范。也就是说，人们在享受这种权利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对他人的责任；人们必须理性地使用这种权利：一方面，表达思想的方式要理性，不要受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表达的思想内容要自由，不能受权势的胁迫，利益的算计，或者感情的驱使。人们只有享受到充分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才算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很显然，当年我们在尽情享用四大自由的时候，几乎从未意识到责任的概念，更不可能将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做一致性的考虑。我们在大字报、大辩论、打内战的时候，往往被派性蒙蔽，以感情用事，违背了“充分利用理性”的基本要求。这样的行为与启蒙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

如何保证人们能够真正享有“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康德认为，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建立。一部好的宪法可以使只存在于理念的东西变成可以实行的，而不是作为无聊而有害的口号。这样的宪法可以把制度按照理念建立起来，容许人们享有最大的自由，同时又使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互一致。这就是康德理想中“普遍的公民立法社会”。由此可知，启蒙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自由，而充分自由的保证是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就这点而言，中国要迎来“启蒙时期”，任重而道远。

第三点，启蒙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会出现反复的社会任务。这个分析非常客观，非常重要。通观欧洲的文明史，启蒙的任务不是通过一次、两次，甚或多次革命所能完成的。1784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五年前，康德就清楚地预见到：“通过一场革命决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康德指出，启蒙有两大“敌人”，即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以及存在于民众心中的愚昧主义。专制主义不可能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势，必然会利用民众的愚钝，创造出一些新的偏见，以维护其权力；而民众心中的愚昧主义，很可能自然地接受这些新的偏见，陷于认知的迷茫。所以，启蒙必定是一个持续长久，而会出现反复的艰巨任务。与政治改革不同，民众的自我启蒙，也就是思想方式的改革，只能是慢慢地积累获得。

中国的情况何尝不是这样？从体制层面来讲，文革与十七年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文革之前，执政党官僚主义造成的痼疾弊端，所在多有；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革命这样的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下，破旧立新、除弊兴利；但是，这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既不可能打破官僚主义，改造专制主义，也不可能教化愚昧主义，实现国人思想方式的真正改变。相反的，文革假革命之名，为所欲为十来年，使黑白颠倒、是非混淆，造成了几代人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的极大混乱，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很显然，这种思想意识和思想方式的改变也不可能凭借一次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能解决得了的，需要经过持续、多次、由全民参与的社会教育活动才能逐渐达成。

事实确实如此。文革结束三十多年，由于上层没有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

全社会集体失忆，后患无穷，殃及子孙。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文革的土壤尚未改造，文革的阴霾还在飘荡，文革的思潮和做派还有相当的市场。前几年重庆上演的不正是当年文革的连续剧吗？唱红黑打、目无法纪、以权代法、草菅人命——为了篡权夺位，野心家假改革发展的旗号，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让他们尽情地释放人性之恶。恶魔一旦掌握了权势，掌控了信息技术，就会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地封杀民众自由，剥夺基本权利，残害无辜生命。他们罗织罪名，滥施刑讯，恶行多端，令人发指，与文革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文革期间对人的专政，主要还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压力，那么，现在则赤裸裸地是通过权势中心的暴力。温总理严肃指出：文革的悲剧可能会重新发生。这是一句警世之言！国人必须警醒。

我们还必须看到：三十年来，伴随着市场开放、经济发展而来的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猖獗，使得许多文革时期的旧偏见借尸还魂，重新登场；有的则改头换面，演化为新的偏见。这些新旧偏见，堂而皇之地登场入市，搅乱人心，成为驾驭缺乏独立思想民众的层层圈套。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譬如，文革时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变成了“一切向钱看”；文革时期“人和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现在变成了“人和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文革时期“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现在变成了“为了功利，不择手段”；文革时期“路线决定一切”，现在变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现在变为“关系哲学”；文革时期的“出身好、红五类”，现在变成了“官二代、富二代”；文革时期“以运动方式搞政治，搞清理阶级队伍”，现在变成了“以运动方式搞经济，搞社会综合治理”；文革期间崇尚“精神原子弹万能”，现在变为“腐败也是一种生产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当下畅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许多沉积了封建社会的污秽，更多的散发着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铜臭。历次政治运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国人割断了对中华历史的承继；十年文革浩劫，毕现阶级斗争的真相，使国人抛弃了对远大理想的信念——既失去了过去，又没有了未来，缺乏信仰的国人迷惘地生活在当下，在金钱至上的环境中，或乐此不疲，或无能为力。在传统力量和惯性思维的熏陶下，他们安之若素地因循既定的状态，不仅没有摆脱原有的“不成熟状态”，反而堕入了一种新的“不成熟的状态”。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社会现状。

陈乐民先生在《在中西之间》一文中写道：“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变化和进步人所共见。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仍然需要教化，成为现代化的享有自由的文明人……。越是反顾中西两种文明史，越是深切地体会我们的历史缺少了若干个‘关键时期’。历史是不能责怪的，但它可以使人们明白，使人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或许我们还需要两三个世纪的‘启蒙时期’来实现自我改造，特别是改造我们的人的基本素质。”对于这种肩负历史责任感的呼吁，我深表赞同。

的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不可否认缺少了“社会启蒙”的阶段。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崇尚皇权，迷信天子，臣服权柄，国人对权力的崇拜与依附心态非常强烈；相反的，理性思维却非常稚嫩；这样就很难形成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更难产生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正是我们民族素质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三十年前，国门陡然打开；在毫无渐进过渡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从一个封闭的状态一下子跃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发展阶段。但是，大门虽然打开，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体制，以及民众心中的愚昧主义并没有改变。原本需要缓慢培育、自行发展起来的社会，在一个接一个运动式政策的操控下，被强行推进，揠苗助长，结果顾此失彼，发展失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公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更明显滞后。这样就造成了整体性贪腐蔓延、官员懈怠无为、贫富差别加剧、社会意识缺失、民族意识迷茫与道德水准沦丧。目前国人普遍焦躁不安，对现状不满，对政府不信任，社会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们必须对国家的未来有所思考。中国的道路在哪里？社会建设与政治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我以为唯一的良策是：驾驭权势、开启民智——也就是要制服康德所说的“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以及民众心中的愚昧主义”这两个文明社会的“敌人”。“启蒙”是在现代世界的变迁中，按照自身的逻辑，渐次展开，连续演进的一个过程。“启蒙”解决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性阶段所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西方或东方的问题。通观各国强盛之路，都有一段适合国情的启蒙时期。其实，对于每一个在现代性道路上发展的国家，“启蒙”本身就是窥视其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今后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逾越“启蒙时期”这样一个关键的阶段，即使需要的时间会很长久。

开展全民性的启蒙教育显然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以我之管见，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可以通过对薄王罪行的审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次全面、理性、深刻的讨论，进行宪法普及和行宪教育，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深入地了解近年重庆发生的社会事件，即所谓“重庆模式”背后的本质问题；认识到这场小文革与当年的大文革一样，其实质都是掌权者为了达到个人崇拜的目的，无法无天，目无法纪，随心所欲，肆意而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性灾难。其次，在对“重庆模式”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回溯到对四十多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展开一场大反思、大评论、大辩论，这样就能够比较自然地找到一把开启全民性启蒙教育的金钥匙。当然，在这整个过程中，需要顶层领导的巨大勇气和卓越智慧。只有义无返顾地通过这样集体性的社会反思与争论，才能有助于国人解除精神羁绊，恢复理性思维，清理偏见糟粕，改变思想方式；才有可能清理文革的土壤，清除文革的阴霾，改造文革的思维，杜绝文革的做派，在法治建设和制度设计中，找到一种驾驭权势、服务人民的崭新体制。

记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苏联大清洗七十周年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是的，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文革，回顾文革，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为了让全国人民能够共同选择一条适合国家发展进步的最有效的道路，这是启蒙教育的宏大目标之一。很显然，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启蒙教育，才能明辨是非，知道对错，厘清思想，达到共识；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启蒙教育，才能建立符合人类进步发展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念；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启蒙教育，我们每个人才能开启理智，认识自我，改变思想方式，从“不成熟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启蒙的精髓，就是要求人人都具有理性担当的精神，一方面为了认识世界，一方面为了对自己负责。这是国人素质改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复兴昌盛的必由之路。

开展启蒙教育的最后基点，必须要落实在制定一部“好的宪法”，建立一个全面完善的法治国家。这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方向。只有在独立的立法和司法的体制下，民众才能享受最大的自由，才能达到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相一致；同时也才能在制度建设中平衡好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普遍的公民立法社会”。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时期运动的口号。”康德当年曾大声疾呼。二百多年后的中国人，你听到了没有？！

王允方完成于 2012 年 12 月底

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

孙 耘

Y —— 一位关心、熟悉清华的朋友

S —— 孙耘

Y：你读了孙怒涛的新作，为什么也想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心路？

S：从去年孙怒涛学长在清华校园网上搞《追寻记》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通信联系。今年春天收到他的回忆录文稿：《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题目开宗明义，顿时让我眼前一亮。近年许多文革当事人都在写回忆录，但这样立题的不多，在我们清华还是头一位。他娓娓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在诸多问题上探查自己的动机和效果，真诚地‘认错道歉’，同时谈及对文革新的思考和认识，从而开启了清华人反思文革的一条新路。我作为同辈人，深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和艰难’，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坦诚、勇气和执着。

当年，孙怒涛是 414 的头头，我是团派的干将。同为青年学生，大家的心路有相近之处；作为不同的个体，特别是处于对立的群体之中，又必有一定差异。我愿扼要地说说自己的经历和心路，顺便提及一些问题和粗浅的思考，作为对孙怒涛同学的一个回应，同时就教于清华学友以及关注文革的朋友们。

Y：那么，就像孙怒涛一样，先从你自己小学中学的经历说起吧。

S：我家祖上是天津南郊的农民。爷爷持家有方，开过米店。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能写一笔好字，但没接受多少新文化。他很早就到商铺‘学生意’，后来在英美烟草公司谋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应属于高级职员。父亲言语不多，脾气暴躁，但待人宽厚、仁义，处世谨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平安无事。他常常以此自诩。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的潜在影响很大。1950 年我 5 岁时

上学，年岁最小，懵懵懂懂的，一直是大同学的跟屁虫，从没有当过班干部。少先队的什么鼓乐队、夏令营等活动也没我的份。小学毕业那年保送人数较多，我没想到以第十来名的成绩居然混了个保送名额，得以进入天津十六中，就是著名的耀华中学。到耀华上初中，才是自我觉醒的开始。

Y：我知道耀华是天津的名校。怎么说到耀华才‘自我觉醒’呢？

S：谈到母校耀华很令人自豪。学校坐落在天津英租界有名的‘五大道’附近，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紫红色的建筑群，包括四座教学楼和礼堂，保留着欧洲建筑简洁古朴典雅的风格。学校的教学设施一流，校舍里有专门的讲演室、实验室等，独立的体育馆和图书馆在大操场两侧遥遥相对。那个年代，拥有体育馆的中学你听说过吗？耀华的校名取‘光耀中华’之意，以‘勤朴忠诚’为校训，代表了那一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的理念。‘七七事变’后流亡的青年才俊，如钱伟长等，都曾在耀华短期任教。当然，解放前它算‘贵族学校’，1952年改为公立，更名为‘十六中’，普通市民子弟就多了起来。

十六中继承了耀华的传统，比如男女生合校不合班；我们1956级还特别试行按年龄分班。我们班年龄最小，都是11、12岁的鸡和猴。入学时，来自普通小学的我属于年岁小不谙世事平平常常的一介白丁，依旧跟在别的同学后边跑。第一学期在玩玩闹闹中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期末开班会，班主任颜老师总结说：我们班虽然调皮捣蛋，考试成绩在全年级最好，还有一位同学得了全五分……我心里暗想：不知是谁能考得这么好。轮到我上前领成绩单时，颜老师对我小声说了一句：还要继续努力啊。我听了心里直打鼓：没觉得考砸了呀。回座位上打开成绩单一看，呀，整整齐齐从上到下，全都是5分。这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刻，11岁的我仿佛一下子觉醒了，逃离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能行，你会做得更好。

小时候我除了上学读书以外，不大懂人情世故，更不用说社会政治，属于后知后觉者。初一下学期反右运动开始，校园里没有大字报，我曾骑在同学肩上扒会议室的窗户偷看，只见里面一道道线绳上挂满了小字报，觉得挺新奇挺好玩的。我家没有右派，也不知道亲戚、老师或同学家长中谁是右派，对反右没什么概念。教历史的徐振树老师讲课很精彩，所以威信高，同学们听说他要‘下放’劳动，就想凑钱给他买点东西。代数李老师在课堂上得知后厉声责问：是谁的主意？我们见势不好齐声回答：是大伙儿的主意。后来学校还很开明，并没有为难我们这些小顽童，同意买些草帽、风镜、手巾等给徐振树和傅义柱（图画）几位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右派。

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我开始在各方面展现自己。1958年‘大跃进’，全校停课大炼钢铁。不知哪位同学搞到一个小高炉，要用大平板车去拉回来。没有骡马，谁来驾辕？情急之中我头脑一转：驾辕无非是利用杠杆原理让车体保持运动中的

平衡，只要把高炉装在车轴上方，找准平衡位置就行。于是我自告奋勇当辕马驾辕。化铁炉子两三米高几百公斤重，十几个同学前拉后推，我紧握车辕保持平衡，一刻也不敢松手，任凭脸上汗水流淌，只能靠同学给我擦汗。十多里路顺利前行，直到大车进校门时，因上陡坡车辕翘起我被高高举起，引起一片惊呼。小高炉大出风头，熔化出全校第一滴铁水，获得广播表扬。这件小事提高了我的威信，让我萌生一种自豪感，而且更加自信了。从此，勇于任事、敢为人先逐渐成为我做人处事的风格。

Y：中学时代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呢？

S：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第一，耀华和清华一样，倡导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十分重视体育、文艺等业余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兴趣小组，例如美术、摄影、航空模型、生物、无线电等等。文体社团和课外活动小组都有专门的老师辅导，有的达到准专业水平，像航模组多人是省队主力，在全国比赛中获得过仅次于北航的优异成绩。清华男篮的球星‘小五’刘维奇就是耀华59届的校友。

1958年兴起无线电报务运动，高班的沈忠如、贾云年同学被选去集训，参加全国比赛，获得好成绩。报务组出了名，我一上高中就报名参加。1960年贾云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先后在云南和河北从事地球物理和地震研究，1976年在唐山大地震中以身殉职。沈忠如报考清华无线电系，但录取时被调整至电机系，因为他出身资本家。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知家庭出身的影响。上清华以后，我到无线电运动队继续从事报务、测向等国防体育项目，在队里结识了我的爱人孙铮，后来在文革中的活动也多与清华体育代表队有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参加报务活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其二，我自小求知欲很强，喜爱读书，但家里缺乏读书的条件和氛围。幼年时爱看‘小人书’，象三国、水浒、列国志、三侠五义等等。一般家庭买不起‘小人书’，都是几人合伙从流动书摊上租来看，于是养成看书飞快不求甚解的习惯。上中学后我常跑图书馆，凭兴趣乱看。最初喜看各种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寓言等。有一段时间钟爱翻译作品，特别是苏维埃文学，如‘古丽雅的道路’、‘一本打开的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西方古典名著也有涉猎，但兴趣不很大。我们自己的大部头革命作品几乎都读遍，像‘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把革命与战争描写得动人心弦，使青春期的我特别崇尚革命英雄，常常被那些英雄的高尚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幻想着浪漫的革命历程，甚至惋惜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那火红的革命年代。这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隐藏在内心深处，尽管是幼稚的、虚幻的，却不能否认它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看来，它是促使我义无反顾地投身文革大潮的内在动因之一。

Y: 这么说，你在中学里如鱼得水，成长得很顺利啊。

S: 也不尽然。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上高中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实实在在体验了挨饿的感觉。城市里槐树柳树叶子都被扒光，近郊根本挖不到野菜，母亲因劳累与饥饿患了浮肿病。我的父亲在1960年秋病逝，家庭的顶梁柱忽然坍塌，生活陷入困境。母亲是家庭妇女，哥哥中专刚刚毕业在外地工作，下边还有三个小妹妹，十五六岁的我必须有所担当，为母亲分忧。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家事的烦扰，我要控制自己的焦躁情绪，要学会‘噪中取静’的读书功夫。我常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名言警诫自己：如果松开掌握自己的拳头，我就会遭到不幸。总之，那是生活对我的第一次磨练。

有一天，母亲拿出几张印制花哨的纸张给我看，原来是股票，要我到大丰面粉厂去领股息。这时我才知道家里还有股票，尽管每次才领20多元，根本解决不了生活困难的问题，但领股息就要算资产阶级。这可是件大事，不能对组织隐瞒，我当即向班主任如实汇报了。以前，各类登记表‘出身’一栏我都填‘职员’，现在得改为‘高级职员’，因为你肯定收入不菲，不然怎么会买股票？再后来，为表示对家庭认识的提高，就干脆写‘资产阶级’了。其实，我至今不知道按有关‘政策’我家到底该算什么成份。从此以后，我感受到家庭出身带来的压力，背上了这个无形的沉重包袱。

中学时代，我待人谦和，乐于助人，在同学中享有一定威信。我遵章守纪，成绩优秀，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但我从来没有‘红’过，似乎总摆不正‘红专关系’。高三那年，我和几位课代表一起费尽心力帮助大家复习功课，搞讲座、办墙报，晚间还到同学家个别辅导，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仍然入不了共青团，因为我不够靠拢组织，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靠拢组织’。唯一的安慰是同学们选我作为‘群众代表’参加天津市毕业生代表大会。我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告别母校，有自豪感也有压抑感，有甜蜜也有些苦涩。

Y: 家庭出身好像并没有影响你上大学。

S: 我的出身还不算正牌‘黑五类’，至多是深灰色吧。我能上清华确实是命运的眷顾。196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阶级斗争的弦暂时松弛了一下，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之相应，当年的高考录取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强调考试成绩，要‘按分排队，分级录取’，相对弱化了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我本想报考哈军工，因政治条件不够被拒绝。为了吃饭不花钱，我又想报考师范大学。学校老师们不甘心，一再动员我报清华北大，并亲临我家与母亲面商解决困难的办法。没有这些老师的帮助我上不了清华，我十分感谢他们。

Y: 听说你当年是天津的高考状元？

S: 这是民间的说法。那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十六中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

的消息是阅卷的校友传出来的。62年虽然注重考分，但主旨仍是‘又红又专’，所以高考分数及成绩排队严格保密，官方校方都不作宣传。到清华后，按照惯例我和十几名高分新生一起受到‘蒋校长接见’，不过是高沂代表的。遗憾的是，关于高考成绩，我只听到一些传闻，至今不知自己确切的分数。‘状元’的名号增强了我的自信，也让我感到压力。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能在内心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继续努力，要有所作为。

我们那届毕业生考得很好，高分生很多，录取率达93%，为耀华争了光。我听说，暑假后教育部长杨秀峰接连一星期亲临耀华听课，继而多位老师获得晋升，由二级升一级，由三级升二级，还传出要把耀华改为‘国立二中’的消息。所以老师们对62届毕业生记忆犹深。

1987年正月初二，耀华传统的校友返校日，文革后我第一次回母校，见到校长阎治身老师。他教过我们物理，一见面就认出我，劈头一句：你们62届毕业生300多人，我从头想到尾，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你在文革中栽了大跟头。是啊，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怎么会狂热地投身文革铸成大错呢？这些年我不断回顾自己的心路，一直试图做出真诚的、令自己信服的回答。

1962年的‘资本主义回潮’没能掀起多大浪花。第二年就开始了四清、五反，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64、65届高中毕业生中，不知有多少‘黑五类’子弟被阻断了进大学的道路。我和孙怒涛出身不同，不在同一年参加高考，现在却有着同样的感受：考上清华绝非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文革中我们团派认为教育界十七年是‘黑线主导’，批判过62年的‘资本主义回潮’。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回潮，团派中许多人很可能进不了清华，甚至上不成大学。文革中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悖论，我们自己往往深陷其中，应当引起深思。

Y：到清华以后怎么样呢？

S：初到清华，一切都感到新鲜，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典雅庄重的图书馆，金光闪闪的圆顶大礼堂，大草坪前镌刻着‘行胜于言’四字格言的日晷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学中既有来自上海北京文质彬彬的高材生，也有身着土布单衣，打着赤脚的南方农村子弟。他们有的聪明绝顶，能文能武；有的见多识广，言谈不俗；有的潜心攻读，誓不回家，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特长，至于那些党团员班干部更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水平。与他们相比自愧不如，我感受到新的压力。

对我来说，初到清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吃饭’。老师帮我申请助学金，很快拿到12.5元的全额伙食补助，我没有额外的4元生活补助，只能依靠自己的节俭和哥哥的补贴。解决了吃饭问题，我能安心读书了。为此我感谢清华，感谢国家，我要尽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我们无线电系803班大多数是团员。一年级班主任顾鋆文老师帮我圆了追求

多年的团员梦。二年级我转到校无线电厂。清华体育代表队有自己的党团组织，独立的宿舍和食堂，而且伙食标准更高些，对我这穷学生的身体发育大有好处。

Y：当年的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直属学校领导，政治上吃小灶，出了不少干部。

S：体育代表队党团员的比例要高于普通学生班，平均学习成绩也略好一些，是培养‘双肩挑’人才的一个基地。我所在的航海无线电支部政治气氛很浓。我很自然地成为团干部‘做工作’的对象，他们总要‘帮助’我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我对那种居高临下充满说教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来越厌烦甚至反感。

压抑和反感都属于青春期的内心悸动，同时也表明我对社会政治一无所知。有一个例子，从高一学俄语开始，我就与一个乌克兰女孩瓦莲金娜建立了通信联系，而且一直保持到大学二年级。那时中苏两党关系已公开破裂，厚厚的苏联来信十分招眼，我却浑然不觉，最后还是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找我谈话，不让我继续写信了。现在想来很可笑，我那时对政治就是如此迟钝。

Y：我想，大学几年里你对政治的认识应该有所提高了。

S：那当然，我也在逐年长大嘛。对我们这一代同学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清华的反右教育搞得很热闹，有展览，有讲座，有座谈。我对反右了解很少，看了图文并茂的展览，觉得很新鲜。有一幅‘群丑图’印象最深，教数学的李欧教授打着阳伞蹲在阴影里，口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没有照到清华园。细细品读后才明白，原来不能随意给党员、党支部提意见，搞得不好就是反校党委，反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我还得知，我们系的元老孟昭英、常迥，教物理的夏学江，教电工的杨福生诸位先生都是右派。据我观察，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无可挑剔，也不像不可救药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老师给我们无八级讲‘反右’，介绍他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如何挺身而出与来煽风点火的北大右派学生‘二十九人团’辩论。原来清华这一茬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都是反右时的知名‘左派’。我头脑中留下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印痕：要事事紧跟校党委，争取当左派，千万不要成为右派。

64年开始的‘九评学习’更加有声有色，‘新清华’报、大会、广播一起登场，众多‘积极分子’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孙怒涛对此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生动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党团干部、辅导员们苦口婆心地鼓动我们‘暴露思想’，你暴露的问题越尖端，就越显得‘积极’，他们的工作成绩也就越大。我倒是诚惶诚恐地想表现一下，无奈自己的阅历简单，没有什么可暴露的亮点，只好再拿家庭出身说事。我检查自己对家庭认识批判得不够，检查自己受家庭出身的影响，遇事甘当‘老好人’，明哲保身，缺乏斗争性等等。我不属于组织上重点关注的人，稀里糊涂也就过关了。

Y：影响深远的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很有清华特色。你今天怎么看？

S：文革前清华的这两场思想教育运动是蒋南翔校长应对时局的一着妙棋。当年‘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上层建筑领域首先拿文化界开刀，继而派工作组进北大，波及到教育界。蒋校长政治嗅觉敏锐，未雨绸缪，一方面紧跟党中央，拿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尽全力强化‘不漏气的发动机’，巩固清华的阵地。反右教育明确地告诉全校师生员工：谁反对校党委谁就是右派。九评学习的‘清理思想’无疑是引蛇出洞的翻版。白纸黑字装进‘袋子’，立此存照，以备秋后、甚至秋后的秋后算账。我们班一位地主出身的同学就在辅导员的反复动员下，暴露了所谓‘反动思想’，四年后毕业时遭受批判，被工宣队发配到新疆。我党传统的驾驭人招法在清华被发扬光大，而且运用得更为精妙。与此同时，校党委加紧发展学生党员，培养了从辅导员到中层干部一大批独具清华特色的‘双肩挑’青年干部，指望他们确保发动机不漏气。

Y：蒋南翔是新中国的教育家，在清华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你怎么看文革前蒋南翔主政清华的十几年？

S：确切地说，蒋南翔是共产党的教育家，身上兼具党性和教育家的属性。作为教育家，他继承了清华的某些优良传统，经过对‘全盘学苏’的扬弃，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清华有人专门总结‘蒋南翔教育思想’，自有详尽的论述。我作为当年的学生有些亲身体会，比如坚持全面发展，提出‘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既注重基础理论，又强调动手能力；注意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等等。在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强调‘重在表现’，敢于录取一些‘有问题’的学生，即使对‘反动学生’还坚持在校内教育、挽救。应该说，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能尽力坚持‘有教无类’的传统是难能可贵的，我自己也算一个受益者。蒋南翔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通俗的说法就是‘听话、出活’。校党委要求我们：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还要奋发有为；即使你奋发有为，也要当驯服工具，真是一个最具清华特色的口号。然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早已弃如敝屣，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无可否认，就清华的整个历史来看，这是个明显的退步。作为教育家的蒋南翔没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另一方面，蒋南翔又是我党在教育战线的领头人，党性原则必定置于首位。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蒋南翔深谙党内斗争的真谛，从52年院系调整入主清华，改‘教授治校’为党管学校，借助反右等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培养嫡系，组建自己的‘清华牌’干部队伍。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地打造了清华的‘不漏气的发动机’。在政治风云中，蒋校长坚守自己的原则，特立独行，文革中拒不认错等，都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他本人锱铢必较、党同伐异的思想作风亦深深影响了清华的党风校风。改革开放后清华迟迟不给钱伟长‘改正’右派，可作为一个注脚。

如唐伟同学指出的，蒋南翔进而推行‘党化教育’，把清华办成‘党校’。1953年他在清华率先建立‘辅导员’制度，注重发展学生党员，悄悄地也十分有远见地把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作为目标并付诸行动。到文革前，在校学生党员达千余名，在高校中无出其右。正是这些辅导员和学生党员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顶梁柱，实现了蒋校长出将入相的梦想。‘满清政府’诠释了蒋南翔党化教育的成功。然而，党化教育禁锢思想，‘辅导员’制度培养新型官僚，‘南翔思想’指导下的清华党委一脉相承影响至今，半个多世纪出不来‘大师’的清华屡遭社会诟病。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众多老校友扼腕叹息，为清华的前景忧心。

伴随着改革开放，许多清华学子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有其历史的必然，其积极意义是肯定无疑的。数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多名常委，直到朱学长、胡学长，曾令我们引为骄傲。几年前一位北大同学抱怨：台上都是你们清华学工的人，这是最糟糕的事。我当时据理力辩，觉得他们有酸葡萄心理。今天回头再看，人家难道全无道理吗？如今胡学长已突破旧规‘裸退’，习学弟以亲民姿态接班，清华人继续执掌着中华巨轮。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条巨轮将被引导向何方？总之，关于清华和蒋南翔，一切的一切，是耶非耶，尚需人们思考，尚待历史验证。

Y：咱们继续往下谈。1965年你去‘四清’了？

S：清华四、五、六年级学生从1965年暑假开始陆续进驻北京郊区农村。出发前对我们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刚刚发表的‘二十三条’，其中一个小提法特别令人瞩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第一次听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鲜名词。我们上故宫午门参观北京市四清展览，那还是按‘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搞的，介绍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闻所未闻，感到新鲜和刺激，心中充满了期待。

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到京郊延庆县，刘冰、何东昌亲自带队。我在城关镇胜利街大队，身着清华学生的标志装——空军的黄棉袄蓝棉裤，负责青年、民兵等工作。第一次长期在农村生活，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切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刚到农村吃‘派饭’时，穷苦人家落满苍蝇的窝头和臭烘烘的腌咸菜难以下咽，后来居然吃得喷香；遇到‘富裕中农’家庭用蛋肉招待，则一筷子也不动。我觉得自己在思想改造方面有了不少进步。

四清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农村的政治运动，头脑中留下几个深刻印象。第一，农民很穷，即使在延庆县城，许多农民辛劳一年，结算下来勉强能够购买分配的口粮和那点冬储大白菜，还有不少欠生产队钱的。为准备派饭，老乡们常拿一只鸡蛋换回一点酱油醋，调调口味。其二，地主富农与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戴帽地主’黎玉才解放时不过二十来岁，温文尔雅，没有什么劣迹。那些十几岁的地富子女聪明能干，但地位卑微，虽然表现积极，却难掩内心深处的痛楚，令人

同情。我不知他们以后走过什么样的生活道路，相信他们摆脱了出身的枷锁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能有所作为。其三，老贫农谈起本村出去的某公社干部，从小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土改时却特别积极，带头斗地主挖浮财，然后就入党当官，现在××公社当书记。我熟悉的贫下中农如大队长郭存海、保管员周明宇等，为人敦厚正直清廉，都不是土改打头阵的积极分子。我从中知道革命不那么高尚纯粹，革命运动中常常靠痞子，即‘勇敢分子’打头阵。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至今社会上流行的痞气和流氓作风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Y：1966年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批‘三家村’，矛头已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你们在北京搞四清，有什么感受？

S：我和先知先觉的同学不同，根本不懂政治，对上层斗争一无所知。四清时一直窝在乡下，春节都在延庆留守，所以不知道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1日北大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后，一连串重磅新闻陆续传到四清工作队：北大闹翻天了，派去了工作组；我们同一工作队的郭敦仁教授提前回北大了；彭真倒台，改组北京市委了；学校有人给蒋校长贴大字报了……听到这些片断消息我感到惶惑和不可思议，大家都没心思工作了。没过几天工作组进清华，要求四清工作队马上封存文档材料，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结束了。在那个年代，新的政治运动终结前一个运动似乎已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定式。

Y：档案记载，工作组6月9日进清华。你们哪天返校的？

S：参照孙维藩日记，应在6月13日前后，浩浩荡荡好多辆斯柯达大轿车从延庆拉我们返校。一路上带队干部们明显心绪不佳，政治敏锐的同学开始指责他们，要求他们与校党委划清界限。一进校门，就看见乱哄哄一群学生，拥簇着一位戴纸糊高帽手敲脸盆的年轻老师游街，宿舍门口墙上满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我从未见过这种景象，起初感到惶恐、吃惊、不解，当发现自己不属于运动对象以后，又想看看热闹，继而就去凑这个热闹，要表现自己的‘积极’参与。我当天就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沈×，你保谁的驾？’，要我们队团支部的领导沈同学与蒋黑帮划清界限。

我很想多写几张大字报。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是三字班海军调干学生，为人厚道，我说不出什么意见，对蒋校长和校党委也不知道该批判些什么。怎么才算积极参加运动呢？反正‘墙倒众人推’，我抱着一种玩闹心态，回到无线电系班上写了一篇大字报，点名批判专业教研室主任扬弃疾先生。三年级时杨先生主讲‘超高频技术’，开场白谈治学方法引用三句古训：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温故而知新。我要小聪明对杨先生无限上纲：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岂不是反对‘立竿见影’学毛主席著作？我那时还不懂得这顶大帽子有多重的份量。文革中我与杨先生再没有接触，不知道这篇大字报对他有过什么影响。多年后听到杨先生的一些事，知道他是一位很有独立见解的正直的学者。我们无八年级几次返校聚会，杨先生因年事已高都没有参加。我与先生不熟悉，没有勇气直面先生道歉，就借这个场合表达我的歉意吧。

Y：工作组时期最主要的事件是批蒯大富，揪出‘蒯式人物’好几百人，即所谓‘蒯派’。那时你算什么派？

S：刚回学校时我跟不上形势，看到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等行为觉得不可理喻。6月中旬开始就有人批评、质疑工作组，比如王铁成，口气很大，感到有些狂，我跟不上他们的思路。后来看到‘访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是李小忠从林学院转抄的，感觉讲得有水平。‘李小忠’是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三人的化名，后来被打成‘小三家村’。23日蒯大富等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了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然而，6.24 辩论会上工作组一下子就给他上纲到反党夺权，更令人反感。那天我去过辩论会现场，大礼堂楼上下挤满了人。我挤在过道上回头一看，突然担心二楼塌下来，又匆忙挤了出去，在外面听辩论。那一天场面的壮观，群情的激昂，可能在清华历史上空前绝后了。没想到一天以后风云骤变，传达了李雪峰讲话，代表队连夜组织游行，高呼‘保卫工作组’，声讨蒯大富。

反蒯开始了。我小心翼翼地参加工作组安排的各项活动。工作组封锁了校门，外人不准进，学生不准出；还听说要像反右时一样，给学生分成四类，准备抓右派。我内心充满了压抑和危机感。刚回校十多天，就经历了惶惑、兴奋、骚动、压抑、惶恐这样的情绪起伏，内心受到很大刺激。那些天，校广播台总播放一首歌颂战斗英雄的歌：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麦贤得光荣入伍保卫海防……多年以后，只要听到这首歌，内心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压抑、难受。前些时候与汲鹏同学偶然谈起，原来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Y：你是说，汲鹏也怕听这首歌？

S：是的，汲鹏在工作组时期挨过整。他一听到这首麦贤得和才旦卓玛唱的‘太阳啊，霞光万丈……’心里就感到难受。恐怕不少清华同学都有类似的感觉，这是必然的巧合。

蒯派们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纷纷认罪投降，唯有蒯大富‘又臭又硬’，坚持到最后。这是老蒯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反蒯’延续到7月下旬。7月22日开始，陈伯达、江青、康生多次到北大座谈、演讲，强烈批评工作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公众面前正式亮相。那时我才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认定她的讲话代表毛主席，尽管她曾在北大当众流泪，自称‘阶级斗争斗到我们家里来了’，让大家惊愕不

解。随即，中央文革代表党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建议由群众无记名投票，按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新的权力机构，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些话说到大多数师生的心坎里。陈伯达、康生还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员不一定是代表党的。这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等于给群众一把尚方宝剑，可以自行检验、评判各级党组织。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等‘少数派’参加。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最后出来与大家见面。会后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人们完全想不到，没过多长时间，天又翻过来了。

Y：形势的发展的确让人眼花缭乱。那时你有什么感受？

S：尽管我不是蒯派，我同样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如果说，以前的教育让我觉得毛泽东是高高在上的天神，现在则亲身体会到毛主席与我们心连心。中央文革就是毛主席派来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王光美秘密坐镇清华指挥反蒯，将几百名师生打成反革命，使大多数师生员工对王光美和刘少奇产生反感。王光美讲：‘我代表少奇同志…’，‘下自行车伊始…’以及打饭做秀等等，反而增加了人们的轻蔑。所以，当毛泽东表明态度以后，清华井冈山就充当马前卒，带头批斗王光美，炮轰刘少奇。

Y：我明白了，这是你后来成为坚定的造反派的一个思想基础。

S：还不止如此。工作组刚下台，血统论对联就传入清华，我又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8月1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 鬼见愁’贴到清华，放言要辩论。清华同学中不乏有胆有识、有政策水平的佼佼者。有的干部子弟站出来批评对联，比如自七的吴慰庭；也有‘黑五类’子弟上台表示异议，比如电九的李磊落。然而对联的拥护者人少而势大，辩论的武器是辱骂、拳脚加铜头皮带。他们组织起‘红卫兵’、‘贫协’等‘阶级队伍’，高叫‘只需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很快在清华形成一马长嘶万马皆喑的局面。血统论甚嚣尘上，多年的压抑上升为恐惧，让我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又面临一个难以测度的深渊。在惶恐中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个星期，直到8月8日晚间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巨大震动，如‘清华文革亲历’所记，听到广播后，当即‘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我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情绪由兴奋转而激奋。《十六条》再次申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不讲什么出身成分，而是‘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我反复研读，备受鼓舞。走资派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当左派，为反修防修贡献力量。8月10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群众接待站，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幸赶上这场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明确了目标，有了底气，再也不怕气势汹汹的老红卫兵查问出身，谭力夫讲话出笼后也敢于理直气壮地批判。后来，老红卫兵在所谓‘红八月’中制造‘红色恐怖’，引起天怒人怨，同时干扰了批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中央文革遂明确表态：血统论对联是‘反动对联’。

Y：也就是说，经过‘血统论’的冲击，到十六条发表，毛泽东发出号召，你就决心做坚定的造反派了。

S：那时，我感到自己再次获得解放，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的号召点燃了我的革命激情，‘造反有理’不再是红五类的专利，谁也不能剥夺我革命的权力。‘革命倍觉主席亲’，我要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在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跟着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顾这段经历，当年的青年学生虽然离不开时代的局限，但大多有理想、有抱负，有精神追求。他们激进、敏感，又简单、幼稚，如马克思所说，容易‘轻信’。毛泽东是发动群众的高手，深谙驭人之术。当你被压在底层，甚至掉进‘反革命’泥坑时，他一把拉你起来，告诉你：你是革命先锋，向前冲吧。你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甚至为之献身。我想许多平民造反派都有类似的心路。

同学中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中学生‘老红卫兵’是另一类群体。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天生对政治很敏感，文革前就以‘接班人’自居，在北京闹起‘学潮’，要求贯彻他们的‘阶级路线’。文革工作组撤离时出现权力真空，他们马上成立‘红卫兵’、‘贫协’，并宣扬极端的‘血统论’。对‘权’字他们情有独钟，有着舍我其谁的偏执，对联更反映出他们的狂妄和狭隘。他们自恃根红苗正，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想敢干的冲劲超过大学生，在初期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把第一波造反烈火烧到全国各地，例如揪斗文教领域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牛鬼蛇神，以及‘扫四旧’，搞‘红色恐怖’等等。没过多久，到1966年秋天，当文革烈火烧到他们自家门口时，许多人又转为保爹保妈的保守派，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批判中央文革。一部分人就此开始了新的思考。应该承认，相对于我这样的平民子弟而言，在政治上他们是早熟者。

与老红卫兵针锋相对，另有一些先知先觉者，典型代表是遇罗克。他的‘出身论’

从反击血统论对联入手，全面批判共产党的阶级路线，言论大胆而深刻，震撼人心。我读后虽然很有共鸣，但没有勇气和水平同‘阶级路线’叫板，只想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Y：咱们继续往下谈。当时有个‘八八串联会’，要继续批工作组，还有‘八九串联会’，强调斗黑帮。你站在哪一边？

S：我当然是八八派观点，但没有参加‘八八串联会’，因为那两天正紧张地准备出去串连。

Y：串联？好像那时中央还没有号召‘大串联’呀。

S：你的记忆没错。《十六条》一公布，学校再次大乱，但各地运动发展不平衡，外地一些受压的大学生跑到北京上访告御状，控诉工作组和当地领导，要求中央派人去解救他们。大约8月9日，力八梁春沛、鲁炎杰等同学贴出大字报，要发扬12.9革命精神，把革命火种带到全国。他们受到西交大来京告状学生的邀请决定去西安，最后组织了近20名学生，以力八两个班为主，我们队有两人随孙铮参加，还找来辅导员周彦煌（力七）当领导。形势严峻，时间紧迫，我们匆忙到食堂退了粮票菜票凑出旅费，到学校开了‘实习’证明以便买半价票，12日就登上了去西安-兰州的火车。组织一支成规模的队伍到外地串联，我们在清华应该算头一个。在火车上遇到北京灯市口女中和30中的学生，她们要去兰州支持革命派。兰州的情况比西安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看过大字报，兰州大学有个李贵子臭名远扬，他们得到甘肃省委支持，残酷迫害革命师生，还到铁路中学等单位制造过流血事件。火车上的列车员都力劝我们到兰州去，解救受压的革命群众。一种使命感让我们改变计划，决定直接去兰州，然后再去西安。

Y：当时兰州是什么景象？你们怎样‘煽风点火’，支持革命派呢？

S：14日到达兰州。一下火车就大吃一惊，只见车站广场红旗招展，站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还有整整齐齐一排排人都举着毛主席像，感觉很新鲜。省委把我们北京来的一行人接到招待所，主管文教的副书记马继孔出面接见，一开口就说：我们欢迎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组。我们马上声明：我们只是清华大学学生，不是工作组。回过头来想，那时中央还没有号召‘大串联’，人家很难相信一群普通学生会自发来到几千里以外搞革命，肯定认为我们有背景有来头。我们虽无政治斗争经验，但革命性、警惕性蛮高，所以拒绝住省委招待所，而是步行前往兰州大学，省委的车只好在队伍后面跟着。到兰大后李贵子马上‘接见’我们。大名鼎鼎的李贵子是五年级学生，衣着朴素，做派老练，说话口气很大。他为我们安排了招待所，我们则坚持住在教室，到学生食堂用餐。当天，我们就分头下到铁路、

工厂、学校以及兰大内部作调查。

兰大的校园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感觉到一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但我知道，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我多次遭遇这种情况，走到一个避静的拐角处，会有一个人叫住你，向你控诉所受的迫害，然后又悄然消逝。他们都是被李贵子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学生。我同情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他们也向我倾诉，对我充满信任。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革命情谊’，那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纯正的、真挚的感情，至今值得回味。写此文时我查询有关资料，又记起几个熟悉的名字：朱选、陆保珍、张明生等等。如今他们都已年逾古稀，不论过往的生活有多少曲折，我祝福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

15日是我们调查的第一天，结果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省委要组织周边农村的民兵进城，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紧急开会研究，觉得必须设法制止省委的行为，当即决定：1，派鲁炎杰等三人速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他们在铁路局帮助下18日清晨赶到北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要求面见周总理。2，因为不清楚军队的态度，派我和孙铮、孔繁胜三人马上去兰州军区，要求军队保护革命群众，起码要保持中立。3，其他人继续联系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注意有关动向，做好应急准备。

我们三人当晚来到兰州军区，说明情况，坚持要见司令员张达志上将，见不着人我们就赖在那里不走。等到午夜时分，张司令只好出来接见。我们顾不得落座，急忙报告‘紧急情况’，并告知已派人向中央汇报。张司令个子不高，面带微笑，显得稳重而和善。他背手站在那里听我们讲述，并不插言，最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要相信我们。我感到，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委态度不一样，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天已很晚，张司令派他的警卫员送我们回校。那位年轻军人身穿便装，推一辆自行车，示意我们包里有防身手枪。他边走边聊，似乎对省委很有看法。到兰大门口时，一辆小轿车打着大灯开过来，他急忙转过身并用手遮住脸庞，嘴里嘟哝道：是省委的车，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很有点成就感。我更感到惊诧的是，省委与军区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居然存在不小矛盾，有些不可思议。

Y：后来农民进城了没有？发生冲突了吗？

S：可能这些传言原本就是杯弓蛇影，也可能我们的努力起了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农民进城的事。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来。兰州大学李贵子要召开全市性的万人大会，辩论省委问题，指名道姓要我们发言。那时，批判省委的属于非主流的少数派，受省委支持的一派占据很大优势。我们立即闭门研究对策。鉴于兰州以往的情况，很担心有人冲击会场，甚至对我们动武，遂商定开会时占据靠近主席台的位置，大家要围坐一起，让周彦煌坐在中央。那么谁去发言、怎样

表态呢？按常规，由周彦煌发言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尚在议论纷纷时，我脑筋一动，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上台发言有人身危险，周彦煌是我们头头，要重点保护；其次，他的苏北口音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我建议由我去发言，我的普通话没问题。关于如何表态，由于我们刚到兰州，调查不够深入，不宜‘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随意上纲上线。发言要简短明了，既要明确指出问题，又要体现我们的政策水平。这样一看，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还责成我起草发言稿。

16日晚间，大会在兰州大学操场召开。偌大的操场坐满了人，举着红旗、标语牌和毛主席像，在数盏聚光灯下可以清晰分辨出不同单位的一个个小方阵。主席台好像是临时搭建的，我们按计划围坐在主席台旁，没有人上主席台，也不知主席台上有什么人物。开会不久就轮到我们发言。我稳步走上主席台，眼望前方，台下人山人海鸦雀无声，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我顿了顿，用缓慢的语速，一字一句地大声念发言稿。第一句话先明确我们的身份，是‘代表 14 日到兰州的，清华大学、北京 30 中、北京灯市口女中的同学发言’。我简单描述了某些单位工作组迫害革命群众的事实，对照毛主席指示和《十六条》，最后指出，造成兰州万马齐喑的形势，‘省委是有责任的’。这句结论性的话是我挖空心思的得意之作。它没有按《十六条》的四类划分给省委定性，只不过指出省委对迫害群众负有责任，这就足以点起一把火了。我在台上一字一顿地高声说道：‘我们认为，省委是有责任的！’只见操场远处几块方阵爆发出一阵掌声欢呼声，红旗摇动久久不能停息。我的发言引起一阵骚动。后边几个发言都是保省委的，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劳模，声称要送一套毛主席著作给清华学生。我再次上台接受了馈赠。第二天，兰州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宣传画，‘省委是有责任的’这句话传遍大街小巷。兰州的革命烈火再次被点燃。19 日，鲁炎杰他们在北京受到陈伯达、王力接见。中央文革严厉批评了甘肃省委，紧接着就宣布主持省委工作的副书记裴孟飞和马继孔撤职，李贵子也不知去向。兰州的天翻过来了，革命群众扬眉吐气了。我们亲自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内心充满了自豪感。那时，我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又很纯真，全心全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十六条》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中央文革首长一再讲‘不要当保姆’。现在群众已经解放了，文化革命往下怎么走，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群众越信任我们，我们越不能当保姆。于是大家统一思想，决定尽快离开兰州。

兰州串联是我第一次主动参与政治。在兰州，我们按‘十六条’办事，自己既当左派，又充当左派的拯救者，从而更坚定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在兰州我有意表现自己，检验自己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为自己勇于任事、敢为人先的作为而自得。我平生第一次上台发言，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万人大会上讲话，你只能听到喇叭里传回来的自己陌生的声音，那种感觉很奇妙。总之，兰州之行让我找回了自我，增强了信心，敢于再次对自己说：你能行。

我们在兰州这段时间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第一次大串联开始；8.18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老红卫兵‘扫四旧’，打砸抢，搞‘红色恐怖’；8.24 拉倒清华二校门，等等。这些事件我们都没赶上。8月下旬，赴兰州的一部分人取道宝成线到重庆，住在重庆大学，依旧到各处鼓动造反。9月中旬，我们一行人乘船到武汉，再转火车回到北京。当时学校的行政工作还由‘三临’主管，因为串联坐火车已经不要钱了，我们就找刘涛签字报销了火车票。

Y：兰州之行你们与革命群众成功地互动，有一定代表性。怎么看待文革初期全民的这种积极参与？

S：文革初期，撤销工作组发布《十六条》以后，全国群众纷纷起来造反，人人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家庭内部或亲友之间都争论不休，人们纷纷依观点‘自由结社’，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祖国大地，在后人看来，好像全民都吃了兴奋剂。其原因何在？人们指出了各种因素：文革前干群矛盾的积累，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愚忠，等等。我个人体会，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对民主、自由、平等有一种天然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在专制社会常表现为对‘明君’的渴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又往往变为无政府主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西方中世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提出‘圣经’是至高无上的，人人可以通过读‘圣经’与上帝沟通，否定天主教层层‘教阶’的权威，体现了新生资产阶级追求地位平等的政治要求，是一种社会进步。无独有偶，文革初期我们鼓动群众起来造反时，常引用陶铸的一句名言：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能够直接地、自主地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而摈弃直接管理他们的党组织体系，体现了他们追求民主、追求平等的愿望。兰州和重庆的经验告诉我们，陶铸这句话用于发动群众是百试百灵的法宝。

今天看来，《十六条》的发表是文革初期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从此，‘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就代替‘听党的话’成为举国上下最时髦的话语，而不再强调党的‘组织观念’。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然而，令党的领袖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民主犹如‘天方夜谭’里的妖魔，一旦从魔瓶里放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了。而且随着社会阴暗面的公开暴露，各级干部头上完美的光环被彻底打碎，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应该说，破除‘党组织’的权威和神秘感是文革带来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

Y：你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66年9月回校后你参加哪个‘红卫兵’组织了？

S：66年9月的清华，与外地的轰轰烈烈相比，让人感到冷冷清清。‘三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地来京学生。校内几支红卫兵还固守着清一色的‘阶级路线’，排斥出身不够格的学生。9月23日蒯大富他们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而且很

快就突破了血统论，敞开大门招收非红五类出身的‘兵团战士’，不发红卫兵袖章，但佩发‘井冈山’的小证章，并且申明在内部一视同仁。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了井冈山。那时进出一个组织很自由，我不记得填过什么表，也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纯粹是山上的散兵游勇。

Y：井冈山的组织的确松散。按照惯例，你总要属于某一个战斗小组吧。

S：10月3日《红旗》第13期发表社论，毛主席向造反派发出新的进军号令：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不久，井冈山兵团在阶梯教室开会，组建‘南下野战兵团’去云南昆明串联。我们一群散兵游勇，包括孙铮，马莉等人凑在一起组成一个战斗组。这时，看到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寻找伙伴，我知道他，是校乒乓球队知名的‘黑五类’子弟李磊落，就邀他加入我们小组。于是，来自4个系、4个年级的5名女生和4个男生就偶然地凑在一起，组成后来小有名气的‘打落水狗’战斗组。李磊落的加入，不但增强了战斗组思想上的凝聚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我的，以及我们大家的人生轨迹。

Y：李磊落当年很有名，都知道他死在湖南武斗中。

S：李磊落是电91班学生，校乒乓球队队员。他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有志气，可惜天妒英才生不逢时。他的父母年轻时曾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又脱党当了逃兵，解放后靠做小生意为生。李磊落背着‘叛徒子弟’的包袱进入清华，所以格外追求进步。66年8月2日在大礼堂辩论对联，李磊落勇敢地跳上台，声言：我脸黑心红，黑小子照样干革命。结果被人连推带踹轰下台。‘红八月’中，他的叛徒父母一个被殴打致死，一个自杀。‘父母双双被打死’的传闻和贴满宿舍门墙的大小字报使李磊落一下子成了代表队的名人。我们很难体会李磊落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煎熬，但他在我们组的一系列表现，直到在常德牺牲的前一刻，都在向人们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脸黑心红，我是真正的革命者！

Y：噢，李磊落原来有这么悲惨的经历。你们战斗组一起去昆明了。

S：10月16日，‘井冈山南下野战兵团’一行几十人乘火车去昆明。我们组的成员在火车上会合，算战斗组正式成立，推举我当组长。当时正传抄毛泽东的一首新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最后两句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细细品味这富有哲理的两句话，觉得对我们特别有指导意义，于是给自己的战斗组取名‘肯登攀’。

昆明的串联学生很多，最抢眼的还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他们依旧身着军装，腰系皮带，还有人身带棍棒匕首。随着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兴盛，这些干部子弟大多变为保爹保妈派，双方自然会发生冲突。我们此时已不再顾忌‘血统论’，也不怕他们的皮带匕首。有一次发生武力冲突，我们人数众多，身高体壮，赤手

空拳还略占上风。后来省委书记阎红彦开会接见，我就坐在他旁边。那时阎书记尚未受到大的冲击，表现得稳重平和，有长者之风，想不到没过多久竟然‘自杀’了。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有许多未解的谜团。

在昆明，我们小组时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议形势，谈认识，各抒己见。李磊落政治敏锐，思维活跃，能引领大家提高认识，最后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可以说，他是我们组的精神领袖。《红旗》十三期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李磊落的一些‘经典’言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让夫人亲自出面指导文化革命运动，可见已处于少数地位。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当时听了这话，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经过多次形势分析和讨论，我们推想，文革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批判刘少奇，直到把他拉下马。得出这个结论让我们感到吃惊，激动，兴奋，甚至还有点悲壮。我们决心充当毛主席的马前卒去冲锋陷阵。李磊落带头改名言志，取笔名‘江林’，其含意不言自明。我的名字‘孙毓星’平平淡淡，受另一位改名‘宋耕’的启发，决定叫‘孙耘’，意思是：要在革命道路上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此外还有‘毛伟’、‘林迅’等名字，‘迅’当然指鲁迅。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11月1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社论鼓动革命群众‘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敏锐地感知：这是毛主席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于是把战斗组更名为‘打落水狗’。

Y：那时，多数青年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革命性很纯真呀。

S：我们‘打落水狗’战斗组可算某一类典型。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多数非红五类出身，也不是响当当的蒯派，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有强烈的使命感；都脱离原来的班集体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或许，还有较浓的小资情调。共同的理念凝聚成一种力量，使我们逐渐成为井冈山的骨干队伍。然而我们组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高潮中有一人牺牲，二人重伤，我则进了班房；毕业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人受到冲击。面对生活的周折，我们只能自嘲：‘打落水狗’自己倒成了落水狗。唯有一点值得庆幸，我们组13名成员中出了4对‘革命伴侣’。当年清华的战斗小组几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经历够独特了。

Y：革命加浪漫，就像‘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描写的那样。

S：可见古今中外青年人搞革命都带有浪漫色彩。当然，革命总是第一位的。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我们从昆明返回时，临时决定从株洲下车，到湘潭住下准备步行长征。我和李磊落专程到长沙接待站借款35元，买了胶鞋、雨伞等必需品。这笔款毕业后被追回，从我的工资中扣掉了。11月15日我们从湘潭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从韶

山经湘潭、中路铺，过湘江到朱亭，经上屋场、攸县、茶陵，进入江西到龙市，最后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全程 20 多天。当时茨坪的巨幅画像还是原来的朱毛会师，尚未改成毛林会师。我们参观八角楼，登上黄洋界，吃红米饭南瓜汤，唱红军歌曲，在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好像朝圣一般。在山上我们得悉中央下通知暂停大串联，而且听说北京出现了反林彪和‘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就不再继续步行长征，乘卡车下山到吉安，经南昌转乘火车于 12 月 8 日回到北京。

Y：66 年末刮起所谓‘十二月黑风’。你们 28 团正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

S： 经过昆明之行和步行长征，我们全组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S 除一人以外，大家都继续在一起活动。‘打落水狗’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字报和讨论会上。不久，动农系零字班的臧令瑜找到我们，要把观点相近、志同道合的战斗组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批判刘少奇的资反路线。他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选几个战斗组作为核心，有：‘雄关漫道’臧令瑜，‘八一’李自茂，‘第一星火’张兴华，‘井冈志’吴文忠，‘烈火’戴国珍，以及‘打落水狗’等。核心组第一次在 2 号楼开会，臧令瑜建议取名叫‘送瘟神战团’，瘟神的所指不言而喻。我则提议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28 团，因为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是红四军 28 团，而 28 团团长正是林彪。张兴华他们都表示赞成。于是，清华文革史上有名的‘28 团’就此诞生。刚成立的 28 团积极投入反击‘十二月黑风’和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 12.25 大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参与者，后来逐渐成为清华文革中一支重要力量。

关于 28 团，我想说明几点。1，‘大事日志’上说 12 月 24 日发起成立，不知根据哪些原始记录。我的记忆应该再早些，大约在中旬。2，28 团的成立与蒯大富无关，核心组里也没有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在 28 团与三纵队的论战中，总部支持 28 团的观点，同时还要保持凌驾于两派之上的姿态。3，67 年初，28 团在社会上的主要活动包括：参与砸联动，主办联动展览等，只有个别人参与‘反康’。4，28 团以观点或思潮结合，组织松散，进出随意，很多战斗组都是自己宣称属于 28 团，而大家也就认可了。5，28 团早在 67 年 3 月 1 日就宣布解散，几个纵队也相继解散。后来 414 串联会成立，28 团逐渐变成团派核心骨干的代名词。

Y：照你的说法，28 团组织松散，不分一二三把手，那为什么说你是 28 团团长？

S： 这本是戏称。67 年 1 月，28 团的主要发起人臧令瑜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头头、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一起，串连一些群众组织炮轰康生，我校还有戴国珍，龚兰等参与，就是所谓‘28 团反康’。为此，臧令瑜险些被送进班房，好不容易检查过了关，就此淡出文革运动。‘反康’对 28 团冲击很大，危难时刻，

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负起责任，在内部外部撑起 28 团的门面。出头露面多了，有人就戏称我是‘团长’。414 串联会成立后，各系均设立分部。团派跟着也按系组建 01——12 部队，部分总部委员加上各部队一把手组成‘部队核心组’。我是部队核心组成员，从此进入团派的领导层。

名不副实的 28 团团长头衔给我带来了麻烦。1970 年深秋，学校大张旗鼓地‘清查反革命组织 5.16’。据说，有人对迟群讲：你知道‘团派’这个叫法怎么来的吗？那是因为井冈山早期的骨干队伍叫 28 团。28 团团长叫孙耘，肯定是 5.16 分子。于是就把我从内蒙古海拉尔抓回学校，进行了长达 2 年半的审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从上井冈山，组建‘打落水狗’战斗组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进入 28 团核心组，表明我已自觉地要求自己站到运动第一线。之所以说‘自觉选择’，是因为它是我过去生活经历的自然延伸，是我内心追求的一个释放，是自我觉醒的一个新阶段。因此，至今我不后悔，也不该后悔这个选择。

Y：我好像能理解你了。是不是你周围的许多人都有类似情况呢？

S：起码在我们战斗小组内，大家不但有共识，而且有一种正面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李磊落，对我个人以及我们全组影响很大。

Y：你多次提到李磊落对你们的影响，那么就着重谈谈他吧。

S：如果说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是因为参加了‘打落水狗’战斗组。‘打落水狗’之所以成为‘打落水狗’，就因为有了李磊落。在我们心中，李磊落这个名字永远不会忘怀。

李磊落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文革初期的不幸使他丢弃了以往的多愁善感，从一个普通学生变为一个思想者，进而成为一个战士，像殉道者一样用全部生命书写自己的忠诚，兑现自己的誓言。

步行串连回来以后，我们战斗组的人员有分有合，分头参加 28 团的活动。有人到兵团保卫组。保卫组负责维持治安，还与体院等单位一起策划砸联动的行动。有人去八一学校搞联动展览会。体育代表队一些人负责展览会的保卫，逐渐成为团派的一支武斗力量。我更多参与 28 团与三纵队的论战等活动。此时李磊落已不满足本组的小小天地，他有更深更远的追求。崔兆喜告诉我，1966 年底，李磊落参加过一个叫‘共产青年学会’的小组织，其成员有著名的伊林、涤西，还有当今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以及北大一些人。他们开过两三次会，学习、研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林、涤西‘炮打林彪’以后，这个小组织就寿终正寝了。这说明李磊落当时的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他在不断地思考、探索。他总提出一些惊人的见解，比如：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

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他还结合现实斗争加以引申：‘你要加入一个潮流，就要努力站到潮流的前头，引领这个潮流前进’，‘不要做一个有了你更好的人，而要做一个没有你不行的人’。这些话语我闻所未闻，它表现出来的见地、志向和气魄，我惟有赞叹和钦佩。

李磊落率先走向社会。他支持中学里受压的少数派，积极筹办联动展览。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朱彤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在‘红八月’时，他曾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胸前的皮肉上以示忠诚，然而仍被红卫兵打得尿血，爬回家里，险些丧命。

‘十二月黑风’时，李磊落把朱彤带到我们组避难，以逃离联动的‘追杀’。

67年‘一月风暴’时，李磊落结识了‘红色洋人’李敦白，由于理念相通，双方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时李敦白正和聂元梓一起搞‘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参与北京市的夺权。今年，在美国的沈昆同学来函说：‘李敦白跟我通电话时提到了李磊落，我当时还挺惊奇。他告诉我，李磊落和他熟识，1967年春李磊落曾经找他，请他到清华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帮助。’我向蒯大富征询，证实确有其事。蒯还说：‘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就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得精辟极了。’查阅党史，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讲过这样的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李敦白应该知道这件事。

一月下旬，为‘反康’的事，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指明要28团负责人参加，我和臧令瑜等人出席。一开始，江青说：文化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形势有了新发展，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江青询问大家的看法不过是一句套话，出人意料，在大厅右后角有一个人突然站立起来，高声叫道：我发言，就噔噔噔走向主席台。定睛一看，竟然是李磊落。我感到奇怪，他是作为哪方代表来的呢？李磊落上去，拿着稿，大讲一通夺权后主要矛盾会转到革命队伍内部云云，大致是28团那套理论。没讲几句，江青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让他下台，然后进入正题，严厉批评反康。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只有我明白他，在寻找一切机会践行自己‘站在潮流前头，引领潮流’的宣言。

Y：李磊落的确与众不同。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情结。

S：那时的李磊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充满了革命豪情。我们保存着他的一份残破手稿，散文‘满江红——与形左实左的战友共勉’，写于1967年春。他面对‘二月逆流’，热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山崩地陷，寰球振颤。这个洪流冲决一切罗网，甩开一切绊脚石，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她狂叫着，呼啸着，冲击着，战斗着。她摧毁着座座挡路的阴山恶岭，破坏着条条保守的渠身浅道。……哪怕会遇上逆风千里，甚至有被狂风撕碎的危险，但她革命的脚步决不停顿，更不后退。……最后，李磊落想起了高尔基的‘海燕’，他激愤地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

更猛烈些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今天，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他那口号式革命词藻下的真实思想。但我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他在恣意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我还知道，在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自卑，那就是自己黑黑的出身。联动的喧闹已经证明，达摩克利斯剑依然悬在黑五类子弟头上，他们随时可能再次被人宰割。

李磊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而且比你们更革命。视死如归是革命者的最高境界。于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死’的字样。比如，4月1日晚间，北大附近一个大草垛失火，我们都跑去救火，他回来后写道：死了又有什么，地球照样转动，革命继续前进。只要需要我一定毫不畏惧地献出生命。他在我们面前一再表示：要革命，就要主动地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四川两派动枪动炮，在成都132厂地质学院一名学生中弹身亡，是北京学生的首例。李磊落带领一伙中学生——他的崇拜者，跑到四川支持造反派。中学生们体验到闹革命的惊险与刺激，但他们不了解，李磊落是要去接受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回来以后自豪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李磊落的思想和行动总是超越我们大家，他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打落水狗’。

武汉7.20事件后，兴起‘第三次大串联’。当时，中央文革认定湖南‘工联’‘湘江风雷’是左派。在常德，他们一派3000余人被军分区支持的‘红联’武力驱赶到长沙。我们组的宋耕在西大操场斗蒋大会上结识了常德工联进京告状的人，他们特别希望‘首都红代会’前去帮助。在李磊落的倡议下，‘打落水狗’战斗组再一次统一行动，不去省会等热点城市，而到武斗激烈的常德去支援造反派，一同‘接受血与火的考验’。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激动又悲壮。

Y：在我看来，你们去参加武斗的动机的确匪夷所思。

S：客观地说，人的动机从来不是纯粹和单一的。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能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

我们一行十余人在7月30日到达长沙，会合当地的造反派，准备走水路打回常德。李磊落目标明确，很快加入‘华蓥山游击队’——一支小青年的武斗队，当上‘政委’。他执意要冲到武斗第一线。后来我们看到，李磊落得悉7.20事件后就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

Y：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S：8月2日我们乘两艘武装轮船随先遣队三百余人出发，走湘江进洞庭湖再入沅江，行驶近3天到达工联的据点德山电厂。第二天，李磊落等人随一支队伍渡河进入常德夺枪，但一上码头即遭阻击，我校吴庚生同学被机枪打中，鼻子和

肩部连中几弹，伤势严重。李磊落亲自断后，掩护大家退出常德。他们设法直接向总理办公室汇报，终于要来一架小飞机送吴庚生到长沙救治。吴同学大难不死，后来分配留校工作，直到退休。

6日，由桂入湘支左的47军紧急派某团经德山去常德‘制止武斗’。带队的尹政委很重视北京学生，让我随他走在最前面，一起进驻军分区。当晚红联撤出常德，但市区周围枪声不断，战况激烈。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来了……他的战前动员就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我看他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驾驶楼里面，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解救。车到东门附近，我们步行搜索前进，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此时是8月7日凌晨一两点钟。李磊落的遗体停放在军分区院里，我们组的孙铮和宋耕不知何时来到军分区，见状就嚎啕大哭。当地的武斗队员们个个情绪激愤，眼睛瞪圆，发出骇人的闪光。我突然听到屋里劈劈啪啪作响，还夹杂着呼叫声，与孙铮进去一看，一个叫黄闯或杨闯的人一边骂着一边用板凳砸向一位年长的军人，据说是军分区副司令。那人满面血迹，靠在墙角。这位闯将越打越气，突然拔出手枪就要击发，个子矮小的孙铮眼疾手快，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一把将他的前臂推向上方，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到天花板上。这一推解救了那位副司令，也挽救了那位闯将，可以说还救了我们自己。这个场面对我触动很大。武斗中一旦死人，人们的情绪就无法控制，就会丧失理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悲痛之中，我内心充满自责和担忧，作为战斗组长和带队者，我怎么向李磊落的家人交待，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呢？

李磊落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陆续有很多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愿来到常德，要继承他未尽的事业。然而，来人越多，我作为一个头头的思想负担就越重。

8月底发生了两派相持中最激烈的一场武斗。那一天，红联一方半夜偷袭，激烈的攻防拉锯中我方有十几人阵亡。‘战地医院’大厅里弥漫着呛鼻的酒精味，地上蒙着白布的遗体赫然排成一列，十分刺眼，其中就有北京化工学院的胡宝新，他们一行四人才到常德不几天。我们组的朱以文被子弹洞穿腰部受伤，是孙铮她们抬下来的。那一刻，我别无旁骛，只想着如何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学校。后来朱以文转到长沙手术，所幸未伤到内脏，住院近一个月，随我们一起于9月25日

返回北京。回来后我们又派一同学返回湖南，找到 47 军和省革委会，为李磊落办理了‘革命烈士’证书，拿到抚恤金 2000 元，一并交给了他哥哥和弟弟妹妹。

Y：你们一起去的同学一死两伤，在清华外出的几千人中伤亡最惨重了。

S：据我当时估算，八、九两个月间，常德一地双方的死亡人数就有三四百人。推而论之，全湖南省，乃至全国该有多少人死于大武斗啊。我亲历了战友的牺牲，见证了武斗的惨烈，更意想不到，对立的两派中不分伯仲，都出现了私刑、虐杀等恶行，所表现出的兽性与土匪几无二致。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感到迷茫：文化革命为什么会变成‘武化革命’？发展下去会成什么样？百思不得其解。

李磊落的骨灰由宋耕带回北京。8月 13 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敦白作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发言。兵团总部还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国际悲歌一曲’，纪念李磊落和在武汉‘八一惨案’中溺水身亡的肖化时。

重新翻阅那本小册子，其中关于李磊落遇难的描述带有演绎色彩，因为作者不是亲身经历。该书编辑、付印时收录了李敦白的发言，但出版发行时李敦白已随王力关锋的倒台而失势，他的发言被撕掉，仅在目录里留存些许蛛丝马迹。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复原文革历史之难。即使文革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档案，也不尽可靠，更何况在派性之下选择性地处理史实是个普遍现象。档案不过是胜利者雕琢过的‘正史’，特别是其中的‘揭发交待’材料大可存疑。所以，我要特别向今天的文革研究者和评论家进言，对关键性的、作为论据的史料，你必须按照治史的规矩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不要轻易采信，更不能随意推演、发挥，否则你发出的宏论只能是空中楼阁，非但落不到实处，反而会误导自己和他人。

Y：我们确实不能忘记文革中许许多多像李磊落这样‘献身’的人。

S：我的文革道路与‘打落水狗’和李磊落关系甚大。我们通过思想的交流相互影响，通过共同的战斗生活加深感情，产生越来越强的认同感，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事实上，每个文革参与者都从属于某一群体，从一个战斗队到一个派别。在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偏激的领袖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体都有程度不同的趋同性和归属感，甚至今天还在影响对文革的反思。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

Y：是呀，还有很多社会学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你回校以后做什么了？

S：九月份回校后两派正在大联合，没有我什么事，我一度萌生退意。然而，李磊落的形象即刻出现在脑海里，我斥责自己的动摇，告诫自己：绝不能当逍遥派。我决定做点‘实事’，就是协助陈继芳抓干部工作和开展大批判等等。

我参与了 67 年底至 68 年初团派‘三大战役’的策划组织，重点批判蒋南翔

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组织‘第二套班子’对抗文革的罪行。在‘解放干部’方面，陈继芳领导下的‘第二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专案组，比如，斗蒋兵团、八五支队、九六支队、吕应中专案组等。我负责联系其中几个专案组。‘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

Y：‘罗文李饶’专案由罗征启开始，你是直接当事人，请谈谈有关的情况。

S：67年秋冬，两派围绕着干部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我们掌握一些材料，揭发罗征启反对中央文革，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尖端言论，根据‘公安六条’足以将他定为反革命。于是，总部决定派保卫组和代表队一起抓捕罗征启。68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罗征启回家过年时被抓获。后来将他关在化学馆地下室，以九六支队为主组成‘130支队’进行审问。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其事，包括连续几天昼夜不断的审问，其间还打过他胸脯一拳头，是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我们的逼供信对罗征启老师身心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内心一直充满歉意。1980年为我考研录取的事，罗老师在给哈工大的信中特别申明：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罗老师是有意的隐恶扬善。30年后我读到这封信时，内心顿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Y：后来罗老师一家遭遇了更大的灾难，就是他弟弟罗征敷致死事件。文革研究者和清华同学的不少文章里都提到这个事件，版本多有不同。我觉得，你作为当事人，应该说说清楚。

S：罗老师一家的灾难是我们造成的，心中的悔恨和歉疚几十年来未曾减退。就事件本身而言，面对别人的说法我感到很为难。他们的描述多来自道听途说，我如果重提此事又担心引起罗老师一家悲痛的回忆，所以只能保持沉默。近些年多次与罗老师晤谈，历经人生磨难的他非常豁达，我内心很感宽慰。况且，梳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也不可能绕开这件事，就借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说。

68年3月上旬，因担心化学馆不安全，就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在八达岭的避暑地三堡，并由代表队负责保卫。罗征启凭借头脑清晰和地形熟悉在27日夜间跳窗逃跑，尽管腿脚摔伤，最终还是逃出了三堡。

当时，继王关戚倒台之后又揪出杨余傅，对文革的前景大家都感到迷茫。在校内，我们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414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很有些得意。没想到大意失荆州，我们只好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由保卫组和代表队继续抓捕，另一方面准备开批判大会发通缉令，抛材料、造声势压老四。我曾拿着材料找到海军宣传队的办公室负责人胡保清，要求他们支持发通缉抓捕。他只能含混地回答：是反革命就要抓嘛。不

敢明确表示反对。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为了找到罗征启踪迹，还抓过他老父亲及同学林维南。我们自恃抓‘反革命’是‘革命行动’，就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蛮干，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话，‘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听到代表队那些人讲述跟踪、蹲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前些年我问过罗老师，得知林维南一家作为华侨已离开大陆多年。我无缘与林维南先生见面，只有借此机会向他及他们全家表示我真诚的歉疚之意，祈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Y：说到这里，看你的心情很沉重。其实，你参与抓人行动好像也挺偶然。

S：怎么说呢，现在人们喜欢说‘偶然创造历史’，但哲学家又告诉我们，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我认为后者更深刻，更本质，也就更真实。

实际上，罗征启当时已经被老四朋友保护在科学馆里了，我们不可能抓到。按照计划，抓不到人就发通缉令，而印通缉令缺照片，因为他们在清华的小家已经‘坚壁清野’了，于是决定去城里他父亲家抄照片。

4月3日晚，我们一行9人乘坐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建国、王庆章两位同学。我带人进屋，有人找照片，有人宣讲‘政策’，有人哄骗他的小弟弟。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一本相册出大门时被告知：抓到罗征启弟弟了。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风。车回到保卫组所在地甲所，几个人抬着他下车，放到地板上就开始做人工呼吸。我心知不妙，赶紧找来刘汉忠医生。他略作检查，就摇摇头委婉地说：脉几乎摸不出来了，赶紧送医院吧。我急忙从总部会议上叫出陈继芳和王良生，说明情况，一起去北医三院。到三院时人家不接收，只开出“人已死亡”的证明，这时大约是晚上11点钟。闻讯我们很为震惊，人命关天哪。可是我们想不出什么原因导致死亡，遂决定马上去卫戍区报案。夜半时分，军管会一位领导出来接见，听了事情的过程汇报，就问：谁是带队的？我说：是我。他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又在抓人的张建国、王庆章名字上画了圈，然后说：这三个人留下，别人都回去吧。第二天早上把我们三人一起送到半步桥看守所。

在拘留审查中我们都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安局很快就弄清了案情。实际情况是，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

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面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心里明白，人命关天，即使强调动机是‘抓反革命’，也不能随意伤害生命。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既敢为，就得敢当；况且，出于责任和义气，作为头头还应该多承担责任。抱着这样的心态，初进班房时尽管杂念很多，我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冷静，而且像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者一样，总要写点不合辙的诗文激励自己。

我深知，罗征敷之死给他本人和全家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几十年来，我的愧疚和悔罪，我所接受的惩罚，都无法弥补其万一。尽管罗老师代表全家多次表示了原谅之意，但我无法心安理得，无法原谅自己。我和孙怒涛一样，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唯有努力行好事作好人，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实际行动去赎罪，以不负死者和生者。

Y：真是人间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呀。请继续往下谈。

S：5月9日蒯大富带人去探监，即所谓‘冲击公安局七处’。见面时他告诉我，公安局要求扣下王庆章，放我俩回去。但他坚持：我送去三个人，你也得还我三个人。蒯大富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还说：如果需要留下一个人，就留我。

那时有一个新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我们三人先后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参加公安局办的‘学习班’。工宣队入主清华以后，8月29日把我们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9月中旬，王庆章与几十名有各种问题的同学一起被送往沙城，当时的说法是‘暂不分配，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发生活费，等待分配’，实际上是由北京师院的学生对他们监督审查改造。1970年王庆章正式分配到河北省宁晋县。我和张建国与部分七、八字班同学一起，于1968年12月底分配。孙铮随我一起‘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到海拉尔报到时遭遇零下45度的超低温，一片雾蒙蒙的冰天雪地，或许已预示着未来的日子将被严寒所笼罩。

Y：这么说，你没有参加清华的百日大武斗了。

S：罗征敷事件让我躲过了‘百日武斗’。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幸运。依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和常德的体验，当然要与陈继芳、王良生、王子瑜等人一起，主张通过搞专案挖‘现行’材料，从政治上打垮414，而不赞成采取武斗方式。然而，一旦武斗发生，又绝不会当逃兵。我的这一劫恐怕在劫难逃。

我认为，罗征敷事件对清华文革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是两派斗争中第一件命案，强烈刺激了414群众，大大激化了两派矛盾，催发了20

天后的‘百日武斗’。同时，它对‘罗文李饶专案’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催化作用。我们进班房的三个人都是校体育代表队的成员，当传出可能判刑的消息后，以代表队成员为主导的专案组自然更为着急，就力图把‘现行反革命案’做实做死，以减轻我们的罪责。我总觉得，这是他们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并大搞逼供信的一个心理因素。因此，我同样愧对专案中受迫害的老师、同学，尽管我没有直接伤害他们。专案组的许多成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影响了出国、入党、提升，甚至背负着‘三种人’、‘严重政治错误’等罪名。对他们，我总有一些歉意。

专案组成员、校足球队的时作隆在 5.30 武斗中摔伤致高位截瘫，我们二十多位同学在毕业后按每年一个月安排寄生活费，连续 18 年没有间断，直到他 1985 年去世。小时英年早逝，没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令人十分惋惜。2007 年‘二闲堂’主编唯一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时作隆武斗受伤的事，我曾以‘北南’的笔名简单记述了小时后来的经历，连同几张旧照一起发表在该网站‘四十年细说从头’栏目。

Y：今天你说了不少表示愧疚和道歉的话。这些话一定是你早就想说的吧。

S：有些话的确憋在心中很长时间了，有些则是近几年在清华两派反思氛围里的新体会。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解剖自己’，进而解释自己，真诚地说服自己，然后才可能去说服别人。我达不到鲁迅的境界，只有努力学习他的精神。

Y：听说你毕业后的经历也很坎坷，可不可以简单谈谈？

S：我和孙铮一起分配到海拉尔通用机械厂，我当车工，孙铮搞电机装配。68年底到69年初，正是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即所谓‘挖肃’运动的高潮。外来大学生自然‘清白’，是依靠力量，北大来的小汪已成为专案组的骨干。我报到不久，厂革委会就让我进专案组。我无法坚辞不干，好在已有清华的经验教训，迅即发现完全是搞逼供信。口供材料犹如滚雪球，咬来咬去，共产党居然都成了内人党，怎能经得起推敲？我的意见被指责为‘右倾’，很快将我和赞同者踢出专案组。这样，我不但避免了再陷泥潭，而且得到全厂上下的好评和关照。可见，从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往往更深刻也更有价值。

1970 年秋，迟群谢静宜主政的清华开始大张旗鼓地清查 5.16，启动虽晚，但气势更猛，迅即在全校铺开，一时间人人自危。数百名已分配离校的学生受到‘隔离审查’，其中几十名重点分子被陆续揪回学校。工宣队通过逼供信获得口供，将井冈山兵团打成‘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10 月底，以开四届人大准备会的名义将蒯大富骗回学校。71 年 2 月 9 日，我在工作中被三位解放军带走，于 11 日回到学校，‘隔离’在东主楼八区。迟群与我个别谈话，说我‘民愤极大’，

威胁要‘依法制裁’，诱导我交待‘5.16组织问题’。谁都知道，迟群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那几天我压力极大，甚至动过自杀念头。实际上，许多审查对象都有类似想法，有人已付诸行动，比如与我同关在八区的一位实验员就喝过敌敌畏。校内自杀身亡者有四名，除一位教师在9003大楼恒温室自缢以外，另外三位都是团派骨干。物〇的栗乃志在审查中跳楼身亡。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老工人韩启明最悲惨。他本已调回河北老家，又被揪回学校，因不堪重压，逃到电厂外小河边割开股动脉。据说，工宣队赶到现场时他的血尚未流尽，挣扎着一口气对军代表惠宪钧说：老惠，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团派的‘捉鬼队’伤亡更惨重。陈贯良在清华的江西鲤鱼洲农场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未死，被讥笑为‘火烧屁股’，后来在两人陪护当中突然钻到拖拉机后轮之下，终于如愿以偿。分配在苏州的李介谦是捉鬼队头头之一，在当地审查中‘自杀’身亡，详情至今不清楚。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当然搞不下去，迟群赶紧中止从外地揪人，转而强调‘5.16罪行’。实际上，早在70年11月周恩来就说：‘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这样，将我文革中的事又翻腾一遍，找不到足够的‘罪行’，最后还回到罗征敷事件上重新定案。

Y：这第二次审查有多长时间？怎么给你定案的？

S：1971年9.13事件以后清查运动就逐步停止了，其后陆续将我们这批人作结论，送回原单位。我的事却拖延到1973年5月，审查了2年零4个月。5月18日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全校‘宽严大会’，将赵××、张×从严逮捕法办，孙××、蒋××从宽处理。然后回到主楼后厅开全系大会，当场逮捕吴××，对我则宣布了‘复审结论’，一个新鲜的说法叫做‘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就是暂不戴五类分子帽子，送回原单位，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当天工宣队集中处理了武斗期间的全部命案问题，共涉及12个人。

Y：你在学校审查了2年多，政治上受到巨大打击，想必有很多感触了。

S：和许多同学一样，我的思想变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从1968年秋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领域’开始，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宣告结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再次举起‘斗批改’大旗，以斗立威，以批固权，自上而下连续发动了几轮政治运动。

第一轮叫‘清理阶级队伍’，是共产党立威的惯例，矛头对着平民百姓。查三代、翻旧帐，40岁以上人人过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虽无详细统计，数字肯定惊人的。据唐少杰老师调查，清华在清队期间自杀24人，超过工作组时期和百日武斗。更有甚者，在某些地区还发生对地主富农灭门分浮财的惨剧。一位同学的母亲老家在湖南道县，她向我描述过那里的惨状，说：鲜血把村边的河水都

染红了。

第二轮随后跟上，1970年1月‘一打三反’登场，借‘落实战备’之名，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打三反’开创了公开、成批枪毙‘政治犯’，其实绝大多数只是‘思想犯’的恶劣先例，还将杀人权下放到省一级，致‘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一大批思想先驱者死于枪口之下，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等。很多地方借机清算武斗旧账，枪毙了一些失势的造反派头头。湖南常德水运公司‘海总’头头郭大副就被处决，1980年才获平反。

在一片肃杀气氛中，1970年3月2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造反派统统划归为5.16，制造了涉及近千万人的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直到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的9.13事件，政治重心转移，这些运动才告一段落。当年‘三结合’在台上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出于派性充当了整人的打手和帮凶。然而，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揭批查’运动中，他们同样遭到清算。

清查5.16运动对我来说是个‘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我见识了迟群这位御林军小头目的嘴脸，体验了被打入深渊的滋味，知道了‘秋后算账’的厉害。我想不明白，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革命，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文化大革命中台上人如走马灯般轮换，台下你整我、我整你，到底是为什么？不久以后，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43年前的28团团长，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竟然仓惶出逃丧命异乡。我的头脑中犹如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又好像一桶冰水浇头，通身凉透却使我骤然清醒。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政治以及有关文革的方方面面。总之，这是我思想解放的开端。

在海拉尔工厂的几年里，我亲眼看到文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了解到工人群众对文革以及各类政治运动的看法。他们对我的理解、同情和帮助就隐含着朴素的批判因素。1976年4.5事件时，我厂毛吉昌、刘永杰两位书记特意叫我到办公室，闭门议论形势。大家很有共识，为天安门的革命行动叫好，反感‘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那时，我已从文革的坚定拥护者转变为理性的批判者。

Y：不少人都有类似的转变过程。1973年回到厂里以后怎么监管你的？

S：回到海拉尔，我由车工改为大炉工、翻砂匠，以利‘劳动改造’。人家老工人对我没有丝毫歧视，反而处处照应。我体会到工人群众的纯朴可爱，与他们成为朋友，友谊延续几十年至今。1975年，市委派毛吉昌到我厂‘代职’当书记。文革前夕他作为共青团市委书记正在中央团校学习，曾在清华园中学当过工作组，对北京和清华的文革有所了解，政策水平也较高。在他任职期间，于76年4月解除我的‘群众监督’，算是‘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同时安排我到科室，从事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工作。

Y：这就是说，从 68 年 4 月事发后将近十年中，对你已经做过 3 次处理。

S：如果算上毕业前工宣队的审查，就有 4 次了。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政治的险恶和肮脏，对我的打击之重自不待说。幸而我一直推崇先贤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吾日三省吾身’。做人做事要换位思考，你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案，受些惩罚岂不应该？自己做事自己当，何必怨天尤人？所以我的心态还算平稳。上帝是公正的，当紧闭大门以后会为你开一扇窗，他施以惩罚的同时还让命运之神赐福于我。在我危难之际，孙铮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不离不弃，在我监改期间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不久又添了一个小千金。周围的群众，从领导到工人，对我都抱有理解、同情、甚至怜悯，经常施以援手，让我在严寒的边陲感受到人间的温暖。那个时代受挫挨整的人很多，各有不同的体验。我的感受是：上天很公平，世间好人多。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Y：你在 1976 年解除了群众监督，那个龙年是多事之秋：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你的生活该有新的改变了。

S：随着四人帮戏剧性地倒台，长达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继而邓小平上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当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有救了；忧的是，政治经验告诉我，恐怕会重算文革这笔账。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蠢蠢欲动’，于是跟着电台学英语，在给青工辅导高考的同时复习大学基础课，谋划着准备着，寻找机会离开寒冷的北国，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1978 年春，从清华传来新一轮讨伐声，我知道，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我们把母亲和小女儿送回天津老家，早早做好应急准备。4 月 19 日，五大领袖被正式逮捕，一场‘揭批查’运动势如燎原，不出一个月，全国就滚雪球般抓了数万人。中央见状，又急令刹车。过了两个多月，我心想这一轮躲过去了，但往后还难说，因为北京的吴德正被炮轰，如果新官上任还难免再烧三把火。果不其然，不久林乎加从沪调京接替了吴德，他的三把火把我再一次烧进了班房。

Y：这就是你第二次进班房了，在什么时候？

S：1978 年 10 月份，我和孙铮参加了哈工大‘回炉班’考试。回来后不久，11 月 13 日，我再次被拘留审查。按照行话，这叫‘二进宫’，班房里的囚犯都高看你一眼。刚关进看守所，心绪烦乱，看看眼前，再想想未知的未来，我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渐渐平复，等待着解往京城。然而，等来的只是一次例行审问，让我把学校那些事重复了一遍，此后就无人问津了。

1979 年春节过后，孙铮前来探视，告知我俩都考上了回炉班，她准备去哈工大报到。送走孙铮，我心绪稍安。其后十几个月中，海拉尔的许多朋友代替孙铮

照顾我，无家胜于有家，我收到的食品数量最多，有些至今尚不知何人所赐。

拘留期间，我坚持偷偷写日记，回忆读过的诗词，靠记忆和推理复习高等数学等，后来又争取到学英语和其他功课的机会。我再次领悟到，只要站得直、行得正，你就终会感动上帝。一位眉清目秀的解放军小李班长对我格外关照，还出钱给我买来字典。我出狱时他已复员，竟没能还钱和当面致谢。就这样，我把看守所变成自己的学校，不但学习文化知识，还学到不少社会知识。

Y：你蹲班房也有不少收获，看来你挺善于学习的。

S：你说得不错，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和事都是我学习的对象。

孙铮到哈工大后，汇报了我的情况，学校十分通情达理，答应为我保留学籍，让我们感到很温暖，看到了希望。然而案子的一拖再拖却让我不断地由希望转而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煎熬中一年就过去了。1980年寒假，孙铮在朋友的帮助下多方奔走申诉，海拉尔公安局终于在2月8日将我释放，名曰‘取保候审’，电机厂书记刘永杰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至此，近15个月的牢狱生活宣告结束。

Y：不过，‘取保候审’意味着事情还没完结。

S：是啊，所以我马上请假，在春节前回到家中。孙铮告诉我，河北宁晋县王庆章的专案组早在半年前就直接找过罗征启。当时罗老师刚刚提升为党委副书记，仍兼宣传部长，他姿态很高，表示‘永远不再追究’，还强调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代表全家。于是王庆章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商量先由孙铮直接找罗老师谈谈。罗老师在工字厅接待了孙铮，指点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让海拉尔派人来清华，征询对孙耘的处理意见，剩下的事我来办，你们就不用管了。’他的话给我们很大安慰和信心。罗老师还支持我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将黄美来老师编写的政治复习资料寄给我作参考。

Y：原来你还不是第一个得到他恩惠的人。罗老师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S：罗老师对文革早就有深刻的反思，他是一个理性的思想者，这样的举动绝非一时头脑发热。

我回到海拉尔，将罗老师的意思转达给公安局，经海拉尔市委批准，指派一位副局长带队前往北京。同时，我报考了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研究生，厂里给我长假，让我专心在家复习备考。让我专心在家复习备考。短短40天要准备5门功课，时间显然不够。我下定决心，拼命一搏。4月4日在海拉尔一中考试，我感觉题目不难。一个月后，哈尔滨传来消息，我的成绩是415.75分，总分和数学(100)、英语(79.75)都是第一名。哈工大拟录取并来函调档案。时间很凑巧，海拉尔市公安局报请市委批准后于5月27日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同意北京市委、

清华大学党委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给予适当行政处分。文件下发到我们厂，刚调来几个月的书记张崇才对我很同情，依据他的经验，最好不要背着一个行政处分，就做出‘取消其此次调资升级资格，免予行政处分’的处理决定。实际上，那次调资升级名额为40%，按常理我和孙铮也只能上去一个人。正是因为没有行政处分，12年后的1992年，海拉尔市公安局重新下文详述我的问题，并按照最高检察院文件补发了拘留期间的工资和取暖费。

Y：你获得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照，说明人同此心，看出了人心向背。

S：1980年6月上旬，我的档案转往哈工大。与此同时，与我同命相连的同学井岗山也从吉林报考哈工大。我与井岗山素不相识，只知道他是‘北航红旗’二把手，曾跟随谢富治、王力去武汉，因7.20事件而闻名全国。冥冥之中，我和井岗山的互动成就了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Y：你是说胡耀邦批示你们读研究生的事吧。请讲讲具体过程。

S：7月初，哈工大校党委开会研究我俩的录取问题。结果常委们意见不一，8对1，只有一人赞成。当时哈工大由副校长刘仲甫主持工作。巧的是刘仲甫与井岗山的父亲光复后同在黑龙江鹤立县当领导，是‘铁哥们’，两家关系很密切。常委会那关键的赞同票正是刘仲甫的。7月21日校党委打报告，以‘有不同意见’为由向省委请示是否录取。据说省委书记们意见也不统一，因为涉及政策性问题，遂指示哈工大派人到北京请示。8月份，哈工大派人事处副处长金光和研究生科科长王舜两位老师赴京。刘校长当然最希望录取井岗山，不过我和井岗山已经牢牢绑在了一起，除政策问题外，一个说得出去、也可能说服别人的原因就是我考第一，而且成绩遥遥领先。

Y：真是无巧不成书。你和井岗山就这样在冥冥之中互动了。

S：我闻知哈工大的否定结果后给省委写了信，又到北京继续向各方申诉。厂里特意给我和孙铮一个去呼和浩特办事的差事。到京后我们首先拜访了罗老师，是我文革后第一次与他见面。随后他就给省招办和哈工大写了一封信，表明赞成录取的态度。我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通过亲朋好友给哈工大老领导李昌，给五届人大代表黄火青等送申诉材料，最后还给胡耀邦写了信。

哈工大的两位老师十分负责。到北京后他们先到清华找罗征启。罗老师态度鲜明，给他们看了那封信。信中恳切地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清华党委里林克、胡启立、汪家璆等大多数成员支持罗征启，明确表态赞成录取。然而在北航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两位老师没有气馁，先后找了高教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最后，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9月4日，阎草副主任听取了汇报，收下了材料。当天书记处开会，中纪委王鹤寿书记便向胡耀邦汇报了这件事。胡耀邦看了材料，当场做出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我不知道胡耀邦总书记是否看过我的申诉信，但我知道，他这样雷厉风行地批示，决不是随意表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他一贯理念的必然行为。关于胡耀邦批示的四句话，罗老师当年告诉过我，我记得大意是不差的。井岗山的老同学，北航戴维堤、尹聚平夫妇在其回忆录《逝者如斯》中生动、清晰地描述了在阎草家看到胡耀邦亲笔批示的情景。

中纪委迅速落实总书记批示，向清华和北航作了传达，同时邀集高教部、新华社和哈工大组成调查组，分赴吉林省和海拉尔市考察我俩的工作表现，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就是例行程序：调查组向省委汇报，汇集各方意见建议录取；随后哈工大党委议决：同意录取；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并发函向书记处和王鹤寿、胡耀邦同志汇报；书记处批复之后才发出录取通知书。

10月中旬，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来到哈工大才见到井岗山本人。我和孙铮终于在哈尔滨团聚了。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Y：这新一页揭开得真不容易，有那么多巧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你。

S：我的确是幸运的。据我所知，在全国众多造反派学生中，经胡耀邦正式批示读研究生的仅此一例。此前78、79级研究生招生时也有类似情况，他们就没有我俩的运气了。

我感谢罗征启，也感谢哈工大和清华那些老师、干部；我感谢胡耀邦，也感谢黑龙江省、北京市和中纪委的各级领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顺应了社会潮流和人心向背。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这种必然来自全国上下对文革的反思，来自团结一致向前看、往前走的朴素愿望。

当时我们做了两手准备，同时寻找可能的接收单位，研究生上不成就调动工作。我们听说华中工学院的书记朱九思是大胆的改革家，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就通过武汉的友人送去材料，等我回到海拉尔时已收到华工发来的商调函。如果哈工大不能录取，我就将去华中工学院工作。朱九思思想开放，敢作敢当，还接收了在清华整得很惨，‘帽子’尚未完全摘掉的陶德坚老师。

Y：胡耀邦的确是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

S：对胡耀邦总书记我充满感激之情。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我悲愤之极，在哈工大设的灵堂前徘徊许久，出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没能献上自己的一束鲜花，留下终生遗憾。2009年3月底，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为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实现近30年的夙愿，我们夫妇二人专程赴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墓，

到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在胡耀邦墓前，我诵读了祭辞：

泱泱中华 朗朗乾坤 幸生耀邦 千古一人
 心系天下 施惠于民 平反冤案 颠倒昆仑
 ‘人才难得 既往不咎’ 关爱我辈 将心比心
 人格高尚 党之‘良心’ 人性光辉 岌然永存

4月7日，我第一次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座谈会。发言中谈到耀邦同志对我的恩惠，多年的情感突然迸发，以致泪流不止无法自制。会上我着重谈了一个观点。当代人制史论今，常被现时的权势、名声所左右，只有历经时间的淘洗，光环褪去，后人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客观。比如，一提到‘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刘少奇、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固然这是些大案要案，但我认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胡耀邦从朴素的人性出发，拿出非凡的魄力，顺势推动对数十万‘右派’的‘改正’；进而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摘帽；‘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原罪被一笔勾销。试想，除了胡耀邦，谁能做出这个‘顺势推动’之举？这个‘一风吹’吹掉了中国的现代‘种姓制度’，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色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历史性进步。特别是，这个伟大的行动发生在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真正起到‘颠倒昆仑、扭转乾坤’的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这场‘平冤案’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惠及全国数亿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其规模之大‘前无古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胡耀邦是‘千古一人’。我相信，后人对他的评价将不会低于，甚至超过毛泽东、邓小平。

Y：你的评价很有意思，或许掺进去你个人的感情因素吧。

S：我不否认对胡耀邦有感恩之心。我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但我一直在观察、学习，加上独立思考，可能思维方式还跳不出科学逻辑的框框。你看我很会考试，说明我是个‘求甚解’的人。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似是而非，我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严肃认真的。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Y：看得出你是个认真的人。到哈工大读研和工作应该比较顺利了吧。

S：总的来说是越来越顺利了。哈工大的小环境不错，老师同学待我都很好，但大的政治形势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摆脱不掉。我到哈工大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公审‘四人帮’。政治形势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我暗自思忖，如果早在暑假期间宣布这个消息，我们这研究生还上得成吗？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世事的无常和我们的幸运。

到1982年，公审四人帮以后，又开始了‘清理三种人’，即整肃‘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个模糊的定义足以适用于任何造反派，‘二十一年内不搞运动’的承诺犹然在耳，新一轮运动已展开。然而搞政治运动毕竟已不

得人心，像哈工大就没有多大动静。这是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又一个进步。

可是，我注定躲不开政治的漩涡，它会自动找到你。1983年研究生毕业面临分配，当时哈工大刚刚转归七机部（航天部）领导，部主管部门坚持要将我和井岗山‘不予分配，退回原单位’。经过我们的坚持、老师的支援和学校的反复交涉，最终七机部做出妥协，同意我留校；同意井岗山进北京，但不能进七机部，可以自己找接收单位。后来他去了北京化纤学院（即服装学院）经管系。

Y：噢，你年岁不大，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了。

S：这个调侃的词汇说来轻松，但是当‘运动员’的滋味一般人大体会不到。孙铮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作记录员，清华来函要求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哈工大管理学院的总支书记罗家骥亲自出马外调，找到多位当事人，否定了那些重磅材料，最后按‘一般错误’收场。罗家骥在清华听到一则消息，‘清理三种人’当中清华向外发函涉及三、四百人之多，大多要求定‘严重错误’以上的罪名。罗书记对清华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哪儿有这么多‘严重错误’？

那段时间我接待过直接间接来自清华的外调好多次，有两件事印象最深。其一是关于陈继芳的外调。马小庄陈继芳夫妇分配在长春一汽，干得很出色。陈继芳是团派主持‘解放干部’的总管，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在清查5.16时就受到很大冲击，亏得怀孕六个月才没被揪回学校。这一次能放过她吗？专案组曾明确警告他俩：薄一波讲过，“清华井冈山都到哪里去了？”长春一汽的专案组两次找我调查。第一次来人态度很好，第二次换了个人，态度恶劣。他拿出几张复印件，指着说：你以前写过的材料还不认账吗？想让我照抄一遍作证言。我一看，是十几年前清查5.16时的‘交待材料’。我一下子火了，高声质问他：‘你知道这些材料是哪儿来的吗？你知道清查5.16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清华有多少人挨整，多少人自杀吗？你知道中央早就宣布那是冤假错案，要求销毁黑材料吗？……你拿张纸来，我给你写。’我未加思索，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一份证言：

看到这些清查5.16时的所谓材料，我十分震惊和气愤。在迟群操控下，清华的清查5.16运动波及数千名师生员工，有四人自杀身亡，是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中央早已定性并明令销毁相关材料。鉴此，我郑重声明：这些材料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我概不承认。除了对材料中所涉及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歉意以外，谁使用这些材料谁就要负政治责任。

写完后我签上字就摔门而去，情急之下竟然忘记抄一份底稿，但其内容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陈继芳对我说，虽然长春一汽核查办人员没能从我和王良生那儿拿到他们想要的材料，难以向上级交差，但是我们这批清华同学不屈服于薄一波等人淫威的胆量和智慧，却让他们由衷地感到佩服。

还有一次在系总支办公室接待清华的几位老师。刚坐定，一位领头的老师就说：

我们来是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你要如实回答。至于你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谈……。这本是一种审问的套话，但我一听就窜起一股无名火，当即打断他的话：你说我还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这样一来二去居然吵了起来。我们系总支书记站在旁边愣愣地看着我，不知所以。一位女老师赶忙打圆场，说到他们来之前找过罗征启等等。我听她提到罗征启，头脑冷静了下来。其实我明白，过激反应是我的‘运动后遗症’，往往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件小事，触动了某个心结，就会突然火冒三丈，情绪无法控制。于是我检讨了两句就开始对话。他们外调的目的是整团派的几位政治课教师，非要说我们搞专案、抓反革命是听了‘教唆’。他们诱导我写出证词，言里话外还带有一个意思，这样的话反而能减轻我们的责任。实际上，文革中的学生，特别是团派学生都自认为‘路线觉悟’很高，很自负，从不理会干部教师的意见。同为团派，教师与学生发表相同的见解亦十分正常，根本没有教唆之类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不可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这件事让我想起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偏见显然来自派性，然而为什么清华的派性那么顽固，那么强烈，其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呢？

Y：清华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过去有骄人的历史，文革中有激烈的争斗，直到今天又有‘大清帝国’一说，在国内大专院校中确实独树一帜。

S：以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比较，就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而言，清华与哈工大、华工这些学校大不相同。‘红教联’陶德坚老师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

文革一代清华人没有不知道‘红教联’的，那是个‘牛鬼蛇神大杂烩’，是‘右派翻天’的典型。‘红教联’连同它的发起人陶德坚老师早就被批得臭不可闻，以至于四十年以后，所谓牛鬼蛇神、右派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一位团派观点的干部在谈起文革时还不忘与红教联划清界限，强调：我们与红教联可不一样。

查看大事记，1966年10月28日，在地质学院等院校造反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清华大学红教联’宣告成立，成员包括土建、冶金、电机、自控、基础课等单位的教师。12月12日，‘红教联’扩充并更名为‘红教工’，加入了实验员、工人和职员等，一度发展到近二百人。67年1月23日，‘红教工’加入井冈山兵团。3月15日‘红教工’解散，回本单位闹革命。‘红教联’的历史沿革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唯有仅存在一个半月的‘红教联’之臭名延续至今。这是清华文革史上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我与‘红教联’接触不多，只认识其中几个老师，如林贤光、曹维涤、张家廉等，专门搞‘陈里宁案件’的朱起鸣也见过几面，与陶德坚本人并不熟，印象中她是一位温和端庄、略显柔弱的年轻老师。陶德坚是414重点攻击对象，后来受陈里宁案件牵连，被团派‘群众专政’。30多年后，在‘五柳村’网站上看到陶老师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始知她已在1997年7月离开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

月，她拼尽心血记录下自己的人生之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她的爱人陶世龙，即‘五柳村’网站的创办人，近年回国住大女儿处，与我们同在一个小区，见面机会较多，因此，我对他们夫妇多了一些了解。

Y：你介绍一下陶德坚老师吧，她可算清华文革中的名人。

S：陶德坚十七八岁时，带着‘救人’、‘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的理想，为圆自己的大学梦，从香港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怀着强国富民的梦想，一心跟共产党走，对未来的事业、生活、爱情都充满期待和幻想。我们自己亲有体会，一代代青年学生都有相似的成长过程。那个时候急需知识和人才，环境相对宽松，强过后来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所以，尽管父亲是国民党员，陶老师还能很快入党，当上学生干部，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53年8月陶德坚他们提前毕业。她作为唯一的党员拿着一摞档案，与九位同学一起从天津大学分配到清华，充实缺少师资的建筑系。她一到清华即受重用，担任系党支部宣传干事，参加了清理思想运动和肃反运动。然而，她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尤其缺少政治历练。她听到几个天大同学对党支部的意见，就原原本本向支部书记刘小石反映，结果酿成‘曹昌彬事件’。曹昌彬等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又加重处理，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这些同学蒙冤二十余年，其中一位先家破后人亡，十分悲惨。在1957年整风时，陶老师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曹昌彬等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直言提出，结果虽然没被打成右派，却在58年追加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她实在想不通，在刘小石跟前‘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

关于这个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事件发生在1956年冬季，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前，更在‘反右’之前。由‘水平很高’的刘冰同志亲自操刀，同时在建筑系还抓出英若聪等三名研究生组成的‘反党集团’。这件事说明，蒋南翔有很强的党性和政治嗅觉。1956年10月底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反应迅速，马上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裴多菲俱乐部’，在高校中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曹昌彬他们只不过对刘小石的‘宗派主义’有意见，说他对清华毕业的人亲近，对外校分来的疏远，根本不涉及党的大政方针和校党委的治校原则。深谙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蒋南翔把对支部书记的意见升格，说他们‘有纲领、有策略地进行反党活动，……企图篡夺党在建筑系的领导权’，让刘冰一棒子打下去，毫不留情，显然是借机作为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反右时所谓重灾区，如政治课，物理、外语教研室等都是‘外来户’集中之地。正因为文革前非清华出身的教师、干部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受压感，有些还受到直接打击，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多数参加到团派。

党内处分是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但对陶老师并没有很大影响。她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搞业务的，不作支部宣传干事了，就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她后来成为精密仪器机房防微震领域的专家。说起陶德坚，建筑系老师都知道她聪明能干，干活不要命。一位 414 派的老师听到她去世的消息，一句感叹脱口而出：哎呀，那是个能人呐。‘能人’是同事们对陶德坚的一致评价。

Y：文革中她必定也是‘能人’了。

S：文革中的陶老师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紧跟党的领导，先后保蒋、保工作组，结果一错再错。她糊涂了，然而又开始清醒了。原来蒋南翔、工作组都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告诉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主席才是我们的贴心人。工作组撤销后，受到‘十六条’的鼓舞和地质学院教师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的影响，她挺身而出，在万马齐喑的清华教师队伍中，率先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织‘红教联’，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曹昌彬事件到成立红教联，说明陶老师是有觉悟、有正义感的，是为人正派的，然而在政治上又是很幼稚的。一个‘漏网右派’牵头组织一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起来造反，在很多人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从此开始了她荆棘丛生的文革之路。红教联和陶德坚像是团派的软肋，先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写公开信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坚之流’，随后即成为 414 的首要攻击对象。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罗征启老师曾坦率地承认：当时 414 是把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德坚头上。

1968 年春，江青、康生指名让抓‘陈里宁事件’中‘清华那几个坏人’，陶德坚老师被团派‘群众专政’，关押了几个月。工宣队主政以后，陶老师更成为‘全能运动员’，每一次政治风波都要抓她作为背后的‘阶级敌人’。林彪倒台，她早年的学生借谈心之机鼓励她暴露思想，殊不知是惯用的‘引蛇出洞’招法，她遂被批为林彪的‘社会基础’。72 年清查 5.16 收场后，她成为全校唯一一个‘暂不戴帽子的 5.16 反革命分子’，并被‘清除出党’。1974 年‘批林批孔’时，因为‘拒不认罪服罪，疯狂翻案，抗拒改造’，又给她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并‘交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她已吸取教训不再‘谈活思想’，然而还是被批为邓小平、刘冰的社会基础。在多年的频繁批斗和劳动改造中陶老师承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连尚未‘解放’的蒋校长看到后都‘充满关怀之情叹息地说：“怎么让你一个女同志来干这个？”’

直到四人帮倒台，陶老师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不再扫厕所了；不必定期汇报思想了；进出清华园不需要专案组批准了。我无法想象，陶老师被连续‘专政’八年，在清华园是独一无二的，其间她遭受了多少摧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那瘦弱的身躯？

Y：后来在政治上给陶老师平反了吗？

S：文革结束后政治形势变化很快：落实政策，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天翻地覆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且深感愤懑的是，在陈里宁释放并恢复党籍之后，专案人员仍有说词：“定你为反革命不单是为陈里宁翻案，从为曹昌彬翻案，到你文革中的表现，说明你一贯反动，你别想翻案。”再后来右派改正，曹昌彬们平反了，文革中的案件都要一一复查。专案组还有应对招法，像对付钱伟长的右派改正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字——拖。直到1979年底，经过上层的干预，校方才发还陶老师被扣的工资，并费尽心思拼凑出一个‘复查结论’，其中列举了‘带头冲击专政机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系列错误言行’等罪名，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叫做‘不定为敌我矛盾性质’。同时拒不解决陶德坚被迟群开除党籍的问题，要‘另作研究’。‘不定为’三个字算清华的又一个创新，如同迟群在清队时首创的‘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一样。小学生也明白，‘不定为’不等于‘不是’，只为了留下一个‘敌我矛盾’的暗扣。可叹清华人的高智商都用在玩弄整人的文字游戏上，不能不说这是母校的悲哀和耻辱。陶老师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要求就有关事实对质，结果‘结论’不了了之，事情又拖了下来。

当年身为政治部主任的胡启立曾仔细听过他们的申诉，但没有正面表态；另一位外来的党委副书记挑明了原因：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因为解决快了群众思想受不了。谁能在清华自封为代表‘群众’？显然有一些执掌实权的人还想整治陶德坚。陶老师以切肤之痛认识到：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1982年武汉华工的改革家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创建建筑学专业。曾为右派的周教授想到同命相联的陶德坚，予以推荐。朱校长毅然决定接收，后来还派组织部长去清华调取陶老师的文革档案，以便解决‘开除党籍’的问题，但清华让这位部长坐了冷板凳。好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在华工，陶老师一直以没有‘政治结论’的身份顺利工作，直到退休。

在回顾了自己的‘风雨人生’之后，病榻上她一吐真情：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后记’中她再次表示：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么顶撞，造成过什么伤害，均请各位予以谅解。陶德坚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15年了。建议我的同学们再去读读这短短8万字‘素描式的人生画卷’，尽管读来颇感压抑，但你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Y：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S：在清华的政治氛围下，我认识的不少团派教师、干部，都像陶德坚那样选择了离开，包括一些正牌清华出身的。他们在社科院、北大、复旦等单位担当学术领导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当年与陶老师一起分配到清华的10名天大同学，

最后只留下林贤光一人。到九十年代，全建筑系的老教师中，非清华牌的只剩下林贤光和曾昭奋两位。

传统是无形的巨大力量，清华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可惜‘新清华’还留下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整人、排外传统。我真心希望，这个传统到我们这一代能寿终正寝。

Y：当年痛批过红教联和陶德坚的人，今天恐怕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S：是的。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必然过程嘛。‘红教联’的老对头‘万山红’战斗组的一位骨干教师就发过感慨：陶德坚死得太早了，好些事情她看在前头了。几年前，414 总部核心组的蒋南峰同学登门拜访林贤光夫妇，为 1967 年初的抄家行为鞠躬道歉。林老师很为感动。

沈如槐在自己的书中重新认识当年打击红教联的行为：我们和红教联之间在政治观点上有极大的分歧，我们认为他们的许多言行是错误的，……（但）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更不应该采取批判斗争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认真全面地研究红教联的观点，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击团派，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红教联的成员一律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他接着表示：在这里我也愿意诚恳地向那些被我们 414 批判、揪斗、抄家、关押甚至体罚殴打的教师、职工及其他同志表示道歉。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沈如槐见到陶德坚老师的爱人陶世龙先生，还当面表达了歉意。

孙怒涛在文中也鲜明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地位已一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到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 414 的极大打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我从她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Y：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听说某位 414 派的老师讲过，‘今天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参加红教联，也要“彻底砸烂”’。面对今天的现实，大家都更需要反思文革。

S：反思文革的课题很多。我们不妨仿照孙怒涛同学，从反问自己开始：你为什么自觉地投身文革？你为什么参加某一派？几十年中你对自己和文革的认识有什么改变？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回答得清晰透彻却不那么容易。那些连篇累牍下笔万言的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更要先做好这些功课，起码要给自己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回答。对亲历者而言，没有对自己的反思，你描绘的文革再生动再热闹，也势必有某种扭曲和雕琢，更何谈深入的研究与恰当的评论？

孙怒涛用工程方法论将学生划分为‘优质生’和‘差质生’，以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来解释两派的分野，虽然逻辑上显得简单生硬，优质、差质的说法也值得探讨，但从宏观上看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与所处地位密切相关。所谓‘地位’，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本质上是在社会利益链中的位置。某些年轻的研究者指出，不同群体的观点、思潮分歧背后有深层次的利益之争。我们耻于谈利，但他们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的看法是不是更深刻呢？

我前面已指出文革理论和行为充满了悖论和矛盾。毛泽东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特权阶层’问题。⁴¹⁴ 某些朋友针对这个理论有精辟的见解：老四老团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只不过老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老团强调‘继续革命’。其实，正如沈如槐指出的，毛泽东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悖论。党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专政工具，而‘继续革命’又要打碎它，犹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定不会成功。时至今日，‘特权阶层’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形势下变本加厉，体制性的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癌瘤。如今抛弃了‘革命’而代之以‘改革’，能否走出悖论的怪圈，结果将如何，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前面已提到，按统计分析，激进的造反派中以体制的批判者居多，他们——借用孙怒涛的定义属于‘差质群体’，大多在原有体制下受到压制或感到压抑，有一种变革体制的本能冲动。这种变革要求与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合拍，就产生了‘彻底砸烂’的极左口号。体制的批判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是文革的一大特征。老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激进派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派’，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右派。激进派感到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遂成为崇拜、迷信毛泽东的真诚的‘保皇派’。相反，保守派和温和的造反派以抵制文革的偏‘右’面目出现，本质上却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们在批判文革的极左方面觉悟较早，同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中的左与右，与文革前传统意义上的左与右恰好是相背的。

文化革命群众运动阶段中，全国各地几乎都分裂成类似的两大派。研究两大派的形成、争斗和命运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简单贴上各种标签，比如‘都是造反派，一概不用’，‘跪着造反’，甚至有‘疯子’、‘傻子’之说，都无益于解读文革，也不利于认识现今的中国。

Y：反思文革这个课题远没有完成。清华是不是还应该起点带头作用？

S：清华大学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政治漩涡中，先后有彭真、刘少奇、周恩来、江青、毛泽东直接插手，涌现出蒋南翔、钱伟长、蒯大富、迟群、谢静宜等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直到当今的国家领导人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清华学子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虽然官方一直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我们清华人在反思文革

和两派和解方面却迈出了较大的步伐，起到某种表率作用，也得到社会的肯定评价。当然还要承认，与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朋友相比，我们的认识水平还显得浮浅，视野还不够开阔。切实的亲身经历是我们反思文革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会成为我们的局限。对此应当有清醒、客观的认识。

Y：你怎么看清华两派的和解？

S：当年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为你死我活的‘内战’，伤亡惨重，积怨很深，和解必定是漫长的，渐进的，逐步积累的过程。我认为，今天两派和解是反思文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反思文革则是两派和解的思想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停止过对文革的思考。我从9.13事件开始，算反思得比较晚的。清华有许多人，比如罗征启老师，对文革的反思就更早更深刻，从而率先迈出和解的步伐。1980年罗老师主动为我解脱，支持我考研究生，在清华树起一个样板。1987年蒯大富出狱后，在探亲途中受到各地同学的热情接待和关照，其中就有汲鹏等414的朋友。九十年代，在最具开放精神的深圳集合了众多清华精英，他们促成了蒯大富和沈如槐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时，面对文革研究依旧被列为禁区，‘纪实文学’、野史大行其道的局面，又萌生了自己书写清华文革史的想法。2004年，沈如槐同学经多年潜心耕耘，率先出版《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2007年以后，邱心伟、汲鹏、颜慧中、王允方、张蔼玲等组成‘齐凡思’，策划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约远在美国的陆小宝同学写了后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齐凡思’即一起反思的谐音。其后，邱心伟、原蜀育又编辑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这些工作促进了清华文革的回忆与研究，引起巨大反响。

近几年好多同学以各种形式——或出版物，或网络；或完整，或片断——来回顾、思考文革。比如，叶志江的《走出文革》属于新颖的网络文学，是众多网友参与创作，并在网上发行的第一抢手货。我的中学校友金晶玮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非常年代的清华女生》，以清华两派同学的友谊为主线，参照了好多人的真实经历，描写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在清华校园网63、64社区，关于文革的回忆、思考和讨论几年来从未间断。这种氛围下，两派的骨干人物陈育延、汲鹏、李自茂、唐伟、张学琛等积极策划组织了2009年和2010年校庆期间的聚会。大家交流思想，坦诚相见，尽管还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毕竟坐到了一起，增加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开阔了彼此的视野，增进了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广度。

Y：这个过程包含了许多有心人的不懈努力，真应该感谢他们。

S：正是在2010年的卢沟桥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

等 414 朋友，见证了团派头头崔兆喜向陈楚三鞠躬道歉的一幕。后来孙怒涛搞‘追寻记’，我充当他与韩爱晶的中间人。其间我与孙怒涛的交流十分坦率，冲撞也不少。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都从对方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感受到别样的气息，同时也在检讨自己的思路。今年春天，孙怒涛发来他的回忆录书稿，让我提提意见。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而且很赞赏他的立意，所以真心实意地提了不少意见。他还希望我写点什么，我犹豫再三才答应下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和水平写书评，只能说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一篇广义的读后感，企望与大家共勉，如果真能成为引玉之砖，那就是份外的收获了。

Y：谢谢你说了很多心里话。

S：更感谢你耐心听完我的讲述。最后要说明，因为我的大多数文字资料没能保留至今，以上提到的不少人和事，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请予谅解，并望惠予補正。

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李仕林 朱光永 孙之荣 苏德昆 达瓦次仁 段云富

前 言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六年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纷纷启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包括史学工作者和不少文革的亲历者。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特别是清华两大派全面内战时期，曾经出现过与两大派不大相同，或完全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内战，主张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结束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共同完成文化大革命赋予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任务，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目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全面内战时期的一种“非主流”声音。我们称它为“第三种声音”。

在清华两派全面内战时期，第三种声音有组织的活动相对较少，加之不是当时的“主流”声音，不为研究者们重视。依赖文字了解文革的年轻一代，常常误以为当时的那一代人都陷入了疯狂的内战。其实，随着内战的不断升级，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逍遥派”队伍，他们用脚投了内战的反对票。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数众多，代表了文革中，特别是全面内战发生之后大多数人的呼声。研究文革，不研究这种声音显然是一种缺憾。我们作为清华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在清华内战时期曾经建立了具有“第三种声音”典型特征的组织，开展了活动。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们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们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清华文革中具有相同感受的同志们，回忆自己的经历，将自己所知道的第三种声音的相关情况写出来，给研究文革的学者或者为后人全面研究文革历史做参考。

一、对清华全面内战的简要回顾

清华和北大处于文革风暴的中心。清华和北大内部的派性斗争，是文革“全面内战”的典型。毛泽东主席正是从这两个学校入手，试图结束“全面内战”，同时又继续推进文革的。

1966年6月1日，从毛泽东主席下令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到1966年底，清华大学经历了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斗争变化。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成立并控制清华大学行政权力为标志，追随毛泽东主席反对“刘邓司令部”的造反派胜利了，“保守派”失败了。清华园内，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转向造反派的行列，形成了强大、统一的造反派队伍。但造反派几乎在统一的同时就发生了分歧。

清华两个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当时简称为团派或老团）和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当时简称为414派或老四）之间的内战，大体上从1967年开始，到1968年“7.27”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是不同观点的大辩论。1967年4月14日，“414串联会”成立，组织分裂正式形成。其后，一边辩论，一边吵架，内战走向激烈。在当时中央高层的压力下，两大派9月份成立联合总部。但真正的联合总部一天也没存在过，内战继续走向激化。1968年1月4日，两派发生的第一次武斗被北京市卫戍区调解、平息。周恩来总理主导的“二月春风”使内战稍事缓和，并有走向解决的迹象。但后来文革局势的变化，“二月春风”化为乌有，清华重启内战并迅速升级。1968年4月23日，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开始，至“7.27”结束。

清华历来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当它走向迷途的时候，这一特点也在全面内战中显现出来。清华内战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文斗时间特别长，足有一年以上。当时，全国都打内战。但全国各地的两大派从形成到发展，从文斗到武斗，只经历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搞清楚两大派的分歧到底是些什么，大规模武斗就开始了。相比较而言，全国各地的内战，说理的时间较短，而清华两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写了无数大字报，出版了大量印刷品，开了不计其数的大小辩论会，广播喇叭昼夜不停地喧嚣。可以说，这些论战曾经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状况在当年的中国是很罕见的。清华内战制造了系统、对立的理论，即“彻底砸烂”理论和“红线主导”理论，并产生了“理论家”。“414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樱就是曾经被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的414派理论家。

其二，清华派性特别顽固，特别具有煽动性、迷惑性。两派均声称自己不是

搞派性，而是为了解决路线问题。两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甚至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在文斗的高峰时期，清华的师生员工卷入派性的比例非常之高。文革结束以后的很多年，当年的亲历者，甚至当下研究历史和政治的学者，有不少还在评判哪一派的理论更正确。当年的派性对后来的清华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第三，清华内战牵动着中央高层，不少高层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干预过清华内战。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干预，有的是起灭火作用的；有的是起煽风点火作用的。因此，清华内战具有特别的复杂性。清华内战的最终解决，是由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著名的“7.27”行动。

二、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后，由于各地党委被夺权，加上两大派的激烈内战，全国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从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看，他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文革，同时也在想办法减轻混乱，减少破坏。对于两大派的内战，一开始，他就表示不赞成。并且，随着内战的发展，他的态度一步一步变得严厉。1967年3月，他曾经发出革命的学生们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1967年6月，毛泽东主席又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指的就是两大派的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

清华的两大派，其核心力量都是跟随毛泽东主席“路线斗争”起家的造反派，诞生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对路线斗争有特殊的敏感、癖好和惯性。两派初起时的一系列争论，用当时的标准看，确有“原则性”，甚至精彩纷呈，从而获得清华园内多数人的关注和思考。但是当这些争论发展成内战，并继续向恶性方向转变之后，人们对内战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全国主流局势，是引导各地的两大派消除派性、停止内战、促成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并深入地进行斗批改。清华的两大派漠视毛泽东主席停止内战的主张，将路线斗争按照自己曲解的方向不断放大。在全国主流局势的背景下，清华园内许多人从参与或关注争论，到逐渐走向中间或逍遥。两大派的队伍从高峰时的庞大数量逐渐缩小，中间派和逍遥派的队伍逐渐扩大。同时，清华的另一些人开始对两大派的内战进行反思，并逐渐地发出了第三种声音。

1. 内战中的忧虑和思考

在内战早期，1967年的5月，团派中出现了“五·七串联会”，主张两派能多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五·七串联会”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分别批评两派的一些错误做法，促进两派联合，促进早日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它的主张曾在校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与两大派强大的声音相比，它显得相对弱小。9月份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以后，“五·七串联会”逐渐销声了。

整个1967年，在清华园，无论在团派中，还是在414中，许多师生员工迫切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尽快走入“正轨”，结束两派分裂的局面，“复课闹革命”，按照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战略部署”，进入“斗批改”，完成“教育革命”的重任。很多人对双方“铁杆儿派”无限上纲的做法十分反感。

1967年6月下旬，时任《414井冈山报》出版、发行的负责人，414总部委员段云富在编辑出版第三期《414井冈山报》时，发现一篇名为“革命的大联合万岁”的文章后，十分高兴。在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文字修改后，用了大半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在当期《414井冈山报》上。

没想到，报纸出版后，414总部召开特别会议，严厉批判了414内部的“机会主义”。会议矛头直指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总部委员段云富，说段是投降主义，是托派。段云富据理力争，说明这篇文章是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精神的，说明大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激烈的争论后来变成了漫骂，甚至有人拍桌子瞪眼睛，指着段的鼻子，骂段是混蛋，要段滚出414。

7月初，段云富的肝炎复发。鉴于精神上的打击和生病等双重原因，段云富给414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写了“辞职报告”，辞去总部委员，离开414，回家治疗、休养。

8月下旬，从老家返回学校后，何去何从摆在段云富面前。参加打内战吧？不愿意。逍遥吧？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选择的做法。此时，原巴黎公社战斗组的几位战友、原414不满派战的老师、同学找到段云富，向段云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小组。

开始，他们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文化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关于反派性、促联合、深入进行斗批改的指示。参加学习的人时多时少，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有时也找一些教师和工人座谈。经常参加的人主要有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胡平晟、苗日新、陈左一等。经过几次学习讨论后，大家觉得学习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放着清华的一大堆实际问题不解决，光学习有什么意义。于是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工人中去，到教师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于是分头到9003，到工厂，到200号，了解情况。

几乎与此同时，另外有人开始用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论述，从理论上研究清华两派斗争，认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其伪装具有欺骗性。

1967年12月，李仕林给团派的“井冈山广播台”写信，信中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团派战士，对于井冈山广播台的作法想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可是自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以来，我们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中很少听见播送批评我们团派自己的文章，总是听到批评414的。我感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精神。……我建议以后井冈山广播台不播送或少播送骂414的文章，多播送批评我们团派自己的文章。衷心希望井冈山广播台成为执行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成为斗私批修的模范，成为促进革命大联合的模范。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话，请能广播这封来信。”这封信被井冈山广播台置之不理。

2. 发出第三种声音

大约在十月到十一月间，段云富和战友们逐渐形成了组建一个战斗组织，以反派性、促联合，进行斗批改，完成清华教育革命为基本宗旨的思路。思路形成后，大家分别以个人名义或战斗组名义开始张贴反派性大字报，并决定成立战团。

1967年12月25日，以成立日命名的1225战团正式成立。当时只有10多个战斗组参加，组成了由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和胡平晟等为成员的战团核心组，推举段云富担任核心组组长。核心组研究后明确表示：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414，而是隶属于9月份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并以《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1225战团》的名义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派性、促联合活动。因为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战团成立后的几天内就起草了上百份反派性、促联合，联合起来进行斗批改的大字报。

差不多与此同时，团派中也有人正在积极寻找已经销声的“五·七串联会”，或者同意反派性、反内战宗旨的其它团派成员，在团派中建立类似于1225战团的组织，同1225战团一起，共同发出第三种声音。经过努力，团派中的类似组织几乎接近建立，但由于主要成员临阵动摇而流产。笔者手头保留的未发表的成立宣言中称“为什么清华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主要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队伍，是因为私字，因为顽固地存在于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为此，我们一部分团派同志，怀着打倒派性，为实现清华的革命大联合而斗争的决心和意志，走到一起来，宣告××战团成立了。”

这时候，清华内战已经打了一年。虽然两大派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仍然很大，但内战初起时迷人的理论光环已经褪色，不少人感到厌倦，中间派和逍遥派大量增加，他们希望结束混乱局面，恢复清华的平静。同时，全国各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纷纷结束内战，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1968年1月11日，团派《向东支队》贴出大字报《为什么清华两派都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对两大派一年内战提出了尖锐批评。大字报说：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毛主席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团派应该立即停止对414的攻击和批评，主要做自我批评，414的缺点、错误让414自己去讲。同样，414应该立即停止对团派的攻击和批评，主要批评自己，团派的缺点、错误让团派自己去讲。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二十几天来，事情却完全相反，两派不但不停止攻击对方，不但不做一点儿自我批评，反而变本加厉，把派性斗争升级又升级，内战烟火弥漫。大字报、广播、开大会，完全听不到一点儿自我批评，听到的只是无休止地攻击对方，甚至不惜降低革命造反派的风格，采取谩骂、造谣、无限上纲等低劣手段。两派的广播里天天都在唱着高调：‘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但是，谁都不愿意做自我批评。

“我们经常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现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但是清华的两派不但不‘多做’自我批评，就连‘一点儿’自我批评也不做。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了不用，说了不做，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正在清华园存在着。”

大字报提出：

“今天，清华的两派头头为什么都不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呢？为什么都顽固地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呢？为什么要自作聪明地，正路不走走歪路呢？”

大字报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进一步质问：

“看今天的清华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人过问，内战烟火弥漫，我们不能不问：作为两派头头的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孙怒涛、沈如槐、汲鹏、刘万璋、宿长忠等同志，难道你们脑袋里的‘私’字还少了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呢？”

大字报还对两派群众提出：

“在党性不香、派性不臭，派性挡道、党性让路的清华，在两派都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的今天，难道不应该对这种危害革命的私字和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斗争吗？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吗？不打倒它们行吗？”

“有一部分同志对清华大联合的前途感到悲观，他们不想参加派性斗争，但是又缺乏勇气起来同派性做斗争。这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是完全不正确的。

“由于今天的清华园无论哪一派都还是派性高于党性，坚持党性的同志很可能暂时不被其他同志理解，可能会被骂成‘折中派’、‘调和派’、‘没有阶级斗争观点的糊涂虫’、‘右倾’、‘老机’、‘动摇分子’、‘混进老团中的老四’、

‘混进老四中的老团’，甚至可能受到排斥和打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坚持斗争，群众是会看清楚的，群众是会站到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来的。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一切悲观主义的态度都是没有根据的！”

“让我们用毛主席的教导来勉励自己，为彻底实现清华的革命大联合而斗争。”

1968年1月17日，在此前上百篇大字报的基础上，1225战团将其综合、归纳后写出长篇大字报《派性五十例》。全文从六个大类、五十个小类列举了两大派的派性，对派性进行了系统批判。这些类别涉及当时背景下两大派所有主要的争论领域，并且轮番列举两大派在这些领域各自的派性表现。这篇大字报用大家熟知的事实反驳了两派内战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说明派性不是两大派身上的个别现象，次要现象，而是两大派的主要政治特征。派性已经成为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障碍。

以上两篇大字报，是第三种声音具有代表性的大字报，阐述了第三种声音对当时清华局势的观点和立场。在这两篇大字报上都有很多留言。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声称“团派—414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杆儿团”和“杆儿四”都咒骂这两篇大字报。

团派中类似于1225的战团未能成立起来，来自团派、中间派、逍遥派而又赞同反内战、促联合的学生、教师、职工纷纷加入1225战团。这里的人不问谁以前是哪一派的，只是为了反内战走到了一起。参加1225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更没有成立各系的分部。有的人今天来了，明天可能又离开了。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核心组认为，如果两派真正联合起来，1225战团将解散，回系回班闹革命。因此，1225有过多少人，谁也没记过，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团派和414派相比，它非常弱小。经常参加活动的，大约有几十人，参加“1225”召开或发起召开的会议或活动的人数，曾经达到过几百甚至上千人。但这与414高峰时7000多人的组织，团派上万人的组织，完全无法相比。1225战团的目标是希望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以毛主席关于反派性反内战问题的若干指示为武器，结束清华内战。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人访问1225战团。他们表示，赞同1225提出的目标，但深刻质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同意1225的基本观点，同情1225的努力，而不参与1225的组织与活动。1225战团对他们表示理解，欢迎他们常来走走，聊聊。

3. 促头头活动

1968年1月16日，1225战团在中央主楼217邀请两派头头座谈大联合问题。团派方面鲍长康、马小庄等，414方面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龙连坤等应邀出席。两派主要头头，除蒯大富外，几乎都来了。1225的同志尽力做说服工作，

促进两派靠拢。但两派头头谈不拢，没什么结果。由于蒯大富没来，会后，段云富再次找蒯大富“谈心”，仍无果而终。

1月25日，1225战团专门邀请蒯大富座谈反派性、促联合问题。原“五·七”串联会的负责人栾德富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开得平心静气，双方都直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1225战团认为，清华的一年内战，方向错了，两派都要悬崖勒马，蒯大富应该为促进大联合发挥主要作用。蒯大富说，两派的斗争主要是路线斗争。团派中也有派性，派性干扰路线斗争，我也对派性很头疼。但克服派性，是为了解决路线分歧。你们把两派的斗争主要看成派性斗争，这是不对的。围绕这些问题，双方都展开了说理斗争。这次座谈会时间不短，座谈双方都能较自由地展开争论。但1225的同志们发现，蒯大富的内战观念根深蒂固，没有一丝松动。更为奇怪的是，蒯大富将这次座谈会看成拉拢“1225”进一步向团派靠近，分裂、瓦解、打击414的一次机会。这让参加座谈会的“1225”的同志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但这也让1225的同志们了解了两派头头们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了解了制止内战的艰巨性。

4. 第三种声音的内部讨论

1225战团有过数不清的内部讨论会。与当时的两派一样，1225的同志不可能不关心政治热点问题，尤其是路线是非的争论。

众所周知，文革中，路线是非是至高无上的。谁在路线上站错了队，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当时的两派都发誓自己代表正确路线，都有相当强硬的上层背景。而要在没有任何高层背景的情况下，公开发出“两派都错了”的声音，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讨论这类问题时，1225内部也是意见纷呈，难以统一。对如何处理路线争论与反派性斗争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1225本来就是非常松散的组织，这些分歧更容易影响1225战团的行动。

但1225战团的核心成员始终认为，路线问题是与非，对与错，并不以两派为界限。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各有对错。毛泽东主席虽然一直把“路线斗争”放在文革各项工作的首位，但从来也没有将全国两大派之间的斗争看成路线斗争，相反，他始终将其称为“派性”、“内战”。在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是非没有可能争论清楚。只有联合起来，结束对立和混乱，通过调查研究，通过理性地辩论，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同时，只有结束内战，才有可能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的部署往前走。沿着对立和混乱的道路走下去，对清华，对国家只能带来灾难。从这个角度讲，两派都是错的。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1225不对当时的所谓“路线是非”表态。同时，也并不认为我们自己就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在路线问题上我们提不出，也不愿意提出“第三种意见”。我们只把反派性、反内战、反武斗当成自己当时的唯一任务，紧紧

抓住不放。

1225 战团成立初期的代表作《派性五十例》，主观上站在非常“客观、公正”的立场，从两派争论的若干具体问题入手，分别指出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派性表现。后来我们在讨论中认识到，具体问题上的是与非是非常复杂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很难“客观、公正”得了。而且，不论两派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是与非，不论谁对得多，还是错得多，两大派在总体上的公开对立、打内战都是错误的。两派的总体错误高于具体问题上的对错。

为了坚定反派性、反内战的立场，1225 的一些同志还尝试对全国广泛产生的派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企图站在较高的角度对影响文革进程的全面内战这个普遍问题，有较深的理性认识。他们从革命导师那里寻找武器和力量。其研究心得经常在 1225 内部交流讨论。较典型的是，尝试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论述用于解释这种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在维护文革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5. 反内战游行

与两派头头的两次座谈会表明，两派头头的工作都很难做。但发出第三种声音的同志们并没有气馁，想反过来做两派群众的工作。1968 年 1 月中旬，1225 战团组织了全校性的反派性、反内战、促联合的大游行。大家举着标语、横幅，喊着口号，从二校门出发，途经礼堂区，经大操场、明斋、新斋、4 号楼，过小河返回主楼。游行人数从一百多人不断扩大，到达明斋后达到 300 ~ 400 人，返回主楼时仍有 50 ~ 60 人。

6. 促联合大会

为了争取两派基层群众更多地站到反派战或中间立场上来，决定以“1225”战团的名义，召开一次全校性的反派性、促联合大会。大会地点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时间为 1968 年 1 月 24 日上午。战团核心组将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去动员和组织发言，另一组负责会务，为这次大会倾力准备。会务组布置了会场，贴出了海报，刷了一些大标语。这次组织的发言，不只是 1225 的同志，还组织了并未参加 1225 但反对清华内战再打下去的一些同志。这些工作顺利进行。只剩下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广播大会海报。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广播海报，知道这个大会的人就会很少，会议可能没有多少人参加。但广播站都在两派手里，说服、争取两派广播大会海报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当时设想，争取让两派的广播站都广播这份海报，避免一派广播，尽量减少误会，争取较好的效果。

1 月 22 日晚上，原团派的李仕林、张战烽一起找到蒯大富，请求团派的广播站广播会议海报。蒯大富当时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市革委会多次到清华促

进大联合，蒯大富至少在口头上不便反对反派性、促联合的行动。所以他同意广播我们的海报。第二天中午，李仕林拿着海报去找团派广播站，但他们一看海报的内容，拒绝广播。李仕林又到静斋再去找蒯大富，蒯给井冈山广播站负责人刘泉打电话，说了半天，做了许多工作，看样子是答应了。但直到晚上还是没有广播。晚上八点，两人在主楼 217（1225 战团主要活动地点）给刘泉打电话询问，刘泉明确表示不答应。刘泉是团派总部委员，著名的“铁杆儿”老团，掌握着团派喉舌。晚上十一点，张战烽又给刘泉打电话，仍不答应。后来，张战烽愤怒了，在电话上与刘泉反复争吵，刘勉强答应，但又说广播员不答应，要给广播员做工作。直到 1 月 24 日早晨，仍未广播海报。1 月 24 日上午八点半，张战烽又去井冈山广播站，大吵了起来，吵还是不解决问题，团派广播站坚决拒绝广播。

与此同时，1225 战团中原 414 派的魏洪波、段云富也找到 414 广播站，要求广播召开此次大会的海报，但也被拒绝。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说服、磨嘴皮，或许因为他们俩人都曾经是 414 派的总部委员，在 414 中有较广泛的人脉，直到 1 月 24 日上午，大会召开时间快到了，414 广播站才将大会海报广播了几遍。好在 414 广播站直播了大会实况，全校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这次会议的发言。

大会在校大礼堂如期举行。由于知道此次会议的人很少，也许还有我们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参加大会的人远远少于预期。一千多个座位的大礼堂，坐了大约二百多人。在当时的两大派看来，这是对 1225 反派性、反内战的一个讽刺，一个打击。尽管如此，参会的人仍然按照预定议程热情饱满地开完会议。记得大礼堂后排过道上不断有人进出，有的是来看动向的，有的可能是来看笑话的。这是在大礼堂召开的唯一一次反派性、促联合的大会。

7. 迎接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原定 1968 年 1 月 5 日进校，帮助两派消除派性、促进联合。因 1 月 4 日清华发生第一次武斗而推迟了。2 月 13 日，海军宣传队正式入驻清华。由于 1225 战团同海军宣传队入驻清华的目的高度一致，1225 战团立即与海军宣传队取得联系，向海军宣传队汇报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已经做过努力，并表示愿意在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配合宣传队，为消除派性、停止内战、促进联合再尽一份努力。在同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交流的过程中，1225 战团的代表发现：军宣队将 1225 战团误解为清华的第三派，担心会因此使大联合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担心，1225 战团的主要负责人段云富等向军宣队反复表示，1225 战团发出了反对内战的第三种声音，但我们不是第三派，我们没有私利，不在大联合中谋取任何席位，大联合实现之日，就是我们解散之时。终于获得了海军宣传队的理解，并对此表示赞赏。

此后，1225 战团始终同海军宣传队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向他们报告情况，请

他们释疑解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受到他们的指点和鼓舞。海军宣传队逐渐了解了 1225，相互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8. 参加头头整风

1968 年 2 月 5 日，由北京市革委会主办的首都大专院校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学。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决各大学的派性，促进大联合而举办的。清华两大派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指定参加。1225 战团感到这是解决清华问题的极好机会，决定配合学习班，多做头头和群众的工作。

1968 年 2 月 9 日，1225 战团部分同志到新疆驻京办事处（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在地）贴出给两派头头的公开信和两条标语，希望他们认真学习，真心实意实现大联合。414 的头头沈如槐、孙怒涛、汲鹏从学习班出来，帮 1225 战团的同志贴大字报，表达他们对促联合行动的支持。此前的 2 月 6 日，团派的《井岗雄鹰学习班》请 1225 战团去炮轰团派的派性。1225 的段云富、魏洪波、胡平晟在学习班上发言，表达两派群众强烈要求实现大联合的愿望，希望头头们切实斗掉“私”字，不让群众失望。

在头头们被北京市革委会召去办学习班的同时，校内基层出现一些促联合的学习班。开始是两派分开办，后来出现两派合办的学习班。1225 战团于 2 月 12 日邀请一些联合举办学习班的单位开会，讨论形势，并研究如何进一步打倒派性、促进联合。

2 月 13 日，海军宣传队进校的当天晚上，1225 战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军宣队进校以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认为，清华出现了难得的好形势，消除派性、实现联合出现了难得的好机遇。1225 战团必须抓住机遇，配合北京市革委会和军宣队，努力做好工作，争取清华早日实现大联合。

1968 年 2 月 16 日，团派总部发出了《关于目前我校大联合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内部参考文件发到团派各战斗组学习使用。这个文件完全站在派性立场，竭力维护派性，反对党性，实际上是对抗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的内部指导性文件。

9. 解散 1225 战团

1968 年 2 月 18 日，1225 战团主要负责同志认为，鉴于北京市已举办两派头头的学习班，军宣队已进驻清华，各系两派均在举办学习班，继续以 1225 战团的方式来反对派性、促进联合，已经不合适了。因此建议解散 1225 战团，全体成员回班回系回单位，努力促进办好各单位的学习班，用新的方式为清华的大联合做贡献。这样做也是我们兑现向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曾经做过的承诺。虽然许多成员反对这一意见，认为上述看法对清华反派性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但

也认为回到各自单位，促进本单位消除派性、实现联合，是当前形势下最紧迫的任务。1225 战团的同志纷纷回到本系、本班、本教研组，参加本单位两派的学习班，促进基层组织的联合。同时，还有同志到校办工厂的工人中做工作，促进那里的联合。

10. 为“二月春风”奔走

1968 年 2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讲话说：“革”与“保”已经不是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了。当前的路线斗争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党性还是派性的斗争。这是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将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提到路线的高度。在周总理讲话的促进下，全国出现了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高潮。当时，周总理的讲话及随之出现的好形势被称为“二月春风”。这个讲话也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 1225 战团的同志们。

经过各方面大量的促进工作，工化系准备成立革委会筹备组，综合机械厂准备成立革委会，这标志着那些地方的大联合已取得相当的进展。但是全校大部分单位没有进展，校一级头头也没有进展。工化系和综合机械厂想串一些单位搞一次大行动，去促进校一级头头的大联合。经过串联，校内更多的单位决定联合发起“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大会成立了筹备处。原 1225 战团的同志负责大会筹备处的后勤和联络等具体工作。段云富是筹备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会越筹备规模越大。

1968 年 2 月 29 日，“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大专院校学习班新地点）召开。群众热情非常高，北京市委党校大礼堂被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坐满，估计有 1400 人之多。清华大学学习班的两派头头都到了会，领导学习班的解放军也参加了。学习班的负责同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讲了话。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珏在主席台就坐。两派群众（或未参加任何派别的群众）积极发言，要求头头们认真斗私批修，早日实现清华大学的大联合。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给要求联合的群众很大鼓舞。与一个月前，1225 战团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的流产的大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当天晚上，土建系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土建系两派联合勤务组。

11. 再聚集

但好景不长，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中央文革 2 月 21 日讲话，是关于“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此事与清华的团派教工组织《红教联》相关，414 是首先开始大规模攻击“反动组织红教联”的。团派为了自保，也开始行动。3 月 8 日，土建系的团派把《红教联》的陶德坚、朱启鸣、来晋炎等几个头头抓了起来。大联合的形势迅速恶化。414 准备全线发

起进攻。1968年3月9日，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准备迎战414。

1968年3月15日，由聂元梓串联发起的首都8个高校在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驻地召开第二次串联会，炮轰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骂学习班方向路线错了，是往革命小将脸上抹黑，是“修养式”的闭门思过。有人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2月2日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讲话。当时，聂元梓、蒯大富头脑已经膨胀到极点，连周总理的话都可以不听，更未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放在眼里。谢富治和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相当软弱，他们领导的首都大专院校大联合学习班事实上被冲垮了。

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原1225战团的同志忧心如焚，又重新聚集拢来，多次联系海军宣传队的负责同志谈话，寻找解决办法。海军宣传队的感受，与1225战团的同志一样，也苦于找不到办法。

已经解散了的1225战团的同志重新聚集到中央主楼217，研究挽回局势的对策。

12. 武斗前夜

中央文革有个3.15、3.18讲话，说“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提出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团派认为这是亮明路线斗争旗帜，反击414的大好机会。414也奋起反抗。反内战，促联合被两派都抛弃了。此时，北大已经乱起来了。北大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清华看来马上就要乱了，大字报区的内战气温已经大大上升。

1968年3月25日，北大发生武斗。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去北大制止武斗。

1968年3月28日，北大再次发生首都高校空前的大规模武斗。事态变化非常突然。

此时，清华不论哪一派，都在否定“二月春风”。两派都指责前段时间，首都高校出现的反派性、促联合的浪潮，说它否定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重开内战的清华园，两派的对立程度迅速超越以往任何时候。对两派的劝说已经毫无用处。

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清华两派均将毛主席的指示和两报社论为我所用，均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内战的空气进一步升级。1225战团的同志非常困惑，在主楼217开会讨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该如何理解。社论给人的印象是：不知道它究竟是支持内战，还是反对内战。一贯以毛主席公开发表的指示为行动指南，不愿依靠“小道消息”的1225战团感到迷茫。

1968年4月21日，团派的广播站全天静默，听说是搬家，准备武斗的。

此时，已经毕业分配，因故回到学校的段云富，仅找到 1225 的魏洪波。在了解了清华的最新局势和 1225 的同志们为制止武斗所做的努力后，他委托魏洪波向 1225 在校的战友问好，并请他转告见到的战友，请他们注意安全。他提醒大家，光靠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几十个人是无法制止武斗的。段云富认为，两派已经走向了他们的反面，相信中央绝不会对两派的胡闹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两派武斗队分别占领各学生宿舍楼，构筑武斗工事。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纷纷打整行李逃离学校。成千上万人的逃离，构成了清华蔚为壮观的“难民潮”。在清华百年历史上，或许只在日寇侵占华北，清华南迁时有过类似情况。估计两派留校参加武斗的总人数不足千人，95% 以上的师生员工选择了逃离。

这时，1225 战团的同志意识到，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阻止内战的继续和武斗的发生，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尽管我们到处收集情况，彻夜讨论，也想不出办法。

1968 年 4 月 23 日，清华园大规模武斗终于发生了。从此直至“7.27”工宣队进校，这就是清华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百日大武斗”。

武斗发生以后，聚集在中央主楼 217 的 1225 的同志们，愤怒、焦虑到极点，极力想做点什么来制止武斗，却又做不成任何有分量的事情，因而感到极其无奈。

4 月 23 日中午，1225 战团共十人，怀着对清华武斗的深切忧虑，走访了《人民日报》社。目的是请教 4 月 2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提到的，“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应该如何理解。这篇社论是反对所有派性，还是只反对经过“分析”后的某些派性？“二月春风”后掀起的反派性斗争是否要否定，总理 2.2 讲话是否继续适用，清华今天发生大规模武斗，这种派性是否该反等等。说穿了，是要求对 4 月 20 日社论做出解释。《人民日报》评论组的一位同志接待，群众组的一位同志参加。他们的回答模模糊糊，不知道他们对清华武斗是什么态度。

13. 无奈和焦虑

各学生宿舍楼被两派占领以后，1225 战团的同志也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宿舍，有的迁往校外，有的暂住中央主楼 217。也有不少人离开 1225 战团，或者回老家，或者停止参加 1225 战团的活动。留下来的人天天聚集在主楼 217，研究清华园的形势，寻求回答“怎么办？”。

能够想到的办法都想了，比如刷反对武斗的大标语，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但两派已经杀红了眼，谁听？有同志提出，尽可能多串联一些人，组织全校大游行，呼吁两派停止武斗。这算是一个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主意，但规模小了不行，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海军宣传队也非常支持这个主意。但终因不能找到足够多的人参加，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胡平晟等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到工厂去，动员工人起来制止武斗。便分头到 9003 和校办工厂，动员起近百人的队伍，并准备继续扩大组织，

以便出面制止武斗。但是终因力量仍然太弱小，未能实施。面对惨烈的武斗，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很是苦恼。住在中央主楼，消息十分闭塞，到处打听情况，但仍然了解不多。尤其是不知道中央对清华武斗是什么态度，极感焦虑。

武斗发生以后，414 派占领了中央主楼的 4 层以上，4 层以下仍允许“和平居民”居住，1225 战团的大本营 217 房间得以保留。但 5 月 20 日，414 占领了全部主楼，1225 战团被赶了出来，失去了最后的存身之地。1225 战团的同志，在校外能找到住处的，留在了北京，找不到的只好回家了。留在北京的也做不了任何事情，只能近距离观察清华的事态发展。这样，1225 战团事实上又被迫解散了，全体变成了逍遥派。

1968 年 6 月初，在北京房山工作的段云富接到电话，被告知两派在东区浴室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其原来所在战斗组——“巴黎公社”的钱大耀因武斗受伤“被俘”，被团派关押在 1 号楼的“监狱”里。414 托人联系段云富，希望这个非团、非 4，又认识很多团派头头的人能够前往探望，了解伤情。段云富立即请假从房山回城。只身回清华“探监”。

回到学校后，段云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于处于两次武斗之间的间歇期，学校冷清到有点阴森。二校门到礼堂周边马路寂静无人，偶尔看到一两名持矛戴盔的“武士”进出于科学馆。团派办公室主任张学森看在大串联期间战友的情分，看在老段非 4 的身份，开了路条，允许他前往一号楼探监。

1 号楼中间楼梯站岗的团派卫士们手执长矛，看了路条并不放行。他只得从侧面寻找通道。两侧的楼梯全部被床架、床板封住，好在还可以钻过去。爬上 4 楼，看到团派保卫组副组长孙茂。大概是接到张学森的电话，孙茂给这个非团非 4 的人一个“面子”，允许他去看钱大耀。并派了两个人“跟随”，一个做记录，另一个手持短矛警戒。进“监房”后，那位武士将短矛嚓的一声扎在桌上，还说了一声“老实点”！

离开 1 号楼时，段云富见到了团派保卫组组长崔兆喜，这也是段的一个老熟人。段骂了崔，说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你们这些人不懂。”探监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段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中央知道清华的情况吗？为什么不管管？让这些“无知”的青年学生这么胡闹下去怎么得了！同时，他也深感自己的无能、无力。事后又想，历史是最公正也最严酷的审判者，挑动武斗的人和犯下杀人罪行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住在校外的 1225 战团的同志，不时地会回清华了解一些情况。百日武斗发生以后，住在林学院的朱光永曾见到同班拿长矛守卫武斗工事的团派、414 派同学各一位，分别对他们进行劝说，直到他们离开武斗中的清华园，回了老家。

14. 7.27

“7.27”那天，也象往常那样，朱光永回学校了解情况。“7.27”上午10点多钟，在强斋附近，朱光永听到外面一阵一阵口号声，连忙下楼观看。从化学馆那边有几队工人手举红宝书，高呼“反对武斗！”，“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等口号，往东走来。前面一队是女工队伍，有100多人。他看工人宣传队来了非常高兴。几个月前，1225战团本来就想在清华园组织上千的师生员工举行制止武斗的大规模游行，但没有成功。现在，校外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来了，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呀！朱光永毫不犹豫地跟他们一起走，来到大礼堂前。

大礼堂前广场已经有近10支宣传队，都有军代表。科学馆东大门已打开，离门口10多米广场草地上围坐着20多个学生，头发很长，脸色苍白，体质瘦弱，听说是原驻守科学馆的414派同学。他们身后有两个大木柜，里面暂时封存着战死者。团派广播站正在喊：杨余傅的黑后台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来迫害红卫兵小将！朱光永在广场走动观看，一个军代表过来向他宣传反对武斗。朱光永说：“我就是主张大联合、反对武斗的，早就盼你们来了！”军代表就叫他带一支队伍去东区某一地点。随后，朱光永把那支队伍带到了工宣队要去的地方。

由于当天所有校门被封锁，无法出校，朱光永当晚住在了1225战团教师苗日新家中。除了在校教职员，朱光永是1225战团中唯一亲眼见证“7.27”的学生。回到外地躲避武斗的1225战团的同学，听到“7.27”毛主席派大批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衷心拥护。荒唐的武斗和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7.27”，本意是为制止清华武斗而量身定制的，其本意是一次和平行动。但由于遭到顽强反抗，“7.27”变成了一次强制性行动。为制止武斗，工宣队付出了血的代价。内战期间和“7.27”制止武斗的过程中，几十名清华学子、干部、教工和工宣队员死于非命，数百人受伤，几十人终生残疾。

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北平郊区时，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清华得以完好保存。但在文革中，由于老红卫兵的“破四旧”、两大派的内战和武斗，以及其他种种“活动”，使清华园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

大规模武斗发生以后，1225的同志们明白，清华内战正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奔向自取灭亡的深渊。没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者的直接干预，清华内战难以结束。在那种情况下，1225战团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静观局势的变化和中央高层的行动。制止武斗，结束内战，恢复秩序的愿望终因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著名的“7.27”得以实现。

“7.27”不仅强迫清华两派结束了长达1年零7个月的内战，解散了清华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而且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开始了中国文化大革命

中被称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阶段。“7.27”是中国文革的重要转折点。

三、 反 恩

从历史角度看，清华大学的内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清华内战中第三种声音的出现也具有典型性。全国各地、各单位，打内战、搞武斗的造反派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人数上却只是少数。多数老百姓厌恶内战，反对武斗，但却处于无权的地位，敢怒而不敢言。据我们了解，在全国敢于发出反对内战和武斗的第三种声音很少，绝大多数人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脱离派性内战，或远离武斗现场。而清华的第三种声音不但形成了组织，还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各种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两派组织为什么内战不止，并升级为武斗，出现“全面内战”这种怪现象？基层群众反派性、促联合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效果，而最高领导者组织的一次行动就可以中止武斗，改变文革进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文革历史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全面内战虽然发生得早，持续时间长，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的第三种声音几乎一开始就伴随内战而产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五·七串联会”（团派）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1225战团”（非团非4派）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和人员方面的联系，但它们都是清华全面内战期间发出第三种声音的组织。两个组织的正式存在时间从1967年5月到1968年2月，合计9个月。由于1225战团在1968年3月以后的再聚集，实际上一直存在到1968年“7.27”工宣队进校。所以这两个组织的实际存在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长达一年零七个月内战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第三种声音发出。在两派的内部，也不时有第三种声音产生，包括其领导层。

至于用消极方式、沉默方式不参加“派战”、内战，或与内战保持距离，不参加武斗或者反对武斗的，则在全面内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绝大多数。这是清华大学全面内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清华两大派与全国的两大派一样，曾经都是毛泽东主席支持过的造反派，是他非常看重的文革先锋队。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曾经想从红卫兵领袖中培养一批接班人，将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扶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岗位。全国两大派，包括清华的两大派，为争夺可能到来的这些权力，不惜杀红了眼。文革初期，本来被认为正义的造反行为，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两大派的丑陋行为迅速脱离了曾经拥护文革的广大群众。

毛泽东主席发动“7.27”，只是为了结束全国的内战，并不想结束文革。第

三种声音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他扭转全国混乱局面的意图，但不是他继续进行文革赖以依靠的力量。所以，清华的第三种声音，虽然曾经同海军宣传队有过密切的联系，也曾经通过当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记者向上层反映过情况，但“7.27”后，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进校后，从未肯定过第三种声音，其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清华为什么没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结束内战，防止武斗的发生，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225 的同志们也曾为此深感遗憾。如果清华当年能依靠自身力量结束内战，就不会有“7.27”；如果没有“7.27”，文革轨迹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但回过头看，全国发生两大派内战是历史的必然，它是由文革发动的目的与方式决定的，也与中央高层存在两种声音密切相关，与某些人的私欲膨胀密切相关。在踢开各级党委后的无政府状态下，不发生内战和武斗反而是令人奇怪的了。这是发动文革本身带来的恶果。清华两大派不同于全国其它地方、其它单位。清华两大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强大程度势均力敌，背后都有文革高层的支持。武斗前的文斗时间长，都制造了与文革命运休戚相关的理论体系，以显示自己是最正统的文革派。两派都目空一切，都想争当全国造反派的领袖，都想维护本派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些特点，使清华很难依靠自身力量结束内战。周总理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预，也无济于事。

我们不赞同毛泽东主席本人支持两大派的分裂、内战和武斗，从而形成全国全面内战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之初始料未及的。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们熟悉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之初、之中，以及文革晚期公开发表的各种讲话，了解他的各种公开行为。从所有这些讲话和行为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一开始就反对两大派的分裂、内战和武斗，而且不断地批评、告诫造反派，努力将造反派的这些脱轨行为引导到自己希望的轨道上来（“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之后，他对造反派的批评和告诫越来越严厉。但清华的两派对他的指示、告诫长期置若罔闻。于是，他不得不采取“7.27”那样半文半武的大规模行动来制止清华的派战和武斗。

从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发动“7.27”行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不能继续容忍造反派长时间的胡闹，并因此影响他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造反派全都打下去，因为造反派是他支持和扶持起来的，是文革的先锋。

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他提出要研究因这两个错误带来的“有所不足”方面。他没有将两个错误推给任何人，而是算在文革的帐上。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毛泽东主席本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敢于公开指出文革的这两个错误。这本身足以说明，两个错误都不是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其实，考察文革的全过程，毛泽东主席一方

面不断地发动群众，打倒他要打倒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地纠正“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种种错误。1968年他发动“7.27”，并随后结束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典型的纠错行动。当时，它符合全国的民心，顺应全国的民意，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确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研究文革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把文革中的一切错误都堆到他一个人的头上，比如说他发动了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我们更反对将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无限夸大，将其妖魔化。

结束红卫兵运动，虽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纠正“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但也必然伤及文革自身。这充分说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过程，天生就酝酿着失败。

当年聚集在“1225”旗下的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对文革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与觉悟。其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在文革初期是拥护文革、支持文革、参加文革的。其中的学生，不是在组织上加入过红卫兵，就是在思想上加入过红卫兵。1967年，清华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这些同志逐渐脱离了红卫兵队伍，公开反对两大派的胡闹。当时，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发出第三种声音，不但需要相当的勇气，而且需要对文革前景做出明确而坚定的判断。但反内战、反武斗、促联合始终没有脱离毛泽东主席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轨道，呈现了显著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后来更顺利地接受对文革的否定，包括对全国两大造反派的否定。

当年清华内战中的某些头头，四十多年后仍然宣称，当年他们之所以另立山头，就是反对文革，否定文革。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他们是先知先觉者，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我们这些亲历者看来，这只能糊弄那些不知内情的人，说轻一点，恐怕也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清华内战的发生，两大派都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两派都是错误的。这在结束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期间，早就由清华官方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当时的中央采用了清华的判断，并推向全国，得出了全国的“两大派都是错误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由官方撰写的中共党史第二卷，在描写清华武斗时，却将原因只归结到其中的一派（P798）。虽然，中共党史第二卷对文革的叙述总体上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对清华这段历史的描述，却值得商榷。

不少学者热衷文革史的研究，也有不少亲历者纷纷撰写文革回忆录。但在有些文章中，真相与假相混杂，求真与歪曲相伴，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一些描写文革的“文艺作品”更是将文革妖魔化，将参加文革的红卫兵妖魔化。这是又一种偏离历史真实，以偏概全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不仅会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还会遗患后人。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中无法删去的一页，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十分认真地总结

的一页。文革在中国发生，有其历史的逻辑。如果我们要真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以免在今后复兴中华民族的征途中不再重复类似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分析文革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不能全面地、客观地总结历史教训，走出文革的目的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想象文革的真实，只能以当时发生的事去寻求原因、结果和规律。但反其道而研究文革的文字、回忆录、文学作品并不少见。

例如，文革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自愿参加的阳光下的政治运动。但不少文字却将其描述成毛泽东主席在黑暗角落里发动的一场阴谋。这就背离了最基本的事实。

1966年8月1日～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几十年来从未听说那次会上有人投过反对票。那么，可以推论，包括参会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同志在内，尽管内心有种种想法，但仍然举手投了赞成票。这是毛泽东主席通过党的正常组织程序使文革合法化。那么，发动文革，就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而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换句话说，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文革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发动的。

既然如此，那普通群众支持文革、参加文革，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就是跟党走。这在当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现在的某些文学作品却把当年的多数群众描写成一开始就反对文革、抵制文革，只有少数有问题的人才参加、拥护、或支持文革，从而把当年的多数群众妖魔化，使文革变得不可思议。用这种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去描写一场复杂的政治运动，背离了最基本的历史真实。

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中的8月4日晚上，周恩来同志率领参会的一半中央委员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代表毛泽东主席给蒯大富平反。应全校师生员工的要求，邓小平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三句话。其中的第三句话是：“我衷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在场的两万多清华师生员工亲耳听到的。

在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有人提出党的九大、十大应认定为非法。但遭到小平同志的坚决否定。小平同志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大、十大等文革中召开的党的最高层会议，其政治决定是错误的，但其组织程序却都是合法的，不应该被认定为非法。这同遵义会议以前党的有些最高层会议的情况非常相像。

毛泽东能够在多数老同志内心并不赞成的情况下发动文革，并以党的决定的形式使其合法化，与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密切相关。这个问题至今研究得很不够。例如，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原因，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而遭受严重破坏的？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因素是不是民主集中制

被破坏的唯一原因？为什么全党那么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未能阻挡这种破坏的发生？诸如此类的最应当研究的问题，至今未见答案。

现在，一谈到文革的错误，几乎都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此，也是不科学的。这样研究文革史，没有任何进步作用。企图以全面否定毛泽东，或者否定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从而解释几十年来党所犯的所有错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其实，毛泽东被妖魔化了，共产党也就被妖魔化了。最后，必然是以否定共产党做为终结。

就文革错误而言，毛泽东主席当然应该负第一位的最大的责任，因为他是第一把手，总体方针政策是他提出来的。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尤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未能阻止毛泽东同志个人独断专行，党中央领导集体应当负有相应责任。深入分析这段历史，对于今天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也不赞同把文革仅仅看成中央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同志晚年，中央高层的确存在着权力斗争。但也确实包含着治国理政观念和路线方面的巨大分歧。直到病重、病危期间，毛泽东同志仍然念念不忘继续进行文革，并说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虽然，这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悲哀，但这也说明了毛泽东并不仅仅把它看成一场权力斗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问题，为此做了注脚。

文革初期，很多普通群众积极参加，除了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外，对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非常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主席严重夸大了干群对立，将一大批干部看成走资派，错误地使用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过的“群众运动”方式，企图以这种手段解决防止执政党从人民公仆变成“老爷”的问题，即走出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问题。但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夸大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超越了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因而选择了错误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途径。与此同时，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未能在事前、事中阻止这样的错误可能是文革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文革之后，未能深刻总结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正错误的完整、准确的措施，已经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失误。照此发展，将会给中华民族的继续发展带来更多，更为严重问题。也会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必须永远防止文革或类似文革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党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问题的确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随着执政，在实践上表现的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暴富利益集团的出现；工农大

众的相对贫困化；道德的全面沦丧；“沉渣的严重泛起”，以及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资源的严重破坏、环境的不断恶化等等事实，正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不能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办法去解决，但应当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是急需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予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花大力气研究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研究执政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恢复党的信仰和宗旨，将其变成行动；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威力；全心全意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实践的检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党内的蛀虫清除出去，重新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

注：

- 1、本文作者都是当年清华大学文革的亲历者。
- 2、达瓦次仁，男，藏族，1225战团核心组后期成员。2001年11月他曾明确表示应当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留下来。几个月后，他因病去世。达瓦次仁同志也是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为此，我们也将他的名字署上。

否定文革面面观

沈 昆

引言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有幸参加了由陈育延校友等人组织召集的原清华文革两派部分校友在宛平的小聚会，得以结识了一些当年清华两派的风云人物，特别是一些当年四一四派的领袖人物。

就是在这次小聚会上，首次近距离见识了孙怒涛学长“令人倾倒的温文尔雅”，颇有些相识恨晚的感觉。此后，紧接着又跟随孙怒涛学长追寻了一段“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的真相”。怒涛兄在追寻真相过程中所表现的严谨细密，平和宽容与对他人的尊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们之间建立起你来我往切磋交流的“思友”关系。

此次，怒涛兄在其回忆文革的大作《良知的拷问》发表之前，又承蒙抬举，不仅让我先睹为快，跟随怒涛兄的笔触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拷问自己，还盛情邀请我也写点关于文革的随想文章。

近年来，常在校友社区行走，与校友对文革问题多有讨论，尤其这几年每次回国都会参加校友聚会，当面讨论请教文革问题，对我思考文革得益颇多。想写且可写的很多，几经思忖，仍难敲定要写的题材。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薄熙来事发引致否定文革之议再成热点，且怒涛兄大作的最后部分就包括了对否定文革的讨论，尽管我们观点不尽相同，但仍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何不就此借怒涛兄这块宝地，贡献我的“两分钱绿叶”，以为怒涛兄的红花作陪衬？

此即下面拙文之来历。

中国当局与主流舆论对文革的否定

自 1977 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肯定文革的语言宣告文革结束以来¹，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后经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全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抛弃，以及后来两年经中共最高层领导成员多项变动与取消宪法中“四大”权力的条文等多种铺垫后，在 1981 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革”。此后，“彻底否定文革”与“全面否定文革”或“全盘否定文革”就成了中国社会对于文革的主流话语。

然而，经过三十余年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彻底”“全面”否定文革，人们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一朝醒来却“被发现”正面临“文革复辟”的危险²。且不论中国当前面临的危险究竟是文革复辟，还是揭竿而起的社会革命或动乱，抑或是西风东渐的茉莉花，中国官方的“文革复辟”危机感至少表明，三十几年的否定文革，效果不彰。这就不能不让人有所反思，对三十年来的“否定文革”作一审视。

那么，当局与主流舆论又是如何彻底否定文革的呢？

《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该代表了当局在改革初期形成的共识。其要点概括如下：

《决议》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根据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的，并为林彪与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所利用的，“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的错误实践。主要有以下四点依据：

1、文革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文革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自己在内的中共当局。

2、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革错误地打击了大量所谓“走资派”的党政领导干部。

3、文革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4、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

¹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于 1977 年 8 月 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文革结束，但肯定文革“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并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² 温家宝总理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重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显然，改革之初当局对文革的否定，重点有二：一是否定所谓走资派的存在，实质上是否定当权者与群众的矛盾的严重性；二是名义上否定直接依靠群众，实质上隐含脱离群众的合法化。文革的归咎对象则是犯了左倾错误并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毛泽东。

三十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 16 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 2011 年 1 月正式出版。因此，该书对文革的评论成为中共官方对文革彻底否定的最完整论述。

该书认为，文革“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该书在列举了文革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以至组织建设和社会道德等诸方面造成的损害之后，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该书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着重否定和批判了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包括权力机构的“阴暗面”，“只有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逐步解决”。

该书在批判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并总结了应从文革吸取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训之后，特别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¹。

显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论述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全面的官方论述。至于所谓“全面否定文革”或者“全盘否定文革”虽然迄今尚未见有人做过较全面的论述，但顾名思义，其含义自然是认为文革从理论到实践一无是处，无分巨细皆应一概否定罢。

既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宏大论述占据着中国社会的话语霸权，既然彻底否定文革的执政当局拥有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宣传等几乎一切方面的绝对优势资源，为什么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的努力却效果不彰？不能不让人对于种种否定文革论述背后的真实含义结合其实践加以探究。

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二十八章。

三类主要群体对文革的否定

诚如怒涛兄所言，“对文革如何评判，十三亿中国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种各不相同的回答，从彻底否定到全盘肯定，各种声音都有”。对于文革的否定，不同的人群也必有不同的含义。但鉴于中国社会各色人群之庞杂，笔者自然没有能力细析中国各色人群否定文革的真意，因此只能聊做“易粗不易细”的概括。

此处笔者将对中国社会的官员，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这三个主要群体对文革的否定作一概括的叙述，当然这三个群体也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每个群体内对文革的否定都存在着多样性，因此也都还可以细分。笔者在此无意对各群体否定文革的各种观点加以详尽的探究，因此只对上述三大群体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也就是占据各群体主流的否定文革观作一概述。

（一）官员群体对文革的否定

显然，官方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定位是这一群体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文革论述。因此，这一群体否定文革的第一要义就是否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说法，否定“走资派”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当然，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当权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定义为阶级矛盾，把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当权者定义为“走资派”，应该属于定性错误。执政的共产党摈弃了阶级斗争之后自然就纠正了这一定性错误。然而，官员群体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以及“走资派”的否定绝非仅此而已，在他们宏大叙述后面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否定当权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社会政治矛盾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徒劳无益地企图否定，这一矛盾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经济发展解决而必须通过政治的与社会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实践属性。

正是由于对执政者与民众矛盾的忽略甚至刻意掩饰，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群体几乎已经异化为对民众疯狂掠夺的寄生群体，被称之为“最无耻”的群体。“三个代表理论”的应运而生，“赋予”了当权者无视官民矛盾的“天然合法性”，使文革初期曾经被突破过的“被代表”再次强加于民众。

正由于没有正视官民矛盾，当权者倚仗手中权力以及掌握的资源优势，不仅脱离民众，往往更以民众为敌，动辄使用警察与武警实施镇压。而民众的仇官心理日重，凡有针对官方的群体事件发生，必啸聚而上诉诸暴力，比之文革期间表现的“仇官”心理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三十几年来的经验充分证明，忽视官民矛盾的严重性，或者错误地以为官民矛盾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行得到解决，就等于纵容任由官民矛盾的发展，原本以管理与被管理为主的政治性矛盾就很可能发展成政治经济思想等全方位的矛盾，甚至演化成对抗性的斗争。

官员群体否定文革的第二要义则是否定群众运动，否定直接依靠群众的必要性。如果说前述官员否定文革的第一要义主要体现为理论层面的，那么这第二要义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官员们在文革中深受群众批斗夺权之苦，自然会痛恨群众运动，视群众运动为洪水猛兽。因此，作为实践上否定文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取消文革宪法赋予群众的四大民主权力，不仅如此，还顺便取消了1959年宪法赋予工人的罢工权力。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他们严厉打击群众的结社自由，千方百计防止群众组织的出现。不惜调动大量国家资源，逆信息时代的潮流而动，封锁网络信息，打击言论自由。

不仅如此，凡与群众运动有关的，文革中出现的一些事物，即便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也大都在取消之列。比如文革前就开始的，文革中得到大力发展并且初有成效的对地震的群众监测预报，就是在否定群众运动的指导思想下，借口正规化而取消的，致使中国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大幅度倒退。

在否定群众运动与否定直接依靠群众的思想主导下，在当权者眼里，群众不仅只被当作被管理的对象，更被异化为维稳防范的对象。接访变为截访，深入群众变为事先安排好的甚至有导演的作秀，巡视与出游变成扰民。官民关系已经恶化到中共执政以来少有的严重程度。

官员群体从文革吸取的另一大教训，就是严防出现毛泽东似的强人，坚守集体领导与领导集团范围内的民主制度。防止出现强人独裁，固然不错，但由于如果临到强人坐大即将实行独裁之际再防范，显然晚矣，因此防止出现强人独裁极可能成为防止强人出头，从而开启庸人时代。集体领导与领导层的民主应该是从个人专制转向民主的进步，但如果缺乏防止领导人以权谋私脱离广大群众的强有力的制度保证，相当一部分领导者有可能通过“权”“利”交换而形成某种利益格局，一旦这种利益格局形成之后，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就将为这种利益格局保驾护航，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领导层民主表决的结果多半只能是少数明白人的失败。不幸的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恰恰就是走的这条路。

（二）知识分子群体对文革的否定

知识分子群体无疑是个极为多样复杂的群体，对文革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仅按老中青划界，由于文革际遇不同，对文革的感受与看法可以差之千里，更何况各人之间由于价值观，思维方法，看问题的角度等种种差异都必然会影响各人对文革的评价。本文无意对知识分子群体中对文革

的各色评价进行探讨，将仅限于对知识分子具有共性的否定文革观加以叙述和分析。

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共识的对文革否定的要点大致有以下几条：

(1) 大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批斗冲击，先有老一代的专家权威以及中青年的业务尖子，遭受批斗甚至体罚与人身侮辱，几乎无一幸免；后更普遍地被“再教育”，不断自我批判检查，“被”自行羞辱。加之文革初期工作组的抓反革命与革委会时期的抓“516”，受迫害者数以十万计。因此，知识分子群体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就是对文革中整肃知识分子的否定。

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并非文革所特有，甚至也不是中共执政后才应运而生的，早在中共处于艰苦斗争之中并且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之时，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已经存在，最典型的大概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共执政后，更是历经思想改造，交心运动，反胡风，及至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整肃受伤害。但人们并不认为那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肃，却总以为只是针对少数有问题者的，甚至不少知识人也在其中充当打手整肃他人，还有因此而获荣升者。

到了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被整肃，除了少数御用文人外，几乎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尽管程度不同。才有了群体的觉悟与共识，否定这种出于马列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而给予知识分子的另类对待。在这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恐怕要“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才会尽显其荒谬，才会有共识，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的“翻身解放”¹。

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中受整肃和迫害最严重的有两个时期。其一是文革初期，先有以工作组的名义出现的外来当权派对所谓“反动权威”和“修正主义苗子”进行整肃，并在学生中抓“四类”人物；工作组被批判撤出后，由当权者子弟组成的红卫兵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开始在北京大开杀戒，肆无忌惮地虐打残害各色所谓有问题的人，包括大量的专家学者业务尖子等知识分子。以后这种“暴力批判”成为范式，被扩散到全国。当年八月，文革在工厂企业事业机关等各种单位展开，这些单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单位党委抛出一批所谓“反动权威”的专业知识人才作为群众批斗对象。其二是1968年较晚时期，由各单位革命委员会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其后的抓“五一六”运动。这两个时期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2) 文革中的思想禁锢显然是知识分子群体深恶痛绝的而欲于否定文革的另

¹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先被“正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称为与工人农民并列的我国三支基本力量之一。

一要点。文革早期的工作组专制时期与革委会成立后的恢复秩序时期，确实都实行了似乎比文革前更严厉的思想控制，配合当时的抓反革命或清理阶级队伍，形成恐怖专制。但在这两段时期之间确实存在一两年的思想控制“真空”时期，造成这种相对“真空”的原因有二：思想控制赖以为组织基础的党团组织甚至行政机构在文革冲击下全部溃散失效，此其一；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冲击必然冲破1957年反右奠定的“党员干部作为真理诠释人不容质疑”的铁律，此其二。

显然，思想禁锢问题应该得到进一步探究。

其实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早在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时并非在压力下开始的，而是由于追随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把未经实践证明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真理信仰就意味着从此走上了放弃“思想自由”与“独立精神”之路。文革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多次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已经进入了思想禁锢状态，不过那主要不是由于政治压力造成的，而是通过扮演真理化身的党的“谆谆”教导，很大程度上“自愿”接受的。正是由于这种“自愿”的成分，人们往往轻忽文革前就已存在严重的思想禁锢，直到文革中（特别是后期）民粹的愚昧盲动与威权的强力相结合，撕去了“自愿”的面纱露出政治高压的狰狞面目，人们才极其痛切地感知所承受的思想禁锢。

人们之所对文革中的思想禁锢感受较强烈，也与上述思想控制“真空”期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经历最初步的思想解放有关。破除1957年来就在中国社会占据不可动摇之地位的“代表”或“被代表”（党，国家和人民被干部代表）的思想戒律，显然是也必然是当时国人思想解放的第一步，破除禁锢思想的层层囚笼，只能从最贴近我们的那一层开始，无论这第一步看起来多么渺小而微不足道，只要迈出了这一步，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就会朝着自由与独立的方向奋进，一发而不可收。

（3）文革中，文化教育科研学术等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从事的活动都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否定文革的重要一面。

伴随1966年八月红色暴力而来的民粹庸俗化“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批判“四旧”的“文化的革命”之名行破坏文化毁灭文化之实。与红色暴力一样，这一庸俗化的“破四旧”很快发挥了榜样的巨大作用，从北京传播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更由于红色暴力与庸俗化“破四旧”打着反对阶级敌人与“批判旧文化”的旗号，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出现，掩盖了其转移“文革大方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本质，以至在文革中免遭彻底清算，反而被定格为文革的招牌模式，给文革打上了最深刻最臭名昭著的印记。

这里有必要对破坏文化的庸俗化“破四旧”做进一步探究。

“四旧”的概念来源于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主要文献。1966年6月1日，

首现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以后又得到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确定与重申。其后，在1966年8月9日“十六条”公布到8月18日的不到十天之内，官方媒体与中央领导人讲话都一再强调“破四旧”的意义。于是，“破四旧”成了文革的一大主要内容。“破四旧”付诸行动，则是由于北京中学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发起的，1966年8月17日午夜，北京男二中的几个红卫兵头头经议论后，起草了首倡破四旧的文告，《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¹。由于“破四旧”运动是在红色暴力的浪潮中开始的，“破四旧”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暴力性质，反过来又极大地激发了停课失学青年的游民（或者说，流氓无产者）特质：强烈的破坏性与反文化倾向，几个月之间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害。在以“破四旧”为名的破坏文化肆虐全国的几个月里，当时仍然在位执政的当权派们，借口支持群众运动而纵容怂恿，采取了不作为的可耻立场。

这里需要指出，中共在革命过程中需要游民阶层为革命冲锋陷阵，执政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需要游民充当“勇敢分子”，因此中共当局从来没有着力改造游民，消除其破坏性。相反，中共的公有制政策实际上有助于游民意识的扩散，使更多的人接受游民特质。

另外，青年学生本以学习追求文化知识为己任，却在文革中成为反智识破坏文化的打手，表明文革前十七年的党化教育违背了教育的某些基本要义。

除了文革“破四旧”运动对文化的破坏之外，文革中教育中断，大学停止招生，科研受干扰甚至荒废，学术活动被中止，更加之政治压力下对知识劳动成果的泛政治化批判检查甚至否定毁灭，对知识分子从职业进取，到事业成就，甚至人格尊严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在这些方面造成的损害毫无疑义打断了传统的知识人才成长道路，干扰了传统的知识产品产生过程。然而，由于传统路径的阻断，人们被迫寻找不寻常的路径，经过这种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创造性自主努力而淘汰优选出来的人才，显然不是传统培养途径造就的人才可以比拟的。虽然目前尚无数据对比，但从直觉来看，似乎文革后出现的世界级或接近世界级的人才或成果都远多于文革前的十七年。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传统的知识人才培养途径与知识成果的创造途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

¹ 印红标：《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原载石刚编著：《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知识分子群体对文革的否定还着重于否定文革中种种愚昧反智的社会逆流，诸如“早请示晚汇报”的例行仪式，“三忠于四无限”的效忠表态，“三敬三祝”的会议开场式，如痴如癫的“忠字舞”；宣扬“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智论调。显而易见，文革中泛滥一时的愚昧反智逆流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恪守的理性原则以及对智识追求的直接冒犯，也是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反动。

文革中的愚昧反智逆流能够泛滥一时，一方面由于在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下各级当权者追求政绩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由于高压下的政治泛民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庸俗化而堕落成谄媚政治，致使中国社会中本来就根深蒂固的愚昧反智倾向沉渣泛起，以至上下呼应形成一股对抗社会进步的“反动”逆流。实际上，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工的8341部队领导人首倡的¹，而“忠字舞”的推广与猖獗一时也是在各地各单位的革委会成立后，由各级革委会以及驻学校的工宣队认可和提倡的。

此处有必要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与小农经济，一方面造成文化教育的落后，广大底层民众鲜有受教育的机会，致使文化知识与底层民众脱节；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官本位定位（学而优则仕）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脱离尤其严重，绝非西方国家仅仅表现为市场经济下的分工不同所可比拟。在某种意义上讲，愚昧反智倾向的根深蒂固正是中国社会底层民众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群体脱节的反弹。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有责任深思。

知识分子群体对文革的否定，自然还有与其他群体特别是下面将要提及的“普通民众”群体的共同点，诸如对文革暴力，“无法无天”等等的否定，将在下面“普通民众对文革的否定”一节中加以讨论，此处不赘。

（三）普通民众对文革的否定

普通民众包括的范围太大，我这里仅指除知识分子外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者与其他市民人等。所谓这一群体对文革的否定，当然也和前述两个群体一样，仅仅涉及该群体否定文革的共识部分，这些共识有些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

普通民众对文革的否定，大概以文革暴力最为深恶痛绝。文革暴力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批斗活动中的暴力以及人身侮辱，1966年红色暴力8月先在北京发生而后又传播到全国的大规模暴力行为，1967-1968年全国各地的两派武斗。

文革初期在群众自发的批斗活动中，一部分人对被批斗者施行了暴力或人身侮辱，绝大多数群众并不认同，但认为这些人是“出于义愤”，并以“革命不是

¹ 1967年11月13日，8341部队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见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

请客吃饭”为由而予以容忍了。正因为这些暴力行为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要当权者出面制止，很快就可以得到纠正。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活动中发生的暴力现象是中国社会潜在的暴力倾向失控而造成的情绪性发作，具有某种随机性的话，北京红色八月的大规模打人残害人致死一千七百多人的严重暴力罪行则呈现了某种组织性和明确的目的性。

人们从下面的时间表显然可以得到某种启示。

* 1966年6月初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各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运动。

* 6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现象，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当晚，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并宣布以后批斗人要经工作组批准等。工作组并把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以工作简报上报中央。

* 6月20日，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

*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并派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工作组问题。

* 7月19日，在刘少奇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

*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作出的撤消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做了检查。

* 8月1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向全会作关于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几次打断其讲话，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8月2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特别就北大“618事件”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工作组镇压群众，北大“618事件”被中央文革称为“革命事件”。

* 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是一种白色恐怖，这种白色恐怖是中央发动的”。¹

* 8月4日，拥有众多高干子弟包括中南海子弟的北京男四中发生大规模暴力批斗事件。

¹ 1966年6月9日至8月4日主要参见穆欣的文章：《关于文革初期工作组派出与撤销问题》

*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 8月5日，北京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男六中，35中，28中等中学都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这几所学校的前三所都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中南海子弟，后三所则都在中南海附近，隔墙或隔街相望。这一天，邓小平女儿邓榕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了代理校长兼学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成为北京第一位牺牲于学生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时为北京师大附中高中学生，校文革小组组长，据该校的亲历者说，刘平平“一直都很好，很讲政策”，8月5日却“突然带头打人”。

*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次日即在全国范围内公布，申明了文革的目的和若干政策问题，包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红色暴力仍然持续升温与扩展。

*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来自打死第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针对宋彬彬的名字即兴说了“要武嘛”。

其后，以早期红卫兵为施暴主体的红色暴力在全北京加速升级，至8月26日开始每天打死人数进入三位数¹，各种暴行残害折磨令人发指，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感官和心理能够承受的极限²。北京市在那个夏季的红色暴力中，据官方数字，有1772人³被打死或被逼自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北京的红色暴力很快通过“大串联”传播到全国。

当年八月，大兴县发生的屠杀事件与清华大学的“824”事件最具典型意义。

在大兴县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的短短几天里，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调查表明，大兴县的屠杀是由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策划组织的，是县公安局会议传达的所谓敌情触发的⁴。

清华大学1966年8月24日以贺鹏飞等人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勾结其他十二所学校的“老红卫兵”，以“内外有别”为借口，撕毁8月19日以来开始出现并日渐增多的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大字报，暴力查抄贴过此类大字报的战斗小组，抓人打人。十二校红卫兵还在贺鹏飞指挥下推倒作为清华标志性建筑物的清华二校门，并且强迫所谓黑帮分子（校系两级干部）和反动权威搬运残砖碎石，

1 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

2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3 转引自王友琴：《八月祭》

4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http://www.takungpao.com/history/content/2012-04/13/content_20360.htm

红卫兵们则站在搬运路线两旁用皮带抽打。当日清华园一片肃杀恐怖¹。

如果说大兴县的屠杀事件是基层当权派挑动“阶级”仇恨转移文革大方向的赤裸裸的表现，清华大学的“824”事件则是“衙内”红卫兵以暴力恐怖震慑群众并直接打击批判刘邓路线的学生所做的最疯狂的挣扎。清华824事件无愧为自1966年8月5日开始的，以文革的名义反对文革的一系列大规模暴力事件中最典型也最明显的保护党内高层当权派，震慑普通群众，打击造反学生的最典型的恶性事件。

许多证据表明，北京八月红色暴力与当局的不作为甚至纵容怂恿有关。

毛泽东的长处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为了发动群众迁就群众运动的过失就成了毛的七寸。当毛在1966年8月初急于发动群众而疾言厉色地批判刘邓工作组镇压群众时，刘邓们的衙内们（很可能得到了他们的老子们暗示，支持，鼓励，甚至直接授意）为毛准备了群众运动的红色暴力这口瓮。8月18日毛接受宋彬彬为他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就欣然入瓮了。两个多月后，毛才幡然发现文革的方向竟然已被扭转偏离而予以纠正，然而入瓮的印记之深影响之大恶果之累累已成事实，至此，毛所钟情的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已经注定失败，不仅作为证错共产主义理论的实验而必然失败，而且必因丧失人性的种种表演而与民众心目中的“虽败犹荣”无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中共十七年来的阶级教育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以阶级为定向的仇恨教育在青少年中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造就的共同情绪氛围，一经少数有心人的示范作用，许多青少年人性深处蕴藏的恶就必然被激发躁动起来，形成凶猛的暴力洪流，而无须丝毫事前的组织策划。

当年的当权派们，无论是“文革派”还是后来被打倒的“走资派”，对于红色暴力大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文革派”的谢富治在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对公安的讲话，要公安干警“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²。时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在红八月暴力问题上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8月下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对进入高潮的红色暴力深感不安，向分管清华的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竟然以“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加以推托³。而清华的“824”事件，贺鹏飞事先曾向王请示，得到王的同意。

显然，这些当权者即便不是心存阴谋的有意而为，也是由于他们把“政治正确”

1 邱心伟，原属育：《清华文革亲历》，43-48页

2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78-mcs-2002-issue-3/1250-2012-01-06-08-38-50.html>

3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337期，增刊第503期

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而宁可不作为。

虽然当年晚些时候，中央文革曾表示红八月暴力是转移文革大方向，但也仅此而已，目的是回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方向，而没有丝毫的切割意识，因此，不仅八月红色恐怖时期实际上反文革“整走资派”之大方向的种种倒行逆施仍然堂而皇之地冠以“文革行为”的正名，保持了作为否定文革最有力证据的资格，而且更由于红色恐怖八月的榜样作用使以后的平民造反运动也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严重的暴力倾向（当时的说法叫做对阶级敌人的凶暴是阶级感情深的表现），肆意抄家绑架私设刑堂等等破坏践踏法制的恶行，就都成了文革“革命行动”的不可免除的成分。而正是这些，恰恰是几乎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的。

既然 1966 年八月的红色暴力成功地陷广大向往“免除恐惧”的民众于红色恐怖之中，既然红色暴力在中共执政以来首次突破了法律限制，八月红色暴力必将给文革甚至文革以后的中国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此，笔者曾经以“单于仁模”的笔名在对章立凡先生的文章《资本为何在中国犯下两次“原罪”？》跟帖中写下如下文字：

『中共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政党，在执政的前三十年迷恋于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执著，而忘却了共产主义理论本身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与共同富裕。文革本来提供了中共回归正道的机遇——摒弃错误的理论追求而重新追求人类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与共同富裕，然而我们看到却是罔顾社会公正的单纯财富追求。这不能不认为是没有正确地总结文革经验教训而错误地全面否定文革的恶果。』

这里值得深思的是下面的路线图：

(一) 文革初期工作组对群众的压制失败之后，由“衙内”们发起打着文革旗号而大肆实行名为“除四旧”实则消灭文化，同时掀起红色暴力打杀无辜，名为对反动阶级的斗争，实则以淫威震慑群众以阻止其对于公正平等自由的追求。公平地讲，“衙内”们上述“转移文革大方向”的做法虽然在几个月内就受到批判而似乎归于失败，实际上他们比起老一辈（“走资派”们）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功。首先他们的举动得到全国范围的仿效，在几个月内把文革引入歧途；其次，由于他们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出现，打着“批判旧文化”与反对阶级敌人的旗号，掩盖了其反对文革的本质，以至在文革中免遭彻底清算。从此那些本为反文革的，转移文革方向震慑普通群众的，破坏文化打杀无辜的暴力行为被定格为文革的招牌模式。

(二) 文革失败，被全面否定。对于广大普通群众而言，否定文革的最主要动因，就是(一)所述的那些破坏文化打杀无辜的文革“招牌模式”，也是否定文革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而当权派门实际要否定的则是群众对官员的权利，包括监督权，发言权，更遑论任免的参与权等等。文革的全面否定，官员们当然随了愿，六四之后更是肆无忌惮了。而广大群众却忘记了曾经追求过的公正平等自由，再次逆来顺受地接受沉默而被动的角色。

(三) 经济改革成了缺乏监督的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官场腐败，血腥掠夺等种种社会恶相重现中国，大行其道。以至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演变成为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这当中，当年的“衙内”们大多成了当今中国最富有的人们。¹

很显然，文革之前那几年日益拧紧的阶级路线发条，给予男女“衙内”们越益增长的动力与欲望去追求其特权利益，终致以反动对联为典型标志的极端发作，虽然因受到压制而一时失败，但经过“彻底”否定文革后，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政治上，更扩展到经济领域。

红八月的暴力风潮之后，暴力就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似乎不暴力就不革命。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化为武化革命就难以避免了。1967至1968的两年里，全国范围内多数群众组织经历了两派斗争激化并进而升级为武斗的过程，动用了从大棒长矛之类的“冷兵器”到各种枪支大炮坦克军舰等现代“热兵器”，造成“全面内战”的“天下大乱”，至少十几万人在武斗中身亡²。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给民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困难。

除了上面叙述的八月红色暴力的榜样作用外，使文化革命异化成“全面内战”的武斗，大致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1. 中国具有推崇使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以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历史。中共掌权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思想在文革前可谓深入人心。

2. 中国社会没有摆脱“弱肉强食”的兽性，崇尚暴力的现象在中国根深蒂固，极其普遍。

3. 文革爆发前几年，中共大力宣扬“斗争哲学”，使那一代人崇尚斗争轻忽妥协，因而在文革两派争端中不愿意妥协。

4. 作为政治起家的政党，中共在全国大搞泛政治化，任何认识上的不同都极可能被政治化，并进而上升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泛政治化外加夸大阶级矛盾的结果使妥协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外加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个体生命的轻忽与对集体的过分尊重与服从，中共执政之后更是在全国人民中不遗余力地压制个人考量而宣扬集体主义，以至一代人普遍接受“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生命”这样的观念。因此，一方面可以为了本派的利

¹ 单于仁模对章立凡文章《资本为何在中国犯下两次“原罪”？》的跟帖，后被网友称为“文革失败路线图”，见多维网博客：<http://blog.dwnews.com/?p=50526&ci=351715#comment-351715>

<http://blog.dwnews.com/post-50553.html>

² 参见金鐘的文章：“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數”，原载《开放》杂志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008>

益或维护所谓正确路线不计个人生命的安危而参加武斗，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了尊重“群众运动”以及“发动群众的需要”而容忍对“敌人”的暴力，接受“敌人”做出的牺牲。

6. 中共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通过阶级教育大力宣传阶级仇恨。由于泛政治化与夸大阶级矛盾，文革两派的分歧往往被视作阶级对立的表现，如果对方组织结构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就会成为煽动阶级仇恨的目标，广西武斗中发生的对广西“422”的屠杀，湖南的道县屠杀，都带有明显的煽动“阶级仇恨”的印记。如果说，在中共执政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需要“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强化其阶级意识，是完成土地改革终结封建制度残余之必要的话，文革前夕伴随四清运动的新一波强化阶级意识则多多少少成为各级当权派转移聚焦于官民矛盾的注意力之方便手法。

尽管各地各单位发生的武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以上所述应该是造成文革武斗的广义根源。

对文革暴力的否定当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

普通人群体对文革的否定还聚焦于对文革乱象的否定。文革大乱不仅大大增加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甚至遭受恐惧的威胁与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极大地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轨迹。生产停滞，物质匮乏，人们的收入长期原地踏步。职工十年不长工资，绝大多数1958年入厂的工人直到1973年还是二级工，谈到家庭负担，那真是怨声载道。农村经济被统死，连地里种植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不仅富裕仍然遥不可及，很多农民还仍然在饥饱之间挣扎。旧秩序打破之后，新秩序迟迟不能建立，建立之后也并没有带来早前许诺的进步，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被阻断。人们不能不否定那些没有兑现的许诺，并重新审视一切。

普通人群体对文革的否定也还表现为对文革中泛政治化与政治庸俗化的厌恶。普通民众对于文革中的泛政治化在文革当时就多有微词，冷言调侃消极对待，文革结束，文革的泛政治化做法自然被否定。文革中凡事都要讲政治，人人都“被参与”政治，事无巨细动辄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大批判月月搞天天搞。致使民众先是高度政治紧张，紧接着就是政治疲劳，而大众政治本身只能落得个庸俗化形式化。普通人实际上倾向于抱持分工的传统，习惯于政治乃是政治家的事务，看重的是透过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背后的实际利益，工人对此有个说法：“别总是务虚，务点实行不行？”就是在文革早期人们被“当家作主”的动人口号激起空前的政治热情之时，人们也往往带着疑惑与犹豫，“务实”的长期缺乏最终导致对泛政治化的否定。正因为如此，文革之后普通人更加紧紧盯住实利而鲜有政治热情高涨了。

(四) 对文革“无法无天”的否定

文革期间一切以政治为准绳，政治为最高准则，法律自然也不例外，必须服从政治。以至旧法被弃新法阙如而法纪崩毁，执法机构彻底撕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面具，成为人治的工具，人治之下难免“无法无天”。

尽管中国社会各群体对文革法制之缺失与人治之“无法无天”的认识可能不同，但对否定文革缺失法制的“无法无天”却存在共识。

作为社会规则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为社会成员提供概括而普遍与严谨的行为规范，以保证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成员得以共存，避免由于社会成员的矛盾冲突激化而导致社会的崩溃。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与义务的行为规范，其首要特性就是公平与正义，非如此，法律就无法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就会受到某种社会势力的挑战与冲击，甚至遭受毁灭的厄运。

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法律向权力倾斜的惩罚。文革前法律向权力的倾斜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法律屈从于权力，法律为权力服务，权力当局认为某公民有罪，法律机构就会判处该公民某种刑罚，比如某工人若被认为调皮捣蛋，经党支部决定就可以被送交法院判处劳教；二是法律并不能保障公民依法规定的应有权利，比如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权力从来都要看当权者的眼色，如果当权者不允许某种言论或结社，法律决不会出面主持公道。正因为十七年的积怨与不满，文革早期才会出现“砸烂公检法”的狂飙，造反的群众组织也才一度拥有“自行执法”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欲望绑架拘捕与关押所谓“走资派”及其他各色斗争对象。这当然是“无法无天”的乱象，然而公道地说，民众也可以法律为私器总比只许当权者以法律为私器来得更接近于公平。

虽然把法律作为私器掌握于自己手中“自行执法”可以获一时之爽，毕竟此例一开，人皆可为之，难免自己最终受罪遭难的结果。文革恰恰证明了这种环环相报的现世报，几乎所有整人者都未能逃脱最终被整的结果，几乎所有以法律为私器而无视他人合法权利的无一例外地经受了自己合法权利被践踏的恶果。

因此，痛定思痛，还是须要确立公平正义的，为全社会所尊重的法律体制。

对于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反思文革，网传中共“第一智囊”，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先生曾经写下如下文字：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

制提供了依据。”¹

王沪宁指出，“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¹

王沪宁在具体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没有能力阻止文革发生时，又特别指出，“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与“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这样两条法律与法制方面的原因。¹

应该说，王沪宁先生的这些文革反思显然比当局迄今公布的彻底否定文革叙述更加深刻。尽管王沪宁先生把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局限于缺乏“阻止文革发生”的能力，毕竟文革的发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进一步思考，就不难得出“彻底否定文革则应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结论，而这恰恰是文革试错的目标之一。

王沪宁先生关于中国缺乏宪法保证与独立的司法体制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只是王先生没有进一步展开话题，有把违宪违法的问题局限于文革的切割之嫌。其实，文革中的违宪违法既非空前更无绝后。文革前，即便不计 1954 年宪法颁布前在土改与镇反运动中造成大量冤案错案的违法行为，自反胡风运动起，1957 年的反右，59 年的反右倾，62 年的“小说反党”事件等等，哪一次不是违宪违法？文革之后，从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六四”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以及此后常年持续不断的打压异议人士，包括绑架与非法拘捕监禁等，加之非法暴力拆迁侵占公民财产，绑架关押上访维权人员等等丑行，又有哪一年哪一月停止过违宪违法？

所以，既然缺乏宪法保证与独立的司法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缺陷，违宪违法就绝非文革所特有。只不过，违宪违法原本只是当权者的特权，受害者则往往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人。而在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的的文革运动中，普通人群也破天荒地得到机会过了一把违宪违法的“瘾”，触痛了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加之文革初期刘邓路线下当权者主持的抓反革命与打黑帮批权威，文革前期两派斗争中群众组织的互相整治，以及文革中期革委会的实力当权者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抓五一六”运动，文革中违宪违法的受害者就绝非总人口百分之几的少数可言了。正因此，文革使违宪违法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全社会之痛，对否定文革的“无法无天”形成了社会共识（尽管各群体对于“无法无天”的涵盖认识存在很大出入），为国人实现确立宪法保证与建立独立司法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¹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6 年 5 月

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中共当局与中国社会主流舆论宣布彻底否定文革迄今已有三十年了，然而重庆事变一夜之间却令当局某些政要以及社会主流舆论惊呼面临“文革复辟”之危险，似乎文革不仅未能被彻底否定，还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无疑可以看作当局与中国主流舆论正式承认，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事倍功半，未能奏效。那么，什么原因致使“彻底否定文革”收效不大呢？

有一派意见认为，未能“彻底否定文革”是由于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没有“清算毛泽东”所造成的。果真如此吗？

暂且不说，三十年来毛泽东早已被简化为装饰中共当局权力来源的五色彩旗之一，而其思想理论无论对错有用与否皆已被束之高阁，批毛清算究竟有何实践意义令人怀疑而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割裂与矛盾激化作用令人警觉之外，毛的文革思想究竟有哪些还被相当数量的某些民众（或称“左派”）流连称道？人们倒是首先应该探究，当局真的实践“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综合上文所述，中国社会各群体否定文革的主要共识集中于“违宪违法”，暴力泛滥，以及“思想禁锢”这三点，尽管笔者已在上文指出这三点并非文革所特有，不妨还是依照中国社会各群体的意愿对当局的实践作一番检视。

首先，中共作为政治组织竟然从来没有注册过，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违宪违法了。高层人物如胡耀邦赵紫阳的被整肃，不禁仍然缺乏宪法保护，而且违背党章程序。其次，当局从未兑现过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屡见不鲜的倒是当局使用各种卑劣手段打压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更遑论司法过程中的以言论治罪，先拘押后取证，刑讯逼供等普遍存在的非法执法行为，以及各级当权者对异见人物或维权民众实施的绑架拘押暴力侵害等违法行为，三十年来几无中断。事实证明，当局不仅没有在实践上彻底否定文革“违宪违法”，相反，却仍然奉其种种传统的或“新开发的”违法手段为统治民众的利器，仍然视法律为私器。

其次，暴力仍然是中共当局对国内民众实行统治的支柱之一，中共当局迄今为止从未在法律上禁止对正当维权的民众使用军事力量，使用保安、警察以至武警（准军事武装）攻击镇压维权民众几乎成为地方政府处理民众维权群体事件的首选。中国至今缺乏特别严惩暴力犯罪包括国家机构暴力犯罪的法律条文，在政府机构处理与民众的矛盾的过程中常常借助黑道使用暴力威逼民众屈从，司法办案过程中使用暴力刑讯逼供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足见当局既然仍以暴力为维护

内部统治的利器，怎么可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出现的种种暴力行为，杜绝以暴力解决内部分歧的危害呢？

至于思想禁锢，当局仍然习惯于一元化思想，公然宣称的“五不搞”其中之一就是“不搞思想多元化”。三十年来，人们不仅经历过“清理精神污染”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这类倒行逆施的“运动”，更见诸了“敏感关键词”、网络封杀、舆论导向、组建网评员队伍等种种现代版戈培尔行径。当局为了控制网络言论与信息流通，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发网络的警察功能，以“技术创新”对抗信息自由的世界趋势。甚至连文革式表忠心般的“与 XX 一致”、“听 XX 指挥”的效忠表态也在官媒上大行其道。不仅当局不肯放弃使用思想禁锢的枷锁，就是许多知识精英（左右皆有）也仍然习惯于禁锢反对派的意见观点，动辄打棒子扣帽子，甚至不惜借助当局的专政力量使对手封口。如果说文革以及文革前的思想禁锢多多少少带有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迷茫色彩，当下的思想禁锢则是为了利益维护而实行的赤裸裸的禁锢，因此当下的思想禁锢乃明知逆世界发展的潮流而为之，是比文革的思想禁锢更加不能容忍的。

三十年来真正彻底否定了的文革特色，大概只有在文革中曾经短暂出现的民众对于当权者的权力，包括批评权、监督权与选择权。对于这一点，当局在否定文革伊始就下大力否定民众对于当权者的权力，以至如今不仅民众毫无权力置喙当权者的公众事务，当权者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官老爷。

由此可见，当局三十年来的“彻底否定文革”，不过是否定文革那些不利于当权者的特色，而对那些社会共识的弊病则把文革实行切割，仅仅否定文革那段，文革前后的来龙去脉则依旧保留，以便仍然作为维护权利的利器，当然也就没有“彻底”可言了。

文革能彻底否定吗？

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收效甚微，其原因除了当局在实践上并未彻底否定之外，还在于文革不能彻底否定。

文革作为几乎涉及中国全社会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必然要在文革中充分表现自己，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推进或阻止文革。因此，文革中发生的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或事件，有些可能是顺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些则可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者不应否定而应进一步予以推进，后者则应予以否定并找出其根源与后续，以便杜绝其今后继续危害。因此，否定文革必须对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不加分别，笼而统之地彻底全面否定文革的一切，势必如同倒脏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那样，不

但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与肯定，反而会招致反对与批判。

下面笔者愿就文革值得且应该肯定的方方面面加以叙述与分析。

首先，根据中共当年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与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和指示，以及文革早期的实践过程，文革区别于中共执政以来其他政治运动的根本特征在于，文革是民众以民主权利整治脱离群众的当权派的社会政治运动。依照毛的文革理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突出表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显然，文革理论这一论述实质上揭示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包含所有现代国家都面临的一大问题，即，官民矛盾。文革理论在这一点上撕破了共产党当权者“天然”代表人民的面纱，具有深刻的意义。当然，文革理论是马列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延续，是以阶级革命为主旨的。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民矛盾套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夸大了矛盾的对抗性，导致矛盾错误地定性为敌我矛盾，以至文革理论关于通过人民群众使用民主权利以思想文化革命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的设计，由于矛盾激化而异化为激烈的对抗性斗争，并陷入必须不断进行阶级革命的死循环。

官民矛盾的本质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分工的不同，是任何管理系统都普遍存在的。现代发达国家解决官民矛盾的方法是把管理机构转化为服务性机构，人民的民主权利则是这一转化的保障。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掌控了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由于生产资料名义上的所有权公有，而实际上的支配权官有，当权者在社会上占据绝对优势而民众缺乏制衡的手段与资源，当权者仅仅出于职业考虑的最优化也很容易脱离群众，加剧官民矛盾。

因此，文革直指官民矛盾，并以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的思路是正确的，不应否定。否定这一点，势必导致掩盖或回避官民矛盾，导致对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拒绝，其结果必然是权力机构脱离群众之倾向的失控与官员腐败的泛滥，正如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其次，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曾经实行过很认真的以“战斗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民主制度，每个战斗小组由观点相同的人员志愿结合而成，推举出一两名有声望和信誉的领导人（战斗小组长），战斗小组上一级的机构（如分部或支部，分队或支队等）则由战斗小组长联席会议选举，总部机构则由分部一级的委员会议选举。凡有决策事项，也都经由战斗小组、战斗小组长会议、分部领导人会议、以及总部委员会议等逐层讨论决定。这种逐层递进的民主机制，类似于北京独立学者王力雄先生提出的“逐层递选制”¹，其优点在于选举人熟识被选人，因此较

¹ 王力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出版社，1998

少盲目性，而且这种民主机制更偏重于理性共识，因而优于西方的普选民主制。显然，文革的这种民主尝试是有益的，可以为今后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宝贵的经验。文革民主的失败，主要由于阶级斗争理论主导下对政治分歧的夸大与绝对化，以及国人缺乏对于民主程序的敬畏，在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之后，这两者就都可以通过教育解决。因此，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发生的民主尝试不应全盘否定。

再次，文革早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突破了批评或反对某一级中下层党组织就是反党的紧箍咒，也破除了某个党员代表党的神话，伴以“要关心国家大事”的热切愿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就此起步。当然，考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解放历程，不能超越历史条件。文革前的十七年形成的思想禁锢绝非只是一层铁幕或一只牢笼，而是层层叠叠多层次多重多方面的，而且这些桎梏并非以暴力为背景强制施加给我们的（除极少数人之外），而是在接受教育的形式下我们自愿接受形成的。因此，在文革中人们开始破除思想桎梏时只能从最低的层次开始，而不可能指望一下子就完全摆脱十七年甚至更长久以来形成的思想桎梏达到完全的独立思考与思想自由。正如一个被囚禁在层层牢笼里面的人，要获得自由只有从最贴近他的那层牢笼开始一层一层地打破牢笼才有可能。凡事开头难，国人的思想解放在文革中只迈出了一小步，但只要迈出这一步，国人的思想自由之路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另外，破除思想桎梏的牢笼，还存在工具问题。十七年的“罢黜百家家独尊马列”，造成国人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破除思想牢笼的工具除了马列毛，几乎不可能指望其他。因此，文革当中人们的独立思考以及各种思潮尽管幼稚甚至荒谬，但却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中学生由于上山下乡较少受控制，外加从各种途径获得的受控书籍资料较多，比大学生更具备思想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改革中出现的思想成果很多都与那个时期中学生中的思想交流有关。

对国人而言，尽管文革开启的思想解放以马列主义毛思想为指导与工具，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但其结果必然突破马列毛，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思想解放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规律，不会被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约束。因此，在文革初期起而响应官方的号召参与文革的人们，在“四五”事件时起而反对官方的文革就毫不奇怪了。

因此，国人在文革中起步的思想解放，尽管步履艰难步幅不大，仍然应予肯定。

再其次，文革中由于特别强调干部联系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以至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中高级当权者都能深入群众，直接与群众接触，解决群众的问题。使很多干部形成了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要务，为群众负责胜过为上级负责的工作作风。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专业地震工作者预测到即将发生的大地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布地震预警，然而距唐山市一百一十五公里的青龙县革委会，自主采纳地震预报，“公开向全县人民广播，组织预防。结果，当唐山地

震发作，虽然有七千三百多间房屋倒塌，青龙县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一人。并且在震后五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就赶赴唐山救援。一九九六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¹ 相比于今日之当权者们，一切以对上级负责为第一要务，以个人的升迁为重，大搞政绩工程，扰民掠民。难道不正表明了否定文革期间出现的干群关系新气象的恶果吗？

最后，笔者认为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鲜事物也不宜一概否定。

(1) 文革期间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取得了弥足称赞的成就，成功地预报的大规模地震，计有1975年2月4日的辽宁海城大地震，1976年5月29日的云南龙陵大地震，以及1976年8月的四川松潘、平武两个大地震。这些成就是在文革时期确定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地震工作方针指导下获得的，这当中，群众的广泛参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革十年建立了强大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网，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十万人。但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思路下，群测群防队伍被判为‘科学性不足’，于一九七九年开始整顿，到一九八〇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文革期间，四川是地震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文革后历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不足千人，后来竟然是一个不留。”¹ 如果坚持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方针，保持健全文革时建立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网，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危害绝不至于如此惨烈。

(2) 文革期间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走“626”道路，到广大农村与偏远地区送医送药，并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中国的人均寿命在文革期间从1967年的59.58岁增加到1977年的65.38岁，成为中国在消除大饥荒影响之后人均寿命增长最多的十年，如下面图1所示。也由于得益于文革期间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的人口死亡率在文革结束后两年发生大幅度下降，使全国人口死亡率得以较快地下降，如图2所示。显然，文革期间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对中国农村的健康卫生所做的贡献，不容否定。²

(3) 文革期间尝试的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的大学招生方式，虽然存在忽视培养知识人才基本规律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学生应该具备社会实践经验的方向并没有错。实际上，那些在大学学习中较好地掌握了科学知识的工农兵学员在以后的工作中往往有出色的表现，而上山下乡那一代人在恢复高考招生后经过较严格的大学训练，涌现的优秀专家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常规大学生成就的人才都多。这

1 朱健国：《地震预报改革失败随想》http://blog.boxun.com/hero/200810/zhujianguo/1_1.shtml

2 李毅：从人均寿命看毛时代和改革时代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8-23/4263.html>

些都表明，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有助于人才的培养与形成。因此，大学招生需要参考学生的社会实践，不应予以否定，而应该加以研究，寻找适当的方式。

[Health Statistics >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total > years >](#)
China (historical data)

Date	Amount	Rank	Definition	Source	Printable version
2005	71.83	#80			
2004	71.44	#46			
2002	70.66	#94			
2000	70.26	#96			
1997	69.66	#93			
1995	69.4	#87			
1992	69.01	#89			
1990	68.87	#89			
1987	68.67	#86			
1985	68.33	#83			
1982	67.81	#80			
1980	66.84	#78			
1977	65.38	#80			
1974	64.33	#26			
1972	63.18	#77			
1970	61.74	#79			
1967	59.58	#80			
1963	50.17	#23			
1962	54.09	#93			
1961	40.52	#27			
1960	36.32	#163			

DEFINITIO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years a newborn infant would live if prevailing patterns of mortality at the time of its birth were to stay the same throughout its life.

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图 1. 中国历年人均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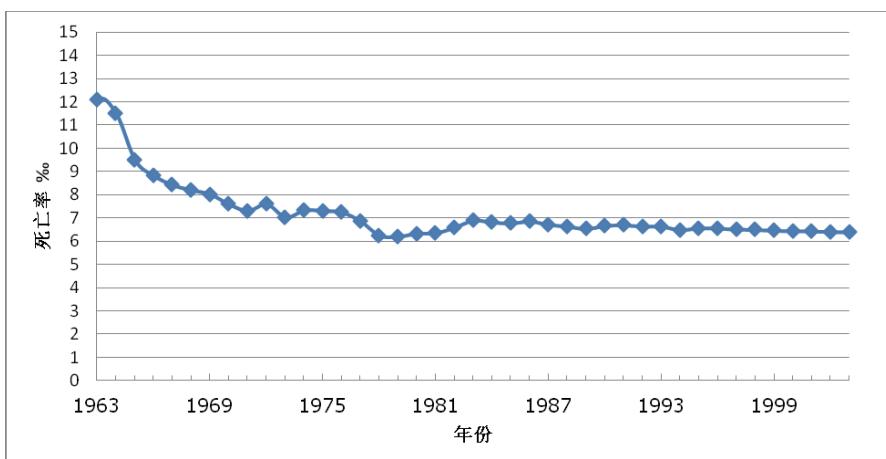


图 2. 1963-2003 年中国人口死亡率

文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应该不止笔者提到的上述几项，其中有些是直接有益于社会的，有些则是有益的尝试，都不应该简单地一概否定。

综上所述，文革显然不应该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必须加以具体分析。

否定文革必须挖掘根源，阻断后延

文革作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物的主观愿望。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顶盛时期而面临“向何处去”的彷徨时，文革作为赫鲁晓夫向右修正马列的共产主义理论而遭受失败的互补，向左进一步推进马列主义的革命就成为检验马列主义的必然逻辑了。因此，文革反映的种种弊病大多都与共产党几十年上百年的理论与实践有关，体现了一种历史传承关系。

此外，文革发生的国际大背景是世界人权运动的高涨，这不会不在中国的文革中有所反映，文革中人民群众曾经力争的对于官员的批评言论自由、监督权、选择权应该就是争取人权的表现。尽管由于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与官本位文化，中国人的人权概念既微弱又模糊，但文革中表现的民众争人权的雏形以及随之而来的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事物应予发掘肯定。

文革又是一场空前复杂的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文革中顽强敌表现自己，文革中发生的事物与现象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否定文革必须具体分析，同时，否定文革又不能仅就文革论事。而必须挖掘文革中各种弊病的根源，发现其历史传承关系，以便阻绝其改头换面继续延续。

从上述原则出发，我们否定文革显然不能以文革止步，而必须触及文革“试错”已经直接或间接证错了的那些一度被尊为真理的理论，纠正出于这些错误理论的实践。

追根溯源，中国政治体制难以避免违宪违法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执政党拥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包括高于法律与宪法。在这种执政党至上的情况下，宪法与法律又何能成其为宪法与法律？不过是执政党的工具罢了。

中国执政当局不愿对辖下民众放弃暴力，无非还是专政思维作怪，不认为政权应该为全民服务，而总是惊魂不定比比皆是假想敌，当然也就“实行专政没商量”。

思想禁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元化思想的根深蒂固，不能容忍不同思想。其实，中国深受一元化思想之害，文革以后已成不争之事实，况且思想多元化在进入网络时代后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当局却力图螳臂当车，可叹可悲啊。

总之，文革最为人诟病的弊病都根源于中共的基本教义，并因得益于中共至

今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¹而得以在文革后继续为祸中华。因此，“四项基本原则”不除，就难以保障“文革弊病”不再出现。

否定文革还必须触及文革试错的终极理论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

在苏中等国实践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特征的马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快实现工业化的成就，但都发生了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的情况，并由于经济发展失衡而出现过大饥荒的危害。面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这些问题，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并且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前提下，显然只能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困难是由于管理人员的问题，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因此，通过文化革命，由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批评监督管理人员，净化管理者的思想，就成为值得尝试的途径。

然而文革的失败表明马记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管理人员的思想“无产阶级化”加以解决。文革中造反派夺权后就会异化的事实表明，革命者成为管理者之后发生的异化绝非只是思想的原因，而有其更为根本的职业分工的原因。

进一步思考就不难发现，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悖论就在于，名义上所有权的公有与实际上支配权的官有（私有）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不仅使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公有制下社会成员与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荡然无存，而且造成了权、责、利的不相适应，拥有支配权的不必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买单的总是拥有名义所有权的公众，获利则大头归管理者所有。因此，这是最不负责任的经济制度，也就完全没有公平可言。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反而有其公平合理的一面。

所以，否定文革也必然应该否定文革所证错了的马记社会主义。

**** ***

任何一种社会弊病，当其危害仅仅涉及少数社会成员时，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只有在其危害波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时，这种社会弊病才会引起社会大多数的公愤，才有可能“寿终正寝”。文革正是这样一场社会大变动，共产党执政的种种弊病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危害涉及面之广可谓空前，为中国消除这些社会弊病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文革的全部正面意义本来在于以其证错的负面结果告别马记社会主义，实现全面改革。

如果文革的结束是顺着“四五”运动的自然走向，经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文革的否定应该是社会各阶层反思的共识，文革的经验教训应能

1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不允许争论的四个议题：

1.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2.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
3.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得到正确的总结吸收，中国的改革则应能既达到高速的经济发展，又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

然而，文革的终结实际上却是以权贵集团内部的武力政变的形式实现的，实质上是一部分权贵摘取了即将成熟的桃子，成为权贵们的囊中之物。因而，文革的否定似乎成了权贵们的恩赐，也就必然以权贵（原“走资派”）们还乡团式的清算方式进行。其结果就是，文革前既已存在而文革中推到极致的那些有利于权贵统治的一党专制弊病不但没有根除，反而发扬光大，甚至借机清算了文革前尚为共识的那一点公平正义。因此才会有今日的畸形社会发展，才会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脱节。

正确总结吸取文革教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陆小宝

2012年元旦刚过，孙怒涛同学寄来一封信，信上说：“在你的敦促和鼓励下，历时四年多，终于写完了很粗的初稿。”随信而寄的，就是他的文革回忆录书稿《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厚厚一本，长达三十多万字。在给我的信中，他还调侃自己说，“我要自我表扬一下，这两年来，我很勤奋，每天都要写一点，改一点，虽然对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不满意，但写作的态度是问心无愧的。”我们这些清华校友对老孙的认真精神最是了解，我被他这几句朴素的话深深感动了：这本书稿可真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啊。

孙怒涛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敦促和鼓励”，这是他的谦词，我受之有愧。但他这么说，也确实有一点来由。那是2008年的冬天，我回国探亲，顺便到深圳和杭州，找了蒯大富和孙怒涛，目的就是要说动他们写文革回忆录。这件事过后，我还写了两首诗，登在清华校友网上：

促写文革回忆录七律二首

其一

年末过深圳同学聚会特约蒯大富催促写文革回忆录

书生狂态共当时，各历风霜鬓有丝。
聚话席前烧烤久，散谈午后早茶迟。
戎行百日曾相斗，文革三年足反思。
纸笔催君不媚俗，要留真实后人知。

其二

杭州见孙怒涛促写反思文革文章

清华才子旧音容，对面骤然如梦中。
 俗务经年人远隔，清茶一盏话相通。
 昨天能鉴明天事，盛世望敲警世钟。
 引玉之砖我先出，西湖杨柳待春风。

2008年那个时候，清华校友中反思文革的热潮初步形成，但有些文革时的重要人物却尚未启动。正如汲鹏在为邱心伟、原蜀育两位同学编的《清华文革大事日志》一书写的文章中说的：“反思文革这件事，从去年开始，经几个人一搅活，许多人都动起来了。……但是，有些最该动的人还没有动。”在此情形之下，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再来促进一下。

促写清华文革回忆录，我为什么最先想到去找蒯大富和孙怒涛呢？几乎所有研究中国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清华文革的群众组织分成团派和四一四两大派，团派的一把手是蒯大富，四一四派的一把手是沈如槐。2004年，沈如槐已经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为了多角度、更真实地反映文革历史，我认为蒯大富也应该写出他的书来。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理解。但是，对孙怒涛呢，一些不是亲历清华文革的人恐怕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其实，要研究清华文革，孙怒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华文革头头中，他对团、四两派都比较了解，是唯一在团派和四一四派都当过核心组成员的人物。孙怒涛很有才气，善思考，讲道理，得人心。在文革的狂热和极端的两派对立中，他的态度一直比较温和、中肯，很得一大批中间群众的拥护。如果说，蒯大富代表团派，沈如槐代表四派，那么也可以说，孙怒涛代表了许多中间派群众。在文革中，像孙怒涛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得势，甚至还常常被讥笑为“孙老机”。但是，今天我们反思文革，需要的就是这份温和、客观和真诚。这就是我动员孙怒涛出来写文革回忆录的原因。

我的那次促写文革回忆录的回国之行，是有效果的。在深圳，蒯大富答应我说，他已经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可惜的是，他后来身体不好，未能亲自执笔，最终由他的朋友韩爱晶写了《清华蒯大富》一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在陈育延牵头组织的卢沟桥小聚会时，蒯大富带了刚刚出版的书，分发给参加聚会的两派朋友。他说，他认可韩爱晶书中所写的是历史事实，书中观点则由韩爱晶自己负责。在送我的这本书上，蒯大富签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看了韩爱晶这本书，感到他写得确实不错。他对蒯大富比较了解，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史实，很多观点也很鲜明。但是，毕竟他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全过程，有些叙述很难做到真切到位，有时还会让人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我想，如果他写一本书叫《北航韩爱晶》的话，一定会写得更好。

令我十分满意的是，我的杭州之行，四年后的今天，也终于结出了一个硕大的果实。这就是孙怒涛刚刚寄来，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稿。

一收到信，我急忙打开书稿，花了一天的时间，匆匆地看了一遍。我的第一印象，总觉得他的书同其他回忆文革的文章相比，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但是，这种很独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时间，我想抓，抓不住；想说，说不出来。三天以后，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原来，孙怒涛书稿中这种很独特的东西，同我久久思考的某种想法非常契合。我的这种想法，埋在脑海里，且深且久，现在经孙怒涛书稿的激发，一下子开始清晰起来。我十分兴奋，马上给孙怒涛回了一封信：我准备为他的书写一篇读后感。

孙怒涛的书稿激活了我的思想。我认为：他的书，有两大特色，要做到这两个特色，难能可贵；他的书，具一个贡献，开拓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意义重大。

两大什么特色？这就是：第一，在内容上，着眼于自己经历的群众运动本身；第二，在态度上，内心反省式的诚恳总结。

一个什么新课题？这就是：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

群众性的民主活动应该成为文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先说孙怒涛书的第一个特色：在内容上，着眼于自己经历的群众运动本身。

我们看到，文革过去四十年，回忆文革的文章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内容十分丰富。有的是揭秘，主要是揭高层内部机密、宫廷秘闻、决策过程，以及权力之间的互相倾扎和争斗。还有的是暴恶，主要是揭发和披露文革期间各地发生的恶性事件和血腥暴行、酷刑、杀人、武斗。再有一些是谈自身遭遇和感受，主要是普通平民在文革中的这个动乱环境中的所受到的迫害、冤屈和苦难。把这些真实的史料，留给我们的后代，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看了这么多这么多后，慢慢地，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会产生一种不足的缺憾。心里总是隐隐觉得，文革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什么内容呢？看了孙怒涛的文章，我明白了，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自己经历过的群众运动本身，也可以说是，文革期间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本身。

我们经常说，文革十年动乱，其实，群众运动，只有其中的两三年。大概的

时间，从我们清华大学来说，应该是刘少奇工作组撤走，到工宣队进校。也就是，从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时期。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十六条”精神，全国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党的领导和各级政府的行政领导，都暂时停摆，改由群众自己组织的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运动中，喊得最多最响的是所谓“大放、大鸣、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及中央文件应许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且不管决策者的最先动机是什么，也先不问社会效果最后怎么样，也先不去说高层内部的权力之间的互相倾扎，如果单从群众运动本身看，从当时的表面现象看，这个时期，或许是历史上中国民众被官方赋予“民主”和“自由”最多的时期。从孙怒涛的文章可以看到，思想上，66年8月工作组撤离时，我们许多人都实实在在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那时候，民众自由结社集会，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跨系跨年级，组织战斗组，自行选举群众组织领导人。言论自由，也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召集会议，人人可以上台参加辩论。出版呢，群众可以编写和印刷小册子，群众组织自己办报纸，也是可以的，比如当时清华井冈山报的发行量可能比许多官方报纸都大得多。

孙怒涛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但他当然没有资格参与高层决策，对文革理论当时他是正面理解的，事后也没有去热衷什么宫廷内幕。他平民出身，是个地地道道的江南才俊、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在文革前的政治环境下，却受到种种压抑，也就是他书中说的所谓“差质生”。文革中他做了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却始终保持书生本色，没有残酷迫害过什么人，也基本没有干过什么过分的坏事，更没有参加过武斗。幸好，文革后，他受到的整肃也不算太大，隐退下来做了一个他本来想做的本分的技术人员。他在书中记录下来的，主要的就是这些在文革中他自己经历过的群众运动本身。比如，怎么思想解放、怎么写大字报、怎么上台辩论、怎么组织群众，以及群众组织怎么形成、怎么成长、最后分成两大派、两派又怎么协商、怎么纷争，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记下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参与人物之外，还用很大的篇幅，记下他个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

这些内容，在我们读其他回忆文革的文章时候，见到不多。感谢孙怒涛的文章，一一地真实记录下来了。这些内容，虽然发生在文革特定的畸形民主的时期，但是，无可否认，其中的一些内容，是所有民主运动本身中都会有的内容。无疑，在我们将来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难免还会碰到这些内容。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文革中，我们所做过的其中的一小部分事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

这里我说“文革中的一小部分事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我知道，对这句话，许多人是坚决反对的。我看了一本书，叫《亲历文革》，其中有一段文字，是采访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对文革的看法。这位教授，参加过文革，当时还是江苏

省委写作组成员，文革后，成了著名学者。他对访谈者说道：“还有一次，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同两个从美国来的人发生争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具有伟大意义，是一次全新的民主政治的尝试。我问他们文革时你来过中国吗？他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我说，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接着就给他们上了一课。哈哈哈，文化大革命的丑恶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觉得好玩。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

我也“亲身经历过文革”，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从美国来”的吧。我亲身体验了文革的混乱，残忍和丑恶，不会给文革冠上什么“伟大”、“全新”之类的字眼，更绝不会“哈哈哈”觉得文革好玩。但是，经过在国外长久的观察和反思再反思以后，现在我已经部分同意了那两位美国学者的看法：真的，从某个意义上，文革确实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尝试。

为什么我在美国待了一阵以后，也会开始部分同意这两位美国学者的看法了呢？我想，是因为远离了国内对文革个人恩怨和情绪化的环境氛围以后，慢慢学会从更多的维度和更广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观察文革。这位教授对“民主政治尝试”的观点如此义愤，可能是他对世界民主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而把民主政治概念化和理想化了。也许他觉得，民主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在它尝试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文革中有过的那样凶残行为和丑恶现象的吧。

民主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的政治形态。实际上，民主政治可以分成多种不同的模式。从大的说，有英国那样君主立宪式改良主义的民主，也有美国那样代议制式比较温和的民主，还有法国大革命那样全民参与的比较激烈的直接民主。从历史上看，有些民主式样，在它们的“尝试”阶段，确实出现过混乱、残忍和丑恶的现象。我们总是爱把文革说成“史无前例的浩劫”，其实，像文革这样的“浩劫”，可以说是“史不乏例”的。读过世界历史的人知道，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动乱和血腥，并不亚于我们的文革。

有一本书，名叫“乌合之众”，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一百多年前写的，我看了以后，感触非常深。我觉得他写的是太真切、太生动了。我们文革群众运动中发生的许多现象，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离奇，很不可思议。他在书中一一道来，仿佛亲眼看到过一样，而且把原因剖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十分折服。比如，我一直想不通，文革中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一下子都会失去理智，仿佛都中了邪似的，变得如此疯狂？受过高等教育，这么些有知识、有教养的清华大学学生，怎么会去杀人放火，将人活活打死，变得野兽般的残忍？文革中有些人的信仰、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行为，为什么会与他们的愚蠢和残暴同时并存？勒庞先生指出，群体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其个人就被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三个特征，一个是一致性，一个是情绪化，一个是低智商。”原来，我们文革中发生的许多行为，勒庞先生早就见过，并且

分析透了。勒庞先生是群众心理学的开山鼻祖，而他自己说，他的这种心理学是总结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宗教”等等群众运动，而建立起来的。

我们国内有些人往往把文革的丑恶和凶残，完全归因于独裁、社会主义或无神论，认为只要西化了，有了民主，就可以避免文革重演，看来是将这个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勒庞先生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运动，他主要指出这种类型的民主运动可能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必须看到，在各种民主模式中，法国大革命那样全民参与式的民主，在我们国家是最有深厚根基的。我们文革中崇尚的大民主，是这种式样的民主；而国民党崇尚的，同样也是这种式样的民主。去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有台湾学者著文指出：上世纪初，我国知识界，从国外输入两种民主思潮，法国卢梭式全体公意的民主，和英国弥尔（严复翻译成穆勒）式代议制民主。这两种民主思潮对辛亥革命的成功，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革命派支持的卢梭思想最后占了上峰。他们指出，孙中山民权主义里所讲的民主，主要是卢梭式的民主。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其实蕴含了一种全体人民参与的“全民式的民主”。延存到今天，台湾实行的民主，“总统直选”和“全民公投”等等，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台湾选举的时候，有人调侃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他们由台湾选举联想起文革的乱象，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来由的。

去年台湾大选时，汲鹏正好到台湾旅游，目睹了大选场景，不禁联想到清华文革时的诸位头头。他特意给我说，“孙怒涛是个平民政治家”。最近，我又看到郑易生同学的一封信，也把孙怒涛称为平民政治家，不过，他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短期、业余的平民政治家。

需要指出的是，孙怒涛可能从来都想不到，有人竟会称他为“平民政治家”。他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他的书中写什么文革中的民主尝试。他想的只是，真实地记下自己在清华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不过由于他本人在文革中的位置，使他能够记下、也只能记下了群众组织的种种活动本身而已。但是，正因为他写得认真，写得真实，他的书就像全息摄影的底片，包涵原生态的全部丰富性。人们可以多层面的解读。

我相信，不久后，人们总会看到：除了“高层揭秘”和“血腥控诉”之外，揭示群众组织的兴起、消亡、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和意义，将是文革研究中最值得深挖的一个巨大金矿。文革中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一方面呈现了它的非理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另一面也展示了草根平民的抗争、正义、善良和创造性。它们才是文革运动最深层次的原始动力。

拷问良知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孙怒涛书稿的第二个特色：在态度上，内心反省式的诚恳总结。

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到不公正境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属正常吧。有些人呢，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在文革中当过什么头头，有过什么惊人举动，或者得到过最高领袖的一句什么什么话的评价。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这派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过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

孙怒涛同上面所说的几种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们看到，在追述事实的同时，书中有大量篇幅的分析和议论。而在这些分析和议论中，且不说没有掩饰，没有自夸，没有自诩正确，就是忏悔，也只占很少的部分。他花了大量的功夫，用来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他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放在道德良知的案板上，非常认真而且严格地进行解剖、分析、审查，并且重新作出评价。他审视自己的行为，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毫不留情。比如，一事当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有过什么个人名誉利害方面的考虑，导致什么决策错误和后果，通通和盘道出。对自己这样做，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相对来说，这还不算是最难的。那么，什么是最难的呢？那就是：不顾情面，不怕得罪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比如，孙怒涛在文章中，涉及到沈如槐的某些行为，以及评论周泉缨的某些观点，很可能得罪同一个派别的生死战友；又如，他反思、追悔四一四的分裂行为，这样，肯定会引起一些本来一直相信他、拥护他的四一四基本群众的反对，可能从此失去民望。他明知后果，还是凭籍良心说出自己的观点。这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设身处地，扪心自问，像他前面那样解剖自己，我有时或许还能勉强做得到；而像他后面那样不顾情面的秉笔直书，我实在自愧不如。所以，我很理解孙怒涛的挚友王允方同学的意见：虽然不太赞成孙怒涛“成立四一四总部是最大错误”这样的说法，但不妨碍他对此书作出很高的总体评价。

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指他的史料多么丰富、多么炫人耳目，也不是指他的分析多么精当，认识多么正确，而是指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人格和良心。

前几天，有好几位同学分别给我寄来一篇网上热传的文章，题目是“文革，为什么没有人忏悔”。在问到个体忏悔问题时，作者徐友渔先生回答说：“要求人忏悔是一件很难的事。”“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罪恶元凶都不被追究的话，要叫平常人忏悔，这说不通，甚至对大多数人没有说服力。我曾经编过一

本书，是文革参加者的回忆录，一个作者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不忏悔’。他实际上主张忏悔，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党政干部事后都胡说八道，文过饰非，让我们忏悔，怎么忏悔？忏悔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除了人的天性在感情上是非理性的，在本性上要抗拒忏悔的以外，道德问题的最重要的特点不是讲道理，而是榜样的力量最重要。如果最高负责的，该忏悔的人不忏悔，要叫别人忏悔确实很难。所以，我觉得必须有这么一点来补充，如果带头的人忏悔了，该追究的人都追究了，你再来要求一般人忏悔可能就要容易一点。”

徐先生的话讲得有几分道理，在网上博得许多人的赞同。但是，我觉得，追究文革罪恶元凶，和个体忏悔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什么前提条件。同样，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党政干部事后都胡说八道，文过饰非，也绝不是“我不忏悔”理直气壮的理由。如果个体忏悔需要这样那样的前提，那么，只会陷进一个责任链的怪圈，谁都可以期待别人先忏悔，结果谁都不忏悔。现在不正是这样吗：人人都觉得文革错误，事实上，当时也几乎人人都加入了这种错误，而事后人人都觉得没有责任，自己受迫害，自己委屈，自己不该先忏悔。互相指责，互相埋怨，就是不反省自己。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忏悔，是灵魂的自我救赎，必须出于自己本身的觉悟，别人是无法要求，更无法强迫的。你可以要求别人认罪，但无法强求别人忏悔。在精神和灵魂的层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无论事大事小，是官是民，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我们反思文革这么多年，看来，能够反思到这一点的人还不是很多。而这一点，正是民主社会的根基啊！

徐先生有句话说的很对：“道德问题的最重要特点不是讲道理，而是榜样的力量最重要”。孙怒涛不是“文革元凶”，不是“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党政干部”，也不是在文革中杀人放火“最该忏悔的人”，但他，至少在部分清华校友眼里，确实为我们反思文革作出了一个榜样。在孙怒涛“拷问良知”的启发下，孙耘同学写了一篇读后感，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和遭遇。前几天，他把这篇文章寄给我，让我提意见。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给他回信是这样说的：“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要是谈自己经历的事实，和自己的内心感受，没有刻意迎合某种潮流，没有攻击别人，也不糟蹋自己。”我认为，这种态度，就是良知的态度。文革中，我们同孙耘属于对立的派别，当时的观点和做法很不一样，以后的境遇也很不同。但是，在用良知反思文革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孙怒涛作出的榜样的意义，不仅仅是忏悔，而且主要不是忏悔。再说了，全民反思文革，主旋律也不应该是忏悔，毕竟，在文革中做过伤天害理恶事的人是极少数。有一件事比忏悔更重要。那么，这又是什么呢？以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来反思文革、审视文革和总结文革。

孙怒涛将他的书命名为“良知的拷问”。什么是良知呢？对此，孙怒涛的同乡先贤王阳明先生有过非常有名的论述。阳明先生认为，所谓良知，是天赋的为

人之道，“只是个是非之心”。孙怒涛作出的榜样，就是用阳明先生所揭示的这个普通人的“是非之心”来反思文革。

据说，秦晖先生提出不同人对文革的四种判断，即体制内肯定、体制内否定、体制外肯定和体制外否定。徐友渔先生又提出“站在世界政治文明和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文革。”我个人认为，两位先生的这种种分法，不管体制内体制外还是普世价值等等的角度，说到底，都是以意识形态作标杆，先认定某种自以为一定正确的主义、社会制度或者时代潮流，将其作为铁定的标准来评判文革。这样的评判，很容易闹意气，很容易赶潮流，很容易走极端，很容易失真。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只要一涉及到什么体制呀、什么意识形态呀之类的话题，许多人好像一下就会失去基本的理智。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往往各执己见，完全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气氛。我一向主张，应该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文革亲历者都来回忆文革，诉述自己亲身经历和自身的内心感受，激发自己天性的良知，来反思文革。这样的反思，既不是被某个威权政治所强迫的；不是被某个利益集团所诱导的；也不是被某些精英专家所劫持的；更不是被某种舆论媒体所裹胁的。每个人先把各自的意识形态主张放一边，为了自己的灵魂，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静心内省，不要情绪化，也不要绝对化。揭露、谴责极左和暴力是良知；揭示、坚守理想和正义也是良知。只要相信天底下确实有良知这件事，用这种方法来反思文革不是更好吗？

问题是，良知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靠不靠谱呢？徐先生在文章中就说“人的天性在感情上是非理性的，在本性上要抗拒忏悔的”。你孙怒涛受过高等教育，也许有良知，那么多普通老百姓难道也都有良知吗？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看的话，良知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天性和本性。徐先生所说的“非理性”和“抗拒忏悔”的天性和本性，现实中确实普遍存在，没有错，但这只是灵魂蒙尘后，没有及时清除时的天性和本性。在心灵的积垢清除以后，一种真正的天性和本性才会显露出来。在王阳明那里叫良知，在佛教里叫佛性。这种真正的“天性”和“本性”，是能够辩明是非的，是愿意弃恶从善的。

有人或许会说，现在已经是讲究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了，你念念不忘地总是讲精神呀灵魂呀良知呀这一套，没有可操作性，恐怕不行吧！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中，也是很讲究精神和灵魂的净化。相对中国文化的“内省”，西方更注重“忏悔”，两者的实质意义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前面说了，西方人将个体精神的平等和独立的观念，逐渐演化成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公民责任准则。良知这个东西，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美国宪法规定，执政者必须通过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并且有一个明文规定的任期，然后重新回到人民的自由选举中去再生。这样做的基本考虑依据就是：只要人民的整体性还保留有良知，那么这个政府就不至于长期退化为专制暴政。又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要特意选出 12 个

没有专门法律知识的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听取法庭辩论，互相讨论后，对被告作出最后的审判决定。这样的做法无疑就是说：一切法律制定的最初依据是普通老百姓的内心良知；一切法律执行的最终结果也必须取决于普通老百姓的内心良知。

以上看出，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民主社会是多么地看重“内省”、“忏悔”和“良知”这些东西啊！但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的人们，对这些东西，又是多么地陌生和隔膜啊！我们失去了它们，我们失去它们已经很久很久了。既然，良知是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失去了良知的社会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从文化层面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失去对良知的追求，这是文革产生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着还要问：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对良知追求的呢？有人说文革开始失去的，这好像不对。文革时期，肯定是失去了，但不是开始。有人说1949年开始的，这好像也不对。又有人追的再远一点，说是从共产党主导意识形态时就开始失去了。这下追溯得很远了，是不是追到根了呢？其实，还不够远，还没有追到根，而且，对责任者的认定也不全面。说起来，早在中国学术界着手构筑科学民主新文化基础的创始阶段，就发生了一些偏向。而这个偏向，是当时国共两党顶尖理论家、哲学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精英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的重大成果。让我们回到90年前，从中国知识界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辩论说起。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科学能支配人生观吗？”从而引发了这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大辩论。鉴于一战以后，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精神危机（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科学的胜利却把人对天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信仰一扫而光），张君劢提出了一个观点：自然科学不能完全涵盖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等等有关心理和精神范围的问题。他的许多论点主要来自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宋明王、陆学派的内省、良知等等哲学思想。张君劢好像十分心仪王阳明的“良知”说。他说，良知是罗盘，是矩尺，是量器。只要稍微刺激一下良知，人就可以发现自己是走向善和恶。而且，只要有这些轻微的警告，人就应该更严格地约束自己。张君劢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大辩论，历史上称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首先出来应战的是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随后参加辩论的有国民党理论权威吴稚晖、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学界泰斗梁启超，以及新锐著名学者胡适等一大批精英中的精英。这场辩论历时很长，牵及的学术问题也很多，这里不想具体介绍他们各自的论点，只想简单说一下大辩论的最后结果：除了梁启超和张东荪等少数几位学者站在张君劢一边以外，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等大多数学者都站在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赛先生”的一边。科学战胜了玄学，丁文江、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都成了鼓吹科学的受人欢迎的英雄人物。

但是，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检讨一下。由于当时的启蒙学者们急于抛弃

中国老旧传统，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可能又有点夹生，虽然这场辩论在宣传科学上取得重大胜利，而在构筑科学民主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的时候，还是暴露和遗留下一些问题。美国学者费侠莉在『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中，总结这场大辩论时写道：“科学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如果不是理解上胜利的话。宋明理学的学术威望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而张君劢版本中的欧洲唯心主义成分，一直存在到后来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支柱，到头来声名狼藉。后来一位观察家诙谐地总计得分如下：‘利用耶稣和佛陀的神圣名字无效；对待孔子、老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很不公正；严重伤害了康德、黑格尔和柏格森；对宋代和明代的哲学家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唯独卡尔·马克思、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杜威有幸逃脱了枪林弹雨。’”

你看看，这种横扫古今中外一切精神和思想巨匠，只留下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大辩论，结果是不是真的有点可怕呀！是不是已经留下可能产生文革的胚芽了呀！是不是已经留下改革后唯利是图、唯钱是图、唯官是图的信仰危机的胚芽了呀！

那么，通过这次大辩论，科学的观念是不是真正树立起来了呢？遗憾的是，这一点也还是打了折扣的。上面我们看到费侠莉说了这么一句话，“科学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如果不是理解上胜利的话”。至少在她看来，中国学者们对科学实质意义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这个偏差是什么呢？原来，在辩论中丁文江提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同时，又提出了“存疑的唯心论”这样一种的观点。费侠莉评论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丁文江提出的‘存疑的唯心论’招致两个方面的攻击，然而理由却是站不住脚的。丁文江最重要的见地，即必须把科学主要当作一种合乎理性的方法论，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国家到处都是“科学是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观”之类的口号，但是，如果问：科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科学的定义是什么？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学校里的科学教育最重要的应该抓什么？科学发展观怎么个发展？能够确切回答的人恐怕不多。现在许多人对科学的理解恐怕还远远到不了当年丁文江的高度。

90年前在清华大学引发的这场大辩论，中国思想界开始选择摒弃“良知”、“内省”和“忏悔”等等一套“玄学”东西。这套东西，却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前些年，我们经历了文革暴乱的思想危机；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改革后浮华的信仰危机。好了，90年后，现在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科学生孙怒涛，写了一本书来反思文革，书名就叫做“良知的拷问”。这件事本身，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给我们留下许多联想和深思的空间。

我过去说过：反思文革，第一层次，要从事实上反思；第二层次，要从体制上反思；第三层次，更深的层次，是要从文化上反思。孙怒涛不一定有意识，但

他确实是从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源头上开始反思了。虽然这种反思，还刚刚开了个头，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有了线索，有了路径，下面的路就要靠大家一起来走了。

警惕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孙怒涛一再给同学们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批判文革，否定文革。他邀约多位同学给他的书中“文革·反思”专题写稿，要求的条件只有一个：只要否定文革就行。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理解，非常赞同。因为我们都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亲眼看到文革极左理论的荒谬，文革暴力的血腥，文革给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灾难后果。在学校的时候，我参加孙怒涛所在的那一派，他是头头，我是小兵。我拥护他的原因，就是他主张反极左、反暴力。

但是，看了孙怒涛的书稿以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看他写的内容，并不是单纯地暴露文革的荒谬和残暴，许多是他自己经历的群众运动本身；看他写作的态度，也并不是绝对的否定、指责或者忏悔，而是发自内心的诚恳反省。我突然觉得，在不知不觉之中，孙怒涛的这本书已经超出了他给自己预设的目标主题。除了“批判文革、否定文革”之外，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总结文革，主要的就是总结文革时期的群众性大民主实践。

孙怒涛这本书的主题发生了超出他本人预料的变化，绝非偶然。凭着良知来反思历史真实的亲历者，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我们是抱着对大民主理论的正面理解投入这场运动的；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我们是在强权势力的压制和迫害下起来反抗的；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激情和我们冲破专制的勇气。文革中的平民造反派，不是每个人都是打砸抢分子；文革中平民造反派做的事，也不仅仅是血腥的武斗。文革中我们做过的一部分事情，是中国将来民主进程中必定要做的。我们的错误，有历史的原因，应该放到历史的情景中去分析考察。我们的失败，是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应该认真总结。

看了孙怒涛的书稿和拙文初稿后，郑易生同学说了一段话，很能说明孙怒涛当初的心态。他说，“有一些东西自己一直感觉到而说不出来，这次小宝的文章多少将这种感觉说出来。我们那时候的勇敢和幼稚，其实是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对民主、平等和公正的诉求。不管它一厢情愿地借助给予的那一种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来表达，抽出时间语言，许多群众组织，如清华 414 中的三七战团等，其原始动机有较多追求正义、不欺负人、讲道理的价值观。这是不是可以说文革中

人们行为的两重性，形式和内容、强力和自发、禁锢和自由，一一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分析起来，说一些人是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形似盲目实是自发地追求和扩大社会正义性，也不为过。这与美化自己无关，却事关对人们良知的潜在力量的认知和肯定。这点应该告诉国人。为什么我一直自我纠结，为什么我们不太敢说，缺乏自信和底气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思想被一种已有的、现成的思想框架紧紧地束缚住了。”

现在，我们要大声地说：文革必须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更不能简单否定。

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并不奇怪。文革的极左政治主张，有许多明显的理论漏洞。文革的许多暴乱和血腥的事实，群众留下的只是厌恶的记忆，不愿去分析总结它的合理成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加者，事后受到整肃，不堪回首往事。目前的一些知识精英，希望通过彻底否定文革，揭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邪恶本质，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更主要的是，某些文革中的当权者，对群众运动给予他们的冲击，不能原谅，甚至刻意报复。文革后上台的某些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恐惧文革时期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重来。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强大舆论潮流的裹挟之下，对文革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总结的呼声，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响应。更有甚者，有些政治集团，对不同政治派别，随手扣上“文革余孽”的大帽子进行清洗。对民间出现的反对之声，也轻易冠以“企图复辟文革”的罪名，进行打压。连老百姓的上访和起码的人权申诉，都以害怕酿成文革式群众性动乱为由，严格加以监控和防范。

我们这个国家，要启动民主这个程序，跨不过总结文革群众性大民主历史这个坎。目前，我们要警惕的是，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来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从世界各国的民主进程看，我们可以知道：民主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一种伟大理想。它的内容和方式，不是既成的、固定的和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动态的，是在探索和纠正错误中不断完善的。

民主这个概念，起始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就是提倡公民直接参加管理和决策。从这个概念出发，法国的卢梭提出了民众直接参与方式的民主理念，导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显然，这种民主模式最接近民主的原始理念。但是，法国大革命发生了空前的暴乱和血腥，绝对不亚于我们的文革。比如，文革中，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受到迫害；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都是被送上断头台活活处死的。又比如，文革中，我们的许多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虐待；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氧气的现代化学的鼻祖拉瓦锡，是被直接宣布处以死刑的。但是，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并没有提出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如果彻底否定了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有今天法国以致世界各国的民主社会。

鉴于直接民主模式的缺陷，有些民主的启蒙思想家又提出了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民众定期选出自己的代理人，由他们代替人民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

这种民主模式，美国是领跑者。美国的国父们，在宪法中规定了选举的程序，以后又产生政党，出现两党制，民主程序也就慢慢完善起来。现在，代议制民主式样、民众投票选举，政党轮替，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体现。有些人甚至将它认为是普世价值。其实，尽管有这些民主程序，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存在着重大缺陷，比如宗族问题、妇女问题和阶级问题，矛盾突出，有时非常尖锐。上世纪 60 年代，几乎与我们文革同时，美国社会也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当时美国大学的校园，反战、反叛运动风起云涌，与社会上黑人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结合一起，有的甚至走向了政治暴力斗争。那时候的青年学生，普遍流行一种偏激的嬉皮士风气。他们脱离家庭、群居、吸毒和性解放，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行为，无疑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但是，美国民众没有彻底否定他们的骚乱运动。相反，美国历史对上世纪 60 年代定位是“理想的年代、激情的年代”，并且将他们的运动定位成“民权运动”。经过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模式的民主理念进一步深化，美国社会更加平等、更加进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美国的当权者彻底否定学生运动，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局面。

再来看台湾的选举。前面我已经说过，由于国民党的民主先行者受卢梭直接民主理念的影响较深，同时台湾选举又同台湾独立派的意识形态搅混在一起，在最初几届全民直选中，确实产生过一些乱象。“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革还在搞”的话，也不能说是完全污蔑。我们看到，经过几年实践以后，现在台湾的选举已经变得理性多了。如果当时台湾朝野被“文革来袭”的论调吓到，彻底否定选举的话，就不可能有台湾今天民主的成绩。

民主的进程还没有结束。它还在探索，还在深化。代议制民主，并不是最终完美的民主模式。代议制民主意味着精英或政客代理民众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是否能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始终遭人质疑。加上，代议制民主模式日趋老化，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渐渐显露。精英政治、官僚政治、被资本控制和操纵的寡头政治，明目张胆地将人民边缘化。除了充当选举机器以外，人民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一民主理念得不到真实的体现。上世纪 70 年代，我们的文革中后期，美国的一些学者首先提出了“参与民主”的理论。他们主张让民众直接参加部分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来弥补代议制民主模式的不足。民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们，做了很多推广工作。但是，成效不很理想。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参与民主”的理念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进展。在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大潮流中，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出现了所谓“拉美化”的社会困境。为了寻找新的出路，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纷纷向左转，提出了“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标榜：“21 世纪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着些许区别，其中一项就是民主，而且明确是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2007 年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在中国社科院演讲，他说：“人

民有权寻找解决方案，而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人民的民主参与。我们不应该把民主等同于大选。民主的进程是多样的。”在参与民主的理念推动下，他们上下结合，成立了几万个社区委员会、几万个工会和农会组织、成千上万个经济合作社，鼓励民众绕过官僚体系，对社区政治和经济活动，积极参与决策和管理。这种参与民主的实践，方兴未艾，有些措施卓有成效，有些措施出现新的问题。

毫无疑问，无论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理论，还是拉美国家人民正在进行的实践，“参与民主”，都是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的重要部分。

“参与民主”这样的名词，也许我们不熟悉。其实，对它包含的某些理念、内容和方式，我们并不陌生。有一些，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延安时期做过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带着文革时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印记。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的工会和农会、那么多的经济合作社、那么多的基层群众组织。甚至，我们曾经自信地提出过“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内容的“鞍钢宪法”。参与民主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并不否认，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过我们的启发。拉美地区的领导人毫不讳言，过去他们是跟着中国学的，现在中国变了，不管他们了，他们只能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

我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了这种民主理念，也进行了许多这种民主理念的尝试。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语：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文革的许多内容是为了贯彻他的这个理念。但是，在提出和实践这种民主理念的同时，我们掺杂了许多极端的思想。我们将我们认定的目标绝对化，提倡的民主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什么是专政？毛泽东说过：专政就是独裁。所以，我们的民主，势必成为独裁的民主；我们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推行的民主叫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民主。什么叫革命？毛泽东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所以，我们的民主势必成为暴乱的民主。这种独裁民主和暴乱民主，得不到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拥护。我们在民主进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犯过不少错误。最终，文革失败了。我们的民主尝试也失败了。这当然是很遗憾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遗憾的。最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呢？最遗憾的是，我们的当权者，彻底否定和改变了自己国家的民主进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下，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一律给予打击；文革中群众民主运动的头头，一律严加整肃；文革中人民一度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一律予以取缔；长期摸索而得“民众参加管理”的理念一律批判；在国有企业行之有效的民主规章制度一律强制抛弃。不能不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理念是倒退了的。

还有最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文革后分裂成互不相容的左、右两大派别。左派提出彻底肯定文革，右派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他们互相攻讦，互相谩骂，无休无止。其实，这两个派别在思想方法上，都犯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各自抱定某种社会

体制或意识形态模式不放，绝对化，理想化，将其视为固定模式和终极真理。不是彻底肯定，就是彻底否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妥协的余地和空间。两种极端的模式都不可能马上实现的情况下，双方无心立足实际，为民众的参与民主做点实事，剩下的只能是网上的口水战。在这种彻底否定文革和彻底肯定文革的口水战的噪音声浪中，世界各地的民主理念在深化、在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却陷入了僵局。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美国著名评论家、『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佛里曼写的。书名是『我们曾经辉煌』，这就明显地表示，作者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在谈到政治方面问题时，他说，“我们政治体系陷入僵局。两党严重分歧对立，无法达成任何深入、与意识形态相悖的妥协。”而美国需要两党妥协而成的“混合政治”。他说，“民主党倾向于强调公平，共和党则擅长于建立精英政治。”其实这两者，美国都需要，不可或缺。他希望出现一种“激进中间派”。其实，佛里曼所说美国两党对立局面，同目前中国左右两派的情况很相似。中国也需要一个混合的“激进中间派”，才能冲破目前民主进程的僵局。

说到“激进中间派”，我不由地想起孙怒涛在清华文革中扮演过的角色。孙怒涛是个“中间派”，可能算不上“激进中间派”。他在清华文革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起不到掌控全局的主导作用。能够掌控全局的“激进中间派”领袖，现在的美国没有出现，在中国恐怕也难。

这里还要指出，不管民主进程进行到什么程度，直接民主也好，代议制民主也好，参与式民主也好，都有一些内容是作为前提条件，共同需要的。比如，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等等。即使在文革群众性大民主的特定环境下，这些内容至少在某些有限的条件下，也是得到官方许可的。一旦失去这些民主内容，必须首先争取。

天上不会突然间掉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十全十美的民主政体。不管推行何种民主模式，直接民主也好，代议制民主也好，参与民主也好，一定都要有一个动员广大民众的过程；一定都会有广泛民众参加的对体制、政治、政策等等的争论、评论和辩论；也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基层民众组织。甚至，为了争取某种民主权利，难免会有群众抗争的行动。如果一出现这些东西，马上想起文革的群众运动，马上批判什么民粹主义，马上封网封口、取缔组织，那么，谈一切民主模式，都只能是叶公好龙而已；那么，如何一种民主模式，都无法迈开哪怕一点点的微小脚步。

民主的本意，就是民众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害怕民众，害怕民众组织，害怕民众说话，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很可能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用来遏制民主的借口。

彻底否定文革，很可能会彻底堵死中国启动民主的任何路径。

有人说，我们总结文革，是为了防止文革历史重演。对这种说法，我只同意一半。我认为，文革大民主的部分内容是无法防止，一定会“重演”的。我们希望防止的，是文革中发生的动乱和血腥惨剧“重演”。

文革大民主的一些内容，虽然明文禁止，今天已经在社会上“重演”。比如，文革中提倡“四大自由”的“大字报、大辩论”，文革后把“大字报”从宪法中删掉了，并被严令取缔。结果呢？大家看到，今天互联网上博客蜂起，比我们当年的大字报范围更大，传播更广。再说“大辩论”，文革后，权威人士明确规定“不争论”，结果呢，你到网上去看看，左派和右派，几乎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在那里不停地辩论着、争论着。又比如，工人的罢工权利，文革后也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今天中国的罢工浪潮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还有，大家都记得到，文革时期，各地都爆发过群众性组织的抗争行动。文革后，此类行动是法律禁止的，但是看看目前中国各地的反腐败、反剥削、反迫害的群众抗争运动，屡禁不止。文革的这些东西，你再说不许“重演”，它们换个什么别的形式还是在“重演”。一味靠维稳，靠禁止，肯定不会奏效。

文革大民主的还有一部分内容，将来有可能“重演”。比如，文革中各地群众组织基本上都形成两大派，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它们看成是两党政治的雏形；文革中一度喊得最响亮的巴黎公社选举，是提倡全民选举制度。这些东西经过总结、提炼和改进，也许最后能够找到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来。

如前所述，文革群众运动失败，酿成惨剧；而文革民主运动的部分内容，不可遏制地必将在中国一再发生。正因如此，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认真反思总结文革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就像参加过一次大型比赛的足球队员，不懂章法，踢得很烂很次，头破血流，损兵折将，败得惨不忍睹。现在我们这些人老了，再也踢不动了。如果由于那次惨败，足球运动就此废止禁绝，那么我们这些败军之将的最好选择，当然是隐藏伤口，以闭口息言的方式来遮羞。但是，我们知道，足球运动势必还会进行，以后有人还会组队，还会参加比赛。我们希望新的球队踢的比我们好，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这样，我们就有义务、有责任将自己参赛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供新的球队参考。所以，我们才不顾失败的羞耻和伤口的隐痛，像孙怒涛在本书中所作的这样，将当时的动作一招一式地回忆、比划出来，并且写成文章。我相信，只要是局内的有心人，一定能够看得懂我们的文章，也一定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一片殷殷苦心。

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孙怒涛把自己的书定名为“良知的拷问”。良知两个字，别具深意。对一个人，这是“良知”。许多人良知的叠加，就成为“民心”。我们赞同用良知反思文革，最终用意是赞同用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来反思文革。用普通老百姓的民心反思文革，对过去文革研究的判断，是一个突破。过去文革研究中，按秦晖先生的概括计有四种判断：体制内肯定、体制外否定、体制内肯定、体制外否定。这四种判断，要不是体制内，就是体制外；要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用民心反思文革，没有这样的局限。管它什么体制，只要符合民心，可以各取其优点。对文革的判断，也不绝对化，既可以部分肯定，也可以部分否定，一切以民心为依归。我们相信良知的存在，也相信民心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我们只提倡分析的态度，而不鼓励预设的立场。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上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很赞成。但对他接下去说的话，我有疑问。他说：“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很奇怪：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努力研究、吸收和综合包括中国过去和外国在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怎么能够先用“封闭僵化”和“邪路”这样肯定的断语，一棍子把所有人通通打死，自己“坚定不移”起来了呢？

习近平在十八大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讲得很好，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交口称赞。但是，我也还是有些许疑问。他说：“我们人民热爱生活，盼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盼望着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将人民的“盼望”和“向往”开列得很详细，但是我觉得，他有意无意地把人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盼望”和“向往”漏掉了。其实，目前中国有很多人更“盼望”和“向往”的是：自己能够亲身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如何正确引导、组织和帮助他们实行这种“盼望”和“向往”，这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人民“盼望”和“向往”民主。讨论中国的问题，民主这个话题是绝对绕不过去。

讨论中国问题，还有一个话题也是绝对绕不过去的。这就是：文革。

两个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文革。如果把这两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合并成一个话题，那就成为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这个课题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孙怒涛的书，已经将这个新课题推出前台。

孙怒涛的书名是『良知的拷问』。但是，我们知道，“良知”还不是王阳明学说的核心部分，王阳明学说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是“致良知”。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就是：把握良知这个根本，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然后达到知行合一、经世济民的功用。

如果仅仅停留在“良知”的层面，那么，孙怒涛这本书的价值还是有限的。因为拷问良知的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道德的养护，或者为了他个人的灵魂救赎，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作用就不是太大。值得庆幸的是，孙怒涛的书并没有停留的拷问自己良知的层面。虽然还不是那么自觉、那么目标明确，看得出来，孙怒涛确实努力在用他的良知，内心反省式地诚恳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比如，他特意地追忆了群众组织从个人、战斗组、串联会、纵队，慢慢成长，再分裂成两大派的过程，显然是想去探求群众性民主组织的发发生机理。又如，他提出所谓“优质生”和“差质生”这样一套概念，其目的或许是试图寻找出诠释群众性民主运动发生的内在动力学。

下面，我从孙怒涛的书中再抽离几条出来：

1) 政治道德底线。文革中，有些人不讲政治道德，唯权术是尚。比如，当时蒯大富就热衷于什么权经。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常常迷失道德底线。尼克松的水门，陈水扁的两颗子弹，就是例子。但是，孙怒涛现身说法，指出民主政治必须讲究道德底线。

2) 从民众运动中产生领导。各种政治制度以不同的方式产生领导，古代有禅让、有嫡传，现代有选举、有内定。文革开始，领导群众的是一批高干子弟，搞的是“红二代”接班，有点像嫡传，也有点像内定。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生命力。文革转到群众民主运动阶段后，从民众运动中产生一批群众领袖，像团派的蒯大富，四一四派的沈如槐。这种产生领袖的方法，具有最大的优越性。一般来说，这些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不但有能力、而且也是有群众基础的。孙怒涛在他的书中说到沈如槐成为四一四的一把手的大致过程，沈如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把手，主要是得到群众的认可。现在回头去看，沈如槐这个一把手也确实比孙怒涛更合适。你想，孙怒涛连要不要把四一四从井冈山中分裂出来，是那么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怎么当得了这个派的一把手呢？

3) 民主政治的致胜关键是争取中间群众。虽然，孙怒涛当四一四的一把手不合适，但他对四一四的存在和发展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怒涛说，如果没有他所代表的势力，四一四肯定还是会分裂出去，但是最后能否生存下来，和向什么方向发展，就不好说了。这句话说得很客观。当时，四一四在明显得不到中央支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广大中间群众的支持，并且抵消掉太极端的政治观点，

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在所有民主政治中，两派力量最后决战时所要竞争的对象，都是中间派群众。最后决定成败的，不是得到多少铁杆分子（所谓‘铁票’）的拥护，而是在游移不定的中间派中能够赢得多少份额。争取中间派的过程，也是两派修正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往往双方都会向中间靠拢，克服走极端和情绪化，变得更为理性。

4) 妥协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妥协政治。因为，民主讲的是共存，并不是这一派要完全吃掉另一派。要共存，一方面要善于斗争，一方面还要善于妥协。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它的议会通过的所有决议案，几乎也全都是妥协的产物。

5) 责任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最近我看“参与民主”理论创始人佩特曼的书，她把“责任和妥协”等等，称为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由此可见，一个缺乏公民责任心教育的民族，要实现民主政治是很困难的。

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显然就不单单是“良知”，而是“致良知”了。而“致良知”，知行合一，就可能产生经世济民的社会功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看到，孙怒涛对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还不是那么自觉，目的性还不是那么明确，有一些根本性问题尚未触及，比如：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有什么内在矛盾和缺陷，将它导致一场血腥的民族的灾难。我们提出这一点，没有丝毫要苛责他的意思。相反，这恰恰说明，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工作。目前国内文革研究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动手做的人，还是很少很少。

的确，总结文革期间大民主实践，这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写了这篇拙文的初稿以后，我曾经将它寄给几位朋友征求意见。朋友们的意见非常两极。有的人强烈坚持对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他们说：文革中，当年我们在学校里自由折腾，没有明确的行事规则，也没有清晰的自我追求目标。在整个文革中，真正的民主内核并不存在，民主的诸多要素也未显现，不能认为是一次大民主的实践。我们当年文革中的战斗组文化，怎么能够同台湾现在的政治民主相提并论？

但是，也还有较多朋友，对这个课题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和热情。有位朋友说得很动情。他说：这个课题给反思文革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认识我们那几年无比真诚的折腾。我从心里赞成。因为一直不甘心，甚至不放心已经付出血泪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发现价值”和“深加工”的使命这样轻易地放弃，把它完全交给后人，或者那些政治家和历史专家。

我十分感谢双方朋友的不同意见。有人热情响应，固然高兴；有人强烈反对，至少说明这个课题能够触动人心。我今天说的“总结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实践”，绝对不是号召大家都来为文革唱赞歌，最主要的当然是总结失败教训。以上朋友所述，在整个文革中，真正的民主内核并不存在，民主的诸多因素也未显现。如

果这些朋友能够把我们当年的战斗组文化同台湾今天的政治民主作一对比，详细阐明什么才是真正民主的内核和要素，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课题讨论的成果了吗？

我最没有想到的，还是几位70后和80后的反应态度。他们都是我的子侄一辈，分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竟然对这个课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那位70后，偶然看到拙文草稿，特地给我发来一封信，信中说：“陆叔叔，有幸拜读您的读后感，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文革大民主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对现今国内已发生的种种和将来的种种可能性，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非常希望能读到您这篇读后感的下篇，并期待着暑假能见到您！这是一个很新的话题，要使之成为一个课题从而能够沉淀出一些普世的价值还需要很多人，包括学术界的很长的努力。但是我从您的文章里读到的真诚，我想会对很多人，尤其是我们，您的晚辈们有所启发，从而参与到这件事中来。”

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期待。我期待着，有更多的文革亲历者，尤其是更多下一代的年轻人，参加这个文革研究新课题的开拓和讨论。

文革春秋

周家琮

文革春秋

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少读《孟子》，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颇为存疑，窃以为又是孟老夫子的夸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尚不能阻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区区几篇被王荆公后来讥为“断烂朝报”的鲁国史稿，岂能吓退“乱臣贼子”？及至文革，得以见识春秋历史，如何充当权谋政治的利器，将政敌杀得落花流水。自此叹服《孟子》所言不诬。

文革发难，点来祭旗的乃明史专家吴晗。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檄文，定了吴晗以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替彭德怀翻案的滔天大罪。可怜吴晗对党和领袖一片忠心，早已和清华大师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道扬镳，笃行史学为政治服务之宗旨，却率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晗的“三家村”同党邓拓、廖沫沙，亦难逃借古讽今恶毒攻击之罪名，被揪出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其时凡涉笔历史题材的文人，无不冠以同一罪名，被斗得不亦乐乎。替本为文革主攻对象的“走资派”们，颇挡了一阵子枪林弹雨。

借古喻今虽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罪名，但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却可以成为文化革命的重型武器。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矛头暗指党内高层。此文与戚氏另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皆深得领袖首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革进攻的号角。紧接着6月3日《夺取资产

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又扯出史学旗帜为政治斗争摇旗呐喊。及至 1967 年，对刘少奇见报的首次变相点名批判，还是借道戚本禹批判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本为武器批判高手的林副统帅，也祭出批判的武器，在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列了一连串烛影斧声、政变夺权的历史案例，杀气腾腾地渲染政变敌情。伟大领袖闻之虽称不安，但其后就有了关于“二月兵变”的流言。一直到文革后期，褒王安石以挺文革；贬宋江剑指“投降派”；孔夫子陪绑副统帅再遭批判；秦始皇和法家被捧到天上。文革大戏的每场演出，几乎都不乏历史的幽灵登场。

以文艺和学术为政治工具，文革先锋的几个秀才并非始作俑者。样板戏的前驱及指导思想，可溯源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延安时期。史学从学术的“道”沦为政治的“器”，同样有其革命历史。延安时的陈伯达，写过指桑骂槐讨伐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跟形势的郭沫若，也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及时敲响警钟而得领袖推介。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并未因一片苦心的借古喻今而改变。郭氏为抨击秦始皇的现代版蒋介石，还写了本貌似历史著作的《十批判书》。然而长于戏说历史的郭老却被历史戏弄，二十多年后该书因不合文革需要，反被钦定为“《十批》不是好文章”。1948 年吴晗所作《朱元璋传》，亦可窥见对蒋氏黑暗统治的影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本乃风闻领袖赞扬海瑞，为迎合圣意服务政治所为。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曹禺的话剧《胆剑篇》、若干画家的颂圣之作，皆异曲同工。岂料却被选为进攻突破口，作了文革炮火下的冤魂。学术为专制政治服务之险恶，亦由此可见一斑。

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倘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运用，自难拘泥于史实。在所谓“以论带史”的招牌下，歪曲史实践踏历史，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证明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光荣正确由来已久，而“走资派”早就是机会主义或叛徒内奸工贼，从安源罢工到井冈山会师，从遵义会议到西安事变，重大历史事件本已模糊不清的面目，被肆无忌惮地进一步歪曲篡改。为了文革旗手江青的历史伪装清白，甚至不惮毁灭史料、置见证人于死地。历史造假运动中，被诬者有口难辩，知情人噤若寒蝉，历史遭到最无耻的践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本乃专制文化的传统厉有师承。孔子标榜“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恶迹以扮厚道，却霸道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门徒子贡也明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对此心中有数，提醒人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近乎文学想象、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自隋文帝禁私史，秉成王败寇之宗旨，替当今主子文过饰非的官修史书，更不在话下。民国以降，国民党对辛亥之役贪天功为已有，对党魁独裁、通款东瀛、帷薄不修等皆讳莫如深。延安时期，既以满纸谎言、令人作呕的联共党史为权威教材，同样亦步其后尘，将重构党史作为

整风的重点，并以此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党史自此开始注水，直至发展到文革的大规模历史欺骗。

与造假并列，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手段，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在言必称三代的古代中国，改革祖宗法度，自属大逆不道。要争取改革合法性，除了假天象伪称天意，只有托古人以扮神圣。王莽搞土改，蓝本是莫须有的古“井田制”。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其实也如政敌所云“好学而泥古”。变法中推行的“均输法”，学的还是西汉桑弘羊。康南海闹变法，也要下功夫攒二本《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为变法思想寻找历史资源。甚至到了大跃进年代，自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的领袖，为证明人民公社乃古已有之的良策，还搬出东汉时的“五斗米道”，推荐给高级干部以资借鉴。文革标榜继承古代变法精神，颂扬商鞅王安石的闹剧，皆与之一脉相承。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今中外的人们，都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也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借“古为今用”之名，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影射史学”盛行，历史赤裸裸地沦为权谋政治的工具，在中外历史上却十分罕见。文革发动者曾构陷他人，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借春秋史事，作为政治斗争重要武器，倒是文革的一大发明。与副统帅的“四个第一”等，皆可归入其“有所发明”之序列。所可疑者，是文革发动者虽满脑子帝王将相，但历来自诩厚今薄古，鄙视先人。文革初期的社论文章，无不狂呼踏倒三坟五典，誓与传统决裂。何以每至文革重要关头，却都偏好借春秋史事，来发动现实的政治斗争？

原因也许有很多：中国历史悠久、史料资源丰富；领导人鄙视言必称希腊、也不怎么引证马列但谙熟旧史，言及中国赫鲁晓夫时，还不忘赵匡胤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历史故事和戏文为百姓喜闻乐见，便于运动群众；附庸于皇权政治的史学传统，和“王前巫而后史”的史官文化等。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也许还是长期军事斗争的传统，以及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文革借道所谓历史学术批判，迂回攻击的斗争策略。正如工程师出身的官员热衷“工程”，相信人才教育、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皆可借各类工程造就。1949年之后，执政者囿于长期军事斗争和地下身份的惯性，未能跳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窠臼。怀疑一切夸张敌情、领导人警戒森严、政务过度保密，皆沿袭了尚处于地下时的心态。沿袭军事斗争发动战役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治理，经济、文化、政治方针，皆以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实施，文革时登峰造极，相沿成习迄今余绪未了。翦除妨碍“继续革命”的同僚，伟大统帅采取自称“剥笋子”的手段。而高饶、而彭黄张周、而彭罗陆杨、而刘邓，取法兵家梯次展开、各个击破之策略。整肃罗瑞卿，被通知与会的元帅和中办主任，会前居然相互打听不知会议何为，亦合兵不示形、突然袭击的战术。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文革后期“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的教诲，言之谆谆者正是众所周知的谋略大家。其“引蛇出洞”的反右妙计，更是“兵不厌诈”的经典。有何种内政就有何种外交，1958年将访华的赫鲁晓夫蒙在鼓中，却造成炮击金门有苏联背书的假象。虽一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然大国外交行诡诈小计，是否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亦恐一言难尽。所以文革之役伊始，并未取正面进攻的态势，而是借道历史批判声东击西、迂回包抄；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诱敌深入；在攻击敌营时梯次展开；以地下方式派江青去沪组织文章，皆为用兵之道。

当然，文革之初没有贸然正面进攻，除了对兵者诡道的擅长和爱好，也取决于文革之际的实际政治格局。格局之一是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经显示，党内多数并不赞成极左路线。文革发动者虽吹嘘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打倒政敌，但文革伊始要一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打倒大批党内军内所谓走资派，全面推行文革路线，以党内民主方式决策并无胜算。诚如李鸿章论及对日之战时所言：“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前有袁项城称帝错估力量对比不远的殷鉴，后有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晚近之教训，战略大家岂会掉以轻心。于是除了采取迂回斗争策略，文革前夕还成立“首都工作组”，充实京畿卫戍，以军事领导任文革副帅，真正做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尽显军事家缜密之谋略。文革之际政治格局的另一特点，是所谓一线二线非制度化的二元权力格局。形式上一线刘邓主持工作，实际上二线通过政治运作和个人崇拜依然大权在握。形式上党内决策有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老大为所欲为乾纲独断。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虽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迷恋于不按规则出牌，但一线的存在和合法的程序，却还不能完全绕过和马上推翻。虽似已君临天下，但离秦皇汉武的予取予夺，虽心向往之却相距尚远。痛斥政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正是上述尴尬心态的反映。于是，古为今用的春秋手法、迂回包抄的秘密策划，便成了文革发难的不二手段。而与之类似的二元权力格局，自遵义会议之后几与党史相伴。流毒至今，又演化为废除领导终身制与退而不休的名实相悖，成为实现政治透明有序、安定团结长治久安之大碍。此种表里不一名实相悖的二元社会现象，不但存在于高层权力结构之中，在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亦随处可见，还蔓延至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潘汉年案胡风案已经钦定结果，却装模作样履行审判程序披上合法外衣。小至以徒具虚名的招投标掩盖内幕交易，大至领导人退休年龄、选票多寡入局划线的权变，皆在显规则牌坊之下，掩潜规则运作之黑幕。且表演者行之若素不以为耻，围观者习以为常不以为忤，由此政治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则毫不足怪。

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贾谊说：“攻守之势异也”。从造反者到执政者，观念和行为需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政治透明公开、运作规范有序，方可谋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文革发动者却背道而驰，昧于革命和执政攻守迥

异之势，政权于“马上得之”，以为仍可“马上治之”，热衷继续革命，醉心玩弄政治权谋。从整风反右的转守为攻、所谓居二线的以退为进，到文革初期的迂回包抄、坐山观虎斗，雄才大略挥洒自如。后果却是国乱民穷、灾难深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尤其党内民主固然有了长足进步。然毋庸讳言，酿成文革惨剧的体制基因并没有得到根除，言行相悖表里不一、思想浅薄却热衷权谋的文革遗风仍沿袭泛滥。一面高唱权为民所用，一面肆意挥霍纳税人血汗。左手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右手送子女入国外贵族学校。环顾政界商界学界，乃至体育界慈善界，“运作”、“勾兑”成风，厚黑学成功学大行其道。商场官场皆战场，迷恋于孙吴兵法、申韩术数，挂显规则之羊头，卖潜规则之狗肉者，代有传人。经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产生交易成本高昂的柠檬市场。经济前景不确定，导致投资衰退经济活力降低。政治运作的不透明、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既助长官场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更驱使人们用脚投票纷纷逃离。谋划今日之政治体制改革，对权谋政治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可不察；对文革时代政治文明的败坏及遗毒，不容忽视；对文革领袖的权谋乱国，更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清除文革政治毒瘤，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绕行和逾越的一道坎。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借春秋笔法影射现实。在专制统治的岁月，阴谋家利用历史玩弄政治权谋。虽然这一切也许正在成为历史，但只要所谓政治挂帅、以革命的名义无不可为的核心价值观，得不到反省和清算，利用爱国、利用反腐、利用为民请命、乃至利用唱歌玩弄政治权谋的闹剧，仍将不断上演。文革春秋，其无后乎！

通注文革之路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普京在纪念大清洗牺牲者集会上的讲话

人类对天灾的认识，曾经相当的蒙昧。洪水袭来以人性祭河伯；大旱降临君王惶恐、下诏罪己；瘟疫流行，原始部落认定有魔鬼附体；直到今天，仍有人相信地震、艾滋，是上帝在惩罚人类。而对于社会灾难即“人祸”的由来，或因偏见而蒙蔽，或为利益所左右，欲谋共识，更难于天灾。诚如洞明世事的列宁所云：几何公理如果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推翻。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波匈事件，走上街头的当地百姓，争的是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苏联傀儡的波匈领导人，埋怨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闯了祸；莫斯科怀疑是华盛顿的颠覆阴谋；对秦始皇坑

儒推崇有加的毛泽东，则断言是反革命杀得太少。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二百多年前，其起因今天仍被关注和讨论，且见仁见智聚讼未决。所以讨论文革起因、探究“通往文革之路”，纷争和歧见更不可避免。

关于文革之起因，迄今尚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得以见之于官方文字。唯一权威的说法，是1981年就历史问题所作决议的表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灾难。此说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以避免纷争稳定局势，或未尝不可。但时至今日，倘仍以此概括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无论如何再也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历史事实的检验。首先就历史观而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汤因比，都不会容忍把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少数个人的历史解释。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此早有深刻论述。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都要通过政治人物的行为得以实现，政治领袖不过是政治集团及其思想和制度的LOGO。把政治灾难归咎于政治人物的错误或破坏，无异于同语反复。说文革是领导犯错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断言戈尔巴乔夫头搞垮了苏联一样，是将个人作用置于客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规律之上，可以奉上一顶“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论的帽子。况“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江青，此后一直未离中枢和领袖。是什么样的政治熏陶和长期教诲，居然令其沦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让她青云直上身居高位，进而作恶多端为所欲为？岂不令人深思！其次就参与文革的群众动机而言，当年从工厂学校到穷乡僻壤，亿万群众狂热投入革命，文斗武斗不顾身家性命，绝大多数皆抱天真而愚昧的追求和信仰，岂可归因于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欺骗？最后就文革的历史事实而言，文革祸乱全国，被迫害者众加害者亦众。庙堂之上，文革后来挨整者，先前几乎皆有整人之过。每逢整肃党内高层，明哲保身、随声附和者固不鲜见，落井下石、为虎作伥者亦大有人在。在整肃同僚的道路上，文革发动者从来都不是孤家寡人。江湖之广，支持参与文革动乱者，更是不计其数。所谓反革命集团固难逃其罪，然众多恶行的实践，无不假手于各级干部和亿万民众。德国人反思二战灾难，并未把所有罪行向纳粹头目身上一推了之，而是同时反省自身和全民族的错误及责任。不能正视文革年代全党全民之过，为了维护虚假说辞和推脱责任，讳言甚至无视我们自身的错误，同类的错误势必再犯。只有深刻的文革历史反省，才能昭示后人教育下一代，才能真正总结文革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皆源于事件主体内部的深刻矛盾。既非外部力量所可左右，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得以酿成。希特勒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苏联解体、中国文革，莫不如此。文革十年动乱，自有其社会、制度、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的深刻原因。文革前在高校，号召学生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通往文革的历史必由之路。

中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残酷的族内迫害，都离不开蛊惑人心的狂热教义和

思想，文革亦不例外。文革主力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点睛之句，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文化大革命，靠的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古今中外的革命狂热，都以迫害异端彰显其合法性。“继续革命”也需要不断发现作为革命对象的阶级敌人，以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文革前夕已经发出的信号弹。文革自始至终的战略方针，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纲举目张”。有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神圣名义，迫害干部群众师出有名。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红色后代们把文革当成盛大的节日，欢呼终于又获得象父辈一样投身革命、接班做主人的历史机遇，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犯下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指导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既有承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处，而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对世界政治潮流的警觉和应对。文革发动者对“和平演变”的预见，不逊于布热津斯基和尼克松，令人不得不钦佩其政治上的战略远见。“马上得之”的老革命夺取政权后，遇到了统治权力的合法及传承的新问题。毛氏在 1967 年斥责清华 414，说他们主张“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显然透露出其中的焦虑。克里斯马式的权威崇拜，在打江山的第一代逝去后必然风光不再。虽说“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以血缘世袭避免政治动乱，也曾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放眼全球除了几处孑遗残留，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民主选举迹近和平演变，江山流血得来岂可拱手让人。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维持统治合法性并得以延续。其时海峡对面，同样面临世界政治大潮对集权统治合法性的挑战，虽应对和结果与之截然相反，却充分说明文革绝非领袖心血来潮和坏人阴谋，而是应对世界政治潮流之历史必然。

文革思想资源的另一脉，来自“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封建专制思想。以封建专制思想对抗资本主义的把戏，《共产党宣言》早有揭露。文革却公开标榜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反修防修”的旗下复辟封建专制，上演了现代版焚书坑儒的惨剧。文革发动者深知，多元包容的文化、闪耀人类良知光芒的普世价值，与专制统治冰炭不相容。因此声称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还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而掀起了文革破四旧、批封资修、与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决裂的疯狂浪潮，以实现久加诺夫所说的意识形态垄断。不愧为“好学生”的副统帅深谙此道，声称“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以军队为发源地，以个人崇拜为旗帜，全面推行思想专制。在经济思想领域，为了维系掠夺式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批判尊重价值规律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道德领域，为了让人们安贫乐“道”，泯灭向往美好生活、追求人权自由的天性，做一颗为革命献身的螺丝钉，号召学习据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人物，最后演化为“斗私批修”的闹剧。

文革最崇高的思想支柱，是实现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自宣称苏联变修之后，

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担负起拯救世界三分之二苦难人民的神圣责任，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赤化全球，成了文革狂热的精神支柱和崇高理想。国外的文革追随者，既有恐怖组织赤军红色旅，又有西方国家的校园骚动，竟一度让文革发动者产生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幻觉。而向柬埔寨等国输出的革命，颇得文革发动者嘉许：“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近代以来，中国效果最显著的一次意识形态输出，也许就是支持指导红色高棉。结局却是青胜于蓝的屠杀、惨绝人寰的灾难。

亿万群众卷入的文革动乱，之所以一触即发愈演愈烈，也是当时诸多社会矛盾的反映。是实行比较务实，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施政方针，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继续革命？历经批判反冒进、开展反右倾，党内尤其是上层为此一直存在路线分歧和斗争。包括文革中期的九届二中全会，高层所暴露的分歧，也部分反映了这一矛盾。大跃进的失败特别是大饥馑的灾难使基层干群滋生不满。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和整人者、既得利益阶层和被边缘化阶层之间的矛盾，结怨积聚已深，后来成为许多单位派别对立的历史根源。搞特权腐败、骄奢霸道的大小“土皇帝”，与民众对立干群矛盾已相当尖锐。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又有当权者按以往运动套路整人以自保，制造了新的干群矛盾。由此不难理解，文革初期打倒当权派的燎原之火，为何得以迅速蔓延。

文革灾难得以泛滥，离不开专制传统和制度基础。秉承二千年顽固的皇权专制传统，不少党内高层以臣仆自居，有忠无诤，对文革的倒行逆施不敢反对甚至为虎作伥。亿万民众成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愚民，甘心充当文革炮灰。是文革发动者利用了官民众生的愚忠，而不是他被什么坏人利用。独立思考对文革持怀疑批判的少数，遭到无情的镇压和屠杀。党内长期形成的家长制，使违背党内多数意志的一项项文革决议、一桩桩重大冤假错案，仍然形式上通过了合法程序。高度集权毫无制约的一元化体制，加上个人对军队的高度控制，使文革意志得以在动乱中推行。文革令人发指的无数暴行，更有赖于长期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阶级敌人”的人权毫无保证的法治状况，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制度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文革中被推荐为学习重点。其中就坦然宣称：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文革中的确不乏坏人作乱，但首先必须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让坏人得以掌权还可以任意为非作歹。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对文革发生的制度基础，有过深刻的思考和论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

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正是历经文革磨难后的深刻反思，邓氏才会发出上述高屋建瓴之论。遗憾的是如此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当时就有人说不要再讲，而后直至今天，更是被束之高阁无人再提。

文革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文革尘埃甫定，有人说文革是灾难空前。谭震林老闻言大怒，历数苏区肃反延安审干之事，证明党内残酷斗争源远流长，文革绝非空前。文革的思想文化批判，不过是批胡适抓胡风、评红楼批武训传、思想改造拔白旗的延续，更远还可追溯到整肃丁玲王实味。文革的打倒一切，之前就有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的多次预演。文革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四清”即已明确的运动重点。文革中达到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州大地更是早已轰轰烈烈。且始作俑者居然皆为文革主要打倒对象，其中某公大难临头之时，还不忘自己对山呼“万岁”的首创权。文革中一度泛滥的血统论，也出自文革前早已存在、打着阶级路线旗号的严重身份歧视。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种种暴行，文革前早已普遍存在并得到鼓励。文革前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灌输和实践，造就了文革中斗黑帮、打黑五类的血腥和疯狂。也使得昔日的同学同事、甚至亲人间文革中相互为敌，为了谁代表革命路线、谁拥护领袖而自相残杀。如果不是井冈山时期就发生过AB团之类的血腥事件；如果不是延安时期就制造了大批“内奸”冤案；如果没有类似胡风集团的奇冤；如果执政后不曾从中央到地方，仍不断揪出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人们怎么会相信：那么多不畏白色恐怖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职业革命家，在文革中统统成了应该打翻在地的黑帮？如果没有文革前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丑化、清洗，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的国度，文革中怎么会到处发生学生毒打老师的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刻意渲染仇恨颂扬暴力，又怎么能想象联动的十几岁花季少女，文革中会成为嗜血的法西斯冲锋队？如果不是文革前长期盲目颂扬历代农民造反，文革群众运动怎么会效仿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愚昧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无视法律践踏人权，就在首善之区北京，文革中对扫地出门、草菅人命、乱打乱杀的惨剧，怎么会竟然听之任之无人制止过问？

历史的逻辑是无情的，漠视者难免付出惨痛的代价。以为政治迫害并非社会机体系统沉疴，不过是领导人一时犯错，少数坏人作恶，有人不小心倒霉，而自己可以侥幸置身局外甚至幸分一杯羹，历史的悲剧就会不断重复上演。当 1957 年的周扬和老舍在批判右派时，绝不会想到 9 年后自己会遭遇更惨烈的暴行；当 1958 年亿万人民热火朝天投入大跃进时，他们也难以预料不久就将遍地饥荒道有饿殍；当 1964 年特大型红歌《东方红》在人大会堂隆重上演时，台上台下兴高采烈的人们，更不会想到二年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将和台上扮演的地主恶霸一样遭到批斗；当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颂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革命行动，灌输“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格言时，又怎能想到当年地主戴的高帽子，很快就要被无情地戴到自己头上；当文革之初红后代们以为接班时机已到，忠心耿耿地要做伟大领袖的红色卫兵，对“黑七类”疯狂施虐时，更想不到他们的英雄老子很快被一批批打倒，自己不久也被投入大牢；而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后又被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蒯大富们，当他们从此义无反顾地要追随伟大领袖，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时，更是做梦也想不到，几年后会作为文革替罪羊沦为阶下囚。历史的悲剧不只眷顾芸芸众生，当 1967 年的国家元首悲愤地手持宪法，申张自身权利时，不知他有没有醒悟：延安整风自己向党的领袖山呼万岁时，已经为文革种下了苦果；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当数百万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民族精英，不经审判即被流放关押时，有没有人申张他们的宪法权利；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当他在庐山卖力批判彭德怀时，甚至当他举手同意整肃“彭、罗、陆、杨”时，已经注定自己同样悲惨的下场；不知他有没有反省，就在“四清”中甚至就在一年前，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农村、工厂和高校，又迫害了多少无辜群众，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了文革罪人的蒯大富们；甚至我们还可以揣测：此时他有没有羡慕和向往，有媒体或者街头可以就文革开展辩论，有议会或者法院可以申张正义，有选举或公决可以听从民意，决定胜负……

洞察“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苏洵，在《管仲论》里又说道：“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革之祸早有由兆。文革和此前一场场政治运动，高举的是同一面蔑视人权和生命、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依赖的是同一块个人专断、践踏法治的制度土壤；运用的是同一套群众运动残酷斗争的手段；文革依靠的主要打手，也还是延安整人的康生、反右的棍子姚文元、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反修论战的先锋王力。文革前的一场场政治运动，早已铺就了通往文革之路。

对社会灾难起因的反思和认定，可以照见时代的智慧和良心。文革后陆定一、周扬等大彻大悟反躬自问，闪耀着老一辈的良知和真诚。而遇危机则归咎“外部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有动乱即声称系不明真相群众受别有用心之人欺骗，惟独不肯面对现实检讨自身，正是缺乏自信良知泯灭的表现。讳言文革真实原因的

代价，不仅是执政者政治诚信资源的丧失，更危险的是始终讳疾忌医，则沉疴再发势所难免。错判病因固然会庸医杀人，不查明安全事故的真实原因，要防止事故再次发生，正如西谚所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重大政治“事故”的真实原因采取鸵鸟态度，必将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清末迭遭外侮危机深重，昧于政治革新的专制维护者，认定只是船不坚炮不利，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望办洋务拯救帝国却加速王朝覆灭。六十年代初明明是旗帜三面饿殍千万，却对外谎称是“三年自然灾害”，对内刘少奇的报告归咎地方的“分散主义”，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领袖，则一如既往地认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由此发起文革的前奏“四清”。苏共二十大揭露了集体化和肃反的灾难，但仅仅把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启动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最终积重难返苏联顷刻瓦解。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执笔《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历史灾难归咎斯大林个人错误的，正是后来主持起草决议，把文革原因又说成是领袖犯错、坏人利用的胡乔木。《再论》写到：“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触及要害的深刻提问，却给出了今天看来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他（指斯大林）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当年的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则断言：“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风雨雨，所谓第一支笔的僵化思维，居然没有半点长进。竭力撇清苏联大清洗、中国文革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系，良苦用心可谓一以贯之。如果说当年我们无缘读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百年国际共运史的血雨腥风也不甚了了，更没有经历过文革劫难，相信了第一支笔的自欺欺人之言。那么今天我们已然明白：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领导人的错误总要酿成巨大灾难。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朝鲜，所谓坏人总会出现领导核心，不断产生又被反复清洗。文革要说有所贡献，或许就是政治神坛之上，过去庄严的偶像被从此击碎。目睹了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仓皇出逃，觊觎接班人的薄氏野心家道貌岸然却五毒俱全，比戏剧还精彩的官场丑闻、前赴后继的贪腐政客，难道我们还会天真地相信，庙堂之上尽皆天使和救星，还会轻率地把国家兴衰、百姓命运，仍寄托在领导人不会犯错、不出坏人的天方夜谭上吗？所谓领袖犯错和出现坏人，不过是专制制度人格化的载体和表现。薄熙来罪行的暴露虽系偶然，但却又一次雄辩地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既不能阻挡劣迹斑斑者登上高位，也不能防止位高权重者胡作非为。为防止灾难卷土重来，唯一靠得住的是，让公仆们的任免去留由民主决定，把公共权力关进宪政的制度之笼。万一领导人又“冲昏了头脑”，则尽快把他赶下台，而不是继续高呼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汶川之难，总理曾引“多难兴邦”的典故与国人共勉。然揆之史实，无论是

春秋之际灾难频仍的楚灵王，还是李鸿章在遗折中以多难兴邦为之打气的清王朝，并未曾因多难而中兴。日寇侵华之难，虽有人当成机遇作无耻感谢，但中华绝非因此而兴邦。观之现实，频繁发生的矿难、水灾，也未使预防工作自然得到切实改进。要实现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灾难的教训，其前提又是必须真诚面对灾难的史实和原因。反之，如果以“宜粗不宜细”搪塞敷衍，借口“团结一致向前看”，推卸弄清真相总结教训的历史责任，则侈言“多难兴邦”，只能是欺人之谈。遵义会议因军情紧迫，对军事之外的其它错误并未清算。但到了1941年，面对抗日、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回避历史上的错误及原因，就不可能明确和统一今后的路线方针。从确立领导权和夺取政权的角度，延安整风前期对历史问题的回顾和清算不可或缺。在反思历史教训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亦居功至伟，中国社会由此获得三十年巨大进步。但囿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局限、稳定局面经济建设的迫切、以及历次党内斗争老一代恩怨的盘根错节，并没有对文革及之前的错误，进行系统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今天当我们又为不断积累的新旧矛盾所困扰，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寻找路标时，必须补上反思文革、全面总结历史教训这一课。让文革真相大白天下重拾社会信任；反思文革病因明确改革方向；检讨文革的制度积弊制定改革措施；清除文革的思想余毒求得改革共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文革，推动改革再次出发；才能告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冤魂；才能坦然面对尊重历史的文明世界；对于终究要拷问历史真相的子孙后代，也才能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才不致迷失方向、蹉跎徘徊更不致复辟倒退。我们的后代再说到“多难兴邦”时，庶几可将我们今天的努力，作为光荣而不是梦想，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以史为鉴

人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

—— 罗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本乃“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夫子自叹。二千年后记者会上再闻总理此言，听到的却是功罪自有历史评说的无奈和坦然。面对黯淡的现实，人们往往寄期望于历史。起义失败的青年卡斯特罗，在法庭上陈辞慷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面对枪口的匈牙利改革领袖纳吉大义凛然：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文革被活活打死。卞的先生王晶垚，抗议校方至今

仍对暴行责任者宋某荣誉有加，出语悲愤：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文革中被批斗的国家主席也自我宽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后来党的中央全会决议里，却编造了诬其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在这类决议里，史实如同去年国博北门的孔丘塑像，可以随意搬来搬去，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言虽出自胡适，却并非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适之先生本意，恰恰印证了历史常被涂抹的悲哀。）难怪美国记者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断言：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因此历史是否值得信赖，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人们、记述历史的时代，是否值得信赖。持笔丹青者，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还是小说《一九八四》里所刻划的，温斯顿等专司在真理部篡改编造历史的角色。而借助历史的记录，反过来对记述历史的学者和团体、国家与时代，也可以有更深入的观察和评价。人们从“以史为鉴”、“察古知今”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如回顾明清以降中朝关系，谨防重蹈昔日陷阱；检讨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助推德国纳粹上台；剖析历代变法得失，以资今日改革方略之借鉴；从史事和现实的对照中总结经验教训，窥见兴废得失。还在于能从对历史的态度，照见当下时代的面貌和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论史识笔走春秋，无不折射出当代述史者的观念、立场和道德水准。罔顾史实歪曲造假者，当下必无诚信可言；褒贬古人溢美盈恶，今日之事亦难言公正；对历史疮疤和谜团粉饰掩盖，现实政务的透明公开更不可期待；不尊重历史，就不可能尊重今天和未来。

对待历史最狂妄无耻的当数秦始皇，焚毁载史之书，坑杀记史之人。此前历史一笔抹杀，从他开始才算数，自称始皇帝。与禁写编年史、违者问斩的沙皇伊凡堪为伯仲。与其对历史的态度相匹配，秦政的暴戾苛虐亦为二千年之最。邻邦皆视为虎狼之国，以吏为师、“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的卖官鬻爵，中国不少坏制度坏传统，也是秦代的发明。二千年秦以恶名载史，直到古人今人一概打倒，既扫四旧又斗黑帮的文革年代，才有了“百年皆行秦政法”、“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知音同道。而历代凡重视历史，将修史视为国之大事的，也大抵在所谓太平盛世。对待历史的态度，或可作为有无盛世之象的判据。判断国家亦如此，那个六十年前始则率而冒险、后又求救于中国的邻邦，对中国当年的重大牺牲和救命之恩，在今天的官修史书中居然几近空白。与对历史的无赖相吻合的，正是其现实的黑暗和荒诞。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鼓吹对历史“鄙视过去，迷信未来”、“踏倒三坟五典”，对应的现实，正是政治残酷内斗、经济狂热蛮干、文化专制荒芜。昨天的历史、当下的新闻，统统被政治绑架。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成了“高大全”；苏区肃反、延安抢救的血腥被轻轻抹去；毛选注释谎称西路军溃败罪在张国焘分裂；至于韩战系美帝挑起，饥荒乃天灾所致，万斤亩产的卫星、子虚乌有的冤案，乃至伪造新闻照片，陈毅之头被换邓小平、王海容掉包冀朝铸，处处充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谎言。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尘封的史实得以重见天日，若干被歪曲的历史得到较客观叙述，对历史人物有了多维视角和公正评价。历史学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气象，虽贡献主要来自民间，亦足以彰显社会意识和政治文明的长足进步。但为了政治需要，掩饰歪曲历史的文革遗毒并未肃清。过去对历史的造假，也没有得到正式全面的反省和纠正，仍在误导和欺骗今人。清华一例：投笔从戎献身冀中抗日、却被冤杀的清华学长熊大缜，校园里新立的英烈碑述其生平，镌刻的仍是匪夷所思的“因公殉职”。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历史创伤，官方话语更是讳莫如深。对最值得总结教训的文革当代史，不但未能恪守真诚面对、忠于史实、客观公正的基本史德和精神文明，还刻意抹去文革的集体记忆，以致对文革历史的歪曲和谎言，随处可见。与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世界各国对待类似文革灾难历史的真诚：在西欧，当代德国人以尊重历史赢得世界尊敬。离柏林墙遗址不远，街头公园陈列着纳粹批斗政治犯、冲锋队狂热集会的图片。倘忽视人群面孔，酷似中国文革场面。在慕尼黑市郊，囚禁过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的达豪集中营，笔者目睹一批又一批的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悼念受害者，反思民族历史上丑陋的一页。在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本世纪初又建造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规模十分可观，镌刻着众多犹太受难者的姓名。英国官方于1998年，对26年前镇压北爱尔兰游行的真相，进行了调查、公布和道歉。连罗马教廷也宣布，纠正自己6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在东欧，俄罗斯在斯大林肃反的屠杀地、莫斯科布托沃射击场设立了大清洗纪念地。在喀琅施塔得，为被镇压的兵变死难者竖立了纪念碑。10月30日被定为俄罗斯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日，纪念集会上一一公布大清洗死难者的姓名，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再次唤起。出席集会的总统普京告诫：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乌克兰把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纪念斯大林时代饿死的同胞。在北美，美国人对历史上的扒粪时代、三十年代大萧条、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种族歧视等历史疮疤，记述唯恐不够详尽。对歧视华工和日侨的历史，也公开承认并官方道歉。在非洲，南非有纪念索维托惨案的博物馆。在亚洲，蒙古有“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韩国有“真相与调查委员会”，调查并公开韩战期间政府对左翼人士的迫害。在中国的台北，也有马场町和景美人权文化公园，纪念包括中共人士在内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称他们为“追求社会正义的热血志士”。白色恐怖的罪魁祸首虽非国民党莫属，时任台北市长的国民党人马英九，却并未忌讳为公园命名并对死难者悼念。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警示国人引为殷鉴”的勒石镌文，发人深省。环顾全球，大陆对待文革历史态度之特色，实在令国人蒙羞！

文明各国，对包括灾难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建设纪念场馆，开展纪念活动。惟独中国文革，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已过去三十年，除汕头和大邑二处难副其实的民间展览外，官方的态度仍然是冷漠和禁绝。温总理出访之

际，去奥斯维辛悼念异国的政治死难者，诚为文明国度官员应有之风范。然国人岂不因此而困惑：偌大中华，何时又能辟一隅之地，也可供国人悼念文革受难同胞？民间的“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开了二年竟被封杀。倒是很有美化文革之嫌的“五七干校纪念馆”、“知识青年博物馆”，在若干地区堂皇开张。粉饰苦难岁月和荒谬政策的电视剧《知青》，同样可以高调上演。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无论是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燕园、还是红卫兵发源地清华附中、毁于薄熙来红色恐怖的清华二校门、以及本乃斯文之地，老舍等文人却在此遭毒打的国子监、打死校长的师大附中、批斗国家主席的中南海，今天一概看不到当年文革的任何历史踪影。中宣部明令规定，对文革出版物要“严格审查”。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研究仍属禁区。《东方》杂志纪念文革三十年的96年5月刊，被勒令销毁。2006年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众多媒体准备的纪念文字被禁止。荧屏之上、官方出版物中，八十年代后文革题材的作品已十分稀见。眼下名目众多的周年纪念频繁上演，唯独对于文革没有任何纪念。本世纪以来，建党纪念活动领导人讲话，也不再提起文革。在纳税人供养的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文革研究事实上成为禁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文革的巨大灾难被轻轻简略带过。美化文革的鼓噪，反倒颇能迷惑对文革无知的一代年轻人。去岁刚开馆的国博，举办《复兴之路》的党史展览。与建党初期翔实史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浩劫竟被简化为三张庆典照片。颇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驻足照片之下，摇头长叹。总之不纪念、不研究、不教育、不讨论、官方失语、集体遗忘，显然已被确定为对待文革历史的既定方针。对晚近的一段国家历史，如此刻意回避，不但鲜见于今日文明诸国，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之说，在积贫积弱的岁月或无可奈何。但“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境外”的现象竟发生在今天，只能是大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耻辱。“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文革历史如此被漠视和遗弃，不但暴露了当下的虚伪失信和逃避责任，更预示着今后重蹈覆辙的巨大历史风险。

近年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官修党史问世，自然无法再回避文革。但其中第二卷的文革叙述，同样使人深觉困惑和遗憾。撰写建国后不满三十年的党史，历经十六寒暑、四任研究室主任，恰与司马氏孤笔撰《史记》的光阴比肩。落笔时的纠结、杀青之际的难产，亦可以想见。其中对文革的持论，自不会偏离有关历史问题的正式决议。文革依然被庸俗化为领袖犯错误、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故事。淡化了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文革意识形态根源；忽略了独断专行、破坏法制的文革制度土壤；回避了引发文革的深刻社会矛盾；模糊了文革前极左路线和历次政治运动，必然导致文革的历史进程。对文革的记述，还绝非无心地忽略、淡化了若干重要的经纬脉络：一，忽略了相当一部分文革被迫害对象，在文革不同阶段也认可、参与甚至主导了迫害他人。整肃彭罗陆杨，绝非仅毛林所为；

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和各级当权者，主导了文革抓黑帮、斗群众、斗干部的第一波浪潮；将“黑五类”扫地出门、遣送出京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后来被打倒的老帅亦曾为“破四旧”喝彩；口口声声文革受迫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不但隐匿当年恶行，还无耻地自我标榜最早觉醒，其实是文革前期红色暴行的主力军；文革初期被整的干部，文革后期一旦再度掌权，仍以文革的理念、文革的手段斗人整人。甚至到了文革之后，若干文革曾被迫害的老干部，又以文革手法，整肃曾经努力解放他们的胡耀邦。二，突出文革中各级官员、文化精英所遭迫害，淡化无数普通百姓所受苦难，更刻意回避对传统“阶级敌人”、以及其它干部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对文革初期响应号召参与运动的群众，在后期清队、抓516、一打三反中，被大规模报复迫害的史实，语焉不详；尤其是许多对文革、对林彪四人帮、对发动文革领导人怀疑反对者，惨遭迫害，对其全面真相和指使者，亦三缄其口。对“黑五类”遭灭门屠杀、中外历史罕见的道县、横县、大兴等地的惨案，更只字不提。三，最先冲破文革暗夜的，是一批民间的文革批判者。他们开启了思想解放之先河，其思想和勇气均堪为民族之前驱和骄傲，足以让追随文革的衮衮诸公蒙羞。但文革历史的这一面，他们的代表人物“乾坤特重我头轻”的遇罗克、林昭、杨小凯、“李一哲”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被一笔抹杀。四，由文革前的阶级路线发展到文革中的血统论，折射出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文革中群众派别的形成（如清华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派别）、重大事件和惨案的发生，许多与之关系密切。由血统论折射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但在分析文革时不容忽视，而且在文革后直至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该书对文革中血统论的喧嚣一时，以及代表人物和严重危害，却只字不提。五，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是铸成执政党大错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文革狂热的重要工具。对此民族精神沦丧的一页，作为党史亦毫无记载和批判。难怪个人崇拜的封建余毒，今天又在沉渣泛起。鼓吹个人崇拜的红歌，前一阵又唱响大江南北。六，无论是文革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还是文革中对稳定乱局起过重要作用的“三支两军”，军队在文革政治中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文革时期实行的也是典型的先军政治、先军经济。但该书对先军体制，对军队介入政局、管制社会产生的问题和教训，对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长远影响，却只是一笔带过，缺乏认真的检讨。七，作为今日成书的当代史，对文革时期的经济，不应仍只是从计划经济的视角加以叙述。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深挖洞”方针的荒唐和代价，固不容忽略。文革时期低下的经济效率、掠夺百姓福利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畸形的经济结构，也都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予以记录和纵向的比较。八，内政外交，本为一体。建国初期迷恋于虚幻意识形态的内政，决定了始则结盟苏联继则反目成仇的外交。其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今日颇可检讨。文革的内乱必然影响外交，但该书对包括输出革命在内的外交和文革的关系及后果，亦语焉不详。尤其是中苏关系，

从“说了许多没有用的话”的意识形态论战，到文革中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兵戎相见，不但浪费庞大国力投入备战，甚至一度使国家濒临核打击灾难的边缘。对此重大战略失误，更不可缺少深刻的检讨和反省。

该书辑录史事的缺失，使得对文革若干重大事件，至今仍难窥全貌真相莫辨。文革中党内高层复杂关系之变迁，伴随和左右了文革的进程和结局，该书对此不着一墨。对林彪的整肃缘何而起？侮辱全国人民智商的设“国家主席”说，至今并未正式否定，“九一三事件”仍属文革重大之谜。云南沙甸等地的武装镇压事件、溺亡二十余万人的河南板桥水库溃决，该书对此类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处置、责任和教训，皆若无其事，缺乏起码的交代。对文革中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输出革命酿成的巨大灾难，也只字不提。自孙文以俄为师、实行党国体制以来，党史国史难分，该书应该也代表对文革历史的国史表述。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将付梓，其对文革的叙述，与党史是否轩辕难分，不妨拭目以待。

虽然系统的文革史研究，或许可以留待更具历史感的后人。但今天任何涉及文革的历史记述，都不可不遵循陈寅恪先生“从史实中求史识”、谭其骧先生“求是先求真”的教诲。对重大事件的基本史实，不应有任何的省略、含糊和删节。八十年代初囿于当时政治环境形成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有所简略或情有可原。但当年对所谓文革敏感问题，尚没有现今如此多的禁忌；对文革罪行的揭露，比眼下也更真实和大胆；对文革的反思，比今天还要真诚和深刻；那时更难以想象，有人胆敢像今天这样，居然公开为文革招魂摇旗呐喊。文革在当时和今天的境遇反差，足以提醒我们：对文革的记忆和揭露、反思和批判，三十年来不但没有前进和深化，反而倒退甚远。而淡忘文革记忆、回避乃至歪曲文革历史真相的倒退之举，正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卷土重来者所利用。他们利用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无知、对今日社会弊病的不满，继承文革道统挑战改革开放，妄图实现他们没有文革的文革式乌有之乡。

历史专业在当代中国虽渐遭冷落，地位远不及欧美。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对辛亥、长征、抗日、内战、改革开放乃至自然灾害，不断举行各种纪念。修族谱、建祠堂、公祭帝王先贤，亦蔚为时尚。但惟独当代历史中的政治灾难，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不但被划为研究和纪念的禁区，还刻意抹去相关的集体记忆。官方对此虽无正面的坦白和解释，但事实却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刻意淡忘文革的原因或许很多：还原文革历史真相，势必揭穿“为尊者讳”的欺骗，不利其追随者再拉大旗作虎皮；此前的文革政治结论，经不起历史研究的推敲检验，重新评价不但会引发争论，而且将影响既有的政治格局，胡乔木当年曾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理由就是声称讨论会导致党分裂；文革中也曾神气过的阿Q们，如今有的春风得意甚至盘踞高位，忌讳再揭头上的疮疤；最要害的则是反思文革，必然引发对文革思想和制度根源的怀疑和批判；揭

露文革黑暗有损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动摇执政合法性。当年国民党元老阻挠蒋经国“解严”，吓唬蒋的就是所谓“动摇邦本”。但谎言终究不能持久，卡廷惨案事隔七十年，真相还是终于曝光。隐瞒也树立不了威信，一旦骗局被揭穿，谎言制造者的信誉和统治基础随即崩溃。大清洗真相被揭露后，法捷耶夫自杀象征一代政治精英的信仰毁灭，而东欧则爆发此起彼伏的反抗。林彪一旦出逃，既有虔诚信徒因此精神错乱，更有曾经无比狂热的文革一代年轻人，因发觉上当受骗而觉醒，终于以四·五运动为代表，发起了对文革和当局的公开挑战。现实的政治失信，与掩盖历史真相的自私短视，总是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不能真诚反思历史，遑论坦率面对现实；对他人历史之过尚且粉饰掩盖，对自身今日之误更难承认改正；当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公信力缺乏每被质疑甚至反读，应当深刻反思治本之道的，首先应在庙堂之上。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非典初期对疫情的隐瞒，不应只认为是少数官员的品德瑕疵，而是当事人在隐瞒事故、蒙骗公众的潜规则中浸淫已久，相沿成习作出的习惯应对。当假球假唱假药假数字泛滥成灾，当上市公司包装、官员学历注水成为普遍现象，当孩子们也学会了在虚矫中写作和发言，连歪曲二战历史的某邻国也反唇相讥：自己的历史随意涂抹翻云覆雨，有何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自身的历都能作伪，还有何不可造假？公信力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一旦丧失再图恢复谈何容易。徒木立信固属历史笑谈，指望政令说教和口号可以重建诚信，亦无异于缘木求鱼。某人大代表提议建百姓道德档案，或系肉食者的弱智。兰州某校要给学生发“诚信证”，山西某地纪念关公以彰诚信，更显荒唐。特权车违章横行随处可见的国度，难言良好的交通秩序，遑论健康的社会管理。沈阳商铺闻官府检查统统关门，官商学界精英用脚投票纷纷移民，已充分证明政治不透明、公信力丧失，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并由此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君子之德风，重建社会诚信只有从执政者的表率做起。最容易起步而又可取信于民的，不妨自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始，自彻底公开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真相始。德国统一后，对是否公开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档案，也有过担心和争论，但最终公开的结果，恰恰是恢复了社会信任民族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革新，平反冤假错案是重要标志之一。其伟大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宣布本来无罪者的清白，而是执政党历史上首次勇敢面对历史真相，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此举高度凝聚了人心，重塑了执政党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为此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信任基础。

在一个缺乏普遍宗教信仰的国度，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对祖先和历史的敬畏，既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又是承载社会政治价值的经世资源。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千年，历经祸乱却不曾湮灭，离不开对自身历史的敬畏和传承。国博陈列的西周大盂鼎，先人们在十分原始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郑重地将291字的铭文铸

于鼎上，记述史事于国之重器，足见其对历史的敬畏和虔诚。而在国博邻近大厅同时展出的《复兴之路》，以三张照片敷衍文革十年，传递出的是主办者侮史欺世的愚蠢和轻慢。刘少奇 1962 年夏忧心忡忡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透露出对历史的敬畏所唤醒的良知。而不惧史笔之诛的文革发动者，埋怨西湖一带古墓让其“处处与鬼为邻”，破坏了勾留山水风月的心情。胡大秘书随即唱和：“土偶欺山，妖骸祸水”。一句顶一万句的结果，是西湖边的秋瑾墓和抗战纪念碑，在 64 年底被大无畏地掘毁。其蔑视传统割断历史的狂妄暴露无遗。文革红卫兵砸瞿秋白碑、毁孔庙、掘抗战英烈墓，始作俑者实为此主仆二人。对自身的历和先人疯狂糟蹋破坏，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乃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然而蔑视历史的文革遗毒，今天并未得到认真清算。对历史无所畏惧的另一端表现，是路易十五式的蔑视未来哪怕洪水滔天。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名义，追求短期政绩和私利，透支资源、环境和市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已成地方施政方针的主流。对真古迹的漠视破坏、对假遗址的争夺炒作、对历史无知加庸俗的戏说，皆为历史伦理堕落的明证。最近更有人声称：上世纪 60 年代初饥荒死人系子虚乌有，且出此妄言的林某并非一介无知青年，而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历史系、人民日报西北某省的负责人。此例令人扼腕之处，并非个别人的无知，而是由此可见历史教育和喉舌部门的堕落。可以一并立此存照的还有：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近年出版，其中将若干领导人自然病逝皆列为国之大事，而对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则视为末节未置一词。最近又有人在报纸撰文，颠倒黑白地声称：“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以此类推若干年后，倘又有某喉舌放言文革苦难均系子虚乌有，可能再也不至引发惊讶。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文革发动者本负有历史责任，但在最近反日游行中，却大量出现对其怀念的口号照片。说明对历史真相的刻意隐瞒和抹杀，造成一代人对当代历史的无知，其严重后果已开始显现，并将影响深远。而对历史的无知，加上现实困境和外部争端，正是孳生集权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文革前“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格言，《千万不要忘记》的电影，都把回忆过去作为思想灌输的工具。文革首批罹难者邓拓，也写过《专治健忘症》一文，揭露貌似健忘、实则无视历史教训者的丑态。为了昭示后人不忘历史苦难，钱理群先生呼吁《拒绝遗忘》，俄罗斯的莉季娅著书《捍卫记忆》。但要让饕餮民脂者记住大饥荒，让钟情红歌者不忘文革苦难，不啻是指望可以唤醒装睡者，让死人埋葬自己的尸体。历史无关记忆，历史不会被遗忘只会被遗弃，面对历史需要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诚实、良知和勇气。揭示文革历史真相、记取文革历史教训，首要的并非史料的钩沉和学术的辨正，而是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反省，其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的革新。而政治革新的成效，正可以从如何对待文革历史

得到验证。当天安门广场上终于有了一座文革纪念馆；当国家终于沉痛集会悼念文革死难者；当文革信史可以出版、文革纪念碑得以矗立；只有那时，我们才没有辜负先烈林昭的嘱托：“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而中国的历史，才可以说终于又翻开新的光明的一页。

殷鉴不远

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 图图主教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在《诗经·大雅·荡》里，感慨殷商应以夏桀为历史教训。夏虽迄今尚无信史，但殷商与夏相去何止百年，总结历史教训的古人却不以为远。那么当代的“殷鉴”，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训又有多远？以下二则消息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一则是一著名导演张某，擅于策划盛大庆典和各种“印象”，也许是觉得影响了创作的美好心情，他对今天还有人念兹在兹回忆文革苦难，颇不耐烦地训斥道：文革过去多少年了，还要沉重多久？在张大导演的心目中，文革显然已经十分遥远。另一则消息来自江苏泗洪，去年该地政府把上访者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以阻止其再次上访。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学习班乃文革中限制人身自由，用洗脑、威胁、批斗强行“统一思想”的手段。当时可是有最高指示为其背书：“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则消息让我们又觉得，文革闹剧仿佛近在咫尺重现眼前。出此高招的泗洪领导倘生逢其时，文革时少不了成为“活学活用”的模范。学习班在泗洪卷土重来提醒我们：虽然文革已过去多年；虽然对文革记忆的刻意淡忘，使得今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陌生，甚于文革前更久远的年代；虽然文革的血腥动乱，离今天的繁荣太平，也相去甚远；但今日社会的种种乱象，折射出某些官员的观念和行为，离文革其实并不遥远。办学习班、唱红歌与文革的关联，也许不难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其演出套路，与文革过于“形似”。而与文革未必“形似”、却十分“神似”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至于当年也有“狗崽子”辛酸经历的大导演表示不耐烦，也不可仅仅视为艺人的轻浮。它毋宁是在警告：文革这段沉重的历史教训，本应作为国家记忆被格外珍视，却正被漫不经心甚至居心叵测地刻意抛弃。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导演，代表了不少并不赞成文革、甚至是文革受难者的心态。所映衬出的，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浮华短视，对苦难

的历史弃之如敝屣的时代。

文革的魅影，几十年挥之不去，并不奇怪。文革动乱的根源，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文革蔑视人权，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虽在许多国家陷亿万人于苦难，业经实践检验已在全球宣告失败，在中国却仍被高举。对人类政治文明先进成果，视为异端坚持“五个不搞”。对茕茕孓立的意识形态盟友，却罔顾国家战略利益慷慨援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除了因枭雄已去、家长制难以继外，和文革时期并无根本区别。“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式权力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一旦执政党又象文革时期犯下严重错误，仍然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予以制衡和纠正。党政不分、社会监督和自治缺失，治国之败笔屡见不鲜。有着浓厚皇权色彩、一把手专权和只对上司负责的干部制度，成为官场腐败的深层次根源。项南等锐意改革的官员中箭落马，八十年代“二十八天的未遂政变”，二任总书记非程序去职，已卸任领导人非法干政的事实，均充分证明：党内离谨守程序规则、尊重实行民主，还相去甚远。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病，邓小平早有论述并倡言改革。但三十年过去，此项改革非但连停留在纸面上也没有做到，偶有高官口头述及也被视为异数。本该仅以防务和救灾为职责的国防力量，不经法定程序，（正面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动用空降 101 师维护最高法院裁决）作为处置内政维持统治的最后手段，文革发动者视之为统治基石，也是民主和法治随时可被践踏的重大隐患。对此早已被文明世界所唾弃的制度安排，在后文革时代，却继续主导执政理念并反复强调，而且不乏具体实践。此弊不除，民主法治、长治久安终将沦为空谈。

文革帷幕初落，老一代领导人痛定思痛倡导法治。后文革时代的法治状况，与文革时已有天壤之别。然而类似文革无法无天之事，并没有完全根除，有时还相当严重，每每成为社会的热点痛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庄严宣布要永远废止的专案组，仍变相存在。无视法制“从重从快”的运动式严打，记忆犹新。违宪的因言治罪和劳动教养，尽管民间抗议不断却岿然不动。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暴力拆迁中的地方政府有组织犯罪、乃至重庆式的“打黑”，无不再现践踏法制的文革幽灵。宪法在文革时不能保护国家主席，今天仍然保护不了遭权力迫害的公民，形同虚设。从民间维权者到公安高官，为免遭迫害都不得不躲进外国使馆。守常先生遁入苏联使馆、革命党人厕身租界、副统帅被迫仓皇出逃、许家屯避祸新大陆，近百年的老故事还不断有新版上演，岂不令人扼腕！法制常遭破坏十分普遍，在特定时空还十分严重，就不再是少数人违法乱纪的偶然现象，而是政治制度法治环境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把宣称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专政”，奉为治国之基本原则，将执政党的专门委员会，凌驾于无独立可言的司法之上，依法治国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文革发难于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武器是“拿起笔做刀枪”的文革式大批判。

作为文革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大批判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文革时代的三十年，文革式大批判几度兴起，虽无疾而终却风声鹤唳。其令人胆寒的政治背景、俨然真理化身的霸道、蛮横粗暴的风格，与文革大批判皆在伯仲之间。从对“异化”理论探索的讨伐到清除精神污染；从批《乡恋》到禁《苦恋》；从批判市场经济到诋毁对外开放；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防止和平演变；一直到九十年代后的四份万言书；近年来批民主社会主义批普世价值；继承文革衣钵的批判从未懈怠。文革年代被奉为文艺指南的《讲话》，系七十年来整肃文艺异端的纲领文献，今岁又高调纪念大秀政治姿态。文革时的社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这次竟捧得更高叫得更响奉之为“精神灯塔”。文革大批判未曾止步于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即人身迫害每每伴随升级。后文革的左派们虽有心无力却也亦步亦趋。意见相左则破口大骂甚至饱以老拳；视为异端除了口诛笔伐继之上演诉讼闹剧；连号称学术刊物的《历史研究》，也载文扬言要对颠覆正统史论者立法制裁。尤为甚者，文革的遗老遗少们，近年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暗中眷念，而是用文革的思维和语言，公然对抗否定文革的历史结论。他们并非仅仅是书生空议论，除了写文章作演讲办网站，还频繁集会、宣传造势，吹捧为他们所推崇、效仿文革的政治模式。为其公开站台或暗送秋波的大小官员，亦大有人在。一时间山雨欲来，大有文革初期大批判开道、与政坛实际角力遥相呼应之势，几近一场复辟文革的预演。

文革对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戕害，还表现为假大空的文革式语言泛滥，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化严重退化堕落。相声《照相》讽刺的文革色彩丑陋文化现象，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被抛弃，在官方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今天仍随处可见。所谓核心价值观不知所云，官员们习惯了空话套话假话，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空洞说教；类似“五道杠”的孩子们从小学会了如何言不由衷；公费订阅的出版物大量生产文字垃圾；努力说些真话的民间媒体屡被整肃；久加诺夫所说的“主旋律”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借助行政手段被强化。尽管大环境腐败不堪，却还号召百姓学雷锋无私奉献。自“五讲四美”始，类似文革“斗私批修”的道德口号，不断被隆重推出，却相继如烟云过眼沦为笑柄。真善美的文明伦理，真本居首。但文革和之前的反右，对民族精神最深重的毒害，是全民说假话，是哈维尔所说的社会生活在虚假之中。文革时的中国，人们纷纷用言不由衷的口号，表示对革命和权力的拥戴。天安门事件发生，朝野军民纷纷声讨。半年之后四人帮垮台，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一致拥护。林彪一伙总结道：“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口称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仍然是今天人们在公开场合的政治姿态。一个社会最深重的危机，也许既非经济衰退和自然灾害，也不是内部动乱或外部争端，而是由文革遗传而来的上述社会精神病态。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留心当下的世态万象，不难发现竟有如

此丰富的文革遗产，得到神形兼备的继承。以专项行动专项斗争之名，搞运动仍然是施政执法常态；为貌合神离的所谓意识形态盟友背书埋单，令看不明白战略的外交尴尬难堪；盲目投资和经济过热、大起之后必然带来的大落、一厢情愿的“又好又快”，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破坏古迹、暴力拆迁，迹近于现代官方版的“破四旧”；如今只出现在落后国度的文革式“打砸抢”，又频频发生；文革中只限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恶毒攻击罪名，变身为指责县太爷就会被控的诽谤罪；文革时走资派国民党帽子满天飞，如今则动辄大骂汉奸卖国贼；如今的文坛市井，戾气弥漫不输文革年代。“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红卫兵之骂，升级为 2011 年“三妈”版，作者仍然来自最高学府北大；真相在深宫幕后扑朔迷离，“谣言”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文革特有的政治景观竟又再现；一度遭唾弃的文革个人崇拜，正跃跃欲试犹抱琵琶半遮面；文革时以妻子侄子辅佐左右，以佞臣仆役为钦差。今日是太子遍布要津，秘书充斥官场；鼓吹血统论的英雄，文革时不过昙花一现。如今有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家天下的尚方宝剑，真的纷纷荣登高位成了好汉。

文革既非发生在一夜之间，也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历史舞台突然消逝。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否定文革、抵制平反冤假错案、以反革命罪杀害李九莲等思想犯、再次发起经济上的大跃进、支持学文革搞屠杀的红色高棉，都发生在四人帮已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之后。其时打倒“走资派”、破四旧大串联、停工停课搞武斗的文革乱象虽已停息，然而是彻底否定文革、还是坚持没有四人帮的文革路线，始终存在曲折反复，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斗争。解放思想运动和清除精神污染，正是这场斗争的表现。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政治运动的整人方式和大批判手法，清除精神污染都忠实继承了文革的衣钵，不啻文革的小型再演。从反对市场经济、质疑物权法、扬言让私营经济倾家荡产，到国有经济“理直气壮”的扩张垄断、对民营经济口喊支持实则挤压歧视，无不体现文革仇视私有产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顽固和强势。从讥特区为租界、反对加入 WTO，到《中国可以说不》、砸汽车烧商铺，让人想起文革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狂热。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文革的思想，仍在不断被宣扬；文革的歌曲，还在广泛被传唱；文革的大棒，继续在挥舞；文革的打手，依然官居台上。亲历文革迫害的人们，睹之难免不寒而栗。文革式的“唱红打黑”，令拥戴文革之辈欢欣鼓舞，甚至情不自禁公然号召再来一场文革。他们沿袭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手法，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帜，利用改革停滞施政失误积累的社会矛盾，欺骗煽动底层民众，许诺再来一场文革，就能惩治腐败，给他们带来平等幸福。一旦发生经济或社会危机，他们就可仿效纳粹、推出枭雄领袖粉墨登场，把百姓和国家再次拖入灾难深渊。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适逢换届之际，野心家事发下台，虽属偶然却似显天意。不过倘依照赵启正先生“孤立事件”的口径，仅以刑事个案处理，不揭露文革打

砸抢先锋到今日黑打的基因传承，不反思野心家得以升迁的体制和路径，不警惕其思想影响和同党“人还在、心不死”的隐患，不从政治上深刻总结教训，则仍将重复如今各领域治标之政的败笔，文革复辟的隐忧就始终存在。君不见重庆“黑打”硝烟刚散，贵阳小河案又起纷扰。薄熙来虽然身败名裂，韩德强打人仍然理直气壮。

日本右翼今天蠢蠢欲动，而且在国内不乏支持者。其根源在于，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很不彻底，日本朝野对侵略的罪行和根源，一直缺乏深刻的反省。如果我们对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能深刻反思、彻底清算，对文革复辟的风险麻木不仁。陶醉于有宪法无宪政，有代表无代议，有选举但内定结果式的所谓特色民主；坚持口头讲法治却视法律为工具的专政原则；拒绝政治决策和运作的公开透明，政府新闻办炮制“休假式治疗”的笑柄，“谣言”每每变身比戏剧更精彩的新闻；排斥外部和舆论监督腐败不断蔓延；高喊经济转型却言行不一因循拖延；坚守培养“听话出活”驯服工具的教育，却终日侈言创新；面临改革的历史抉择一味拖延、回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的历史悲剧，将不可避免再度上演。总理在感叹“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的告诫，也就绝非空穴来风和危言耸听：“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貌似治平之世的今天，行将辞任的总理，发出文革或将复辟、亟待曲突徙薪之警言，是否杞人忧天？苏轼在《晁错论》里的警告，也许早已给出了回答：“天下之患，最不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忧国忠言的晁错，不为汉景帝所信惨遭腰斩；千年之后直言忠谏的苏轼，还是不容于当朝被贬官放逐；又过了近千年，说真话的先知顾准，仍旧落得家破人亡。中国历史再也不发生这类悲剧的日子，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壬辰仲秋 于有竹斋

反思极端思维方式

——读孙怒涛对清华文革群众运动回忆的一点想法

郑易生

与中央的政治斗争直接相连互动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历史引人注目的原因。但是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值得关注：这就是在脱离了党政组织系统足足两年的“自由放任时期¹”：清华校园犹如一个政治 - 文化的“小生境”，演绎着一个数以万人计的政治派别的自组织演化过程。这是一个由井冈山（蒯大富派）与 414 两派自发组织之间的博弈，从联合到分裂，从文争到武斗的政治历史。在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两重性——被控制性和自发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学校对立双方全方位较量——从政治活动、理论、组织、宣传到武力对抗——之中，这个由双方共同创造的历史剧充满了矛盾性：禁锢中的自由、愚昧中的良知，大混乱与自组织、平等意识与政治歧视、高尚理想与残忍行径。这些如此相反的东西是那样真切地混杂、并存、甚至连在一起，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些对立的东西舍去一方、至少先将这一方压瘪，以便能够顺畅地地发挥下去。对于文革的群众活动，那种“一言以蔽之”的态度无疑能巩固简明的结论并抒发我们的情感，但能够真正摆平在思想深处困惑着我们的那些矛盾吗？我们能否增加批判中的分析成分呢？

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清华大学的 20 年生活，特别是 1966-1968 年学校政治斗争和两派群众组织发展的过程。这种近乎原生态的事实描述与心灵袒露表达了我们许多人对那个年代强烈的痛定思痛与反思，也展示了学校文革中那些比较复杂的，看似自相矛盾、实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历史内涵。孙的书引起的联想很多。本文想着重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谈一谈经历学校文革的体会。原因是当年那种极端思维方式记忆

¹ 即从 1966 年 7 月工作组匆匆撤离清华到 1968 年 7 月工宣队在枪弹中进驻清华。这里说“自由放任”，是指上面（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是原则的，而且往往是失效的。

犹新，而且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另外，孙怒涛回忆的 414 组织的意义也恰恰与此有关。

一、难能可贵的 414

我与孙怒涛是同系的清华同学，比他低三届，我也是 414 派的。我们年级那伙同学 414 的人不少，但不在核心组织之列。看了孙怒涛，还有沈如槐、汲鹏等的回忆和邱心伟、原蜀育的《清华文革亲历》，才知道一些他们决策的“内幕”。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冲击，不敢太积极，最后就成为一个旁观者了。对我来说，40 年后回顾学校两派斗争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不是别的，而是在那个时期人们表现出的人品。

文革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都是在极端的“革命行动”中造成的。不难理解，在一个左的极端的浪潮过去后，历史凸现出的反倒是在那个时期“不那么极端”的、或者“反对极端”的行为。这一点恰恰是 414 的一个特点，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我觉得 414 的出现，是当时大多数人内心希望减缓文革极端态势的自发而有组织的表现。考虑到当时的“凡事左三分（林彪语）”、人人自危的政治气候，它确有一些难得的新意。

(一)

414 的骨干来自前一年成立的“八八串联会”，那也许是清华第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它有平民色彩，同情在工作组期间被整的学生和老师，坚持对造成同学之间的政治伤害的工作组进行批判。它倾向于当时被压制的、弱者的一方，比较讲道理，抵制凭借出身“红五类”而咄咄逼人的红卫兵。

而 1967 年 4 月 14 日成立的“414 串联会”，则是清华文革中“非极端倾向”的更高表现。它与“新政权”中蒯大富主流派的政见分歧主要是在干部问题。他们提出应团结而不是排斥文革前的干部、应分析而不是“彻底砸烂”过去的一切，并论证这是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后来，414 擅自宣布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不仅数量多，而且大胆使用他们。

除政见不同之外，414 还不断地揭露掌权后的造反派的毛病和“变质”倾向，批评地位越来越高的蒯大富搞小圈子、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

历史地看，即从 1976 年文革后的一系列深得人心“拨乱反正”政策角度看，414 对干部等问题的看法是相对符合那个时期的社会要求的。回顾对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不难发现这个任务越到

具体越是显得空洞、勉强、脱离教育的实际，缺乏生命力¹。在自己岗位上好端端的勤恳工作的人，突然被一个新的（革命）标准判定成为“敌人”——面对这种今天看起来荒唐但当时势不可挡的革命逻辑，414 展现出相对的独立思考的勇气。

（二）

回想起来，414 多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它没有任何组织后台（尽管它不是不想有²），却得到很多群众的拥护，并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双方实力可谓悬殊，但是 414 将当时暗藏在许多人的内心感觉——即“不要做得太过了”以一种能使社会环境容许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逐步成为一个相当大而稳定的社会组织群体。

这正是 414 和学校其他红卫兵组织——无论是前期干部子女为核心的八九红卫兵和后来掌权的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不同的地方：414 的思想行为有更多的“内生性”，较少来源于上层直接或间接的精神或指示。它是将毛主席语录与学校数千群众的内心要求结合起来的产物。

（三）

其实，414 也做了不少为文革的极左推波助澜的事，在学校之外的活动更是与别家的造反派差不多。它与团派的分歧，说是“五十步笑百步”也不冤枉。但我认为 414 显示出文革大民主的进步正能量的一面。“大民主”的践踏法律、文化专制的性质及其带来的惨痛灾难并不意味着另一些事实不存在：一些群众恰恰利用它开拓出的空间表达出某些合理心愿，而这些心愿反映了当时社会已经尖锐存在或者正在发展中的矛盾。这正是文革“造反有理”的口号带来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心中的上帝只有毛主席而不包括校党委了、而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解也由不得基层组织了。一位朋友聊起此事，说这有点像欧洲宗教改革后对圣经的解释不由牧师垄断一样，信仰者已经有了一点解释它的机会与权利了。这毕竟是一个解放我们心灵的变化。

是的，我们是“跪着造反”且与对方一样争相表现对文革的忠诚与紧跟姿态，我们在声称“解放全人类”、“解放干部”的同时，还严格遵循与保持着对另一些干部、同学的政治歧视，这令我们今天感到羞愧。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极左可怕的时代，才能感到 414 能够顽强地、用尽智慧表达出来的一种“常识的思维”

1 事实上，文革进入“斗、批、改”中期已经自发地偏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方向。“阶级斗争”愈发显得有名无实：地富反坏右等老“阶级敌人”是“死老虎”；而对“走资派”的斗争也是有斗无争，批判会像一种内容重复的礼仪，已成为派战的工具。至于到了后期迟群、谢静宜主持的清华的“改革”，“破字当头”、但“立不在其中”。如不考试的招生、大量政治运动、以生产代替培养人才等，很快显出破坏教育的结果。

2 毛主席就不喜欢 414，认为是与他作对的。直到 40 年后，借 2011 年清华校庆之机，两派头头相聚恳谈时，一些团派朋友才终于真的相信了“414 真的没有后台”的事实。当年，“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不喜欢我们”这一现实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是多么不易。回顾历史，有多少有进步意义的努力不是带着条条框框、或“很不标准地”进行的呢？

是的，作为一个社会的象牙塔，学校故事的社会代表性和影响都是有限的，这一切只是在一个小小生境中发生的演化，不仅受外界制约，而且只有两年时间就夭折了。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与激励了那一时期清华至少数以千计的学生、老师与干部的思想、情绪与生活。我想，仅仅从上层的、宏大的、“关键事件”中观察文革，是看不到这些人和人心之变化的，更不可能注意到社会上政治活动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发现其中一些有特点的类别（“物种”）对未来可能的启发是什么。例如 414 与和它对立的团派都展现了相当的社会自治能力，很像今天推动群众社会参与性的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它们容纳了同学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要求，反映了各自的不满与诉求，它焕发出来的蕴藏在人们身上的责任感、创造性、效率与学习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对此我们也是事后才意识到的。我觉得只要不是仅盯着这些活动的结果的“无用性”，就会看到中国民主希望的潜质——而这一点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相信的。

并不是说 414 的骨干和头头们当时有多高的思想，许多事其实不过是在派战中逼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不论有多少局限性，414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知道，经历文革浩劫的大多数老干部都有“坚决抵制了四人帮”一类的评语。其实左祸横行时，他们基本上没有条件公开这样做。而在学生群众运动中，一些学生能够利用特有的条件以一个组织的方式勇敢地表达了一种与极端化相反的思想倾向，这是冒风险的、值得尊重，值得研究。物以稀为贵——它含有我们民族文化与心灵的生机，哪怕它的位置看起来并不起眼，哪怕它来自文革。一个国家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拥有什么了不起的条件（如自然、人力、文化、历史），重要的是它怎样对待它们，能不能发现、珍视、培育和发掘这些资源的价值与潜能。

迄今的文革历史的结论和研究有众多缺陷，对群众运动的傲慢与偏见就是其中之一。

二、为什么我们如此积极地投入文革运动？

（一）

如果将文革的群众运动理解为被文革激发或释放出来的诸社会矛盾的复合体——各种不同层面的、不同发展程度的、直接或间接方式体现的矛盾——进而讨论其各自的根源、合理性、局限性、相互关系，或许有助于摆脱对群众运动过于笼统或感性的认识。即使为了批判的彻底性，也应先分析。

(二)

文革为什么吸引了我们那么多的人那样热忱的卷入？被裹挟？恐惧？起哄？都有。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的文革思想引燃了他们隐藏于心中的对日渐官僚化、等级化的现实的不满，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历史的路径与国际格局使中国走上一条高度集权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到文革前，它在一个贫弱国家建立工业、国防基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与相应制度的内在矛盾也在迅速发展。由于干部垄断了社会上全方位的事权，干群关系集中了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由于事事政治挂帅，政治地位深刻影响和主宰了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党政干部阶层的垄断性、封闭性与特权化发展。干群矛盾成为最普遍、最重要的社会矛盾，而政治地位分层也扩展到群众内部。与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社会不同，文革前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地位决定的等级社会。

文革前，由于大跃进教训而采取的比较现实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与中苏分裂后越来越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思想层面上表现在：是容纳越来越多的经济不平等而调动更强的经济动力与自由，还是为了当初的平等理想而排斥资本主义的幽灵？我们青年学生是接受意识形态教育最多的人群之一，不仅是崇拜领袖，而且大多有一股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加上文革之前的几年老是批判苏联和平演变为特权阶层的国家，这已经事先注定了我们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对“纯粹社会主义”的想象与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之间的反差，已经积聚了相当的能量。因此当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时，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绝大多数都热烈响应。记得我们班里几个同学还一厢情愿地设想“北京公社”（以巴黎公社为原则的社会）的平等制度呢。

但是，文革群众运动还有更深的动力，来自群众内部因政治地位差异造成的社会矛盾。文革初期，主要是“革命群众”与“阶级敌人”的斗争。随着文革进入派战阶段，此时当权派和其他“问题人”失去文革参与权，或被打入了“政治贱民”阶层，“革命群众”之间与政治地位差异有关的斗争又开始了。

(三)

在清华，团派改变现实的态度更激进。如果说 414 反映了群众对文革中极左政策的抵抗，那么团派则多少反映了文革前的被压抑者的声音。

例如蒯派的代表蒯大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1963 年刚上大学后，不忘家乡高考落榜务农的中学同学在农村的悲苦，径直向中央写信反映干部浮夸与粗暴的工作作风。这一“思想出轨”在文革初期成为被工作组批判的标准的“右派言论”。当时被工作组批判的“蒯派”同学中，有不少其实就是这类“说大实话”的学生。“蒯派经历”在工作组撤出后成为证明“革命性”的政治资本，他们多数加入蒯大富

的团派，也有的加盟 414。孙在本书详细记述了自己这样一个出身好、学习好的好苗子怎么就因为说了一些见到的或听人说的农村实情，暴露出“思想动摇”，从此就变成受人歧视的“差质生”的过程。

一个青年，或因出身不好、或因“思想不纯”而被政治上歧视，这种伤害，反而成为孙怒涛在文革中积极参加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动力。孙怒涛书中提到他参加团派英雄李磊落的追悼会一事。李磊落从小品学兼优，人们说，他在湖南冒着枪弹而坚持站在汽车前门的踏板上，就是有一种摆脱因家庭而受到的政治歧视、视死如归的心愿。再如《红教联》等激进的教师造反派，他们对于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感受更为具体。今天读到他们当年大字报的一些内容，就能理解他们在文革中追求理想与平等的愿望……。

文革前清华的基层政治组织，是由专职的基层党政干部、部分“双肩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兼职的辅导员组成的。他们体现着原校党委的“平衡政策”：力图在“红与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培养一流专业人才”之间平衡。他们受到更纯粹更执着的革命精神的质疑与批判：为什么校党委偏爱只专不红的人才？为什么当权派更喜欢与“封资修”有关的东西？他们还受到那些感到思想自由受到压制或因出身受到政治歧视的敏感的师生的挑战，而当时的团派比 414 更多地容纳了这些原来被“边缘化”的群体。¹

本文无力全面分析派战的根源等问题，这需要系统思考和实证研究。我只是举例说明：对文革中群众运动中的言行，不应一概鄙弃而应当进行“拆分”。例如可以一分为三：（1）它表现出的践踏法律、剥夺人权、反智的行为，以及其思想文化与制度原因等。（2）它反映出的群众要求和社会问题，以及正在变化着的深层政治经济背景。（3）它展示出的群众的自发的民主实践，在建立有效的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制度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三、我们为什么那样极端？

(一)

若要用一个词描述文革时期我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极端”二字。陆小宝同学曾在“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文中提出文革时期思想方式的主要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倾向”，并对它进行了分析。前面提到 414 在清华对它的抵制，但 414 自己也是“极端革命”之一部分。孙怒涛书中将文革中的无知与荒唐联系到

¹ 当然除了老团老四还有一些同学对文革不抱幻想，属于“逍遥派”。我年级一个那时就看透了“彭德怀被冤枉”的同学周文业告诉我，他对学校文革斗争根本就不感兴趣。近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编纂清华历史上真正学术大师的资料文献。

我们受到的教育，对此我深有同感。文革中的极端行为背后有政治大环境的驱使，也夹杂着野心、怯懦、冷漠、嫉妒等卑劣情操，但是那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一个深层的原因。对于大学生来说，极端的思想方法不是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一把火就点燃出来的，在这之前的大学甚至中学期间，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在政治思想问题上不断极端化的过程。

(二)

文革之前，我们许多人在政治思想上已经大致具备了如下理念：

(1)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与革命、甚至只与革命联系在一起。(2) 当你发现事实不符合理论时，应认识到这些事实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局，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例如大跃进的狂热与悲剧应被视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主流……等等。(3) 看人看事先要看其是属于哪个阶级的说法，然后结论就清楚地得到了。(4) 私心、私欲是万恶之源。(5) 劳工神圣。任何不平等都是问题，为富者不仁……。

记得《九评》学习，班上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看法出现分歧。经过多次有组织的讨论、包括听示范性的典型发言、加上政治老师“辩证的”的解释，最后大家基本上统一思想——有一些讲出亲见实情的同学居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了，承认自己看问题方法立场有问题。而我们这些家境好、涉世极浅的同学，则不仅不会犯这个错误，反而自我感觉甚好……。还有一次大家讨论别人落水后，是否应当不管怎样情况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有同学质疑这样是否明智。争论的很热闹。而最后的结果是：一些提出质疑的同学被说服，坦承自己的思想不够纯洁。我们还争论“有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结论又是类似：在任何情况下，阶级性是真、人性是伪……。为什么总是不给矛盾的东西共存的空间呢？为什么总是按照正确的“客观规律”来修改亲见的事实呢？为什么总是不能率直地实话实说呢？……这种自疑与困惑是当年不敢想也说不清的。陆小宝提到今天回忆文革时说“真实比正确重要”，其所指正是这种思想深处的“政治正确性”。

我们在这种校内外的革命气氛的感染下，一次次地怀疑自己的内心直觉，遏制心里不洁净的思想活动，让自己适应那种更简单、更鲜明、更绝对的思想要求，以获得虔诚的、安宁的、纯粹的情感。经过一次次思想训练而形成的思想理念，很难抵制我们崇敬到迷信程度的领袖从道德制高点发出的文革号召——做全新的人、创造新社会。这实际是一种无限忠君的信念加宗教的虔诚、它在舆论一律、别无分店的思想政治环境下、只能在单一的方向上行走，鄙视分寸感和常识感、嘲弄改良与建设、难忍不同意见……，一种“极端模式”已经主宰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因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了。

(三)

在我们亲身参加文革后，上述思维方式急剧扩张成为可怕的极端语言与行动，构成疯狂的历史场面。就拿双方的论争说，“文革体”不久就驱逐了“讲道理”：

(1) “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2)一句“你就是抓住革命派的缺点反对文革！”的杀伤力足以堵住任何人的质疑。(3)“揭伤疤”。只需抓住对手的可歧视处，如出身、“犯过错误”，就足以将他轰下讲台。

特别是极端思维突破做人的底线。最重要的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时似乎没有谁用“底线”这个词，但是心中一个隐隐存在的“界限感”不时地牵制或禁止我们的过分举动。从小受到的简单化教育中，好目的……好人……好的手段，这三位一体从未分开、从未冲突。但文革的暴力突然出现，要我们被迫或甚至自觉接受“革命的名义”下的罪恶。两者在无数幼稚敏感的心灵中厮杀：一边是咄咄逼人的理论逻辑武装下的激情，一边是说不清楚道理的思绪柔情。如果说前者就是所向披靡的极端意识形态，那么后者就是孙怒涛书中围绕的“良知”——可以理解为一种朴实的常识性思维。

外有大潮之裹挟，内无良知之制衡，甚至不极端就不能生存。“对敌斗争”（批判黑帮等阶级敌人）是这样，革命造反派间斗争也是这样。汲鹏说，在这样背景下，双方斗到你死我活是必然的。于是在清华，我们每个人都亲见了两派争论的激化之惨烈的轨迹：讲道理的大字报变成标语口号、言语变成拳头、冷兵器、直至枪弹炸药土坦克。

(四)

文革中猛烈批判学校教育的那种极端思维，很大程度上恰是文革前的思想教育的产物。随着毕业后在社会的磨练、文革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改革后社会多元化趋势，开放带来的新视野，我们倍感当年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之重大缺陷，感到“清华智慧”的局限性¹。我们已经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曾经支配我们的思想习惯，是在一种狭隘的、封闭的、教条主义思维环境中形成的。它排斥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历史道路等的多样性，否认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权利，认为不同于自己就是反对自己，差异就是差距进而只有‘对’和‘错’之分，只习惯于接受和相信绝对的、唯一的真理，习惯于接受和使用被简单化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变成实用主义的机械教条，恰恰将里面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忽略掉了。我深感我们自己青年时期的教育失去了与传统与世界现状的联系，而这正是可以避免人云亦云、做到自由独立的精神人格的知识基础。

¹ 清华的学生在文革中也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但是这种“清华智慧”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智慧，缺乏思想层次探索上的执着与勇气。

我们的青年到中年是一个经历极左并告别它的过程。它的教训意义深远，因为文革是百年以来我们苦难的民族挣扎地奋起历程中一个重要章节。尽管我们上述文革的经验与感受不足以放大到全面评价整个历史、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与影响，也不应因此否定自己的一切，但是它的确是我们刻骨铭心的一个经验教训而且对未来的警示意义。

四、极端思维方式依然存在

(一)

现在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争论，一下子想到文革中的文风。尽管争论的内容不同，但是支配双方的话语方式如出一辙：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面对无论哪一个层次的问题都一概用无限上纲的意识形态框架处理……，这一切实在太熟悉了。我不禁想到：已经被从政治上、经济上否定的文革，其极端思维方式居然可以流传下来，依然支配着许多人的认知？的确，它不仅影响着发展与改革的决策者的思维，也影响着对现状批评者的思维。

(二)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新契机。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路高歌猛进，而它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似乎以更高的速度积累着，潜在危机越来越大。决策者尽管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而且维稳第一，但还是未能改变“矛盾恶性积累”的趋势，以致于“物极必反”的不祥之兆再次显现在眼前。急功近利、只顾一头的风气无疑有体制的、文化的根源，特别是政府的行为缺乏来自社会的制衡……。但那种极端思维方式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往往将真理——有些是好不容易认识到的——夸大为谬误。例如：“经济增长是决定性因素”被极端化为：只有增长是硬道理，其余就是软道理。因此社会公平、环境等只能对它一味迎合，没有抗衡的地位。又如“有些问题是改革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被极端化为：你所看到与感受的社会不公等坏事既然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等待经济增长到达那个“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转折点……。

注意上述真理与谬误之间不是对立的、相反的关系，而是“夸张”的关系。因此所谓“极端思维方式”就是将真理夸大的倾向。其核心是铲除那种维持事物内的双方共存的能力，使之只有对立性而无同一性¹。真理与谬误只差这一步。其

¹ 一位朋友告诉我，马克思对对立统一矛盾的思想与我们许多人理解的不同，他给我看了下一段语录：“我们看到，

实，公与私、计划与市场、平等与效率，自由与秩序……、这些对立的事物本是相辅相成、互相依托、共存共生的。虽然在不同层面、不同时间和场合可能会有某一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或更需要强调。这本是历史与常理。只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思维才喜欢将一方与另一方搞成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使之僵化下去。我们发现极端常常是多数人利益的天敌，大起大跌常是少数人暴利和多数人遭殃。

(三)

社会的冲突背后是阶级分化的现实。因此社会能否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这的确成为考验我们民族有无大智慧的挑战。而实现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极端主义病毒发作。我们的制度与文化中都有一些利于该病毒生存的条件。不仅如此，在中国，极端思维方式易于滋生还有一个原因：她面临的问题比较麻烦、复杂、有太多从单一层次出发看是“两难”、“悖论”、“怪圈”的问题，这往往使展示理性与实现共识的难度特别大。

例如经验显示：中国的现代化，少数人的发达易，多数人的现代化难。它不可能像早已工业化的国家那样占有与使用超过人口比例的自然资源，也不能转移大多数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或显得“多余”的同胞。那么，是这些背景决定着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的特点，还是后者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两难处境？

又如我们为自己的碳排放成为世界舆论众矢之的而焦急，但经济全球化已经将我们锁定在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一些西方国家自己就是形成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的一方原因或甚至受益者（廉价劳动与环境）。问题是：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吗？与其向过去、向外国人抱怨，不应当老老实实地反思自己的思想意识、政策与体制吗？为了转变发展方式而彻底与自己的低效、好大喜功、奢华与贪腐决裂吗？而另一方面，难道我们不应当抬起头来，想一想一味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教科书所说的去做是否就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呢？

中国的“原始积累”非常复杂：勤劳致富、创新致富、掠夺致富、权力致富都有。文革没有中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权阶级”的形成进程，而改革中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又演变成为真正的“新阶级”成员。难道我们不该承认一个与市场经济适应的有产阶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它所承载的创造精神难道不是远比计划经济时更广泛更强大吗？……而另一方面，没有“公仆”（即官员）的权力营私和钱权合作，这一“原始积累”能够如此顺利吗？难道面对少数人剥夺与盗窃社会公共财富的事情，人们只能纵容与掩饰，不应当表示不满、警惕和追究吗？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也错了吗？

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资本论》第一卷，第 124-125 页，人民出版社，2004）

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截然不同的现成答案难以令人信服。我实在做不到对事物的一个方面夸大而对其另一方面装作不知或加以歧视。这是文革的警示：警觉那个“极端思维方式之妖”，不论它披着怎样唬人的外衣。人们爱说罪恶与悲剧都是恶魔制造的，我们的一些经历则显示它们也有可能是一个合理性被夸大和神圣化而另一个合理性被漠视和妖魔化的结果。改革前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机械的平等观怎样遏制了社会自由与创造力；今天，我们又看到在权力 - 资本的结合和贫富差距严重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要剥夺普通人追求平等的权利，这实际是正在制造社会分裂。

(四)

我有时想，一个人走路还需要两只脚一左一右地走，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也不可能完全均衡，不可能没有内部利益冲突、不可能风平浪静。但是，跨越一代人的时间后看一看历史的合力之后果：为什么有国家的前进了，有的则付出过多代价，甚至在许多方面只是转圈子、翻烙饼？其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可能取决于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否存在使对立双方共存于矛盾体中实现同一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哪里呢？¹

我想，它不是一种否定矛盾、取消斗争的幻想。这不仅不可能，也不人道。事实上许多激进和革命正是被逼出来的，而为理想奋斗牺牲的斗争精神是进步的必要条件，永远值得崇敬与珍惜。对于这种“实现同一性”能力，我只是觉得它必要且短缺，但自己缺乏研究。也许它是与下列因素正相关的：（1）制度的张力：既能制约国家压迫社会，也能支持国家能力建设；既能制约少数人欺压愚弄多数人，也能制约“多数暴政”。（2）相应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强有力中间力量，（3）多元的声音，有影响人物的远见及其超越极端意识形态的公共意识，包括对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4）国民的道德与理性——说到底，人的思维方式决定漫长变革的最终状态或质量。

我想，孙怒涛在回忆中的主题“良知”也是这个道德与理性的内容。孙怒涛作为 414 的领袖之一，很能代表我们多数人的想法。他在两派对垒中是强调团结、联合的温和派。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认为团派与 414 之间毕竟是同学之间意见不同的矛盾，为什么非搞的你死我活呢？我想当年很少有人会苟同他的想法，因为在那个情况下谁从大局出发谁就自取灭亡。从这点看，他真的像自己承认的难以主导 414 行动。但是“成熟的”政治家就没有局限性了吗？我觉得清华文革小生境中“孙怒涛”的特点及其价值，如果换一个层次或视角可能看的更清楚——

¹ 近些年来，极端本身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警惕。有识之士为了避免国家在内斗中分裂，主张超越左右、寻求各派思想政治上“最大公约数”、提出超越来自两个方面的激进主义……，令人敬佩。现在，“共识”成为越来越热的词汇，可能与这些人的努力有关。

位“朴实良知”多于“政治经验”的平民政治家。也许政治与良知也是一对矛盾，互相制约。政治需要某种极端化——包括意识形态化、夸张化；而良知则不需要这种极端性，虽然它很难定义，但是一定包含人的常识与人之常情，它总是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它不能取代专业政治家，但可以制约其异化或堕落；它不能取代制度的力量，但可以支持其改革并防止其锁定在少数人的利益上；它不能消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但可以减少分裂的可能。

清华文革中，正是无形的良知使得 414 能够在极端中表现出一些不极端的行为。

五、结语

文革的最大影响是通过“物极必反”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法避免在未来的路上还是以这种“大撞墙”的方式调整自己。清华文革小生境里短短两年的故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浪花。从中我深感单一的思想资源、垄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化等助长下的极端思维方式，一旦占了上风并且持续化，就会要么压抑、要么挥霍一个民族的活力。今天从这一层面的反思是需要的，因为从较长时间段来看，这类思维方式难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化文明的要求互相适应的历史性难题，更应付不了一个深深融入世界并影响世界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的新的挑战。读孙怒涛的回忆之后，我感触最深的是：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但是警惕“政治正确”的诱惑，不要极端思维方式。

清华园的一只蝴蝶

胡鹏池

一、1966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

“六二四”，清华文革的一个符号！

这是1966年6月24日晚发生在清华大礼堂的一起影响文革进程的事件，当时笔者正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

尘封了46年的这件往事，随着本文的展开，重被部分的拾起。

那天晚上，清华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楼上楼下、过道、讲台两侧全都站满了清华人，大礼堂门口挤满了想入而不得入的清华人，礼堂前的中心大字报区及区内的草坪到处是东一簇西一堆兴奋、激动、或静默流动、或热烈辩论着的清华人。

六月是“十年文革”的始年初月，笔者刚从怀柔四清前线回来。临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老曹同志执手相告：“小胡啊，这次运动来势很凶啊，回校后多看多想少说话，知道不？”我说：“知道的，知道的。”

50多岁的曹队长原是北京市手工业局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已参加过两期四清了，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与我关系极好。我在回校后一直记着他“情之殷殷”的表情和“来势很凶”的判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个静穆而寂寞的单兵散勇，赶赶场子看看热闹，三缄其口不发表任何意见。再说了，父辈们的经历也告诉我，政治是深不可测的海，一不小心自己葬乎江鱼腹中尸骨无存且还罢了，还要祸及父母弟妹及两姓六属。

我为什么开篇就要说这一段看似与本文主旨无关的话，因为我认为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班我们宿舍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一种心态，也

可以解释相当大的一部分同学在文革初年以“观察、自保”为主的表现。

那晚，我很早就挤进了礼堂，占据了一个极好的座位，大概在七、八排左右，中间过道右侧的第三、四个座位，对舞台上的一切尽收眼底。我坐在那儿面对着热烈的场面，脑子里虽有思考与辨识，但心情却并不是那么激动的，自始至终没有鼓过一次掌，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熟悉的眼睛看着我。尽管如此，当晚上 11 点多回到宿舍时，同宿舍同学得知我在现场，问了一句“怎么样？”我仍然无意间回了一句：“两边都不怎么样！”也就仅此一句而已。

那晚的辩论是怎么引起的？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

6月22日下午2点15分，工作组通知化902班的文革组长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你们班的讨论会，于是大家全都很兴奋。20多分钟后，工作组来了一位女同志，坐下就开会。班上有人认识也有人不认识王光美，不认识的以为她就是王光美，认识的又没有说她不是王光美。至于会议主持人蒯大富本人认识不认识，蒯当时没有说，40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

会议开得很热烈，期间有人递条子要求确认来者身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会议结束时，那位女同志说：“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一些将来者误认为王光美的同学大失所望，有的人就十分气愤，甚至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摸去了。于是认为“王要来参加会”是一则谣言。

本着工作组“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去工作组追查“谣言”。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等认为“哪怎么可能呢”？继续追。从晚上6点多一直追到11点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们坐了五个钟头的“冷板凳”，憋了一肚子的气。

6月23日一早，蒯等十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长达三千多字，指名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牵涉了王光美，清华园立刻沸腾了。

6月24日，贺鹏飞激将蒯大富，约定当晚大辩论。毫无疑问，贺的行为是工作组授意的。据此，有的校友认为这场辩论是工作组组织并指挥的。我能认同这种观点，但同时也要指出从事后的结果分析，工作组的组织与指挥并不很精心。

当晚7点半，大礼堂里辩论开始。蒯方出场的是蒯大富、鲍长康，孟家驹，似乎还有刘才堂、刘泉，王铁成、王良生等诸位同学流星般地上去客串与“冒叫”。贺鹏飞这一方除了贺本人外还有其它几个学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曾上台客串与“冒叫”过（“冒叫”是大跃进中放卫星的词汇）。

贺方的几位同学似乎个个都不行。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贺

方的主将，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水平不行，嘴皮子更不行，一整晚上就不曾有过任何出彩的表现。

贺鹏飞是我早就认识了的，他是我们系的低年级学生，我们同住七号楼，一个门洞进出，我住四楼，他可能是二楼或一楼，又都在七饭厅用膳（短时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互视为路人。他是将门虎子（“将门虎子”是中国成语。其实“将门”未必出“虎子”，最典型案例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与“乐不思蜀”的阿斗），作为顶级的高干子弟，身上有一层耀眼的光环，身材魁梧，虎背熊腰，脸模子与他老子长得一样，也有两绺“八字胡”，个头却比他的老子矮得多。

那晚是我第一次得识蒯大富，中等身材，个头和我差不多，不算太瘦，小分头，戴眼镜（有同学很确定的回忆是紫框），穿兰色学生装，操一口我所熟悉且有亲切感的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辩才无碍，口齿清晰流利。

辩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件事。

蒯方顽强地要求工作组把这件事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解释清楚呢，就怀疑有“阴谋”。我坐在那里想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对你们这样一个具体的小班级能有什么“阴谋”呢？也许也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班学生的活思想，当然也包括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以，我认为蒯大富是有“小题大做”之虞的。

其实，现在想想，工作组也有可能已经有“阴谋”了。鉴于6月21日蒯在刘才堂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关于“权”的著名批语，以及6月23日的大字报等，工作组可能已经锁定蒯与化902为重点关注。而且就在6月23日这一天，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有一个“工作队就是代表党”、“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的内部讲话。所以清华工作组很可能在623晚或624白天，已将蒯大富锁定为清华文革的“黑客”了。“黑客”是现在的说法，当时叫“游鱼”。“游鱼”的说法也出自李雪峰的讲话中。

但在当时，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又何以得知呢？我的这种认知水平，正如被人讥讽为“幼儿园水平”。其实“幼儿园水平”也不错啊，经过了四清已经有“自我防卫”的意识了。有的人的水平比这还差很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咬奶头”的水平呢！

贺方的几个人本身也都是学生，哪能知道工作组的事儿呢？当然就解释不清楚。加之他们是预设立场，摆明了是受工作组指使为工作组辩护的。这种角色本身就可疑，就不容易得人心，何况他们的口齿又那么笨拙，所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了。

但是贺方中有一个小矮个子的发言是值得注意的。他的主要意思就是王光美“与会与否”这件事不重要，你蒯大富为什么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瞎起哄呢？这不是扰乱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吗？不是煽动群众对工作组的怀疑吗？而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新市委是党中央刚任命的，所以对新市委是要信任的，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也是要信任的。

坦白的说，这个小个子的思维逻辑与我当时是一致的。

你想啊！党中央刚刚撤销了一个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又刚刚任命了一个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新市委也不过一个多月，怎么可能又是错的呢？如果又是一个新“黑帮”，那毛主席与党中央又是干啥吃的呢？

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新市委也是错的，再来一个新新市委，也要去怀疑，也要去考验，这事情还有完没个完？

贺方的同学也没有把话说满，但言下之意就是蒯大富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有野心，有野心呢就必然把水搅混以便浑水摸鱼。

我当时认为“王光美说来没来”当然是有原因也会有过程的，应该在事后解释清楚。能够解释清楚最好，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解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她毕竟是王光美，是刘主席的夫人，说不定真有点什么机密的事临时不能来了，这都是可能的。

总之在我看来“来不来”是小事，“解释不解释”仍然是小事，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也多得很。

而蒯大富们却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篇累牍出大字报。

我记得同宿舍的同学议论过这件事，全都认为蒯这小子太好出风头了，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对于八字班及八字班以上参加过四清的同学，“工作组代表党”几乎是普遍真理。我们下去搞四清当然是代表党的，尽管我不过是共青团员，与我一起包队的曹同学连团员都不是，但是经我介绍入团的青年就有十多个，我还介绍了三个贫下中农入了党。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也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体现的。在这样的惯性思维下，即使是一个村的党支部那也是代表党的领导的，当然在权威性方面是有差别的。

看来，那天在现场的同学们多半没有我这样的认识局限性，他们只知道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考验一切。当然他们也有道理，北大校党委不是被考验烂了吗？清华校党委不也是被考验烂了吗？谁知道这个新来的工作组是红是黑呢？先怀疑了再说，先考验了再说。

我们忘不了“反右派”，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反右派”；我们把工作组看作是大爷，

把自己看作是孙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大爷，把工作组看作是“二爷”或其它。我们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他们认为只有毛主席；我们的思想比较符合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比较符合当时的毛泽东思想。

当时谁又能知道这个“毛泽东思想”是前后不搭、千变万化的呢。

会场上低年级同学居多（后来的蒯派也是低年级的占了绝对大比例），甚至还有不少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他们猎奇心理比较重，对“王光美说来没来”的幕后原因有浓厚的兴趣，对工作组连对这样一件小事也解释不清楚感到既奇怪又不满意，他们既已怀疑就要考验了。

那晚，蒯大富的胜势是非常明显的。蒯的辩论水平比别的同学明显高，比起工作组的那些人则更要高。当鲍长康、孟家驹发言时，蒯方的优势并不明显，但老蒯一发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会场呈现一边倒。

蒯在会上不厌其烦反复叙述他们去强斋拜访工作组的经过，讲他们如何如何坚持要工作组解释清楚这件事。

蒯大富就象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一定要工作组“给个说法”。秋菊最终得到了“说法”，所以秋菊就没有继续闹；但“蒯秋菊”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所以他要继续闹。蒯秋菊与秋菊一样都有那么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倔脾气。但“秋菊”是受了伤害与委屈的，而当时的“蒯秋菊”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

所以，我认为他对这件事坚持到底“要说法”的理由不符合我们理工科学生常挂在嘴边的“充分必要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蒯大富的演讲有几个特点：第一、时间、地点、现场人物，交待得十分清楚；第二、用词有分寸，不说过头话。比如说“怀疑有阴谋”，从来也没有说“肯定有阴谋”；又比如说“我们（指蒯们与工作组）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不一样”；第三、大量运用了“渲染”、“比兴”的文学手法。

蒯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在工作组所在地的强斋“等了五分钟”，他马上就接着说此时是几点几分了，有什么人进进出出；然后说“又等了五分钟”，此时又是几点几分了，又有什么人出出进进。“时间、地点、人物”是任何一件事情的三要素，蒯交待得如此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他的真实性了。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再说工作组让他们坐了五个多小时的冷板凳。

蒯甚至能说得第一次冷板凳是几小时几分钟，第二次又是几小时几分钟，这就大大赢得了广大与会师生们的同情分。

包括我在内，对蒯所说的这些前后经过也是不怀疑的。

我对“六二四”那个晚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

多年后，我与老蒯在南京、深圳少说也吃过二、三十次饭，酒席宴上，杯盘恍惚之际也曾不止一次的谈到过“六二四”。谈起“六二四”，老蒯当然很兴奋，那是他的一炮走红的“成名作”，校友们也多交口赞誉。我这个人虽然并不擅言词，但也是好唱反调，好泼冷水的主。我对老蒯说：要说那天晚上你的表现呢？真是没说的。嘴皮子呢？超一流！工作组的那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但要说到辩论的内容与实质呢？其实稀松。什么“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这只不过是一种中学写作文时的“渲染”手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现在这种手法就叫“煽情”。对此，蒯辩解说这反映了工作组害怕群众。我说这就越发“扯”，你说工作组害怕群众，工作组说你不相信党；你说工作组群众路线有问题，工作组说你动机有问题。双方都有道理，双方的道理都是“扯淡”。我这样说，老蒯当然没有认同，但也没有生气，只是酒席宴上的一笑而已。

有那么六、七年的时间，我与老蒯交往相对频繁些，在这个过程中一向是相当平和的，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凡有清华同学的聚会，大凡都是老蒯一人唱独角戏，别人基本上插不上嘴。但只要是蒯大富与沈如槐同时在场，蒯的段子就往往讲不起来。沈不苟言笑，冷冰冰的坐在那里，不喜欢讲也不喜欢听，场面就会沉闷而清冷。沈当然也不是没有风趣的人，他就是故意不肯给面子。有沈有蒯的场合，大家都会照顾两人的情绪。无沈的场合，老蒯风生水起时，我也常常是席间“傻听傻乐”的一份子，但我顶过他两回，一次就是关于624，另一次是关于讲段子。这个细节与本文无关，但有点意思，故在此一笔带过。

蒯的演讲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贺方同学明显落下风，每当他们为工作组开脱时会场上一片嘘声。尤其是在这期间刘涛曾给王光美打了一次电话，然后跑到台上说：“我妈妈说了，工作组是正确的”，下面一片哄笑。

我对刘涛抱有深深的同情，她这一辈子，真是太不容易了。但她那天的表现也只能说是“咬奶头”的水平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不得不一个接一个的粉墨登场了。

首先登场的是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张茜微，她是从后台的东边走过来的。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她也戴眼镜，是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她的解释是模模糊糊的，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却三番五次说不清；既没有“讲理”的信心，也没有“不讲理”的气势。

继之上台是第二副组长杨天放，他是从台的西边走过来的。据说他是林业部副部长，貌相就有点土，身材矮敦，戴一顶兰色鸭舌帽，语言却还算是朴实的，虽朴实却无味，讲话不得要领，很快就在一片嘘声中下了台。

继而，第一副组长周赤萍闪亮登场。

周赤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中将军衔，我早已在《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上看过他的回忆录，知道他是林彪四野手下的一员骁将。

周没有武将那种魁梧的身材，中等偏矮，满头银发，甚至连眉毛也是白的了，脸色却红润得难以置信。看他那个着装，显然刚刚沐浴更衣了，穿着宽大的绸衬衫，宽大的绸裤子，肉白色（有校友说是灰色的），拖着黑色的皮拖鞋（有说是塑料拖鞋），从头到脚一身休闲装。他一手执着一只超大号的搪瓷茶缸（那时还没有保温杯），一手摇着一把大芭蕉扇，缓缓地从大礼堂的西侧走到讲台上。人已到，口未开，就先失三分人心。他这一副养尊处优的老革命态势马上使我联想到毛关于“官做大事了，就要变修”，“车子越坐越好，房子越住越大”，“以其昏昏，示其昭昭”，“再不整整不得了”之类的论断。

周中将在台上讲了十分钟左右，全都是风马牛，没一句话能讲到点子上。

周中将毕竟经过枪林弹雨，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即使台下的反应很糟糕，他并不慌乱，还在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他与杨副组长不同，他的衣着已经很不土了，倒像一个大地主，但他的文化水平理解不了他面前的大学生们。他是有气势的，有一股“我就不讲理了，你能怎么着”的大兵霸势。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话音落，哂笑起，大礼堂里响起更大的一片哄笑。蒯大富只问了一句：“你怎么能代表得了毛泽东思想？”台下的学生们就起哄“问得好”。周中将无以为答，就在一片哄笑声中下了台。

那个晚上，真正出大丑的正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蒯兄弟就这样连续挑落对方数员大将，最后终于逼得工作组组长叶林亲自出马了。

叶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位“一二九”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国务院身份使我认为他是周恩来派来的，当然也是经委主任薄一波派来的。那天晚上，他穿白色短袖，衣冠楚楚，身材硕长，五官端正，十分俊朗，容颜有玉色的光辉，似乎没戴眼镜，他的男中音的声音缓慢圆润浑厚，有很重的鼻音，一打眼一开口就知道这是我党的一位有知识有水平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

叶林强调了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在新市委领导下进行的。

叶林的发言没有明显的语病，也没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他也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没有急智，既不流利，也没强悍的逻辑推理，更不会煽情，抓不住人心，他也始终没有回答“王光美说来没来”的问题。

大概记取了刚才周赤萍的教训，叶林并没有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而是换了一种说法：“蒯大富同学向工作组夺权就是向党夺权”。

叶林说：“最后让我念一段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一切牛鬼蛇神都逃脱不了党的阳光，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最后请杨天放同志带领大家呼口号”。

呼完口号后，叶林宣布大会结束，但蒯大富马上接过去说他还有话说。

这是蒯在这次会议上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言，他提到了一则消息：邮电学院的工作组长被撤了。这则消息太惊人了，为他“怀疑工作组”找到了一个理由，并将一个重大的悬念种在了与会群众的心里：工作组是可以怀疑的，工作组是必须怀疑的。

接着，蒯在与贺鹏飞商量后宣布“散会”！群众也就散了。

这样的结束无疑是对工作组更大的打击，蒯大富成功的“反客为主”，而工作组将裤衩也输没了。

“六二四”那个晚上，蒯兄弟（我后来与老蒯渐熟，叙过年齿，我与他同庚，都是苏北人，都是1945年生，他是九月份生，我是三月份生，且我是制八的，他是化九的，也比他高一届，称他一声蒯兄弟，可也）毫无畏惧，沉着机警、巧舌如簧。理工科大学生严格的逻辑训练使他在辩论中占尽上风，他又是“清华文学社”的才子，文学功底不薄，擅于煽情，上文所说的什么“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之类并无实质意义的话，很能抓住现场观众的情绪，以至掌声、叫好声、鼓噪声不绝，一阵高过一阵。

那晚，虽有刘才堂、刘泉、鲍长康等学生帮衬，但无疑，老蒯才是主将，老蒯在那晚的表现真令人惊叹，有一种“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在那个特殊的晚上，蒯大富连败工作组三员大将，直捣黄龙，最后更是挑落了对方主帅。就像早期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聂卫平一样，蒯大富一战成名。

“六二四”的蒯大富是一个传奇。事后，我曾对老蒯在那个晚上的表现给了这样两句话的评价：“百卉初萌、利刃新发”，“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我是真心佩服他，但我佩服的是他的口才，他的急智，并不是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很少让我佩服过。

蒯大富讲话是有逻辑性的，但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是整个事件是构建在“蒯大富及化902班的大多数同学不认识王光美”的基础上。

蒯大富怎么会不认识王光美呢？

此前，王光美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访问东南亚六国”的新闻纪录片早就不止一次的放过了，蒯大富怎么可能没有看过呢？即使没有看过纪录片，各种报纸也曾许多次刊登过王的照片，尤其是王光美在印度尼西亚街头的巨幅照片，难道蒯连报纸也不看？这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蒯也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书呆子，文革前他已经在政治上出过大风头了，他远比一般同学

关心时事热切得多。

所以说“蒯大富不认识王光美”这件事虽说有可能，但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蒯明知来人不是王光美，却故意装着不知道。

后一种可能性比前一种可能性大得多。

再说了，工作组故意隐瞒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蒯等的大字报说“我们还有大批材料有待陆续公布，可这么一来，将我们的材料搞走了相当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遗憾。”你们能有什么“大批材料”呢？这太搞笑了。

如果拥护工作组这一方也有一两个能说会道的同学，循着这两条线追问下去，那么被动的就不是工作组而是蒯大富了。

所以我说“六二四”的那一场大辩论有什么意义呢？要说有意义，真他妈的没什么意义！要说没有意义吧，还真他妈的有点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

这一晚，清华园的一只蝴蝶振动了它的翅膀！

二、6月24日至8月4日的四十天

如果说“六二四”晚上真正出大丑的是井冈山老战士周赤萍的话；

那么，真正的失败者却是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共和国主席夫人王光美。

然而，王光美对这次失败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

事后证明，她也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接受到有益的教训。

其原因当然很多，笔者概括有三点：

第一、王光美完全没有认识到“清华园”是与“桃园”完全不同的；“桃园”的农民干部，她搞得掂；而清华的大学生们她是搞不掂的。地点不同了，对象不同了，时机也不同，老皇历不顶用了。

第二、刘少奇没有意识到对于“文革走向”与文革具体操作手法，毛并没有真正发话。他没有意识到毛躲在杭州，让他在北京“相机行事”是为了卖他一个“空档”，以便揪住他的辫子。他自以为是的沿习了“土改工作组”、“三反五反工作组”、“四清工作组”……以及“打土围子”、“打老虎”、“拔白旗”、“抓右派”、“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整四不清干部”……这些我党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屡试不爽的传统方法。

又有谁能知道，这一回的毛是“主意不变，方法全新”；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何况他老人家的斗争艺术已经“炉火纯青”，用大翻译家傅雷在被打成“右派”前赞他的一句话就是“到了化境”的。什么叫“到了化境”？

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随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就是“老子一气化三清”，鼻子一哼，两道白光，千里之外取敌首之首级。”

第三、刘少奇、王光美对于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毛对于他们的日益不满日渐疏远，没有清醒的认识。虽然也不至于蠢到麻木不仁，一点也没有觉察的程度，但完全没有充分的估计。

他以为他是上了“宪法”的共和国主席；他以为他是当了22年的接班人；他以为毛尽管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甚至打倒了他的亲信彭真，但真要打倒他刘少奇，那还是不可能的。至于毛所说的那个“一个小指头”，他虽然也感到害怕，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重视又能怎么样呢？重视了能逃脱吗？不能的。只要被毛盯上了，又有哪一个能逃脱得了悲惨的命运。

刘可能意识到了危险，但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面前，就在当下。

于是他们表现得努力工作，工作的主旨是“维稳”，并妄想以此修复与毛的关系。

如果说初期的文革已是两主席博弈的舞台，那么走在前台演戏的则是他们各自的婆娘。综合江青在文革中的整个表现与业绩，可用“疯婆娘”一言以蔽之；而王光美在文革初期的整个表现则可用“蠢婆娘”一言以蔽之。江青在北大煽风点火，王光美在清华高压灭火。这里并不在乎二人在两校出现的时间有几天的早晚，整个文革初期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北大运动走在清华前面，北大的校党委已经被打倒了，清华就开始怀疑清华的校党委了；北大的张承先工作组已经挨江青、陈伯达、康生熊K了，清华也就开始怀疑叶林工作组了。北大清华一墙之隔，那壁厢煽风，这壁厢灭火，这火又如何灭得了呢？江青在北大越走越远，王光美在清华在相反的方向上也越走越远，就这样最终发动了反蒯斗争。

综合文革初期王光美的表现，她当然是一个整人者，她和她的男人要为清华大学在“反蒯斗争”中的全部受迫害者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刘少奇与王光美也是文革这部“全能绞肉机”中的另一类受害者。

“六二四”接下来的事大家都是清楚的。王光美工作组悍然发动了近40天的反蒯斗争，整了700多名师生，打了50多名蒯派分子，整死了两个人，另有数名受迫害者自杀未遂，清华园内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

这期间，蒯大富曾经溜出了清华园去上访，后来又回到了清华园；失去人身自由18天（7月4日至20日）；绝食3天（7月4日至6日）。

7月6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文中写道“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我准备长期斗争”，于是乎复食。

王光美工作组的高压几乎压服了所有人，却最终没有压得服蒯大富。

一方面她成就了蒯大富的英雄传奇；另一方面也会日后的埋葬她和她男人的坑又多挖了一锹土。

如果说 624，蒯大富的表现虽然优秀但仍然是有暇可击的话；

那么在 624 至 84 这段时间内，蒯大富的表现是接近完美的。

如果说 624，蒯大富收获的是全校师生中的多数人对其嘴皮子的认知；

那么从 624 至 84，蒯大富收获的则是全校师生中的一部分人对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及颇为有理有节的斗争艺术的认可。

这一部分人中也包括笔者。

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八八”，又后来成为“井冈山老战士”，但这其中却不包括笔者。笔者仍然是走走看看的逍遥派，从来不是保蒋派，也不是反蒋派；从来不是反工作组的，也不是保工作组的；既不是八九，也不是八八，更不是“井冈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67 年的 4 月参加了“414 串连会”，终于混了一个“红袖套”。

笔者晚年有时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也觉得很奇怪。究其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谨慎，还因为是在班上年龄最小的缘故，平常自由散漫，在年级里当了个小官，几乎与班上所有同学的关系都还可以。没有人想整我，整他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人想拉我，拉他也没有什么用。

1966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回京了。

自从 1965 年的 11 月 11 日离京，毛已经在外面呆了整整 250 天，在这 250 天内，毛泽东完成了发动文革的全部部署。

7 月 20 日，感觉到风向不对的王光美工作组主动解除了对蒯大富的关押。

蒯大富放出来了。

蒯大富放出来了！整个清华园都在传播着这个消息。

清华园的这只蝴蝶又一次振动了它的翅膀，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更给力。

三、7 月 31 日的那一整天

1966 年 7 月 31 日，周恩来一天内两见蒯大富，谈话长达 6 小时。

第一次从凌晨 2 点谈到 5 点钟，地点在清华甲所。

第二次从晚上 7 点谈到 10 点钟，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两次谈话基本都是蒯大富一个人讲，周恩来只是听，偶尔也发问，或要求重

讲一遍。

这里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并思考的。

1、第一次谈话开始，周恩来让蒯大富坐下后问了姓名与籍贯，叙了同为苏北人的乡谊后即说：

“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一个总理为什么主动对一个学生作这样的保证呢？处于惊弓之鸟状态的蒯大富根本就不可能要求总理作这样的保证啊！

那当然是为了消除蒯的紧张情绪与思想顾虑，以便能听到最真实的情况，掌握第一手的材料。

于是，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然后就开始讲。周的秘书孙岳作速记，一字不拉地全部记下来。

蒯回忆说：“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

2、谈话刚开始 20 分钟不到，贺鹏飞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说话。”周恩来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把他赶出去了。

又过了 20 分钟左右，贺鹏飞第二次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说话。”这回周恩来生气了：

“我跟你说过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它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请注意，贺鹏飞第一次敲门进来说的是“我们”，谁是我们？显然是指贺鹏飞以及可能在门外的刘涛、刘菊芬（刘宁一的女儿）、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这些高干子弟。第二次敲门进来时说的是“我”。

有可能在第一次碰壁后，贺鹏飞在门外与可能也在外面的刘涛、刘菊芬等商量了，她们可能认为大家都进去听呢周恩来不答应，一个人进去呢兴许就答应了。没想到仍然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

为什么贺等高干子女如此感兴趣？

因为他们也已经意识到文革的风向已经变了，也许王光美已经知道了周来清

华的消息，要求他们争取听一听。

为什么周恩来如此坚决地拒绝贺鹏飞等的要求呢？

那是因为此事是毛的直接布置，关系太重大了。如果让贺参与谈话，那么蒯的汇报就会内容打折扣，锋芒有收敛；而且有可能自己前脚离开，贺等后脚就会给王光美通气。

周与蒯谈话这件事，是保不住密的，但对于谈话的内容周要做到绝对保密。

3、第一次谈话时，周恩来只带了他的秘书孙岳，第二次谈话时周恩来却叫上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

叫上这两个人干什么？思虑慎密的周恩来无非是为他与蒯的谈话作个证，而且这两个人是与刘少奇关系稍远的人。

第二次谈话，周恩来也让蒯大富带了三个人，他们是蒯自选的。因为蒯曾经失去自由 18 天，这 18 天的情况可由他们来补充。

4、谈话结束时，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

“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

然后与蒯等握了下手就走了。

一个八亿人口大国的现职总理，竟然在 24 小时内花了整整 6 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从《周恩来年谱》中，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 8 月 1 日，周恩来先后约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叶林谈话；

2 日、3 日，再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的学生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8 月 2 日晚，周恩来又与朱德等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谈话至凌晨。

要知道，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于 8 月 1 日正式开幕了，周恩来会里会外有无数的事情要做，然而他却在百忙之中将与蒯大富等的谈话放在极重要的位置，将调研清华文革的事情放在极重要的位置，真可谓紧锣密鼓、争分夺秒啊！

当调研工作进行到 8 月 3 日时，周恩来作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即 8 月 4 日

到清华来开大会。这一天，他又约了王力、关锋谈清华问题，而后又分别再约叶林和清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由此推断：也就是在 8 月 3 日这一天，周恩来对清华文革的调研告一段落了，他的阶段性的结论意见已经出来了，他的处置措施也已经有了腹稿了。

既然已经掌握了全面情况，有了阶段性的结论意见，那么周恩来也势必会去向毛泽东作更详细的汇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在什么时间去向毛泽东汇报的？

四、8月4日的那个下午

1966 年 8 月 5 日，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的“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角，宣告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灭亡。”

“打倒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蓄谋数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役。

在经历了前期舆论准备、“左派”重组、哨探敌情……进入中期的廓清外围、抢滩登陆、清除了占据枢要岗位的杨尚昆、罗瑞卿，砸烂了陆定一的中宣部“阎王殿”，摧毁了北京市彭真的“独立王国”……这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布局及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胜利后，1966 年 5 月 16 日，“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而文革的正式开始也表明“打倒刘少奇”的战役进入了总攻阶段的“倒计时”。

但即使是到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布局仍然是扑朔迷离的，巡游云梦，忘情山水，放出空档，诱敌吞饵……一般人当然是完全看不懂的，中央高层也许只有周恩来、林彪略知几分底细。

正是在 8 月 5 日这一天，以这张 204 个字的大字报为标志，毛泽东终于下达“总攻”的命令。

总攻的日子是重要的，但决定总攻的日子同样是重要的。

毛泽东决定要“总攻”的日子是哪一天？

笔者根据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与排查，大胆的推测这个日子正是写大字报的前一天，即公元 1966 年 8 月 4 日，而且推测到更为精确的“晚上”。

8 月 4 日这一天的下午一点左右，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及部分非常委们“突然”

接到了一个通知，下午三点钟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为什么说这次会是“突然”的呢？

下午一点左右发出的通知，三点就要开会，还不“突然”吗？

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开这次会呢？

笔者认为就是因为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清华文革”的汇报。

上文已经说到，周恩来在经过连续四、五天夜以继日、争分夺秒，高强度高密度的深入调查后，已于8月3日基本掌握了“清华文革”的全面情况，并得出了初步结论。

既然初步结论已经出来了，当然会尽快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的汇报也许是分几次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一次进行的。无论是几次汇报或是一次汇报，都有一个最后的、全面的汇报。

那么这最后的汇报又是在什么时间呢？

因为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一般是后半夜睡到当日中午的。

所以，可供选择的时间段只有两个：

一是在8月3日晚间毛泽东睡觉之前；

二是在8月4日上午毛泽东起床之后。

笔者认为是后者，即8月4日上午毛起床后的这一段时间：上午十点后至中午一点前。理由是什么？没有更多的理由，只是直觉。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什么内容呢？

当然汇报的清华文革的这个典型案例的全部情况：工作组是什么时候进校的？工作组的组成情况，王光美是什么时间当了工作组的顾问？如何领导并操控了整个清华工作组？清华如何出了一个蒯大富？王光美和工作组组长叶林又是如何组织发动了长达40多天的“反蒋必反蒯”的？过程如何？蒯大富又如何从“六二四大辩论”到“失去人身自由”的，在被管制的阶段如何“绝食抗议”的？工作组在这一场“反蒯”运动中整了多少师生？定性了多少个“蒯派”？自杀身亡者有几人？自杀未遂者又有几人？当然也少不了蒯大富在整个过程中的“亮丽”表现，也包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新市委以及刘少奇的有关指示。

虽然，周恩来是在自己有了初步结论才向毛泽东系统汇报的，但是周恩来不会将自己的结论端出来。情况我来讲，结论只能由毛泽东本人做。

毛泽东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正是写在他的“大字报”里：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文字精辟辛辣，气运贯通，底气沛乎苍穹。

毛泽东的底气从哪里来？正是从清华文革这个典型中来的啊！

在8月4日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毛最感兴趣的可能有三点：

1、王光美全面介入并领导了清华文革。

清华工作组的错误，就是王光美的错误；王光美的错误就是刘少奇的错误。这三者是完全可以画等号的。

2、清华居然出了一个蒯大富，从怀疑到辩论，从辩论到被镇压；从公开斗争到绝食斗争，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

3、刘王的错误既有事实，还有一组确凿的数字，刘少奇的小辫子给真真切切的抓住了。

其实在派周恩来清华前，毛已经对清华的事情有所风闻了，也已经知道刘少奇已经上钩了。但是刘“吞钩”有多深？这条“辫子”究竟有多粗多长呢？也就是“上纲上线”能上到何等的程度呢？毛毕竟不在现场，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光凭江青在耳边嘀咕，毛觉得还是没有把握的。

上得过低了呢？毛觉得不过瘾，既不能出心中长久以来的“恶气”，也不能上组织措施将刘彻底拿下。

上得过高呢，也不能服众。毕竟人家也是当了几十年的接班人了，也可算作树大根深，盘根错节了，何况自己还曾说过刘的一箩筐的好话。

正是在这样的两难思考下，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调查清华文革，结果大丰收，毛获取了“清华文革”这个经典案例，并颇为意外的收获了蒯大富这个典型。

这个典型就是一枚炮弹。

没有炮弹怎能“炮打”呢？有了炮弹就可以开始“炮打”了。

在听了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挟余愤及余奋，趁热打铁，立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毛在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面对毛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地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斥责与羞辱下，刘终于意识到了灭亡的危险就在眼前，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终于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是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毛：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加油，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随即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

王光美对此也有相同内容的回忆：

“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王光美强调指出：

“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敲定刘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在此之前，毛虽然已经多次批评过刘，但是一直也没有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

正因为毛手上掌握了清华的案例、蒯大富的典型，毛才召开了这次会议，又加上会上发生了刘的抗争，毛才将刘的错误定性为党内斗争中所犯错误的最高品阶——“路线错误”。

当然，炮弹不止蒯大富这一枚，但似乎其它炮弹都没有这一枚那么有杀伤力。

当然，如果没有发生刘公开对抗，毛迟早也会打倒刘的。

但是，如果错过了8月4日这一天的决策，也就错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面再找这样的机会也是费功夫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蒯大富这枚炮弹是影响了整个文革进程的，也间接影响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命运。

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

第二、周恩来的人望使得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

如果不是周恩来，而换任何其它的人去做这个调查工作，效果就远不如了。

比如换成陈伯达，同样的结论，别人就会认为是极左与偏见；

比如换成江青，人家会认为是这一对夫妻在整另一对夫妻。

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所以当年我们就曾经奇怪：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江青只往北大跑而不到清华来呢？原来是她男人跟她打好招呼的。

8月4日下午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当晚周恩来就带着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来开文革现场大会，在会上，周恩来亲自给蒯大富平了反。

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蒯大富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革命的要革命的学生。

将蒯大富的人物性质复归原位。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将蒯的人物性质坐实了，也就将刘“镇压群众”的错误坐实了。

五、“伟大”炮打司令部，“亲密”就任接班人

上文说到在8月4日下午的会上，毛泽东将刘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了，这等于最终下定了“总攻”的决心。

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是将“决心”

变成了“命令”了。

但这个“命令”当天并没有发出去，所以严格的讲，8月5日并不是“总攻”的日子。

8月5日，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念了他的这张“大字报”，也在第一时间给周恩来看了，当即布置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宣读。

但仅几小时后，毛收回了成命，他似乎还要再修改一下。但他修改的内容并不是出于缓和，而是决心“一次性让刘窒息而死”的加码。

修改后的“大字报”于8月6日定稿。

同日上午，林彪、叶群回到北京，住在人大会堂有空调的浙江厅。

同日晚11点左右，周恩来与陶铸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参加者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等军方重要将佐以及中央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只有20余人。

周恩来到会后，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将这张204字的大字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说：

“现在看来，多年的事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周恩来讲完后全场愕然，没有一个人发言，连同协同召集会议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也没有要求他们发言，只是宣布了一下纪律就散会了。

这次会议是没有什么名目的，参加会议者也只是毛、林、周等圈定的名单，当然是被认为是可靠的人，用得着的人，或是要保护的人。

这既可以算作一次小范围的“战前动员会”，也可算是“打招呼会”。

8月7日，毛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公布的方式是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会议代表。

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打倒刘少奇”的总攻开始了，其实也就结束了。

但文革并没有结束，其后的运动只不过是已经“打翻在地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全是“狗尾续貂”，渲染阴暗心理，拿老百姓开心。

为什么写好了的大字报，却拖后了两天后才公布呢？

因为毛泽东要等待他此时唯一的“心上人”——林彪的到来。

8月5日，毛泽东对看了大字报的周恩来说：

“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毛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即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1966年8月5日晚九时许，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一早就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

走笔至此，需要交待一下林彪的情况了。

自从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后，林彪就离开了北京去大连休养，此后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神秘消失了两个多月。

两个月后的7月18日，毛泽东经武汉回到北京，不久就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以中央名义电令催促林彪到会，北京派来的专机等在大连，但林彪坚决不肯走，他向秘书口述了向中央的请假条。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重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也得承认这是一篇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紧跟毛的讲话，完全是一副坚决拥护毛泽东，坚决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将他早已经营多年的“吹捧毛泽东”的系统工程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可以这样评价，“五一八讲话”是林彪造神运动的“巅峰之作”。

然而在两个多月后，面对毛泽东的召唤，林彪却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笔者认为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于7月8日在武汉写了他那封五年早知道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作了评价。毛在信中说对林彪的讲话“总觉得很不安”，其实就是很不满；毛说林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其实就是说林彪别有用心。

当时毛江为了“革命工作”，夫妻分居两地，毛在汉，江在沪，毛故以“家书”的形式系统的表达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严重不满。

多年后，毛讲了他写信给江青的真实意图：要是写给总理或林彪本人呢，他们看了就放在抽屉里了，而江青是个小自由主义者。

至于，毛泽东有没有真的将这封信送给江青看，这并不重要，咱们也无需去落实这件扯淡的事。重要的是毛泽东让周恩来看了，还让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了，

更为重要的是毛同意周去大连向林彪传达了这封信。

对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记载道：

“（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向中央做报告时也重点谈了这封信，情节基本一致。周说：

“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对于林彪而言，毛的这封信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内容的（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对此笔者另有著述，本文不准备展开分析）。林彪看了信后表面上接受了批评，表示回到北京后再修改。但我们不难想像林彪看了这封信后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加强了，他对毛泽东的戒备心理加重了。

他可能会长叹：我都讲了你那么多的好话了，你怎么还不满意呢？真他娘的不好伺候啊！

可是“不好伺候”也得伺候，他心中“惶恐”了，“惶恐”中还带有几分“幽怨”，几分“无措”，除了“要避润芝”外并没有其它的“应对措施”。

所以，当毛泽东要林彪来参加会议，林彪就写了请假条。

这是林彪一拒毛泽东。

毛泽东获悉林彪以病为借口不赴会，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林彪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开幕了。

8月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与刘少奇也吵过了，“路线错误”的结论也已经敲定了，毛又让秘书给林打电话，要林回北京。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

这是林彪二拒毛泽东。

8月5日，本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定闭幕的日子，可是因为毛泽东写了大字报，

又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领导机构。

毛又让秘书徐业夫在电话里将他的大字报读给林彪听，再次坚决要林彪來。林彪仍然藉口有病，不能出席会议。

这是林彪三拒毛泽东。

在这期间，林彪还拒绝了周恩来的劝行以及江青通过叶群的劝行。

同一天，毛泽东第四次让徐业夫给林彪打电话，这次是霸王硬上弓，一定要林彪來！

就在这样的标准的“三请四邀”后，林彪终于答应来了。

8月6日上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宣布什么时候林彪来了什么时候再开会。

同日上午，林彪回到北京。

林彪一到北京，立即被接到人民大会堂。一向不串门的毛泽东亲自登门看望，说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还是推说身体有病，一再叩头求免。

毛泽东骂林彪裝病称疾，想当明世宗，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当也要当，不当也要当。（舒云 1996年10月11日，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笔记）

就这样，林彪终于参加了会议。

无论是“不得不當”，还是勉而为之，还是半推半就，还是正中下怀，总之，林彪當了接班人。

六、结束语

南美洲的丛林中一只蝴蝶振动了翅膀，引发了太平洋彼岸的一场暴风雨。

这是“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

这世上有沒有这样神奇的“蝴蝶效应”，笔者是深表怀疑的。

但看起來“风马牛”的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溟溟中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却是可能的。

没有624晚上的精彩表演，没有王光美工作组长达40多天的高压“反蒯”，就不可能铸就蒯大富这个“典型”；

没有周恩来提供这个“典型”，8月4日下午的那个“突然”的政治局会议就有可能不会召开；

没有这次会议，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刘少奇的当面抗争；

没有刘少奇的抗争，毛泽东也许就不会在8月5日写那张大字报；

没有那张大字报，就错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也许刘少奇还能在政坛上苟活一个短时间；

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其它人，历史的大事件已经不会改变了，但事件的细节可能是大不一样的。

看似这一连串“玄玄乎乎”的“如果”，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三年后，1969年11月13日，刘少奇死于废都开封的一间地下室里，15日刘的肉身在开封府的焚尸炉里化作一缕轻烟，留下一杯粉埃。

五年后，1971年9月13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一家三口，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里，林彪的头颅被削去了一半，滚在十几米外的远处。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竟然死于非命，且不得全尸。

十年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老而逝，他的肉身至今还躺在大中华中轴线的巍峨殿堂里。

又十年，1987年10月底，蒯大富刑满出狱。

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

丢了一颗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2011年6月25日（“六二四”事件45年后的次日）蒯大富题签赠书《清华蒯大富》于笔者。书名起得真不错，但蒯大富不仅仅属于“清华文革”，他属于“中国文革”，所以更恰当的书名应该是《文革蒯大富》。

笔者以为应该将蒯大富这个清华人的事迹放在整个的“中国文革”中去考量他的意义。

“清华文革”这个箩筐小了点，小得搁不下“清华蒯大富”。

七、余音绕绕

1966年7月20日，感觉风向不对的王光美工作组主动解除了对蒯大富的关押。蒯大富放出来了！当时整个清华园都在传播着这个消息。

时过境迁，20年后，1987年10月底，蒯大富刑满释放。蒯大富放出来了

已不再是新闻。但消息却仍在早已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清华老团老四中悄然传播着：

你知道吗？听说蒯大富出来了。

现在在哪里？

听说在山东；

听说在北京；

……

又约五、六年后的冬天，我与我的生意合伙人张先生（老团总部委员，我的标准老乡）在南京接待了蒯大富、罗晓波夫妇。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张先生特意邀请的，还是老蒯顺路而过的。

在一场又一场的“接风洗尘”、“杯酒压惊”、“先干为敬”中，不断地回忆着尘封往事。蒯的身材变得难以置信的粗壮了，却依然那么能说会道。一次又一次的看他的老相册，一次又一次的听他讲“段子”，依然佩服他的记忆力，依然佩服他的嘴皮子，也不记得有多少老团赶赴来看他，也不记得与多少老四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了。

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先生被当地有关机关传去问话，我则集结了三四名信得过的员工悄悄地来到该部门前“哨探”。

冬夜的冷风里，我在那个有高高台阶的门前找了一个阴暗的角落盯着那扇门，不停地看着表。

时间太漫长了，耳边不断的回响起那遥远的“六二四”回声：

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

午夜时分，张终于出来了，嘴里叼着烟。我急切地趋前问：怎么样？怎么样？

张说：没事没事！妈的，刚开始也很凶啊，训我，结果被我训了一顿……

我奉承张：你真行！就是江泽民在面前，你也敢训他！

我经常这样毫无恶意的揶揄张先生，圈子里的许多人都知道。

20年前的那场文革，我们这些人其它的什么本事也没学到，只学到了“粪土当年万户侯”。

也许是在蒯大富来宁前，1993年他在北京邂逅王丹。

蒯对王丹说：

“1989年6月4日我正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家就住在中南海南面。6月4日那天，我穿着短裤，拿一个扇子，我就站在那个街边，看到很多人啊，前面学生啦、市民啦，我看到这种场面确实激动啊！因为我们当年就这么干的嘛！”

蒯还问王丹：

“当时我在天安门，假设我支持你们，你们会不会欢迎我？”

王丹说“你千万别支持我们，我最怕岁数大的人来支持我们哪！假如你们支持我们，等于我们有后台。那‘四人帮’就和我们混在一起了。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当时四人帮那么明显地破坏国家，你们看不出来，跟着跑，不是笨蛋嘛！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是坏蛋嘛，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

王丹的话很深刻，20年前我们所干的事难道不是“坏蛋与笨蛋”干的事吗！

王丹的话也很浅薄，倘若他早生20年，我推定他也会是与我们一样大同小异的造反派。

光阴荏苒，转瞬又是20年。

倘若在今天蒯大富重遇王丹，王还会这样说吗？我想一定不会了。

王是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王的话表明他完全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而我们这一代却还能对王这一代有一小半儿的了解。

如今，王也应该有下一代了吧。

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知一代。从我的文章所获得的网友评论，即使是我们自己这一代相互之间至今也是有着许多的“不知”，好好的朋友，为了“团啊四”的尘封往事，一言不合，转眼变成乌眼鸡。

“走出文革”？谈何容易！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操作的方法。

就好比是一件曾经落在粪坑里的布衫，洗过了，漂过了，或是将其置于樟木箱底，再撒上几粒樟脑丸，甚至再用香水喷一喷，以为是行了，可过十几年、几十年再拿出来闻闻，那当初的臭气依然幽幽地氤氲于指鼻间。

何况，更何况这件落在粪坑里的布衫既没洗过，更没漂过，只不过拿在自身也是混浊的污水里马马虎虎地涮了一涮。

俗话说“混水能洗白萝卜”，那是因为萝卜本身是好的。倘若是一个已经烂心了的臭萝卜，你倒是拿在混水里洗洗看，只能把那“混水”也洗得越发的臭了。

乐观地说起码得花一百年，还得要从现在做起，要花很大很大的气力。悲观地说，文革的余毒永远也难肃清得了，它刻在中华民族心中的伤痕也将是永远的。

从这一点讲，老头和老头的“文革”也算是“不朽”的了。

因为文革“不朽”，“文革蒯大富”也将“不朽”。

呜呼！倏忽之间已过三代，这个时代不再属于我们，然我们却仍然属于这个时代。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感

唐 伟

孙怒涛 1960 年从浙江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中曾担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的二把手，1980 年调离清华。曾表示要写一本《我在清华大学二十年》的书。今年 2 月 22 日老孙给我发来了本《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以下简称《拷问》）。他在卷首语中写到“写作的过程，是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我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看的……，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一个负责的交代。”孙怒涛的书，我看得很认真，也想得很辛苦。因为他书中的重点是写清华文革，这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所写下的一切是给同代人看的，引起同学、朋友的联想，以求史料的真实。但我以为主要是为了给后来人看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聪明得太迟，而又老得太快，社会总在轮回转圈。

1949 年，有大学学历的中国人只有 10 万。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三条：招工、参军和上大学。老孙的父母亲含辛茹苦供养独生儿子上学，他们的追求和梦想一直是老孙心目中最有份量的嘱托。老孙也的确是一个能读书、会读书的读书种子，家世清白、父母良善，只要不是过于贫困，哪派势力当政临朝他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没有必要特意贬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把共产党视为恩人，把毛主席当作救星，永生感恩！”记得去年和老孙在北京见面，还谈到他的慈溪老家乡里自他以后这些年，还没有一个考上清华的。

小学入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是老孙父亲的期望，也是他自己梦想的政治前途。我比老孙小几岁，有点政治觉悟也开始于 1958 年。那一年，中学校园的围墙写上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操场上也垒起了一座炼铁的土高炉，解放前在美国留过学的英文老师晚上站在乒乓球台上，在教育革命的口号声中接受批判……。大饥荒的 1960 年老孙上了大学，

红专辩论、参观反右展览、学雷锋运动、反修教育，孙怒涛平和地娓娓道来，亲切真实，那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体验。

“九评学习”成了孙怒涛政治追求的“滑铁卢”，清华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两大法宝：一是政治课和理论学习中的“灌输”，二是政治运动和学习中的“亮私不怕丑”。孙怒涛就因为暴露思想、迎合组织诱导而被绕进了政治漩涡。他在党员、干部启发下，在学习会上谈了“听到的、见到的、心里一闪念的”如基层干部浮夸、农民挨饿的事例，得到了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的组织结论。老孙追求进步之心严重受挫，大学毕业也未能入党。“人，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就很难清洗掉，很难再改变。”老孙的体会可谓刻骨铭心。

蒋南翔校长是一个嗅觉敏锐、处事老道的政治家，这位老清华学人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他对清华自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清华看重学习尖子、体育尖子，关爱学生到“护犊子”的程度。他在“院系调整”的政治改革后从团中央到清华任校长，“反右斗争”的胜利，搬掉了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桀骜不驯的钱伟长，破除了以“教授治校”为代表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仿莫斯科大学建造的主楼就是蒋南翔在清华工作业绩的象征——宏大板结。大饥荒缺吃少钱，主楼降低了高度，缩小了规模。尽管如此，主楼已成地标，足以长久地傲视全国高校，既能彰显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窘况，更是改变了清华的传统，从此尊官重楼：大楼重于大师、高官藐视学人。蒋南翔部长要在学生中培养出副总理的期望自然不在话下。

1965年的夏天，老谋深算的蒋校长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从西单大木仓高教部到海淀水木清华丙所，有他频频往返的身影。在“顶风开好万人船”的口号下，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将65级入学的1649个新生学制改为5年；开办了两个女生食堂；把4、5、6年级的4400名师生调到京郊农村搞一年“四清”，“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三大革命运动战士”；加快了学生中党组织的建设，打破了一般不在一年级发展新党员的惯例；更加密切关注高干子弟的动向，积极发展高干子弟党员……。他是不是想到了：北京城里将再次难以摆下那张平静的书桌了？

1965年9月孙怒涛在怀柔县城关公社白庄大队参加“四清”，一个贫农的儿子在苦寒的农村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他有两大收获：他知道了什么东西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他还知道了同年级的刘菊芬同学是高干子弟，并初步领教了机心难料的刘菊芬的高傲善变。老孙和农民打成一片，努力工作，但是他火线入党的梦想依然落空了。

如孙怒涛所言，1966年6月1日全国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

第一部分 清华文革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做到了。他老人家延安整风以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批判《武训传》，向已死的陶行知开刀，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集团，经过“反右”运动大规模的整肃，中国知识分子已有别于社会的脊梁和良心，他们失去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再也不敢奢谈体面，若没有“单位”收留，甚至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生活基础。毛泽东攀上了超过秦始皇一万倍的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君临天下，天威难测。他再也不会犯错误了，因为他会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以前的错误。他永远不会失败，因为所有的失败都由党、国家和人民承担。党、国家、人民绝不会相信并接受毛泽东会失败的各种事实。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我们的所有成绩，都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我们所有的挫折，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受到干扰的结果。林彪强词夺理，却符合群众的良好愿望，迎合了领袖需要。于是毛泽东的胜利接着胜利，而我们得以长久地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里。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向清华党委贴大字报的是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绝大多数同学和孙怒涛一样，“感性上的保蒋和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感性来自于个人的体味，理性来自中央对北大的说法和类比分析。蒋校长和老师们没有理由怨怼自己的学生，除了那些自以为拥有“丹书铁券”可以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独立思考的传统和谨言慎行的作风，在急风暴雨的狂涛中仍在发挥作用。清华师生从来没有抛弃过理性思考。早在1966年春节，清华党委内部就有“两个中央”的小道消息流传。党委副书记刘冰在五月的晚风中从北京饭店开完市委工作会议，骑着自行车返校，在经过塔院的路上心乱如麻，他有着与57年“反右”斗争前夕完全不同的心境：革命，真的革到自己头上了？周恩来访问归国，在毛泽东那里弄清了那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自己，才放下心来步步紧跟。只要野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刘、邓壮士断腕，得力的干部彭真、刘仁、蒋南翔惨遭抛弃。随着彭、罗、陆、杨被打倒，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顷刻瓦解。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出来了。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入清华，清华党委领导立马成为“黑帮”。上级组织的无情无义造成了文革的第一波灾难，群众从来没有贪天之功为已有，上级组织有什么理由要把打倒各级领导的罪责算到“造反派”头上？

偶然创造历史。6月的一天，自控系63级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从此清

华文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出于偶然，王光美原拟与化902班同学座谈未到，替代她的女同志或许没有说明身份，事后受到蒙骗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恰巧这天，蒯大富在刘才堂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有关夺权的批语。工作组如临大敌，开启了对刘才堂、王铁成、蒯大富等人的斗争。因为蒯大富在班上有个支持他的“十人小组，”工作组认为是群众基础；因为蒯大富是校刊通讯员，他学习毛著的照片上过1965年的《人民画报》，工作组怀疑他是清华党委埋下来的炸弹。为了“枪打出头鸟，”“反蒋必先反蒯”。仍是偶然的自作聪明，王光美到学生食堂和工友一起为学生打菜，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国家主席夫人亮相。但清华不是桃园大队，知识分子一眼看出这只是王光美令人反胃的作秀。她在清华从此名声不佳。

在工作组的淫威下，校、系、年级、班有组织地将“蒯派”清理出来搞臭：取消这些人的行动自由，禁止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逼迫他们写交待材料并加盖手印，甚至监视居住。就这样在全校师生中硬抓出了500多个“右派学生，”硬整出了一个“蒯派”，硬逼出了三条命案。1957年“反右运动”的场景，再一次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魔。巨大的压力下，要么窒息而死，要么爆发而生。清华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所有的“蒯式人物”统统缴械投降了，纷纷和老蒯划清界线。在绝望中绝食的蒯大富，悄悄被人看顾，来人自称受到江青同志委托。老蒯久旱逢雨，停止绝食，有了生机和继续战斗的勇气。

一、关于“八八串联会”

“八八”的目标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作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清华第一个群众自发的对抗上级指定的“临筹”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只是政治家们鼓惑群众的借口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段。共产党最忌讳有组织的行为，自外于共产党的组织是不会得到信任和支持的，它的最好的结果是自生自灭。一个共产党员可以犯政治错误，但决不能犯组织错误。“八八”组织松懈，各系负责人联席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唐伟、陈育延、吴栋等几个头面人物，也只是凭着父辈是革命烈士、革命干部；本人都是预备党员，自以为“辫子”较少，能在“血统论”肆虐的环境下与“临筹”的高干子弟过上三两招。工作组也非等闲，大辩论、讲道理输了，搞外调、查三代是他们的拿手活。清华派出的外调人员到重庆渣滓洞查敌伪档案，整了一堆唐伟父亲是叛徒的“黑材料”回清华。工作组撤得太快，这些没用上的“黑材料”工宣队用上了：唐伟在“清队”中被关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背着“叛徒子女”的档案材料分配青海。“八八”的纲领很低，

只求清算工作组在清华 50 多天里犯下的错误，只求所有无辜的师生和自己不要被打成反革命，“八八”派并不认为“夺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49 年以后大陆政权不是一直在共产党手里吗？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大革命吗？因此完全没有一点夺权接班的思想觉悟。随着工作组撤离，刘、邓垮台，刘邓路线遭到全国、全党、全军批判后，“八八”的头头就失去了追求，迷失了方向。

孙怒涛认为：“‘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就是革命左派。”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这种非黑即白的决定论说法都难以站稳脚跟。居高临下的“平反”，从来是权力部门的一出戏，“八八”掌过一天权吗？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哪个左派是自封和举荐出来的？毛泽东称蒯大富为“五大领袖”，他能领导近半师生员工的“414”吗？毛江夫妇不是在他们去世、下台 N 多年前，就无情无义地将老蒯抛弃了吗？老孙曾咨询过我，老蒯未能加入“八八”的原因和经过。我将经过告诉了他，还说：老蒯不诚实有目共睹，他宣扬的“权经”遭人反感。但《拷问》中仍写道：

“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八八’吗？答复是：他不行。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1966 年 8 月 23 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支持他拉起自己的红卫兵队伍。老蒯加入“八八”只是试探能否控制“八八”。至于说到鲍长康的“义气”，我真为老孙既无事实又无原则的吹捧深感脸红。鲍长康聪明好学，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是兵团总部的二号人物。看了李自茂回忆“5.30”的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是清华武斗中团派的第一线总指挥；看了韩爱晶写的回忆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手上不仅有伤亡同学的鲜血，更有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鲜血。鲍长康量窄器小、锱铢必较。工作组“反蒯”，他投降了；老蒯绝食抗争的时候，鲍长康的义气哪里去了？前年老蒯在太原突发中风，一同驾车出游的鲍长康借口上海家中有事，不能留下照顾老蒯，第二天却带着一帮人上了五台山。是冶金系 6 字班的王文鼎为老蒯夫妇买了机票、送上回深圳的飞机。老孙还能讲出几件鲍长康讲义气的事情？

《拷问》还写到：唐伟“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写到这里的老孙，头脑未必清醒：

“旗手”江青只敢承认自己是条老毛让她咬谁就咬谁的“忠狗”，老蒯说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比起那些奉旨造反、投机造反的人，唐伟只是个跪着造反的学生。唐伟当时说过：“宁可右倾，不当阿斗。”他是糊涂啊！

二、关于“血统论”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分清敌友，实际工作中执行着一条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土改时，由新政权派出的工作队根据每个家庭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而定。其中难免错划和偶然的因素，时代和社会造成的贫富悬殊被指控为个人行为，犹为荒唐处是一次定成分就万劫不复、殃及子孙。毛泽东终其一生不懈怠地奉行井冈山当“山大王”时的杀富济贫，并乐此不疲。人为灾难不断，举国难安，内斗内耗无休无止。阶级路线中的“重在政治表现”只是留给掌权者解释、定性和灵活掌握、生杀予夺的借口，也成了“政治犯”由来的依据。

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八八”的几个头头第一次被周恩来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他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世：

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到父亲一辈破败了，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对我说、你的家庭出身可以填职员。我还是填官僚地主家庭。

我出生于剥削家庭，我入党时就填写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为什么现在要改呢？你们能因此而说周伯伯就不革命了吗？有人劝我也改个名，我周恩来在受到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的时候也没有改过名，为什么现在要改呢？我们政协有一个老先生，“五四”以后为了表示和旧社会一刀两断，不要姓名了，叫“无名”，别人叫的时间久了，他的姓名成了吴铭。我今天提到他只是为了说明革命不革命和姓名、和家庭出身没有关系，你们可千万不要去找吴铭老先生的麻烦啊。

他还谈到，为了给铁路让道，搬迁周家祖坟的事。

他说自己1949年后再也没有回过淮安祖籍，回到老家见不见那些破落地主家族的亲戚长辈？不见不好，见了之后会不会给当地政府和群众造成压力？当地政府曾报告将我的祖屋修成“周公馆”，我没有同意，我对当地政府干部说，我真是从那间屋子里生出来的？你们若要坚持修“周公馆”我也只好同意，但是你们必须在门前挂上我写的一段话。这是一个罪恶的剥削家庭，这个家庭出了一个不肖子孙周恩来，他背叛了这个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你们若是同意挂上这段话，就去建“周公馆。”

……

家庭出身不仅阻断了许多普通入参军、招干、升学，甚至嫁娶的生活出路，而且也让贵为总理的周恩来深深地心存忌惮。邓小平也从未回过老家，广安协兴乡传出一句话：“龙归大海不回头。”真实情况邓家是土豪。只有厚黑如毛，才会把富农家庭成分改为中农。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自于阶级斗争学说。“血统论”是这个错误理论开出来的“恶之花”。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口号也传到了清华校园。高干子弟大多持支持态度，以此作为仗势凌人的依据，他们象被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一些早就想着攀龙附凤的农村学生，可悲地充当了抄家整人的打手。前些日子在 1964 级校园网上，读到了贺鹏飞班上一位同学的回忆文章。当年他热切地盼望成为贺鹏飞的同班同学，跟随贺鹏飞，他幸福地参加了“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典；他还参加了“8.24”的行动……。四十多年后他依然沉湎在铁杆粉丝的疯狂激情里，一遍再一遍写到：“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这种农村版“血统论”耸人听闻，这种顽固的愚昧或许是清华教育深层次的悲哀。

清华历来看重学习成绩、体育成绩，平时高干子弟也行事低调，注意搞好同学关系。1963 年贺鹏飞高考落榜，贺家也只是通过荣高棠找到蒋南翔，让贺鹏飞到清华附中补习。第二年贺鹏飞作为体育尖子（北京市中学生铅球比赛第一名），根据规定降 50 分被录取到机械系。在“血统论”的煽动下，在工作组的讨好下，在权力和荣誉的诱惑下，不少“红五类”子弟晕头转向了，丧失了理智。“血统论”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伤害深重而久远，可是首先受到伤害的却是鼓吹者自己。

三、关于“8.24”

“清华大学红卫兵”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它是在刘菊芬的“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它有一个抱团的群体，带着高傲和神秘。它有一个以高干子弟作为核心，吸收了多数中央候补委员以上、少将军衔以上、省部级干部以上的子女“揜爹”排座次，“红五类”子女为侍从、为拥趸的豪华阵营。这帮“听话的好孩子”，习惯了保姆的教导，王光美说，他们成立了“八八串联会，”你们就不能成立“八九串联会”？于是清华就有了“八九串联会。”“8.24”行动也是在王任重指点下搞起来的。他们大权在握、体面光鲜、思想贫乏、毫无创意，他们的大字报除了泄露上层斗争的动向，就是暴露上层斗争的隐私。“8.24”行动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壮举。

“8.24”行动是一次欲盖弥彰的闹剧。1966 年 8 月 19 日清晨，唐伟、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中午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王新民、袁塞风等高干子弟跟着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8 月 21 日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高干子弟带动下，矛头对准王光美，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校外赶到清华看大字报的人

也越来越多。“8.24”傍晚，贺鹏飞等人在王任重的提点下，召集了十二个院校的红卫兵拥进清华，撕毁了主要是他们自己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为了掩盖他们不光彩的政治行为，他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喊着“老子英雄儿子好汉”的口号，推倒二校门、抄家、抓人，把“黑帮干部”、右派教授关到科学馆、二教毒打。

以下摘自罗征启老师文章《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 1966 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2008 年 8 月 20 日修改稿）：

8月24日晚上，……几个人把张慕萍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萍的呻吟。过了一会一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张慕萍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我心理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 15 公分，不能超过 20 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象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象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面前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的姿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我被带回生物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 x x x 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象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工化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过了一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忘了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痞模样，一边站着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

罗征启讲了这样几件事：(一)、“8.24”是一起卑劣的政治事件，领头的干部子女要毁掉的是他们在巨浪突袭晕头转向时贴出的揭发自己父母的大字报。为了

掩盖其政治目的，他们打着“破四旧”、“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推倒二校门，四处抄家，毒打“右派”、“黑帮”，以转移群众视线。(二)、张慕萍、罗征启、钱伟长等人肉体被殴打，人格遭凌辱，而凶手是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罗老师文中点到的贺鹏飞、与我同系同年级的杨同学、水903的马楠等人乖戾凶残的整人手段和电影中的坏人毫无两样，谁能相信他们只是二十出头、大学低年级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有过任何忏悔和道歉。他们当年的恶行和至今无悔的厚颜，将自己的人格污点越搞越大，这种自作孽行径，已将自己变成了清华历史上永驻难改的地痞流氓。

时任北京新市委二把手的吴德，在他的回忆书中竟然指认蒯大富是清华“8.24”的肇事者。那些说违心话保官、有了权就栽赃的“老革命”们，我要对你们说一句：“我鄙视你们！”如孙怒涛所言：“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

四、关于蒯大富

谈论清华文革，蒯大富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蒯大富是江苏滨海一个贫农家的孩子，1963年考入清华工化系902班。在工作组的高压下，可以看出他的执着和坚韧。他在大礼堂前和以势压人的薄一波辩论，展示出了他的机敏和口才。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我曾在给周泉纓的信中说：这是一个20岁的青年学生的骄傲，也是清华大学的骄傲。蒯大富有政治追求，又受到校党委的重视，为什么到大三还没入党呢？保定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后来，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让我特别反感并心生警惕的是不断传来的“蒯氏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谎话越大相信的人越多，谎话的作用在于它被戳穿之前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后来陈育延对我说，“蒯氏权经”有二十多条。

孙怒涛的《拷问》中说：“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的蒯大富收罗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老孙如此分析和真实相差甚远，连蒯大富自己都不会相信。老蒯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很快转变为权欲野心，在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下很快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走过了一段疯狂的夺权道路。

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它的发起人是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选中井冈山这个名称的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小女生，十六、七岁

的刘刚，她后来成了蒯大富的恋人。“八九”红卫兵分崩离析，“红旗”、“延安”等红卫兵和“红教联”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但“井冈山”的成立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井冈山”的目标明确：批判工作组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八九”、为蒯大富彻底翻案。尽管如此，井冈山的人数在“三总部合并”前也只有数百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9月底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分裂的原因是在打倒刘、邓后，继续革命的方向方式方法上。“八八总部”认为“井冈山”批“八九”是矛头向下，不符合“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革命不分先后”的《十六条》精神，所谓为蒯大富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有泄私愤和树立个人权威的苗头。“临时总部”认为斗黑帮是大方向，重点批判蒋南翔和清华党委代表的资反路线；“八八总部”认为重点是批判王光美和刘、邓为首的资反路线。但周恩来特别告诫过：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所以主张向中央请示、听中央安排。井冈山主张彻底为蒯大富和“蒯派”翻案，其思想基础发展成为“大翻个儿”的口号和“理论”。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校内派系斗争厌倦，对运动发展茫然，纷纷外出“大串联”。

蒯大富篡夺清华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的领导权，既是文革乱象，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结果。

“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全国夺权斗争高潮叠起的1967年，打着“三司”旗号的一个红卫兵小分队，就能在一个省或市里掀起巨浪狂涛，蒯司令的一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省地级干部该保或是该反。明明是“二司”的“北航红旗”，因为韩爱晶和蒯大富的亲密关系也在全国各地设立“三司联络站”。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文章中错误地写到：“早在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为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中学则以‘西城纠察队’为主成立了第三司令部。”真实情况是这样的：“8.18”后不久，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联合组成了“一司”，政治观点不重要，父母级别和相互关系才是重要的。清华“八九红卫兵”参与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来被称为“一司”。一部分没有被邀请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不愿意了，联络了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准备成立“二司”。戴维堤、韩爱晶为头头的“北航红旗”，朱成昭、周永璋、王大宾为头头的“地院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在“二司”筹备人员的邀请之列。政治观点不重要，凡未参加“一司”的红卫兵组织均可参加“二司”。1966年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后，地院周永璋找我商量，两校牵头找清一色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第三个司令部。“北航红旗”是保工作组的，留在了“二司”，这也是后来“天派”、“地派”由来的原因之一。“三司”成立之初，只有14个院校，以“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地院

“东方红”人数多，又是发起单位，1966年9月5日“三司”成立，地院和我们派人出任了正副总指挥。国务院将几个红卫兵的司令部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其中一座大殿就是“三司”的司令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曾经给我们当了几天顾问。1966年10月6日发展壮大了的“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蒯大富由中央文革点名作为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那时“井冈山”还未加入“三司”，它加入“三司”是清华“三总部”合并以后的事了。

“井冈山”的历史使命明确而简单，就是充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三司”是各校红卫兵派驻人员组建而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靠边，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受惊恐而自杀后，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不断减少，尽管他精力旺盛、勤勉有加，但也会力不从心。国务院设在西安门大街22号的红卫兵接待站逐渐被中央文革渗透和掌控。蒯大富掌控“三司”应在清华“三总部合并”前夕，因为那时清华派驻“三司”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二把手陈育延。

1966年12月周恩来、陶铸、江青等中央首长多次讲话，要求各校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师生员工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头头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主动找到老蒯，表示放弃争一把手，都用“井冈山”的名称，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各推举9、7、5名总部筹备委员。就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12月19日）清晨，蒯大富派人突然强占了“八八总部”控制的明斋广播台，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备委员的名单。孙怒涛在《拷问》中写到：“在‘井冈山红卫兵’里，总部核心主要是那些与蒯大富有过共同患难经历、并且开始就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人物。其中有好几位都是蒯大富同班或同年级蒯派。这些人这次都被蒯大富推荐上去了。”“我被蒯大富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我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从老孙的回顾中，能看到是“三总部合并”吗？那是蒯大富私自任命干部，拉帮结伙。当时有几个造反的头头在乎程序正义、手段光明？对蒯大富的卑劣行径中央文革却没有任何干预，我甚至猜到，其中有戚本禹的共谋。清华文革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了。几天后我和朱德明、许胜利宣布退出了“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备组。

“蒯司令”获得了“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权力，他的造反精神更足了，更加狂妄了。毛老人家正在部署迎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自然乐于见到几个如同蒯大富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将专干“脏活”，以搅乱天下。全国学校已停课半年，“大串联”、“长征队”、千多万红卫兵参加“北京朝圣”……工农业生产已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毛统帅号召全国大夺权。权、权、权，命相连。且看蒯大富的突出表现：

1. 反刘少奇，手段卑污

“12.25”行动，是“三总部”合并后“井冈山兵团”第一次大行动。6000余名清华师生打着横幅游行，在“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中，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满了长安街。十月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但还是中央首长。1966年12月31日晚上，周恩来把“井冈山”的头头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虽然我已经退出了总部，蒯大富仍然通知我参加了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不支持“12.25”行动的作法：“你们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在北京街头，我如何向外国朋友解释？他还是国家主席嘛。”“你们要求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判，为此我专门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写书面检讨，背靠背的批判嘛。”回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蒯大富篡改周恩来的讲话：“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但同意把她揪回来批”。我上台去和老蒯争吵了起来。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有十多人，当时、以后、现在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证，我或老蒯究竟谁在说谎。

“智擒王光美”的“1.6”事件，当年《井冈山报》发行了数十万份，“捉鬼队”把他们的战绩宣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利用的践踏的是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对女儿的爱心。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受到侮辱，面对暴行她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反而得到师生内心的敬重。那天晚上天刚黑，王光美被绑架推拥在西大操场体育馆的观礼台上，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围观群众。我和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孙岳通过电话，冲上观礼台去传达总理的四点指示，看到王光美被人推搡着，鞋掉了一只，头发零乱，竟能让我见到人性到了绝望处的微光。许多年后在深圳，老蒯和我聊起那天晚上，放王光美回去之前，蒯大富去见王光美。老蒯问：“你认识我吗？”“不认识”。老蒯自得地说：“我就是你要批倒斗臭的蒯大富啊。”王光美赶紧站起来要和老蒯握手，被老蒯拒绝了，“我怎么能和这个臭婆娘握手呢？”我不无调侃地对老蒯说：“所以她后来通过陈希同把你赶出了北京。”这种充满小鸡肚肠的阴谋伎俩，称得上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吗？从这事件后，我明显地感到，蒯大富的心中已不再有阳光。

1967年4月10日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周恩来的退让，说明中央对刘少奇斗争的升级。后来老蒯对我们说，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不知是哪个小子的鬼主意，不过挺解气的。这个3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被挂上打了×的黑牌子、跪在主席台前的“黑帮分子”，包括彭真、刘仁、叶林、蒋南翔等各级干部有300人之多，他们都和清华文革有关？真的是必须置于死地的仇敌？杀人不过头点地，以革命的名义对政敌极尽羞辱践踏之事，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你老孙就坐在主席台上，我很想在《拷问》中看到你当时的感受和今天的认识，你让我失望了。

刘涛是刘少奇和王前的女儿，跟着工作组干过错事。刘少奇垮台了，蒯大富用工作组修理他的方法修理刘涛：你不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现在毛主席说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你若不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不站出来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就是反对毛主席。1966年12月江青还专程到清华找刘涛谈话。随着对刘少奇斗争的不断升级，刘涛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最龌龊的中国成语叫“大义灭亲”，它挑战人性，制造人格分裂。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我们工化系工作组的副组长张蔷薇是革命烈士张太雷的女儿，也是邱心伟同学姑姑的亲家。有一次我请邱心伟领我去见见张蔷薇，邱心伟说老太太身体很不好，只要有人提到文革、清华就全身痉挛。我不知道她受过何种刺激，至今心灵的拷问、煎熬还折磨着她。我们这些人都干过错事、蠢事、需要用一生为青春买单，去自我救赎。

在打倒刘少奇的大戏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插曲，就是陶德坚的“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的事情。陈里宁恶毒攻击刘少奇，因为有精神病被关在北京安定医院里。“红教联”和“井冈山”等四、五个群众组织把他抢出来，让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还将他的事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出，大量印发《新编“狂人”日记》。并于1967年1月6日晚组织百余人冲击公安部十三局档案室，抢夺陈里宁的档案。在群众和荷枪实弹的守卫对峙的紧张时刻，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令守卫让陶德坚听电话，最后让她带走了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翻案，就是为打倒刘少奇造势，为给刘少奇定案增添筹码。陶德坚只是土建系的普通教师，她怎么知道陈里宁并这么感兴趣的？她怎么找到安定医院和公安部十三局这个保密单位的？她如何下决心挑头去抢档案的？为什么也挑选了1月6日与“智擒王光美”的“捉鬼队”同时行动，让周恩来无法兼顾？陶德坚死也不说，在她的《风雨人生》中并没有临终忏悔。诡异的是陈里宁不仅狂批《修养》，也批判《毛选》。批准逮捕陈里宁的人正是老蒯的“铁哥们儿”公安部长谢富治。“窥渊鱼者不祥”，陶德坚惹火烧身自是难免。闹剧收场了，陶德坚当年就受到批判。最后还是老蒯的“团派”保护性的把陶德坚看管起来。

我的这些认知，也是来自于陶德坚临终前的自传《风雨人生》。带着诸多疑问，2011年的某一天，我邀上蒯大富拜访了罗征启。虽说陶德坚对分管过土建系工作的罗征启十分反感，但对罗夫人梁鸿文却有好评。在罗征启的办公室里，我们三人喝着上好的铁观音，聊了整个下午。陶德坚的自传、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丽聪明、务实自信、肯干能干、坚强而不落人后。陶德坚在香港长大，外祖父娶了七、八房姨太太也没有养出一个男丁。陶德坚的父亲出身贫寒，因长相英俊、学业有成而入赘陶的外祖父家。陶德坚是家中的大小姐。刚解放她就只身北上求学，被铁道学院录取，开始了她在北京的大学生活。在与该校曾经是地下党的第一位干部若有若无的恋爱关系中加入了共产党。院系调整后该校迁唐山，陶德坚进

清华土建系。每一个人都自带风水命数，每一步选择都在决定人生际遇。陶德坚急于成功的取巧心态大于追求进步的理想；她成了政治运动中的弄潮儿，却迷失了本来应有的政治信仰；她受到母亲、丈夫、女儿的深爱，而她却似乎只爱自己；对共产党、“井冈山”、“红教联”这些和她相关的组织并无认知和认同。陶德坚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象痞子，却在清华文革中成功地出演了一个痞子的角色。陶“大小姐”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和老孙有太多太大的不同。奇怪的是孙怒涛在《拷问》中，说他的“怒涛战斗组”和“红教联”是“一路货色”，陶德坚和孙怒涛一样都是组织上眼中的“差质生”，而其实陶德坚“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以“大小姐”的傲气，定然不会对老孙的巴结认同承情。

2. 为了权力，排除异己、制造分裂

“井冈山兵团”成立，没有经过任何程序，总部筹备委员就成了总部委员。蒯大富志得意满，任人唯亲，唯我独尊，怀疑一切，自我膨胀。他编出了自我吹嘘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印了50万册。江青为此批评老蒯：你蒯大富也太狂妄了，我还没出选集，你倒先出了。由于江青的干预，《蒯选》发行量不大，存世就更少了。1967年1月唐伟、沈如槐和宿长忠、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章等人先后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内的“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天安门纵队”、“东方红战团”和“中央警卫团”，“五纵队”要求总部整风。1967年1月4日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尤其是朱德明在整风大会上发言：“要用100度的开水给蒯大富洗澡。”大规模的“反唐战”开始了。刘泉说：“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蒯大富说唐伟是“托派”，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八八”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陈家国在大会上拿出半年前记的日记，历数一些“蒯派”人物在工作组压力下的投降、软弱，包括刘泉反蒯的大字报。“反唐”暴露了造反派头头们自伤自残的真实嘴脸。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涉，老蒯也发现“大方向错了”。“反唐”戛然而止。

蒯大富“反唐”的本意是搞臭唐伟，搞臭“八八”，争取更多的师生臣服于“蒯派”的杰出代表蒯大富；给那些敢于和蒯大富作对的人一个教训。事与愿违，“反唐”的结果是老蒯制造了更多的反对派，这也表明了“井冈山”内部深刻的裂痕，清华团、四两派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孙怒涛旁观者清，在《拷问》中写到：“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这段话极有见地。1966年10月以后，周恩来多次提醒我们：“当

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受压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你们会犯错误，现在你们开始掌权了，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那时就曾发奇想，很想问一问周恩来：“周伯伯，是不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掌权后就开始犯错误了？”只是胆量不够大，也没有合适的机会，腹诽而已。工作组的副组长、冶金部副部长、辽沈战役的大英雄周赤萍，在清华主席台上的表现太让师生反感了，活现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势者将学校踩在脚下的丑态。

群众组织内部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是对文化革命进一步展开的诸多疑惑。刘、邓、陶垮台了，下一个该打倒谁？康生？陈伯达？周恩来？中央文革？“穿军装的刘邓路线？”都在被怀疑、被炮打的名单之中。造反派的“坏头头们”像进了赌场日渐红眼的赌徒，唯恐右倾而不能立新功。蒯大富没有闲着，他也要先安内、后攘外。有了派系一统，就有了号令清华的实权；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和点拨，就有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反唐”不对，但为了“实权”和“虚权”，都是必须的。那个干了错事、坏事须自责、道歉、悔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内疚只是中了黑《修养》的毒才会有的表现。

3. 抓“联动”等，参与对中学生的迫害

毛泽东未必懂得“蝴蝶效应”，但宋玉的《风赋》却烂熟于胸：“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红卫兵一出现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的一封信把这帮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狂热青年学生捧到了天上，通过八次大接见、大阅兵，红卫兵成为了运动，成为了全国造反学生的代名词。通过不须花钱的“大串连”、“走新长征路”，这股洪流浩荡喧腾，“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助他实现了“天下大乱”的丰功伟业。红卫兵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继续革命”的“血统论”，也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所谓“右派”，就是“黑五类”、“黑八类”、后来还加上“臭老九”。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八旗子弟”血统高贵的蛮横，“义和团”暴民的愚昧，还有着“党卫军”冲锋队员的不可一世的残忍。暴行在“红八月”里达到巅峰。

周恩来为了保护知名人士，支持成立了“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东城区的高干子女少一些，随后也成立了“东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在《实话实说西花厅》中回忆说，“周总理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事实上纠察队按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把极少数知名人士保护起来，在街道居委会和街道派出所的安排和挑唆下抄家、打人不误，恐怖和血腥依旧。

“西纠”、“东纠”的崛起，刺痛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老”红卫兵的自尊自大：他们算老几？居然骑在我们头上纠察我们？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101中学等海淀区的红卫兵骨干发起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独领风骚，“西纠”、“东纠”中的父母级别不高的“红五类”子女立马贬成了“土联动”。“联动”矛头是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尤其看不起“戏子”江青和“十七级大干部”戚本禹。“联动”没能猖狂多久，“红司令老毛”轻轻一挥手，“联动”就惨遭围剿。

清华“井冈山捉鬼队”充当了打人抓人抄家的重要打手，北京体育学院成了临时看守所，那帮四肢发达的体育尖子成了最趁手的帮凶，谢富治把持的公安系统给予了全力配合。那些父母已经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弟，在阴谋阳谋的搏杀中终于输光了全部政治资本，在“上山下乡”之后，就一蹶不振地——废了。

一位女一中初三班的学生在当年给我的信中写到：

清明节，我被体院的王八蛋莫名其妙地关进了局子里。1967年4月22日晚上，我们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人员接见后“大赦”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理曾说：“你们这些人中也许有的人父母被斗了，被打倒了，他们不跟主席走了，你们还跟吗？党和国家会抚养你们的。”顿时掌声雷鸣，被接见的我们全哭了。我回到家以后父母都没说我，只是爸爸在第二天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一个条，叫我好好闭门思过。

我的一位“捉鬼队”的同学，一次闲聊偶尔谈到当年抓“联动”的事情，脸上不无自得。后来我看要宝忠的《蒯大富传》，讲到叶志江带人去抄邓拓的家、抄调查部长孔原（“西纠”头头孔丹是许明、孔原的儿子）的家。再翻看了叶志江相赠的大作《走出文革》，书中对此事并非只字未提，只因自己粗心眼拙而失察。后经叶公友情提示，果然在第126页中找到了数百字的叙述，叶志江也承认“这毕竟是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我再次向叶公道歉，并修正看法：如何教我能不相信他走出了文革？“没有一滴雨水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释放“联动”分子那天，江青特意抢到周恩来之前放人示好，她也害怕得罪太多的军中大佬。周恩来雷霆雨露皆恩来，三言两语就收伏了这帮天真可爱的“小魔头”。只是至死难悟的蒯大富及“捉鬼队”，从头到尾被毛江夫妇当枪使，惹上了杀父夺妻断子绝孙的家族血仇，无缘无故得罪了无数的“红色豪门权贵”，通俗话叫犯了江湖大忌。老蒯到底是农民的儿子，至今还傻傻地检讨自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去年校庆后，清华附中的几个朋友请我吃饭，我把老蒯也邀请上了，由于事先没给主人打招呼，见面后两位男主人还给面子，两位女主人当下就脸色不好看了。老蒯讪讪吃罢，中途离席。女一中那位朋友曾告诉我，当年北京西四“九三学社”所在地是“西纠”总部，院子里养了两条狗，一条叫“戚本禹”，一条叫“蒯

大富”。“西纠”的“国防绿”们抄家打人回来，不是踢“戚本禹”几脚，就是揍“蒯大富”几下。“蒯司令”从此恶名远播，血仇难消。老蒯若没蹲满 17 年大牢，定难过上如今安稳的生活。

4. 反军乱军，还是为了权力

1966 年 12 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总部会上，蒯大富安排人连夜把保险柜运往天津用氧气割开，还说周总理下令归还保险柜的指示出了北京就不好用了。这件事似乎后来无人追究，我曾当蒯大富的面指控过他，他却没事的人一样。那么多人参加总部会，参加抄家抢劫的人也不会少，几十年来也没听说有人揭露这件事。1967 年 1 月 11 日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还担任了组长。蒯大富当时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敢这么干？抄来的东西给了谁？蒯大富曾将刘志坚抓到清华，关押在 1 号楼 506 房间。鲍长康曾持关锋指令窜到北海舰队。

蒯大富反军乱军的手段，不同于各地极左组织和“三支两军”部队的冲突，蒯大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锋芒直指军中德高望重的老帅、老将。根据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 通知》的精神，“穿军装的刘邓陶”就是第二个被打倒的目标。1967 年 7 月蒯大富在他召集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上发言：“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

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受中央文革差遣，去四川揪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元帅，地院的红卫兵捷足先登，抢在北航之前将彭元帅弄回了地院。地院的头头朱成昭是一个人格健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彭德怀在地院没有受到折磨，让江青心中不爽。江青指使韩爱晶挑起了一场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武斗，韩爱晶趁乱把彭元帅抢到了北航。韩爱晶下令不许任何人与关押在地下室的彭元帅谈话，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还亲自动手拗彭元帅的耳光。韩爱晶的好友告诉我：韩爱晶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对彭元帅充满敬意。就这么一个不缺少见解却毫无人性、人格的“红卫兵领袖”，不仅受到毛泽东称赞，说韩爱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也得到了当年仅一面之缘的“414”二把手孙怒涛的信任和吹嘘。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都为你老孙推崇韩爱晶的美言和相信韩爱晶的谎话而感到脸红。

清华百年校庆前后，蒯大富给我看一条韩爱晶发给他的短信：“毛泽东有错误，也整过我们，但是我们对他永远也恨不起来。有时想到主席，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我问老蒯，你相信老韩还为谁能流出真诚的眼泪吗？老蒯一笑置之。

“揪军内一小撮”止于武汉“7.20”事件。在这个擦枪走火就能引发“辛亥革命”、终结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城市，中央文革那几个“小爬虫”终于激起

了工人、军人的巨大反弹，荷枪实弹的军人步伐逼近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匆匆离开武汉飞往上海。他自己点燃的野火，猛然窜到他的身边，几乎灼伤他的皮肤，他就一定能控制住所有的老军头？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恩来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耍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

毛泽东从“5.16通知”的部署掉头而去，蒯大富被“放了鸽子”。“井冈山”对外作战部又该向谁开战？军事动态组收集的材料如何处理？设在全国各地的反军联络站如何收场？蒯大富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也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1967年8月16日周恩来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年出去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了倒忙。”几天后，王力、关锋倒台了。这是老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之前，老蒯干什么对什么，尽管行事下作、手法卑鄙，大方向总是正确的。这之后，老蒯什么都不对了，他成了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添乱的“小混混”。

5、挑起武斗，下令开枪使武斗升级，双手沾满鲜血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沉浸在主楼广场30万人批斗王光美带来的风光无限的喜悦中，以“纵队派”为主的反蒯力量自发地汇集成了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派别。1967年4月14日，一个以干部问题为论战焦点、以反对蒯大富独霸清华权力为目标的“4.14总部”成立了。蒯大富通过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控制的明斋广播台，撕毁三总部联合协议，组成了一个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拒绝监督的强权机关，逼走了唐伟、朱德明、许胜利；掌握权力的蒯大富唯我独尊、野心膨胀、任人唯亲、排除异已，逼出了“纵队派”，逼出了“414”。工作组“反蒯”，是强权压制民主；“414”反蒯，是反对蒯大富的专制。“井冈山”总部委员孙怒涛、王良生等相继参加“414”，蒯大富用他的强权培植起了一个秉承公道正义的强大对手。对于广大的师生员工来讲，求得安全、避免恐惧，远胜于对权利的追逐。

周恩来是何等聪慧精细的人物，他长于未雨绸缪、枉尺直寻，总能棋高一着化解危局。他痛斥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的卑劣伎俩。对于蒯大富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的权迷，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召开仅仅几个小时前的凌晨寅时，他通过谢富治宣称不能参加大会，还建议大会延期。“团派”暴跳如雷，老蒯重重地“闪了腰”。尽管周恩来曲意逢迎毛泽东、谀事江青，领衔“刘少奇专案组”组长，遭人诟病，却能时时处处表现出是无奈的违心所为。总之，老蒯对于这位最早为他平反的恩人尽管恨得牙痒，却从来不敢公开挑衅。去年4月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问世，封面上的照片竟不是“爷爷一样”的毛泽东，或最疼爱他们的江青阿姨，而是老蒯就教于周恩来的照片，我以为这两个脑瓜灵光的家伙是慑于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1967年5月30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毛泽东说的“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成了老蒯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饼，也成了蒯大富终生抱憾的清华情结。

“414”成立不到一年，人数发展到7000，足以抗衡老蒯的“团派。”进入新年，66届的同学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两派抢地盘、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愈演愈烈。1968年3月27日北京大学发生武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打跑了对立面“北大井冈山”，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表态支持聂元梓。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决定通过武斗打垮、打跑“414”，实现独霸清华的野心。所以我指出老蒯是清华武斗的挑起者、责任人，老蒯对此指证供认不讳，多次在同学面前说：“如果我当初不同意打，（清华武斗）肯定打不起来。”

清华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1968年7月27日结束，又称之为“百日武斗。”两派的冲突从4月23日的“旧电机馆战斗”到4月26日的“8号楼战斗”、“2号楼战斗，”4月29日“414”“百人抢粮”，5月2日“土木馆战斗”，发展到近千人参加的“5.30大武斗”。血淋淋地演了一出毛统帅倡导的“文攻武卫”的大戏，遵从他的教诲将派别之争演变成了“国共两党的斗争。”“5.30大武斗”之后，冷兵器过时了。老蒯下令开枪，而且是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和良心的谴责。老蒯还下令格杀凡是走近科学馆的人。想到那些在武斗中无辜死去的鲜活生命，我们是否应当象鲁迅一样“出离的愤怒，”写出一篇又一篇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414”没想到自己这一派竟然能支持这么久，架在主楼顶上的“九头鸟”高音喇叭，把播音员冯克庄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到了数公里之外，可是科学馆成了“团派”包围下的孤岛。两派的头头和小兵都生出了一种无力感，武斗的残酷和血腥超出了双方的想象。有一次孙耘对我讲：当年若知道老四救出科学馆的人就打算撤出清华，真应该制止吴慰庭炸毁老四通往科学馆的地道，让老四跑了算了。陈育延是反对武斗的“鸽派”，打算脱离战场回家，5月19日施施然路经老四防区，万料不到会被俘进了科学馆。蒯大富心中忐忑、不无悔意，却受到“鹰派”的巨大压力。5月30日“团派”火烧东区浴室时，陈继芳还曾从九饭厅提来两麻袋辣椒干倒在火里，后来见团派战友用手榴弹在水木清华炸鱼吃，心中受到刺激，回沈阳家中养病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团、四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老邓的“宜粗不宜细”，陈云的“两派都不用”，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

去年，正在编写《清华蒯大富》的韩爱晶，造出了一个他和地院王大宾在1968年5月30日后，受北京市革委会委托，到清华找沈如槐协调两派大联合，被沈如槐拒绝的故事。言下之意是“414”铁心武斗，沈如槐拒绝调解。韩爱晶为什么就不去想一想毛泽东那只翻云覆雨的黑手？江青肆无忌惮的挑唆？孙怒涛为

此与韩爱晶核实，与陈育延探讨，网上、电话过招二、三十个回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如陈楚三分析，是老韩把1967年9月前两派联合的事情扯到1968年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老韩说谎。能够证实或证伪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沈如槐、韩爱晶、王大宾。老韩说有，但说不准时间、地点、举不出任何佐证；沈如槐断然否认；王大宾在四川都江堰，老蒯去年还去见过他，王大宾至今保持沉默。我相信沈如槐的说法。清华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普通同学钱萍华都会死于狙击手的枪下，仅仅为了安全，坐阵主楼的头头沈如槐那时根本没有单独会见韩爱晶、王大宾而不为人知的可能。本以为在《拷问》中可以看到老孙的判断，老孙，你让我失望了。为此，我将去年给你的邮件附于后，以指出韩爱晶在说谎。

孙怒涛学长：

《育延有言》这篇文章上网同时，陈育延也发给了我。你同样执着和较真的态度令人钦佩。看到你的来信，我愿意谈谈自己的认识。

你为“百日武斗”中王大宾、韩爱晶到清华调停一事追寻真象，蒯大富、蒋南峰、陈楚三在泸沟桥小聚会上都有猜测和分析。聚会结束第二天，沈如槐在郭林酒家请吃饭，那天老沈阴沉着脸面对你的询问再次否认了这件事。然后是你、陈育延、韩爱晶、陈楚三的邮件往来。事件的中心人物三位：王大宾、韩爱晶、沈如槐。还缺少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局外人争论下去，大家仍然一头雾水。任何断语和结论都有待证实。

为了还原事情真象，我们作以下分析猜想：在皇权专制条件下，战争是政权唯一的催生婆。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不止一次要挟恫吓说，要“重上井冈山”，要去“找解放军”。清华武斗初起，毛江夫妇只是静观其变，“百日武斗”中也未有他们的表态，其他中央首长也视若不见。蒯大富泄愤打倒刘少奇、羞辱王光美，既受到了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也迎合了毛江夫妇的阴暗心理。把清华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蒋南翔的老套路，也是蒯大富的新目标。只是一个跟着北方局，一个贴上了中央文革江阿姨。毛泽东的心愿是集神力、皇权、教主于一身，而老蒯是最好的信徒、打手、痞子。于是蒯大富未经任何程序便当上了首都“三司”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毛泽东还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1968年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仍然难以掩饰对清华“414”的厌恶和对老蒯的昵爱。1970年，蒯大富已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仍被指定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可见老蒯深沐皇恩、宠幸难衰。

清华两派之争，要害是清华大权落于谁人之手。蒯大富错在于是清华土生土长的学生，同学老师知根知底，运动中他的充分表现，失去了多数师生的支持。“414”是一个“反蒯”的大联盟，反对“痞子上台掌权”才是“414”的宗旨。武斗刚开始，蒯大富的恋人——清华附中刘刚就离他而去，到了陕北：“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政治生命完了！”

武斗进入僵局，蒯大富的投机心态促成了他行为上的首鼠两端，团派内部分化成鹰、鸽两派，如同“414”的“东方红”、“三七”两战团。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公安部，既要维护北京和全国的大局，又要偏袒蒯大富，派出一个有蒯大富参与的调解

小组，促成一个以蒯大富为主的清华大学权力机构也是必然的选择。当时毛江夫妇并未表态，也许正在等待“414”落荒而逃，蒯大富的团派“打江山、坐江山”的结果，所以这些调解因缺乏威权而变得无足轻重。韩爱晶等人到清华调解不论是一次或是两次，都是真实可信的。沈如槐断然否认在清华武斗正酣时见过调解代表韩爱晶、王大宾也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沈如槐是否说过“拖也要拖死蒯大富”的狠话也不重要了。对蒯大富“这个双手沾满同学鲜血的刽子手”，“拖死老蒯”也算不上什么狠话。因为调解不是毛江夫妇的意思，双方师生的血债，让义愤如焚代替了理智思考。蝇头小利上作“蜗角之争”怎比得上英明领袖在祖国山河大地这张“白纸”上横涂竖抹的“伟大战略部署”呢？这“两小撮”“疯子”、“傻子”在打着工人旗号的“皇军”的扫荡下终于同归于尽了。难道四十三年后，我们还要再疯一次、再傻一回？忽然想起辛词中有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可谓一叹！

陈育延信的重点在讲述团派中的“鹰鸽之争”，在述说老蒯一度的大权旁落和内心的彷徨挣扎，在陈述一些多数老团、甚至团派总部委员也不知情的重大事件。坦陈史料是需要明智和勇气的，有如李自茂。时至今日蒯大富已被判刑服刑释放出狱，已用不着为他推诿罪责，他的认识局限出于封建愚忠，至死难改。所有的文革肇事者也已度过了法定的20年追诉期。那些在劫难逃的倒霉蛋，也许有幸成为在建的“封神榜”上人。那些依仗父母权势投机革命、寻求“终南捷径”谋取飞黄腾达，进而祸国殃民的人才是真正的蠹虫，愿他们继续追随贺鹏飞进入地狱，因从不知忏悔而成为万劫不覆的孤魂野鬼。而那个最大的肇事者，那个“始作俑者”却从未被揭发，从未被清算，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面对还活在世上的十数亿中国人？

清华从来不是两派之争，第三派只是销声匿迹，从来没有散伙。三派中都藏有种种大奸大恶之人，即便回顾历史也不能被派性迷住了眼睛。

你我都没有参加武斗，都没有在场证实证伪的资格。就你而言，建议这场笔墨官司就此而止。

中国传统文人尚重“全始终之德”，你作为“沈孙汲之流”的二把手，居然武斗不在场，让我至今疑惑。我也曾听到过你因没参加武斗而生出的感叹，这种知识分子的软弱，出自贫寒的家世？出自旧文化的浸淫？出自内心恐惧？十年文革的阴霾，难掩我们心头的阳光。我们已不再青春，不再天真，也不再纯粹，但心中还有一丝阳光，也许就是希望。

唐伟 2011.8.27 于深圳

1968年7月27日，数万工人和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414”如同见到救星，赶紧欢迎；“团派”如同见到外星人入侵地球，用子弹、手榴弹还击，造成5死731伤的惨剧。蒯大富仓惶出逃，和陈育延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给党中央、谢富治拍求救电报，差点误了夜半后的“伟大领袖接见五大领袖”。老蒯也不想想，这和上一年抓联动的手段与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

情景有什么两样？那时的打手是谁？背后的黑手是谁？《拷问》中独具慧眼的孙怒涛看见了，“这次召见，414 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 731 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

毛泽东的历史观来自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用不着自我批评的。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7.27”以后，毛泽东给“工宣队”送芒果，又是发指示，又是搞接见，尽管天象森严、天心难测，却也春风雨露、泽被万方。各行各业，各路精英，既受贿赂、利用，又被收拾、打压，无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老干部死去活来，终于明白了为官之道；中学的“小屁孩”被他捧得狂妄了，“上山下乡”也活该；大学的知识分子不可一世了，让他们尝尝当“臭老九”的滋味；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就是不知道“下岗”以后生活怎么办；贫下中农“上、管、改”，“三农”问题堆成山……。林肯说：“一个人可以永远地蒙蔽少数人，也可以一时蒙蔽所有的人，但绝不可能永远地蒙蔽所有的人。”

“英雄真戏子，戏子假英雄。”7月 28 日的召见，是红卫兵领袖吃的最后一顿“板凳饭”，明摆着的卸磨杀驴、猫哭耗子，孙怒涛却看成了护犊心切、恨铁不成钢。糊涂地认为，“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象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7.27”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拷问》中的这些分析，逻辑混乱、因果倒置，聪明睿智如老孙这样的清华“优质生”，认识上如此错位，囿于一己的得失之心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真正揭露毛泽东，谁也讲不清文化大革命。

五、关于两派的理论

所谓理论，不是假设，就是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历时十年，耗尽巨大国力和牺牲的实践证明，这个反人性、反人类的假设错了。文革发动至今四十多年来，我们天天企盼政治改革带来的思想理论建树，以完成“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哲人先贤所憧憬的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1949 年建国，都没有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开启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宣布文化革命结束后，执政党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平庸怠惰、得过且过，

谁不讨厌这种“开左灯、向右转”的虚伪生活？段子里总结说：“中国是一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一阵，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一阵；习以为常就行了。”反省文革、“整理国故”，是中国知识分子踏踏实实建设新中国的责任。

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封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就是领袖了。周泉纓写了《414思潮必胜》，毛泽东调侃他是“414的理论家”。于是有人讲：“老团有领袖没理论，414有理论没领袖”。周泉纓此生添了心结，一度在名片上都印上清华大学学生、理论家的头衔，中了魔一样笔耕不已、潜心写作，十二年间，出了七、八本著作。两年前，韩爱晶在收集资料时，轻轻一挑唆，《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出了疑问。罗征启含糊其词，然后沉默不语。万润南尖酸刻薄，说周泉纓“一个字都没写”，还被老毛一口痰堵塞心窍。周泉纓被点中死穴，对老师大暴粗口，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本焕大师摩顶赐名的佛门弟子。李兆汉若未病逝，会站出来说什么呢？

《414思潮必胜》是周泉纓起草、定稿，罗征启、万润南、印甫盛、李兆汉等人修改而成的。1967年8月3日，周泉纓以“414东方红战团一战士”署名贴出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由于很少有人关注，周泉纓又化名写了一句口号：看！《必胜》这张反动文章的矛头对准了谁？贴出去后，仍然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看。到了9月17日周泉纓、杨忌非贴出了一篇内容是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地派”头头的会上点名批评周泉纓说，有人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周泉纓是个小丑”。随后两个月中，周泉纓受到批斗和关押。周泉纓后来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不反陈伯达，怎么能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造反派头头？”至于毛泽东说，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写了一篇《414思潮必胜》，说造反派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打江山的人为什么不能坐江山呢？周泉纓因毛泽东、江青点名批评而暴得大名，《必胜》这才终于引起了两派批判者的重视。

《必胜》从来不是“414”的共同认识，更不是“414”的纲领和理论，毛泽东说打江山、坐江山的那段话，据说也是张春桥看出来的文章深意。《必胜》还是一封情书，1967年周泉纓去河南郑州调研时，认识了“河造总”的一位漂亮女孩子，在那个泛政治的狂热年代，许多人忽略了这张大字报的副标题。今天的人会奇怪：原来情书也可以这样来写。

在毛泽东淫威日盛的文化革命中，一派群众组织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自外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汲鹏说：两派坚持的理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414在继续革命中更加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老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加强调继续革命。清华文革证明了这个理论的荒谬。高等学校的派斗发展到武斗，说明“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走到了尽头。口水战、笔墨官司只会更加搞乱思想，根本不解决派性斗争中的任何问题。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必胜》成了清华文

革舆论争斗中的收官之笔，反映了两派师生为人驱使、为人作嫁、为人替罪的无奈心情：革命已成强弩之末，专政必须加强。不被毛泽东看好的“4·14”，依附上了统治思想的制高点，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宦海沉浮中却占尽优势。看看两派骨干精英从那时到今天的生命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鸿庆说：清华文化革命是一场大戏，首尾最重要，中间只是过程而已。“清队”、“清理三种人”、“揪 516 分子”的同时“血统论”不断抬头，今天已发展进入到了“拚爹”时代：“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两派都不用，两派都成弃子。因为重用自己的子女，至少不会被挖了祖坟。清华文革谁是胜者？谁笑到了最后？“八九”！

“红色贵族”万岁！

第二部分 清华教育

清华文革大戏收场，劫后余生的清华并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资中筠先生说，它已经不是我上学时的清华了，现在的清华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1985 年清华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1993 年初的暑期干部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都赞成把学校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建校 100 周年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1998 年 5 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行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且确定北大、清华为国家第一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大学。这个目标既是学校的愿望，更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去年 4 月是风光无限的清华百年校庆，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却再也无颜提起。

“学校愿望、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成了让人怎么也笑不起来的笑柄。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曾是我在兰州大学时的学生，他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是“向金钱献媚，向权力下跪。”是啊，不知哪个下流无耻的马屁精把涛哥的照片放得最大、放在二校门图案中最显眼的正中央，把母校众多的先贤、恩师的照片作为陪衬、台柱。尴尬呀！你让涛哥情何以堪！你让母校情何以堪！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最近，出了一个说脱口秀的北美崔哥，他说北大建校以来出了 600 个名人，而清华只出了一个蒯大富。这不竟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三个分别来自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吹牛。人大的说：“我们学校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党领导的老师都在我们学校。”清华的讲：“我们培养出了最多的省部级高官”。北大的最谦逊：“我们学校只出了一个图书管理员，但他领导了中国 28 年。”北

美崔哥说得不对，清华名人中至少还有一个涛哥。他和老蒯都来自江苏农村，都是蒋南翔时期清华学生中的“红人”，太多相似的学生生活和共同的清华文革经历，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在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下，本应出现难分轩轾的毕业生。奇迹出现了：一样的种籽，种在一样的土地上，同时生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一个是造反有理、“痞子”掌权；一个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让我们不能不膺服教育的神奇功能，去找寻其中的道理，去重温如同魔咒般的校训。

一、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个标题是我抄黄延复的，一个字都没改动。黄老先生毕业后就在校史办公室工作，我读他编写的书籍资料如聆面训，清华往事好象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把枯燥的工作干成了兴趣盎然的专业，直到退休。他在故纸堆中找寻人生、心系母校且不忘育作他人，任何一个清华学生心中都会有一丝感动。

1914年冬，梁启超正在清华“赁屋著书”，学校就趁机请他给学生作一次“伦理演说”。梁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自定演讲题目为《君子》。他分别引《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描述君子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和品格。他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1917年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图制徽，定为校训。1949年以后，镶嵌于大礼堂额顶的“清华学校校徽”图案被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覆盖。老校训从此被人淡忘。上世纪末，覆盖校训的红五星被揭掉，大礼堂上的老校训方才重现。1999年，1958级校友集资将一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字碑镶嵌在老图书馆大厅北壁上。2000年，学校新建东南大门，又把这八字校训铭刻在大门口的巨石卧碑上，以志永远。

二、蒋南翔的“校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蒋南翔时期清华没有校训，只有“南翔精神”。“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八个字可以概括“南翔精神”。但它不如“听话出活双肩挑”，“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明白生动，深入人心。“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才是当之无愧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已被覆盖，清华园内再也无人提起。

蒋南翔是1932级清华校友。这位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前不

久，清华大学遭到了建校以来最蛮横的肢解，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航空系、采矿系……均被切离清华，一个综合性大学变为剩下8个系、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对于这个对教育事业破坏极大的“院系调整”，现在极少被人提及，更不用说反思教训。父母死了，子孙不忘拜祭。母校惨遭肢解，却从不再提起，只想从心里忘记！“欲灭其国，必亡其史”。我们就是这样的无耻、无颜的人子、学子！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学生最多的系是政治系。现在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就活跃在清华学校最后的两三年中。清华理学院的创办人叶企孙和他开创的充满理性光辉的整个时代，离开了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这个对中国科学贡献巨伟的大师，生前无人看望，死得无声无息。仅仅是因为他无儿无女？仅仅是因为文化革命？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真实的历史，而少数知道的人慑于恐惧而接受“党性”的约束。文理大学可以不设工科，文理学生不须精通工艺、了解生产流程，实验数据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工、农、医等应用学科的学生，须臾不能缺少数理逻辑、理性思维、历史启迪、人文关怀。学校被肢解后的清华学子要获取诺贝尔奖的梦幻追求，如同残奥会选手妄想获得奥运会冠军。在“院系调整”中，清华这个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办的中国大学还不是最惨的，那个对中国情真意切的司徒雷登，用心血和意志浇灌出来的燕京大学被锉骨扬灰，美丽的燕园成了她美丽的衣冠冢。从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中国大陆绝迹。清华的断臂残肢，在政府权力魔杖的点化下，奇迹般地长成了矿业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斯大林不仅送来了建造大学的图纸，还派来了权威的专家、教授。晚清、北洋、民国时期办学，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富国强兵、为国家培养可用人才是第一位的。“一边倒”向苏联，既受迫于国际冷战大局，也是政治需要，谁人说长道短，必是反苏亲美。蒋南翔有不同意见，那时还人微言轻，并没有置喙的地位；他多年以来耿耿于怀，始终不认同“院系调整”，但从来没有站出来秉公直言，别人劝阻并不是理由，党性原则才是原因。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蒋南翔正率领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他反对校园内搞群众运动肃反，校内主持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决定的。党性再一次压倒了理性，蒋南翔不再坚持正确意见。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灾难中，蒋南翔惨遭抛弃，他的学生、辅导员、干将听党中央的话，纷纷与他割袍断义、划清界线。蒋南翔倒台后，清华的“保蒋派”中除了刘冰等极少数人，什么时候有人站出来为蒋南翔说过公道话？文革的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拿批斗蒋南翔来标榜自己革命？蒋校长不是一个坏人，每个学生都受过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对自己几乎贡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痛心，而清华文革也让他丧失了自己推行的那一套教育理念的自信。1981年，为了争取区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全国高校学潮汹涌，我当时任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协助刘冰校长处理学潮。刘冰几乎每晚都要和蒋南翔部长通电话汇报学潮情况，蒋部长每次都要问一句：你那个团委书记表现怎样？我

已经持有了蒋校长给清华毕业生授予的“猎枪”，也从蒋校长的关切中感受到了他对清华文革的反思和担忧：他或许想起了1966年8月的那个夜晚，“马楠将军”当他的面将他继母吊在梁上毒打的惨状，亲眼目睹自己播下的“龙种”，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魔鬼、惟命是从的小爬虫和满世界乱窜的“跳蚤”，悔不当初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高校的团委书记如果变成了耗子屎，足可以坏掉学生思想工作这一锅汤。蒋校长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不无忧虑，这绝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和教育的成功。

梅贻琦还有一句更精采的名言：“没有坏学生，只有教坏的学生。”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何等慈悲、何等浩荡的胸襟胸怀！蒯大富、涛哥、也包括孙怒涛和我，以及我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同学，都不是坏学生。2005年，在我们入学40周年的校友聚会上，张孝文校长对1964级、1965级的学生讲：“你们虽然没有在清华造就成才，如同面粉没有被蒸成馒头，但你们进校前就已经是好面粉了”。找寻清华文革罪孽的原因，不能不认真反省清华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训，而是情真意切的校训。

有同学将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发到了清华校友网上，一位同学指责我对“联动”分子的温情。我不是因为“联动”分子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手上染血，心上支楞着罪恶的十字架，我只是不愿让貌似义愤的怒火烧红自己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是什么人、什么事教坏了他们。暂时离开一下蒋南翔，听我讲讲我对清华高干子弟的认识，听一听“狗熊”吴慰庭的故事。

吴慰庭的经历能回答不少问题。孙华栋是武斗中第一个当了俘虏后被活活打死的同学，凶手有多名“清华技工学校的莽撞小青年”，领头的人绰号“狗熊”，原自控系67级学生、团派“前哨”广播站负责人、保卫组的吴慰庭。1968年5月14日“晚上，‘414’无线电系64级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同学绑架至一教楼内，遭‘狗熊’及在一教的中技校的一些人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水后死亡”（摘自《清华文革亲历》）。1968年在清华的批斗会场上，“狗熊”被押送部队农场“劳改”，后被公安机关判刑13年，刑满那年赶上“严打”，他又多坐了两年牢。1985年48岁的“狗熊”和因为“出身不好”又要照顾多病母亲的大龄女李大姐结为夫妻，未育子女。

2007年初冬，来访清华的外宾可以看到一个七旬老者孤独地在寒风中擦洗工字厅的玻璃窗，那老者就是四十年前打死孙华栋的“狗熊”。现住天津的“狗熊”年迈患病，没有社保、医保，也就没有退休养老金。李大姐的退休金刚过千元，两人平均刚超过了天津市的低保线，“狗熊”又不能享受低保。街道上只好每月给个50或100元的补助。自七同学为他们捐了一万元钱，这两口子就是不用，总想退回去。“狗熊”的社保难于解决，除了职能部门的推诿、不作为外，还缺

少社会、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同情。自从五年前我认识了“狗熊”，我认为他是一个犯过罪的好人，李大姐更是一个侠骨柔肠的好女人。

“狗熊”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是接管北平市领头的三个军代表之一。“狗熊”的生母是天津一位医生的女儿，救过他受伤的父亲。如故事一样爱上英雄、结婚生子。如故事一样男人奔赴革命，奔赴延安。如故事那样“狗熊”和生母从天津到南京、西安一路的艰辛寻父。“狗熊”当过大烟馆的小杂役，架电线的小工，母亲为人洗浆缝补，1953年16岁的“狗熊”才得知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狗熊”生母最终也没能见到孩子的生父一面，在“组织”干预下离了婚。生母唯一的要求是要生父将“狗熊”带到北京接受良好的教育。经过育才小学短期培训，“狗熊”和陈楚三、毛远新同一年上了101中学。父亲在延安娶的“革命妈妈”厚待“狗熊”，“狗熊”每月有30元生活费，有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后来“狗熊”的父亲又姘上了一位国民党营长的姨太太，该营长刑满出狱后，状告共产党高级干部霸人妻女，“狗熊”父亲受到组织处分，从6级高干降为9级。“革命妈妈”在父亲再娶这位姨太太之前患尿毒症而死。“狗熊”说，她是被父亲有外遇而气死的。武斗伊始，父亲就从天津到清华一教，劝“狗熊”回家，说中央规定高干子女不得参加武斗。“狗熊”讲：陈楚三的继父也是武汉空军的高干，他能在科学馆参加武斗，我为什么不能坚守一教？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里，父亲传达中央规定也被儿子置之不理。许多高干子弟早在一年多前就离开学校，凭关系进了部队。他们有“组织”出面提点、关照，共和国都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为什么他们的子女要去经历没有好处的危险呢？“狗熊”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感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他知道了蒯大富占了便宜又要抛弃女友刘刚，而刘刚是他继母带来的妹妹同在清华附中高一年级班里的同学，“狗熊”几次守候在强斋门口，准备伺机将蒯大富暴打一顿。

孙华栋死那一年，“狗熊”31岁。

后来，清华校办同意出一笔钱，为“狗熊”补交社保费，曾任天津市领导的65届的一位校友也出面帮助，希望他能象老蒯在深圳那样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在这几天，孙耘发来邮件告诉我，“狗熊”的社保解决了。今天（2012年7月7日）下午我接到了“狗熊”从天津来的电话，那无法压抑的喜悦让人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酷暑严寒，为了获得作为公民权利的区区社保，他奔波、等待了6年！吴慰庭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75年中，他前16年随母寻父，中间15年在蹲大牢，最近6年跑社保，老天为什么要这样的人生放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也很高兴，为社会有温暖而高兴。母校代他补交了26万社保基金，除了解决就医困难，每月还能领到2900多元养老金。相信听过他的故事的清华同学都会为这对患难夫妻的晚年生活有靠而感到宽慰。

吴慰庭的一生令人同情，他少年时随生母寻父的经历更催人落泪，他狂热、

冲动、冷酷和暴戾的性格绝对不会事出无因。父母是人生第一个启蒙老师。有的高干父母如同戏台上威风八面的英雄，下班回家后也从不舍得“卸妆”，传唤儿女训话有如贾政召见宝玉，如果家中是赵姨娘当政，亲情上的冷就足以摧毁一颗幼小的心灵。不少高干子弟也许生在硝烟战乱的小路边，长在马背摇篮的艰苦岁月中，未必得到了发育阶段应得的关爱和教诲，引领他们走上人生道路的人，也许只是家中的保姆。他们在新社会光荣门楣的优裕生活中，有人德才缺失、恩义淡泊也在情理之中。“英雄不讲出身”。高干家庭一样人才辈出。陈育延曾告诉我，她家在中南海住过一段，与陈伯达家比邻而居。陈伯达的女儿喜爱文史，可陈伯达坚持毛主席讲的“学了文科也没用”，只准许女儿报考理工科大学。陈伯达的女儿最后拒绝报考大学，去部队当了兵。父母，尤其是大人物的父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女身上，是多么不近情理的事情。在清华，上到蒋校长、下至政治辅导员，对高干子女最欠缺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权力可能腐蚀当权者，也就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子女。

追究清华文革种种表现的原因，不能不深刻反省清华的教育。反省文革前的清华教育，蒋南翔同样是绕不开的话题。用韦君宜的话讲，蒋南翔到清华当校长是把“一肚子教育理想都带了去的。”蒋南翔的办学理念既有个性，更有党性。

“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清华园。”他是带着党化教育的任务到清华当校长来的，从到学校的第一天，在他的讲话中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1980年，死里逃生、重掌大权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重复和重申了这段话。蒋南翔在清华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13年。1988年5月3日，蒋南翔因胃癌去世，临终前还对清华大学当时的负责干部说：我认为“又红又专”比“德才兼备”这一提法更确切。

60年代的清华学生早已无从知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耳熟能详的是“南翔精神”。“南翔精神”伴随蒋南翔来到清华。1953年初，清华成立政治辅导处，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南翔精神”开始生根；“南翔精神”大成于1958年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出的“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南翔精神”完善于1961年形成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这个《高校六十条》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系统地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经验，用主要精力草拟，并多方面征求意见而形成的。196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高校六十条》，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半个世纪以来，蒋南翔之后的清华历任领导萧规曹随，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上殊无建树，“南翔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蒋南翔后来担任了中央党校第一副

校长，其实清华大学在“南翔精神”指引下早就办成了党校。有人总结说，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理论。其实说这句话的人高看了邓小平，邓小平只是在毛泽东的专政思想框架内，添加了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奋剂。对于毛泽东、对于文化革命这两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大事，他极不负责任的敷衍塞责，“宜粗不宜细”的回答等于在历史的拷问下交了白卷。清华何尝不是愧对历史，看看清华的校史展览和反右、文革，许多重大事件被恶意删除，一些良知缺失而又权势在握的人物早已丧失了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的组织行为只能是更加可耻可悲！

“南翔精神”并不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而是毛泽东思想在教育战线上的体现，是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只是掺杂进“南翔精神”中的私货，清华文革中被他的包括政治辅导员在内的学生们，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严加批判。蒋南翔只是“南翔精神”最坚定、最忠实的执行者。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也许与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打工的经历、一段“卑微的伤心史”有关。他指责北大“庙小妖风大，池深王八多”。这是一种恨惧交加的复杂感情。他对清华并无偏见，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修好之前，毕竟有清华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享用。他并不是教育家，却特别中意“伟大的导师”的称颂。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提出了“三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红又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学习解放军”，包括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蒋南翔等16人参加了座谈，从传达内容看，也就是些标语、口号：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学制可以缩短。”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所谈的教育是党化教育和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把宣传和培训也当成了教育。

清华大学不是党校，但却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以培养“毛主席的好战士”、“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为目标，这是蒋南翔的功劳。老蒯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的典型，涛哥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得好”的典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造反有理，痞子掌权”和“又红又专”，既是毛的号召，

也是“南翔精神”。早在文革前，清华学生都在争当“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这是清华校风中的主流精神。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是国民党最早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仿效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停止了“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实行“党化教育”。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

集“党化教育”大成者是蒋南翔。除了开设马列主义政治基础课，评选“先进集体”活动，蒋南翔特别强调：“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蒋南翔创造性地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党化教育”在工作中落到了实处，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是他推行“党化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1953年，蒋南翔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起草了一份向高等教育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的报告。根据“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的标准，从当时在校最高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了25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学制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24小时工作。辅导员队伍归团委领导。经过清华文革十年劫难，1977年政治辅导员制度得以恢复，当时学生中党员已占多数，已不宜由团委管理辅导员队伍，清华第一个成立学生工作部，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还逐步增派了一批博士生担任辅导员。

第一批25名辅导员第一次会议是在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中召开的；50年代有突出表现的辅导员被选送苏联留学，学习新学科、新专业，返校后就成了新学科、新专业的创办者和学术带头人。这一传统在后来，改变为优秀辅导员不须考试直接就读研究生，“多数辅导员给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据1993年统计，现任12名校级干部，其中10名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系主任、系党委书记及机关正部、处长中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约占45%。最新的统计是：清华大学1949年后培育出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1人，中共中央委员50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国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9人，省部级领导280人；全国人大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7人；全国政协副主席13人，政协常委116人；最高法院院长1人，最高检察长1人。清华，只有清华，才有这么多的“听话出活”、“双肩挑”的人才。“教授治校”见鬼去吧，清华大学“以吏为师。”

思想“灌输”的效果和成败，不取决于灌输者，而取决于被灌输者是否接受。而接受灌输的前提是受灌输者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不难看出政治辅导员必然要先受其害，更不难理解为什么服从、听话的奴仆思想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清华牌政治家多如星辰，而兼有人格魅力的清华牌

政治家却寥若晨星。

政治辅导员学习的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两论”，即《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团委在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指导下，贯彻《高校六十条》编写的《团支部工作五十条》。其中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等论述影响至深。

1957年的“反右斗争”，才是政治教育的生动课堂。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一举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反右”第一线总指挥邓小平亲自到清华作报告，毛泽东钦点那个说“什么话”的黄万里教授成为了“右派”。公开的原因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花丛小语》，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党必须过河拆桥和民主党派分道扬镳，不整肃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如何统一思想？黄炎培在世的另外两个儿子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没听说有什么“右派”劣迹和言论，也一个不漏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调侃黄炎培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一门五右派”的黄炎培还敢和毛泽东“窑洞对”，夸夸其谈什么“周期律”吗？蒋南翔和蒯大富一样热衷权力，经常提醒身边的干部“要有政权意识”。钱伟长教授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是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成员，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访问，有新中国学界“三钱”之美誉。钱教授聪敏博学、全知全能、眼生于顶、口若悬河，对蒋校长多有不敬；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袁氏夫妇是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因为阶级斗争中手软，而成了蒋南翔的掣肘。“有政权意识”又不乏阶级斗争警惕性的蒋校长，岂不要打造一个从这里漏气的发动机？和钱教授、袁书记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师生有500多人，和清华文革中被抓出来的“蒯派”人数相差不多。毛泽东因抓出300多万“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超越秦始皇等历代暴君，夺得“坑儒”之冠；蒋南翔因清华反右斗争制造恐怖而赢得威权。

在“反右”之后提出的教育方针，红专目标再无人反对，“党化教育”大行其道。又红又专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通俗图解，也是“南翔精神”的核心内容。又红又专来源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22条，讲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早在1955年11月7日在发展刘仙洲副校长入党的支部会上，蒋南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1958年以后，又红又专的指导思想就成了抓教育的一条主线。蒋南翔常对学生讲：“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就达不到目的。”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

服从分配。如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等著名教授成为了“文物”，除了撑门面当摆设，他们在学生中几乎没有学术上的影响；而如张光斗一类投机钻营、腆颜造假、曲学阿世之徒却见风得风、见雨得雨，光荣入党，一直爬到副校长的高位。一大批“蒋南翔式的”、“双肩挑”干部，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从政治辅导员、“助教党”的队伍中成长起来，和找到“归宿”的老知识分子实现了“两种人会师”。一个“永不漏气的发动机”就这样打造成功了。

1958年，在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领导下，团委着手整顿辅导员队伍，重申辅导员制度的要求，全校辅导员从150多人减到80多人。1977年何东昌指示，尽快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至今这个制度已有了近60年的社会实践，培养出了大批优秀辅导员，不仅充实了校系领导班子，而且为党中央领导的梯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涛哥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当上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就意味着成为最优秀的优质生，“革命事业接班人”已经非我莫属。有了这样的耀眼经历，毕业以后都能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辅导员是他们的晋身之阶，所以他们对辅导员制度感激不尽、赞扬有加。有一位辅导员出身已经成为金字塔之顶的高官回清华对学生现身说法：“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和学生们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不吃亏的。”当我问起我所熟悉的一些辅导员时，他们也是类似的感受。他们多因为有助于本人的成长来肯定辅导员制度的。

在我看来，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

教育、灌输是软性的一面。所谓灌输，就是洗脑，洗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注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过程，其实与传销的洗脑差不多的。辅导员们自己先被洗脑，然后再洗周边同学的脑。不仅要将与正统说教有异的思想清洗掉，那些有点棱角的个性、正常需求的私心，统统都在纠正、克服、抑制之列。青年学生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最后被灌输成单一的红色，再没有其他的色彩。

监督、控制则是比较硬的手段，这针对那些教育、灌输效果不够理想的差质生的。

教育、灌输、监督、控制的具体措施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其中有一种叫“个别谈心”的，是我最反感也最害怕的。

辅导员和颜悦色地找你促膝谈心，表面上看似亲热、平等，目的就是套你的话，从中找出思想倾向上有问题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会放过。辅导员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你也是禁闭的。偶尔，他也会说一点他的想法。当心，这是一种“钓鱼谈话法”——以自己无关紧要的小事把你思想上偶尔一闪的隐秘想法钓出来。谈完回去以后往往会记在工作笔记本上。一次次的谈话，加上其他各种场合下观察到的表现，成了你完整的思想档案。到了某一天需要“帮助”你的时候，一条条有日期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有旁证的记录会

翻腾出来。到那时，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动学生了。

辅导员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不断地锻炼、考察、培养辅导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

政治辅导员才是今后掌权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他的人，不过是革命事业的打工仔。这些辅导员，名曰又红又专双肩挑，都是根红苗正，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观点鲜明，对党无限忠诚，在学校期间已经学会掌握了如何控制群众思想、如何制造革命舆论、如何搞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掌权的手腕。

我不否认我认识的不少辅导员本人的品质都是不错的，我也不否认他们为同学做过不少的实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辅导员队伍只是执政党统治学校、推行教育路线、扼杀独立精神、实施思想禁锢的工具。

在文革初期蒋南翔刚刚倒台的时候，一些激进学生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与他们接触最多矛盾很大的政治辅导员。我看到有的大字报上把辅导员每月18元的生活补贴费叫“养狗费”。这种污蔑人格的说法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赞同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辅导员制度已是很反感的。现在看来，如果把执政党比喻成一家“大院”的话，那么，这支辅导员队伍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看家护院”。

以上引文来自孙怒涛《拷问》中没用上的材料，这是一个清华高年级师兄的真实体会。

学生政治辅导员大多来自“红五类”的农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坚信“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既顺从又听话的同学，最适合辅导员工作，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他们纯朴勤奋、感恩心切，对“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无反感。植根底层民众的奴隶思想、皇权意识很快上升为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阶级感情。因为只有那种奴性入骨、惟命是从的人，才是最适合被打造成暴力机器的胚子。

1965年，蒋南翔在毕业生大会上讲：“毛主席1957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了分析，我们可以把思想过硬概括为三个境界或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来的系统提法是：

第一个台阶，是做爱国的文明的守纪律的学生。

第二个台阶，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分配，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

第三个台阶，对学生中一部分先进分子，要帮助他们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又红

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¹

“党化教育”本质上是虚伪的，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奴化教育、痞化教育。黄万里是1953年评定的二级教授，出于对官僚体制的抗议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拒绝写申请当博士生导师。还说：“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黄万里成了清华唯一拒绝写申请，而没有当上博导的教授。蒋南翔曾说，“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服从分配。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就是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黄菊是清华电机系电机专业63届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前夕表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听说要分他去大西北，他害怕艰苦，放弃分配，溜回上海，在上海人造板机械厂参加了工作。他的行为为老师、同学不齿，电机系可能都没给他发毕业证书，他也从来不敢回学校。贺鹏飞勉强考上清华，1970年分配到甘肃武都地区工作，去那里看了一眼，就被那里的艰苦环境吓回来了。贺鹏飞回京途经天水，巧遇和我一个年级、分到武都工作的段姓同学，一番交谈下来，段同学也不服从分配了，他们一起逃回了北京。贺鹏飞已在若干年前死去，死时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军衔。

不能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只是虚伪地喊“精忠报党”的口号，能不给清华丢人？无数事实证明，如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废除任何带奴役的契约，就无法指望培育出美德。

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中的表现发人深省，孙怒涛还在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军是青年学生，既有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竟成了只听命于领袖的枪手，充当了无辜的炮灰呢？

党的教育方针是在反右以后的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对这一方针出笼前后所受教育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镇压反革命，要抗美援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权比较稳固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斗争，标志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对教育实行全面控制，标志是提出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回想起来，对我的德育影响最大终生受益的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个时候没有提“爱共产党”，也没有提后来替代“爱护公共财物”的“爱社会主义”。

到了高中，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¹ 以上部分内容主要抄自2005年版的《蒋南翔传》和方惠坚的《清华工作50年》。

因为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当大跃进成为全党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以后，即便是一所县中，也要垒起小土炉炼铁。

因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于是，垦荒种地、夏收夏种成了一门分量最重、占时最多的课程。

政治与教育，是有关联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这完全是错误的定位。

更为错误和荒谬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必须为某一党派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某一党派狭隘私利的工具。

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的方针，也是极端化的。

无论是叫又红又专，还是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或者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的。在清华，这一培养目标有一个通俗形象、简洁明了的叫法：听话出活。

所谓听话，当然是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党把你放在哪里就在那里死心塌地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红”，就是“德”，是政治标准。

听党的话，落实到具体，不仅要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党中央的话、领袖的话，还要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听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话，甚至是听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总之，就是听领导的话，听上头的话。脑袋是用来吸收、消化党的指示的，不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谁要是有点自己的思想，有点个性，那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那就被视为开始走上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了。

所谓出活，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精湛的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能为党高效率服务的工具。这是业务标准。

在听话与出活上，听话永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

要培养听话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兴无灭资”：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其他的思想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封资修的，都必须彻底清除干净。

于是，从高中到大学，被灌输进脑子的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是永远英明的、不会犯错误也没有丝毫缺点的，抗战八年打日本鬼子是全靠八路军新四军的……

红专大辩论、参观反右展览、联系实际的“九评”学习、学习“毛选”、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雷锋、参加“四清”、政治课教育、党课、还有各种各样的繁多的活动、会议、参观、座谈等等，都是我们上过的阶级斗争主课，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听话的人。

我并不一概否定这些活动，也不是说这些活动的效果一无是处。作为原本纯洁的学生，我们是从正面去接受这些教育的。譬如“学雷锋”，我们从中学做好事，付出爱心，这是对的。但在这些活动中，各级组织的着力点是增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是在强力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和奴隶意识。

不同时期的青年学生，都有共同的特点，如有爱国心，有民族自尊心，有政治热情，

追求进步、真理、正义，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单纯，幼稚，勇敢，易被鼓动，易受蒙骗，等等。文革前的青年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更增加一些新的特征：对领袖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紧，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无比痛恨，敢为共产主义理想赴汤蹈火，等等。这样的一群青年学生，个个都愿意成为红卫兵、党卫军。文革之所以能得以发动，原因之一是学校已经为文革准备好了成百万的冲锋队员、枪手和炮灰。

孙怒涛的思考痛心疾首。“党化教育”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发生了极大的混乱，以小骂大帮忙见长的党内大笔杆子邓拓，竟被自己献身的组织构陷委屈上吊而死；明史专家吴晗校友“曲学阿世”，视学术精神如玩物，把一个朱元璋写得颠来倒去，为迎合圣意宣传“海瑞精神”，反被诬为“反党分子”彭德怀一党，夫妻双双受尽羞辱迫害致死；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了出来，清华骤发雪崩，从党委到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乃至个别政治辅导员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党性发生“变性”，再无其他纲常伦理来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清华大学被损毁的不仅仅是“二校门”，蒋南翔鼓吹的“三层楼”也轰然坍塌了。

三、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殉文化”而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鲁迅说：这位“老实得象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在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两年后，“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现在清华一教西北小山坡前的王国维纪念碑上，镌刻着陈寅恪窥破天机的不朽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纯为知识、学术，勤奋读书、游学，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以洞悉幽冥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彻底破产，“戊戌变法”

是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文化自救而以失败告终的行动。慈禧没得选择的选择了“晚清新政”，刚刚起步的“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一枪毙命。宫帷深锁的帝后奢靡生活让站起来了、富起来了的中国人梦萦魂牵、艳羨难已。爱国压倒启蒙，爱国主义成了蒋校长政治思想教育的第一个台阶。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国社会的上一次“奇变”，始于“商鞅变法”，大成于西汉“独尊儒术”。那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天人合一”的封建文明支撑起了一个泱泱大国三千年的农耕社会。蒙、满、俄、日……的异族入侵和蚕食，一次次地阻断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和平崛起。任何一个文明古国失去了今天，也就没有了过去，不管过去何等强大、如何辉煌。一次次的救亡和内斗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久历劫难还不是最可怕的，“劫尽变穷”让中国人无路可走才是最可怕的！陈寅恪如同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以大勇气、大智慧、大情怀、大心愿昭示读书治学的知识分子要铭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训导，要象张骞一样去“凿空”，去劈开中国变革图强、建设崭新文明的大道。

陈寅恪的校训比梁启超的校训晚十余年，同样没有被贯彻在清华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之中。由于对今天教育乱象的反思，有的人高估了民国“黄金十年”教育发展的成绩，轻浮地说什么“中国高等教育 30 年里走过了西方办大学 1000 年的路程”。不知道丑陋的中国文人什么时候能改掉总是夜郎自大、蛙鼓蝉鸣的坏毛病。1949 年以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只有 10 万人，只是今天一年大学毕业生的六十几之一。仅此一点可知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多少骄人的成绩，《围城》中的假文凭和野鸡大学生，生活中照样有。问题是我们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有问题，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尊重他们的劳动。用杜牧的章句形容：“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按照黄延复老先生关于大师的标准：“大师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五种品格：高尚的人格、博通的学术、深邃的思想、卓绝的识见，儒雅的文采”。我斗胆以为除了陈寅恪、黄万里、叶企孙等寥寥数人，还有几个清华教授配称为大师？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在国外高校完成学业、做出成绩的。不能把栽培他们的功劳全都归于中国教育事业。当然也不应抹煞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战乱频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的卓越工作。在清华，梅贻琦校长就是楷模。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潘光旦合作撰发的《大学一解》中。他主张大学之道：明德修己、新民、止于至善。大学的直接目的：发展学术、作育人才。他要求学生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宏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不应该给学生以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只应该给学生判断的能力，让学生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宽广

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全人格”的人，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他还主张“才不通而身不得出”，即没有通识准备的人，不允许其参加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才可能良性发展。为了感受一代教育大家的流韵风采，我不去说他那些枯燥乏味的“通才论”、“大师大楼论”、“坏学生论”，下面有三个故事感人至深。

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2.9”学生运动后，军警将到清华抓捕宣传抗日的进步学生。梅贻琦校长将军警的抓捕名单张贴在布告栏中予以公告，在教师、工友的掩护下，蒋南翔等被通缉的学生全部安然逃脱。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梅贻琦民主治校，在于对校长一职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他曾说，校长就是在戏剧中饰演皇帝角色的人，他端坐戏台中央高高在上，但他不是剧中主角，除了一两句自我介绍的道白，甚至连一段象样的唱腔都没有。我曾设想有一天，重临西南联大旧址，在校园草坪席地而坐，手捧台湾作家鹿桥的《未央歌》，追怀那个国难岁月的大师风采。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资历、人望都在“寡言君子”梅贻琦之上，但他们都信服地支持梅贻琦主政校务、共度时艰。梅贻琦一生从未遭逢异词谤语。我私心暗忖：蒋南翔校长也能做得到吗？

真学者视学术为生命。梁思成回国的目的很纯粹：共产党来了也会有人盖房子。说到梁思成自然难忘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林才女患肺病喜静，据传梅校长曾命人在新林院梁宅前竖一警示牌：“林徽因住此，请勿喧哗。”梅校长做事如此风雅，实不让六朝故事，令人追忆神往。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没有被人从校训中“腰斩”掉，因为它从来没有成为清华校训。民国政府致力推行的同样是“党化教育”，蒋总统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反民主、反人权的独裁政权，注定与现代文明绝缘。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已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3000年了，果真“天不变，道亦不变”？身为“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帝师”、被传统文化彻底“化”了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投湖而死去“殉”哪门子能够永世长存的文化？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且不说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级台阶”的人生追求中有多少权谋欺诈，只是向“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磕头的拜师礼，就能说明这是培育奴才的第一课。启发兴趣，提倡思辨，鼓励怀疑精神，推崇超越前辈先贤，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才是教育的真谛。有如亚里士多德超越老师柏拉图。孔门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哪个学生超越了孔子？两千多年下来，汲鹏说是“老

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现在清华检讨自己：“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纯属脸皮太厚的文过饰非。

徐葆耕学长和我有数面之缘。他俨然已是清华“国学专家”，我有点点难以置信。他为了称颂今日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风貌，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灾难铸就辉煌”理论。这个理论有点奇怪，它不追寻灾难的原因，总结灾难的教训，也不去找寻规避灾难的办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颂灾后的辉煌。

这个理论颇受主流青睐，并广为流行，地震、矿难、高铁出轨后，这个论调都能在主流媒体上“辉煌”好一阵子。徐葆耕有两个例证：一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是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二是清华“文革动乱后，在‘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¹

“灾难铸就辉煌”，通俗说法是：“灾难就是辉煌”，这是毛泽东的“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的另一种表述。常识告诉我们，创造和建设才能铸就辉煌。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生活异常艰苦，闻一多教授要业余篆刻图章换米求生，如果生活无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是否会更为斐然？乱离人可怜！文史学生尚可苟且延续学业，科研、实验应当难以为继。那时的清华学人之所以还能有所成就，只能说明专制的学术钳制比战乱还要不出学术成果、还要让人才思枯竭。葆耕学长是否也要像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谈话那样，像无耻地感谢日本人的侵略那样去感激灾难呢？至于说到文革后清华的堕落，罄竹难书四个字有点过分，痛心疾首是国人的真实感受。葆耕学长也看到了，“对于一个班、一个班地（清华学生）留学美国”，清华已被讥讽为“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事实上现在的清华留学生和前辈大不一样了，老清华留学生大都回国报效国家，今日留学生大多定居国外，如若回来也多半是加入了“八国联军”（坊间称世界百强企业为“八国联军”，称民营企业为“义和团”）杀到中国，回国为了赚钱。人各有志，其中原因总有不同，自然不必一切为外人道。我要强调的是：清华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上做得不好，不好到已经留不住人才了；国内工作、生活条件让精英们有了出去不回的理由。清华学生比较许多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许是更听话、更出活的“驯服工具”，但不争的事实是：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大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令人满意。还记得张孝文校长的“面粉”比喻吗？考进清华的都是优质生，如同精白面粉，我也不相信清华能把好面粉做成了棒子面窝窝头。

在给孙怒涛的信中，我曾错误的认为自由、独立是资本主义口号，是 1980

¹ 徐葆耕：《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刘琅、桂苓编著《大学的精神》页 19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年代香港高楼上悬挂的商业广告：美国精神。前两天去珠海，张鸿庆再次点化我：陈寅恪的校训是他纵观古今、学贯中西，开悟得出的时代精义。新芽萌生于老树的残躯、种籽，任何新思想、新事物都切不断与陈旧、腐朽、死亡的联系。在生命将死将生之际，有能量的消散和凝聚。宇宙的历史是一部能量不断改变存在形式的变化史。吸收物质，积聚能量，构建文化，锤炼思想，微小的人类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如果对陈寅恪那一代知识精英采取舍弃和健忘的态度，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无情，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不幸！

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了，“用全人类所有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头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达成“一切人的解放”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应具有“公民意识”？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容不得盗袭兵焚的斯文神圣之地。它虽然诞生于西方教会的怀抱，但神圣的大学也禁止在校园里、课堂上宣传教义、党义。大师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站在知识的最前沿，站在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天堂和地狱的分界上，揭示真理、预警灾难、昭示未来。他们因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他们不应该因学术思想有悖于统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而被整治得死去活来、挨批受“坑”。

1968年7月27日后的清华文革还有整整8年的干烧高压锅里的“热寂”岁月。本应普照天下的“红太阳”盯上了“六厂二校”，红太阳聚焦，“熵增原理”在清华出现了反常。通过8341部队的宣传科长迟群、机要秘书谢静宜，毛泽东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控制了清华。清华文革如朕亲临，继续革命的战略战术、阶级斗争的政策策略全凭圣心独运。先是制造恐怖、获取威权，具体做法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抓516分子”、办江西鲤鱼洲“牛棚”；然后是招兵买马、组织队伍、训练打手，一是从64级、65级的学生中，挑出700多名根正苗红、听话出活的学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视为“新工人”；二是招收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红卫兵、工农兵，“两兵”大学生占领上层建筑，名为领导“斗、批、改”，实为充当打手、炮灰。最后由“梁效”写作班子吹响战斗号角，从清华、北大向全国掀起“反右倾回潮”、“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巨劫连绵，无休无止地冲击着赤县神州。这不仅是“党化教育”，更是党的“全面专政”。毛泽东劫尽将亡，他也曾惊惧于陨星天象，伤感于枯树文章。哪一个重要知识分子不被他折腾得思想麻木、精神癫狂。若干年后，巨恶元凶阴魂不散，涛哥出来宣布：“不折腾了”。大家觉得反正“劫尽变穷”，跟着涛哥得过且过罢了。于是清华百年校庆齐颂盛世、大唱赞歌：“精忠报党”！

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他们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其实权力有自我扩张

的天然秉性，和个人的道德品质无关。让全校师生员工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却非常有效，这就是秀才遇到根本不和你讲理的兵的心理劣势。那八年中，清华成了兵痞横行之地，被逼死的人、被批斗的人、被冤屈诬陷的人、被体罚被侮辱的人比哪个时期都多。毛泽东认为清华文革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结合“清队”、“抓 516”、“整党”甄别干部，重建各级组织。批斗、恐吓、引诱、揭发是一贯手法，利用捕风捉影、知情人急于洗刷自己去立功举报，只要还有自尊自重，不会佯狂自污、唾面自干、宁弯不折的人，多半不会平安过关。工化系副系主任李文才文革时作为交流学者在英国学习，武斗结束前才回到清华，工宣队认为他和清华运动、清华派系没有关系，打算第二天把他“三结合”进入系领导班子。但考虑到他在北京×中学读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就找他谈话，要求他第二天写出交待材料。当天晚上，李文才因惊恐而自杀身亡。在批斗工化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会上，党总支副书记黄志冲被罚站在滕藤身边陪斗。由于黄志冲是清华教工子弟，说话多、欠严谨，又分管学生工作，接触人更多，留下的把柄也多，可供揭批的言行比滕藤还多，教工的发言多冲着黄志冲去了。据滕藤后来对我说，黄志冲一定认为他是工宣队在工化系的主攻目标。批斗会后黄志冲越想越怕，上吊死了。

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是一个废弃了的劳改犯农场，占地 9300 亩。首批 398 名教职工于 1969 年 5 月到达，先后有 3000 多位教职工及家属在这个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改造思想。1970 年查出血吸虫病患者 747 人，疑是血吸虫病患者 111 人。我的三哥、工化系教师唐晋也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1971 年 10 月全部人员撤出鲤鱼洲，迁至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奥斯维辛集中营杀人用毒气，迟群、小谢用生物武器，不仅环保，也利干隐匿真凶。你若拷问血吸虫，它绝对不会招供主谋就是那个 1950 年代诗中讲血吸虫已被“照天烧”了的毛泽东。

迟群、小谢用“冷暴力”构筑的专政机器，在教育、培训（包括军训、下工厂农村劳动）、宣传之间划出了两个等号，即：教育 = 培训 = 宣传。他们名为关心青年学生，实则利用、出卖青年学生。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毛泽东亲自抓的清华教改，是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需要的只是奴隶中的工匠。谁都可以看出清华“斗批改”的教育革命有多荒唐。但它远离教育宗旨，偷换教育内涵，以教之名义，行害之实质却并没有被注意，更没有被清算。在教育产业化的荒唐指挥下延续至今，怪不得资中筠痛叱清华聚毁人才。熊庆来说：“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倡导的就是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知识分子做事做人的两大原则，

也就是熊庆来讲的“学术生命和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革无定式，无法预设蓝图；改革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改革并不痛快，大多相当痛苦；改革就是做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投机取巧，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只能象“大跃进”那样害死许多人。

提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就是承认学术文化不仅是事业，而且是超越国家、政党、阶级利益之上的事业。陈寅恪说：“国亡然能有史，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诫，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国家危难，史学衰落，此已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死继绝的大节”。只有这种气吞山河，包容万物的“雅量”，才能保持华夏民族文化火种长燃不熄。

“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是育人育己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是马克思主张的“人的解放”，从自在走向自为。梅贻琦说：教育本身必须以每个个人为对象，从每个个人的自身着手，其目的就是首先要促使他们的完整人格的养成。

陈寅恪于1953年12月1日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当然，毛公、刘公岂能“应从”陈寅恪的“狂悖”之言，没有治他的罪也只是因为他名气太大，1953年的文网也还没有收到后来那么紧。但陈寅恪坚守大节的心志、胆色却令人动容。

黄万里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敢于担当的清华教授。我的长兄杨美卿曾是黄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同在水利系泥沙教研室工作。黄先生“怀璧沉沙”的坎坷人生和难得的人品、才情、学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对三门峡工程的论断的正确，已被时间和实践证实。我在读黄万里时注意到以下几件事：

密云水库建成几十年来一直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拿得出手的主要成果之一。黄先生计算了水库上游河段历年来的流量，曾向钱正英部长建议

降低大坝的高度，在“经济困难时期”节省投资自有利国利民的特殊意义，但是他的建议无人理睬。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落难教授，如果没有学理精通的大胆识、没有对专业的执着、没有对国家强盛的一往情深，他怎么还要去面对钱部长等人丑陋的冷脸，而自讨没趣呢？

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是黄先生临终都耿耿于怀的不解心结。他早年考察过几乎所有的川江水系，如同预言黄河的泥沙作祟，他预告长江的砾石将堆积三峡水库的库尾，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形成极大的祸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我，乃至我的长兄杨美卿教授都没有能力判定黄先生的意见是否正确。但是论证三峡工程不让有资格和能力的黄先生参加，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能叫重大决策前的科学论证吗？黄先生还提出缓冲意见；用建三峡大坝不到一半的钱，在川江上游建 10 个水电站，发电能力即可与三峡电站相当。黄先生于 1992 年写《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5 年写《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从 1992 年 1 月到 1994 年，黄先生连续致信江泽民总书记、中纪委、监察部，有的信甚至用了举报的方式。对于一个知名教授几近疯狂的抗争，有关部门和有关大员一直装聋作哑，显足体制没有人性的冷漠。2001 年 8 月 27 日黄先生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挂记的还是长江、三峡。临死还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

对于关系重大的“南水北调”工程，黄先生也有宝贵的建言，惜乎同样没人理睬。“黄钟毁弃，瓦釜长鸣”，这个典故用来说谁呢？

专家总是片面的，不片面不能成其为专家。黄万里先生不是那种专家级的匠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家学渊源、文词高雅；数学、力学功底扎实。1930 年代初的黄河、长江水灾，促成了他改行水利，一生求学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以学习为最高最大的善行，不断更新自己的已有知识。他发现熵值和焓的单向变化将控制水流、泥沙的运动，他不断用新知识、新理论增进对江河水系的认识。“热力学第二定律”、“混沌理论”都是他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毕生都在潜心学习，学问不断精进的大师。

黄先生一生坎坷，活得艰难，生于忧患，死也遗憾。实践证明，黄先生没有错，是拥有权力的政府和上级组织错了；黄先生并非不幸，他有值得为之奋斗的学术和真理，不幸的是国家和人民！先生仙去，我们怎么能不痛惜大师！

我相信教育可以兴国。由于深圳大学罗征启校长（当时张维任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召唤，我放弃了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刘冰校长给我安排的省委办公厅的副职，于 1984 年 1 月来到深圳大学创业，希望能跟随清华师长在特事特办的深圳特区，办成一所争创一流的高等学院。罗征启在深圳大学改革最精采的一项是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我在深大任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党办有 4 名工作人员，后来增加了 1 名发余热的老干部——人民

大学前任组织部长徐景秋做顾问。党办是全校唯一的党的专职组织机构，囊括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青、妇的所有工作；党委书记和各系的支部书记（当时系上还没成立总支）一律兼职。三、四年下来，学校各项工作照样生机勃勃，党员教师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一线工作，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什么党群矛盾，一点也没有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实行学分制，逐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政治时事课、公民素质课和学生勤工俭学供学生选修。事实证明“去党化教育”也是可行的。

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还是失败了。1989年的“6.4”，导致罗征启下台并被开除党籍。其实，深圳大学教育改革在这一事件的两年前就败象显露、祸根深种。深圳大学一直未能进行民主办学的制度化建设，没有建立对校、系主要领导的权力约束机制。民主只是形式，集权才是目的。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派来的副校长和清华派来的罗校长矛盾重重，教师队伍缺少为改革出力的新血，包括清华在内的教师纷纷调离，蝇营狗苟之徒菌集权力中心，深大改革焉有不败之理。何东昌部长曾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难听话：“罗征启，他懂教育？”我以为去掉这句话的恶意后，还是值得深思的。

“6.4”是罗征启下台的直接的导火线。总结清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加群体事件绝非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绝不让他们跟着“蒯大富们”去搞什么“12.25”行动。我们过去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充满误导，我就十分着迷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站在行进的有轨电车上抛撒传单的镜头，简直就是油画中的自由女神在引领大众奔向光明自由。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学生。

罗征启校长做为一名党员，他犯的是组织错误，不是政治错误。周泉缨说：“罗征启得罪了中国两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在清华他得罪了陈云，在深大他得罪了邓小平”。每当念及罗征启对清华学生、深大学生的关爱之情；每当想起早上上班的路上，见到他和梁鸿文老师走走停停、指指点点，精心设计深大的规划布局，安排在哪里添修一条路，在哪里多种一片草。我的心中对他和梁老师就有一种浓浓的敬意。在深大工作时，我多次冒犯过他，说“罗校长在深大的改革事业将随他下台而一风吹掉，而他盖的房子将会成为他永远的纪念碑”。对他在深大禁止抽烟，我说过：“林则徐虎门禁烟，被发配伊犁；罗征启粤海禁烟，将来不知会被发配到哪里？”唉！至今想来我都后悔死了，这张讨厌的鸟鸦嘴！

上大学，独立思考能力最重要。真正在人类社会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而是有机演化、逐步尝试出来的。从教育着手应当是中国改革的切入点。民

主政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高等学校应该是教育养成这种良好生活习惯、并有益于终生的圣地。

在自由匮乏的社会里，只有思考的碎片，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思想。香港回归前，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是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如何面对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理的挑衅性预言呢？

这篇“读后感”或许会让所有读它的人面临一场精神折磨。语云：“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我把它送给孙怒涛学长和我那些传奇般的清华同学，我感谢他们在恩怨情仇的真实世界里一生与我同行。

2012/7/15（定稿）

文革回忆录

良知的拷问

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孙怒涛



三

卷首语	345
第一章 清华之前	347
第一节 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347
第二节 我的少年，在红旗下长大	349
第三节 我的高中，狂热的大跃进时代	351
第二章 阶级斗争是大学生活的一门主课（1960.9—1966.6）	357
第一节 无处不在的政治思想教育，挺过三年困难时期	357
第二节 反右展览，对我重重地敲了一次警钟	361
第三节 “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362
第四节 “九评”学习，我人生的“滑铁卢”	364
第五节 怀柔“四清”，“三同”做得好是远远不够的	371
第六节 批“三家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	376
第三章 文革爆发蒋南翔倒台工作组反蒯（1966.6—1966.8）	378
第一节 保蒋还是反蒋？都有道理很难抉择	378
第二节 贴了同班同学的大字报，羞愧难当	381
第三节 蒯大富的“干扰”，引起工作组的警觉	383
第四节 6.24 大辩论，工作组色厉内荏败给蒯大富	386

第五节	我对工作组不满意，对蒯大富也不信服 ······	387
第六节	一个软弱的蒯派，一份不服气的检查 ······	389
第七节	「怒涛」战斗组，被指责是“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 ······	393
第八节	被揭老底，我的“癞疮疤”全校皆知 ······	395
第九节	王光美卖饭打菜，一次反胃的政治秀 ······	397
第十节	我居然想参加「自控系红卫兵」，自不量力自讨没趣 ······	399
第四章	「八八」勇斗「八九」（1966.8—1966.10） ······	401
第一节	工作组败走清华，「八八」「八九」争雄 ······	401
第二节	一气呵成《少数赞》，激愤之下成名作 ······	404
第三节	赶潮流学时髦，改名“怒涛” ······	408
第四节	似是而非的对联，掀起血统论恶浪 ······	410
第五节	周恩来再来清华园，我有感动也有不满意 ······	412
第六节	8.24 老红卫兵发飙，胆战心惊的红色恐怖 ······	413
第七节	勇敢的「八八」，逐渐迷失了方向 ······	416
第五章	「井冈山」一统清华错误不断（1966.10—1967.4） ··· ···	419
第一节	应邀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筹备会，不为所动 ······	419
第二节	大局明朗，赶紧上了「井冈山」 ······	422
第三节	受蒯大富重托，组建「第一湘江」 ······	423
第四节	南下串联，病困南宁 ······	425
第五节	为促三总部联合，成立「天安门纵队」 ······	428
第六节	「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把我拉进总部 ······	432
第七节	江青接见，第一印象居然是她很有气质 ······	434
第八节	反感使诈擒拿王光美，开始在观念上与总部有隔阂 ··· ···	436
第九节	不赞同反唐（伟）反「八八」，开始在观点上与总部有分歧 ···	439
第十节	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我与总部尖锐对立 ······	443
第十一节	《多数赞》无人喝彩，《少数赞》时过境迁受批判 ··· ···	447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414 串联会」（1967.4—1967.5） ··· ···	452

第一节	「414 串联会」首次行动是强夺总部广播台，极不光彩 ······	452
第二节	身兼三重身份，同是两派要员 ······	457
第三节	两位团委干部，参加过「第一湘江」的活动 ······	459
第四节	“孙怒涛舌战蒯大富”，是有点影儿但此说有点演化化 ······	461
第五节	我对权的认识，感觉很重要但又不会抓 ······	463
第六节	筹建革委会，蒯大富的一着妙棋 ······	466
第七节	谈判异常激烈，只为加不加“正确”两个字 ······	470
第八节	墨迹未干，我就撕毁了《四项协议》 ······	473
第九节	团派紧锣密鼓筹备革委会，414 策划密室一心奔独立 ······	475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414 独立的主发动机 ······	477
第十一节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最终抉择了分裂 ······	479
第十二节	不伦不类的“井冈山 414”，这个名称是我坚持的 ······	481
第十三节	尽倾主力背水一战，这个建议是我提议的 ······	483
第十四节	突围成功，414 终于独立 ······	485
第十五节	414 的一把手是怎么定出来的？我的说法 ······	487

第七章	414 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	492
第一节	粗浅印象，团派的主要头头们 ······	492
第二节	粗浅印象，414 的主要头头们 ······	496
第三节	坚持“三不”原则：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长 ···	501
第四节	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疑似康生、周恩来、林彪 ······	504
第五节	我认为的团派后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 ······	509
第六节	团四分派根本原因：政治观点分歧和群体利益矛盾 ······	512
第七节	两派主要头头的群体属性，我是一个特例 ······	520
第八节	所谓 414 的队伍“纯”，团派的“路线觉悟”高 ······	523
第九节	两派争斗的三个关键词：思潮、权力、利益 ······	527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414 这辆三轮战车的前后轮 ·	531
第十一节	陶德坚和「红教联」，我倾力批判过 ······	533
第十二节	“揪刘火线”，闹哄哄的政治庙会 ······	536
第十三节	痛惜英才早逝，缓步走进李磊落的灵堂 ······	539

第十四节	中央首长排排坐，我亲见的周恩来 ······	542
第十五节	414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我稀里糊涂拍的板 ······	544
第十六节	毕业分配，我与杨继绳的各自际遇 ······	546
第十七节	面对这样的一纸毕业鉴定，我欲哭无泪 ······	550
第十八节	周泉缨的《必胜》，搅得 414 一地鸡毛 ······	552
1、	《必胜》及《炮打》的出笼 ······	552
2、	团派对《必胜》的态度 ······	553
3、	我与「三七战团」对《必胜》的态度 ······	556
4、	沈如槐与「东方红战团」对《必胜》的态度 ······	561
5、	张春桥、毛泽东对《必胜》的态度 ······	562
6、	给《必胜》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	564
第十九节	是是非非周泉缨，毁誉参半理论家 ······	566
第二十节	「联合总部」，联而难合 ······	570
第二十一节	414 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 ···	573
第二十二节	1.4 武斗，我拿起竹竿当长矛 ······	580
第二十三节	在罗征启问题上，我也当众说谎了 ······	593
第二十四节	两派之外，清华的第三种势力 ······	598
第二十五节	一席《多余的话》，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	601
第二十六节	高校学习班，两派最后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 ······	603
第二十七节	一封加急电报，在大武斗爆发前夕把我拽回家 ······	608

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1968.10—1980.10） ······	616
第一节	去头头学习班“投案”，被工宣队拒收 ······	616
第二节	滑稽的整党：群众把党员的关 ······	618
第三节	毛泽东 7.28 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	619
1、	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反感 414 ······	620
2、	毛泽东认可的“四不”方针让两派都失望之极 ······	623
3、	毛泽东为什么没把七二七行动预先告诉蒯大富 ······	627
4、	毛泽东对蒯大富、414、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	632
5、	蒯大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	636

6、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就将七二七定位成伟大战略部署吗 ······	639
第四节 毕业第一课，去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 ······	642
第五节 一场飞来横祸，从“积极分子”到五一六分子的落差 ······	644
第六节 “狗熊”，其人其事点滴 ······	657
第七节 为了入党，我亏了心 ······	660
第八节 四五天安门广场，中国人真实心声的呐喊 ······	663
第九章 清华之后 ······	668
第一节 公审四人帮，又见蒯大富 ······	668
第二节 清理“三种人”，风声鹤唳毛毛雨 ······	670
第三节 六四，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	673
第四节 哀思，在谢晋澄的“墓”前 ······	675
第十章 回顾与反思 ······	678
第一节 对于两派争斗，我的再认识 ······	678
1、清华文革初期史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争斗、消亡的历史 ···	678
2、两派基本都是错误的，但错误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	680
3、两派群众的政治热情、民主意识及理想主义是最值得肯定的 ···	681
4、成立「414 串联会」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	683
5、成立 414 总部是 414 所犯的最大错误 ······	685
6、一贯地自觉地顽强地抵制批判极左思潮是 414 最大的历史功绩 ·	691
第二节 关于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我的再思考 ······	692
第三节 否定文革，我的一孔之见 ······	695
第四节 拷问良知，每个国民和执政党都应认真做的功课 ······	700
 主要参考文献 ······	705

卷首语

在阅读本书之前，请您先看看下面这些话，或许不是多余的。

本书叙述的是一个原本极为普通的清华学子，先是狂热地参加了文革，继而成为一派头头，最后回归为一名普通教师和科技人员的心路历程。

如果您想在本书中寻觅清华两派争斗的内幕秘闻，您会失望的。因为我所写的基本上都是众所周知的旧闻。

如果您想看到文革亲历者的深刻反思，您会失望的。虽然我也想反思，也有点反思，但是肯定够不上有深度、有思想，仅仅是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程度。只是有人不想说，有人不愿说，有人不敢说而已。

如果您以为文章会写得很生动、够哲理、有文采、图文并茂，您也会失望的。全书平铺直叙，朴实无华，犹如一杯无味的白开水。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倾力著书呢？

首先，这是为我自己写的。回忆往事反思文革，是闲来随意想想还是落笔写成文字，认真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为自己在清华二十年间尤其是文革初期的人生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写作的过程，是我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也是对自己灵魂的再一次拯赎。

其次，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看的。他们知道我当年的言行，但是不一定了解我的内心。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一个认真的交代。

最后，如果公开出版，是写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看的。我留下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头头既非清纯可爱亦非妖魔可憎的一个实例、一个标本。我的书，对于后人后世研究文革，探究文革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可能是一块碎片、一粒微尘。

写得不怎么样，也写得很艰辛。曾保留的个人资料绝大多数已经被销毁或丢失。极差的记忆力总是把人和事弄得张冠李戴。幸好现在有网络可供查询，有别人的

回忆录可资参考。

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文革中，我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有的事情想起来还挺恶心。早已知道错了，常扪心自问，暗自追悔一下，也就过去了。真要写出来，白纸黑字，朋友尽知，头上曾经的光环和虚名因此而自毁。我写作的过程中，内心一直有这样的犹豫和矛盾。

还有，有些内心的真实想法，要是写出来，会不会因言伤友？会不会以言获罪？这也是我深有顾虑的。

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我所经历事件的真实，以及我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的真实。或许，这个在我笔下平常、平凡、平庸的我就是真实的本色的我。

本书并非自传，主要写的是我亲历的清华文革前期。写了点清华之前的事情和一些大学生活，因为那段时间形成的性格和所做过的一些事情都影响着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也写了点留校当教师和清华之后的事情，因为文革一直在发酵，我对文革也有了新的思考。

您已经看到这里，如果就此掩卷而止，我会因没太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庆幸。

当然，如果您不怕失望，愿意继续看下去，我要真诚地对您说一声：谢谢！

第一章 清华之前

第一节 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全长三十六公里的杭州湾大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它的南端就是我的故乡——宁波慈溪。后樟桥¹，这个当年不到二十户的小村庄，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家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所谓江南鱼米之乡，指的就是苏南浙北这一带。刚解放的时候，那些从山东过来的解放军战士认为这里家家都是地主，因为绝大多数人家住的都是瓦房，而在山东只有地主老财家才住瓦房的。

父亲七八岁的时候没有了爹，十几岁的时候没有了娘。失去双亲的父亲小小年纪就给地主家放牛，是苦出身。他给我讲过的令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一件事就是冬天没鞋穿光着脚放牛太冷了就踩在牛刚拉出来的冒着热气的牛粪堆里取暖。

母亲也是苦出身。外公很早去世，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女儿没法生活下去，只得改嫁。要改嫁也不能带着三个女儿一起去，只得将大女儿早早出嫁，二女儿送人当童养媳，最小的三女儿随身带。我妈就是那个大女儿，嫁给爸爸时才15岁。

父亲和众多叔伯都住在晁家（村庄名）。父亲与他哥哥分家的时候，他分得一间披间（靠着山墙盖的小房子）。生我以后，才借钱买了邻村的三间旧房。听妈妈说，从晁家搬到后樟桥的时候，一担箩筐，一头坐着我，一头是家什，就这样乔迁“新居”了。

因为父亲忠厚老实、本分勤快，被晁家的一户大户人家看中，招他到在上海开的南货店里当伙计。每天，他从徐家汇到杨树浦，来回一趟，拉着堆满货物的架子车，爬过坡度很陡的苏州河桥，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在繁华的十里洋场。可以这样说，父亲是解放前就到上海滩务工的农民工。

¹ 后樟桥这个自然村原属余姚县横河区，1979年横河区划归慈溪县。所以笔者早年填写的籍贯一直是余姚。在余姚众多杰出名人中，王阳明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他的“致良知”学说对笔者有很深的影响。

农村的贫穷，农民的节俭，尤其是父母亲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的身传言教，在耳濡目染中，既养成了我勤俭节约的好品德，也养成了对别人很小气对自己更抠门的不良习性。

还有一些因素影响了我的性格。本来在晁家与众多叔伯家相邻为伴，后因搬家到后樟桥这个小村庄里，别的人家都是同姓大族。同族内部不论有多大矛盾，对待不同族的外姓是联手同心的。我家是单姓独户，非常孤立。别人家的孩子一般都有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独子，小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照应，尤感孤单。别人家的父母都是在家的，我爸爸常年在上海打工，妈妈是女流之辈，家里没有顶梁柱，无人保护我，对我来说，近似单亲家庭。孤姓、独子、“单亲”，这种环境是城镇里的孩子、绝大多数农村的孩子都不会碰到的。这些明显的弱势使得我在村子里是最容易受欺负的。我要是与同龄玩伴闹架，总被有兄弟姐妹帮衬有父母庇护的孩子欺负，所以我从不敢主动与别家的孩子吵嘴打架。妈妈从小教我的一招是，要是有人欺负你了不要还嘴更不可对打赶快往家里跑。因此，我没有一般农村孩子常见的野性、顽劣，而是养成了农村孩子难得一见的胆小、忍让。村里的大人们都夸奖我这个小孩子有礼貌，很本分，不仅没打过一次架，连骂人的话都没说过一句。其实，并不是我生来就那么有教养，而是我没有蛮横的资本。听人说，要是一个男孩子连一次架都没打过，那长大了就算不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有点像女孩的男孩，本性懦弱，退让怯斗，缺乏男孩子争胜好强的勇敢精神。环境影响性格，确实如此。

农家的生活是清贫的。但是我家比不少邻居要稍好一些。原因是爸爸做苦力赚现钱每月有工钱寄回家。这让邻居们既羡慕又嫉妒。一般农家几乎没有现钱进账的渠道，都是靠卖鸡蛋卖蔬菜才能换来油盐，买点酱醋。

童年生活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这完全得益于爸爸在上海的卖力打拼。他长年拉货走路，小腿生疮了，没钱治疗，最后烂得小腿肚都没有了，仅包裹着一层黑皮。他的腰部有一个深陷的弹坑，那是上海淞沪抗战的时候，他在街上拉着一车货行走时被流弹击中后留下的。我相信那一定是日本鬼子的子弹。所以我对小日本向来没多少好感。

上海解放前夕，南货店倒闭，父亲失业，只得回家租田务农。土改时，邻村有划为地主富农的，我这个小村庄每家都很贫穷，只有少数几户是中农。我家的成分是贫农，三口之家分了四亩五分的田。这个成分在定的时候，父辈们并不太当一回事。后来才深刻体会到，家庭成分，那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前途一个家庭的命运的头等大事！

第二节 我的少年，在红旗下长大

我在六岁那年上的小学。

解放前的农村里，文盲多得是，基本上都是睁眼瞎子。女孩子根本就没有上学的份儿。因为大人认为女孩总要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媳妇，读书既赔钱也没多大用处。男孩一般也不会送去读书，因为到头来反正是要务农的。放牛、割草、干杂活，再小的男孩在农家也能派上用场。家境殷实点的个别中农，也只是让男孩读一二年的书，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就满足了。富农家的男孩可能会读完初小（4年）或高小（6年）。至于念初中，那是地主家少爷才有的福分。

父亲在上海虽然干的是最下等的苦活，比起绝大多数乡下人来，他算是开了一点眼界，长了一点见识。父亲切身体会到，就是因为自己没文化，不识几个字，所以只能做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要是孩子没文化，那就永远翻不了身。他发誓即使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也要让自己的独生儿子读上书，把眼睛读亮，不再是他那样的穷命。所以他立下的“宏大志向”是：一定要让我读到小学毕业！

父亲接受的新思想大大超越了他同辈的村里人，这是我的那些务农的邻居们不可能理解和接受的新观念、高境界。我对在上海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一心要培养我读书的爸爸非常感恩。这是我的幸运。

1950年，家乡解放了。那年头，小小的我也曾拿着鸟枪站岗放哨、检查路条。社会的大变革让我读到小学毕业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小学是一座庙改建的。我刚上学的时候，庙里还有供着蜡烛香火的泥菩萨呢。教室很小的。我上课的那间教室只能放二排桌子。一排是我这个年级，七个学生。另一排是另一个年级，人数也差不多。老师教我这个年级的时候，另一个年级自习或做作业，等一会儿再轮到教他们，我们自习或做作业。这叫复式教学。

好几年我们村子里上学的只有我一个人。从家到学校大约有三里地，有一段路还是沿着河岸走的。如果说许多小孩不喜欢读书，爱玩，爱逃学，我对读书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即使下大雨了，下雪了，妈妈叫我别上学了，我也非得去。做作业也很自觉，不做完作业不出去玩，甚至觉得做作业比玩耍更有趣。

学校里的图书馆，充其量也就是三五十本书，我都借阅遍了。没新书的时候，只好重借一遍旧书看看。要是爸爸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能给我带来一本课外书，那对我来说是最心爱的礼物。要知道，别人家的孩子连一本属于自己的课外读物都没有的。小学期间，我一共有三四本这样的课外书，是其他小朋友羡慕的宝贝。

学校里成立儿童团（后来叫少先队）的时候，我是靠前吸收的一批。戴上鲜艳红领巾的那天，晚上都舍不得取下。那是一条布质的红领巾。红领巾一直戴到颜色泛白，布条磨损分叉，还是舍不得买条新的。

有次辅导员告诉我们，说是过几天我们都要到北京“见”毛主席去。我要妈妈给我弄了个小背包。出发那天，到了学校里，看到大殿的地上用粉笔画着从浙江到北京的地图。我们沿着铁路线往北“走”。每“走”到一个大的城市，辅导员都要点一个同学做这个城市的介绍，其他同学补充。就这样一个下午一站站地“走”到首都。这个非常活泼有趣的队日活动，至今印象深刻。

我天资并不聪明，但是我读书很用功，成绩是中等的。七名同学中，基本上都在第四名左右。我最怕做复杂的算术题了。那鸡兔同笼的题目，怎么也立不出算式来。至于美术、音乐、体育，更是差强人意勉强及格。我没有艺术细胞。农家小孩，可能大都差不多。

小学毕业了。我妈不想让我再读书了，叫我学手艺。做木匠要力气的，怕我吃不消。做泥水匠档次太低没出息。她想叫我学篾匠。农村里，一般做手艺的比务农的家境要好不少。她也是为我的今后着想。但是我坚决不干。我想继续念书。妈妈说，你认得的字已经够多的了，还念什么书呀？我不敢反驳她，就是一句话：要读书。

爸爸支持了我。他说，算你运气好，解放了，想读就一直读吧，只要不留级。就这样，我考上了初中。那年是1954年，我12岁。

父亲的培养，自己的好学，当然是我能一直上学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是靠着共产党才翻身解放了，靠着政府的助学金，读了初中，再读高中，一直读完了大学，远远超过了父亲的梦想。因此，从小我就把共产党视为恩人，把毛主席当作救星！

我考上的初中是周巷中学。

从没见过中学，对中学的想象是中学校舍的柱子一定比小学这座庙里的柱子还要粗大。要不，怎么能叫中学呢？到了中学一看，房子的柱子比小学的还小，很失望。不过中学里同学那么多，老师那么多，教室那么多，图书馆里的书籍那么多，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从学校到家，有三十里地。一学期里，我只在期中走着回家一次。

我初一的成绩依然平平。到了初二开始学几何代数，我发现那些原来让我很头疼的算术应用题，用代数解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后来一直想，早知道用代数做那么简单，干嘛还要学算术呢？还有几何，对“ $\because \cdots \therefore$ ”这样的逻辑推导过程充满了乐趣，证明题是我最喜欢做的。这后二年，脑子豁然开窍，成绩突飞猛进，名次在班里位列前茅。

我是住校生。那个时候学校里还没有电灯。晚上在教室里上自习是用汽油灯照明的。那个汽油灯一旦点亮，特别的明亮。一个教室里一盏灯就足以把整个教室照得明如白昼。宿舍里用的是小煤油灯，非常昏暗。双层床密密麻麻，白天也

很暗。因为我常常在宿舍里躺在床上看书，小学毕业时 1.5 的视力，才过了一年，近视就达到 300 度。从此，一辈子都戴上了令我讨厌的眼镜。那时候，乡下戴眼镜的人极少。走在路上，总有人好奇，背后指指点点的，被贬称为“四只眼”。

每月 7 元 2 角的伙食，吃得很好了。有一个大厅，全校开会的时候是礼堂，雨天作为室内运动馆，吃饭时间摆上一溜方桌就是饭厅。八人一桌，一大钵菜，饭是自己到饭桶里去打的，管饱。每当传达室的老大爷手拿铁榔头走到一段悬挂着的铁条前“铛”的一声敲响时，举着筷子把饭碗端在嘴边的同学们，一齐动作，稀里呼噜的声音响成一片，场面十分的壮观！这比我在家吃饭有趣多了。我从此胃口大开。

初一后的那个夏天，因为要治我的慢性鼻炎，父亲叫我去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开眼界。那时，父亲在一家南货店烧饭。他每天忙碌到晚，我却无所事事，只能找点能找到的书消遣时间。有一天，我想帮他做点烧饭间的杂事，没想到他语气很严厉地对我说：“不许弄！”我惊呆了。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一向很慈祥的，这样厉声的呵斥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叹了一口气，态度放和蔼了，对我说：“我让你读书，就是要你做人上人的。我没文化，只好做最苦最累的活儿，难道你读书读出来后还要像我那样去烧饭吗？”我轻声吱了一句“我知道了”，就不再帮他做什么了。我那时才知道他心里是望子成龙。只要我能有出息，比什么都高兴，就是对他含辛茹苦培养我的最好回报。

在父亲的殷切期待下，我初中毕业，即将走进我的高中。

第三节 我的高中，狂热的大跃进时代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报考了当地有名的余姚一中。

上高中以后，政治运动多起来了。尤其是从 1958 年开始，那一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这在当时并称为“三面红旗”。

大跃进在工业方面最重要的体现是大炼钢铁。1957 年全国的钢产量是 535 万吨，1958 年的年中，毛泽东拍板决定当年的钢产量指标翻番，1070 万吨！全国的钢铁厂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指标。于是，全党总动员，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大搞群众运动，全民办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大炼钢铁成了全党全民最重大的政治任务。

“1070”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忆犹新，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当年重复过无数遍，还因为在大学时代我为它付出过代价。

我参加过上山找矿石。余姚城南再过去十几里地就是四明山区，那里曾经是

浙东游击队的根据地。我们这些高中生天在山上转悠，只要看到石头里有点亮晶晶的或者黄褐色的，全搜罗起来背下山去鉴定。当然，最后这些花岗岩之类的石头都扔到一边去了。

我参加过炼铁拉风箱的工作。同学们把家里的废钢旧铁拿到学校喂到高炉里，用炭火烧红了，锻打成块，就是我们向党献礼向县委报喜的成果。那高炉，也就二三米高，用砖坯砌成。没有鼓风机，就用人拉大风箱鼓风。废铜烂铁搜刮完了，就把烧饭用铁锅、翻地用的铁耙也从家里强拿出来。我不甘落后，也回家各个角落搜罗铁器，为此与妈妈吵架，说她思想落后只顾小家不顾国家。

农业方面的大跃进就是放高产卫星了，水稻从亩产几千斤到几万斤。我们都是农村里长大的，当时一亩田能有六七百斤的产量就很不错的了，没见过超千斤的。农民全不信一亩能打几万斤稻子，但是不敢说。要是说了，那就是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问题，要当作白旗拔掉的。

我们学校里放不了水稻卫星，那就创造性的放点别的卫星。学校里发起了歌颂“三面红旗”的“千首诗”运动，看哪个班级哪个同学写的诗歌多。诗歌不论长短不论质量只讲数量。于是大家挖空心思拼命写诗歌。我记得有一天我一口气写了二三十首，后来居然被评为全校诗歌创作一等奖。其实，我写的都是一些顺口溜，或者把一句长长的话拆成短句分行写的所谓“新诗”而已。

1958年，党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们学校也积极贯彻执行。

除了政治思想教育大大加强以外，学生的家庭出身变得十分敏感和重要。在初中的时候，学校对学生的家庭出身并不很看重，同学之间也不关心谁的家庭出身怎么样，所以相处比较和谐，没有因为出身而造成隔阂的。到了高中，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生干部只有家庭出身好的同学才能当，出身不好的同学入不了团，还经常会在班会上受到重点“帮助”，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

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一个县中而言，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

夏秋的双抢（抢收抢种）是农村的大忙季节。我们就到生产队去，或者到农场去，一去好几天，或者十几天。学校西边二十里地的牟山农场是我们经常去劳动的地方。

在县城东边，学校有几亩地，我们经常被派工劳动。学校里有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我经常爬到粪池底，把大粪掏到粪桶里，再挑到粪船上运去施肥。学校北面四五里有一座二百多米高的丰山，我们在山脚坡上垦荒种白薯。

暑假里回家，虽然没布置参加劳动的任务，我很自觉地在生产队里跟随社员一起抗旱、割稻、插秧、施肥、喷洒农药等。汲水的水车要四个人一起转着圈儿推。有时我一个人推得飞快，把其他几个老伯摔出去站在旁边看我一个人傻推。在收割后的水田上，我把晾晒的草垛子排得笔直一条线，老农说我认真得迂腐。耘田这活儿就是双膝跪在刚洒过粪水的稻田里，一边用双手拔草松土一边缓步移行。

有时碰到一团大粪也顾不得恶臭用手捏碎把它塞到泥土里去。这时，真真切切感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义。起初乡亲们以为我是来与他们抢工分的。后来一听我是义务劳动的，就很欢迎我了。

高中里各种运动花样繁多。我参加过扫盲工作队到农村去帮助文盲半文盲认字。报纸上提出要消灭“四害”¹，我们积极响应号召，夹老鼠、掏雀窝，干得热火朝天。

那个年代，当时说是火红的年代，实际上是狂热的年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桥梁已经造就，共产主义似乎已经触手可及的了。什么是共产主义？最形象的说法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公共食堂里，写着“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标语。没想到，几个月时间，从各家各户强行搜刮来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之后是连绵三年的困难时期，连稀饭也吃不饱了，只好吃糠吃野菜充饥。

在高二之前，我从来没当过班委，连小组长课代表之类的绿豆芝麻官都没沾过边。因为我一直是班里年龄最小的那几个人，大哥哥大姐姐们有的比我大四五岁。我能管好自己已经觉得很不错的了，从没想过要管事儿，管别人。

上高二的时候，我被任命为学生会的学习部长。这是一个我做梦都没梦到过的“大官”。从一个白丁跳过班干部这一级直接升任校级干部，有点坐火箭的感觉。我没什么喜悦，只觉得惶惶然。我找我信赖的班主任袁老师，说我从来没当过干部，现在要当学习部长，怕干不好。他说，既然学校领导信任你，你就好好干吧，别害怕。就这样，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学生会干部，并非由学生公推的，是由学校领导指定的。为什么选中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学习成绩很拔尖，在年级里一直名列三甲，尤其以几何代数语文学物理这几门主课为优，学得比较轻松。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出身贫农，家庭成分好。这样，尽管没有什么当干部的经验，还是被圈中了。

除了领导高中初中二十多个班级的学习委员以外，我有一项很具体的工作，那就是负责出版「自然园地」墙报。这块墙报是前任传下来的，名称据说是物理老师定的。我既不会发动群众，也没人主动投稿，于是写稿、编辑、抄写、贴报基本都是我一个人。报头、插画、描边是同班的一位喜欢画画的同学做的。我接手不久，把这块墙报更名为「宇宙」，自我感觉这名字更有气势。

记得有一个活动是我建议并推动的。那时学校里的同学和大多数老师课上课下都用本地方言说话。稍好一点的所谓普通话也是夹带着严重方言的“书面话”。我找到校长，说应该把推广普通话当作一项中心工作来抓。我这建议真有点不知

¹ 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来又说麻雀益多害少，被“平反”，以臭虫替之。再后来，蟑螂替代臭虫入了四害榜。

天高地厚。他说你们学生会可以试试看。于是我们规定课堂上师生都必须讲普通话，还派普通话讲得比较好的同学设“关卡”，老师学生在过关卡的时候一定要用普通话应答才能通过。我到北京后，我这个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浙江人讲的普通话居然连北京人都听不懂，可见当时我们学校里的普通话水平是如何的糟糕。

我的体育成绩很差，算不得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最优学生，但在老师们的眼里也算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间或在大会上表扬我，还组织全校的学生干部听我介绍学习经验。高二时，我因在大办钢铁的热潮中表现良好入了团。小学里入队（少先队），中学里入团（共青团），大学里入党（共产党），这一直是父亲所期望也是我所梦想的政治前途。1960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因政治思想好、对“三面红旗”积极拥护以及是校级“四好生”，被共青团余姚县委评为“五四红旗手”。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铅印在《余姚日报》上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偷偷地把这份报纸保存了好几年。在高三的成绩报告单上，我的各门课程全5分。政治思想的评语是这样写的：

听党的话，政治觉悟高，品质好，工作责任心极强，往往为集体工作到深夜；学习目的性明确，既能苦战，又能巧干，成绩优异，在宁波嘉兴两专区统一考试中，荣获本校个人第一。平日求知欲旺盛，知识领域也颇宽广；热爱劳动，能挑选最艰苦的工作，体育锻炼进步很快，已基本上扫除了文质彬彬的现象。

斗争性不够强，开展批评不够大胆，应该认识到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必须嫉恶如仇。更希望树立雄心大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崭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在此抄录这样一份评语，就是为了与大学毕业时候的鉴定做个对照。一个听党的话政治觉悟高的优秀高中生，经过大学前四年以后竟然变成了一个思想认识模糊与党离心离德的落后大学生。

临近毕业的时候，对毕业生最重要的思想教育就是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既要准备考上大学进一步深造，更要准备考不上大学回乡务农。说实话，尽管我在各种场合都表态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但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过我会考不上大学回乡务农。我想，要是像我这样出身好思想好成绩优异的学生考不上大学的话，还有几个人能考上？

学校里还大力批判只想上名牌大学的“名校思想”，拿上一届有位烈士子弟考上了省里一所比较差的专科学院闹情绪不去报到的事例做反面教材。我那时眼界很高，一门心思都在名牌大学上。爸爸听别人说上海交大很有名的，离他做工的工厂很近，要我考交大，我根本就瞧不上。浙大，是本省的，我认为也只是二流大学，更不作考虑了。看了一些高校的招生画报，一眼就喜欢上了清华那个二校门。至于专业，我不喜欢电机、土木这样的老系，也搞不懂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这些系是做什么的。也是一眼看到自动控制，就喜欢上了。

与所有其他的同学一样，心里想着考名校，但是嘴里又不敢说。学校领导一看几乎所有品行兼优的学生不敢报考名校，那也不行呀，于是暗地里来做个别工作了。袁老师是教我语文的，他认为我写作不错，建议我考北大。我对文科兴趣不大，所以我没吱声，这使他很失望。他说，名牌大学也得有人去上呀！像你这样的情况不报考谁报考？他问我是不是想考清华？我红着脸顺势说是的。他说那你就填清华呀！这样，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成了我的第一志愿。

高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紧张，我把它当作一次期终考。我自信一定能考上的。那种自信我今天想起来还有点莫名。考试结束以后，我们又到乡下参加双抢去了。天蒙蒙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晚上还要开会。干了半个多月后，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发下来了。在大多数同学还没等到通知书的时候，我的通知书到了，果真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我心里高兴极了！这兴奋之中，既有继续深造报效祖国的纯朴想法，也夹杂着终于跳出“农门”与粪桶担说再见的念头。令自己都有点意外的是，曾经被学校领导带领我们批倒批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时竟然不自觉地冒了出来。

我心想，如果我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会有多高兴呢！当我回到家里告诉妈妈的时候，她先问我北京有多远？我说总有好几千里吧。她没有一丝的喜悦，眼里涌出了眼泪。她说你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万一她要是病了，死了，等你赶回家来，怕尸体都要腐烂发臭了。那时候的我，一心想的是到北京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可以上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了，可以见到皇宫金銮殿了，可以跑码头闯世界了。年轻气盛的，根本就体会不到父母内心的苦衷和担忧。

我没报考交大，这让爸爸也有点失望。不过后来他告诉我，当厂子里那么多上海人得知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时候，都惊奇得不敢相信，对他说“依伲子（你儿子）考上清华了？勿（不）得了啊！”这让老爸好好的享受了一次虚荣，人们对他也高看了几分。

我考上清华，在家乡也成了一件颇为轰动和传扬的大事。方圆十里，本来上大学的就屈指可数，上清华的就我一个，此后多年也再没有第二人。村里老人说，要按过去老黄历，那是中了头名状元呀！是文曲星下凡啊！还有的老农问我：读书不就是认字吗，你读了十二年书了，难道还没把中国字全认完？到底中国有多少个字呀？

我沉浸在考中清华的欢乐和激动里。展望前程，一片光明。我们这一届毕业生考到北京是历届最多的。三个班级，考上清华3名，北大2名，北京其他院校6名，简直是空前绝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也兴奋异常。

在考上的同学兴高采烈的同时，我当时所不知道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景况。他们在勤工俭学的时候脏活苦活累活抢着干，说话小心翼翼不敢随便，时

时担心被批评、帮助、教育。对于高考，这些同学已经很有自知之明了，他们只挑最差的专科报考，只求能读上大学就很满足了。但是无论平时表现怎么优秀，高考成绩怎么优异，他们统统都落榜了，处在失望甚至绝望之中¹。在2005年高中毕业45周年的校友会上，我听到有位姓计²的女同学说，她头天收到舟山水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家人正高兴呢，没想到第二天又收到该校的电报，说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她一下子从天上跌入了地狱，痛哭了好几天，大病一场。还有位姓沙的男同学，人都已经到了大学里，报到时被拒。他说他当时怔怔地坐在海边，连想死的心都有，只是想到了父母亲会悲伤欲绝才没跳海自尽。我听了这些，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个人的出身，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严重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解放前农家子弟上不了学，这肯定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么解放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上不了大学，就一定是合理公平的吗？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就一定是公平的吗？我不清楚不明白的东西实在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是那个年代党的政策的受益者，我能考上清华绝非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1 与几位高中同学一起回忆，比较一致的记忆是：学生的政审是高中老师做的，家庭出身对录取与否影响极大。成绩好但出身差的落榜者比比皆是，出身好成绩一般甚至差一点的照样录取在名校。高中对学生是否录取、录取在哪类大学有极大的决定权。学生填好的志愿表是交给学校的。不合学校想法的会多次退回要求重填。有的学生可在学校列出的三、五所大学中任选一所，有的学生只能填学校指定的那所大学。有一位考上南京大学的同学听江苏的一些同学说，他们就读的高中，办法更公开透明：学校将分配到的名额全部张榜公布，让学生自己先对号入座填志愿。

2 本书中，有些人的姓是化名。

第二章 阶级斗争是大学生活的一门主课 (1960.9—1966.6)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紧张的学习，有快乐的文体。有校园的美景，有师生的情谊。有图书馆里的苦读身影，有水木清华的朗朗书声。但是与文革关系最密影响最深的是我在六年大学生活中的这门“阶级斗争主课”。在这章里，我就只叙述与这门主课有关的一些事情。

第一节 无处不在的政治思想教育， 挺过三年困难时期

即使到了1960年，在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除了我父亲及极个别手艺人，种田的村民几乎都没有去过40里开外的余姚县城。周边那些村庄里的普通农民大体也是如此。至于北京，对于那时的乡巴佬来说，是一个只听说有皇帝的金銮殿却无法想象有多遥远的地方。

我到上海转车，乘坐的是上海直达北京的学生专列。所谓专列，除了全部都是学生，还是那种碰到所有快车、慢车、货车都得靠边让道的列车。唯一的优点就是避免了中途转车的麻烦。向北，向北，五十多个小时以后才到北京站。

清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简直比余姚的县城还要大。风一刮，扬起树叶、尘土满天飞，沙子吹进牙缝里咯吱咯吱的。校园有点脏，有点乱。

我在自动控制系的604班。¹同一届有七个班。其他班级里有部长的儿子、将

¹ 关于清华学生班级的编号：当年清华有11个系，历史比较悠久是土建系、水利系、电机系、动农系、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冶金系，统称老系。1958年前后新设置的有工物系、工化系、自控系、无线电系、数力系，统称新系。老系的班号一般是以专业简称+年级（毕业年份的末位数字）[+班级序号]。如汽7，意为动农系汽车专业1967届。企92，意为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1969届第2班。新系中一般都有保密专业，所以班号以系简称+年级（毕业年份的末位数字）+0+班级序号或专业编号。如笔者所在的自604，意为自控系1966届。刚进校时，自604中的“4”是序号，大四分专业，这个“4”是专业编号。

清华的学制为6年。1960年入学的，应于1966年毕业，称为6字班，当年是大6学生。以此类推，1964年入学的，应于1970年毕业，称为0字班，当年是大2学生。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要缩短后，1965年入学的这一届是5年制，也应于1970年毕业。为与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那届相区别，这届称为00字班，当年是大1学生。

军的女儿等，我这个班级的同学中没有一个高干子弟，大多数都出身于工农家庭。

有一点是让我极为惊讶的。除了少数同学出身一般干部、中农、职员等以外，居然还有一个出身富农的。他来自北京。

我对成分非常敏感。高中的同学要是一般出身，就只能上一般的大学。要是出身不好，很难考上大学，更别提上清华了。是因为北京的高校太多北京的考生很容易考取清华，还是因为清华贯彻的阶级路线与我的高中不一样？我好长时间都没想清楚。

还有一点让我惊奇的是，班里有好几位同学是党员。

我的中学里，没有一个学生党员。一百多个高三毕业生中，即使是那些出身很好表现优异极受学校领导赏识的同学，在毕业前也没有一个人能入党的。所以，当我一下子看到班上有好几位党员的时候，心想，他们肯定是有不得的优秀啦。后来接触的时间一长，感觉其中有的各方面的表现也是平平的，并不特别出类拔萃。尽管这样，并没有减少我对党的热爱和向往，对做一名党员的渴望和追求。争取在大学期间入党，是我在政治上的努力目标。

进校的时候，彼此互不了解，班委、团支委，可能都是由辅导员及党员们商量指定的。团支部领导班里的政治思想工作，班委做一些服务全班同学的事务性工作。而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由高年级派驻到低年级的党员辅导员及年级党支部。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高考成绩优秀还是我曾经是中学学习部长的缘故，进校不久我就被指定为班里的学习委员。这让我感到自己是被组织看重的。

但是，心理上的落差还是很大。在高中的时候，我受领导的关怀，老师的宠爱，也为同学所羡慕，感觉优势明显。到了清华，来的都是各地各校最优秀的尖子，相比之下，自己并不突出。

在政治上，与班上的这些党员相比，差距不是一点点。出身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这样的出身比贫农更显得耀眼。见识上，与那些见多识广、能歌善舞的城里来的同学相比，我如井底之蛙，自惭形秽。生活上，我虽然不是那种爱攀比的人，但也深感自己的穷酸。一身家织布的衣裳，一双有扣带的布鞋（同学常笑话我这鞋是女孩子穿的），尽显我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家人。就连我说话，也是班里最让人听不懂的一个。我的“普通话”翘舌音全说成平舌音，后鼻音往往发成前鼻音，四声更是混淆不清，有时还掺和着谁都听不懂的老家土话。这种比“英语还难懂的普通话”（一位英语老师的评语）常常闹出不少笑话，引来同学善意的哄笑。唯有读书成绩这一点，才支撑着我残存的自信。

听人说高中的课程是机械的，大学的课程是辨证的。能不能学好高等数学，特别是微积分，标志着能不能跨越从高中到大学的这道坎儿。跨不过去，无论高中时的学习成绩多么优秀，到了大学里也得掉下来。所幸，我跨这道坎儿并没费太大的劲儿。一个学期以后，我的成绩就名列前茅。以后几个学年，各门成绩都以5分居多。要始终拿全班第一是不可能的，但一直都在三甲之内。后来被选为因材施教生，开设了第二外语，上了电工基础的提高班。我一直暗暗地把拿到优秀毕业生奖章作为我学习上的努力目标。

我的记忆力向来就很差劲的，所以只能依靠理解力。老师说过，读书，要把一本书读厚，再把它读薄。这由薄变厚是知识扩展、充实、积累的过程。这由厚变薄是知识消化、整理、归纳的过程。临考试前，最后要记住的往往只有一页纸的核心内容。所以我越到考试前就显得越轻松。从没开过夜车，没为考试睡不着觉。

这并不是因为我聪明。我深知，我天资平平，虽不算太笨，也绝称不上聪慧。我平时是很用功的。即使在星期天，最多也只休息晚上或下午一个单元，其他时间都泡在教室里看书复习做功课。

考分高并不等于学习好。学习好并不等于工作能力强。工作能力强并不等于一定会有杰出的成就。我工作以后，能力和业绩都是一般般，并未显出被一些人恭维为“清华高材生”的与众不同来。这与我读书比较死板思维比较单一有关。我只习惯正向思维，极少反向思维或另类思维。

进校不久，学校组织新生进行了一次红专大辩论。

红专大辩论在高中的时候就进行过一次。那次，还是由我引起的。我记得我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红与专的议论文。文章大意是说我们一定要又红又专，红要以专来体现。兄弟班的同学看到了，反映到学校领导那里，说“红要以专来体现”的观点是错误的。于是学校组织我们这一年级三个班的同学展开辩论。领导的本意是想通过辩论让大家对红专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没想到辩论一开始就以班划界了。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出于保护我，在发言中都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外班的同学全都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学校领导一再强调不要只是局限于争论我写的文章是对还是错，要围绕红与专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来辩论，但是大家的辩论依旧还是围绕我的观点对错而争论不休。我在辩论会上没敢再吭声，更不敢为自己申辩，心里有点发毛，怕成为批判的靶子，祈求辩论会快点结束。这是我第一次经受类似派战的洗礼。

有过高中那次红专辩论的教训，这次我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尽管我思想上还是认为红要以专来体现，但是我不敢再说了。班上有那么多的党员和干部，也轮不到我去积极表现。我就随着大流谈谈正面的认识，谈谈心得体会。班上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争论。在“大家都受到了又一次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的总结中，

红专辩论结束了。

我入学的时候，正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在高中的时候，大概从1959年开始，就感觉到粮食很紧张了。一边要参加繁重的农忙劳动，一边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特别能吃饭。劳动时一顿中饭就可以吃一斤米。所以平常总是有点饿兮兮的感觉。

就在我上学来北京的火车上，看到有个上海口音的学生，掰开一个白白的馒头，一闻，说是有点味儿了，随手一扔就扔到窗外去了。再掰开一个，又扔到窗外去。一连扔了好几个，看得我好心疼，只是不敢说。到了学校里，同班有一个姓侯的山东同学，他带来家里做的烙饼，连吃了好几天。最后都严重发霉了，连我都说这吃不得了，吃了会生病的，叫他扔了，他还是舍不得，都吃了。我感慨万分。农村同学与城里同学对粮食的感情，就是不一样呀。¹

大学的前二年，粮食紧张的程度，我们饥饿的感觉，都远胜于高中的时候。

对于像我这样南方来的学生，吃惯了米饭，吃馒头窝头都不觉得饱，非得最后吃口米饭才感觉算是吃饱了。但是，大米极少，面粉也很少。主食以玉米为主，早上是玉米糊糊，中饭晚饭是窝窝头。因为肚子里没油水，一天不到一斤的定量，好像整天整宿都是饿着的感觉。临吃饭前，已经饿得心慌慌，两个窝窝头吃下去，似乎只减轻了点饿的感觉，还没吃饱，还想吃。但是定量已经吃到了，再吃就要寅吃卯粮了，只好快快地往宿舍里走。走出九饭厅，那十几米的路，往往是一步三回头呀！“再吃一点点”与“不能再吃了”的两种想法斗争得非常激烈。

我在这方面还算比较能克制的，每月28斤的定量一般是不超的。每天吃不到一斤，怎么办？只能在周日少吃一顿，或者某个晚餐编着各种理由少吃一两。有个别同学，上半月吃得饱饱，下半月肚子饿饿，只得向同学借粮票。每个同学的粮票都很紧张的。偶尔一次，大家帮帮忙，尤其是女同学发扬一下风格，也就过去了。经常这样，怎么受得了？对于这极个别在自控系读书但是自控能力很弱的同学，只好由班干部替他保管粮票，到吃饭前按顿发给他，以免超支。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稀饭刚卖完，就有几个同学围上去，用小勺子把桶边的桶底的角落里剩下的一点点稀饭刮到碗里，有时候还能刮上一小碗。我记得我也刮过一二次。那稀饭有一点淡淡的木头的香味。这个时候，肚子实在太饿了，这点斯文就不讲究了，大家也不笑话。

不过，我班有一位姓廖的同学因常去刮粥而比较惨。他后来入不了党，是因为组织认为那是一种在三年困难时期表现不够坚强的行为。他心里很不服气，认为这是珍惜粮食的节约行为，又不是去偷去抢的。

¹ 这是笔者当的想法，其实是很片面的。

说起偷，还真发生过偷稀饭的事情。我班上有个同学刚买来一碗稀饭放在桌上，正好有人过来找他说话。说完话他转身一看，稀饭没了！我听得他大叫起来：“我的稀饭怎么不见了呀？”不见了，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有人拿走吃了。这当然是极个别的现象，这很难把它说成是偷。饥饿之下，对意志薄弱者，往往会做出一点损人利己的可笑事。

那几年我们多次开班会，开团支部会。组织上一再对大家进行形势教育，做思想工作，激励斗志，强调这是暂时困难，是因为我们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更是因为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加剧的。指出这是对每一个青年学生特别是对想入党的积极分子的重大考验。要我们与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我们都相信这是暂时的困难，相信这困难一定会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克服的，所以表现得都很乐观。不就是饿一点吗？那就尽量减少一点体育运动，保持体力。不就是脚有点浮肿吗？那就尽量多坐少站。

我很惦记老家的情况会怎么样。1961年暑假我回乡探亲的时候，老妈、亲友、乡亲们都告诉我不够吃，吃不饱。半粮半糠混合着不断餐就很不错的了。挖野菜、摘树叶、掘草根、采瓜秧是普遍现象。我在卫生院里亲眼见到一个老农因为吃的糠麸过多一个多星期拉不出屎来只得求医生一点点抠出来，那嚎叫的凄厉声就像是在杀猪似的。听老家的老人们说，即使是在民国的灾荒年月，也不比这更严重。

富庶的江南尚且如此，北大清华的学生都吃不饱，可以想象，那些贫瘠的偏远的共产风刮得厉害的乡村就更悲惨了。在我，当时只是感觉有点饿，我根本就不知道，同一时期，大批的饥民在这场大饥荒中倒下毙命了。

第二节 反右展览，对我重重地敲了一次警钟

大四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反右展览。印象中展览是在图书馆的一个大阅览室里举办的。那真是一堂印象非常深刻的政治教育课，

展览中所展示的清华反右运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以党委书记、校长、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的蒋南翔¹为首的“红方”与以副校长、民盟中常委、号称“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为代表的“黑方”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展览告诉我们：右派分子狂妄叫嚣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妄图阻扰党的教育路线，妄想将共产党赶出教育阵地。广大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党滥言，给他们予以迎头痛击。反右斗争最后以揪出几百名右派分子而胜利结束。

我对反右的最初印象是在1957年的秋天，那年我刚考上高中。跨进校门的

¹ 文革前，蒋南翔任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委员、高教部部长、北京市委常委、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

时候，看到有些教室外面的墙壁上还残留着暑假里集训的老师们大鸣大放时写的大字报，还有声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标语口号。那时我根本不懂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不懂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向党进攻，不懂右派分子怎么向党进攻，更不懂右派的帽子对一个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过了几年，我听说我初一的班主任老师、初中的教导主任以及教过我课的几位老师都被划成了右派。在我印象中他们都是教课认真负责的好老师，想不通他们怎么会成为右派的。我为他们难过。至于反右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是懵懵懂懂的。

这个展览把反右斗争以生动、具体、形象的形式展示出来，我深受教育。共产党是那么的伟大、正确，我心里只有热爱和感恩，为什么这些人偏要反对党呢？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感到无比的愤慨。我想，这些人一定是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抱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

现在，反右展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共产党是绝对不能反对的！谁要反党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我想，象我这样出身的人，怎么可能去反党呢？

这个展览还警示我，对基层党组织，对支部书记、党员等，也是不能反对的，不能随便提意见的。右派向党进攻中，使用了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任何对基层党组织，对支部书记、党员有不满的意见，都可以说成是这种手法的运用而上升到反党的原则高度上去。于是，都可能被划成右派分子。

看完展览，我的思想受到巨大的震撼！我庆幸反右那会儿我还小，没碰上。我还庆幸组织上给我及时教育及早警示，免得我稀里糊涂地犯立场错误。

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一个接着一个。在整个大学期间，从没间断过。“学雷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第三节 “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63年开始的“学雷锋”运动，是一次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教育运动。

学生的特点就是热情、真诚、向上、单纯。这一运动在学校里开展得尤其热火朝天。

做好事，是见效最快也是最容易具体学的“学雷锋”活动。凡是属于做好事性质的，不论在生活上，学习上，还是为群体，为别人，大家都抢着去做。

我们班刚好要去山东博山微电机厂进行专业实习。事先，班级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有文艺特长的同学，一路火车，一路宣传，到各个车厢里唱歌、打快板、表演节目。像我这样只能做点杂活的同学，不停地给旅客倒水、擦桌子、拖地板，

做得认真、积极，让列车员都插不上手。当旅客一眼看到我们胸前佩戴的校徽，我看到的是惊奇的目光，听到的是啧啧赞许的私语声。

当然，“学雷锋”不仅仅只是学做好事。雷锋的事迹是全面的，雷锋的形象是高大的，雷锋的精神是伟大的。在我们的心目中，雷锋就是一个完人，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那个时候，我们学《毛选》，学的是伟大领袖的思想。我们学雷锋，学的是光辉榜样的言行。我们都学得真心诚意，都是从正面去理解、接受和学习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这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提高了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雷锋说，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就下定决心，党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默默无闻地起到螺丝钉的作用。

那个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雷锋事迹中有没有人为拔高的成分，没有想过在“学雷锋”背后还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政治背景。组织上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沿着组织指引的方向，只做正向的简单的思维。

为了推动“学雷锋”运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都题了词。今天，我们再把这些题词拿出来重温一遍，感觉到另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含义。

毛泽东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领袖不需要说太多的话语，不必说学什么、怎么学，他就是发号召的。言简意赅的七个字，足以掀起一场群众运动，尽显领袖的伟大魄力。

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这个题词，很概括，也很虚泛。字数不能比毛泽东的更少，但是也不能太多。内容不能太虚，也不能太实。这个题词非常符合二把手的身份。

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个题词，概括了什么是雷锋精神，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全面而又具体，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周恩来的务实风格。

林彪前后有两个题词：“全军同志都应当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两个题字的共同点就是都发出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

我想，对于诸位中央要员的题词，毛泽东最欣赏的应该是林彪的题词了。因为，他的题词点出了“学雷锋”的目的，“学雷锋”运动的落脚点就是全国人民都要心甘情愿地做毛泽东的惟命是从的好战士、好学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拉下马，国防部长的桂冠戴在了林彪头上。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处境被动，林彪坚挺毛泽东，使其险度难关。林彪在部队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树毛泽东权威。作为一名普通战士的雷锋，就因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

了林彪着力树立的理想典型。这一“学雷锋”运动，对林彪来说，一是取悦毛泽东，不仅要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而且要全国的亿万老百姓都要做毛泽东的好学生。二是取代刘少奇成为新时期对毛泽东吹捧的最有力者，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最高举者，对毛泽东思想阐释的最权威者。三是通过“学雷锋”运动，早已结成的毛林政治联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和林彪号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双重号召下，这一呼一应，他们彼此共同得益。这一“学雷锋”运动发生在三年大饥荒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伟大领袖不仅对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不谢罪，反而号召全国人民像雷锋那样做他的好学生，既是重塑他已经受损的形象，掀起对他个人崇拜的新一轮浪潮，又是为他发动文革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做了绵密的思想铺垫。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堆积而成的。

善良可怜的我们，当年只会闷着脑袋在那里学雷锋，哪会知道“学雷锋”运动的背后还有很多这类的政治“故事”。

雷锋是个好同志。“学雷锋”劝人向善，总是好事。所以，即使今天，我也并不完全否定当年的“学雷锋”运动。但是，再看看“学雷锋”运动背后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效果，值得反思的很多很多。

如果说，“学雷锋”运动完全是正面教育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九评”学习就不是那么的春风拂面了。

第四节 “九评”学习，我人生的“滑铁卢”

中苏分歧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尖锐的过程。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原本坚如磐石的中苏关系有分歧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就中苏关系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此为由头，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6日开始发表一系列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批判文章。从这一天的《一评》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这九篇理论文章，史称“九评”，标志着中苏大论战达到高潮。

每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学校总要组织大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那既有革命激情又有理性辩驳的檄文以及激扬高亢、抑扬顿挫的语调，听得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热血沸腾、情绪澎湃。

每次听完广播，就要组织学习、讨论。谈认识，谈体会，激发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仇恨，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等到最后那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学校组织了一次为期好几个月的学“九

评”运动。¹

我们班里的学“九评”运动，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是学习、讨论，提高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识和觉悟。这一阶段中，可能各班讨论的议题不一样。我班争论的是阶级斗争究竟是谁（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趋于缓和还是变得越来越尖锐？我听出来了，那些党员和绝大多数同学都认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无产阶级是不得不应战。至于今后的趋势，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反抗程度，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是长期存在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书呆气，总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资产阶级要反抗，无产阶级要专政，于是就产生了阶级斗争，很难说一定是谁挑起来的。我的说法引起了大家的争论。但仅仅是争论，不是批判。因为这一阶段是正面的讨论学习，个别其他同学也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经过争辩以后只要承认自己的看法是片面的，就表示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就是收获。我也经过争辩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由于资产阶级不甘心灭亡的本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而挑起的，

第二阶段是对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清理自己在前几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思想认识。如果说第一阶段还有点坐而论道的味道，那么这一阶段这就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本人的阶段了。

学校对清理思想的重视，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中看出来：停课一段时间集中清理思想。这是我进校四年所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所谓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是毛泽东在审核《九评》时亲自加上去的：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在这一大段论述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每一条标准，毛泽东都以赫鲁晓夫作为反面人物予以警示。我后来想，难道早在 1964 年，他的内心对中国

¹ 学“九评”运动中，主要的是学《九评》，因为前面的八评已在发表的时候学过了。

赫鲁晓夫已经暗有所指？当时，全中国可能没几个人能猜得透他的心思的吧？

在这一大段论述中，毛泽东明确无误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该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显然，所谓接班，毛泽东的本意是指开创共和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第二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接班问题。这本来与我们学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在清华那帮紧跟形势、头脑灵活的党团领导的理解和引导下，革命接班人竟然成为全校师生人人都要面对都有可能接班的重大政治课题。就如“学雷锋”、学《毛选》这些运动或活动一样，清华的党团组织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这一次，涉及到反修防修，涉及到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对“九评”的学习就更为重视了。

学“九评”到这一阶段，每个人都必须联系实际、联系本人的思想。我班里的同学，在政治上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有些出身贫苦的同学从忆苦思甜入手，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位姓晁的同学饱含热泪地说：“要是没有毛主席共产党，我就像地主老财家的一条狗啊！”还有一位姓郜的同学慷慨激昂地说：“谁要是敢对党说半个‘不’字，我就要与他拼命！”我相信这些同学的话都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肺腑之言，是完全真诚的。这些充满无产阶级感情的朴素言语，经党团干部和辅导员们的一再赞扬和后续发言者的反复引用，一时成为我们班的经典话语，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这些同学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听了非常感动，也引起我的极大共鸣。我也苦思冥想，想说一两句有个性、有新意的言语，就是想不出来。上大学以来，在以往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中，我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最积极的。我努力紧跟，也只是处于中间位置。

其他同学联系实际、联系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都是表对党的忠心，表做革命接班人的决心。所谓清理思想，基本上都是谈正面认识的居多。即使谈到自己的思想，也是泛泛检查非无产阶级思想，说了一长串没什么要紧内容的话，其实不过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

小组的或全班的学习讨论会上，主持会议的党团干部们一再要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要深挖头脑中的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思想。鼓励大家，只要讲出来，就表示赤胆忠心地向党交心。讲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还严肃地甚至带点警告地说，这是对党、对革命是否忠诚的一次严峻考验。

我一直在想，我清理点什么呢？我觉得自己对党是忠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的表现是良好的，我坚信党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所以，我在发言中也与大家一样谈认识，谈体会，谈非无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不良影响等等。为了有点新意，我在发言中还举了两个例子，以此说明我在思想上曾经有过的一些模糊认识。

一个例子是，我听人说，1958年的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是毛主席为了比上一年翻一番，脑袋一拍给拍出来的。是听谁说的，我忘记了，但确实是听别人说起，我记住了，就随口说出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说我回家的时候在公社卫生所里亲眼看到有一个农民因为吃了过多的糠麸而拉不出屎，以此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的老家也是很困难的。

我还特别指出，这是我听到的看到的东西，开始有点模糊的认识，很快就感到这是错误的，我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

我发言以后，其他同学发言，各人说各人的。我觉得我的发言与众不同，真正做到了联系实际，联系本人，不是空泛的。我内心有点洋洋自得，自我感觉良好。

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党团组织辅导员们的高度重视。因为之前从来就没有人谈及这样既具体又重大的例子。他们突然发现在身边的同学中竟然有人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认识模糊立场动摇。,

会后，有党员、干部找我谈话，有积极分子找我谈心。他们鼓励我，要我把所有曾经听到过的、看到过的、一闪念想过的与党的方针政策不符合的东西统统清理出来。

我听到过的、看到过的、想过的东西确实不止这两个例子，还多着呢。水稻放卫星，亩产几万斤，农民伯伯一听，说，这不是白天说梦话吗？谁信啊？对公共食堂，男人吃不饱意见大，女人意见更大，说吃的是大锅菜，每天就这几样。说打饭回家，都冷了，吃了不舒服。城乡一体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轰麻雀，成了大家茶后饭余的笑柄。我老妈也对我埋怨过，说家里的粮食全被生产队长强行拉走了，共产了。等等。

农民都是很朴实的。他们对于不满的事情，往往乱说一气，口无遮拦，不讲分寸。他们并非恶意攻击，只是表达一种情绪。听的人也都是哈哈一笑了之。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但是我更相信党，相信党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我认为乡亲们的那些议论都是因为觉悟低，思想保守，见识少，不懂科学。是只看到缺点和支流，不去看主流和伟大成就，不懂辩证法。我对这些错误议论是有警觉的。

我竭力申辩，那些错误的议论不是我的，也不是我赞同的，我只是听到了在会上作为例子说说而已。可是我这时已经感到百口莫辩。从小，我没有敢与父母顶过嘴。上了学，我也从来没有敢与老师、领导抗辩过。当组织找我谈话、同学找我谈心的时候，谈着谈着，我在不知不觉中又谈到了一些我在老家看到听到的事情。谈着谈着，那些本来不是我的思想，我被兜来兜去的兜了进去，慢慢地似乎变成是我的思想了。最后，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在一次次的个别谈话和帮助启发下，我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组织上不断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查找阶级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我几次在小组上做检查，我成了班上重点帮助的对象。

有一天下午，有个班干部通知我，说晚上要开全班大会，教研组的老师也要来参加，叫我好好准备检查。我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咚的往下一沉。心想，我的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连教研组的老师都要来听我的检查？我真后悔我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地举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后悔一万年也没有用了。

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挤在一间宿舍里已经是非常拥挤的了，上铺也坐满了人。又来了好些老师来听我的检查，室内挤不下，就敞开房门，门外走廊上都坐着不少人。我在全班同学和教研组老师的面前做了一个我自认为是沉痛的、深刻的、系统的检查。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第一次那么大范围的正式检查。我成了一个在“九评”学习中暴露出严重政治问题的“反面教员”。

实事求是地说，班里同学对我的帮助，态度上是诚恳的，气氛也是和风细雨的，并没有对我疾言厉声的批评，更不是什么批斗。那次全班大会以后，教研组党支部一位姓杨的老师还专门找我谈心，要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记得那天是在东大操场东边空旷的小路上个别谈话的，边走边谈，足足与我谈了二三个小时。

我从高中毕业时候又红又专的优秀学生，短短四年，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思想有问题的落后分子。巨大的落差，没法不让我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那种政治压力，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体会得到，一辈子都忘不了。

可能今天的年轻人听了会很不以为然的。就这么两句话呀？最多是两句牢骚话，有什么大不了的呀？现在大家说的闲话，比这更加敏感更加放肆的，多得是呢。

是呀，现时的政治氛围比六十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宽松多了。在我读大学的年代，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态度。这是非常严重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轻一点说，是思想问题，感情问题。重一点说，或者如果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说的，那就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要是正好碰上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这就属于右派言论，定成一个右派学生或右派分子，不冤枉的。五七年不少右派分子的言论，好多还没有这两句话严重呢。

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就如同几十年后的年轻人也不会理解现在的一些现象一样，如有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或者发了几段短信，让地方官员很不爽，因而遭到跨省追捕。

今天，“三面红旗”已经被历史否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中国、对百姓造成的大伤害早已尽人皆知。有朋友对我说：老孙，看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认为“三面红旗”是错误的，真不简单！我说，你真的是高抬我了，我可没有那样的先知先觉，我当时对“三面红旗”也是真心拥护、积极投身其中的。看到不少现象，听到不少议论，想不通、不理解是有的，但是并没有怀疑和不满，更没有认为“三面红旗”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当年班上的其他同学、那些党团干部和辅导员们对“三面红旗”的

真实想法是什么。我想，凡是亲历了大跃进年代的人们，要说一点都没听到“奇谈怪论”，一点都没看到“狂热发烧”，是不太可能的。对“三面红旗”多少有点想法看法的人，肯定是有。我与他们的差别只在于他们都比我有政治头脑，比我要聪明得多。他们都懂得凡是涉及“三面红旗”的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凡是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一切，若与中央不一致的，都是不能说出口的。他们懂得这里面的厉害，懂得深藏不露，保护自己。只有我，头脑简单，特别相信“向组织交心”这样的话，傻乎乎的把看到的听到的一些犯忌的话说出来了，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儿。我说了真话，说真话就要倒霉！

过了若干年，大家对我在“九评”学习中有过什么样的具体言论可能早已忘记了，但是，“老孙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的结论性印象已经定格在每一个同学和老师的脑子里了。人，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就很难清洗掉，很难再改变。

原以为我在“九评”学习中被重点“帮助”了一下，“九评”学习结束了，这事也就过去了。其实不然。后来我才知道，组织上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呢。我在“九评”学习中的这几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一个从受组织信任、培养到需要组织“帮助”的转折，从优等生到差质生的转折，从向上升到向下滑的转折，从春风得意到坎坷曲折的转折。这是我人生的滑铁卢。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就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篇读来令我心惊胆战的文章——《文革前的清理“反动学生”事件》。文章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年毕业时被清理出来的“反动学生”王学泰先生写的，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文章摘录如下：

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毛泽东的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

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61人，分属27个院校，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反动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反修防修；二、关于“三面红旗”问题，三、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四、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五、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后，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

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这些无辜的学生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清华1964年开展的“九评”学习，显然就是在这一时段内。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清理思想是受教育的问题，而对我这样在“三面红旗”上暴露出来立场动摇、认识模糊的，如果政策掌握得严一点，就够得上“反动学生”的资格了！

一想到我那时完全有可能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送到农场劳教，那今后几十年生不如死的生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是不是还能活到今天？

真的是好险啊！

像我这样问题可大可小、定性可严可宽的学生，全校肯定不止我这一个。有的“反动性”比我还严重，但是都没有被送到农场劳教。据说，蒋南翔说过，清华的学生自己清理、自己教育，教育好了照常毕业。这一点上，蒋南翔没有死板执行上级政策，他保护学生是有功的，我从心里感激他。要是我读的是别的大学，即使我有“出身好”这一薄薄的保护层，也不见得能扛得住“反动学生”、“右派学生”的大帽子。文革中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曾经是他的一大“罪状”。

积极要求入党是一个青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能在大学里入党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我对入党充满了热情，也满怀自信。一度认为像我这样出身好学习好的学生，入党是迟早的事情，很可能会比其他同学入得更早些。

在大学的前几年，新党员的发展工作极其缓慢，好像没什么人入党。是因为

新生入学后的前几年主要着重于教育和考察？还是因为困难时期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我不得其详。

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经过学《毛选》、“学雷锋”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发展新党员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不少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陆陆续续地入了党。不仅有我认为表现确实优秀的，也有一些我认为比我条件差或者表现差的同学也入党了。每次参加新党员的发展会，我就想，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发展我入党呢？

因为“九评”学习，我在政治上遭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党组织对我的印象急转直下，我的自信心也急速跌落。但是我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我既没有对党组织有埋怨情绪，也没有对已经入党同学抱嫉妒心理。我只怪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太低，离党员的标准差得太远。有的人可能会以经常写思想汇报、找党员干部交心等形式表达自己入党的迫切心情，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无比忠诚。这些，我又不喜欢做。我只想在以后的运动中有出色的表现，重新取得党的信任，最终跨入党的大门。

不久，大学时代最后一次锻炼的机会，表现的机会，入党的机会终于给我等来了，那就是“四清”。

第五节 怀柔“四清”，“三同”做得好是远远不够的

1962年下半年，困难的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毛泽东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于是，第二年，就在农村掀起了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过了一段时间，在作为“社教运动”纲领性文件的《二十三条》¹中，“四清”的含义已经扩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样更宽的范围。

本来，农村“四清”与我们大学生并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这一《谈话纪要》震惊了高教部。于是，在1965年秋天，我们这些已经学完了全部课程本来应该进行毕业设计的大六学生以及大五大四的共七千人，都到农村参加“四清”去了。

¹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作为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该文件共有二十三条，所以当时简称为《二十三条》。

就在一年多前，即 1964 年 5 月份，我们班曾到昌平小汤山阿苏卫大队参加了三个星期的“四清”。当然，那次只能算是见习，但也是一次锻炼。在这次正式下去之前，我们又多次听报告、学文件、参观展览、开讨论会，预先做足了功课。王光美在河北抚宁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的“桃园经验”，曾经是我们学习过的典型材料。那种像敌后武工队进了敌占村，扎根串连秘密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神秘而紧张的对敌斗争气氛，让我对未来的“四清”充满了幻想和期待。

1965 年 9 月 13 日，我来到北京郊区怀柔县的城关公社白庄大队。大队地处怀柔水库的西北角。

这个大队共有四个小队。我们这个工作队一共有 7 个人，其中有三名党员。我原以为我只要跟着别人吩咐的干就是了，没想到被安排做了第二小队的包队。所谓包队，就是派驻在这个小队里，把这个小队里的“四清”工作全包下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独自一人开展过社会工作，心里没底，很有点胆怯。

一个别人不会碰到而对我来说严重得像拦路虎一样的问题是，即使我泡在北京这样的普通话堆里经过五年不算短的熏陶，我说的普通话还是实在太烂了。与朝夕相处的同学说话他们还经常听岔了，更何况是北京郊区的农民。记得初次去一个老乡家吃派饭¹，大妈听不懂我说的话，没办法，找了隔壁的大爷来陪我说话。大爷也听不懂我的话，我说了几遍，他不仅没听明白，反而把我的意思听拧了。我闷头吃饭，他低头抽喇叭烟，场面实在尴尬。有一次，我向社员宣讲《二十三条》，他们对我说的话连大意都没听懂。有一个社员俏皮地说，这个老孙真不简单，做报告都用外国语，说得溜溜的。我听了，哭笑不得。

我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多说话多交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连比带划地，我这个“假洋鬼子”总算能让老乡听懂我的大概意思了。

下去“四清”的时候，领导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打成一片。

对于从农村里来的我，做好“三同”是我最有信心的了。尽管具体做起来，还是有不少没料想到的困难。

同吃：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五类分子”²家，一家一家的轮流吃，吃完以后留下粮票和饭钱。我们这样做大受老乡的好评。他们说我们这一茬工作队与以往的不一样，以前上面来人，都要好吃好喝，还要白吃白喝。我们吃的完全与老乡平时吃的一个样。主粮是玉米、红薯，面食极少。对于刚刚经历过困难时期吃不饱的岁月，我吃得差一点无所谓，能吃饱就满足了。老乡们卫生习惯太差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在有几家吃饭，我都看到饭碗上还残留着上一顿别人吃过没洗干净

¹ 每天轮流着在生产队指派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叫吃派饭。

² “五类分子”，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即地、富、反、坏、右）。

净的玉米糊渣渣。尽管心里一阵恶心，一想到这是阶级感情的问题，也就眼一闭，照吃不误。

同住：我们四个男队员一起住在一户老乡家的大炕上。为了真正体现我们与贫下中农一家亲，我常到饲养员、保管员大爷那里，与他们在一个土炕上睡。那炕上到处都是虱子，咬我，还钻到衣缝里安家做窝。开始时，痒得我满身抓，一边掐虱子一边起鸡皮疙瘩。后来我也慢慢地习以为常了。

同劳动：开始时，队长好意，分配我与妇女在一起干点轻活，我主动要求与男劳动力一起干。我并不强壮，北方的农活也不顺手，那就学着干，不偷懒。后来平整土地的时候，我能把独轮小车推得滴溜溜的跑得飞快，一点也不输于村里的壮小伙子。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都夸我“三同”做得最好，肯吃苦，没有一点工作队员的架子。那段时光，要不是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那黝黑的脸庞、破旧的衣裳、满脸的胡子茬，外表上与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了。有位大爷闲聊时问我：“老孙，您多大啦？”我当时是24岁，我故意对他说我已经有42了。他听了说：“呵，看上去不太显老呀！”这让我笑得晕翻！

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我喜欢与大家一起干活。但是一想到工作队领导嘱咐我们的，“三同”不是目的，是手段。是要利用“三同”的机会接近群众、发现骨干、了解生产队的真实情况、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心里带着这样的大任务去参加“三同”，也就不轻松了。

晚上的时间，如果工作队不开会，我们都要到老乡家里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时间。我常常为今晚到哪家去、聊些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发愁。

整个“四清”运动划分为几个小阶段，从宣讲政策、通过访贫问苦摸底排队、确定干部和生产队是哪类的，到组织阶级队伍、干部“上楼”交代与“下楼”检查、开展对敌斗争、健全党团和民兵妇女青年等各类组织、整改等等。在这些“四清”的主要环节上，因为我的能力实在有限，相比其他几个包队，我是做得最差的了。

幸好我包的生产队里没有走资派¹，没有严重的“四不清”干部，总体而言，是个不算很落后但说不上很先进的小队。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农村常见的生产队长作风简单粗暴，有点多吃多占的毛病，党员没起模范带头作用，社员积极性不高这类问题。

搞“四清”，就是搞阶级斗争。有走资派的要揪出来斗倒斗臭，没有走资派的，也要让社员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因为“四清”的第三个阶段叫对敌斗争，

¹ “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

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

我包的小队里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说句老实话，我倒并不是看着他们可怜，而是觉得十几年的历次运动，已经把这些地主富农敲打得相当老实的了。如果说解放初期他们还想变天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被整得沉默寡语、唯唯诺诺，基本都死心了。你指派他往东他决不敢往西，在生产队里没人愿意搭理他。这样的思想当然是右倾的，是阶级观念不强。我不断地学《毛选》，学文件，提高认识。为了阶级教育的需要，我把土改时期的老积极分子发动起来，把历史材料再加点新的材料一起整理出来，准备开斗争会。

有一天，几十个社员坐在一个大炕上，地上站着已经习惯了批斗的地主富农。大家又是声讨，又是控诉，还高呼口号。我是现场“导演”（工作队的领导是幕后“策划”），其他的人都是“演员”，有的演正角，有的演反角。对于打“死老虎”，大家没有丝毫的顾虑。群情激昂，批斗会开得很成功。

我心里着实“感谢”这两个反面教员，给群众作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要是没有他们俩，我的社教运动连一点点的亮点都没有了，不知道该怎么走过场。

在开斗争会的时候，我心里闪过一个怪怪的念头：要是再过十几年、几十年，这些地主富农都死光了，再搞运动，批斗谁去呀？难道接着批斗他们的儿子、孙子？

就在这次“四清”中，我认识了刘菊芬（自7）。她是我们大队的工作队队长，与我是同系的低一届同学。

她是党员。能当工作队的队长，我想肯定是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很有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

确实，党员就是不一样。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那是肯定的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思路清楚、作风干练、有政策水平、处处以身作则。像我这样一个在政治方面很幼稚，工作能力也很弱的人，对这样精明强干的队长当然是很佩服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她也就是与我班上那些政治上很优秀的同学一样，没太多其他的不同。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听其他的队员在议论，说刘队长的爸爸来看她了。小车没开到村里来，远远地停在村外。

“她爸爸是谁呀？”我傻乎乎的问。“是刘宁一啊！”我一听，吃了一惊。

我知道刘宁一。他当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我非常惊讶。原来刘菊芬是高干子女啊！我惊讶她是那么大高干的女儿，更惊讶她是高干子女而我一点都没感觉出来她是高干子女。

在清华，有不少高干子女。我们自控系，高干子女可能更多一些。我们年级里就有不少部长、将军的子女。虽然我的班级里没高干子女，但是我对同年级的多少有点了解的高干子女的印象都不佳。他们比较傲气，夸夸其谈，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不认真学习，成绩都比较差，有个别的留了一级再留一级一直留到8

字班去了。热衷于谈恋爱。生活上不知勤俭。我想，他们光明的前途与幸福的命运早已是安排好了的，来清华，不过是镀一层金而已。哪像我们，一切全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所以，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刻苦，很勤奋，大学期间，极少谈恋爱的。

高干子女可能瞧不起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因为是土包子，没多少见识，除了读书以外没什么其他的爱好兴趣。我对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也同样对他们不服气。

刘菊芬是我第一个直接接触过的高干子女。在她的身上没一点高干子女的不良习气。她非常朴素，朴素到连我都认为她太寒酸了一点。她很正直，很真诚，很谦虚，很热情，没有高干子女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没有队长的架子。

我从心里对她表示尊敬和钦佩。接触了她，我开始怀疑我对高干子女以偏概全的认识是不是一种小农意识的偏见？

春节的时候，队里其他的同志都回城过节去了，我主动要求留下来留守。这样，我第一次在北方过了一个农家春节。我给乡亲们写了许多春联。字虽然不算漂亮，但是我写得很认真，字也比较端正。大家夸我写得跟字帖差不多，让我很有点喜滋滋的满足感。尽管地属北京，靠近县城，农民的清贫令我印象深刻。不少农户家里家徒四壁，家当一目了然，比起我的家乡，更贫穷许多。于是我心中更增添了几分对我现在的生活要知足、对党要感恩的情感。

开春以后，“四清”进入到整改的收尾阶段。

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要我马上回学校，把这里的工作移交给一个新来的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想有始有终地把整个“四清”都搞完。另外，在来搞“四清”前，我心里暗暗想着要好好表现，争取在“四清”运动中“火线”入党。我们这个工作队里已经发展了两位队员入了党，没有我。我不是不努力，实在是水平不够，能力有限。我知道我这样的表现和这样的工作成绩还达不到入党的标准。

我提出希望继续留在这里直到“四清”结束的要求没有被批准。组织上要我服从命令，我只得遵命返校。

离开了“四清”这个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迎面而来的是批“三家村”这个文革的前哨战。

第六节 批“三家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

1966年4月2日，我回到了学校。我班里还有个别同学因身体等原因没参加“四清”，我与他们一起在教研组里做毕业设计。

回校没多久，系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留校考研究生。

我听说过大学毕业以后还能继续读研究生的，但是不知道研究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给我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我读了 18 年的书，似乎还没读够似的。想想自己年龄尚小，能继续深造也是不错的。于是当场就做出决定，表示愿意考研。过了一些日子，拿到了准考证。

过了几年，也就是我留校当老师以后，教研组里的老师（昔日的老师如今成了同事）告诉我，说教研组的领导、老师早就相中了我，不管我的研究生考试成绩怎么样，教研组肯定会录取我的。因为他们对我的学习能力很了解，不会受研究生考试成绩影响的。

我猜想，回校参加毕业设计和准备研究生考试，大概都是领导有意安排我从“四清”一线提前返校的原因吧。

后来，陆陆续续的，从“四清”回来的同学多起来了。至五月底，相当多的同学都返回学校了。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我还在怀柔搞“四清”，对这样的重头文章毫不知情。回校后，在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前线》上不断刊登了一些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严重关切。

5 月 10 日，姚文元再次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评“三家村”》一文，把《三家村札记》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既然问题说得那么严重，大家赶紧找来那些大毒草与批判文章一起对照着看。

我以前没有看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文章，但是我很喜欢这些短小精悍的杂文体。我从接触鲁迅杂文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杂文。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篇名叫《专治健忘症》的杂文，讽刺有些人好得健忘症，对那些患了健忘症的人，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其清醒。还有一篇叫《一个鸡蛋的家当》，讽刺的是一个只有一个鸡蛋的人梦想发大财，最后连一个鸡蛋的家当都没保住。

杂文如匕首投枪，击中对手的要害。但是杂文的文字比较隐晦，难以看懂讽刺的是什么，矛头所向何在。

批判这些杂文的文章，都指出作者不怀好意，借古讽今。他们批判说，这些文章都是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和无耻污蔑。

我班里的同学政治敏感性很强，对报纸上的批判深信不疑。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的同学找来一些报纸和杂志，看到有毛主席的图片，就对着阳光看背面是不是有刀枪等凶器指向伟大的领袖，或者有隐含着恶毒攻击性的文字。

按理，经过“九评”学习的惨痛教训，我应该学乖了。我应当附和大家的看

法，赞同大家的观点，也表现出对阶级敌人义愤填膺、对党忠心耿耿的样子才对。但是我脑子里在想，杂文呀，漫画呀，本来就是用来针砭社会弊病的。文章又没指名道姓的讽刺党，仅仅是一般的议论而已，为什么一口咬定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

本来是心里想想的，没憋住，就说出来了。我说，我怎么看不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呢？

后来我想，我真该给自己掌嘴！我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幼稚、糊涂、迟钝啊！

如果说我比先前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我这话不是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的，而是在宿舍里大家随便议论的时候随口说的。

其实，这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有心人已经把我的话记在心里去了，说不定还记到小本本上去了，而我却浑然不知。

类似这样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因为我的思想认识没有跟上形势，肯定会冒出其他不合时宜的话。我之所以对这篇《专治健忘症》以及因它发表的议论，即使对于我这个极其健忘的人来说还能清晰记得而没有忘记，是因为日后这也成了有人揭发我、工作组整我的重要材料之一。

到五月下旬，政治运动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各种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也很多。其中，“北大贴了大字报了”是最轰动的消息。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宣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大幕，也在事实上提前终结了我的学生生活。

第三章 文革爆发 蒋南翔倒台 工作组反蒯 (1966.6—1966.8)

第一节 保蒋还是反蒋？都有道理很难抉择

就在离我毕业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6月1日，从这天开始，中国进入了十年文革动乱，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当时的中国，经过共产党十七年的经营，是一个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经过党的多年培养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为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时刻准备着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有这么一群青年学生做先锋，只要领袖划一根小小的火柴，革命的烈火就会立即被点燃，迅即在中华大地成燎原之势。

现在，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听到了这是党的号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召唤！我心中的一腔热血在沸腾！

就在几天前，风闻北大有人贴大字报了。清华北大是近邻，人员往来很便捷。哪个学校有点重大的事件发生，另一个学校基本就在第一时间知晓了。我到北大去看过热闹。不过没看到什么大字报。听说都移到室内去了，不对外开放。

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明确地把北京大学定性为“三家村”黑帮¹的重要据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些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北大的上空，也震撼了消息纷传的清华。

¹ “黑帮”，是文革中常用的一个称谓。凡是或怀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称为黑帮。

未名湖闹翻了天，清华园也如炸开了锅。

每一个清华师生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那么清华呢？陆平这个北大的校长被罢官了，那么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呢？清华究竟是“延安”¹还是“西安”？蒋南翔是姓“马”（马列主义）还是姓“修”（修正主义）？

一个从来就没有思考过的尖锐问题，突然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学校里陆续出现了一些怀疑蒋南翔姓“修”、怀疑清华党委是“西安”的大字报。

清华是蒋南翔 1953 年担任校长后苦心经营了 14 年的根据地，号称是“一架不漏气的发动机”。党委依靠其强大有效的政工系统，组织力量对一切怀疑蒋校长姓“修”怀疑清华党委是“西安”的论调，坚决地予以迎头痛击。辅导员们、各级干部们、党团员们、还有数量众多的积极靠拢组织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们，立即被动员起来，马上贴出了一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校长的大字报。声势浩大，顷刻就把那批怀疑的大字报给压了下去。

那几天，没有人来找我。可能是党团干部们太忙了，忙得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可能是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思想认识本来就非常模糊的人，在紧要关头怎么能作为积极分子来依靠来使用呢？他们压根儿就没指望过我。或者，他们瞄着的眼睛也并没有完全忘记我？

虽然没人找我，我自己一点也没闲着。我成天在看别人写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的两种观点截然对立，我看了觉得似乎都有理有据，都很有说服力。

那些保蒋的大字报，列举了清华在党委在蒋校长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种种伟大成绩，以说明清华党委是红色的“延安”，蒋校长是坚定姓“马”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到的。

我一直受到党的恩惠、组织的培养、老师的教导。学《毛选》、“学雷锋”、学焦裕禄等等活动，都使我觉得我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成长的。尽管在“九评”学习的时候，心里有些委屈，那也是因为自己的思想认识有问题，立场上不够坚定，多亏了组织的及时帮助、挽救，才不至于犯更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党委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我这个工农子弟的政治迫害。我从我这个例子中正说明清华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那些怀疑的大字报也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清华党委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正在培养着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这些事例我相信也是真实的。但我总觉得那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¹ 延安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首府，用在这里表示革命。西安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北的大本营，用在这里表示反动、反革命。

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是前进道路上正在克服着的问题。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用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在此时不知不觉中发挥着作用。

所以，我的基本倾向是相信校党委，是保蒋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又难以想通的。清华与北大，同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同在北京，同受高教部蒋南翔部长的直接领导，执行的是同一条教育路线，在我看来，清华与北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北大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堡垒，清华怎么可能不会像北大那样烂掉而独善其身呢？从这样的理性推导得出结论，我觉得清华党委和蒋南翔都应该有严重的问题，都难保的。

学校里，怀疑校党委与坚信校党委，反蒋与保蒋，开始了拉锯战。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没几天，怀疑的反对的大字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过不了二天，听说钱伟长这些老右派们看到反蒋的大字报，笑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句大家熟知的毛主席语录。既然反蒋是让敌人高兴的事情，那肯定是错了。那些保蒋的人借此大做文章，把当前学校的形势与五七年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反右展览对大家的教育实在太深刻了。于是，保蒋大字报的气焰高涨起来，反蒋大字报收敛了不少。

还有的大字报认为党委是正确，但是蒋南翔可能变修了。我想，蒋南翔作为清华党委书记，他要是变修了，这个党委的班子肯定也烂了，即使有好的也是极个别的。要是蒋南翔是姓“马”的，那么党委应该是“延安”，这个班子里即便有坏的，同样也是个别的。所以，清华党委究竟是“延安”还是“西安”与蒋南翔是姓“马”还是姓“修”，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那几天的形势变化实在太快，简直是一天一个样。

我忙着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没写什么大字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表什么样的态。感性上的保蒋与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

尽管我一直摇摆着，但是慢慢地，我觉得校党委、蒋南翔都是应该保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要是清华党委都信不过，那相信党就是空谈的了。五七年的右派不正是用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手法来反对党的领导的吗？

大概是到6月8日，我终于倾向保蒋了，我准备要写表态的大字报与那些誓死保卫校党委的主流派站在一起了。

正当全校师生在有关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辩论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还没有形成基本统一认识的时候，6月9日，从高教部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蒋南翔被停职检查了，他被罢官了！

这一下子，保蒋派全蔫了，反蒋派都笑了，摇摆不定的中间群众呆了，而像我这样刚刚拿定主意就要选择保蒋立场的人懵了。这形势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也太突然了！我在最后的时刻，尽管还没来得及行动，但在思想上已经站错队了！

蒋南翔真的倒台了，清华党委真的“修”掉了。有些上个月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准研究生”们把准考证烧掉了，以示与蒋南翔的旧清华划清界限。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毫不迟疑地把那张原来珍藏起来作为纪念的准考证拿出来当众烧掉了。原以为报考研究生是组织的培养，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时忽然感觉是上了蒋南翔的当，是在迈向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我以绝大多数同学无法模仿的举动表明我坚决拥护上级决定蒋南翔停职检查的政治立场和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的决心。

在大字报区我看到有这样的大幅标语：热烈欢呼“蒋”家王朝覆没了！当然，这是指盘踞清华的蒋南翔王朝覆没了。

蒋南翔是被清华师生揪出来的吗？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也有争论但是没有答案。到后来才知道，蒋南翔显然不是被群众揪出来的。那时候学校里保蒋的势力还大得很，绝大多数师生都不相信反右时候的坚定左派、高教战线上的掌门人怎么可能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蒋南翔是被上面什么人抛出来的。什么时候把他抛出来，取决于时机。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写明了“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大概这个时候蒋南翔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倒台是迟早的事。当熊熊的革命烈火往上烧烤的时候，舍车保帅成了一些人惯用的伎俩。

第二节 贴了同班同学的大字报，羞愧难当

那些天，全校师生思想混乱、人心浮动、小道消息满天飞，清华园，如同经历了一次十二级地震。很快，北京新市委给清华派来了工作组，替代校党委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一个基层单位出了严重问题，按照惯例，上级总是要派工作组去处理的。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不久，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接受起来十分自然。

既然上面宣布了蒋南翔停职检查，工作组进校代行领导权，清华原有的党政机关团委学生会等等像是失去了主力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于是，批判蒋南翔、批判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呼啦啦地占据了压倒优势。保蒋南翔保校党委的大字报，几乎绝迹。在形势完全明朗化的当下，前几天还在使劲保校党委保蒋的，现在不敢再吭一声。那些反蒋的，还有大批中间群众，这个时候争先恐后地写大字报，以表示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紧跟。

我与班里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应该写点什么样的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的大字报。议论过后，他们叫我执笔起草。在他们的印象中，好像我是很能写点文章似的。我不知道怎么会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可能是我在“九评”学习做检查的时候用心写的那篇发言稿，写的有点条理？其他场合，我好像并没有表现出有这方面的长处。

本没有什么文才，听到几句怂恿我的好话，我那好表现自己的冲动和欲望被激发出来了。既然叫我执笔，我就不再推辞，欣然受命。于是一篇洋洋数张的大字报很快就被我炮制出来了。

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篇大字报写了点什么内容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阶级路线方面的表现，我在大字报上举了一个这样一个例子：说我班上有一位出身高级职员的上海漂亮小姐来清华上学的时候，穿着布拉吉，拉着手风琴，抱着洋娃娃，一派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里指的是我班一位姓冉的女同学。虽然没点名，但是我班上海来的女同学就她一人，班里的甚至同一年级里的同学都知道这是在说她。这素材是别的同学提供的。入学的时候我与这位女同学并不在同一班，根本不知道她的这些事情。我把这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就像是亲眼看到似的。

这篇贴在 12 号楼附近的大字报，我们系里的同学可能都看到了。我现在想来，这篇大字报当时对这位当辅导员的女同学肯定造成了很重的思想压力和很大的精神伤害。

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觉愧疚。在毕业以后的几次同学聚会上，只要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这件让我脸红的事情。

当然，如果要为自己辩解，“理由”很多，俯拾即是。最冠冕堂皇的一条就是，我本意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没做好，伤害了同学。

工作组陆陆续续进校以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些学生揪斗各级干部的现象。

职位比较高的干部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上的黑帮，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

还有不少做学生工作的党团干部，有的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紧张，也往往被当做黑帮爪牙冲击批斗。

我亲眼看到一位电机系的女老师，可能也是个辅导员吧，被剃了阴阳头，脸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她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脸肿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睁不开。

12 号楼东边是一条通往主楼的大马路。在与 11 号楼之间有一个七八平米大小废弃的水泥板平台，这时成了天然的“斗鬼台”，不时有干部被当做“牛鬼蛇神”拉到这里进行批斗。

戴着纸篓做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小木板，上面写着打了叉叉的名字，脸上

涂满了黑墨水，有的剃了阴阳头，被一群人押着，呼喊着革命口号游“街”示众。这是当时清华园内常见的现象。热衷于这样革命行动的，以低年级的学生为多。

我心里有点怀疑，难道这真的是革命行动吗？

我知道这都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斗争土豪劣绅的办法照搬过来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也不敢怀疑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有没有错。但我总觉得这么照搬几十年前的做法，把干部都当作土豪劣绅来揪斗，似乎有点不适当。但是，疑虑归疑虑，哪敢说出来？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教研组老师对教研组领导的批斗会。

大概是因为看到别的教研组都在批斗的缘故，我们教研组的一些老师串联了一下，也要过过场，要不，显得太跟不上形势了。这个批斗会，通知我们部分高年级学生参加了。

教研组主任做了检查。下面有老师领着呼了几句口号。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最多是敦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之类的话语。会开完了，这个场也就过了。毕竟是同一个小单位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张，教师的政策水平也要比同学高得多。

第三节 蒋大富的“干扰”，引起工作组的警觉

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以后这几天，北京市新市委派出以叶林¹为组长、周赤萍杨天放为副组长的500多人的庞大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代行党委职权，领导文革运动。

仅仅几天功夫，要从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抽调近万名干部进驻北京那么多的大专院校，工作量够大的，任务够紧急的，效率也够高的，真的如消防车救火、救护车救命一般。

问题是，这批工作组到清华，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我们下乡搞“四清”的时候，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的。既有中央文件可指导，又有先前的典型能借鉴。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只是因为没什么工作经验感觉心里没底，上级领导是胸有成竹的。

而这批工作组来清华之前，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如暴风骤雨般的文革运动，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有哪些中央文件可指导他们？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针政策？准备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对清华情况有什么样的了解？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能回答一二吗？

¹ 叶林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周赤萍时任冶金部副部长，杨天放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刘少奇后来（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上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¹指派工作组的最高长官都不知道如何搞文革，下面的人就更是天晓得。

周恩来在8月4日的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也老实承认：“我们是仓促决定、仓促上阵，仓促派了工作组，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没有很好的交待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甚至党的政策也没有交待。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各部门、全国调来，也没有经过学习讨论，又没有详细的交代过政策，交待任务。”

从学生方面说，在校党委垮台以后工作组陆续到校之前，没有人直接领导他们了，他们当然更不知道下面的运动该怎么搞。游斗干部是部分学生无组织的自发的“革命”行为。

工作组打的是一场遭遇战，一场大兵碰到秀才的遭遇战。新市委给学生派来了一个“婆婆”，一个不知道如何当“婆婆”的“婆婆”。

那些工作队员，大多数都是原来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儿，既看不惯号称斯文的大学生那种有点野蛮的行为，也对同为基层干部遭批斗有一种自然的同情。有的工作队员怕挫伤了学生的革命积极性，隐忍不说，有的工作队员就直言不讳了。

“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可以这样做。”[4-P15]这些话一经个别工作队员说出口，就迅速公布在大字报上，在校园里流传。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与部分激进的学生发生了顶牛。

校园里马上出了一些大字报，如《北京市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等等，刮起了一股小小的对工作组不满的、怀疑的风潮。

在这股风潮中，蒯大富（工化9）也参与其中。他说不上是最早最积极的，但也是相当早的。6月16日，他就贴出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4-P17]

实事求是地说，这股风潮只是少数思想比较激进的学生对工作组没有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表达的不满情绪，既不代表大多数学生的意见，也没有达到反工作组那样严重的程度。不过，这确实标志着危险的火苗已经冒出来了。

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那容得学生对工作组表示丝毫的不满？要是听任这样一种不满情绪蔓延，工作组还怎么能领导清华的文

¹ 在网络上可检索到刘少奇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周恩来8月4日、8月22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化大革命？退一步说，连能否在清华站得住脚也成问题。于是，工作组毫不示弱，在把全校几百名干部轰上“楼”（打倒或靠边站）的同时，组织大字报对这股“歪风”进行反击。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陷入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困境。

6月21日，王光美以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名‘普通工作组员’（自称）”[4-P20]。这是她的“谦虚”之词。她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顾问。所以，她是刘少奇在清华的眼线，也是清华工作组幕后的实际操纵者。十分凑巧的是，她蹲的点正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从此，王光美与蒯大富，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冤家对头。

更凑巧的是，本来那天下午王光美要去蒯大富班参加座谈会的，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王光美没去。蒯大富错把另一名来参加座谈会的工作组员当做王光美了。蒯大富感觉是上了当受了骗，懊恼得很，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于是贴了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4-P20]

那几天，对工作组贴大字报的，还有不少。为什么拥护工作组的人独独挑蒯大富在大礼堂进行大辩论？我想，那是因为又是在这个凑巧的6月21日，蒯大富在刘才堂（工化9）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4-P20]这段批语够厉害的。这种涉及到夺权的话，在其他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上都不曾提过。

对于工作组来说，学生提点意见，表示点不满，已经是很伤面子难以容忍的事情了，要挑战工作组的权威性，妄图向工作组夺权，那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绝对不能退让半步的。

蒯大富的这段批语触到了工作组最敏感的神经。工作组认为，以蒯大富为首的这批人就是想夺工作组的权，而且背后极有可能有后台。蒯大富后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10]

6月24日，由工作组策划、由校革筹主任贺鹏飞主持的一场大辩论在大礼堂举行。一方是蒯大富及他的两个同伴，另一方也是三位同学，代表要与蒯大富辩论的那些同学。这一天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表明只经过短短十余天的时间，工作组就倾全校之力，对蒯大富一伙进行严厉的批判。工作组的斗争矛头就此从“斗黑帮”完全地转向“反蒯（大富）”。工作组沿着这个错误的方向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¹

¹ 所谓正确与错误，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当年认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蒋南翔为首的黑帮是正确的，反蒯是把矛头指向了群众所以是错误的。现在看来，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以蒋南翔为首的黑帮”同样是错误的。

第四节 6.24 大辩论，工作组色厉内荏败给蒯大富

6.24 辩论那晚，我也想到大礼堂里看现场辩论的。大礼堂里人满为患，我不愿意戳着挤着听，就回宿舍去了。

那晚，蒯大富邀集了两个同学，目标是为追寻“王光美没有参加蒯大富座谈会的真相”而来的。这本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小问题。双方只要把各自所掌握的情况往台面上一摆，事情就很清楚了。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阴谋，仅仅是一些误会和某些巧合而已。

工作组方面似乎对澄清真相并不感太大兴趣，也没花多大力气去澄清。他们组织人找蒯大富辩论的目的是为了重现五七年反右斗争时“引蛇出洞”的故伎。工作组在这个时候开始耍阴谋了。因为他们已经把蒯大富定性为向党夺权的右派学生、反革命分子。辩论会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打掉他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树立工作组的绝对权威。。他们集中了全校的力量，足足准备了一整天。工作组方面大权在握，人多势众，蒯大富这边势单力薄，看上去，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辩论会。但是，在大礼堂这一方舞台上，倒是蒯大富显得侃侃而谈，毫不胆怯。工作组虽以势压人，甚至工作组领导轮番上阵，仍然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台下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抱着想弄清楚事情真相来的。看到工作组挥舞着大帽子想压服蒯大富，多有不满。尤其是周赤萍的一句“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这样大言不惭的话，让他在满腹经纶的清华师生面前丢了颜面。俗语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次是反过来。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兵（后来才知道周赤萍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碰到清华这群咬文嚼字的秀才们，即使自以为有理也说不清了。

第二天，我看到在礼堂的大字报区，贴满了评论这场大辩论的大字报。嘲笑周赤萍发言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力挺蒯大富的大字报明显占了优势。不过，到下午，情况发生了逆转。《无限信任工作组》、《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工作组组织的大字报占了压倒多数。清华开始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的运动。

上级发话了，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的批语是反革命的。”[4-P22] 蒯大富被定性为向工作组夺权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叶林要求全校师生表态，究竟是站在工作组一边还是站在蒯大富一边。这成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第五节 我对工作组不满意，对蒯大富也不信服

想想自己“四清”分到几十户的小队里，熟悉大致的情况也要十来天。现在工作组进清华才那么几天，我觉得工作组一开始说的做的并无大错。譬如，低年级学生的那些过火行为就应该劝阻的嘛。当然责怪的话不要那么直白。这里是大学生，不是工人或社员。譬如，把清华所有的干部统统赶上楼，先靠边站，我认为也没错的。我们搞“四清”的时候，对一个“烂掉”了的单位（即领导班子有严重问题），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没“烂掉”，干部也是先“上楼”（先挂起来，仅保留安排生产的权力），再“洗澡”（检查的意思），然后再“下楼”（解放的意思）的。

我甚至对那些贴工作组的大字报还有点反感。工作组才来了不几天，情况还没怎么熟悉呢，事情还没做多少呢，怎么就可以怀疑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怎么就轻易说工作组不可信任？

在 6.24 大辩论之前，我对工作组的处境是同情的、体谅的、理解的，对那些不满工作组的大字报不以为然。我并不认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工作组是路线觉悟高。

本来嘛，学生这边，对工作组应该多一点耐心，应该接受工作组正确的批评意见。工作组方面，要允许学生对自己贴大字报，对各种意见要认真、慎重的对待，确有错的地方要认错并改正，对个别比较激进的学生要多沟通。

事实上是两方面都是有对也有错。但是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有理对方有错，都不认为自己有错。工作组自以为是新市委派来的党的组织，哪容得学生说三道四？学生认为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心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放大镜来检验工作组的一举一动。

在 6.24 之前，我对蒯大富并没有好印象。我参加运动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反修防修，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夺权什么的。权是什么？权有什么用处？为什么要夺权？夺谁的权？这些懵懵懂懂不明白的问题，我甚至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它是新市委派到清华领导文革的，这点没什么可怀疑的。你蒯大富大谈夺权干吗？难道真的没安好心想夺权？我觉得蒯大富有点张狂，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看了许多评论 6.24 辩论会的大字报，我对蒯大富不胆怯的勇气和雄辩的口才心里佩服。

而对工作组在 6.24 辩论会上的表现，我很不满意。辩论会上，工作组以势压人，这一点就不能让我心服。周赤萍的讲话明显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嘛！尤其是对“反蒋必先反蒯”的口号，感觉特别类似于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

更使我反感。学生中有少数几个人对工作组不过有点不满、有点怀疑而已，并没有要向工作组夺权。即便是蒯大富，他谈到了夺权，但是他说得很策略，也没说立即必须向工作组夺权。工作组马上采取高压做法，把蒯大富那段批语上纲上线到是向工作组夺权的铁证，把蒯大富定性成反革命分子，实在无法让我信服。所以，当班上同学在工作组的组织下揭批蒯大富，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拥护工作组的校内游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参加。要我高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把蒯大富当做反革命分子来围剿，我心里通不过。

于是，在那些拥护工作组的同学的眼里，在“不坚决支持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的逻辑下，我就被划到支持蒯大富这一边了。

我一向对党组织的话是非常信任不去怀疑的，这个时候却表现出与工作组不同心的思想。细细想来是有原因的。

就在 6.24 大辩论的这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传到校内。我第一次听到“造反有理”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据说，“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语录！

小时候，我听说过“造反”这个词儿。那是听老人讲“长毛”造反的时候听到的。“长毛”者，就是指太平天国那些起义军。他们都留着长发，在我们那一带，他们被称为“长毛”。老人们说，造反，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杀头的！

所以我对“造反”这个词，一直认为是贬义词。在新中国，造反，那是造共产党的反，当然就是反革命啦！

现在，我居然听到了“造反有理”这样新鲜的道理。我瞪着眼睛，晕了半晌都没回过神儿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尽管我的思想一时还没转过来，但一听说是毛主席说的，那肯定是真理，还错得了吗？这个新思想新观念我要赶快接受。

文革初期，既是思想混乱又是思想解放的时期。人们旧有的思想观念一次次地被突破，经受蜕变。过去连对基层的党组织党员干部都不敢提意见的，现在也敢贴大字报了。过去认为清华党委是固若金汤的庞然大物，现在居然轰然倒塌了。这一个个刚刚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告诉了我，造反并不可怕，造反确实有理。像我这样过去在心里没有一点点造反念头的人，也开始敢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心里小声地说半个“不”字了。这个“不”，是不再轻信工作组，不再紧跟工作组。

“造反”成为报纸广播、大字报和日常交谈中最常用的一个流行词。“造反有理”慢慢地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付诸行动。

一股对什么事都敢于怀疑，对什么人都敢于造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即“怀疑一切”）也悄悄地在滋生着、蔓延开来。

在这股思潮下，我对工作组表现了一点不紧跟，不坚信，但是我并没有反工

工作组。即便这样，我还是成了蒯派¹。当然，比起其他坚定的蒯派，我是一个极其软弱的小蒯派。

第六节 一个软弱的蒯派，一份不服气的检查

6.24 大辩论以后，工作组在全校范围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蒯斗争。斗黑帮被搁在一边。斗争矛头向下指向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蒯大富作为反工作组向党夺权的代表人物，在全校范围受到批判和声讨。从各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么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大三学生，俨然已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首领。工作组通过外调内查，深挖了蒯大富和他家的老底。蒯大富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声名狼藉。

在工作组的统一部署下，那些在 6.24 大会上为蒯大富鼓过掌的、写大字报支持蒯大富的、对工作组有过怀疑表示不满的、甚至对“无限信赖工作组”的游行发点牢骚的师生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作为“蒯式人物”进行批判斗争。²

有的学生并没有公开支持过蒯大富，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对工作组的不满，只是因为没写反蒯的大字报，没参加拥护工作组的游行，有的也成了蒯派。

我有个朋友是电机系的学生，他成为蒯派的原因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天晚上他们班里组织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只因为他已经上床了，懒得爬起来参加，于是就成了班里的小蒯派。

工作组的逻辑三部曲是：“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完全统一的。”[4-P23]

“工作组接二连三地组织校、系、年级、班级的辩论大会，一步步把蒯派搞臭，并公开对他们实行‘专政’。取消他们行动自由，不许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甚至进行‘隔离性’保护，写交代材料，按手印。”[4-P24]当然，根据每一个蒯派问题性质的严重程度，工作组给予的“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性质极其严重的蒯派才被隔离被“专政”。

工作组把蒯派按错误的性质、严重的程度、罪行的大小分成四类。一类、二

¹ 严格一点说，在工作组时期，一般称支持蒯大富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为“蒯式人物”，而不是叫“蒯派”的。工作组撤走以后，大家才把这批接工作组整的“蒯式人物”称为“蒯派”。本书中统称“蒯派”，不做严格区分。

² 工作组的反蒯斗争，显然得到了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刘少奇 7 月 3 日在听取了自己的妻子和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女儿刘涛有关汇报后表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17-P3]

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即人民内部矛盾，教育教育就过关了。三类的性质要严重一些。要是能认识错误、痛改前非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若坚持错误、态度恶劣，性质就要发生转化，按敌我矛盾处理。第四类，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按敌我矛盾处理。

很不幸，我被工作组定为“四类蒯派”。

我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作组，我只是对工作组在 6.24 辩论会上表现不满意。对工作组不满的话对同学说过，不太支持的行为同学也看到过。这差不多已经够得上蒯派的条件了。如果仅仅是这些，我也只够得上一二类蒯派，不会划为四类的。关键是我不仅有对工作组不满的“现行问题”，还有“近期问题”，更有“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那就是我在“九评”学习的时候就暴露出有那么多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那就是“前科”，说明我对党的离心离德是一贯的。所谓“近期问题”，就是不久前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又散布了一些不合时宜同样是有违党的立场的言论，有些人记忆在心。

像我这样同时有“现行”、“近期”、“历史”问题的，相当稀罕。不要说在班里，即使在年级里，也已经是很冒尖很典型的了。这样的“蒯派”不整，还整谁去？

对我批判的大字报贴在九饭厅前和 12 号楼的墙上。

我那个时候的胆子很小。一看到我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大字报上，我差一点吓得半死。那种胆战心惊怦怦乱跳的感觉，至今还没忘记掉。一年以后，在团四两派的互攻中，我的名字有时被团派同学写得斗大一般，还受到过名字被打叉叉的“待遇”，那个时候已经是脸皮厚厚、见多不怪了。

6 号楼与 7 号楼之间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那时被开辟为东区学生宿舍的大字报区。我常常经过这片大字报区到大礼堂那边看大字报。反蒯那段时间，我看到许多批判陈继芳（焊 0）的大字报，那种尖刻严厉的字眼，让我觉得这个“蒯式人物”好可怕好厉害。后来在总部里见到陈继芳，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个子不高的低班小姑娘。

说句实事求是的话，我班对我的批判是非常温吞水的，比陈继芳这些大蒯派受到的批判要温和得多多了，更不用说比全校一万多师生员工对蒯大富那种狂轰滥炸的批斗架势。要不，我是肯定挨不过这一关的。所以，我至今心里还很感念我班的同学们手下留情。

几乎所有的蒯派在这种从未经历过的政治高压下做了检讨。也有个别忍受不了的，选择了自杀。我认识我系的史明远老师，一位英俊有为的年青教师，不堪批斗跑到“十三陵服用敌敌畏自杀”了 [4-P26]。

自从“九评”学习狠狠地摔了一交以后，我对自己的政治辨别能力已经丧失了自信。全校一开展反蒯斗争，我就知道自己错了。领导一找我谈话，我就马上认错检讨了。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蒯派。

班里同学说我会写点东西。这点写东西的小才，除了写大字报，似乎就是用来反复写检查了。看来“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有点道理的。

我还保存着一份 1966 年的 7 月 6 日写的检查底稿（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的检查了）。巧合的是，一直非常坚定并以绝食相抗争的蒯大富，也是在这一天“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4-P26]。蒯大富写的是假检讨，真对抗。我写的是真检讨，假认错。

我的检查一开头，就承认这一个多月来，连续犯了二次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前一次，保校党委，保错了。这一次，怀疑工作组，又怀疑错了。

我检查了种种根源，从政治立场、阶级感情、思想方法等等方面做了检查，给自己戴上了立场错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个人自由散漫、好出风头等等帽子。

检查的套路已经比较熟了，无非是承认错误、认清危害、深挖根源、改正措施等几大块。

如果检查到此为止，能不能蒙混不知道，但也算是正常的检查。我呢，有点不太识相，或者说，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服气，于是在最后又多写了好几段我还没有想通的问题：

我说，校党委也是党组织，我相信党，保卫党，怎么会错了呢？我吸取了保蒋保错了的教训，对工作组想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它，怎么又错了呢？我确实是想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只是最后，保也错了，怀疑也错了，怎么老是站错队了呢？我很痛苦。

我说，工作组比起新市委比起党中央来，犯错误的概率总要大好多，这“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就是绝对化了嘛，对工作组怎么可以“无限信赖”的呢？

我说，“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信任不信任工作组就是信任不信任党的问题”，这种提法在 6.24 的短兵相接中，在蒯大富的猖狂进攻面前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两句口号是不对的。因为局部不能代替全局，个别不能代表一般。

我说，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的这些语录应该怎样理解、怎么执行才是正确的呢？

我一连提了八九个没想通的问题。我最后写道：“以上谬论种种，希望组织和同志们批判。”

在这份交给工作组预审的草稿上，对上面这许多我想不通的文字，审稿的领导用波浪线重点划出，有几处还打了大大的问号，在边上还批注着这么一句话：“信任群众信任党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黎”。这位姓“黎”的领导是班里的还是年级里的或者是工作组里的，我就分不清了。这无关紧要。我能想象得到，这位姓“黎”

的领导对我的检查是多么的不满和生气，一边看一边忍不住就在我的草稿上旁注批驳了。

我不知道工作组看了我的这份检查稿以后是怎么讨论我的问题的。是认为我对组织很老实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认为我态度不老实表现很猖狂借检查之名行向党反扑之实？

与我同宿舍的有一位老章，他也是从农村来的，是我比较信任的党员，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来找我个别谈心。我对他毫无戒备，心里想什么就谈什么。他套我什么我就如实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火力侦察”的，他们在整我更多的材料呢。

我父母一贯训导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我这个人，没有害人之心是好的，连防人之心也没有，特别缺心眼。我在“九评”学习后曾经发誓要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但是，事到关键时刻又都忘得干干净净。

工作组接下来打算如何更严厉地整治我，我当时并不清楚。工作组撤走以后，有个知道内情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我被定为“四类翻派”，本打算在年级的范围里批判的。只因为反翻紧急刹车，工作组匆忙撤走，我才只遭受了小难躲过大劫。

我当年也想过，要想保险点、安全点，就得随大流，随主流。组织上叫我怎么说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怎么做。那样肯定不会有大错，肯定不会挨整。工作组要反翻，大家都跟着工作组反翻了，我也应该跟着反翻。即使最后错了，最多也是认识问题。大多数人都错了，法不治众嘛，挨整也整不到我这样的群众头上。

这个明摆着的现象我是看到的，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也懂得的。可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每到关键时刻，我总是憋不住要想说一些与多数人、与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样会挨整而不接受教训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自己，一直没有完全想明白。

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幼稚可笑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来谈什么坚持真理之类的大话，肯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尽管我自己确实认为是在坚持真理）。从小父母亲就教育我要做一个忠厚老实不说谎话的好孩子。小学里的老师教导我们要做诚实的好学生。到了高中大学组织上要求我们忠诚老实对党交心。我把诚实看成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我觉得，在我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要我违心的去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我会感到很憋气，很难受。我每每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讲真话冲动，一定要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说了真话才安心，才顺气。每次挨整以后，就痛定思痛，告诫自己今后千万别这样了。但是，过了一阵，好了疮疤忘了疼，每当大事来临，又是控制不住自己。

还有一点，我比较认死理。这可能与学工科的有点关系。习惯逻辑推导，习惯理性思维。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这肯定是要碰壁的。

参加文革才两个月，就喝了两口水。打击很大，信心受挫。伟大领袖要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激励着我。我没有气馁，我还要继续战斗。

第七节 「怒涛」战斗组， 被指责是“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

在工作组进校一段时间以后，班里的同学三五成群自行结合组织起了战斗组，以战斗组的名义写大字报。

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发自内心的拥护，积极地参加。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想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好好表现，以实际行动改变组织上对我的不良印象，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能参加一个战斗组肯定比单枪匹马的个人单干要好得多。我盼望着有人来找我，把我吸收到他们的战斗组里去。但是没人来招呼我。

环顾四周，大多数同学都已在战斗组里了，全班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有点形单影只。

尽管我知道自己已经很落伍，但是我多少也是有点自尊心的。要我主动去问“你们要我吗？”万一吃个软钉子，我面子上下不来。我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既然别人不愿意来找我，那我就去找那几个剩下的人去。这么一串联，很快，一个由我和老许、老贺、老史、老林共五位同班同学组成的战斗组成立了。既然是由我串联起来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以组长自居。

那个时候想当个组长之类的绿豆芝麻“官”，自封就是了。本事全看你能招募到几个人，别人愿不愿意做你的“兵”。

我给战斗组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怒涛」战斗组。寓意就是文化大革命犹如汹涌澎湃的怒涛，荡涤着一切“封资修”¹的污泥浊水！我们就在这大风大浪的怒涛中，跟随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我在大学期间比较喜欢写日记。往往在晚自习开始前，隔三差五的总要写点东西。所以，虽然文笔不怎么样，没什么文采，但是出手比较快，这方面比其他的几位同学要强一些。

大家讨论后，如果观点比较一致，想要写点什么了，多数都是由我执笔起草，然后再誊写到大字报上，用「怒涛」战斗组的名义贴出去。如果讨论的意见统一不了，

¹ “封资修”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

我就用自己的名字在大字报上署名。

当时学校里已经陆陆续续涌现出几百个战斗组。我这个战斗组并没有写过什么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字报，贴的数量也不多，是个不起眼的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战斗组。

倒是在班上，在年级里，我们这个战斗组引起了一些阶级觉悟很高敏感性很强的同学的“重视”。“重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写的大字报观点多么新颖或偏激，而是我们这个战斗组的成分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很快，我听到了一种议论，说我们这个战斗组是集“地、富、反、坏、右”之大成的大杂胎。

听到这样的风言风语，大家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开始我也很气恼，后来琢磨了一下，果真有那么一点儿影子。情况原来是这样的：

老贺，他是一位早在高中时就入党的老党员，也是班里的干部。照理说，我们这个战斗组里就数他的政治条件最好的了。他怎么也会孤单的呢？原来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为人处事一向小心谨慎。他与“富”字沾上边了。

老林，听说曾经有过私“拿”别人饭票的不良行为，是班里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重点帮扶的对象。是不是因为这就认为他有点“坏”？

老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大队干部，听说在“四清”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对这件事很有点想不通。要是他爸爸真有问题，就是“四不清”干部了。

还有老许，他来自上海，出身好像是高级职员或小业主什么的，我不敢肯定，能肯定是他不是红五类出身。那么他与“资”沾了一点边儿？

最后是我。虽然我的出身是这几个人中最过硬的，但是我在组织的眼里是认识模糊思想“右倾”，与“右派学生”相差无几了。

五个人，要完全套上“地富反坏右”，肯定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我班以工农子弟占绝大多数。我扳着手指数了一下，家庭成分差一点的或者本人毛病多一点的，真的都集中在我这个「怒涛」战斗组里了。也难怪我们这几个人都没人主动要我们，都感到有点孤单。现在，成立了战斗组，不孤单了，但是一看到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心里就特别的郁闷。可是，又没地方可以倾诉的。

其实我们这几个人，讨论问题的时候观点经常不一致的。我们并不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组成的战斗组。我们更多的是因为感到像个弃儿，害怕孤立的状态，害怕孤独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把其他的几位召集在一起，而是我们此时的处境和心情相差不多。结成一个战斗组以后，就有一种抱团取暖的热度。在这个“家”里，一起讨论形势，对学校的时局发表看法和评论，交换各自得来的消息，尽管不一致的看法很多，但是总比孤魂野鬼似的一个人游荡要好得多。

当然，我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点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想积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的。这一点，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别人可不管这些。我们这个战斗组存在的本身，就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和警惕。他们可能在想：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要趁着文化大革命来造共产党的反呀？尤其是我这个战斗组长，更受某些人的非议。

有次，我从外面回到 12 号楼，走上楼梯，快到四楼的时候，从靠楼梯口开着门的那个套间宿舍里（即 427/429），我听到有个很响的声音传出来：“那个孙银基又写大字报了！哼！太猖狂了！”

我听出那是兄弟班的一个姓王的革干子弟（该同学后来是「自控系红卫兵」的主要骨干）正在激动地对别人嚷着。这一声“哼”的粗重鼻音中，我听到的全是鄙夷和不屑。

我没吭声，因为我不习惯面对面的质问和对骂。但是我心里非常愤慨！我贴大字报又怎么啦？我写大字报是毛主席给我的神圣权利，你管得着吗？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来与我论战呀！你何必在背后指责我啊？

我心里实在气不过，回到宿舍，我就奋笔疾书，用小楷写了整整一张大字报，贴在四楼西头楼道口的墙上。

我的这张大字报，尽管没有漫骂，但是用词也是尖刻激烈的。我好像是一只被激怒了的公鸡，鸡冠毛都高高耸立起来，向着对我背后中伤的这些人狠狠反击。

这是我在文革中措辞最为激烈的一张大字报，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上面有不少同学的留言和批注。有指责我的，也有比较公道替我说话的。过了几天，我把这张大字报揭下来保存了好一段时间，可惜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听到的非难，我可以反击。但并不是所有的暗箭都能预防的。譬如，当我被人揭了老底的时候。

第八节 被揭老底，我的“癞疮疤”全校皆知

那个时候的大字报上，除了以战斗组署名的以外，个人署名一般都是真姓实名，极少用化名的。经常能在大字报上看到一些批注。谁看了某篇大字报后，如果有话要说，有感想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这篇大字报的任何空着的地方（往往是在文章的最后）写上一段话。“好得很”、“对极了”、“狗屁不通”、“坚决支持”等等都是最常用的简洁批注语。

凡是以我的名字署名的大字报贴出去以后，过半天一天回过头再去看看，也

会有一些人在我的大字报上批注。其中总能见到这样的一些批注：“此人在‘九评’学习时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此人‘九评’学习时在全班做过检查”等等。这批注用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我的名字。

那个时候，这种揭老底的手法是惯用的。甚至还有取名为“揭老底”的战斗组。祖宗三代、小偷小摸、检查处分、个人隐私都是揭老底的内容。所以，一般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不敢也不愿写大字报，就是因为怕被知情人揭了老底，自找不自在。

我出身没问题，所以我敢于写大字报。但是，“九评”学习是我心头永远的伤痛，就像那块阿 Q 头上的癞疮疤。我也非常害怕别人揭我这个老底。

这些批注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这笔迹我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我同宿舍的老祝写的。他写的字与众不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批注并没有造谣，所以我没法向他“兴师问罪”。但是，这样的批注让我非常难堪。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脸面没有了，又无处发泄，你说窝火不窝火？我心里的无名火无处可发。

我也是在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难道我写大字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行动有错？要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写大字报与我辩论呀！干嘛老是揭我的老底？我也像阿 Q 一样，心中忿忿不平。

“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把大字报贴到你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心里暗自思量。

写大字报，当然是希望看到的人越多越好。贴到没人看到的地方，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写的大字报，最早贴在 12 号楼附近，后来就贴到大礼堂区。那是清华大字报的中心地带。

既要贴在礼堂草坪周围的大字报区让更多的人关注，又不想让老祝找到，我就“打一枪换个地方”。我有意识地今天贴在东南角，过几天贴在西北角，在不同的地方贴。让我惊奇的是，我写的大字报无论贴到哪里总能被老祝找到，总能看到他诸如此类的批注。我懊恼不已。我想，我是被他死死地盯上了。

真像个可恨的小特务，像个无聊的大喇叭，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像个《悲惨世界》中那个穷追逃犯的讨厌警长。我搜刮所有解气的字眼在心里骂他。本来嘛，我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也只有班上同学、教研组老师，最多还有同年级的少数同学知道。这是我最怕提起、最想保密的隐私。现在，经他一宣扬，变成全校不少人所共知的丑闻。我气愤、我郁闷、我也无奈。我不知道这仅是他个人的爱好所为，还是他受工作组指派的受命之举。

绝大多数同学对这种揭老底刨祖坟的手法是很反感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看

到在我的大字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批注：“干吗老是揭别人的老底呀？”、“四大¹是毛主席给的权利，你这样是不是不让人家说话呀？”、“老揭别人的短，可耻！”这些批注的箭头又指向老祝的批注，表达对他这样做法的不满。我心想，世上毕竟还有讲公道的人。这让我心里感到一丝温暖、一点慰藉。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你写的批注被他人批注了，他人的批注又被别的人再批注。箭头指来指去的，有好几重，很像一幅攻防的军事地图。这也是当时清华大字报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久而久之，我也慢慢习惯了老祝的批注。我的老底也就是这么一桩，这么一件破事情。他的批注没有更多的新意。丑事既然已经公开了，就得慢慢地习惯、适应。我还得革命，我不能因此而畏缩不前。度过了最初一段有点惊恐的日子，慢慢的我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害怕、担心、慌乱了。但是，我精神上所受到的压力，始终在心头，感到沉甸甸的。我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这件“不光彩”的事情第一次从班级走向全校，全拜老祝批注之托。至于第二次，后文还要提到。文革以后，我觉得老祝那时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已不再介意这样的小事一桩了。

文革中，不全都是烦心之事。偶尔，也有可乐之事。

第九节 王光美卖饭打菜，一次反胃的政治秀

王光美虽然是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又一直在清华蹲点，但是对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而言，几乎听不到她的消息，见不到他的身影，不知道她的存在。

7月18日，如火如荼的反蒯斗争突然刹车，紧急转回斗黑帮。这一来，让那些紧跟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们措手不及，中间群众对此也顿生疑窦。当怀疑工作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暗流涌动的时候，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

7月30日，中饭时间²，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饭来了！

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想一睹她的风采。其他几个售饭点上卖饭打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可怜。

1 “四大”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简称。

2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P33上记载的“晚上王光美参加九饭厅食堂服务”有误，应为中午。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筐筐的馒头、窝头再放一大搪瓷盆菜。

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那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录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4-P33]这是记录在清华文革大事记上的话。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可能是我走了以后有人这样呼过，也可能是她在别的食堂卖饭的时候有人呼过。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美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不时露面来食堂卖饭这些不寻常的举动，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三同”那样简单的作秀，她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是：我是清华工作组的，我是刘少奇的夫人，我就是工作组的幕后老板，清华文革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你们还怀疑什么？你们怎么可以怀疑工作组是绝对正确的呢？

这是王光美眼看工作组的处境不妙而不得不亲自出马所做的一次挽救行动。

当然，我并不是当场就有上面这些想法，而是过了好些天以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人们总说王光美出身书香门第，是辅仁校花，对她高雅端庄、光彩照人的仪表赞不绝口。但是，她的食堂亮相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那天，我是第一次亲眼近距离见到王光美。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听到有关刘少奇的一点点传言，对王光美也没有一点点怀疑。她的形象，说实在的，粗一看，真与食堂里卖饭打菜的女师傅无异。只不过看上去身材较高，有点丰满，微露龅牙，肤色白净，但是看不到知识女性的那种气质。如果换上旗袍戴上项链，给人的形象也不过是雍容华贵而已。

王光美以后的故事还很多，众人褒贬不一。我作为一介平民，对她在刘少奇落难之后的不离不弃，还是很赞赏的。对她将刘涛（自9）逐出家门、将蒯大富赶出北京的行径，则很不以为然。

第十节 我居然想参加「自控系红卫兵」， 自不量力自讨没趣

清华附中是中国红卫兵的发源地。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既然伟大领袖对红卫兵是如此的支持，于是，近在咫尺的清华大学校园里随即也出现了红卫兵。

清华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由刘菊芬出面组织的「自控系红卫兵」。七月底，它筹建的海报贴在 12 号楼附近。

我一看到是刘菊芬在负责筹建，很高兴。她是我“四清”工作队的队长，老领导、老熟人了。

毛主席支持的新生事物，肯定没错，我也想做一个“红”色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小“兵”。看到申请条件中有一项是“红五类”子弟，我完全符合条件。我想，参加红卫兵肯定不成问题。

找到刘菊芬，我对她说来了意。她对我笑笑，不置可否地哦了两声。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直到 8 月 4 日「自控系红卫兵」正式成立。

这件事让我对刘菊芬的亲切感陡然减少了许多。吃闭门羹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

后来想想，也真是的，我对刘菊芬的印象很好，不见得她对我的印象也好。在“四清”中，我在对敌斗争中不时表露出一些“地主富农分子看起来已经比较老实了”这样的右倾思想，工作办法不多，对所依靠的积极分子的看法摇摆不定，包队任务完成得不怎么好的。仅仅因为“三同”做得还不错，她对我能有很好的印象吗？就凭彼此比较熟悉就会同意我参加红卫兵吗？要是她再稍稍了解一下我对工作组不满的现实表现，很可能她会在心里说：亏你老孙想得出来，想参加我组织的「自控系红卫兵」！

「自控系红卫兵」的基本骨干都是革干革军子女。即使是工农子女，他们能瞧得上眼允许参加的也是很少数。这样一支脱离一般群众、甚至脱离大多数工农子弟的“贵族红卫兵”，仅凭这一点，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当时根本就没好好了解「自控系红卫兵」的真实宗旨是干什么的。还以为只要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他们就会吸收我。没过多少天我才知道，原来「自控系红卫兵」是拥护工作组的。天哪！我怎么会想去参加这样一个红卫兵组织啊？全清华再也找不出比我更冒傻气的人了吧？

我把这样一件会让人笑死的糗事抖落出来，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多么的滑稽可笑！

三十年后，刘菊芬已经是四通公司的副总裁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时到她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她给我的印象依然是“四清”那个时候的刘队长，真诚热情、和蔼友善。

第四章 「八八」勇斗「八九」 (1966.8—1966.10)

第一节 工作组败走清华，「八八」「八九」争雄

反蒯斗争是紧急刹车的，工作组的撤走也很突然。这是上层政治权力较量的结果。作为普通学生，只感到这两个月的政治风云，诡异多变，无所适从。

7月28日，北京市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临走前，扶植了一个「临时筹委会」¹，由它来领导清华的文革。

8月4日晚，周恩来率领一大批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²的中央高级干部参加了在东大操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会上，叶林做了一个浮皮潦草的检讨，新市委也做了检查，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首长都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学生的发言依旧是互相攻击、揭老底。一位「自控系红卫兵」姓蔡的女生在大会发言说，她看到蒯大富猖狂向工作组夺权向党进攻，肺都气炸了！第二天，“肺都气炸了”成为清华大学报区最醒目的一句流行语。

周恩来听取了两边激烈的争辩后，在会上做了重要的长篇讲演。

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靠传达而是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报告。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情无比激动。

他首先指出“工作组的方向都错了”，“犯严重错误的方向上去了”。他称蒯大富为“同志”，宣布“对蒯大富案件和刘泉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一种“天亮了”、“翻身了”的舒心。

¹ 「临时筹委会」，即「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7月29日，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4-P383]

²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升至第二位，陶铸升至第四位，刘少奇降至第八位。

周恩来在大会上还公开承认“上面要负责任”，“我也应当向大家，向受了委曲、受了不平等待遇的同学赔礼道歉”。这让我非常感动，再次让我见识了一位襟怀宽广、从不推诿责任的伟人。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¹方向上去，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

大会以后，因工作组的反蒯运动而遗留下来的学生间的对立情绪实在太严重了，周恩来的讲话不仅没有缓和对立情绪，围绕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的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

一批人认为工作组已经检查了，可以过关，下面应该立即斗黑帮。另一批人认为不先把工作组的错误批深批透，消除同学之间的严重隔阂，怎么能万众一心斗黑帮呢？而「临时筹委会」提出的建议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4-P36]。

坚持要批工作组错误的这部分师生串联起来，于8月8日成立了一个「八八串联会」，领军人物是唐伟（工化00）、陈育延（力00）、吴栋（自9）等。要立即斗黑帮的那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

8月19日，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头面人物是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高干子女。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九串联会」，所以这个红卫兵的别名又叫「八九红卫兵」。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8月22日，唐伟等也组织了一支红卫兵，取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²，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八串联会」。

「八九」派的观点，表面上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是斗学生而不是斗黑帮，改正工作组错误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立即转为斗黑帮。

我是坚决支持「八八串联会」观点的，自认为是个坚定的「八八」派。我当时写过大字报，认为是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造成了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之间严重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它的错误不彻底批判，它遗留的恶果不彻底清算，对被错整的蒯派不道歉不恢复名誉，在这样的局面下，怎么能同心合力斗黑帮呢？

两种不调和的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周恩来先说“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向上去”，接着又说“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

¹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毛泽东提出“文革”的三项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² 在成立的时候取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9月10日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周恩来把两个方面都讲到了，圆滑全面，无暇可击。如果强调前者，就是「八九」派的观点。如果强调后者，就是「八八」派的观点。「八八」与「八九」都能从周恩来的讲话中找到依据，所以各不相让。

为什么「八八」、「八九」会这样严重对立？这就要追溯到工作组时期这两部分人的不同表现。

工作组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反蒯。反蒯结果，整出了虽说是“一小撮”却有七八百人的蒯派。全校一万多名师员工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都参与了反蒯运动。

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工作组反蒯的。但是非常积极的也只是一部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八九串联会」的头面人物和骨干分子都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蒯的领导力量。工作组撤走的时候被扶植上台，掌握着清华的实权，他们对工作组是有感情的，他们不愿意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也不认为工作组有多大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蒯大富是反革命，蒯派该整。他们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积极反蒯的群众，一时也难以从心里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他们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就是批判他们自己，这个弯子不好转。他们不愿批工作组的错误，于是就提出打黑帮，于是就结成「八九」。当时，「八九」派人数众多，是绝对的主流派、多数派。

在跟着工作组跑的人中，有很少一部分，他们对反蒯是有看法的，他们不满意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做法。只是在反蒯的浪潮中，他们不敢正面顶撞工作组，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他们害怕一旦工作组发现他们有异心会被当做蒯派挨整。现在，工作组撤走了，中央明确定性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他们没有了工作组的外部压力，又有了周恩来讲话的撑腰，他们胆壮了，于是就起来批判工作组。这部分人就成了「八八」。只是，他们是处于劣势的少数派。

八月中旬的那段夜晚，灯火通明的大礼堂大字报区，我经常能看到唐伟与人辩论的情景。看着唐伟清秀瘦高的个子，那敏捷的思路，滔滔的辩才，以及我深为赞同的观点，站在外圈伸长脖子围观倾听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儿。他是最低年级的，个子也比我要矮一些，所谓“仰视”，那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对他佩服得很。我偶尔也看到唐伟与陈育延挎着军绿色的书包，行色匆匆地穿行在校园里，很像是一对金童玉女。

蒯派挨了工作组的整，对工作组当然是恨得要死。工作组倒台了，最兴奋的莫过于蒯派。所以蒯派持有「八八」观点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是共和国的总理亲自为蒯大富平了反，蒯大富和蒯派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不仅「八九」派仍然坚持蒯大富是向党夺权的反革命，即使是在「八八」派里，相当多的人也是认为蒯大富即便不是反革命，即便整他是错误的，蒯大富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东西，

更不是什么革命左派。蒯大富依旧是臭烘烘的没人理。蒯派这一群体在「八八」里也没有什么说话的份儿。

八月的清华，就这样进行着「八八」与「八九」的大论战，进行着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大搏杀。

少数就意味着孤单，意味着受压。

那时的我，在班里一直忍受着游离于多数派主流派之外的孤单、郁闷和痛苦。真盼望能有一次痛快宣泄的机会。

第二节 一气呵成《少数赞》，激愤之下成名作

8月22日，我听说「八八」即将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八九」刚成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相抗衡，兴奋异常。那天中午午休，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反蒯以来感受到的压制与抗争、不公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我想着，尽管我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但是，我反复审视，感觉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错。

忽然想到，在刚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我觉得这句话就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为我撑腰似的。

我激动得睡意全无。我非常想写点什么来抒发一个少数派的情感，宣泄一个少数派的情绪。我微闭着眼睛急速地打起了腹稿。等到全稿差不多拟就，我一骨碌从上铺跳下床来，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一篇大字报就这样一气呵成。又修改了一遍，找来二张大字报纸誊写。随即，贴到大礼堂东侧两棵树中间的席棚上。¹

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少数赞》。

《少数赞》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表达具体的观点和评论，它仅仅如实记录了一个少数派受压时孤立无援的复杂心情和内心感受。或许，正是因为碰触到情感这一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才引起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给他们以困境中的鼓劲，坚持中的加油，由一个人的自我壮胆感染成一群人的相互慰藉。

对我而言，《少数赞》是我的“成名作”，是它使我在校内为一部分人所知晓，此后我文革中的各种机缘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我在文革中所写的文章、发言稿全都丢失或销毁，这一篇《少数赞》因为收

¹ 笔者自己已经记不清贴在大礼堂的那个区域了。笔者在无线电系的高中校友说是在此处，另一位姓胡的好友说他“记得是贴在大礼堂前的东侧，对面正是同方部，也就是后来蒯大富再遇‘胖老头’的那个地方。”

录在《大字报选编》里才得以保存至今。全文篇幅不长，按《大字报选编》里收录的刊载于下：

革命少数赞

毛主席语录本第 222 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有言在先：革命少数赞，赞的是那些坚持正确观点，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同志，而绝不是指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于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们，他们想利用本文为它撑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乃至炮打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的阴谋也一定不能得逞的！)

多数常常是正确的！

而且，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在党的纪律中，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因此，一般地，人们希望自己成为多数派，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分子所掌握时。

正因为如此，十六条明文规定：“保护少数”。这可以说是多数派享受不到的一种光荣权利！

然而，少数派确实不大好当的。

你看：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检查自己：我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否全心全意地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句话，是否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尤其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用心地读毛主席的书。他必须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依然无限地信赖群众。他要受得起委屈和误会，经得起种种打击。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那些他认为是坚持了错误观点的同志。他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迁怒于多数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而始终把握住运动的大方向！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更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判断。他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他常常食不甘，觉不香，为真理而终日奔波辛劳！

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清除这些脏思想。否则，他就坚持不住少数！他的少数意见，哪怕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一定会完蛋！”

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当他发现自己的少数观点是错误时，他同样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绝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非！

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大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

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数！

符合真理的少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曲折，它必将发展成多数。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

因为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战无不胜的！

因为真理属于无产阶级，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革命少数派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顽强得很！彻底得很！可贵得很！一句话，好得很！

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革命同志，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要敢于成为少数，要善于改变自己少数派的地位！

那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甚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当然多数派”的性格，是不能与我们相干的。批判！斗争！革命！造反！这就是我们的格言！

让我们经常在少数派的风浪中，摔打滚爬，担风险、经风雨，锤炼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钢筋铁骨、永不变质，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接过来，牢牢地传下去的一代新人！

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
(原名：孙银基)

初稿发表于 66.8.22，第一次修改于 66.9.26

附记：(1)本文时代背景：「八八」革命串联会在坚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
为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的斗争基础上，于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

想红卫兵，当时他处于少数地位。本文是献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大会的。本文原名为：“少数赞”。

(2)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604 班学生（住址 12 - 420）贫农、团员。

清华大学自控系「红色服务兵」翻印

1966. 9. 28

尽管我所说的“少数”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少数”，我还是怕有人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为“地富反坏右”这样的一小撮“少数”歌功颂德，所以才有了开篇的“有言在先”。这多余的表白，还有“贫农”、“团员”这些身份的宣示都暴露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十分胆小谨慎，甚至有点战战兢兢的。

这篇大字报是我当时不吐不快的激愤之作。写完贴出之后，想说的话说完了，想吐的气吐出去了，想宣泄的情感也宣泄完了。我当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去看它，要不也不会贴到大礼堂的中心大字报区。至于会有多少影响，多大效果，这些，我当时一点也没想过。

后来好些蒯派和「八八」派对我说，那时他们同样正受压，正憋气，看到这篇大字报，眼睛一亮，很受鼓舞，感觉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我被这批人引以为“同志”，视为知己。

遗憾的是，这篇大字报在 8 月 24 日的“红色恐怖”中被撕毁了，它的寿命仅仅只有两天！

一个月以后，学校的大字报选编组找到我，说想收录这篇大字报，问我有没有意见，需不需要修改。我仔细地审阅了一遍，没对正文做任何改动，全文有三处修改（文中有波浪线的字即为增添的内容）：

一处是，有些同学认为我即使“有言在先”，但是笼统盛赞“少数”，还是可能授人以柄。我接受他们好心的意见，把标题改成《革命少数赞》。加了“革命”这个限定词，增添了标题的革命色彩，那么“少数”就再无歧义了，也不会被“少数”真正的坏人利用了。那个年代，“革命”是最时髦最流行的，用得越多就越显得自己革命。“革命”就像一件外套，什么东西套上了“革命”两字，就显得革命多了，也保险多了。

另一处修改的是，因为我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已改名，所以把文章的署名改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最后一处是我写了两点附记，交代了这篇大字报及我这个作者的背景。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篇曾经自鸣得意过的大作，心里想，这算什么

文章呀？既没有闪光的思想，也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凡见解，更缺少华丽的文采，不朽的警句，文中还夹杂着“狗屎堆”、“混蛋”这样的不雅用词。充其量，这不过是一篇表达当时心境的小杂文而已。

时过境迁，不要说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年代所写文字的语境，即使作为作者的我，也无法从中嗅出当年紧张激烈的时代气息了。只是当时写作时的心潮澎湃，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虽然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杂文，在当时，还真是一篇广为流传的大字报。

由于清华的《大字报选编》在全国的影响力，我在文章的“附记”中公开了我的通讯地址，所以打那以后，我收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信中写着他们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且深受鼓舞。我还收到好些学生寄给我的红卫兵袖章和毛主席像章这类纪念品。好几个友人告诉我，说在大串联的时候，在外地也看到过这篇多次传抄的大字报。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在网上检索到《革命少数赞》的踪迹。¹

第三节 趋潮流学时髦，改名“怒涛”

我的名字是在8月底开始的破“四旧”²浪潮中改换的。

父母给子女起的名字，或多或少都带有祈福求富保平安的意思。在名字中有个“富”呀“贵”呀什么的，这很常见。但到了文革初期扫“四旧”的时候，这些“富”“贵”都认为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货色了。地名在改，街名在改，人名也在改。革别人的命不是那么容易的，革自己名字的命，只要自己愿意，谁都可以做得到。于是，不少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的同学改成“向东”、“卫彪”，甚至“宁左”、“井冈山”之类的革命名字了。

我的原名叫孙银基，因为我的同辈堂兄弟都是以“银”字排行的。以革命的眼光审视，“银”，就是银子，就是金钱，与政治挂帅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还要以“银”为“基”础，这名字显然散发着太浓的铜臭味儿。把这样的名字签在大字报上，感觉有点难为情，不合潮流，于是就萌生出改名的念头。

其时，我的「怒涛」战斗组因为观点的分歧已经不太出大字报了，但是还常在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对于共同度过的这一段艰难的不平常的日子都非常怀念，对于「怒涛」这个“窝”也很留恋，对“怒涛”这两个字同样倍感亲切。在议论外界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时候，我们约定，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怒涛”，以

¹ 譬如，《文革十年文献库》中收录了此文；当年翻印的用于张贴的大字报在网上被人收藏和出售；有些文革回忆录中摘录了此文的一些段落，谈到当年受压时读到它时候激动的心情。

² “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简称。

兹留念。

于是，我就成了“孙怒涛”。这名字，念着磅礴大气，想想豪情万丈。在9月26日对《少数赞》进行第一次修改的时候，我签上了已经用了好几天的新名字。这名字随着《革命少数赞》的流传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其他的几个同学，后来有的改名了，有的最终还是没有改。即使改了名的，可能是觉得在名字中用这个“怒”字实在不合适吧，于是就变通了一下，改成较为温和中听的“洪涛”。就我一人，“怒涛”到底。

1980年，文革已经结束了。一看到这个带着“怒”气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也是文革的“余毒”，越看越看不上眼。趁着工作调动的机会，我又想把名字改回来。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过来，到新单位报到的时候就能用原名了。于是，给派出所的经办民警说了一通好话，终于在户口迁出证明上改成原名。到了杭州，哪知道接收单位不认账。新单位的领导说，调令上写着的是“孙怒涛”，我们不能接收“孙银基”。左说右说就是说不通。没法，我只好再跑到迁入户口的派出所，对办事的民警又说了一箩筐的好话，请他在入户的时候仍旧用那个新名。这正是，想赶潮流学时髦，聪明反被聪明误，典型的瞎折腾！

前些年，曾有友人打趣我，说你们“大清帝国”的涛哥真不少呀！我自嘲：此涛哥非彼涛哥也！彼涛哥前程似“锦”，此涛哥名落“孙”山。这名字凶巴巴的，已经不合新倡导的“和谐社会”大潮了。友人拍拍我肩膀安慰我：好在你“名不副实”，模样看上去还没像名字那样“怒气冲天”。

可见，浅薄的赶潮流是会留下笑柄的。这就是明证。

我不得不佩服蒯大富在改名这件事情上，不随波逐流的独特个性。

这个“蒯”字，我读《三国演义》《史记》的时候曾经见过，知道是姓，但不知道怎么念。懒得查字典，就遵循“白字念半边”的不成文规则，我默念读作“朋”。

当大字报上见到“蒯大富”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念成“朋大富”了。可是大喇叭里工作组使劲批判的那个“大富”不姓“朋”的，才知道这个“蒯”字应该念成kuǎi。我想，在清华，像我这样的白字先生可能不止我这一个吧？我的好朋友汲鹏（压00）曾调侃老蒯说，把“蒯”由冷僻字普及为常用字，这绝对是老蒯对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我的名字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话，那么“大富”这个名字更是赤裸裸地在宣扬“封资修”了。早在6月19日，“胖老头”¹薄一波就对蒯大富说这个名字“不太好”，是“想发家致富啊”？[10]甚至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13-P71]。在破“四旧”的浪潮中，那时蒯大富已经不算反革命了，许多人都写大字报，强烈要求蒯大富改名，有的甚至要求他把姓也改了，说这样一个

¹ 薄一波与蒯大富谈话时自称“胖老头”。[13-P71]

谁也不会读的姓难道是要故意刁难全国的劳动人民不成？蒯大富面对一片要求他改名的另类浪潮，始终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

我想，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刘少奇正好选中清华当做他的新“桃园”注定了清华必然要出一个“×大富”；王光美蹲点的系正好就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王光美要来参加蒯大富班的座谈会又正好发生了点不大不小的误会。这些全都是巧合，是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的外在的偶然因素。蒯大富从高中到大学，热衷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有赶大潮流的强烈意识，但是不为小潮流所动，坚持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不惧高压，这些在文革初期的蒯大富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品德，是使蒯大富之所以成为蒯大富的内在的必然因素。

第四节 似是而非的对联，掀起血统论恶浪

8月初，「北航附中红卫兵」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搅动了全北京，也搅翻了清华园。大字报区，宿舍里，到处都是有关这副对联的辩论。

有人说，这副对联好得很，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有人说，这副对联好个屁，宣扬的是封建主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能打洞”的血统论。

如果对联就只是这上下两联，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能一眼看穿这副对联是错的，是宣扬血统论的，辩论就不会如此的激烈。

问题是，我所见到的对联，并非只有上下联，还有一个横批，叫“基本如此”，外加放在对联“门”中间的条幅，叫“鬼见愁”。意思是说，不是绝对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心中有“鬼”的人“见”到这副对联才发“愁”。

“鬼见愁”的恫吓对我不起作用。但是，“基本如此”的辩证说法迷惑了我。于是这副对联看上去就变得似是而非、是非难辨了。

当时，党的阶级路线的标准提法是三句话：1、有成分论；2、不唯成分论；3、重在政治表现。大学六年，经过多次的政治学习，我已能把这条阶级路线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后，还能一字不差。

拿对联与标准提法相比较，上下联的意思就是“有成分论”，横批中包含有“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意思。当然，对联是一种易记、通俗、简洁、形象的表达方式，与三句话准确严密的表述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对联并不是阶级路线完整的、严肃的表达，但我认为对联并无大错，基本正确。

8月2日“晚上，全校关于对联的辩论轰轰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刘菊芬主持会议，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

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2-P34] 我对刘菊芬这样高调的说话并不认可，这话说得太绝对了。但是我同意对联本身基本上“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我的最初观点。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站到讲台上，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着你报出身。听到“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掌声就差一大截。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稀稀拉拉的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每当听到与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还出现了“横扫一切浑蛋”的口号。总之，在客观上，最实践中，这副对联已经没有“基本如此”的遮羞布，只剩下赤裸裸的血统论。高干子弟趾高气扬，其他的畏首畏尾。出身剥削阶级的，龟缩在宿舍里，连出门都需要勇气。这副对联造成的“红色恐怖”，连我都感觉到很大的无形压力，更何况是出身不太好的同学。

把全校、全社会都卷入到对联的辩论中，不符合中央文革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¹的大方向。于是，江青出来讲话了。她说：“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P36] 不久，对联引发的风潮平息下去了，但是因对联造成政治上的压制和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难抚平的。

对于阶级路线，文革前我就一直在想：连三句话都有点多余的，其实就“重在政治表现”一句话已经可以概括一切了。党认为表现好的就依靠、就重用，党认为表现不好的就教育、就限制使用，还要前面的二句话干吗？后来我慢慢地琢磨，觉得自己想通了。光是“重在政治表现”，这标准不太好掌握，随意性太大。先讲“有成分论”，那就像是划了一条粗杠杠。成分好的，基本上就是要依靠重用的，成分不好的，基本上就是不能依靠重用的。然后，用“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再开一个小口子。成分好的，如果政治表现不好，就可能不被依靠重用；成分不好的，如果政治表现好，也能被依靠重用。当然，这些都是极少数。这样，阶级路线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贯彻了。

在文革之前，我从来都是想怎样正确理解阶级路线，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样

¹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面写道：“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就把刘少奇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革的路线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镇压学生，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旧是错误的。但当年把这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因为此前派工作组是惯例。譬如“四清”同样派工作组，同样把矛头对着基层干部。刘少奇执行的路线，本质上是党一贯执行而且屡试不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民众、对民族、对国家就一定是正确的？有利的？进步的？那是另一个可探究的话题）。只是因为此时不对毛泽东胃口了，所以被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签予以批判。

的阶级路线是不是有问题，究竟是错还是对。

文革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文革把左倾路线推至极左。文革前的阶级路线是左倾的，文革初期出现对联这一怪胎，同样把阶级路线由偏激推至极端。对联这样的血统论虽然退潮了，极左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一直是盛行的。文革结束后，太子党、官二代的兴起，说明某些“马列主义者”坚持的仍然是丑恶的血统论和世袭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在一百多年前寿终正寝了，但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要肃清还需极大的努力。

第五节 周恩来再来清华园，我有感动也有不满意

8月22日晚上，周恩来再次来到清华大学，还是在东大操场上，冒着雨对全校师生员工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

是什么原因让他与上一次来清华讲演相隔仅只18天又一次来到清华？

可能是因为受毛泽东之托过问清华的文革，所以他要格外的尽心在意？可能是因为中央全会已经开完了，他要把会议的精神尽快地传到清华，并通过这里传播到全国？可能是因为他对清华这段时间的运动不是很满意，所以来指明方向？

今天我仍然搞不清这些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代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来关心清华的文革，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凡是参加这次大会的清华师生和外地来京串联正好在清华的群众，无不为周恩来在雨中坚持不打伞一定要与大家同风雨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与在场的二万多名群众一样，齐声高喊着：“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我们年轻，淋点雨算不了什么。总理那么大的岁数了，淋了雨生了病可怎么办？

周恩来谈到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他们已经做了检查，还可以继续检查。而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来负的。他代表工作组，也包括他自己，表示“赔礼道歉”。

周恩来要求大家学好《十六条》，把“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成立起来，充分准备好了，就可以斗以蒋南翔为首的黑帮了。

周恩来的讲话，向来都是这样，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只是，这一次我听了以后，感觉没上次那么的兴奋和激动。

会后，大多数师生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可以接受的。也有一小部分师生感觉他的讲话是抹稀泥，给人的感觉是工作组已经检查了，错误也批评了，下面再不要在工作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我的看法也是属于后一类的。8月4日的讲演，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是明确地指出了“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

论清楚”。而这一次，周恩来认为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北京市新市委和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犯的，这个错误已经由中央全会解决了，所以下一步就应该成立领导文革的权力机构，进行“斗批改”了。我当时心里暗想，总理的讲话精神怎么与「八九」的观点这样相似的呀？

第二天，大字报区“贴出了几封给总理的信，表示不同意总理昨晚讲话中的一些意见（作者中哪个组织的都有）”[4-P43]。我在 24 日凌晨就贴了一张《敬爱的周总理，问您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可能就属于这“几封给总理的信”之一。我问他在 8 月 4 日大会上还不同意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而在 8 月 22 日大会上改变态度，是不是表示工作组的问题已经辩论得差不多了，下面应该斗蒋、斗黑帮了？我说我对此不理解。

今天再回头看看周恩来的这篇讲演稿，似乎在当时他并没有真正摸到毛泽东真实的思想脉络和意图。毛泽东并不满足中央全会上批评刘少奇的方向路线错误，不满足把刘少奇从第二号位置上拉下来。中央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周恩来上没摸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终目的，下又没有透彻了解因工作组反删而造成的情感隔阂和观点分歧是多么的严重，所以，他开出的这一帖药方注定是要碰壁的。

再仔细琢磨周恩来在清华的两次讲演，还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8 月 4 日那次，他说“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战友，我们要保持晚节”。8 月 22 日那次，他说“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听他讲演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他谦逊好学的态度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所感动。我不可能再往深细想下去。今天看来，在刘少奇倒台的前后这些天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一再地在向紫禁城里的毛泽东遥表忠心？

第六节 8.24 老红卫兵¹发飙，胆战心惊的红色恐怖

「八八」「八九」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再次讲话有所缩小。「八八」对他的讲话不太满意，「八九」在两天以后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位从老二降至老八，大家知道了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挨批了，降职了。既然王光美是工作组的“组员”，那刘少奇不就是清华工作组的幕后指挥和后台老板吗？做这样的联想，提这样的疑问，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但是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略的。

8 月 19 日凌晨，就在毛泽东身着戎装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以后的几

¹ 慰老红卫兵，是指最早的那批红卫兵组织。在清华，老红卫兵专指「清华大学红卫兵」。

个小时，政治嗅觉敏锐而又无惧无畏的唐伟、陈育延、吴栋以「向日葵」战斗组之名贴出了轰动全校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8月22日，又贴出《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矛头所向，十分明确。

一时间，在大字报区贴了不少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有涉及到李雪峰、薄一波、陈毅等等的，也有几份对周恩来8月22日讲话表示异议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针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其中甚至有《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这样重磅的大字报。

这些直接点名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招致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极大愤慨。这些天来，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大字报区的动向，一直在制造“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舆论。现在，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要重拳出击了！

8月24日下午，在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首，纠集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二所院校的中学红卫兵，在清华大学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名为反击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妖风，实为震慑敢于造他们老子反的群众。

那天下午，我正在礼堂大字报区转悠。忽然，从大喇叭里传出比平时高八度音播报的《最后通牒》和《安民告示》。“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谁敢阻扰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立即打断他的脊梁，焚尸扬灰。当剐千刀，罪该万死！”的叫喊声震耳欲聋。还勒令那些写中央首长大字报的作者缴出底稿和抄件，自行撕去大字报，否则，“红卫兵小将的铁拳头就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这讨伐檄文的杀气腾腾早把《安民告示》的一丝“温情”刮得无影无踪。

这边高音喇叭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咆哮，那边从二校门处涌进一大队高举红旗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一边高呼革命口号，一边雄赳赳地行进。

大字报区，有人拿着照相机不断地对那些疑似反动的大字报拍照留存，还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撕大字报。大字报区顿时一片狼藉。

这股“矛头直指混蛋”、“狗崽子们”¹的大队人马犹如洪流，威风凛凛，气势逼人。所到之处，路人或在看大字报的人纷纷靠边，退避三舍。

我站在路边，看着潮头向我涌来，经过我的面前，向着大礼堂涌去。我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心里打鼓。想起清晨刚刚贴出的那份大字报，我想一定已经被当做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拍照留存，只待秋后算账了。那“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好像就是冲着我喊的。尽管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心里想，在他们的眼里，我这样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学生。我真心想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我真心想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但是，“革命”、“造反”统统都是左派的专利。我要是想这样做，就不是“造反”，而是“翻天”了！

¹ 这些都是《最后通牒》里的用词。

我似乎又穿越到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世道。这里不是说理的场所，也不是看热闹的去处。我立即选择了第三十七计——溜为先。虽不是落荒而逃，绝对像脚下抹油，赶紧溜回宿舍。

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头天晚上二校门被推倒了。

清华的二校门，她是清华园最著名的标志，也是我最喜欢的建筑。想当年，我就是被招生画报上二校门的英姿深深吸引而报考清华的。第一眼见到她，那感觉犹如一见钟情。到清华以后，我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二校门前留的影。

我赶紧跑去，二校门已经不复存在。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厚重浑圆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那块空空荡荡的地，就像是我空空荡荡的心。

听说那天晚上，学校里的黑帮分子（主要是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书记们）、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红卫兵抄家、抓捕、毒打，关押，受尽凌辱。在他们的皮鞭下，搬运二校门废墟的砖头石块。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劈头盖脸地抽打。这些人平时从没有做过如此重的体力活，在抽打和呵斥声中，连滚带爬，哀叫不断，景象惨不忍睹。

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无论是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把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予以强制剥夺的恐怖。

这场“红色恐怖”，喊的口号是镇压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右派翻天，干的实事是撕毁大字报威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的旗号是破“四旧”拉倒二校门，惩罚对象是黑帮分子右派分子反动权威。这批老红卫兵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些当事人仍三缄其口，不敢对历史做一个负责的交代。

8.24事件是清华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是红卫兵组织第一次以红色恐怖的名义进行文革的暴力事件。它像是一根耻辱柱，将面目狰狞血腥的“贵族红卫兵”¹牢牢地钉在其上。

八个月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在二校门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高大雄伟的领袖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尊巨像，据说在当年的中国是第一座。

九一三事件²以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³，从伟人像的基座上铲除了，以图抹去人们头脑中深刻的记忆。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塑像被拆除，庄重的二校门又在原址上重建。

历史，总是螺旋形上升的。

¹ 陆小宝校友在他的一篇政论文中，曾将由贺鹏飞、刘涛、刘菊芬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称为“贵族红卫兵”，将由唐伟、蒯大富、沈如槐分别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414称为“平民红卫兵”。

²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出逃，机毁人亡，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³ 林彪题词的全文是：“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毛泽东塑像揭幕之前，蒯大富通过叶群请林彪题词。题词原件上本来还有“清华井冈山兵团题”一行字。在1967年五一节后第二天，林彪题词在全国报刊公开发表。从此，毛泽东塑像在神州大地到处耸立，“四个伟大”的颂歌响彻云霄。

第七节 勇敢的「八八」，逐渐迷失了方向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才五天就发生的 8.24 事件，是它最嚣张的“革命”举动，也是它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疯狂的反扑。此后，这股保皇势力渐渐衰落，再也没有像样的作为。

作为它对立面的「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政治高压下，一直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批判「八九」和「清华大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

但是，慢慢地，「八八」似乎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吧，叶林已经做过检讨了，那诚恳的态度，连周恩来都被感动了，为他说了不少好话。况且，周恩来已经明确说了，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上面。工作组不过是执行错误，怎么能老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呢？

如果「八八」也开始斗黑帮，那与「八九」的主张又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

这时，大批学生开始离校去外地大串联。与火红的红八月相比，九月的清华园里显得有点冷冷清清。「八八」徘徊不前，有点举棋不定，难有作为。

我认为，此后的「八八」在两件事情上有所失误：

一件是，虽然「八八」召开过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的大会，但是，仅仅翻案到“工作组反蒯是矛头向下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为止。在对蒯大富翻案的问题上，「八八」没有新的建树。

「八八」的主要领导认为，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是工作组，给蒯大富平反的是共和国的总理。总理都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了，何必要「八八」再去平反呢？在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上，「八八」没有责任，在为蒯大富平反这件事上，「八八」也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尽管周恩来亲自解放了蒯大富，给他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包括「八八」在内的大多数师生并不承认蒯大富是一个好人，更不是左派。“蒯大富够不上反革命，也不能算是好东西”是当时大字报常见的一句话。而一些铁杆的「八九」依旧认为蒯大富是反革命。也就是说，蒯大富和蒯派，只是名义上的平反，并没有实质性的平反，并没有平反到位。他们依旧是臭烘烘的。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应该把工作组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冲洗干净。这是对「八八」的基本要求。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

他们就是革命左派。这算是对「八八」的高要求。

但是，「八八」连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得很好，更别提做到高要求了。于是，在我听来，「八八」高喊“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口号，显得有点干巴巴、空洞洞的，没有落到应该落到的实处。

为什么「八八」会这样？究其原因，我认为「八八」这些人，在反蒯时期虽然对工作组的反蒯有所不满，但是基本上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在「八八」的眼里，这些蒯派在工作组进来没几天就怀疑工作组，又没有多少让人信服的理由。而且，这些蒯派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可揪的辫子。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反工作组是革命行动，他们是革命左派。能给他们平反就已经不错了。要承认他们是革命左派？没门儿！工作组的错误只不过是不该在那个时候把蒯大富这些人整成反革命而已。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他们怎么可能为蒯大富和蒯派真正平反呢？

另一件事情是在对待蒯大富能不能参加「八八」的事情上。「八八」曾经主动邀请蒯大富同班的亲密战友，也是全校出名的大蒯派鲍长康（工化9）参加「八八」。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吗？答复是：他不行的。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据唐伟说，为加入「八八」蒯大富曾找过他，他回答说需开会决定。在「八八」的联席会议上，唐伟和陈育延的态度中立，其他几位核心激烈反对。于是蒯大富加入「八八」之事只好作罢。

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中的蒯大富收罗在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

唐伟见识非凡，勇敢聪慧，在坚决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

不仅如此，因为「八八」没有理直气壮地为蒯派彻底平反，没有果断地接纳蒯大富成为“思想兵”¹，这也为日后蒯大富反唐（伟）反托（派）反「八八」找到了“理由”，同时，也为团派与414的矛盾分歧埋下了一个祸根。

我那时只是普通一兵，不了解「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内情。据后来唐伟、陈育延批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右倾和软弱无力，另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举动来看，过于责怪唐伟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看好蒯大富，自会有人对蒯大富感兴趣。此后，心怀叵测的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频频与蒯大富或明或暗地接触。他们对蒯大富极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为后台的

¹ 当年戏称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人叫“思想兵”。

工作组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是一颗大有利用价值的棋子。面对以中央首长名义伸出的援手，任谁都不会拒绝。并没有彻底翻身的蒯大富绝非是一个甘于沉寂的平常等闲之辈，他总想在文革中有一番大的作为。这一拍一合，清华文革舞台上更精彩的一幕大戏就要开演了。

第五章 「井冈山」一统清华错误不断 (1966.10—1967.4)

第一节 应邀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筹备会， 不为所动

那是 9 月 21 日，我在新斋前面东西走向的那条马路上看路南的大字报。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忽听身旁有一个人问我：“你是孙怒涛吗？”

我扭头一看，是个我不认识的同学。也是瘦高的个子，也是戴着一副眼镜，长得眉清目秀的。

我疑惑地看着他，回答说：“是的呀！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他微微一笑，说：“看过你写的《少数赞》，我当然知道的啦！”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鲍长康。我一听这名字，顿生钦佩之意。原来他就是那个除了蒯大富以外，与刘才堂、刘泉等齐名的大蒯派啊。

当时以蒯大富为首的工化系 902 班有好几个学生一起反工作组。在工作组全校批判蒯大富的时候，鲍长康、刘才堂也是时时被提及的蒯式人物。那时，我对鲍长康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我转过身来，与他面对面的站着，对视着。我的脸上肯定写满了惊奇。惊奇我面对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鲍长康，更惊奇他怎么会认得我？

当时清华有一万多名学生，住在 1~13 号楼及新斋等学生宿舍。1~4 号楼及新斋等在西区，靠近学校中心区，5~12 号楼在东区，13 号楼孤零零地戳在这两区中间的北部。一般一个系的学生都住在同一幢楼。在同一个楼住又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的同学彼此常打照面，还能面熟。

我住东区 12 号楼，鲍长康住在新斋。这次在西区的大字报区碰到，肯定是偶遇。但他能估摸出我是谁，真的让我很惊奇。

鲍长康确认了我以后，对我说，晚上在二宿舍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问我愿

意不愿意参加。我说，好的呀！有人邀请我参加会议，听听看看，多点消息，长点见识，又有何妨？

我回到宿舍，老许等告诉我，说张云辉来过了，留了一张条子，是通知我晚上参加会议的。我想，看来蒯大富他们已经把我给惦记上了。即使没有我与鲍长康的偶遇，留条还在宿舍里等着我呢。

开会的地点是在学校西北角的二宿舍，比较僻静，离工化系学生的宿舍楼不远。

与会的有 20 多人。要说认识，只有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过的蒯大富和刚刚认识的鲍长康二人，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经介绍，有彭伟民、张云辉、刘刚¹等人。他们之间互相认识的很多，估计不少是工化系的蒯派们。

蒯大富是会议的主持人。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个会上最活跃的人物。

蒯大富的口才，我已经在他与工作组的全校辩论会上领教过了。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楚，不打草稿，可以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宏论。相比较那些磕磕巴巴念着发言稿为工作组辩护的对手们，着实要更胜一筹。

蒯大富首先传达了张春桥与他的谈话内容。为了强调重要性和可信性，他看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念了两遍。

蒯大富告诉与会者，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他接着分析清华的形势，指出「清华大学红卫兵」是老保组织，已经溃不成军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右倾的，斗争性不强，在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上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也不为被工作组错误批判压制的蒯派真正平反，他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蒯大富情绪激动，握着拳头说：“所以，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真正能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彻底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与「清华大学红卫兵」斗争到底！”

接着，大家发言、表态。在蒯大富的鼓动下，多数发言者显得很兴奋，很激情，纷纷对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的设想表示支持，愿意参加。以蒯大富为首的几个核心人物，显然已经在事先有过密谋。他们的初步设想，经过大家七嘴八舌的补充完善，新的红卫兵就要由策划变为实施了。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井冈山红卫兵」的筹备会。

与绝大多数与会者热烈表态、踊跃参加不同，我一直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听着，心里在思考着、盘算着。我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对于蒯大富，除了他的口才，我更佩服他在政治高压下坚持不屈、以绝食抗争的胆量和勇气。

薄一波这个倚老卖老的副总理在大字报区偶遇蒯大富，就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说他“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10] 工作组更是不知道给他戴上了多少顶反革命的帽子。这样罕见的政治压力，在清华

¹ 刘刚是清华附中高年级女学生，与蒯大富关系密切。据蒯大富说，「井冈山红卫兵」的名称是刘刚起的。[13-P138]

几乎没一个人能顶得住。如我，刚有一点压力就早早地做检查，趴下了。

我自知没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因而就格外佩服那些无畏无惧敢于抗争的英雄们。过去敬佩的是那些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在当时我佩服的就是蒯大富。

但是我很难认可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有必要反工作组。那点起因、那点理由，并不能得出“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结论。所以，要我承认他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路线觉悟，我做不到。倒是工作组在全校一反蒯，真的让起初大方向并不怎么错的工作组开始犯错误，让蒯大富“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预言”竟一语成谶。

至于所谓张春桥的接见谈话、中央文革支持之类的消息，我半信半疑，对此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总觉得，自己要不要参加这个即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应建立在对大局形势的判断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位中央首长的态度上。

我在申请参加「自控系红卫兵」的时候是那样的冒冒失失，而在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时候显得谨小慎微。是因为从反面吸取了教训，还是因为政治上成熟点了？

我对蒯大富的形势分析是完全赞同的，也认为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是必要的。所以，我内心是倾向于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但是有两点让我犹豫的因素：

一个是，我当时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尽管我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现状很不满意，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帮助它，不应该另起炉灶。何况我已经是“思想兵”，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改换门庭，从这个红卫兵组织跑到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去呢？

与会的这些蒯派们，他们大多被工作组在全校或全系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批判过，都是很出名的蒯派。这群香味没有余臭尚存的蒯派们，即便他们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不是很乐意地欢迎他们还很难说。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失望情绪越大，要抱成团建立一个自己红卫兵的心情也越是迫切。这点上，我与他们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我来参加会议之前，「怒涛」战斗组的组员们已经对老蒯叫我去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有了估计。老许、老林态度严肃地告诫我：你要去参加会议听一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蒯大富要拉你参加一个什么组织，那是坚决不能同意的。为了战斗组的团结，我在来前答应过他们一定不会擅自参加新的组织。

所以，当大家都表过态会议几近结束的时候，蒯大富见我一直没说话，就问我：“老孙，你怎么样？”我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确实很沉闷，我也感觉憋得慌。但是，虽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斗争不坚决，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帮助它，另搞一个红卫兵，可能不是太合适吧？所以我要再想一想。”蒯大富听了我的发言，感到非常失望。他知道我没有参加的意思，就叫我好好的再考虑考虑。

虽然没有表态参加，但我心里还是很牵挂着这件事。于是，在第二天晚上我又跑到二宿舍。蒯大富他们正忙得要命，几个人在起草「井冈山红卫兵」的宣言、

通告、组织原则等文件。我有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看到蒯大富正在起草一份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条件，上面写着，第一条是要有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第二条是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觉得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就对蒯大富说：第一条与第二条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比较好？蒯大富说，现在就是要特别强调“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我觉得与他有点话不投机的感觉，于是就知趣地悄悄离开了。

9月23日，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宣告成立。

「井冈山红卫兵」的出现，在校内并没有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因为在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好几个新的红卫兵组织，如「遵义红卫兵」、「延安红卫兵」等等。但是，「井冈山红卫兵」毕竟这是由全校闻名、颇受争议的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所以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像我这样参加了筹备会议而没有当即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人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数人比我有更强的敏感性和决断力。

第二节 大局明朗，赶紧上了「井冈山」

国庆前后的那些天，清华园里虽有纷争，但总体平静。算得上新闻的，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了分裂，有了两个总部：「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我那时正被指派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方队，为练习正步走而集训。

10月2号，《红旗》杂志13期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

看了这篇社论，我立即意识到校内前一阶段关于当前运动的主要任务究竟是斗黑帮还是深入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争论，中央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应该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清华主要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本来就站在工作组这一边，与工作组沆瀣一气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其思想右倾，软弱无力，内部分裂，无法再深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新近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高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才是我校新兴的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前几天没有大胆果敢地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一旦明白了下一阶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也知道了我该怎么做。既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经明显落伍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死守着它不放，不去投奔「井

冈山红卫兵」呢？为什么一定要被「怒涛」战斗组其他同学所牵制，不敢孤身前行、勇往直前呢？

我当即写了一篇表态的大字报，贴在土建系前面的大字报区。题目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逼上井冈山，跟党闹革命》。那一天，是 10 月 3 日，我“上山”的日子。

这个“逼”字，在我写大字报的时候也感觉到有点言过其实。起码，当时并没有人把我逼得如林冲逼上梁山那样的地步吧。所谓“逼”，真实的意思是我有一种被形势所“逼”的紧迫感，要再不“上山”就要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了！

十天前，鲍长康客气地请我“上山”，蒯大富热情地邀我“落草”，我没有答应。那个时候我只要点一下头，就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二十来个元老之一了。现在是我自己主动来投靠“山寨”的，有那么一点点“敬酒不吃”的尴尬。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而不敢“上山”。因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听到了中央的声音看清了大形势而不是仅仅因为上面有某某某支持才下决心的。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也看透了自己不是那种造反精神很强、思想前瞻、敢于冒险、胆子很大的人。我的路线觉悟显然比那些早于我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们要低得多，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10 月 6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更让我惊奇和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大会上，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的红卫兵宣读“誓词”。

这个场面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中央果真是支持蒯大富的。蒯大富那天晚上说他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话确非虚言。而我在前几天果断地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井冈山红卫兵」时来运转，今非昔比。它的门前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蒯大富也从此真正走出清华，名扬全国。

第三节 受蒯大富重托，组建「第一湘江」

我来到当时「井冈山红卫兵」所在地的丙所。蒯大富听了我的来意，很大气，对我这个看清形势才“入伙”的人，依然表示了热情的欢迎。那个时候，「井冈山红卫兵」正利用有利时机加紧招兵买马，趁势扩充队伍。蒯大富对我说：“老

孙，看过你写的《少数赞》，你文章写得不错，我这里已经有两个直属战斗组了，你来筹建第三个战斗组吧！”

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希望这第三战斗组也能成为他的很有战斗力的又一嫡系战斗组。我答应了。于是他把最近投奔到「井冈山红卫兵」并已被批准加入的一摞申请表给了我，让我自己挑选。我按照不保校党委、不保工作组等标准从中选择了几个人。

就这样我筹建了「第一湘江」¹。湘江，哺育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诞生过极有影响力进步刊物《湘江评论》。这是一个我心仪向往的神圣之地。那个时候，取战斗组的名字，好多都是与红色经典有点关联的。

「第一湘江」的第一个成员就是王允方（工化00）。他是老蒯特地向我推荐的，我当然格外看重。他是上海人，长得很清秀。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能感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和机灵。他是化001班的，与蒯大富同系。9月28日，他由他的同班同学、「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的彭伟民介绍参加的，“上山”的资历比我还要老好几天。他也是被工作组狠整过的蒯派。

我与他刚开始相识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随着彼此交往的加深，我发觉我们俩很合得来。他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观点也不偏激，与我非常一致。他人品极好，为人真诚、热情、谦和、宽容，极有正义感，富有同情心。他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好，出手也快，是「第一湘江」的主力笔杆子。一手秀气飘逸的好字，也让我很欣赏。他有非常出色的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所交朋友很广泛，有良好的人缘，这些正是我所欠缺的。他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更乐意在底下做一个出谋划策、协商沟通、穿针引线的人。这点与我正好互补。那几年中，他是我最信得过的“高参”，我的好多思想都是由他那里得到启发，甚至就是直接从他那里“贩卖”过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了解、磨合以后，经过几次政治风浪的考验以后，我们成了挚友。几十年来，我与他的友谊始终如一，延续至今。从我走出班级以后，我有幸在清华大舞台上结识了不少有思想、有见地、有才气、敢担当的优秀人物，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良材，王允方就是我所结识的这批朋友中的第一人！

「第一湘江」的其他成员，还有刘惠明、殷江昊（殷长实）、刘国先、沈文龙、万挺（万陵馨）、戎兵、常峰、小宋，总数正好是十个同学。王允方说他“上山”的时候「井冈山红卫兵」才五十来人，到我组建「第一湘江」的时候，可能才百把人。蒯大富为了筹建第三战斗组，一下子就同意让我挑走了这么多人，足见他的魄力以及他对我的器重。

「第一湘江」的第一次全组会议各自先做自我介绍。原来大多数都是大大小

¹ 最初的名称叫「湘江」。

小的蒯派，挨整受压的。大家来自不同的系不同的专业，自控系的有好几位。既有像我这样大六的高年级学生，也有大一的小学弟。如刘惠明（自 6）是与我同系同年级的高年级同学，他为人诚恳，处事稳重，考虑周全，特别能够团结人。殷江昊（自 0）是低班同学，他性格和善，勤于考虑，思想敏锐，文笔快好。他们都是组里最有力的骨干。这样一个跨系跨年级的战斗组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有利于信息的交流、思想的活跃、视野的开阔、见解的互补。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进行，有个别组员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又陆续补充吸收了一些新的组员。程树楷、李忠智、贾维平、唐松立、陈柏年、王芳、邵群涛、小吴等都曾经是「第一湘江」的组员。

我在这里列出了「第一湘江」的组员名单（可能还有个别遗忘的），是因为我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有过难忘的经历。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想念他们的，尽管后来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在 414 闹分裂的时候，有一部分组员离我而去。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唐松立（汽 02）同学。他因为在组内发表“可以给毛主席贴大字报”这类当时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反动”言论而引起全体组员的公愤，大家一致举手通过把他开除出组。现在想来，这样粗暴无情地对待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同学，我作为组长，尤其感到深深的愧疚。相比较这些先知先觉的同学，我那时的思想还完全停留在“贴毛主席的大字报、反对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统统都是反革命”这样的认识层次上。

蒯大富叫我筹建第三战斗组的时候，还特意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清华大学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假红卫兵”。我同意这个观点。于是，「第一湘江」出的第一篇大字报，就是这篇文章。贴出去以后，反响很大。于是，又连续写了二评、三评。至于其他还写了点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蒯大富说的第一第二直属战斗组叫什么名字，谁是组长，我一直不知道。或者，他告诉过我，我没往心里记。很多年后，我听闻第一战斗组叫「红辣椒」，只有一个人。第二战斗组可能是个空号（或者没怎么活动过）。只有我这个第三战斗组还比较人丁兴旺，在学校里小有名气。我与那两个战斗组没有什么往来，也没搞过联合行动。这是有点奇怪的。除了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这一想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大串联的冲击波引得我们都是眼睛向外，人心浮动了。

第四节 南下串联，病困南宁

八九月份的时候，串联之风开始刮起来了。到了十月份，学校里已经显得有点冷清。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清华园里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风头渐长的「井冈山红卫兵」、日渐消退的「毛泽

东思想红卫兵」，还是已经作鸟兽散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都纷纷外出去串联了。

延安、井冈山、遵义这些革命圣地，自然是狂热的红卫兵最想去顶礼膜拜的首选地。许多红卫兵都是徒步而去，走红军曾经走过的路，经风雨、见世面，既是学习，也是锻炼，更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播撒到神州大地、穷乡僻壤。

还有不少去全国各大城市的。那时去广州的人非常多，听说刘涛也去广州了。我与大家商量了一下，10月中旬，我们也随大流去了广州，后来又去了南宁。

我们一行十个人乘火车南行。当火车行驶经过长沙的时候，我们遥望湘江指指点点，心潮澎湃，因为我们将是「第一湘江」战斗组。

那时，串联的学生南来北往，火车上的人挤得一塌糊涂。能四五个人挤着坐一张座椅已经是最好的享受的了。钻到座位底下躺一会儿更是“卧铺”的待遇。过道里、座椅前、厕所里，到处都挤着人。许多人只能站一条腿，另一条腿无插足之地，就这样始终保持金鸡独立状。车厢就像一个巨大的沙丁鱼罐头。

列车上，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隔壁是一列空闲着的卧铺车厢，过道门锁着，进不去。有人把门弄开了，于是大家蜂拥而进。我们战斗组的几名疲惫不堪的女同学也转移过去了。她们叫我也过去。尽管我已经略感风寒，精神不爽，我知道我是不能过去的。要是一过去，万一出点事话就说不响了。

不一会儿，在卧铺车厢里有人在大声吼道：“谁把车厢门撬开的呀？这是违反铁路规定的！是谁想造反呀？”

没人吭声，吼叫声还在继续。

我挤过去一看，见是一个乘警神色恼怒地在咆哮。我说，门是我打开的。

他见我出头，气愤得说话都打结了，冲着我说：“你……你……你这是在搞破坏！”说着说着，他把手伸向腰间，要掏匣子枪。

我见他想要动武，就吓唬他：“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敢把枪对着毛主席坚决支持的红卫兵吗？现在那么多的红卫兵挤在车上，有的已经生病了，你却空着卧铺车厢，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

我拉着虎皮当大旗对他扣着大帽子一阵咋呼，还把歪理讲得理直气壮。我们战斗组的人也一起为我帮腔：“你看，我们队长（他们把我从组长升级到队长了！）自己还挤在那边的车厢里，只让这些有病的身体弱的红卫兵来这里休息一会儿，你可不能站在红卫兵的对立面，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呀！”其他学生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起哄。

这位乘警气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我们人多势众，他孤掌难鸣，不敢真的动手犯了众怒，只得悻悻地走了。走前撂下一句话：“千万别把卧具弄脏了！”

他的身后是我们的一片掌声。这既是我们的自我庆祝，也是对这位乘警敬业精神的敬意。真要是讲道理的话我们是讲不过他的，于是只好用“革命的名义”

把他气跑了。好在这也不是一件原则性的事。

我们到南宁下了车。在西南民族学院落脚。

那时，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谁见了都敬畏三分。

虽说大串联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但是我们这个战斗组在广州，在南宁，说话行事都比较谨慎。我们只是到各个学校或机关看看大字报，了解当地文革的形势。我们完全不是那些老子天下第一不顺眼就轮起铜头皮带打人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我们毕竟是大学生，比他们更多知道一点“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

于是，多看、少说、不轻易表态，不深度插足当地的运动，成了我们每到一地的言行准则。就这样，我们在南宁的一些院校和机关里串联了几天。

就在此时，我得病了，大家把我送进了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一检查，没想到还挺严重的，得住院治疗。

本来我们打算离开南宁后，再到别的地方转转的。我不能同行，怎么办？总不能让那么多人都陪着我住院吧？

与王允方等商量，决定大家先返回北京。因为已经出来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学校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了，大家心里都很记挂。

他们商议后要留一两个同学陪我住院，我坚决不同意。我这毛病，能吃能睡能走动的，只是有点发烧和胸痛，用不着陪护的。于是，全组人马返回北京。

经诊断，我开始得的是肺炎，后来转成胸膜炎，胸腔里已经有大量的积液。

我体质向来较弱。1米8的个子，只有一百十几斤重。瘦长体型，像豆芽菜。再加上文革以来，思想紧张，压力剧增，作息无规律，常通宵达旦地折腾，就这样积劳成疾，累垮了。

几次穿刺抽液，抽出了许多带血的积液。打链霉素针，吃雷米封药，经过治疗，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

我给王允方写了一封信，开玩笑地说，每天要在屁股上钻Φ0.8的小孔若干，现在都已经没地方下钻了。

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疗条件很不错。虽然在文革中，这所医院的医疗秩序当时还是比较正常的。他们对我进行积极认真的救治。

有个小护士，对我这个清华大学来的红卫兵，格外的尊敬和照顾，护理十分细心，连我的内衣内裤也一定要帮我洗，令我深为感动！

感觉自己已经不发烧了，不胸痛了，胸腔内也没积液了，我要求出院。主治医生说，才半个月，刚控制住病情，要马上出院，那不行的。

我心里实在惦记着学校的运动。离开了「第一湘江」，我心里空落落的。

医生无奈，对我说：你这个胸膜炎是结核性的，体质下降的时候结核菌就要

活动。结核菌跑到哪，哪里就得结核病！跑到肺里得肺结核，跑到脑里得脑结核，跑到骨头里得骨结核。你出院以后起码要好好静养半年！

医生的话吓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将信将疑，点头连说是、是，但是我还是要求马上出院。医生不好强行劝阻，把话说到了也就尽到责任了。很可能对我这样从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也不敢多说吧？

住院 17 天，一出院就上了火车。革命大串联时期，想到哪地方就可以到哪地方，很方便。

那已是 11 月下旬。北上的时候，真想拐道到上海看看爸爸后再回北京。我已经二三年没见到爸爸妈妈了。妈妈在老家乡下，要从杭州再转火车、汽车、走路，很不方便的，所以没敢想。爸爸在上海，较为顺路的。

从株洲折东经上海回北京与从南宁直接回北京，路远不了多少，时间也耽误不了几天的。但是这个念头刚一闪，就觉得心里不安，脸上发烧。别人都在全身心地搞文化大革命中，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殊死的战斗，我怎么可以为个人私事而忘却我的责任呢？这“私心一闪念”让我羞愧不已，决定直接回北京。

回到学校，见到王允方他们。大家见我病愈了，都很高兴。至于医生在我出院时的医嘱，早被我抛到脑后去了。在这革命的年代里，在这激荡的校园里，我没法静心休养。我想，拼了命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

第五节 为促三总部联合，成立「天安门纵队」

到了 11 月份下旬，外出串联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回校了。学校里又热闹了起来。这段时间我与蒯大富走得很近，彼此经常讨论一些问题。

有一天在甲所，因为太晚了，老蒯留我，他房间里正好有个空铺，我也懒得回宿舍去，于是就在老蒯住的房间里睡了一夜，聊了不少天。

11 月份的清华，「清华大学红卫兵」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支独秀的「井冈山红卫兵」以外，还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遵义红卫兵」这些林林总总的红卫兵组织。

报刊社论在宣传，中央首长在讲话，都要求各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下面的群众，隶属于不同红卫兵组织的战斗组，纷纷贴出大字报敦促头头们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的号召，呼吁尽快实现大联合。

我和「第一湘江」的组员们都觉得，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的局面应当尽快结束。我们也与其他的战斗组一样大声疾呼，要求联合。

但是，无论是人多势众的红卫兵，还是只有“七八个人十来条枪”的红卫兵，虽然嘴上都表示愿意联合，但是各打各的算盘，各怀各的心思，对于联合的态度

也各不相同。

各个红卫兵之间政治观点上有分歧，难以求同存异，这当然是主要的障碍。心存疑虑也是原因之一。可能有想趁机吃掉别人的或怕被别人吃掉的，可能有宁做鸡头保持独立自由、不做凤尾任人摆布的。总之，在联合问题上，我们在下面看到的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很缓慢。

从11月底开始的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开门整风，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联合做思想上的准备。“11月30日 成立由小组长联席会议产生的三总部整风领导小组，有「第一湘江」、「第一红岩」、「老实话」、「锷未残」、「1018」等小组各派一名代表组成。”[4-P69] 因为这个机缘，我在整风领导小组里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

群众积极要求联合，头头顾虑重重。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对我所在的「井冈山红卫兵」进行炮轰，敦促蒯大富顾全大局，下决心赶快联合。

王允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把学校里有影响力的分属于不同红卫兵的战斗组先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促进联合，说不定会极大加快联合的进程。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有道理，而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于是，我们就先找我们的邻居「轮机兵」谈去。

「第一湘江」刚成立的时候在学校西区找了一个地方，大串连回来后搬到了新水利馆。新水在大礼堂的东侧，地处学校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那时，学校的各个教室，只要你愿意，只要是别人还没有占据的，你都可以占为己用。古人叫占山为王，我们是占教室为王。或志同道合，或游说拉拢，不管通过什么办法，能拉多少人“入伙”，就能竖起一面多大的旗，围起一座多大的“山寨”。

我是「第一湘江」的“山大王”，汲鹏是「轮机兵」的“山大王”。

「轮机兵」早就占了新水403。我们刚开始时在新水找不到地盘，就找他们商量，合用一间教室，暂时栖身。

不久，我们找到新水311落脚，「轮机兵」搬到新水308，我们依旧是相距很近的邻居。

「第一湘江」是跨系的属于「井冈山红卫兵」的战斗组，「轮机兵」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战斗组，基本上都是汲鹏所在冶金系的同学。我们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彼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当一致，观点都比较温和，彼此相处十分愉快，所以我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门。我与陆小宝、周家琮、冯海、张蔼玲、雷翎、冯韵芬、卢清萍、顾家琳等「轮机兵」骨干，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

当我们把以下促上实现大联合的设想与他们一说，他们觉得确有道理，很感兴趣。只是感到就我们这两个战斗组，力量太小了一些，影响力也不大。于是决

定由王允方、陆小宝等再去串联别的战斗组。

据王允方说，他一个人就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他说他自报家门是「第一湘江」的孙怒涛让来联系的，于是受到这些战斗组的友好接待。对于我们的建议，多数表示赞同，也有一些表示不感兴趣。听了串联了一圈回来的王允方的汇报，大家都很受鼓舞。

12月15日，在「第一湘江」所在地，由我召集并主持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所属部分战斗组成立「天安门战斗兵团」¹。”[4-P79]这里所说的“部分战斗组”就是「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锷未残」、「巴黎公社」、「红色风暴」、「红鹰」、「第一燎原」、「人民万岁」、「第一红五星」、「第一送瘟神」、「无名」、「沧海横流」等。

在有十几个战斗组近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明确提出我们这些战斗组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的战斗团体的目的就是要以下面战斗组联合的实际行动来促进上面几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大家在发言中纷纷表态：头头们不联合，我们下面先联合！

关于新团体的名称，大家提了好几个名字。议论比较了一番，各有长短，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我提议用“天安门”这个名称。一来，天安门也是如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名称一样，都是红色革命的象征。二来，我坦率地对大家说，我希望我们这个新组织的基本观点不要像某些人的观点那么左，也不要像另一些人的观点那么右。我不喜欢走极端的思想倾向。我说：“我们不要做‘东单’，也不要做‘西单’，我们要做中间的‘天安门’！”

最终大家都同意「天安门战斗兵团」这个称谓。由「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起草的「天安门战斗兵团」成立宣言也顺利通过。

关于「天安门战斗兵团」的组织机构，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实行战斗组组长联席会议这种形式。除了联席会议的决议必须执行以外，各战斗组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所以，这个「天安门战斗兵团」实际上是由十几个战斗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而且有意思的是，大会没有推选或指定「天安门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或者召集人。任何一个战斗组组长都有权召集联席会议，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民主管理的好形式。

会议还决定，回去各个战斗组以促联合为主题出一批大字报。于是，第二天，以“天安门战斗兵团××战斗组”署名的一大批大字报占据了大礼堂中心区的显眼位置。这众多的大字报在分量和气势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这样的声势和

¹ 几天以后马上改名为「天安门纵队」。

影响是单打独斗的某个战斗组无法达到的。

很荣幸的是，我因此结识了高季章（水9）、王良生（水9）、段云富（工化6）、彭正光、黄瑞和（工化研）、吴国是、孙扬名、杨成勋、颜慧中、胡鹏池、郁强、李贵芝、李伯川、邹得和、郭创贤、林蓓蕾、董建尧、任敦渭、刘延荣、杨秋生等一大批好友。

蒯大富听说是我发起成立了「天安门战斗兵团」，很不满意。崔兆喜（电9）受他之命专门为此事跑到新水来找我。

那天我正好不在，是王允方接待的。后来王允方告诉我，崔兆喜问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把「第一湘江」从「井冈山红卫兵」中拉出去？他说老蒯担心不仅原有的几个红卫兵还没有联合起来，现在又多出来一个「天安门战斗兵团」这个山头，更难办了。他说着说着，难过得都快要掉眼泪了。王允方一再向崔兆喜解释事情的原委，一再表示「第一湘江」不会脱离「井冈山红卫兵」。一旦大联合促成，「天安门战斗兵团」将服从联合总部的领导。崔兆喜听了，将信将疑。

在中央的号召¹以及群众的敦促之下，1966年12月19日上午，由蒯大富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唐伟、陈育延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随即，「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忠于党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红旗红卫兵在校临时总部」等人少力小的红卫兵纷纷宣布解散或整体加入「井冈山兵团」。

那一天，清华大学两个红卫兵三个总部终于在组织上联合起来了，「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天下。

对于最终有了联合的大好局面，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推动联合的众力中，我们尽了自己的一点心，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当我看到联合后成立的新组织名称叫「井冈山兵团」时，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前几天成立的「天安门战斗兵团」的名称十分不妥。尽管我们成立在先，此刻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名称给人造成是在与「井冈山兵团」平起平坐的错觉。第二天，我召集「天安门战斗兵团」的联席会议，提议更名为「天安门纵队」。“纵队”的级别一看就知道低于“兵团”。我们以此告诉大家，我们只不过是「井冈山兵团」下属的一个“纵队”而已。就这样，「天安门纵队」成为「井冈山兵团」下的第一个纵队。

我们为大联合后的「井冈山兵团」搞了一个实际的大动作，它记录在清华文革的大事记中：“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13个战斗小组百余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4-P83]

¹ 最明显最直接最有效果的一次“中央号召”是：1966年12月18日，“当天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4-P82]于是，第二天三总部就联合起来了。

第六节 「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把我拉进总部

12月21日，经三个总部提名协商，「井冈山兵团」筹委会由“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戌源、邵凯胜、潘剑宏共20人¹” [4-P84] 组成。

联合后的新组织「井冈山兵团」沿用了“井冈山”这一名称。蒯大富当上了一把手。筹委会中，由「井冈山红卫兵」推荐的委员有一半之多。「井冈山红卫兵」是这次联合的最大赢家。这是因为它是清华第一大红卫兵组织，更因为它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

「井冈山红卫兵」提名的委员，基本上都是与蒯大富有过共同患难经历、并且较早就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其中有几位是蒯大富的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

我被蒯大富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事后猜测过。我想，随着「井冈山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尤其是联合以后的「井冈山兵团」成为全校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之后，蒯大富明白，应该在全校的范围内选择更有代表性的人选作为「井冈山红卫兵」的提名进入「井冈山兵团」的总部核心。

至于蒯大富为什么会提名我进入总部，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我的《少数赞》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第一湘江」的战斗力也比较认可。二是「天安门纵队」在促联合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也是识大体的，并没有出现他曾经担心过的另立山头的局面。对此我想他是比较满意的。三是「天安门纵队」一成立就显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并且开创了下属十多个战斗组的纵队形式。原本是为促联合而成立的纵队，尽管并没有明确谁是「天安门纵队」的负责人，但是在「天安门纵队」这些战斗组组长中，显然我是比较活跃著名的一个。我在无意中由一个战斗组组长而升级为一个纵队的代言人。手下人多势众了，分量也就随着加重了。蒯大富不会看不到这点。他在总部会议上给我分派的工作就是联系「天安门纵队」。

就这样，在无意识中我被文革运动的漩涡裹卷到清华文革舞台的中心。

¹ 据王良生回忆，筹委会委员应是21人，另一人是学生委员韦富强。他记得他和韦富强、李保余等人都是一2.25行动的具体组织者。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蒯大富的印象都是非常好的，对他也是打心眼里佩服的。我明白这是蒯大富对我的重用，我也积极靠近他。

「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当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这个联合，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多月，中间的反复波折颇多，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井冈山兵团」刚成立五天，唐伟等三名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部委员，因“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宁可右倾，不当阿斗”¹ [4-P85] 而宣布辞职。刚刚联合起来的造反派立时现出了裂痕。

唐伟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从「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来，我对唐伟一直非常钦佩，他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重的分量。我对唐伟的辞职，既不理解，也不满意。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原则分歧非要在刚联合后马上就分道扬镳呢？我认为唐伟辞职是一种不顾大局的分裂行为。因这件事，我对他的看法有了变化。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唐伟并不是因为反对 12.25 行动而辞职的。那时他并不知道蒯大富要搞这么大的行动。他们这几个人是因为看不惯蒯大富在联合过程中搞的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譬如“蒯大富公布的上述总部成员名单与三总部商定的人员严重不符，蒯大富独自做主修改人员”[13-P167]，看不惯江青和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无原则支持，他们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才作出痛苦的选择。唐伟在这个时候已经对蒯大富的人品、做派很有看法了。

当时我不了解唐伟辞职的真正实情，所以只对唐伟不满，没怪蒯大富，因为我与老蒯正热乎着呢。现在看来，那时唐伟对蒯大富的看法基本是正确的，对他的辞职也理解了点。不过，我还是想，唐伟当时要是不辞职，在兵团总部内做一个起建设作用的反对派，在蒯大富犯错误的时候，起到批评、抵制、反对的作用，可能对清华的文革运动更有利一些。那样，我可能很快也会成为以唐伟为首的反对派中的一员。只是，不仅唐伟与蒯大富的政治观点和理念很不一致，而且唐伟的个性是属于宁愿痛痛快快地干一仗、不愿委曲求全地坐一起的那种人。所以，唐伟与蒯大富的分手是迟早的事，可能难以避免。

唐伟辞职后马上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纵队」。

这之前的一天，由原「井冈山红卫兵」旗下的「第一星火」、「打落水狗」等一批坚定支持蒯大富、观点比较激进的战斗组成立了「28 团」²。

随后几天，宿长忠（水 7）沈如槐（力 0）成立了「八八纵队」，陈楚三（力 6）成立了「东方红纵队」，刘万章（工物 6）成立了「毛主席警卫团」。他们与

¹ 唐伟承认说过“宁可右倾，不当阿斗”的话，后来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说成是“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

² 之所以命名为「28 团」是因为在井冈山时期林彪曾是 28 团的团长。“团派”的“团”可能起源于「28 团」的“团”，也可能是因为「井冈山兵团」的“团”。414 总部成立、“清华革委会”流产以后，团派遭到重创。团派中的鹰派于 5 月 31 日成立了激进的「624 战团」替代已经解散了的「28 团」。

唐伟的「毛泽东思想纵队」一起合称为“三纵队”¹。“三纵队”的骨干战斗组如「向日葵」、「千钧棒」、「战地黄花」、「红色小老虎」等等原来都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

也就是说，虽然「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号消失了，联合成「井冈山兵团」，但是在表面统一的兵团之下，又冒出了好几个“纵队”、“团”之类的组织。「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力量换了马甲叫「28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核心力量换了马甲成了“三纵队”。

有两个不争的事实是：

一、只有「天安门纵队」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前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其他所有的“纵队”和“团”都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才成立的。

二、只有「天安门纵队」是跨原来的三总部的，不具有明显的“井冈山”色彩或“八八”色彩。而其他的“纵队”和“团”都是由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战斗组组建的。

所以，对新生的「井冈山兵团」而言，「天安门纵队」明显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没有原来红卫兵组织的“派性”，而其他的“纵队”和“团”都多少表现出原属红卫兵组织的“派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离心的涣散的作用。

原有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后消亡了，这些红卫兵组织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在表面联合的遮掩下，骨子里还是没有真正联合。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远远没有消除，对立的两派已经显现。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局面，无论是对新生的「井冈山兵团」，还是对「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蒯大富，都是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他们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第七节 江青接见，第一印象居然是她很有气质

12月30日下午，蒯大富把一部分总部委员召集在一起，说是有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是谁，他没说，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们跟着他到了静斋。他敲门，门开了。蒯大富、刘才堂等在前面（那天鲍长康外出不在校），我比较靠后，我们依次鱼贯而入。

有一位首长站在门内，与我们一一握手。我看，不是别人，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

我感到很惊奇，有点意外。怎么？江青到清华来啦？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激

¹ 所谓“三纵队”，其实不只是「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这三个纵队，还应该加上「毛主席警卫团」。“三纵队”是三个纵队再加一个团的习惯称呼。

动或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而且是那么近距离的见到江青。

她显得比较高挑，腰板挺直，身材修长，戴着黑边眼镜，给人的感觉很有气质。

江青和王光美，都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在我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她们都还是高高在上为人仰视的大人物。

我说一句老实话，这两个人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江青的气质与形象远胜于王光美。

多年后，偶尔有友人问我对江青的印象，别人会惊奇地叫起来：“你有没有搞错哦？江青这女人还有气质？”

凡是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有资格对江青评头论足一番的。她心胸狭窄、心肠歹毒、祸国殃民，这样的女人还能说得上有什么气质？

应该承认，像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土包子，在那个时候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气质，可能是感觉她长得很有精神，形象不错之类的印象罢了。

文革之初，江青在北大的大操场有一个长篇讲话。我看的是大字报，没有听录音讲话。她在讲话中谈到她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当时我就想，家务琐事，家长里短的，值得在北大这样的万人集会上来渲染吗？难道这也算是阶级斗争？这不是将阶级斗争庸俗化吗？我很不以为然。

在这次见到她之前，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的，我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因为是毛主席的夫人，因此爱屋及乌。还因为党的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吹捧她，我也深信不疑。

后来，随着文革的进展，江青对团派的偏袒和对蒯大富的宠爱让我感到不满。江青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模样也让我厌恶。于是我对江青的好感慢慢消失。再后来，她那种表演一样的惺惺作态让我恶心。她竭力鼓吹“文攻武卫”的口号让我非常反感。周恩来对她过分的“谦恭”她居然安之若素，这让我愤而不平。以至于后来一听到她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那尖锐的嗓音，尤其是带着颤音的“同～志～们～好～～”能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到那个时候，曾经有过认为她很有气质的那点印象，早就没踪没影了。

那天的江青，她的身份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更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我们对她只有毕恭毕敬的份儿。

我们坐下以后，就正襟危坐着聆听她的教诲。除了蒯大富有资格有时候简短应答以外，我们其他的几个人个个都像小学生见到老师那样，洗耳恭听，点头领首，能发几声嗯嗯哦哦的回音已算斗胆的了。

因为就那么十几个人的范围，所以江青说话也就用不着提高分贝了。她说话字正腔圆，听起来还是很悦耳的。至于她具体讲了点什么，早已忘记了。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还有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来清华视察并

接见蒯大富和总部委员，接着又在西大操场与全校师生见了面、讲了话，这件事传递给我一个强烈信息就是：中央文革是信任蒯大富的，是支持「井冈山兵团」的！

后来，尽管对江青有多少不满，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根本没有要反她的念头。曾经与极个别最可靠的朋友私下议论过江青，哪敢随便跟其他人瞎说哦。

江青前脚刚走，王光美后脚就到。当然，这一次王光美不是来视察清华的，也不是作为贵宾请来的。她是被蒯大富“智擒”来批斗的。

第八节 反感使诈擒拿王光美， 开始在观念上与总部有隔阂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发起 12.25 大行动。六千多名清华师生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从校园里推到街头、推向社会。

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斗争目标就是要揪出刘少奇这个混入党内的赫鲁晓夫，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支持总部的决议，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大行动。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二个大动作是此后十几天即 1967 年 1 月 6 日发生的“智擒王光美”。

王光美名为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实为幕后指挥者。而她的背后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工作组在清华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王光美的责任是第一位的。清华师生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深刻检查，这要求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周恩来曾在几天前表过态：要王光美做书面检查可以，但是不同意揪王光美回清华。这个态度也是毛泽东的态度¹。但是，蒯大富并不甘心。嘴上不敢强顶，心在暗暗盘算。正在这时，电机系的「捉鬼队」策划了一个捉拿王光美的秘密行动方案，蒯大富点头认可了这一鬼主意。

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读书。「捉鬼队」想法先控制了刘平平和同校读书的妹妹刘婷婷。然后以公安局的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正在北京第二医院救治，要他们赶快去医院探视。又假冒医院的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还让刘婷婷在旁说了句“妈妈，姐姐受伤了”。接到这样的车祸电话，爱女心切、纵然是白区工作经验极为丰富的刘少奇也一时慌了手脚，未及多想，急匆匆与夫人一起赶往医院。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居然会有人敢胆大妄为把骗局设到他们头上。

¹ 1966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与清华一部分同学座谈，讲“毛主席不同意揪王光美回清华，建议让她作书面检查”。
[4-P92]

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没想到连刘少奇也一起被骗出来了。这大大出乎于这出闹剧策划者的预先设想。他们没敢动刘少奇，只把王光美揪了回来。

蒯大富对能否揪回王光美并不抱多大希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做批斗王光美的准备。那天晚上，我们总部委员二十多人正在静斋开会。八点多钟，大喇叭突然广播说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被揪回来了，要全校师生员工赶快到西大操场参加批斗会。我听了很惊讶。看蒯大富的神色，很惊喜。他立即宣布休会。我跑到西大操场，登上主席台，只见群众纷纷赶来，秩序很乱。不一会，由总部委员任传仲主持审问批斗王光美。因为没想到王光美竟然这样容易就被骗到了手，怎么审，怎么斗，都是现场临时发挥的。倒是王光美，大概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对所审问题应对自如，挑不出毛病。有时她的狡辩、回驳和诘问反把审问者弄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本来是被工作组迫害的有理一方，竟然比迫害师生的无理一方还显得尴尬。台下群众又是气愤又是着急。大会只能喊口号以壮气势，然后就急忙宣布散会。对这样一个匆匆召来、草草收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到场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感到失望和不满。

运动就是一切，结果是次要的。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做检查，对「井冈山兵团」来说，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更何况，骗斗王光美的过程是那么的“精彩”刺激。《井冈山报》不惜篇幅，以《智擒王光美》为题，绘声绘色地大肆宣扬。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清华，发生在王光美身上，全国各地很快都知晓了清华「井冈山兵团」斗了王光美。

蒯大富看到昔日风光无限的王光美成了他的阶下囚，内心一定是扬眉吐气的。于公，这是对刘邓反动路线的一次沉重打击。于私，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这样一种为公为私的情绪，我能理解。我心里也一样的解气，只是为没有打掉王光美的嚣张气焰而遗憾、而不满。

我当时只看到王光美被揪回来了，大快人心，并不知道揪她的过程。后来才知道，所谓“智擒”，原来是使计诈骗。

当我知道周恩来明令在先，说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蒯大富竟然置周恩来传达的最高指示而不顾，用这样不正当的手段来“智擒”王光美，事后还大肆宣扬，毫无认错表示。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 1.6 行动。他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啊，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就是彭、罗、陆、杨¹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13-P191] 我在

¹ “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在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打成“阴谋反党集团”。

事后看到这一严厉的批评，非常赞同！

但是，对于周恩来这样很严肃的不寻常的批评，总部里多数委员并不以为然，没有认真的反省和检讨。无论在底下还是在会上，他们的观点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要是革命的需要，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越是简单、越是直接、越是有效、越是一击中的的手段，就是最好的，都是可以使用的。谁要是去考虑这种手段是高尚还是卑鄙，那就是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就是一个糊涂虫。

我对于这样的观点，从内心就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排斥感。我总觉得，目的固然重要，达到目的的手段、方法也是同样重要的。要是用残忍的、卑鄙的、阴谋的手段追求崇高的、伟大的、正义的革命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是否真的革命、真的崇高、真的伟大、真的正义，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了。

在你死我活、你亡我存的军事斗争中，当然是要兵不厌诈，不能书生气十足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与王光美之间，那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斗争，还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怎么可以用这样欺诈的不光明的手段去达到“革命”的目的呢？即使性质是敌我矛盾了，要是对方已经成了阶下囚了、失去抵抗能力了，也是要讲政策，不能为所欲为的。难道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吗？

我很明白我这种想法是妇人之见，是政治上的幼稚可笑，是宋襄公蠢猪式的愚蠢，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无法接受“为了革命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要那样，我就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造得不再是我自己才行。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罪行，要她回清华做检查，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和声讨，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革命的。要是我处于蒯大富的位置，我会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清华师生强烈的革命要求。能不能揪回来，取决于中央的全局考虑。如果中央不同意，我会向大家作解释，也会再次向中央要求。我肯定不会采取与中央意见相左的行动，更不会采用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手段去“智擒”。

我当时想，蒯大富敢于按照非常理出牌，于是他成了红卫兵领袖。我比较循规蹈距，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所以我最多只能成为他的一个下属。

几个月来，我一直追随蒯大富。因为我认为他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在政治上的敏锐、果敢、勇气等等都是我所佩服的。即使发生了“智擒王光美”这件事，我觉得在政治观点方面我与他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与他之间好像在政治观念上有矛盾，在为人处世上存在差距。

与战友、与伙伴、与朋友，不可能做到各方面完全一致的。与蒯大富存在着一点差距并不影响我继续跟着蒯大富与他一起并肩战斗。只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再无条件地、全方面地向蒯大富靠拢了。我心里多了一份警觉。我有意识地与他保持了观念上的距离，我要守住我最底层的观念。

许多人只知道我在整风与干部问题上开始与总部有分歧、与蒯大富闹矛盾的。其实，观念层面上的分歧是从“智擒王光美”这件事以后就开始了。

事情总是一步步发展的，过程总是一一页页展开的。几乎是与“智擒王光美”这一事件同时，蒯大富开始反唐（伟）、反「八八」，我与蒯大富之间的分歧就显现在政治观点这层面上了。

第九节 不赞同反唐（伟）反「八八」， 开始在观点上与总部有分歧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三总部联合了。但是，组织上虽然联合成「井冈山兵团」了，政治上的分歧、思想上的隔阂还是很大。联合前的各自整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分歧和隔阂。

唐伟对兵团总部有批评的权利，这应该得到尊重。但对他的自动辞职，我认为是一种轻率的、不利大局的、带有“分裂”倾向的行为，我心里对此很不认同。不过，我并没有对唐伟进行公开谴责。

「28团」就不同了，他们立即对唐伟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代言人，是陶铸在清华大学的代言人，是反动路线新的反扑”[4-P97]。曾同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现为总部委员的刘泉更认为“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兵团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4-P98]。蒯大富发表声明，认为“托派¹分子在趁机夺权”[4-P111]。

对唐伟进行批评，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也认为唐伟是有错的。但是，那样的高调和尖锐已经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恶意的攻击了，这又是我不能同意的。

「28团」也好，蒯大富也好，他们要打压唐伟否定「八八」有他们的理由。因为早在「八八」、「八九」对立的时候，蒯大富他们就对「八八」的软弱，对「八八」不敢为蒯派公开平反表示不满。那时种下的不满种子，现在开始发芽、发酵了。

令人惊奇的是，曾经是唐伟“亲密战友”的陈育延，在反唐、反「八八」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是她最早贴出“《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作为的》大字报，揭开了全校反唐战的序幕。”[4-P94] 此后她坚定支持蒯大富和「28团」的立场，接连发表《彻底批判「八八」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从「八八」的成立看它的反动目的》等大字报，对「八八」全盘否定。看着陈育延的表演，我大跌眼镜！太不理解了！

¹ “托”，即托洛茨基。当年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者”的鼻祖。

对于陈育延为什么要如此作为，我是“局外人”，一直没想明白。连作为当事人的唐伟，在这个问题也想了几十年！

不管蒯大富、陈育延反唐伟的内幕怎么样，事实是，由陈育延带头否定「八八」，「八八」最受伤（我也是其中一个受伤的小兵）。由陈育延带头反唐伟，唐伟心最疼（我设身处地猜想的）。

在「八八」时期，陈育延和唐伟一样，也是非常有威信的领导人。她鲜明的观点、善辩的言词和爽直的个性，都在我们这些「八八」基层群众中留下深刻的良好的印象。

几个月之后，唐伟稍稍向右转，陈育延急剧向左转，两个人就这样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唐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不如前，陈育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是直线下降。两位我曾经很钦佩的「八八」带头人，几个月以后竟会变成这样，令我唏嘘不已！

在「井冈山红卫兵」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是「八八」与「八九」在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我是持「八八」观点的，也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以我对「八八」是很有感情的。当然，我对它后来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斗争不力也有不满。这也成为我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原由之一。即便如此，「八八」的历史功绩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的。唐伟作为「八八」的最主要的头头，更不应该被当作托派来攻击的。

面对总部的反唐、反「八八」，“三纵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借着总部整风的机会，反击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与唐伟一起辞职的“总部委员”朱德明说：

“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对蒯大富得用 100° C 开水烫！” [4-P126]。这样极端说法的大字报，我亲见过。当然，这也是极个别的。兵团总部与“三纵队”口诛笔伐、恶言相加，谁也没有好听的话儿。

那是一个唯我独革（命）、唯我独左（派）的年代。所谓整风，自己的错误尽量回避，回避不过去就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别人的错误就使劲儿整，上纲上线的整，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28 团」与“三纵队”刚发生内战的时候，「天安门纵队」基本保持沉默，没有表态。后来，虽然我觉得两边都有错都该打板子，虽然我在大的政治观点方面基本上是站在蒯大富这边的，而且我觉得唐伟有错在先，但是我还是认为，在兵团总部与唐伟、与“三纵队”的矛盾纷争上，总部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现在「井冈山兵团」已经掌了清华的大权，运动的主导权在总部这一边，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在总部一边。是总部把兵团内部矛盾的性质搞错了。

我心里想，蒯大富你刚被工作组整过，掌权才几天，你为什么马上要去整别人呢？这别人不是敌人，是曾经的战友呀！工作组撇下斗黑帮的大方向不顾而斗蒯派是方向性错误，你现在放下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不顾而反唐伟、

否定「八八」，那不是也在犯着与工作组一样性质的方向性错误吗？

我心里虽然觉得蒯大富反唐、反「八八」是错误的，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情感上，我都通不过。但是要我站在“三纵队”一边对蒯大富公开谴责，我同样也做不到。两边都有一些极端的言论，我都很反感。我不支持、不参与对唐伟的“围剿”，我也不支持、不参与“三纵队”对总部的反“围剿”。对于这场兵团内部的窝里斗，我看着，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在1月中旬，当时社会上有一股“经济主义妖风”。为响应中央号召，清华“大批革命师生去车站、工厂、外地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四大纵队派的同学大部分离校，杀向各地反击经济主义黑风。”[4-P101]我也带着「天安门纵队」的部分战斗组去了太原。因为校内留有人，对学校里的形势还是比较了解的。到1月底，学校内斗又起。我打电报给蒯大富，明确表示我反对反唐，反对否定「八八」。同行的王允方等人认为仅仅打个电报表个态效果不大。我觉得有理，于是只身一人赶回学校，当面劝说蒯大富别继续这样干，敦促总部诚心诚意地开门整风。蒯大富正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我的谏言？在总部与“三纵队”的矛盾上，我感觉我左右为难、深浅不是。

「天安门纵队」的好些战斗组后来的态度比我要明朗得多，他们没有我那么多的顾虑。他们的基本倾向是站在“三纵队”的立场上批评总部，只是在批评的态度上，比“三纵队”要和缓一点，没那么尖锐。我记得汲鹏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印象深刻的话，他说：“老蒯今天否定这个，明天否定那个，这样下去最终会否定了老蒯自己。”

到2月初，蒯大富才意识到反唐、反托、反「八八」搞不下去了，这场闹剧戛然而止。

这当然与“三纵队”的坚决抵制有关，与兵团里为数众多的中间群众对此不满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央文革来干预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的阎长贵给兵团总部打来电话：“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4-P119]。蒯大富对中央文革的指示还是言听计从，不敢顶风的。历时一个多月的反唐、反「八八」就此刹车了。蒯大富在大会上表态说：“反托反唐错了，客观效果是不好的，但主观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意思”[4-P120]。

蒯大富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的表现一直是可圈可点，应当基本肯定的。在被工作组迫害的时候，他的勇气是非凡的，他的反抗精神值得大书特书。翻身了，掌权了，成了多数派了，成了“执政派”了，全国扬名了，掌声四起了，被中央首长青睐了，年轻的蒯大富随着他的政治地位从地狱火箭般地窜到天堂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在悄悄地快速地起变化。蒯大富没有在工作组的大棒下打垮、压

倒，现在，在掌声和吹捧声中，蒯大富已经有点飘飘然、昏昏然、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犯了错误，他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已经没有正视问题、承认错误的勇气。我认为，蒯大富以后所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就是从反唐、反「八八」开始的。此后，蒯大富的所作所为乏善可陈，留下的是斑斑劣迹。

我非常为老蒯惋惜！

很长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蒯大富一掌了权马上就要反唐、反「八八」。过了好多年，知道了斯大林一上台也是把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个个搞掉的。毛泽东一建了国也是把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一个个搞掉的。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一想，蒯大富这样做就毫不奇怪了。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以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当然，差别在于蒯大富无法与这些历史巨人相并提。在毛泽东的眼里，他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小卒子。

历史上「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之间的“旧怨”没有化解，现今团派（兵团总部）与“三纵队”之间又添了“新仇”。唐伟不满蒯大富就辞职并组织纵队，蒯大富向唐伟、「八八」开刀打击“三纵队”，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团四两派的雏形已经形成。只是，这个时候所争夺的权，是对清华文革运动的主导权，是大字报大喇叭的话语权，是对中间群众的引导权，是一种“虚权”。而到围绕筹建清华革委会而展开的权力之争，则是在争实实在在的“实权”了。

从蒯大富翻身（以 10 月 6 日蒯大富在十万人大会上宣读誓词为标志）才三个月，从蒯大富掌权（以 12 月 19 日成立「井冈山兵团」为标志）不到一个月，蒯大富就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体现在“智擒王光美”和对周恩来的批评上）、如何正确对待持不同观点的战友（主要体现在对唐伟对「八八」的态度上）、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例如，已经开始造“以蒯大富为首的正确领导下”、“响应蒯大富的号召”之类的舆论）等问题上开始犯错误。“三纵队”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在总部内部，后来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与总部不同的观点。我在观点上开始与总部有比较大的分歧了。但是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和缓的。我认为这是革命小将经验不足，是前进中的错误。我认为“三纵队”过于尖锐的批评或指责不利于蒯大富改正错误。从情感上说，我与蒯大富还是要更近一些。只是，亲近的距离在慢慢地拉大。随着干部问题上大辩论的展开，我与蒯大富之间的关系，就由亲近而转变成疏远了。

第十节 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我与总部尖锐对垒

有着近两万名师生员工的偌大清华，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群体。

文革中，人数最多、热情最高、能量最大、冲劲最足的，首推学生。文革初期，学生是清华文革的主力军，也是高校和全国文革的先锋队。

另一个群体是教师。教师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龄大一些，就显得稳重或保守些。青年教师，则显得相当活跃，但是活跃度远不如学生，因为教师已经是社会人，与学生的身份不同。他们经历多，顾虑也多。

还有工人群体，集中在后勤、车间、实验室等地方。由于人数相对较少，写大字报和辩论的能力较弱，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清华园里，影响力有限。

研究生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介乎于高班学生与青年教师之间。人数虽不多，却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和水平。工化系的「不怕鬼」、土建系的「揪要害」都是闻名全校的战斗组。

最后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就是干部。

清华的干部队伍，按级别可分上层、中层、基层三部分。

上层干部是党委正副书记，才几个人。¹ 中层干部是指学校部、级处级和系这一级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校级科室及系教研组这一级的都属于基层干部。

从 1966 年 6 月 9 日得知蒋南翔被停职反省、工作组进校开始，干部队伍就受到了群众运动的极大冲击。甚至有不少与学生接触最频繁最密切的辅导员，也有被学生游街、批斗、殴打、戴高帽子。按说，辅导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干部。

工作组进校五十天所做的两件大事，除了反蒯就是整干部。

一进校，工作组先把干部统统赶上楼。这不稀奇，是工作组的传统做法。

从 6 月 24 日反蒯开始到 7 月 18 日紧急刹车，反蒯成了工作组的第一要务。这段时间工作组已经忙得顾不上大整干部了。客观上，蒯派们替干部们挡了不少拳脚，让他们稍稍喘了一口气。

反蒯紧急刹车，又开始斗黑帮整干部。不过才十天左右时间，工作组就滚蛋了。

工作组撤走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在批判它对学生的镇压上，为革命造反精神平反。

经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般的洗礼，干部们已从最初的惊恐迷茫中缓过神来。对大多数基层干部的冲击本来就不算太厉害，他们事实上已经自己解放

¹ 除蒋南翔外，还有刘冰（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工会主席）、何东昌（党委副书记兼教务处长）、胡健（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委书记、人事处长、政治部主任）、艾知生（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了自己，群众不再与他们为难。

虽然中层干部也在努力争取自我解放，纷纷要求与红卫兵小将在一起，在战斗中得到新生。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没有得到“解放”。上层干部个个都是黑乎乎的黑帮身份。

早在 1966 年的 10 月中旬，就有「揪要害」战斗组贴了大字报，认为一下子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是错误的。此后，又写了《再谈是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的》、《解放黑帮》等大字报以及《你知道我校有多少“黑帮”吗？》的调查报告。

老实说，我的思想没有那么敏锐。对于干部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一点意识都没有。

这以后，陆续有不少大字报谈干部问题，但是没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因为那时的焦点在大联合、整风以及此后的反唐反「八八」的争论上。

等到反唐反「八八」告一段落，等到外地省市有的已经成立“三结合”¹的红色政权（革委会），学校运动的中心开始转到干部问题上来了。

1967 年 2 月 22 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这篇社论对全校师生的震动较大，它正式把运动重点引向干部问题。

工作组撤走以后，学校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运动也处于无组织领导的状态。每个人思考、判断、决定的主要依据来自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以及中央文件。这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不容怀疑必须紧跟的。二是两报一刊²社论。这也被认为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三是中央首长讲话。因为各个中央首长讲话的调子并不完全相同，譬如周恩来的讲话与中央文革的讲话有较大的差异。即使同为中央文革的成员，讲话的分寸、轻重上都有点不同。再加上已经有今天在台上大紫大红明天就被打翻在地的先例（如陶铸），所以每个人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基本上都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之。合我心意者就听之，拥护之，不合我心意者就忽略之，甚至反对之。

《红旗》这篇社论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很大的反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合民心合时宜的大问题。

以红卫兵为标志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表现出敢冲敢打的精神，起了先锋的作用。但是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仅仅只有红卫兵小将是不行的。在未来的新政权中，革命干部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解放干部，即解放那些在运动初期被冲击现在已经有了认识有了觉悟的干部，让他们从运动的对象转变成为运动的动力，并为以后结合进领导班子做准备，是这阶段的重要任务。

¹ 中央规定，新建的各级革委会必须由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这三部分组成，称为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² 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要解放干部，首先必须要正确地分析干部队伍。而这，又离不开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基本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认为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占着统治地位。所以，要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干部在这十七年来的的表现、定性的问题。这是一个统称为“十七年”的问题。

而要批判刘少奇这五十天里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必然会涉及到对干部打击一大片这个严重后果。这是一个统称为“五十天”的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各个战斗组、各个纵队等战斗团体、各个知名的有影响的人物都用大字报或者集会演讲等形式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各层干部们对于关乎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今后前途命运的干部问题更是格外的关注。

中层干部纷纷出来亮相，表示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连刘冰这样的上层干部也贴出《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大字报。他说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这样的表态当然引来一大批大字报的强烈批判。

对学校原校级领导及中层干部的亮相，许多战斗组都纷纷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调查员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才发表的。

这篇以清华大学为典型素材的调查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落在清华的上空，造成了一次更大的冲击波。

尤其是因为这篇调查报告是伟大领袖亲自修改批准刊登的，清华园里的欢呼声更是高过以往。

虽然兵团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总部委员陈继芳负责的「二办」（干部办公室）来处理干部的问题，对不少亮相的干部也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但是，总体上，兵团总部对《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的形势跟得不紧，贯彻得不力。

要说，兵团总部对打倒刘少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来是很积极，跟得很紧的。12.25大行动和1.6揪王光美都是明证。对这篇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器的《红旗》调查员报告，它也应该是热烈欢呼、坚决拥护、认真贯彻才合情理。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由「28团」中的一些战斗组写了一篇《〈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的大字报，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4-P157]

这篇大字报同样具有爆炸性。因为它不仅宣称游街一大串好得很，而且公然与毛泽东钦定的《红旗》杂志调查报告唱反调。这不是公开地与中央的指示唱对台戏又是什么？

尽管总部立即发表声明，宣称《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相当多的团派战斗组和团派群众并不同意这张大字报的观点或者有所保留。但是因为写这张大字报的战斗组都是属于团派的骨干战斗组，总部无法与它撇清关系。事实上，依我看来，《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所表达的正是相当一部分团派骨干真实的内心思想。以造反有理起家的蒯派，热衷于过激的革命行动，对否定“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言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不满和抵触。

围绕着关于干部问题的大论战（这论战从1967年年初开始，在三四月份达到高潮，以后以不同的形态一直持续到1968年下半年的七二七），两种观点的分歧慢慢变得清晰起来。随之，团派与纵队派¹这两大阵营在论战中自然形成。

团派从毛泽东的许多语录中找到答案²，认为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的干部都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所以，对这十七年必须要来一个大翻个儿！对旧清华必须彻底砸烂。这就是“彻底砸烂”论的主要论点。

纵队派同样也从毛泽东的不少教导中找到答案³，认为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同样照耀在教育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就是“红线主导”论⁴的主要论点。

在这场大辩论中，双方引经据典，调查分析，力图证明只有自己的论断才是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当时的辩论中，抓住有利于自己的毛主席语录，片面的做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把对方的观点推到错误的极端，这些都是常用的手法。譬如纵队派认为“彻底砸烂”论就是要否定十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绩，就是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所以把团派说成是极“左”派。而团派则认为纵队派是包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纵队派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右派。双方都不怎么关注、不实事求是地承认对方的论点中包含着合理的正确的成分。

我在整风与反唐、反「八八」这件事上，已经与总部不唱一个调子了。在干部问题上，虽然我自己也比较迟钝，但我对总部更迟钝的反应感到不满，对《罪

¹ “纵队派”是“三纵队”再加上「天安门纵队」的简称，包括了四个纵队一个团。

²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³ 例如，毛泽东多次论述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95%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

⁴ 周恩来在1967年9月在一次接见会上说：“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13-P310]可见周恩来也是赞同“红线主导”论的。

责难逃》大字报的出笼非常反感。我认为纵队派在干部问题上是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做得比总部好多了。

这期间，我写过不少大字报。我坚决拥护《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支持纵队派在干部问题上的观点，批评总部在干部问题上表现迟缓、行动不力。但是，我对刘冰这样的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表态也表示出高度的警觉。我曾发表声明，认为“刘冰亮相是反扑”[4-P142]。我对解放干部的认识只限定在清华的基层、中层干部。像刘冰这样清华党委的第二号人物，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修正主义教育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是走资派，属于打倒之列，根本谈不上什么解放。¹

在关于干部问题的辩论中，「天安门纵队」逐渐成了“三纵队”的同盟军，很自然地融合进纵队派的阵营里。我也常常成了“三纵队”头头们聚会的座上客，与他们打得火热。

与“三纵队”的关系热，必然地，与蒯派的关系就凉。

第十一节 《多数赞》无人喝彩， 《少数赞》时过境迁受批判

蒯派掌权以后，不少人向我提建议：老孙，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多数派了，再写一篇“多数赞”赞一赞吧。

在我写《少数赞》的时候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冲动。但是此时，我并没有写“多数赞”的一点点念头。因为在总部里都有好几个人鼓动我写，老蒯也曾对我提议过，我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革命多数赞》，算是《革命少数赞》的姐妹篇，贴出去了。

后来，《井冈山报》以「第一湘江」的名义将此文更名为《革命少数掌权赞》，刊登于1967年3月24日的第四版。这一天，正好是「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纪念日。这一期中，第一版发表了蒯大富的《井冈山人永远忠于毛主席——庆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我的这篇文章与「冲霄汉」的《井冈山人赞》一起发表于第四版。

文章虽然不长，完全引录没多大必要，摘录几小段如下：

地位改变了！显赫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被拉下了马，永世也不得翻身！

地位改变了！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等大小政治扒手不过是清华政治舞台上匆匆

¹ 刘冰是在工宣队进校以后的1970年被“解放”的。当时中央已经“发明”了一个有别于“走资派”（属敌我性质矛盾）的新名词，叫“走资派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刘冰被“解放”的新闻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典型登载在1970年《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参见刘冰著：《风雨岁月》P152

过往的政治小丑，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现出保皇的丑恶原形！

地位改变了！那些被蒋南翔视为“个别捣蛋”“不好摆布”，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蒯氏人物”的革命小将掌权了！他们发号施令，“俨然”是清华园的主人！

……
历史把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谁，识破校党委种种阴谋诡计，高举“反蒋”的大旗，把斗争的锋芒直指蒋南翔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谁，在王光美的法西斯统治下，负着种种反革命的罪名，用鲜血抒发对毛主席最深厚的革命豪情？

是谁，蔑视修字号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的白色恐怖，独树井冈山大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最致命的攻击？

又是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揪出了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刘少奇？

正是革命小将！

……
他们从少数转化为多数！

他们从否定得到了肯定！

他们从无权变成了有权！

地位改变了。但是，革命小将们：

他们分得清社会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这边，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分得清头脑中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坚决夺“私”权，让“公”字对“私”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砸烂了旧制度，正在建立革命新秩序！

他们参加着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同时又在用最美丽的图案来描绘共产主义光辉夺目的图景！

……
让那些以不犯错误为荣的庸夫俗子去自豪，去自鸣清高吧！

让阶级敌人去咆哮，去狂跳，去发抖吧！

有毛泽东思想太阳般的光辉——塌不了天！

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陷不了地！

这些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壮大的革命小将，井冈山人——新的无产阶级当权派，像矫健的海燕，迎着暴风雨的洗礼，朝着东方的旭日展翅高飞，前程无量！

这篇赞扬少数派掌权的文章有点类似于当今社会常见的庆祝××周年纪念歌功颂德的应景文字一样，没多少新意，通篇是大话空话还有气壮如牛的豪言壮语。记得原稿里还说了几句掌权了的少数派更要团结大多数，更要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为革命而掌好权、用好权之类的议论。这是我这篇文章中因为对蒯大富对「井冈山」的忧虑而最想说的话，很遗憾，在发表的时候被删除了。

对于蒯派而言，在落难的时候，《革命少数赞》是雪中送炭，是情绪低落情感脆弱时的互相慰藉；现在蒯派翻身了，《革命少数掌权赞》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是众多庆贺声中的一次鼓掌。地位不同了，感受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篇大字报贴出后，基本上是无人问津，无人叫好，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大字报中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掌了权的蒯派们，心中更愿意听到对往日与工作组斗争英勇业绩的讴歌赞扬，对红色「井冈山」的倾力支持，而不是逆耳的告诫和不入调的提醒。

在总部里，我不敢说自己是头脑最清醒的总部委员，但我敢说，我是最不敢自夸最革命的总部委员。可能是我一直对自己政治上的不自信，所以我比别人要更多检点自己的言行。我在文章里提出了要夺取自己脑子中“私”字的权，提出革命小将以后还会犯错误。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与蒯大富之间在观念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我曾对王允方谈起过，在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嗅觉、政治手腕等方面，我比蒯大富差得太多。而在思想观念和道德修为方面，我说我感觉蒯大富“根基比较浅”、“基本功不扎实”。我当时没敢说“修养不够”。因为“修养”一词已经被批成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个贬义词了。

我与老蒯离心离德的言行，我与总部或明或暗的唱反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部分团派群众对我的不满。

很有意思的是，在蒯派被工作组迫害受压的时候，我因为那篇《少数赞》被他们引以为知音。而当我成了总部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与“三纵队”搅和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昔日的战友对我已经有点无法忍受了。

1967年三四月份，作为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大张旗鼓地批判。

在群众揭批“黑”《修养》的时候，我的《少数赞》也被“联系实际”，捎带着批了一把。

在《少数赞》中，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当他发现自己少数观点是错误时，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决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非！”

有个战斗组就批判上了：这腔调完全是刘少奇的修养嘛，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战斗的时候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呢？

有的大字报据此断言：孙怒涛本来就是一个深受刘少奇黑《修养》毒害的修正主义苗子，是个典型的修养派！

那时，我的心理素质已经很能承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礼遇”了。对这些，我认为都不值得理睬，所以就一笑了之。

想当年，我与班上的许多同学一样，在学《毛选》的时候，这本《修养》也是当做与“老三篇”¹一样的经典著作，研读了多遍的。我并没有去学习后来被批判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之类的市侩哲学，也没有看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货色，而是秉着革命者应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目的去学习去研读的。《修养》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这些批评者认为我深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这话虽然不中听，倒也是基本不错、入木三分的。

绝大多数团派群众，总部的大多数委员，尽管与我在看法上有分歧，观点上有争论，但是彼此相处，态度依然还是比较友善的，并没有把我当做另一个唐伟。

不过，也曾经发生过很尖锐的冲突。

3月10日，“在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对总部组织路线进行整风。孙怒涛发言，提出要罢刘泉、陈育延、张云辉、邵凯胜的官。”[4-P140]

总共才二十人左右的总部委员，我为什么要一口气同时罢免四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具体的原因了。依稀记得要罢刘泉、陈育延的官，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八八」的头头，却带头反「八八」，我对他们的这一做法很反感。至于张云辉和邵凯胜，我并没有与他们有任何不愉快的过节，仅仅是因为他们与蒯大富关系密切，他们在总部里的作用不大，蒯大富拉他们入总部，有任人唯亲的嫌疑。

如果我只提议罢陈育延或刘泉一个人的官，说明我多少还有一丁点儿政治头脑和斗争策略。可是我提出要罢免四名总部委员的官，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理了、太愚蠢了？我是成心在给自己树敌，成为众矢之的，最后一个都没罢免成。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候的我，头脑的简单、思想的幼稚、行为的孟浪，简直可笑之极！

对我的罢官动议，其他的几位当事人没有回应。只有陈育延，这个敢说敢做性格爽直的人，她毫不示弱地马上对我进行反击。她“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内部在酝酿着修正主义复辟》，认为总部右倾，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认为应将孙怒涛轰出总部。”[4-P141]

正当我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28团」著名的战斗组「打落水狗」、「冲霄汉」等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认为“孙怒涛在敌人反扑时提出罢陈育延、刘泉、张云辉、邵凯胜四个革命小将的官，是书生气十足的表现，我们不同意，但也不同意把孙怒涛拉下马！”[4-P143]

蒯大富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很宽容，也显得比较公正。他既没有批评谁也没有指责谁，既没罢谁的官也没把谁轰出总部，悄无声息地平息了这出由我引发的

¹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著作，当年统称为“老三篇”。全国人民都熟读过。有些经典段落，我们能背诵如流，不差一字。

总部内讧。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414 串联会」 (1967.4—1967.5)

第一节 「414 串联会」首次行动是强夺总部广播台，极不光彩

在整风和干部问题这场大论战中，有一批隶属于纵队派的战斗组，如沈如槐的「千钧棒」、陈楚三的「战地黄花」、孙怒涛的「第一湘江」、汲鹏的「轮机兵」、倪振伟的「二万五千里」、尹尊声任彦申的「刺刀见红」、黄瑞和的「不怕鬼」、周泉缨的「云水怒」、段云富的「巴黎公社」、高季章的「锷未残」、宿长忠的「翻腾」、张雪梅的「八八探照灯」、刘万章的「红色小老虎」、郭仁宽的「暴风骤雨」、任敦渭的「第一红五星」、李贵芝李伯川的「人民万岁」以及「从来急」、「风雷激」、「争朝夕」、「鹰击长空」、「曙光初照」、「八八春雷」、「1356」、「开新宇」、「第一靠舵手」、「第一换新天」、「第一高举红旗」等，他们观点鲜明、影响较大，成为纵队派的代表。

由于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因此就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交流信息、分析动向、切磋对策。

当时大家一致的感受是，尽管这些战斗组的能量很大，战斗力很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全校运动的大局有影响，也得到相当多师生的支持和赞同，但是，与已经上台掌权，既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和社会承认又掌握了学校全部资源的总部相比较，那就显得势单力薄，无法抗衡了。

「28 团」和纵队派的“四纵一团”（「天安门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毛主席警卫团」）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后成立的。1967 年 3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求解散跨车间、跨班组、跨系、跨班级的组织，按行政系统实现大联合的社论。兵团总部以此为契机要求解散纵队，回班级闹革命。「28 团」率先响应，「天安门纵队」、「毛

主席警卫团」跟随其后也宣布解散。其他“三纵队”硬撑了好几天，到3月11日，不得不也宣布解散。

从3月中到4月中这一个多月里，没有纵队支撑的“纵队派”与兵团总部在干部问题上的激辩，都是以战斗组形式进行的。“纵队派”一方面深感兵团总部对清华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很不得力，有时成了运动深入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又痛感“纵队派”自从各纵队解散以后，力量分散，单体弱小，难以协调，无法用一个声音发出最强音。怎么办？经过多次串联协商之后，认为唯有再走联合之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最初密谋搞一个串联会的是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主席警卫团」的头头和骨干。他们商量有了初步意见后再找「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纵队」协商。就这样，由二十多个战斗组作为发起单位，决定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

因为串联会的名称实在太长，而成立的时间定在1967年的4月14日下午，所以有人提议这个串联会简称为「414 串联会」，获得大家的一致通过。

广东话“8”就是“发”、“4”就是“死”之类的彩头和忌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的。以日期作为组织名称，这在当年是常见的现象。至于414成立以后有人把“414”写成是“四幺四”、“死要死”、“试一试”等等，都算是派战时期或调侃或贬义的414别称吧。为什么不选更早一天或晚一天，别无更多深意，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西主楼3-208教室，出席「414 串联会」成立大会的“有700余人，代表250余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1-P103]，并顺利通过了预先准备好的《414 串联会第一次大会决议》。

当晚，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何方”的辩论会。「414 串联会」参加了辩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第一次大会决议。散会后已近夜深。之后又在北院的一间教室里召开414发起战斗组组长会议。

那段时间，大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怎样推动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怎样应对兵团总部的压制上。在成立「414 串联会」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是以协商办法决定的。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虽然规模比纵队要大，但是比纵队更为松散的组织。这次战斗组长联席会议上，这个会上，有没有讨论「414 串联会」的领导班子，或者讨论到什么程度，这点存疑。我并不记得讨论「414 串联会」的一把手问题。当时的形势、氛围以及时间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条件。

但有一个议题肯定讨论了。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到了总部广播台拒绝广播「414 串联会」成立的公告和海报。一说起这事，大家心里都愤愤不平，很有气。

在大字报区，“纵队派”完全可以与兵团总部相抗衡。“纵队派”大字报的

质量与数量常常占优。但是大字报一定要有人前去观看才有效果。而且，有些精心写作很有分量的大字报，贴出去不到一二天甚至才几个小时就被人用粗制滥造的大字报或者直接用大标语覆盖了。这是大字报的短处。一想到这，非常郁闷。

大会辩论，也要由总部组织才能开得起来，因为场地和扩音设备全掌握在总部手里。曾经有过几次辩论会，总部往往处于下风，所以，有时总部对“纵队派”要求大辩论的叫板，宁愿缩头，也不开辩论会。

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全校的广播系统了。广播可以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不间断地叫唤。即使在吃饭时，休息时，那高分贝的喇叭声直灌耳朵，你不想听也得听，无处可躲，无处可逃。

总部手里有广播，414手里没有广播。总部独霸着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发出的都是总部这边的声音。

所以，会上一说起广播，与会的人莫不情绪激动，认为兵团总部的广播台应该播发不同观点的稿件，不能只有代表总部的一种声音。

有人提议：把总部的广播台夺过来（名曰“暂时接管广播台”），以此向总部表达要求彻底改组广播台的强烈诉求。这提议像是一针兴奋剂，大多数人都很感兴趣，表示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要是从总部手里把广播台强夺过来，肯定要引起严重冲突的。这只能激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明确表示反对强夺广播台。

马上有人将了我一军：“老孙，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永远被总部压制着不发声吗？”

强夺广播台是不对的，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要是强夺，就是我们在用不讲理的办法对付总部的不讲理。这是我的直觉。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主意既能冲破总部的压制又不至于激化矛盾。既然我提不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接受的比强夺广播台更好的方案，于是只好闭嘴不再讲话。

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要能集中正确的意见，说服貌似有理的不正确意见，会出好的点子。我只能辨别强夺广播台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说服不了大家，也想不出好的点子。所以，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头头。

多数与会者都支持这一行动。我印象中，沈如槐等先前是“三纵队”的那些战斗组长最积极。只有极少几个先前是「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长表示反对或没表态。串联会的议事决策规则就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多数同意了就算通过。既然大多数同意，于是就开始具体行动的策划。

我听着他们的策划，既没有再吭声，也没有退席以示不满。对于他们即将实施的行动，我当然不会参加。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强夺广播台的行动是会上的临时动议，还是有几个战斗组事先已经有过密谋拿到会上来讨论的。总之，这是一次由「414 串联会」多数战

斗组长同意、以「414 串联会」的名义组织实施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

会议最后决定在第二天中午趁人不备之时，派一支小分队强行接管在明斋的总部广播台。会上落实了要接管的人员以及准备要广播的稿件。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很晚才结束。

尽管我不赞同这次行动，但毕竟是「414 串联会」的第一次行动，而且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行动，我非常挂心，惴惴不安。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一直在三院后西大操场东的那块操场上徘徊。这天中午我没心思吃饭就跑过来了，眼睛不时地瞄向明斋，遥望着那里的动静。我心神不宁，十分忐忑。我不知道今天的冲突会是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结果。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知道我不希望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不希望打斗、不希望受伤、不希望流血。我当时还闪过盼望这次行动因为某个意外的原因而取消了的念头。

突然，全校的大喇叭中断了正常的广播。接着，传来了另一个广播员播出的《414 革命串联会就暂时接管井冈山广播台告全校革命同志书》。这是「414 串联会」强占广播台前预先准备的广播稿。稿子还没广播完，又戛然而止。过不了一会儿，看到明斋东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不断有人从门里踉踉跄跄地被挤推出来。我知道这次偷袭、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已经失败，我不忍心再继续旁观惨不忍睹的失败，懊丧着回 12 号楼的宿舍去了。

接下来的一幕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参加，是后来有人绘声绘色给我讲述的：

这支失败了的偷袭队伍并没有灰溜溜地做鸟兽散。在现场的 414 负责人把这支凌乱的队伍集合起来，先在明斋前开了 414 第二次串联会，接着以悲壮之师的形象在西大操场、大礼堂区游行，一路高喊反对总部压制言论自由要求改组广播台的口号。沿途有不少同情 414 的师生加入，最后居然集结起一两千人，再沿着二校门前的东西干道一路游行到主楼前广场，开了一个颇有声势的 414 第三次串联会以后才结束。

事后，414 的头头们沾沾自喜地用坏事变好事来总结这次行动。虽然具体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锻炼队伍、扩大影响、凝聚人气上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在以后的一次 414 会议上，也说“4.15 行动是一个失败的行动，但却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1-P110]

显然，我当时是站在派性立场上，用“革命的行动”为 414 群众鼓气，只是掩盖错误的一种自我安慰。

自文革开始以来，冲突已经多次。8.24 的红色恐怖，那是自称最革命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针对“妄图翻天”的“阶级敌人”的。主席台上争抢话筒、彼此推搡，那也都是在公开场合情绪激动时的过分表现。一个下属的群众组织对其上一级组

织的要害部门进行偷袭强占，这在清华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团四两派的关系史上也是第一次。就性质而论，是极其恶劣的。

幸亏当时还没有武斗的氛围。414 是赤手空拳去强夺的。广播台没有设防，团派也是赤手空拳把 414 的人挤兑出来的。这一次事件，有人说这是武斗，有人说这是冲突。这肯定不是文斗，硬要说这是武斗也未尚不可。但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群体冲突。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要故意减轻这次冲突性质的恶劣。武斗不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升级，从徒手到器械，从长矛到真枪实弹演变而成的吗？

这次冲突的原因和责任，双方各有各的说法。414 声言，总部的高压政策是造成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总部应承担全部责任。总部当然把原因和责任全归于 414 方面。

我认为总部对不同意见的群众实行高压政策是极其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构成 414 强占广播台的理由。414 要求总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属下的每一个群众组织，不得歧视，更不得压制。414 的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如果以不合理、不正当的手段来表达合理正当的诉求，那么要求的合理性、正当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414 企图以过激的方式达到改组广播台的目的，也就是想以暴力手段实现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这样的思维是完全不可取的。

以暴制暴，其结果是暴力升级、矛盾激化。想以这样的方式让蒯大富改正压制不同意见的错误，效果恰恰相反。蒯大富当天就宣布“414 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 414 一切文章”[4-P160]。414 以自己的错误“引导”蒯大富去犯更大的错误。这虽非 414 的主观故意，客观效果看上去很像是如此。

这件事情也惊动了中央文革。414 要求向谢富治汇报而遭拒绝。414 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就让自己在中央首长面前丢失了印象分。

这次冲突是谁挑起的？是 414！谁该负主要责任？也是 414！

长久以来，许多团派群众始终对 414 强夺广播台这件事耿耿于怀。这也难怪，因为「414 串联会」的成立标志着「井冈山兵团」内部组织上公开出现了一个反对派，4.15 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开创了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极坏先例。

414 方面，在其后的派战中对强夺广播台的错误行动，没公开承认过，检讨过。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认识不足，没有深刻的反思。这是很不应该的。

老实说，在「414 串联会」成立的当天所组织的第一次行动竟然是强夺广播台，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也是我心里一直极不舒服的。我当时虽然表示了一个反对的态度，也没参与这次行动，但是事后我为了 414 的派别利益竭力美化这一行动。长期以来，我的认识一直是很肤浅的。

414 没有自己的广播台，犹如一个人没有喉舌般的痛苦。此后十几天，参加

414的一些老师自发捐款购买广播设备筹建414广播台，有的捐几十元（相当于一个年轻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有的甚至捐几百元（相当于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¹这让我们这些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们极为感动。就这样，4月30日，414终于有了自己的广播台。

我在4月14日那晚想不出的办法做不到的事情，414的群众就这样帮我们解决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评论蒯大富、沈如槐和我的表现：

说蒯大富：受压的时候讲理，掌权以后就常常不讲理。

说沈如槐：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也敢于不讲理。

说孙怒涛：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只好闭嘴不再讲理。

对蒯大富、沈如槐如此这般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感觉是有点过分了。但是对我的评论，我觉得虽不是全部至少在不少时候确实是这样，很形象、蛮到位的。当然，具体到强夺广播台这件事情上我后来闭嘴不说话，并不是因为主张强夺的人对我不讲理，而是我的理不足以说服对方的理因而我只得闭嘴了。

第二节 身兼三重身份，同是两派要员

从「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在清华的政治舞台上，我成了一个活跃分子。

我有三重身份：

我的第一重身份是「第一湘江」的组长以及「天安门纵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我的“山头”，我的根基。「第一湘江」和「天安门纵队」因为经常发表一些篇幅较长、观点不太偏激、态度比较平和、较为说理的大字报，因而在校内有比较大的影响。3月初，积极响应总部的要求，「天安门纵队」解散了。在「414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们把原「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又串联起来，成立了「三七战团」²，与“三纵队”解散以后又成立的「东方红战团」相呼应。

¹ 414没有财权。此后一年多，414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教师职工的自愿捐款。在唐金鹤《倒下的英才》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6-P400]

² 毛泽东1967年3月7日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上做了批示。批示要求“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执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生病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这就是著名的《三七指示》。从《三七指示》中，我们（指当年笔者和「三七战团」的朋友们）读出了通过“军训”“说服学生”对造反派帮助教育的政策，读出了“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的干部政策，读出了“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执行斗批改的工作”的运动方向。依此，我们认为文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此我们提出了“新阶段论”），造反派在新的历史阶段有可能会发生分化（据此我们提出了“左派分化论”）。因为对《三七指示》特别有体会，我们便把新成立的组织取名为「三七战团」以兹纪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三七指示》是肯定“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而「三七战团」却是跨系跨年级跨班级的组织，并非是以教学班为基础，这是完全违背《三七指示》精神的。可见我们那时对中央指示也是按需而取、为我所用的。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兵团总部核心组委员。凡是通知了我的总部会议我都参加了。这使我与其他总部委员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总部的各项决策的背景和过程也看得比较清楚。我经常在全校的大会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发表演讲。大字报、大喇叭上也经常看到听到我的名字，偶尔还会成为某一事件的焦点或争议人物。

我的第三重身份是「414 串联会」的负责人之一。不仅参与了「414 串联会」的发起，也是「414 串联会」负责人中唯一的一位总部委员¹。因为在整风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我与“三纵队”的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所以经常与“三纵队”的头面人物开会讨论，对他们的个性和为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等到 414 总部成立以后，我成了 414 总部的核心组成员。当然，到那时我就不再是兵团总部的委员了。

在兵团总部内部，我是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我的观点与总部其他委员的观点，彼此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但是我又不是一切都与兵团总部对着干的“反对派”。在不少事情上，我与总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譬如，我也坚决支持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批斗。当中央决定王光美回清华接受群众批斗后，我虽然没负责具体工作，但是总部每次开会讨论研究批斗王光美，我都参加了。4 月 10 日那天在中央主楼前广场召开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揪斗王光美大会上，我就坐在主席台前排最东边的那个座位上。²

明知我已经与兵团总部离心离德了，明知我与“三纵队”明来暗往、内外呼应，蒯大富仍然把我留在核心组内而没有一脚踢开，每次总部会议仍然通知我参加。甚至当我成了「414 串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蒯大富一直误以为我是「414 串联会」的一把手），总部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回避我。在这一点上，蒯大富对我还是显得宽容有雅量的。

几十年以后，蒯大富当面对我说，那时总部对我的压制是不对的。老蒯此话意在反思。其实，平心而论，我当时在总部里虽然感到有点压抑，但是并没有被粗暴地压制。

在总部开会议事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会有争论的。我在兵团总部里是明显的少数意见甚至是个别意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采纳我的意见那也是很正常的。随着兵团总部与纵队派、后来是与 414 的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

¹ 一直到 5 月 10 日王良生宣布参加「414 串联会」并成为串联会的负责人之一，「414 串联会」才有了第二位总部委员。

² 当年批斗王光美的时候，我当然认为批斗她是正确的革命行动。想起半年前她在清华的淫威，她对清华师生犯下的罪行，如今沦为阶下囚，我心中十分快意。我仅对给她穿戴这副行头心里有点看法，认为这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了，但也没想到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是目无法纪。笔者之所以写上“我就坐在主席台前排最东边的那个座位上”这句本可隐恶的话，就是承认笔者在这一事件中是犯有错误应承担责任的。王光美，她是文革的受害者，她也是文革的加害者。但是，即使对加害者也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笔者看到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中的批评后，不便再修改这段正文，谨以本脚注作为简短回应。

大，我也慢慢地失去了在总部会议上与其他总部委员喋喋争论的兴趣。因为，一来，我的观点在大字报或者大会上都是公开的，彼此都明白，谁也说服不了谁，再争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二是我不擅长于即兴辩论。这需要机敏。我脑子转得比较慢，往往需要思考后再想着怎么去驳，而且往往需要拟成提纲以后才讲得有条理。一对一的面对面辩论，我尚且应付不了，更别说我要与总部里那些特有辩才的同僚辩论了。所以，在后期，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一般都把我不赞同的观点尽量记下来，以免忘记，以备反驳。鲍长康老是对我说：“老孙，你别光记呀！你也说话呀！”老蒯也常说：“大家都别吵，先听老孙说说。”所谓压制，就是不允许别人说话，或者说了后组织围攻。少数意见不被采纳，或者没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压制不同的意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与兵团总部对我的态度相比，对 414 的态度确实算得上是打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总部对我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 414 则是按“准敌我矛盾”处理的。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后期在总部会议上只记不辨的态度引起绝大多数总部委员的反感。他们以为我拼命记录是为了向“三纵队”头头（后来是「414 串联会」头头）通风报信。这点上他们误解了。我生性讨厌偷偷摸摸的不光明做派，不屑于“里通外派”的勾当。作为公开的反对派（而非隐藏的内奸），在我参加的总部会议上也没有讨论什么不能外传的秘密，我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其他总部委员观点的原话。但是话说又回来，其他总部委员的反感和误解并非没有道理，都是因我的不当做法所引起。

后来我到了 414 总部，因为在观点上比较一致或相近，我所代表的「三七战团」成了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的一支重要力量。沈如槐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民主，所以我在 414 总部里得到更多的尊重，意见也往往被采纳。这比在兵团总部里的感觉要良好。但是，我要说的是，在 414 总部里开会的时候，个别不民主的粗暴现象同样存在甚或要超过兵团总部。

第三节 两位团委干部，参加过「第一湘江」的活动

在有关干部问题辩论的过程中，被工作组轰上楼还没有机会在群众面前做深刻检查没有被“解放”的清华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在辩论干部问题的过程中纷纷“亮相”。所谓亮相，就是以各种形式，主要是以大字报、公开信、发表谈话等形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已经有兵团总部和纵队派（后来是 414 派）两种不同的观点摆在那里，所以，亮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表态自己比较赞同哪一方的观点。由此，清华的干部队伍也基本分裂成两派。

414 看到亮相到自己这边的干部当然是热忱欢迎的。人越多势越壮也越表示自己的观点正确嘛。要是亮相到总部那边，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有时候还免不了挖苦几句讽刺几下。对有辫子可抓的，一点都不客气。譬如，对我熟悉的自控系党总支书记凌瑞骥，414 曾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揭他的老底，批他的罪行，声讨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总部对亮相到 414 这边的干部也一样，亲疏分明。这“疏”，就不是一般的冷淡和批判那样的“疏”，而是打压、围攻，后来是抄家、抓捕那样的严酷了。

亮相到 414 这边的干部，响应中央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号召，主动要求到学生战斗组里去。向“革命小将”学习，与“革命小将”相结合成为一种时尚。我们「第一湘江」就来了两位很知名的原因团委副书记谭浩强和贺美英。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参加到学生组织中去的校中层干部，在当时曾是一件很震动的事情。以致在「井冈山通讯」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简讯：“「第一湘江」公布成员名单，前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贺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 [4-P143]。

我在入学后不久就知道谭浩强的名字，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副书记，在学生中知名度很高。在文革中，谭浩强是最早亮相的清华中层干部，受到全校的关注。他曾写大字报公开反对蒯大富的否定一切、打击干部、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而同意 414 的“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观点。很多 414 战斗组都支持谭浩强，欢迎他参加学生的活动。可能是由于观点与我们比较接近，他们俩选择了“第一湘江”战斗组。他们来了以后，与我们在同一间大教室里活动，参加我们的讨论，大家相处比较融洽愉快。我们的身份是学生、“革命小将”，敢说敢干，说话做事没有什么顾虑。他们的政治阅历比我们要丰富得多，看问题也比较全面，我们乐于与他们讨论一些问题，听听他们的意见。但因为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干部，这与我们的学生身份是有很大差别的。总部常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当做是“操纵革命小将的坏干部”。我们组里也有个别组员比较左，训斥过他们。他们在这样的攻击和压力下，说话做事自然都比较小心谨慎。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份善良的心意：别给 414 小将添了麻烦。

记得有一次，我在大礼堂里作了一个发言，讲的好像是对蒯派要作阶级分析。我是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写成比较详细的提纲的。那次讲演相当成功，台下的老四¹一片叫好声。414 在大礼堂开大会，414 广播台当然也是全校直播的。大会完了我回到新水教室，看见谭浩强、贺美英非常兴奋激动，直夸我讲得好。他们奋笔疾书大字报支持我的发言，态度非常鲜明。那一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¹ 那时，团派的成员叫老团，414 的成员叫老四。这些称呼并无褒贬之意。

谭浩强在清华中层干部和“清华牌”干部¹中，很有代表性。他能说会写，敢于亮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号召力。由他牵头策划、胡大忻执笔起草、146名干部联署，发表了一封《致全体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影响很大，不几天在公开信上面签名的干部多达331名。所以在解放干部的时候，414是把谭浩强作为清华中层干部的典型来解放的（还有两个典型是罗征启²和吕应中³）。这个典型可不好当。因为明摆着，团派对414树立的干部典型是要竭力打击的。在二月份谭浩强刚贴出《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的最初表态时，曾得到兵团总部的肯定和鼓励。但当他明确亮相到414这边的时候，团派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责骂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两面三刀人物”。蒯大富甚至发表了一封“致谭浩强的公开信”，说他牵头的这封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4-P173]。自谭浩强亮相到414以后，他一直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我看到，他表现得很坚强。

文革以后，谭浩强成了我国最著名的计算机教育家。贺美英高升至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两位或从政或从教的成功人士在文革初期都曾经在「第一湘江」待过，也算是与我的一段缘分。

第四节 “孙怒涛舌战蒯大富”， 是有点影儿但此说有点演化

「414 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与总部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有一天，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我与蒯大富在大礼堂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

那天晚上，兵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大礼堂开会，往往是这样的：在主席台的正中放一张齐胸高的演讲台桌，台面上放着一只麦克风。讲台的东侧靠后放一张条桌，再放二三把椅子，是大会主持人坐的。主持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即时处理台下听众递上来扔在主席台上的条子。根据条子内容的不同，有的要马上转送给讲演者，有的要打断发言宣读条子的内容，有的就压下会后再处理。

那天，我与刘才堂坐在主持人席位上。蒯大富正在做总结发言。在他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老蒯离开正题把话锋一转，提到了我。

老蒯说（大意）：“我们都知道孙怒涛同志身体不太好，刚生病不久，医生

1 “清华牌”干部是指清华毕业留校工作的干部。在清华，“清华牌”的干部和教师占绝大多数，毕业于别的学校的干部、教师往往比较压抑。

2 罗征启：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3 吕应中：清华党委常委、核能所（即200#）党总支书记。

要他好好地静养一段时间。老孙，你可要好好地注意身体哦……”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感动，一阵热乎，觉得尽管我与他矛盾不断，他还是非常关心我、爱护我的。

老蒯话锋一转，接着说：“孙怒涛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你身体不好，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还是听医生嘱咐休息六个月吧……” [4-P173]

听到这里，我才听出味儿来。原来老蒯关心是假，警告是真。爱护是假，挖苦是真！

我筹建「天安门纵队」的时候，老蒯就不放心，以为我要拉出队伍另立山头，夺他的权，与他唱对台戏。后来虽然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为了促联合，而且真心愿意在他的领导之下，但看来他的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这次我与纵队派搅和在一起搞「414 串联会」，他认定我也是与“三纵队”一样，又要向他夺权来了。真的是，前嫌未释，又添新疑。

老蒯在大礼堂这样正式场合的大会上对我讥讽挖苦，怀疑我的动机，我很生气。我作为「414 串联会」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这样说，已经不是只对我个人的态度，而是与「414 串联会」直接相关的了。我真想马上站起来，对他的话立即予以反驳和回击。但是我这个人思维比较迟钝，反应也不够敏捷。正当我想着如何做出合适的回应，老蒯的演讲结束了，接着大会马上散了。

第二天在大字报区，有不少大字报（当然都是 414 方面的大字报）对老蒯的这次讲话表示不满，认为老蒯以这样没水平的话损一名持不同意见的总部委员，有点不厚道。更有的说，这等恶俗之语充分暴露了老蒯自身心地的阴暗。

我对老蒯的话也很气恼。冷静下来以后，我仔细地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必须要有正面的回应。如果不吭声了，那就是示弱，就是默认，只能让蒯大富和团派看轻我，414 群众也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怎么回应呢？直接说这是蒯大富的恶意攻击？或者也抓住蒯大富的过失来一个冷风热嘲给予回敬？想想都觉不妥。我想，最关键的还是态度要诚恳。我与老蒯毕竟是战友，他是我的领导。我与他之间是有观点分歧，也存在一些他对我的误解。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化解误会，减少矛盾。

另外，蒯大富是在长篇发言中把我“捎带”进去的。我也应该在一个主题发言中“捎带”着回应他的讥讽而不能直接简单地回答。

第二天晚上，总部继续召开批判大会。我为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精心充分的准备。

那晚，我在大会的发言中“详细阐明了 414 与团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我还）在发言中谈到‘将来‘井冈山兵团’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文化革命后又怎样进行防修、反修？’（这话）引起团派（的）哄堂大笑。” [4-P173] 我是联想到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好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

题，何况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呢？没想到我的问话竟引起哄堂大笑。在这些团派群众看来，我是一个杞人忧天的傻子。「井冈山」是革命的山、红色的山，怎么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呢？

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也是话锋一转，说（大意）：“昨晚，蒯大富同志在演讲中提到了我。我首先感谢他对我的健康状况所表示的关心。”

在浅浅的肯定之后，我接着说：“我们「井冈山」人造反、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清华园、在全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希望蒯大富同志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群众，能够团结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志，真正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而不只是为某个小团体而掌权。至于我本人能不能掌权，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414 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最后，我用“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段我最喜欢最能激励我的语录作为发言的结束语。

这一大段话，显得正气凛然又情真意切，既有领袖伟言又充斥派性色彩。这段发言引来坐在大礼堂的老四的满堂喝彩。第二天的大字报区出现了许多支持我发言的大字报，赞扬我的发言有理有节。

几十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对我重提这件旧事，还冠以“孙怒涛舌战蒯大富”这样夸张的标题。这，说到底，都不过是两派头头在派战中斗智斗勇、唇枪舌战的一个小小花絮而已。

我已经忘记这次口水仗是哪一天打的了。

看到《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¹日记》1967年5月4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晚上礼堂开辩论会，最后孙怒涛发了一个很好的言。昨晚蒯把孙讥讽了一番，说什么‘你要注意身体，否则夺了权也掌不了权’，姿态很低。今天孙态度诚恳，从革命利益出发对蒯提出忠告，姿态很高。”[3-P171]

感谢孙维藩的日记！有这一佐证，我不仅得知这次“舌战”的具体日期，也知晓这次交锋在两派的群众中确实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五节 我对权的认识，感觉很重要但又不会抓

蒯大富说我“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这话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说我掌不了权，或者不会掌权，这点他看得很准的。他说错的一半是，其实是我并不想夺权、

¹ 孙维藩是物7的一位普通老四。

也不会夺权，更夺不了他的权。

什么叫权？权与我有什么利害关系？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从高中到大学，我看到那些有权的职位，体现的是管理，是服务。譬如，班长管我，书记管我，老师管我，领导管我，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并没什么不应该，也没感受到权的力量。我也当过小小的学生干部，并不觉得我手里握有什么权，我只是想在领导安排给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付出自己心血，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大家服务好。

每一个职位，我看到的都是一份责任，一个需要付出自己心血的岗位，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是有油水可捞的肥缺。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看问题想问题都非常单纯、非常简单。

尽管在学《毛选》的时候也看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样的经典警句，这个“政权”的“权”到底是什么，还是很不清楚。权，似乎与我无关。潜意识里，我一直只要求自己听党的话，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员干部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文革开始，校党委轰然倒坍了，被夺权了。那权既不是被我夺的，也没夺到我的手里。权与我还是不沾边。

在学生中，对“权”有深刻理解并且极其重视的，当数蒯大富。他在工作组刚进校不久，就在一份大字报上写下了引起工作组警惕的关于“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的批注。

我不知道蒯大富在写这段批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地认识到权的意义、作用和威力。他能写出那样的话，有这样的思想，说明他对权的认识起码比我要高得多。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他这样的意识。不管蒯大富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权的实际意义，当他被工作组关起来失去人身自由，在全校批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想他对什么是权、权的威力有多大，必定已经有了切切实实的体会。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教会了蒯大富真正懂得了权。

我也是从工作组反蒯的时候，感觉到权的重要性。工作组手里握着权，它就能名正言顺地调动一切力量，镇压它想要镇压的人。

与蒯大富有很大差别的是：我只感到权的威力。而蒯大富不仅感到权的威力，更感受到权的强制性，他在强制下不得不失去人身自由。

此后，我对权的重要性的认识比以前要多了一点。权，不仅有服务、管理的功能，更有强制、镇压的功能。但是，有这点认识，与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到斗争中，完全是两码事。我虽然懂得了一点权的重要性，我还是没有想过以后要去夺什么权、掌什么权。

与那些自诩为“最革命”、“最正确”的革命小将不同，我一直认为我是要革命的，但是从来不敢说我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我所希望的是掌权的人是真

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能善待我而不是压迫我的。我从来就没想到我要去掌什么权，因为，我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掌权的料。即使我成了总部委员，我也并没有掌权的感觉。我在总部里从来没分管过某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具体的实权。如果说有点权，那就是我有参加总部会议的权利，有议事的权利。

在「天安门纵队」开会讨论的时候，虽然也有个别人说我们「天安门纵队」也应该当仁不让地去争权，但是主流论调是我们「天安门纵队」不要争什么权，我们所要做的是以大字报来影响全校的运动。我们认为，如能以正确的观点引领全校运动的方向，也就是实际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对这样的“虚权”看得相当重。而对于“实权”，譬如争名头、夺职位，我们从心眼里是鄙视的，不屑的。

蒯大富在夺权掌权的实践中不断有新的体会，不断地总结着经验。他在 1967 年初「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的文章。其中讲到：“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我还要说，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4-P103]

当我读到这样“精彩”的文章，这样“经典”的句子，我只能自叹，我是永远达不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写不出这样深刻的“醒世警句”。我老老实实的承认，对权的理解，对权的追逐，我永远都赶不上蒯大富，我只能做一个蒯大富所说的“糊涂虫、马大哈”。

蒯大富在“权”字上不断地下功夫，不断地创造“奇迹”：他把他对权的感性认识，经过提炼升华，上升到“权经”的高度。广为流传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确实听他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什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只要目的是革命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治斗争一定要有后台”等等，这些都是蒯大富和他的亲密战友在总部会议上或底下的闲聊中公开宣扬的言论。我当时听了，感觉特别的刺耳，很不中听。这与我的传统观念，与我为人处事的准则格格不入。

今天看来，蒯大富在我们那年代的清华人中确是一位颇有权谋的政治高手！他把今天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潜规则在几十年前就条理化，提炼成在造反派中极为风行的权经。

蒯大富从一开始就把 414 看成是向「井冈山」夺权来的，并时时刻刻提防着我和沈如槐向他夺权。实事求是地说，他提防“三纵队”，提防沈如槐他们夺权

还有点道理。就我和汲鹏、王允方、高季章等人，就「天安门纵队」而言，我们真的没有夺权的心思。我在这里并不涉及权的观念很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夺权或反夺权是对还是不对，我只是如实坦承，在我的周围，在「天安门纵队」里，就集结着这样一群心地上很真诚、很善良、很清高，但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很天真、很迂腐的书呆子。在当年的政治斗争中，这正是「天安门纵队」（后来是「三七战团」的致命弱点，团派和“三纵队”（后来是「东方红战团」）远比我们成熟得多。

第六节 筹建革委会，蒯大富的一着妙棋

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的成立结束了从工作组撤走以后长达四个月间多个红卫兵“群雄割据”的局面。12.25打倒刘少奇的大游行和1.6“智擒王光美”的行动后，清华「井冈山」的声名远播，蒯大富踌躇满志，准备再立新功。

唐伟的自动辞职和重立山头给了蒯大富一个反唐、反托、彻底否定「八八」的口实。这场造反派的内讧既使唐伟的形象受损，更让蒯大富大大失分。三总部的裂痕并没因组织上的联合而弥补，反而在加深、在扩大，形成总部与“三纵队”的新矛盾。

整风中，“三纵队”咄咄逼人，蒯大富忙于检讨、狡辩，左支右绌，十分被动。

在干部问题辩论中，414既占了制高点，又抢得先机，蒯大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蒯大富对纵队派和414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以为只要把他们打成“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4-P160]，广大中间群众就能觉醒过来，跟着兵团总部走。没想到高压反倒把中间群众同情弱者的情绪给压了出来，犹如工作组对蒯大富施以高压也曾引来不少群众的同情一样。只是，这次角色换位了。

1967年的头四个月，兵团总部从成立时候的巅峰状态一路下滑（只有4.10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这件事风光了一阵），似乎一直都是浑浑噩噩地不在状态。

总部终于意识到，继续辩论干部问题只能在这场辩不赢的口水战中被414牵着鼻子走。总部决定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经过一番讨论策划，提出了在5月底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目标，并于4月30日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当时，一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如上海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的“东北的新曙光”、贵州的“西南的春雷”¹等等。

¹ “东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都是在这些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社论所用的标题。

基层成立革委会的就更多了。北大、北航等也都在积极筹备革委会。所以，成立清华革委会，确实是抓住了当时的大方向，紧跟着文革运动的步伐。一箭双雕的是，既为全兵团树立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又可以甩掉 414 在干部问题上的死缠烂打，并将 414 推入被动应付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一招，「414 串联会」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虽然一统清华，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一旦「井冈山兵团」披上了一件“清华大学革委会”的外衣，那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414 在兵团内部搞点独立，玩玩对抗，是派别之争。要是在一个合法的政权内，414 的这些活动就有“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嫌疑，活动空间会受到极大的挤压。

414 面临着生存考验！

明目张胆地反对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这在大道理上是行不通。414 只能强调，有关干部问题的大辩论还没有深入展开，广大中层干部还没有解放，哪些是可结合的革命干部还没有达成共识，团四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甚至 414 仍然是“非法组织”的身份。面对这样不正常的局面，清华大学要成立革委会的基本条件远没有具备，时机远没有成熟。现时如果要强行成立革委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有权威的、代表全校革命师生意志的革委会，而是一个以兵团总部为核心，以少数几个同意团派观点的干部、教师做点缀的“团记”革委会。

就这样，围绕着成立什么样的一个革委会，现在是不是适合成立革委会等重大议题，两派进行着激辩和争斗。对于“清华革委会”这一目标，团派打的是一场攻坚战——势在必得，414 打的是一场狙击战——志在必挡。

兵团总部公布了由蒯大富领衔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共 11 人组成「革筹小组」作为清华大学的临时权力机构。蒯大富把我也拉进了「革筹小组」，我想主要的考虑是因为我是总部里公开的反对派。从形式上说，蒯大富不想让「革筹小组」给人以清一色团派的印象。他肯定也考虑到我是「414 串联会」的“总负责人”。但是我并不是以「414 串联会」的代表参加「革筹小组」的，因为此时蒯大富还没承认「414 串联会」是合法组织。

那时我的派性已经很强了。我对蒯大富的好意没有领情。与其他的 414 头头商量以后，为了表示我不被蒯大富拉拢的决心，我发表了《孙怒涛严正声明》以表明我的立场：

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 414」及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 414」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

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 [16]

414 的许多战斗组随即表态，坚决反对「革筹小组」，拥护我的声明。414 第十一次串联会也通过决议，“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4-P173]。

5月10日，同为总部委员的王良生因为与总部某些负责人“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分歧” [4-P180] 而在此时公开发表了参加「414 串联会」的声明，这让我在总部里不再感到孤单。

这段时间，除了在干部问题、「红教联」问题等方面两派依旧唇枪舌战以外，总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加快了筹备革委会的步伐。

蒯大富做了一个让步动作，那就是在5月9日终于承认「414 串联会」是合法组织。

紧接着，蒯大富做了一个进攻动作，那就是“搬出”谢富治这尊佛来打压414（也可能是谢富治主动来关心清华运动的，所以我在“搬出”两个字上打了引号）。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文革前任命的十几个副总理中，与那些被打倒、被批判、靠边站的其他副总理的处境截然不同，他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彻底投靠了江青，被毛泽东信任重用红得发紫的副总理。

作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过问清华的文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我最早知道谢富治的名字是在党史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陈谢”就是陈赓、谢富治。对于包括谢富治在内所有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们，我一直都是深怀敬意的！

5月12日，谢富治来清华，接见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据王良生回忆，蒯大富向谢富治介绍我的时候，称我是“「414 串联会」勤务站总负责人”。

谢富治听取了蒯大富关于学校运动的汇报，也听取了414对总部的意见以及我们的要求。从谢富治的指示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他对蒯大富的偏袒。他指责“414 大方向有问题。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 [4-P181]。当我们想提出联合方案时，谢富治傲慢地说：“我不看，你们的方案肯定通不过”。[4-P182] 谢富治接见两派的时间长达7小时，但是对消除两派分歧，促进两派联合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蒯大富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红卫兵小将的一面旗帜，又深得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宠爱，谢富治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蒯大富，这本来是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不应该用亲团派、压414的态度来支持蒯大富。这样的态度，只能助长两派对立情绪，无助于两派通过协商求同存异，最终也不能帮助蒯大富实现成立革委会的目标。

谢富治对我们的无理指责，我听了很反感，不服气。我在给414群众原原本本传达谢富治对我们的批评后，马上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

思想。他的话对不对，大家自己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嘛！”这话用意很明白，效果也很明显。“414 对谢的话极为不满，当晚 12 点，有 60 人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告状”。[4-P182]

5月21日下午，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兵团总部与414负责人，主持两派的协商谈判会议。代表414方面出席的有孙怒涛、沈如槐、宿长忠、刘万章、王良生、龙连坤等六人。我是首席代表。团派以蒯大富为首，鲍长康、任传仲、陈继芳等参加，人数比414要多。

会上，两派都向谢富治告状，互相攻击，自我辩白，极少自我批评。谢富治听了很不乐意，要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做口头革命派，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做大联合的促进派。两派都表示拥护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说，你们都赞成不打内战了，那就把共同点达成一个协议，回去执行，慢慢创造大联合的气氛。

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两派达成了著名的《四项协议》：

- 1、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 2、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 3、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 4、「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在协议协商的过程中，双方的争论极为激烈，都希望协议对己方有利的多一些。除了龙连坤作为革命干部不便讲太多率直的话之外，我们其他五个都是学生，与团派代表在言词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沈如槐说话最多，最为力争。我说话较少，因为我是首席代表，我得表现得稳重一些。要么不说话，要是说话，就表示了414的最后意见。

对《四项协议》的第一条，双方都没有异议。

第二条，关于按班、系实现大联合。团派坚决支持，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解散「414 串联会」，然后化整为零地吃掉。414 这方则深有顾虑。纵队派已经在三月初吃过解散纵队的大亏了，当然不愿意马上就搞“按班、系的大联合”。心中虽有这点小九九又没法公开说出来，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显然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条款。团派认为非写上不可，谢富治也坚持这一条必须写上。最后，经过激烈争辩，414 终于争得了“逐渐”两个字作为过渡，即同意“逐渐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第三条，关于「革筹小组」。团派认为无需调整，主张原封不动。414 认为「革筹小组」里除了孙怒涛以外都是清一色的团派，而且里面还混进了宋××这样的“坏人”，所以必须调整，增加414方面的代表。「革筹小组」的名额分配直接关系

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所以双方都坚不让步。谢富治知道如果团派一点都不让步的话，这协议难以为 414 所接受。他表态说应该适当调整，团派这才不得不同意调整。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式的协商、谈判，双方同意调整扩大后的「革筹小组」名单共 22 人，其中学生 13 人，革命干部 5 人，教职工 4 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4-P188]

在 13 名学生代表中，团派占 9 人，414 有 4 人。沈如槐对 9：4 并不满意，想再争取多一点，最好是基本对等。这点上，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能占据 4 席，已经很有话语权了。比起我在兵团总部里处于极少数的境遇，我觉得 9：4 已经很不错了。

414 方面推荐孙怒涛、沈如槐、汲鹏、王良生、龙连坤（干部）、李振民（职工）参加「革筹小组」。我、汲鹏、王良生的观点在 414 中都属于比较温和的，龙连坤、李振民是干部，也不过激，这几位蒯大富都表示接受。沈如槐是「东方红战团」的，观点比较激进。蒯大富对「东方红战团」、对沈如槐的成见很深，对他参加「革筹小组」表示强烈反对，坚决不同意。我们坚持沈如槐必须参加「革筹小组」，因为沈如槐代表了「东方红战团」，代表了 414 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僵持不下，最后还是由谢富治拍板，同意沈如槐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生气也没办法。

照理说，《四项协议》中，最关键最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三条，因为这一条涉及到权力分配。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双方争议最激烈的居然是第四条，即“「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一条上。

第七节 谈判异常激烈， 只为加不加“正确”两个字

本来第三条还有“调整和扩大总部”的内容，但是谈判中对此没有涉及。即使总部调整扩大，再增添几名 414 人士，加上我和王良生原有的委员，总部里「414 串联会」的代表依然只是少数。

我们担心的是，团派占绝对优势的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极有可能作出非常不利于 414 的决议，譬如，以大局为由要求解散「414 串联会」。对这样的决议，要是不执行，就是违背《四项协议》。要是执行，无疑是自己钻到自己结的套索里去，吃哑巴亏。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非常的被动。

对于第四条，我们一开始主张干脆不写，回避处理。团派坚决不同意。谢富治也支持团派的意见。我们一看反对不了，就强烈要求在第四条中加上“正确”两字，修改成“「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团派代表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的权威性，

它作出的决议当然必须无条件执行。他们内心是想以这一条来束缚 414，担心要是加上了“正确”两字，414 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字把一切不合 414 胃口的决议都说成是不正确的决议而拒不执行。

这一条款，就像是如来佛的“紧箍咒”。没有这一条，团派担心 414 这个“孙悟空”随时会造总部的反；有了这一条，414 担心总部随时会想出什么妖蛾子整治得 414 头痛欲裂。

两边内心的担忧都有一定道理，彼此也心知肚明，但又都不便拿到台面上来。于是为了加不加“正确”两个字，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¹

一年前，要是工作组说“工作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蒯大富会认为这样的说法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坚信蒯大富肯定不会同意这样说法的。“「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样的说法违背毛泽东思想，实在太明显了，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能一眼识别的。而现在，因为这有利于蒯大富了，他就坚持这样的说法。看来，还是利益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深信加上“正确”两字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以顽强争取。我们当即背诵了一段很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我们还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上都要加“正确”这一限定词，对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反而不允许加“正确”这一限定词，岂非咄咄怪事？

谢富治迅即掏出语录本，以我非常惊讶的熟练程度翻到第 103 页，带着大舌头腔念道：“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我们反驳：“「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都不是党的机关。”

谢富治疾言厉声地反驳我们：“「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权力机关，也适用的！”

我们顶嘴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经常做出错误的决议。”我们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把心里的顾忌摊上了桌面：“如果回去以后，他们利用多数做决议叫 414 解散，我们难道也要执行吗？”

谢富治拉长了脸不悦地说：“你们应该相信他们，要互相信任。”

一句来一句去，我们顶撞着谢富治，据理力争，毫不示弱，但是气氛越来越僵硬。

形势严峻，连一向稳重少语的龙连坤顾不上干部的身段，忙不迭地帮腔。我也赶快放下“首席谈判代表”的架子，一再插话抢话。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尤其是

¹ 深感老团老四和谢富治都缺少谈判的智慧。1972 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在谈判中碰到棘手的台湾问题。聪明的基辛格提议的“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表述为中美双方所接受，于是诞生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团派坚持不让加“正确”两字，这第四条变成刚性的。414 坚持要加上“正确”两字，加上了第四条就变得弹性的。如果能在刚性与弹性之间找到一个比较柔性的用词或表达方式，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很遗憾，那时的我们都没有解决棘手难题的智慧和灵活的谈判技巧。

沈如槐急得有点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起来，极力反驳谢富治的谬论。

团派代表在旁边使劲起哄，说 414 对大联合没有一丝诚意，414 公然反对谢副总理的指示……

我们不顾脸面的顶撞抢白，团派代表的火上浇油，彻底把谢富治惹毛了。他虎着脸说：“我是为促进你们的大联合而来的。你们这样吵来吵去，连我这个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也管不了你们啦？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谁要当就谁来当吧！你们要是想打内战就去打吧。一年二年都没关系。等你们打够了，再签协议！”

谢富治撂下的狠话，就像是下了最后通牒。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被逼到了死角。

我看谢富治沉下脸，动了怒，心里又是担心又有恨意。过去对他的敬重，在此时已经消失殆尽。眼前的谢富治如凶神恶煞一般，已不是军人的威严，而是蛮不讲理的霸道。

我看到蒯大富、鲍长康的嘴角上挂着得意的微笑。微笑里面，还有一丝对我们的冷笑、嘲笑和幸灾乐祸。

明明白白这一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非得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在谢富治虎视眈眈的威逼之下，一股被逼订立城下之盟的屈辱涌上心头。

就我心中的怒火和愤懑，我真的很想猛拍一下桌子，腾的一下站起来，吼一声：“老子不干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尽管我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是在逼急了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怒发冲冠的激愤冲动。

我当然可以不签字，可以把谢富治和团派撇在这里扬长而去，可以显示我们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团派回校以后，“拒绝大联合”、“破坏和平谈判”、“反对谢副总理”等等吓人罪名都会铺天盖地的压在我们头上。谢富治会向毛泽东汇报，很可能会惹得龙颜大怒。414 将陷入极大的被动，严重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难以估量。

我要是签字，明知这是明显违背毛泽东思想而又会给 414 带来极大危害，我如何向 414 的其他头头和广大群众解释交待？

实在是左右为难！

蒯大富已经代表总部在协议上签了字。

谢富治看着我。团派代表看着我。414 的几个代表也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有愤怒，有屈辱，有无奈，有不安……

沈如槐凑近我的耳朵嘀咕道：“我们不签字！”我轻声地问他：“要是我们不签字，能走得了吗？”¹ 沈无语。

我想，四条协议，前面三条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经过力争才得到的。尤其

¹ 这几节中有关《四项协议》的谈判细节，均根据笔者在 1971 年 9 月所写的交代材料底稿。

是 9:4 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一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为这一条而推翻全部协议不签字，可怕的后果立马就会降临到 414 头上。签了字，争得了基本的利益，可能产生的后果回去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我心中权衡再三，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抓起重如千斤的钢笔，代表 414 签下了我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内心有撕裂般的痛楚。真窝囊！真屈辱！真不甘心！

签字完毕，谢富治那张紫红色的嘴脸回嗔作喜。团派代表喜逐颜开，眉飞色舞，使劲地吹捧谢富治。我们一脸苦相，闷闷不乐。

这次谈判，沈如槐给谢富治留下了深刻的但是负面的印象。在我们临走时与谢富治握手作别，谢富治握着沈如槐的手，不忘批评了一句：“你这个小伙子呀，只能做一个闯将，不能做元帅！”

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们少言寡语，气氛沉闷，心情沉重。怎么向 414 群众解释我们怎么会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怎么让 414 的其他勤务员理解我们这些代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心中茫然。

第八节 墨迹未干，我就撕毁了《四项协议》

回校以后各自散去。我向 414 群众接待室走去。

不少老四已经得知我们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所以一路上有人拦着我，关切地打听情况。我边走边说，到接待室的时候，后边已经跟着一些人。接待室里的人更多。显然，他们早就在这里等着头头了。

我简略地讲了谢富治主持两派谈判的情况，讲了《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

听了前二条，很平静，没啥反应。听了第三条，有点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一听完第四条，顿时大哗。责问声随即响起：“这么明显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条款，你们怎么不坚决抵制？”“你们为什么不先回来与我们 414 群众商量就签了字？”

开始，我还做点辩解。后来责问声越来越响，甚至还有责骂声。有的老四十分激动地谴责我们，说：“你们这是屈服于谢富治的政治压力，与团派搞妥协，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出卖了 414 战士！”

我自知理亏，本来就有点“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惭愧，只是没想到 414 群众的反响会这样大。看这架势，《四项协议》在 414 群众中肯定通不过。

我对大家说：“当时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不签字的。你们要是不同意，就贴大字报造我们头头的反嘛！”

晚饭后，我到 414 广播台去。果然，那里已经有好些老四以及没有参加谈判的勤务员。见到我，又是一片责备声。沈如槐召集勤务站的人开会，说：“别互

相埋怨了，要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

多数勤务员认为前三条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第四条。有人说：“勤务站应该发表公开声明，阐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先讲清楚，比以后蒯大富作了解散 414 的决议后再不执行而违背协议要主动些。”有人说：“参加谈判的头头就不要公开反对《四项协议》了，免得团派说他们是出尔反尔，撕毁协议。”大家都很同意。于是，我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主意：让没有参加谈判的“汲鹏等 19 个委员发表声明：(1)感谢谢副司令对清华的关怀；(2)抵制孙怒涛等人的右倾；(3)协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4-P189]

这样的一个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对《四项协议》的基本接受（前三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是对整个《四项协议》的抵制和否定。

勤务组还默许甚至怂恿下面的战斗组造我们这些犯了右倾错误的头头的反。我们认为，414 群众不满的情绪表达得越激烈，我们撕毁《四项协议》就显得越是合理，越是迫不得已。

对《四项协议》不满，当然也是对谈判《四项协议》代表的不满。我作为签字的首席代表，更遭到大家的严厉质问和指责。我本来已经十分愧疚了，这时连连认错。“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作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 414 战士，要求 414 战士炮轰 414 头头。”[4-P189]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414 群情一片激愤，「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以及“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声称协议‘根本违反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的表态仅仅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进行抵制，「东方红战团」中的一些勤务组成员不满意汲鹏等人发表的声明调子太软。他们单独发表声明，说“《四项协议》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对这样的上纲上线也很反感，认为过分。

团派看到 414 这样对待《四项协议》，大骂 414 背信弃义，也大骂我不讲信用，撕毁协议。

我陷入了团四两派共同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团派眼里，我成了那个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墨迹未干即刻撕毁和谈协议的蒋介石。在 414 眼里，我成了那个屈服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因而右倾投降的陈独秀。没一个人能理解我，原谅我，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无法宽恕自己。

414 方面强烈抵制《四项协议》，团派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执行《四项协议》。签字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蒯大富利用传达谢富治指示的机会，对 414 进行攻击。这明显违背了《四项协议》第一条“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的承诺。414 抓住这一点，认为是团派违背《四项协议》在先，为自己抵制《四项协议》找充分“理由”。

414 的反叛举动，团派的不检点行为，都没有逃过谢富治的眼睛。5月 23 日

凌晨一点，414 广播台的大喇叭叫我赶快去接一个重要电话。我一听是谢富治办公室打来的，非常重视，立即叫广播台同步进行电话录音。来说这是谢副总理的指示，是传达给蒯大富和孙怒涛的：“你们总部和 414 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 [4-P190]

我接听电话指示以后，对录音进行整理，并立即与沈如槐等人商量。我们对“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的告诫不很理解。但是既然现在连毛主席都知道了《四项协议》，这就非同小可了。凌晨二点多，我通过 414 广播台一字不差地传达了谢富治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大礼堂由兵团总部召开的全校“庆祝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巨大关怀”大会上，我再次进行了传达，并“代表 414 总勤务站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4-P190]

我对谢富治的指示是不折不扣如实传达了，但是对《四项协议》“坚决拥护、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表态，完全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仅仅是为了应付。

「414 串联会」勤务站的所作所为也一点不漂亮。在统一运作下搞了一次阳奉阴违，施的是雕虫小技，演的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把戏，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漂亮外衣下，最本质的是 414 的利益容不得有半点损失。

我现在这样严厉的抨击，对于那些留校的没参加谈判的勤务员显然是不公正的。他们只不过是出于保护 414 利益的派性考虑当了一次“周瑜”。即便是参与谈判的那几位勤务员，这样的抨击也是过重的。因为最后拍板签字的不是他们，而是我。

我在谢富治面前，既没有本事说服他，也没有胆量跟他翻脸。回来以后，一边忙着做检讨，一边与大家商量合谋。真正阳奉阴违、背信弃义的，就我一个人，无论我有多少无奈和压力，都不能成为这样做的借口。这是一次违背我以往做人原则的政治道德的堕落，我深感惭愧。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这种氛围的政治斗争中，我学到的究竟是聪明，还是狡黠？我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演变。

第九节 团派紧锣密鼓筹备革委会， 414 策划密室一心奔独丘

团派的形势一片大好！

成立革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谢富治的坚决支持。《四项协议》已经签订，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团派上下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全力

以赴，奔着同一个目标。可以这么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兵团总部这一边。而 414 正好相反，外有团派及谢富治的挤压，内有群众的普遍不满，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困境。

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得意容易忘形失态。蒯大富踌躇满志地说：“当前的大好形势，不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是要‘占领南京’了！” [4-P148]

蒯大富传达了 5 月 23 日谢富治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 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1-P149] 于是，团派就从谢富治的传达中拼凑出“414 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这让我十分反感。毛泽东的话意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怎么能随心所欲地剪辑、演绎成这样的“最高指示”了呢！而且，对于谢富治向毛泽东的汇报，我相信《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是会汇报的，但是不可能向毛泽东汇报 414 强烈要求第四条加“正确”二字、团派坚决不同意加这样的分歧细节。毛泽东也不可能过问得很细。能够听取清华两派的协议并且表了态，这对毛泽东而言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我对谢富治用毛泽东赞同《四项协议》这样的话来压 414 屈服，同样很不满。

「革筹小组」开会，两派各自推荐共提出“学生代表 37 名，革命干部 5 名，革命教职工 7 名，共 49 名；常委 17 名，主任 1 名，副主任 4 名” [4-P191] 供群众讨论。

对 414 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团派搞起了连不少老团都感觉不太光彩的搞臭风。“团派按老蒯‘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大字报铺天盖地造谣、污蔑、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把 414 的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彻底搞臭。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 24 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总部委员鲍长康等人还大叫‘好得很！’” [4-P191]。

对我的搞臭内容，也就是“九评”学习那点事情。

本书初稿曾向鲍长康征求意见。在一次聚会中，他对我说：“老孙，你知道对你的搞臭风是怎么组织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就告诉你这个几十年前的秘密吧。

那时团派已经掌握了全部学生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写的“九评”学习检查材料（我真不知道像我“九评”学习时候的检查材料都要装到我的档案袋里，今日听了仍令我感到极感震惊！）老鲍说，他把这些材料散发给一些战斗组，让他们写搞臭我的发言稿和大字报。我对老鲍说，我“九评”学习中暴露的问题在工作组时期已经有班上的同学在大字报上捅出去了。老鲍开玩笑地说，那是个人行为，我们那一次可是“组织行为”啊！老鲍又说，“你的书名叫《良知的拷问》，

我也算是拷问了一次自己的良知。”我紧握老鲍的手，为老鲍坦诚、磊落的胸襟深深感动！

尽管那时我的脸皮已经练得有点“刀枪不入”，对我搞臭也无所谓了，但是我对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本身还是很反感的。为此，我、汲鹏、王良生发表了《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刹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4-P192]

过了两天，5月28日，在大礼堂进行革委会选举。414方面鉴于前几天的团派对414候选人的搞臭风和对414的攻击依旧不减，对这次选举进行抵制，没有派人参加。“会上，蒯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切很顺利，最不顺利也只有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老蒯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小组」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4-P194]由于我们都没参加这次选举会，写得如此绘声绘色的选举详情究竟如何我并不清楚。要是汲鹏、王良生以及我的通过都如此之艰难，沈如槐是折腾了几次才通过的？好像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没提名？对于团派单方面搞的选举闹剧，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两派签订《四项协议》以后，414是公开抵制，团派是实际违背，两派都没有遵守执行《四项协议》。414撕毁《四项协议》为团派的攻击提供了口实，团派违反《四项协议》的作为给414的分裂提供了借口。才几天功夫，《四项协议》已经名存实亡。刚调整扩大的「革筹小组」因414的不再参加而成了团派的一言堂。

这些天，鲍长康代表总部号召兵团上下“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廿四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4-P191]陈继芳也发出了这样的誓言：“老子铁了心，5.30一定要成立革委会！”[11-P113]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414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们不再理会团派单独搞的革委会选举，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策划414的独立，即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414 独立的主发动机

「东方红战团」对于414的出路，态度是很明确的。

派生于「八八」、“三纵队”的「东方红战团」，在政治观点、派别利益等

方面与团派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从「井冈山兵团」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显示出离心的倾向。随着这阶段蒯大富的不断犯错误以及对 414 的高压政策，「东方红战团」要与总部分庭抗礼的态势更加明显。即使冒着分裂的骂名和中央打棍子的风险也要坚决抵制团派独大的革委会，这是「东方红战团」的既定方针。当然，在步骤上，在策略上，「东方红战团」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到了 5 月底，「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们在圆明园废墟密谋，作出了“成立新的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策。” [1-P153] 我对「八八」和对「井冈山」都是有感情的。如果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分个厚薄，在兵团成立之初，我对「井冈山」更有感情。只是，随着与蒯大富之间分歧的加大，我对总部的失望也多起来了，感情也逐渐疏远一些了，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则亲近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与总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像「东方红战团」与总部之间那么多、那么深。

我乐于在兵团总部里面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总部委员。在有些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在另一些事情上我也投赞同票。

随着争论的升级，我与总部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这是事实。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脱离总部，要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要与总部分道扬镳，要与蒯大富正面相斗。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如果说，「东方红战团」是想把我从蒯大富营垒拉出去成为与团派对抗的同盟军的话，那么我更多的是想借助「东方红战团」这一外力逼着蒯大富认识错误、更弦改辙。

5 月中旬，当「东方红战团」的一些重要人物频频向我吹风，说什么“只有经过分裂才能达到真正的联合”，我不仅没有这样的念头，对于这种歪理，心里还挺反感的。

这期间，「三七战团」开过好几次战斗组组长会议和全体会议，研讨过学校的形势和可能的结局，也谈到过“分裂”这样的话题。有主张不得已就分裂的，也有主张无论如何要避免分裂的。总的倾向性意见与我一样，都是主张能不分离就尽可能不分离。

一提到分裂，我就想起了张国焘。红军长征路上，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因此，张国焘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现在的情况当然不能做这样简单的类比。我可以辩解说自己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得不与错误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但是，归根到底是自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这总是一个客观事实。分裂，怎么说都是一件很难听的事情。谁都不愿意背上分裂的骂名和责任。难道我想做清华文革历史上张国焘那样的分裂主义分子吗？决不！

此外，414 与团派的矛盾难道真的尖锐到非得分裂就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步了吗？我心存幻想，感觉好像还没有那样严重。

我当时是这样估量 414 的两支中坚力量的：

「三七战团」，既没有搞分裂的心思，也没有搞分裂的魄力和能力。没有「东方红战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总部分裂的。有了「东方红战团」，在某种条件下，它可能会跟随着分裂。

「东方红战团」，不管有没有「三七战团」相随，它或迟或早都要从「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去的。没有「三七战团」，它分裂以后究竟会有多少 414 群众跟着「东方红战团」走，这样的一个分裂组织能生存多久，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如果有「三七战团」一起参与分裂，那么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分裂后生存的机会就多得多。

「东方红战团」这架动力强劲的发动机在分裂的道路上已经启动，我也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前进还是后缩？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局势逼着我作出最终的抉择。

第十一节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最终抉择了分裂

前段时间，我无论与蒯大富怎么有分歧，闹矛盾，搞对立，那都是政治观点上的，并没有再上升到组织上的决裂。但是，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我知道我已经处在分裂还是不分裂的十字路口。

《四项协议》对我个人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方向的抉择上，我从不主张分裂偏向到了不得不分裂。

谢富治是那样的蛮横无理，连“正确”两个字都不允许加。团派承认 414 合法仅仅是改正错误，并非是实质性的让步。而承认 414 合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赶快成立革委会这一功利目的，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从根本上改变对 414 的态度。搞臭风、攻击风就是明证。

如果不分裂，那以后“合伙”的日子怎么过？今天兵团总部、「革筹小组」的决议要无条件的执行，明天革委会的决议更得无条件的执行。要是不执行，罪名就更大了，那是抗拒红色政权的大罪，到时候动用专政机器实施镇压也是理由十足的。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反抗是够坚定的，让我钦佩。蒯大富对唐伟的打击、对「八八」的否定、对“414 是非法组织”的定性也够厉害的，让我害怕。他在这两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手段，我都领教过了。

除了对今后形势的估量以外，在我思想的深处，还有一个对个人利益和命运的考虑和担心。很明显，我如果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

政治风险：清华「井冈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蒯大富是全国闻名的学生领袖。他们在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战役中立下了大功。因此，不仅得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支持，更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要与「井冈山」闹分裂，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置于右倾的、分裂的位置上吗？置于与中央文革闹

别扭的对立面上吗？我们这样做，肯定得不到上面的支持，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同情。再说成立革委会，这大方向肯定没有错。外界不会理解 414 为什么要反对成立革委会，不会认同“两派分歧严重成立革委会的条件不成熟”这样的反对理由。外界所看到的就是 414 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蒯大富。随便问一个路人选择支持蒯大富还是 414，不见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支持蒯大富，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支持 414。更何况，周恩来已经答应要来参加清华革委会的成立大会了。只要大会一开，他亲自一参加，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个革委会，说明 414 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错了，是倒行逆施。接下来 414 如果不解散的话，蒯大富很可能把 414 重新定性成“非法组织”甚至反动组织，把 414 的主要头头都定性为坏头头。到那个时候，414 的处境是非常凶险的，我们这些 414 坏头头的下场也是极其难看的。被抓起来，被判刑，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完全有可能的。

政治利益：我已经是兵团总部的核心委员，是「革筹小组」的四个副组长之一。尽管在革委会选举中被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我知道那不过是团派的小伎俩而已。我肯定能参加革委会，而且风闻我是内定的四个革委会副主任之一。这个相当于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令人炫目的。我也明白，在这个革委会里，我只是被团结的对象，只是用嘴皮子参政议政的一只花瓶而已。很有可能过不了几天，我又会被蒯大富当做右倾分子排挤出来，当做唐伟第二来打击。但是，在近期一段时间内，有虚名、无风险，还能满足一下虚荣心，这点大体上也是肯定的。

如果我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但是，如果我害怕承担政治风险，却想着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而放弃我的政治立场，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在老四眼里，我就是一个背叛者；在老团眼里，我就是一个投机者；而我对自我的评判则是一个变节者！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胆怯。在诱人的政治利益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动摇。因为谁都有私心杂念，谁都有得失考虑。要说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与命运，那是不真实的。

但是，影响一个人思想行为的，不仅仅只是趋利避害这一条。我，以及我们这一群人，在当时是把政治理念视为根本，把政治观点看得极重的人。就我的内心而言，我非常在乎坚持独立的政治见解。当捍卫我的政治观点与追求我的政治利益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究竟选择什么？

那是一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年代。我们已经认准了我们是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也已经认准了蒯大富在是极左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和可能采取的办法进行抵制，即使上刀山下火海，有天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我想过政治风险和政治利益，但是没有因此而动摇过，我坚定地取义而舍利。

当沈如槐等人把「东方红战团」的决定告诉我，询问「三七战团」的态度时，我与汲鹏商量后，决心不再理会「三七战团」一部分成员的反对意见，决定以「三七战团」声明的形式支持「东方红战团」，一起与总部决裂！

我做出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政治决断。我很明白，这一决断不只是影响我一个人，也会影响到一大批 414 群众。不只是影响 414 的未来，也会影响清华文革的走向。

从这一时刻起，「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成为 414 这叶小舟的两架发动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迎着恶浪，奋力向前！

「三七战团」的坚决支持，我和汲鹏的明确表态，让沈如槐和「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们十分惊喜，他们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几天，团派上下忙忙碌碌。彩旗插上了，标语挂起了，锣鼓备好了，请柬派送了，就等着 5 月 30 日良辰吉时一到，等着周恩来、谢富治等贵人主席台一坐，广播一响，口号一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庆典就要开幕了。414 知道团派全力以赴在做些什么，因为这是公开了的。团派是不是知道 414 暗地里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分裂？他们忙得晕头转向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也可能知道 414 的动向，但是没太放在心上。对于团派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要革委会的大牌子一挂，无论 414 折腾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样来也都无济于事了。

清华园中，团四逐鹿，究竟鹿死谁手？

水木湖畔，鱼死网破，到底谁笑最后？

谜底即将揭晓。

第十二节 不伦不类的“井冈山 414”， 这个名称是我坚持的

在策划分裂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最后采纳了我的提议。

一是新组织的名称。

「东方红战团」认为，既然与「井冈山」彻底决裂了，那么在名称上也应当抛弃“井冈山”这块牌子，与「井冈山」划清界线。他们提议新成立的组织名称叫“东方红”。他们甚至搬出驻在清华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¹的话：“我看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1-P156]。我既不同意张广友的观点，对他居然说出这样不合记者身份的话更感到十分吃惊。沈如槐与张广友交往甚密，视他为“良

¹ 张广友在 1975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始终遵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写了多篇内参报道，肯定万里的铁路整顿。以后，他积极支持、热情报道安徽的农村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

师益友” [1-P135]。我除了因解散「二万五千里」找过他以外，此后再也没有与他交往。这可能与他对“三纵队”——「东方红战团」的观点更欣赏，对「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不太感兴趣很有关系吧？我认为他是伸向「东方红战团」的一只手。究竟是红手还是黑手，我不知底细，但我不喜欢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插手清华运动。我心里一直对他保持着一份警觉。

「东方红战团」与「井冈山」既没有什么渊源，也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对“东方红”这一称谓情有独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三七战团」不同。「三七战团」成员中既有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的，也有来自「井冈山红卫兵」（蒯派）的。如「第一湘江」绝大部分组员都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所以，总体而言，「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即使现在不得不离开「井冈山」了，对“井冈山”这一称谓还是有一份依依不舍的情感。在「三七战团」的会议上，即使愿意分裂的人都不愿意易帜成“东方红”。如果易帜，不仅组织上离开了「井冈山」，还有一种投奔到「东方红战团」门下，被「东方红战团」收编的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这样的小心思又摊不到桌面上来。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条非常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在 414 的基本群众中，大多数人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要让他们在组织上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再要他们在情感上与「井冈山」一刀两断，接受一个并不怎么喜欢的“东方红”，难度就更大了。新组织的名称固然很重要，但是争取更多的 414 群众跟着新组织走，那是更重要的，因为这与 414 独立后的前途命运密切攸关。

「三七战团」的人一定要我坚持在名称中必须有“井冈山”，并把这作为「三七战团」跟着「东方红战团」一起独立的条件。

在有关名称的协商过程中，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都认为在名称中应该有“414”，这点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我们不同意叫“东方红 414”，「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对“井冈山 414”这个名称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所以，在名称问题上争辩得很激烈。我绝不后退的坚决态度，以及我为 414 前途和利益着想的正当理由最终说服了「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经过反复比较这两个名称的利弊，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名称就用“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这是我坚持的结果，也是「东方红战团」为了大局照顾「三七战团」情绪作出的让步。

所谓利弊，这里的“利”，也有沈如槐所说的“从「井冈山」拉出去一支队伍，对老蒯影响可能不大，而在「井冈山」内部‘另立中央’，会使老蒯十分难堪”[1-P155] 这样的派利考虑。老实说，「东方红战团」的人会这样想，「三七战团」的人并没有那么去想。

名称定下来以后，有一位「东方红战团」的头头说，蒯大富已经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才是真正的井冈山人！我听了这种虽说不是全无道理的强辩，

心里着实感到有点好笑。我想，只要你们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就不吭声了。

沈如槐后来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的名称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带来的好处却妙不可言。” [1-P155]

要说“不伦不类”，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成「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也是共用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的。414 与团派共用“井冈山兵团”，并非首创。不过当时我说服大家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用这一先例作为理由。

真正“妙不可言”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 414 群众脱离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障碍。其次，让社会对 414 的认可也有一点帮助。因为从名称看，这是同一个造反组织的两派因观点不同而分家，并非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立而另起炉灶。

如果说一点小秘密，那就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细微的奢望。我要“下山”了，要与老蒯分手了，这是非常伤感情的。这伤筋断骨的裂痕，是很难愈合的。但愿在名称上还连着这么一层脆弱的皮，希望能在以后的大联合中对创伤的愈合多少起点作用，也希望日后老蒯和老团们能明白我的一点良苦用心。

我不知道团派和蒯大富听到“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这个名称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很恼怒？可能很无奈？我现在知道大多数团派都认为这是 414 要沾响当当的“井冈山”的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充分利用“井冈山”的品牌效应和无形资产。这样的猜测是不符合实情的。「东方红战团」根本就不想沾“井冈山”的光，他们在心理上对“井冈山”是排斥的。我代表「三七战团」坚持用这个名称，并非想沾“井冈山”的光，而是出于对“井冈山”还留有一份真诚的情谊。团派的朋友们可曾想到这一层？

第十三节 尽倾主力背水一战，这个建议是我提议的

我参与的另一项决策是策略性的。

沈如槐原先的设想是这样的：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在「东方红战团」中精选五十名骨干分子结成死党，由沈如槐亲率这精锐之师组成“敢死队”，抱定必死的决心，成立 414 总部。以「三七战团」和「东方红战团」剩余力量为主包括绝大多数 414 群众由我牵头仍然留在「414 串联会」里，以照顾 414 群众中不愿分裂的情绪。如果“敢死队”突围成功，那么「414 串联会」马上就跟进，合并到 414 总部里去。如果中央对刚成立的 414 总部狠狠地打一闷棍，定性为分裂势力或反动组织，那么这批“敢死队员”即使做拼死的抵抗，也肯定要“光荣牺牲”了（被狠整的意思），414 肯定要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是「414 串联会」这

块阵地还在，仍然可以继续与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和新成立的革委会周旋到底。

这确实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两全之策。沈如槐的身先士卒，「东方红战团」的勇挑重担，都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士气高昂，誓言为信仰、为主义、为正义而甘愿献身。那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令人动容，令我钦佩！

当沈如槐在 26（或 27）日向我通报这一方案的时候，我是同意并接受的。回到「三七战团」，我找汲鹏等人商量讨论这一行动方案。大家认为这一方案的最大的优点是稳妥，最大的弊病恰恰也是因为稳妥。把退路考虑得过于周到的稳妥方案会给广大 414 群众留下头头们顾虑重重、决心不大、信心不足的印象。这样瞻前顾后反倒更加重 414 群众的疑虑不决，有可能让这样一次生死决战最终因不够大胆果断而流于失败。所以大家认为这实质上是一个稳而不妥的方案。我们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比较，最后形成了另一个方案。

我把「三七战团」的方案通报给沈如槐：既然这是一次决定 414 命运，也是关乎清华运动方向的大决战，那么 414 的决策层就应该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建议 414 勤务站的大多数头头都拉出来参加 414 总部，只留下很少几个头头留在「414 串联会」里，对顾虑较多，想看看形势发展再说的那部分 414 群众起一个“收容队”的作用。那样，414 总部宣告独立的浩大声势，上面即使要打棍子也多少会有一点顾忌。而 414 的基本群众看到 414 头头们都义无反顾地脱离了总部，他们受这股声势的鼓舞，也会大胆的跟进，因而 414 突围成功的希望反而更大。两强相遇勇者胜！在这样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多显示一份勇气，少留存一点后路。

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计划，更有风险性，当然也更刺激。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几岁血气方刚、派性充斥的年轻人来说，诱惑力也更大。

「三七战团」向来是以观点温和、行动稳健著称的。当我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冒险的方案，实在有点出乎于「东方红战团」的意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三七战团」观点温和，行动犹豫。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三七战团」观点虽然温和，立场却很坚定，而行动是坚决果断的。看到「三七战团」有这样的决心愿意与「东方红战团」一起共赴艰难，令「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既惊喜又感动。

经过仔细的反复推敲，最后由沈如槐拍板决定：「414 串联会」的核心中，除了宿长忠、蒋南峰、王良生三人留守以外，沈如槐、孙怒涛、刘万章、陈楚三、汲鹏、张雪梅、陈家国等核心悉数参加 414 总部。414 的两大主力部队「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倾巢而出，不留预备队。

414 已经不打算只用一小股“敢死队”做“火力侦察”，而是要用“主力军团”做“集团冲锋”。那气势，正如 414 战歌所唱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我们挺胸昂头，有进无退，勇往直前！

第十四节 突围成功，414 终于独立

414 这边为独立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兵团总部那边为成立革委会大张旗鼓地筹备着盛大典礼。

对于兵团总部召集的总部会议，我一贯的态度是叫我参加我就参加，没叫我参加我也不会主动去问。《四项协议》签订以后，兵团总部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总部会议了。对此，我十分理解，因为我已经完全站到了总部的对立面。再参加总部会议，既不适宜，彼此也会很尴尬的。

我不知道总部筹办革委会庆典的情况和进展，但是 5 月 30 日是一个已经铁定的大庆日子。兵团总部上上下下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高音大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邀请来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到校。已经有过 4 月 10 日在中央主楼广场承办三十万人揪斗王光美大型集会的经验，再办这样一场庆典，驾轻就熟，小菜一碟了。

414 总部的成立日期定在 5 月 29 日。这个日子也是精心计算过的。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在 5 月 30 日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 414 总部。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 414 总部，那是一个红卫兵组织内部闹分裂的问题。要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再成立 414 总部，那就是公然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性质要严重多了。

在沈如槐的统一指挥协调下，414 广播台、414 报、各主要战斗团体准备了大量的文告、大字报和大会发言稿。这过程中，「东方红战团」的战斗力得到充分的展示，「三七战团」也紧密配合，互壮声威。

5 月 28 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零点过后半小时，随着“东方红”浑厚激昂的开始曲，414 广播台的声音响彻清华夜空。音色声调酷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女播音员隆重广播了由我参与起草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成立宣言》，宣告了与「井冈山兵团」并行的、相对立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然后宣读的是《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以及 414 总部的几个决议、「414 串联会」的决议、「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严重声明》等。那个晚上，还没有入睡或者睡后又被吵醒的人们都知道了清华园终于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414 正式分裂出来了，而且声势不小！

5 月 29 日上午，在大礼堂召开的 414 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更把气氛推向高潮。二千多人的大礼堂里席无虚座。过道上、空闲处也都是坐的、站的人，甚至在主席台上的讲台周围也全都坐满了人。发言者慷慨激昂表着忠心和决心，互相鼓劲，也是互相壮胆。

我与其他的 414 头头一样，心里最惦记的是：414 已经跨出了分裂的一步，

团派的激烈反应是必然的。中央会怎么表态？会给新成立的 414 总部定什么性？焦虑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变化。

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团派成立革委会的庆祝大会是会如期召开的，所以清华大学革委会也会如期成立的。至于周恩来会不会来参加，不好说，来或不来的可能性都存在，但似乎不太会影响大会的召开。

听到 414 总部的成立，团派对这种公然分裂的行径立即给予回击。不过声势不大，因为他们正在专心致志为庆祝大会的筹办做最后冲刺，忙不过来。

当时团派写过一张大字报，我看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银基突发领袖狂，前如槐，后万章，骑马挺戈离井冈……”。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生动，让我马上就联想起高高瘦瘦的堂·吉诃德骑马挺戈大战风车的情景。414 公布的总部委员名单中，沈如槐排在第一名，在我之前，刘万章是第三名，排在我之后。于是，在团派的想象中，沈如槐成了我的马前先锋，刘万章成了我的马后殿军。团派这个战斗组写的大字报颇有文采，只是消息也有点太不灵通了，到这个时候还以为我是 414 的一把手，想当领袖而策划了 414 分裂呢。

事情的转折没有预兆，来得太突然也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天后，即 5 月 30 日凌晨 4 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16-P272]

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想，全校师生，两派群众，听完第一遍广播以后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被突发的奇迹惊呆了！惊呆得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一回事啊？周总理不来了？革委会推迟了？不成立了？成立不了了？

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414 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我很高兴，很激动，欣喜若狂。因为 414 的成立，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这结果是我们曾经祈望过但又没抱多大希望的。因为周恩来不参加庆祝大会而导致革委会暂时不成立了，这个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有一种逃过了大难，躲过了一劫的侥幸感觉。

我马上想到了蒯大富。我想，当他收到谢富治的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难受、懊丧。革委会的流产，是蒯大富掌权以后最大的一次挫折，也是与 414 较量中的严重失败。我想他对 414 的怨恨肯定又增加了几分。想到这里，我心里并不轻松。

唉，可怜的蒯大富！

我刚生出点恻隐之心，一想到蒯大富毫不留情地打击唐伟，毫不手软地把 414 打成非法组织，我的怨愤又上来了。

哼，可恨的蒯大富！

此时此刻，我对蒯大富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414 突围意外成功，几乎完胜。团派革委会流产，近乎完败。这样的结局，注定了 414 成功之后必然磨难更多，团派失败之后必然复仇更烈。此后，清华出现了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一朝一野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并存的局面。这团四两派，争斗是常态，偶尔也联合，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直至最后兵戎相见，生死相搏，那种惨烈，在这个 5.30 的清晨，任谁都没有料想到的。

清华的文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十五节 414 的一把手是怎么定出来的？我的说法

「414 串联会」的领导机构，是二十几个战斗组长的联席会议，当时称为勤务站。这些战斗组的组长都是勤务员。勤务站按多数勤务员的意见做出的决定，大家都应该执行，一致行动。如果有人持保留意见，不愿意参加某项活动，也悉听尊便，不会追究的。譬如我反对而且没参加 4.15 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勤务站的谴责。串联会的决议并不对所属成员构成刚性的约束力。

此后，由「414 串联会」组织的辩论会或召集的大会上，出头露面最多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沈如槐、汲鹏、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章等人。那时大家一心想的是如何积聚力量，如何在与总部的辩论中压倒对方，如何抵御总部对 414 的高压政策，如何争取更多师生的同情和支持，如何扩大 414 队伍。对于经常参加 414 活动的普通群众来说，那些常在公众场合亮相的勤务员都是 414 的主要负责人。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我是挑头的，另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是另一个人挑头的。总之，当时的「414 串联会」是蛟龙群舞但不混乱，大家协商办事，一心谋事，众人齐心，生气勃勃。

就我自己感觉，由于我的名头、影响都比其他的勤务员要大一些，不论是兵团总部方面，还是 414 群众方面，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414 串联会」最主要的头儿。在「414 串联会」勤务站会议上，沈如槐经常是最活跃的人物。在整风阶段，沈如槐不仅把“三纵队”串联起来，也把「天安门纵队」与“三纵队”串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慢慢地演变成了会议的召集人，后来又经常是会议的主持人了。在这过程中，他的革命热情，他的协调能力，他的思想观点，逐渐被大家所认可。

无论是「414 串联会」刚成立的时候，还是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想过「414 串联会」要推举一把手的问题。谁都知道「八八串联会」的头儿是唐伟、陈育延、吴栋等人，唐伟是其中最主要最出名的负责人，是「八八串联会」的代表人物，但唐伟不是「八八串联会」的一把手。唐伟自己也说，「八八串联会」没有定谁是一把手。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必要设一把手的。我觉得「414 串联会」现在这样的协商运作机制已经很不错的了。

「天安门纵队」也好，「三七战团」也好，虽然比串联会的组织要严格、固定一点，也没以某种程序确定谁是一把手。一般人都认为我和汲鹏是代表人物，或者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也仅此而已，并不是一把手。我们当时把这些头衔都看得非常轻。你属下的成员认为你是头儿了，那就是头儿了。那个年代，谁都可以自封为“司令”，只要有人愿意跟着你走。一个没有兵的司令，那就是光杆司令、空头司令。要是手下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上百人愿意跟着你，你叫“勤务员”也好，叫“司令”也好，都是一样的，你都是他们的头儿。

「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的实际运作是王允方、高季章他们。我知道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比较弱，顶着主要负责人的虚名已经有点名不副实了。所以，我没想过「414 串联会」要有个一把手，更没想过我要去当它的一把手。

我没想，不等于别人就没想。

大概是 5 月中旬（也可能在上旬或下旬，实在记不清了）的一个晚上，我忙完事情回寝室休息。到了宿舍里，同班的老四问我：“414 的一把手是沈如槐吗？我们还以为是你呢。”

我说：“从没明确过谁是一把手呀！你们怎么知道沈如槐是一把手的？”

他们说他们听到 414 广播台广播了一篇稿子，里面提到沈如槐是 414 的一把手。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他们说是亲耳听到的，不会有错。

我沉默了几秒钟，一下子就来气儿了。广播台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乱说的呢？怎么可以没经过「414 串联会」勤务站的讨论决定就宣布某某某是 414 的一把手的呢？那也太不像话了吧？

我楞了一会儿，猛地感到一阵被强迫接受的屈辱涌上心头。我觉得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一下就宣布沈如槐是一把手，实在太气人了！

找他们论理去！我一扭身，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感到十分委屈和憋气。

我一路快步疾走，间或小跑几步，从 12 号楼奔向大礼堂的方向。下意识中，我好像是要到科学馆的 414 广播台去质问一个明白似的。

穿过六、七号楼中间的小广场，经过新航空馆，还没过新水利馆东北角那座小桥，我被从宿舍里赶出来的两个同班老四赶上了。老张老李看到我神色不对头，激动得都失态了，怕我出事，赶紧跑步追上来，终于追上了我。

他们一个从后面用双臂用劲地抱住我，一个在前面挡住了我的去路，嘴上喊着：“老孙，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我正在气头上、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我使劲挣扎。他们不放手，把我抱得紧紧的，让我动弹不得。我挣扎了一会儿，没挣开，就僵持在那里。

他们问我，你要干吗去？你找谁去呀？你就是要去找人，也要冷静一点以后再去的呀！

因为不再脑袋既空白又混乱的赶路了，慢慢的，我开始冷静下来了。

是的，我要找谁质问去？我要质问他们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质问呢？

我答不上来。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想好，我干嘛要跑去质问？我有点泄气了，身子不再硬邦邦的了。趁势，他们把我连拉带推强劝着回到宿舍。他们看着我上床了，又劝慰了几句。

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刚才自己提的那几个问题。

我问自己：“你想当 414 的一把手吗？你有能力当 414 的一把手吗？”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我不想，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谁能当 414 的一把手呢？”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我是要去质问为什么把沈如槐称为 414 的一把手？我强烈反对沈如槐当一把手？好像也不全是的。我老实承认，沈如槐当 414 的一把手，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但是我并不强烈反对他当一把手。

那么为什么我一听到沈如槐是 414 一把手这个消息会那么冲动、那么失态呢？我问自己的心。

我的心告诉我，我是因为这件事没有经过协商就强迫我接受的做法所激怒的，是对「东方红战团」这种做派心里感到很愤懑。如果「东方红战团」想拥推沈如槐做 414 的一把手，完全可以在勤务站会议上正大光明地隆重推出沈如槐作为候选人让大家讨论决定。凭着「东方红战团」的人多势大，要达到这个目的是不难的。那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做派。尽管我或「三七战团」的其他人可能会对 414 需要不需要明确谁是一把手提出异议，也可能会对「东方红战团」推荐的人选提点不同的意见，但是，对我们而言，只要「东方红战团」坚持，这些台面上活跃的「东方红战团」头头，我都可以接受的。

既然我不想当 414 的一把手，既然「东方红战团」的人那么想让他们的人当 414 的一把手，既然我并不反对沈如槐当一把手，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去吧，让沈如槐去当这个一把手吧。

这么一想，虽然反感他们这样做派的气还是没有完全消退，但我决定不再跟他们计较论理了。心里一释然，也就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我像没事儿一样，照旧做该做的事。

不知道「三七战团」的其他同志有没有听到这一广播，也不知道 414 广播台

此后有没有再造这样的舆论，反正我的平时表现与以前无异，大家也与我一样，忙着各自的事情。

当年我失态这件事情，连王允方、汲鹏他们都没有告诉。此后，我也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前些年，老蒯率一帮团派朋友来杭，有人直接问我：“你们 414 当年怎么会推选沈如槐当一把手的？”对他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我笑笑，未作解释。

我在前二年翻出了一份在 1971 年 9 月所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 5 月 29 日 414 总部成立以前，是「414 串联会」的形式，由一个勤务组负责，共 20 多人，组织上比较松散。那时沈如槐还不太出名。而我因为本来是兵团总部的核心组成员，而从一月份以来一直与蒯大富有意见分歧的总部内唯一反对派，所以当时影响比沈如槐大。尽管串联会勤务组中从来没有排过谁是第一号头头、(谁)是第二号头头，但当时 414 和团派群众的心目中，我是 414 串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不过我与沈如槐是明确分工的。我负责主持「414 串联会」的大会，沈如槐负责(主持)勤务组会议。实际上「414 串联会」的骨干力量是「东方红」，其次是「三七」，沈如槐也在主持勤务组会议中慢慢形成他的核心和威信。到 414 总部成立时，才正式定沈如槐是第一把手。

由此可见，在整个「414 串联会」期间，是勤务站集体领导，并没有明确谁是第一把手或总负责人。后来慢慢地形成主要由我主外、沈如槐主内的领导格局。因为我出头露面比较多，名气比较大，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414 串联会」最主要的头儿。

414 总部成立的时候，协商决定总部委员名单，才明确了沈如槐是 414 总部的一把手，排名第一。具体的协商细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为什么推举沈如槐作为 414 的一把手，我猜想是这样几个原因：

1、为了主导 414，「东方红战团」必须要争一把手这个位置。他们早先制造的舆论也是为争一把手做准备。在他们看来，“「天安门纵队」是温和派，孙怒涛是代表人物。其他的四个纵队都是强硬派”，沈如槐“是代表人物之一。在 414 的发起人，414 的核心组中，强硬派占大多数，他们不希望温和派做一把手。主要是担心温和派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把队伍引向妥协之路”[1-P107]。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了，确实是「东方红战团」的心里话。在「414 串联会」成立前后，「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都是“三纵队”、「东方红战团」团结、争取的对象，是友军，是同盟军，但不是依靠的对象，不是“我军”（“三纵队”之间的关系，才是“我军”之间的关系）。我和汲鹏作为 414 的核心成员，可以参与决策，但是绝对不会让我成为 414 总部一把手的。假如我硬争，「东方红战团」宁愿另外成立其他的组织，也不愿屈居在不能由他们主导的 414 总部里。在整风中，“三

纵队”被总部强制解散，后又受到各种压制，这对“三纵队”的刺激很大，让他们吃到了没有权力就要任人摆布的苦头。所以，「东方红战团」对实权看得极重，他们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点意识他们是很清醒、很强烈的。

2、沈如槐在「414 串联会」成立之前及其成立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充分表现出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精力充沛、工作能力强、作风雷厉风行等特点，展示了她的才干，树立了他的威信。沈如槐自己也说：“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在前一阶段与蒯大富是斗争中，我的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并在策划成立 414 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1-P106] 在「东方红战团」中，资历比沈如槐老名气比沈如槐大的还有几位。综合考虑以后（其中有沈如槐是「东方红战团」核心中班次最低，在高班头头毕业以后仍能带领 414 坚持下去这一因素），他们认为沈如槐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从来不认为沈如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私利权欲而争权夺利的人。但是为了「东方红战团」这一群体利益，沈如槐不想做一把手也得做一把手。当然，有「东方红战团」做后盾，沈如槐自信有能力做好一把手。此后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沈如槐做 414 的一把手是勤勉的、出色的、得到 414 广大群众拥护的。414 即使在最内乱的时候也没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这是 414 的万幸。

3、我比较温和的观点虽然赢得了大多数 414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缺乏一把手的气魄和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出自蒯派，来自团派，曾是兵团总部委员，与蒯大富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样的政治背景，很难取得「东方红战团」的充分信任。而我在签订《四项协议》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右倾、软弱和妥协，更遭「东方红战团」的恶批，认为我“违背 414 广大战士意愿，没有坚持原则”[4-P190]。广大 414 群众也对我大为不满。在 414 上下的一致炮轰下，我的威信也骤降至最低。在两派尖锐斗争的环境下，呼唤一个更强有力的一把手领导 414 是必然的选项。多年后蒯大富曾对我说过，414 如果是你当一把手，两派可能早就实现大联合了。此话听起来似乎很有点道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老蒯的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我是不可能成为 414 一把手的。蒯大富坚持不肯在《四项协议》上增加“正确”两个字，也让他“如果”更加成为不可能。

4、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我认为头头对个人的权欲名利都不怎么看重，但是对群体的权欲，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三七战团」继承了「天安门纵队」宽容、顾大局、忍让以及书呆子那样的不争权理念。在 414 里，不仅「东方红战团」的力量明显强于「三七战团」，对团派、对蒯大富的态度，也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抱幻想、态度强硬，表现得更为勇敢和坚决。所以由「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出任 414 总部的一把手，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此以后，由沈如槐执掌的 414 大船，开始了外战与内斗的艰苦历程！

第七章 414 的外战和内斗 (1967.6—1968.9)

在清华团四两派一年多的争斗史中，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的重大事件有两件。一件是 414 的分裂和革委会的流产，一件是百日大武斗。这两件既有联系也有因果的大事，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也留下不少的疑团，至今仍然是我们这一代清华人饶有兴趣的话题。譬如，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414 到底有没有后台？两派主要头头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叙述我在 414 总部的活动之前，我先就这些话题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节 粗浅印象，团派的主要头头们

自「井冈山兵团」成立，我就是兵团总部的委员（后来进入核心组）。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常与团派的主要头头们在一起议事，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从 1967 年 4 份开始，我是「414 串联会」和 414 总部的重要负责人，核心成员，与 414 的主要头头们相处一年有余，对他们更为熟悉。在两派头头中，有较长时间对两派主要头头有过近距离观察和亲身接触的，我是唯一的一人¹。

尽管我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可惜我看人往往是不太准的。这里，我不可能对每个头头做全面的点评，我只谈点我在与之交往的这段时间内的直观印象和粗浅感受。

为了忠实于历史，我把当年与这些头头共事的印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直书于笔下。显然，这并不表示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印象。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我对当年的印象已经有了许多修正。我也明白，当年有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对方有错，其实是自己的看法太片面，有问题。

涉及到那么多的头头，留给我的好印象写出来，别人不会有太大意见。要是

¹ 王良生对两派头头也比较熟悉。他加入「414 串联会」的时间不足一月，没有笔者这样“有较长时间”。

我现在再说一些不太中听的话，难免给人添堵，让人不开心。在这里，我先致歉了！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印象，我现在对这些朋友们从心里都是很尊重的。

先说说团派的头头们：

蒯大富（工化 9）是团派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更是灵魂人物。他威信的“原始积累”是在他与工作组不屈不挠的勇敢斗争中完成的，中央文革的肯定和信任则把他推上更高的一层楼。当蒯大富已经成为清华「井冈山」的代表人物，成为全国红卫兵的学生领袖，他在团派中的地位就变得无人可替代无法可撼动般的稳固。蒯大富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政治嗅觉很敏锐，也很有权谋。他聪明能干，能言善辩，很有组织能力。外面的人以为他在总部会议上一定是搞一言堂很霸道的。其实并不尽然。一般地，他都是让大家先发表意见，由大家讨论，允许别人对他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也会参加争论。当然，一锤定音的结论是由他做的。总体而言，总部会议还比较民主。就观点而言，老蒯在总部里并不算是最极端的。作为一把手，他要协调比他左的和比他右的各种观点立场，这确实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在总部会议上从来没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大几岁，他对我的态度也比较尊重和友好。我与他的关系，如果说在「井冈山红卫兵」期间是“蜜月期”的话，从「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我们开始在观点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我对他的个人诚信也打起了问号，对他的一些处事行为的观念我也不太苟同。从工作组反蒯到蒯大富掌权这半年时间里，他有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大落大起。他没有被工作组棒杀，却被喝彩的掌声捧杀得晕晕乎乎没过好掌权关。

鲍长康（工化 9）是团派的二把手。他为人一贯低调，遇事冷静，思维缜密，讲究说理，形象上温文尔雅，不显强势。他有上海人特有的聪慧。在观点上他与蒯大富很接近。他对团派理论的阐释、团派观点的创新、团派利益的捍卫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讨论或争论中，他往往能从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这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蒯大富得力的信得过的好副手。蒯大富不在校的时候，都是委托他全权负责的。因为他曾经邀请我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筹备会，对于这样的“引荐人”，我对他多了一份别样的亲近。后来得知他在百日武斗中担任了团派的武斗总指挥，这令我十分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是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那种人。不过想想也是，在蒯大富不便亲任这一职务的时候，作为二把手，他无法推卸这个职责。

刘才堂（工化 9）是蒯大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与蒯大富、鲍长康等都是化 9 级与工作组坚决斗争的那十几个经历生死考验的人。这些人，有的名正言顺地进了总部，有的隐身于幕后做着高参。以我的感觉，这个小圈子才是蒯大富真正依靠并影响决策的“影子内阁”，而总部核心组可能只是第二层的。刘才堂其实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性格很爽直、心计不多城府不深的人。这点上，我是很

欣赏的，因为我害怕与心思过于绵密的人打交道。但是，似乎又感觉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过于简单直接，常常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革命就是反革命，似乎不存在中间的过渡色带。因此，有时候对他观点的左和态度的极端让我很无语，有一种无法与他争论的感觉。不过，我始终认为，刘才堂是个心地透明的人，为人正直，在人品上我信得过他。也因此，即使在观点上我与他相距实在太远，我对他并不反感。

陈继芳（焊 0），她的性格和观点与刘才堂十分相仿，也是嫉恶如仇，个性鲜明。我对她在工作组高压下的坚定不屈非常佩服。我那时想，如果是在战争年代，她肯定是又一个刘胡兰式的英雄。她是一个做事踏实的人。在总部里，她主管「二办」负责干部问题。不像我，在总部里是个甩袖掌柜，不管事情也没什么实权。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太不一致，我在她的眼里是极右的“老机”¹，她在我的眼里是很激进的女将，所以彼此很少交流，也没兴趣交流。

马小庄（焊 0）为人谦和，真诚朴实。那份农村小伙子的憨厚，第一眼就给人以值得信赖的印象。他很有涵养。与人讨论或争论，态度平和，平等待人，从不高声，也没见他发过脾气。到底是党员、学生干部，谈吐间显示出很高的政策水平，与我这样的群众就是不一样，让我不得不佩服。在团派中，他是与 414 打交道的最佳人选：既能维护团派的核心利益，又能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知道连「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对他都有良好的印象。就观点而论，他也是坚定的团派，但我愿意与他展开讨论。尽管意见难以统一，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好感。后来在「联合总部」，1967 年的国庆节，“两派成立「国庆联合指挥部」，由孙怒涛、马小庄等人组成。”[4-P266] 这是一次我与他的愉快合作。在众多团派总部委员中，我对他带有一份尊敬，尽管他比我小好几岁。

陈育延（力 00）是一位极有个性、很有思想、很有主见、性格爽直、喜好外露的总部委员。在「八八」时期，我一直把她视为唐伟的副手，「八八串联会」的女中豪杰。这么一个低年级的小姑娘，能有这样非凡的见识和作为，真了不起，我很佩服。到「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蒯大富对「八八」的两个主要负责人采用了拉陈（育延）压唐（伟）的分化政策。陈育延打响了反唐第一枪，又第一个提出对「八八」必须全盘否定，这让我对她的做法十分反感。那段时间，我与她公开冲突过，彼此闹得不可开交，心存芥蒂。所以此后我与她互不搭理。因为她始终以永远正确的左派形象示人，纵队派就给她封了一个“陈常左”的“雅号”，当然，这并非是个美誉。我离开总部以后，陈育延成了团派中的鸽派，一贯反对武斗，与鹰派常有冲突，这又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王良生（水 9）是我在总部里观点最相近的委员，一直是团派中的鸽派。因为

¹ 当年，“老机”是贬义称呼，老机会主义分子的意思。

有他，我才不至于有太孤立的糟糕感觉。「414 串联会」成立一段时间以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 414 这边，也成为 414 的负责人。作为 414 派出的学生代表之一，他参与了《四项协议》的谈判。414 对他是信任和器重的。在 414 分裂的时候，我坚定地参加了 414 总部，他则留在「414 串联会」里。等到「414 串联会」并入到 414 总部的时候，414 的负责人中，唯有他没有参加 414 总部。是蒯大富让鲍长康、马小庄出面做了他的工作，挽留他继续留在团总部里。就这样，我与他基本一致的观点，都曾是「天安门纵队」的一员，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沈如槐说起“这位可爱的王良生又只身离开了 414、回到了井冈山”。[1-P141] 我想，这中间的抉择各人有各人的考虑。人各有志，只能互相尊重各自的选择。我对王良生的选择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关口斟酌过，纠结过。「三七战团」中就有许多与王良生一样想法的人，既同意 414 的政治观点，又反对 414 的组织分裂。我与王良生的差别仅在于：我坚决地向前走了一步，他犹豫地向后缩了一步。多年以后，我与他从不同的地方又飘落到同一城市，相距不远，常有往来，我们依旧是相交甚欢的好朋友。

潘剑宏（机 7）是总部办公室主任，我们都叫她“潘总管”。她既负责掌管清华的财物大权（譬如我在兵团总部期间凡去外地的人要借款都得经她批准），替蒯大富管好家，又保管着井冈山兵团与中央联系的电话号码。周恩来或中央文革要与清华「井冈山」联系就直接找她。而她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或中央文革办公室。可见，她的地位十分关键、机密、重要。她尽心尽职、任劳任怨，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像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具体的事务都是由她主持操办的。我要特别说一句的是，她以及团派中许多具体掌管钱物的经办人，都是清廉无私，经得起审查的。哪像现在的那些大小官吏，几乎无官不贪腐。由于她主管的是行政方面的具体事务，就政治影响力而言，她在总部里并不很大。

最后，我想谈谈任传仲（自 00）。把他放在最后，并不是说他最不重要，而是他最特殊。他在总部里的能量和影响都很大，所以不能不谈到他。而他又是一位我在总部里最有看法最不待见的同僚，这让我在如何谈论他时很有点顾虑。尤其是，他早已故去了。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传统。对一位已经故去多年的熟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那是很不厚道的。我思量再三，决定还是直言不讳。他如地下有知，敬请原谅我的大不恭。

任传仲是与我同系的低班同学。他不仅是我系也是全校很出名的蒯派。他在全校的出名主要是因为在批斗蒯大富的全校大会上对蒯大富反戈一击的惊骇一幕。这让不少蒯派都在背地里骂他是“叛徒”。他这样的表现虽然不足称道，但多少还是可以谅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工作组对蒯派的政治高压是极其厉害的。几乎所有的蒯派都做检查交代认错认罪了。我认为，认错认罪是可以的，但是要公开站在工作组的立场，对蒯大富的“反党”罪行揭发鞭挞，这样的“立功”表现

就有点过分了，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事后，蒯大富不计前嫌，在「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仍然重用他，让他做了总部核心委员。我对蒯大富宽宏大量的气度和敢于用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的魄力感到惊奇和佩服。从中，我也看出蒯大富是一个政治人物，非我等常人可比。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对蒯大富重用“大节有亏”的人暗暗担心。我认为这样的人可使用，但不宜重用。而任传仲因为重新获得蒯大富的信任和重用，对蒯大富就表现得格外忠诚，甚至是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这就是蒯大富很有政治手腕的驭人之道。

上面这点“变节”还不是我对他最有看法的主要原因。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从说话腔调到行为举止一身的痞气。414 骂蒯派是痞子，在总部里，能够对号入座的，就他一人。我非常反感他的痞气，所以我从来没主动与他说过话打过招呼。我始终都没弄清楚他的政治观点是偏左还是极左，他似乎只对抄家打斗冲会场等“革命行动”感兴趣。他是武斗的主战派，七二七那天，“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 7 名工宣队员¹ 的腰或腿或臂部” [12]，这位“作战部部长”就是指他。到清查五一六的时候，被蒯大富视为心腹的得力干将任传仲再一次对蒯大富反戈一击。蒯大富后来说：“任传仲这个人真正是个叛徒，搞武斗最凶的。他上台说：蒯大富！你是五一六，你在搞阴谋！在清华发展庞大的五一六集团。……回想文革时身边的极左分子，往往就是投降派。” [13-P389] 当蒯大富再次品尝到同一杯苦酒的时候，才算对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²

第二节 粗浅印象，414 的主要头头们

再说说 414 的头头们：

沈如槐（力 0）的「千钩棒」比他先出名。总部开门整风中，「千钩棒」因坚决抵制蒯大富的错误、坚决批判极左思潮成为闻名全校的战斗组。由此，沈如槐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在「东方红战团」的拥推下脱颖而出，成为 414 的一把手。因为资历较浅，他在 414 总部里的权威性没有像蒯大富在团派里那么强。这点上，沈如槐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格外地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尊重大家，作风也更为民主。作为 414 的一把手，他捍卫 414 群体的利益。他又是「东方红

¹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最早的一支工宣队，就是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由北京 60 多个工厂 3 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制止团四两派的武斗而开赴清华大学。

² 比笔者更了解任传仲的一些朋友，他们对他有着与笔者截然不同的印象。陈继芳说：“任传仲，他才华出众，写得一手好字，能出口成章，即兴吟上一首挺不错的诗词。据说一九六五年他以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可谓才子！他虽然作风较浮，观点变化较快，但仍不失其可爱之处。” [11-P98] 沈昆在毕业后与任传仲有过比较深的直接交往，他说：任传仲“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文随和的人，连说话都从来不会高声，与他在工作组批蒯时以及 1967 年 1.6 行动后批判王光美时的表现完全是判若两人。他有诗人气质，情绪变化比较大。” 虽然任传仲并没有给笔者留下这样良好的印象，但是笔者认为陈继芳、沈昆他们讲述的也是真实可信的。所以特意在此加一脚注，以免读者受笔者片面印象的误导。

战团」的核心，典型的「东方红战团」观点，所以他更坚定地捍卫「东方红战团」的利益。在 414 总部里，「东方红战团」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他深知，要是没有「三七战团」的帮衬，一旦「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发生内讧，414 将不攻自破，陷入危机。所以他对我的尊重胜于我在团派里的礼遇。沈如槐为人正直，敢于担当，坚韧不拔，既有主见，也有魄力，原则性很强。他很能思考，常常提出新颖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点也常引发争议。他人很聪明，演讲的口才虽不及老蒯那样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但是笔杆子相当厉害，文思敏捷，条理清楚。虽是低班学生，毕竟是学生党员，做过团支书，有过历练，领导 414 总部这一班人有章有法。在 414 中，有资格和才能做一把手的，起码还有三四位，但是既然沈如槐成了一把手，大家就都尊重他，拥戴他，谁也没有想去挑战他、取代他，所以 414 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作为一把手，总部讨论时最后的拍板定夺都是由他做出的。与蒯大富在团派里的地位不同，414 总部里没有离了谁就一定不行、离了谁就群龙无首的灵魂人物。沈如槐不是，其他如外界一些人猜测的陈楚三、周泉缨等更不是灵魂人物。但是 414 里有核心人物、决策人物，那就是沈如槐。他也不负众望，殚精竭虑，一直尽职尽守地领导着 414。有人以为沈如槐只是形式上的一把手，是傀儡，是替身，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可能是沈如槐自己说过他作为 414 这个团派“反对派的一把手，没有丝毫的权力”[1-P107] 这句话给人以误解。仅就沈如槐倔强的性格而言，他也不是甘为傀儡的那种人。我对沈如槐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对《必胜》的态度，这在下面再详尽叙述。

汲鹏（压 00）是我交往最密的朋友，并肩战斗的战友。「第一湘江」与「轮机兵」宛如两兄弟。「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我们都是发起人和代表人物。我们从新水相遇为邻一直互相支持亲如一体，首先是因为我们俩在各种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或接近，其次还在于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都不喜欢走极端。他看问题有前瞻性，相当深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这些都是我这个南方男人所欠缺的，因而也为我特别欣赏和佩服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可见我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他本人就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汲鹏演说家的天分不仅令我，也为两派的头头和群众所折服，所倾倒。有位好友曾评说，如果把汲鹏那些获得满堂喝彩的演说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其实从字面上看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稀松的词语。然而，他永远不打草稿上台即兴发挥的演说，居然具有那么大的煽动性和蛊惑力，排除派性的因素，全在于演说本身的魅力。也不能说汲鹏的演说内容全是常人常言。好多闪光思想，不少至理名言，都是在即兴讲演中脱口而出的。“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几十年来，一直为我们这些清华人所津津乐道。

宿长忠（水 7）是一位出色的组织家，具有极强的组织才能。我这种人，是属于书生空议论的，不懂得怎样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正因为我的组织能力很弱，所以对宿长忠在这方面的天赋就格外钦佩。414 能从一个很松散的串联会到一个拥有七千人的从总部到分部体系完整组织严密的群众团体，宿长忠劳苦功高，贡献至伟。在「八八纵队」里，宿长忠是头头。沈如槐是他的副手，声名在他之下。但是在「东方红战团」推举沈如槐成为 414 一把手以后，宿长忠甘居沈如槐之下，毫无个人杂念，依旧辛劳勤勉，那种不计职位高下的无私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在 414 的所有行动中，宿长忠不仅决断果敢，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全力护卫其他的同志。所以，宿长忠在 414 的上上下下，享有极高的声誉。毕业后他遭遇了太多的不公，英年早逝，令我万分悲痛！

陈楚三（力 6）思想敏锐，风度儒雅，举止稳重，才华出众，人品上佳，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人物。他写的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有理论水平，富有征服力。他也是最能提出新颖观点的 414 头头，这些观点大部分都能为 414 的多数群众所接受，成为四一四思潮的组成部分。陈楚三是一位既让我敬重又让我不敢过密交往的朋友，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份。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与毛泽民同时牺牲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屠刀之下。他不可能再像瞿秋白那样会从烈士变成“叛徒”。对于这样的革命先烈，我打心眼里敬重敬仰！因此，我对陈楚三也格外多了几分敬意。但是，我又风闻他是康生的养子。其时康生身居中央文革顾问要职，正红得发紫。而我对陈楚三的这一个背景，却极为忌惮。我不希望 414 因为陈楚三而与康生有撇不清的关系。414 不企望因为康生的背景而红得发紫，更不想因为康生的万一倒台而被殃及池鱼。我宁愿与蒯大富、沈如槐这样平民出身的人交往，而对陈楚三这样有高干背景的人物，我反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之所以会这样，很可能是因我的眼界比较窄、胆子比较小、顾虑比较多、对高干子弟的成见比较深的缘故。后来，随着交往的日渐增多，我对他本人了解也深了一点。经过“414 战歌事件”，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抓去又放回来之后，我对他不再存有戒心，平添了几分对他坚贞不屈的敬佩。

刘万章（工物 6）是个勤勉踏实的人，组织能力也相当强，是 414 里的实干家。他的组织能力在大型活动的组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414 举行的集会、辩论会、进城游行等大型活动，他往往都担任总指挥的角色。许多具体的事务工作都要靠他去落实，他都尽心尽力去做好它、完成它。刘万章也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之一。就观点而论，相比较其他的「东方红战团」核心，我的感觉要稍微温和一些。他脾气很好，很有涵养。有一次大会上，他因口误把“小小寰球”说成“小小铜环”，我们调侃他，他也不生气，笑笑了之。

张雪梅（水 0）是 414 总部里唯一的女学生委员，因此格外抢眼。她个性爽直外向，有话就说，不模棱两可。做事干练，不拖泥带水。在对《四项协议》及

陈楚三被抓这些大事上，她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她也是「东方红战团」中的核心人物。

蒋南峰（无 6）是个极具另类个性的人。他既没有组织一个战斗组，更没有拉什么纵队、战团，完全是单兵作战。他写的大字报，往往只有一二张纸，短小精干，简明扼要，观点表明就止，不像我写起来洋洋洒洒罗里罗嗦的好几张。他从来都是以蒋南峰署名，不用笔名化名。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蒋南翔的弟弟呢。他既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是 414 总部学生委员中唯一的“无党派人士”。他独往独来，天马行空，个性倔强，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跟谁都敢顶嘴、反驳，不太顾及别人的脸面。他的动手能力是超一流的强。

高季章（水 9）是总部的一般委员。我之所以要介绍他，不否认我与他私交甚好这一因素，更因为他是《井冈山 414 报》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由「三七战团」掌控并基本代表「三七战团」观点的 414 部门。《414 报》的观点一向比较温和，与团派《井冈山报》比较极端的风格截然不同，与 414 广播台的风格也有较大差别。在经费紧张物资匮乏条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能把《414 报》坚持办下去实属不易。我与汲鹏虽是「三七战团」的代表人物，但很少过问实事，高季章才是「三七战团」的实际主管。他在「三七战团」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多次组织了以「三七战团」名义出面的重磅大字报以及与「东方红战团」联合署名的声明和发言稿。他勤于思考，思维严密，观点平和，态度诚恳，对理论问题尤感兴趣。如果说四一四思潮是广大 414 群众的集体创造，「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对四一四思潮的形成、发展、完善都有极大的贡献，那么在「三七战团」中高季章无疑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

周泉纓（动 6）也是一位不能算 414 核心头头但是非得详细介绍的总部委员。他思想敏锐，观点独特，很会分析问题，很能逻辑思维，而且引经据典有一定理论深度。在「414 串联会」成立前后，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也比较正面。每有聚会，他都很喜欢发表演讲，一套一套的，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他那些标新立异的见解，给人以新鲜的刺激，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听着过瘾，很有启发。但是有些观点说着说着就会过了头，因此觉得有点偏激。为此，我与汲鹏等「三七战团」好友常在一起议论周泉纓的观点。后来，每当听到他有些观点豁了边，过了头，我们就在底下相视一笑，偷偷地小声说，周泉纓又“尖端放电”了。“尖端放电”本是电学现象。我们说他“放电”，那是夸他的观点新颖、独特、很有启发性，我们被电到了。说他“尖端”，就是过头了，偏激了。正确的思想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那时我们说他“尖端放电”，是善意的调侃，并非讽刺，更无恶意。那段时间，我和「三七战团」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肯定的，而且是比较高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周泉纓虽然只是总部委员，从未进入 414 的核心层，但因为他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成员，

在总部里又比较活跃，所以很有影响力。关于周泉纓，我没想到这之后不到半年，我与他的关系会急剧恶化，我对他的印象会那么糟糕。这起因，全是因为他的《必胜》。

革命干部的代表，团派里是韩银山、张修身，414 里有龙连坤、李振民。这些工农出身的清华中层干部本身的素质都是很好的。414 总部里还有谭浩强这样的清华牌干部。这些干部在各自的总部里，即使参加最核心的会议，其作用也不过是参谋或顾问。那时，“革命小将”掌实权。在决策层，不仅“小将”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说话的分量也远超“革命干部”。尽管 414 高举的是解放干部的大旗，在解放干部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干部的使用上，虽然比团派要好得多，除了干部办公室等少数机构干部确有实权外，其他也只是一般参与和使用。像龙连坤、谭浩强这样的中层干部，在 414 总部里，不能说是陪衬，但也只能算是配角。

沈如槐是 414 的一把手。那么谁是 414 的二把手呢？414 从来就没有正式明确过谁是二把手。要是我说我是 414 的二把手，我想不管是 414 的头头和群众还是团派方面，都不会对此有异议的。至于 414 的“老三”是谁，既没有明确过，也没有公众一致的认可。宿长忠、陈楚三、汲鹏这几位都有可能，难分伯仲。团派惯用的“沈孙汲之流”代表着他们的看法。

上面我简单地谈了对团派和 414 主要头头的印象。我在本书中提及到的这些人，据我所知，在这几十年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尽职地贡献，都有显赫的成就，远非我能比能及的。

在 1967 年年中的清华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2 个总部、5 个代表人物这样的政治格局。假如投射成一条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兵团总部占据着光谱的左边，人多势众，能量最大，受中央文革支持，是掌权派。414 占据着光谱的右边，势力稍逊于团派，还常被中央首长批评，是在野派。两个总部的核心人物是蒯大富和沈如槐，占据着各自总部的中心，亮度最高。比蒯大富更左一点的代表人物是刘才堂，比沈如槐更右一点的代表人物是周泉纓。集合在刘才堂、周泉纓周围的人数不多，但能量可观，往往影响着蒯大富、沈如槐的决策。在蒯大富与沈如槐之间，还有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我。我代表的是人数超多、能量超弱、但体现了人心向背的大批中间群众。在兵团整风期间，以我为代表的「天安门纵队」与蒯大富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到「414 串联会」时期，与蒯大富越来越偏离，与沈如槐越来越靠近了。到 414 总部成立，我代表的「三七战团」完全脱离了蒯大富，而与沈如槐的「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但是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我在这条政治光谱上，是由左往右慢慢移动的。

很遗憾，在这条政治光谱上，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之间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文革，团派的“极左”与 414 的“极右”其实都是左的，离正确的那点都很远。差别仅在于，团派比

414 更左而已。

第三节 坚持“三不”原则： 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长

在做头头期间，我一直很明确地坚持“三不”原则：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长。这一原则，是我与汲鹏及「三七战团」的核心人员共同商量定下来的，也与「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交换过意见，为他们所赞同。

一、不寻靠山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今天红得发紫的大人物，说不定明天被江青或康生一点名，就倒台了。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陶铸。

文革前，陶铸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因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中央文革顾问等显赫头衔，地位如火箭般的直升至党内第四号交椅。转眼之间，在1967年1月份，又沦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迅即被打倒。

要是找了这样的靠山，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可能也跟着春风得意，一旦他倒台了，也跟着一起玩儿完。把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捆绑在一位中央首长身上，听命于他的指示，随着他的沉浮而沉浮，那就失去了自我，就是政治投机。这不是我所热衷的革命。

我所欣赏的是这样的：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识别真伪，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行。如果做对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我们有成就感，也有自豪感。要是做错了，那是我们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后果。我们不怪任何人，输也输得心服口服。

这，就是我们不找靠山的理由。

二、不找外援

在1967年的上半年，社会上已经普遍出现了两派对立甚至分裂的现象。

我不太了解外校和社会上的两派，也没认真研究两派产生的根源和规律。清华的团四两派，因为观点比较鲜明，力量相差不是十分悬殊，再加上清华的特殊地位，所以两派的影响都比较大。于是，那些被掌权派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少数派在野派，往往会找上门来，寻求我们的支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师范学院¹的少数派，他们拉着队伍到清华来，既是声援414，也是希望寻得414的支持。他们呼的口号是誓与414“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既感动于他们的热诚，但是也不敢与他们有过深的交往。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并不了解他们。

我们无法对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我们也不想万一有一天他们出事了而累及我们。我们并不想拉外面的势力来壮自己的声威，那是一时的、虚假的、靠不住的。我们只想在清华园里踏踏实实地把本校的文革搞好，吸引更多的师生同情、支持、参加414，这已经够让我们费心费力的了。

北京后来出现了天派²、地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属于天派，谭厚兰、王大宾属于地派。

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中央文革的宠儿，都是全国闻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都是掌权派。我们搞不清天派地派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所以，在私底下议论时，我们常用“狗咬狗”这样的不恭用词来形容。据说天地派的后台是不同的。即使后台不同，这些后台也都是位高权重的中央首长，我们攀不上，我们也不想攀。从我们内心讲，我们不想介入天地派的纷争。

仅仅因为414是蒯大富的对立派，所以社会上的人们就把我们划为地派。我们完全是“被地派”的。平心而论，414并不热心地派，地派对414也有不少看法。

相比较北大和北航，地质对我们态度要友善一些，我们当然不会拒绝他们的好意，我们对他们也是友善的。韩爱晶是蒯大富的铁杆盟友，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故意与「北航红旗」交恶。相反，因为听闻北航搞得很不错，我们对韩爱晶还带有一份好感。当然，外面任何让蒯大富碰一鼻子灰的事情，我们是偷着乐的。至于他们的活动，不管是天派组织的还是地派组织的，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乐得做一个旁观者。

然而，想虽然是这样想，碰到具体的事情，往往就不见得一定坚守这条原则了。因为天地派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参加过一些地派组织的活动。譬如“揪刘火线”，“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些都是地派组织的活动，我们都参与了，都犯了错误。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是地派组织的活动才去参加的，而是因为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正确的才去参加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受派利益的驱动所致。

看来，414也只能在清华园这一亩三分地上闹腾闹腾，一参与社会上的活动，也立即犯错误，与蒯大富毫无二致，最多是有点程度上的差别。

¹ 北京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

²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统称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分别是：「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他们分成两大派：前三个属天派，后两个属地派。就名称而言，因为北航与“天”有点关系，地质与“地”有点关系，故名天派、地派。

三、不炮打中央首长

所谓炮打，最常见的形式是公开贴中央首长的大字报，隐秘一点的是暗地里整材料为公开炮打做准备。炮打的程度轻一点的，是质问的口气，或者把问题往刘少奇上联系。厉害一点的，就不客气地用“打倒”、“揪出”之类的字眼了。

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人，特别是江青、康生等，他们要么明着指示要么底下透风某某某在历史上有问题，某某某是反对毛主席的。于是，某某某就成了被炮打的对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示众了。如果某个造反组织率先炮打了，而且炮打对了，那么这个造反组织就立了一大功，捞了一票政治资本，在镇压或对抗另一派的时候，也就增加了厚厚的筹码。所以，许多造反派抱着投机的心理，对炮打乐此不疲。

我们既没有高人指点，也没有过硬后台，全凭着自己的判断行事。

对于中央首长，我们既不了解他的历史功过，也不清楚他的现今是非。那些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了的，肯定是“犯事”了，我们就跟着欢呼一阵。至于他们为什么被炮轰被打倒，除了知道一点罪名，详细的依旧不清楚，稀里糊涂的。

仅凭小报上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是很难判别他是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如果我们随便炮打，万一要是炮打错了，那就犯下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罪，414 也会因此而被牵连，实在犯不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能力有限，态度很保守。宁可不犯错误，也不想争这个头功。

我认为绝大多数的炮打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赌博。炮打对了，那是因为正好符合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于是就大紫大红，立了新功，赚了一票。要是炮打错了，也就是炮打了中央文革不希望打倒的人，那轻则是被批打了横炮，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重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立马被抓起来，送进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子里。有哪一个大人物是因为群众的炮打、揭发而下台的？没有！那些被打倒的人，都是上面有人成心要打倒他们，炮打是那些要打倒他们的人利用造反派造的舆论和声势。

我们实际接触过的中央首长中，有好几位我们心里是有很大意见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发发牢骚表示不满而已，并没有炮打的打算和实际行动。唯一的一次是，1968 年春天，我们对谢富治的积怨实在太深了，社会上正好有一股倒谢风潮。414 也蠢蠢欲动，准备猛烈地炮轰一顿，巴不得把谢富治打倒，出出这口恶气。最后，中央出面保了谢富治，我们赶快做了缩头乌龟。

另外 414 里曾经发生过反康生、炮打陈伯达的事情，这都是 414 里个别战斗组的行为，并非 414 总部在底下鼓动。身为 414 总部委员的周泉缨曾经炮打陈伯达，这一做法连沈如槐也不支持，414 总部更是反对。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我们心里是有看法、有不满的，但是 414 总部并没有公开反对他们，炮打他们。

“三不”思想也可以说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上靠毛泽东思想，下

靠 414 广大革命群众，努力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这就是 414 核心层的基本共识。

第四节 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 疑似康生、周恩来、林彪

到底 414 有没有后台，这在两派争斗时是个特别吸引眼球的话题。

团派的一些朋友一直强烈怀疑 414 是有后台的。最合情理的逻辑是：明明知道中央文革是坚定地支持团派的，蒯大富作为反刘少奇有功的学生领袖是为毛泽东所欣赏的，414 要是没有强有力后台做支撑，敢这样顽强地明目张胆地对抗团派吗？还有一种最没头脑的逻辑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要是没有后台连一天都生存不了，414 要是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个后台太厉害了没有被揭露出来而已。

对于 414 有没有后台，当年有些老四也心存疑虑。有人曾当面问过我，要我向大家老实交底 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不得有任何隐瞒。

如果说当年团派从上到下都怀疑 414 有后台，我还能理解的话，在四十余年后今天，还有那么几位团派朋友一口咬定 414 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的目的就是指使 414 搞垮蒯大富，进而破坏文革。他们被这个臆想中的后台搞得神魂颠倒，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真相”，想挖出 414 的后台。就在几年前，有位团派朋友曾当面向我征询：“老孙，现在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说一句实话，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如果有，现在说出来已经无关大局了，只是让我们知晓了谜底而已。”

我除了吃惊和好笑，真的是无言以对。

什么是后台？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没有一个准绳，就无法讨论，只能各说各的。我心里有一个自定的标准。我认为，一个大人物要成为一个派别组织的后台，至少应该同时符合下面三个条件：

- 1、这个大人物要有巨大的政治能量足以对这个派别支持、保护、甚至庇护；
- 2、这个派别对这个大人物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的；
- 3、这个大人物与这个派别之间有着某种比较直接的或紧密的联系以及有相互关联的政治利益。

当年，团派没敢公开挑明他们所怀疑的 414 后台是谁。因为要是被 414 抓住把柄，那是很被动的事情。我从团派的议论中，感觉他们怀疑的 414 后台，主要集中在康生、周恩来、林彪身上。我要一一谈谈他们与 414 的关系，他们对 414 的影响，414 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三位都有巨大的政治能量，符合做后台的第一个条件。那么他们是不是 414 的后台呢？

康生

之所以怀疑康生是 414 后台的主要依据是因为 414 总部核心陈楚三是康生的养子。此外，1967 年初，社会上（如中央党校的「红战团」）有一股反康生的暗流。兵团总部支持“调查”康生问题，「28 团」反康最为积极，还有好些战斗组也参与其中¹。团派怀疑康生是不是因为此事记仇因而暗中支持 414。康生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地位显赫，确实完全具备做后台的资格。如果他是后台，当时也是红后台，不是黑后台。正因为“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在清华是一个路人皆知的“秘密”，所以我对陈楚三的言谈特别注意，也保持着足够的警觉。无论在总部会议上，在公开集会上，还是在底下的交谈，我从来没有从他嘴里听他提起过康生哪怕一次。退一步说，即使康生对他有过指示，他没提这是康老指示，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的，我都把这当做陈楚三个人的意见来决定我是赞同还是保留的。也就是说，在我眼里，康生是康生，陈楚三是陈楚三。我从来没有因为“陈楚三是康生养子”这个身份而要额外考虑陈楚三的话是不是康老的指示什么的。

怀疑康生是 414 后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传说康生是地派的后台，而 414 被划入地派阵营了。即便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因为 414 与地派的关系非常疏远，硬要把康生说成是 414 的后台，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我本人对康生并没多大好感。原因很可笑。在我第一次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时候，我看到康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太阴沉了，太有城府了，深不可测，我的感觉很不舒服。当然，我对这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完全没必要为这点“理由”反他或保他。

2011 年 4 月下旬，在两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宛平聚会上，我与陈楚三都被邀参加了，并同处一室。那晚，我问了他与康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询问他。陈楚三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参加两派聚会。在会上会下，我这个问题同样被其他的老团朋友问了不下四五次。4 月 26 日下午，他在会上给大家作了一次详细的解释。他说他上学时住在康生家，与康生一家很熟。曹轶欧（康生夫人）曾向他提起过想认养他，但是他没回应，此后他与康生一家都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了。文革中，他确实通过康生家的门卫提交过几次材料，但康生从来没有给他回复或回音。这是陈楚三亲口对与会者所做的最权威解释。他后面说的这点我也从他在 414 期间从来没提起过康生得到印证。我听到身旁有位团派朋友喃喃自语地说：看来老四真的没有后台。陈楚三的亲口解释终于让他释了疑。

其实，陈楚三的说法早就在沈如槐的回忆录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陈楚三明确地跟我说，他不是康生养子，虽然曾经给康生写过几封信，可从来没有

¹ 「天安门纵队」中也有个别战斗组参与反康生的活动。

回音。”[1-P265]看来，团派的朋友只有亲耳听到陈楚三的亲口说法才真正相信了。

周恩来

在周恩来亲来清华接见蒯大富，与他长谈几小时并在全校大会上亲自为他公开平反的时候，我想蒯大富对周恩来肯定是感恩戴德的。后来随着中央文革越来越密地插手清华文革，周恩来慢慢地淡出了。

激进的蒯大富亲江青而远周恩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对周恩来不满的第一次公开暴露是在揪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的问题上。周恩来一是恪守中央决定始终不放王光美回清华，二是严厉批评蒯大富骗斗王光美“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3-P97] 蒯大富心里是一百个不服气，以“智擒王光美”的大吹大擂来发泄他对周恩来批评的严重不满。

当然，这件事发生在 414 之前，与 414 无关，但是种子已经种在后来成为老团老四们的心上。

蒯大富破釜沉舟铁了心要在 5.30 成立革委会。他对革委会可能流产的思想准备一点点都没有。鉴于 414 宣布成立总部，分裂局面已经形成，原本答应来参加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周恩来不来参加成立大会了，建议革委会延期。这对蒯大富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如“当头一棒，一盆冷水”。¹ 打击之大，可谓空前。

5.30 革委会的流产，在蒯大富的心里结下了两个大大的仇。一个是对内，对 414 的。另一个对上，对周恩来的。如果说，之前的蒯大富只是对周恩来的思想太保守，没有像江青那么激进有看法的话，这一次是在重大的切身利益上受到严重的创伤。

我原来一直以为，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是革委会无法如期召开的唯一原因。现在才知道，即使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谢富治参加大会的态度依旧没变。也就是说，如果蒯大富决心如期成立革委会的话，这个庆祝大会还是开得起来的。谢富治陪着蒯大富思前想后纠结了一晚上，最终蒯大富选择了推迟。这一推迟，就推到遥遥无期，清华革委会再也没有在蒯大富的手里成立起来。

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决定不来参加成立大会是革委会流产的最重要外因。414 的感受是“天神相助”，客观上是帮 414 扭转了危局。但是周恩来绝非为了帮 414 才把革委会搅黄了的。他的决定是从对大局的考虑出发的。至于 414 因此而挣脱困境，仅仅是他这一决定的副产品。

蒯大富认定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给 414 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最默契的配合，这就是 414 后台的“铁证”。团派的其他头头、骨干和群众，从上到下都深度怀疑是周恩来利用 414 搞垮了蒯大富的革委会。有一位团派朋友勾勒了这样一张“路线图”：在 414 与周恩来之间的关键人物是张广友。是他代表周恩来的

¹ 蒯大富不满地说：“总理给我们当头一棒，又浇了一盆冷水。”[17-P112]

意图支持 414 分裂。我认为，作为一种想象，无论听起来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只能是想象，而不是事实。414 分裂是团四深层次矛盾发展的结果。内因是根本。作为 414 分裂的决策者之一，我确实没有感觉有什么外在因素对我产生影响。

用不着否认，414 与周恩来之间是有上下互动关系的。这种互动体现在思想上，体现在情感上。

414 对周恩来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亲”。我们自认为四一四思潮与周恩来的思想体系是很合拍的、一致的。他的一言一行，我们十分关切。他的困难处境，我们十分同情。他在上层与中央文革这帮人艰难周旋，我们在清华园与团派的极左思潮艰苦抗争。我们自我感觉就是与他上下呼应。

我们“亲”周恩来的另一个因素是带点派性的。在中央首长中，除了不过问清华文革、对清华两派都没表态过的那些以外，凡是表过态的，都是站在团派这边打压 414 的。对 414 公开指责，敲敲打打，那是家常便饭。唯有周恩来，没有公开指责过 414，这就足够令我们心存感激了。我猜想，周恩来的内心对蒯大富这样的极左势力也是不抱好感的。对于 414，他不参与江青等压制 414 的大合唱，我们感觉是他对 414 所能做的最大支持了。

至于周恩来对 414 的态度，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去感觉。对于清华的 414 与团派，乃至全国的温和造反派与激进造反派，显然，周恩来对前者的好感更多一些。周恩来尽力保护老帅、副总理这些他在中央的支持者，那么他也会尽力照顾作为他的社会基础的温和造反派。414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后传来消息，说周恩来说了一句“没想到清华 414 也参加了。”[1-P232] 这是一句批评的话，夹杂着失望和惋惜的情绪，也可以解读成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 414 一直存有的好感并寄予希望。我们听到以后，因没能为总理争光反而给总理添乱感到非常的内疚和愧疚，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懊悔无比。

作为中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有做任何一派后台的实力和资格。但是，周恩来是个努力紧跟毛泽东、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大人物。他知道蒯大富是毛泽东欣赏的，中央文革支持的，所以他绝对不敢也不会违背这个大原则公开支持 414。在「414 串联会」成立半个月后的 4 月 28 日，当有人问他知不知道清华有个 414 时，周恩来说：“不知道，清华我就知道有个井冈山，只认识一个蒯大富。”[1-P160] 是周恩来确实不知道清华冒出了个 414，还是他佯作不知，这无法考证。从周恩来的绝妙回答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是绝对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授人以柄的。

周恩来对清华两派的态度，表明了他坚持不亲一派打一派的党性立场。他对团派、414 都有过批评。而态度明确的支持，他只给了「井冈山」，起码表面上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对毛泽东是敬畏的话，那么对周恩来是敬仰，是敬重，带点亲切感。

我是反对找靠山找后台的。但是，如果周恩来敢于做、愿意做 414 的后台的话，我是心甘情愿拥戴他这个后台的。414 上下也会非常乐意的。但这终究不是现实。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周恩来只是 414 的精神后台。

林彪

说实话，当年，及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想过老团中居然会有人怀疑林彪是 414 的后台。近年才知道，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团派朋友认为林彪是 414 的后台。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所有的造反派唱的都是毛主席的语录歌，唯有 414 选用林彪语录作为 414 战歌，说明 414 对林彪崇拜到何种程度。二、两派为这段林彪语录的真伪互相激烈争辩。正当因吴法宪、戚本禹否认这是林彪语录，414 处于十分被动地位的时候，林彪办公室为这段未正式出版的林彪语录证实，从而替 414 解围，而让团派颜面扫地。团派朋友说：“这样的做法不是令人深思的吗？可见 414 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以此证明林彪就是 414 的后台。

我看了，不禁哑然失笑。林彪在文革中深居简出，几乎没有插手过地方上的事情。414 与林彪，简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我只是想说，如果哪个大人物曾经说过几句并非主观故意对 414 有利的话或做过某件有利的事，他就成了 414 的后台，或者 414 就认他做自己的后台，那这个“后台”的桂冠也太不值钱了，以这样来认定后台也太小儿科了。

因为绝大多数老团都认为怀疑林彪是 414 的后台是可笑的，所以我也简单略过，不再多议。

团派曾经强烈怀疑林杰¹ 是 414 的后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专门有一节“后台风波” [1-P233] 记述此事，我不再赘述了。

尽管团派只能怀疑而不能确证 414 的后台是谁，团派还是坚信 414 是有后台的。这样的执迷不悟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当毛泽东派出三万首都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正常人的思维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谁也不敢蒙着毛泽东调动工人来清华的。蒯大富在无法从谢富治的北京市、江青的中央文革处求证是谁派出这庞大的工人队伍的情况下，认准是 414 的黑后台所为，公然武力抗拒工人。某种意义上说，蒯大富是被自己臆造的“414 后台论”断送的！

除了后台外，团派还怀疑过张广友、罗征启等人是伸向 414 的黑手。尤其是对罗征启，被团派列为“罗文李饶”² 之首，认为只要把这些亮相到 414 的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着 414，414 就会不攻自破了。

说到底，团派对 414 从根本上还是不了解。可以那么说，即使团派所说的那些后台真的都倒台了，团派所说的那些黑手真的是反革命的黑手，414 也不会因

¹ 林杰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实际负责人。1967 年 8 月与王力、关锋同时倒台。

² “罗文李饶”，即罗征启（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学宓（清华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康（清华教务处副处长）、饶慰慈（清华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此而垮台、而瓦解的。因为我们心里非常清楚，414的重大决策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外界的影响有，但绝不是主要的。与414多少有点关系的黑后台打倒了，或者黑手揪出来了，这最多会让414有点一时的被动，但是想要以此整垮414，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那个时候重提一件蒯大富的往事，可能对团派是会有所启发的。

当蒯大富和蒯派们挑战工作组权威的时候，当工作组凭借党的名义倾全校之力围剿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援手，凭什么这样硬气和无畏？那是因为他们敢于独立思考，他们坚信自己没有大错，更没有罪，工作组这样整群众是方向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凭着这样的信念，他们才坚持到了“解放”。

多数414头头在工作组时期的政治勇气和独立精神显然不如蒯大富和这些蒯派们。但是过了不到一年，两者互换了位置。已经成了414头头的沈如槐等人，他们明知道蒯大富是毛泽东所欣赏的红卫兵领袖，明知道清华《井冈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典型，但是他们更知道蒯大富等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断违背着毛泽东思想。他们不畏江青、谢富治等人的权势和高压，敢于独立思考，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勇气。曾经英勇的处于掌权派地位的蒯派们，此时却迷信和依附中央文革，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年没有后台敢冒犯工作组的蒯派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没有后台的414因为同样的理由敢于与团派抗争到底呢？

第五节 我认为的团派后台： 谢富治、江青、毛泽东

团派有后台吗？

当然是有的，而且都是强大给力的红后台。至于有的后台后来颜色变了，由红变黑了，那是在两派都消亡以后的事情。

团派的后台是谁呢？在我看来有三个：

一是谢富治

作为北京市党政军一把手，更兼公安部长，清华又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具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对团派支持和保护。谢富治的屁股坐在蒯大富一边，蒯大富没有理由不听谢富治的话，他也是很看重谢富治这个后台的。只是，蒯大富自恃是毛泽东的“宠儿”，并不从心眼里完全服了谢富治。对于谢富治不顺自己心意的话也是不听的，因为蒯大富有比谢富治更硬的后台，所以只有在合意时才言听计从。谢富治从支持蒯大富中向伟大领袖邀功表忠心，蒯大富需要由谢富治出面向414施压，他们各有政治利益所图。

谢富治在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以及抓陈楚三、周泉缨这些事情上把他的后台角

色表演得淋漓尽致。

二是江青

江青不仅是中央文革的实际掌门人，更有“毛泽东夫人”这一无人能及谁都忌惮的身份。蒯大富对江青是敬畏的，完全做到了言听计从。对蒯大富来说，听江青同志的，就等同于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是后台，谢富治见到江青，那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

蒯大富在打倒刘少奇上建立了奇功。蒯大富两次批斗王光美，让王光美出尽了丑，江青快意无比。所以江青对蒯大富犹如自家孩子一样的呵护和疼爱。

怪就怪在，我们都明明白白知道团派有江青、谢富治这样权高位重的中央首长做后台，我们还是公开与团派对抗。为什么有这个胆量？因为我们以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团派的所作所为。团派有许多错误，我们反对的是团派和蒯大富的错误，并不是团派和蒯大富的全部。因为我们只是对江青、谢富治庇护蒯大富错误的言行表示不满，而不是反对江青、谢富治，更不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北京市革委会。这是我们牢牢掌握的原则。团派以为我们有后台才敢于反对蒯大富，这完全是错误的判断。我们是因为自认为站在真理一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对抗蒯大富，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蒯大富的背后站着江青、谢富治。

除了谢富治、江青，想做团派后台的，还大有人在。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就是其中之一。1967年6月26日，他带戚本禹来清华找两派做工作，竟然对团派说“要承认414（总部）囉，承认了对你们主动。……（团四两派要）以对等原则召开联席会议，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决定一切问题”[4-P211]。当我们终于从他非常难懂的福建话中听明白他的意思时，我们欣喜若狂，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这“承认414”、“对等原则”都让团派老大不高兴，因为这把他们的核心利益全出卖了。陈伯达来清华的本意是想帮团派忙的，只因为事先不了解情况，结果帮了倒忙。后来陈伯达忙着为自己的失误补救，团派心里依旧有气，414也没领他什么情，心里骂他搞两面派。陈伯达似乎也是很想去当团派后台的，但他这样笨拙和迂腐，团派岂能看得上？

至于戚本禹这位曾经红得发紫的人物，也应该算是团派的后台。但是在蒯大富眼里，真没把他当做一回事。即使是后台，也是小小不言的小角色。

每当与团派多多少少有点牵连的大大小小人物，譬如像王、关、戚，杨、余、傅¹倒台的时候，414都要鼓噪一阵，说这些人是团派的后台。其实，这些人与团派即使有一点关系，相比较江青、谢富治这样的真后台，也是比较浅表的。

¹ 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杨、余、傅，即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三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宠爱和支持，这点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但是这种支持，是对造反派支持的体现，属于比较正常范畴。所以，我在两派争斗期间，一直都没有认为毛泽东是团派的后台。如果那个时候就确定毛泽东已经是团派的后台，起码我是不会再搞 414 的了。跟以毛泽东为后台的团派争斗，岂不是自己找死？

直到看到毛泽东 7.28 召见谈话之后，我才猛然明白，原来团派的背后真还站着一个巨无霸的后台——毛泽东。

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五大领袖说：“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13-P354]

对于派工人进清华一事，毛泽东对蒯大富说：我这是来为你解困，“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13-P370]

召见结束，毛泽东离开了又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他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13-P373]

而对于 414，毛泽东的表态和定性是：“我才不高兴那个 414。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13-P370]

作为所有造反派的领袖，毛泽东对某个具体的造反派组织极少公开表态。他表面上是维持一碗水端平，不给外人留下抬一派压一派的印象。但是这次，毛泽东的态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犯下严重错误的团派得到他无原则的庇护，欢迎工宣队制止武斗的 414 则受到他毫无道理的指责。在团派开枪打死了工人、蒯大富犯了罪行的危难关头，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拉下公允的假面，放下高贵的身段，把团派后台的身份暴露得一览无遗。

团派真的好“幸福”！有那么大、那么多的红后台的坚决支持，着实令我有一丁点儿“羡慕嫉妒恨”，外加巨大的压力。

在文革之前，我们津津乐道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是多么的英明团结。文革开始后，铁幕洞开，神话破产，我们震惊地发现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矛盾那么深的裂痕已经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

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林彪已经结为同盟站在一起。刘少奇邓小平并非是同盟但客观上被划为一起。既敬服又畏惧毛泽东而思想上却与刘少奇有更多共鸣的周恩来最终站到毛泽东这一边。

中央高层的分歧必然会“投射”到社会基层。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这三个代表人物必然会有三种相应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代表人物都是他们相应的社会基础的“后台”（指利益代表和精神层面而言的后台）。

在全国，刘少奇是保皇派的总“后台”，毛泽东是激进造反派的总“后台”，周恩来则是温和造反派的总“后台”。在清华，刘少奇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后台”，毛泽东是团派的“后台”，周恩来则是 414 的“后台”。

派别以“后台”作为政治利益的代表，因而衷心拥护、积极支持。“后台”以派别作为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因而悉心呵护、全力支持。这方面，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与清华的老红卫兵、团派、414 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但是，因为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势力和能量上并非是等量级的，所以，他们与派别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上是有差别的。刘少奇通过王光美、刘涛这样一条线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后台。毛泽东通过江青（中央文革）这样一条线成为团派真正的后台。周恩来与 414 之间没有这样一条线。周恩来对 414 的支持只能在力所能及且有充分正当的理由下才做那么一点点（最经典的一次是以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为由拒绝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客观上给 414 以极大支持）。414 对周恩来的拥戴也都在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下呼应的。

团派始终强烈怀疑周恩来是 414 的后台。相比较怀疑康生、林彪等是 414 的“后台”，团派怀疑他是 414 后台算是最靠谱的。但是，靠谱也只是靠近一点谱，并不是真的就等于谱。

第六节 团四分派根本原因： 政治观点分歧和群体利益矛盾

清华「井冈山兵团」已经分成团四两派，由同一个兵团组织内部的两派彻底分裂成两个完全独立互相对立的两个总部。不管是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还是当今研究清华文革史的学者专家都在分析探究清华两派产生的成因和斗争的实质。

政治观点的分野显然是形成团四两派的重要原因。

我在给《倒下的英才》一书作者唐金鹤的邮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团四最初的观点分歧是在干部问题上。清华师生中认为清华中层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经过文革洗礼应该及早解放的那部分人，慢慢地都集合到 414 的大旗下了。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是想善待干部尽快转入‘斗批改’尽早结束文革动乱这样简单而朴素想法。”[6-P512]

陆小宝曾经评论这是“政治观点决定论”[6-P22]。我承认，几年前我确实认为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导致两派形成最主要的原因。从兵团总部整风开始，继而在干部问题上展开的大辩论，更延伸到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慢慢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凡是同意“红线主导”论的，结成了 414 派。反之，凡赞成“彻底砸烂”论者，即为团派。团派与 414 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泾渭分明、清晰对立。这是

清华派别斗争的显著特点之一。

有意思的是，尽管两派的政治观点分歧巨大而明显，两派却都说自己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就是说，两派的争论，似乎是两个毛泽东在争吵：一个是文革中的毛泽东，强调的是继续革命理论。一个是文革前的毛泽东，突出的是他的一贯红线。前者以团派作为代言人，后者以 414 作为辩护者。¹

政治观点的不同是造成团四两派的重要原因，对这一点几无异议，所以我在这里不多赘述。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 414 的这些人会持有“红线主导”论，而团派的那些人会持有“彻底砸烂”论呢？

经过这几年的思索，我认为团派与 414 派是两个在组成成分和利益诉求上有明显差别的群体。

在这里，我要引入“优质生”以及由优质生组成的“优质群体”、“差质生”以及由差质生组成的“差质群体”的概念。

为了说明这两个群体的差别，我以我所在的自 604 班作为示例分析它们的成分和形成过程。

我班有 36 人²。入学的时候，有三四位高中就入党的同学马上被组织看中，担任班上和年级里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新生的眼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同学。全班只有一位同学的出身是富农，但因为本人是党员，显然比不是党员的一般工农子弟显得更优秀些。其他所有的同学，尽管各人情况有点差别，但也各有所长，没有明显差劲的。

可以这么说，进校之时，我班的同学几乎全都是优质生。要说差别，也仅是优秀还是优良的程度差别。没有明显的差质生。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已经形成明显的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不是团体）。凡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出身好、成绩优秀的这些优质生，通过高考，送到清华、北大、军工院校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学。家庭出身不好的这些差质生，落榜了，个别幸运一点的也只能上不入流的大专。高考，就像是一架甄别“优质生”还是“差质生”的筛选机，把不同的两类人送上不同的人生轨道。能进清华这样名牌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优质生。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清华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自动控制、无线电、数学力学。这五个新系都是 1958 年前后新筹建的，其中有不少与国防工业有关的专业涉及保密，因而在招生的时候对考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严格。总体而言，清华招生

¹ 汲鹏对笔者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团派偏执于继续革命，414 倾重于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就打架了。

² 自 6 年级在入学的时候分 7 个班，到大四的时候分专业，缩编成 5 个班。笔者始终在 604 班。前三年的老 604 班与后三年的新 604 班，人数有差别，人员上也不一致。36 人是毕业时的全班人数。

时对考生的出身看得不是很重。在电机、水利、土建、动农、精仪、冶金这六个老系里，出身有点问题的比例要高得多。王良生是水利系的，1962年入学。他说他这个班里，家庭出身成分高、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有海外关系的，竟然高达74%。这与我班（1960年入学）的情况差别巨大。

大学六年中，各种政治运动和繁多的活动从没间断过。拣其重要一点至今还有印象的，有红专辩论、学《毛选》、忆苦思甜、“学雷锋”、评功摆好、学“九评”、农村“四清”、批“三家村”等等。这些运动和活动，基本上以正面教育为主，多数比较温和，偶尔也有点激烈。逐渐地，班上同学分成了两个界线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点轮廓的群体：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优质、差质的差别主要在政治表现方面的不同。

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阶级感情深等等，都是政治表现好的重要标志。出身于双革（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质群体的主体，政治辅导员、党员、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等学生干部则是其中优秀优质生，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优质群体的核心和中坚。

而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右派学生是最差质的差质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认识模糊、立场动摇的学生肯定也属于差质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家庭的学生，有个性、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不大爱听组织话的学生，都有成为差质生的可能。在政治上表现不上进、不紧跟，以致给组织上留下政治落后印象的，个人品行（譬如有点小偷小摸）、思想意识（譬如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点问题的学生，还有极端散漫、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学生，也可能属于差质群体，虽然这些与政治思想上犯错误有问题是有程度上差别的。

在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之间，有不少既算不上优质生也不算差质生的同学。所以在两个群体之间有一片模糊的中间地带。这两个群体也是动态存在的。本属于优质群体的优质生如果犯了政治错误，就会掉入到差质群体中去。差质群体的差质生，尤其是仅仅因为出身不太好的，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积极靠拢组织，能彻底背叛剥削阶级，就会上升到优质群体中去，甚至有可能入党。这叫做“重在表现”。

组织上对优质生的政策是信任、培养、重用。毛泽东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对优质生说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也是对优质生说的。优质生的前途光明、前景美好。所以，已经处在优质群体中的学生想的是要不断的为党立新功，以确保在优质群体中的位置不断上迁，至少不能往下跌。

组织上对差质生的政策是帮助、团结、教育，使之脱离差质群体，上升成为

比较优良的优质生。对于极少数性质严重的差质生就要进行批判、监督、改造，以防再往下滑成为敌对分子。因为差质生都明白自己的前途暗淡、命途多舛，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地抓住机会（特别是政治运动的机会）表现自己，以求挣脱差质群体的苦海，改变差质生的悲惨命运，力求进入优质群体。

这就是当时两个不同群体人的心态。

很显然，优质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是强势群体，而差质群体必然是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

虽然从没有明文公布过优质生差质生的标准，虽然谁也没有给哪个人贴上优质生或差质生的标签，但是组织上（辅导员们、党团干部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潜标准的。他们不断地在给学生们摸底排队，进行动态管理。到底是优质生、差质生还是不优不差的中间生，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其实每个学生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在我临近毕业，也就是在文革之前，我班的情况是这样的：

1、党员约有 19 人，超过全班人数的一半（老系班级的党员就没有这样高的比例了），其中政治辅导员 4 名。这说明经过大学六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优质群体中优秀优质生的数量明显增加，质量也有极大的提高。

2、有三四名同学因各种原因成了差质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差质群体（老系班级的差质生可能要多一些）。

我在大学前四年一直处于优质群体里的。在“九评”学习后非常不幸地掉到差质群体中，成为班上第一号差质生。

文革前学生中的差质群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1、这个群体比较小。根据我班的情况推算，约占学生总数的 10 ~ 15% 左右（老系里，这个比例可能要高一些）。

2、差质生与优质生之间有矛盾，但表现得不是很尖锐。

3、由差质生上升变成优质生的通道尽管很小，但是没有完全被堵死。所以差质生面前并非是漆黑一片，绝望到底。当然，从差质生变成优质生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能成功的几率也很小，而变成更差的差质生的可能性倒是蛮大的。

4、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时候的差质生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差质生散落在各系、各年级、各班中，互不认识，互不联系。所谓差质群体，只是一个概念，并没有抱成团形成一个实际的团体。

文革开始了。那场校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的大辩论，本来是会引起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一次大分化大重组的。如果大辩论最后证实校党委是“延安”，蒋南翔姓“马”，那么，保蒋的优质生将更优质，保蒋的差质生也会因为站对了队在转变成优质生的天平上增添了砝码。而反蒋的都犯了立场错误，反蒋的优质生将变成差质生，反蒋的差质生将更差质。当然，如果证实校党委是“西安”，蒋南翔姓“修”，那情况就完全是翻了一个个儿。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当时无论反蒋的还是保蒋的，都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共产党政权的目的，只是在认定校党委、蒋南翔是不是变修这点上，观点截然相反罢了。不管反蒋还是保蒋，几乎每个人都有让原本优质的更优质，原本差质的变优质的真诚动机。可以想象，要是校党委最后胜利了，那么，其结果就与五七年的反右一样，又将有一大批优质生跌落到差质群体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反基层党委的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实际情况是，这场辩论刚开始没几天，谜底就揭晓了。反蒋反对了，保蒋保错了。于是，这一次立场站对了的反蒋学生扬眉吐气。保蒋的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挨了闷棍，垂头丧气。

工作组进校，反蒋的还来不及受表扬，保蒋的还来不及挨批评，反蒯运动就开始了。这不到十天的保蒋还是反蒋，并没有对优质群体或差质群体的变动产生多大的影响。保蒋的优质生们并没有因为保蒋错了而掉到差质群体中去，反蒋的差质生们也没有因为反蒋对了而上升到优质群体中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保蒋还是反蒋发生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之间的迁动和重组。最多，只是心理上的影响而已。这样的结果，解放以后十七年来还是第一次。

在这场由工作组指挥组织的全校反蒯运动中，反工作组的蒯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优质生，而跟随工作组反蒯的主力也是优质生。反蒯运动使得优质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最终，那些原本是优质生的因为反工作组而成为蒯派全都跌落到差质群体里！

蒯派处境凄惨，一片哀号。蒯大富说：“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10] 陈继芳深夜面对奔流的河水，“一刹那，我想到了死。跳进去么？跳进去就一切都结束了。”[11-P30] 蒯大富、陈继芳这些原本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一下子掉落到差质群体的最底层。如果文革最后以刘少奇的胜利而结束，那么运动后期，这些蒯派全都会定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命运与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一样的惨。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击的对象，没有一次是能平反的。1950年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的胡风分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中的走资派，不管是整对的还是整错的，总体而言，整了就整了，绝不认错，绝不平反。

十七年来，唯有刘少奇派工作组整学生这一次，不到两个月就平反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破天荒地由共和国的总理出面平反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毛泽东这个时候突然心生慈悲，换了一副菩萨心肠。但是对蒯派而言，能不能平反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命运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转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

大转弯。

反蒯期间及以后的差质群体，有如下特点：

1、差质群体猛然间膨大了许多，全校一下子新增蒯派 700 多人。以前的差质生是零零落落产生的，情况各异。而蒯派是一次性产生的，全是犯了反工作组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蒯派中的大多数都是出身比较好、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斗争精神的原优质生。现在的差质群体中，既有文革前的老差质生，也有蒯派这新差质生。新产生的蒯派成了差质群体中最主要也是最有政治能量的差质生。

3、非常重要的是，文革前的差质群体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而反蒯以后，蒯大富组织了「井冈山红卫兵」，这实际上是一个以蒯派为核心、为骨干、为主力的全校性的差质群体组织。「井冈山红卫兵」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差质群体的政治诉求，代表差质群体的切身利益。

4、蒯大富平反了，蒯派也平反了。慢慢地，不只是平反，蒯大富和蒯派都成了革命左派，也就是说，成了新优质生。十七年来，有哪一次政治运动中，差质生翻身成为优质生的？没有！一次也没有！这一次，完全是奇迹，是反常。蒯大富不仅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不仅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后来竟然成了实际掌管清华大权的「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差一点成为清华革委会的一把手。蒯大富从反蒯前的优质生，在反蒯中变成最差最差的差质生，反蒯以后成了最顶尖的优质生。这是一个 U 字形的人生轨迹。他犹如从人间掉入到十八层地狱以后又腾飞到高高的天堂！蒯大富及其蒯派，从工作组反蒯时候的差质群体变成「井冈山兵团」掌权时候的新优质群体。

这个时候，原来的优质群体在反蒯以后，也有如下特点：

1、优质群体向来是最听党的话的。只要跟着党走，永远不会犯错误。但是这一次老黄历不灵了。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反蒯是工作组指挥布置的，优质群体是反蒯的主力军。这一切似乎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没想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优质群体紧跟工作组起劲反蒯，最后不仅没立功，反而站错了队，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随着蒯派成为新优质群体，跟着工作组跑的优质生就不再是优质生了，他们成为相对比较差的差质生了，他们形成了新差质群体。

2、优质群体发生了极大的分化。绝大部分优质生（跟着工作组跑的）整了一小部分优质生（反工作组的）。最后，这些原本都是优质生的，因为整人和被整，他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落差和情感鸿沟。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愈合的。

3、优质群体向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他们前途似锦，光辉灿烂。反蒯运动后，那些跟着工作组跑站错了队的优质生，突然发现他们似锦的前程蒙上了阴影。他们的接班前程被横刀夺爱。因为那些蒯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坚定的革命左派，成了主流派，成为掌权派，成为新优质群体。

4、在优质群体中，本来最牛气的是革干革军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这次文革的对象就是走资派，所以干部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昨天还是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女，今日成了黑帮子女。他们的身价一落千丈，成了新差质群体中的最差生，被文革运动所边缘。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落在工农子弟后面。

5、文革前，在校党委、校团委的领导下，优质群体是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的。他们寄生于这一组织系统得以生存，依靠这一组织系统得以发挥作用。蒋南翔一倒台，庞大的组织体系顷刻瓦解，工作组撤走后，优质群体如一盘散沙，只能各自为战。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组织意识仍在，很容易抱团形成新的群体。在批判工作组中诞生的「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那些跟工作组跟得不紧、对反蒯也反得不力的这些原优质生挑头的不自觉集合。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人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发出了重组和变迁。不仅如此，更严重更长远的影响是，对什么是优质、什么是差质的标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标尺，最基本的方面，如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等等，还是没变。但在文革前后，甚至在文革的不同时段，这一标尺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变化。

在文革初期，凡是能深刻理解继续革命理论的，能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能向着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造反精神强路线觉悟高的，都是优质生最主要的标志。他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之，对继续革命理论不理解的，对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的，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开火不猛烈的，缺乏革命造反精神路线觉悟低的，就是保守派，甚至是保皇派，就要沦落为差质生。

文革前的差质群体是隐形的，优质群体是有合法组织的。经过文革初期的激烈变动，有分化，有扩充，有重组，最终形成了两派。以新的标尺来衡量，蒯派成了革命左派，团派成为新优质群体。而原来优质群体中的大多数，这个时候成了新差质生。这一新差质群体的组织形式就是「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们最后演变成 414。

沈如槐在《清华文革纪事》115~118 页中记录了几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可以为我的上述分析佐证：

学生干部党员在 414 中的占 62.6%，在团派中只占 27.4%。这说明文革前最优秀的优质生大多数都跑到 414 这边去了。

学生中的反工作组分子团派占 65.6%，414 占 29.3%。“反工作组分子”也就是蒯氏人物。可见蒯派主要集中在团派，蒯派是团派的核心。

反蒋分子团派占 60.3%，414 占 33%。这说明对旧清华表示不满的绝大多数在团派。

「八九」分子团派占 20%，414 占 68%。可见保工作组的「八九」分子绝

大多数都跑到 414 这边来了。这与多数蒯派跑到团派去了是同一回事。

这几张统计表都是着眼于团派与 414 派的成分比例，没有反蒋与保蒋、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八八」与「八九」的比例及人数统计，这是很遗憾的。以我个人的观察，保蒋积极的，一般保工作组也比较积极，一般会参加「八九」，后来成为老四的会比较多。反蒋积极的，一般也是反工作组或者对反蒯保工作组不很积极的，一般会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或「八八」，后来成为老团的会比较多。

群体与观点，这是一物两面的关系。同一群体的人，因为以往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基本相同，所以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观点。反过来也一样，因为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有共同语言，所以彼此接近、吸引，容易共存于同一群体。

“红线主导”论，既是原优质群体的切身感受，也是为肯定原优质群体的过去历史所需要的。所以，“红线主导”论最容易为原优质群体所接受。它是 414 最核心、最基础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 414 赖以生存的生命原动力。

蒯派切身体验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因此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的口号也是非常自然的。唯有如此，蒯派才能避免再退回到过去挨整的地位，保持新优质群体掌权的地位。

学生是清华文革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学生的观点和群体影响着干部队伍和教工队伍，干部和教工必然随之分群分派。

清华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清华牌”的，也就是说，都是优质生留校的。最具典型的是，谭浩强是历次政治运动表现积极突出的政工干部，吕应中是蒋南翔号召走“吕应中道路”的红专典型，罗征启是旧党委的宣传喉舌。没有比“红线主导”这样的理论更得这批“清华牌”干部的欢心了。教职员中的党员，亮相到 414 的占 47.4%，亮相到团派的占 30.5%[1-P117] 整个清华干部队伍，也是亮相到 414 这边的人数要多得多。

简而言之，以原优质群体为主的 414 派基本上代表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都拥戴“红线主导”论。而以蒯派为主的团派则代表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受歧视者，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彻底砸烂”论。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既表现在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上，更表现在对今后政治命运和政治前途的争取上。

所以，我认为，团派与 414 派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表。群体利益的矛盾是造成分派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因为“文革不同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似是观点与观点的冲突、思潮与思潮的交锋、理论与理论的对峙，而背后无不深藏着广大群众的利益渊源、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17-P75]

对于分派，除了政治观点和群体属性的主要影响外，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派别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个是政治风险的考量：

历次政治运动让人们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政治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政治上栽了跟斗，人生一辈子就完了。

在保蒋还是反蒋、反蒯还是反工作组这两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队站错了的人很多。他们心里想着，再也不能站错队了，再也输不起了。团派不仅是多数派，更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主流派、在朝派。414 不只是少数派，更是被中央首长批评、打压的在野派。这两者强弱分明，前景也大不同。明摆着，参加团派的政治风险几乎没有，参加 414，面临的凶险要大得多。

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的干部和教师，对政治风险的考虑显然要更多一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学生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同学。我班里有一位姓厉的杆儿老团曾这样说过：“414 垮掉的可能性极大，最好的前景也只能得到清华的半壁江山。蒯大富是毛主席支持的，绝对垮不了，最坏的前景起码还能得到清华的一半江山。清华肯定是以团派为主坐江山的。”他在利弊得失上的透彻分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另一个因素涉及到价值观的认同感：

自从团派掌权以后，团派一些核心人物的价值观取向颇受争议，蒯大富的政治品行也屡遭恶评。许多老四对我说过，他们对团派一些核心人物信奉的“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等在道德层面有悖于常理的言行非常反感，无法认同。蒯大富在诚信方面的缺损也使他的个人魅力大打折扣。相比较 414 这边的头头，看起来似乎要让人放心一些。这也使得受传统教育很深的一部分师生因此而选择了 414。

我认为团四分派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观点分歧、群体利益矛盾、政治风险考量和道德价值差异。至于具体到某个人参加了某派，究竟是哪个方面看得更重一些，哪个因素起的作用更多一些，那是因人而异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可笑的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譬如，看到一个挺讨厌的人参加了这派，心里即使赞同这派的观点也不再参加。当然，这些都是个别的。

第七节 两派主要头头的群体属性，我是一个特例

一个人所处的群体与这个人所持有的观点，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致的。

两派的主要头头，有一些我至今都不清楚他们在文革前和工作组时期的表现。我只以比较了解的蒯大富、马小庄、陈继芳、陈育延、沈如槐、陈楚三、汲鹏这几个两派的主要头头来分析它们的群体属性。

团派中，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完全一致的有蒯大富、马小庄、陈继芳。在文革前，他们都是优质生。蒯大富是入党积极分子，离跨进党的大门只差一个脚后

跟。马小庄和陈继芳在文革前就入了党¹，都是学生干部。这三位都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在工作组时期，他们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是全校或全系出名的大蒯派。他们是团派总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坚定的团派观点。

414 中，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完全一致的有沈如槐和陈楚三。他们也都是党员。沈如槐是团支部书记、党小组长，陈楚三是烈士子弟，他们两位也全是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我不是很了解他们在工作组时期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是蒯派，没挨整。他们对工作组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所以很快成了「八八」派，陈楚三还是「八八」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是 414 总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坚定的 414 观点（更准确一点说，是 414 中的鹰派，坚定的「东方红战团」观点）。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1、这几位在文革前，全部都是出身很好、政治表现优秀的优等优质生。他们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有同样的接班前景。那时他们处以同一群体中，互相之间当然没有什么群体利益的矛盾。

2、工作组时期，他们被分化了。蒯大富等不要说接不了班，而是要当反革命了。沈如槐等仍在优质群体里，未影响前程。

3、「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等成了新优质生，夺取了清华大权。沈如槐等相对于新优质生而言反倒成了新差质生，接班前景渺茫。如不力争，将只能做蒯大富等的臣民。

4、蒯大富是团派一把手，沈如槐是 414 一把手，其他几位都是派内最有影响力的头头。由这几位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群体归属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在两派的总部委员中，还有不少与他们一样，也是政治观点与群体归属一致的。

事情总会有例外。有少数头头，他们的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是背离的。

在团派中，陈育延就是一个背离的例子。她出身干部家庭，党员，是优秀的优质生。在工作组时期，不是蒯派，没有跌落成差质生，但也不是坚决跟着工作组反蒯的。后来是「八八」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就是说，到 1966 年年底以前，陈育延与沈如槐、陈楚三、唐伟等人的经历和状况几乎一样。从她的群体属性讲，陈育延应该归属于 414 派的。但是陈育延却持有团派观点的，是团派总部核心要员。

在 414 中，汲鹏也是一个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背离的例子。汲鹏也是党员，是蒯派，与陈继芳同系，各方面情况与陈继芳非常类似。从群体属性上讲，汲鹏本应归属于团派，但他持 414 观点，是 414 总部核心委员。

在两派的主要头头中，我是一个最特殊的例子，群体归属与政治观点背离的程度，超过了陈育延和汲鹏。

¹ 学生党员，都是文革前就入党的。因为文革开始后，党组织停止活动，没有再发展新党员。一直到工宣队进校整党以后，才恢复党组织活动。

两派的主要头头在文革前几乎全都是优质生，唯有我是差质生。一个差质生在文革中敢于跳得那么高，折腾得那么厉害，是极为少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出身好，从中学到大学前几年一直是优质生。优质生的影响和思维让我的胆子比那些出身不好的一直是差质生的同学要大得多。而且，我虽是差质生但不是非常差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太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渴望从差质群体蹦回到优质群体中去。

蒯大富等是在工作组时期才跌入到差质群体中去的。他只跌入过这一次。他成为差质生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几十天。我是在“九评”学习中成为差质生的，已经当了二年的差质生，是老牌的差质生。工作组时期又成了蒯派，在差质群体中往下又跌了一次，成了“双料”的差质生。随着蒯派成为新优质群体，我也跟着沾光成为新优质群体中的一份子。在蒯大富的提携下，成为「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那时的我与蒯大富是属于同一群体同一观点的。

团派是维护从文革前各个时期到文革中反蒯时期的差质生的利益的。从群体利益出发，我应该是团派，而且应该是铁杆团派，一直的团派。

但是，最终，我成了老四，而且是 414 总部的核心委员。

我与汲鹏都是观点与群体背离的，但我背离得更厉害，因为汲鹏文革前是优质生，而我不是。

为什么我本该属于团派阵营的，反而成为 414 阵营的一个头头呢？多年来，我一直这样问自己。

主要的原因，我在群体利益与政治观点之间，我更看重政治观点。我认真比较过“彻底砸烂”论与“红线主导”论的不同，我内心还是赞同“红线主导”论的。一个在“九评”时被“帮助”过的人，怎么不把这当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迫害、怎么不想着要去彻底砸烂，反而赞同用这种方法对待自己，认为这也是“红线主导”呢？那可能是因为我与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子女还有所不同，也由于清华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那么的强大和有效：整了你，还把你整得心服口服，整得你不怪整人的组织，只怪自己不好。如我，真心地认为“九评”学习中组织的帮助是为我好，而不是迫害我。我始终认为是自己的觉悟不高，认识模糊才导致政治上掉队，才需要帮助。我做梦都想着重返优质群体，变为一个受组织信任的人，并且最终能成为党员。所以我反而认为这也是“红线主导”的一个具体体现。

我之所以在 414 这个群体里，更深层次的还有一个原因，我对于不少团派总部委员接受的“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左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等等观点很反感。在价值观和人品方面，我更认同在 414 阵营里的那些原先的优质生们。

据我所知，414 头头中，只有我和汲鹏是蒯派，是本该在团派却跑到 414 来了。有意思的是，我和汲鹏虽然都在沈如槐为首的 414 阵营里，但是与沈如槐等

人还是有点距离和差别的。沈如槐、陈楚三都是属于「东方红战团」的，而我与汲鹏都是「三七战团」的。看来，这不是巧合，有一种内在因素在起作用。这里，群体属性还是有不小的影响。我与汲鹏脱离了团派，都赞同 414 观点，但是没有完全融入「东方红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观点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是我们成了「三七战团」的人。「三七战团」对团派比较温和，与我和汲鹏等都是与团派同一属性是很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我与汲鹏都曾经“失身”掉入过差质群体，与蒯大富在群体属性上是一致的，这就从群体属性上解释了，为什么沈如槐他们是决不会让我或汲鹏当 414 一把手的。这不是沈如槐个人的意愿或好恶，而是沈如槐代表着原优质群体切身利益和集体意志。他们担心我或汲鹏当了 414 的一把手，会很容易与群体属性一致的蒯派妥协，会损害原优质群体的利益。

我与汲鹏的群体属性与蒯大富一致，这也从群体属性上解释了，为什么蒯大富对我和汲鹏在态度上要温和一点，没有像对沈如槐他们那么“恨”和“狠”。当然，这与我们在观点上也不如沈如槐他们那么强硬也有很大的关系。

某个人的群体属性与群体归属背离的现象正说明了团四分派并不简单地由群体属性决定的，政治观点会影响一个人本该是在某一群体，但实际上却处于另一群体。

第八节 所谓 414 的队伍“纯”， 团派的“路线觉悟”高

414 在论战中，除了大力批判团派的极左思潮外，最喜欢拿起“阶级分析”的武器，拿团派的阶级成分说事（我也是其中颇为积极的一员）。414 总是说团派队伍严重不纯，痞子多，有政治问题的多，并为自己这边党员多，学生干部多，阶级成分纯而骄傲。

团派在论战中，除了攻击四一四思潮是右倾的否定文革的思潮以外，也最喜欢说 414 的队伍里保蒋的多，保工作组的多，修正主义苗子多，最自豪于自己的造反精神强，路线觉悟最高。

当年的派战夹杂着严重的派性。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普遍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是违背中国社会实际的，因而是必须扬弃的。

今天我们应该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蒯派最早反工作组，受工作组迫害最甚，对刘少奇在文革五十天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十七年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最力。他们瞧不起以原优质生为主的 414 在十七年里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最深，在五十天中则成了

工作组压迫蒯派的帮凶，最起码也是不敢吭声。

414 当然是不服气的。414 认为在十七年里，在毛泽东思想红线主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这批优质生们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一直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至于在五十天里，蒯派反工作组并不是因为他们路线觉悟高，而是他们自己身上有许多小辫子被工作组抓住了。他们个个都写检查了，投降了，一点也不勇敢，更不是英雄、左派。批判工作组的时候是「八八」带头抗击着「八九」的。总之，蒯派的路线觉悟也不咋的，都是投机投对了的政治暴发户。

这就是所谓的五十天与十七年之争。团派强调的是五十天的路线觉悟，414 强调的是十七年的阶级觉悟。这其实就是“红线主导”论与“彻底砸烂”论激烈争辩的又一反映。

因为五十天的路线觉悟相对是现实表现，十七年的阶级觉悟相对是历史表现，而且当时更看重路线觉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414 落在下风，辩论起来有点理亏心虚。

于是，414 就专攻团派队伍不纯的软肋。

414 里党员、学生干部所占的比例比团派的要高许多，这已经由数据说明了。414 就是以原先的优质生为主体的。这是组织上的纯。

还有一个原因：414 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时候，参加 414 的人，都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后，明确表态自己持有 414 观点，愿意在组织上脱离兵团总部参加 414 的。所以，六七千人的老四，在政治观点上都是赞同 414 观点的，对蒯大富都是持 no 而不是 yes 的。虽然程度有差别，方向基本一致。这是政治上的纯。

因此，414 队伍就显得相当纯，而团派队伍相形之下就显得不那么纯了。

六七千人的老四坚决“下山”去了，留在「井冈山兵团」的还有八九千人。这其中，有不少同情或赞同 414 观点但是不赞成 414 组织分裂而留在团派里的。如王良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有好些既不赞成 414 观点也不同意团派观点的中间群众，因为无处可去，也留在团派了。还有一些逍遥派，无所谓观点，闲得慌，也偶尔参加一下团派组织的游行之类的活动。有一部分干部，在“再也输不起了”的心态下，参加了政治风险小的团派。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对蒯大富的不少做派也看不惯。只是因为蒯大富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旗帜，从这样的“大局”观出发不愿意公然与蒯大富分裂。在 414 分裂前，有一个兵团总部委员曾叫我别搞 414 了。他亲口对我说：“老孙，现在老蒯不能倒。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那时老蒯早就变修了，我们第一个就打倒他！”

总之，有好些老团是“被团派”的。也就是说，留在团派的人员，看似庞大，人数超过 414，这支队伍，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非 414 派”。真正持团派观点经常参加团派活动的老团，只是“非 414 派”中的一部分。现在把“非 414 派”

统称为团派，就给人造成了团派队伍里观点参差不齐的印象。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上述观点上的不纯，最多只是团派队伍在人数上的缩水罢了。譬如说，号称有近万人的团派，“有效团派”实际上也只有八九千人或七八千人，并非比 414 多得很悬殊。

更严重的是，团派队伍在成分上确实也是不“纯”的。

我已经说过，在文革之前，学生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差质生。只是因为差质生散落在全校各个班级里，没有形成团体，所以差质群体是隐形的。工作组的反蒯斗争，不仅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的新差质生，而且，这个差质群体以「井冈山红卫兵」这样的组织凸显在全校师生的面前。「井冈山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以「井冈山兵团」¹作为「井冈山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不问出身成分，均可加入。这一政策可能是蒯大富出于招兵买马的需要，也可能是蒯大富自身受过迫害而对同类的同情。不管哪种情况，大量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其中好些都是老差质生），在对比「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执行阶级路线上的差别后都上了“山”，成为“兵团战士”。到三总部合并时「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全校师生员工（除五类分子和没有解放的干部）被囊括进「井冈山兵团」里面了。等到 414 分裂的时候，这些老差质生，情感上与原优质生要疏远一些，在观点上对“红线主导”论也有一定的抵触，所以他们大多数都留在团派里而没有投奔 414。譬如，我的「怒涛」战斗组，他们都是差质生或者接近是差质生，除我之外多数都留在团派了。

在教师队伍中，也有差质教师。在反右运动中犯错误的，在大跃进的时候发过牢骚被组织教育过的，困难时期对党不满的，在中苏论战中因为曾经留过苏对苏联有好感的，家庭出身很差的，对组织顶牛怪话连篇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算作是教师队伍中的差质生。

正因为学生和教师队伍中的差质生比较多地集合在团派里，414 用最厉害最拿手的“阶级分析”方法，给团派扣上了“组织不纯”的帽子，团派也是有口难辩。因为，这是事实。

414 中，有一些根正苗红自视阶级觉悟高的人，，最喜欢攻击团派里痞子多，对痞子口诛笔伐，表现得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团派掌权就是痞子掌权。

我最早知道“痞子”这个名词是在学《毛选》的时候，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读到的，乡绅蔑称贫农叫“痞子”。

尽管毛泽东为“痞子”正了名、平了反，说他们是“革命先锋”。但是“痞子”这一称谓实在太不雅了，没人自称痞子或喜欢别人叫自己是痞子的。

¹ 笔者已经不记得「井冈山兵团」是「井冈山红卫兵」外围组织这档事儿了。孙耘在《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中提及他就是“兵团战士，不发红卫兵袖章，但佩戴‘井冈山’的小证章，并且申明在内部一视同仁。”显然，作为「井冈山红卫兵」外围组织的「井冈山兵团」与三总部合并以后的「井冈山兵团」不是一回事儿。

在两派争斗中，414 口里说的痞子究竟是哪些人，好像没明确地界定过。我的感觉，言语举止有点痞气的那些人，大家往往叫他们痞子（有些是不带恶意的调侃味道）。但是，痞子绝不仅仅是指他们。家庭出身不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差的，旧社会过来有历史问题的，其他劣迹斑斑的，都属于痞子的范畴。痞子，主要所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

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写得极其精彩生动。把从未跌入过差质群体的优质生比作绅士，把老差质生和曾经跌入过差质群体的前优质生比作贫农，当然是极不合适的。但是，农民运动时绅士们的心态与现在这些老优质生的心态，倒是惟妙惟肖地相似。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差质生比优质生矮人一等，没有多少发言权，抬不起头来，更别提什么接革命的班、掌革命的权了。而到了 1967 年上半年，过去的差质生们摇身一变，混迹于新优质群体里，俨然成了掌握清华大权、接革命班的新优质生。而原来的优质生身不由己地成了相对保守、右倾的新差质生，本来名正言顺的革命接班也成了泡影。这种身份的变化、地位的变化、前程的变化，是向来居高临下的老优质生们所没法接受、口服心不服的。

蒯大富、陈继芳等蒯派，原来就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与沈如槐、陈楚三等都是同属于优质群体的。这些在工作组时期当了几十天短暂差质生而今成为新的优质生，成为掌权者，414 中的老优质生们对他们的掌权是无法指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革命接班人行列的。对于他们的掌权，最多仅仅是对他们的个人品行有点微词（如对蒯大富）。所以，414 所说的痞子，并不是指他们这些人。

414 所说的痞子，主要是指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老差质生。痞子，就是对这类人的蔑称。因为蒯派掌权，老差质生又多跑到团派里来了。所以，团派（蒯派）掌权，也就是这些痞子得利、痞子翻身、痞子掌权了。

纵观两派头头，就我所知，老牌的差质生就我一个。我如果一直在团派总部，很可能，我就是最易被 414 攻击的痞子掌权的典型。

我参加 414 以后，也曾在大礼堂的讲台上用派性的“阶级分析法”为 414 卖力地鼓噪过。只是，我在文章中、讲演中，竭力避用“痞子”这一称谓，因为我心虚。我心里既否认自己是真痞子，又怀疑在别人眼里我就是痞子。我对“痞子”称谓有一种过敏的回避。

沈如槐、陈楚三等 414 头头和群众对我一直都是很尊重的。但是每当 414 批判团派痞子掌权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

看过我的回忆录初稿的许多朋友都说，当年无论老团老四，谁都不认为你老

孙是痞子，这痞子是你自己臆想的，痞子的帽子是你自己戴上去的。确实，我身上并没有痞气，相反，留给大家的是谦和、讲理等不错印象。但是，“痞子掌权”中的“痞”，并非只是形象谈吐上的“痞”，而是政治上的“痞”。

我想起我班的那些党员、辅导员等，他们太了解我了。像我这样政治上一贯认识模糊，是他们曾经帮助的对象，现在成了总部委员，成了他们的领导，他们嘴上不说，心里能服气吗？不管我是团派的总部委员，还是 414 的总部委员，就我现在成了总部委员这级别的“领导”，仅此一点，他们心里也是难以服气的，心态上的不平是可以想见的。我这样说，并非瞎猜，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毕业的时候，班上那些过去的优质生们，不管是老团老四，他们共同给我做了一个让我欲哭无泪的毕业鉴定。我在他们的眼里，依然是政治上的痞子。当然，这是后话。

第九节 两派争斗的三个关键词： 思潮、权力、利益

在此我对清华两派产生的成因和争斗的实质做一个比较简洁的表达：

团四两派的争斗，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新优质群体与原优质群体），成立各自的政治组织（兵团总部和 414 总部），为了维护各自群体的利益，提出各自的政治观点（“红线主导”论和“彻底砸烂”论），形成各自的思潮（团派思潮和四一四思潮），目标是为争夺清华文革领导权和革委会政权权力的一场斗争。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思潮、权力、利益。

思潮是派战的大旗，权力是派战的目标，利益是派战的目的。

思潮，即思想潮流。每派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观点的集合形成思潮。414 思潮的核心观点是“红线主导”论，团派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彻底砸烂”论。两者阐述充分，表达清晰，泾渭分明，发挥到极致。

两派为了表白自己的高尚，都一再强调清华两派之争是思潮之争，路线之争，不是你争我夺的权力之争，更回避背后的利益之争。但是，否定也好，淡化也好，都改变不了两派争斗的这一实质。

围绕干部问题的大辩论，主要是一场争夺文革领导权的斗争。纵队派与团派各自亮出自己的观点，打出自己的旗帜，以求吸引更多的群众，引领清华文革的方向，并为未来三结合的革委会中争取更多的权力做准备。

到了要联合，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围绕着实实在在的权力分配和今后的权益，两派的争斗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远比争夺相对比较虚的运动领导权要激烈得多。

团派要建立以蒯派为核心的占压倒优势的革委会。对于保守右倾的、原先一直视为非法组织的 414，让到 9:4 已经是底线了。团派绝对不肯退让到与 414 平

分秋色的对等。

414 对权力的渴望在这个时候同样是毫不掩饰的。对于 9:4, 414 并不是很满足的。414 力争的是对等。414 容不得在革委会里团派占有压倒多数的权力。《四项协议中》中没有加“正确”两个字给了 414 一个撕毁协议的借口。最根本的是，即使鱼死网破，414 也要阻止由团派主宰的革委会成立。

蒯大富必须争权。如果说，蒯大富在工作组刚进校的时候写在大字报上有关权的那段批语，还没深刻领会权意味着什么的话，被工作组整成反革命以后的蒯大富，是真正了解了权就是生存的命根子。蒯大富这个人有私权的欲望，但他主要的、更多的是为新优质群体而争权、而掌权。蒯大富反唐、反「八八」，表面上看起来是观点之争，本质上是不愿让「八八」分享权力，只想要「井冈山」（蒯派）大权独揽。蒯大富要权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当仁不让地争权。

沈如槐也必须争权。纵队派被迫解散，414 处处受压，这些都教育了沈如槐没有权是多么的痛苦。对权的渴望，为权而争夺，沈如槐一点也不逊于蒯大富。沈如槐也并不是为个人而争权，他完全是为原优质群体的翻身而争权。沈如槐要权的口号是要让更加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414 掌权。

连向来对权迷迷糊糊耻于谈权的我，此时似乎也清醒了不少，大谈权的问题。4月 18 日，“孙怒涛贴出【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兼评“权”】”[4-P161]。文中提出“左派分化论”，指出当前左派内部斗争的实质是“由谁来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在权力的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什么？那就是利益。谁掌权，或者说，谁在权力机构中获得多数或绝大多数，谁就争得话语权、决策权，它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就能得到保障。

关于利益，现在有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不少文革的亲历者都否认自己积极参加文革有私利的考虑。都认为自己一心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只是，文革错了，自己受骗上当了，但是参加文革的动机是纯洁的、高尚的、无私的。而在不少没有参加过文革的后人们看来，参加文革的人都是为利而去。文革中的种种因果，都是利益的驱动所致。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带片面性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参加文革的人，既非全是动机纯正思想高尚的无权欲无私利的“完美主义者”，也非都是利欲熏心追名逐权之徒。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确实都有很高昂的革命热情，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相当纯洁的革命动机，同时也有在革命外衣包裹下的强烈的政治利益诉求。

文革年代的利益，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利益，而是政治上的利益。那个年代的人，对金钱，对物质利益，远没有像现在的人们那么看重。在文革年代，甚至可以说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普通人对政治利益是极其看重的。

有谁愿意成为右派？有谁不愿意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右派的命运就是没有尊严、没有地位的贱民，就是贫病交困、难以自保的社会弃儿。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前途就是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受人尊敬、有好的工作和生活。在从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到差质群体中的落魄者的多个阶梯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想通过文革，通过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通过以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达到改善政治处境提升政治位能的目的。所谓“要求进步”，不就是优质的想变得更优质，差质的比以前少一点差质？所谓“害怕掉队”，不就是怕慢慢地或突然地掉到差质群体里，甚至成了右派学生？当我们经常说到“要求进步”、“害怕掉队”的时候，除了为党为国的纯正动机外，就没有一些为己的利益考虑？

我不是说，争取或捍卫个人的（政治）利益是可耻的、见不得人的。我也不是说，参加文革的人都是以此作为最主要原动力的。不少人说自己参加文革纯粹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因为强烈的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前途的责任感，是纯真朴素的理想追求和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承认自己有丝毫的利己动机和利益考虑。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强烈的权力意识，更不是想当什么山大王。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没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甚至，我也相信，确实存在一点私利都没有考虑的很纯粹的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对大多数积极参加文革的甚至包括逍遥派的人而言，谁能否认与一生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政治利益丝毫都没考虑过？

就说我自己，临毕业前，文革爆发了。才不过几天，反蒋保蒋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我“九评”学习中落下的政治“污点”只有在新的政治运动中才能洗刷清或洗刷得白一些。我积极地投入了运动。那种积极性曾引来根红苗正的优质生的侧目，引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警告。我参加文革，有没有私心？扪心自问，有！我既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纯正动机，内心也有将功补过的愿望。反蒯的时候，没与工作组站在一起，又被迫做检讨。我非常难过，既为自己没有在打退蒯大富猖狂进攻的战斗中为党出力而自责，也为又一次犯了错误、前途更加暗淡凶险而恐怖。我写了检讨，总想检讨得好一些，那样在运动后期就会网开一面，避免做右派学生的可悲下场。但是我没有灰心失望。《少数赞》中“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也“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这些都是我那时内心独白和真实写照。我非常想通过积极参加文革，把自己从差质群体中捞出来，回到优质群体中去，回到如高中和大学前几年受信任被依靠的政治状态。说实话，作为一个差质生我感受到无声的蔑视、鄙夷实在太压抑、太难受了。我害怕今后漫长的人生都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文革给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

当总部委员，那完全是偶然，得益于《少数赞》的出名。文革前的差质生当总部委员的，可能就我一个吧？我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是做“官”的料。做不做总部委员，当不当革委会副主任，对我来讲真的无所谓。我最在乎的是能不能重新成为一个党所信任的优质生。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对我来说就是做个党员，有尊严受信任地做点我喜欢做的技术工作。

团派骂 414 是“右倾复辟”，本质上没有骂错。这批旗下长大的优质生，少则已经乖乖地听党的话苦心修行了几年十几年。那些出身于双革家庭的，把上一辈老子的政治积累也算上，足有几十年了。这些原来的优质生才经过短短的半年时间，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掉入到新差质群体。原来铁板钉钉、无人敢抢的接班人位置也被新优质群体（团派）取而代之。他们不甘心沦落，他们努力要再攀爬到优质群体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团派一派掌权，414 中这些过去的优质生今天的差质生，不是能不能做接班人的问题，很可能处境将会进一步恶化。他们不愿意在团派的统治下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他们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文革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他们拼了命也要阻止团派一派掌权。他们确实有回复（难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复辟”）到文革前美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414 骂团派（主要是蒯派）是政治暴发户，本质上也一点没错。这些已经成为反革命或反动学生的蒯派，要按照以往的政治运动，最后是要打入到十八层地狱的。可是他们才经过几十天时间就平了反，才不过三四个月就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冠，接着又掌了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连那些老牌的差质生也混迹在团派中成了革命左派，不再低眉顺眼了。在 414 眼里，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路线觉悟可言，纯粹是政治投机投对了而已，更别说十七年的阶级觉悟了。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拼死也要保卫文革带给他们的胜利果实。所以，他们不能再被原先的优质生赶下台重新沦为差质生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 414 一派掌权，蒯派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次沦为差质生。这是团派（蒯派）坚决不能容忍的。

本来，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优质群体的利益与差质群体的利益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这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懂得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还能考虑、照顾到另一方的利益，那么他们在协商、妥协之后，是能够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获得如现在所说的双赢结果。

遗憾的是，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一分为二永无止境的斗争哲学。所以，团派的上台必然要让 414 变成受压的差质群体，414 的上台必然要让团派重新回到受压的差质群体。代表新优质群体的团派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会让 414 分享它的既得利益。代表原优质群体的 414 为了夺回原有的既得利益不能让团派一派掌权。双方不会妥协，也不愿妥协，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生死恶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宁愿做一场零和

游戏同归于尽，也不愿共赢共存、联合相处。

对于文革，有一种“新文革、旧政府”的说法。中央开大会时，在庄严的主席台上，左边坐着清一色的“新文革”，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这批左派，右边坐着清一色的“旧政府”，即老帅、副总理等。中央也是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绝不混坐，界线分明，形同水火，生死不容。清华的两派、两个群体，就是中央两派、两个群体在基层的反映。他们争斗的激烈和不可调和，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 414 这辆三轮战车的前后轮

414 总部成立以后，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很快建立起来，从各系建立的分部到总部的各职能机构。因为「414 串联会」在两个月的发展过程中，组织体系已经初成雏形，414 独立成总部后，再加以扩充完善，组织体系就比较完整了。

在我决心拉着「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搞 414 独立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在 414 总部里与「东方红战团」怎么分配权力的问题。那时头等大事是 414 独立出来以后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革委会的流产标志着 414 总部生存下去已经没有问题。我和汲鹏既没有权力的欲望，也欠缺组织能力。而「东方红战团」做组织工作的人才济济。尤其是宿长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总部、分部和职能部门，「东方红战团」的人占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两个战团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既然已经是同舟共济了，我又不擅长搞组织工作，所以没去过问分部和职能机构的组建。而沈如槐、宿长忠也是择优选用人才的。

「三七战团」的人数，也就十几个战斗组一百多号人。「东方红战团」有“三纵队”合并而来，估计人数会超过「三七战团」。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瞎估计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说，在 414 里，绝大多数群众是既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的。

就团派与 414 派相比较，团派是造反派中的鹰派、强硬派，414 是造反派中的鸽派、温和派。而在 414 内部，「东方红战团」是 414 里的鹰派，观点比较激进，态度比较强硬。「三七战团」是 414 里的鸽派，观点比较保守，态度比较温和。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都认同“红线主导”论，都反对团派的极左思潮。这是 414 的基本观点，也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为同盟的政治基础。但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还是有所差别的。

从组织成分上讲，「东方红战团」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过来的，他们与「井冈山红卫兵」没什么渊源。「三七战团」是由「天安门纵队」演变而来的，

而「天安门纵队」由隶属于三总部的战斗组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三七战团」里有属于「井冈山」的战斗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鹏、王允方等）、有我这样担任过「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所以「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相当感情的。

从政治观点讲，差别主要有两点：

在干部问题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保守得多。「东方红战团」的胆量与步伐显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不断提出一些新观点、新举措。有些观点很有新意，我们很支持的。有一些观点，我们一时也难以接受，于是就保留。还有解放干部的一些举措，如树立吕应中、谭浩强这样的典型，我很支持。但是对刘冰这样的校级“走资派”，虽然我经了解后知道他是工农干部出身，历史上没问题，但我认为在条件不成熟，超越了414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解放他的步骤操之过早、过急，反而会陷414于被动之中。总之，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东方红战团」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一直起着冲锋陷阵的带头作用。414在解放干部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应当归功于「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努力紧跟、积极参与、适度牵制。在团派极左的强大压力下，「三七战团」对「东方红战团」在干部问题上的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周泉缨在《必胜》中说：“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还‘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¹[2-P335]他所说的“你们”，主要是指团派这样的激进造反派，也多少捎带着是对我们说的。对于「东方红战团」为了与团派的极左划清界线而拼命向右的倾向，我们是十分担心的，生怕414过于右倾被团派坐实了“右倾复辟”的罪名。

在对团派的态度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温和得多。「东方红战团」对蒯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蒯派掌权从心眼里不服气。周泉缨“团派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这样极端的观点，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层中居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东方红战团」的大多数头头都是原来的优质生，他们对蒯派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对原来的差质生似乎有着一种斜眼瞧人的轻蔑感。团派与414的对抗，实质上是蒯派与「东方红战团」的对抗。他们之间是互不妥协的。「三七战团」对团派的判断和态度，远没有「东方红战团」那样的严厉和强硬。

正因为有这样两点主要的差别，我，还有「三七战团」，常被个别「东方红战团」的朋友调侃成是“团老四”，意思就是观点和情感都偏向老团的老四。

尽管414绝大多数群众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东方红战团」或者「三七战团」，但是在观点上，不是倾向「东方红战团」就是倾向「三七战团」。一个团体中，

¹ 当年《必胜》中这些极右言论是严重脱离414群众，也是笔者无法接受的。现在看来，应当承认这些言论充分显示出作者当年的勇敢无畏和思想前瞻。

中间群众总是占大多数的。414 的大多数中间群众的观点都是偏向「三七战团」的。但是因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和战斗组，他们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在 414 总部和机构里又占着大多数，所以 414 的基本走向是由「东方红战团」决定的。「东方红战团」明白「三七战团」这一同盟军对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对我与汲鹏一直比较尊重。对于「三七战团」所代表和反映的 414 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也能倾听一部分，并在行动上做适当的调整。

虽然「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之间有分歧、有争论、有时候甚至偶有争吵，但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共识。大家都明白的，在团派这个外强的巨大压力下，「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已经同坐到 414 这条船上。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彼此的政治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共性大于差异。所以 414 内部，整体而言是团结的。

414 总部成立以后，我不知道「东方红战团」是怎么运作的。我对「三七战团」过问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们在负责。尽管有时候会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动已经远不如 414 总部成立之前了。因为我认为，「三七战团」在观点上与「东方红战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是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三七战团」没有必要过多的独立活动，这样对于维护 414 内部的团结是有利的。

一个组织的核心层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公开的不同的两派，只要处理得当，是利大于弊的。当然，首要的一点是这两派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各自代表的利益。其次，占优的这派不能以势压人，要尽可能照顾到少数派的利益诉求。少数派也不能处处发难事事计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应该是起建设作用的少数派。我当时就想过，要是 414 全按「三七战团」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后怕狼似的温吞水一碗，永远不会有大的作为。要是全按「东方红战团」的去做，也可能脱离了大多数 414 群众的接受程度，会陷于孤立冒险的危险境地。

如果把 414 比作一辆战车的话，「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是这辆战车的前后轮。「东方红战团」是前轮，冲锋陷阵，基本决定着 414 前进的方向，「三七战团」是后轮，承载者 414 的大多数群众随着前轮前进。当然，这里说的前后轮只是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414 的方向，「三七战团」同样是参与决策的；414 的群众，「东方红战团」也同样承载着。

第十一节 陶德坚和「红教联」，我倾力批判过

清华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在文革中的表现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了以教师为主的战斗组。其中有两个战斗组闻名全校，因为它们曾一时成为学校运动

的焦点。

一个是由动农系的青年教师倪振伟为首的「二万五千里」。他们在 1967 年初兵团总部整风的时候，因为批评总部的错误、反对否定「八八」招致总部的打压。总部的「二办」以「二万五千里」攻击总部为由通令解散该战斗组。更可笑的是总部以对待「二万五千里」的态度作为干部亮相的试金石。这一通令引起轩然大波。支持总部决定的与反对总部通令的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大多数战斗组发表声明认为总部的决定是错误的，而在“总部委员中仅孙怒涛一人不同意（解散）” [4-P151]。一个战斗组，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仅仅是因为对总部有不满意见，即使尖锐一点，也不能通令解散的嘛。可见当时总部在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上是多么的横蛮霸道！为此事，我曾找过住在校内招待所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把总部会议上各种不同意见向他反映，希望上面了解并阻止蒯大富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张广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连同我提交的材料装入一只大信封内，上书“戚本禹同志收”。「二万五千里」后来成为「414 串联会」的发起战斗组之一，一直是 414 中非常活跃的教师战斗组。

另一个战斗组是由土建系的青年教师陶德坚为首的「红教联」。它是团派观点的。这次是轮到 414 对「红教联」倾力批判，大力打压了。在这个问题上，「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要批「红教联」？我对「红教联」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一是他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里面找”的口号；另一个是他们搞了为陈里宁¹翻案的行动，影响很轰动。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红教联」提的这个口号确实是出自他们之口还是 414 的一些战斗组把「红教联」大字报里的“素材”经过“概括”、“提炼”以后再加给他们的。在两派论战中，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等手法是常用的，两派都有。所以，414 对「红教联」的批判声讨中，肯定也会有许多不实的地方。但是，「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我们认为「红教联」的这个口号与团派的“大翻个儿”、“彻底砸烂”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为陈里宁翻案的行动则为这个口号做了最好的注解。

414 打压「红教联」还有一个原因是「红教联」的成分复杂。为首的陶德坚虽然是党员，但是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受到过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一政治“污点”让她一下子从优质群体中除名，成了差质生。她是「红教联」的头头，这一条辫子，足以把她为陈里宁翻案的动机说成是对党不满、向党反攻。

「红教联」组织上是属于团派的，「红教联」观点上是属于团派思潮的。所以，

¹ 陈里宁原是湖南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文革前他因反刘少奇而被投入监牢，后认为他有精神病而转至精神病院。文革初，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作为反刘少奇的英雄而翻案成功，被誉为“新时代的狂人”。最后又发现他还涂改毛泽东著作而再次入狱。这是文革中发生的一出具有轰动效果的典型闹剧。

无论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还是出于派性利益，414 是必然要打压「红教联」的。批「红教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批团派。「红教联」只不过是一个把柄很多、极易击败的现成靶子。「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对「红教联」的看法高度一致，动员 414 力量，对「红教联」口诛笔伐，其声势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而团派，用不着详说，当然是死保「红教联」的。

414 在主楼前召开过“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这事我是赞同的。但是把陶德坚拉到会场上进行批斗，显然是错误的，我并不赞成。

我现在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政治观点，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的碰撞、争论是必然的。在法治下的言论自由，就是人人有批评的权利，人人也有辩护的权利。摆事实讲道理的争鸣、批评甚至批判都是有助于社会进步，有助于彰显真理的。遗憾的是，文革年代缺乏这样的大环境，于是 414 与「红教联」之间的争斗，其实也是与 414 与团派的争斗一样，是既有正常的政治观点争辩，又交织着浓厚的派性色彩。

414 在批斗中揭露「红教联」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 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 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 7%）”[4-P179] 拼凑起来的。这样的组织成分让「红教联」更不堪一击。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怒涛」战斗组曾被讥笑为“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怒涛」与「红教联」其实是“一路货色”，可是我这个「怒涛」的头头却在振振有词地严批「红教联」的头头！我当时觉得「红教联」就是该批，批得有理。在我的脑海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罪不可赦的，在反右运动中犯严重错误也是错不可恕的。在这些比我更老的差质生面前，我似乎产生了虚幻的优质生的良好感觉。其实，我在优质生的眼里，离右派也不过五十步路，与陶德坚差不了多少。由我这样的差质生坚决打压陶德坚这样的差质生，看上去既悲哀，又滑稽可笑。

我粗粗看过陶德坚写的自传《风雨人生》。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地位已一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 414 的极大打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但她一再表示相信党、忠于党，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从她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恶魔，是人民的死敌，因而我对他们无比的痛恨。这当然是党长期灌输教育的结果。今天重新审视，事实上，这是一群听从党要开门整风的号召，出于热爱党、相信党，对党提了些意见、建议、批评的人。党把这些用“阴谋”引出的“蛇”统统打成

右派分子，这是执政党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几十年后，为了掩盖错误，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证明仅仅只是犯了一点扩大化的过失。一个政治运动，把99.99%的不是右派的人都被“扩大化”成右派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可笑的狡辩吗？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右派已经摘帽了，但不是平反，好像右派分子还是有罪的，只不过是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这让我联想起蒯大富尽管由周恩来亲自平反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东西”，很是相像。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这批被错整的右派分子，总体而言，比当时的大多数人更能独立思考，更敢于讲真话，更有批判精神，以及更强的公民意识。他们是一批正直、真诚、勇敢、有良知的中国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无辜的，无错，更无罪，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

右派分子是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痞子”，是一批新社会的贱民。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状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人间悲剧！

第十二节 “揪刘火线”，闹哄哄的政治庙会

1967年7月初，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的市中心，在被赭红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南海，在面对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始作俑者是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

1966年8月3日，刘少奇与他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谈过话。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谈话理所当然地成了他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证”。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一直要求刘少奇做检查。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刘少奇不得不在1967年7月8日写了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问题是，新八一团是从老「八一团」分裂出来的。刘少奇的检查只向新「八一团」做，老「八一团」怎肯罢休？于是，7月9日，老「八一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刘少奇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他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向“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是，刘少奇无论做多么深刻的检查，上面的中央文革，下面的造反派都不会饶过他的。他的检查被批判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新一轮“革命大批判”的“反面教材”。可能刘少奇根本就搞不清新老「八一团」之间有什么差别，他的检查书只写给新

「八一团」又落下了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名。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团」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

这消息一传开，很快引起北京各大中学、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仿效。一些造反派赶去声援，划地为营，竖旗为寨。短短几天功夫，各色人等赶往府右街“参观”，热闹非凡。

这就是初成气候的“揪刘火线”。

几天后，刘少奇的检查传到清华。团派闻风而动，于 14 日进城示威游行，反击刘少奇的新反扑。414 消息滞后，行动迟缓，群众不满，总部被动。

沈如槐对我说，既然已经被动了，就不要着急，跟在团派屁股后面跑永远都被动，还是等一等，看准了时机再行动。

当我们得知建工老「八一」在中南海西门的静坐示威得到中央首长的肯定时，18 日晚，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参加“揪刘火线”，既是抓住大方向，又能改善 414 以往在人们中的右倾形象，同时也有别于团派的进城游行。于是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召开声讨刘少奇的誓师大会，下午进城游行，晚上进驻中南海西门。任命刘万章为总指挥，蒋南峰为副手，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几乎在同一时刻，团总部也作出了相类似的决议。

19 日，414 与团派两支路线相同、规模相仿、目的地一致的游行队伍前后出发。团派手握全校的资源，先遣部队乘着四个轱辘的汽车飞速前往。414 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徒步或骑自行车前往，很有点“土八路”与“国军”赛跑的架势。巧得很，那天正好有一支机械系的 414 小分队在城里活动。他们自作主张地打着 414 大旗去了中南海西门，所以比团派的大部队早到了片刻。这着实让 414 自我陶醉了一阵子。

清华两派没去之前，驻扎在“揪刘火线”的造反派队伍不过二三十家。团派到西门以后，联合北航「红旗」，召开了很有声势的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两校发言。晚上，414 联合新人大、林院等单位，发起成立了「揪刘火线联络站」，并组织了有五千余人参加的声势更为浩大的誓师大会。

清华两派的同时出动产生了极大的带动效应。各路造反派争先恐后，纷纷跟进。以后短短几天功夫，进驻的造反派达到近一千家。顿时，府右街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旌旗招展，喇叭震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层层叠叠，连营结寨十几里，棚子搭起七千多。即使是天桥庙会，也没有这样的闹猛。

刘少奇在围墙里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揪斗，拳脚相加，脸青鼻肿，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围墙外“打倒刘少奇”的呐喊声。

在那一段时间里，校内的运动已经不是中心了，两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揪刘火线”上去了。

在“揪刘火线”的现场要经常开大批判会。总部交给我的工作是组织大批判稿件。那时校内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多得是，组织几篇稿子不成问题。说实话，在乱哄哄熙攘攘的露天开大批判会的场合，并不要求批判稿有多高的水平，因为谁也没在那里认真听，只要能造出声势来，标语口号式的，套话官话废话的，都一样管用。

“揪刘火线”本是批判刘少奇的战场。中央文革本来也希望通过共同对敌，促进两派的大联合。但是，很快地，对敌阵地变成了两派内斗的战场。不仅清华两派如此，许多单位也是这样。那时已经有天派地派之分了，整个“揪刘火线”形成天地派两大阵营，活动有各自的联络站在组织。各个造反派嘴里喊着“打倒刘少奇”，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对立派的气势压下去。互相冲击批判会场的有之，高音喇叭对骂的有之。在中南海里能听到这些的刘少奇本来应该有一丝窃喜的心情。可惜，他过的是度日如年的难熬日子。

我到“揪刘火线”也去过几次。既是为了感受现场的革命气氛，也是看看414做得怎么样，还需要做点什么。由于414进驻的时间比较早，414的指挥部设在府右街旁的丰盛小学里，在府右街上还划了一块十几平米的地盘作为前线阵地。

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闹得交通堵塞，鸡犬不宁，并有向北门、南门蔓延之势。本来想集中矛头对准刘少奇的，没想到，倒是引发了两派更多的内斗。中央文革为如何收场而煞费苦心。正好，快要到8月5日了，那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纪念大会，然后要求各个造反派在会后都从“揪刘火线”体面地撤回去。

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揪刘火线联络站」也分到二张。照理说，414是联络站的发起单位，是应该分到一张票的。但是自北师大加入联络站以后，以谭厚兰的名头，处处排挤414，力图主宰联络站，引起我们极大的不满。这次分票，北师大暗中搞鬼，414一张都没分到。沈如槐要蒋南峰无论如何也要弄一张来。蒋南峰以联络站召集人名义重新开会表决，终于争得了极其宝贵的一张票。

当蒋南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时侯，我先明确表态，应该是沈如槐上天安门城楼的。沈如槐谦让说，还是你老孙去吧！蒋南峰开玩笑地说：“这票是我抢来的，你沈如槐不上，那就我上了！”说心里话，我内心是特别想要这张票的。那个时候上过天安门城楼的清华学生，除了蒯大富，屈指也没几个人了。更何况，还能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是一份多么高尚的幸福和荣耀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代表414去的。只有一把手才有这个资格，我是不能有这份妄念的。

1967年8月5日，在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一

周年的天安门集会上，沈如槐代表 414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瞅准时机把 414 袖章送给了周恩来，还与他谈了几句话。蒯大富上天安门，对团派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的新鲜和刺激。沈如槐上天安门，对 414 来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份自我陶醉，团派要是见了，准会撇撇嘴的。

大会以后，各造反派纷纷拔寨回府，历时近一个月的这场闹剧终于收场。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第十三节 痛惜英才早逝，缓步走进李嘉落的灵堂

1967 年的秋天，在武汉 7.20 事件¹前，学校里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武化革命”论调的大字报，414 总部和我对此都是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7.20 是一个突发事件，总部研判了形势，认为要关注外地的武斗形势，但是仍然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主要方向，所以主要精力依旧集中在“揪刘火线”上。

7 月 31 日晚上广播了《红旗》杂志 12 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席卷中国。

我们都认为两报一刊社论代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414 对这样的大道消息是极为重视的。我对《红旗》社论更有兴趣，更多一份信任。如 1966 年 10 月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三期社论、1967 年 2 月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第四期社论，都对我研判大局紧跟形势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我对《红旗》社论的这个新口号和新动向没有什么疑问，认为这是下一阶段的运动方向。

早在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到过：“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既然党内有一小撮，政府里有一小撮，那么军队里肯定也有一小撮，这样的推断是顺理成章的。

在这篇社论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首长的鼓动下，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认为下一阶段的运动重点就要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了。

清华的团派和 414 派都不甘落后，团派表现得更胜一筹。团派早在外地建立了不少联络站，财源充足，于是大批人马去外地揪军内一小撮去了。8 月 3 日上午，414 在西大饭厅召开了战士大会。会上，群众强烈要求派人去外地，炮轰头头思想右倾、行动迟缓，落在团派的后面。头头感到压力很大。

8 月 6 日上午，414 召开了一次全体总部委员都参加的非常重要的会议。沈

¹ 1967 年 7 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湖北的文革问题。7 月 20 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冲击武汉军区和毛泽东下榻的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并抵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精神。当时中央称这一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如槐传达了8月5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的周恩来回答蒯大富等提问时的谈话。沈如槐说，中央没有让大家出去搞第三次大串联的意思。大家分析、研判，一方面感觉到中央似乎并不鼓励大家去外地揪“军内一小撮”，另一方面又看到在《红旗》社论的鼓动下，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日盛一日。总之，去或不去揪“军内一小撮”，似乎都有道理，都有依据。但要是什么都不做，在这样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中明显落在团派后面，将来会很被动。在矛盾、纠结之中，总部最后决定先派一些人到外地去看看当地的情况。

一讨论到要派一些头头出去，总部里的学生头头们都争着吵着想出去，认为留在学校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连沈如槐都说想出去外地调研。这一来更吵翻了天。谭浩强、胡大炘等干部问，还要不要坚持搞大批判了？傅正泰老师说人少也要坚持大批判。学生头头与他们吵，说他们是书呆子气。龙连坤生气了，拍着桌子说，都吵什么啊？我也发了脾气，说你们都要出去，我也不干啦！总部会议开成了一锅粥，没形成定论。

8月上旬，414先后放了四五批共二三十人去了外地¹。总部委员中，沈如槐、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章、张雪梅、王永县、吴栋、郭仁宽等多位总部委员也多以视察联络站、调研当地形势的名义去了武汉、南京、广州、哈尔滨、长春、沈阳、长沙等地。总部要求出去的委员对各地军区领导，先认真调查研究，该保的一定要保，确有问题的也要揪。总部委员中，傅正泰、李秀英、魏洪波、谭浩强、李振民等干部、教师都没出去。学生委员中，我、汲鹏、蒋南峰、周泉缨、黄瑞和等都留下来了。

我之所以没出去，并非是因为路线觉悟高，而是因为我向来对打打斗斗揪揪这类事情没多大兴趣，更别说是要我去涉足我不熟悉的外地和我一无所知的军区问题了。我觉得批斗刘少奇、解放干部这些事情也是大方向，总得有人做。要说兴趣，我对清华的两派斗争性质的研讨可能更有兴趣。此外，那时的我，革命激情已经减退了许多，远非1966年下半年的时候可比。就这样，我就待在学校里，哪里也没去，哪里也不想去，坚持做点大批判的工作。我还把很想到外面去转转的汲鹏也劝阻下来。

因人员外出过多和注意力的转移，所谓大批判只能是维持一个门面，清淡了不少，两派的派战无形中也缓和了不少。

8月10日，414总部办公室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通知，要414派代表出席当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首长接见。当办公室的赖老师告诉我沈如槐不在，我才知道他已经去了外地。我先到市革委会取了票，接着赶到人民大会堂。那晚，

¹ 这四五批人是总部批准给了经费带了任务出去的。414经费紧张，囊中羞涩，没能力派更多的人。至于下属的战斗组及个人自由出去的，那是很大的数量，绝非几十个人。全校外出人员共约7000人。

中央首长听取大家的汇报。第二天，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长篇报告。他批判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的错误论调，并且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他在报告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说了，揪“军内一小撮”是自毁长城！他要求各个造反派组织不要再派人到外地去，已经派往外地的人员要全部撤回来。

我觉得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的明确指示实在太重要了！那时候还没有随身可携带的录音机，全靠在小本子上记录。我没练过速写，但是我记得飞快，把讲话要点都记录下来了。回到学校已是深夜，总部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在等着我的消息。我简单地把周恩来报告的精神传达了一下。第二天上午召开 414 的全校大会，“孙怒涛传达首长讲话，号召全体 414 战士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努力学习首长讲话，搞好革命的大批判。”[4-P245]接着我连夜把笔记本上的速记稿改写成比较通顺完整的记录稿，并录了音，在 414 广播台上反复播放。之后，在《井冈山 414 报》上登了启事，又叫蒋南峰通知在外地的人员速速返校。同时，赶紧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牵头单位「海直红联总」拉关系，并组织了一些拥军活动。

就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很快平息下来，在外地的人员也陆续返校。

8月7日凌晨，团派的李磊落在湖南常德的一次“战斗”中不幸去世。我不知道这次“战斗”是不是与揪“军内一小撮”有关。我从团派的广播中得知他是站在汽车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向前冲的时候被机枪扫射中弹倒下的。这以情节我至今还记得。

我与李磊落并没有很深的交情，仅仅是一面之交。王允方与李磊落很早就相识，他们是学校乒乓球队的好朋友。他曾带着我找到李磊落的宿舍，想认识一下并看看李磊落能不能也来「第一湘江」。

李磊落是一个长得清秀很聪慧的小伙子。他走了，我心里很难过。

8月13日，团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李磊落为“革命烈士”，并在二教的二楼为他布置了灵堂。那几天，团派广播台广播的都是悼念他的文章，不时捎带着几句对 414 不太友好的话语。

我不认为李磊落是英雄、是烈士。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团派我才这样认为。但是我还是非常痛惜他，因为他是一位仅仅见了一面就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朋友！

那天晚上，我在二教的楼下徘徊了好久，心里想着要不要进去表示一下我的哀悼。作为 414 的头头，我这样去吊唁合适吗？团派会对我白眼吗？会把我轰出来吗？414 知道了又会怎么想？我有很多顾虑，我犹豫不决。后来我想，虽然我与李磊落的派别身份不同，但是毕竟是同学，是朋友。我并不是代表 414 去的，我只是以一个与他相识的同学身份，去表达一下我的哀思。

踏进二教大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上走。当我走上二楼出现在灵堂

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守灵的团派同学眼神中满是惊奇和狐疑，怔在那里盯着我。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我。他们用眼神在问我：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只是，在肃穆的灵堂里，谁也不便说话。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不再理会他们的眼神，缓缓地走到李磊落年轻英俊的遗像面前，默默地注视着他，有好一会儿。然后向他低头、默哀、致礼。礼毕，我回身，缓步下楼离去。始终，我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清华英才，他倒下了。很可惜！很不值啊！

我没有向任何一位老四说起这件事。我估计看到我来吊唁的这几个老团也没有传播这件事或者拿这件事炒作一番。在不幸死难的同学面前，派性是渺小而丑恶的。

第十四节 中央首长排排坐，我亲见的周恩来

自从 414 独立以后，我作为 414 的头头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机会多了不少。

毛泽东、林彪都是深居简出的，我从来没受过他们的接见。他们之下的中央首长，我几乎都亲眼见过。

江青在接见的时候最喜欢讲话或插话。如果说第一次在静斋的接见我对她很有点好感的话，随着此后对她在公众场合印象的减分，随着她对蒯大富的态度越来越偏袒，以及她在接见的时候矫揉造作，在言语间常常挤兑周恩来，我对她慢慢地反感起来了。但是我知道她是毛泽东最亲密最信得过的身边人，我对她是绝对不敢流露出一点点反感的言词的。

有的中央首长说话不多，但是留下印象很深刻。如康生，给我的印象是城府极深，特像某一部电影中演反派角色的国民党军官，总是阴沉着脸。那个特别喜欢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像个迂腐的老夫子，看上去倒是很和善的。

还有好几个首长好像是陪坐来的，从来不说话。他们在我们面前虽然是大首长，在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面前，他们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小学生。所以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像泥塑的菩萨，端坐在那里。除了眼珠子会动，全身基本不动的。那个空军司令吴法宪，脑袋上小下大的，特像我在外国历史课本中见到的有个叫路易菲利普国王的样子。我瞎想，看上去这么蠢这么笨，难道真的是一个特能打仗的四野纵队司令？

真正让我从心眼里钦佩崇敬的中央首长是周恩来。

他在 1966 年 8 月份两次在清华大操场的报告，感动了所有在场的清华人。那时我在台下，只能远远地倾听着、敬慕着。

当其他的中央首长在接见的时候都是高谈阔论“抓革命”，只有周恩来，除了讲“抓革命”以外，总要强调“促生产”。作为一国的总理，他不能不想着几

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他殚精竭虑地苦撑着文革的大局，那份劳心劳力，让我无比敬重。

当然，我敬佩他，还有派性因素。总感觉到我们与他的思想是共鸣的，总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同情 414 的。那时，一个不对 414 无端指责的中央首长，足以让我对他感激万分了。

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里，能经常受到他的接见，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能亲眼看到满脸疲惫又强打着精神倾听大家的发言，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从不以势压人地做指示。我的心里只有感动、钦佩和崇敬。

记得有一次接见过程中，周总理起身向边上走去，可能是想到卫生间去。走到半途，忽然听到接见的人群中不知那个造反派唱起了国歌。我远远望去，听到国歌声的周恩来马上停住脚步，端着右臂，一动不动地凝立在那里，直到这边唱完以后才再起步。那份不留下一丝把柄的小心谨慎，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如果接见的时间比较长，中场会有短暂的休息。这时总会有一些人奔向不同的中央首长前去请教、提问、反映问题等等。围着周恩来、江青的人总是最多的。有一次，我，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都围到周恩来的前面。我们与他之间，只隔着一排当作主席台的条桌¹。他站在条桌后面，上身前倾着与我们说话。我也前倾着，与他脑袋的距离也就是三四十公分。我非常想与他说句话，但是胆子小，怕我提的问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别的人一点也不胆怯、不客气，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地不断问着。我就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不停地扫视着他修过脸以后带点青色的络腮胡子根茬茬，还有浓密的黑发和已有点花白的鬓角，看着他深邃的眼睛，听着他微带一点南方腔的浑厚男中音，我心想：这是怎么样的一颗充满无穷智慧和神奇记忆力的脑袋啊！我为自己能这样近距离地与敬爱的周总理面对面亲密接触，感到无比幸福和荣耀。中场休息结束，我们依依不舍地回到座位上。我忽然想到，真正需要休息的是周总理，可是他连这一点点可怜的休息时间都被我们挤占了。我很难受。此后，再有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宁愿远远地看着，再也不忍心上前去挤了。

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心力交瘁地硬撑着。我亲眼见到他在接见的时候，太累了，用小方巾擦一把脸。太饿了，摸块饼干往嘴里填。十年文革，把一个神采奕奕、俊美帅气、精力充沛的周总理活活地累死了、气死了！

那个时候，我把毛泽东奉为敬畏的神，把周恩来奉为敬仰的圣。现在，神已经跌下神坛，圣也已经走下圣坛。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真相以后，我才知道周恩来也是有错误、有缺陷的，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他不是完人，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¹ 在安徽厅接见的会场十分简朴：一长排条桌上盖着白布，后面坐着中央首长。每位首长前面一般放着几支铅笔，一个茶杯，还有一个小碟子，上面是一块湿的小方巾。

他依旧是一个伟人。

第十五节 414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 是我稀里糊涂拍的板

1967年8月22日下午，414正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组长会议，议题是讨论全国形势，讨论大批判如何深入。这样的会议，只要有空，总部委员都会参加的。只是，这期间外出的总部要员比较多，沈如槐就因为去外地没出席这次会议。

我、汲鹏、龙连坤等坐在前排，便于商谈和掌握会议。会议从二点左右开始，到四点多钟，快结束了，忽见蒋南峰从外面快步进来对我们说，今晚外面有一个行动，问我们参加不参加。

蒋南峰是414的对外作战部部长，凡社会上的事情都是由他在负责的。

我们叫他说详细点，他叫与他同来的一位姓汪的女同学给我们几个总部委员介绍情况。她说，她参加地派外事口的「反帝反修联络站」，联络站决定今晚搞一个全市性统一行动，到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抗议集会，声援港澳同胞的反帝抗暴斗争。如果参加，派个200人左右的队伍就可以了。

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觉得可行，都同意了。我想，这是反帝的行动，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我叫她到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总部的几个人在下面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她在台上讲了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后，又提了几点注意事项。她说，去的人最好穿黑色的衣服，带一些诸如改锥、虎钳之类的工具，带一个书包，如有文件就装到书包里带出来，以便搞到英国人在中国搞间谍活动的罪证，那样他们就无法抵赖了。

这些注意事项都是她从联络站那里听来传达的。台下的人听到这些，顿生疑窦，纷纷给我们递条子，有好几张。问，为什么行动搞得那么神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行动中央同意没有？当时我们心里也有点嘀咕，于是又商量了一阵。我们猜测可能是要冲进去。那个时候，冲这冲那的都是平常事，冲进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别的造反派连国家机关、军队大院都在冲，都可以抢档案的，这个小小的帝国主义的代办处有什么了不得的？冲不得的？

在场的总部委员有的虽然有一点疑虑，但是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大家都看着我，意思是要我拍板决定。

如果有沈如槐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只发表我的意见供他参考，最后的拍板肯定是由他来做的。他是一把手，掌控全局，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也多。现在

他不在，我是二把手，不想拍板都不行。

我本人是同意这次行动的。因为，明摆着，行动的矛头是对着英国佬的，大方向肯定没错，是一次革命行动。这次行动要是不知道，没碰到，那是另一回事。既然知道了，碰上了，能不参加吗？

团派常常在社会上搞轰动性的大动作，其影响是 414 没法比的。414 难得有在校外出头露面的机会。虽然这次行动不是 414 策划、组织的，也不是主角，但是要是能参与进去，给中国人长志气，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也是给 414 长脸呀。

况且，在场的总部委员最多是有点疑虑，并没有反对意见。他们等着我拍板，只是尊重我罢了。如果因为对这次行动的具体做法有点疑虑而不敢参加的话，那我在大家的眼里真的是一个连一点责任都不敢承担的胆小鬼了。

于是，我跳上台去，宣布 414 参加今晚的反帝革命行动，由龙连坤和数力系的分部头头带领 200 名数力系的 414 战士前往（总部委员讨论的时候没委任蒋南峰带队，他说他是临时被人拉上车参加了这次行动）。我没有对递上来的条子做解释。因为我不知底细，也没有时间去搞清楚，所以解释不了。我只是要求参加行动的人服从指挥、相机行事。

实在说，我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只想着大方向这一点。根本就没有想到，使领馆，相当于外国在中国的“领地”。非法闯入国家机关、军事要地，怎么讲也是内政，而非法闯入使领馆，就是外交事件了。也没想想，有那么多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万一场面失控，怎么办？

当天晚上，果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事件的前因后果大致是这样的：¹

1967 年 8 月，港英当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几家左派报纸，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多名记者及报社工作人员。8 月 20 日，外交部（此时已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了权）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限令 48 小时内解除对报纸的封查令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通牒。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外交部造反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与北京高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联合，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8 月 22 日晚，联络站组织了一万多人，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

¹ 关于 414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具体描写，最早且产生极大影响的出自韩丁所著的《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1971 年夏天，韩丁访问清华大学，采访了工宣队安排的几个人，其中有高衡庆（音译）。他以 414 总部值班人员和“火烧”事件直接参与者（口气中似乎他是带队）的身份向韩丁讲述了 414 参与“火烧”的经过。笔者必须负责任地指出，他所讲述的与事实严重不符。韩丁采访期间，对“火烧”事件最了解的蒋南峰、龙连坤和笔者这几位 414 总部核心都在学校，可惜没人来了解此事。现今，笔者和蒋南峰还健在。尽管我们在一些细节的记忆上有出入，但一致认为收录在韩丁书中的由高衡庆口述的有关 414 参与“火烧”的描述不足为信。

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然后，包括 414 在内的多个造反派组织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也越过围墙，突入院内，进行打砸抢活动，殴打了英国代办和工作人员，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23 日凌晨，当周恩来得知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极其气愤，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第二天，我在动农馆的 414 总部会议室里，听了龙连坤的汇报。他大发牢骚，对这次行动非常不满。他说现场秩序很乱，多次广播总理的指示，都不听。别的红卫兵带头一冲，414 的队伍也被冲乱了，失去了控制，随了大流。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感觉有点不妙。

随后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第四版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从字面看来，这个行动是得到中央肯定的，我心稍安。

再后来，陆续听到了一些中央首长对这次行动批评的消息。我心想，大方向是对的，最多是有点过头了。我们对这件事一直没有做过像样的检查。即使后来的大联委的学习班上、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虽然做了点检查，也是很肤浅的。

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的内乱，这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也就是隔岸观火瞧瞧热闹而已。现在，居然连最起码的国际惯例都不顾，把别国的代办处给烧了。这样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17-P64]

为什么以温和著称的 414 也积极参与这一的极端行动？为什么以反极左思潮为旗帜的 414 干起极左的行径来一点也不比团派逊色？根本原因在于在文革的左倾路线下，极左思潮无孔不入，侵蚀每个红卫兵组织和个人。414 未能幸免，我也深受其害。我根本就没有“外交无小事”这根弦。虽然反感打砸抢活动，但是觉得对帝国主义的代办处，即使冲冲打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414 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铸成了“四派自身历史的最大耻辱”。[17-P64] 是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应当承担全部领导责任！至于事后受到严厉审查和追究的如蒋南峰、姓汪的女同学，他们都只是具体的经办人员，责任不在他们。

在清查五一六中，我如实地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我在其中的作用。奇怪的是，专案组对我的这件事并没有过多的追究。相反，并非应该由我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揪刘火线”，在我的清查结论中反倒榜上有名。

第十六节 毕业分配，我与杨继绳的各自际遇

1967年春，我在大字报区看到一则「66届毕业生串联会」的公告。公告称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1966届大学毕业生能尽早毕业分配。

从「八八串联会」、「八九串联会」开始，不同名称的串联会常常出现。譬如，总部整风的时候就有「整风串联会」。这些串联会都是政治性质的。像这样与文革运动无关仅为某个特定目标而结成串联会的，这是第一个。新鲜！

那时，我的革命热情正高涨着呢，看到一些人嚷嚷着要毕业分配，有点不解，也有点不屑：怎么觉悟这么低的呀？在毕业之前遇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怎么不好好参加，还想打横炮干扰呀？

我也就是想想而已，没去理睬它。那时我正忙于与总部论战，忙于414的事情。

没想到「毕业生串联会」的生命力还挺强的，得到了绝大多数6字班毕业生的拥护和支持。团四两派在政治观点上尖锐对立，但是6字班的老团老四在毕业分配上的立场高度一致，大家都想快点毕业离校参加工作。

想想也是，对于6字班的大学生，如果文革推迟二三个月，早就毕业分配完毕，到工作单位报到去了。每月46元（北京地区标准）的见习工资也早已拿上，能自食其力，不再依赖父母了。该找对象的就找对象，该结婚的就结婚，该干嘛就可以干嘛。

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聂元梓的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把我们如期毕业的美梦给毁了。

原以为运动搞上一两个月，顶多一年半载就会结束，现在看来遥遥无期。

6字班这些应届毕业生，正常的都读了18年的书，年龄都已经到了25岁左右，大一点的近30岁了。1966年至1967年这一年，说是学生，书早就读完了，也不读书了。说不是学生，还没分配，还没参加工作，更没拿到工资。内心的那份焦急，是实实在在的。只是大家觉得很无奈，也不敢大声说，怕被人说成对文革的不满。

7字班8字班的低班同学，他们也很同情6字班的。因为6字班能不能分配，与他们的关系大着呢。6字班不毕业，他们就更甭想毕业。总没有大闺女还没嫁出去，让二闺女三闺女先出嫁的道理吧？

「毕业生串联会」是由数力系6字班的石福庆发起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干劲也很足，居然把北京市几个高校的毕业分配串联会串成了校际的串联会。到8月份，还真的拿到了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的文件。

学校被两派瓜分着、割裂着。石福庆明白，没有两派的支持，是搞不成毕业

分配的。他“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15]开联合会议。414 总部研究了此事，认为这是一件与毕业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应该解决的事情，所以决定给予支持。这样，在校、系、专业各级成立了由干部、教师、学生参加的团四两派基本按对等原则组成的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我作为 414 的代表参加了校领导小组。

应届毕业生要分配了。这对团派的影响不大，因为团派总部的核心委员都不是 6 字班的（只有李国柱是 6 字班的，但他只是一般的总部委员）。对 414 的影响超级大。414 总部的核心组中，有我、陈楚三、刘万章、蒋南峰、陈家国等几位都是 6 字班的，人数超过一半。总部委员中，周泉缨、王永县等几位也是 6 字班的。要是这些人都分配离校的话，414 的领导力量将损失惨重。为此，总部决定 6 字班的总部委员都要尽可能地争取留校。

对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来说，所幸的是 6 字班的分配方案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下达到高校和用人单位。分配小组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对号入座，落实到人。

我没有具体参与分配工作，也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去向。因为我被动员考研究生，就知道是留校的，所以已经有了留校的思想准备。再加上两派斗争正如火如荼，我也不可能要求离开学校扔下 414 拍拍屁股走人。

文革前，清华留校的一般都是在政治上或学习上优秀的学生。那时留校当教师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到了 1967 年，热衷留校的人已经不多了。通过一年多的文革，尤其是毛泽东把教育战线定性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家对高校避之犹恐不及，对留校已没多大兴趣。在二千多名 6 字班毕业生中，原分配计划有 140 人留校的，最后只有 40 多人愿意留校，其他的名额都“浪费”了。

我班也是一样。原计划有两个留校名额的，我算一个，那么团派还可以有一个留校的。结果，他们宁愿去四川贵州等三线厂，也没有人愿意留校。

本来沈如槐很担心因为 6 字班的毕业分配会导致 414 领导层流失一多半，最后因为留校名额无人竞争，几乎所有的 6 字班总部委员都没费太大的周折全留下来了。

在毕业分配期间，石福庆找到我，说清华学生的大字报，无论政论水平还是写作技巧，都盖过不少著名的文科大学，在社会上都出名了。《新华社》想在清华的应届毕业生中物色文笔比较过硬的红卫兵小将做记者，问我愿不愿意去。我问他，你怎么想到我来了？他开玩笑说，谁叫你的《少数赞》“臭名远扬”的呀。

《新华社》到以理工科见长没有新闻专业的清华来招募记者，这在当年也算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我对自己做了一个粗浅的评估。

虽然我喜欢写点什么，但是我深知，我的笔杆子一点都不过硬。我不是那种

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的人。我只有在自己特别想写的时候，也就是有写作冲动的时候，才可能写出一点比较感人、能引起共鸣的小文章。但是，《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这些都是党的喉舌，发出的都是党的声音，阐述的都是党的观点。像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要写听命文字，我是既写不出，也写不好的。即使写也会写得很痛苦。

另外，虽然我喜欢写点东西，但是从来没想过把写文章当作我今后的职业。我读了六年大学，有自己的专业。我还是喜欢搞技术工作。我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搞新闻。舍弃本行，进到一个我没有基础没有长处的新闻行业，我没这样的兴趣和胆量。

想过以后，我回答石福庆，说我不想《新华社》。他很为我惋惜，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进中央单位的好机会。

于是，石福庆去找了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是动农系的杨继绳。杨继绳是党员，团支书，政治条件很好。他本来是要分配到一家大型坦克制造厂去的，但是还没有去报到。听说要他去《新华社》当记者，后来调令也下来了，他还是很犹豫，并不是特别想去。这时团派听说《新华社》要调一个老四去当记者，不高兴了，于是扣着调令不放。杨继绳班上的老四得知此事十分气愤，他们想办法把调令弄了出来。1967年12月份，杨继绳班里「云水怒」战斗组的几个同学推推拉拉地把他拉扯到《新华社》去报到，说你不愿干，先占上名额，免得被老团占了。就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杨继绳做了《新华社》记者。

多年以后，石福庆问我，当年没去《新华社》后悔不？我说，从没后悔过。他说：我说句老实话吧，你要是去了可能不会比杨继绳干得更好。我说：这点我完全承认，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可能比杨继绳干得更好。我自嘲说，我没别的优点，只有一点长处，就是多少有点自知之明，知道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没去《新华社》，中国少了一个平庸的记者，这是幸事。杨继绳去了，体制里出了一位有良知的新闻人，这更是幸事！

杨继绳自己说过，他在新闻界从业三十年，第一个十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第二个十年，他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第三个十年，他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三真”成了他的追求和座右铭。我看他写的《墓碑》、《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等大作，也看过他写的多篇时政评论。在这些著作中，我听到了他的心声：“在权力面前说真话”。

能在风云诡谲无常权谋狡诈充斥的体制中生存下来，不易。能在如同污泥一般的官场环境中仍保持一个人的正直和良知并且有非凡的作为，那是更加的不易。

杨继绳做到了，令我敬佩！

我前后几届的清华校友中，官至高位、权至顶层者大有人在。那些从辅导员

制度中培养出来的领导人，除了维护体制利益，没有更多的大作为。不是平庸，就是守旧。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都远远不及杨继绳。

第十七节 面对这样的一纸毕业鉴定，我欲哭无泪

在两派割据的1967年下半年，即使像下乡夏收这样的事情，两派也是各行其是，组织不到一起。唯有1966届毕业生分配这件事，两派和平地协商解决了。这是因为单独某派无法包办毕业分配，也不可能各派自行分配自己一派的毕业生。毕业生超越派性的共同利益压倒了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另外，石福庆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班的两派势均力敌，团四各占一半。班里的分配工作，我无暇插手也无兴趣过问。所有有关毕业分配的会议和活动，我一次都没参加。

11月底，我班代表414参加分配领导小组的学生党员干部老厉找我谈话，向我宣读了由班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写的毕业鉴定。鉴定全文如下：

小组鉴定意见

孙银基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入大学后七年半来，有很大进步。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三面红旗”认识比较模糊，但是，基本立场是坚定的。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清理了思想，认识有较大提高。积极参加四清运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敢于用毛泽东思想去鉴别、分析一切，在刘邓工作组和保守组织的压制打击下，发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较早参加了革命造反组织，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较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一年多来，一直为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希望今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增强党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坚韧性，密切联系群众，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1967、11、25

听到这样的鉴定，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大了，心里拔凉拔凉的。那绝望的心情犹如我不是在听我的毕业鉴定书，而是在听我的政治宣判书。

我这时才知道，要放入我的档案中伴随我一生的竟然是这样一份毕业鉴定书！

我没法否认我在“九评”学习的时候暴露了对“三面红旗”的模糊认识。我也知道“认识模糊”的含义就是目前还不是敌我矛盾的立场问题。我原本以为，三年多前已经做过检查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努力改错。我积极参加文革，主要是出于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反修防修，关心国家大事，同时也有改错立功的私心。

我认为这几年中，特别是文革以来自我感觉表现不错，在毕业鉴定的时候会放我一马不会再提这件旧事了。但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破灭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本身就是大是大非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再次认定我“认识模糊”，那就是宣布我政治上是不可靠不合格的。一般的小事是不会装入档案的，凡是装入档案的东西都不是一般的小事。把一个“认识问题”装入档案袋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不仅仅是“认识问题”的政治问题。所谓“基本立场是坚定的”仅是一句多余的空话。

后来我才知道，其他同学的鉴定意见都是正面肯定的。有所差别也仅仅是肯定的语气和用词有点差异罢了。缺点明显一点的同学也是用比较委婉的“希望”来表达。像我这样明确指出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认识模糊”的，在班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唉~~，我几年前的政治污点现在成了我的历史污点。我走到哪里，只要一查档案，就知道我是一个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不可信任不可委以重任的人。这将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永远悬在我的头上警告着我。我今后要在社会上平平安安生存下去，唯一之道就是永远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做人。或许，这就是组织上要把政治污点记录在案的目的吧？

记得在《水浒传》里有这样的描写：官家对重刑犯要在额上刺字，名曰金印，以示与良民的不同。

时代不同了，宋朝的金印到了现代社会也与时俱进。档案是当政者治民的一大法宝。一个人如果有对党不利的言论或行为，就记录在案。人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如影随形。这根小辫子，想什么时候整就什么时候整，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执政者的手里，组织的手里，领导的手里。

一生耿直的彭老总，因为上了一道万言书，触犯了龙颜，连同过去的历史旧账一起整，整了个半死，整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把国防部长也整丢了。文革期间，1959年的历史旧账连同更年久的历史旧账一起再整，整得一条命都没了。建有丰功伟业的开国元勋尚且是这样的命运，草民呢，更命贱如草芥了。我相信，被档案整得惨不忍睹死去活来的人不在少数。

我默默地听完毕业鉴定，没有说什么。组织的结论，犹如组织的脸色，冷若冰霜。恳求也好，辩解也好，说什么都没有用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更改的。

我不知道班上那些属于414的党团干部特别是代表414参加毕业分配小组的老厉有没有为我争取过在毕业鉴定上不写上这个“认识问题”。尽管我的总部委员头衔有点“显赫”，名气有点大，但是我在这些原来的优质生眼里，不管现在他们是老团还是老四，我永远都是一个差质生。他们永远记得我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模糊，是一个应该记录在案的政治污点。

我对做不做总部委员，做不做革委会委员，都无所谓，但是我对毕业鉴定是

非常在意的。现在这样的鉴定结论，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一个对我的前途、命运的极大打击，甚至是一个难以向朋友派友启齿求援的打击。我情绪十分低落、郁闷，灰暗的心情一直挥之不去。随着对文革越来越迷茫，对派性斗争越来越厌倦，对自己的前途越来越没有信心，我的表现也越来越消极了。要不是 414 头头那份无法逃脱的责任感，我真的想做一个我以前所不屑的逍遥派了。

唯一使我有点安慰的是，幸亏我没选择去《新华社》当记者。没去，不仅是有点自知之明，简直是有点先见之明了。要是拿着这样的毕业鉴定到《新华社》报到，除了被打入冷宫，或者日后被清理出党的要害机关，我不会有其他的前途，更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第十八节 周泉缨的《必胜》，搅得 414 一地鸡毛

1. 《必胜》及《炮打》的出笼

1967 年 8 月 9 日，周泉缨写了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前的大字报区。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是我们已经叫喊了好几个月的口号，并不新鲜。那时，凡是参加 414 的老四，都相信有一个四一四思潮，都坚信四一四思潮是必胜的。

用“四一四思潮必胜”作为大字报的标题，我见到过的也不只这一篇。¹

《必胜》的署名不是周泉缨，而是用了「东方红战团○○支队」这一化名，并不引人注目。

也就是说，本来，这样一篇大字报很有可能淹没在大字报区数百上千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与众多其他的大字报一样，自生自灭。所谓“这大字报贴出去后的第二天，清华园内就如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2-P94] 只是大字报作者美好的想象。

如果说这篇大字报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表面上看，有这么三点：一是篇幅很长，二是林林总总讲了不少观点与话题，三是用了许多伟人语录，引经据典，貌似很有理论性。

大多数人，不管老团老四，粗粗一看这大字报，很有可能没看完就掉头走了。我就是非常粗略地跳着瞟过一遍，没看仔细，也没耐心看完。

我以前一直以为《必胜》是周泉缨一个人写的。后来风闻他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看了他写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后，才知道了《必胜》的创作过程。他是这样叙述的：“我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四一四思潮必胜》

¹ 在《孙维藩日记》中，就登载着一张别的同学写的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题的长篇大字报的照片。[3-P217]

初稿……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罗征启……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润饰了一下这段文字……我请……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就这样，《四一四思潮必胜》就正式定稿。”[2-P92]

《必胜》贴出以后，团派中对论战感兴趣的一些人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因此对它进行猛烈批判。「三七战团」的一部分战斗组对《必胜》也严重不满。

如果像往常一样，一方口诛笔伐地声讨一阵子，一方不再回应，那么这个热点话题过几天也就过去了。1967年的夏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大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清华园里也每天都有新鲜的话题。两派不会在《必胜》上无休止地纠缠下去的。

正当对《必胜》的批判慢慢退潮的时候，周泉纓来了一个更大的惊人之举：炮打陈伯达！

1967年9月14日和17日，周泉纓以「清华大学414伟大转折纵队〇〇支队」的名义连续发表了《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及《评陶铸之流 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简称《炮打》），矛头所向，直指陈伯达。第二篇文章上署了周泉纓的名字。

即使是不指名的炮打中央首长，对本人，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严重大事。消息马上就传到江青的耳朵里。第二份《炮打》贴出的当晚，在有414头头参加的中央首长接见会上，江青发话了：“今早在清华礼堂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贴大字报的人）叫周泉纓。周泉纓，小丑！叫这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文革头上。”谢富治马上接腔说“抓起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P356]

其时，正值团四两派在商谈大联合。周泉纓的炮打陈伯达既陷414于极度的被动之中，也毒化了大联合的气氛。

团派根据江青的讲话把周泉纓定性为“反革命小丑”，根据谢富治的指示要抓捕他；以「三七战团」为代表的414群众因为“炮打”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声讨他；「东方红战团」的一部分头头以中央还没定性周泉纓是反革命为由竭力庇护他。直到10月19日，以为风声已过不老老实实躲着的周泉纓终被团派抓住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将近一年后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候下令释放周泉纓。

又过了四十多年，万润南在校友网上抖出了一个有关《必胜》的爆炸性旧闻。万润南质问周泉纓：“《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万润南接着说：“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篇文章的‘文字’，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出自我的笔下；后两段的每一个字，则是老罗所写。参加构思、讨论，并提供了

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这一下，捅了周泉纓的马蜂窝。周泉纓立即宣布与罗征启、万润南绝交。

我对万润南的话，大部分是相信的，那就是《必胜》是周泉纓、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这几个人一起策划、构思、讨论、写作、修改，集体创作完成的。至于万润南反问周泉纓“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这话好像说得有点太绝了，似不可全信。我知道，周泉纓是一个既有思想、也有文笔、很有个性的人，在《必胜》的创作过程中不可能如万润南所说的那样碌碌无为到连一个字都没有写的程度。¹

万润南之所以爆当年的内幕，并非是来抢《必胜》著作权来的。他说：我“无意改写清华的文革史。《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当时由周泉纓署名，而且也由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其作者，当然是周泉纓。”万润南这样说，是客观的，公正的。我也认为，无论周泉纓具体写了多少，罗征启、万润南具体改了多少，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纓的。所以我认为，即便极而言之，如万润南所说周泉纓没写一个字，《必胜》的著作权还是应该属于周泉纓的。周泉纓署名了，被抓起来坐牢了，他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这种骨气我还是很佩服的！

万润南之所以要这样说，这样做，是因为万润南认为周泉纓被毛泽东“钦定”为“理论家”后，这《必胜》“就变成了一块痰，让你痰迷心窍了一辈子。……对我们而言，是往事一段；对你而言，是一生的辉煌。……（所以，）我索性大喝一声，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帮你把这口痰吐出来，也许，你的心智就正常了。”

对这点，我非常认同万润南对周泉纓恰如其分的看法。周泉纓确实是“痰迷心窍”了。万润南的好心，本想是为周泉纓“治病”。只是没想到“药”用得太猛了，“病”没治好，“医生”与“病人”却成了仇家，令人扼腕叹息。

周泉纓、罗征启、万润南这三位都是清华的大名人，都有不平凡的坎坷人生。几十年生死相交的朋友情谊被这件事情破坏了，反目成仇，大家看着，无比痛心。但愿他们以后会有握手言和的那一天。

¹ 笔者曾通过万润南的同班同学将本书初稿中有关他的章节传给他，征求他的意见。万润南回信说：“关于《必胜》的出笼经过，我会再写一些文字，待完成后发给你们。孙怒涛的记述很客观，谢谢他。老万”。

2012年8月7日清华校友网64社区上，刊登了万润南的一篇文章：《罗征启——夭折的接班人》。里面详细谈到《必胜》出笼的经过。这大概就是万润南说的“再写（的）一些文字”，笔者认为可信。现摘录如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纓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於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於是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纓那封信的修改，於是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後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2. 团派对《必胜》的态度

《必胜》出笼以后，团派并没有立即形成对《必胜》批判的高潮。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对《必胜》的批判才多起来。很可能，那几天他们正在仔细地研判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和背景。

我一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团派对这张大字报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要倾其全力大张旗鼓地将其批倒批臭。

《必胜》之所以被团派高度关注，我猜想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它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四一四思潮的部分基本观点，引用了不少马列语录，更显得有理论深度。这引起了有同样理论论战欲望的那些老团们的兴趣。二是有些尖端的观点比较容易被抓住尾巴，况且还有一些不合事实的叙述（如“414 派几乎都是最早从白色恐怖里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和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2-P340]），批驳这种有明显破绽的文章更容易取胜。三是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东方红战团」的重要人物写的。好些尖端观点并不为 414 多数群众所接受。那么批《必胜》就是只打击「东方红战团」，对 414 的杀伤力最大，而引起 414 群众反弹的副作用最小。

大概从 8 月 20 日开始，团派掀起了一场围剿《必胜》的浪潮，“团广播台举办了《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专题节目”[4-P250]。

8 月 26 日的团派「井冈山报」上，用十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两篇系统批驳《必胜》的文章。《必胜》作为反面教材也刊登在这期专刊上，于是“流毒”全国，并让经常阅读《井冈山报》的毛泽东也看到了此文¹。没有团派“帮”周泉纓“炒作”，《必胜》的命运也就是自生自灭、销声匿迹。对此，周泉纓是承认的、感激的。他说：“事实上从《四一四思潮必胜》被团派批判以后，我确实成了文革的名人，为此我一直感谢蒯大富和他领导的团派。”[2-P95]

实事求是地说，撇开政治观点和派性语言不说，团派这两篇批驳《必胜》的文章同样写得很有理论性、针对性、逻辑性，写得很精彩。在 414 中，能写出《必胜》这样有分量有水准的文章，少说也有七八人。团派里面同样也有那么多人写得一手好文章。

两篇批驳文章中，重点的一篇是由「天安门纵队」的「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等 10 个战斗组联合写的。这对我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领导的「天安门纵队」已经在 3 月初解散了。「414 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以原「天安门纵队」为班底，成立了「三七战团」。414 分裂成立总部的时候，「三七战团」所属的战斗组也发生了分裂。多一半的成员跟着我和汲鹏到了 414 总部，少一半的成员留在团派总部。留在团派里的这些成员没有散伙，他们依旧以原来战斗组的名字

¹ 在 1968.7.28 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他说过，“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13-P353]

进行活动，于是就有了“团记”的「第一湘江」、「团记」的「轮机兵」等。这些“团记”的战斗组集合起来，重新捡起了“天安门纵队”的名号。只是 414 的「第一湘江」、「轮机兵」等属于「三七战团」，团派的「第一湘江」、「轮机兵」等属于「天安门纵队」。于是，清华就出现了名称完全一样但是分属两派的两个「第一湘江」、两个「轮机兵」等有趣现象。这与 414 占用“井冈山兵团”的名号相类似。他们用着「天安门纵队」和「第一湘江」等名号，可能也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吧？

另一篇批判文章是由「624 战团」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等 7 个战斗组联合写的。文章指出，《必胜》宣扬的就是“团派冲锋陷阵打江山，而 414 掌权坐江山”的观点。应当说，团派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抓住要害的。只可惜这一要害没有被当做要害重点展开批判，也没有上纲上线到“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做江山”、“无产阶级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这样的理论深度和政治高度，而是淹没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等一大堆其他罪名的批判里，因而显不出这就是《必胜》的要害了。

在上半年干部问题的论战中，团派一直处于下风，十分被动。这一次，抓住《必胜》这个 414 自己送上门来的反面教材，又有「天安门纵队」这批很能写的秀才助力，团派对它的批判，用“铺天盖地”、“狂轰滥炸”这样的形容词，一点也不过分。这次团派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在周泉纓炮打陈伯达以后，团派除了继续狠批《必胜》外，就是要想方设法把周泉纓这个“反革命小丑”扭送到公安局里去专政。由于沈如槐的庇护，这一目的一直没有达到。直到一个多月后，团派才逮住了机会，如愿以偿。

3. 我与「三七战团」对《必胜》的态度

这里我先谈一下我与周泉纓此时的关系。

在 414 总部成立以前，我仅仅对他观点有时比较偏激、“尖端”有一点看法，其他方面我对他的印象还是相当好的。他思想敏锐、视角独到、观点新颖，这些都是我所欣赏的。关系尽管不算密切，但是互相尊重，尚能友好相处。不过，在对团派的看法上，分歧已经很明显。他认为我对团派抱有幻想，我认为他对团派过于极端。

414 总部成立以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对他的看法也更多了些。他的性子比较爽直，脾气有点急躁。他很自信，甚至显得有点自负、自大，总认为自己观点是正确的、革命的。所以，在总部会议上，有时候他与别的总部委员争论起来，他会大声呵斥，指着别人的鼻子责骂“老机”。我亲眼看到过他这样对待魏洪波老师，我也亲身领受过他这样的指责。这当然让我心里很不爽。我想，即使在团总部里，我也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啊！我对他这样粗暴的态度和盛气凌人的

作风很不满意。记得有次因吕应中间题我去 200 号¹开座谈会，上车以后才发觉我与他同在一辆车上。我们彼此形同陌路人，谁也没有主动打招呼。我与其他的总部委员，与「东方红战团」的其他负责人都有良好的个人情谊，唯独与周泉纓，始终没建立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必胜》发表之前，我与他的关系只是疏远，并没有恶化到公开对立的程度。

贴在大字报区的《必胜》，我跳跃式的粗看过一遍，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因为此后团派连篇累牍地批判，我想知道团派为什么要那么大力鞭挞《必胜》，才仔细地研读了一次。

我对《必胜》的内容大致分了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我赞同的。尤其是第一段“阶级关系的变化”阐述的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及其“部分改善无产阶级政权”的观点。这些观点，经过几个月的团四论战，已经成为 414 群众的共识。《必胜》只是把这些共识重复了一遍，叙述得更有条理性。就实质内容而言，在我看来并无多大的新意。

另一部分是我不熟悉的。如军区问题，「河造总」²问题，全国各地两派是不是有规律可循的问题。这部分我无法表态。

还有一部分是我不赞同的，那就是对团派的态度。认为团派只是在对付主要敌人的时候利用他们的力量“划几浆，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在水中”[2-P345]，用铁的手腕把他们捏得粉碎。这种极端的观点是我不能接受的，这种偏激的用词也是我所反感的。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共同目标是反对团派的极左思潮。但是，在「东方红战团」里像周泉纓等人，已经偏激到团派等同于极左派，把蒯大富看成是变质的、落伍的、必须抛弃的红卫兵头头，这与我对团派、对蒯大富的认识和估计是有很大差别的。就说蒯大富，尽管他犯了很多错误，现在还在继续犯着越来越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毕竟很年轻，掌权的时间很短，经过挫折，只要他吸取教训，他会成熟起来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刚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比较幼稚的，也是犯过许多错误的。中间有很多人被历史淘汰了，但是留下来的是真正经历过考验而成长为革命家的。为什么青年学生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会出几个真正站得住脚的学生领袖呢？

我赞同的部分，也就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盟的思想基础。我不赞成的部分，也就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分歧之一。对于这样一篇我基本赞同又有部分不赞同的大字报，我是不会公开批评的。

沈如槐用《千钧棒》战斗组的名义发表过“平保”、“平黑”等的观点，我

1 200 号是当年坐落在昌平燕山脚下清华核能研究基地的代号。

2 「河造总」是「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简称。

对其中有些论述也有所保留的。414 战斗组出的大字报，甚至「三七战团」一些战斗组出的大字报，有些我也有不同意见。这就得包容。听听别人的观点，对的就吸收，不同意又不是原则分歧的，用不着公开争论。另外，对有些观点我也不是很自信，也在不断地思考和琢磨，在消化完善的过程中。即使是团派的大字报，要反驳的观点太多了，绝大多数也是看过就完了，只有认为很重要的，才找合适的时机批驳一下。

「三七战团」多数同志对《必胜》的反应，比我要激烈一些。

比「三七战团」反应更强烈的是 414 中那些既非「东方红战团」又非「三七战团」的大多数中间群众以及总部委员中的教师、干部。这些都是温和的老四。他们认为周泉纓的观点太右了，414 不能越右越好，越走越右。

时值沈如槐外出。在我主持的总部会议上，主张批判《必胜》与不主张批判《必胜》的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414 内部「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在《必胜》问题上发生争执，「三七战团」倾向于批判，为了统一思想，昨天到今天(8月 21 日)开了一天半会。” [4-P250] 我不主张过于屈从于团派的压力。我认为 414 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大批判上。8月 22 日晚上，“414 总部发表关于《团总部某些人借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攻击 414 的声明》。说：目前的任务是批判、邓，要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批判。……为了坚持大方向，防止内战爆发，对团总部这种行为暂不予以还击，并劝他们迷途知返。” [4-P251]

过了二天，“「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发表声明，认为‘《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完全正确’。「三七战团」发表了一个《批判「东方红战团」声明的声明》” [4-P253] 就这样，「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矛盾完全公开化。

「三七战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以「三七战团」名义写的大字报、声明之类，少数是我预先看过的，多数可能知会一下大致的情况，还有一些并不见得都告诉我，高季章、王允方等几个主要成员商量过以后就贴出去了。在周泉纓炮打陈伯达之前，我本人对《必胜》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克制的。

对于以「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名义发表的声明，沈如槐说：“我估计，这是周泉纓在唱独角戏。” [1-P226] 我想想也是。因为这期间「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几乎全都外出了，只留下宿长忠。而宿长忠对《必胜》也是很有看法的。所以周泉纓实际上是以「东方红战团」的名头发表了一份自己支持自己的声明。这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周泉纓也是「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之一。

沈如槐还说：“我在武汉接到北京电话，……说 414 总部发表了关于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问题的声明。我离京外出调研期间，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做出这样重要的决策居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对此，我大为光火。” [1-P225]

这我要辩护一下。我主持总部会议，发表的是“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批判”的总部声明，而并不是批《必胜》的声明。即使发表了批判《必胜》的声明，只

要是依照大多数留校总部委员的意见作出的，也是无可非议的。至于请示或征求一把手沈如槐的意见，主观上说，我当时没有这样的观念。既然“帅”在外，那么“在家主持工作”的“将”顺理成章地独行其令了。客观上说，沈如槐去外地并没有做正式的工作交代。我连他去了哪里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怎么与他联系。我即使想请示也无从请示。说句实话，我也没向可能知道沈如槐行踪的宿长忠打听一下。沈如槐之所以大光其火，关键是因为总部发表了一个他不满意的声明。这点也好理解。

当时学校里是这样一个混沌的形势：团派借批《必胜》试图压垮 414，自不待说。「东方红战团」内部虽然有意见分歧，但是基本倾向是支持《必胜》的，这也比较明确。「三七战团」的大多数人都主张公开批判《必胜》，并且贴出海报要在大礼堂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召开批《必胜》的大会。这得到相当一部分 414 干部、群众的支持，也引来另一部分干部、工人的担忧和反对。他们找到我，说 414 内部批一批就可以了，公开批，只会让团派从中渔利。还有的说，你们小将闹矛盾，最后我们工人倒霉。他们要我力阻这个批判大会。而周泉纓则给沈如槐打电话，对他说什么“414 内部搞政变。你回来迟了，权就要被人夺走了！”¹这样耸人听闻的假消息，把一潭已经浑浊不堪的浑水搞得更浑。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局面，既要坚持反极左防极右的原则，又要不危及 414 的生存，这已经超出了我的处事能力了。左右为难之中，我力劝「三七战团」先别开大会批《必胜》。

我对《必胜》态度的彻底转变是在周泉纓炮打陈伯达之后。作为一个总部委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不仅周泉纓自己极有可能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414 也必定受其牵连，甚至可能被定性为反动组织。那样，414 就真的完蛋了！我一直坚信，团派的高压政策压不垮 414，但是 414 内部激进分子的极端行为会葬送 414。这是我最担心的。可以这样说，我此时对周泉纓已经全无好感，我彻底被周泉纓惹火了，简直是怒不可遏。我甚至怀疑过，周泉纓是不是老团派到 414 来卧底专门来搞垮 414 的奸细？我认为，周泉纓对 414 的杀伤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团派！

到这个时候，我坚决主张狠批《必胜》，狠批周泉纓。因为：

1、周泉纓的性质已经变了。他是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小丑”，是严重危害 414 利益的败类。我心里已经把他从同志、战友的名单中，从 414 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了。必须要与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他的《必胜》当然必须批判。

2、《必胜》已经远播校外，我十分担心社会上看到了，特别是上层看到了，误以为这就是四一四思潮，误以为这就是 414 的主流观点，那就糟糕透了。我必须发出强大的声音：《必胜》不代表大多数 414 群众的观点，在 414 里面大多数

¹ 这句话引自笔者在 1971 年清查五一六时的检查交代材料。

的人都是反对《必胜》的。

3、《必胜》里确实有我不赞同的内容，而且《必胜》里确实有一种右的倾向。团派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危险，必须全力批判。以周泉纓为代表的右倾思潮对414也是危险的，趁这个机会也要好好的批一批，防止414因为批团派的极左而自己滑到极右。

我和「三七战团」批《必胜》，还有这样的想法：既向团派显示「三七战团」并不同意《必胜》的所有观点，与「东方红战团」是保持着距离，又向「东方红战团」表示，尽管「三七战团」与你结盟了，在原则问题上「三七战团」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要发出不同声音的。

我和「三七战团」真的要批判《必胜》、批周泉纓的态度，引起沈如槐的极大不满。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当时，周泉纓是「东方红战团」的一个核心成员，是与沈如槐关系最密的战友。沈如槐要全力庇护周泉纓，全在情理之中。

非常令我意外的是团派对「三七战团」批《必胜》、批周泉纓的反应。「三七战团」真心实意地批《必胜》、批周泉纓，却引来团派中极端分子对「三七战团」的反批判。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搞“假批判、真包庇”，这让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她9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精彩的一幕：

“在大礼堂里，414的「三七战团」召开大会批判414的周泉纓。团派战士大批拥进了礼堂。我们的发言比414还多。这里虽然是孙怒涛们主持会场，但是任传仲、倪旭生却活跃在舞台上。团派战士的发言就其内容来讲当然比414的尖锐和泼辣得多。但就其效果来讲，适得其反。因为团派发言一致认为此「三七战团」召开的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孙怒涛是两面派。把周泉纓与414头头与其思潮串联起来。可以说，他们的发言派性很强，有些过左。于是这个毛病就被右派利用，孙怒涛等人一再煽动414战士与团派的对立情绪，说什么：‘我们是真批判’，‘决不许假借批周，把矛头对准广大414战士’（真活见鬼，是骂孙本人，他却把矛头转成了骂414战士，狡猾！）结果可以说，这次会议团派失去了自己的团结对象414中的偏左者——「三七战团」。会议最后发生了抢话筒事件，结束是老团结尾的。整个大会的调子是激烈的……”

这段日记写得很传神。我要再补充一点的是：任传仲、“狗熊”¹等人气势汹汹地冲向主席台，台下的老四想挡也挡不住。主席台上混乱不堪，主持大会用的话筒也被老团抢去。我气得一跺脚也离开了会场，心里恨恨地想，既然我是假批判，那就让你们老团真批判去吧！

关于这次批判大会，有一点是陈育延在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这次批判会是我在总部会议上逼着沈如槐同意召开的。也就是说，这次大礼堂的批判大会是以414的名义而不是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召开的。沈如槐在大多数总部委员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开批周泉纓、批《必胜》的大会。但是他心里是不情愿的，行

¹ “狗熊”是团派激进的「前哨」广播台负责人吴慰庭的外号。

动上也就不会支持。我依靠「三七战团」召开并主持了这次大会，到会的总部委员也只有汲鹏等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一个也没有到会。没想到好不容易开起来的大会又被团派的激进分子所冲垮。我想沈如槐在暗中也窃笑不已吧？我与「三七战团」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在 414 内部，被沈如槐批评；在外面，又被团派批判。两边都不落好。

几十年后，我看到了周泉纓对「三七战团」批《必胜》的反应。他能料到中央会批他，团派更要批他，但他没想到 414 内部也有人要批他。“至少在其规模和级别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2-P95]。那是因为周泉纓当年小视了「三七战团」，至今仍然没有弄明白当年「三七战团」为什么要狠批《必胜》。

4. 沈如槐与「东方红战团」对《必胜》的态度

周泉纓用「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名义发表的“《必胜》是完全正确的”声明，从本质上说也是实情，并非谎话。《必胜》所表达的观点，确实是「东方红战团」核心层的观点。沈如槐仅仅对派别的规律性和把四一四思潮与「河造总」联系在一起，有不同意见，有些不满。沈如槐坦承，《必胜》中“所谓比较尖端的观点，周泉纓或在「东方红战团」或在私下都阐述过，我们都不陌生，并且都很赞同。”[1-P227] 沈如槐甚至对《必胜》提高到这样绝对的程度：“批判《必胜》就是批判 414，否定《必胜》就是否定 414。”[1-P226] 这与我认为的《必胜》里面的正确观点也仅仅是四一四思潮的一部分，更何况还有错误的、不属于四一四思潮范畴的那些内容的认识是有很大差距的。

团派批了一阵《必胜》，热情慢慢消退。周泉纓不甘心《必胜》就此淡出人们的视线。他开始用炮打陈伯达吸引大家的眼球，再次把焦点集中到他身上。

沈如槐支持《必胜》，但是不赞成周泉纓《炮打》。沈如槐说：我“劝他千万不要贴这样的大字报。……你是 414 总部委员，炮打陈伯达会给 414 带来极大的被动，搞不好会让整个 414 背上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414 刚刚经历了一次冲击，一次洗礼，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经不起再三折腾，你把 414 的队伍搞乱了，我们还怎么去和蒯大富斗？”[1-P238] 周泉纓不听，他就是要一意孤行，再一次的折腾 414。当时「三七战团」的人就议论：别人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避之唯恐不及，周泉纓是抢着要去戴这顶帽子，硬闯着非得进监牢的门不可！

如果说，《必胜》引发了 414 的内部矛盾，使得「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分歧公开化的话，那么《炮打》引爆了 414 内部最严重的一场内讧。

尽管外界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沈如槐仍然以“一批二保”的对策死保周泉纓。其实，“一批”是为了应付中央的批评、应付团派的进攻、应付 414 内部的不满情绪不得已而为之。他既不认为周泉纓的观点有错，更认为他在反对老蒯拉 414 独立上是有功之臣。所以“一批”只是幌子。至于“二保”是实实在在的一味死保。

他借口江青只说了周泉纓是“小丑”，没说他是“反革命小丑”，所以不能当做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为了防止团派把周泉纓扭送到公安局，「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千方百计地为周泉纓找了一个秘密去处藏匿起来。他们对周泉纓的支持已经达到纵容的程度，对他的保护已经达到包庇的程度。

「三七战团」批《必胜》，批周泉纓，自不待说了，火气更大，火力更猛。414 的战斗组几乎一边倒地对周泉纓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也严厉指责沈如槐。有一些战斗组“坚决要求改组 414 总部，把总部中的‘周泉纓分子’拉下马。”[1-P244] 那段时间，直接找我的教师、总部委员很多，态度可以用“怒不可遏”来形容。有位教师气愤到极点，对我说：总部一定要明确表态，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绝不能因为周泉纓一个人葬送了 414 的前途，让一粒屎坏了一锅汤！

即使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如在 414 中有极高威望的宿长忠就是赞同批《必胜》，对周泉纓炮打的做法深为反感的。

我对沈如槐坚韧不拔的品质是很欣赏的。我自知我在坚韧性上比他差得很远。他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敢于顶着压力不断冲击，事实证明他做得对，坚持得好。但是在周泉纓问题上，他的“坚韧不拔”已经变成了固执己见。为了保他的爱将，作为 414 这一群体的一把手，沈如槐宁愿置 414 绝大多数群众的坚决反对而不顾，置 414 面临被分裂、解体、压垮的严重危机而不顾。从「东方红战团」的小团体或他与周泉纓的个人情谊而言，我无话可说，但是作为 414 这个有着七千人的群众组织的首脑，我认为这是极不应该的。对此，我大为不满。

正如“智擒王光美”事件让我开始与蒯大富保持距离那样，周泉纓的《必胜》、《炮打》事件让我开始清醒地与沈如槐保持距离。「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已经结盟，为这样一个事件而闹得再次分裂，对 414 而言没有丝毫的好处，只会让团派看着 414 的内讧拍手称快。但是政治上的结盟并不表示在所有观点上「三七战团」都要赞同「东方红战团」，在利益上都要服从「东方红战团」。我甚至有一种隐隐的担心，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严重的内部分歧下，「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还能不能精诚团结走下去？要是以后 414 真的成了掌权派，「东方红战团」会不会欺压它的同盟军「三七战团」？会不会把「三七战团」也当做划完几浆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在水中”的同路人？对这些，我心中无底，只有担忧。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我与沈如槐的关系，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因这件事而降到了冰点。在我与沈如槐合作的一年时间里，在这件事情上的分歧和矛盾是最严重、最尖锐的。

5. 张春桥、毛泽东对《必胜》的态度

张春桥在 1967 年 12 月 10 日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

的传单，说 414 要坐天下，414 必胜。他们就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 [1-P229]

毛泽东在 1968 年 7 月 28 日召见五大领袖讲话时说：“清华 414 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 414！414 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13-P354] 毛泽东还说：“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 414。……你那个 414 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 [13-P369]

那么，《必胜》果然是宣扬了“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了吗？

先再简单回顾一下清华前期文革的实际情况。

蒋南翔并不是被清华师生打倒的，推翻的。如果把抵制工作组错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叫做打天下的话，那么清华的天下是谁打下来的？确实，工作组时期，蒯派受工作组压迫最甚，对工作组的直接反抗也最烈。但是，在 1966 年的 8、9 月间，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八」派在艰苦卓绝中抗击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八九」派的重压。到 9 月下旬，以蒯派为核心的「井冈山红卫兵」才竖起大旗，逐步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军。清华的天下，先不说外力的影响，并不是只靠蒯派一派打下来的，是蒯派和「八八」派共同把清华的天下打下来的。「八八」派和蒯派都是造反派。也就是说，以「八八」为基础的 414 与以蒯派为基础的团派都是造反派。认为只有团派是打天下的或者只有 414 是打天下的，都是片面的、不符合清华文革实际的说法。

到 12 月底「井冈山兵团」成立，标志着清华的造反派打下了清华的江山也坐上了清华的江山。兵团总部委员中，既有蒯派，也有「八八」派。这个时候，确实体现了造反派打下了天下，也坐上了天下。

以后团派与 414 派的争斗，是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争斗。团派想一派掌权，不容 414 染指权力、分享权力。414 派不许团派一派掌权，要分享权力，同坐江山。

所以清华的两派争斗，问题实质并不是如张春桥、毛泽东所认为的“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而是同属打江山的团派和 414 派，以谁为主坐江山的问题。团派要以团派为主，甚至要垄断权力。414 要以 414 为主，至少也得对等。

当然，在 414 内部，「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要求也并不完全一致。

我希望 414 与团派联合起来一起掌权。我能接受以团派为主的联合。

周泉纓在《必胜》中所表达出来的，基本上就是「东方红战团」的愿望。他

们认为团派只是完成“划几浆”的“历史任务”后就要“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在水中。”“414 坐天下”或“以 414 为主坐江山”，这就是《必胜》的观点。

硬要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说成是《必胜》的观点，那是张春桥、毛泽东无理的上纲上线后强加给《必胜》，强加给 414 的。把这说成是 414 的观点，更是错上加错的。

张春桥在这里犯了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就算是 414 坐天下，也仍然是造反派坐天下，并非是保守派复辟。张春桥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他只把团派看成是造反派，414 不算造反派。显然，张春桥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说法是歪曲了《必胜》的原意。

毛泽东在张春桥的基础上，又随心所欲地再发挥了一次，把《必胜》的观点归纳成“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罪名实在有点吓死人！

毛泽东“见微知著”、“洞察秋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的惯常使用的。彭德怀在他的万言书中，对于大跃进说了句“有失有得”。毛泽东抓住“失”先于“得”大做文章，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吴晗写《海瑞罢官》，本是他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精神的号召而写的，吴晗本人还积极紧跟毛泽东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文革前毛泽东点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把这出戏上纲为替彭德怀翻案。这一次对《必胜》，毛泽东故伎重演。他无中生有地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然后痛批之。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没有团派「624 战团」批《必胜》那样实事求是。

毛泽东、张春桥为什么要批《必胜》？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414 是保守的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在 7.28 召见讲话中，毛泽东总算把他的这层意思扭扭捏捏、曲里拐弯里讲出来了。

6. 给《必胜》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周泉缨说，《必胜》“就是清华 414 派的理论纲领”。[2-P91]

这样的说法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414，与当时能在社会中站得住脚的所有红卫兵组织一样，不管是口头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为理论纲领的。无论现在对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新认识如何，都不能改变当年我们对此信奉笃行的事实。

《必胜》算什么？它是有一定的理论性。但是它像一个理论纲领吗？它是 414 的理论纲领吗？它连正确地总结、归纳四一四思潮都做不到，遑论是 414 的理论纲领！要说它是 414 的理论纲领，简直是太可笑了！太离奇了！七千人的 414 中，有几个人认可周泉缨是 414 的理论家了？实在不多！二三十名 414 总部

委员中，有几个人是把《必胜》作为指导 414 的理论纲领的？我看一个都没有（即便是周泉缨本人在当年也不敢如此夸海口）！时至 2006 年，周泉缨竟敢这样胡说吹牛，全然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拼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真让我瞠目结舌！

对于《必胜》，大多数文革的研究者以为这就是 414 派的代表作，代表了四一四思潮。

这种认识也是很不正确的。

思潮，就是思想潮流。四一四思潮，就是 414 这一群体大多数人向着某个方向流动的思想潮流。所以，思潮是平民的，不是“精英”的。作为群体里的“精英分子”的思想，有的能够代表群体思潮的，那是主流。有的能够引领群体思潮的，那是潮头。有的是脱离群体思潮的，那是支流。也有的与群体思潮背道而驰的，那是逆流。

《必胜》是这样的一篇作品：它有相当一部分观点是属于四一四思潮范畴的，但它没有完整地、正确地归纳、阐述四一四思潮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还有许多四一四思潮的基本观点，它没有涉及。它又阐述了不少仅代表个别人的观点，其中有很多是错误的，是 414 大多数人所反对的；也有一些既前瞻又正确的观点，但并没有被 414 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所以，把《必胜》阐述的“四一四思潮”等同于 414 派的四一四思潮，把《必胜》的观点等同于 414 派的观点是错误的。综合而论，《必胜》并不能作为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有意贬低《必胜》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要有意抹杀《必胜》的历史作用。我只是想恢复《必胜》的历史真实，还原《必胜》的历史真貌。

在此，我郑重地提请国内外的文革研究者注意：如果把《必胜》当作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那会极大地误解、歪曲了真实的四一四思潮，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揭示和把握清华两派争斗的实质。

因为各种原因，当年 414 没有对四一四思潮做过权威的、严格的阐述和界定。在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沈如槐、陈楚三所写的纪念文章《回忆与思考》，虽然是事后之作，但是，对四一四思潮的归纳、总结、阐述，远比《必胜》要全面、完整、准确得多。如果说《回忆与思考》还有略嫌不足的地方，那就是由「三七战团」首先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四一四思潮的归纳、总结、阐述中表述得不够充分。例如得到包括「东方红战团」在内为广大 414 群众所认可的“新阶段论”、“左派分化论”¹ 等等，显然也应是四一四思潮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¹ 由高季章、胡鹏池等主笔以「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锣未残」、「巴黎公社」、「第一红五星」、「第一野火烧不尽」等名义发表的《论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及《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系统阐述了 414 对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对清华干部的基本估计、怎样对待革命的三结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的看法等等观点及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当前（指 1967 年四、五月份）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到了。所以小将要正确对待自己，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否则会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阻力，甚至会沦为革命对象。在《大事日志》1967 年 5 月 5 日记载：“团派说这篇文章为 414 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提出‘新阶段论’、‘两小撮’论。”5 月 8 日记载：“老蒯传达谢副总理讲话和两段最高指示。(1) ‘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是反动的，

《必胜》在发表的时候曾引发一场激烈的论战。毛泽东曾对此文发表过评论。因此，《必胜》是一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革文献，值得所有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清华文革的学者专家认真研读。这就是我对《必胜》的历史定位。

第十九节 是是非非周泉缨，毁誉参半理论家

周泉缨是个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奇的人。

要是周泉缨炮制了具有轰动效果的《必胜》《炮打》以后，老老实实地躲在某个角落里避风头，很可能风波喧嚷过一段时间后就过去了。毕竟老团一时抓不住他，而被他炮打的陈伯达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说了“不要抓，要教育嘛！”[2-P104]的话语¹。但是周泉缨张狂的个性和不屈的信念注定了他不会有片刻的安宁。他不听「东方红战团」战友的强力劝止，执意要在校园里亮相、活动。为把炮打陈伯达的材料散发到全国各地以造成更大的影响，他在策划印刷的时候被告发，经谢富治同意，于1967年10月17日夜里由团派“扭送进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2-P107]。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无动于衷。因为在我心里，我已经不把他当做414战友，而是414的祸害了。既然414自己无法清理门户，现在由团派动手“帮”着清理，我是乐观其成的。

再次看到周泉缨的名字大概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1977年吧。有一天，教研组的老师告诉我，说周泉缨来清华贴大字报了。

周泉缨？我听到这个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名字，惊诧得长大了嘴，似乎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折腾人的文革终于结束了，大家都在揭批四人帮，都在一心一意地工作，他到学校里来贴大字报干吗啊？

下班经过二校门的时候，我专门拐到照澜院，看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周泉缨向来喜欢写长篇文章。大字报有十几张。没一两个人在看。有些路过的，瞄上一眼标题，或者看上几行字，就匆匆离开了。我也没看完。说心里话，我对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不感兴趣，所以连题目早已忘记了。我感兴趣的是想看看这究竟是

¹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要准备批判；……总部委员陈育廷等贴出《批烂臭名昭著的〈新阶段论〉》。……「6.24」、「小小战斗组」、「国际悲歌」等战斗组写了批判《新阶段论》的大字报，指孙怒涛《关于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一文是反动的‘左派分化论’的代表作”。[4-P174~178] 所以，团四两派曾经激烈争辩的“新阶段论”、“左派分化论”，不仅是早期414的主要理论之一，而且也是四一四思潮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其实陈伯达一点也不大度，小鸡肚肠，很记仇的。下面记述的是一件笔者亲历的事情：1968年3月11日和16日，中央首长两次接见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各派头头，听取大家的汇报。团派与414都参加了。会议是陈伯达主持的。由于第一次会议我们多次要求发言而没有机会，第二次会议，我多次举手。后来我站起来举手，大声地说：“我要发言”。陈伯达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说，“清华414的”。陈伯达不屑地挖苦说：“你们414不是‘必胜’了吗？还发什么言？不要发了。坐下！”会场立时哄堂大笑！我当时站着，满脸通红，非常尴尬，下不了台。我气愤地坐下，对沈如槐说：“以后他主持会议，我再也不发言了！”（摘自笔者1968年11月交代材料）

不是周泉纓写的大字报？在他的大字报前是不是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的眼球？

时过境迁。清华文革前招收的一万多名学生，除了800名低班学生以“新工人”的身份留校当教师以外，全都分配离校了。清华的老师职工大多数是知道周泉纓的。十年前，周泉纓的名字在清华无人不晓。现如今，周泉纓似乎是上一世纪的人物，早就过了气，今非昔比了。我想，要是周泉纓以为他贴出大字报以后还会有像《必胜》、《炮打》时那样的轰动，那肯定要失望的了。

看着几句久违了的语言，我无心再看，就回去了。听说，不久大字报被清洗掉了，不留一丝痕迹。

因为这件事，周泉纓又一次坐了三十个月的牢。

北京市公安局的审查结论是：“周泉纓 1977 年 4 月至 7 月四次来京串联，在清华大学、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对面墙上贴大字报，反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有关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干扰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当时拘捕审查是必要的。” [2-P164]

周泉纓来清华贴大字报几个月以后，我听说他又被抓起来了。我心里只是感叹：周泉纓呀周泉纓，你干嘛那么想坐牢的呀？

再以后的几十年，我一直没听到他的音讯。

过了新世纪，有位朋友对我说，他有一本周泉纓的著作，问我想不想看看。

我对周泉纓出书，还是有点好奇的，于是要来看看。

书名叫《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嘿，周泉纓什么时候研究上佛学啦？还是现代佛学？我吃惊不小，静下心来仔细拜读他的大作。

实话实说，我硬着头皮只看了二三十页就看不下去了。我也理解了我的朋友为什么说他也没看完就送给我了。我们都“顿悟”不了他的新“学说”。

再以后，他的有关统一论哲学的多部著作我都没怎么读。偶尔翻翻，感觉现在的周泉纓已经是个不以常人思维的“外星人”。只有那本《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说的是我所熟悉的事情，所以比较仔细地阅读过。

我只能说，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书中的另类观点所击倒。

有朋友给我传来周泉纓在 2010 年 6 月 6 日写给他的校友的一封信。据说此信已经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上公开发表。我不惜篇幅把其中的一大段引录如下。周泉纓说：

朗钧说，周泉纓一向被认为是 414 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很多当年的 414 人并不承认周泉纓能够代表 414，且《四一四思潮必胜》也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最近当年的一位 414 核心组成员这样讲：“关于周泉纓，请奉劝外边的人士不要把他看成为 414 的代表。这不过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自我炒作，当然还有老蒯谢富治帮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了。文革后他仍在炒，只是已经没了观众。……好多人同我聊起来提到，如果 414 思潮就是

周泉缨观点，他们就要退出。”看来周泉缨当年和现在并不为所有的 414 人所认可。我认为朗钧这个说法不但符合历史事实，而且非常正确。我说朗钧这个说法不但符合历史事实，是因为我称呼自己的思想是“414 思潮”，从来就是为了炒作，而且从来就是为了“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这是我文革中使用的一贯的手段，而且今天仍然在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段，在推销自己的新的更加重大的思想创造。我说朗钧这个说法非常正确，是因为我的“414 思潮”至少在当时在 414 中是少数，而且我的文革思想包括《414 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都不代表 414，包括不代表 414 的「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正因为如此，我在炮打陈伯达后早已经被开除出 414。至于毛泽东主席要称呼我是“414 的理论家”，是有他老人家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而且我也深信，老人家的治国能力和手段，在《414 思潮必胜》发表一年之后，对《414 思潮必胜》发表的过程早就了如指掌，因此他老人家不可能不知道《414 思潮必胜》不代表 414 群众的绝大多数。

就上述这段文字，我想说几句话：

1、我不知道朗钧说的那位 414 核心组成员是谁。414 核心组成员不过七八个人。这位核心组成员对周泉缨的评价十分贴切、到位，我完全同意。周泉缨的《必胜》确是仅代表 414 中极少数成员的观点。

2、周泉缨在这里很勇敢、也很坦率地承认了“我的‘414 思潮’至少在当时在 414 中是少数，而且我的文革思想包括《414 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都不代表 414”。2010 年的这个说法更正了他在 2006 年说过的《必胜》“就是清华 414 派的理论纲领”的说法。只要他能承认《必胜》不代表 414，那我就谢天谢地了。任你周泉缨把《必胜》吹得天花乱坠，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别人信与不信是人家的事情，与我无关，也与 414 无关。

3、周泉缨说：“我称呼自己的思想是‘414 思潮’，从来就是为了炒作，而且从来就是为了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这是我文革中使用的一贯的手段”。这段话，印证了我当年对周泉缨的一个判断：周泉缨确实是 414 中的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这一称谓是我在“四清”的时候才知道，并且真的遇见过这样的勇敢分子。勇敢分子与积极分子不同的是，勇敢分子在运动早期特别积极，表现特别抢眼，言语行动都相当过火、过头，深入一了解，其言行的背后都有强烈的个人目的。当周泉缨贴出《必胜》，特别是后来贴出《炮打》大字报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就没考虑过 414 的安危，没考虑过 414 的整体利益。他想的只是要让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痛痛快快地不计后果地发泄出来，以及要让自己与蒯大富、沈如槐齐名的功利心。我与周泉缨的派性都是很强的，但是派性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既然全身心投身于 414，就把 414 这一团体的派利益看得极重，放在首位。而周泉缨的派性表现在利用 414 这一平台，顽强地宣扬、炒作他的观点。为了达到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的目的，对自己，他不惜坐牢，对 414，任由它分裂、内讧。在周泉缨的心目中，414 仅仅是他为了达

到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他这样的“派性”极其可怕，也是我难以接受、容忍，甚至是不屑的。

周泉缨以 414 总部委员的身份，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口号，以 414 派的影响炒作他只代表几个人不能代表 414 派的观点，在团派的“帮助”下，一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让最高领导也相信《必胜》是代表了 414 派观点的。因此圣口一开，圣喻一下，414 派就遭殃。对 414 来说，周泉缨名副其实是一个祸害，一个罪人。

上述这段议论，当然是派性十足的对往事的议论。不过当年，周泉缨被抓进去以后，大多数老四已经从心里开除了周泉缨的“派籍”，这确是实情。

在 414 总部里，我与周泉缨的关系最差。在得知毛泽东 7.28 召见讲话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他简直恨得牙痒痒的。因此，我在本书涉及到的两派头头中，对周泉缨的非议也最多。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历史老账，并不是我现在的认识。

当毛泽东在召见讲话中说“414 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的时候，我这种不在召见现场的人，都能从文字记录的语境中感觉那是毛泽东惯用的嘲讽、揶揄的口吻。毛泽东对 414 是那样的厌恶，他能对“414 的理论家”会有好感吗？但是周泉缨看到以后，竟然把这钦封的“理论家”当真了。他无限感慨地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2-P509]。看到这里，我想，同一句话，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受，竟然如此之大，天壤之别！

“由于毛主席对我的思维能力的器重”[2-P510]，周泉缨走上了一条理论研究的道路。最近十几年，周泉缨专心于理论研究，著作颇丰。先不说他的研究成果究竟如何，他的这种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一生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令我由衷的敬佩，也是远非我能所及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对周泉缨给自己戴多高的桂冠，不想说三道四。对他自诩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这一研究成果，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不想妄评这究竟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还是虚幻无稽的梦呓。我只希望他不要以为“历史永远只能是任人雕刻的历史”¹而故意曲解清华文革的历史。至于在他的这一“理论”指导下所得出的有关文革特别是清华文革的一些观点，如“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能够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对立面 414 派的四五十头面人物打成反革命，能够下命令向包围清华文革左派组织的工人群众开枪等等，都说明蒯大富是无愧于自己文革缘分的群众英雄”、“清华武斗中 414 派死亡的战士永垂不朽”等等，都是

¹ 笔者把本书初稿涉及到周泉缨的部分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在《提前评判孙怒涛的回忆录》一文中说：“历史永远只能是任人雕刻的历史，真正实事求是的历史不是我们凡人能够把握的历史，而只能是神和佛才能把握的历史。”

我所不能接受的。我惊叹，几十年后，周泉纓写作时依旧保持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

他两次坐牢，人生道路坎坷不平，我深表同情。他坐牢那会儿，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现在想来，作为公民，他仅仅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这是他的权利。他是无罪的。我曾经幸灾乐祸，实在是太不厚道了，惭愧得很！

周泉纓的坎坷，不仅在文革中。即使在改革开放年代，厄运还继续纠缠着他。又听说近年来身体也不佳。即便如此，周泉纓仍然付出很多努力与代价，锲而不舍，笔耕不止，常有著作问世。他的这种精神，令我佩服，值得我尊敬！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多多保重！

最后，我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是非非周泉纓”，说的是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这是事实，不含褒贬。至于“毁誉参半理论家”，也是事实。我这里说的理论家，是不打引号的。因为在派战年代，即使是至高无上的领袖钦定他为“理论家”，我心里根本就没认可。今天，我不赞同他的理论，但我承认他是一个理论家。毕竟，他从事理论工作多年，而且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他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专著，更发表了难以数计的网文。试问，我同时代的校友中，有谁能出其右乎？作为一个理论家，如果默默无闻，如果没人赞赏或诋毁，那才是可悲的。那些著名的、伟大的、不朽的理论家，即便是马克思，也是毁誉参半的。就我所知，周泉纓在校友这个圈子里，对其顿悟理论持好评的不多，能顿悟的更少。但是在社会上，听说有一大批拥趸。这真是“校内开花校外香”。我祝愿他的顿悟理论能为更多的民众所参透。

第二十节 「联合总部」，联而难合

1967年9月15日，毛泽东发布了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这犹如一股强大的春风吹进清华园。都自称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团四两派没有任何理由不积极响应。

对于这次联合，蒯大富是作了认真努力的。他首先放弃了鸵鸟政策，明确承认414总部是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他只是改错。蒯大富做事，一向以功利导向。上次为了成立革委会而承认「414串联合会」，这次为了大联合而承认414总部。能改正错误，比坚持错误要好，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率领兵团总部委员到414总部所在地与414总部委员一起学习最高指示。这是一个友好的高姿态。在「联合总部」核心组的名额分配上，他从《四项协议》那个时

候的 9·4 往后退了一大步，认可了基本对等。这是一个关键的、实质性的让步。应该讲，蒯大富能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他对他的总部委员特别是持鹰派立场的强硬派，除了说服以外，也用他的权威进行了压服。因为这实质性的让步，已经超过不少团派总部委员可接受的底线，触及了团派的核心利益。尽管蒯大富心里可能也是打着“先联合你、再整治你”的小算盘，但是他为了实现两派的大联合，为了实现他有点过于乐观的“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2-P270]的目标，他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这一时的政治远见，于大局是有利的。

414 得到的这些实际成果，虽是 414 近半年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团派做了极大让步的结果。说句公道话，414 在这次联合中并没有实质性的退让或损失。虽然 414 中有些人并没有放弃“以 414 为主”目标，但是“以 414 为主”只是单方面的美好愿景，并不是切合实际的行动目标。414 总部对基本对等的结果是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

9月21日，两派签署了联合协议，发表了《总勤务站公告 001 号》，标志着两派的联合跨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谢富治、傅崇碧都给清华的大联合题了词。我认为团派为大联合的初步实现比 414 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但是，很遗憾，这次大联合，最后还是功亏一篑，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应该承认，联合的思想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因此，本来双方都应十分用心的爱惜维护这颗弱小的幼苗。一个很细小的偶发事件都有可能把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幼苗扼杀在嫩芽状态。要尽量做到不说不利于联合的话，不做不利于联合的事。

联合后的总部叫“总勤务站”，这是双方协商后都同意的，并且以此名称发表了公告。但是 414 中的激进分子对“总勤务站”的名称严重不满，认为有让外人误解 414 是被团派“吃掉”了的嫌疑。沈如槐屈从于派内压力，在全校大联合庆祝大会前向蒯大富提出更名为“联合总部”的强烈要求。这反映了 414 的不识大体、没有全局观和小心眼。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团派群众普遍的强烈抗议，认为是 414 又一次撕毁了协议。多数 414 群众也认为临时更名没多大必要，得不偿失，事后纷纷用大字报提出批评。沈如槐当时也认识到“会前临时要求改名，纯粹是出尔反尔的小人之举。由于改名风波，两派大联合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个问题上，我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我仍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后悔不已。”[1-P247] 改名风波引发的对立情绪把前些天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一点联合氛围冲淡了，冲散了。此外，414 在“对等原则”下谈判下属机构合并时所表现出来的斤斤计较，也是不够明智的。

两派中都有观点比较激进的一些人。虽然这部分人数不多，但都是派内骨干，能量极大，特别有煽动力。作为一把手，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量调和派中从激进到温和的各种意见，不可太偏重极端的一方。在这点上，我甚至觉得蒯大

富搞平衡的手腕比沈如槐要更高一些。

譬如，10月3日，团派激进的「624战团」变身为「斗私批修联络站」，其用意是斗蒯大富的“私”，批414的“修”。第二天，蒯大富写下了“伟大的空话，动人的口号，美丽的外衣，装着一个丑恶的小资产阶级灵魂。惊人的毅力，聪明的才智，僵化的脑袋，面临着暗淡而可怕的前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革命到底的，总是有极少数人摔出去，我们队伍中不见得全是好人”。¹他以软中带硬的口气与团派内的激进分子“共勉”之。这说明蒯大富当时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对派内的鹰派也是敢于批评、努力节制的。我很少见到沈如槐有这样的批评和节制。

在「联合总部」的名义下，两派共同组织了庆国庆、下乡三秋、复课闹革命等活动。这些活动的特点都是不涉及两派分歧，是无派性的公共活动。这些活动，有利于两派关系的融洽，有利于团四群众隔阂的消除，也有利于增添联合的气氛。

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的分歧，派性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联合总部」成立干部学习班，在干部人选上发生争执。414坚持把吕应中、罗征启放进来，团派坚决不同意。”[4-P277]「联合总部」公布的总部委员中（由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鲍长康、宿长忠、刘才堂、汲鹏、刘万章等33人组成）有谭浩强，一部分团派的激进分子也坚决抵制。在干部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本来就很大，都认为这是自己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肯妥协和让步，于是争执不断。

在联合的过程中各种干扰也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一个干扰是周泉纓接连炮打陈伯达增添了联合过程中的火药味。团派与414的大多数要批周泉纓，「东方红战团」要保周泉纓。于是，这一新的焦点既涉及到两派的派性利益又似乎不完全是一场以团四分野的纷争。

此外，我认为作为「联合总部」一把手的蒯大富，对「联合总部」的领导不够得力没有到位。蒯大富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团派一把手而不是「联合总部」的一把手。初步联合一个半月后，即11月8日才公布「联合总部」的总部委员名单。团派和414两个总部下各办事机构的联合和合并，举步维艰，没有强力推进。大多数的部门没有合并起来。「联合总部」仅仅是一个空架子，实际运行的仍然是团总部和414总部。初步联合后，两派没有制定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就算哪，头头和群众都是心中无数。很可能，我是苛求蒯大富了，他可能有我所不知道的难处。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很好利用9月底10月初的大好时机趁热打铁，联合的机会就这样在这两个多月中销蚀掉了。到了12月4日，团派绑架了吕应中，12月20日，团派绑架了陈楚三。这两起绑架事件，宣告「联合总部」名存实已亡，这次联合最终失败。

¹ 引自陈育廷 1967年10月4日工作笔记

这次大联合的失败，我认为主要责任不在上层，而是在两派本身，因为上层并没有响起有负面作用的不同声音。两派的分歧是深刻的，两派的派性是严重的，两派在处理联合中出现的问题都有不少的错误。在联合的开始阶段，团派的诚意和努力都是显著的，值得肯定的地方更多一些。最后团派策划的两次绑架，给苟延残喘的「联合总部」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在大联合的最后失败上，团派应负主要的责任。

我不会成为两派大联合的阻力。但是，要作为积极的推力，我的努力显然是做得很不够的。

第二十一节 414 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 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

414 有一首战歌。围绕着这首战歌，不仅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还把好几位中央首长都牵连进来了。

战歌是在「414 串联会」成立后大概 5 月份唱响的。歌词用的是林彪的一段语录，414 自己谱的曲。歌词是这样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嗨！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¹

说实在的，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对这段歌词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主要是那几句重复的“完蛋就完蛋”，觉得比较粗鲁，有点兵痞气。可能想要表达的也是革命英雄主义，但是总不如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样的毛主席语录来得威武、正气。要让我来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林彪这段语录做 414 战歌的歌词。

不过一想到这是林副统帅的语录，我就无语了。想想也是，在战场上，看到自己的战士流血牺牲，杀红了眼，什么糙话都可能会说的，顾不得粗鲁不粗鲁了。

文革初期，流传过毛泽东的好几首未公开发表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里面有一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不雅的甚至可以说是污秽的“屁”字一旦入了领袖的诗文，谁敢说臭？谁敢说不雅？报纸上的吹捧文章说那是伟大领袖在抒发豪情满怀的革命情操。中央级的文艺团体在恢弘的舞台上齐声合唱用这首诗谱的歌曲，堂而皇之地把“屁”字唱得震天响。

¹ 波浪线的字为林彪语录，最后一句是口号。

统帅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副统帅的话少说也得一句顶八千句吧？总之，歌词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抒发还是流氓无产者亡命一搏的宣泄，并不取决于歌词本身而是看谁说的。只要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谁敢说半个不字？

开始我觉得不是很顺耳，唱的次数多了，慢慢的就顺耳了，甚至悦耳了。414 集会时唱，游行时唱，广播台更是每天播唱。在派战中，唱这样的战歌就像打了鸡血针似的，特别能鼓舞斗志，激励士气。派性催生派歌，派歌益增派性。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这段林彪语录。沈如槐、周泉纓的回忆文章里，两人的说法有点出入。不管怎么说，周泉纓很欣赏这段语录，在 414 战歌形成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泉纓说，选中这段语录是因为它是“一贴良剂”，有助于“克服 414 派在文革中固有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 414 派对团派的战斗力。”[2-P116]

414 派中，「东方红战团」对团派向来是观点鲜明、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毫不妥协，已经很“亢奋”了。“温良恭俭让”的弱点是「三七战团」带来的。所以我把周泉纓的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含义就是：414 战歌有助于克服 414 派因为「三七战团」而带来的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 414 派对团派的派性战斗力。

团派有自己的团歌。第一句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旋律像是颂歌似的，比起 414 战歌的高亢激昂、杀气腾腾来，反倒显出几分温和味。林彪这段语录透出的“兵痞”气与团派某些人的“民痞”气，倒是很相通的。怪不得团派里有人认为这段林彪语录与团派的气质特别吻合，应该是团派的战歌才是。现在竟然成了 414 的战歌，阴差阳错，莫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派性是怎样炼成的？派性就是这样炼成的！

团派对这首 414 战歌恨得咬牙切齿，把他称为“完蛋歌”。414 不予理睬，你骂你的街，我唱我的歌。414 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也是响彻全校、无孔不入的。夜深时分，战歌一响，老团躲在被窝里直骂娘，老四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好几个月，就这样过来了。

突然有一天，那是 1967 年的 12 月 5 日，团派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称 414 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414 造林副主席的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还说 414 战歌用的是法西斯语言，宣扬的是武士道精神，曲调是豺狼般的嚎叫。总之，最歹毒的话都说了个遍。

在这之前没有一点征兆，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吓人的罪名。蒯大富有虚张声势的前科，414 早就领教过多次了。不理他！414 依旧我行我素，战歌照唱不误。

12 月 13 日，蒯大富发表公开讲话，说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要空军司令、林彪的老部下吴法宪核实是不是林彪语录。吴法宪回应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

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1-P259] 于是蒯说，如果再唱这首完蛋歌，就是明目张胆地炮打林副主席的反革命！蒯大富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密谋，动用了高层大人物的力量来打击 414 霸张气焰的这场战役，看来是胸有成竹、胜券稳操了。

蒯大富的这一番话，打了 414 一记闷棍。吴法宪言之凿凿而又无法证实的这番话让 414 陷入极度被动之中。认输不唱是不甘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铁证来证明 414 战歌的歌词确实是林彪语录。

414 里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纷纷出动，寻找这段语录的权威出处。很快，找到了。414 心里有底了。12月 16 日，414 广播台发表了一则声明，重申歌词是林副统帅的语录，但没公布语录的出处。414 使了一个欲擒故纵之计，这套虚虚实实的手法是想让蒯大富暴露得更充分些。

学校里的蒯大富还没来得及对 414 的声明做出反应，谢富治、戚本禹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蒯大富助阵撑腰来了。“谢富治说：‘我从未听见过，谣言。’戚本禹说：‘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罪该万死！’”[1-P260]

至此，起码已有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三位大人物对林彪语录表态，明确站在蒯大富一边了。

414 看时机已到，于 12 月 18 日在大礼堂召开战歌问题专题大会。这次大会由我主持，陈楚三做主题讲话。他在讲话中不仅公开批评了前两天谢富治、戚本禹的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更激动地宣布了 414 战歌歌词所用语录的原始出处。原来它出自林彪 1959 年 11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总参谋部编的《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汇编》。

总部在讨论开这个大会的时候，一致认为由陈楚三来宣布这一证据，比其他任何头头来宣布更有权威性、更可信。

当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老四一听到这一宣布，立时掌声雷动，欢呼雀跃，几乎把大礼堂的圆屋顶都要掀翻了，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沉闷憋屈一扫而光。

团派宣布战歌绝不是林彪语录，犹如一颗“炸弹”炸晕了 414。现在 414 回敬了一颗威力更大的重磅“炸弹”给团派，绝对把团派炸懵了！414 很得意。事态的发展似乎是在这一回合派战中，团派只能悄然认输，偃旗息鼓，而 414 可以大获全胜，得胜回朝了。

还没等到 414 好好地庆贺胜利，品尝胜果呢，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急剧直下。

刚过了一天多，即 12 月 20 日，中午时分，我正在九饭厅吃饭。刚吃了一半，突然，从门外跑进一个姓谢的女同学，找到我，对我说：“老孙，不好了，老团把陈楚三给抓起来了！”

什么？抓了陈楚三？我大吃一惊！张着嘴，含在口里的一口饭堵在喉咙口下

不去。我撂下还没吃完的半碗饭，心急火燎地跟着她一溜小跑到 414 广播台。此时科学馆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议论纷纷，吵吵嚷嚷。我知道了陈楚三是在照澜院食堂用餐时被团派用小汽车绑架走的。

在我以往的印象和判断中，团派恨「东方红战团」胜过恨「三七战团」。在「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中，当然对沈如槐最恨。对陈楚三，尽管也很恨，但是我以为在 414 所有头头中，团派最不敢动的就是陈楚三，因为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康生的“养子”。蒯大富即使想动 414 的头头，也绝对不敢动到陈楚三的头上。

为什么要抓陈楚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来的派战中，陈楚三始终坚定地抵抗团派的“旧仇”，再添上前天陈楚三宣布战歌是林彪语录的“新恨”，老蒯对陈楚三真的下手了。这是我的猜测。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蒯大富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非要把陈楚三抓起来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不可。据鲍长康多年后对我说，抓陈楚三这件事并没有在总部会议上讨论研究过。看来，这是蒯大富与保卫组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干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无疑是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

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不仅仅只是蒯大富，还有我。就在我到达科学馆不久，听得团派广播台广播了将在大礼堂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陈楚三大会的通知。我一听急了，手足无措，方寸大乱。有人说，沈如槐在中央主楼的一间房子里，因怕被团派把他也绑架走，被身边的人劝阻着不让出来。科学馆里只有我和宿长忠两个头头。我与他商量以后，用大喇叭把全校的 414 召集到西大操场。因为事出仓促，来到西大操场的老四都是非建制的散兵游勇。我除了讲陈楚三被团派绑架以外，也讲不出更多可以鼓动的话了。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分派一部分人去大礼堂捣乱团派开大会，一部分人去包围广播台不让团派专心斗陈楚三。我就这样胡乱地脑袋一拍，调兵遣将。结果，除了造成冲突以外，毫无点滴建树，倒尽显一个书呆子头头在面临突发大事时的笨拙和慌张。

陈楚三被绑架一事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信息：如果蒯大富连陈楚三都敢抓，那么 414 里所有的干部、群众，尤其是 414 头头，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敢抓的，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414 是这样的一个群众组织：像周泉缨引爆的内乱很可能让 414 四分五裂，内讧不断；而蒯大富，甚至是中央文革的横蛮高压只能使得 414 更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这次陈楚三被抓事件对 414 的正面效果是，因《必胜》争吵造成「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之间的巨大裂痕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我想，沈如槐一定也与我一样更明白了，「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精诚团结，减少或者搁置分歧，才能在险恶的大风大浪中让 414 走得更远些，更久些。

陈楚三不只是「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更是 414 的核心头头。在援救陈楚三的问题上，我和「三七战团」没有二话，唯有全力以赴。

冷静下来以后，总部认真研究形势，认为只有上街游行，把事情闹大，让中央知道，才有可能解救陈楚三。

12月21日上午，414 组织了 1500 多人的队伍进城游行，向社会公布战歌事件的真相，诉说陈楚三被抓的冤情，争取舆情的支持，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陈楚三。同时，还质问北京市公安局究竟是谁同意抓了陈楚三。我们想以此惊动更高层领导关注这一事件。“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刘万章说：‘如果陈楚三是反革命，那我们大家都是反革命，我们与陈楚三共存亡。’宿长忠谴责‘蒯大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孙怒涛高呼说：‘还我人生安全！还我‘四大’自由！’” [1-P266]

游行队伍在北京市革委会前举行了集会。集会后，在队伍要不要留下来静坐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原来在头天晚上总部核心组开会的时候曾经做过决议：如果上面不立即释放陈楚三，游行队伍就不回校，静坐到底。真到要执行总部决议的时候，不少分部头头及许多骨干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这样孤注一掷的做法是不是策略？学校里的运动还要不要继续搞？已近隆冬，这一千多人的队伍的后勤供应怎么保障？等等。我与汲鹏倾向于先把队伍拉回学校再说。与沈如槐、陈楚三、宿长忠关系极好的张雪梅，出于尽快救出陈楚三的焦急心态，对我这样的“退缩”态度很不满。沈如槐有心想坚持静坐，但从全局考虑，也看到大多数人不想留下来，决定大部分回校，一小部分留下。因为陈楚三是数力系的又是分管广播台的总部委员，所以自愿留下的三四十名老四也多是数力系或广播台的。他们由总部委员张雪梅和数力系分部一把手周忠荣（当年曾叫周忠东）负责，赶往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来访接待室，办起了「革命到底学习班」，目的是要查清绑架陈楚三的真相，要求立即释放陈楚三。

不清楚是不是 414 声势浩大的游行真的惊动了中央的更高层还是另有原因，反正是才过了几天，事情出乎意外地发生了转机。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生纪念日。那晚，414 正在西大饭厅举办“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庆祝晚会。九时许，突然接到中央首长接见的通知。戚本禹、谢富治还有北京市的领导丁国钰、李钟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先单独接见团派，再单独接见 414，然后两派一起接见。

在接见 414 的时候，陈楚三被架着出来，放回到我们中间，意思是说放人了。才几天不见，本来温文尔雅白净斯文的陈楚三，脸上带着伤痕，尽显受尽折磨挨打以后的疲惫。我们立即涌上前去，围着他，如劫后重逢，格外的亲热。

已经知道这段语录是林彪的，已经知道抓陈楚三抓错了，说不定因此还被更高层批评了几句。即便如此，戚本禹张狂的本性丝毫没变。在接见会场，我们与

他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他一再狡辩，说“你们的战歌也是有问题的嘛！曲调不够高昂，也不够严肃……‘完蛋就完蛋’多了么，怎么那么多？……反复也不行。说的严重些，这实际上就是篡改。……起码是不妥当、不严肃。”[1-P269]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战歌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听，我们很受鼓舞，戚本禹问：“你们谁来唱一唱？”我们八位代表再加上陈楚三，蹭的一下全站起来，昂着头挺着胸，齐声唱了起来。尽管我们这几个大小伙子五音不全，但是声音绝对响亮，几乎是对着戚本禹在吼叫，恨不得把他的耳膜震聋！

在同时接见两派的时候，戚本禹不敢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他照本宣科地念了预先准备好书面稿。他不得不承认“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戚本禹在“但是”后面又开始大做文章了！他“但是”道：“这个改编没有把林彪同志论述八大作风全部表现出来，同时也没有把林彪同志的我军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作风的话引全，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来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同志伟大的军事著作是不妥当的。此外，战歌的曲调也不够高昂……”[1-P273]

看着这毫无自我批评精神、鸡蛋里挑骨头、无理搅三分、满嘴胡喷的戚本禹，我心里极度的厌恶和鄙视。心想，像他这样没有教养连狡辩都没水平的无赖，怎么就混成“中央首长”了呢？

还有可气的是，就在接见会场，团派代表看到陈楚三在场，对着我们大声叫嚷“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抓起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放出来是实行群众专政！”我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央首长明确表态陈楚三是无罪释放。但是谢富治、戚本禹对我们的抗议置之不理，只说“陈楚三出来了就是了嘛”，绝口不提“无罪释放”。这使我们感到，战歌事件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还留有尾巴。团派只是输了一个回合而已，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2月27日黎明时分，我们回到学校，马上组织欢迎陈楚三胜利归来的群众大会。从南校门直到大礼堂，七千多名老四列队夹道欢迎陈楚三。尤其在大礼堂的过道上，人们簇拥着陈楚三向台上走去。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如欢迎钢铁英雄凯旋归来。对414来说，他们不得不释放陈楚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陈楚三被释放了，本来驻扎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的「革命到底学习班」也可以撤离回校了。可是，释放当天中午，团派有十几名总部委员发表联合声明，说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也发表讲话，说“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抓就抓，想放就放。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1-275]想到陈楚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抓走，又不清不楚地被放回，觉得事情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不，遗患无穷。总部与「革命到底学习班」商量以后决定，一定要为陈楚三讨一个公道，

也为 414 讨个公道，这个学习班还是要坚持办下去。

这以后，「革命到底学习班」由周忠荣负责。

总部委员都到过「革命到底学习班」，我也在那里住过二天。我发现他们与公安局工作人员的关系很不错，彼此能平和相处。这很不简单。因为在北京市一般民众的眼里，既然 414 是蒯大富的对立面，那 414 肯定是保守的，不被中央支持的。尤其是公安系统，是谢富治一手把持的地盘。要在公安局门口的接待室里和平申诉，万一有点过激的言语或行为，马上扣个“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帽子，吃不了兜着走。周忠荣他们白天学习、开会、写大字报、找公安局的同志申诉和询问，晚上铺点东西和衣而睡，还有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这二三十位老四都在为陈楚三被抓一事讨个公道做出了极大努力。其中有位姓薛的女教师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令人感动。我对这批「东方红战团」骨干的精诚团结，对周忠荣的奋勇带头和出色能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惊羡不已。陈楚三能有这批生死之交，不枉为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坐了几天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禁闭。

「革命到底学习班」在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接待室坚守了 95 天。他们要求追究抓人关人的责任人，矛头直指蒯大富、谢富治，同时要求为陈楚三彻底平反。在蒯大富、谢富治大紫大红的时候，这些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1968 年 2 月份，首都高校学习班开张。学习班负责人李钟奇、丁国钰批评 414 至今还有人进驻在北京市公安局里，是破坏大联合的气氛。沈如槐和我这些参加学习班的头头感到压力很重，劝说「革命到底学习班」撤离。他们不听，反把我们这些头头训了一顿，说我们太软弱。连沈如槐都劝不动他们，我的话当然就更没分量了。

2 月中，戚本禹倒台。414 上下欢声雷动。这本来是一个顺坡下台的好机会。总部作出决议命他们撤回学校。但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倒谢富治的风潮，他们认为那里是一块很好的宣传阵地，想再看一看，还是不肯撤回。

到 3 月 24 日，杨、余、傅倒台了，而谢富治反倒岿然不动。他们这才撤回学校。

对于这批「东方红战团」的骨干，我既钦佩他们的执着，也恼火他们有时候的固执。

在 414 头头中，被团派扭送进公安机关的，前有周泉缨，后有陈楚三。因为周泉缨的《炮打》在 414 群众和总部里都是不得人心的，认为他的炮打行为是伤害 414 整体利益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所以，他被扭送进去以后，414 总部并没有对他有营救的举动。相反，在底下里，我听到过说他是自己想当反革命、是咎由自取的议论。陈楚三被团派绑架至公安局，大家一致认为陈楚三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了 414 整体利益而受迫害的。所以 414 上下一气，誓把陈楚三营救出来。对他们俩被抓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了尽管在派性年代，414 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

在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后人看来，战歌事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回头看看，确实是闹剧。414 拿林彪语录当做派歌是闹剧。团派攻击 414 伪造林彪语录是闹剧。414 反击团派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也是闹剧。一段话，要是领袖语录，那谱曲传唱就是热爱领袖的表现，否定这段语录就是恶毒攻击领袖。若不是领袖语录而当作领袖语录，那就是篡改领袖语录，罪该万死。至于这段语录，内容是不是正确、健康、有品位，那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互相攻讦，更是闹剧。如果只是打口水仗，骂来骂去，还只是小闹剧。最后竟然把陈楚三给绑架了，最后公安机关竟然把陈楚三收监了，最后把多名中央要员都牵连了进去，这更是大闹剧。

一场闹剧，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荒诞！

在战歌事件中，可以看到团派和 414 都是派性大发作，很难说得清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但是从团派绑架陈楚三开始，虽然 414 救援陈楚三的行动中有很大的派性考量，但是谁能否认得了这是对蒯大富任意剥夺人身自由（他这时有没有想起一年多前他被工作组无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对谢富治践踏法纪草菅人命、对戚本禹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正当抗争？

经历战歌事件，我感觉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一点保证，随时都有被抓捕被绑架的危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感到害怕。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很团结的、很强大的组织 414。我只是感到清华的文革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已经没有开展正常辩论的环境和氛围了。现在已经不是看谁讲得更有道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了。

我心里非常希望蒯大富能吸取教训，就此罢手，不再炫耀武力，不再使用武力。但是，良好的愿望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几天以后，清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我强烈怀疑其中很重要的动因就是团派在战歌事件没有捞到好处而心生报复。

第二十二节 1.4 武斗，我拿起竹竿当长矛

仓促上阵

1968 年元旦刚过几天，两派之间发生了 1.4 武斗。武斗地点在学生宿舍 12 号楼。我从入学开始一直住在该楼的四楼，所以这次武斗我是被撞上了。

刚刚经历了 414 战歌和陈楚三被抓放的事件，两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对立情绪相当严重，但是我没预料到马上又会发生武斗。我的政治嗅觉向来是比较迟钝的。

1968 年 1 月 3 日晚上，我在主楼开会。会议结束，已近半夜，我一个人回宿舍。到八饭厅前，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团人，夜色下，分不清是十几个还是二十几个。他们戴着口罩，穿着棉大衣，有的正从 11 号楼出来，有的已经快到 12 号

楼的东门。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在这里出现这样一群形迹可疑的人？我顿感蹊跷，当即改变路线，绕到 12 号楼西门进楼。到 227/229「红尖兵」广播台，见但燊（自 9）等人在，还未睡觉。我对他说了刚才路上碰到的情况，说今晚要多加小心，很可能会上出事情。才谈了大约一刻钟光景，忽听得从楼上传下来暖气管的击打声。不一会儿，从各处房间里发出来的击打声大作，响成一片。但燊说：“糟了，楼上真的出事情了。”他赶紧跑了出去。

我对于 12 号楼究竟有什么值得团派要来偷袭的，茫然不知。我的精力和兴趣一直是在学校里，对于系里、年级里和班里的事情极少关心，几无过问，知之甚少。即使对同班的同学，大概只有三分之二我分得清谁是老团谁是老四，有好几个人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老团还是老四。414 每个系的学生分部，一般都是一个年级推举出一名负责人，六个年级的六名负责人组成分部。414 自控系的分部委员我认识几个，也没认全。如果说 414 的总部委员也算是一个“官”的话，那我这个 414 的二把手也真够“官僚主义”的了！

楼道里全是闹哄哄的叫嚷声和脚步声。我班里已经有不少人毕业离校了，还有一些人准备在最近几天离校。有人告诉我，各个班的老四已经把本班的老团都赶在房间里，警告他们老老实实地待着，不要到处乱走，要是到楼道里去，会吃苦头的。我听说，有个别不老实待着的老团，真挨了几下打。就这样，老四把整个楼道控制起来了。

至于老团怎么偷袭的，老四怎么抵御的，我都不清楚。自控系的分部委员们都很有组织能力，他们既没有向我这个“上级”“请示汇报”，也没有像对待小兵那样的分派战斗任务。更有意思的是，当我看到同班的老四都忙进忙出的，我问他们：“我做点什么？”他们居然说：“你还是待着吧！”看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安排我做什么。小兵都在忙乎，倒是要我这个头头到边上凉快去。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从来就不适合做指挥或当小兵似的。我也不生气。因为我知道我既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不熟悉 414 自控系分部的人员、组织及准备情况。

楼道被 414 控制，一楼的楼梯和通到五楼的楼梯都被堵住了。我就在中间的几个楼层各处走走，问问情况，有时也去 227 室转转。我好像是一个夜游神似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该去哪里？

大约几十分钟后，当时我正在 227 室里，忽见窗外有一个黑影从上往下掠过，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声闷响。不一会儿，又见一个黑影摔下。楼外围着的人见有人从楼上摔了下来，都赶紧跑过来，把人架走了。我想，这跳楼的肯定是老四。问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说很可能是从五楼跳下来的。

我吓呆了，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完了！肯定死人了！从五楼跳下去，哪有不死的道理？

我心中无比悲痛，无比气愤。拉过话筒，带着哭腔在广播中通报了两位同志

被团派攻打被迫跳楼牺牲的消息。我还声嘶力竭地高喊口号：“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我的心里真的是难受到了极点，麻乱到了极点，老是不停地念叨：“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后来，听说老团正在不断地攻楼。有一个人，可能是分部委员吧，把我带到二楼西头，说，你守这里吧。于是我与其他几个老四守在这楼梯口。

一楼是无法防守的，因为有太多的窗户，按照预案早已放弃。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塞满了双层床、桌子、椅子等杂物，用以阻止老团沿着楼梯往上攻。

老团要爬行钻过这些障碍物是很困难的。但是老团很顽强，在水枪的掩护下，不怕水淋，手拿铁棍一点点的往前挪动。

我们拿着拖把等物挥舞着阻挡他们，驱赶他们，还拿皮管的水滋他们。大冬天的，水冰凉冰凉的，浇在身上肯定很难受，但还是挡不住这些老团前仆后继地往上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急着想去救援五楼的老团。

我找不到好使的家伙，两手空空的，心里想着阻挡他们，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终于找到一根短木棍，拿在手里似乎比什么都没有要强一些。

老团拼命攻，我们这几个守楼梯的老四没敢下重手拼死命阻挡。几轮进攻以后，老团终于攻上了二楼。眼看抵挡不住，我与另一个老四，赶快退守到227/229套间里。

一进房间，我们赶紧关上门，顺手拉上一张上下铺的双层床顶上。

听到有人在外面撞门。我们在里面用力顶住双层床。有床铺顶着房门，外面的人想进来是很困难的。

撞了一阵，撞门声没有了。过了一会儿，有个脑袋瓜子在气窗上冒头往室内探视。他肯定是脚下垫了凳子之类的东西才爬得那么高的。

他向下看见了我们，我们抬头也看见了他，就这样对视着。因为有床铺顶着门，所以我心里并不是很害怕。

一忽儿，一根长矛从气窗上伸了进来，他想来刺我们。我们见状，赶忙找室内可以抵御的东西。我拿起挂蚊帐用的竹竿，另一老四拿起拖把，与他的长矛对打。好在他的长矛够不着我们，更重要的是他站在上面从气窗里伸进来的长矛施展不便，无法发挥这件“武器”的有效威力。我们站在长矛的威胁圈之外，只用竹竿、拖把打他长矛的端部，与他纠缠厮打。

这样对打了一阵以后，他见奈何不了我们，又去拖来一根水管，可能就是我们刚才丢弃了的那根皮管。他用手捏扁了水管口，一股强力的水流从气窗上方滋进来，对我们发动“水攻”。我们的竹竿和拖把顿时失去了抵抗作用，只好赶快躲在床背后，躲在远处的角落里，靠着墙壁从侧边用竹竿去干扰他，不让他专注、直接地来飙射我们。即使这样，我的头上、脸上、身上、尤其是眼镜片上都被滋了不少水。趁间隙，我随手拣了一条毛巾在头上扎了一个兜，活像陕北放羊的老

汉扎在脑袋上的那种白羊肚手巾。

我退守的这间套间似乎并非是团派非得攻下来的要地，所以门外的一两个老团好像也没下力气花功夫铁了心攻门。除了交替使用长矛和水管以及有时候使劲撞几下门之外，他们也想不出破门的更有效办法。这样，我们与门外的他们经常处于半战半休状态。当然，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时刻准备着对老团的进攻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紧张的对峙，好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我只听得 12 号楼外面一直有很嘈杂的人声。武斗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一无所知。

我们的方针是坚守待援。即使外面好长时间不来进攻了，我们也不敢拉开双人床开门看看动静，害怕老团正等待着我们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等到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听外面有人喊，解放军来了。一会儿，有老四来敲门。于是我们移开双层床，打开门。来人告诉我，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来制止武斗了，武斗已经结束。

谈判负伤

解放军要求两派谈判解决争端。

我是总部委员的身份，以及我是自控系的学生，又亲历了武斗，这就决定了我责无旁贷的要作为 414 的首席代表参加谈判。

我们要求就在 12 号楼里谈判。因为此刻的 12 号楼由 414 控制着，在这里谈判才安全。团派要求在 11 号楼谈判，因为 11 号楼是电机系老团的势力范围。他们想在他们的地盘上谈判，想法与我们一样的。为谈判的地点，双方争执不下。

制止武斗的解放军见团派绝不让步，把这视为原则问题，解放军只好来劝说我们。他们说，现在的 12 号楼是武斗现场，打成这个样子，满地是水，好多桌椅都在楼道里，不适合双方的谈判，要我们去 11 号楼谈判。我们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好在有解放军在，我们也不担心了。于是就对解放军提出要求：必须保证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才能去。解放军承诺了。我们五个谈判代表，跟着几名解放军战士去 11 号楼。我走在最前面。

11 号楼在 12 号楼南面，相距也就是二十米左右。我出了 12 号楼西门，看见 11 号楼西门口聚集着不少人。

快走到 11 号楼西门的时候，楼上的老团从上面的窗户口砸下东西来。有石块，有墨水瓶，有鞋子等杂物。我用双手抱着头弓着腰走。突然，我的额头被一件硬东西砸中了，眼镜也被砸得从鼻梁上滑了下来，挂住一只耳朵上。说时迟那时快，紧靠在我身旁的一位身材高大的解放军战士张开双臂呼的一下扑上来，把我的脑袋压在他的咯吱窝里，大步推着我走了几步，护着我进到 11 号楼西门。我听到他身上也有被东西砸中的声音。好在这一段路只有短短的几米。老团也只是泄愤，并没有拿特大特重的家伙往下砸，怕出人命。

进到楼里，我从那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挣脱出来，感觉额头上有点痛、有点热、

有点湿，用手一摸，是血。原来右额被砸中了，砸破了皮，砸出了血，所幸没正中碰到脑瓜上，没砸成脑震荡。我就让血花挂着，也不去擦掉，想等一会儿与团派谈判时作个证据，讨个说法。

谈判的地点在 11 号楼三楼东边那间套间里。到了那里，我才认出掩护我的“解放军战士”原来是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李钟奇将军！

李钟奇肯定认识大名鼎鼎的蒯司令，知道响当当的清华「井冈山」。我想他很清楚中央文革对蒯大富对清华「井冈山」的态度。幸好，他这次来清华只是奉命制止武斗，并非是对这场武斗的是非曲直来作裁决的。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规矩。作为一个军人，他更晓得。清华这次武斗，既非两国交战，砸谈判代表也远没有“斩来使”那那么严重。但是，公然在他的眼皮底下砸谈判代表，挑战他对 414 的承诺，这已经超越他容忍的底线。耿直的他顾不了那么多情面。当两派谈判代表都到齐以后，他对团派训开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守信用的呢？怎么可以把谈判代表都砸了呢？”

老团的代表面面相觑，脸上无光，不敢吱声。这理亏是明摆着的，还有什么好辩解什么呢？

我知道，这只是极个别老团的过激举动。但是，就是这样只顾一时痛快的行为将自己这派的谈判代表陷于尴尬、难堪的不义之地，在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将军面前颜面扫地。于是，我觉得我所挂的这点小小的花，实在太值得、太划算了！

李钟奇指责了一通团派以后，看着我额头上的挂花，一只大手拍拍我的肩膀，神色深情、声音凝重地说：“砸在小将的身上，疼在我老将的心里啊！”

我一听到他说这样的话，顿时感动万分，热泪差一点夺眶而出，不能自己。四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当时他说这句话时候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让我心里热辣得很。¹

李钟奇将军自比老将，视我们为小将，危难的时候首先保护我们，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他自己身上也挨了砸，全然不顾，只想着制止清华两派武斗是他这次来的使命。

即使有李钟奇在，两派代表仍然互相指责对方挑起武斗，造成己方人员重大伤亡。414 说武斗发生在 12 号楼，来攻打的老团都是外系的专业武斗人员，不是团派挑起的又是什么？团派有点理亏，但是仍然争吵强辩。李钟奇一看，不强压不行。就说，你们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武斗，达成协议，否则由军队接管。这一压，果然见效，双方态度软化了不少。李钟奇命人按他的意思当场起草了协议，让双

¹ 笔者注意到李钟奇在文革中曾对被批斗的彭德怀拳打脚踢、公报私仇、态度恶劣。他这样的行径是笔者反感和不齿的。但是笔者还是要在这里如实记录亲历的这件事及其当时内心感受。

方代表马上签字。协议如下：

清华两派停止武斗协议书

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上午，在卫戍区李付司令员亲自主持下，由团派和四一四派，各派五名代表，就停止武斗问题进行了协商，已达成如下协议：

- 一、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抓的人无条件释放。
- 二、停止武斗后，保持原状，不得再发生武斗，事态不准扩大，保证四大自由、人身安全。十二号楼 427、429、527、529 号两个房间由卫戍区封闭，听候处理。
- 三、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斗工具，由解放军接收。双方解散专业武斗队。
- 四、双方不准利用广播进行互相攻击。
- 五、解决武斗，主要靠毛泽东思想，双方都要自觉地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斗私，批修”，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 六、以上诸条，由解放军监督双方，坚决执行。武斗停止后，谁再挑起武斗，要负完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

团派代表 鲍长康（签字）

四一四代表 钟成国（签字）

1968、1、4

协议写好双方看过认可以后，先由团派的谈判首席代表、他们的二把手鲍长康签字。轮到 414 签字的时候，我们小声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自控系分部主要负责人钟成国（自 7）代表 414 方面签字。一来是以此突出是团派来攻打 12 号楼的 414 地盘的。二来是为了故意矮化团派：414 在与团派的多次谈判中，处处要争对等，显平等。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与鲍长康对等的应该是我。但是这一次我不签字，让钟成国签字，是我们要的一个小心眼、小花招。果然，协议达成后，听说鲍长康在老团那里挨了“骂”，说他不该与 414 的一个分部头头一起签字，太不对等了。鲍长康本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只因为是他先签的字，明知吃了点亏也没办法了。

同样是这位号称“救火队长”的李钟奇将军，他在七二七那天也来清华制止武斗了。只是，这一次他所经历的就没有 1.4 武斗那次那么幸运了。团派“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12] 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说肯定是很不愉快的。

过程回放

关于 1.4 武斗，我从 414 方面了解比较容易，也了解得比较详细。团派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就不够详尽。我从但燊（代表自 9 年级的 414 分部委员）、郭创贤（代表自 0 年级的 414 分部委员）、钟成国（代表自 7 年级的 414 分部委员、自控系分部主要负责人）、崔兆喜（团派总部委员、保卫组负责人、团派 1.4 武斗现场指挥）等有关当事人了解到的情况，1.4 武斗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自控系从学生到教师，大部分都是 414 的，尤以自 9、自 7、自 0 这三个年级更强，是 414 力量最强的系之一。12 号楼是自控系男生的宿舍。11 号楼是电机系男生的宿舍，团派的力量占优。

武斗的直接起因是团派偷袭自控系 414 的「红尖兵」广播台。

这个时候的清华，团派已经有三个广播台，414 有两个广播台。团派总部领导的广播台设在明斋，414 总部领导的广播台设在科学馆。这些总部的喉舌，都是影响很大能够覆盖全校的广播系统。由团派激进分子在一教开办了代表鹰派观点的「前哨」广播台，广播的内容观点极左，用词偏激，语气火爆，影响很大，在派仗、武斗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恶劣。414 没有相类似的广播台与之抗衡。11 号楼的电机系团派有一支骨干队伍「捉鬼队」，因在“智擒王光美”中大显身手而闻名清华。电机系的团派办了团派中唯一一个系级广播台，足见其实力的强大。这个取名为「太阳升」的“地方台”，水平比总部直属的广播台要差多了，广播的文章多数只是谩骂式的攻击和派性口号。「太阳升」的影响范围只在东区学生宿舍楼一带。对着 12 号楼的喇叭日夜高分贝的骚扰，害得 12 号楼的自控系老四（也包括自控系老团）苦不堪言。于是，有几个自控系老四自发办了一个「红尖兵」广播台，与「太阳升」针锋相对唱对台戏。「红尖兵」广播台得到 414 自控系分部的支持，414 总部对此当然也是乐观其成的。只是，水平也很有限，同样是派性十足。就这样，「红尖兵」广播台与「太阳升」广播台，针尖对麦芒似的，谁也不让谁。两个广播台的喇叭，你方唱罢我登场，日夜扰民，苦了东区所有的学生们。

架在 11 号楼的喇叭对 11 号楼自己的影响比较小。现在架在 12 号楼的老四的喇叭正对着 11 号楼，11 号楼的老团就受不了了。他们必欲除去这根眼中钉肉中刺而后快。此外，因为在 414 战歌事件中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最后铩羽而归，团派心中有气很想报复一下 414。我想，这些都可能是引发 1.4 武斗的原因吧？

12 号楼是一幢五层楼的学生宿舍，每层楼中间是一条东西向的长长楼道，南北两边是宿舍。两头的北面是卫生间和盥洗室，南面是成套间布局的两间宿舍。楼的东西两头各有楼梯上下。「红尖兵」广播台的广播设备安放在二楼的西南套间 227/229，广播线从二楼沿着外墙连到架设在楼顶的喇叭。从二楼到五楼的各层套间都住有老四，便于守护线路和喇叭。

1968 年元旦前后，有人向 414 自控系分部反映，说有几个彪形大汉在 12 号楼内外转悠，形迹可疑。其中有一个是自 9 的。他是体育代表队的，平时不回 12 号楼住，现在是团保卫组的。这引起 414 自控系分部的严重警惕。他们分析认为，团派对 12 号楼感兴趣，一定是冲着广播台来的。经研究后，他们作出决定并有预案：

1、派人防守 527/529 套间。因为这个套间里住的六字班学生已经毕业离校了，现在空无一人。于是决定各年级派五六个老四轮流值守 527/529 套房，确保广播台线路和楼顶喇叭的安全。

2、若有团派来袭，立即敲打暖气管。暖气水管各个房间各楼层相连，声音可以传递很远，比在楼道里喊话管用得多，算得上是一项古时烽火台、抗战时消息树的清华版应用。

3、若团派来袭，各层楼的老四应立即用床、桌子等把楼梯堵起来并把守。阻止更多的老团前来攻打。

4、自控系的老四手无寸铁，是抵挡不住团派保卫组进攻的。为此，但燊专门找到宿长忠，请求他在 12 号楼出事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带人赶来支援。

电机系的团派听说自控系的 414 把五楼西边空出来的套间抢占了，心里很有气。对「红尖兵」广播台，心里更有气。砸掉广播台，教训教训 414，出出心头的恶气。想法就那么简单。负责团保卫组的崔兆喜是电 9 的学生，「捉鬼队」与团保卫组的联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这次行动有没有经过团派总部的研究和同意，这点存疑。

团派的保卫组早就成立了。绑架 414 干部，抄抓 414 头头，冲击会场等等都是他们干的活。保卫组里很大一部分成员来自校体育代表队，个个高大彪悍。414 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类似机构，所以吃了不少亏。沈如槐意识到两派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而且逐步升级，没有自卫能力是不行的。于是由宿长忠负责，组建了「李文忠学习班」，以便应对突发冲突事件。

527/529 套间第一天值守的是自 9 的老四，当晚无事。第二天由自 0 的郭创贤、江道波等 6 个老四值守。

夜半时分，团派先派人潜入 12 号楼察看，发现全楼学生多已就寝，并无异常。于是用手电向 11 号楼的老团发暗号，表示可以开始行动。团保卫组一行十余人蹑手蹑脚从东门进入 12 号楼来到五楼 527 门前，开始破门进攻。遭到偷袭的值班人员立即敲打暖气管报警求援。

在 227/229 套间里值守的老四立即开启「红尖兵」广播台，用大喇叭呼叫「李文忠」学习班前来自控系救援。团广播台立即播放音乐干扰，瞬间就把「红尖兵」的求救声给压了下去。科学馆、主楼等地的老四根本就听不到「红尖兵」的广播声。周边楼群的老四知道 12 号楼出事了，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不明，又一时难以组织人员，所以，只能由自控系的老四独自应战。

除了派人到主楼等地去找宿长忠外，414 自控系各分部委员指挥各个年级的老四分头行动起来。自 9 的老四马上用床和桌子堵住了东头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自 8 的老四也用床和桌子堵住了西头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接着，但燊带了几个自 9 的老四从东头冲向五楼。住在四楼的几个自 7 的老四已经先行冲上了五楼。他们看到楼道西头有十来个人高马大的团保卫组的人，头戴刺杀面具（击剑代表队运动员专用的防护面具），手执长矛、长棍。这些人，一部分正在猛烈砸打 527/529 套间的门，还有几个人手执长矛面对着从楼道东头来的老四。西头四楼

通向五楼的楼梯已经被他们用木床和桌子堵住，以防 414 从西头四楼往上攻。此时，五楼东边的楼道里已站满了老四。虽然 414 在人数上占压倒的优势，但是老四手无寸铁，几次试图冲上前去为 527/529 套间解围，那些老团只要抖一抖手里的长矛，就被逼退回来了。但燊等人除了责骂老团，毫无办法，只能等待宿长忠的援兵。老团对楼道东边的老四只实施警戒，并不反攻，正在集中力量砸打 527 房门。由于房内用木床顶着房门，老团一时也无法攻破。久攻不下，他们打开楼道西头墙上的消防水龙头，向 527 房里喷水。这下提醒了但燊他们。老四也打开楼道东头的消防水龙头向老团喷去。老团调转水龙头与楼道东头的老四对射，两支水枪打开了“水枪战”。大部分老四躲进两旁的房间避水，老团本来也可以躲进西头北边的盥洗间的。因为他们要急于攻下 527，就顾不得躲避老四的水枪了。十来个老团全部集中在 527 房门外的一块窄小的楼道上，被水龙头淋得透湿。

但燊他们望眼欲穿，焦急地盼望着救兵快快到来。熬过好一段时间，由宿长忠亲率的「李文忠学习班」十来个人，通过东边楼梯来到五楼。

虽说「李文忠学习班」是 414 里最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比起团保卫组，装备上还是差得太远了。他们既没有长矛这样进攻武器，也没有面罩这样的防护器具。比自控系老四强一点的是手里有一根一尺左右的短铁棍。老团武斗人员见来的是这样一支援兵，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宿长忠他们面对手持长矛的老团也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楼道里又出现僵持局面。

这个时候 12 号楼的武斗态势，是一种团派与 414 之间复杂的包围和反包围交叉、内线与外线层叠的类似于“三明治”的局面：

处于最内线的是郭创贤等值守人员。他们既没有任何反击能力，也没有退路可逃。527 房门已经被长矛、铁棍砸开一个大洞。几个老四躲正在床背后使劲顶住不让房门被撞开，还有几个老四拿着竹竿与伸进来的长矛对刺。他们的处境最危急，只能固守待援。

郭创贤他们的外线是团保卫组。团保卫组包围着他们并全力在向他们进攻，又被「李文忠学习班」所包围，不得不戒备防守。团保卫组的处境也有点不妙。

再外线是宿长忠他们。他们包围了团保卫组，离解救目标近在咫尺。但是前进不得。如僵持下去，危险性会越积越大。因为，如果团保卫组攻破 527，解决战斗，就会转过身来全力以赴对付他们，他们定要吃大亏。另外，如果楼外的团派增援上来，他们也将腹背受敌，必招致全军覆没。这两种情况只要发生一种，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外线的是在 12 号楼外面赶来救援的众多老团。“团总部崔兆喜、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继芳等人” [4-P315] 悉数到场。他们知道团保卫组已经攻入 12 号楼，但在楼内被 414 包围起来了。他们组织力量从一楼向二楼往上攻，但是楼梯已经被堵死，二楼还有老四拼命守卫，老团人数再多，也施展不开手脚，

上攻与保卫组会合的难度极大。

12 号楼外面也有众多的老四。只是因为没有组织，无人指挥，形不成战斗力，又不明情况，只能干着急，形同观战。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无论是在外线还是内线上的老团或老四都在尽力突破僵局，把胜利的天平扭向自己这边。

终于，在五楼楼道出现了转机。有几个老四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双层床，竖起来，床板对着老团，几个人躲在床板背后推着床向前滑行。这无疑是一张巨型的盾牌。盾牌后面跟着几个老四手持消防水龙向老团射水。一时间，五楼的老四喊声震天，一下子就冲到老团面前。老团的长矛在这盾牌面前失去了威力，也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还没等老团反应过来。经过一阵短暂的搏斗，在楼道里的这几个老团全被缴械俘获，赶进了盥洗间。

正当宿长忠、但燊他们庆幸解围终于成功，进入 527/529 套间，发现就在几分钟之前，郭创贤和江道波已经从五楼摔下去了，生死不明。

原来，就在宿长忠他们想法突破团保卫组防线的时候，团保卫组的另几个人也正在想法突破 527 的防守。他们看到从房门无法突进，就想办法爬上楼道天窗进入到五楼上的架空层，在 527 的天花板上砸开了一个大洞，用转头砸向郭创贤他们。郭创贤他们能抵挡从正门的进攻，却无法抵挡从房顶自上而下的攻击，只好逃到 529 里间。

四楼 427/429 套间里的老四从楼上的打斗声中感觉五楼的老四可能快坚持不住了，就着急地向上喊话，要五楼的老四抓住广播线顺墙往下撤到四楼。五楼这几个老四建议郭创贤先下去，因为他是分部委员，被老团抓住一定会吃大苦头的。其余的人都是一般的 414 群众，估计即使被老团抓住也不会受太大的伤害。郭创贤起初不肯，但是情况越来越危急，老团很快就会从天花板洞里钻下来。郭创贤同意下去，但他还是叫江道波先下。江道波在慌乱中抓住广播线往下滑，广播线太细了，一双湿手根本就抓不牢，他滑了一小段便摔下去了，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郭创贤以为江道波已经平安滑进四楼，也抓住广播线往下滑。他的湿手也同样抓不住，摔下去了。只因为他在下跌的过程中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弹开了一点，才没压在江道波身上，要不江道波不摔死也得被压死。第三个姓姚的老四用牙咬住广播线，双手紧扣住五楼的窗台边，双脚探到了四楼的窗户，由四楼老四抱住得救了。就在这时，老团从天花板的窟窿里跳下，抓住了剩下的三个老四，一顿暴打，其中姓戴的老四更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 527 房间里的老团对抓获的老四施暴的时候，门外的老团也成了老四的俘虏。当他们听到有两个老四从楼上摔下去了，看到没逃走的老四被打得脸青鼻肿流血，顿时热血往上涌，怒火从心生，非常气愤！有一个「李文忠学习班」的老四对着一个没戴头盔的老团当头就是一棍，也流了血，开了花。

唉～～就差那么几分钟！如果宿长忠他们早来几分钟，如果老团砸开天花板晚几分钟，如果郭创贤他们再坚持几分钟，就不会发生从五楼摔下去的不幸了，对各自俘虏的施暴也不会那么厉害了。

从团派武斗人员开始攻打 527/529 套间，到他们全部被 414 俘虏，历时约两个小时。天还没有亮，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就来了，武斗基本结束。

当江道波、郭创贤从五楼摔下来的时候，12 号楼的楼外有不少东区的学生。有老团，有老四，也有来围观的一些人。一看到有人摔下来了，不管摔下来的是老四还是老团（当时天黑无从判断），好几个人都跑上前去救护。江、郭二人被何人救起、如何送到北医三院，详情已经无从考查。我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救护他们的同学们！

余波涟漪

谈判协议墨迹未干，口舌之战迅即再续。两派各自召开大会，说明武斗真相，攻击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两派的广播台更是隔空交战，各不相让。

我亲耳听到团派在广播中公布了这么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孙怒涛手执长矛参加武斗，在我英勇的井冈山人面前戴起花头巾，乔装逃命，狼狈不堪，丑态百出。”[4-P315]

几个月来，414 早就习惯了团派的造谣。对于团派的谣言，开始时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辟谣。后来，造的谣越来越多，前一个谣言还在发酵，新的谣言接踵而至，简直是辟不胜辟，于是也就随他去，不再花精力花时间辟谣澄清了。414 群众经过多次谣言的轰炸，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神经也有点麻木，习以为常了。对于一般性的谣言，不再要求总部澄清这澄清那的了。

这个涉及我的最新谣言，我也一笑了之，不加理会。也没有老四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曾听到有一个老四这样说：“老孙像一根麻杆儿，要是戴上花头巾，那样儿岂不是比狼外婆更吓人？”

原以为 414 是本分老实不造谣的。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老团也一样认为老四造老团的谣造得满天飞，对老四的造谣极其反感的。于是，我想到，原来两派都是会造谣的，造的谣都不少。只是因为我身处 414，对老团的造谣很敏感。老团造 414 的谣言，我一般都知道真相如何，所以一听就知道这是谣言。而对于 414 造团派的谣，我不敏感，不知道哪些是 414 造了团派的谣了，也不知道团派的真相究竟如何。我想老团对 414 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敏感对方造自己的谣，不敏感自己造对方的谣。

两派派战中，完全无中生有的谣言也是有的，但我想，大多数应该是那种加油添醋的谣言。譬如，有关我的这则新闻，起码有三点是有影子的：1，当时门外的老团确实认出我来了。2，确实看到我当时头上扎了一条毛巾了。3，确实看到我手里拿着一根东西了。这三点是事实，没造谣。至于我手里的竹竿变成了“长矛”，

我头上扎的毛巾变成了“花头巾”，是门外的老团看走了眼，还是在一人传一人的传话时走了样，我就说不准了。所谓“狼狈不堪，丑态百出”，那是老团的主观想象。对我这样的 414 头头，只会丑化，不会往好的方面想的。最后那个“乔装逃命”，那是老团“合理”的推断。所以，关于我的这则谣言，是有点影子，加上误传，添点想象，加上推断而出笼的。

两派在派战时候的造谣污蔑，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有真有假、真真假假的派性炒作，满足一下派性发作时候的精神需求，犯不着当真、生气的。

探望伤员

受伤的两个老四躺在北医三院。作为同一个系的同学，我应该去看望他们。作为 414 的头头，我必须去看望他们。

刚刚发生过陈楚三被绑架的事件，接着又发生了 1.4 武斗，我作为谈判代表还挨了砸。原以为老团对我会比对沈如槐等「东方红战团」头头客气些，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老团对我也一样很恨的。所以当我提出要去医院探望伤员的时候，总部的人都很不放心，担心我半道上被打或者被绑架。但是我决心已下，一定要去。总部没法，说给我派一支小分队保护我。我觉得那样一来太招摇、太小心过分了，而且会被团派瞧不起的。最后，有人递给了我一件“武器”：一根约三十公分长、手指那么粗的铁棍用以自卫，再给我派了一名临时“保镖”。

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从来没与人打过架。据说，一个男孩子要是没与人打过一次架，算不上爷们的。我身上确实没多少男子汉的气概，胆子比较小。现在有了这段铁棍，似乎壮了不少胆。对付一个人的空手袭击，我划拉着招架一下，争得逃跑的时间，不至于马上就束手就擒，这点自信还是有的。我把铁棍藏在袖子里，外人看不出来，蛮隐蔽的。指派给我做保镖的人，我看，原来是我系的车间工人，我认识他，叫小关师傅。我对他说，你不必贴身跟着我，与我保持五十米左右的距离远远跟着就行了。要是老团真的绑架了我，你别来救我，赶快跑回总部去报个信就行。

我与小关一起上路了。出东南校门，到五道口，经四道口、北航东门去北医三院。我不时往后瞧瞧，见他不紧不慢地跟随着我。快到医院门口时，我觉得已经比较安全了，就跟他扬扬手，示意他可以回去了。

受伤住院的两个老四，一个叫江道波，一个叫郭创贤。江道波腰椎骨折，躺在病床上动惮不得，痛苦不堪。郭创贤掉下来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也受了不轻的伤。两个人从五楼摔下没有摔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一想到江道波可能瘫痪，才二十出头，今后的人生都得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度过，我心如刀绞。此时，我只能用苍白的问候安慰几句。我心里暗想，要不是我搞 414，他们不至于会那么悲惨的吧？一种负罪感立时涌了上来。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跳楼的呀（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并不是跳

楼而是想逃到四楼去而摔下来的）？那是五楼，跳下来是要摔死的呀！就让老团抓住当了俘虏，最多是一顿毒打，也不至于被打死或者打伤成现在这样呀！但是我最终也没敢把这样的话说出口。他们都伤成这样了，我这样的话里似乎有责怪他们跳楼的意思，于情于理都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后来郭创贤告诉我，如果老团只是在房门上方的气窗用水枪冲他们。因为有双层床顶着房门，房间里有六个老四，想攻入很难的。后来，老团在天花板上砸开一个大洞，老团从上往下砸砖头石块，他们就感觉顶不住了，想逃命。慌乱中根本来不及多想。

郭创贤毕业后先分配在东北，后调回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开了家公司，事业有成。我每次去深圳，凡与校友叙谈总要约他见见面，总要问问他的健康状况。面对着他，我时有一股内疚的感觉。看他各方面都很不错，很是欣慰。郭创贤说江道波在福建，他们有联系。我没有机会与江道波见面，只能请郭创贤代问一个好。2009年春上我去深圳，与郭创贤再次相聚。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他因病去世。听到噩耗，我十分悲痛。我总觉得那次武斗受伤，折了他好几年的寿命。每想到此，难受不已。

内心后怕

1.4 武斗，与大半年前，即 1967 年 4 月 15 日 414 抢夺总部广播台那次事件相比较，有一些是共同的。譬如，这两次都是精心策划的，都是攻击对方的广播台，都发生了严重的肢体碰撞，都是一种暴力行为。

但是，显然地，1.4 武斗比 4.15 冲突要严重多了（开始使用长矛、铁棍、面具、水龙等武斗器械）、规模大多了（直接对阵的有几十人，参与卷入的有几百人）、损失大多了（重伤数人、轻伤数十人，12 号楼被打得一片狼藉）、影响大多了（卫戍区出动解放军来制止武斗，李钟奇副司令员亲自到场）。所以，如果说 4.15 事件是一次严重的冲突，那么 1.4 的性质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武斗。

我已经分析过并承认 4.15 冲突是 414 挑起的，414 要负主要的责任。对于 1.4 武斗，我也明确地指出，团派挑起了这次武斗，团派要负主要的责任。

我一直想不明白团派为什么要挑起 1.4 武斗？要想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策划的过程是怎样的？

关于后一个问题，在 2012 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曾问起鲍长康。他说，总部确实没有开会策划 1.4 武斗。老鲍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由他来策划，绝对不会搞得顾首不顾尾地那么糟糕。但是，也有团派人士告诉我，1.4 武斗是由团总部策划的。多位团总部要员亲临现场指挥协调；远在西区的土建系老团在谢德明率领下攻入 12 号楼救援，这些都是明证。不管哪一种情况，这是一次由电机系团派联手保卫组想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占自控系老四广播台的局部冲突最终演变成清华两派也是清华文革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武斗。

清华的两派，从动口发展到动手，从冲突发展到武斗。相隔时间不长，关系恶化迅速。

当我在房间里与门外的老团对峙的时候，我没感觉害怕。因为毕竟有房门隔着，他不能近我的身，我与他都没有实际的生命危险，所以不觉得是生死相搏。等到武斗结束后静下心来，我胡思乱想，倒是有点害怕起来。

我想，要是我与老团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用长矛对峙对刺，我还能这样淡定心不跳吗？要是真的要我选择如果我不刺死他他就会刺死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不愿、不想、也不敢将一个与我无血海深仇的同学刺死。我也不愿、不想、不甘心被人无缘无故地刺死。一想到今后可能真的会碰到这样极端两难的抉择，我的心在发颤。我不想举手投降，不想跪地求饶，我最大的可能是会选择向后逃跑。但是，真的能逃得成吗？在灌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宁死不屈，不当叛徒逃兵俘虏”的年代里，逃跑、求饶、投降都是可耻的，都是一件永远抬不起头永远会被人当作话柄的耻辱。如果在两军对仗的时候，我的临阵逃跑最后导致我的战友受伤甚至丧命，我的良心能安宁吗？我对万一碰上“刺人心不忍、被刺心不甘”的两难境地充满恐惧。这对我来说，是一道无解的题。

陈楚三被抓让我明白了 414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老四是安全的。1.4 武斗让我明白了死人的事情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文革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懂了，越来越厌烦了。写文章我可以，台上辩论我也不怕。但是要轮拳头比力气，这不是我的所长，我既毫无兴趣，我也感觉害怕。

我的心正在离文革而远去……

第二十三节 在罗征启问题上，我也当众说谎了

解放干部的工作，两派都在进行。只是，两派的干部政策都有很浓重的派性色彩。譬如，对亮相到自己这一派的干部，大力支持，悉心扶植，尽力鼓吹。而对于亮相到对方的干部，就竭力打压，丑化批判，甚至关押批斗。

客观地说，亮相到 414 的干部所要承受的政治风险，远大于亮相到团派这一边。这在清华园里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毋庸多言。

在团派的眼里，414 是一个右倾复辟的保守组织。为了打垮 414，团派千方百计地要从亮相到 414 的干部里整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然后再整成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操纵了 414 的坏头头们。414 有过抓陶森、批凌瑞骥挑动群众斗群众等过火的错误的行为，但是还没有昏到想在亮相到团派的干部里揪一个操纵团派的反革命集团的地步。

在 414 内部，对待干部的解放上，「三七战团」比较谨慎，顾虑较多，特别怕右，

远远不及「东方红战团」的大胆、果敢、进取。

为了推动干部解放，414 树立了谭浩强、吕应中、罗征启这三位中层干部作为典型。对这三位干部，团派也知道他们的典型意义，均采取了先是利诱，再是威胁，继而死打的态度。414 对这三位干部，有点微妙的差别。对谭浩强、吕应中这两位干部，414 内部观点一致，态度明确，坚决地保，大胆地用。而对罗征启，在总部委员中，在 414 群众中，对该不该死保罗征启是有很多争议的。不仅倾向于「三七战团」的总部委员表示很慎重的态度，即使是属于「东方红战团」的骨干中，对死保罗征启也有持异议的。个中原因，是认为罗征启的观点太右了。

对于罗征启勇敢地亮相到 414，我是真心欢迎的，也是很佩服的。但是对他的不少观点，我感觉太右，所以很有顾忌。414 派客观存在着态度激进而观点偏右的「东方红战团」与态度温和观点偏左的「三七战团」。所以，亮相到 414 这边的干部，在观点上也有偏「东方红战团」与偏「三七战团」的差别。如同为清华牌干部的谭浩强与「三七战团」的关系较好，罗征启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很亲密。周泉纓说：“罗（征启）则是我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唯一称之为亮相到「东方红战团」的清华干部”[2-P93]。亮相到 414 的干部有数百人之众，能被「东方红战团」认可是赞同「东方红战团」观点的，屈指可数，寥寥几人。正因为如此，沈如槐非常欣赏罗征启的才华，更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佩服他的政治见解。我当然不认为罗征启是走资派，或者是走资派伸向 414 的一只黑手，但是他对旧清华十七年的观点实在太右，我对他持相当谨慎、警惕的态度，从没与他个别接触过。记得有一次在新水 300 室召开的对罗征启的帮助会上，我甚至做了这样的一个发言：“要好好地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别以为亮相到 414 这里就找到避风港了！”罗征启听了，非常委屈。会后对人说：“团派骂我、打击我，我都不怕。没想到 414 中，特别是头头，竟然也这样说，真想不到！”

尽管团派对谭浩强、吕应中都是打压的，相比较，对罗征启的打压更重。正因为如此，414 把解放罗征启当作是解放中层干部的一个带标志性的突破口。如果罗征启能得到解放，要解放清华其他的中层干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414 对待罗征启，从支持鼓励他勇敢地亮相到死保他，这中间也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到后来，敢不敢死保罗征启成了 414 的干部政策是真的解放干部还是假的解放干部的试金石了。也就是说，414 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命运与罗征启的政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1968 年 1 月 30 日，罗征启被团派抓走。经历近两个月的严刑折磨以后，3 月 27 日，他从关押他的三堡（地处八达岭附近的清华疗养所）逃离出来，历尽艰辛，死里逃生，躲在城里的亲戚家里。老团在城里搜捕他，他觉得非常不安全，于是给沈如槐写了一封信。沈如槐看到此信后，虽然心有主意，但感觉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决定，找核心组开会研究。龙连坤是干部，怕他知道了此事反而不便表

态，让他为难，所以这次核心会没让他参加，只有我、陈楚三、汲鹏、宿长忠、刘万章等不多几个人。还有一个是为罗征启传递消息的老印，他是「东方红战团」中与罗征启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

沈如槐先介绍了罗征启目前的状况，并念了他向 414 求援的信件。罗征启在信中说，他趁守卫不备，跳窗逃了出来，摔坏了腿。瘸着拐着爬着到了沙河，昏了过去，被路人救起，送回城里。因团派在城里大肆搜捕，很不安全。言下之意希望得到 414 的保护。沈如槐问大家：“我们怎么办？”沈如槐自己首先表明了坚决保护罗征启的态度。

作为一名亮相到 414 的干部，竟受到团派如此不堪的政治迫害。414 无力把他救出来，他靠自己的努力侥幸逃脱。现处于危难之中，有性命之虞。414 作为一个组织，绝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这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因此而可能置 414 于非常被动的局面，这点，我也是很有顾虑的。要是 414 不管，罗征启被老团再次抓去，不仅罗征启本人极有可能丧命，414 也将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总之，我当时的感觉，保护罗征启是必须的，但是保护他确实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必须非常慎重才行。

与会者一致同意把罗征启营救回学校。毕竟在 414 的地盘上，比在他亲戚家里要安全得多。营救由沈如槐和老印具体负责策划和实施。

把罗征启接回学校的行动策划得很周密。一天晚上，罗征启化了装，乘小车闯过南校门，到二教下，拥入科学馆。整个过程有惊无险，相当成功。之后，沈如槐又开了核心会，向大家通报了这次行动的经过，并告诉大家，罗征启现在就躲藏在科学馆三楼靠南一间密闭的小房子里，生活起居由老印照看，连在科学馆里的 414 广播台人员及守卫人员都不知道。在会上，我提议要罗征启写一个材料，譬如在被老团关押期间，他们问了他哪些问题，他是如何回答的，他是怎么逃出来的，等等。我对他不是很放心，希望能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在团派突然抛出他的材料时措手不及。

罗征启的逃跑，让团派十分恼怒。到处搜捕也一无所获。一天，团派派出几个人，在罗征启父亲的家里，把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当工人的罗征启弟弟罗征敷抓走了，想从他的嘴里掏出罗征启的行踪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给罗征敷嘴上塞上一团擦车用的棉纱，绑着手按在吉普车中间过道上。到了清华，一看，罗征敷早已被憋死了。此事 414 知道以后，人人义愤填膺，大喇叭大字报上一片都是对老团的讨伐之声。

沈如槐想，罗征启就在科学馆里，他看不到什么，但是高声叫骂的喇叭声还是能听得到的。看样子这个噩耗是无法对罗征启隐瞒的了。老是瞒着，反而更被动。于是，他拉上我到科学馆那间密室里，告诉罗征启他的弟弟被老团打死了，我们代表 414 和其他关心他的战友向他表示沉痛的哀悼。罗征启已经从广播中听到了

这个痛心疾首的不幸消息，这次不过是从我们的嘴里得到了证实而已。看着罗征启得知胞弟无辜死难，他的双眼怔怔的，心中的痛楚无以言表。我们也深感空洞的安慰是多么的苍白、乏力。我对他并没有亲切感，依旧认为他的许多见解是很右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对他十分的同情。我想我一直对他采取冷淡的、责难的态度是不是太无情了？亮相到 414 的干部要经受这样大的政治风险，自己和亲属要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以前无法料想到的。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态会发展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对 414 会带来多严重的影响，这些我心中无数。我建议沈如槐应该把罗征启的事情在总部内公开，不能光我们几个核心组成员知道和操作。沈如槐同意了，在科学馆四楼阁楼上召开了一次绝密的总部会议。果然，一名「东方红战团」的总部委员对死保罗征启大为不满，被大家以维护 414 的利益所说服。总部会议决定，对外，保罗征启的调子不降。在内部，由傅正泰负责，对罗征启进行全面审查。对 414 群众，为防内部争吵军心动荡，严格保密，不准泄露一丝消息。

尽管没有什么证据做依据，团派凭着直觉还是一口咬定是 414 把“反革命集团首犯”罗征启给包庇起来了。团派广播台不断广播罗征启在关押期间交代的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操纵 414 坏头头的“反革命罪行”。在团派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好些 414 群众心里虚虚的，忐忑不安。虽然，对于老团的造谣早就习以为常，但是罗征启问题毕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只要有一条罪行坐实，对 414 的影响和冲击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414 群众强烈要求头头表态，澄清事实真相。

为了让广大的 414 群众坚信无疑，在主楼后厅召开的 414 战斗组长会议上，我们这几个总部核心要员，个个都在会上表了态。沈如槐带头表态，说罗征启是团派抓去的，目前他的下落总部确实不知道。他的表态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接着由我表态。我心里非常矛盾。要说我不知道罗征启的下落，那明摆着是说谎，是欺骗。要是我说罗征启就在 414 的保护之下，那这消息肯定像一颗原子弹爆炸，这局面，是我、是 414 都无法应对的。能不表态吗？也不行。414 群众的压力之大，仅靠沈如槐一个人表态已经不能取信大家了。要是其他总部要员都表态了，只有我一个人不表态，那其实就是宣告了我与其他总部要员态度上的不一致，群众依旧会疑虑重重，414 人心依旧不能稳定。而且，414 群众必然会指名道姓要我表态。总之，只要我是在学校里，我是没法回避表态的。为了 414 大局，我也只能表与沈如槐一样的态。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罗征启目前的下落。

我们一个个依次登台表态。414 总部所有的核心都表态了。414 群众可以对我们中的某一个人不太信任，但是对我们这些核心的集体表态，他们没有理由再

不相信。他们不安的心总算暂时放心一点了。

我记得我们总部核心中有一位是这样表态的：“罗征启肯定是让老团打死了！他们打死了人，不好交账，就造谣说他逃跑了。我们一定要向蒯大富讨还血债！”我听了这样的表态，心里很不满意。我们明明知道罗征启在 414 这里，说不知道罗征启的下落，这已经是在说谎，在欺骗 414 群众了，已经很过分了。罗征启没死，硬要说罗征启是让老团打死了，这比一般的辩解、说谎又过分了一大截，这是明目张胆的在造老团的谣了。唉，即使我心里非常不满，我也不能站出来去“辟谣”呀！

从我做总部委员起，不论是做「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还是做 414 的总部委员，我对自己提的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说谎，不辜负那些信任我的群众。蒯大富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他的坚忍不拔，他的雄辩口才这些正面的以外，还有就是他的诚信度不够高。他在传达中央首长讲话的时候，自己听得进的或有利于自己的，会传达得很详细。不对自己胃口的或不利于自己的，就会有意无意的少传达或不传达。所以那个时候有不少大字报批评老蒯经常“贪污”中央精神。我一直以此为戒，尽力做到诚实、透明、实事求是。我接触中央首长的机会不多，凡是需要由我传达的，我都不凭个人好恶，悉数传达。有人亲口对我说，跟着蒯大富，政治大方向看来不会有错，但是心里不踏实。要是跟着我，明知道我的政治判断力是很有限的，但是起码不会欺骗他。他说这也是他选择 414 的原因之一。我听了他的话很受感动。我心里暗暗说，一定不能辜负了这份难得的信任。

在做头头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基本做到了诚实、透明、不说谎。但是这一次，我当众说了谎话。我一边撒谎，一边心里十分凄苦！要是为了良心的安宁，我不应该撒谎。但是为 414 群体的利益，我就必须撒谎，以度过眼前这段非常时期。最终，政治利益压倒了政治道德。

我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但是，对政治感兴趣与搞政治，完全是两码事。从大处说，我的政治眼光、政治魄力、政治智慧、政治胸怀，都远远不够。小而言之，连一点小小的政治手腕、权谋伎俩都不会，全是按本色做事。我实在是一个迂腐的人，连在什么场合下、有多重要的事情上、允许说多大的谎都不会把握。那些政客们惯常使用的尔虞我诈、颠倒黑白、心狠手辣、脸厚心黑等等，我更是见不惯，受不了。所以，我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不适合在政界商界发展、不适合做别人的喉舌。我能做的，也就是教点书，搞点科研，从事尽量不需要说谎或者少说谎的行当。这是我从这件事中悟出来的一点道理，也算是多了点自知之明吧。

要说我从小长大没说过一句谎，那也不是实情。但确实是极少说谎的。而且，基本上是小事上，为保全自己而又无害别人的事情上。这次在有关罗征启的问题上的说谎，是我最严重的一次说谎。说谎以后的感觉太不好了。再往后，又有好多次不想说谎而不得不又说谎的。那是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批林批孔、反右倾

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天安门事件、追查政治谣言、等等等等，一直到六四“动乱”。在各种会议上，总被组织要求表态，不表态还不行（想想文革初期做一个逍遥派真不赖，没人逼他们表态，逼他们参加运动）。看着别人或真或假的表态，看看自己言不由衷的表态，我真不知道这样的表态有多大意思。为什么上面一定要每个老百姓都表态呢？后来想想，上面就是要摧毁你的意志和自尊。尽管你事后可以辩白说自己是被迫表态的，是无奈无辜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就在表态的那一刻，你的道德是低下的，你的良知是蒙尘的。什么时候社会的氛围真正是言者无罪了，不以言获罪了，那么昧着良心说违心话的情况也会少多了。

当另一位总部核心反诬老团打死了罗征启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生气：这样说老团太过分了吧？几个月后，清华发生了百日大武斗。期间，无辜的孙华栋真的被一教“狗熊”这帮老团活活地打死了！文弱的中层干部刘承娴¹被团派专案组折磨得跳楼致死了。“罗征启被老团打死了”的话是假的，但是孙华栋、刘承娴等被折磨致死却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书生气又一次被残酷的事实所嘲笑。

至于罗征启，此后我与他一直没有联系，曾听闻他在深圳大学工作。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深圳出差，与朋友们聚会。席间，有一位在深圳大学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说非常的凑巧，今天正好是罗征启被宣布开除党籍的日子。老罗对来宣布这一决定的人平静地说了句“愿贵党今后好自为之”的答话。朋友还告诉我，老罗被严密监控着，监视着他与什么样的人有来往。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既然今天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我说我是无论如何都得去拜访他的。这有什么好怕的呢？尽管已是深夜，我和朋友们一行十来个人一起来到罗征启家。我郑重恭敬地向他表达了我对他由衷的敬佩和真诚的问候！这敬佩之情是文革以后我听闻了他的几件大事以后油然而生的。²

罗征启，真正清华人的良心！

第二十四节 两派之外，清华的第三种势力

在团四两大派政治势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弱小的第三种势力。这其中大致有两部分：逍遥派和中间派。

在文革开始，是保蒋还是反蒋，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同情蒯大富，在“是”与“否”之间举棋不定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参加文革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那一阶段，

¹ 刘承娴是清华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² 这些大事可参阅万润南的《罗征启：夭折的接班人》，《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几乎没有什么逍遥派。

后来，因为支持工作组、参加「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八九」派在与批判工作组、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八八」派的争斗中落败以后，不少「八九」派的人，还有一部分出身黑五类的以及父母被冲击的干部子弟，开始不再积极参与运动而趋于消极旁观，安于逍遥。逍遥派中有些人借大串联之际免费乘车住宿的优惠条件游山玩水，有些人借串联之名行“并联”¹之实。也有不少对熙熙攘攘的大字报大辩论不感兴趣，躲在某个角落里背外文的，或在宿舍里堂而皇之搞“线路斗争”²的。随着运动无尽头地拖延下去，这一支逍遥派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加深。逍遥派们各自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共同的一点是这些事情大都与文革无关。他们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文革、抵制文革。党团组织的瘫痪给了这些逍遥派以足够的生存空间。

中间派往往是既不同意团派的观点又不赞成 414 的观点，有点无所适从，于是就游离于两个主流派中间。即使观点上有偏向团派或 414 派的，有的甚至也偶尔参加团派或 414 派的活动，但是都不十分积极。不过，他们又与逍遥派不同，他们都比较关心学校的运动。

逍遥派也好，中间派也好，由于没有组织团体或者团体不够强大，所以既发不出响亮的声音，又显示不出雄壮的力量。他们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被边缘化的，还算不上是一支与团派、414 并雄鼎力的第三种势力。

在「414 串联会」成立之后的 5 月初，以栾德富为首的「五七串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反对派性，促进联合。栾德富是温和的老团，他既反 414 的派性，也不留情面地反团派的派性。但是「五七串联会」未能制止 414 的分裂。后来，栾德富参加了 414，「五七串联会」也随之解体。不管怎么说，「五七串联会」可以算是一支代表了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

段云富（6 字班学生）、魏洪波（电机系教师）都曾经是 414 的总部委员。在总部里，因为常常与「东方红战团」的某些人观点不一致，感觉很压抑，就不再常参加总部会议了。但他们对运动非常关心，并没有逍遥或消极。1967 年 9 月底，团四两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联合总部」。这是一次貌合神离的联合，两个总部的各自机构仍然在独立地运转。这期间，经过批周泉纓、414 战歌事件，两派关系实际上已经倒退到联合之前的状态。段云富、魏洪波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两派又将公开分裂之际，于 1967 年 12 月 25 日成立了「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 1225 战团」。他们的宗旨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进行“斗批改”。他们宣称「1225 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 414 派，是属于「联

¹ 即男女朋友并肩一起出去周游全国。

² 对焊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戏称。

合总部」的。他们的成员，不问是老团还是老四，只要是反派性、反武斗、促联合的就行。「1225 战团」是继「五七串联会」以后的又一支代表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而且，它的影响比「五七串联会」更大，存续时间也更长。很遗憾，「1225 战团」成立不到十天，两派爆发了 1.4 武斗。成立以后四个月，爆发了百日武斗。「1225 战团」也未能阻止武斗的爆发。

我与宋德富相识，彼此是朋友。我与段云富、魏洪波更熟悉，在 414 总部里，是观点相近的同僚。尤其与段云富的关系更好一些。他领导的「巴黎公社」曾是「天安门纵队」的重要成员。

从观点上说，如果说我在 1967 年的 5 月份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五七串联会」的话，那么到 1967 年年底、1968 年年初，我对「1225 战团」的话已经很听得进了。虽然在派性如何产生，分裂如何造成等方面，我的看法与他们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等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

我很同情段云富他们，觉得他们反派性促联合的宗旨和目标都是对的，心地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那种不懈努力的精神也是非常令我钦佩的。但是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 414 头头的身份和比较强的派性，我不可能公开参加「1225 战团」。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的主观愿望虽然很美好，但是没有抓住派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实质，仅单纯地反对派性，除了失望以外，不会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所以，我仅仅是同情他们，并没有对他们有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也不会去批评、嘲笑他们，更不会刁难、打压他们。

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这一口号深得清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的共鸣和支持。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大方向比团派和 414 都更正确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1、派性只是表象，指导文革的理论必然导致两派的产生，导致两派的分裂，导致派性的发作。派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北京市革委会组织了封闭的以消除派性为目标的高校学习班，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1225 战团」的权威性、政治能量和影响力是无法与北京市革委会相比的，那么，它怎么可能成功呢？

2、那个年代是以走极端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勇敢的。反对 414 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坚决不妥协的，在团派里面被称为铁杆老团，最吃香。同样地，反对团派极左路线最坚决不示弱的，在 414 里叫铁杆老四，也是最看重的。掌握团派话语权的最坚定分子与控制了 414 大局的最坚定分子，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性而不是派性，都认为自己在最坚定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才是左派，对方是右派或极左派，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掌权才是代表无产阶级掌权。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全校师生员工的很少数，但是政治能量极大。有这两极存在，作为代表中间群众、代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心声的第三种势力，与其相比，政

治能量实在太小了，处于无关轻重的地位。

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抗战胜利后，尽管全中国民众要和平，反内战。但是国共两党却互不相让。民主党派的声音反映了民意，促成了重庆和谈，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防止内战的全面爆发。其根本原因，民主党派既不明白国共两党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根源所在，自身的政治能量又太渺小了，构不成举足轻重的分量。

尽管「五七串联会」、「1225 战团」在两派期间发挥的实际效果很有限，但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积极地顽强地发出反对派性、反对武斗、反对内战、要求联合的“第三种声音”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像他们那样发出吼声，他们的队伍强大到足以对两派起到牵制、调解的重要作用，甚至能影响运动的走向，那么清华的文革就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第二十五节 一席《多余的话》，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每当发布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激动万分（到后来仅仅是显得有点激动万分）。刷大字报大标语表示热烈欢呼，那是最起码的行动。如果感觉重要一点的，与自己关心密切一点的，那就要开大会或者游行庆祝。现在看到许多宫廷电视剧，才知道那个时候皇帝下圣旨，百官和草民都要三呼万岁，与文革期间欢呼最高指示，其实也差不多是一回事儿。

最高指示，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段话。只要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就认真领会，坚决执行。正如林彪说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但是，越到后来，有不少最高指示，怎么理解也理解不了。

毛泽东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心里嘀咕：天天说形势“大好”，我们眼前怎么连“小好”也没看到呢？

毛泽东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我们心里暗想：充分发动起来了的人民群众在做什么呢？打派战？打内战？都在搞革命没多少人在搞生产，这样的坐吃山空行吗？

毛泽东说：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议论：这个“底”可真够深不可测的，究竟到哪一站才算是个“底”？开始说是几个月，后来说是 1968 年春天结束，再后来说是要搞三年。无边无沿，看不到底。

到 1967 年的年底，对于那个我们曾经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领袖，他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旨，我们已经开始敢于在二三个人的范围内议论了。

当我们在一起议论（有好几次是大礼堂开会前我们坐在台下议论）形势怎么

一个大好时，傅正泰老师总是说，形势就是大好。我们请教他为什么说是大好，他就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问他发动起来做什么了，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呀！再问他，他也不知道该答什么了。

傅正泰老师是个非常正直的老师。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天真、可爱、随和、与我们很谈得来的老师。他也是总部委员。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但是经常与我们「三七战团」的几个人混在一起，混得很熟。我们都很喜欢他。老师与学生的身份不同，他更多的是担心我们这些小将瞎议论最高指示会犯错误的。

后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4 年，傅正泰老师创办了海淀走读大学（现更名为北京城市学院），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先河，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我在 1968 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任最高领导人。1935 年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井冈山，后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多余的话》，同年被杀害。

因《多余的话》，在文革前他被批判为晚节不保，在文革中更被指控为叛徒，他的墓碑被捣毁。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了好多绝非多余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他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在清华，我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大学生。我也问自己，我当 414 的头头，是不是也是“历史的误会”？我各个时期的老师们、同学们还有乡亲们，要是得知我成了一名教授（那可是大学问家的称谓哦！），不会太惊奇的。因为我成绩向来不错，一直是个书蠹虫。但是我居然成了一个造反派头头，那是决计想象不到的。究竟是我自己想爬到这个位置，还是被群众运动的浪潮推到这个位置的？我觉得主要的因素还是后者。一个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又没有把控能力，更没有从事政治所需要的素质和性格因而常常犯错误摔跟斗的人，原本应该去敲学问之门的，一不留神撞进了政治之门。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袒露了他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几年的心路心境：“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拍案惊叹，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瞿秋白的这段话，所说出的，完全是我这个 414 头头此刻的心情，一模一样。我深感，414 也像一辆千斤重的辎重车，我就是那匹羸弱负重的瘦马，险峻陡峭山路的一侧是万丈深渊，再往前拉我力不从心，想要后退定会粉身碎骨。

在我眼里，瞿秋白是一个文人，一个有良知、有才华的文人，一个向往光明、

自由、美好社会的文人。他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虔诚的革命者，但是，本质上，他适合像鲁迅那样的从文，不适合做职业革命家。历史的潮流把他推到总书记这一领导岗位上，成了革命领袖。这份职责他虽尽力而为，实在是勉为其难。《多余的话》写出了文人从政后复杂的心路历程。瞿秋白在就义前真实地、无情地剖析了自己，也剖析了他为之献身的主义。他的就义是那么的从容、淡定和勇敢。但是，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来用以自我解剖的真实而带点灰色的情绪被那些纯粹而又纯粹的“革命者”指责为晚节不保自首叛变的“铁证”。

我既没有瞿秋白那样的非凡才华，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高尚情操。我不敢自比瞿秋白，但是我深感我的心与瞿秋白是相通的。我知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摇摆性很大，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我知道自己的这些弱点但是又难以克服。我被《多余的话》所感染，被那种上又不能上、下也不敢下的两难所折磨。我看不到文革的前途，看不到 414 的前途，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我估计或多或少有我这样情绪的人不是个别的，不是少数，而是相当普遍。对两派争斗厌倦，对文革前程看不到希望的人与日俱增，都在逐渐走向消极，趋于逍遥。

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又不得不承担着那么大的政治责任，身心俱累。他坦然地把就义看成是一次“长休息”，镇定从容。我从 1967 年下半年以来，也深感体力不支，许多事情已经无心过问，无力参与。我也一样感到躯体和精神的双重疲惫。

我也有点想当逍遥派了。这是文革开始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念头。但是我不能。我既然推动着搞起了 414，我就得对 414 负责。上虎背容易下虎背难。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热爱还是不热爱，我都得继续留在 414 里，都得继续做 414 头头。这是一份责任。要是我现在去逍遥了，尽管别人阻挡不了，我的内心通不过。因为我觉得对不起 414 群众。正因为我此时的坚持已经不是靠信念、靠理想、靠热爱而是仅仅靠责任支撑着的，所以我的心就感到特别的累。

在这方面，沈如槐比我强多了。他的坚韧，他的意志力，都远胜于我。这是让我不得不佩服的！

第二十六节 高校学习班， 两派最后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

1968 年 2 月，又一次联合的机会降临到两派头上。只是这一次联合，是在 414 战歌事件、陈楚三被抓放以及 1.4 武斗以后，两派的关系中已经浸润了暴力和血腥，彼此之间有了仇和恨，互相间更加不信任了。可以这样说，大联合的基

础更不如 1967 年 9 月份那次了。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北京市领导对联合紧迫性的认识和对还没有实现联合的两派压力达到空前的程度。

全国已经有一半多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北京市 18 个区县已有 16 个成立了革委会”[8]。2 月 13 日，清华也进驻了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促进两派的联合。

大形势、大环境都要求北京市还有一半多没有实现大联合的高校，特别是有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的清华两派赶快联合起来，为建立革委会做准备。为此，北京市革委会决定分期分批开办“首都大专院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北京高校学习班”），并于 1968 年 2 月 5 日正式开班。

“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8] 可见这次上层真的是下足了力气，也抱着极大的希望。

清华的两派头头已经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学习和商谈了。好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海军宣传队驻在学校，他们是学习班的主持人，斗私批修的宣传员，调解矛盾纠纷的和事佬。

团派参加学习班的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任传仲，414 方面，沈如槐、陈楚三、汲鹏、刘万章，还有我参加了学习班。按要求，两派的主要头头应全部都参加。学习班在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后迁至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吃住都在学习班里，目的是与学校的派性活动尽量隔离。

2 月 4 日下午，我们五个人为了表示继承革命老前辈的艰苦奋斗传统，决定背着背包步行去高校学习班。一路上有说有笑，兴致很高。回忆起 414 一年来的斗争，沈如槐说：“414 刚成立时，总部里只有孙怒涛一个人。后来搞《四项协议》成立「革筹小组」时，22 席中占了 6 席。到 9 月的「联合总部」中捞了一个 7:6。如果这次搞联合，非得倒一个个儿不可。”我和汲鹏说：“能争个完全对等就不错了，要知足，别太高骛远了。”沈如槐说：“老蒯怎么啦？非得独占一个席位？要算算账，他没干过一件好事。对等，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谈得眉飞色舞，有点忘乎所以了。

因为团派始终不承认陈楚三是无罪释放，一直叫嚷着陈楚三是反革命，沈如槐认为如不彻底解决陈楚三的问题，大联合无从谈起，所以就让宿长忠留守学校，而让陈楚三参加学习班。我担心团派会不会死命反对。沈如槐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坚决顶住。

果然，团派头头看到陈楚三作为 414 的代表参加学习班要与他们一起学习，心里添堵，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抗议当然无效，因为人都释放了，事实上就是承认了陈楚三不是反革命。我发现团派的这些头头一看到陈楚三，眼神里全是恼怒，似有深仇大恨。但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忿忿不平。除了学习、开会不得不在一起，

平时吃饭、睡觉、活动、休息、闲谈，还是各派的圈子，互不掺和的。学习班在这样横眉怒目的气氛中开张，能是好兆头吗？我真不明白到这个时候团派还强词夺理说陈楚三是反革命，实在有点胡搅蛮缠不讲理。我也觉得如果 414 先不提陈楚三参加学习班的问题，等以后气氛和缓一些，在联合的过程中再提出陈楚三的问题，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解决呢？难道要表现得这么强势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坚持原则不妥协不软弱吗？

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武器，以批臭批倒派性为突破口。

如果说，第一次大联合的开始，双方还表现出相当的诚意的话，那么这一次为联合而举办的学习班，双方都没有什么诚意，也没有什么信心，只是为应付上面的压力。

所谓斗私批修，基本上都是斗对方的私批对方的修。斗自己的私批自己的修，那也是高高举起千斤重，轻轻落下三两轻。在自我批评的大旗下，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地批评对方才是真。

36 所参加学习班的高校，确有几所高校实现了大联合。但是对大多数高校，效果不明显。尽管蒯大富、沈如槐有几次发言很感人，也做了比较实在的斗私批修，但是两派的对立情绪依旧，联合无实质性的进展。

有一天清晨，我们这些头头被海军宣传队一早叫起，说是学校里两派的大字报贴到学习班里来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求头头们把自家一派的大字报撕掉，撕干净，不留痕迹。

北京二三月份的清晨特别的寒冷。我们几个头头，哆哆嗦嗦地在新疆驻京办的外墙上撕着大字报。浆糊把大字报冻得严严实实的，很难撕，只能一点一点的扣。

“一缕阳光，几条汉子，贴着墙壁，手脚不停。他们在干什么勾当呢？原来都在擦自己这派的屁股。”我用怪里怪气的腔调随口胡诌着。于是有人调侃说，老孙，以后你要是写回忆录，倒是可以把这几句顺口溜写进去的。无心对话果成真，四十多年以后，我真的写在这里滥竽充字数了。

受过这遭罪以后，我们就严令“家里”以后不许再到学习班里贴大字报。

两派主要头头都进了封闭隔离的学习班，学校里两派都少了主心骨，派仗也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但是暗底下对学校里派战的遥控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不过，由于海军宣传队居间不断地耐心做两派头头的工作，头头们看到大势所趋，通过一帮一、一对红等活动，两派之间的敌对情绪和缓了不少，慢慢地出现了比较平和的气氛。校内的不少基层单位实现了大联合，综合机械厂等单位甚至成立了革委会。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北京化工学院等几个学校也成立了革委会。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3 月中旬，社会上出现一股以北大为首的倒谢风潮。虽然 414 对谢富治一直心存不满，也盼望着他的倒台，但是如果也跟着公开倒谢，认为有风险，怕中央

枪打出头鸟，所以不准备赶这趟浑水。后来，倒谢风潮越闹越大，连团派都开始重炮轰谢富治了。414再不倒谢，又要成为保守派了，终于按捺不住，卷入到倒谢大潮中。因不敢公开喊“打倒谢富治”，就默许甚至鼓动下面的战斗组起来反谢。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倒台的不是谢富治，而是杨、余、傅。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学习班里的两派头头已经无法安心学习，都是心猿意马，想赶快回学校打派仗去。

这个学习班看来也受到高层的批评。主管学习班的李钟奇不得已做了只反派性，“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8]的检查。办了两个多月风波迭起的学习班，就这样虎头蛇尾，在4月19日草草收场。高层的政治斗争还在激烈进行，基层两派的联合是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的。

4月23日，清华开始了百日武斗。5月30日，两派发生了死伤最惨重最血腥的大武斗。这以后，414伤亡严重，科学馆陷于绝境，屡次救援行为均告失败。我后来听接近沈如槐的老四讲，当时焦头烂额的沈如槐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把科学馆里的老四救出来，414就全体撤离清华，不跟蒯大富斗了。我在想，要是沈如槐能预见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他会在两派大联合中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求联合吗？

7月27日，首都三万多名工人开进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团派开枪，造成震惊全国震动最高层的血案。此后，红卫兵运动退出文革的大舞台，蒯大富本人也由红卫兵领袖而一步步沦为阶下囚。我在想，要是蒯大富能预见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他会在两派大联合中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求联合吗？

我想，要是真能预见到这一天，他们是会联合的。联合，即使两派自认为的核心利益受点损失，总比人员死伤要好得多，总比被强行同归于尽被逼着退出历史舞台要好得多，总比被隔离审查甚至判刑要好得多。

我们都不是高瞻远瞩的人。所以，这些“如果”也就是事后说说而已。

当局者迷。我们这些头头在当时为派别利益迷住了双眼，晕晕乎乎的。宝贵的两次大联合机会就这样从手指缝里溜走了，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内斗中白白地消耗掉了。回头再想想，万分的惋惜。

一切假设一切惋惜都没有用。历史的事实是，清华团四两派从分裂走向大规模武斗，最终同归于尽。

为什么两派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后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1、这是文革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文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靠着毛泽东的极高权威和群众对他的绝对迷信，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就被攻陷了。如果文革只局限在上层，那么像历次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一样，群众不会分裂成两大派。“走资派”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可是可否、可多可少的。

当文革的烈火烧向基层，哪些是走资派哪些是革命干部，群众很难分辨得清、很难正确界定。由干部问题又直接引伸出对十七年的评价问题。由上述所产生的分歧形成两大派是必然的结果。可悲的是：无论是强调要砸烂旧清华的激进造反派团派还是强调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的保守造反派 414 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都视对方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可救药者，因而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2、这是中央两派斗争的必然反映。当年要是说中央存在两派，那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但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是公开的秘密。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失去了权势的老帅副总理们代表“旧政府”向“新文革”们进行的一次拼死的抗争。414 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二月逆流”在基层的反映。尤其是在“新文革”与“旧政府”间起着缓冲、纽带作用的周恩来，既紧紧跟随毛泽东、献媚江青，又时时心系“旧政府”、保护老家伙们。清华的团派听命于江青、谢富治等“新文革”，清华的 414 奉周恩来为精神后台，同情“旧政府”。清华两派斗争实质上是中央两派斗争在基层的典型反映。上有所动，下必有乱。

3、这是群体利益激化的必然结局。团派说，414 上台就是复辟旧清华。414 说，团派一统天下清华师生必遭其殃。总之，哪一派上台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在这华丽的外衣下，内心则是群体核心利益的考虑和捍卫。当群体以派别形式显现时，在派性的助推下，群体利益的激化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4、这是鹰派掌权的必然后果。团派总部和 414 总部，基本上都是本派的鹰派占据着主导地位，鸽派仅起牵制的辅助的作用。如果说 414 中的鸽派还有一个「三七战团」作为后盾的话，团派中的鸽派都是个体，连个依托的力量都没有，影响更加有限。鹰派的特点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信奉斗争哲学，与对立派毫不妥协，而且政治能量极大。鹰派的政治敏感性极强，极善于捕捉和利用对方的错误，并以自己的过激反应为对方的反击提供口实和机会。由此，两派的冲突与争斗，犹如钱塘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浪盖过前浪。

5、这是两派势均力敌的必然趋势。如果两派的力量过于悬殊，可能只要一两个回合，胜负已定，不会旷日持久。团派在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上远胜于 414，在人数上也略多于 414，但是在士气上并不占多大优势。综合而言，414 虽处于在野和少数的不利地位，但与团派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团派要压垮 414，力量小了点。414 要反制团派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给团派制造点麻烦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团派与 414 的争斗是一场持久战。文斗时，是隔空的口诛笔伐，大字报大喇叭还骂不死人。一旦政治气候恶化，来一个“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以武斗决定胜负，那种血腥程度就会超越想象而不可控制。

如果说，前面的三点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普遍分裂成两派的共同原因，那么后面的二点可能就是清华两派由分裂走向武斗的重要因素了。

政治上定性错误，方法上处置极端，利益上不容妥协，这是团四两个群体的矛盾逐步激化至武斗对抗的惨痛教训。

第二十七节 一封加急电报， 在大武斗爆发前夕把我拽回家

高校学习班以围剿派性为突破口，期望实现大联合。但是，派性只是问题本质的表象，仅仅围剿派性无法解决两派之间的深刻分歧，难以调和两派之间的尖锐矛盾。

高校学习班的无果而终，为北京市高校的校园武斗之风打开了闸门。

北大也有类似于清华的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它的对立派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据说人数也不少。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发生了武斗，聂元梓把「北大井冈山」打得惨不忍睹。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表态坚决支持聂元梓，向被（用试电笔）“刺伤”的聂元梓表示慰问，严厉批评了「北大井冈山」，责令其交出“凶手”。此后「北大井冈山」被上压下打，陷入困境。¹

中央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给蒯大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要你敢打，有能力打，把414打趴下了，打跑了，上层都会支持你的！

4月10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里，发表了毛泽东最新的一段“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²这一指示把文革的性质提到国共斗争继续的高度，为已经势不两立的清华两派斗争火上加油、煽风助力。

这期间，团派加紧炮制“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作为伸向414的黑手以便在政治上打垮414，同时加紧武斗的舆论准备。我知道在414这边，也在积极做着应对武斗的各项准备，包括加强科学馆的防卫，加紧“学习班”队伍的建设。

4月中旬的学校气氛，日紧一日，紧张得让我窒息。

4月20日晚，我正在礼堂的大字报区走走、停停、看看。与平时一样，大字

¹ 由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北大武斗对北京还没联合仍在内战的高校起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北大井冈山」奋起反抗。虽然北大的武斗没清华武斗那么惨烈，但也打得十分凄苦。直到7.28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后，武斗才停止。北大武斗历时4个月，长于清华的百日。

²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无疑又一次助燃了群众两派之间的内战烈火”。[17-P228] 清华百日武斗的发生和血腥，究其最终根源就是文革的理论以及毛泽东的这一类“最高指示”！

报区灯火通明。那些派战的大字报依旧言词激烈、派性十足。听到的广播依旧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回荡在清华园上空。只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天团派的广播里比往日多了一丝杀气。我似乎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股血腥的味道，似乎听到武斗的脚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逼近。清华园里，就像是大决战的前夜，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强烈的直觉是，两派的武斗已经不可避免，随时都可能发生，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刻由哪一根导火索而引爆。

突然，我班的一个老四看到了我，跑上前来对我说：找你找得好苦呀！我问他什么事，他给我递上一封电报。

这是一封加急的电报。我的心呼的一下提了上来，立即涌上一阵不祥的预感。

那个年代，对穷学生而言，唯一的通讯手段是信件。上大学以后，父亲规定我每个月必须要写一封家书报平安。我经常因为忘记而拖延。为此，他每次都在来信中附上8分邮票，以防我借口没钱不及时回信。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接听过来长途电话，也没收到过电报。我看到别的同学接到的电报多数都是因为家中有十万火急的大事。

我急忙拆开电报，一看，是老家发来的。只有这寥寥五个字：“母病危速归”！

我的脑袋一下就炸开了。我知道，要不是万不得已，家里绝对不会给我发电报，尤其是加急电报的。¹

我几乎连想也没有想就拿定了主意：立即回家！

我没找王允方。如果我有犹豫不决的事情，我肯定要找他商量的。在这件事情上，再去找他只能耽误我的时间。

但是我知道事情再紧急也必须告诉414总部，不能不辞而别。沈如槐不好找，我知道汲鹏在哪里。找到汲鹏，我把电报拿给他看，说，我是独子，我必须得马上回家。我说我不能再费时间找沈如槐了，请他转告沈如槐我离校的原因，代我请假。

汲鹏深表理解。他一再安慰我，叫我别着急。我回宿舍拿了点最简单的东西。汲鹏送我到南校门车站。我到北京站买了一张最早是第二天早上8点发车的火车票。那晚我在火车站一夜无眠，焦虑不安。

在火车上，我紧张的心慢慢的冷静了下来。我一边担心着母亲的病情，一边想：我就这样离开414了？我这样的突然离开是不是对414的不负责任？会不会对414造成伤害或者损失？会不会给团派的造谣攻击提供了炮弹？我脑子里乱哄哄的，理也理不清。

¹ 在平邮信件8分钱的年代，普通电报的每个字收费3分5厘（5厘是译电费），电报正文及接收人的地址姓名都按字数收费。加急电报每个字7分。所以要求电文极其简练。在农村里，打电报虽然昂贵，但是打长途电话更花钱、更费时、更少使用。

只有一点我是很清晰的：如果我要是因为留在学校里而见不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我将自责、悔恨一辈子！我甚至可以想象，我不能为母亲披麻送终的话，母亲的口眼都不会闭的。我的那些亲戚，我的那些乡亲，如果见不到我这个独养儿子侍候在母亲的病榻前，跪拜在母亲的灵堂上，他们的唾沫星子都会把我淹死的！

我宽慰自己，414 里还有那么多头头，个个都比我有能耐。虽然我是第二号头头，毕竟对 414 来说，有我一个不算多，没我一个不算少。而我在家里，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是无法由别人替代的，是万万不能缺席的。

古人有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忠”。回家探望病危中的母亲，这是我一个人的“孝”。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在忠孝难两全的时候，他可能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忠”而舍弃“孝”。可是，轮到我要抉择“忠”或“孝”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犹豫就选择了“孝”。想到这，我羞愧无比，无地自容。关键时刻，我在 414 与母亲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吧？我一边检讨自己、反省自己，但是却没有一丁点在下一站跳下火车重回学校的念头。我只是想尽快回到家里见到母亲。

在矛盾、不安、内疚、牵挂、痛苦、急切的情感纠葛中，我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一个厂里的食堂当大师傅。我想先到父亲工作的厂子里看看他在不在，是不是已经先回家去了。

父亲在厂里。而且父亲并不知道母亲病危的消息。这就有点奇怪了。我们商量了一会儿，怎么也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无法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我家的小村庄里没有电话，离公社又很远。父亲叫我马上回家看看，把家里的情况赶快告诉他。

还没容我动身呢，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腹部也疼痛难受。

这下父亲为难了。是留我在上海看病呢，还是回家看望我母亲呢？老家的电报上写得那么凶险，当然是应该立即回老家的。我的病还没有到危急的程度，要看病，回到乡下再看病也不迟。于是，父亲请了假，与我一起回老家。

坐了一天的火车，再乘汽车，再步行好几里路，终于到了家里。

乡亲们见到我回来了，都嚷嚷，这下好了，可盼回来了。母亲在里间床上躺着。听见外面的喧哗声，看到我进来，硬撑着想起来。我看到她病容满面，干瘦无力。她的身体一直不算好，整年都是病怏怏的样子。前些日子县城里发生武斗死了人，最近听别人说北京也发生了武斗，她马上就想到她的宝贝儿子。思念心切，急火攻心，一下子就病倒了。邻居很着急，商量出主意。有个姓唐的邻居是当过兵的，见多识广。他说那就赶快打电报叫银基回来，还要加急的。我母亲怕把我吓着了。他说，你本来就病着，不说得重一点，不加急，你儿子能回来吗？于是他专程跑到慈溪县城里，给我拍发了这份加急电报。

我母亲的病是心病加疾病。现在看到我回来了，心病好了一大半，挣扎着爬了起来。我看到她还能这样动弹，稍微放下了点心。

我对母亲有点责怪。我说她：“你还没到病危的程度呢，怎么好打这样的电报催我回来的呀？我都吓死了！”她一听就恼了，说：“你真的要我到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快死了才能叫你回来奔丧吗？我都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不重呀？你来信的时候经常说，为了保卫毛主席，流血牺牲也不怕。你不怕，我怕死了。听说北京在搞武斗，我就你一个儿子，你死了，我靠谁去啊？”说着说着，她伤心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了起来，骂我没良心的。我心里只是因为觉得对不起414，才说她一句。也觉得我刚才的话伤了她的心。被她一骂，我手足无措，惶恐不安，赶紧沉默不语。

母亲的病刚有点起色，我的病倒变得重起来了。每天都是腹痛、发烧、盗汗。去慈溪、余姚、甚至宁波的医院看过病，检查中发现腹部有一个明显可触及的硬块，化验指标也不正常。各家医院的医生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肿块，有的说是瘤子，有说是结核，还有甚至怀疑是癌症的。因为病因不明，难以对症下药，所以吃药打针都没什么明显的疗效。

5月上旬，我得知清华发生武斗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但是心里还是沉甸甸的。武斗的具体情况一点都不清楚。1.4 武斗只打了一晚上。我想这次可能也是这样打了一仗吧？不知道打过以后又会太平几天？回校后知道居然打了差不多一百天，居然伤亡了那么多人，这是完全超出我的预料和想象的。

大概到了5月中旬，村里有好心人告诉我们，说是在慈溪城里碰到有人在打听我的消息。

这下父母亲紧张了。他们担心是不是蒯大富从北京派人来抓我了？

我估量了一下，心想，团派千里迢迢地派人跑到浙江来抓我，不太可能的吧？我已经离开了学校，再绑架我有什么必要，有什么价值？难道真的要对我赶尽杀绝？

我对父母说，不太可能是冲着我来的。我怀疑这个消息是不是弄错了或听错了。父母说，不太可能，不等于没有可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万一真的是来抓你的呢？那就不得了啊！

他们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县城里有一位老师是一派的笔杆子，写过派性文章，另一派对他很恨，于是，出动了几个人，半夜里把他从被窝里抓出来，绑到山坳里，用乱石把他砸死了。据说那老师跪地哀求也没用，还是死了。这件事在我们村子里传得妇幼皆知，谈之色变。

一想到可能发生这样可怕的惨剧，父母亲就沉不住气了。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外避避风头。我虽然觉得自己与老蒯并没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但是保不定有个别老团对我很恨的，如 1.4 武斗谈判时有人要砸得我脑袋开花一样（这档事我

（没敢对父母说）。既然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老团不会来抓我，我就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了。

因为我病痛无法走路远行，当晚，借了一条农用船，请了本家的一位叔伯摇船，载着我去二姨家。她家离我家有十来里路，外人要辗转寻到二姨家，总要多费不少周折。

风高月黑之夜投奔亲戚家，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逃难。只听到单调的摇橹声，小船破水而行的哗哗声，谁也没有心情说闲话。我在二姨家待了一个多星期。老家周围好像没有再发现异常的情况。久待在外，也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回家。

老团来抓我可能是一场虚惊，我的病痛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扰。因为一直未见我的病情好转，父亲也不能老是在家里待着。他嘱咐我继续看病，多长点心眼关注周围，忧心忡忡地回上海做工去了。

小村子里，没有报纸可看，消息很闭塞。公社的广播是有的，每家都有一只失真严重的小喇叭。我家那只喇叭哑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我要听广播，就得到邻居家去。喇叭里讲的总是形势一片大好。邻居们晚饭后聊大天的小道消息真假难分，多数都是道听途说，有的我一听居然还是半年一年前的旧“新闻”。

学生可以停课闹革命，工人也可以停产闹革命，农民还得起早摸黑地干活。他们说，城里人不干活照样拿工资，我们不干活，误了庄稼，最后就得饿肚子喝西北风，谁管你呀。运动经历得多了，农民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运动来了先顺着，不顺着那是要吃眼前苦头的。风头过了该干啥就干啥。所以，1968年的夏秋天，我家的小村子里，文化大革命也好，武化大革命也好，只是在广播里响着，标语里贴着，饭后扎堆闲聊时谈着。除此之外，感觉不到文化大革命的踪影。

没有学校的消息，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再发生武斗，不知道两派的争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我的离校对老四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心中的思念绵绵无期。

人一旦离开原有的环境，往往会展开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除了生病看病，我无所事事。在这比较宁静的乡村里，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想一些问题。

看着农民披星戴月辛劳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想要是没有他们，我们饿着肚子还有力气来打派仗吗？文革还能再坚持几年？学生已经两年没上课了，工人已经两年没心思好好做工了，社会乱哄哄的，难道这就是文革？我们在学校里你争我斗的究竟有多少意义？

我对打派仗已经厌烦了。甚至，我对文革也感觉没意思了。说句心里话，不要说我现在病着回不了学校，如果我病好了，康复了，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回去再打派仗了。

在家几个月中，从北京寄来的信件极少，其中有一封是陈楚三给我寄来的。他在信中简约地介绍了学校里的形势，并用了一个“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典故。陈楚三是博学之人，这一典故的意思我依稀是知道的，所以对他的这封信印象深刻。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尽管「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有矛盾也有争吵，但是毕竟是同舟共济的墙内兄弟，相同点远多于分歧点。在这 414 存亡的危急关头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希望我能尽早返校。

收到这封信之后，我思绪起伏、辗转难眠。

我被众多的 414 战友推拥着做了 414 头头，我也用我的观点和行动影响着众多的师生裹卷到 414 这个群体里来。而在现时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口，我却不在他们的身边，没有与他们一起战斗，我内心非常的歉疚和痛苦！我深深地觉得对不起他们，无颜再见到他们。我比较胆小，但是我也并不是怕死鬼。只要与大家在一起，我就有胆量和勇气。要不是因为母病，我绝对不会逃避离校，肯定会参加这场武斗的。我反感武斗，反对武斗。但是当武斗无可避免地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也会参加武斗，犹如在 1.4 武斗中那样。我可能不敢一个人单挑独斗，但只要是在集体里我也敢于上场拼斗。

但是，理智告诉我，武斗是错的，武斗是没有出路的。我知道 414 是被迫参加这场武斗的。但是一旦武斗打响，就很难分得清正义或非正义。武斗就是靠拳头说话，无法讲什么道理。我不知道 414 该怎么应对这场武斗才算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即使 414 被迫参加武斗也同样要承担责任的。

从情感上说，我应该听陈楚三的话，回学校去，与我的 414 弟兄们患难与共，战斗在一起，要么胜利在一起，要么死也死在一起。从理智上说，我不应该再回学校去参加明知是不应该的武斗，尤其是已经出来了。情感与理智的纠缠撕裂着我，我痛苦万分！那种情感愧疚的痛苦，精神折磨的痛苦，远胜过躯体病痛的痛苦。

如果我的身体没病，我不知道我会做怎么样的抉择。幸好我一直病着。理智的思考和带病的躯体，决定了我即使想回校也无法回校。

我想，陈楚三肯定一直在殷殷期盼我的回信。沈如槐等一定也期待着我尽快返校助他一臂之力。我无颜、也无言回复他们。

到了 8 月初，我从广播里听到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的消息。我热泪盈眶！心想这一下清华的局势必将发生重大的有利变化。后来父亲也来信说，听人说北京的武斗已经停止了，既然我的毛病在乡下治不好，要我赶快到上海就医，久拖着总不是一回事。8 月 18 日，我到了上海。先去的是地段医院，最后去的是华山医院。

华山医院到底是名医院大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结核肿块的可能性最大。这与我自己的判断相吻合。1966 年底我在南宁生病就是结核性胸膜炎，这是病史。低烧、盗汗、血沉超标等也都符合结核病的症状。只是结核病怎么会在腹部有那么大的肿块，乡下医生解释不了。华山医院的医生说，要确诊，必须剖腹探查。我问，怎么剖腹探查？回答是：“打开腹腔，活体检查，是什么性质的肿块就作相应处理。”我问能保守疗法吗？医生说，当然也是可以的，只是什么时候才能

吸收这么大的肿块，谁也不知道，可能要一年半载，也可能要拖上三年五年的。医生最后加上一句：“要是万一不是结核肿块而是肿瘤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想到这种“万一”，想到即使是结核肿块也可能要拖个几年，那还怎么参加工作？我决定还是动手术为好。是什么就当什么治，干净利索，比拖着半死不活的要强。

9月5日，住进了华山医院。我动手术的时候是半身麻醉，脑子是清醒的。手术刀的刀锋在肚皮上轻轻一划微微的痛感以及肚子切开一条缝以后被医生拉扯开来的感觉，现在还能回想得起来。肠子被捣腾了一阵。听得一个护士轻声地叫道：“是结核！是结核！”不一会儿，一只搪瓷盘端到我的跟前，我微侧脑袋斜看了一眼，两个肿块宛如从老母鸡肚子里取出来的两只软皮鸡蛋。术后我问医生，肿块都取出来了吗？医生说只取了两个最大的肿块。我问为什么不全取出来？他说，小一点的肿块要靠机体自身慢慢吸收，如果要全部取完，那就把你的肠系膜全都剥掉，能行吗？

活体切片检查结果证实确是结核性肿块。后来问了医生，我才知道我这毛病全名叫“肠系膜淋巴结结核”，是结核菌活动到肠系膜上的结果。上一次，结核菌跑到胸膜里，就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因为没好好休息，一直瞎折腾，所以结核病菌就活动到肠系膜去了。医生警告我，这次一定要坚持治疗，让体内无数个细小肿块都吸收掉。要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尤其不要熬夜，老老实实的全休半年以上。要是不治好，将来结核菌跑到骨头里就是骨结核，跑到脑子里就是脑结核。医生的话吓得我一愣一愣的。

这次手术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在2000年前后的六七年间我已经先后得过三次肠梗阻——肠子套叠、嵌闭或扭转，其中一次又动了手术。医生说，上海那次手术后的肠粘连是肠梗阻最可能的诱因。肠梗阻没有有效的预防办法。一想到以后可能还会得N次肠梗阻，真想在肚皮上装上一根拉链以备急用。

手术当晚，麻药过了，疼得厉害。躺也不行，坐也不行，侧身不行，仰面也不行。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难受极了。老爸陪着我，把他也折腾得够呛。

病房里有一个思想特别积极的病友，他每天都要带着全室病友做早请示晚汇报。那时候的早请示晚汇报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程序：全体肃立，唱革命歌曲（最经典的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念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右手高举有节奏地挥舞红宝书¹，高喊：“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样，就算礼成了。要是碰到这样的早请示晚汇报不参加，那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敬不忠，

¹ 是指64开本甚至更小的套着红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

麻烦就大了。出身不好的，马上被抓个“现行（反革命）”也说不准的。

我动手术后的第一天，无法下床，疼得呲牙咧嘴的，那位带头病友见了，瞧我这样，随我去了。第二天早上，疼痛好一点了，但是下不了床。那位带头病友见我仍然不想跟着做早请示的样子，不高兴了，说：“怎么这样娇气的呀？”我问：“坐在床上行吗？”“不行！”他说，“早请示是一项很严肃的活动，怎么能坐着做呢？”我没办法，只得下床，佝偻着腰，扶着床沿，痛苦地比划着，嘴巴蠕动着。尽管这样，那位带头病友还瞟过来不满的眼色。

住了 14 天院。出院后，休息了几天。我心里惦记学校。离校 5 个月了，学校里的形势肯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工宣队进校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想赶快回去。9 月 25 日，我返回学校。

这一回去，我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真正由学生变成教师了。

我们这一批 66 届的毕业生是按 1967 年 9 月毕业的。也就是说，我们上了 7 年本科。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我们是到 1967 年的年底才正式分配完毕（极少数待分配的以外）。我是 1968 年 2 月 17 日向学校报的到，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实那天只是办了个手续而已。学校里打着派仗，我依然是派头头，没有一点做教师的感觉，只是从此每月可以拿见习工资了。

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 (1968.10—1980.10)

第一节 去头头学习班“投案”，被工宣队拒收

到了学校，已经没有了两派的激烈争斗，此时已是工宣队的一统天下。碰到熟人，也只是匆匆地聊上简单的几句话，没有多大的兴趣和心情谈更多的情况。我只知道，我离校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两派发生了死伤多人的大武斗。七二七那天，工宣队死伤惨重。至于武斗何等的惨烈，一直不是很清楚。在 414 最艰难最危急的这些日子里我离开了战友，这是我最感内疚最感羞愧的事情，所以我也无颜向我的好友详细了解武斗期间的情况。此后听到的，也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段，残缺不全的局部。直到看了沈如槐写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和唐金鹤写的《倒下的英才》，我才对百日大武斗有了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

因为身体还未痊愈，刚回校先休息了十来天。后来我想，既然已经回校，学校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现在是工宣队的天下，我不敢完全给自己放假。我回到了教研组，先是半休，不久基本上是全时参加运动。

在教研组里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两派停止活动了，工宣队掌权了，这个时候的打倒派性斗私批修才真正开始取得实际的效果。

听说两派的头头都在大联委学习班里办班，我与教研组里一位信得过的老师商量，我要不要去参加学习班？他说被工宣队点名了再去总是比较被动的。我觉得也是。主动去，起码表示自己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并没有想有意逃避。

我跑到工字厅古月堂，找到一位工宣队的负责人。我问他，我这样的人要不要参加大联委学习班呀？

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他对我这个名字好像没听说过似的，一点也不熟悉。

他又问我，原来干嘛的？我说我是 414 的头头。我没敢炫耀自己是 414 的第二号头头。

他再问我，参加武斗了吗？我说没有参加武斗，刚从老家回来。

他不再与我多说什么了，手一摆，说，既然没参加武斗，那就不必参加学习班了，还是回你原来的单位参加运动去吧。

呵，有这样的好事？我像是去自首当场被无罪赦免了一样，转身就回来了。心想，是你们不收留我的，又不是我故意逃避的。我知道，在教研组里参加运动，远比在学习班里办班，心情要放松得多。

估计工宣队进校之前，以为清华的两派，毛泽东支持的全国闻名的蒯大富领导的团派一定是革命左派。反对左派的 414 肯定就是挑起武斗的保守派了。没想到七二七那天，团派让工宣队死伤了那么多人，而 414 是欢迎工宣队的。工宣队对团派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要是我是团派头头去自投罗网，也有可能照收不误。对一个他不熟悉又没参加武斗的 414 头头，工宣队就不是很感兴趣，把我打发走了。

虽然没有参加大联委学习班，工宣队并没有把我这个头头完全忘掉。系里的、教研组的工宣队要求我写交代揭发材料。交代是交代自己的问题和罪行，揭发是揭发别人的问题和罪行。我所交代的第一个错误是“反对谢富治同志”。此后还交代了第二、第三、第 N 个错误。

工宣队进校以后，除了给头头办学习班、追查杀人凶犯、整肃派性以外，就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把全校师生员工专注在两派争斗上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斗争大方向上去。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隐藏在群众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美蒋苏修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与文革前二年揪斗各地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完全不同，清理阶级队伍完全是矛头向下的运动，据说是为了打掉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分清敌我阶级阵线。

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死狗”，当然需要在运动的烈火中一烧再烧的。十几年来，他们翻来覆去的被斗过多少次，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重点是要把那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即使掘地三尺也要一个不拉的统统挖出来。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于是，阶级敌人的队伍急速膨胀，畏罪自杀的人数迅速上升。¹

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上经常召开全校教职员的万人大会。大会的肃杀气氛足以让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心惊胆战、两腿发软。其中有一排队伍是各单位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位教过我外语的和蔼可亲的女教师也排在这排队伍的末尾。见到我，一脸尴尬和不安。我心想，怎么她也被揪出来了？难道也是阶级敌人？

清理阶级队伍这场运动期间，自杀的人数是清华文革中最多的阶段。那时，

¹ 据唐少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死亡”》一文载：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共有 24 人自杀身亡”。

对自杀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我只是偶有风闻。

自控系是1958年刚成立的新系，教师都比较年轻，不像基础课教研室、土建系、水利系等这些单位里有历史问题的“老家伙”比较多。我所在的教研组有十几个年轻教师，都没什么历史问题，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

第二节 滑稽的整党：群众把党员的关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斗了个遍，有的甚至斗上几遍。今天是这拨人斗那拨人，明天是另一拨人斗这拨人。文革中，除了老牌的黑五类，基本上是谁都整过人，谁也都被人整过。

斗完走资派，斗群众里的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斗完阶级敌人，就要对普通党员整一整、烤一烤了。

像我这样的普通群众，在专门整党（基本上是整党员）的运动中，并非是运动对象，不会挨整的。群众在一旁，不光悠闲地看热闹，手里还握有一定的权力——要是多数群众对某党员的检查不满意，通不过，那就要重新检查，直到群众满意为止。这叫“开门整党”，群众成了党员是不是能过整党这道关的把门大将。

世道变得真的是好快呀！“九评”学习的时候，教研组的老师来听我的检查，现在是我听教研组党员老师做检查。哪里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才七八年就来了个轮回！

现在轮到整党了，这个时候的党员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没一点精气神了。

尤其是在公开检查阶段，每个党员都要谈错误，说认识、挖根源、查危害。有检查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检查忘了本的，有检查自己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的，有检查自己不敢得罪人、老好人思想比较严重、斗争性不强的，有检查自己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的。每人的检查都要是挖空心思，都是斟字酌句的。既不能写得太深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过不了关，也不能检查得太肤浅了给人以浮皮潦草不认真的印象也过不了关。

当众检查时候的临场发挥、现场表现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表情凝重、声音低沉、眼泪汪汪，能让大家感觉到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认识是多么的深刻，那就会比较容易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在群众评议阶段，就容易一次通过。如果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捶胸顿足、哽咽不已，那说明是真正触动到了灵魂的深处，叫做“感情出来了”，群众点头通过绝对没问题。要是检查的时候表情呆板、语调平缓，声调单一，连心里难过的样子都没装出来，既感动不了自己，当然更感动不了群众，对不起，准备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检查吧。

记得有一位调干出身的党员，他检查自己在车一个薄杯形零件的时候是用一段铜棒一点点扣着切削而成的。他说，绝大部分的材料就这样都浪费了。要是这些废弃的材料买成米，该有多少斤？一家子能吃多少天？他算了一本帐，痛哭流涕地说自己也是穷苦出身，这是忘了本呀！

一个普通党员，在那个时候，只能这样检查才能过关，重新登记，其他的捷径是没有的。

幸好我们教研组的党员老师，出身一般都不是很差，也没什么历史问题，所以，虽然也不全都是检查一遍就通过，最后都比较顺利地过了关。¹

教研组里的老师，给我讲过课的，我当然认识、熟悉，但是并不知道底细。至于没任过课的，此前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对于一个刚分配到教研组来的毕业生，除了旁听受教育以外，没什么说话的份儿。

我们教研组的工宣队员是一位四十开外的女师傅，看上去为人蛮亲和的。不过批评起这批老师来，不讲情面，有时候还真能一针见血。

她说，你们这些大学教师，每天上班就只把自己眼前的一尺见方的地方收拾一下，别的都不管的，哪像我们工人上班都是全车间打扫？全局观念就是不如我们工人阶级。说得大家红着脸，哑口无语。

第三节 毛泽东 7.28 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大约是在 1968 年年底，我看到了一份手抄的毛泽东 7 月 28 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讲话稿。我把讲话稿抄在专门收录毛泽东未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稿、诗词等的专用笔记本上了，至今还在。这稿子比后来韩爱晶整理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要简单得多。不过，有关清华两派的谈话内容基本精神是一样的。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1. 突然而定：“7 月 28 日凌晨 2 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9]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在凌晨时分被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惊醒，揉着忪眼，带着睡意，心中不知道有多忐忑不安呢！

¹ 全校党员不全是像笔者所在的教研组党员那样都能顺利过关的，“仅在 1969 年年初的‘整党建党’运动中就有五位党员因为难于过关，自杀未遂。”[23]

2. 空前绝后：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以下全部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的以外）悉数出席；召见时间比一般接见外宾还长许多的五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清华的两派及其武斗以及由此引伸的教育革命等；对 414 这样一个群众组织明确的表态和对《必胜》的严厉批判。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此后也不再有的罕见举动。

3. 意义巨大：这次召见，决定了团派和 414 的命运，也决定了全国造反派的命运。红卫兵、造反派走下了文革的舞台，文革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成为新的文革主力军。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才不高兴那个 414。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 [13-P370]

当我看到这里，立时感到满腔的悲愤，犹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一般的不能自己。我心里对着远方敬畏的神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一心一意用生命来捍卫您，捍卫您的伟大思想，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好几位 414 战士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您怎么能说我们 414 是反对您的呢？您要我们把火热的胸膛剖开让您看看我的心吗？那里面是一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啊！我们知道您对蒯大富是支持的，偏爱的。我们之所以成立 414，是因为蒯大富他确实有错，他执行您的路线过左了呀！如果不是有人在您面前歪曲事实，搬弄是非，您一定会明白我们才是您最忠实的红卫兵！苍天啊～～”

一想到在伟大领袖的眼里我们竟然是反对他的，他竟然那样的厌恶我们，我沮丧极了，难受极了，绝望极了！我甚至这样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悔不该拼死拼活地搞这个 414！

这份讲话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研读过它。尤其是涉及到清华的，每隔几年读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感受。尽管我不是七二七的亲历者，更没有七二七的内幕秘闻可爆，我还是很想谈谈自己对这次召见讲话的看法和思考，其中也有一些主观的臆想和猜测，算是一家之言。

1. 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反感 414

从这篇召见讲话中，可以明确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反感《必胜》所表达的“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

我在本书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了《必胜》本来的观点只是“414 打天下，414 坐天下”或“414 为主打江山，414 为主坐江山”。是毛泽东硬要上纲上线，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对“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的论调非常反感，说：“清华 414 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 414！” [13-P354]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反感“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借召见之机，借《必胜》之题，要痛加批驳呢？那是因为这样的论调深深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触犯了他的忌讳。毛泽东本来就是农民造反派的头头，是他造了国民党的反才打下这座“共和国”的江山。毛泽东更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坐上天下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论调岂不是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坐天下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这样一种从根基上、理论上反对他、反对现政权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毛泽东看到《必胜》就龙颜大怒，一再声言“我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

胜者为王败者寇。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基本规律。一个敢于造反的首领，率领一群文武左右，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于是首领成了开国皇帝，文武左右成了开国元勋。他们打下了天下，也要世世代代坐天下。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等文臣武将）在“无产阶级”外衣下根深蒂固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观念反映出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

在我 1967 年批判《必胜》的时候，当时只担心《必胜》会传到江青那儿，没想到竟会传到毛泽东那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召见讲话稿的时候，心里对周泉纓怨恨到了极点，以为是他让毛泽东对 414 产生了误判。实事求是地说，把毛泽东反感 414 的责任全部推到《必胜》、推到周泉纓头上，是有失公允的。毛泽东并非完全是因为《必胜》才反感 414 的。但是，因为《必胜》，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 414 的反感。由于《必胜》貌似很有理论性，这让毛泽东认为 414 反对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有理论支撑的。

其二：他反感 414 的“红线主导”论。

与团派提出的“彻底砸烂”论相对立的是，414 提出了“红线主导”论。这是四一四思潮最基础的理论。

要是在文革前，尤其是毛泽东被政治上的对手攻击的时候，譬如像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有点招架不住的时候，谁要是提出建国以来的成就是伟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为主导方才取得的这样一番宏论，毛泽东一定是非常领情的。当年，林彪就是在大会上毫无保留地对“三面红旗”给予最坚决的支持，给毛泽东以最及时的援手，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即把唯一一个“很好”的赞语给了林彪。414 的“红线主导”论本意是为毛泽东解放以来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业绩歌功颂德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提，实在是提得不是时候。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多条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正处于攻势，毛泽东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将刘少奇苦心经营的地盘彻底砸烂！而 414 提出的“红线主导”论，在毛泽东看来，

既有为刘少奇评功摆好的嫌疑，又在否定他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妨碍他彻底摧毁刘少奇的势力。

毛泽东说：“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13-P373]毛泽东既说要“彻底砸烂”，实际上他又承认并非完全“彻底砸烂”。究其清华团四两派恶斗的原因，这种悖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对团派“彻底砸烂”论表示赞赏和支持，实质上就是他对414“红线主导”论的反感和否定。他以为蒯大富只要把“彻底砸烂”的意思向414解释清楚了，414就驳不倒了。他把414看得忒弱智了！如果说，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彻底砸烂旧清华”，那么毛泽东通过文革要彻底砸烂的是“彻底砸烂旧中国”（十七年来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把持的那部分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欣赏、支持蒯大富“彻底砸烂”的根本原因。

其三：他反感414搞抬尸游行、炸高压线。

沈如槐承认：“派人炸高压线的电线杆是我在武斗中最愚蠢、最缺乏理智的决策，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次行动……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损失。”[1-P390] 我能理解沈如槐当时的心情。为了营救科学馆被团派火力封锁的一百多名414人员，才出此下策的。但是，情有可原，法理难容啊！因为这，让毛泽东反感414，我认了，414错得无话可辨。

至于“抬尸游行”，这算什么错误？当4月29日谢晋澄（自9）被汽车辗压而死的时候，“414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4-344]。那时，414还顾及毛泽东的一点颜面，没抬尸到天安门去游行。但是此后两个多月来，中央不仅没出面制止武斗，武斗反而不断升级。7月4日、5日、6日连着三天，都有老四被冷枪射杀，414才在万分悲愤和极度绝望之下抬尸到天安门游行。这说明414对中央还寄托着最后的希望，敦请中央快快出手制止清华武斗。是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上搞抬尸游行，那是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脸，丢了文化大革命的脸，丢了他这个伟大领袖的脸，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为此，他非常反感414。我要说，他反感414是没有道理的。要说丢脸，是他自己在丢自己的脸！他发动、领导的文革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是他丢了中华民族的脸，丢了中国人的脸。414的抬尸体游行，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把丑陋的、残暴的文革之脸向世人、向外人展示了冰山一角而已。

得益于通天的「井冈山报」，领袖对414的恶行一清二楚。至于团派的恶行，领袖概不知情，偶尔从别的渠道知道一点也以小将犯错误宽宥之。团派有这样的领袖撑腰，怪不得能肆无忌惮了！

其四，他反感414反对中央。

当毛泽东说：“我才不高兴那个 414。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江青马上接着起哄说：“414 是反对我的。”跟屁虫谢富治接着江青说：“414 也是反对我的。”江青在别处插话时还说：“我说 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 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13-P362]

一个小小的 414，竟然反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中央文革，还反了没吭声的陈伯达，差不多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414 都反了，真够罪大恶极的。

这里，只有谢富治说 414 想反他，我们是认的，没冤枉我们。反康生、反陈伯达，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并不代表 414。对江青，我们有不满，但是没反她。至于对周恩来，414 对他一向是敬仰的、感激的，要说反总理，完全是江青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和挑拨！

其五，他反感 414 右倾保守。

早在 1966 年 8 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知道蒯大富其人了。那时，蒯大富是一个被王光美的工作组、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典型。毛泽东用这颗炮弹狠狠地炮打了刘少奇，把他拉下了马。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 年 12 月 25 日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又一次立下了大功！蒯大富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是学生领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些在毛泽东的心里是已经定格了的。

414 是 1967 年 4 月才产生的。作为革命左派的对立面，天生就注定了是个“右”派（好听一点叫“保守派”）的命运。江青说：“甚至 414 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13-P370] 蒯大富是革命左派，深得毛泽东的偏爱，正红得发紫，414 右倾保守，既没有为毛泽东建立寸功，反而不断地找蒯大富的麻烦，414 凭什么讨毛泽东的喜欢？凭什么让毛泽东不讨厌？

这次召见，这篇讲话，让我们第一次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对 414 有那么大的不满和反感、那么深的厌恶和怀恨。

相比较蒯大富做了好几件令毛泽东欣赏、开心的大事而得到他的宠爱，也因此，他对 414 越加反感。

是否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对 414 的反感，也就是他对全国造反派中温和、保守一翼反感的真情表露？

2. 毛泽东认可的“四不”方针让两派都失望之极

从百日大武斗爆发的那一天开始，团派和 414 都盼望着中央早日表态和干预。当然，双方所盼望的表态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从中央文件和公开讲话中看，他向来都是反对的。这次召见讲话中，他也说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他接着马上就说，“如

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13-P355]因为他认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13-P368]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武斗都一贯地坚决地无条件地反对的。在他认为需要“治”的时候和地方，他强调反对武斗、不许武斗。在他认为需要“乱”的时候和地方，他是默许武斗、纵容武斗、甚至想法搅乱。乱与治，都出于他的政治需要。

清华的百日武斗，正好处于毛泽东希望文革全局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看到中央在清华武斗的前期和后期，执行着两种不同的方针：

高校学习班结束前后，北京市的一些高校已经爆发了武斗。北大发生武斗后，中央迅速表态了。这一表态，积极意义是北大武斗表面上被制止了，而非常坏的负面影响是为得到中央支持的强势派蓄意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加速打垮弱势派起到了示范作用。

毛泽东在召见时说：“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13-P353]我不知道得到他认可的“四不”方针，北京市是何时出台的。我估计出台时间是在北大武斗之后清华武斗之前。这从北京市对北大清华武斗的不同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一方针，起码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也解释了，在武斗初起的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一个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由韩爱晶、王大宾等来清华调查武斗，但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14]

谢富治、吴德是知道毛泽东同意他们提出的“四不”方针，所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去做强力制止清华武斗这样既不讨好又很吃力的傻事。

到1968年7月初，毛泽东对全国近似内战的武斗局面已经不能容忍了。再这样下去，文革就要失控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真的想“治”了，再也不想继续“乱”下去了。《七三布告》¹的发布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于是，7月15日，谢富治等北京市领导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上交枪支²。这实际上是上层对蒯大富的严重警告，也是给蒯大富以最后的机会。

对于上层在清华百日武斗期间前后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方针（“四不”方针是只能感觉没有明示的），清华两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团派方面

武斗爆发前的4月22日晚，新航空馆里“一场空前严肃的（团派）总部会议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一些人坚持要打，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

¹ 7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

² “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13-P340]蒯大富的建议明确地拒绝了谢富治的要求，也堵死了自己的最后一条生路。

指出，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会场议论纷纷，显然主战派占多数。……会上，也有人¹这样认为：‘中央对清华两派的斗争始终不表态，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与 414 僵持着，也许只有武斗才能迫使中央尽快对清华问题表态。’”[11-P109] 蒯大富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 3 月 29 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10] 蒯大富又说：“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10] 显然，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用中央的表态压垮 414，这就是团派挑起武斗的目的。

什么样的表态是团派期望的？我猜测：要是中央表态说 414 是挑起清华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已经由一个右倾保守的群众组织沦为被“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所操纵的反动组织，那么，把 414 彻底压垮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团派有这样的指望，并非是白日做梦。根据以往江青、谢富治等大人物对团派坚决支持的态度，参照北大的先例，不少团派人士估计武斗打起来以后，快则一二天，迟则三五天，中央就会表非常有利于团派的态了。对此，团派信心满怀。

事实上，团派可能得到的中央表态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大得多。毛泽东在召见中讲了“我才不高兴那个 414。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最高指示啊！远非 1967 年 4 月蒯大富曾经拼凑“414 上台，不行！”那样有水分的“最高指示”可比。这个“414 是反对我的”最高指示，对 414 的杀伤力，犹如立即处斩、就地正法的死刑宣判一般，顷刻间，414 会作鸟兽散。可惜的是，这一最高指示发表的时间晚了点，恰如马后炮，对团派已经没多大的帮助了。要是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武斗期间，甚至在七二七前的十几天发布这样的最高指示，团派发动武斗、求助于中央表态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武斗挑起来了，令团派大失所望的是，中央也好，毛泽东也好，对清华的武斗一直没有表态。

可能蒯大富也不知道中央不表态是因为此时正在执行着“四不”方针，他没有认真地琢磨中央不表态意味着什么。团派既没有利用“不表态”不计后果地疯狂进攻 414（各种条件所限也是重要原因），也没有因为“不表态”退而停息武斗（可能骑虎难下吧）。就这样，在占优的局面中与 414 打打停停地胶着着。

到了 7 月份，眼看 414 已经被逼上悬崖，这个时候，中央出台了《七三布告》，始终偏袒蒯大富的谢富治也开始叫停武斗。团派对此是极不情愿的。² 明摆着，这

¹ 在五柳村网站 2011 年 2 月 15 日发表的《陈继芳：1968 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一文中，“鲍长康的见解很独特，他说：”代替了此处的“也有人这样认为：”。

² 严格地说，此处应该是仅指团派中的鹰派。沈昆对笔者说过：“我记忆中并不知道有此谢富治叫停武斗之事，很可能是老蒯或团派头头贪污了。我以为，如果当时老蒯如实传达了谢的要求，在团派内充分民主讨论，团派可能达成某种停止武斗的解决办法，因为当时一线武斗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感到厌倦了。”

样做给 414 有喘息的机会，不让团派取得眼看就要到手的最后胜利。

总之，团派对中央在百日武斗中前后两种方针和态度全都没看懂，全都不满意。

414 方面

在武斗爆发之前，那时我还在学校里。414 总部开会和头头们底下议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都是“如何应对武斗”。也在如何应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在科学馆内安装铁门，加强「李文忠学习班」的训练等。实事求是地说，414 对于如何防止武斗想得很少，说得很少，做得很少。我与绝大多数头头一样，都感觉到武斗将一触即发，无法避免，应对武斗是当务之急。

414 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要不要武斗”的问题，因为“要不要武斗”的决定权不在 414 方面。414 深知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站在团派一边，414 要是挑起武斗只能招来棍棒格杀，自取灭亡；只能引来包括 414 群众在内的广大师生员工的严重不满，众叛亲离；只能让团强四弱的局面更为不利，雪上加霜。要说 414 想维持分裂的现状，拖着，以求将来联合的时候筹码可以更重一些，这样的想法是有的。但是想从武斗中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的想法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捞。414 真的不想武斗，不能武斗。因为政治上打不得，实力上打不赢，武斗对 414 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炸药桶的敏感时刻，414 做了一件错误的、不明智的事情：抓斗陶森。团派认为抓斗陶森触及了他们的底线，是引爆武斗的导火索。团派可能找其他借口甚至谣言（如 414 在大礼堂藏匿了“480 根长矛”[4-P340]）来挑起武斗，但是抓斗陶森实在是 414 以自己的错误给了团派挑起武斗的口实。

4.23 武斗终于爆发，演变成百日大武斗。

414 在武斗中对中央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

先是失望。武斗爆发以后，以“救火大队长”著称的李钟奇副司令员不再来清华“救火”了。海军宣传队撤离清华了。北京市革委会就清华武斗发表了一纸无力的声明后再无实际下文了。种种迹象表明，清华爆发武斗以后，情况十分反常，负有责任的上层竟然都成了“围观者”，谁也不来管清华的死活了。414 寄希望于中央和北京市出手制止清华武斗的希望落空，感到深深的失望。

继而丧失信心。本来以为，这场武斗“发生在首都，发生在毛主席的身边，终究不会打大，打久，中央不会长期不闻不问”。[1-P367] 但是，都打了一个多月了，经过 5.30 大战，双方都死了好几个人了，上层依旧不闻不问。414 对上层干预武斗已经一点点地失去了信心，前途感到十分渺茫。

接着是愤慨。等到武斗进行了两个多月，七月上旬，那几天，每天都有 414 的人被团派的冷枪射杀。这都是《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发生的惨案。414 的情绪极度悲愤也是极度愤慨。抬尸游行是超乎常理的行为。但是，除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向中央表达请求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十万火急的心情以外，还能有什么样其

他比这更合适更理智的方式呢？414是多么祈望《七三布告》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

最后是绝望。当救援科学馆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以后，414 陷于绝境。救又救不了，撤又撤不出，连一向意志坚定的沈如槐也产生了“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即撤出清华”[1-P392] 的念头。我相信，七二七前的最后几日，414 在绝望中的坚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如果 414 因为失望、绝望、愤慨而被激得完全丧失了理智，采用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报复手段对付团派，那就正好应了毛泽东“暴露坏人”的预言，414 肯定会落得个被当做土匪一样歼灭的下场。

所幸 414 在百日武斗中一直坚守防御的立场，而且是纯粹的消极防御。这明显与军事原则不相符的。在军事上，即使是防御，也应该是积极防御，在防御中抓住有利战机进行反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但这是派战，是武斗。既然被迫参加了武斗，唯一可行的就是以消极防御表达不愿武斗的意愿和不屈从团派挑起武斗的意志。

清华发生残酷、血腥、长达百日的大武斗，团四两派都有责任，但最大、最主要的责任是在上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武斗，究其总根子，全在于文革的理论和文革的发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宣扬的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发言权的斗争哲学，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革命经验都为武斗埋下了种子。他纵容暴力夺权，江青鼓吹“文攻武卫”，都造成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面。其次，要不是他采用了令两派都失望都不满的“四不”政策放任清华武斗，近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清华即使发生武斗，也是完全能制止得住的。

3. 毛泽东为什么没把七二七行动预先告诉蒯大富

几十年来，令团派最想不通并且一直纠结着的疑团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

蒯大富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10] 此话，我完全相信。要是预先知会一声蒯大富，团派对工人宣传队所表现出来的欢迎程度，起码在表面上绝对不会逊于 414。

蒯大富认为对他封锁如此重大的消息是一个阴谋，一个“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10] 的阴谋。

就在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团派头头和骨干的小型聚会，他们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的真相。七二七那天，团派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想弄明白团派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了。

由于七二七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还没有揭秘，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我也是。

七二七这次行动的决策、实施过程，韩爱晶是这样说的：

1968年7月的某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样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斗。谢静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¹，制止武斗，拆除工事。”[13-P341]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1、这件事情的筹备过程有好多天，具体参与筹备的也有好几个人。七二七行动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也非个别人知晓的秘密行动。

2、毛泽东是七二七行动的最高统帅。原则大事，如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这些都是在毛泽东那里决定的。

3、毛泽东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对于区区三万工人进清华的一次行动，毛泽东没有掉以轻心。他蹲在地上指点地图的架势，不亚于他当年指挥百万雄师的三大战役。这不仅是为了过一把久违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瘾，还因为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通过制止清华的武斗来达到平息全国武斗的目的。

4、为此，毛泽东打破惯例，反常行事：（1）派工人去制止武斗。往常北京市发生了武斗，都是由卫戍区派解放军去制止。如果仅仅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遵循常例就是。蒯大富既不会开枪抵抗解放军，清华武斗也一样能被制止。以往的经验告诉毛泽东，那样只能解决清华一时一地的武斗问题，不能解决清华武斗的根源问题，更不能解决北京和全国范围的武斗问题。毛泽东是着眼大局的。他派工人去制止武斗，这样的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完全出人意料。（2）派出了三万之众。三万工人与五六百人的武斗人员，几乎是50:1的绝对优势。三万工人涌进清华，因为武斗而空旷的清华园里将满地都是工人，区区几百个武

¹ 7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制止陕西武斗的布告。

斗人员立即会陷入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架势，工人不是来论理的，而是以多压少硬做的。识时务的，和平解决；不识时务的，就强迫解决。无论团派还是414，只许服从，不许讨价还价。（3）由8341部队指挥，卫戍区参战，海军宣传队带路，主体是工人。军民一体，各自发挥优势。

一旦以这样的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解决了清华武斗的老大难问题，再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那么北京其他发生武斗的高校，全国还在发生武斗的地区，都能正确无误地接收到伟大领袖下决心要解决武斗的信息了。解决清华一个点，影响全国一大片。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非常规的手段，才会有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效应和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强劲威力。毛泽东确实想出了一着非凡的高招、妙招、绝招！

毛泽东拍板决定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有没有嘱咐有关人员给蒯大富打一声招呼呢？有三种可能：1、明确嘱咐通知蒯大富。2、明确嘱咐不要通知蒯大富。3、没有明确交代要不要通知蒯大富。

1、要是毛泽东明确向某人交代要预先通知蒯大富，我看没有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贪污“最高指示”的。当迟到的蒯大富扑在毛泽东的怀里恶人先告状，对毛泽东哭诉“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13-P366]的时候，毛泽东听了，马上就问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13-P365]接着毛泽东又马上追问：“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13-P366]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看出，要是毛泽东事先交代过要通知蒯大富而该人有意或无意遗忘了的话，毛泽东肯定会追问个水落石出、责备此人的。即便是周恩来，我想毛泽东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人真的忘了通知蒯大富，看到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龙颜已经震怒，即便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肯定早就心惊胆战，赶快坦白请罪的。所以，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要通知蒯大富而经办人故意隐瞒不通知，故意要让蒯大富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的“阴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2、毛泽东明确交代不要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可能性也是极其微小的。难道毛泽东有意要测试蒯大富的应变能力？果真这样，当然是没有哪个人敢泄露天机偷偷通知蒯大富的。

3、最大的可能性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想到要不要通知蒯大富这码事。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办事风格。他向来是只抓大方向，不过问细节的。

尽管毛泽东没想到要通知蒯大富，但是他对蒯大富是有基本估计的。《井冈山报》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414挑起了清华武斗，蒯大富只是没有能力平息武斗而已。他相信蒯大富会欢迎工人制止武斗的。

毛泽东认为：“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13-P354]“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13-P369]这样非同寻常的声势，以及通过各种形

式给蒯大富“间接打了招呼” [13-P370]，本来很聪明很机灵的蒯大富应该用不着费太多的脑筋就能想得到工人是谁派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13-P368] 的蒯大富，已经蠢到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蠢到没一点智商了。毛泽东太相信蒯大富了，结果看走了眼了。毛泽东对自己也太自信了，以为三万工人一到，两派定会夹道欢迎，武斗立马停止，人们山呼万岁。所以，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万一蒯大富抗拒工人怎么办？”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毛泽东很想帮蒯大富，给他梯子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学生领袖、造反派头头，想通过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测试他们的政治智慧，考验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既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也测试、甄别他们。这也不能完全排除的。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的态度，那些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在要不要通知蒯大富的问题上，就要大费脑筋细思量了。

8341 部队的负责人，与「清华井冈山」素无交往，没有义务要预先告知蒯大富。8341 是“御林军”，其地位是「清华井冈山」不可能相比的。谢静宜、迟群¹ 等人“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 [13-P349] 像迟群这样喜欢出风头、有政治野心的人，对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才可能做到一鸣惊人。

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丁国钰，北京卫戍区的黄作珍、李钟奇等人，他们在本次行动中只是配角。而蒯大富“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 [13-P350] 他们对蒯大富的张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他们心里巴不得蒯大富摔一个跟斗，哪会多嘴去通知蒯大富呢？

周恩来，从七二七行动的策划和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毛泽东完全绕过了他，他即使知道了这件事也绝不会插手，只会冷眼旁观。如果在七二七行动之前毛泽东告知了他，做事一向慎密的他对这样一件事情该涉足多深肯定把握得极有分寸。只要毛泽东没向他交代要给蒯大富打招呼，他是不会主动去通知的。何况他的内心对蒯大富也没多少好感。

估计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都没有参与策划此事。如果江青知道此事，即使毛泽东没有交代通知蒯大富，凭着江青对蒯大富的关爱，她是极有可能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即便事后毛泽东责怪江青多嘴多舌，江青倚着夫人的身份，或撒娇或撒泼，毛泽东对她也奈何不得。只因为江青没有参与此事，所以蒯大富这一最重要的援

¹ 迟群，时任 8341 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68 年七二七行动中，他们是开赴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之一。此后，两人掌控清华、北大两所大学长达 8 年，成为“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尤其在迫害知识分子上，犯下了累累罪行。

手没有发挥作用。¹

至于林彪及中央军委的大员们，似乎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与他们关系不大的这件事。

所有预先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中，唯有谢富治的处境最为微妙也最难受。蒯大富与谢富治的交情最好，对这样一个与蒯大富有极大利害关系的重大行动，谢富治从心里说是非常想通知蒯大富的。但是，谢富治在这次行动中同样并不是主角，他也仅仅是被知会了配合一下这次行动而已。毛泽东又没有向他交代通知蒯大富，他猜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不敢擅自泄密。要是仅仅为了讨好蒯大富而泄露了天机，招致毛泽东的批评、猜忌甚至责骂，那样做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另外，谢富治在7月中旬几次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解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一向对谢富治比较听话的蒯大富，这次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这让谢富治在毛泽东的面前说不响话了，谢富治心里对蒯大富也是不很满意的。所以，我想谢富治在七二七前的那几个晚上反反复复地前思后想，一定在为要不要给蒯大富透露点口风而纠结着。最后，权衡再三，还是没有通知蒯大富。很可能谢富治有侥幸思想，以为不预先通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没想到蒯大富竟然头脑发热到会开枪抗拒。

在召见现场，表现最反常的也是谢富治。蒯大富还没有来的时候，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两次都说是蒯大富“不肯来”，“（这连）韩爱晶（都）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13-P353] 蒯大富后来说：“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10] 这样一个与他政治生命攸关的重大信息，有不少人（如吴德）可以告诉他，有一些人（如谢富治）应该告诉他，却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这谜底蒯大富即使想一辈子恐怕都难以猜中了。

对于七二七这件事，蒯大富先后怀疑有两个阴谋。一开始怀疑的是黑手背着毛泽东操纵欺骗工人镇压团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在毛泽东对蒯大富前后说了四五次“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13-P365] 以后，蒯大富不得不打消了。紧接着他怀疑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工人确是毛泽东派出来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有黑手从中作梗，玩了花招，设下圈套“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10]。这“阴谋说”几十年来，始终困扰着蒯大富无以解脱，始终是一个“没想明白的疑惑”[10]。

我想对至今还在钻研和破解“阴谋说”那些团派朋友真诚地说一声，别钻这个牛角尖了。蒯大富的知心好朋友韩爱晶说：“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

¹ 《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杂志刊载了一篇在2004年7月对李传俊的访谈录《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文中提到江青事先知道727行动。若果如此，笔者认为江青没把727行动事先通知蒯大富是她的一时疏忽或对蒯的过于相信。

没人想告诉他内幕。……（这都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13-P349] 诚哉斯言！清醒的旁观者一语中的！“全身浮肿”的蒯大富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骄横不可一世的团派也是被自己打垮的！

4. 毛泽东对蒯大富、414、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先说对蒯大富的态度

在整个召见过程中，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震惊。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人去清华，并由他信得过的8341部队组织、指挥，对这次行动的结果肯定有过设想的。我想他认为两派在声势浩大的工人群众面前都会乖乖地服从。他绝对没有估计到对他一向敬仰，对中央文革惟命是从，对文革思想理解最透，对他的战略部署跟得最紧的蒯大富会武力抗拒，而且还打死了工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感到极度的震惊，他简直不相信造反派真的造反了。

接着是着急。深夜里，他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全叫起来，把五大领袖全都召过来。他要当面质问蒯大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召见一开始他就关心地问：“蒯大富没有来？”[13-P353] “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13-P363] 后来的话题有点东拉西扯拖时间，显然是毛泽东在等着蒯大富的到来，那份迫切的心情流露得一览无遗。

疼惜得流泪。蒯大富来了，他“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13-P365] 那情景，就像最疼爱的孙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一样，做爷爷的如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解释和表白。毛泽东一边三番五次地向蒯大富解释“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13-P365] 一边多次表白“今天（召见）没有邀请414（的人来）”，[13-P369]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13-P354] 生怕蒯大富内心对他有怨恨情绪。

批评和责骂。闯了那么大的一场祸，当然要狠狠地敲打敲打蒯大富的。毛泽东批评蒯大富“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13-P370] 警告他“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13-P368]。最厉害的责骂是“蒯大富，你真蠢哪……你们井冈山很蠢……这一次你们很蠢”。[13-P370] 连着用了三个“蠢”字，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口吻。

检讨和认错。要毛泽东做检讨是很难的。当着那么多中央要员的面，同时也当着几个年轻娃娃的面做检讨，更是难乎其难。但他十分罕见地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13-P370] 毛泽东这样放低身段主动承认“错误”，唯一的目的，

我想就是为了减轻一点蒯大富的犯罪感和心理压力。

肯定和鼓气。蒯大富栽了一个大跟斗，但是不能让他失去斗志和信心。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13-P354] “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13-P370] 这些都是对他的肯定。清华联合的时候，“「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13-P370] 退回到一年多前《四项协议》的基础上去。这都是对他的鼓气。对于蒯大富这样的学生领袖，毛泽东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

殷殷嘱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召见结束时刻。韩爱晶说：“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13-P373] 毛泽东这般殷殷嘱托的护犊之心，我想蒯大富要是不感激涕零才怪呢！

不骂蒯大富，难解心头气。骂得太凶了，怕蒯大富泄了气，也怕414翘尾巴。毛泽东要把分寸拿捏到恰如其分，也真够难为他的。

再说对414的态度

毛泽东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的时候，他估计两派都不会抵抗。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猜想，毛泽东第一反应肯定是414在武力抗拒。通过江青、谢富治的不断进言，以及他经常阅读「井冈山报」，在他的脑海中早已烙下了414是闹分裂的，要夺蒯大富权的，竭力挑起武斗的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看来，作恶多端的414进行垂死挣扎是很容易理解的。

真要是414抗拒，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13-P360]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竟然是团派武力抗拒工人，414真心欢迎工人。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尴尬事实。一个“搞抬尸游行，搞炸（砸）电线，……也没有（得到）通知（的414），为什么他们欢迎？”[13-P370] 毛泽东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414欢迎工人，而不是蒯大富欢迎工人。这让他的颜面往哪里搁啊？所以他恼怒地责骂蒯大富：“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13-P370]

因为团四两派的表现截然不同，善恶分明，所以在召见中，毛泽东对如何评论414，如何对414定性，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点：

不再公允：作为领袖，对于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造反派分裂成的两派，虽然他内心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极少公开点评，极少公开批评。他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在这次召见中，他放弃了这样的立场，连表面上的公允也不再保持了。他一再对蒯大富表态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13-P369]“不管运动中（你们）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13-P363]

明确定性：毛泽东明白无误地对 414 做了“414 是反对我的”[13-P370] 的定性。我一直在琢磨，毛泽东对 414 的这个定性，在内心早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前就形成了，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呢？看来他是要选择最需要、最适当的时机。这一次，414 与团派的表现，反差实在太大了。已经到了“现在 414 高兴了，井冈山（快要）垮台了”[13-P369] 的危急关头。他必须一拉一打，才能挺住团派不垮台，才能把 414 的“高兴”劲儿打下去。

软硬兼施：毛泽东说，“对 414 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13-P369]“对 414 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7] 这种“争取群众、区别头头”的政策是分化瓦解的政策，是对待反动组织才采用的政策。一看到这样的政策，我的脊梁背就发凉！至于毛泽东说“沈如槐当副校长”[7] 这样一根胡萝卜，似乎只关乎沈如槐个人，与 414 的整体命运无关。

如果毛泽东当时只说“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这句话，那么 414 当天就会按反动组织被取缔的。但是他还说了一些与此有点矛盾的话。他说：“要消灭 414 也不行”，[13-P369] 清华要搞大联合，“井冈山出两个，414 出一个”。[13-P370] 这样说来，414 又好像是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反动组织了。

这样一些可紧可松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足以令在座的中央首长和学生领袖们反复猜测、绞尽脑汁的了！

现在再通读毛泽东这篇召见讲话，他说的“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这“反对”一词，可能并非是政治上“反党反毛主席”，性质是敌我矛盾的“反对”，而是与毛泽东文革思想、文革路线不一致，右倾保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不管哪一种反对，在那个既极左又极端的年代，毛泽东钦定的“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罪名要多严重就有多严重。它足以把 414 压得顷刻间灰飞烟灭，足以把 414 的头头送入无产阶级的大牢！

最后说说对工人的态度

在七二七事件中，来清华制止武斗的三万工人，他们才是主角，是出了大力的，又是最大的牺牲者。

但是，这次召见，414 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

414 没份儿的原因，毛泽东已经说了，因为他偏向蒯大富，所以尽管 414 会不高兴，他也不让 414 来。其实，414 对领袖的安排哪敢有不高兴的胆量哦。不被召见，那是小事一桩。科学馆里的老四死里逃生了，武斗终于停止了，这些足

以让 414 以手加额，欢天喜地的了。

倒是工人，他们挨了打，流了血，负了伤，死了人，这情况毛泽东是知情的。虽然召见中他也多次提到工人，但都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顺便提及的。只有一处，毛泽东算是比较正式地提到工人：“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 5 个工人，打伤工人”。[13-P369] 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 731 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13-P368] 妄想以威力强大的“精神原子弹”抵御土造的却是会致命的长矛手榴弹，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荒唐！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是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因为毛泽东派出了工人，414 得救了，所以，无论怎么说，414 还是应当对毛泽东说一声谢的。但是，没必要感激涕零，跪拜叩谢。因为，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文革大局。他派工人来清华的本意是给蒯大富梯子下，替蒯大富解围的，并非是来救援 414 的。414 所要万分感激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三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他们也是受毛泽东之命而来的，他们毕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救命之恩！

死难的这五位工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牢牢记住他们：

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手榴弹炸死；

张旭涛（北京 541 厂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长矛刺死；

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被开枪打死。[12]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 41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14 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13-P363] 的家丁而已。

5、蒯大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错误判断

蒯大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作出判断之前，他也是先做了一番调查的。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找不到江青和谢富治，工作人员都没明确告诉他工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我猜想，蒯大富认为工人要是中央派来的话，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都会预先知道的，蒯大富所深信的江青、谢富治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的。现在，江青、谢富治都没给他信息，从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那里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于是蒯大富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是 414 的黑后台伸出的黑手来镇压井冈山援救 414 来的。

另一些相反的信息并不支持是黑手操纵工人来镇压团派的。譬如，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并没有肯定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蒯大富“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和我们是一派的。……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10] 这些很关键的重要迹象都被蒯大富忽视了。蒯大富看到了他的好朋友鲁文阁，都没当面去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信息矛盾、局面混乱的状况下，有点吓昏了头的蒯大富顺着根深蒂固的“414 有黑后台”的思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韩爱晶一听到清华来了许多工人制止武斗，他在下午也跑到清华实地察看了一番。他一见人山人海的工人，马上就想到：“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7] 他的判断与蒯大富截然相反。韩爱晶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判断，用不着太高的政治智慧。蒯大富是当局者迷。

让蒯大富产生错误判断的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1、首先，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是因为蒯大富“害浮肿病”了。他自恃是文革骄子，老子天下第一，除了毛泽东、江青，谁也管不了他，他也是谁的话都不听，谁都信不过。

2、在蒯大富的思想深处，一直坚信 414 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身居要职、能量极大。这个后台平时支持 414 对抗团派。现在派几万工人进清华就是这个黑后台伸出的黑手，目的就是要拯救濒临绝境的 414。

3、蒯大富亲眼见到的现实也印证了工人是被黑手操纵的：科学馆里的 414 都被工人解救出来了；一个个老团被工人抓走了；工人正在拆除团派的工事，收缴团派的武器，摧毁团派的战斗力。

4、联想到「上柴联司」¹ 的下场，蒯大富就像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感到“很恐怖”、

¹ 「上柴联司」，是上海柴油机厂的一个群众组织。1967 年 8 月 4 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血洗「上柴联司」，

“非常恐怖”。[10]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蒯大富以及团派总部的委员们集体丧失了正常的思辨能力，连常识都没有了。

错误决策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于是，蒯大富他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10]、“必要时可使用武器”。[12]

我猜想，当他们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面对“黑手”的血腥镇压，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敌手，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中必定涌起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悲壮豪情！

错误的判断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判断毕竟只停留在认识上，错误决策是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错误。错误决策一旦付诸行动，立即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可以这么说，当蒯大富作出这个错误决策的时候，蒯大富本人的命运，整个团派的命运，乃至全国造反派的命运都已无可挽回的决定了！他们的前程都要被葬送了！文革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发生转折了！

错误的判断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但是，错误的判断并不是必然会做出错误决策的。历史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很多，歪想正做的事情也并不鲜见。

假设一下，就算三万工人是被“黑手”操纵来镇压「井冈山」的，蒯大富也可以作出另一种决策：那就是不对抗，由着工人做。大不了工事被拆除了，武器被收走了，老团被带走了。即使这样，清华「井冈山」也变不了「上柴联司」。

因为，清华是在北京，离毛泽东近在咫尺，不是远在上海，更不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十万工人（这是蒯大富估计的）来清华这样的惊天大事，不出十二小时毛泽东肯定会知道，肯定会干预的。

因为，清华「井冈山」有蒯大富这样通天的学生领袖，有江青、谢富治这样靠得住的后台。「井冈山」、蒯大富，都是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号的。「上柴联司」怎么能与清华「井冈山」相比呢？

因为，蒯大富所看到的恐怖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怖，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蒯大富看到工人“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鸣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¹也被抓走了。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10] 工人见一个抓一个，必然有一些肢体冲突，但是，没往死里打学生，也没打死一个学生。工人手里拿得最多的是红宝书，

¹ 死伤惨重。

1 后来高季宏声明他没有被抓，是老蒯看错了或记错了。

以及拆除工事用的铁鎬之类，并没有用于武斗的武器。这与「上柴联司」被镇压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采用不抗拒的对策，蒯大富所损失的不过是工事、武器这些“身外之物”。人虽然被抓走了，但无性命之虞。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把人放出来，重振「井冈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至于这只把清华「井冈山」整得如此惨的“黑手”，只要蒯大富一见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这只“黑手”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为伟大领袖除了一个隐患大害，为文革又立了一个旷世奇功，也可以出蒯大富心头的这口恶气。

即使最后知道“黑手”是自己错误的臆想，所谓“黑手”原来是一只巨无霸的红手，那也没多大关系。毛泽东向来是只注重结果，并不在意过程中的想法。蒯大富虽然没除大害，没出恶气，但是配合毛泽东停止了清华武斗，并为平息全国武斗做了贡献，这点功劳是跑不了的。

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是晚上了，蒯大富在广播台召开会议。面对“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10]的乱局，蒯大富坚决果断地说服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10]这个时候的蒯大富，无疑是理智的，冷静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正确的决策。非常遗憾的是，太晚了，晚了三五个小时。现在惨案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虽然避免了此后双方更大的伤亡，但是已经不能逆转历史的进程了。

不管蒯大富判断得是否正确，只要他应对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形势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让我粗线条地畅想一下：

蒯大富配合毛泽东实现了平息武斗、转入“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对蒯大富会高看一眼。“真蠢”的评语将会被“真聪明”、“真有政治智慧”、“真有应变能力”所代替。蒯大富将位列五大领袖之首成为首席领袖。

清华两派尽管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挑动百日武斗的罪魁祸首，会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但是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即使面和人不和，也得实现大联合。团派与414这对欢喜冤家、情仇弟兄还得在清华园的同一片蓝天下共生共息。

清华将很快成立以《四项协议》为基础的革委会。414 经过一年多的浴血抗争，仍旧回到 414 分裂时候的起点。有点进步的是，沈如槐将会是众多革委会副主任中的一个。

绝大多数工人被运动着到清华转了一圈，又会回到工厂里干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即使要发生，也是以后的事情。各地造反派只要紧跟形势，还能在文革的舞台上再蹦跶一段时间。

蒯大富做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和清华校长，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做九大的中央委员，亦非梦想，完全有八九分的指望。虽然此刻他还不是党员，突击入党，只不过是一纸手续而已。

唉～可惜啊可惜！我真为蒯大富在影响到团派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选择正确的决策而扼腕感叹！要不，七二七的惨案可以避免，团派也不至于在此时覆没。一着错，全盘输。团派的锦绣前程并不是被“黑手”蓄意破坏的（如果“黑手论”成立的话），而是被蒯大富自己“很蠢”的决策所断送的。

当然，即使蒯大富选择了正确的决策，团派、414、全国的造反派及其所有头头的命运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是，造反派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文革头头最终会被清算，文革最终必然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6. 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就将七二七定位成伟大战略部署吗

挑起武斗以此逼中央表态的蒯大富，最终只把414逼上绝路并没把414打垮却引来了毛泽东的强力干预。在这一役中，团派输得精光。蒯大富这个红卫兵领袖也由中央首长的座上客，迅即失宠，两年后沦落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阶下囚。

414在武斗中死伤惨重，陷入“春秋无义战”、团错四也错的泥潭。即使在七二七那天的表现可圈可点，最终还是落得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至于毛泽东，也不是赢家。他玩团四两派于股掌之中，要打要停全在于他的意志。但是局面渐渐失控。最后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说明了“四不”方针的破产。

毛泽东为什么要派三万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对这个问题，猜测很多，各执一词。对七二七的意义，有往小缩小的，有往大拔高的。

至今还有一些团派朋友认为毛泽东要制止清华武斗，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更有个别的认为七二七的目的就是要镇压团派，打垮蒯大富。他们想的仅仅是制止清华武斗、冲着团派来这样的细枝末节。

相当多的人认为毛泽东派工人来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想着为了让工人阶级取代造反派，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

我认为，七二七事件本身，仅仅是毛泽东以别出心裁的举措，通过制止清华武斗以平息全国武斗局面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行动。七二七事件的策划过程，毛泽东召见讲话及召见以后最初几天的事态发展，都不支持毛泽东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一开始就是为了实施“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这一战略部署。

在策划过程中：毛泽东把这次行动看得如同买一包香烟那样简单，所以才会交给一个机要员去办。要是他当时认为这是实施一个战略部署，他应该走正常程序，由中央开会决定，由周恩来牵头督办，交由谢富治具体负责经办的。“这次不是这样。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13-P349]从这样的

策划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别出心裁的战术技巧，看不出为实施战略部署所必须的深谋远虑和稳妥郑重。

在召见过程中：从毛泽东对蒯大富的疼惜、庇护中丝毫看不到他即将抛弃这批学生领袖，从对工人的冷漠、冷血中也丝毫看不到他对即将登上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的热情和重视。

在召见结束后：我们看到谢富治为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而奔波忙碌。7月30日，谢富治在北航接见团派时说：“（宣传队）制止武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收缴武器的任务也大部分都完成了，……他们可以减少一些”。[1-P425]武斗已经制止了，谢富治认为工人可以撤出清华了。8月2日，谢富治接见工宣队和蒯大富时说：“回到老路上来，那个《（四项）协议》和伟大领袖讲的一样么！人数配备上差不多。”[1-P426]谢富治有了“「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的圣旨，实现清华两派大联合的底气更足了。

这说明，一切都沿着毛泽东在召见讲话中所确定的轨道上前进。

但是，工人不干了！工人死了人，受接见的却是蒯大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工人的极大义愤，不仅谢富治知道，想必毛泽东也知道了。因为，具体指挥七二七行动的8341部队负责人，也一样的窝火和愤慨。为了安抚工人和“御林军”的不满情绪，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工宣队，以示慰问。这仅仅是姿态性的慰问，还是他对工人阶级即将赋予重任的预告，我们不得而知。8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工宣队的代表。到这一天，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已经作出了让“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决断。

我猜想，当召见完毕，毛泽东回到他的书房，点上一支雪茄，再细细回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再反复盘算文革大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有些新的想法了。

早在1967年9月的时候，他就提醒、警告过造反派：“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¹。这次召见中，他不仅重申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也亲眼见到蒯大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样屡犯错误的小将还能作为文革的主力军，还能完成文革的重大使命吗？

一边是自我膨胀、很不得力的造反派，一边是组织严密、怨气冲天的工人阶级。在鲜明的对照下，毛泽东抛弃造反派，启用工人阶级作为他的文革新主力军，继续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于是，七二七被重新赋予新的重大历史意义，成为“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标志日。

本来是一次代价巨大的制止武斗的行动，成了文革新阶段的转折点。尽管毛泽东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并不那么高瞻远瞩，但是他把握时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将一个本来是通过解决清华武斗进而解决全国武斗的战术动作演变成开始

¹ 这一“最高指示”是1967年9月16日由江青传达的。

文革新阶段、推出文革新主力的战略部署。他将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高超艺术发挥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不少团派朋友，不少造反派头头，有一种被毛泽东先利用再抛弃、“卸磨杀驴”的感觉。在这点上，我倒是要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

我认为，从七二七策划直到召见结束，毛泽东没有一点点“卸磨杀驴”的念头。后来事态的发展，倒是很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泪”是召见那天就流的；此后，蒯大富等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就被搁置起来了；至于“斩”，那是在二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中才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

因为造反派在反刘少奇的斗争中为毛泽东立下了大功，所以，他对造反派、特别是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是够宽容够忍让的了。其时，已经发布了好几个制止武斗的公告，也多次发布最高指示要求实现大联合。但是，蒯大富等学生领袖置若罔闻，以为都是说外地的，说别人的。如天之骄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两次联合的机会，都没抓住。林彪在召见中有句插话，一针见血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9]林彪的意思，反过来就是说，你们这些五大领袖，现在已经是要大联合、成立红色政权的时候了，你们还在不识相地继续打派战、搞武斗，远远落伍了！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恨铁不成钢，有心护犊，但是他毕竟是大政治家，不是心慈手软的小娘们儿。当他看到工人阶级比造反派更有力量更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召见时候的态度，把造反派如同敝履一样的丢弃了。就算是“卸磨杀驴”，也是因为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这头造反派“驴”不识时务，狂妄嚣张，不再按毛泽东所规定的“磨道”上拉磨了，才招来了“杀驴”之灾。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像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七二七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如果清华两派的头头在两次联合的机会中抓住一次，我想红卫兵运动的命运可能会更长一点，不会只是二年的短命。历史发展的拐点，往往因偶发事件的突如其来而改变了既定的发展轨迹，这并不是罕见的。当然，总趋势还是不可扭转的。

七二七那天，团派在9003大楼打出了巨幅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有意思的是，最后上断头台并非是「井冈山」人，而是清华「井冈山」——它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借工人阶级名义登上上层建筑的，在清华是迟群、谢静宜这些近卫军人。他们执行了一条比蒯大富时期更左、危害比团派掌权时期更大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是砸烂解放以前和文革前十七年的旧清华，那么，在

两个“基本估计”¹的指导思想下，工宣队继承并发扬光大团派“彻底砸烂旧清华”的“事业”，砸烂的对象还包括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尤其是曾经伤害过工宣队的团派。毛泽东用他的后一批炮灰来整他的前一批炮灰，这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团派来说，真的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第四节 毕业第一课，去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

听说留校的6字班毕业生在工宣队进校不久的1968年9月25日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去了。应届毕业生下农场下车间劳动锻炼，这是中央下了文件的，我因为生病没赶上趟。到1969年初，身体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恢复。我想，既然劳动锻炼那么重要，我要是缺了这一课，总是不太好的吧。我看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基本结束了，整党也快要收尾了，我向工宣队提出要去农场锻炼。工宣队同意了。就这样，1969年4月7日，我一个人来到张家口宣化区的解放军农场，清华66届毕业留校的同学们都在那里劳动锻炼。

我这一次积极主动，让我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4月30日晚上，迟群在西大饭厅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宣布要在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办一个“五七干校——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当晚宣布第一批名单，5月4日即刻出发。

鲤鱼洲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因地处血吸虫的重疫区，不得已迁址了，这农场也就废弃了。在农场选址的时候，迟群等工宣队领导是知情的。但是，知识分子已经沦落为臭老九²，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就要选在这样的地方。工宣队严密封锁消息，让教师到这种连劳改犯都呆不下去的鬼地方去“锻炼”，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许多教师在毫不知情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感染了血吸虫病。³我教研组的陈老师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我在去解放军农场之前，还没有去鲤鱼洲的任何消息。我要是不去解放军农场的话，肯定会被送到鲤鱼洲农场去的。十之八九我也会被感染血吸虫病的，那一辈子的健康就完了。多悬啊！我逃过了血吸虫病的魔掌！想想都很后怕。

比起以前的好几次积极主动，就这一次最值得了！

¹ “两个估计”，是指解放后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² 那年头，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排在属于敌我矛盾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排行老九，于是得了一个“臭老九”的恶名。

³ “1969年5月至10月，清华工宣队先后组织了5批2821名清华教职工开赴江西南昌市南昌县鲤鱼洲，……由于水田劳动和防洪，教职员染上血吸虫病当年确诊者就有747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以后多年，直至1997年，清华大学医疗保健部门还要对昔日的吸血虫病患者进行复查和不断的治疗。”[24]笔者在校期间，就听闻有多名重度血吸虫病患者不幸去世。

到了解放军农场，我分配到4629部队学生一连。连队有四个排十二个班。连长、指导员、排长都是解放军，副排长以下都是学生。学生全都来自北京市各高校的66届留校的毕业生。我被分配到一班。班里有4名清华学生，其余的毕业于人大、政法、语言等大学。

有意思的是，414留校的头头都在这里了。有刘万章、蒋南峰、王永县等。我这个排的副排长就是搞毕业生串联会的石福庆。他是一个做事认真、心肠热、人缘好的老实人。之后几十年，他一直热心为66届校友办事，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老领导”。

到了解放军农场，不管你是老团老四，都是一样的待遇：被教育。所以，班里的个别老团校友，对我偶尔在暗底下使点小摩擦外，并不严重。班长是一位数力系姓蔺的老团，他为人很厚道。

他们在1968年9月底就发配到这里来了。此处正是坝上的风口，寒冬腊月的，在满是冰碴的水田里劳作，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我晚来了半年，天气已经转暖，就好过多了。

既然是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除了忙农活，还有就是政治学习、大批判、斗私批修、下连队与战士同吃同住等等。还到庞家堡铁矿搞过一次政治野营：长距离的拉练、听老工人忆苦思甜、参观“万人坑”阶级教育展览会等活动。

与我们连相距几里地，有个学生二连。中央美院的毕业生就在那里。那里有一个很知名的女学生，就是邓小平的女儿。大家闲得无聊，于是有关她的各种消息也成了一大谈资。听说她在毛主席著作学习宣讲中谈心得体会时说，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这倒没什么，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嫁出去。于是大家就瞎起哄，怂恿一位清华校友快去求婚拣个大便宜。

嗨，大概清华人的脑袋都是榆木疙瘩做的，没有“战略投资”眼光。谁能想得到，以为注定要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二号走资派日后会东山再起，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要是谁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在小姐落难的关头援救一把，成为东床快婿，皇亲国戚，准“官二代”的荣华富贵就是唾手可得的了。

我们这批毕业生，毕业都三年了，还没有正式工作过一天，心里当然是着急的。不过，谁都明白，即使不在这劳动锻炼，即便在工作单位，在学校里，文革还没结束，也无法好好工作的。所以，有关工作问题的担心不是最重。比这更为着急上火的是，年龄都快小三十了，绝大多数都还没朋友呢。在农场这样的环境下，连找对象的机会都没有。学生连里倒是有两个女生班。连部领导明令规定不准谈恋爱，所以女生班基本上不与男生班一起劳动、活动的。最后好像有一对谈成功的，那也是在同伴的掩护下比搞地下工作还秘密才没有被发觉。

那年头，大学生是臭老九。工厂里的女工对大学生正眼都不瞧一眼的。谁要是攀上一个女工当爱人，那是烧高香、攀高枝了。大家都盼着劳动锻炼早点结束，

那样就可以早点回去赶紧找对象、结婚、生子。

以为劳动锻炼就一年，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回去的音讯，学生连里弥漫着灰暗、失望、空虚、焦虑的气息。刚来时候的那种新鲜、热烈，早已烟消云散。

当时，连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是调侃一位名叫鲁实普（谐音）的学生的。我记得其中有一小段是：

鲁实普，鲁实普，
年龄快到三十五，
找个对象没有谱，
裤子破了没人补，
被窝冷了没人捂，
你说叫苦不叫苦？

就像和尚撞钟一样的打发日子，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回去。北方的冬天里，本来就没有什活儿可干。过了1970年元旦，在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中扳着手指头测算哪一天才是个头，盼望着能在春节前回家过年。终于，我们在1月25日回到了学校。我在农场锻炼了9个多月。比我早去的同学熬了将近一年半。

第五节 一场飞来横祸， 从“积极分子”到五一六分子的落差

回校以后，我在教研组里参加教育革命活动。

臭老九们，工宣队进校以后都夹起尾巴做人。我先接受了几个月的工人阶级再教育，又到部队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回来继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工宣队师傅对我这个派头的印象好像不算太坏。到年底的时候，她鼓励我要好好表现，在今后的运动中以实际行动向工人阶级学习。

听这话，我一时迷迷糊糊地觉得我似乎就要成为下一场运动的依靠对象了。

这下一场要开展的是什么样运动？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成为依靠对象，反而成了清查对象。

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文革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在1966年颁布的《五一六通知》。至于一个叫“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即使曾听说，我也没往心里去。

1970年冬，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了，才知道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是杨、余、傅，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其时，自动控制系已经改名为电子工程系，有三个与控制相关的教研组（包括我所在的控制元件教研组）合并成有六七十个老师的大控制教研组。

估计年底前是在搞摸底排队吧，我感觉运动的暗流已在涌动。刚过1971年元旦不久，风云突变，学校掀起了揪斗五一六分子的高潮，一场围歼五一六分子的“人民战争”正式打响了。

那是在东主楼11区的一间大教室里，扶手椅、靠背椅围成一个大椭圆形。参加揭批五一六分子攻心会的有教研组的老师，还有1970年刚入学的控0班工农兵大学生¹。会议的主持人是教研组的郝书记。

人很多。人多人气就高，会场的气氛相当热烈。因为是揪斗五一六分子，所以又平添了几分紧张和严肃。

郝书记在主席位上做了一番动员报告。无非是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介绍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如何的阴险恶毒，对革命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接着表示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五一六分子统统揪出来，把五一六集团一网打尽、除恶务尽。最后交代政策，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现成语句敦促五一六分子赶快缴械投降。

接着由工农兵大学生领头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个人喊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句。那个人喊一句，大家跟着又喊一句。喊口号的时候，右手拿着红宝书，伸手举过头顶。经过几年文革的训练，这一标准动作已经做到整齐划一。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反周总理的，而周总理是我最敬仰的中央首长，所以我对五一六分子特别地痛恨！我也与大家一样扯着喉咙高喊口号，以此表达革命的义愤。

我一边喊口号一边在想，真的有五一六分子吗？难道我们教研组的老师中真的有五一六分子？我很怀疑，也很好奇，更有一点莫名的期待，想看看究竟谁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五一六分子。

这头一个晚上的战斗没有收获。郝书记在临散会的时候警告五一六分子，回去好好想想，赶紧坦白，想心存侥幸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段时间，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了学校运动的重中之重。大喇叭不断广播各单位清查的最新消息，包括已经有某某某等多少人被挖出来的战斗捷报。大会政策宣讲，小会政策攻心，检举、揭发、自首、坦白，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第二天晚上继续开会。这次，安排了更多的工农兵大学生来参加会议，壮大声势。近百人把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显然，政策攻心的火力会比昨晚更猛烈。

会议的进程与上一次大同小异。郝书记在讲话中特别点明了这些五一六分子一个个都是填过表的，证据确凿，想逃是逃不掉的。被人揭发，不如自己交代主动。

¹ 工农兵大学生，又称工农兵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废除考试制度后，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直接从工农兵中招收入学的大学生群体。这一招生制度经北大、清华试点后推广到全国。

何况有的只是胁从，不是骨干。现在给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要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话，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工农兵大学生呼的口号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五一六分子站起来！”，“五一六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边连声高呼这些口号，一边用手指指向教师的方向。同一个巨大的声音，同一个划一的指向，这震慑力是相当大的。每个教师都能感觉到那手指就像是在指着自己似的，指得你心里慌兮兮。

我还好。我连五一六集团这个组织都没怎么听说过，更没有填过什么表格，我跟五一六根本就不搭界。我想，我就举举手、喊喊口号、瞧瞧热闹，也不错的。

我还怀疑，就这样所谓的“政策攻心”，真能把填过表格顽固死硬的五一六分子攻出来？

正想着呢，突然，角落里有一个人腾地站了起来，嘴里蠕蠕地说：“我坦白，我交代……”

全教室的眼光如同探照灯一样，全集中到他的身上。

我不认识这位老师，因为他原先是另一个教研组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姓贺，一位年轻的教师。

郝书记一看有人站起来了，满面红光，兴奋之极，大声喝问：“你是五一六分子吗？”贺老师回答：“是的”。“你填表了吗？”“填了”。“那你赶快交代你的罪行！”

贺老师虽然是低声交代，但是，在瞬间安静异常的教室里，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说他参加了武斗，给武斗的人送过东西，等等。

郝书记追问：“武斗中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打死人？”贺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于是郝书记厉声说：“你要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要竹筒倒豆子，不要避重就轻，要知道，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小的时候，村旁的小河里长着很多鱼虾。有很多种打鱼的方法，捕鱼的工具。有一种办法最绝了。柯鱼佬（渔夫）坐在小漁船上，用一截木棍击打船帮。那低沉的梆梆声通过船体传导到水里。在漁船附近的鱼儿时间一长受不了梆梆声波的震扰就会跃出水面。柯鱼佬一手敲木棍，一手持网兜。见鱼儿往上一跳，柯鱼佬眼疾手快，一兜，兜个正着。更有些呆头呆脑的鱼儿，往高跳斜了，正好跳进船舱里，抓都用不着抓的。这样的逮鱼，简直是无本生意，空手套白狼，连鱼钩鱼饵都省去了。

我以为只有在柯鱼时候才看得到的有趣场景，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也让我见识了一番。郝书记一声断喝，大伙儿一齐咋呼，犹如柯鱼佬敲打船帮一般，果然有贺老师这样的五一六“鱼儿”被震出来了。可怜的贺老师满脸煞白，神色惊恐，无助地站在那儿。面对众人要他交代罪行、要他端正态度的威吓声，他不知从何

说起才好。

有第一条“鱼儿”被震出来，那些做了点错事的人，或者填过一张什么表格现在连自己也不记得是什么内容的人，心里更打鼓了。于是，在以后的几次大会上，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先后又有几个老师被震得站了起来。

其中有一位是姓涂的老师，他与我一样也是同届留校的，他也站起来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原先教研组的一位很年轻的实验室老师，我们叫她小黄师傅的，在一次攻心会上，也站起来了。我看到她刚站起来的那一瞬间，虽然神色紧张，嘴角却挂着僵硬的异样微笑，小声地说她也是。大家惊异地注视着她。只听得郝书记威严地喝问了一声：“你还敢笑？”小黄师傅一听，马上收起这不合时宜的笑容，瞬间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哭了。郝书记又大喝一声：“怎么又哭啦？”小黄师傅撇撇嘴，赶紧收住眼泪，只是泪珠儿还挂在脸上，在日光灯下闪光，又不敢用手去擦。大家听着这段类似于座山雕与杨子荣的对话¹，有些人想笑又不敢笑出声儿来，只好捂着嘴偷偷地窃笑。这逃不过郝书记犀利的眼睛和灵敏的听觉，他用更大的声音喝道：“严肃点！”这一声显然是对着大家说的。

这是严肃的政治运动吗？看起来这似乎更像是一场街头活报剧。但这闹剧确实不是好玩儿的。一旦被揪了出来，就要写交代材料，不查个底朝天是不会罢休的。真的要是查出点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矛盾性质就转化了，就不是隔离审查那么简单了，就要进班房，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苦头了，这一辈子就完了。今天说起来，就像是闹着玩儿似的，而在当时，那是性命交关的大事啊！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一诈唬就站起来的老师，哪一个都不是五一六分子，他们只是做了些自己认为有点问题的事情。因为搞不清这问题算多大，于是先站起来表示一个主动坦白的态度再说，并非是因为问题很严重才站起来的。

已经揪出了好几个五一六分子，揪斗会好像还没有就此收场的意思。这几个五一六分子，好像哪一个都不是郝书记心目中真正要揪出来的人。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郝书记开门见山的说：“这几天的运动，战果很大，不少五一六分子迫于政策的压力，纷纷主动站了起来向人民投降，这态度是好的。但是（他特别提高了声调强调‘但是’），有那么一小撮顽固不化的五一六分子，就混在我们革命群众的队伍里，他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梦想蒙混过关。这是一条大鱼儿！今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大鱼揪出来示众！”

我心想，还是大鱼儿？乖乖，有意思。不知道这条大鱼儿究竟是谁啊？

郝书记接着说：“我给这个五一六分子画个像，提醒他一下，也敦促他一下，看他还往哪里藏？这个人呀，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装着斯文的样子，

¹ 当年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一些经典段子我们耳熟能详。土匪头子座山雕与刚上山的假冒土匪胡彪的解放军侦察员杨子荣之间有一段用土匪黑话的对白。座山雕问：“脸红什么？”杨子荣答：“精神焕发！”又问：“怎么又黄啦？”再答：“防冷涂的蜡！”

其实内心是很恐慌的。这个人在哪里呀？他就混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

当郝书记说“就是这里”的时候，他的手指往前一指。

随着他的口令、他的手指，在郝书记旁边的一群工农兵大学生都跟着齐刷刷地伸着胳膊往前一指。

这手指所指的方向是向着我这边的。我心想，难道这个五一六分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下意识地向左边张望了一下，看见左边同学老师的手指也是指向我这里的。哦，原来这个五一六分子坐在我的右边。我心里正这样想，扭头往右边一看，发现右边的同学老师的手指也是指向我这边的。左顾右盼以后，看到我成了大家手指和目光的交叉点，我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郝书记心目中的那条五一六大鱼儿就是我啊！

此时，口号声此起彼落，一声高过一声。一拨人的口号声响起：“五一六分子在哪里？”另一拨人的口号声呼应：“五一六分子在这里！”

每当喊“五一六分子在哪里”的时候，人们的右手缩回到肩头。每当喊“五一六分子在这里”的时候，全体的手指、全体的目光，齐刷刷地，如利剑一般的指向我、刺向我。这个时候，用“千夫所指”这个词儿来形容还有点夸张，“百夫所指”是最恰当最形象的了。我不知道这场戏有没有预先排练过，但是预先告知过目标是谁，这点是肯定的。

最有意思的是我身后坐着的那位我一直很尊重的比我年长不少的柳老师。他担心从背后指向我的后脑勺我看不到，于是把手从后右方弯着伸过来。当我听到“五一六分子在这里”的时候，我用余光瞄见有一只手似乎要从背后抱我一般，却见他的食指已经指在我的心口上了。

“五一六分子在哪里？”

“五一六分子在这里！”

反反复复就是这两句口号。本来我是想瞧瞧热闹的，没想到成了别人瞧热闹的对象。

我心中不禁哑然失笑。

我是五一六分子？我对自己清楚得很。要说在文革中我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我完全承认的。要我承认自己加入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是五一六分子，我没问题，我怕什么呀？我慌什么呀？

听得口号声又换了花样。人们对着我高喊：“五一六分子站起来！”“五一六分子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声浪似乎把教室的天花板都要掀翻了，场面蔚为壮观而激烈。听着那坚定的口号声，我知道，今晚不把我这条大鱼揪出来是不会罢休的了。

我很感激前几年当头头时经历过的风浪锻炼。大礼堂、大操场的大辩论，与戚本禹等大人物顶过嘴、交过锋，见过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被撞上的1.4武斗，

这些与今晚这点小儿科的把戏相比，真算不了啥。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场面的历练，就像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大字报上点我的名，我就吓得半死，更不要说面对今天的怒吼了。前面几位被吓得站了起来的老师，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才心慌意乱地被震了出来。

我知道今晚我已经成了政策攻心会的唯一对象。既然是这场好戏的“主角”了，那就不能以旁观者瞧热闹的心态来对待了，我得认真起来。

“五一六分子在哪里？五一六分子在这里！”

“五一六分子站起来！”

这两句口号不断地交替喊着。大家指的是我，但是又不点我的名。我知道，只要我一站起来，就是自己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头脑再简单，还是知道这是个陷阱。我打定主意，只要你们不点我的名，我就这样坐着、赖着、硬顶着，就是不主动站起来。

有道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政治运动经历多了，谁都可能修炼成“老运动员”的。我就准备当这头“死猪”了！

僵持的局面足足维持了十来分钟。郝书记看着我，我也毫不示弱地甚至带点挑衅地看着他。我见他满眼冒火，一时无计可施。点名把我叫起来，当然是可以的，只是那样就显示不出政策攻心的威力了。我自己吓得站起来与被他点名站起来，虽然都是站起来的效果，但是我与他在心理上的成败感是大不一样的。

我背靠着扶手椅，脸上挂着一丝不屑的冷笑，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夹着小开本的红宝书无意识地在椅子桌面上一墩一墩的墩着。那模样，在郝书记的眼里肯定是一条软硬不吃的老狗。

聪明机灵的郝书记终于发现我有破绽可乘。他突然厉声地责问我：“孙怒涛，你不敢恭恭敬敬地握着红宝书，你这样一墩一墩的墩着，这是对红宝书的大不敬，也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不忠！你给我站起来！”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顾全他的颜面又能把我揪出来的理由。

于是群众的口号声变成了：“孙怒涛，站起来！”“孙怒涛，站起来！”

既然点到我的名字了，再不敢站起来，那真的是一条“癞皮狗”了。站起来就站起来，有什么好怕的？我觉得尽管我是绝对的孤立，但是最终你郝书记还是不得不点了我的名我才站起来的，我在心理上已经胜了一筹。

我不想再让郝书记费心找其他的理由了，也不想被人拖着站起来。我救灾座位上笔挺地站着。他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他，四目相对。

他开始审问我了：“你参加五一六了吗？”

我回答：“没有！”

“你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吗？”

废话，没参加五一六，怎么会是五一六分子呢？不过我不想与他论理，回答：

“不是。”

这样的回答，这样的态度，理所当然地激起革命群众极大的革命义愤。于是，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发言，要打掉我嚣张的气焰、顽固的态度。

其他众多的发言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他是这样质问我：“你是 414 的第二号头头。想当年，你跺跺脚，清华园都要抖一抖的！你不是五一六分子，还有谁是五一六分子？”

我被他丰富的想象力引得差一点要笑出声来。要是说蒯大富跺跺脚清华园要抖一抖，还比较符合实际的。即便是沈如槐，我看还没有跺跺脚清华园要抖一抖的能量，更何况是我？他那么“抬举”我，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个晚上攻心会的目标和任务已经是早就内定好的，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我揪出来。我要是不站起来，攻心会可能一直会开下去。

不管自己站起来也好，被点名站起来也好，总之，我是被揪出来了，攻心会胜利结束，对我的审查开始了。

说实在的，即使在当时，我对参加攻心会的所有人都没有什么怨恨。他们都是被运动来当“演员”的。

郝书记作为最基层的党的干部，他必须执行校党委、系总支的指示或命令。不管他自己是不是相信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或者五一六分子，他在这个职位上如果要待下去，他就得把我这样的大鱼揪出来，否则就交不了差、过不了关。而且，揪我的方法还比较文明，并没有动粗。

工农兵大学生是带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的使命来清华的。他们被拉来参加攻心会，只是当个枪子儿，壮壮声势而已。那位工农兵大学生质问我时的话，明显是有人授意的。

至于那些教师，也就是跟着呼呼口号。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一样会是这样的态度。前几个五一六分子揪出来的那些攻心会上，我不也与他们一样的举着语录本呼口号的吗？

散会后，我被人陪着回 9 号楼的宿舍。这一路上，我心里对领导的安排真有点感动，因为他对一个被揪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还这样关心。

到宿舍后，我想睡觉了，我想陪我来的那位也该马上离开去休息了吧？

他先把窗户都关了，插上插销，却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是与我同届不同班的一位同学，彼此比较熟悉友好。我问他，你要睡在这里？他说是的。我有点听不懂似的看着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我被隔离、被“保护”起来了。于是刚才的那点感动瞬间化为乌有。

我没好气地问：“是不是怕我跳楼自杀啊？”他没吱声。我说：“我又没做坏事，我还不想死呢。”

不管我怎么的牢骚满腹，不给好脸色，他倒是很沉得住气，尽他对我的“保护”

之责。后来听说他是我的专案组组长。

算不算隔离了？因为没有正式宣布我被隔离审查，所以，我也不能完全肯定。这是一笔糊涂账。这为那些将来想赖账的责任人留下了足够的狡辩空间。不算隔离吧，他随时跟着，我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要是隔离，我好像还有不少的自由，基本上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不像是强迫软禁，只能在限定的空间里活动。好在我并不是那种喜欢制造麻烦的主儿。我很自觉。不就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吗？那我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宿舍里写。除了去食堂打饭，其他时间都在宿舍里。

我这个人偶尔也会犯倔脾气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真想一个字的交代都不写。我又没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集团、五一六罪行等等统统与我无关，我有什么可交代的？但是转念一想，既然把我揪出来了，不写点材料，他们怎么下台呢？他们下不了台，我就得这样一直被隔离着，得不到解脱。我怎么耗得过他们？罢了！为他们，也为自己，那就写点东西吧。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隔离慢慢的松懈了。是觉得我的问题不大？还是觉得我态度不错？还是因为看到我心态良好没有想自杀的样子？总之，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他不再跟着我了，不再与我一起睡觉了。我这条在严肃的场合被隆重揪出来的大鱼儿，很快成了小鱼虾似的，这又让我生出一丝不被“重视”的失落感。当然，完全自由的感觉真好！

交代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断的要求我继续写，越详细越好。我也就不断的写着。

开始写文革中我经历的事情。其实，在68年下半年已经详细交代过了，我就换一个题目再交代。接着写思想根源、危害性。写完了，还要我写。再写什么呢？我挖空心思地想。于是把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写上。再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挖思想根源、危害性。我想，写的材料足足有几十页吧。

我的记忆力实在糟糕透顶。虽然我经历的那些事儿才过去两三年，可是好多事情都印象模糊了。那情节、人物、时间、地点都混在一起，搞不灵清了。我没办法分辨，就都写上去。反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又不是我成心想捣糨糊。

至于上纲上线，我是特别注意的。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呀，派性严重呀，这些都是必须着重说的，而且也是事实。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之类的上纲上线是绝对不能写的。有人喜欢大帽子下面开小差的交代手法，我不习惯。

在整个审查期间，我的态度一直是老实的，配合的。但是，也与专案组发生过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这在我《致专案组的申明》中有这样的记录：

一星期前，专案组的朱师傅叫我重抄我在68年清队时写的一份《交代与揭发》中的部分内容。那上面“检查”了自己反“伯达同志”言行以及涉及到一些“林副主席”的事。这些地方，专案组同志未经我本人同意，已在我写的材料上用墨笔涂改多处。对此，我申明如下：以新的观点重写材料是可以的，涂改则是不必要的。尤其是擅自涂改原始

材料，既不能称得上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也谈不到是认真严肃的态度。尽管我遵命重抄了部分材料，但为备忘计，我必须把自己的观点申述清楚。我期望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否则，我对我所写的全部材料无法负责到底。

此致敬礼！

孙怒涛 1971.1.26

竟然涂改我写的原始材料，以后怎么分得清是我自己涂改的还是别人涂改的？这事让我非常生气！本来想写成“严重抗议”的，想想，人在屋檐下，发“红卫兵小将”脾气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1月26日，这天正好是除夕。这是个灾难之年，一点也没过好。

写了好几个月交代揭发和旁证材料，写到最后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写的了。我要求回教研组，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专案组同意了，于是我回到教研组做点杂务。

我听说蒯大富、沈如槐都被揪回清华，隔离审查了。没见过沈如槐，见过一次蒯大富。在路上，远远见到他，身后有两个“保镖”跟着。听说蒋南峰也被隔离了，态度很不好。我知道蒋南峰的脾气是很耿直、很倔强的。

再后来，我听说清华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不管是老团还是老四，许多人都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挨整了，有的被整得惨不忍睹，还有自杀的。在清华，几乎人人都参加了两派。参加过武斗的也有好几百人，而且大家都理解那个时候的运动背景，所以，只要不是有点名气的头头，只要不是犯了开了枪、打死人这样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像我前面几位老师如果自己不在攻心会上跳出来的话，也没什么事情。而分到外地的学生就不同了。那里的领导正为缺个典型过不了这个运动的关而发愁呢，一听说是清华来的，也搞不明白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清华两派是怎么一回事，先隔离起来再说。到清华来外调，即使完全实事求是的介绍，清华人认为是极其普通的小事，外地单位就能拿来大做文章。那时迟群领导的工宣队掌清华大权。工宣队一样是极左的，又吃了团派开枪的大亏，对团派格外恨一点，已经分配出去的也会主动给外单位寄材料。所以分配在外地的老团在清查五一六中遭的罪就更多更重了。

听人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因为清查五一六中，全校老团被清出来的要比老四多得多。我们教研组里就有两个敌我性质的老团，一个是打死孙华栋的大名鼎鼎的“狗熊”，一个是在七二七中有血案在身的孙国富。有严重问题的团四比例太不平衡了。为了表示工宣队对两派一碗水端平的政策，为了不至于因清查运动而派性复发，于是就把我这个414的二号头头揪了出来，成了天平另一端的“砝码”，起到了平衡一碗水的作用。

此话有几分真，我是存疑的，算是安慰剂吧。

我写的这些材料，让领导有点头疼。一是没什么干货，水分太多，阅读材料

浪费了他们宝贵精力和时间。另外一个，可能更让他们生气：要去落实我的这些交代材料，最后发现不少事情张冠李戴，或者时间、地点、情节错位，浪费的精力和时间就更多了。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不太好，说看似老实，实际也不老实。我觉得好冤枉哦。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没什么问题，我交代的东西里也没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只是我罗里吧嗦的把好些人和事都扯上了，肯定给这些朋友增添了不少麻烦。这让我一直很内疚。

审查中有过几次“过堂”，其中有一次印象最深刻：

一位工宣队领导问：“你参加武斗了吗？”

我答：“百日大武斗没有参加，生病回家了。”

“这么说来，炸高压线、抬尸游行都与你无关啦？”

“是的”。我心里想，我又没有分身术。

“‘火烧英国代办处’你参加了吗？”

“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的。”我这答话有点含糊，避重就轻。

“那么揪‘军内一小撮’呢？你有没有外出搞什么活动？”

“我没出去。我还积极传达周总理不要外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呢”。

我趁机给自己的脸上贴了一下金。

414 的几件大错误都与我关系不大。不仅两派期间，从文革以来，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打砸抢活动，没有抄过家，没有打过一个人。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心里笃定得很。

他一时语塞。突然，他想起来了：

“你参加‘围困中南海’了吗？”

“什么‘围困中南海’？”我想不起来文革中还有这么一档子大事。

“就是在 67 年七八月间在中南海西门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呀！”

“哦，原来是‘揪刘火线’呀！我参加了。”我恍然大悟，爽快地回答。

“那不是‘揪刘火线’，那是‘围困中南海’！这是中央首长定的性！是反党分子戚本禹幕后操纵的反革命事件！”

我激动得大叫起来：“那时我们明明是去揪斗刘少奇的嘛！怎么变成‘围困中南海’了呢？”

“那你说说，你们是不是驻扎在中南海西门的府右街上？”

“是的。”我想也没想就回答。

“你说中南海里住的是谁？”

“当然是毛主席啦。”这是常识，我也不加思索就回答了。

“你看，你都知道中南海里住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你们把中南海团团围起来了，那不是‘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

我一下子被他给绕进去了。要说，我算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工科生呢，竟被一

个工人师傅轻易地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反驳。我不得不佩服他比我有更严密的逻辑思维，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要是说中南海里住着刘少奇就好了。不过，要是真的那么说了，麻烦可能就更大了，说不定会把我抓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唉，我心想，为什么毛泽东、刘少奇非要都住在中南海里呢？

我不甘心地强辩：“要是那个时候知道这是叫‘围困中南海’，打死我都不去的！”

“可是，事实上你就是去了呀！”

“北京市去过‘揪刘火线’的有几百万人呢！学校里几乎人人都去过‘揪刘火线’！难道都有罪吗？”我想捞住最后一根稻草：法不治众嘛。

“你是 414 头头，你是 414 参与‘围困中南海’的重要决策人。一般的群众去围观了，不算大错误，更没有犯罪。你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不得不耷拉着脑袋。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谁叫我是 414 头头呢？

我一直在教研组里劳动，自觉矮人一等，夹着尾巴做人。差不多过了两年的时间，197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九时半，谢、郭等三位同志代表党组织和工宣队的领导找我谈话，向我宣布清查五一六的审查结论：

关于孙怒涛的审查意见

孙怒涛（原名孙银基），男，三十岁，家庭出身贫农，原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604 班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是清华 414 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现是电子系自动控制专业教师。

孙怒涛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曾参与了“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还散布过一些对中央首长有损的言论。经审查，孙是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犯了上述错误的，属一般错误。希望孙怒涛同志在今后应认真读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党总支

1972.12

我听了，对我参与揪“军内一小撮”活动这点提出异议。我说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学校里，没出去参与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

“难道你没有发表过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414 那么多人出去揪‘军内一小撮’了，难道你作为 414 的二把手没有参与决策？这些难道都不是活动吗？”

我哑然。凡是 414 的所有错误，只要是我在校期间犯的，我都得沾上一份，无法逃脱干系的。

至于“散布过一些对中央首长有损的言论”，这是我自己的交代材料中就承认了的。从头头到小兵，414 反谢富治是人所共知的。在审查意见中指控我的三条错误中，我能心服口服的也只有这一条。

倒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我负有最主要的领导责任。我在交代材料中也如实写上了。但在审查结论中，却漏了这很重要的一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

把仅负一般领导责任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撤下来，把“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条加上去，这样的审查结论我认为更公允些。

一条也好，三条也好，只是多与少的差别，不是有与无的差别。只要有一条，也能照样对我审查，照样给我下这样的审查结论。我当时想，在这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谁不犯点一般错误呢？你能说自己一点错误都没犯过吗？

这样一想，我就老老实实地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认可了。

哎～我真的好幼稚啊！政治审查后作为结论的“一般错误”，与我们口头上的“一般错误”，完全是两回事啊！政治审查结论是要入档案的，是一辈子到死都要跟着走的。

当我看完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才知道开始给他的审查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沈如槐死不签字，据理力争，最后改成为“一般错误”。

沈如槐是一把手，在百日武斗期间 414 所犯的严重错误条条有份。比起他来，我的那点“错误”都是小小不言的。而最后的审查结论，同样都是“一般错误”。我真觉得有点冤。我想，要是我也拒不签字，硬扛着，说不定到最后能一风吹吧？我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抗争和坚定。这就是一把手与二把手的差别。

我并不是因为沈如槐也与我一样只是“一般错误”而不服气。我更没有对把我揪出来的基层领导、老师、学生有怨气。但是我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始终心存不满。这与我在“九评”学习后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九评”学习后我是服气的，我认为这是组织和同学老师对我真心的帮助。而这一次，我认为是整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第七条的第三段是这样写的：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在 1966 年我看到《十六条》的时候，作为学生的我，深感这是党中央在鼓励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文革运动，即使说错话做错事，只要不犯法，都不会被整的。我 1968 年之前的身份始终是学生。这“革命小将”的身份让我的胆子大了不少。但是底线是不犯罪，这是不能突破的。我在当头头期间，如果说有错误，也都是在“一律不整”的范围内，连“一般错误”也不应该写入审查结论、放入档案中的。如果要整我，那颁布《十六条》的这个政党先得公开承认，即使以中央文件形式许过的承诺也可以不算数的。要那样，倒也不失为光明磊落之举，我们这些被大整小整的人也服气些。现在倒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白纸黑字写上了庄重的中央文件，说过的话如同放屁一样，完全当不得真的！

清查五一六是对文革中的造反派一次毫不留情的整肃。上层的权力斗争总是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作为代价的。随着林彪在蒙古沙漠的机毁人亡，又传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林彪幕后指挥的了。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每次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有个运动来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往这个箩筐上装，就像一个大垃圾桶。

因为林彪叛逃了，这个整了不知道多少人而且结束遥遥无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被声讨《五七一工程纪要》¹这个更紧急的运动中止了、替代了。

在给我宣布“审查意见”的时候，领导当面对我说审查结论和本人所写的材料均不入档案。我将信将疑。这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的审查结论能不入档案吗？入了档案，那么这样一个政治错误就跟定我一辈子，走到哪都知道。要是不入档案，万一再来一个什么运动，难道要再整上一回？我搞不清对我个人而言，这审查结论究竟是入档案好还是不入档案好。

又过了两年，在1974年年底，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不是那个郝书记）告诉我，在我出差期间，为落实政策，在一个专门小组的监督下，我本人所写的交代揭发材料已经全部烧毁。我没吱声，心里依然是将信将疑。对于组织的话，过去我是绝对信任的，现在已经大打折扣了。不是我不愿意完全相信组织，而是组织的所作所为无法让我完全相信。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将信将疑不是凭空臆想。

尽管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五一六分子，在文革中也没犯什么严重错误，但是攻心会那种紧张的气氛以及精神不敢有丝毫怠懈的高度集中，还是给我留下了后遗症。日后我在打桥牌的时候，握牌的左手会不由自己地微微抖动，像得了帕金斯病那样，有时牌都握不住，要散落下来。我想，我尚且如此，也难怪前面那几位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被震出来的老师，也多少理解了在文革之初受到冲击的那些干部、教师为什么不堪政治重压而走上了自杀的“解脱”之路。

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忙于检查交代，急于解脱过关，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想得不多，也想不明白。

清查五一六结束以后，我心中充满了委屈和不满。自己觉得没有犯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要把我当作五一六分子狠整一通？414比团派强多了，对周总理的感情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414的头头也要挨整？总之，那时我是从个人和派性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又经历了好些事件，回过头来再看看清查五一六运动，换了新的视角。有了互联网以后，获得了许多资讯，有了新的认识。

本来只是几十个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青年学生，在1967年5月份搞了一个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秘密组织「五一六兵团」，很快被中央发觉，被定性为反革命阴

¹ 据说在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

谋集团，到8月份头头被抓，这个组织马上就完了。这种事情在文革中是常见的，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奇怪的是，两三年以后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吴德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这一清查，全国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整死的、逼疯的不计其数。

刘少奇派了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也就五十多天，被定性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前后整了好几年，后果远比工作组整学生更严重，倒成了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了？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有过批示、讲话。他们都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我对他们都有意见，都不满意。其中，我对周恩来的失望最大。这或许是因为原先对他最崇敬最敬仰的缘故。因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件事对他的再认识，他在我的心里开始了从圣到人的滑落。

第六节 “狗熊”，其人其事点滴

“狗熊”是团派激进的「前哨」广播台负责人。在百日武斗中，他是大礼堂片区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团派中的中层铁杆。自从文革以来，他在清华已经小有名气。让“狗熊”恶名远播的，是因为他与团派保卫组和中技校的一伙人干了一桩令人发指的恶行：身体极棒的校航海队队员孙华栋是个没参加武斗的老四，他在晚上骑着自行车途经一教时“被团派人员绑架至第一教室楼内，遭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约9小时后死亡。”[17-P17]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狗熊”其真名叫吴慰庭。说来，他还是与我同系同届的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的。进校时，自6年级有七个班约200名学生。那时，像高等数学这样的大课都是在东主楼阶梯教室上的，所以应该是一起听过课的。我不是活跃分子，除了自己的班级，极少与外班的同学交往，所认识的外班同学寥寥无几。多年后，当有人说起吴慰庭是6字班的，我还不相信呢。一学年以后，几门课成绩挂红灯的留级，我班也有一位同学留级到了7字班，可能吴慰庭也是在那个时候留了级的。我们到大四的时候分专业，重新编班，一共有五个班级。我是自604班的。现在知道他是自704班的。我与他是不同届却是同专业的系友。即使是同专业的同学，因为相差了一个年级，互相间的接触也极少。所以，在文革前，我与他并不相识。

再见到吴慰庭，是我从宣化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回来，回到教研组以后。他

从沙城解放军农场“劳动改造”回来。据说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去沙城农场，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宣化农场。前者是“改造”性质，后者是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虽然在思想上也有改造之意，但从政治上看，是锻炼性质。我和吴慰庭从不同的农场回校，因为是同一个专业的，于是我们在教研组里相聚了。在清查五一六之前，他是被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而我是群众一员，政治地位不同。在清查五一六之后，我自我感觉与他同样都是落难人，心情比他好不了太多。

想不起两派争斗时有没有与他正面接触过。教研组里相遇，我第一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他，感觉他真是一个身体健壮、体魄魁梧的人，具有运动员的体质。后来知道他确实是自控系的中长跑运动员。像他这样的形体，在影视中既可以扮演救危难于水火的侠义英雄，也可以扮演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打手。可惜，他在文革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打手。只是在我见到他的那些日子里，他已没有了往日的张狂，言语极少，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他父亲是天津部队的高官，百日武斗期间曾跑到清华要拉他回去，叫他不要参加武斗。但是他坚决不听，誓言一心一意跟着伟大领袖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表现了他的“大忠”。打死孙华栋，他是主要打手之一，但非他一人所为。一般人到了要承担死罪责任的时候往往都尽力洗脱干系，不诬陷不抵赖已经是好样儿的了。他却大包大揽，把打死人的罪责全都自己一个人扛上了，表现了哥们兄弟的“大义”。一个如此“大忠大义”之人，因为“忠义”用错了地方，就变成大罪大恶之人了。

都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泛指显然是很错误的。但是对他，此话并非全谬。“狗熊”这一绰号于他是既形似又有点神似。说他头脑比较简单，可以举一个我亲历的事例。他在教研组里干的活基本上是拖地打扫之类等杂活。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要给大教室的水磨石地面打蜡。他找来蜡块，倒上酒精（或是汽油，记不得了），想把蜡化开了便于用拖把拖着打蜡。没想到一划火柴，火苗腾的一下就窜起来了。我正在上班，只听得走廊上纷乱的脚步声，还有人嚷嚷叫着失火了。大家赶紧去扑火。好在这是一间空旷的教室，里面的桌椅不多，火势很快就被扑灭了，算是有惊无险。吴慰庭脸色煞白，呆如木鸡。教研组领导把他叫去问话，他如实说了他的“好心”是想办点“好事”。后来教研组领导仔细研究了这件事，认为他想蓄意纵火搞破坏，好像还没这个胆量，也不合大白天在教室里干坏事的逻辑，所以没把这定性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是也没认可他的“好心”。领导狠狠地训了他一顿，说：“要是把主楼烧了，我们都得进班房去！”本来是水磨石地面，拖把拖拖就干净了，打什么蜡呀？打了蜡，走路非摔跤不可。就是化蜡，也不能用这样的易燃物，用明火烧的呀！是不是头脑简单了点？

说到这里，我从校友网上知道了他在百日武斗期间还做了这么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414 为了把科学馆里的一百多号老四救出来，最后一招是挖地道。从

动农馆到科学馆，两头对挖。414 昼夜连轴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差一天就要挖通了。“狗熊”等在一教的这些老团活学活用电影《地道战》里的地下埋缸法，居然测出了地道的方位，用炸药把地道炸坍了。有的老团听到这个消息后，大骂“狗熊”是蠢蛋，说：“老四要逃走，就让他逃走不好吗？打了半天，不就是要把老四赶出清华吗？”后来有人调侃说是“狗熊”改写了清华武斗的结局。要是让科学馆的老四逃出去，沈如槐也跟着撤离学校，说不定工宣队不进校了呢。（我听到另有一种说法是，这事是在一教的保卫组那些老团干的，“狗熊”并不在炸地道的现场）

到 1968 年，“狗熊”已是在校 8 年的大学生了。而他的年龄比我还大 5 岁，打死孙华栋时，已经 31 岁。在清华，一般低年级的同学比高年级的同学要激进些。中学红卫兵比大学红卫兵要激进些。像“狗熊”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在大学里，特别是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要知道，即使不识字的乡民村姑，都晓得“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古训。守住做人的道德最底线，其实不需要太高的文化，也不需要太多的智慧，需要的只是一点良知。

“狗熊”头脑比较简单，个性比较偏执，爱认死理，一根筋，这可能与他颇为特殊的身世家庭和曲折的成长经历有关。文革之前，他也与不少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同学那样，沾上些不爱读书、优越感强的不良毛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坏学生。他十二岁给资本家当童工，上大学时曾是年级和系的生活委员热心为同学服务，在对联辩论时曾勇敢地跳上台明确反对血统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文革，打开了他心底里那个潘多拉盒子，最终他成了一个恶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值得深思的！其实，根子早就种上了的。党化、奴化的教育培养的是唯领袖之命是从的奴才和打手。这奴才，自己成了奴才还要教化别人也成奴才。这打手，是把一切不愿成为奴才的和其他无辜的人摧残消灭的打手。只不过，这邪恶的种子在“狗熊”的心里开花结果，表现得更为突出、极端罢了。

“狗熊”，他在文革中是一个施暴者。某个意义上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被判了 15 年刑，碰到严打又多坐了 1 年牢。我听他的同班同学说，他晚年处境贫寒，日子难过。一想起他那时惨无人道的施暴，大家都咬牙切齿，不愿搭理他。但想想他已经坐过牢，为他的罪恶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也有点可怜他。这些年里，自 704 班以及自 7 年级的同学，无论老团老四，出于对弱者贫者的同情，都在尽力救助他。从 2007 年至今，历时 5 年，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忙，最终补上了养老保险。他是继老蒯之后又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解决了社会保险问题的校友。无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大的罪与恶，现在作为一个公民，他理应有享受公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权利。

第七节 为了入党，我亏了心

清查五一六以后，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心情灰暗之极，感觉与处于监督劳动下的“狗熊”，也仅一步之遥。

同样都是刚刚参加工作，别人的档案都是干干净净的，我的档案里已经有毕业鉴定和清查五一六审查结论记录着两个政治污点了。我才三十岁，今后的路还很长。难道就这样在组织的冷待、别人的冷眼下度过我的漫漫余生？

我向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乐观的、跌倒了马上就能爬得起来的革命者，我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愿意跟着党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我越是想革命，反倒越来越不像革命者了。我整天低头干活，话也懒得说，见到人也懒得打招呼。

沉默寡言、愁眉苦脸的日子差不多有一年左右。时间是最好的销蚀剂，它会悄无声息地销蚀一切。好也好，歹也好，日子总得过下去。我不知道这算是想开了，还是麻木了。我比刚审查的时候情绪要好一点。但是，一旦静下心来，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记得，“九评”学习被“帮助”以后，也有过这样一段消沉的日子。

有一天，脑子突然之间好像开了一下窍。档案中的两个政治污点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的了，但是，如果入了党，不就成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把这污点冲淡了吗？想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改善自己政治状态的途径，看到了一线希望的亮光。于是，我找组织谈了我的思想，谈了要求入党的愿望。

组织当然也不希望看到我一直这样消沉的。他们觉得我本质上还是比较好的，只是犯了一些严重的但还可以改正的错误而已。他们首先肯定了我要求进步的态度，给我鼓励。然后告诉我仅仅口头申请是不行的，要书面形式的。还对我提了两点具体的意见，要求我以实际行动改正之：第一点是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与审查我有关的人，譬如曾经陪我住过的那位同学；第二点是要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要让自己首先在思想上入党。

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清查五一六以后我情绪一直很低落，除了在工作中必须要开口的，我对谁都没有交谈的兴趣。我不与人主动搭腔，别人与我说话我也是懒洋洋的爱理不理的。那位陪我一起住，对我起监管或保护作用的同届同学，因为与他没有工作上的交往，所以更是见面不打招呼，也没好看的脸色。说实话，我对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有很大抵触情绪的，但是对具体清查我的人，包括郝书记，我都没记恨。我知道这位同学人品不错，他也是受组织之命对我监管，

在监护过程中他对我也没什么过分的言语和举动。这些我心里都是很明白的。要说有点变化，也只是感觉有点别扭。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也差不多的。可能在他的感觉里，就会敏感是不是我对他有很深的意见了。组织看在眼里，认为我这样的态度是还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本来我想把自己的想法给组织做个解释的，但一想，弄得不好反而成了自我狡辩，倒不如用实际行动表示一个态度更好。

有天晚上，我约那个同学出来谈心，就我对他一直不理不睬的态度诚恳地向他做了自我批评。他也说了他并没有太介意我的态度。就这样，说开了，彼此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

这次主动谈心虚心检讨的谈话，我估计很快会传到组织的耳朵里去的。

除了这样的实际行动，我还写了“思想汇报”、“对清查五一六运动错误态度的再检查”这样的书面材料给党支部。这些我过去很看不惯的为了入党而积极表现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也学着做了。在组织和领导面前，我表现得特别的老实驯服。

至于要我在今后的运动中好好表现，那是要等待机会的，由不得我。

嘿，不久机会就来了。

林彪倒台以后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是批林彪在生产、教育、科技、文艺等方面形左实右的错误。与林彪紧密勾结的江青当时极为被动。记得江青为林彪拍的那张学毛选的光头照刚在《人民画报》登载不久，林彪就自我爆炸了。而批林彪的形左实右最后就会批到江青的形左实右上去。于是江青坚持要批林彪的极右。毛泽东开始支持周恩来批形左实右，后来转而支持江青批极右。这样，在1973年年底开始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把批林整风演变成批林批孔，矛头直指周恩来。

清华的迟群是紧跟江青一伙的。他把持的清华在具体落实“反击右倾回潮”时，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矛头指向教师，把一些教师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态度、对教改的态度都上升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的政治高度上去，认为这些都是右倾回潮的表现。学校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有六十多人，点名批判的有四百多人。我记得有一个被全校重点批判的教师，他的“罪行”就是在课堂上对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扔了粉笔头。

我们教研组也不例外地开展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这一次，轮到史老师倒霉了。

史老师是老教师。其实也不老，那时才四十多一点。我们教研组里在文革前没有教授，只有两位讲师，他是其中之一。要是在电机、土建等老系里，与那些老教授相比，他应该是年轻教师。史老师很有个性，喜欢独立思考，说话比较随便，有些话与官方套话不是那么一致，生活上又有点不拘小节。这本来并不是什么政

治问题，更谈不上严重。最多，底下个别提醒一下就是了。但是在这上纲上线的年代，他的表现就很容易与右倾回潮挂上钩。他变成了从“矮子”里面拔出来的“将军”，成了教研组在这次运动中批判的重点。我估计，在运动的大潮流下，与教研组党支部要是不找个典型批判一下就过不了关的想法也有点关系吧？

史老师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教师的帮助和关照一直是很热心的。我与他搞一个课题，对他的认真负责和业务能力都非常佩服。他的为人，教研组的这些老师比我更了解。与教研组里那些党员教师和年轻教师相比较，他的排位算是教师群体中差质一点的教师了。

要是我没有功利私心的话，在这样的运动中，虽然我不敢公开站出来为史老师辩护，起码我可以做到不说话、少说话、或者只说一些不痛不痒应付场面的话。

但是，我明知道教研组批判史老师是不对的，有点过分，我为了在运动中好好表现自己，为了能够入党，我在教研组的会议上也跟着领导的调子积极发言，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

一边内心有一种矛盾和斗争，觉得自己这样做很不地道。一边又想着，为了自己的前途，只有积极表现自己才能入党。

在那一刻，我已经迷糊到搞不清入党究竟是为了什么？

入党就是要为党的事业、党的利益而斗争、而献身。现在党号召要“反击右倾回潮”，具体的讲就是要批判史老师。我积极投身参加这场运动，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在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做很对，没什么可犹豫的。

但是，内心里又觉得把史老师当做批判的对象是不对的，不厚道的。

是听党的号召，还是听从真实的内心？在为了入党这一动机下，我最后选择的是听党的号召。

这一次，我的表现让党组织比较满意。他们认为我在他们提出的两点具体意见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我通过了组织对我的考验。

1974年10月6日，我终于入了党，成了一名新党员。

本来，入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喜事啊。从此以后我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我的政治生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档案中的两个污点将被入党志愿书所覆盖，不再如噩梦般的纠缠我了。

我入党了，可是我一点欢喜的感觉都没有。

大学期间我也是积极要求入党的。如果那个时候入党，我想一定会激动万分的。那时候入党的动机要单纯多了，就是想着入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以这样说，在我思想最纯真的时候，我想入党而没有能够入党。现在真的入了党了，但是思想上反而不那么纯真了，入党动机中已经明显夹杂着为自己个人前途的考虑。

不仅入党动机不纯，连入党的手段都不光彩。过去在战场上，火线入党，那是表现在爆破敌人的工事、堵枪眼、当敢死队，准备马上要“光荣”，要当烈士的。那种火线入党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样的！要是有一点私心，要是没有必死的决心和勇气，是绝对不敢也不可能火线入党的。而解放以后在历史政治运动中，凡是“火线入党”的，几乎都是靠着紧跟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批判打击别人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与战场上的火线入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我这次，也是这样的“火线入党”。

虽然我如愿入了党，我心里一直觉得有愧。深夜常扪心自问：我这个党员，真的像一个党员吗？

后来，文革被否定了，诸如“反击右倾回潮”这样的运动，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我的内心更多了一份羞愧和内疚感。每当别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都很不好意思说是1974年入党的。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74年的大事件是“反击右倾回潮”。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史老师，心里愧得慌。

九十年代，有一次我回到母校，约了教研组的几位老师一起聚聚。我也请了史老师。尽管当着不少人的面非常难以说出口，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史老师道了一声歉。我说我那时的做法伤害了你，非常不应该，请原谅。史老师很宽容，很大度，说，过去的事情了，别老记得，没事。

但是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忘不了。这是一件亏了心的事，羞愧的事。每当我回忆往事，总是内疚自责，终生于心难安！

老话说，欠债总是要还的。欠的良心债也是要还的。钱财的债能还得清，良心债其实是还不清的。所以，最好一辈子都别欠一点点的良心债！

第八节 四五天安门广场，中国人真实心声的呐喊

应了合久必分的老话。清查五一六运动以后，由几个教研组合而成的大控制教研组经调整又拆分成了几个小教研组。我们教研组换了一个名称，叫微电机教研组。1974年秋，招收了一届工农兵学员。这是我们教研组在文革中唯一的一次招生，再招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事情了。自控系在文革中更名为电子系，文革后又更名为计算机系，我们教研组的专业方向也改为声音图像模式识别。

新招生的这个班叫微4班，三十几名学生。因为教研组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所以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

文革中的教学模式与文革前大不一样。文革前的基础课都是由各基础课教研组分派老师到各班授课，有些是几个班合在一起上大课。现在，教数学、物理、英语、机械制图等基础课老师下放到各专业教研组里，与教专业课的老师合在一起组成

一个教学组，统一负责这一个班的教学。这样的教学组织很类似于火车的包乘组，既有列车员，也有乘警、广播员、炊事员等等。我作为专业课老师也参加了微 4 班的教学及管理工作。

因为文革耽误了大好青春的工农兵学员好不容易争得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绝大多数来清华上学都渴望好好学点知识。但是，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不只是上大学，而是“上、管、改”，阶级斗争是他们的一门主课。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回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被当枪使，扮演着我们曾经扮演过的“炮灰”角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教师想教也教不了许多东西，他们想学也没学到多少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曾风闻要把我调到“梁效”写作班子去。自从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北大的大权以后，他们把两校的笔杆子组织起来，起笔名“梁效”，专门炮制两校教育革命的“经验”推销到全国。“梁效”在外的名声很不好听。即使是在清华，老师们私底下议论起“梁效”来，也是嗤之以鼻。我深知它不得人心、恶名远播。所以，一听到这个风声，担心极了。到时候去还是不去，都是两难的事情。我心里想：想当年老子连《新华社》都没去，还去你这个破地方？万幸的是，这传闻最终只是一阵风，这一劫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想，很可能，还是我的政治条件不合他们的要求吧？互不满意，正好！

自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特别是迟群、谢静宜独揽清华大权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关怀下，清华出尽了风头。我常见到迟群在主席台上，挺着胸、昂着头、背着手，冬天的时候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地一副将军的模样。他专横霸道有时是无赖撒泼的作风让刘冰等党委班子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通过邓小平向上“参了一本”。这告状信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由此引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冰等四位告状者，随即被打倒在地。

那段时间，老师们都听到了一则传闻，说清华在社会上的名声很臭，有人要来冲击清华。于是，我看到主楼广场西南角的简易校门（当时称东南校门）增加了校卫力量。还听说，一旦有人来冲击，就要组织师生员工在校门口筑成“人墙”来保卫清华。

我一听到这则传闻，心里又不安了。我巴不得社会上有人来冲击清华，杀杀迟群的嚣张气焰，但是又怕这样的“人墙”要面对流血冲突。让我打人我不敢，要是被人打了又冤枉。如何是好？幸好，又是一场虚惊。

当时的政治气候诡谲多变、风声鹤唳，不知道哪天会出什么样的大事。

1976 年 1 月 8 日，一个惊天噩耗传遍了神州大地：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周恩来在文革中苦撑着危局。他与其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如果说，对毛泽东，人们是像对神一样的敬畏着，那么对周恩来，人们就像是对擎天之柱那样又敬又亲的一种感情。

而对 414 来说，对我来说，则更多了一份别人少有的情感。尽管 414 已经远去了，一直把周恩来作为 414 精神后台的我们，那时对他依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和爱戴。

说句老实话，后来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虽也有点伤感，但是怎么也哭不出来，哪里有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发自内心的痛彻心腑。

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随着清明节的来临达到高潮。实际上，这种悼念活动已经超越了仅仅是对周恩来的哀思，更多的是发泄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对批邓反击右倾复辟的不满，对十年文革的厌倦，还有对中国前途的深深担忧。

在清华，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受到重重压制的。师生们的悲痛和不满被迫表现为沉默。

4 月 4 日是清明节，这天正好是星期日。这之前，学校里已经通过组织系统下达了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就在自己的单位里、宿舍里、办公室里就地组织小型的座谈、悼念活动。

这几年来，我的朋友们已经深感文革十年是一场恶梦，对政治斗争已经厌烦。好些人早就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政治运动了。我也这样想过、说过。但是，我这人本性难移，到关键时候又有点按耐不住，蠢蠢欲动了。清明这一天，我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向天安门广场奔去。

快到天安门广场，远远看去广场上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各式花圈密密麻麻地耸立在人海中。我随手把自行车放在一边，穿过大马路，快步融入到人群中。

满眼都是花圈、挽联、黑纱、白花、标语、诗词。身在其中，久已压抑的心情一下就舒畅了。我大口大口呼着气吸着气。吸入的气息是新鲜而激动的，呼气的感觉是自由而通畅的。

那些挽联、诗词和标语，大多数都是深切怀念周总理，表达对周总理刻骨铭心的哀思。还有许多是或明或暗讥讽四人帮、期盼邓小平复出的。对这些，大家看了，相视着会心一笑。

人多的地方，有大声朗诵悼文的人，也有站在高处发表演说的人。我恍惚觉得这一幕很像是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朗诵的、演说的慷慨激昂，听众有的热泪盈眶，有的高声叫好！

有一些人在拍照，更多的人是在抄录。

我到天安门来，一是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二是来感受广场的实际氛围。到了广场上，看到了那么多在清华根本看不到的诗词、悼文，感受到在清华很难感受到的人心民心，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周总理是永垂不朽的，四人帮是必定要垮台的，这就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

我没带笔记本。搜遍口袋裤袋，找到了一页纸，看到特别带劲的，就抄录了下来。

清明时节泪纷纷，谁入广场不动情？抬头不见总理面，俯首碑前唤亲人。像

这样悼念周总理的诗文不计其数。

我们想念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这是一条标语，更深的含意谁都明白。

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妖红霞现。这首诗文已经不客气地点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名了。

还有一首这样的诗：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我看了深感社会上对这两校已经是何等的鄙视、蔑视了！

一页纸，很快就抄满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被四人帮打成反动诗词登上《人民日报》的最为有名的诗文，我只能抄在字里行间。

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我碰到三四个我认识的人。我们只是领首点头，眨眨眼睛，算是打了个心照不宣的招呼。还有好几个人，他们对我笑笑，但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我想，这一定是认识我的清华人，于是我也回上微微的一笑，算是作答。

在群魔乱舞的神州大地上，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一方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净土。彼此素不相识的人觉得到广场上来的全都是“同志”。连小偷都绝了迹——他们也知道在这个地方行窃是要遭五雷轰顶的！

当天晚上至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在一夜之间全都被搬走。“工人纠察队”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这一事件震惊海内外。随即，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成“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于是，各单位立即开始清查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有关系的人和事，调查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

为了安全起见，我不得不把抄写诗文的那一页纸销毁了。在销毁之前，我默默念了好几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搞到一本内部出版的《革命诗抄》，我抄写的那几首诗全都收录在里面。

在广场上见到过我的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没人把我供出来。除了他们这几个人，谁都不知道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

后来才知道那天广场上还有不少便衣特务。他们拍照是为了收集证据。我很傻，还以为凡是在广场里的人全都是真心实意来悼念周总理的呢。幸好我只是几十万现场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只是抄录诗文，并没有发表演说这类引人注目的活动，所以特务的相机镜头没光顾到我。只知道在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横行于市，无孔不入遭人嫌。没想到共产党的天下也是一样的。这使得我多了一点政治常识：可恶的特务，即负有“特殊任务”的走狗是无处不在的！

除了追查直接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和事，还要追查政治谣言。追查的任务一级压一级的压下来。追查微4班有没有造谣、传谣、信谣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

我自己也常听到一些所谓的政治谣言，多数都是挖苦、嘲笑四人帮的。每次彼此的传与说，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我不仅听过“谣”，碰到信

得过的朋友，也传过“谣”。既“输入”，也常常不失真地“输出”。

让我这样一个暗地里去过天安门广场，信谣传谣的老师去追查微4班学生的政治谣言，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感到很为难，但是又不敢公然违命。

我把学生集中起来，先做了一番动员，说了一些连我自己都不信的鬼话，讲追查政治谣言是如何必要，如何重要，云云。接着把纸发下去，要求大家把听到的、传过的政治谣言统统都写下来。有的学生说从来就没听到什么谣言呀。我说怎么着都得写一点，不写是不行的。我想的是我自己如何交差。

那一刻，我想，学生们心里一定在想：孙老师很像是个四人帮的小爪牙吧？

等到每个学生都上交了，回到宿舍里，我把所有的材料仔细地看了一遍，感叹不已。

有的学生很老实，把听到某某人在某某地方说的“谣言”都写了。可能对他而言，并不是想揭发谁，不过是如实复述而已。

有些材料写得很搞笑，说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隔壁的厕所间里有人在散布小道消息如何如何。还有的说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听旁边的人说如何如何。这样的政治谣言即使再反动也无从追查起。我看了，心里直佩服这些学生真聪明，居然能写得这样有水平！

我全部看了一遍以后，把材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是没有什么分量或者无法查证的，我放在一堆，等着领导向我催要的时候再交上去。还有很少的几份材料，有的分量比较重，有的写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很容易追查下去的。要是真的送到成心想追查政治谣言以求立功的人手里，会很麻烦的。这几份材料我就塞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几十份材料中即使少了这几份，到时候我也有办法搪塞过去的。

好几天过去了，给我布置任务的领导是只布置不检查，没向我要。我也当作遗忘了似的，随他去了。一摞材料如废纸一样躺在我的书架上睡大觉，有好几个月。

那个时候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反感四人帮的。上一级领导布置了任务，不敢不传达不往下布置。要不上级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不是闹着玩儿的。但是，也就是走走形式过过场，没几个人去认真做。连清华这个迟群已经统治了好几年的四人帮据点，广大干部群众都是这样消极对抗，更何况在其他的单位。四人帮是那样的不得人心，其快速覆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九章 清华之后

第一节 公审四人帮，又见蒯大富

1980年10月，我离开了学习、工作了二十年的清华，离开了我特别想离开又有点舍不得离开的清华，调到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

到新单位以后不久，我看到电视转播公审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他们的世纪审判是合民心、顺民意、大快人心的，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的。从这一政治审判中我得到的信息是：文革的所有罪行，全是由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干的，“伟大”的领袖永远是伟大的。

有一次，我看到以污点证人身份出庭的蒯大富在电视上作证。尽管他被羁押着失去了自由，但看上去依旧很有风采，人也不是那么精瘦了。他侃侃而谈，尽显口才。我想多看几眼阔别多年的蒯大富，只可惜电视上给他的镜头太少了。后来，我听说他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被判刑十七年。（近几年才知道最权威最确切的提法是：蒯大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3-P427]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没有解气、活该的想法。真实的感觉是认为判的理由不足信，判的刑罚过重了！我心里为蒯大富有点不平。

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提起公诉被判刑的十名主犯中，不是主犯的蒯大富的刑期与吴法宪、李作鹏相当，比邱会作还多判了一年。这合理吗？就算蒯大富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从犯，总没主犯的罪恶大吧？

蒯大富是以“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13-P489]为案由被提起公诉的。正如蒯大富自我辩护的那样，“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13-P426]连公诉人在那个时候也与蒯大富一样没有看出来，他们怎么有资格对蒯大富提起公诉呢？

我还要说，如果在1966~1968年间，林彪、江青已经形成反革命集团了，那么，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中共副主席，江青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那些提拔林彪江青的，拥护林彪江青的，投票选举林彪江青的所有九大代表们，该当何罪！所谓“明察秋毫高瞻远瞩英明伟大”的领袖又该当何罪？

在文革初期，不要说蒯大富会犯这样的“罪行”，我想每一个造反派头头都可能会犯这样的“罪行”。我要是处于蒯大富的处境和地位，这样的“罪行”也免不了会犯的。当被工作组整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看到中央文革的人来解救自己，看到周恩来亲自给自己平反，看到江青来支持自己，我也一定会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去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刘少奇。全国的亿万民众，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重判蒯大富可能会让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被造反派整惨了的老干部觉得大快人心。但是，以这样的罪名来定罪是可笑的、不能成立的。蒯大富为自己做的辩护是有理的，站得住脚的。出于政治需要所做的不公正判决，那是对庄严法律的嘲笑，既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也教育不了广大民众和蒯大富本人。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是无法无天的年代，审判四人帮的年代依然是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今天，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权高于法、以权代法、以钱贿法的现象比比皆是。

蒯大富有罪吗？在对蒯大富的指控中，还有“杀人罪、诬告陷害罪”这两条罪名。我认为在下列三件大事上，蒯大富是有罪的：

一、蒯大富炮制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和“十二人反党集团”案，对抓捕的师生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信，导致刘承娴老师的死亡和多名老师学生的伤残。虽然蒯大富对专案组的所作所为也有过疑虑，曾指派王良生到专案组所在地200号核查“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交代的“罪行”是否真实可信，并指示不得打人，但是蒯大富作为这些冤案假案的主要策划者和最高领导者仍然是负有罪责的。

二、在两派百日武斗中共有十几名学生和职工死亡。在4.29的武斗中谢晋澄被汽车碾压致死后，特别是5.30武斗中团四多名学生丧生在武斗场上以后，蒯大富又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如果蒯大富对团派下死命令，绝对不许可在非武斗现场开冷枪射414人员，那样，至少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等几条鲜活的生命就不会死于非命。我知道在团派核心中有好几个人都是态度极其强硬的激进分子，他们不见得完全肯听蒯大富的约束。但是我更知道，蒯大富在团总部核心中的作用、地位和威信都是无人能及、无人敢撼的。蒯大富如若下死命令，谁擅自开枪杀人谁就抵命去，那是管用的，谁也不敢不听的。所以，蒯大富纵容团派激进分子射杀无辜群众这一条罪责是成立的，极为严重的。

三、七二七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对于手无寸铁，举着红宝书来制止清华武斗

的工宣队员开枪、扔手榴弹、扎长矛，导致打死 5 人，打伤 731 人。在这一起严重的流血惨案中，蒯大富上午并不在校，回校后决定抵抗。蒯大富作为团派的一把手，下令对工人们采用武力抵抗的强硬对策，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蒯大富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蒯大富在他的辩护词中，对“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辩护铿锵有力，无暇可击。对“杀人罪、诬告陷害罪”的自我辩护，在我看来，都是强词夺理，无理狡辩，站不住脚的。按照蒯大富的自我辩护，在文革中，在革命的名义下杀人放火、抄砸关押都情有可原了，都不算是罪行了。蒯大富当年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在辩护词中没有一句对被害人的谢罪，没有一句表示悔恨和自责的话。但事实是，蒯大富指使、纵容恶行，造成了众多师生、干部、工宣队员的死伤，他是负有主要的、直接的、领导的责任的，是难辞其咎，难洗其罪的。如果以此起诉蒯大富，并据此判刑若干年，我认为蒯大富完全是罪有应得。

蒯大富后来也承认：“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10]蒯大富的谢罪虽然晚了一些，但总比某些有血债的人死不认罪要好得多。我相信他的认罪和忏悔是真诚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文革结束以后，好友见面，总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相比那些死去的同学和老师们，相比那些受了重伤早逝的或至今仍被伤痛折磨的同学和老师们，我是幸运的。我与蒯大富，在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又见面了，彼此再握手，一笑泯恩仇。想起我在 1966 年 10 月上「井冈山」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感觉与老蒯的关系相当密切。几十年后，尽管在理智上也知道造成两派恶斗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蒯大富，蒯大富既是文革打手，是施暴者，也是文革炮灰，是受害者。从这层意思上讲，不应该再计较与他的恩怨。我在心里一直在说，两派恶斗，如果只是观点上的争吵，要是没有死过人该多好！我们可以再做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现在，我与他中间隔着众多的亡灵，使得在情感上再也无法不存芥蒂地和好如初。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友善相处。我真诚地祝愿他保重身体，写点回忆录，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这也是一件他能做的好事、善事。

第二节 清理“三种人”，风声鹤唳毛毛雨

1982 年年底，中央发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所谓“三种人”，就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邓小平说：这三种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要把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薄一波说：“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匪还要坏”。

这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对“三种人”的痛恨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巩固这些重新上台的“走资派”的统治，并为他们子女的接班腾出位置，扫清道路，要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和党的队伍中统统清理出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何况，老百姓对这样的“三种人”是深恶痛绝的。

问题是，什么叫造反起家的人？什么叫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什么叫打砸抢分子？这些都是很笼统的概念，无法严格界定，也无法准确掌握的。这尺度，就像一根松紧带，宽严就全看主管运动的领导掌握了。说你是，你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是也不是。每次运动，都是一批人整治另一批人的好机会。

这是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准确地说，这是继清查五一六以后对造反派的又一次整肃。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对他曾经支持过又被他抛弃了的造反派的清算。当年的造反派，都已经只剩下悠悠一口气。清理“三种人”，是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惨了的“走资派”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在“走资派”眼里，造反派就与庆父一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造反派不斩草除根，他们认为国无宁日。

在造反派中，在造反派头头中，确实有不少坏人，或者说，有“三种人”。但是以运动的手段针对这一群体进行“清理”，仍然沿袭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遗产，恶果依旧，并无新意。

我来浙江省计算所已经二三年了，是一名身无半职的一线科技人员。一直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已小有业绩，从来就没有想往上爬的心思。至于我在文革中的那点真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也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做了“一般错误”的结论，档案中的材料也被告知烧掉了。这次还会不会像翻烙饼一样的再翻我一次呢？

在我调动工作的时候，我对调入单位清楚交代我曾是红卫兵头头，是414的二把手。我不敢相信关于我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在我的档案材料中已经不留痕迹了。免得自己今后被动，免得新单位的领导为难，还是预先讲清楚要主动点。

新单位的同事多数也知道我在清华当过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实在太有名了，一听说是清华的造反派头头，都以为我与蒯大富是一伙的，想问又不敢问。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传得邪乎恐怖。我竖着耳朵，听着风声，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这次我会遭遇什么样的厄运。

果然，有一天，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他们可能不摸底，也可能已经摸底了要再找我谈谈，这都很正常。态度也是比较和善的，并非审问，而是“了解情况”。我就把我在清华文革中的大致情况汇报了一下。他要我写一个书

面材料。于是我写了一份《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经历（66年—76年）》，在1983年8月29日交给他。

这份材料我选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标题，因为我想还不到做检查交代的时候。我写得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按照清查五一六的审查结论，我也写了自己的“一般错误”。为了澄清我不是蒯大富那伙人，我特别强调我是414的头儿，而414是蒯大富的对立面，是与蒯大富的极左斗争的。我特别说明我在文革中“从未参与过抄家、游斗干部等活动”，以撇清与“打砸抢分子”的关系。

材料交上去以后，没有动静。我非常关注所里的动向。有一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我是在被调查了。因为有一位所里的中层干部长时间在外“出差”，我感觉有点反常。

多年以后，我的直觉终于得到了证实。

当时研究所的同事中有一位清华校友，他是自704班的老刘，我们是同系同专业的，他比我低一届，调到所里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多，已经是研究室的主任了。他工作能力很强，深得领导的赏识。

他说，那时领导向他调查过我的情况。他实事求是地做了介绍，也解释了当年清华文革运动的背景。

他是一个为人很好的高干子弟，又是老四。我相信他对我有所照应的。

虽然，我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运动中，整你还是不整你，并不取决于问题的大小。一个清华来的当过414二把手的名头，一个“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对于那些想积极表现，想以此大做文章的领导来说，足够有理由整我一通的了。

清理“三种人”期间，虽然有冷飕飕的“风”掠过脸颊，但没有电光闪闪雷声滚滚的风暴降临到我头上，只是下了点毛毛雨，实属万幸。

我在怀柔搞“四清”的时候，大队里有一个曾经当过小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当时听公安给我们介绍，他没有血债（要是有血债的话，早就在镇反运动中给枪毙了），只是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干过事。公安对我说，地富分子表现好，还可能摘帽子，对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到死也不可能摘帽子的，他们永远都是内控的对象。

我过去不清楚内控是什么意思。文革以后我才慢慢感觉到了，我就是一个被内控着的异类分子。我档案中那些告知我已经被烧掉的材料是真的烧掉了，还是只是哄骗我其实依旧保留着？我是强烈怀疑的。即使所谓的交代材料、外调材料都烧掉了，甚至审查结论也烧掉了，我依然感觉到我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没有人宣布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审查结论也不会作废。即使有一天说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我当过造反派头头的历史是不可能抹去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可能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但是在好些重大事情上的待遇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旦社会上有点风吹草动，政治形势有点动荡，我总感觉到背后有两只狼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原以为入了党，能把政治污点对冲了，掩盖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那张党票在关键时刻，与一张废纸无异，顶不了什么用的。

这就是我的宿命：一年多的头头，一辈子的代价！

第三节 六四，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989年夏天，一场由悼念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以“反官倒”、“反腐败”为主要口号的学潮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杭州的大专院校学生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

那段时间，在我上班的路上，经常碰到游行的队伍。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站在街边观看。

我看到的游行队伍是守秩序的。打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预先准备好，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游行的组织者往往在游行队伍两侧最外边安排了手拉手的一排人，负责不让外人混入队伍，保持队伍的纯洁，以免节外生枝。也常见各类警察在道路两旁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整个游行的气氛是平和的。要说有“过激”的行为，是那段时间里各类车子的车身上，不管车主愿意不愿意，都被贴上了各种标语或者用墨水涂写的口号。

我们这群经历过文革的人，碰在一起常常会说：看透政治了！要是再遇到这类事情绝对不会再当傻子了！确实有不少人汲取了教训，对政治不再关心，不再参与。但是我们这群人中的大多数，从中学开始，继而大学，又经过文革，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好像已经溶化在血液里，浸透到骨髓中，很难做到超然世外。当然，要参与进去自会有很慎重的考虑，但是要漠不关心，是很难做到的。

在学生自觉维持队伍防止外人加入、民警两旁警戒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我只能站在马路边看着他们，或者在游行队伍的末尾推着自行车缓缓地跟随一程。我想，我要是大学生，一定也会参加这样的游行。或者，如果我的单位有人出头组织这样的游行，我也会参加的。因为“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实在是深得民心。

我们研究所里确实有一位很有群众威信的党员带头组织过一次游行。很遗憾，那两天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

六四事件，被定性成反革命暴乱。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群众高喊反对腐败的口号，是给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抹黑。书写打倒特权的标语，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统统都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革命言行。民众的集会、游行、抗议、示威，如果当政者认为危及了政权的稳固，

不论曾经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镇压起来是绝不手软的。六四，最后以所有善良的民众以事先绝对想不到事后无法接受的血案而告终。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卫国保民。但是，“人民的儿子”下令“人民子弟兵”开着坦克碾过天安门广场。我感到万分震惊！震惊于这种连凶残的北洋军阀、黑暗的国民党独裁者、万恶的四人帮都不敢冒的天下之大不韪，居然都做得出来！我所敬仰的伟人，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让他的英名流芳百世，他举起屠刀镇压学潮也把他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万分悲痛，悲痛于死难的同胞竟然丧命于他们热爱的党、政府和军队之下！这不只是某个个人的恶行，而是极权体制的严重弊端和重大缺陷造成的。我从青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十分真诚的信仰，经历文革后已经疑窦丛生，摇摇欲坠，这一次终于在血淋淋的残酷现实面前轰然倒塌、彻底摧毁了。我问自己：十几年前，我还在积极争取入党，最终成为一名党员。我要入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站在民众对立面上镇压民众的党派吗？

我原有的信仰就这样“死”了。新的信仰又难以建立起来。那种似乎是缺少了灵魂的痛苦，比始终没有过信仰的，更为痛苦得多。好在，我还有点良心，有点拷问良知的勇气，凭此，聊以度过我已经不多的余生，支撑老眼昏花的我看着民主的大潮在一点点冲刷专制的堤坝。

六四热血青年是爱国的，他们也是一心为党的。他们所有的言行都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之内，他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法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他们并没有反党，他们并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希望共产党跟上时代的步伐，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民主进步，希望社会公平正义，希望百姓过上富足的有尊严的日子。对他们的镇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有罪的。

长期以来，反党就是反革命，就是敌人，就要镇压，就要专政，这已经成了执政党的惯性思维和不容怀疑的铁律。我的一位朋友问我：如果有一天，民众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示威游行，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反对，难道就一定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吗？执政党对民众的暴力镇压难道就是天经地义的吗？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封建专制下，反对朕、反对朝廷，即便是非暴力的，也一律镇压。而在现代民主下，面对民众的反对，执政党是绝对不可以对和平示威的民众施以暴力的。部分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反对，说明执政党存在着亟需改正改进的地方，执政党应从中得到教训以重新取信于民。总之，执政党对民众的态度，也就鉴别出执政党手中的权力，究竟是民众授予的公权还是仅为一党私利而霸占的私权。

六四以后，各单位又是照例开展了清查。这次因为我没什么行动，所以很太平，没什么麻烦。不过我心里并不感觉侥幸。我暗想，要是碰到这样的机会我还是会参加的。即使再被清查一次，也不在乎这辈子多一次清查了。

在老四这个朋友圈里，对六四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绝大多数是同情学生、支持和平请愿的。也有个别我们戏称是“坦克派”的，认为不坚决镇压的话，共产党就要下台，国家就要大乱，改革开放的大业就要半途夭折。

旧时的派别早已消亡。过去曾经志同道合的好友，经过若干年以后，面对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各人有自己观点，甚至针锋相对、泾渭分明。过去相信“红线主导”论的保守人士，如今好些人对前三十年和现体制持批判的态度。过去信奉“彻底砸烂”的激进人士，如今不少人对现体制反而更持肯定的观点。值得庆幸的是，明知道对方的观点立场与己不同，互相已不再扣帽子、打棍子、贴标签，已能心平气和地交流、探讨、争辩，这充分说明了经过文革洗礼的我们，大多数已经有了理念上的进步，政治上的成熟，以及“一笑泯恩仇”的境界。

第四节 哀思，在谢晋澄的“墓”前

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与好友相聚。

现在，派组织早已消亡，派利益荡然无存，派性也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派的印迹烙在我们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上，因此形成了浓重的派情结、派友谊，终生都难以忘怀。对我来说，派友谊既包括与414派的友谊，也包括与蒯派、「八八」派、团派的友谊。

席间，谈起了清华文革，谈起了百日武斗，谈起了多位遇难的同学，谈起了谢晋澄，大家唏嘘不已。其中有位好友说，他知道谢晋澄葬在何处。一听这话，我们都说应该去看望看望他，于是驱车前往。

凭着心中的记忆，这位好友终于找到了谢晋澄的“墓地”。他向我们叙说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谢晋澄是在1968年4.29那场武斗中，在九饭厅前被汽车冲撞活活碾压而死的。他的父亲从老家赶到清华见了宝贝独子的最后一面。火化后，他的同学们为他选了一个质地尽可能好一点的骨灰盒。

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中最大的悲伤。这位悲痛欲绝的可怜父亲，临走的时候已经抱不动重如千斤的骨灰盒。¹

当时学校还在武斗中。骨灰盒怎么办？一位家在北京的同学站了出来，二话没说，抱起骨灰盒，就存放到他的家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大家的生活都不安定，谢晋澄的骨灰盒，在该同学家里一保存就是10年。然而，这终究不是

¹ 当年的小女生唐金鹤接待过这位不幸的老人。她说：“我见到了这个可怜的老人，他瘦骨嶙峋，满脸的皱纹刻下了他一生的沧桑。老人少言寡语，欲哭无泪。他坐在那里，长时间地只是以呆滞的目光望着我们。”[6-P350]

长久之计。他与几位好友一起商议，大家决定还是入土为安最为妥当。

葬于什么地方？怎么安葬？这是最为煞费苦心的难题。方案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否定。

北京，清华，是谢晋澄追寻梦想的地方，也是他梦碎魂断的地方。比较了好些可选择的地点，最后大家决定，那就让他长眠在北京，安葬在一个比较宁静的他能遥望清华园的地方吧！

某天，夜深人静之时，有几个中年人手捏铁锹，肩扛水泥，提着水桶，捧着骨灰盒，来到预先勘察过的地方。

铲起草皮，挖好深洞，洞底铺上厚厚的泥浆，小心地安放好骨灰盒，再把泥浆浇注在骨灰盒的四周和顶上，回填泥土，覆盖好草皮。

等到一切都做妥以后，几个人站立四周，默默地致哀、告别，然后悄然离去。谢晋澄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安葬在毗邻清华园的一方净土之中。没有仪式，没有悼词，甚至没有做一点明显的标记。

当我们来到“墓地”的时候，我想起，这片地方我在校的时候也曾来过。印象中，十分荒芜冷清。如今，这里松柏成荫，绿草茵茵，斜坡向阳，清静肃穆，无意中，这儿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墓地”上没有墓碑。“墓碑”就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一行头发花白皱纹满面的故交旧友，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悼念我们的好兄弟，百感交集。我们悼念他，不是因为他牺牲得多么伟大壮烈，而是因为他死得太不值得太可惜。他是不幸的死难者。他以他的死揭示文革是个大劫难，以他的命控诉极左路线的罪大恶极，以他的“墓”告诫后人不要再重演他这样的悲剧。

当年的厮杀呐喊已经销声匿迹，这些年来谢晋澄听到的是后生学子们匆匆行进的脚步声。

当年的腥风血雨已经无影无踪，这些年来谢晋澄闻到的是远处飘来带着芬芳的书卷气。

清华宣称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是成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殿堂还是培养听话活驯服工具的衙门，我们这些已经远离清华行将就木的老人，只有请谢晋澄替我们就近“见证”了。

清华百日大武斗中十几个死难者，我唯一认识的就是谢晋澄。此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充满朝气。我心中的旧伤再次绞痛！

谢晋澄的安葬之地，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这也许是 414 最后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也将随着我们的陆续逝去而成为永远的秘密。

每次来北京，回清华，我都要到这里来凭吊谢晋澄。一到谢晋澄“墓”前，我心里总会记起并祭奠那些我认识的、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罹难者，他们中有钱

萍华、姜文波、孙华栋、刘承娴、卞雨林、许恭生、杨志军、朱玉生、段洪水、李磊落、杨树立、范仲玉、罗征敷等一长串名字。这些文革死难者，都值得我们悼念和记忆。

在团四两派争斗期间，还有更多的身心遭受巨大伤残的受害者。他们是（仅就我现在所知道的极不完全名单）：

在 1.4 武斗中和百日武斗中身负重伤和较重伤的江道波、郭创贤（已去世）、戴××、吴栋、周忠荣、周建秋、周坚、葛伍群、张继昆、姚清信、董庆祥、李光鸣、张南清、宿长忠（已去世）、汲鹏、王允方、程××、姚××（已去世）、霍玉金、龙铮山，李光鸣、赵厚福、时作隆（已去世）、谭昌龄（已去世）、马耀开、陈××、光积昌、唐应武、陈天晴、刘万章、党建国、杨振华、崔丕源、杨明杰、李文斌、曹大安、欧阳北辰、钟成国、王文中、谢德明、郭福鑫等。

曾被关押过的罗征启、文学宓（已去世）、李康（已去世）、饶慰慈、陶森、陶德坚（已去世）、吕应中、谢引麟、黄安妮、张琴心、陈楚三、陈育延、叶志江、曾昭奋、俞善乐、杨立人、左羽、贾振陆、陈家宝、贾××、邢竟侯等。

我是策划、鼓吹、推动、实施两派分裂的主要头头之一，而两派分裂是造成日后武斗的原因之一。作为 414 的第二号头头，我参与了 414 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对于 414 所犯的错误都负有或主要或次要、或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我也发表过许多过激的极左的错误言论，写过许多派性的上纲上线的大字报，打击、批判过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和群众。每当想起两派争斗期间死难的师生以及受我伤害过的人，我心里会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我借此书向你们（以及我在这里没提及的）说一声：对不起！我有责！我知错！

我衷心祝福你们及所有健在的朋友们健康快乐、晚年幸福！

第十章 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 对于两派争斗，我的再认识

每个人的经历会给每个人的人生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每个人的经历对所经历事件的评价也会带上浓重的个人色彩。

关于团四争斗，审查和检查让我不得不时时回顾和思考。人到暮年常咀嚼记忆，不由得经常回想和反思。以往一些看法和观点，在社会变革的影响之下，在社会阅历的增加以后，在朋友间的探讨切磋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修正与更新。

虽然，团四两派早已作古，派性赖以生存的派利益这一土壤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派情结、派友谊、甚至偶尔夹带一些派观点还是有的。这很正常，也无需掩盖。只是，不应该因此而影响对过往历史的客观评判和公正认知。

在清华文革初期，蒯大富是第一号蒯派，团派的一把手。沈如槐参加过「八八」派，是 414 的一把手。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在派别属性上没有交集。我呢，是蒯派，也是「八八」派。后来又是团派（非「28 团」的“团”，是「井冈山兵团」的“团”），最后是 414 派。也就是说，我的派别属性把蒯大富和沈如槐的都涵盖了。历数两派头头，像我这样对蒯大富和沈如槐各自的派角色都有过体验，先是兵团总部核心委员后又成为 414 总部核心委员的，唯我一人。我参加不同的派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使得我对这些派别都有一种切身的感知。所以，仅从这点而言，我应该更有条件做到客观公允地评论这段历史。但是实际上，囿于水平所限，我也做得不够好。下面这些比较粗浅和片面的文字算是我现在的一些再认识。

1. 清华文革初期史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争斗、消亡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文革初期史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争斗、消亡的历史。

清华文革初期，可以细化成 6 个小的阶段。

（1）保蒋与反蒋阶段（1966.6.1-1966.6.9）。

在这十天中，围绕着校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蒋南翔是姓“马”还是姓“修”

进行了激辩。认为应该肯定校党委、蒋南翔的，大体上就是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的，这正是 414 思潮最基础的观点。反对校党委、蒋南翔的，实际上就是认为需要“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这也正是团派思潮的核心。后来，60.3% 的反蒋分子成了团派，到 414 这边的只占 32%[1-P116]，从中可以看出，在反蒋保蒋过程中就已经显露了日后团四两派分野的端倪。

(2) 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阶段 (1966.6.10-1966.8.8)。

包括相当多反蒋学生在内，因对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导致工作组的敏感和压制。由此而掀起的反蒯运动产生了一个受工作组迫害的蒯派群体。蒯派后来成了团派的中坚力量 (65.6% 的蒯派加入了团派，在 414 这边的只占 29.3%，挨整最厉害的著名蒯派几乎全在团派)，而保工作组或者不反工作组的，绝大多数(68%)后来加入了 414。[1-P116]

(3) 「八八」与「八九」对峙阶段 (1966.8.8-1966.9.23)。

这一阶段，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但是它的势力、它的影响仍在。它的代表就是「八九」派。一部分虽然没有公开反工作组但是对工作组反蒯表示不满的成了「八八」派，与「八九」派抗衡。蒯派虽然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还没得到彻底平反和翻身，处于边缘状态。这一阶段中诞生的「八八」派后来成为 414 的中坚力量。

(4) 「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存阶段 (1966.9.23-1966.12.19)。

这一阶段，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八九」派逐步并最后退出了清华的文革舞台，以蒯派为核心的「井冈山红卫兵」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井冈山红卫兵」因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而蒸蒸日上，成为第一大造反派组织。

(5) 「井冈山兵团总部」与纵队派激辩阶段 (1966.12.19-1967.4.14)。

这一阶段中，虽然以「井冈山红卫兵」为主实现了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但是派别分歧依旧存在。在一个总部的面纱下，兵团总部(多以「28 团」的名义出面)与其属下的纵队派(「八八」派)围绕反唐、反「八八」、整风及干部解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6) 414 派与团派全面对抗阶段 (1967.4.14-1968.7.27)。

这一阶段中，「井冈山兵团」从内部的两大派正式公开分裂成两个造反派组织。两个总部独立存在、各行其政。彼此由文攻恶化到大规模武斗。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小的阶段可以归并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前三个小阶段)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表势力和影响。这一阶段中，团四两派开始孕育，雏形初现，但两派之间的矛盾还未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到后一阶段(后三个小阶段)，主要的敌人打倒了，保守派垮台了，原有的主要矛盾基

本解决了，于是，造反派内部两派之间的矛盾围绕着该由谁掌权这一关键点上升为主要矛盾，并最后呈现白热化。

考虑到即使从「414 串联会」成立算起，团四两派并存的时候也一年有余，占了整个清华文革初期的大部分时间。因而，把这之前十个月的文革，看成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的过程，对于清华文革初期史的认识和把握，可能是一个新的视角。

2. 两派基本都是错误的，但错误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指导思想而言，两派都是信奉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贯彻执行文革路线的。

从行为实践而言，两派的表现都是极左的，都同样在做着批判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当时认为正确的事情，都在保护、解放一部分干部的同时打击、压制另一部分干部，互相激化矛盾最后导致武斗。

所以团四两派都是错误的，应该基本否定。对此，我想绝大多数普通的老团老四，已无异议。

但是，一谈起清华文革重大事端，两派头头与骨干在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很大，对这段历史很难达成共识。这主要表现在，有些老四要极力表白 414 比团派正确得多，有些老团要极力证明 414 与团派是半斤八两，没啥差别。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偏离事实的。我的看法是：并不是 414 比团派正确得多，而是团派比 414 错误得多。

由于团派贯彻极左的文革路线比 414 更积极更紧跟，由于团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 414 一直被中央文革打压，由于团派始终处于掌权的多数派地位而 414 一直是在野的少数派，由于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因而对干部的迫害比信奉“红线主导”论的 414 更甚，由于团派几次挑起武斗而 414 基本上处于招架的守势，所以，团派所犯的错误比 414 要大得多，责任也重得多。

譬如，两派对亮相到对方的干部都有批斗、抓抄、关押的行为。但是团派炮制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冤假错案，专案组使用了毒打、罚站、乃至虎钳拔牙等等令人发指的手段，造成被关押的干部有伤更有死的极其严重的恶果。414 对团派干部最严重的错误行为是抓了陶森进行批斗并当做人质关押在科学馆里。

又譬如，在百日大武斗中，两派都有人员伤亡。除了两派在武斗场上对垒时互有伤亡外，多名 414 人员都是被冷枪射杀的，或者抓住了打死的。这性质也比在武斗现场的伤亡要严重得多。

我的有些老四朋友，总觉得 414 的干部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解放干部上是有很大成绩的，看到当年亮相到 414 的干部在文革以后很多人担任了重要职位心里乐滋滋的。而一想到当年 414 上受中央文革的歧视，下受团派的打压，没有

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后来，清理五一六，清查三种人，没有一样不拉下的。虽说是温和的造反派，但是造反派的帽子现在已经是臭烘烘的。总之，情绪中既有自恋自慰，又有怨气闷气。

我的有些老团朋友，总觉得当年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跟着毛主席搞文革，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清五一六挨整，清三种人挨整，整得比老四要厉害得多。蒯大富坐牢了，武斗中打死人的都判刑了。老四的头头即使挨整也不厉害，亮相到414的干部后来都做了大官。总之，不少老团觉得虽然犯一样的错，结局却比老四要惨多了，不公平，不服气。

我想说，对老四而言，像抓关陶森，都是错误。如炸高压线，都是罪行。是错误，就要勇于认错、道歉。是罪行，就要敢于认罪、救赎。这点是不能含糊的。不能因为所犯的错误轻一些少一些就可以沾沾自喜。对老团而言，要心悦口服地承认团派的错误是要严重，责任要大。

老团老四都应从个人的怨天尤人中挣脱出来，不应再过多指责对方的责任，淡化自己的错误。我们对无辜的师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无法狡辩的错与罪。

我非常欣赏陆小宝这句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话：要“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4-P17]，“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2-P298]。如果我们能把最后责任的内容再延伸一点，无论是老团还是老四，不仅应该留下亲历者的回忆，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荒诞、最巨大的浩劫的罪恶无情揭露出来，我们还要留下当事者的惨痛教训，留下觉悟者的深刻反思，为了我们的民族和民众今后不再遭受文革这一类的历史悲剧。

3. 两派群众的政治热情、民主意识及理想主义是最值得肯定的

我认为，团四两派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的政治热情、自觉参政行使监督的民主意识以及心有信仰的理想主义是最值得肯定的。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政治，政治总是影响着我们。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文革，我们不得不被卷入文革。

文革初期，在没有党团组织领导和约束的环境下，我们全都积极地投身到事后证明是错误的文革运动中去。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全错了呢？是不是没有丝毫可以肯定的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起码有三点，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是应该继续发扬的。

政治热情

那时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抱着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一种政治热情参加文革的。

我们承认，我们很幼稚，相信走资派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我们很天真，认为

毛主席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大救星，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指路人。我们很正义，要让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修，劳动人民不受二茬罪吃二遍苦。我们也很愚蠢，多年的洗脑已经让我们失去自我不会也不敢用脑子对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是的，我们可贵的纯正的政治热情被人利用了。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个骗子，指挥几个疯子，蒙蔽一群傻子”的“骗子疯子傻子”论很有市场。但是“傻子”不会永远傻下去，经过事实的教训，“傻子”会看穿“骗子”的把戏，不再受“疯子”的指挥，“傻子”们是会觉醒的。

不能因为上过当受过骗就对政治热情自我否定。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宝贵的政治热情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抱有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的一种政治热情。

所以，在1989年学潮中的广大学生，他们的政治热情是应该完全肯定的，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任何一个公民，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与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的执政者，应该鼓励、保护国民的这种政治热情。只有那种仅仅为了便于统治而把国民当做只须干活的顺民，才要诋毁、摧残这种政治热情。

当年，“逍遥派”是个贬义的称谓，做个逍遥派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显然是片面的。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保校党委保工作组中站错了队的同学，还有黑帮子女等，都不敢积极参加文革，不得不变成游离在运动之外的逍遥派。随着团四两派的恶斗，武斗的升级，更多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心生反感，因而逍遥派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这实际上是广大师生对文革无奈、消极的一种表现。

随着文革的被否定，两派的被否定，文革“逍遥派”这顶帽子成了香饽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逍遥派，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而造反派成了“打、砸、抢”、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认识同样是片面的。我知道不少造反派头头曾以造反派的身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了许多诸如保护干部保护文物的好事。而那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借串联之名，行“并联”之实的真正逍遥派，总非我所欣赏的。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政治挂帅，只要政治思想好，就一好百好，视金钱为粪土。后三十年是金钱挂帅，腰缠万贯，才是成功的标志，对政治十分淡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民智不成熟的表现。当今，对于富裕起来的人们，强调一下关心社会大事，心系民族命运，关注民主民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民主意识

文革中的“四大”武器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虽然都是很有局限性的，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参与学校的治理，监督掌权者

的权力运用，这样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所以，当年不管「井冈山」是多么的响当当，不管蒯大富是多么的红得发紫，它的所作所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处在全校师生尤其是对立面的监督之下。

有关民主意识的问题，在下面“否定文革，我的一孔之见”这节中还要详细阐述。
理想主义

当年团四两派群众绝大多数都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我们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

政治热情饱满、民主意识浓厚、富有信仰理想，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几十年以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我们年轻时热衷的政治绝大部分是错的，我们的民主意识还很幼稚很初级的，我们的信仰和理想是乌托邦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加以肯定呢？错误的，认识到错了，可以改。只要注入正确的内容，就能重燃政治热情，重建民主意识，重塑理想主义。一个没有政治热情、没有民主意识，没有信仰理想的年轻人，则是非常可怕的，如同没了灵魂一般。

沈如槐说过“我们无怨无悔”[5]。这话常被一些人批评为他对自己的错误不知悔改。我想说的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非常痛心，非常追悔。每每思及，夜不能寐。不论反思的深度如何，我们都在不断地反思。

我们所以说无怨无悔，是因为我们此后的遭遇尽管比较坎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们不为个人的遭际而怨恨，因而“无怨”，我们为国为民、为民主、为理想而努力过，奋斗过，因而“无悔”。

我们所以说无怨无悔，还因为是在文革初期那样一种法纪荡然无存、暴力肆虐的险恶环境下，我们还是尽力坚守着道德的底线和良知的边际。我非常欣赏赞同沈如槐写的这段话：“也许，我们（当年）所坚持的东西算不上什么真理，但我们确信我们至少也是在坚持正义、道德和良知。我们是在坚持真、善、美。而正义、道德、良知，真、善、美是区别一个人、一个组织的最最基本的标准。”[1-P422]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伦理，是我与沈如槐能一直携手一年多共同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的根本所在。

4. 成立「414 串联会」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在 414 总部成立以前，以纵队派和「414 串联会」形式出现的 414 派与团派之间，在对解放以来的十七年和文革前的旧清华的评价上，在对造反派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地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如何正确地对待干部等问题上发生过重大争论。其中，尤以在干部问题上的争辩最有深度。可以这样说，团四两派围绕着十七年和干部问题等的大辩论是两派争斗中最为精彩的华章。有关双方的主要论点，沈如槐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和归纳 [参见

1-P292~300], 我就不再赘述了。

尽管那时大字报上所用的言词也是相当激烈的，充斥着火药味，但是多数大字报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力证自己的观点，还是比较说理的。那时的大辩论也不时有抢话筒和互相推搡这样的粗鲁动作，争辩的气氛有时也很火爆，但都还属于“文斗”的范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并非只有极左极右的两家。每个人都在独立思考，从争论中受到启发，在思辨中得出结论。

这精彩一幕的出现，是与「414 串联会」的成立密不可分的。「414 串联会」的成立，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起了正面作用的。

在大辩论期间，观点相同或相近的战斗组之间必然会互相支持、声援，彼此必然会串联、交流，会有一种联合起来宣示更大的力量、发出更大的声音、力求更多地影响清华文革走向的冲动。于是，「414 串联会」就应运而生了。早期曾出现过的「八八」、纵队派也为孕育「414 串联会」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当干部问题成为学校运动的重点和焦点，「414 串联会」的诞生犹如瓜熟蒂落般那样自然。

在社会上，有不同的群体就存在不同的群体利益。不同的群体会形成不同的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井冈山兵团」内部，出现了占主导地位的团派和持不同政见的 414 派。这两派的交锋与争斗是良性的正面作用还是恶性的负面作用，全看这两派是如何互动的。

如果兵团总部把「414 串联会」视为与「28 团」一样的下属组织，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允许「414 串联会」的合法存在，搭建各方平和交流观点的平台，听取合理有益的建议，这对兵团总部而言，实在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好事。当然，「414 串联会」方面，也应该扮演一个起建设性作用的角色，而不是做一个胡乱搅局一味对抗的反对派。真要是这样，清华两派虽然存在，但不至于会恶化到组织分裂并最后演化为武斗的地步。

不幸的是，「414 串联会」刚一成立就做了强夺广播台这样鲁莽出格的举动，显示出这个反对派不够合格。处于关系主导地位的兵团总部以此就把「414 串联会」定性成“复辟逆流”、“非法组织”，不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则更是错上加错。蒯大富没有意识到他应该站在两派之上，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井冈山兵团」的领袖，而自甘矮化委身在团派里面，只做了团派一派的领袖，这是很失策的。

在文革路线下，当时两派都奉行斗争哲学，都自以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所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要实现良性的互动其实是极难的，不太可能的。

纵观「414 串联会」成立前后的清华运动，「414 串联会」的成立客观上激化了两派的矛盾，这是消极的影响。但是，「414 串联会」的成立大大增强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抵制，深化了对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辩和揭示，强化了对

蒯大富和团派错误的批评和斗争。相比而言，积极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以自由结社方式表达群体诉求所彰显的进步和有效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5. 成立 414 总部是 414 所犯的最大错误

尽管 414 有千条理由万般无奈说成立 414 总部是必要的、迫不得已的，在抵制极左思潮回击团派的多次对抗中是至为关键的一步，是积极有效的；尽管团总部在 414 分裂的过程中也犯了不少错误有相当大的责任，我现在认为，成立 414 总部在 414 所犯的众多错误中是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错误，414 应该对分裂负主要的责任。

《四项协议》是基本可接受的

1967 年 5 月，谢富治出面找两派谈判，在他的本意中有想帮助蒯大富，通过坚决支持这位深得毛泽东宠爱的红卫兵领袖来向毛泽东表忠心的用意。所以他偏袒团派的态度令我们非常反感。但是平心而论，他在清华文革这一关键时刻找两派谈话，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签订《四项协议》，这是适时的，并没有错。《四项协议》的基本内容，符合当时“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大方向，反映了两派力量的大致对比，满足了两派的基本诉求。既照顾了双方利益，也存在各方都不太满意的内容，需要双方都做出让步。协议基本上是公允的、合理的。因此，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四项协议》在两派关系中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也是经协商达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成果。两派直接谈判和《四项协议》的签订给团四两派一个携手合作的机会，也是给清华文革一个迈入新阶段的机会。

如果谢富治和蒯大富当时能够接受 414 提出的建议，在第四条中增添“正确”两个字¹，我相信「414 串联会」的大多数勤务员和绝大多数 414 群众都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四项协议》。“清华大学革委会”如期成立的可能性极大。

第四条没有加“正确”两个字，成了《四项协议》头上一个显眼的“癞痢疤”。414 对这一条的口头抵制和预防后果的声明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基本正确的。在具体操作方面的主要错误是：

1、「414 串联会」勤务站未能冷静地客观地评估《四项协议》，未能在肯定和接受《四项协议》的前提下再指出第四条的欠缺并严正声明 414 的立场，这就给人造成了本来只是强烈抵制第四条而最后却是全面抵制撕毁《四项协议》的片面印象。

2、参加谈判的六名代表未能从大局高度认识《四项协议》是应该接受的，因而也不可能做通留校勤务员和 414 群众的思想工作。尤其是作为 414 首席代表签

¹ 在当年的政治话语中，这“正确”两字是应该加的。就加或不加对两派的利害关系而言，加上对团派的影响要小一些，不加对 414 的伤害要大一些。

字的我，未能把自己在签字前曾经闪过的《四项协议》是可以基本接受的理由勇敢地、开诚布公地讲出来，说服大家，而是急急忙忙地认错做检查。

如果 414 看清方向，顾全大局接受了《四项协议》，在革委会中，虽然还是少数地位，但是比此前的只有我和王良生两个人的状况，要大大改观了。团派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了。革委会成立以后的斗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依旧是非常尖锐激烈的，但怎么说也是革委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414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起积极作用的反对派，对团派的极左思潮和错误行为同样可以起到批判、抵制的作用，并从中学得“执政”的经验。这是一条“议会道路”（即 414 参加革委会与团派建立“联合政府”），是一条对两派都有利的双赢道路。

因为团派对 414 推荐的革委会候选人采用“先搞臭、再进来”的手段，414 就认为“议会道路”走不通了，只能走分裂的道路。其实，两派对“议会道路”在政治观念上都是有抵触情绪的。经过文革前的反修教育，认为妥协、让步、忍让都是机会主义的，都是投降派的所为。只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才是最革命的。宁可两败俱伤，也不愿各退半步。414 不愿意走“议会道路”，也害怕“议会斗争”的艰苦复杂、束手束脚，只想着独立出来另立山头痛痛快快地与团派对抗，对分裂后的严重后果想得很少，这反映出我们这些 414 头头（至少是我）思想上的极左，行动上的极端和方法上的简单。既没有政治智慧，又缺乏斗争策略。怪不得连谢富治都批评我们“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4-P181] 文革时期的谢富治表现极差，但是他对我们《四项协议》这件事上的批评，还是很中肯很到位的。

即使要分裂也是采用沈如槐的稳妥方案好

即使 414 接受了《四项协议》，分裂极可能依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东方红战团」是不肯俯首的，因为团派是不肯怀柔的。

真的要分裂，最初沈如槐曾经策划的是“敢死队”突围的方案：以「东方红战团」一部分主力成立“东方红总部”¹，「三七战团」及绝大部分 414 群众仍留在「414 串联会」里，看形势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沈如槐是坚决主张分裂的，但是他提议的行动方案走的却是稳健路线。

我提议并最终被采纳和实施的方案是：包括「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在内的 414 大部分主力分裂出去成立 414 总部，「414 串联会」只是起收容的作用。

我并不是最早最坚决主张分裂的，但是我却提出了一个很激进的行动方案。

这两种方案的出发点都是为了 414 分裂以后的生存更有利些。

如果我那时真心不主张分裂并且有大局观的话，我是应该赞同沈如槐的方案

¹ 事实上，「东方红战团」确实已于 5 月 27 日晚在清华主楼三区 3 楼召开了“东方红总部”成立大会。（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 1967 年 5 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年记》，《记忆》第 89 期）

的。沈如槐率领「东方红战团」分裂出去，我、汲鹏、王良生等留下来执掌「414 串联会」。这样，对「井冈山兵团」来讲，分裂的影响和后果要小得多，回旋的余地也要大得多。

那样的话，「414 串联会」在组织上仍留在「井冈山兵团」内，它是兵团内部的反对派。在政治上是“东方红总部”的同盟军，同时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414 串联会」既全力支持“东方红总部”反对、抵制「井冈山兵团」的极左错误，同时也对“东方红总部”在干部问题上和对团派的态度上过分的行为有所掣肘。「414 串联会」以「三七战团」为核心力量，「三七战团」的各个战斗组也不会分裂。「414 串联会」尽管无法对清华的文革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必定能在两极之间起到缓冲、平衡、调节的第三方力量的作用。

果真如此，革委会是成立还是流产，虽然也很难说，估计如期成立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两派三方的争斗局面将更为复杂，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今后实现大联合会相对容易一些，大武斗的几率也要小得多。

遗憾的是，我在当时复杂纷乱的政治局面中想不出两全之策，在《四项协议》的谈判中又被谢富治一逼一激，失去了理智的判断，情绪上表现得比沈如槐更为激烈，一根筋似的，非得在彻底分裂这条道上走到黑了。

分裂造成严重的后果

1、两派的对抗形式从一个群众组织内部的派别之争变成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恶斗。从主要是政治观点的分歧扩大到组织上的分裂。统一的「清华井冈山」劈成两大块，形成两“虎”共存清华“园”的割据局面。

2、在政治观点上的争论依旧存在，但是被弱化，派性色彩被增强、被放大，派别利益成为两派言论和行动的主要考量。

3、许多本来不存在派别色彩也无派别利益的工作，如拥军、夏收、复课、甚至到机场欢迎中央首长等等活动，都因两派的对立而无法统一组织，最后只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只在 1967 年 9 月后一段时间，两派以「联合总部」的名义统一组织过这类活动）

4、以后虽然有过两次大联合的机会，甚至组成了「联合总部」，但因为两个组织的联合远比一个组织内两个派别的联合要困难得多。这两次能让清华两派免于灭顶之灾的自我救赎机会就这样无功丧失了。

5、两个派别组织之间的武斗可能性远大于一个组织内部两个派别发生武斗的可能性。分裂不见得肯定会导致武斗，但是分裂行为朝着打开武斗大门跨出了一大步，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不分裂的话，百日大武斗极有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舞台这样的事件即使要发生也不见得一定以流血的形式。

6、分裂更促进极端思想的膨胀，极端事件的频发，极端势力的增强。鸽派的

影响和发言权逐步丧失，被鹰派所取代。两派的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互相刺激，互为因果。一个错误后面引发一个更大的错误。

7、因为两派的分裂，广大的中间群众被迫要在团四之间做出选择，造成了中间群众的彻底分化。同时，不少持 414 观点、不满意团派极左思潮、但也不同意 414 分裂行为的中间群众，不得不留在团派阵营或者游离在不团不四的中间地带，实际上削弱了抵制极左思潮的力量。这是十分痛心的。譬如，作为「414 串联会」代表之一参加「四项协议」谈判的王良生在 414 总部成立以后不久退回到团派。

414 分裂造成中间群众被硬生生地撕裂的严重后果，也造成了「三七战团」一些战斗组的严重分裂。

原属「28 团」的那些战斗组，是团派的骨干力量，几乎没有反水参加 414 的。同样，「东方红战团」的那些战斗组，也几乎没有反水去团派的。「三七战团」可就惨了。因为「三七战团」的战斗组，既有原来属于「井冈山红卫兵」的，也有原来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既有团派观点的，也有 414 观点的。现在，我和汲鹏及「三七战团」的主要骨干都决心参加 414 总部，走分裂的路，但是还有小一半的成员，他们或者是持有团派观点，或者是不愿意在组织上分裂，于是他们就离「三七战团」而去，留在兵团总部。

「三七战团」中，以我领导的「第一湘江」所受分裂的伤害可谓是惨不忍睹。「第一湘江」组建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蒯派，后来人员有进有出，蒯派还是占多数。在 414 总部成立之前，随着纵队派与兵团总部的论战，组内两种不同的观点分歧也越来越大，但彼此还能共存于一组，即使发起「414 串联会」也没发生分裂。后来，当我决定要跟着 414 总部独立出去，那些团派观点的和不愿组织分裂的组员，有一半多不愿跟我走。其中有一个组员，在大礼堂的大会上对我反戈一击，团派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的行为造成了「井冈山兵团」的组织分裂，我的行为也造成了「第一湘江」的组织分裂。这是报应，我是自食其果。

当然，414 成立总部并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414 破釜沉舟的绝地反击导致“团记”革委会的流产，是对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的沉重打击，也显示了温和造反派势力的顽强存在。但是，此后的事实证明，414 分裂弊大于利。严重的分裂后果，说明分裂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团派对分裂也有一定的责任

蒯大富一直很懊悔是他最后决定“推迟成立革委会”的[10]。其实，要是当时强行成立了革委会，清华这个乱局如何收场，谁也不好说。我认为，蒯大富把成立清华革委会作为那一阶段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总部承认 414 是合法组织，并愿意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也是它改正错误的意愿表示。「革筹小组」中团四的比例为 9:4，这也是总部需要说服内部的强硬派，是做了点让步姿态的。

但是，蒯大富在好几个关键点上，没有处理好，以致使得成立革委会的极大努力功亏一篑。

1、蒯大富一开始就对团四矛盾的性质定位错了，政策也错了。他一直认为414是代表右倾势力、保守势力、复辟势力的，是来向「井冈山」夺权的，所以他一直对414采取高压政策，竭力打压。后来，为了成立革委会，他不得不承认「414串联会」。出于功利目的的承认，赢不来414的“感恩”。要是他能够站得更高些，站在团四两派之上，把团派与414派的分歧看成是造反派内部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那么他自己就站到制高点、制胜点上了。

2、对于《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如果蒯大富能表示出善意和大度，主动地，或者在我们提出以后表示愿意加上“正确”两个字，那么这样的《四项协议》是可以为414所接受的，起码不会引起强烈的反弹。都说细节决定成败。细节不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总体方向。在革委会这件大事上，在我看来，加不加“正确”两个字是一个细节，但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重大的细节。谢富治的工作作风比较简单粗暴，蒯大富只图看到414被动的一时痛快，于是，这“正确”两个字就成为断送革委会成立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3、《四项协议》签订以后，蒯大富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已经争得了先机，已经看到了革委会成立的曙光，在与414的争斗中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优势。这个时候，蒯大富应当约束团派，特别是约束团派中的强硬派，为了成立革委会这一大局，停止对414进行新的攻击，刹住对414候选人的搞臭风，对414尽量表现出和解、友善的态度，为革委会的成立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可惜，蒯大富没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

4、蒯大富不仅对「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严厉打击，对我、汲鹏、王良生这些在414中比较温和的人士也统统采取“先搞臭再进来”的手段，这在「三七战团」和广大的414中间群众中是大失人心的。

所以，「井冈山兵团」的最终分裂，革委会的最终流产，团派也犯了不少错误，也有部分责任的。团派不是有意识地拉着不让414分裂，而是客观上推着414走向分裂。

不懂得妥协和包容只能是两败俱伤

实事求是地说，在414里，看不惯蒯大富掌权，一直想与「井冈山」分庭抗礼，或者伺机想夺「井冈山」的权，这样的势力是客观存在的。414本身想分裂的倾向也是存在的。团派强行成立革委会只是为这一分裂倾向提供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和借口。

从1967年三四月份「414串联会」酝酿、成立到1968年七八月份414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年多时间里，414总部成立这件事是414策划得最周密也是最成功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战役414完胜，团派完败。

414 的完胜，其实也只是这一个回合的胜利。从长远看，414 的这个胜利，换回来的是开始了更加艰难困苦的历程，也为两派的同归于尽埋下了伏笔。

团派的完败必然引起团派对 414 更大的怨恨和更强烈的报复。这一派的错误的后面总是跟随着另一派更大的错误。

团派和 414 都不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让步和妥协是必要的，不懂得在争取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要从对方的角度想想并照顾对方关切的利益，不懂得一方全胜一方全败的结果只能导向下一次更强烈的对抗并且两败俱伤。

“寸步不让”只是表示一种坚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只是表达一种精神。在具体实施中，不能那么古板、死硬、教条的。不懂得妥协，就不会双赢。只想着对抗，必然是零和的结局。

在两派争斗中，团派一直处于强势地位，是主流派，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但是，最后要不要分裂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 414 手里。我们对《四项协议》的态度和应对是错误的，对局势的判断和估量是错误的，对最后的抉择和行动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决策最终造成了两派的彻底分裂。在一年多 414 所犯的众多错误中，分裂是其中最严重最大的错误。因为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错误。

承认这个错误对我来说是痛苦和艰难的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重大的政治决断，也是一次最无私最勇敢的政治抉择。我们抵制了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的图谋并最终让它流产。414 再次遏制了极左路线在清华园的肆行。我为此自豪，也自我陶醉。

我的一生中，能称得上政治决断的大事并不多。我的个性一直是比较胆小的，也有点瞻前顾后。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可以依靠和指引，有些比较重要的选择只能由自己判断决定。从开始只影响我本人的决定，到影响一个战斗组的决定，然后是影响一个纵队的决定。要不要分裂，则是影响几千人的前程，影响 414 命运的决定。这是我一生中到那个时候最重大的决定。此后的几十年中，也没有再有过这样重大的类似决定。

这也是我最无私最勇敢的政治抉择。我并没有想在革委会里捞一个席位而留在兵团总部，我也没有因为分裂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害怕分裂。

对于这样一个对我来说最重大最无私最勇敢的决断，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是基本正确的，认为「井冈山兵团」分裂的主要责任在团派。

在我撰写这本回忆录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反复地重新审视我自己：在这件大事上，我做的对不对？应该怎么做才对？我应负多大的责任？

要否定一件自认为在个人历史上最重大最无私最勇敢也基本正确的政治决断，是很痛苦的，也是很艰难的。

痛苦在于要承认错误，要自我否定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这段历史。而这一错误，我是要负第一位责任的。因为我作为主外的「414 串联会」主要负责人撕毁了亲

手签署的《四项协议》；因为我提议并说服「414 串联会」勤务组实施了最激进的分裂方案。

艰难在于 414 的头头中还没有人这样说过。看过初稿的许多老四朋友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这虽然是我个人的认识，但是必定会影响或伤害很多老四朋友的感情。我在此先道一声歉意！

永远记住 530

在清华文革初期这段历史中，有好几个日子是有重要意义的。对老团来说，1966 年的 6.24 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老四来说，1967 年的 4.14 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现在老团老四纪念这些日子，已经没有派性的含义，只是为了当年结下的友谊。以这些日子为由，老团老四在一起，大家聚一聚，会一会，聊聊旧时，回忆当年，把盏谈笑，不亦乐乎。

但是，最值得纪念的并非是这些日子。是哪个呢？

对于清华人，尤其是经历文革初期的清华人，我认为 5.30 是一个更值得永志不忘的纪念日。

1967 年的 5.30，团派全力以赴冲击“清华大学革委会”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其教训难道不值得当年的老团们深思和汲取吗？

1967 年的 5.30，414 沉浸在 414 总部成立和“团记”革委会流产的巨大胜利中，根本没想到自己犯下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其教训难道不值得当年的老四们深思和汲取吗？

1968 年的 5.30，团四两派发生了百日武斗中最血腥的一场大武斗，双方都有同学倒在血泊之中。这一天，可以说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暴力的一天，是清华的校耻日。为什么在堂堂的高等学府，文质彬彬的莘莘学子们竟会发生这样惨烈的厮杀？其教训难道不值得当年的老团老四们深思和汲取吗？

所以，5.30 是一个值得团四两派共同纪念的日子。

我们这些亲历者要铭记 5.30。我希望所有的新清华人也都能铭记 5.30。在清华今后的历史上，永远不要再出现这样的 5.30！

6. 一贯地自觉地顽强地抵制批判极左思潮是 414 最大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一场社会动乱，执行的是一条左倾错误路线。它的一个显著表现是极左思潮和极左言行横行天下，呼啸肆虐，神州大地无一处能幸免。团派对文革理论领会最深刻，对文革路线紧跟最坚决，因此，思想言行上也表现得最极左。414 对团派极左思潮极左言行的抵制和批判，客观上是对毛泽东推行的极左路线、本质上是对中央文革鼓吹的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批判。414 的抵制和批判，从头头到群众，是自觉的、一

贯的、也是顽强的。这是 414 一年多的生存期中最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功绩。

都说 414 是保守的，它的“保”主要体现在对十七年的过多肯定上，也体现在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批判上。都说团派是激进的，它的“革”主要体现在彻底砸烂上，也体现在对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上。414 从上到下一贯地、自觉地、顽强地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甚至连高高在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都感觉到了。这当然是因为蒯大富能通天把两派的争论上达天庭的缘故。毛泽东在七二八的召见谈话中，他毫不掩饰对 414 的反感，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蒯大富是偏左的”。这是 414 强烈抵制极左思潮的有利佐证。

但是，因为 414 同样也是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努力紧跟文革路线的，所以 414 也同样受极左思潮的浸润，有极左的表现，犯极左的错误。只是，在程度上，414 远不如团派信奉得那么真，紧跟得那么紧。也就是说，414 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批判是不彻底的，并且带有浓厚的派性色彩。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团派对极左思潮起着推波助澜有时甚至是引领潮流的作用，而 414 的极左表现往往是被极左思潮裹挟侵蚀的结果。

414 抵制批判极左思潮，并没有认识到左倾路线是极左思潮的根源，并没有否定文革，并没有对毛泽东以及政治体制有过一点非议。所以，过高地评价 414 的历史功绩，同样也是不合适的。

第二节 关于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我的再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当年团派就是以此将“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罪名强扣到 414 的头上，而 414 则是极力加以否认，认为自己并没有否定文革、反对文革，而是衷心拥护文革的。现在，文革真的已经被否定了，于是，曾有以“毛泽东的反对派”自居的朋友，沾沾自喜地高调承认 414 当时就是自觉否定文革的，或者认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就是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

我认为，在文革中，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敢于公开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414 要是敢于公开否定文革、反对文革，连几十人的人马都拉不起来，更遑论七千多人的队伍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 414 核心都是真心拥护文革的，414 从上到下，主观上从来就没有否定文革的想法，客观上也没有反对文革的行动。谁要是这样想这样做，不仅文革大环境容不下他，414 这个群体也容不了他。414 提出“红线主导”论的本意，也是在拥护文革的大前提下，让文革进行得更健康、更顺利、更有利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

但是，从“红线主导”论确实能引伸、推导出对打倒绝大多数干部的改朝换

代式的暴力文革必要性的否定。这就是毛泽东反感四一四思潮的重要原因，也是团派攻击 414 右倾保守的着力点。尽管这与否定文革还相距甚远，我在当时也感觉到这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软肋。

相比较团派所信奉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对文革必要性的否定也是隐含的、浅表的。

414 早就消亡了，四一四思潮也早就是一个历史称谓了。但是，曾经是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红线主导”论，在文革以后确实得到了重新肯定。因为，对文革的否定，自然地就是对十七年的肯定。现在的主流说法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一直是红色的，并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路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一直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也就是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一直是红线为主导的。

于是，有一些老四，暗中窃喜，认为肯定十七年红线主导就是证明四一四思潮是基本正确的。四一四思潮真的必胜了。

这感觉是对的，也是不对的。

说时对的，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都重新上台了。国家机器、政权体制都照旧一如文革前。对他们来说，肯定十七年，就是肯定自己，所以，必然是肯定“红线主导”的。站在这一立场上看问题，就会感觉四一四思潮是基本正确的，“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全国都是如此。”[17-P244]

说是不对的，那是我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线主导”论。

经过文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回过头再看看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承认，确实是毛泽东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只是要补充一句极其重要的话：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占着统治地位，是红线主导（如果把毛泽东主导的路线叫做“红线”的话），但不是正确路线主导。

反右斗争，硬是打出了几百万右派分子，把中国社会中最敢于讲真话的知识精英打没了，把中国的脊梁骨打断了。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把中国的社会搞得一团糟。之后的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了几千万人，就是“三面红旗”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恶果。

对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把党内一批不同意见的健康力量斗没了。

1962 年后，刚刚从大饥荒中恢复了一点生气的中国马上又开始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穷折腾，再次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414 鼓吹的“红线主导”论，立论依据就是这些毛泽东领导的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运动都是正确的。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政治运动都是错误的。文革前的十几年，一直是在左倾理论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左倾路线在主导。由此，所谓“红

线主导”论也是错误的。四一四思潮是以“红线主导”论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因此，四一四思潮基本上（并不是全部）也是错误的。

从这意义上说，我这个曾经是四一四思潮的鼓吹者、信奉者，今天我是四一四思潮“红线主导”论的否定者、批判者。

但是我也不是全盘彻底否定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中还是有合理的内核，那就是体现了那个时候普通民众“人心向善，民心思安”的诉求：经过了近一年的暴力文革，人们已经开始厌烦文革，只求对待广大的基层、中层干部宽厚点，早点解放他们，早点转入“斗批改”，文革早点结束，社会早点安定，生产生活秩序早点恢复。

团派有团派思潮吗？团派自己好像没有正式提过“团派思潮”的概念。团派始终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不着再标新立异提团派思潮。而 414 则简单认为团派思潮就是极左思潮。

我现在认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力强大的团派，也是有团派思潮的。应该承认，团派思潮中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确实是极左思潮。

我记得团派的一位核心头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团派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彻底砸烂”！所以，用“彻底砸烂”作为团派最核心最基础的观点，是贴切的。即使就如毛泽东所辩称的“你们（团派）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13-P373] 那么，“砸烂一小撮坏人”依然是极左的错误口号。

但是，简单地把团派思潮等同于极左思潮也是不合适的。在团派思潮中还有一部分是：在连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人为产生的差质群体，总体上是一群有独特个性、有独立思想的人。可是他们在十七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压和歧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因而他们对十七年来不公正待遇是严重不满的。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和社会地位，通过文革的大变革，不再做一个继续受人欺负、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还有一部分团派群众敏锐地察觉到这个体制下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城乡矛盾等），他们对此表示严重的担忧。他们对社会尤其是对教育的阴暗面有大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们希望各种社会矛盾能得到缓解，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所以，我认为，团派思潮中同样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这就是“追求社会变革、呼唤公平正义”的诉求。可叹的是，他们以“砸烂一切”的手段来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最终显现的结果与其初衷南辕北辙。他们不仅未能得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反而蒙受全面专政的更大压力。

当我们抛弃派性的残余思维，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探究最普通的老团老四的内心需求，曾经的团派思潮和四一四思潮，不管多少，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团派观点激进却富有批判精神，414 态度温和但思想比较守旧。他们之中都有可

取的也有应该扬弃的部分。当年，团四两派追求、捍卫各自思潮中的合理成分，表达正当诉求，这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整个社会环境是法治的、民主的、宽松的、包容的，那么两派理解、认同对方正确的观点，兼顾彼此合理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下，双方顽强捍卫各自的正确观点，拼死追求各自的合理利益，从开始时候的口诛笔伐，最后演变成兵戎相见。这是清华两派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文革后，“红线主导”论胜利了，提出并信奉四一四思潮的414派却被否定了。这是历史老人对414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尴尬而苦涩。

414派是保守造反派，即思想保守而行为造反，被否定了。团派是激进造反派，行为造反而且思想激进，他们被否定得更为不堪。

笑得最后的是那个被造反派嘲笑并打得落花流水的「八九」派。他们（严格地说，应该是他们中的“红色贵族”们）奉行血统论，革命目标直接明了：保爹保妈。虽然他们并没有靠自己的力量保住爹妈，还是被打倒了。但是造反派的激进极左，不仅为造反派自己的垮台自掘坟墓，也为走资派的东山再起打下伏笔。“爹妈”们一旦重掌大权，立即整肃激进造反派，遗弃保守造反派，为他们的官二代上位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不仅“龙生龙子”，更要“龙传龙位”。

大结局似乎如唐伟一针见血所言的“‘红色贵族’万岁”。¹不过，严酷的社会现实能否让这些“红色贵族”们过上“百岁”是很难说的。

当今的社会，存在着各种派别的斗争，存在着各种思潮的冲突。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民众的福祉，但愿现时的人们汲取我们的沉痛教训，和平对话，求同存异，找到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的富民强国、民主法治之路！

第三节 否定文革，我的一孔之见

文革历时十年，终于落下大幕。

把文革看成仅仅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是不全面的。把文革看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之斗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之间既有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上的矛盾（当时叫路线斗争），也有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手握大权才能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治国的成就才能证明路线的正确和权力的合法性。

当毛泽东感到他的权力正在被政治对手一点点地销蚀，他的治国方略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他无视几亿民众的死活发动文革，不惜把中华民族拖入一场历史浩劫。

¹ 见收录在本书中的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

当刘少奇的治国方略被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他的地盘（如彭真把持的北京市）被攻占，他就毫不犹豫地派出工作组，把那么多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把烧向他的妖火引向基层。

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口口声声都说是为人民、为群众的。是的，他们也曾经为民众做过好事。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党的利益永远是高于民众利益之的。当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党的利益开展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早就忘记了民众。那时，民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支打击政治对手的矛，一个护卫政治利益的盾！

对文革如何评判，十三亿中国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种各不相同的回答，从彻底否定到全盘肯定，从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各种声音都有。我相信，饱受文革之苦之害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会选择否定文革这一正确结论的。

官方对文革的定性，最权威的文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里提了否定文革。

2011年1月正式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据主管二卷编撰和修改的中共党史研究室负责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这是官方对文革最新最权威的提法。

既然文革是应该被彻底否定的，为什么又把文革研究列为敏感话题，划为禁区呢？要知道，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官方的这一态度，使得文革的罪恶没有彻底的清算和系统的批判，文革的遗产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和严肃的甄别，文革的根源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深刻的反思。对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大浩劫竟然采取如此轻视漠视的态度，是对民众对历史的极不负责！

事实上，在赞成否定文革的这一阵营中，哪些该否定，哪些不该否定，哪些该否定的没有被否定，哪些不该否定的被否定了，这些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同样是彻底否定文革，官方所说的“彻底否定”与民间所说的“彻底否定”，也是大相径庭的。

我认为，文革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引下，错误的判断政治形势，采用错误的方针政策发动的一场错误的大革命；文革发动者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领导了文革，他对文革错误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文革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文革最根本的起因，是一党极权造成的。所以，从这些最根本的方面讲，文革是应该彻底否定的。

但是，官方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仅仅是因为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仅是因为文革不该打倒“走资派”。他们把文革的责任几乎全部都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及他们痛恨的造反派。他们只是有限地承认党和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不敢承认建国后特别是五七年以后是左倾路线在统治全党，在祸害中国。这些，都是应该否定的，他们竭力回避。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把亿万民众推入文革大潮，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并非

是文革发动者初衷所求的，但确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确实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一些东西，这些是官方所害怕的，因而被他们有意识地“彻底否定”掉了。

我举亲历的三个例子：

1. 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在文革之前，经过反右、“三面红旗”、学“九评”、参加“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洗礼”，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深深刻下了“反党就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样的烙印。什么叫反党？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异议的，对党有不满有牢骚的，甚至对基层的某个党组织有不同意见的，与党的某个基层领导有争执的，都可能上纲成对党的攻击，都可被视为反党。许多右派分子所谓的反党言论也就是这些，或者比这还轻微得多。

在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成为保卫党的具体体现。大多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校党委是不能怀疑的，蒋南翔是不能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到十天，校党委和蒋南翔这样的庞然大物一夜间就倒塌了。这对我禁锢的僵化的思想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一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的倒台，让我懂得了反对基层党组织和负责人与反党是不能划等号的。

后来北京市新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北京市新市委是刚刚对彭真的旧北京市委改组后新鲜出炉的，这应该是可靠的可信的上级党组织了吧？没想到它派来的工作组也会犯错误，而且是犯了很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对我禁锢的僵化的思想来了一次更大的冲击。我进一步懂得了，即使反对来头很硬的、自称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组，也是不能与反党划等号的。

尽管此前曾有北京市委烂掉了、北大党委烂掉了这样的先例，但是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更为巨大和震撼的。

那么多反蒋反校党委的人，因为蒋南翔的迅速倒台而平安无事。那么多反工作组的蒯派最后都咸鱼翻身，成了造反有理的革命左派。而这些人要是放在1957年，都是些货真价实的十恶不赦的极右分子。

文革前一直进行党化教育，一直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党的高层，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强调“造反有理”了呢？那是因为文革的发动者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必须适度开放过去的禁区以发动民众运动群众以纠集炮灰。在文革之前，执政者需要禁锢民众的思想以稳定政权。文革之初，刘少奇为了自保而抛出蒋南翔，毛泽东为了扳倒刘少奇而否定工作组，这一切在客观上起到了民众禁锢的思想被适度开禁的效果。对于政治领袖而言，他们从来不愿看到民众思想的真正解放，不愿看到民众站着造反，不愿民众拥有民主的权利。但是在特殊时期，思想解放（形式是“四大”自由）是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使用一下的。需要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放松民众的思想控制，目的达到以后需要天下大治了，再收回放松的自由，禁锢民众的思想。

文革初的思想解放也是有范围的被限制在某一框框里的。无论哪级党政组织，无论哪个显赫的大人物，都可以怀疑，都可能被打倒，但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是绝对不允许被怀疑的。谁要是敢于怀疑，敢于反对，依然是反党反革命的罪名，用《公安六条》¹镇压你，丝毫都不会手软的。

文革初期一次次的思想冲击对我而言是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尽管这种思想解放是极不彻底的，非常有限度的，但是，相对于原来完全禁锢的思想，此时犹如蚕茧破壳、东方破晓。

当时有一个“怀疑一切”的口号，它虽然带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对于突破思想禁锢、开启思想解放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从原来的什么都不敢怀疑到“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显然是个进步。于是，蒯派们敢于怀疑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于是，414也敢于对抗有中央文革支持的团派。所以，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全民也是如此。当然，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相比较，思想解放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样的思想解放并非是文革发动者的初衷。毛泽东所需要的民众始终只是崇拜他的盲民。“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党”就是他在五七年反右后留给民众的警示，是一根不能触及的高压线。文革中，他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跟随刘少奇的干部基础，他动用了“四大”武器这一民主手段。而这一过程中，“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党”的禁区突破了，这一点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更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无法避免的。在文革发动者的本意之外，文革在进行的过程中给民众的思想启示，归根结底，是民众在黑暗中的反复求索，是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是传统思想的层层突破，是混沌状态的最初启蒙。

2. 清华两派争斗的非消极意义。

说到文革中清华两派的恶斗，没有人不反感的。揭老底、上纲上线、抢话筒、造谣诽谤、恶意攻击、抄家关押、非法绑架、直至真刀真枪的血腥武斗。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没有法治的两派争斗是暴民政治。

尽管两派恶性争斗有一百个不是，是不是一无是处了呢？我认为起码有两点是可资借鉴的：

一是因为有了两派，为了派别的生存和与另一派的搏斗，对派头头的监督是群众性的。譬如，我作为414的头头，不仅时时处于团派群众批判性的监督之下，也时时处于414群众批评性的监督之下。头头们的一言一行，关乎着本派群众的利益。我在《四项协议》问题上，沈如槐在《必胜》问题上，都被414群众批评过、炮轰过，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头头，我们尽力克服私心，尽力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愿望。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基本觉悟和自律，更重要的原因

¹ 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

是两派争斗的现实，即两派共存互斗的体制逼着头头们只能这样做。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团派与414派，绝大多数头头都是一心为“公”的（派性意义上的“公”），极少私心，极少“官气”，努力“革命”，不敢懈怠的。可以说，当年团四两派头头的个人操行，总体而言比现在那些官僚们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这与两派互相监督的机制是很有关系的。

二是清华每个师生选择哪个派是完全自由的。选择的动机原因各有不同，但是都出于自愿。对两派都不满意的，可以选择逍遥。对本派不满意的，可以大声表示反对，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可以造反。即使跑到对立面那派去，也无权干涉。解放十七年来，学生的思想在这方寸之地有限空间里从来没有这样活跃过、自由过，充分尊重了个人的意愿。

这说明，在文革初期两派共生也好，大民主也好，群众监督也好，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文革的这段实践，为今后如何开展良性的党派竞争、为如何正确使用民主权利、为民众监督执政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教训。蒯大富反思说，“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10]文革前，没有民主，暴政为主。文革初期，大民主了，没有法制，于是暴民为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基础上的法制与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3. 民众的民主权利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干群对立。但是他把这些社会矛盾错误地扩大、上升成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敌我矛盾。他想自下而上地用大民主的方法向走资派夺权。这是文革的主线和主流。

文革前的十七年，连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在社会上不断地制造新的差质群体。再加上一党极权的体制，所以官僚主义、强迫作风、多吃多占等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官民矛盾、干群对立、社会冲突中弱势的一方，被毛泽东鼓动起来以后，利用文革的大好时机，运用“四大”武器，向着曾经压迫他们的干部和基层组织斗争，争取他们的权利和权益。对干部漫无法纪的残酷批斗当然是极其错误的，但可以发现，越是官民矛盾尖锐、民怨越多的地方，民愤就越大，干部所受到的冲击越厉害，民众争取自己权益的思想也越觉醒。清华是如此，社会上也是如此。

庄严的宪法保障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是这些都是条文上说说的，并没真正实行。除了共产党、共青团等政治团体和学生会、文艺社团等非政治团体以外，结社是被禁止的。谁要求组织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必定被当做反革命的反动的团体被取缔。在文革中，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允许大大小小的红卫兵、战斗队、纵队、串联会、兵团等政治团体存在。这些团体自愿结合，参加

自愿，退出自由。民众有了结社的民主权利，就有了表达意见的阵地，就有了显示力量的平台。民众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单体，而是形成了有政治诉求的群体。

所以，只要给予民众以民主的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民众在官民关系上、干群关系上就不再是绝对弱势的一方。民主和法制，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那只“铁笼子”。

我列举的三点，我不认为那点思想解放有多深远的意义，那仅仅是禁锢的思想牢笼里的一丝微光。我不认为两派互相制约监督有多大的实际作用，那仅仅是没有法制的用于两派恶战的派性手段。我不认为那点民主权利就是我所追求的法治下的民主，那依旧是专制下的不平等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在文革历史上这点微小的积极意义也是应当肯定的。针对当今的中国，是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的。而历史的进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积累的。

否定文革，即否定文革产生的根源，否定发动文革的动机，否定文革过程中目无法纪，侵犯人权的种种野蛮，否定文革造成历史大倒退的种种恶果。否定文革，与那些要肯定文革的思潮划清了界线，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至于是彻底否定还是根本否定，是全盘否定还是基本否定，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并不是原则的差别，本质的差别。我们究竟应该否定文革的什么？到今天还有哪些该否定的还没有被否定？文革中出现的某些事物有没有借鉴作用？文革会不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诸如等等，对今天的我们可能是更关键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既要否定文革，更要反思文革。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民众的视角，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维度对文革进行深入细致的深度剖析，扬弃文革路线、文革思维、文革做派、文革文化等，汲取沉痛的教训和有益的借鉴，那样才能真正避免类似文革的大劫难以及暴力“革命”在中国重演。

第四节 拷问良知， 每个国民和执政党都应认真做的功课

当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篇社论的时候，我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无法想象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灵魂究竟是怎么样一个触及法。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才深深体会到了文革确实触及了灵魂，结果是有污染的灵魂，有出卖的灵魂，也有升华的灵魂，甚至连同肉体一起被消灭的灵魂。

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统统革了命。对灵魂和天理也是一场“革命”：真善美颠覆，

道德沉沦，良知泯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被鄙视、被唾弃，不知耻、不知愧、不知恩的勾当大行其道。

当然，我们看到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以生命为代价反抗文革的志士仁人。只是，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们也看到过那些帮助、搭救落难的、无助的好心人。只是，这样的行善好事只能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做，也不是经常都有。

我们倒是看到了太多的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太多的检举揭发、落井下石，太多的唱赞歌、表忠心，太多的整人与被整、人人自危和自保不暇。

乾坤颠倒了，人妖颠倒了，黑白也颠倒了。

我已经讲过，清华团四两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观点分歧和群体利益矛盾。作为个人而言，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除了受政治观点、派别利益的影响外，还受道德和良知的驱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反人性的、反人伦的邪恶学说。当一个人坚奉这个革命理论、深受这一理论毒害的时候，那么他的良心就变黑变坏了。

在百日大武斗中有好多师生死亡伤残，他们是最惨重最无辜的受害者。其中尤以孙华栋、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的冤死更令人无比痛惜！

没有参加武斗的孙华栋是在夜晚骑车经过一教被抓后活活打死的。朱玉生是深夜在科学馆外值班放哨时被闻亭上的暗哨开枪射杀的。杨志军是在科学馆内瞭望时被冷枪射杀的。杨树立是土坦克从动农馆返回焊接馆途中被二校门西南角小山包地堡里射出的冷枪射杀的。钱萍华是从苏州老家返校时在主楼广场被9003大楼射过来的冷枪射杀的。

这几位死难者，在他们被打死或射杀之前，没有对包括凶手在内的任何人构成任何威胁，更别说是致命的、不得不采取本能防卫的威胁了。当这些凶手把一个健壮的大活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当瞄准器里的十字星套住远方的目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这些凶手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抱着对伟大领袖无比的热爱，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才这么下手的？他们就没想过这一鞭子打下去，这一颗子弹射出去，马上会要了一条鲜活的人命？

在犯下罪行的那一刻，他们的良知完全泯灭了，他们的道德完全沦丧了。

再说一件在百日武斗中的往事。5.30大战中，防守东区浴室的人员是414电机系分部的，其中有我熟识的好几个朋友。他们当时是可以一直坚持到天黑的。但是为了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一名老四得到及时救治而不得不向老团集体投降。我对他们的这一抉择表示由衷的敬意和钦佩！人性终于战胜了派性！我知道，在那个崇尚宁死不屈的年代，他们当时要作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艰难，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他们事后被部分老四责怪，身心备受煎熬。几十年以后，他们的这一无畏而明智的举动受到大家的一致赞誉！历史，最终都会肯定真、善、美的！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补充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防守浴室的老四向老团集体投降成了俘虏以后，曾经遭到个别老团及外校人员的殴打。看到这一场景的许多老团公开表示气愤和谴责。武斗期间，有些老团听闻无辜射杀同学的事情后就不再参加武斗以示抗议。这些有良知的团派朋友，我同样给以称赞和敬意！

在 1968 年的 7 月初，“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者，格杀勿论。”[1-P387] 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三人都是在这之后被“格杀”的。我心想，如果蒯大富不是发布“格杀勿论”这种大开杀戒的通令，而是发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射杀武斗人员，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这样强硬的约束通令，我会说，这样的一纸通令将抵过蒯大富的千错万错而为后人翘指称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革中两派争论激辩的那些所谓对立的政治观点，其实大前提都是错误的，不值得再提的。最值得记忆的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那一刻，最痛彻心腑的是丧尽天良的那一瞬。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文革中，几乎每个人都犯过或大或小的过错，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犯罪。犯罪的是极少数人。罪与错的最后分野不只是在法理上，更是在人性上，在良知上：你有没有为了表示“革命的义愤”而拿着皮鞭毒打老师、同学和干部？你有没有为了自保而诬陷他人？你有没有挺着尖尖的斜口长矛刺向对手的要害？你有没有举着带有瞄准器的步枪射出罪恶的子弹？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是突破了道德的最底线，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知。即使你逃过了恢恢天网苟延残喘着，你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永不安宁！

良知完全泯灭的，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得不承认，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中，或多或少，良知都蒙尘了。

我的良知也有蒙尘的时候。

在文革期间，我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犯过的错误不少。其中有一些错误，于我来说确实是无法避免的。譬如，批判刘少奇、批斗王光美、批判走资派，等等，当时的觉悟就这么一点，认识不到这是错的。还有出于派性利益那种上纲上线、攻击谩骂、说谎隐瞒等等，当然都是错误，也是有悖于良知的。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为了入党，为了今后前途的私利，明知不应该做，最后还是做了深感羞愧的错事。那一刻，我的良知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做过错事以后，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拷问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往的错误，不断地在反省追悔。虽然我做得很初步，认识得也很肤浅，但是我是真诚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我只是想在我离世之前拂尘涤污，质本洁来还洁去。告知后人们，良心账是一定要加倍偿还的，有时候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有人选择痛苦地反省，有人选择快乐地遗忘。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在道德的层面上，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检讨自己的错误，

拷问自己的良知。愿不愿意拷问，全取决于自己。愿意拷问的，即使很痛苦，也会发自内心的去做。

但是，我认为，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良知蒙尘的时候。所以，不论以什么形式什么方法，认真地扪心自问想一想，反思一下，拷问一下，可能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我看过一些文革回忆录。有的写得很好，很有史料价值，也很有思想深度。但是也有一些回忆录，或者隐恶扬善（只讲自己好的、对的、被人整的，不讲自己错的、恶的、整别人的），或者推诿责任（都是因为跟着伟大领袖犯错误，受林彪、四人帮蒙蔽），或者有意无意间地涂抹历史、美化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在身后留一个好名声。这样做，实在背离了回忆录的真义。

拷问良知，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做的功课。

为什么在强权和暴力面前我们往往忍气吞声以阿Q精神安慰自己而不敢据理抗争？为什么在面临危险受到威胁时我们总把伤害转嫁到更弱势的群体？为什么我们总是心里想的与嘴上说的不一致表那种言不由衷的态度？为什么人人都气愤社会的道德滑坡而真当该出手该出面的时候却做了缩头乌龟？……

拷问的主要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

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在某一时刻良知蒙尘，可能是很难免的。这并不可怕。因为还有机会补救，还有能力拂去灰尘，重现人性的光辉。所以，一个伟大的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心智健全高素质的国民，并非是绝对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在反思后避免再犯同类的错误。

拷问良知，更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做的功课。

为什么曾经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在执政以后却视民主宪政为洪水猛兽？为什么过去鼓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反饥饿反内战而现在却站在青年学生的对立面上反官倒反贪腐的他们开枪？为什么不敢公布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真相不敢承认反右就是反错了而不是令世人嗤笑的“扩大化”问题？为什么要把一党私利置于国家民众之上并把全社会的资源攫为己有？……

拷问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政党。

建党九十年来，建国六十年来，只讲光荣伟大正确，只讲莺歌燕舞，不检讨所犯的重大错误，不向被伤害的国民谢罪。从建国以来前三十年的政治挂帅，到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导致社会道德底线全面失守，这样严重的恶果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丧失是有密切关联的。

为什么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和良知的缺损？我认为多年来一贯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很重要的原因。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如一张白纸。知识、道德、品行、良知等等，都是后天培育积淀的。家庭、环境、教育，都是重要的环节。就我的体会，对我的品行、操守、

人格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是纯朴的乡风民俗的濡染，是小学和初中这段政治内容不多的心智启蒙教育。后来从高中到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教育、党史教育以及形式繁多的运动、活动这类德育教育，不能说全部都是垃圾，也是无益甚至有害的居多。

执政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就是把学校当做它属下的一个衙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就是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把教育视作它的私产和统治工具。所谓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就是培养一批听话出活的良民、顺民。而国民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善良、正直、友爱、正义、诚实、勇敢、信义、守法、孝心、知耻、独立思考这些最基本的品德和精神的现代公民。在学校里，进行无休止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以政治辅导员制度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所培养的青年学生必然是心智不全的、只听命于领袖和政党的文革炮灰。

权力不受有效制约和监督的一党极权体制，必然导致贪腐丛生，导致社会不公，也导致政治伦理的丧失。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造成社会道德滑坡和良知缺损的更重要原因。

中国现今社会的痼疾多多。中国的进步不仅需要包括教育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公民责任意识，需要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价值观体系。然而，一党极权的体制却在不断地在继续强化灌输党文化，不断地抑制公民意识的觉醒，不断地在摧毁人性道德价值观念。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社会痼疾固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要是不切实进行积极有效的、渐进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想解决种种社会痼疾是万万不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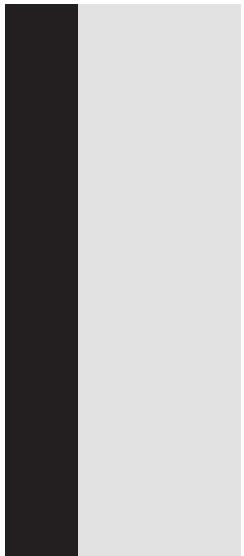
2007年8月2日 动笔

2011年12月30日 完成征求意见稿

2013年1月24日 终稿 于杭州

主要参考文献

1.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2. 周泉瀛：《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银河出版社，2006年版。
3. 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 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
4.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版。
5. 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6.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7.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
8. 卜伟华：《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2010年2月3日。
9.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四四七）。
10. 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11. 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
12.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13.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14. 孙怒涛：《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
15. 石福庆：《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炎黄春秋，2009年7月。
16. 唐少杰：《“文革”群众权力角逐的典型例证》，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1期。
17.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 万润南：《罗征启：夭折的接班人》，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20. 周泉瀛：《提前评判孙怒涛的回忆录》，清华大学校友网，2012年4月6日。
21. 李英美：《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记忆杂志，第89期。
22. 唐少杰：《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记忆杂志，第89期。
23. 唐少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死亡”》
24.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
25. 陈继芳：《1968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五柳村网站，2011年2月15日
26. 陶德坚：《风雨人生》，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年版。



实时 · 连载

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

孙怒涛

目 录

一、事情原委·····	708	十六、感谢老韩·····	725
二、当面征询·····	709	十七、笔记日记·····	726
三、源在老韩·····	710	十八、群策群力·····	729
四、孙耘澄清·····	711	十九、柳暗花明·····	730
五、征询老韩·····	711	二十、峰回路转·····	731
六、沈昆来信·····	712	二十一、育延有感·····	732
七、老韩回应·····	714	二十二、转变自己·····	736
八、再问老韩·····	715	二十三、孰大孰小·····	737
九、做足功课·····	716	二十四、从心和解·····	739
十、韩再回应·····	717	二十五、收获朋友·····	742
十一、三问老韩·····	718	二十六、何谓历史·····	743
十二、不再回应·····	719	二十七、育延结论·····	744
十三、再做努力·····	721	二十八、老沈声明·····	749
十四、我与老韩·····	722	二十九、楚三结论·····	752
十五、几种猜测·····	724	三十、原点断点·····	756

笔者按：本文连载发表。全文还未完稿，因为事件的真相尚在继续追寻中……¹

一、事情原委

今年三月份，我的多位朋友给我传来米鹤都对蒯大富的访谈录：《岁月流沙》。因为我也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所以对这样的文章格外感兴趣。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感到震惊：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笔者注：“沈荣槐”应为“沈如槐”之误）

我之所以感到震惊，不仅是因为过去从来没听说过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这件事，更因为 414 居然坚决不愿意停止武斗，拖也要把蒯大富拖死！

我对沈如槐这样的态度感到很气愤！

在我的印象中，414 参加百日武斗有不少无奈的成分。武斗中被动挨打，死伤了不少人。现在有人出来斡旋停止武斗，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儿，414 应当积极响应才是，怎么可以采取不愿停止武斗的态度呢？我想不通！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韩爱晶带来的停止武斗的方案、蒯大富提出的条件，414 方面无法接受，于是调解失败，无果而终。

但是，即使谈判破裂，也不应该说“要把蒯大富拖死”这样的狠话啊！

我首先征询沈如槐。他的回信很短，矢口否定了这件事，并说他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 395--397 页对此有记载。我赶紧翻开重读，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接着我征询蒯大富。给他的邮件如泥牛入海，久无音讯。

正不知该怎么办，恰巧收到陈育延关于小聚会的邀请函。当我决定赴会的时候，我也把征询这一史实真相作为此行的具体目的之一。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18 22:02:19

¹ 这里的“笔者按”及下面的“笔者注”都是当年发表时就有的。

二、当面征询

4月26日中午到达北京，旋即赶赴宛平古城。

见到新朋老友，格外开心。如崔兆喜，那是故交，都有43年没见面了，这次我特地点名请他从西安来相聚的。

我与陈楚三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比较大型的“小聚会”。当年团四两派的头头怒目相视，今日相见握手言欢。

我与陈楚三同处一室。夜晚，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蒯大富在《岁月流沙》中说到的那件事情。我们都想把这件事弄明白。但是感觉当着很多人的面问蒯大富有点不合适，想找机会单独间问他。

直到27日下午，还是没有找到单独问老蒯的机会。而我必须在三点半前离席，因为城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聚会。

到三点了，我不得已举手向会议主持人唐伟请求发言。我想，这次小聚会的气氛很和谐，当着大家的面向老蒯征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卢沟桥小聚会视频（下）中“我发邮件问过老蒯一个问题，但他……”的场景。老蒯先向我解释了一下，因为身体原因，他不常看也很少回邮件的。关于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一事，他说听韩爱晶多次谈起过。至于调解的细节，他也不是很清楚。与会者议论了一阵，也议论不出什么结果来。唐伟宣布这一话题暂停，换另一话题。于是，我向大家握别。

过了两天，在沈如槐为我举办的宴席上，我要沈如槐给我讲得更详细点。沈如槐说，没有就是没有，还有什么可多讲的呀！

沈如槐倒沉得住气，我可不行。因为此事涉及到我对414在武斗中表现的评价。我对老团老四的一把手都当面征询了，但是仍然没有解开我的疑团。

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只是，从何入手呢？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1 01:06:13

三、源在老韩

回杭以后，我就翻看蒯大富赠送给我的《清华蒯大富》。这是许爱晶（韩爱晶）刚出版的新作。我不是从头开始阅读，而是先寻找我最感兴趣的那件事儿书上是怎么写的。

果然，在该书的P339，有长长的好几段：

早在《七·三布告》发布之前，北京市革命委员常委会上就多次讨论阻止武斗问题。蒯大富身为常委，清华大学的武斗在北京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蒯大富到会时一些干部、军官、工人常委，都对他投来无奈、失望，甚至瞧不起的目光，和蒯大富说话时神情语调显得异样。在谢富治等主要领导和各位常委面前，蒯大富很狼狈，窘迫尴尬，但他就是不下决心停止武斗。

有一次谢富治主持常委会，把制止北京武斗作为会议重要议题讨论。韩爱晶对于泛泛的讨论大为不满，他当场挑明了说：首先要解决在座的常委所在单位的武斗，否则怎么能制止其他单位武斗！

韩爱晶建议市革委会里的干部、军官、工人常委、农民常委、红卫兵常委联合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要他们停止武斗、拆除工事。如果不听，再请卫戍区派两个连战士去强行拆除。

谢富治感到意外，但还是问常委们，同意不同意韩爱晶的建议？

工人、农民常委们明确表示支持，鲁文阁、王大宾都发言，积极支持。干部、军人不啃声。蒯大富也发言表示支持。

谢富治说，那就这么办，要吴德等人会后落实。

会后，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都参加调解小组，分别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做说服工作。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干部、军官不积极，也不参加，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停。

实际上干部、军官们看得比工人和学生清楚。蒯大富连中央领导的话都不听，哪里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许多人在看蒯大富表演，看他走向败局。

看到这里，我知道了，要弄清真相，需找到根子。这件事情的源头是在韩爱晶那里，蒯大富只是个“二传手”而已。

到哪里去找韩爱晶征询呢？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3 02:00:51

四、孙耘澄清

要说巧，也真巧，孙耘给我（确切地说，是“我们”）来信了。

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与他并不熟识，也没什么交往。只知道他是28团的骨干，是个很能写文章的铁杆老团。因为他做了一件很严重的错事，我对他的印象负面的居多。后来孙耘的坎坷人生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十分感慨。这次卢沟桥小聚会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识，对他格外留意了几分，感觉他是一个有思想、很真诚、现在观点相当平和的人。

我在小聚会上当众征询老蒯，这事他记在心里了。不久他群发了一个主题为“澄清”的邮件给所有与会者，信中说道：

今日给韩爱晶打电话询问当年制止武斗的事。韩说得很肯定，他和王大宾找过沈如槐商谈停止武斗，被拒绝，但那是在5月上旬，武斗尚未升级之时。邱心伟的大事记也有记载。那天之所以争论不休，全在于没弄清楚时间，有点像‘三岔口’里的暗中对打。看来再讨论问题，先要坚持现在所倡导的5W原则了。

看到孙耘与韩爱晶有联系，我心中一喜：孙耘不正是我想与韩爱晶之间建立联系的合适中间人吗？

孙耘孙铮夫妇为小聚会出了不少力。会后，他们精心制作了一个值得留作永远纪念的聚会视频，还给我传了许多照片，我心里很感动的。

于是我给孙耘去了一封回信。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3 02:06:46

五、征询老韩

我给孙耘的邮件如下：

孙耘、孙铮：你们好！

视频和照片全都收到。

新制作的视频，加了崔兆喜的派歌新唱和看望汲鹏等内容，就更为丰富而完整，真的是一份珍贵的纪念。

再次谢谢你们的辛劳！

凡是为消除误解增进友谊而作出努力的人们，都值得大家赞赏和感谢！

因为我正在写回忆录，所以对米鹤都写的《岁月流沙》格外仔细地阅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414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的话，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这次参加小聚会，我本想单独征询老蒯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所以不得已再 26 日下午我在离会前当着大家的面向他征询了一下。回来后，我看了韩爱晶写的《清华蒯大富》，在 P339 上也写着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找到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这件事。你们“澄清”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 1968 年的 5 月上旬。

关于这件事情，从韩爱晶的说法来看，目前所知只有韩爱晶、鲁文阁、王大宾和沈如槐是直接当事人，其他的人都不是直接当事人。

为此，我征询了沈如槐这个直接当事人。沈如槐明确告诉我：在百日武斗期间（1968. 4. 23—7. 27），他从来没有见过韩爱晶等三人，更谈不上 414 想拖垮蒯大富之说！

一些历史事实的细节不必也不应该过多细究，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在百日武斗史中是属于重大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搞清楚的。

因为我与韩爱晶不熟，所以只好麻烦你们再向韩爱晶征询：

1. 整个事情的过程，譬如他们是在哪天、通过与谁的联系、有谁引着、在什么地点、除了沈如槐以外还有谁参加了这次会商？他们对停止武斗提出了怎么样的建议或条件？沈如槐是怎么回驳他们或提出反条件的？

2. 他有什么史料（譬如当时的笔记或向北京市革委会的汇报材料等）可以佐证他的说法？

请原谅我的固执。

顺颂春祺！

孙怒涛 2011/05/06

此邮件我使用了“回复全部”功能。我希望凡是收到孙耘“澄清”邮件的朋友，都能看到我的这封邮件，让他们知道我还在继续关注这件事。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4 02: 11: 41

六、沈昆来信

孙耘当即给我回信，他表示他会马上将我的信件转发给韩爱晶，并说“关于你们关心并存疑义的这件事，我同样重视，所以前日再次询问韩爱晶。”

令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这个时候沈昆也给我回了一封邮件。他在邮件中说：

我以为孙怒涛兄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不是固执。此事确实事关重要，可以说是清华百日武斗中争取自行结束武斗的唯一尝试，是武斗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目前当事人双方的记忆截然不同，尽管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人数尚有多寡之分，但从当事人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是一比一，所以双方都应该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以便其他人加以判断。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此事弄得更加清晰。

我与沈昆素不相识，今次小聚会上是首次相见。听闻陆小宝与沈昆在网上撰文相争、言词犀利，这次亲见他们友好叙谈、交换意见。真是网上是辩手，相逢是朋友。见此情景，我深有感触。回杭后我给多位为小聚会出了大力的朋友们的感谢信中写道：“老团，已经不是过去的老团。老四，也不是过去的老四。对历史的认知我们不见得完全共识，对现实的见解也有诸多分歧。见面打个哈哈算不得真和谐。能够做下来，心平气和地互相交流、沟通、探讨甚至争论，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剑拔弩张地恶斗，这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也证明了我们的成熟。”

沈昆的话对我是一个鼓励。我想，清华关心这件事的人虽然不会很多，但绝对不会只有几个人。他的某些想法，我也早就有过。

我在回顾百日武斗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战争也好，冲突也好，往往都是打打、停停、谈谈的。无论打、停、谈，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没有只是为打仗而打仗的战争。但是在清华的百日武斗中，我们只看到打打、停停，没有看到有什么谈谈的（为交换俘虏的谈判不算）。两派在打打停停中僵持着，撕咬着，耗散了精力，浪费了时日、最后，伟大领袖一甩手，都无可奈何地被扫出文革舞台。为什么两派没有直接接触？为什么校内反对武斗的中间力量没能为武斗双方牵线搭桥引向谈判？为什么负有极大责任的北京市革委会不出面居间斡旋阻止武斗？

我还联想到，为什么在六四风波中，当局与学生如针尖对麦芒，步步紧逼，谁也不肯（或不敢）后退半步，没有谈判，最后以流血收场？难道中国的政治争斗就必须是一方全胜一方全输为结局，不能调和不能双赢的？

忽然听说百日武斗期间还是有过一次调停的，我就来了兴趣。我想先把调解的全过程搞清楚，再做深入的分析、研讨。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给沈昆回了一信，对他的理解表示感谢。信中，我还说道：

我感到欣慰的是，无论是过去的派头头，还是武斗干将，现在都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探寻真相、检讨得失、反思过去、共话国事。这是我参加小聚会后最大的感触，所以我很开心。我想，要是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也能如我们那样在民主的、平等的、同为着中华民族前途的氛围中对话，该多好！

这次聚会的主要话题是文革。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从偶尔提及的三言两语中，我辨别出有左派、有主流派、也有民主派的观点。我这里只是说观点的差异，并没有褒贬哪一派是革命或反革命的意思。我想，要是有哪位热心者能组织一次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研讨会，参加小聚会的在座各位是不是又会旧病复发，“卖国贼”、“文革余孽”、“保皇派”等等帽子满天飞呢？我祈愿并相信不会。

韩爱晶会不会给我回信？什么时候才会给我回信？我不知道。我急切地等待着……

发表于：2011-05-25 00:01:53

七、老韩回应

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还算稳重的人，其实内心的急躁毛糙，只有我自己知道。邮件发出以后，我就盼着孙耘马上把信转发给韩爱晶，韩爱晶收到以后马上就推掉诸事“提笔”给我回信。

韩爱晶似乎真的感觉到远方的我在盼他马上回信似的。第二天，我如愿收到了韩爱晶通过孙耘转发给我的回信：

孙怒涛：你好。

- 1、调解武斗的事，我会当件事认真对待。我已钻进另一个题目资料之中。
- 2、如果有人能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就会一目了然。
- 3、包括当时去北大调解，有条件时我也会同时求证。
- 4、文革中我去北大清华先后找周培源、沈如槐直接为北大清华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进行对话都只有一次。
- 5、414 当时也并非沈如槐一个人。
- 6、我们是坐下来，面对面对话的，开头还很客气，后来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
- 7、沈的态度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
- 8、他的认识与我当时思想认识距离太大。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
- 沈如槐一开口，苏北味，当时我惊讶我、蒯、沈三人是老乡！
- 9、原来我一直没有反对过老四，直到1968年7月，有一天，在体院养病时听到老四广播台在骂：蒯大富、韩爱晶之流、、、、、我火冒三丈说：我又没对你老四怎么样，还特别在大会上强调，只要不参加武斗的，一视同仁好好接待。
- 听此广播，我当即打电话回北航，广播把414的轰走。可见年轻感情用事。
- 10、快半个世纪的细节各有所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辅相成、相反相生！保重！

韩爱晶 20110506

韩爱晶发出这个邮件以后，似乎言犹未尽，他紧接着补发了这样一个只有一句话的让我看了不甚明了的邮件：

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行动，一步一步涉及若干人若干环节。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6 01:46:55

八、再问老韩

我仔细看了韩爱晶回复的十条。我对其中的第6第8条都感兴趣，对第4条更感兴趣。这三条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联合”。

韩爱晶说文革中我去清华找沈如槐直接为清华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进行对话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是整个文革中只有一次呢，还是武斗期间只有一次？这两者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得先把这点搞清楚敲定了再说。

如果说，我刚看到《岁月流沙》说“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这件事的时候，关注的是为什么414不愿停止武斗，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关注的是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我开始怀疑武斗期间韩爱晶没有与沈如槐对话过。要是韩爱晶根本就没来414找到沈如槐调解过武斗，414不愿停止武斗的说法也就无从说起了。

第二天，我通过孙耘再给韩爱晶去了一个邮件，主要目的是想确证一件事：
韩爱晶：你好！

谢谢你给我及时复信。

我正在看你的新作《清华蒯大富》。从已经看过的部分感觉你的政治才能比老蒯要高不少。当年，尽管我们知道你与老蒯是莫逆之交，我还是很佩服你治校有方的，北航没有像清华那样的两派恶斗。

我追寻这一事情的真相，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反思文革，别无他意。

在已经表态的两位直接当事人中，你与沈如槐中肯定有一人的说法错了。我相信，经过四十多年的岁月，那一定是记忆的错误。

我正在细研你答复的10条。从你所答的第4条中，我想请你确认一下：

1. 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是不是只见过沈如槐一次？
2. 你唯一见到沈如槐的那次，是不是就是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中所写的那次？

打扰你了，敬请谅解！

顺颂春祺！

孙怒涛 2011/05/07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7 13:45:53

九、做足功课

我一边等老韩的回信，一边开始做我的功课。

在我的印象中，韩爱晶似乎在1967年团四两派搞大联合的时候来过清华一次。我翻阅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果然，在P272, 1967年9月23日的日志上，记着这样一段话：

团派、414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以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

这句话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亲自来参加会议了，谭厚兰只派了一个代表来参加。另一种理解是：他们四个人都是只派了各自的代表来参加会议的，本人并没有亲自到会。

必须把这个歧义排除掉。

我请求邱心伟帮我查找这段史料的出处或其他还有没有相关的原始资料。邱心伟很快就给我回信了。她只一句话：原话来源于沈如槐书中第247页。

我找来《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瞧，沈如槐是这样写着的：

9月23日，两派负责人在主楼商讨联合总部组成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本人以及谭厚兰的代表参加会议，意在促进双方的联合。

沈如槐的记载把歧义问题解决了。韩爱晶、王大宾都到清华来了，都与沈如槐面对面商谈了，只有谭厚兰是派代表来的。

一个新的问题是，邱心伟说《大事日志》这段话也是出自沈如槐的书，所以，史料的提供者实际上只有沈如槐一个人。而沈如槐是我所追寻的这件事的一方，是直接当事人，所以我还必须有其他渠道的史料才能真正证实“1967年9月23日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与沈如槐见面商谈”确是史实。

我肯定也参加了这次商谈，但是我的笔记本已经全部销毁或丢失，我能回忆得起来的好像这次会议是在主楼召开的，其他细节都全已忘记。

想起在小聚会上陈育延多次提起她保留着十几本当年的笔记和日记，这引来大家啧啧的赞叹声和羡慕的目光。她也正以此为素材在撰写她的回忆录。

我想她一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我请她帮我查一查韩爱晶、王大宾本人到会了没有。

她查看了笔记和日记后告诉我，他们都来清华了，还讲话了，她的笔记上都记着呢！

太棒了！陈育延当年的现场笔记和事后日记是最权威最可靠的史料，它证实了“1967年9月23日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与沈如槐见面商谈”这一史实。

我从北京回杭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清华蒯大富》看得比较慢，每天只看个三五页。后来，等到我看到一多半时，才发现此书的P316上也记载着：

9月23日，团派、414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

这段话没注明出处。不过，对比一看，明显可以看出是出自邱心伟的《大事日志》的。韩爱晶引用这段话时有三处细微的改动：增加了日期；韩爱晶、王大宾名字的次序调换了一下；少了一个“以”字。

他引用并作了少许改动，这有力地证明了韩爱晶在撰写《清华蒯大富》的时候是承认“1967年9月23日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与沈如槐见面商谈”这一史实的。

嘿，早知道这样，我真应该快点把他的书看完，那样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惊动那么多的人了！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7 14:04:07

十、韩再回应

如我所希望的那样，韩爱晶马上就给我来了第二封回件：

孙怒涛：你好。

我确认1968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

我所述参与者包括沈如槐记不起或否认可以作为疑点。

这件事从市革会开会——红代会工代会沟通——两派参与——先去北大见过周培源，很客气，戴助听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去清华见沈如槐不欢而散——调解活动失败——有被耍弄的感觉——后来在多种场合谈此事——甚至多次表示如果当年市革会认真对待我的建议不会有七二七——写书搜集资料，从邱心伟大事记中只见到一句——详见邱书中李钟奇多次调解，才明白干部、军官们对我建议不积极的原因。

这件事对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不在意的事，他们忘却不奇怪。这件事是我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后来与蒯也多次谈起。确实、确实，我相信会有确凿历史证据来说明。

至于你问：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是不是只见过沈如槐一次？你唯一见到沈如槐的那次，是不是就是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中所写的那次？

我在书中引过一句话：说有易，说无难。

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别的场合如果与沈如槐见面机会也不少，比如1967年8月5号在天安门上，他书中写向总理问向题，那个问题是问我问的。

我说一次，是指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

保重！

老韩 20110508

韩爱晶在回信中，十分坚定而明确地告诉我，他确认 1968 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他与沈如槐在文革中有重大政治交往的就这么一次。其他的如偶尔碰见的那种不算重大政治交往。

那么，我疑惑了，1967 年 9 月 23 日那次与沈如槐的交往，算不算“重大政治交往”呢？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28 18:32:00

十一、三问老韩

心中有疑问，就得继续征询。于是我又给韩爱晶写了第三封邮件：

韩爱晶：你好！

谢谢你给我认真的明确的答复。

有一点我与你的认识是相同的，即我所说的你与沈如槐之间只见过一次的意思，指的也是你说的“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只有一次的意思。那种如天安门城楼上偶尔碰见或者其他场合握个手寒暄几句没有实质政治内容的见面，都不是我们感兴趣的。

我从你的两封邮件中，可以看出有两点是支持你的“我确认 1968 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

1. 你对去调解清华武斗见到沈如槐的过程，印象非常深刻。这件事情并非是你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从“从市革委会开会…后来在多种场合谈此事…后来与蒯也多次谈起”的一连串事件构成的。对这样一件于你是“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的事情，你几十年来是一直印在心头的，所以认定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

2. 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 中写道：“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蒯匪’这一叫法确实是只有在百日武斗这样特定环境中才有的语境。这也支持你在武斗期间去 414 调解的事实。

我也提出两点不支持你来清华调解武斗的依据：

1. 你在《清华蒯大富》中多处引用邱心伟所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中的内容，因为这本书记载的基本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除了派性语言和个别细节）。在该书 P272, 1967 年 9 月 23 日上，有这样一段话：“团派、414 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以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我认为这一次也是你与沈如槐之间的“重大政治交往”。这样说来，加上 68 年你来 414 调解武斗的那次，你与沈如槐之间的“重大政治交往”应该有两次，而不是只有一次了！

2. 我从《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能看出来，你是一个政治智慧超群的人。67年9月23日团四双方负责人为总部核心组的名额分配争吵不休，你是为促进大联合而来的。68年你在武斗期间来调解，主题只有一个：停止武斗。在武斗背景下，不可能谈什么大联合的事情。但是，在你的《清华蒯大富》P339中，你说你等“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沈如槐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我认为在武斗还没有停止的情况下你来提大联合的建议，是不合常理的，更非你韩爱晶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为的。

我说的这两点，第一点是史料。第二点是我本人的分析。

我替你归纳的两点，我认为都是你的印象或记忆，不能算是史料的。

我相信，你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肯定不会光凭印象或记忆来写，必定手握史料才能落笔的。所以，很简单，我请你对我公开一下你的史料，我的疑虑就烟消云散了。究竟谁的记忆出错，也就一目了然了。

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很讲理的人。我也是学工的，在认真这点上我与你相仿。我自知，我是一个比较迂腐的人，有时候还很固执。这些方面，请你多包涵了！

也祝你保重！

孙怒涛 2011/05/09

我在这封信中，为了有助于韩爱晶回忆，我把我所掌握的材料统统都告知他了。我提请他注意这两点：

1. 你在1967年9月23日与沈如槐已经有过一次“重大政治交往”。
2. 你在武斗的背景下来调解武斗，却谈大联合谈414承认不承认蒯大富是一把手的议题，这是超出常理的。而大联合呀，承认蒯大富是一把手呀，恰恰正是1967年9月23日你们来清华促大联合、协调两派在联合总部中席位分配的主要话题。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30 01:41:33

十二、不再回应

就在我热切地等待着韩爱晶像先前那样认真、及时地给我回信的时候，孙耘告诉我：韩爱晶说，他近期不再弄这件事了。

我一听，懵了！我想不明白韩爱晶为什么不愿意再与我继续交流下去。

很可能觉得他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没什么新鲜的话可说了。他坚持这件印象至深的调解是确实存在的。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涉及到若干人的行动。至于你们信不信，就随你们的便吧。

也可能他不明白我深究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否定他的《清华蒯大富》

的历史价值，还是怀疑我心怀叵测要对他算计？

都是猜测，都是瞎猜，没用。

陆小宝说：

为了死去的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老暮之年，把我们自己年轻时的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东西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东西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屬於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陆小宝的话，在我们这一代清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无论老团老四，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戏称为“小宝语录”。

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对别人留下的记录尽可能地去伪存真，这同样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趁着我们这些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不要把能搞清的史实留给后人去做无谓的争辩。这也是对历史负责，是我们能尽的最后的一点历史责任。

有友人对我说，还是把历史交给后人去评说吧，历史事实暂时存疑，过些时日总能搞得清楚的。

我想，无论是历史的评说也好，史实的考证也好，后人当然会去做的，我们这一代当事人更是责无旁贷。有位叫阿亿的人对清华的文革胡说八道（如把 414 称作是“贾春旺的 414”），我们都把这当做笑料，懒得理他，也相信后人不会信他那些垃圾话。韩爱晶，可就不同了！他那当年五大学生领袖的身份，他与蒯大富的交往亲密（“观察研究蒯大富四十五年，时间之长、距离之近、了解之深，绝无仅有”——摘自《清华蒯大富》之“内容提要”），以及他对这本书自诩为“对书中所述的每一个时间、地点及人物言行重新做严谨的考证”——摘自《清华蒯大富》之“后记”），我想，要是现在没有人对里面个别重要的有疑点的史实提出质疑的话，我看后人都会把这当做铁定的史实加以引用的。

还有友人说，这些细节无关大局。搞清楚了难道武斗就是对的了？即使在清华，也没多少人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了。

说实话，要不是写回忆录，我也不想再去追寻这些事情的真相。大而言之，百日武斗，双方都有责任的（当然，责任有大有小，而且上面的责任远大于两派的责任）。七二七以后，两派同归于尽。所以，说到底，414 是不是愿意停止武斗，确实也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除了清华很少几个老头老太，是没多少人感兴趣的。

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要写回忆录，就不能不谈到百日武斗，不能不反思百日武斗，所以对百日武斗的基本事实是必须搞清的。搞清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和反思。如果真有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而 414 不愿停止武斗这

样一件史实，那么我对 414 在武斗中的表现将要重新进行评价了。

对历史的反思总是建立在可信的史实基础上的。真实的史实有可能引出正确的教训；不实的“史实”不可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要是重要的史实都存在“有”或“无”的分歧，反思的结果肯定是大相径庭的。

我只是一介平民，既没有深奥系统的理论，也没有高远开阔的视野，更没有波澜壮阔的经历，想总结自己的人生，想反思文革，只能从亲身亲历的这一点点小事做起。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5-30 23:11:18

十三、再做努力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一直再没有韩爱晶的信息。我心犹不甘，又给他写了一个邮件：

韩爱晶：你好！

我还在拜读你的大作《清华蒯大富》。你的不少点评我深为叹服。

你在“后记”中写道：“本书难免有差错之处，恳请批评指正”。我不敢“批评指正”，我前几个邮件是对书中提到的一处史实提出征询或质疑而已。

对你说的在武斗期间来 414 调解一事，我现在认为：

1. 你、聂元梓、王大宾三人在 1967 年 9 月为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来过清华，当时在场的有蒯大富、沈如槐及两派的主要头头。这点是有史料可以佐证的。

2. 要是你与沈如槐之间只有一次重大的政治交往的话，那就是 67 年 9 月的这一次，除非你与他有过不止一次的重大政治交往。

3. 尽管你对 68 年的那次为调解武斗与沈如槐的交往印象深刻，但是印象或记忆往往可能会出错的，不能算是史料。

4. 如果你有史料佐证你来调解过武斗的话，恳请你拿出来。那样，假如沈如槐还有异议的话，我会要求他拿出自己的史料。

5. 如果你是仅凭记忆写你来调解过武斗，那我就认为你的记忆出错了，把 67 年 9 月的那次错当成是发生在 68 年武斗期间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目的是追寻真相，我的态度是与人为善，并没有更多的想法。

我知道你很忙，忙于另一个题目的资料之中了。我为打扰了你深感不安，在此谨表歉意！

我恭候你的答复。

顺致我的敬意！

虽然我的这封信里所说的五点看法有点逼他表态的意思，但是我想传达给他最重要的信息是：我的目的是追寻真相，我的态度是与人为善。我一直都在强调，即使这一史实出错，也一定是记忆错误，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岁月，谁都可能会犯、谁都能够理解的记忆错误。

很遗憾，我的表白似乎没有为韩爱晶所接受，因为他依旧对我保持沉默。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01 02:35:07

十四、我与老韩

我与韩爱晶并不熟识，当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了。且不说中央首长接见时候偶然碰到打个照面的那种，如果把在深圳的那次饭局都算上，到现在为止交往的次数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只手的数。

他是大名人，我在1967年初就知道他的大名了。

对北航红旗，我向来是有好感的，因为北航红旗没有发生清华井冈山那样严重的两派恶斗和分裂，更没有发生过大的武斗。这说明这个学校的领导者治校有方。也因此，我对韩爱晶是心存敬意和佩服的。

如果说我从1967年上半年开始因为常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蹦跶，在校内小有一点名气，我在校外依然是一个无名小卒。

这次看了《清华蒯大富》，竟然发现书中记载着有关我的这么一件事，实在出我意外。在P253上：

听说清华有分裂的危险，我们北航几个主要头头五六个人，一起赶到清华。在校园里看到与蒯大富意见不同的学生在游行，我听他们说只是要蒯大富做检查，我很感动，当场我还鼓掌了。我们到井冈山总部，蒯大富和十几个头头正在开会，我发表意见说：“让批评意见充分表达，主动做检查，无论如何不能把群众打成逆流，不能分裂。”蒯大富等头头很客气。

这前后我们有勤务员讲清华孙怒涛来找过，孙怒涛说：“你们北航红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都讲政策。”我听了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要从大局出发，我们不可能采取支持414、反对蒯大富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对蒯大富要批评帮助，但不能分裂。

这里所说我到北航找韩爱晶这件事，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看到韩爱晶的记载，仔细想想，似乎是有过这么一回事，久远的印象慢慢地显现出一丝轮廓来。

“这前后”，应该是在414串联会成立前后，我还是兵团总部委员的时候。我和“第一湘江”战斗组的几个人，一起到北航去找韩爱晶。一是想了解北航的运动，

向北航红旗学习。二是想向韩爱晶介绍清华两派论战的实际情况，也有想争取他的同情、理解、支持的意思。三是希望他能对蒯大富施加影响，对清华运动起到积极的作用。我知道韩爱晶是蒯大富最要好的朋友，但是我并不认为对手的朋友一定就是我们的对手。

看了这本书，我知道了当年韩爱晶一直在对蒯大富做工作，真不愧是蒯大富的挚友。也知道了韩爱晶出于大局不可能支持414，但对于414还是有一份同情的。

这次去北航，因为事先没有预约联系，是贸然闯过去的，对北航红旗而言是不速之客，所以没能见到韩爱晶，只与勤务站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以后的见面，除了1967年4月10日主楼广场斗王光美，我比较近距离的见到他在主席台上讲话。最近距离的接触就是9月23日他来清华促两派头头大联合的商谈会上了。那次，沈如槐是主角，我最多是敲敲边鼓的，相信他对我不会有很深的印象。

在《清华蒯大富》这本书中，对于清华发生的大事，经常有韩爱晶以“笔者认为”的形式所做的点评。从这些点评中，可以看出韩爱晶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人物。这些点评，并非是局外人的隔靴搔痒或亲历者的马后炮。以他治理北航的实绩为后盾，他的点评更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高人一筹。我在给他的邮件中所表达的“叹服”是由衷的。

韩爱晶对这一时期清华两派闹矛盾的定性及对策，无疑是很正确的。蒯大富对414定性错误、处置失当加剧了两派的矛盾。蒯大富做了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以后，他本该站在两派之上，把团派与414的矛盾看作是底下兄弟俩的吵架。耐心听取双方的意见，正确的就虚心接受，不对的多做解释，对他们既要批评，更要肯定，那样才能化解矛盾，控制大局。可惜的是，蒯大富没有听取韩爱晶的良言建策，反而是一屁股坐在团派立场上，视团派为自己的嫡系，视414是来夺权的反动逆流，对414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这不能不说这是蒯大富的一大失策。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继而发生大大小小的武斗，确实是普遍的现象。因为，这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一个具体单位是不是必然会这样，我认为是不一定。也就是说，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以及两派武斗，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蒯大富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智慧，如果414不是以组织分裂来对抗，那么清华或许是可以躲过百日武斗这一劫难的。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02 02:04:13

十五、几种猜测

在我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是不是见到了沈如槐这件事，听到过几种不同的说法：

“替身”说：414是不是派了一个沈如槐的替身（或代表）去与韩爱晶商谈的呀？

我认为，即使是在武斗险恶的环境下，与韩爱晶见面商谈还没有到危及生命的程度。所以沈如槐没必要使用替身。更何况，商谈时对韩爱晶停止武斗的提议需要立即做出反应，需要马上表明414的立场和态度，这些都是替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替身说是不成立的。

“隐瞒”说：沈如槐是不是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这件事呀？

我认为，武斗期间韩爱晶要找到沈如槐，必然会有中间传话的人。沈如槐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去见韩爱晶的，至少要带一个总部要员同去。商谈以后沈如槐必然会向其他总部委员和核心人员报告他与韩爱晶商谈的过程和结果。也就是说，414方面肯定会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沈如槐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这件事。即使他想隐瞒，有那么多的知情人在，想隐瞒也是隐瞒不住的。

“谎话”说：韩爱晶是不是在说谎，把武斗不能停止的责任栽在414头上，为蒯大富减轻一点罪责呀？

我认为，尽管四十余年来，韩爱晶与蒯大富一直是患难与共的至交，但是，现在韩爱晶没有必要为减轻蒯大富的过往责任而说谎。现在毕竟不是那个两派恶斗的年代，不存在故意编造新的派性故事的现实需求。

我要说的是，这些朋友的猜测都是嘴上议论一两句而已，并没有带什么情绪，更不是那种义愤填膺的激动。在真相大白之前，谁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无限遐想的。我在这里也不是要对这个说那个说展开批判，我只是对这些听到的说法表示一下我的看法而已。

文革那时候，我们常常指责某某人定调子。其实，所谓定调子，就是给事件定个性。不能否定定调子的重要性，关键是定调子定得是否正确、恰当。我对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定这样的调子：不管谁对谁错，都是因为年久记忆错误。弄清真相，不要把模糊的史实留给后人后世，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做到问心无愧。

(未完待续)

十六、感谢老韩

起码有三件事，我是要感谢韩爱晶的：

第一件：1967年9月，他与王大宾为清华两派的大联合做过促进工作。1968年5月百日武斗期间，他与王大宾为停止两派武斗做过调解的努力。这个努力，对他们当事人而言，是那样的记忆深刻，永志难忘。这件事，于当年的团四两派而言，其实并不怎么了解内情。我通过这次真相追寻，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告诉后人：清华武斗，不仅在校内是不得人心的，在校外在社会上也同样是不得人心的。调解停止武斗，校内的两派没有做过像样的努力，而在校外，曾经有过这么一次认真的努力。尽管这次调解停止武斗的努力因种种原因而半途流产，但是，我想，不仅是我，我们当年的团四两派，当年的清华师生都应该对韩爱晶、王大宾补说一声：谢谢你们真诚的努力！

第二件：在百日武斗期间，许多逃离清华而家在外地的同学，都逃到北航同学老乡那里避难。这其中就有不少414的同学。韩爱晶并没因为是蒯大富的盟友而为难这些落难的老四。在七二七中，被打得落荒而逃的老团也把北航作为安身之处。用现在的话说，当清华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时候，韩爱晶都伸出了救援之手，把人道主义精神置于政治派别利益之上，这在当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也是更值得我尊敬的！

第三件：在这次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韩爱晶是我的追寻目标。我烦不胜烦地征询他。在与他的几次邮件往来中，我看到了他的认真、真诚、友善、积极的姿态。尽管事件真相还没有完全大白，最后的结局也不一定那么圆满，我仍然十分感谢他的配合！

我还要说一声：对当年一切为反对武斗、阻止武斗、停止武斗、调解武斗而奔走呼号的人们，不管是校内的师生（如那些顽强而微弱地发出“第三种声音”的）还是校外的人们（如韩爱晶王大宾等以及在七二七前几天和七二七那天流汗流血的首都工人师傅们），我们都应该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敬意！

大批逃难的清华师生名副其实的用脚做了正确的选择，偌大的清华成了一座只有几百人还在厮杀的空城，表达了对武斗的恐惧和厌恶！

少数留校参与武斗的两派人员（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偶发的特殊原因，我肯定也会参加武斗的），他们的内心也是不希望武斗的。参加武斗肯定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参加武斗的动机，或为主义、伟人，或为真理、正义，或为同学情义，或为无处可去。种种原由，或多或少都有合理的成分。几十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历尽磨难，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作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贡献，说明他们

确实是清华的英才。当年，不过是迷了路。

只有极个别的人，他们丧失了良知，突破了做人的底线，我一直无法原谅他们。但是，在继续革命理论统治下的文革，极左路线肆虐下的社会，他们的犯罪也不能由他们个人负全责。所以，在量刑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这些血案发生时的历史背景。

看完《清华蒯大富》，有一点我很有感触。在书里，韩爱晶三处提到他在批斗彭德怀元帅时打了他一耳光，一失手成千古恨！本来这本书是专门写蒯大富的，又不是他的自传或回忆录，完全可以不提这件不光彩的事情的。我看到好些回忆录，不少都是隐恶扬善，或者粉饰美化，总想在身前身后留下一个光辉的形象。韩爱晶能直面自己的人生，不回避不掩饰自己的严重错误。这点，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08 00:53:20

十七、笔记日记

一天天耐着性子等着韩爱晶的信，不知何时信能再来，不知会不会再有来信。除了等待，还是等待。既然有空闲时间，那就在这里说说陈育延的笔记和日记。

前面提到过，陈育延为我提供了1967年9月23日的笔记和日记。她先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遍。我请她抄下来给我来个邮件，她当天就给我寄过来了：

孙怒涛：你好！

邮件收到。你要的1967年9月23日的会议情况实际是9月24日上午在主楼召开的兵团总部（团派）与414总部联席会议的第五次会议（9月21日上午第一次，9月21日下午第二次，9月22日下午第三次，9月23日上午第四次）。这五次联席会议都是为解决清华两派联合谈判而举行的。9月24日上午是第五次，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都来参加了，而且只参加了这一次。在我的工作笔记和日记上都有记载。但未讲谭厚兰，大约她本人没来参加。现将有关这次会议的我的工作笔记和当天的日记（部分）转录给你。若对你的回忆录有帮助，尽可以拿去使用、登录。我的回忆录也会登出，所以完全不怕公开。现抄录如下：

第五次会议 9.24 上午（主楼）

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等参加了会议。

聂：北大解决得也不好，希望团派、414派到北大帮助联合。

韩爱晶：主要是政治纲领一致，不能同床异梦，没有必要改联合总部。团派希望往前走。

王大宾：①清华、北大、师大是重点。坏人比北航、地质多，联合不起来肯定有坏

人挑动。②蒯第一把手，底下一边六人。

聂元梓：同意王大宾的意见。

[摘自1967年9月24日工作笔记]

日记 1967年9月24日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

414就是这种从政治到道义上必然要灭亡的一批谩骂者所操纵和掌握的！

我们从9月21日下午到今天又进行了四次谈判会，毫无进展！今天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谈判会（聂元梓中途退场）。在会议快结束时，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王大宾说：“414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414在很尴尬的情况下拒不签字退出了会场，真是一幕政治斗争中的滑稽戏，岂有此理！

我真不知道，象这样长时间谈判的疲劳战术还要进行多少次，可能是近一两个月都不会结束的吧！

这也算是对我们，尤其是对老蒯的错误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从去年十二月三总部合并到5月底试图建立革命委员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失去了许多机会。于是，也就从排斥好人，升到只容不得小人，又升到小人得志。这就是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呀！可见，可怕的不是右派利用，可怕的是左派犯错误，是我们犯错误呀！

……

陈育延 2011.5.9

我收到她的邮件后，第二天马上给她回了一信：

陈育延，你好！

昨天通话时你说起这些往事引得我听了哈哈大笑。看到你的文字记载，绘声绘色，生动无比，精彩极了！

你的笔记和日记，我认为都是极其宝贵的。与孙维藩的日记照片一样，宝贵在原汁原味。孙维藩是从一名普通学生的角度，你是从八八和团派核心人物的视角看清华文革的。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的。

韩爱晶来清华促大联合这件事，在邱心伟的《大事日志》上就有记载。你的笔记和日记是这一史实最有力的史料和佐证。

我关心这件事，是因为这几天我在孙耘的帮助下在向韩爱晶征询他们三人来414调解停止武斗这件事的真伪。韩爱晶说他与沈如槐之间“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的只有一次，就是来调解停止武斗这一次。现在证实他在67年9月24日就与沈如槐有过一次“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这反证了韩爱晶在武斗期间并没有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所以我倾向于韩爱晶的记忆出错了。四十余年前的事情，谁记忆出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想，在我们这些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尽可能把可以搞清楚的史实搞清楚，不要再留给后人去做无谓的争论。

非常感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宝贵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我可能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引

用。在这次对韩爱晶的征询中，我能不引用就尽量不引用。

祝你安好！

孙怒涛 2011/05/10

这次在主楼举行的谈判经陈育延的笔记日记的提示，把我已经淡忘的印象变得清晰起来了。

当年谈判的焦点是联合总部核心组名额的分配问题。414 坚持要团四对等，而且对蒯大富做一把手也不愿痛痛快快地承认。团派要求核心组按团 9 四 4 的比例组成。

9月23日，“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大事日志》P272），当天没能达成协议。第二天，即9月24日，韩爱晶、王大宾参加两派谈判促大联合。王大宾提议“蒯第一把手，底下一边六人”，这基本满足了414的要求，团派也同意了。但是因为414代表又在某些枝节问题上提出了体现绝对对等的其他要求，对于这种斤斤计较的态度，惹恼了韩爱晶和王大宾，以致“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王大宾说：‘414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

对于这次谈判的过程，尽管有几份资料可以对比参照，但在个别细节上还是存在着互相矛盾和模糊不清的地方。所以上面这段话不见得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韩爱晶和王大宾在1967年9月24日（——根据陈育延、邱心伟记载；或在23日——根据沈如槐记载）与沈如槐有过一次重大政治交往。

我一直高度评价蒯大富和团派在这次大联合中的总体表现！他们比414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体现了更大的诚意！这次联合最后以联而不合的结局而告失败，两派又一次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

现在韩爱晶一直没再给我回信。即使他再回来信，只要他不对“1967年9月24日，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与沈如槐见面商谈”这一史实提出异议，我就不打算引用陈育延的这份史料来佐证了。

陈育延是个爽气大度的人。她让我有幸对她的这段笔记日记先睹为快。那绘声绘色的文字、活灵活现的记录，不失真地再现了当年的场景！我不敢独吞，所以决定拿出来与诸位校友共享。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陈育延的回忆录里肯定有许多原汁原味的精彩无比的篇章。我们热切地期盼着她的回忆录早日问世！

陈育延的日记里记载着“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因而“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无独有偶，在《清华蒯大富》也写着韩爱晶王大宾来调解武斗的时候，被沈如槐“蒯匪”的骂声“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

这两个场景，何其相似乃尔！只是一个发生在 67 年 9 月，一个发生在 68 年 5 月。

我与陈育延，当年都是兵团的总部委员，而且都是核心组成员。陈育延是八八的领导人，她名气大，地位也比我高。在兵团整风的时候，我要罢陈育延的官，陈育延要求把我轰出总部。我们俩也是斗得不可开交，在总部开会的时候互相间很少交谈的。这次，她作为小聚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不嫌其烦地与我联系落实，实现了我们在四十余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在我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她友好热情的帮助，无私地把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给我。这些都让我十分感动！在此，我要再一次说声：谢谢你，陈育延！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08 00:54:39

十八、群策群力

我这个人的坚韧性向来是很差的。

一开始，我觉得追寻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的真相是件比较简单容易的事情。正像有的朋友所说的，打个电话一问一下，不就得了？就如我这样麻烦点、慎重点，由孙耘做中间人，只要盯住韩爱晶，要么叫他拿出证据，要么让他承认记忆有误，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与韩爱晶前面几次邮件交流以后，我感觉蛮好的，似乎冰山马上就要浮出水面，谜底就要揭晓。

没想到，韩爱晶不再回信了。于是，追寻一下子失去了目标，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进行下去，情绪也跌落下来。我对孙耘说：有人早告诉过我，此事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我还不信。看来，果然应验。

孙耘比我要老道多了。在我盲目乐观迫不及待的时候他给我泼点冷水，提醒我不要太着急。当我有点泄气的时候他又给我烧烧火，说现在远没到最后，也不会不了了之，说“应验”也为时尚早。

我想到了还有一条路可走。如果我写一篇《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把它贴在校友网里，让对此事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回忆，说不定能从众人的回忆中找到点线索。

韩爱晶一再肯定他来 414 找沈如槐调解过武斗，并且当时就告诉了蒯大富，我有理由推想：根据我对老蒯的了解，他绝对不会将“沈如槐拒绝停止武斗”这样有利于团派的消息“贪污”，闷声大发财的。蒯大富马上会告诉总部核心和武斗骨干的。在双方都打得红了眼的武斗背景下，前哨广播台肯定会拿此事攻击 414 的。也就是说，老团老四两边都会有不少人知道此事的。这样，不就可能找

到一些旁证吗？

我本来设想，一旦事情搞清楚以后，我在校友网发布一个消息，只说结果，不谈过程。现在因为还没完全搞清楚，有求于大家，只好把追寻的前因后果统统都写出来，一来是让大家分析判断，自己去得出结论。二来也是征集线索，收集更多的史料。

孙耘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值得一试。他表示愿意帮我贴到 63/64 社区里。那样可能会有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知情者跟帖。

这也算是一次利用网络平台群策群力的追寻吧。

所以，这些天我一直在写这篇文章。写一段，贴一段。

63/64 社区的学友们，留在学校里参与武斗或旁观的朋友们，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两派头头们，在 1968 年 5 月上旬，你们可曾听到过韩爱晶来 414 调解武斗被沈如槐一口拒绝这样的广播、传闻或消息？

从 5 月 18 日我在校友网上连载此文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在众多的跟帖中，还没有一篇跟帖提及或确认当年“韩爱晶来 414 调解武斗被沈如槐一口拒绝”这则新闻。

只有陈楚三给我的信件中他写道：“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却没有听到团派广播与此相关的任何一篇文章。”

陈楚三明确否定存在此事，这是他的一人之言。他有睡觉的时候，有漏听的时候。他说没有的事情不一定真的没有。我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能证实这则新闻的人说话。如果有哪位校友能提供有关此事线索的，希望你在此跟帖，也可以通过孙耘、连果义告诉我。我这样做只是想为真相的判断多一点旁证，绝对没有想以此去伤害任何人。

这就是我之所以在 63/64 社区上发表这篇追寻记的目的。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08 15:59:35

十九、柳暗花明

今天接到孙耘来信，他信中写道：

还有一个旁证人。工代会鲁文阁（二七厂）已去世，王大宾健在。去年 10 月在成都聚会，邀到王大宾见面，谈了一上午，其中也说到他去清华调解武斗的事。

我现在记忆力不强，为稳妥计，近日又询问多位参加者，他们一致证实，王大宾确实说到去清华调解过武斗。

李自茂说：当时我坐在他旁边，特意问他这件事。他肯定地说有这回事，还说：（因

为调解不成）我当时很恼火，沈如槐怎么会这样。

……

孙耘 2011.5.17

我看了这封信，顿时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是的呀，王大宾不是一般的旁证人，他是与韩爱晶同来清华调解武斗的直接当事人。能与他联系上，对追寻真相绝对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韩爱晶的记忆可能出错的话，两个人，而且是两个具有非凡才能的学生领袖同时记忆出错的概率是极低的。

于是，我通过孙耘给王大宾写了一封信：

王大宾：你好！

非常冒昧地打扰了你！敬请原谅！

关于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一事，沈如槐说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我正在追寻这一事件的真相。

你也是来清华调解武斗的直接当事人之一，所以我非常希望你能详尽地介绍一下关于与韩爱晶一起来清华找沈如槐调解武斗的详细经过及细节。要是你能有当时的笔记或其他史料佐证，那就更好了！

为了便于你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与韩爱晶之间的往来邮件都放在附件里了。

十分盼望你的帮助！

顺颂春祺！

孙怒涛 2011/05/18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09 15:11:53

二十、峰回路转

与王大宾的联系正在进行之中，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韩爱晶终于给我发来了一封我久久盼望的来信！

我想，韩爱晶毕竟是经历过政治风云跌宕起伏的人物，不是那种小鸡肚肠没见过世面的小市民。我感谢他的大度！我也知道，孙耘肯定在这其中做了许多沟通的工作，所以才有可能在我山穷水尽的困境中出现一线山回峰转的光明。

韩爱晶的回信是这样的：

孙耘、孙怒涛：你们好。

1、调解武斗，确有其事，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记录解密会确凿证明这一点。应该是1968年，邱心伟大事记上提过一句。

2、我们去北大、清华调解武斗，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

3、其后几十年里，我多次在各种场合为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4、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

5、2010年蒯大富、李自茂等去四川，王大宾也证明有此事。

6、过去近半个世纪，细节要考证很正常。

7、孙怒涛总要用一个什么公式来推论历史事实，似不可取。

谢谢！

老韩 20110518

我仔细地琢磨着韩爱晶的每一句话，感觉每一句话都很有深意。

韩爱晶说：“调解武斗，确有其事，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记录解密会确凿证明这一点。应该是1968年，邱心伟大事记上提过一句。”对此，我想我与大家都沒有异议。最多可能是在是调查武斗还是调解武斗这点上有点枝节分歧。

韩爱晶说：“我们去北大、清华调解武斗，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这也是事实。只是，我要加上一句，调解清华武斗失败的原因中，还要再加上很重要的一条：414以调查组里有蒯大富之由拒绝了调查组。

韩爱晶说：“2010年蒯大富、李自茂等去四川，王大宾也证明有此事。”这从王大宾的信中也得到了证实。

韩爱晶的这封信中，直接涉及到我追寻的这件事情的，韩爱晶所重申的我认为都是没有争议的史实。这与他前几封信件中说过的话是一致的。

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韩爱晶没有再提到他来414总部与沈如槐见面的事情。而这正是我最关心的涉及到事件真相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关键的一点，韩爱晶是有意不提的？还是认为以前他已经讲过了没必要再提？我从信件中判断不出是哪一种可能。要是前者，那是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信息。

韩爱晶在第7点中对我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我认真反思了一下，觉得在下一封回信中，应该对此有所回应。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1 01:02:04

二十一、育延有感

这一段是我写作计划之外临时插进来的“不速之客”。

刚收到陈育延的一封来信。我看了之后，不禁忍俊不禁。

追寻历史真相，本来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但是，追寻的过程，并不排斥有趣和开心。陈育延的《有感》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同时，我还觉得她写得富有哲理。开心的好东西不能独占，有益的好东西要与大家共享。

说到这段的标题，还有一个小花絮。有次她来电告诉我，如果我想把她的那段日记公开到校友网上，标题可以冠以她的名字，就叫“陈育延日记”，以增强眼球效应。我说，我是想过要把你名字放到标题里去的，只是我的标题一直是用四个字。我总不能取名“育延日记”吧？我打趣说，要那样，周兄会有意见的，校友们也会觉得我老孙有点“纤煞煞”的（类似于“嗲兮兮”的意思）。我听到陈育延在电话那头也在开怀大笑。

这段的标题有点不好取。思考再三，我就不怕大家取笑了，来个“纤煞煞”的《育延有感》吧。

孙怒涛：你好！

你在清华校友网上成功地连载了“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吸引了不少眼球。虽然目前跟帖不多，但是看者不少。我相信，大家都在屏住呼吸，看孙怒涛究竟葫芦里想卖什么药。我这个原本不大上校友网的人，也变成一天之内几进几出的人了。就是为了看你到底得到了什么结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头来“追寻”。我好几次都想跟帖，最后写成了这篇《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虽然你的连载未完，结果不得而知。但我觉得跟着你的文章，我的思想过程很有趣，所以忍不住想告诉你。如果你觉得有意思，想让别人知道，你就发出去。如果你觉得它会影响你的主题，就只当作我给你的私人信件作个交流吧！

另外，邱心伟《大事日志》第344-345页中关于5月5日《市委调查组》的一段，不是取自沈如槐的《文革纪事》，而应当是取自唐少杰的《一叶知秋》第16页上，言词完全一致。而唐少杰的这段，又来自蒯大富、韩爱晶的口述。所以不能再以此作为韩爱晶的佐证。而我的1968年5月4号工作笔记上的这段，是可以佐证这次调停武斗的可能性的。仅供你参考。祝好！

陈育延

2011年6月10日

《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

2011年5月18日开始，孙怒涛在校友网上开始连载他的《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我在看到他的第一篇文章“事情原委”时，就猜想他写文的结论可能是会否定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而被沈如槐拒绝的这件事。因为5月9号孙怒涛曾给我发过邮件，询问：“1967年9月23日，两派的负责人在主楼开会商讨联合总部的人选问题。你参加了吗？要是你参加的话，你的笔记本上有没有记录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这四个人中，谁是亲自到场与会的，谁是派代表与会的？”

我由于回忆录还未写到这里，所以专门为他的邮件去翻阅了我当时的日记和笔记，

没想到还真有记载。于是打电话给他，孙怒涛很高兴，希望我抄下来给他个邮件。我很愿意帮他，因为他正在写回忆录，我想也许他能有用。

邮件发出的第二天，他就给我回了信，称“生动无比，精彩极了”。我自然也很高兴，由于我的日记中所记韩爱晶与王大宾的态度与《清华蒯大富》书中所述非常相象，而时间上前者是67年9月24日，后者是68年5月初。因此，我当时与孙怒涛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似乎韩爱晶的记忆出了错，将67年9月发生的事情记成了68年5月。我们不同的一点是：孙怒涛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反证了韩爱晶在武斗期并没有来清华调解过武斗”。（见5月10日的回信）而我没有明确表态，因为我认为对某一件事情的错误记忆，未必能否定另一件事情的存在。但我想，这只是个人不同的看法，不必强求，所以没当回事，我还要继续写我的回忆录。但当5月18号孙怒涛的“追寻记”一贴出，我马上就感到他可能会以我这个日记为依据去否定韩爱晶了，他也许是为帮沈如槐的“拒绝调停武斗”来澄清，而且越看到后面就越觉得明显。他不断地在追问韩爱晶：是否与沈如槐“在文革中重大的政治交往”只有一次。我感到他在一步步引导韩爱晶犯错误：若只有一次，则67年9月那次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几份材料都可以证实，更何况他手上还握有我的日记。便可以因此否认68年5月那一次了。因此，当他写到第十二集时，我便着了急，我想帮助韩爱晶，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继续查资料。没想到，还真查到了68年5月4日的工作笔记上有一段。

“5.4 市革会讨论结果：

1. 讨论地质东方红小报上关于大事记的问题。①此大事记是反动的。②
2. 删要求谢付总理处理我校问题，谢说处理不了。
3. 组成调查组。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大宾）、谭组成（王、谭反对）。”

[摘自1968年5月4日工作笔记]

虽然这一段没讲结果，但至少证明市革会组织了调查组，北京卫戍区的付政委刘绍文作组长。这个调查组总会与武斗双方接触的，不管是电话还是见面。不管效果如何，都应当有所交待。但可惜我失去了部分日记，其中就包括这一段时间。因此，我这里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材料来佐证，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也就是你不能完全否定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武斗这件事。你可以说“不确定”，但你不能说“没有”。

当我手中握有这份材料的时候，再看孙怒涛，我就笑了，我想跟孙怒涛开一个玩笑吧！中国有句谚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孙怒涛将要捕到韩爱晶这只蝉时，他不会想到后面还有一只黄雀在盯着他，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你不能确定调解的事不存在。我很想当一次黄雀，只可惜我材料不全，缺了一只翅膀，只能与螳螂对峙了！我们都需要回到原点调查了。但也许黄雀后面还有一只老鹰，它的手里也许有更为钢鞭的材料。我当时想，这只老鹰可能很难出现了。但若即使回到原点，也不是原来的原点了。至少经过追寻，增加了对沈如槐的疑问，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派头头们没有独断专行的时候！也许他那时候正在气头上，因为谢晋澄刚死，是不能与“蒯匪”讲和的。但却没有考虑到：个人的某些行为，会在后续的武斗升级和更多的死伤后果中，造成内心终生的悔意，蒯大富现在就是如此！

但68年5月4日的材料，在我手里只捏了两天，我就意识到玩笑开大了会伤及朋友。我必须尽快打电话告诉孙怒涛：市革委1968年5月初有这个调查组的存在，一定不会无作为的。希望他不要把否定的话说死了，以免一旦有了新材料会被动的。我打这个电话时，已是6月2日，他的第十三集“再作努力”已经出来了。我希望自己提醒的不算太晚，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谦谦君子孙怒涛受到伤害。当然可能我是杞人忧天，人家孙怒涛比我城府深得多，早已胸有成竹了，没准还把我给套进去了呢！

虽然我当时认为他是努力想为沈如槐“澄清”，而我是想帮韩爱晶摆脱“记忆误差”的尴尬。我不自觉的还是在用派性的眼光看问题。这时候我猜想的是：孙怒涛原本想通过“追寻记”为沈如槐洗脱“拒绝调停武斗”一事，但反而增加了对沈如槐的疑问，觉得那是无法完全洗脱的，但是又不想停止追寻，因此方向上稍有改动，变成“追寻历史真相”了，显然我这也是“小人之心”。

这时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笑话，内容如下：

有一个神父在绿茵场上打高尔夫球，有一个修女在旁边观看。第一杆就打偏了，神父觉得很没面子，张嘴骂道：“他妈的，打偏了！”再打，还是那样，神父有点恼羞成怒了，又骂：“他妈的，又打偏了！”圣洁的修女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提醒神父道：“作为一名神父，您是上帝的使者，随便说脏话又怎么教化您的子民呢，这是要受到上帝惩罚的！”话音刚落，只听晴空一声霹雳，神父心想：“Oh!my God! 报应来了！”只好闭上眼睛等死。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睁开眼睛一看，修女直挺挺的倒在地上，已经死去多时了。

神父心里很是疑惑：“骂人的是我，为什么死的是修女呢？难道她背着大家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比圣徒骂人情节还要恶劣？”

这时候，只听见云层中遥遥传来上帝那宏大辽远的声音：“他妈的，又打偏了！”

我想，这回孙怒涛可能真的是“他妈的，又打偏了！”本想打韩爱晶的，现在却伤到沈如槐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打偏了，把派性打到孙怒涛头上了，人家其实是真的想“追寻历史真相”的呢，那就只好向孙怒涛道歉了！也请他原谅我的调侃，因为我是生性爱开玩笑的，但绝不想伤及别人，只想有个善意的幽默，博得朋友间的一笑！

其实很多历史事实，都是在追寻的过程中得到真相的。武斗的起因也是如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文革中，凡是没有分裂为两派的，一般都没有武斗，例如北航。而分为两派的，多数在激化后都发生了武斗，例如清华和北大。追溯武斗的根源，我认为还是要从大联合开始，说“武斗挑起双方都有责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事实依据的。就象大联合不成，也是双方的责任一样，自然责任有大小，我将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慢慢道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我也很想听到别人的分析，以便更好的总结历史。

这就是我对孙怒涛“追寻记”的一点小小的感悟。我是很赞赏孙怒涛这种执着的“求实”精神的，因为觉得这个过程有趣，所以写了下来。其中不少谬误，也望孙怒涛谅解，就当是朋友间的直言吧！

陈育延在《有感》里讲了她的许多“有感”。我不说别的，只想说点我听了她讲的这个“他妈的，打偏了”的笑话的“有感”。

每个人对这个笑话都有自己的解读。我悟出的道理是：人在做，天在看。当然，我不信佛，不信上帝，也与马列无关。我的“天”在我心里，是我的良知。我做事情的时候，我的“天”在看着我，监督着我，我要对得起我的“天”！只要能做到问心无愧，我即便是一只螳螂，管它螳螂后面有黄雀，管它黄雀后面有老鹰，管它老鹰后面有天网，我依旧做我该做的事情。

陈育延是个坦率的人、真诚的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1 01:15:57

二十二、转变自己

收到韩爱晶的信以后，第二天我给他写了一封名为“又收到你的来信，谢谢！”的回信：

韩爱晶：你好！

非常高兴继续收到你的回信。谢谢你的大度！

这几天我在一直反省自己，总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注意让你不快了。孙耘坦率地给我指出，说我设问时像个律师，在一套‘严密逻辑’之后总让人回答是或不，缺少讨论的余地。确实，我习惯用逻辑推理来判断是非真伪。要是做得简单过分了，是会令人反感的。你说的“似不可取”如果是这个意思，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

孙耘已经告诉我了，王大宾回忆的与你是一致的。我想，两个人同时记忆错误的概率是极低的。

孙耘在“澄清”邮件中说，调解清华武斗是1968年5月上旬的事情。我查了《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着：“5月5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由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负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

由此可见，你和王大宾发起、组织、参与的这一环扣一环，一步一步涉及若干人若干环节的调解武斗的整个行动，前半过程已经是不争的史实。之所以调解失败，除了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外，414因调查组有蒯大富在内而拒绝调查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现在推测：是不是由于414拒绝调查组，你们最终并没有与沈如槐见面？四十余年，你们错把你们在1967年9月来清华促两派大联合与沈如槐的见面当成是调解武斗的见面了？在促大联合时候，414在联合总部席位分配上的斤斤计较以及不愿承认蒯大富是一把手等表现激怒了你们，你们当时都气得拍桌子大声呵斥。这情景与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上描写的场景非常相似。这点务必请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武斗调解失败（如果我的推测成立，应该叫武斗调查因中途受阻而失败）最后导致

727事件。团四两派被赶出历史舞台，那是咎由自取。而因此导致全国学生造反派（不管好赖）的覆没和随后的被整肃，团四两派，错莫大焉！文革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如果清华武斗能成功调解停止，造反派（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虽然不能改变，但是它何时退出以什么方式退出）的历史将会改写，这点也是肯定的。所以，你对调解清华武斗失败的痛心和遗憾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孙怒涛 2011/05/19

在这封信中，我尽量注意不要再对韩爱晶采用我逼问他解答的态度。我希望能与他一起探寻这件事情的真相。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3 00:46:39

二十三、蒯大富小

如果5月初调解武斗如我所推测的那样是中途受阻而告夭折的话，那么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调查组被414拒绝。

北京市革委会这个调查组出台的背景是这样的：4月29日，两派在九饭厅前为抢粮发生了一次严重武斗。在冲突中，谢晋澄被汽车压死，汲鹏额头被砸负伤，414上下义愤填膺，抬尸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向中央求救，向市民呼吁，要求严惩凶手，阻止暴行。这个时候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

作为由北京市革委会出面成立的武斗调查组，从一开始就犯了两个明显的低级错误：

其一：作为调查清华武斗的调查组，负责人中有蒯大富，而没有414的代表是非常不合适的。诚然，蒯大富是革委会的常委，但是，因为这个调查组是专门调查清华、北大武斗的，蒯大富作为清华武斗相关一方的当事人，是被调查的对象，是应该回避，不能进调查组的。如果蒯大富进调查组，那么沈如槐也应该进调查组，那样调查组才有一个公平的形象，调查的结果才有可能为双方所接受。国共内战爆发前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的代表都参加调停组的。只有蒯大富参加而没有414代表参加的调查组，明摆着就是只调查414的武斗责任而不调查（起码不会认真调查）团派的武斗责任的。北京市革委会连装潢门面的一点公平都没有，政策水平之低是没法恭维的。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分设两个调查组，或者在这个调查组下面专设清华武斗调查组。总之，专门调查清华武斗的调查组中是不能有蒯大富或只有蒯大富没有沈如槐的。

其二：414抬尸游行坚决要求上级查清真相严惩凶手，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应

当知道，是因为武斗才死的人。只有平息武斗才能不再死人。调查武斗很重要，但是调查武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停止武斗。所以，“调查组”这个名称也是大可非议的。它说明了市革委会领导只着眼于“调查武斗”而不是着眼于“停止武斗”。应该更名为“关于坚决阻止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解组”，这样才能突显通过调解阻止武斗的目的。

因为上述两条，特别是第一条的原因，414 坚决拒绝调查组是完全有道理的，站得住脚的。

扪心自问，要是我当年留在校内的话，因为我所熟识的我系同学谢晋澄被压死，我最好的战友汲鹏被砸伤，我是无法克制对团派的万丈怒火的。在拒绝调查组的 414 头头中，我肯定是最坚决的一个，最不理智的一个，而不会比其他头头更高明更有胸怀！所以，要是当年，我肯定也是坚决拒绝这样的调查组的。

但是今日想想，414 抓住的这个道理只是小道理。414 忘记了一个大道理。

414 明知这个调查组的屁股是坐在蒯大富一边的，但是，如果能抓住北京市革委会调查武斗的机会、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武斗的停止，那样做才是着眼大局、紧跟形势、符合清华绝大多数师生反对武斗的愿望。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即使牺牲一点 414 的局部利益，也要实现武斗的停止，这就是当时应该遵循的大道理、大原则、大利益。

退一步讲，即使从 414 的派利益出发，通过向调查组中的韩爱晶、王大宾、鲁文阁等第三方通报清华武斗的真实情况，传达 414 停止武斗的真诚愿望，经由调查组向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反映清华武斗的严重形势和 414 强烈要求中央出面坚决阻止清华继续武斗，给调查组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让 414 从武斗被动挨打的局面中挣脱出来，避免 414 人员再有新的伤亡，这些，无论在政治上、道义上、舆论上、策略上都是对 414 有利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当时文革的大局出发，还是从 414 的派别利益着想，414 都不应该只想着小道理，忘记了大道理的。414 是应该同意调查组的调查，而不应该一口拒绝的。老老实实说，这是我今天才有的这么一点认识。在当年，所有的 414 头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这样的远见卓识，这样的政治智慧，这样的排解众说纷纭的能力。

蒯大富说过，“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对这句话，我是又信又不信。4 月 29 日武斗死人了，那时离 4 月 23 日武斗爆发才不到十天，我不相信蒯大富这个时候就后悔了。极可能是蒯大富看到 414 受到重创正得意着，正要一鼓作气彻底摧毁 414 呢。5 月上旬成立调查组的时候，那时的蒯大富并不希望北京市革委会来干预清华事务阻止清华武斗的。《清华蒯大富》P334 中写道，1968 年 5 月 1 日，陈伯达严厉批评蒯大富，要他“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但是十多个总部委员，“少数人主张见好就收，不要把武斗搞大，但多数委员主张打下去，要打到中央

表态 414 是错的才行”。在团派多数总部委员坚持要打下去的时刻，414 没有抓住外部扔过来的有可能导致停止武斗的一线机会，反而拒绝了调查组，这是非常遗憾的。

如果说蒯大富懊悔武斗，那很可能是在五三〇大战以后。据我猜测，蒯大富并不是因为发动了武斗犯了大错而后悔，很可能是因为经此一役团四两派都死伤惨重，中央一直不表态，414 死硬不低头，弄得蒯大富打又打不赢，退又没脸面，上面的压力日益加重，社会舆论也日渐反感，他对主战派的控制能力逐渐丧失，处于上下两难内外夹击的尴尬境地。我心想，蒯大富这个时候的内心可能是希望北京市革委会再成立一个停止武斗的调解组的。要是韩爱晶不是在上一次而是在这个时机出面调解，我想蒯大富和沈如槐都可能会真心配合，调解成功的希望极大。只可惜，历史的机遇只有一次，错过了上一次，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了！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4 01:13:27

二十四、从心和解

5月18日，我请孙耘把《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贴到63/64社区上了。我加了一个按语：“本文连载发表。全文还未完稿，因为事件的真相尚在继续追寻中……”。这里“连载发表”为了增加点悬念，“继续追寻中”则是实情。因为真相不仅在这一天，即便到今日此刻还没有完全揭秘。

首篇贴出没几篇跟帖，这是预料之中的。尽管我是第一次现身社区，就只发了第一段“事情原委”，有什么好评说的呢？

我希望以后的跟帖多一点，这样找到线索的机会也多一点。但是我也知道，每个人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我感兴趣的、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别人不见得认为重要，值得关注。所以我也以平常心对待校友的跟帖。能有一个平台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告诉世人，我就感到满意了。

第一天的一篇跟帖引起了我严重注意：“原以为卢沟桥之约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到头来却变成了鸿门之宴（发起者也许是好意），失望至极。呜呼！历史的鸿沟竟然如此之深。”

我的这位校友看到我是在追寻这样一件陈年往事，在对卢沟桥聚会的结果表示失望之余，还担心我这篇文章又要在校友网上掀起武斗之争派性之战了。

孙耘来信也表示了他不想看到对武斗种种是非的争论。我的本愿也与他一样。

既然已经开了头，我现在所能做的，一是尽量态度平和、用字谨慎。二是不在网上与人争论。我相信，等到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多数的校友都会说，孙

怒涛确实只是想追寻真相，不是想来挑起争论的。至于追寻这件事的真相有没有意义，有多大意义，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位校友期望卢沟桥之约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点上，理解他的愿望，但感觉他对这次聚会的期望有点过于美好和理想了。我答应参加小聚会的时候，对聚会的前景也是有期待的。我希望这是一个气氛平和、态度友好、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聚会。会上肯定会有争论，但是绝对不要吵架。蒋南峰在会前给我一个邮件说，要是吵架他是不想去的。我说据我估计，争论是难免的，吵架是不会的。聚会已经结束了，实际的聚会并不是如这位校友所担心的那样是鸿门之宴，当然，也够不上团结的、胜利的聚会那样的高标准。

两派的头头和骨干坐到一起，互相征询甚至质问，这比08年的第一次聚会已经是个进步。因为不仅是相逢一笑，还有了实质性的交流。对团派来说，向来很神秘的陈楚三首次参加这样的聚会，最想询问他的是他与康生的真实关系如何。陈楚三在会上会下解释了不下五六次。我也抓住机会向老蒯征询我感兴趣的这件事。所有的征询、争辩、解释都是在比较友好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的，没有一次是伤感情的争吵。只要是氛围友好，这样的质询能搞清真相、消除疑团，有利于反思。我听到一位老团朋友听了陈楚三的解释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414确实没有什么后台。我想他以后就不会再去钻那个牛角尖了。这是好事，也是开诚布公“对话”后的一个积极成果吧。能够求同存异，能够达成共识，那当然是好事。我认为，学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比具体分歧的消除更为重要！

那天上午按年级高低发言的时候，轮到崔兆喜，他说着说着他想唱派歌的冲动上来了。他又担心唱派歌会让我们这些414的人有所不快。我们都说没问题，热烈鼓励他。于是他引吭高歌“414上台是不行的！”，接着又唱“井冈山是老蒯的山”，逗得我们捧腹大笑，鼓掌热烈，现场气氛更为活跃。这场景，即使几年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两派同归于尽已经四十余年了，还有没有派性？我认为，派组织消亡了，派利益没有了，派性存在的土壤和气候不复存在了。所以，派性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是，还有一点小小的残余，主要表现在希望在评价两派时对自己的这派肯定得更多一点。这说到底，也有一点希望自己的历史更多地被肯定一点的私心。这点私心可以理解的，只是，不要因此而太影响了自己的客观认知和评判就行。

至于因为全身心地参加了某一派，对这派有了深厚的感情，所以至今保留着的派情结是很正常的，派友谊更是可贵的。现在两派都在以宽厚、包容之心看待之、对待之。有机会多参加一些两派的联谊活动，对于消除心灵上的创伤，弥补心理上的缺憾，增进深层次的友谊，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是或即将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是很有益处的。

绝大多数两派群众早已忘记了两派的间隙。他们很不理解，都四十多年过去

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为什么两派的头头派性还那么强？即使坐到了一起还是老提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哪一天才能“走出文革”呢？我想说，我们已经能坐到一起比较心平气和地谈天了，这是第一步。我们谈过去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心中还结着冤仇，是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不少疑团几十年来一直纠结着我们。古典小说上常有杀手在杀人前会说一句“让你死个明白”这样的情节。团派和 414 都“死”了，但是我们有不少“死”了还不明白的东西。坐下来，为对方透透自己的老底，解开对方的疑惑，可能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等到该知道的底情知晓得差不多了，该解开的疑团也破解得差不多了，那时两派坐在一起就会更多地总结教训，寻求共识，反思历史，评点现实，才会把两派的和解上升到新的高度，深化到新的深度。

陈育延被 414 当做人质绑架过，绝食了多天。陈楚三被团派毒打过，被当做反革命扭送进公安局。他们的身心都遭受过严重的创伤。现在他们能坐到一起，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宽的胸怀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一直都记着在 68 年春的高校学习班上，两派头头同坐一桌互相仇恨的眼神）。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所遭受的伤害比这两位更严重更惨烈。他们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至今都不敢想、不愿提。对他们，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份理解、一份耐心，更多的一点鼓励、一点肯定，让时间慢慢地去抚平伤痕。

团四两派从减少对立、和缓情绪开始到现在的互相征询、弄清真相，都只能算是和解的初级阶段。我希望以后能提升一步，共同来检讨自己、总结教训，以后再提升一步，共同来反思文革、探求文革之所以产生的制度、文化、历史等深层次的原因。若果能如此，也不枉两派恶斗了一场。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两多”原则：多想想自己以及自己这派的错误；多承担自己及自己这派的责任。责己严一点，责人宽一点，大的是非要搞清，小的细节装糊涂。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不仅从理智上更是在情感上真正做到“相逢一笑泯恩仇，豁达从容度余生”。这里说的“泯恩仇”，我想要是能做到“存恩泯仇”，那样会更好一些。

说说容易做做难啊！我实在算不上是大度的人，所以我很钦佩汲鹏的豪爽、豁达、大气。我记得团四的和解是从汲鹏在深圳接待蒯大富夫妇开始的。那时，他是受着多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开创和解之旅的。罗征启在两派和解的道路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他那常人难以做到的举动令我的心灵震撼！他们都是我所敬佩的人！

为什么我会计较“414 不愿停止武斗”这种说法？因为它确实涉及到责任。诚然，这个责任无论有无、无论大小都已经于事无补，而且，这个责任既不是法律责任，也不是政治责任。它是一个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而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对我们来说，是现实必须面对的责任。

历史责任由不得我们这些当事人评定，愿意不愿意都得我们这些当事人承担。

而道义责任的承担，没有谁能强迫你。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要背，也是在自清、自觉、自悟之后自愿背上去的。

虽然我们在这个责任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会争执、会辩解，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地争执和辩解。这是与四十余年前完全不同的大环境。

我现在的觉悟也仅仅是要求自己两个“多”一点而已。我做不到更“多”，譬如说，“多”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仅仅凭老韩的深刻印象就让我心甘情愿地承认 414 不愿停止武斗的责任，并为此而反省。

“走出文革”是我们真诚的、善良的愿望，我赞同，我支持！但是，正像中国至今尚未走出文革一样，我们这些深陷当年清华派战泥潭的头头们，以及许许多多在肉体和心灵上曾遭受了重创的师生们，要想走出清华文革，路途漫漫，远不如“挥挥手，不留下一片云彩”那样的潇洒、浪漫、简单。

文革派战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两派开始和解也已有二十年了。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和解的？十年？二十年？绝对不会再有四十年。若干年后，当我想对被我伤害过的他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很可能我那时不在了，很可能他那时不在了，很可能我和他那时都不在了。

在“从心和解”的路途上，我愿与大家共勉！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5 01:07:32

二十五、收获朋友

又有好些时日没收到韩爱晶的来信了。给王大宾的邮件也不见回音。闲来无事，这几日写的都是与追寻不太相关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与孙耘之间几乎每天都有邮件往来。从开始的比较客气、拘谨到慢慢的随便、放肆，有时候还能开点玩笑、来点幽默了。他说我的思维方式有些“钻牛犄角尖”，我说他给我挑刺有点“胡搅蛮缠”。我们在信件中观点相同时就互相“吹捧”，意见相左时就据理争辩。他提醒我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也懂，只是事到临头就忽视了）。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我赞成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只是认为“指控”这个法律用词用在这里有点过于严肃了点。他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认为大家都有提供线索举证的责任，当然那是道义上的责任，那样才能尽快查清真相。

交友之道，我对人的品性（品行、价值观、性格等）的认可比对政治观点的认同更看重。我与许多团派的头头都是关系不错的同僚，与不少老团都是熟识的朋友。尽管后来观点上严重对立，但是我心里一直都很尊重他们的。

像孙耘这样的，以前只是没机会接触而已。要不是因为追寻这件事，我对孙耘的印象一直会停留在从前阶段。通过这段比较密的交往，互相有了比较深的了解，虽不能说是已经成了至交，但已是互相信任、真诚相待、坦率相对的好朋友，这点是肯定的。这是我这次追寻中所获得的最宝贵的“副产品”。

我收获的朋友不止孙耘一个。

因为他刚把我的第一篇文章贴到社区里，有事要去上海了，不便再为我转帖，他就把我介绍给连果义。这样，几次通信下来，我与连长之间也已比较熟悉了解了。连长是我的“新朋新友”，因为至今我们还没见过面，没通过话，连他长个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但是，已经有一种好友的感觉。

而陈育延，因为小聚会，因为这篇追寻记，她成了我的“老朋新友”，彼此间的了解更深了。

我收获的其他朋友就不一一列举了。

“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是人在江湖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对，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靠关系才能生存得更活络的国度里。我想再补充一句：“多个朋友多份情”。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代重情谊的人，对于我们这一年龄段需要感情的人，“多份情”远比“多条路”重要得多，受益得多！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5 21:45:21

二十六、何谓历史

何谓历史？这题目太大、太深、太专、太玄。

我的朋友汲鹏有一句名言，想必那时的清华人都记得的：“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文革年代，口才好的头头有好几个。老蒯的口才绝对是一流的。唐伟的口才也绝好。但是，要够得上演说家称号的，非汲鹏莫属，也仅此一人。几十年后，众人还能记得某个人的某句话的，汲鹏是这极少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这是汲鹏的历史观，我也赞同这一观点。不过，我要补充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历史，以我理解，是指历史事实、历史真相或史实。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一观点的。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雕刻的历史”，“雕刻历史和假设历史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猜测，这里所说的历史，如果是指对史实的评说，那是对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评说史实，得出自己的历史。要是说历史是指史实，那这个“历史是可以任人雕刻的”，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历史是任人雕刻的历史”

这样一种表达或口号，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容易助长戏说历史、胡编历史、新编历史都当作严肃的科学的历史的不良倾向。这样的标新立异，我不欣赏！

史实是唯一的客观存在的，它是不会因被年代湮灭或被岁月遗忘而不存在。但是，每个人描述这个史实所得到的历史，往往已经与客观存在的史实有一定差异了。而评说这个史实所得的历史，肯定更是五花八门，有时互相矛盾。

“韩爱晶来清华调解过武斗”这一说法我认为已经是不争的史实，因为这有可靠可信的史料佐证，而且至今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韩爱晶来清华找到沈如槐调解武斗”这一说法，是韩爱晶、王大宾提出来并至今还坚持着的，而沈如槐对此是否定的。我们无法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yes or no”的问题，只能靠证据说话。

为什么描述的史实与客观存在的史实会有差异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因为每个人都像是在瞎子摸象，把局部史实当做整体史实。
2. 因为记忆失误。不要说对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会有记忆混淆、时空错位的可能，即使是昨天发生的事情（相对于今天来说，也已经是历史），在细节上也会记忆失误的。
3. 出于各种目的的歪曲真相（譬如把摸到的象腿说成是一根筷子）或选择性遗忘（只记得对自己有利的，“忘记”对自己不利的）。

前两个原因情有可原。我们只能尽量减少，无法完全避免。

第3个原因，我觉得很可恶，但是，这样的情况时时处处都存在。

在我所追寻的这一事情的真相上，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出现第3种那样的情况。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真实的力量源于细节。如果重要的细节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16 10:46:39

二十七、育延结论

前几天，陈育延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有多长？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八个字！这是她暂停了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大事，花了好几天功夫用心写成的。尽管她下面这一大段详尽的分析我能接受的并不太多，但是她在信中所传达出来的真诚、坦率、平和、善意、我是充分感受得到，让我极为尊重的！

陈育延在这封信的结尾段建议我《追寻记》可以“关门大吉”了。其实，就在我看到她信的一半的时候就直觉地感到，现阶段，这个真相不可能大白，再继

续追寻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追寻记》如何收尾？我经过几天的思考，决定在“真相各表”之后，我再写个结束语，宣告《全文完》。至于陈育延精彩的长信（其中包括比上一次公开的更为精妙绝伦的四篇日记），我将以《追寻记外篇之N》的形式发表，与大家共享。

马英九对两岸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一中各表》的原则。我想，在对真相无法达成统一共识的时候，各自发表真相的结论及其依据，让公众、让后人、让历史去做评判，是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

陈育延在来信中详细谈了他为什么支持韩爱晶的7点看法，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她支持韩爱晶的理由，最后从人证、物证中得出她的结论。我相信，她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部分，我全文摘录如下：

谈谈我对追寻结果的看法。

1、韩爱晶是一个可信的人

文化革命中，我跟韩爱晶的接触比较多，对他也比较了解，我的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我对他一直印象很好，因为北航没有分裂，也没有武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正派的人。他跟蒯大富的关系不一般，除了关心蒯大富之外，还常常会纠正蒯大富的毛病。蒯大富是今生有幸，遇见了韩爱晶，这么帮他！只要清华有事，不管好事坏事，韩爱晶一定到场。韩爱晶在6月11号给我的邮件中，只讲了三次重大纠偏：

“1967年4月前后，我去你们总部，真诚希望能说服蒯大富及总部委员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1967年9月，去你们学校说服两派大联合：

1968年5月，我在市革委会提议成立调解武斗小组，实际是不满意聂元梓、蒯大富。两人分别为市革会副主任与常委，北大、清华搞武斗，怎么要求其他单位响应市革会号召停止武斗呢。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北大清华武斗。我太天真啦，调解过程受到强烈抵制。失败而散。此事成为我几十年的心结，也深藏对谢富治吴德等人埋怨之情。真是一直耿耿于怀，哪会忘记！”

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清华武斗他一直是坚决反对的。我1968年11月，在大联委学习班上有一个“检讨”材料，讲述了1968年7.27前后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段，讲到韩爱晶，是说我从科学馆被放出后，在静斋养病期间的一件事，摘录如下：

6月初，韩爱晶到清华来找蒯大富，顺便看望我。和我谈到清华武斗，当时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武斗应该停止了。因为我校武斗死的人既不是反革命，又不是走资派，都是些青年学生。韩爱晶要我在总部里伸张正义，但当时我在病中，而且这种观点在总部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我不愿多管。当时在场的还有叶志锡（叶志江的妹妹，她在清华照顾我），和与韩爱晶一起来的一个北航的人（不认识）。

[摘自1968年11月文革履历]

这只是说明，韩爱晶特别爱管清华的事，是为蒯大富好。所以我相信他讲的和王大宾、鲁文阁一起来清华调解武斗之事。他这个人一向办事严谨，从不乱说乱吹的，和蒯

大富性格完全不一样。而且清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与中央制止武斗的精神完全不符，他不可能不来清华调解。即便是没有市革委会的调查组，他个人都会跑来劝阻蒯大富的，就象 6 月初这次。更何况 5 月初有了调查组，他名正言顺地来找双方，正是他急于要作的。我也是根据他的一贯行为来相信他会作这件事的。他的话，我认为很可信。

2、至于为什么场景相似

韩爱晶和王大宾 1967 年 9 月 24 日来清华谈大联合，与 1968 年 5 月来清华调解武斗时的场景非常相似。一个是“王大宾说：“414 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另一个是“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乍一比较时，我开始也觉得非常相似，也许两件事搞混了。但仔细一想，一点也不奇怪。这种场景一年之内重复发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沈如槐一向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不管是谈大联合，还是武斗对抗上，都是决不妥协的。这点你也知道。所以蒯大富至今还讲：“如果不是沈如槐当头，如果是孙怒涛或汲鹏当 414 的头，两派早就联合了。”而王大宾也是一个年轻气盛的人，当他想完成某件他认为正确的事，而被强硬派对抗时，他会气得大声喊叫，这是性格特点。而一年之内这种性格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因此对于沈如槐的两次强硬态度的回应很相似，应当是很正常的。

3、至于韩爱晶说的与沈如槐“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只有一次，可以作多种解释。也许他认为 67 年 9 月 24 日那次不算与沈如槐个人的重大政治交往，因为那天，两派众多委员坐在一起，并没有突出沈如槐一个。因此王大宾说：“414 太滑头了！”而不是说：“沈如槐太滑头了！”。韩爱晶也不会在众多总部委员中，注意到哪一个是“苏北味”。那次是集体交往，看到的只是 414 总部这个团体。他对沈如槐个人没有很深的印象，是很正常的。但 68 年 5 月就不同了，他们与沈如槐直接面对面交锋，印象深刻，韩爱晶才会注意到沈如槐的“苏北味”。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次是与沈如槐（个人）的重大政治交往。

4、促成清华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是市革委一直敦促蒯大富完成的。调解停止武斗的目的，也是为了大联合。因此两件事一起谈，是很正常的。

5、你要求韩爱晶讲出“1. 整个事情的过程，譬如他们是在哪天、通过与谁的联系、有谁引着、在什么地点、除了沈如槐以外还有谁参加了这次会商？他们对停止武斗提出了怎么样的建议或条件？沈如槐是怎么回驳他们或提出反条件的？”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没有录音录像，他们是去劝说，不是来清华开会，所以也不会有记录。四十多年前的某一次谈话，具体说了些什么，不会记住很多内容的。但记住了“蒯匪”的说法，这是只有武斗期间才会有，所以可信。至于在哪里见面等等，由于韩爱晶和王大宾都不是清华学生，很难要求他们了解或记住见面地点。举一个例子：你在第十四节中所说，韩爱晶书中谈到，你去北航找过他们，你自己却“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要你讲出四十年前，你是在北航的那个地点找到勤务站的人的，你一定讲不出来，因为你连事件本身都忘记了。如此，你又怎么能苛求别人记住四十年前在清华的某个地点呢？否则就好像“证据不足”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而韩爱晶能记住你去找过他，说明韩爱晶的记忆力很强，因此很多大的事件，他不

会遗忘。但再好的记忆，都还是会有误差的，如果拿小的误差，来否定最基本的大的记忆，那你是永远也不会得到结论的。

6、几天前，6月17号，我与韩爱晶通过电话，先是我打去，后是他打来，电话谈了半个多小时，也谈到了你追寻的话题。6月18号，我与王大宾也通过电话，他的记忆虽有所模糊，但两人都非常肯定：武斗期间来清华调解过，是直接与沈如槐谈话。虽然年代久远，已有四十余年，具体谈话内容已记不起全部，但两人的共识是：武斗期间为调停武斗，两人共同来清华，都先见过沈如槐，无果而归。

我想，也许清华双方都并不直接表示拒绝调停，因为北京市的政策，是不支持武斗的，否则也不会成立刘绍文为组长的调查组（实为调停组）。但双方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因此蒯大富想要谢富治处理我校问题，“谢说处理不了”。而沈如槐提出，“蒯匪”大富不能“承认他是一把手”，这在当时也不可能，因此调解失败。提出苛刻条件，本身就是拒绝调停的最好手段。

韩爱晶在5月18日给你的信中说：“4、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边都不会停，蒯大富只是后悔自己“想让中央表态”的投机失算了。真正的后悔是武斗结束后，否则也不会有7.27对抗工宣队，而真正的悔恨，是在文革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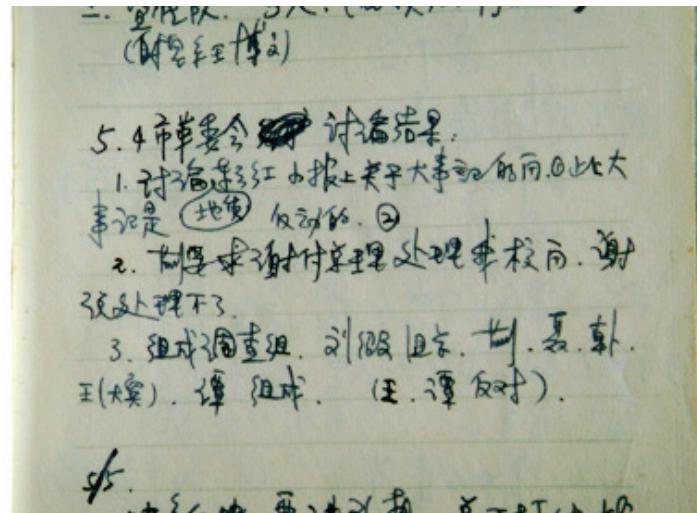
当年的武斗，即使蒯大富不想打了，团派还会有更极端的王大富、李大富坚持要打下去。7.27工宣队进校，蒯大富在7.28凌晨的总部会议中提出要撤，但少数强硬派坚决不撤，因此后来发生了9003大楼的严重对抗，这就是明证。而414的沈如槐，即使他不与“蒯匪”打下去，还会有王如槐、李如槐出来与“蒯匪”斗，只不过他是头，韩爱晶、王大宾直接先找到了他，他提出了当时不现实的要求，调解失败。也是算他倒霉，给摊上了！

总之，双方的不妥协，应当是调解武斗失败的原因，而见面调解，应当说是肯定有的。

以我对韩爱晶人品的了解，他这个人很讲理，因此在北航能服人。当然他也如常人一样，为人处世也会有感情色彩，但如果他发觉自己记忆错了，是绝不会为了自己的自尊而掩饰的，他一定会负责任地纠正的，这点我很相信他。而他给你的信中，始终是讲“有的”，给我的电话也是如此，说明他很肯定。更何况还有王大宾的记忆，这是两个可信的人证。

7、你问：“他有什么史料（譬如当时的笔记或向北京市革委会的汇报材料等）可以佐证他的说法？”韩爱晶回答说：“如果有人能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就会一目了然。”显然，现有人员是无资格去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的。但我这里1968年5月4号的笔记本上有这个记录，是当时总部会蒯大富传达的。这个真实的记录，就印证了市革委的史料，证明有刘绍文为组长的调查组的存在。而这个调查组是不可能无作为的。如果你要看物证的话，那么这个就应该算，其他你不可能看到更高级的了。6月11号我将工作记录的照片发给韩爱晶后，他回函“非常非常感谢”我。

现在，我把这个照片也发给你。



1968年5月4日陈育延工作笔记

综上所述，可以说你的题目《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已有结果。其中一个物证（我的笔记），两个人证（韩爱晶、王大宾）。物证证明了调解武斗的必然性，人证证明了确实来调解过。在我看来，这已足够了。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找到了沈如槐，但未谈成。

你问我“能反驳我吗？”以上七点，就是我的回答。其实我在6月10号的《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中，已经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了，只是怕你受不了，所以讲得很委婉。这次再重新讲一下我的理由，不知能否让你认可。

我认为，如果你还在疑惑：既不能否认“有”，也不能否认“无”，那不是因为“可信的证据”不足，很可能是残留的派性，让你无法跳出来公正的看问题。李自茂说得很对，“屁股决定脑子”。日本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罗生门”，是大导演黑泽明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人们的心理活动，其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台词：“人都自以为老实，都把自己合适的话当作真话，而把对自己不合适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这样才心里舒坦。”他说的是人的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并不是故意想那样作。我想，无论是追求真相，还是写自传，似乎都应该注意到这种心理，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但我常常会用此提醒自己，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你从一开始，就为自己下了结论，是为否定“韩爱晶来清华调解过武斗”而追寻的。但是追寻到后来，你自己先疑惑了。于是你本能地在寻找新的理由，去驳斥这种疑惑，总想找出证据中的“漏洞”，来否定你心中正在形成的结论。

也许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能认真参考一下我的分析是否有道理，会忽然发现，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已经不需要新的证据了，也不需要再追寻韩爱晶了，这些就足够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你在6月11日给我的来函中说：“我希望韩爱晶给我们提供一点他来清华与沈如

槐见面的具体线索，那样我会以同样的热情和劲头去追问沈如槐的。”

这一点其实我不大赞成。也许你觉得只有沈如槐的话与韩爱晶、王大宾不矛盾时，才能使你觉得可以作结论了，但这可能吗？有些事，如果确实是忘记了，但经过追寻，可能又依稀记起，不敢确定，你让他怎样表态呢？难道推翻原来的回答吗？依我对向来自尊心很强的人的了解，“改口”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自己还不能确定，你又何必非要逼他呢？你们有几十年的情谊，如果追问下去，会伤感情，这种内心的痛苦，会让你们都后悔的。我希望在公正地对待历史事件时，能尽量地和谐，不管是两派之间，还是本派内部。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轻松一些。

你在第二十三集“孰大孰小”中，设身处地地为沈如槐作了辩护。我当时的感觉是：你给沈如槐释放了一个善意的信息，言外之意是：即使有拒绝调停之事，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换成你，“肯定是最不理智的一个”。我当时产生了错觉，觉得似乎你是在劝说沈如槐“认错”。于是我觉得，螳螂追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会是沈如槐。我在6月10号的《有感》中，对你诱捕韩爱晶写的螳螂捕蝉的原话是：当孙怒涛将要捕到韩爱晶这只大蝉时，他不会想到后面还有一只黄雀在盯着他。黄雀大声叫道：“且慢！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你不能确定调解的事不存在。”但录入时，觉得戏剧性太强，将感叹语气全部删去。现在我按原语气把螳螂捕蝉继续写下去：黄雀看到螳螂正在捕捉下一个目标，觉得好笑，又大声叫道：“且慢！你面前的不是一只蝉，而是一只小螳螂，你们是同类，放了它吧！”这就是我的态度，我不主张你再继续追问下去了。有些事，点到为止，没有必要追求那么完美，以免伤了感情，你已经对还原历史作了很大贡献，我不主张太追究个人的责任，毕竟那是历史造成的，到此为止吧！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26 13:08:34

二十八、老沈声明

所谓的“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这一事件，最重要的两位直接当事人是韩爱晶和沈如槐。

韩爱晶给我来过三封邮件，我都全文刊发了。

韩爱晶已经无话可说了。我这话的意思是，韩爱晶已经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說完了，暂时已经没有话想说了。我真希望他多多说话，多多给我信件，那样我的《追寻记》可以不断地连载下去。韩爱晶无话可说了，也是《追寻记》不得不“关门大吉”的原因之一。

现在是将沈如槐的观点公诸于众的时候了。沈如槐的观点如下：

我的观点有三条：

(1) 剌大富的这段话是谎言。

(2) 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期间，我从未见过韩爱晶、王大宾、鲁文革等人，也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四一四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之类的话。

(3) 韩爱晶说他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期间找过我，他必须出示证据，时间、地点、人物、史料等等。蒯大富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述（沈如槐说“四一四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不是凭记忆凭印象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有史料，必须有证据。

沈如槐所说的“蒯大富的这段话”，就是我在2011年2月7日在给他的一封邮件中的那段话。我的那封邮件的全文如下：

楚三、如槐：你们新年好！

看到楚三给我传来的老蒯口述回忆文章了。其中有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我向你们求证一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谢谢啦！

老孙

沈如槐很快（2月9日）给我回了信。回信全文如下：

怒涛兄：你好！老蒯的这段话是谎言。我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395页--397页对此有记载。沈如槐

我对于他这封信的反应，在本文《事情原委》中如实记录了：

我首先征询沈如槐。他的回信很短，矢口否定了这件事，并说他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395--397页对此有记载。我赶紧翻开重读，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没有公布沈如槐信件的原话。我用“矢口否定了这件事”替代了“老蒯的这段话是谎言”。为了这一容易引起口水引发派性的敏感追寻尽可能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我把沈如槐表态的话有意抹去了。沈如槐并不知道我的用心。他对我没有把他的真实观点公布出来是不满的。我想，当他看到我在《几种猜测》中对“谎言”说进行“批驳”时，他的心里不知道会不满到何种程度。

沈如槐后来在信中给我详细解释了他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谎言：

我的邮件一方面指出蒯大富在说谎，其谎言包括：(1)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2) 韩爱晶找沈如槐，沈如槐表示，414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

另一方面，我的邮件指出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395页--397页记载了414奔走呼号、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等手段要求中央和北京市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和蒯大富想把武斗进行到底，把414赶尽杀绝的史料和史实，这就是对蒯大富谎言的驳斥。

“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这句话，是蒯大富在《岁

月流沙》里说的，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没有说过这句话，他在给你的邮件中也没有完整地说过这句话。

我的主要对象是蒯大富，而不是韩爱晶。

所以，我与韩爱晶并不是对立的当事人。

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你始终把征询的目标对着韩爱晶，而不去追问沈如槐。我想说的是，我已经追问过沈如槐了。在沈如槐告诉我这些以后，我无法再追问沈如槐。

犹如甲与乙，甲说乙偷东西了，乙除了说“我没偷”和“你说我偷你拿出证据来”这两句话之外，还能再说什么呢？丙还怎么再去追问乙呢？

我可以坦诚地说沈如槐的派性比我要强一点，观点比我要尖锐一点。然而，我知道我所追寻的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直接的间接的当事人来说，是一件重要的大事，我不敢马虎，我还得追问沈如槐，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好几次都在电话中间沈如槐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有可能忘记了？能不能向我保证？问得沈如槐差一点跟我急了。

正因为我的基本判断是韩爱晶记忆出错了，所以我专注韩爱晶的每一句话。我一直希望韩爱晶能提供可信的足以佐证沈如槐记忆出错的证据。那样，我必定回过头再去质问沈如槐。

揭开历史的真相与辨清强加在 414 和沈如槐头上的不实之词，这两种思想我都有，交织在一起。我承认我有派性，这就是我最大的派性。但是我还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让派性蒙住了双眼，失去理智的判断。

许多人都知道沈如槐有一个“三不原则”（不参与、不支持、不评论）。我曾给他发去《追寻记》的前 16 篇文章，他一字未评。他后来告诉我，他没有对《追寻记》发表评论，不是因为“三不原则”，而是因为虽然他与我之间有许多重要的分歧，但是他尊重我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

当我把第 23 篇文章《黄色预警（初稿）》（题目的意思是连载只剩下两篇草稿，快要成无米之炊了。文中有一段写的是我与沈如槐之间的一次通话内容）发给沈如槐，并特别点名要他提出意见时，他才说，“坦率地说，你的文章把对方的观点如实照录，却没有反映我的观点，这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公平的。”我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已经够重的了。

在这篇初稿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沈如槐斩钉截铁的话我在这里公布于众，我的追寻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阳光工程（咱逮住机会也搞个工程过把瘾）。要是最后的结局竟然是韩爱晶确实与沈如槐见过面调解过停止武斗，诸位校友问我老孙你怎么办？我也把话撂在这里（又想借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那句“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的台词）：我就“真相归真相，老四归老四！”

这篇初稿我征求了几位朋友的意见。一位说，应该公布沈如槐的观点，要不对他太不公平了。一位说，这样公布怕在社区里引发激烈的反应，效果不好。还有一位说，还是缓一缓再说吧。

最后，我选择了缓一缓。我再次显示了我的“派性”。因为我是 414 头头，为了追寻真相这件事情能顺利平和地进行下去，我宁愿让沈如槐暂时委屈一下，我宁愿被他一时误解，我也只能先这样了。

沈如槐说：真相只有一个，迟早会大白于天下。……蒯大富把污水泼到我身上，我并不急于澄清，我也不一定去澄清。我确信：严肃的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一定会认真查阅史料，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会只凭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几句话就相信他们的论述。

沈如槐还说：**我面对此事淡定、坦然，是因为我心中无鬼，心中也无愧。**

尽管我很不满他在我的追寻过程中始终采取“超然”的态度，但是，他那份淡定和坦然，我还是很欣赏的！

《追寻记》再发表两三篇后就要结束了。“真相各表”是我的态度。不仅直接的间接的当事人可以“真相各表”，也欢迎各位校友凭着自己的判断来一个“真相各表”。

说理的争论是我所欢迎的，谩骂的争吵是我所反感的，这是我一贯的态度。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6-30 07:23:41

二十九、楚三结论

当我决定以真相各表结束这篇追寻记以后，我把《育延结论》传给陈楚三，希望他写一篇《楚三结论》。

陈楚三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只是，这段时间他非常忙，奔赴在上海、嘉兴、新疆等地。我能理解，建党九十周年，对于他有一种更为特殊、重大的意义。所以，我只有耐心地等待。我也委婉地告诉他，我现在就等他的米下锅了。

终于等来了陈楚三“关于清华武斗的第二封信”。我全文刊载于下：

怒涛兄：

接到你的邮件，你说你的《追寻记》准备关门大吉了，一个重要原因是韩爱晶不再回应你。我看，他也实在没有可以让你下锅的“米”了。

其实，韩的回应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陈育延已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足以证明邱心伟《清华文革亲历》中的记载：**1968 年 5 月 5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聂**

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等负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

陈育延在6月10日给你的信中说，这段叙述来自蒯大富、韩爱晶的口述。我不知道育延学妹的判断有何根据，但却说明她认可邱心伟书中的这段记载。不过，她忽视了这段记载中的最后一句话：“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

特别是陈育延1968年5月4日的笔记更是有力的证据。请看

市革委会讨论结果：

.....

组成调查组。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大宾）、谭组成（王、谭反对）。

这已经证实了邱心伟书中的记载，同时也说明韩爱晶的回忆确实有误：是“调查”而不是“调解”；小组中有蒯、聂而没有鲁文阁（除非在会后增加了鲁文阁）。

我看了育延学妹的结论：“**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找到了沈如槐，但未谈成。**”

此结论的论据如下：“韩爱晶是一个可信的人”（所以“相信”他讲的和王大宾、鲁文阁一起来清华调解武斗之事。”）；“为什么场景相似”（“这种场景一年之内重复发生是完全有可能的”）；韩爱晶说与沈如槐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只有一次，“可以作多种解释”（“也许他认为67年9月24日那次不算与沈如槐个人的重大政治交往，因为那天，两派众多委员坐在一起，并没有突出沈如槐一个”）；“调解停止武斗的目的，也是为了大联合。因此两件事一起谈，是很正常的”；等等。

显然，育延学妹的“结论”，都是“推论”出来的（注意我加粗的用词）。

我们要追寻的是，①蒯大富所说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是事实吗？②蒯引证韩的话“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是事实吗？这两个问题，涉及清华武斗的基本史实，含糊不得；从第二个问题，才引出第三个问题：③韩爱晶、王大宾当年调解清华武斗见到沈如槐了吗？

对于第三个问题，尽管育延学妹费心论证，但她使用了诸如“相信”、“完全有可能”、“也许他认为”一类的词汇，这已经使她的“结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如果说沈如槐“是个可信的人”，“相信”他讲的话都是事实，由此得出的结论能有多少说服力？

陈育延说“调解停止武斗的目的，也是为了大联合。因此两件事一起谈，是很正常的”。育延学妹的这个解释，实在是太牵强了。就算“很正常”，也得先谈停止武斗吧？总不能跳过停止武斗问题，直接谈大联合吧！承认老蒯是大联合后的一把手，武斗就能自动停止吗？韩爱晶说调解停止武斗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那为什么涉及停止武斗的内容一个字也没有？

因此，依据邱心伟书中大家认可的那段记载，我给你的上一封信得出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等试图来清华找414调解武斗，但因调查组中有蒯大富，被414认为不公平而拒绝；韩爱晶等没有见到沈如槐，未谈成。**

我给你的上一封信，曾经问道：如果蒯大富参加韩所说的“调解”，以韩爱晶的政

治智慧，难道认为武斗当事人也可以担任武斗调解人吗？同样，以陈育延的政治智慧，难道也认为武斗当事人可以担任武斗调解人吗？

如果换作是我，也一定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调解”，因为蒯大富没有这种“调解”的资格。顺便提一句，蒯、聂参加这个调查组，反映了谢富治、韩爱晶等对蒯、聂的偏袒，谢富治关于“送派菜”的臭名昭著的讲话，我还言犹在耳。

陈育延列举了韩爱晶反对清华武斗的事实（我相信）后，说道“5月初有了调查组，他名正言顺地来找双方，正是他急于要作的。”可是，不论是在韩爱晶的书《清华蒯大富》中，还是在他给怒涛兄的信中，都没有体现出这个“调查组”找了“双方”，他们去北大没有提到找聂元梓，到清华也没有提到找蒯大富。所以我才说：“**如果调解清华武斗而不找蒯大富谈，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所谓‘调解’，就是纯粹的骗局，就是借‘调解’之名压老四屈服。**”如果育延学妹或者其他任何人知道韩爱晶等人调解清华武斗时找过蒯大富谈，请予以澄清。

我给你的上一封信，实际上也已对第二个问题做了结论，那就是：不论是韩爱晶的书还是韩爱晶的几封信，都没有“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的话，甚至没有一句涉及停止武斗的话！这段话完全是蒯大富的杜撰，是老蒯强加给韩爱晶的。

老蒯信誓旦旦地说，414“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可是，清华原两派的人却是在40年后的“现在”才听到这个“新闻”。

两派的头头也好，非头头也好，至今没有一个人表示“当时”听到过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消息；育延学妹的“结论”也没有说她“当时”是否听到过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消息。

不过育延学妹很聪明，她巧妙地说：“**也许清华双方都并不直接表示拒绝调停**”，也就间接地否定了老蒯关于414“坚决不能停止武斗”的说法；她接着又说“**但双方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提出苛刻条件，本身就是拒绝调停的最好手段**。”陈育延说414的“苛刻要求”就是不承认蒯大富为联合后的一把手！但她没有说团派的“苛刻要求”是什么。

就像是两兄弟正在打架，旁边的人不是先把打架的二人分开，而是先要理论清楚二人中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否则就任凭二人打下去。有这样“调停”的吗？

育延学妹说，“**当年的武斗，即使蒯大富不想打了，团派还会有更极端的王大富、李大富坚持要打下去**”。“而414的沈如槐，即使他不与‘蒯匪’打下去，还会有王如槐、李如槐出来与‘蒯匪’斗”。因此，“**双方的不妥协，应当是调解武斗失败的原因**”。

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平。

但这个“结论”，对于老蒯未必成立，老蒯自己说过，“**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对于沈如槐更不成立，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

我不知道育延学妹希望老四怎样“妥协”，也许，她希望老四放弃所谓“苛刻要求”，承认老蒯是联合后的一把手，但这样调解就能成功？老蒯就能放下屠刀？难道育延学妹不知道蒯大富“放下屠刀”的条件是“**(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

等四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 414 向团派投降；(4)拆除 414 的工事”吗？也许，育延学妹希望老四的“妥协”是接受蒯大富的这四条？

事实上，沈如槐想的是：“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刻撤出清华，到校外与团派周旋”。我要说，“到校外与团派周旋”可能仍然表示了沈如槐的善良和天真。我班的邢××同学，就是在“校外”的圆明园废墟处被抓的；吕应中，就是在“校外”的北医三院被绑架并秘密关押的；罗征启的弟弟，就是在“校外”自己的家中被绑架的。

究竟是蒯大富还是沈如槐“坚持要打下去”？7月27日是最好的证明。

工宣队在7.27进校时，沈如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个解救科学馆里100多人的绝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放414分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在短短的一小时之内与工宣队签署了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通知了各414据点；所有的414据点很快无一例外地成了工宣队的“解放区”。

可是，蒯大富呢？他看到工宣队把各据点分割包围，把被团派“包围得像铁桶似的”科学馆里的414放出来了，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回事啊？”工宣队包围了团派据点，“很恐怖啊！”“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所以就不断给“上面”打电话询问，得不到确切回答，就决定“抵抗反击”，终于酿成工宣队重大伤亡的惨剧！

直到今天，老蒯也没有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找原因，反而推卸责任说是因为谢富治、吴德“封锁消息”、“搞鬼”，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才造成这么大牺牲的。遗憾的是，韩爱晶、聂元梓也以同样理由为蒯大富开脱。不知育延学妹是否也持与老蒯相同的观点。

我给你的上一封信，也已经用大量史料事实对第一个问题做了结论，那就是：**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完全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欺人之谈！**育延学妹说：“蒯大富只是后悔自己‘想让中央表态’的投机失算了。真正的后悔是武斗结束后，否则也不会有7.27对抗工宣队”；实际上也对这个问题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

怒涛兄，你的追寻确实该收官了。你要追寻的，实际上是在前面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对此，最有力的史料物证——陈育延的笔记，佐证了邱心伟书中记载和韩爱晶回忆的一致部分（1968年5月初，市革委会成立了关于北大、清华武斗的小组），也佐证了邱心伟书中记载的正确（该小组是调查组，韩、王、蒯、聂是成员）和韩爱晶回忆的错误（该小组是调解组，韩、王、鲁是成员）。但是育延学妹却和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她的结论是“推论”出来的（韩、王与沈谈了，沈“并不直接表示拒绝调停”，但提出否定蒯担任一把手的“苛刻条件”，导致调解失败）；我的结论也是“推论”出来的（韩、王想找沈谈，但调查组中有蒯大富，沈因蒯大富本身就是武斗当事一方而拒绝谈）；我想，在找到新的证据之前，我的推论更合理，更有说服力。

育延学妹的一句“也许清华双方都并不直接表示拒绝调停”，似乎包含了太多的弦外之音：既暗示老蒯当年对武斗并不“真正后悔”；也暗示她本人当年没有听说过414“拒绝调停”；因而委婉地否定了老蒯关于414“坚决不能停止武斗”的说法。我衷心感谢陈育延的坦荡，也期待她的回忆录早日问世。

有人说，追寻此事的真相是小题大做，没有意义。我不这样认为。当大家都尊重历

史时，这样做的确是小题大做；但有人在 40 年后想颠倒历史时，这样做就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毕竟，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陈楚三 2011. 7. 3

(未完待续)

发表于：2011-07-07 20:09:29

三十、原点断点

我所追寻的“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最终的焦点集中于“韩爱晶有没有在 68 年 5 月上旬来清华找到沈如槐谈停止武斗”这点上，也就是“有”与“无”的问题。如果是“有”，接着就有双方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为什么调解失败了等等一系列更深入更实质的问题。要是“无”，那么“414 不愿停止武斗”这一说法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刚发表的《育延结论》是挺韩的代表作，即支持“有”的结论。《楚三结论》是挺沈的代表作，即支持“无”的结论。他们推理后的结论虽然迥然不同，推理过程的慎密与精彩，胜于华山论剑。

我多次分析、对比、推敲了他们的推理过程和结论，觉得各有各的道理。

陈育延谈的看法和她例举的人证、物证中，最过硬最有力的证据是作为当事人的韩爱晶、王大宾都说“武斗期间为调停武斗，两人共同来清华，都先见过沈如槐，无果而归。”有这一证据在，陈楚三想要用推论来否定“有”，难乎其难！

但是，面对沈如槐的严正声明，韩爱晶想要仅仅依靠证言来证实“有”，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早就承认：“如果韩爱晶的记忆可能出错的话，两个人同时记忆出错的概率是极低的。”在这里，我也应该指出，概率极低的小概率事件并非是概率等于零的不可能事件，仅凭两个人证几十年后的回忆做证言是不足以对真相定性的。

陈育延提供的物证仅仅证明了“在 1968 年 5 月 4 日市革委会组成了以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谭组成的调查组”是存在的。这物证连韩爱晶是不是来过清华都证明不了，更谈不到证明韩爱晶找到沈如槐调解武斗了。陈育延用“这个调查组是不可能无作为的”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把“韩爱晶找到沈如槐谈调解武斗”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都囊括到调查组的“作为”中去了！这样的推理是乏力的。还是陈育延自己说得好：“我的 1968 年 5 月 4 号工作笔记上的这段，是可以佐证这次调停武斗的可能性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它仅仅是佐证了“可能性”而已。

韩爱晶说，“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这被不少人当做

是韩爱晶确实在武斗期间与沈如槐见过面的证据。因为，“蒯匪”是武斗期间才有的专用语。

我想问：在5月上旬，离4月23日百日武斗开始才十几天，414方面是不是已经开始骂“蒯匪”了？据我不多的调查，个别老四叫“蒯匪”，是在530以后。而到7月中，因为好几个老四被团派无辜射杀，不少老四才开骂“蒯匪”。

“蒯匪”这句骂语，究竟是佐证了“有”，还是反证了“无”？全取决于在5月上旬这个时间节点上，414是不是已经开始骂“蒯匪”了。我想，所有参加武斗或在武斗期间在校的师生比我更有资格发表自己的见解。

陈育延68年5月4日的工作笔记和《大事日志》68年5月5日的记载，都提到调查组成员有蒯大富，没有鲁文阁。在这点上，陈育延的工作笔记是铁证。但是在《清华蒯大富》里，“会后，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都参加调解小组”，“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大家注意：这个时候，韩爱晶把蒯大富踢出了调查组，把鲁文阁拉进了调查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推理是：414拒绝调查组的理由是调查组里有蒯大富，不公平，所以拒绝。韩爱晶为了让414拒绝调查组的理由不能成立，于是用鲁文阁顶替了蒯大富。这样，414就没有理由拒绝调查组了，韩爱晶见到沈如槐调解武斗这件事就自然成立了！

可惜的是，陈育延的物证证明了韩爱晶所说的鲁文阁既参加了调查组又到清华调解武斗是虚构的“史实”，414因调查组里有蒯大富而加以拒绝是合情理的。

从现有的人证、物证出发，根据我的推理，参考陈育延、陈楚三的推理，我无法认同陈育延“有”的结论，我倾向于陈楚三“无”的结论。

我不认可陈育延的结论，是不是因为我“残留的派性”，让我无法“公正的看问题”？是因为我的“屁股决定脑子”？

我严肃地审视自己。我承认自己有派性残余，这主要表现在正当的追寻真相的理性与洗清泼在414身上污水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要是我没有一点派性，很难解释与百日武斗没有什么瓜葛的我居然起劲地赶了一趟追寻真相的浑水。

我并没有以现在还有派性为荣。在这点上，我很惭愧。所以我一直力求做到把理智置于情感之上，不要让派性蒙住双眼而分辩不清是非。我不同意“屁股决定脑子”的说法。所谓“屁股决定脑子”，我的理解是立场决定观点。在这里，就是派性决定判断。我猜想陈育延的结论也不是她在“屁股决定脑子”下做出的。

挺韩与挺沈，既不是以原来的团四派别为分野，也不是以谁的人品更值得可信为依据的。从已有的信息中，每个人按自己的逻辑思辨的思路、去伪存真的甄别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在每个人的心中得出自己的推论或结论。

陈育延问我，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我相信“有”。我列举了几条：

1、韩爱晶多次提到的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的记录。如果记录上有他见到了沈如槐，那就证实了“有”。如果会议记录与“有无”一点都不搭界，这样的会议记录即使解密了对“有无”的判断也没有一丝的史证价值。

2、团总部核心听到蒯大富传达韩爱晶与沈如槐谈判的会议记录（如果有这样的笔记本存在的话）。无论是当场的记录，还是事后的日记，只要是当时原始的记录提到韩爱晶见到沈如槐了，一样是最有力的物证。

3、井冈山或前哨广播台那段时间的广播稿录音带等资料（如果有的话），只要提到了韩爱晶见到沈如槐了，同样是最有力的物证。

类似这样的物证只要有一件，就足以说服我相信“有”。因为，它与韩爱晶王大宾这两个人证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我老孙心服口服地承认，真相的结论是“有”。

什么样的证据能证实真相是“无”呢？北京市革委会会议记录上没有韩与沈见面的记录能证实“无”吗？团总部核心的会议记录没有提到韩见到沈能证实“无”吗？团派广播台的现存资料中没有提到韩见到沈能证实“无”吗？都不能。

夸张一点说，即使参与武斗的所有两派头头、老团老四都说没见到韩爱晶找过沈如槐，能证实韩爱晶见到沈如槐这件事是“无”吗？还是不行。

只要韩爱晶一口咬定他见到过沈如槐，有这么一个人证在，虽然不能证实这件事肯定是“有”，但足以否定所有推论这件事是“无”的努力。因为，韩爱晶是直接当事人！

在民间的调查追寻中，证实“有”难，证实“无”比证实“有”更难！

韩爱晶在5月8日的那封信中说了一句“说有易，说无难”的话。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从正面的本意去理解的。韩爱晶的意思是说：对于这样一件对他来说具有“特殊心结和委屈”的难忘的事情，要说“无”是非常难的。

今天，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追寻，我对他说的“说有易，说无难”，有了另一种理解。我是从反面去理解的：对于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当事人说“有”，那么即使有一万个人说“无”，也是无济于事的。

多么意味深长的“说有易，说无难”！

当然，这种难与易，是在民间调查追寻情况下才这样。假如有一个好事之徒，以读者的名义上告法院起诉韩爱晶歪曲了历史真相，如果法院立案的话，韩爱晶就必须为自己的指控举证。那个时候就不是“说有易”，而是“说有难”了。当然这样的状况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通过追寻，我对韩爱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在本文中对他的感谢、赞扬、以及他在我追寻真相前期的积极配合，我至今都是肯定的，不变的。到今天，在“关门大吉”之际，我想对韩爱晶提几点批

评的意见供他参考。

李自茂在跟帖中写道：“韩爱晶给我来电说：孙怒涛不依不饶地要我出示书证，我上哪儿找去？此事只有悬着了，除非去查当年的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记录。”

从这段话中，我读出了三重意思：

1、韩爱晶承认了他在68年5月上旬来清华找到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并没有书证，只是凭他的记忆。那就是说，他在《清华蒯大富》后记中说的“对书中所述的每一个时间、地点及人物言行重新做严谨的考证”，这话，我认为显然是说得有点过、有点满了。

2、韩爱晶把书证寄托在他无法取得、我们更无法取得的“当年的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记录”上。对此，我不敢太相信会议记录一定能成为他的有力书证。说不定也是与陈育延出示的1968年5月4日类似的物证一样的呢？

3、韩爱晶在我不依不饶的追寻下而又无法出示书证的尴尬困境中被迫采取“悬着”的态度，我很难认同这是一种对历史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我想告诉韩爱晶的是，在有关清华武斗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上，把记忆当做“史实”写入自己认为是史书、别人也认为是史书的《清华蒯大富》中，不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原414派的主要头头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还有病中的汲鹏，无不对这样的“史实”表示强烈的质疑。这在派战之后的四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被“414不愿停止武斗”的说法严重伤害的何止仅仅是我们这几个头头的感情？！

我还想告诉韩爱晶的是，在清华两派艰难和解的进程中，他这一次所起的作用是非建设性的！

我希望韩爱晶今后如果发现了能佐证他说法的书证，请随时在校友网上公示，以让我能及时认错服输。

而要让韩爱晶承认记忆出错，对政治人物而言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譬如，要让韩爱晶就文革期间与沈如槐的重大政治交往由“只有一次”改口“有过两次”，连这一点他都做不到。

对于最后一篇连载的题目，我曾经拟了好几个。譬如“真相大白”、“大白天下”、“真相中白”、“不了了之”、“真相灰白”、“无言结局”都是候选的标题。到了今天，前两个标题当然不能用了，后面几个标题琢磨了一阵也感觉不贴切。最后我用了“原点断点”。

早就有人预言，我的追寻肯定是什么结果的。从不明不白的原点开始，到不了了之的原点结束。我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先见之明。很可能，他们早就看透了，真相能不能大白的关键，不是掌握在真相追寻者的手里，而是掌握在真相制造者的手里。

但是，我不认为今天的原点仍然是追寻之前的原点。通过追寻，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字资料给后人。对于那些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文革研究者而言，他们可以从我留下的“断点”开始，作为他们深入研讨的新“起点”。

追寻的结果并不圆满（最后也没有一个“有”或“无”的定论），但是我在追寻的过程中，收获了朋友，收获了友谊。我以前对“414 拒绝调查组”这一史实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次追寻让我对 414 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陈育延说得很好：“我们都不懂得妥协，双方的不妥协政策，造成了联合的失败，也造成了武斗的发生。武斗中的不妥协，则造成了更多的灾难和无辜者的死伤。”不少校友在跟帖中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有的提到，清华武斗能坚持百日的根源，除了政治观点的差别之外，是不是还有派别的利益利害在驱使着？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反思清华文革。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谢谢所有参与追寻真相和关注追寻真相的校友们！

（全文完）

发表于：2011-07-11 11:5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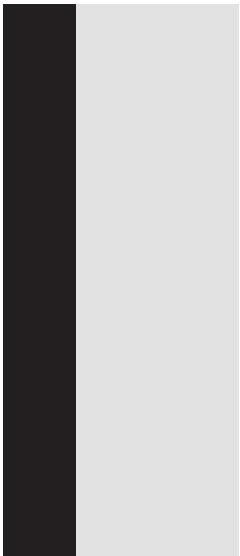
收录附言：

我追寻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一事的真相，始于 2011 年 3 月份。本来只想解开“有或无”的疑惑，没打算写什么文字。经过两个多月的追寻，因困难重重，难以继，遂于 5 月 18 日开始将追寻原委、追寻经过、追寻现状等以连载形式发表于清华校友网 1963/1964 社区（这是清华校友网中人数最多、最为活跃的社区），意欲引起校友们的关注，请大家提供线索，一起追寻历史真相。由于不少校友同样关心这一事件，而且追寻的结果究竟如何谁都不知道，每个人犹如身处悬疑剧中。一时，追寻话题讨论热烈，气氛活跃，争论激烈，回复帖子近 300，浏览人次近 6000。

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这篇一年多前发表的网文，有些文字似有修改的必要。但是，为了忠于历史，我在收录这篇文稿的时候没有在文字上再做任何改动。读者看了各方的观点，想必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在最后一节“原点断点”中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但是一些朋友还是希望我在收录这篇文章的时候把观点表达得更明确些。我遵嘱，写下我简短的“怒涛结论”：

所谓“清华百日武斗期间韩爱晶来清华并找到沈如槐调解停止武斗”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414 不愿停止武斗”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真实。



后记

后记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写回忆录，认为那是名人的雅事。当不少朋友先后鼓动我的时候，我都婉言谢绝了。日记早已在当年亲手销毁，工作笔记本也已全部丢失，手边没有一点点的资料，光凭脑袋里残缺不全的记忆，时空错位的印象，是写不成回忆录的。

后来，沈如槐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看了以后，更觉得没必要写了。他全景式地详细记录了清华两派斗争的这段历史，我想，414 这边已经不可能再有比这写得更全面更翔实的回忆录了。

但是，提议我写回忆录的朋友还是络绎不绝。在劝说的“软磨”和敦促的“硬压”之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 2007 年 8 月开始动笔写了一些。效果很不理想。写几个字，停几天。有时甚至一两个月没有一点进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才写了三四万字，都是一些素材片断。

我花了两天时间，翻箱倒柜把家里最彻底地折腾了一次，居然倒腾出一包“文物”来。一看，原来是我在清华做学生当老师期间写的检查、交代、总结、汇报等底稿，甚至还有中小学的成绩报告单。这对我这个四十年来在清华和杭州已经搬过不下十次家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印象中，材料不止这些。虽缺损得只剩下一小部分，但比一点没有要强多了。我如获至宝！看着这些底稿和材料，模糊的、遗忘的记忆又重新拾了回来，我以文革岁月中的心路历程作为写作思路豁然间清晰起来。

后面几年的写作虽顺畅却艰辛。面对历史，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有痛苦，有愧疚，有悔恨，有不解。我明白我已无路可退，只能勇往直前。

本书从启动前一直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有对我鼓励敦促甚至在回国时专门找到我对我认真叮嘱的，有一次次帮我回忆往事找寻资料线索的，有对我的初稿指正错误提出意见建议甚至逐字逐句修改的，有热心提供出版印刷信息解决各种困难的，还有慷慨解囊给我大额赞助的。他们中有汲鹏、王允方、陆元吉、陆小宝、杨继绳、孙耘、唐伟、胡鹏池、邱心伟、陈楚三、沈如槐、郑易生、沈昆、段云富、

周家琮、但燊、王良生、谭浩强、唐少杰、归圣华、周忠荣、蒋南峰、高季章、连果义、罗保林、雷翎、陈中平、鲍长康、林福宗、张雪梅、钟成国、崔兆喜、张蔼玲、颜慧中、陈育延、张肖蝶、樊程、铁流、万润南、刘万章、周薇、唐金鹤、陈继芳、马雨农、周泉缨、尹尊声、张慰黎、李秉实、梁国光、李祖胤、高汉三、施宇澄、沈沛润等以及许多还未提及的朋友（以上排名不分前后）。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这本书。我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我们这一代清华人，都怀有一颗对祖国对民众赤诚的心，都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都身体力行不让文革那样的时代悲剧重演，都祈望民富国强、政治清明、中华民族有美好的未来。否定文革、批判文革、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是我们的基本共识。如同别人带动了我，我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不同类型清华文革亲历者与我一起做这件事，于是我向一些好友发出了邀请。承蒙厚爱，他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篇篇都是力作，件件皆是上品。这些特约文稿均收录在【文革·反思】专题里。作者有当年的团派、414派、《八八》派和非团非四的朋友，有头头更有“小兵”。我还向一位干部、一位《八九》老红卫兵约稿了，可惜未能如愿，但愿以后能有机会搭建一个更大更广的平台让更多的清华人展示所思所想。来稿照登，文责自负。在这些精彩的文稿中，对历史的认识和对文革的反思不尽相同，有些分歧较大，某些观点我并不赞同，正如我书稿中的好些观点也不为这些朋友认同一样。这至少说明我们这些当年文革的参与者都在积极地、独立地进行着思考和探索。我邀请多位朋友写稿，还有一点小私心：这些朋友费了心血写成的精品佳作定能为我的拙作壮声造势、增光添彩。我向这些给我极大支持的朋友表示深谢和敬意！

我的朋友圈中，还有一部分老同学坚决反对我出版回忆录。他们担心我以言获罪，遭致安宁的家庭和平静的晚年毁于一旦。我同样非常感激他们的深情厚谊！

“言论、出版自由”早就写在庄严的宪法上，我衷心希望宪法的光芒普照到我和每个国民身上，不至于在文革结束近四十年后还发生不应有的不幸。

我虽万分注意别因言伤友，仍有些事令我非常伤感。为此，我要反躬自省，并表示真诚的歉意！

一滴水，于浩渺的大海微不足道。而大海就是由一滴水一滴水汇集而成的。我，不过是大海中即将被蒸发的一滴水。为尽责任，我写此书。凭心而行，无欲无悔。

本书虽经多次修改，也征求过多人意见，相信错误和不当依旧不少。真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怒涛 2013年1月

（邮址：snt100@163.com）

